

全捌册

大清风云

比正史更有趣·比野史更靠谱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大清风云

全捌册

比正史更有趣·比野史更靠谱



总目录

大清风云 . 1 , 帝国崛起

大清风云 . 2 , 定鼎中原

大清风云 . 3 , 康熙大帝

大清风云 . 4 , 雍正王朝

大清风云 . 5 , 风流天子

大清风云 . 6 , 江河日下

大清风云 . 7 , 风雨飘摇

大清风云 . 8 , 曲终人散

帝国崛起 大清风云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鹿鼎公子 著



壹

比野史
更靠谱

唯一可与成吉思汗比肩的军事天才努尔哈齐“七大恨”誓师，剑指中原，改“后金”为“大清”，皇太极横扫天下，三百年大清帝国由此崛起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比正史
更有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风云. 1, 帝国崛起/鹿鼎公子著.—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93-7305-7

I. ①大... II. ①鹿... III. ①中国历史 - 清代 - 通俗读物 IV. 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4360号

责任编辑: 胡 艺
(ngaihu@gmail.com)

封面设计: 古润文化

大清风云: 帝国崛起

DAQING FENGYUN:DIGUO JUEQI

著者/鹿鼎公子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32

印张/9 字数/268千

版次/2016年5月第1

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093-7305-7

定

价: 29.8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值班电

话: 010-66026508

邮政编码100031

传

真: 010-66031119

网址: <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

话: 010-66034985

市场营销部电话：010-66033393
话：010-66033288

邮购部电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清朝皇帝列表

姓名	庙号	年号	谥号	在位时间	皇陵
努尔哈赤	太祖	天命	高皇帝	1616—1626 年	福陵
皇太极	太宗	天聪 崇德	文皇帝	1626—1643 年	昭陵
福临	世祖	顺治	章皇帝	1643—1661 年	孝陵
玄烨	圣祖	康熙	仁皇帝	1661—1722 年	景陵
胤禛	世宗	雍正	宪皇帝	1722—1735 年	泰陵
弘历	高宗	乾隆	纯皇帝	1735—1795 年	裕陵
颙琰	仁宗	嘉庆	睿皇帝	1796—1820 年	昌陵
旻宁	宣宗	道光	成皇帝	1820—1850 年	慕陵
奕訢	文宗	咸丰	显皇帝	1850—1861 年	定陵
载淳	穆宗	同治	毅皇帝	1861—1875 年	惠陵
载湉	德宗	光绪	景皇帝	1875—1908 年	崇陵
溥仪	逊帝	宣统	—	1908—1912 年	华龙陵园



《秋兴八景图》之一

董其昌（1555—1636年），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秋兴八景图》是董其昌的精品之作，共八开，所画为作者泛舟吴门、京口途中所见景色。构图精巧，意境高远，韵味充足。笔墨则集宋元诸家之长，形成苍秀雅逸的画风。



《竹石鸳鸯图》

八大山人（1626—1705年），朱耷，明末清初江西南昌人，明朝宗室，宁王朱权九世

孙，著名书画家，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八大山人的山水和花鸟画都具有强烈的个性化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其简笔写意花鸟画。在这幅作品中，作者以起伏变化的运笔勾勒坡石轮廓，枯湿并用，线条圆转而带篆意；树叶叶面先以淡墨点出，再以浓墨写出筋脉，花朵则直接以笔勾出；禽鸟点染并用，无刻画之迹。整幅画作，用笔可谓纵之横之，无不如意，含蓄蕴藉，毫无笔仗锋芒之嫌。款识：“乙酉春日写，八大山人。”



青花人物纹缸

青花人物纹缸，明崇祯，缸直口，平沿，深腹，腹下渐收敛，平底，底心略凹。内施白釉。外壁绘青花人物纹。明末清初时期，文学艺术繁荣，不仅为瓷器纹样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而且还深刻影响着瓷器装饰画面的艺术表现手法。民窑瓷器上的许多人物画中除了常见的婴戏图、八仙祝寿外，表现戏曲故事也特别盛行，《三国演义》《西厢记》《水浒传》等作品中的内容比比皆是，这与明代万历以来带有版画的戏曲剧本的大量流行有关。



皇太极调兵木质信牌

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643年），爱新觉罗氏，是后金的第二代大汗和大清国的实际建立者，年号天聪、崇德，庙号清太宗，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牌上所刻“宽温仁圣皇帝”为皇太极的谥号。

总序

清史洋洋洒洒近三百年，三百年间怪事、奇事、惨事、恨事迭出，三百年年年都精彩，年年都有挥之不去的喜怒哀乐。整个清朝三百年，几乎囊括了人性中一切的极端面，三百年，道不尽的风云爱恨。

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骑兵，建立了后金，身后留下了无数的尸体，最终倒在宁远城下，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书生袁崇焕手中，就此郁郁而终，这是上天对一个暴力征服者的最大讽刺。随后，努尔哈赤诸子开始斗智斗勇，最后皇太极靠谋略成为老大。

皇太极穷其一生精力都在与明朝对抗，不幸暴毙后，大清国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多尔衮与豪格之争最终便宜了顺治。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后，成为皇父摄政王，将全国军政大权操于一身，顺治完全被架空。此时，孝庄和顺治母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危难关头，孝庄舍身保大清，稳住多尔衮，终于使大清逃过这一劫。

顺治是个痴情天子，亲政后喜欢跟母亲孝庄闹不愉快，结果自己和董鄂妃双双去世。康熙继位时才八岁，不过这是个早熟的孩子，也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很早就懂得帝王之术。在别人还是懵懂少年时，他就已经像个猎人一样盯紧了鳌拜，除掉鳌拜之后，康熙开始了自己雄才大略的一生。

康熙治国和外交不外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所以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鳌拜，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荡平准噶尔，击退沙俄侵略……在整个清朝，帝王之术在康熙手中达到顶峰。

然而，康熙也有缺点，他的法度不够严明，治国主要是依靠儒术和道术。雍正虽然上位不明不白，但当皇帝后弥补了康熙的缺点，雍正治国理念上最大限度地奉行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乾隆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他继位后，废除雍正的依法治国思路，重新走康熙的路子。但乾隆并不懂康熙真正的治国精髓，结果变成了外用儒术、内用权术，所以清朝在乾隆时期开始走向衰落。

自乾隆后期，动乱纷起，尤其是白莲教叛乱几乎烧遍整个中国。到了嘉庆手中，国家元气已大伤，嘉庆虽然是个仁君，可惜终究没有先祖那份雄才。他虽然减缓了国家的衰颓，但始终没能重振大清的雄风。到了道光手中，国家就更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欺负得

够呛，国内的动乱更是风起云涌。

咸丰就更悲剧了，太平天国和天地会起义，全国天翻地覆。更糟的是八国联军来了，他连个京城都保不住，年仅三十岁便郁郁而去。咸丰死后，朝政大权掌握在“龙夫人”慈禧手中，国家每况愈下，虽然中途出现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可惜终究是昙花一现。

清末虽然出现了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袁世凯这样的中兴名臣，但亡局已定，神仙也不能力挽狂澜。最终，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千古帝王，悠悠万事，功过自有百姓言，清朝这些事儿，就交给读者去慢慢品味吧！

序言

据说努尔哈赤的先祖们住在长白山天池附近，传说很美丽。一天，有三个仙女到天池里洗澡，结果一只喜鹊啄来一个果子，让三个仙女中最小的一个妹妹怀孕，生下了布库里雍顺，这个仙女的儿子便是清朝的始祖。

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明朝忠心耿耿的奴才，然而很不幸，他们都死在明军手中。祖父和父亲的死在努尔哈赤心里种下了对明朝的恨，他向明朝索要赔偿。结果明军用十三副铠甲、几十匹马把他打发了，努尔哈赤把这些资本当成自己的第一桶金。

从此，草原上多出了一匹野狼。努尔哈赤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他才是草原上最凶猛、最狡猾、最无敌的苍狼，他用四十多年的时间，统一女真各族，稳住蒙古各部，奠定了在草原上的至尊地位。随后，他开始出兵讨伐明朝，所向无敌，直至遇到袁崇焕。

草原苍狼一世英雄，却在袁崇焕一个文弱书生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撤离宁远城不久，努尔哈赤就一命呜呼，至死他都想不通，自己纵横天下几十年，无人能敌，无人能挡，怎么就败在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手中。

努尔哈赤走得匆忙，连个遗嘱都没留下来，或者留下了遗嘱，但被人篡改了。总之，他死后，一场激烈的储位争夺战开始了。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大妃阿巴亥虽然地位尊崇，三个儿子手握三旗兵马，无奈皇太极谋略更高一筹，不但逼死了阿巴亥，打压多尔袞三兄弟，更将汗位收入囊中。

皇太极是个英明的领导者，虽然武功比不上努尔哈赤，但治国头脑绝对比努尔哈赤要高。在他手中，后金变成大清，国势蒸蒸日上。但皇太极仍然不是袁崇焕的对手，袁崇焕建立的关宁防线依旧牢不可破。

皇太极虽然没能击败崇祯，但确实将大明折腾得气数将尽，最后被李自成轻松夺得大明江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是大清的奠基者，可谓两位开山祖宗。努尔哈赤用武力打下了大清的基石，皇太极用文治巩固和拓展了大清的基业。

然而，这个主张以仁政治国的皇太极活的时间却很短，五十一岁的时候突然暴毙。他的死因至今仍是谜，有人认为是病死的，有人

认为是被多尔衮和孝庄谋杀的。皇太极之死成为清初的重大谜案之一。

皇太极一生中除了文治武功之外，与海兰珠的爱情也是他一生中的亮点。作为努尔哈赤的儿子，战争和权谋几乎占据了皇太极全部的生活，但在杀戮与争夺之外，皇太极总算找到了自己的真爱——海兰珠。

真爱总是以悲剧的结局收场，海兰珠为皇太极生下的儿子不幸夭折后，海兰珠从此陷入抑郁中，不久便撒手人寰。海兰珠去世后，皇太极深受打击，没过多久也随海兰珠而去。

杀伐权谋之外还有真情，皇太极也不失为一个真英雄。

目 录

清朝皇帝列表

总序

序言

上篇 草原英雄努尔哈赤

第一章 神 话

努尔哈赤的简历

暴力创业背后的美丽神话

神的后代就是不一样

第二章 十九岁才出门闯天下

走向社会

与李成梁的纠葛

荒唐的嘉靖皇帝

第三章 第一桶金

一场灾难

第一桶金，第一笔业务

第四章 小老板到大老板的成长之路

女真族

通往大老板之路

第五章 猛如虎，警惕如鼠

暗杀努尔哈赤的刺客们

硬 汉

第六章 我是恶鱼我怕谁

古勒山大战

哈达与辉发

一统海西女真

第七章 女真族最后一个大佬

征服东海女真

招抚黑水女真

第八章 蒙古，你好

玩的就是和亲

林丹这匹烈马

第九章 内部清理：囚弟、杀儿、休妃

辣手无情灭亲弟

狠心诛长子

休宠妃之谜

第十章 后金缔造者

八旗制度

创建满文，发展满族文化

善于韬光养晦的老狐狸

建立后金

第十一章 高举反明旗帜：七大恨

七大恨

皇太极计破抚顺

攻克清河

萨尔浒之战

处理朝鲜问题

第十二章 命中克星袁崇焕

成功者的经验

泼胆汉袁崇焕

下篇 雄才大略的皇太极

第一章 他叫皇太极

阿巴亥之死

政治巨星皇太极

第二个巨人

第二章 治国奇才

更像是汉人的领导者

皇太极：汉官们，你们有福了

第三章 高手过招

太极对太极

忽悠整忽悠

硬碰硬

第四章 袁崇焕之死

祸 端

死 期

第五章 大凌河之战

阿敏的问题

围攻大凌河

投降不分先后

第六章 消灭林丹汗

终于啃掉硬骨头

联姻与整人

第七章 皇太极的大清

第八章 明朝的失败

扫荡京师周边

议和的失败

崇祯：一个最能折腾的皇帝

松山之战

招降洪承畴

祖大寿再次投降

第九章 结 局

崇祯的结局

皇太极的结局

接班人之争

上篇 草原英雄努尔哈赤

第一章 神 话

一幅充满春意的画面出现在我们面前，三个迷人的仙女在湖水中嬉戏，不时还发出阵阵娇笑声。本来只是洗澡而已，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一切风平浪静，三个仙女会按时回到天庭和家人们一起晚餐。不光历史，神话中也往往充满了意外，这次捣蛋的是一只喜鹊。这只喜鹊干了啥坏事呢？这事要放在现在可是大事了，这喜鹊居然让三妹佛古伦怀孕了。

努尔哈赤的简历

大清国本是女真族的后代，南宋时金国铁骑在中原长驱直入，险些就将中原的大好江山据为己有。岂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蒙古人从背后插了一刀，先用二十三年的时间将曾经不可一世的金国灭掉，然后又用五十多年时间灭掉了看似柔弱的南宋。

金国被灭之后，女真族从此沦为流民，零落四散。后来又慢慢聚集起了小的部落，但是从此再也没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直到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出现。努尔哈赤好比是蒙古人的成吉思汗，他凭借一己之力，统一了女真各个部落，建立起了后金政权。那么，“大清”这个国号又是怎么来的呢？

相传，努尔哈赤曾经被敌人追杀，骑着一匹青色的马逃跑，这匹马跟随他南征北战多年，彼此之间有一种默契。它仿佛知道努尔哈赤处境危险，驮着受伤的努尔哈赤一路狂奔，终于摆脱了追兵。可惜这匹马停下来时却倒地不起，活活累死了。努尔哈赤很心疼，含泪将它埋葬，并在马的坟前说：“大青马啊大青马，倘若有一天我努尔哈赤建立霸业，国号就叫‘大清’！”

这只是英雄与骏马传说的又一版本，事实上努尔哈赤的国号是“后金”，“大清”的国号是皇太极选的。学者推测，大清可能来自蒙古语，意思是善战者、出类拔萃者。皇太极马上打天下，希望后世子孙永远继承祖先的尚武精神。

努尔哈赤是大清帝国的奠基者，在清朝历史中享有最尊贵的地位。清初“三祖一宗”，庙号中能够享有“祖”字的大都是雄才大略的皇帝。努尔哈赤是清朝的开国皇帝，庙号太祖；顺治是第一个入关统一

中原的皇帝，庙号世祖；康熙皇帝文韬武略，开疆拓土，守成的同时不忘拓展业务，功劳显赫，庙号圣祖。皇太极虽然也是一代雄主，可惜死得早，只享有太宗的庙号。皇太极如果多活十几年，入关就轮不到多尔袞和顺治了。

我们先来看看清朝第一个皇帝努尔哈赤的简历吧！

姓名：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生卒年：1559—1626年（享年67岁）

庙号：太祖

荣誉称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创业时间：二十四岁以十三副铠甲起兵

对象：十六人，其中叶赫那拉是皇后

子女：十六个儿子，八个女儿

继承人：皇太极

最大的成就：建立后金

最大的失败：宁远之战，败给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袁崇焕

最不幸的事：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

最痛心的事：杀死长子褚英

最擅长的事：打仗与谋略

暴力创业背后的美丽神话

努尔哈赤出生的那一年正是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明朝历史上一个非常荒唐的皇帝。这个人倒不怎么坏，也不残暴，但他长年累月迷恋神仙道术，竟然开创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的纪录，结果让奸臣严嵩专权十七年之久。明朝后期尽出这些皇帝，努尔哈赤可谓是生得很逢时。

努尔哈赤出生于今天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父亲是塔克世，母亲是喜塔喇氏。努尔哈赤以暴力的方式为大清奠定了基业，位置尊崇，人们自然会好奇，努尔哈赤的祖先是谁呢？

根据《清太祖实录》的记载，努尔哈赤的先祖居住在长白山一

带，如果书中所记叙的内容属实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是住在离长白山天池不远处。书中说“山上有潭，曰阊门”，这个阊门很可能就是指天池。阊门原意是指天池的出口，后来引申为天池。

中国古代帝王的神话实在是太多了，努尔哈赤也不例外。有些神话很美丽，但是它的本质却很狰狞。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这样区分魅力统治和法律统治，魅力统治的基础是被统治者相信统治者具有某种超凡的能力、品格及魅力，为了强化统治力量，这些能力与其说是后天获得的，不如说是自然、神或者命运赏赐的；而法律统治则是你有管理的才能，我们把国家交给你。

魅力统治往往是跟暴力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努尔哈赤的一生是暴力征战的一生，为了给暴力披上一层诗意和貌似合法的面纱，他需要美化一下自己的出身。

故事是这样的，某一天——这一天具体是哪年哪月哪日没人知道，总之是年代久远。在布尔湖上空飘来三朵云彩，仔细一看，发现是三位仙女下凡。这三位仙女是三姐妹，大姐叫恩古伦，二姐叫正古伦，三妹叫佛古伦。这三姐妹长得都非常漂亮，身材也很性感，她们下凡也不是有什么大事，就是在纯净的布尔湖里洗洗澡。

一幅充满春意的画面出现在我们面前，三个迷人的仙女在湖水中嬉戏，不时还发出阵阵娇笑声。本来只是洗澡而已，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一切风平浪静，三个仙女会按时回到天庭和家人们一起晚餐。不光历史，神话中也往往充满了意外，这次捣蛋的是一只喜鹊。这只喜鹊干了啥坏事呢？这事要放在现在可是大事了，这喜鹊居然让三妹佛古伦怀孕了。

喜鹊当然没能力让仙女怀孕，不过这喜鹊口里衔着一颗红色的果实。这只坏喜鹊也不知是受谁的指使，居然将果子放在三妹的衣服上。三妹看到这晶莹剔透的红果子，很是喜欢，穿衣服的时候把果子含在嘴里，结果一不小心就吞下了。

刚一吞下，三妹就感到身子发重，肚子里好像多出了什么东西。身体发重，飞起来就特别困难。两位姐姐是过来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都说：“三妹，看你这样子，八成是受孕了。现在你也不要抱怨了，冤大头肯定是找不到的，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啊！你就在凡间好好休养吧，把小家伙生出来，我们再来接你。姐姐就先走了。”

这两位姐姐不厚道，妹妹一怀孕，就不闻不问。幸好，这三妹也挺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不用找接生婆，自己就把儿子产了下来。这男孩刚一出生，就会说人话。更奇怪的是，还没几分钟，他就一下子长

大成人了——仙女的后代嘛，可以理解。

三妹虽然生孩子的能力比较强，但不是一个好母亲，天庭多舒服啊！她看了看孩子，便把自己是如何生下他的如实告诉了他，算是给孩子最早的性教育启蒙吧！接着她又说：“你姓爱新觉罗，名布库里雍顺。上天让我生下你，就是为了让你成就大业，平定那些混乱的国家，并好好地治理它们。你现在顺着这条小河游下去，就会到达你的目的地，你将统治那里的人民。孩子，去吧，别辜负娘的期望。”

神的后代就是不一样

爱新是族名，觉罗是姓氏，后来爱新觉罗合为一个姓氏，意思是像金子般高贵的觉罗族。

这个布库里雍顺真是一个好孩子，目送母亲飞天之后，立刻找了一叶小舟，顺流而下，终于找到有人烟的地方。这个地方叫鄂多理城，在今天黑龙江省依兰县的南面。这地方的人特别给力，布库里雍顺一来就看到他们互相厮杀。布库里雍顺一看，果然如仙女母亲说的，这地方的人特别混乱，得好好治理他们。

布库里雍顺坐在一个地方，后来有人看他非常奇怪，一直端坐着摆姿势，那时人们很少见到摆酷的，所以很好奇，便过来问他，你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布库里雍顺自豪地说：“我从雪山来，仙女佛古伦是我的母亲，我叫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我是来拯救你们的，从此以后你们要跟着我，不要再互相仇视，要和和睦睦。”

这地方的人可能智商不够发达，听他这么一说，就相信了他，还拥戴他为国王。

传说中的这个布库里雍顺就是清朝的始祖。布库里雍顺虽然能力非凡，但是生的后代却很不争气。由于这些败家的子孙“前仆后继”地努力，国家终于发生动乱，布库里雍顺的后代尽数被杀，只剩下一个小儿子侥幸逃脱。

这个小儿子叫范察，他逃到一个荒野中，但是后面的人还是紧追不舍。眼看就要命丧于此，范察灵机一动，反正现在夜色黑暗，不如装成一段枯木，或许能逃过一劫。于是，他一动不动，蹲在地上，好比一段枯木。突然，一只喜鹊飞了过来——又是喜鹊。喜鹊对爱新觉罗家族确实很眷顾，为了迷惑追兵，喜鹊故意落在范察的头上。

追兵们来到旷野中，四处查看，忽然看到有一个有点儿像人又有点儿像枯木的东西。

“会不会那个就是范察？故意躲在那里装木头人。”一个追兵说。

“不可能，你昏头了，喜鹊怎么会落在人的头上呢，肯定是枯木了。”另一个追兵说。

追兵们找不到范察，只好打道回府。范察逃出去以后，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了一道祖训：“不可以伤害喜鹊，喜鹊是神鸟，是我们爱新觉罗的福星。”

范察逃走之后，终身隐姓埋名，是个胆小怕事的主。这个传说不外乎是告诉人们，努尔哈赤的先祖们得到神的庇佑，另外也证实了满族人优待喜鹊并非空穴来风。

范察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孙子，叫孟特穆。此人志向不小，想要恢复布库里雍顺时的辉煌。根据《大清满洲实录》，孟特穆这人很了不起，有勇有谋，把仇人引诱到苏克素护河呼兰哈达山下一个叫赫图阿拉的地方，然后杀一半，留一半，总共杀了四十多人，剩下的四十多人先留着做人质和奴隶。后来，孟特穆定居在赫图阿拉；再后来，他的气消了，把另外四十多人也放走了。

孟特穆在明朝和朝鲜的官方文书中又被写作“猛哥帖木儿”，学者们推测，孟特穆活跃时期大概在洪武年间和明成祖朱棣期间。

这个孟特穆确实是个有脑子的人，他为子孙后代选择了一个好地盘。赫图阿拉前有苏克素护河，背靠呼兰哈达山，有山有水，渔猎方便，适合居住和发展。这块地方无论是从富庶还是风水的角度来说，都是一块宝地。所以，有许多风水大师说，清朝之所以能入主中原，就是因为祖先选的地方好，找准了龙脉。后来清朝追尊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说明他们看到了孟特穆的重要性。

孟特穆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是董山，次子是阿谷。后来，为了躲避战乱，孟特穆带着家眷们投靠朝鲜，和朝鲜宫廷关系密切。直到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孟特穆还活着，当时朱棣下诏安抚女真各部，希望流亡在外的女真族都回到大明帝国的怀抱。朝鲜国王李芳远对孟特穆也非常重视，千方百计笼络挽留。

就在孟特穆举棋不定的时候，朱棣派出使者，点名让孟特穆回国。可惜，朝鲜那边不愿放行，他们说：“所有女真人都可以放行，就是孟特穆不行。”

大家知道，朱棣跟他老爸朱元璋一个德行，谁要是敢违拗他，那

真是找死。听说朱棣发怒，朝鲜那边才战战兢兢又恋恋不舍地让孟特穆回了国。朱棣见到孟特穆后，乐呵呵地封他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建州地方非常大，西至今吉林市东南，东近日本海，北达穆稜河，南过图们江。朱棣把这么一大块地方给他，当然不是为了让他养老，而是让他遏制朝鲜和蒙古。

孟特穆也很识抬举，尽心尽力为朱棣办事，所以君臣之间关系非常不错。孟特穆对朱棣的忠心到了什么程度呢？可以说到了家破人亡也要赴汤蹈火的地步。

在斡木河之变中，孟特穆听从朱棣的命令，去招抚一批不太听话的女真族。招抚没有成功，双方大打出手，这是孟特穆没有料到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有人敢跟大明作对。因为这一个没料到，自己和次子阿谷都在战乱中丧命，长子被人掳走，只有弟弟凡察逃脱。

虽然孟特穆的后代努尔哈赤建立的大清取代了大明江山，但是清朝的先祖中还是有一些对明朝“忠心耿耿”的人。这层关系，也是后来努尔哈赤崛起的资本。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没有祖上与明朝的这些关系，后来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明军能说赔偿就赔偿吗？而明军的赔偿是努尔哈赤崛起的第一桶金。

后来，迫于明朝这个大帝国的压力，“叛徒们”不得不归还孟特穆的长子董山。董山本以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没想到回来后，没法继承父亲的职位。为啥呢？叔父凡察在那儿霸占着，这样一来，家庭不和谐，一场斗争是免不了的。

明朝为了缓和这对叔侄之间的矛盾，给董山升职，让他和叔叔平起平坐。没想到这个举措不但没有缓和矛盾，反而让矛盾升级。这是可以理解的，一山不能容二虎。实在没办法了，明朝决定将建州一分为二，左卫由董山掌管，右卫由凡察掌管。这样一来，各有各的地盘，井水不犯河水，矛盾才得以缓解。

董山与明朝的关系不太好，势力强大之后，经常在边境处打砸抢。董山的三儿子叫锡宝齐篇古，锡宝齐篇古只有一个儿子，叫福满。福满就是努尔哈赤的曾祖，后来被追尊为兴祖直皇帝。福满有六个儿子，第四子叫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后来被追尊为景祖翼皇帝，居住在赫图阿拉。觉昌安的第四子塔克世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后来被追尊为显祖宣皇帝。

最后，我们为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编一条线索：布库里雍顺——范察——孟特穆——董山——锡宝齐篇古——福满——觉昌安——塔克世。

第二章 十九岁才出门闯天下

努尔哈赤出生于1559年，也就是嘉靖三十八年，作为家中的长子，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努尔哈赤这辈子会非常平静幸福。父亲去世后，就是他继承职位。但世事总是无常的，老天注定不会让努尔哈赤这样一个奇才过着平淡平庸的生活。

走向社会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努尔哈赤的母亲喜塔喇氏怀孕十三个月才生下他，“孕十三月而生”，比平常人多酝酿了三个月，怪不得这儿子后来那么神勇。《清史稿》说努尔哈赤长大后外表看上去非常雄伟，有伟人风范，“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沈几内蕴，发声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翻译过来，就是说努尔哈赤这个人仪表堂堂，思想阔大，深谋远虑，声音响亮如洪钟，看书过目不忘，心胸宽阔，可以招揽各种各样的人才。

《清史稿》拍努尔哈赤的马屁是必须的，但这些话说得也不算夸张，从努尔哈赤的表现看，也算得上名副其实。

努尔哈赤出生于1559年，也就是嘉靖三十八年，作为家中的长子，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努尔哈赤这辈子会非常平静幸福。父亲去世后，就是他继承职位。但世事总是无常的，老天注定不会让努尔哈赤这样一个奇才过着平淡平庸的生活。

努尔哈赤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是非常困窘的，曾经流落到抚顺等地，还给一个女真部落的首领当过伙夫。这段经历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桥段，这个首领虽然不是一个美食家，但绝对是一个美食铁杆粉丝。每顿饭都要八菜一汤，一样也不能少。有一次宴会，首领让一个女厨师做饭，努尔哈赤帮她打下手。这个女厨师不知道咋回事，做到第七个菜的时候突然晕倒了，估计是油烟闻多了。这时，首领正等着最后一道菜，没办法，努尔哈赤只好自己上场，努尔哈赤把切好的里脊肉裹上蛋黄液，然后放进锅里翻炒。结果给首领尝后，首领觉得今天这道菜跟往常不太一样，特别好吃、特别香，便问努尔哈赤缘由，努尔哈赤如实相告。首领听了很高兴，问努尔哈赤这道菜叫啥名字，努尔哈赤为了讨吉利，答道：“这菜叫黄金肉。”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努尔哈赤不仅会打仗，也很有厨师天赋。据说，满洲每届大典都要上黄金肉，而且上这道菜都要讲讲这个故事，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个打江山的老祖宗。

中国历史中，每逢乱世，都会流行各种各样的望气理论。

努尔哈赤时代，有一些会望气的人说，满洲不久就有圣人出，这个人将勘定动乱的天下，统一天下，登极为帝。后来，一些眼光特别犀利的长者看到努尔哈赤，见这个人生得凤眼大耳、英俊非凡、身材高大，肌肉发达，说起话来口齿清晰，声音洪亮。再看他走路，龙行虎步，一举一动都给人威严的感觉。更难得的是，这个人心性正直刚毅，对人诚恳，喜欢贤人，讨厌小人。大家觉得，将来这天下肯定是这个人的。

这些当然更多的是清朝后代对努尔哈赤的美化，就算努尔哈赤长得跟WWE（世界摔角娱乐）总决赛的冠军一样，我想也不至于有人说他要当皇帝吧！虽然那时候大明挺腐败的，但也还没到墙倒众人推的地步。随便说某人是个皇帝胚子，这可是灭族的大罪。

努尔哈赤的童年是幸福的，父亲有权有势，母亲很贤惠，又很疼爱他。十岁那年，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终于来到，母亲病逝。继母纳喇氏对他很不好，可能是嫉妒这孩子比自己的儿子优秀，所以想方设法冷落虐待他。《大清满洲实录》记载：“十岁时丧母。继母妒之。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年已十九矣。家产所予独薄。后见太祖有才智，复厚与之。太祖终不受。”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继母对努尔哈赤很不好。十九岁那年，继母说服老公跟努尔哈赤分家，只给努尔哈赤一点点财产。努尔哈赤被迫独立生活。后来，父亲塔克世发现努尔哈赤这孩子能力强，准备多给他点儿财产，不过努尔哈赤自尊心很强，坚决不接受。

自尊心是需要本钱的，没有钱就没有尊严，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都懂。所以努尔哈赤敢于拒绝父亲，说明他那时候已经可以自立了。努尔哈赤没什么手艺，他是怎么解决经济问题的呢？

努尔哈赤虽然没什么手艺，但是力气和武功还是有一些的。为了糊口，他经常跑到山里去打猎，什么野猪啊、麋鹿啊、花貂啊、野鸡啊，这些东西在现在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但当时东北一带这些东西挺多的，想靠打猎成为资本家不太现实，不过糊口还是没问题的。除此之外，努尔哈赤也像女人一样，在山里面采摘一些果子、木耳、蘑菇之类的，运气好的话，偶尔还能碰到一些人参。

当时，抚顺有一个马市，也就是集市，这是明朝政府设立的贸易

点，目的是方便汉族和女真族通商贸易。努尔哈赤经常把自己从山里“淘”到的东西拿到马市上去卖，赚钱的同时也接触了不少的商贾，这些商贾来自不同地方，有女真人和汉人，也有蒙古人，还有朝鲜人。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努尔哈赤学会了汉语、蒙古语、朝鲜语，还研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著作，为日后打江山奠定了文化基础。

大家知道，努尔哈赤打仗非常厉害。其实，努尔哈赤并没有专门练过，只是料子比较好，后来又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上山打猎，慢慢地，各种兵器就耍得有模有样了。不过，努尔哈赤的看家本领是骑射，他箭术之精湛让人刮目相看。关于他的箭术，还有一个类似于“百步穿杨”的传说。

在东北一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弓箭手叫纽翁锦，这个人名声在外，连努尔哈赤都听说过他的大名。有一次，努尔哈赤找到他，以一种崇拜的眼神看着他，希望他能“赐教赐教”。纽翁锦对自己的箭术非常自信，毕竟是行业中的领军人物。于是，他对着百步之外的一棵柳树，开始了才艺表演。不知道是不是看到努尔哈赤特别有压力，还是怎么回事，总之大失水准，射了五箭，只中三箭，而且射中的三箭落点也参差不齐，丝毫不像一个具有顶尖水平的职业选手。轮到努尔哈赤表演的时候，五矢连中，而且落点都聚集在一起。

看来，专业选手往往不是业余选手的对手，专业选手往往受教条束缚，而业余选手却精神自由，游刃有余。看到努尔哈赤的精彩表演，纽翁锦嘴巴张开，呆了半天。

与李成梁的纠葛

接下来，努尔哈赤会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辽东总兵李成梁。李成梁既是努尔哈赤的贵人，又差点儿要了努尔哈赤的命。我们先来说说李成梁这个人吧！

李成梁的祖先是朝鲜人，归附明朝后，迁居到今天的辽宁铁岭。李成梁是天生的将才，如果不是后期生活腐化，足以和戚继光齐名。李成梁早年生活穷困，四十岁才开始当兵。当兵之后，发达得非常快，因为他很会打仗，屡立战功。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李成梁凭借赫赫战功当上了辽东总兵，镇守辽东三十余年，在十次大战中十次取胜，如此“武功”在明朝边帅中两百年未曾有过。

人功劳一大，难免会恃才傲物。李成梁也是这样，虽然前期英明

神武，后来却没法控制自己腐化堕落。别人送来的金银财宝和美女照单全收，算是享受到官场潜规则的好处。李成梁虽然是朝鲜裔中国人，但官儿做得还是顺顺当当的。

努尔哈赤在山上打了三年的猎，手下功夫和刀剑功夫自是不用说。后来他觉得常年做一个猎人也并非办法，守着深山多寂寞，不如在外讨个活路吧！就这样，努尔哈赤参军了，投到李成梁的帐下。努尔哈赤这人天生就是块战士的料，在战场上很猛很恐怖，常常能瞬间秒杀敌人。努尔哈赤当了三年的兵，收获非常大，这是从猎手到战士的华丽转身。战场上的经历给他积累了作战的经验。

接下来就是八卦了！

李成梁看努尔哈赤会打仗，人也比较老实，就把他收到自己的帐下。

一天晚上，李成梁正在洗脚，得意非凡地对自己的爱妾说：“你看啊，我之所以能当总兵，正是因为我脚上长着七颗黑痣啊！”

这个爱妾脱口道：“咱们那个警卫员努尔哈赤脚底还长着七颗红痣呢！”

李成梁一听，脸色顿时白了，七颗红痣在古代可是天子的象征啊！前段时间，明朝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正躺在龙床上安睡。忽然，有一个怪物走了进来，这个怪物穿着龙袍，长着龙头人身，走起路来龙行虎步，霸气十足。皇帝见了，以为是东海龙王给自己送礼。忽然，那个龙头人看到皇帝，大怒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睡在朕的床上？还敢非礼朕的妃子，好大的胆子！”

皇帝大怒，从床上跳了起来：“我才是皇帝，你这个怪物还不给我出去！”

那人听了居然大笑，说：“真是跟不上潮流啊，你们姓朱的早已经是明日黄花了。我才是真龙天子，不信你看我脚上有七颗红痣……”

那人一抬脚，明朝皇帝一看，果然如此，顿时大惊，脚踩七星在古代就相当于是真龙天子的证据。七颗红痣象征着北斗七星。

梦醒之后，明朝皇帝立刻找人解梦，解梦的都说天下可能要易主，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那个脚踩七星的人，然后把他杀掉。

李成梁几天前就接到皇帝的命令，让他一旦发现脚踏七颗红痣的人，立刻抓住，重重有赏。紧要关头，李成梁也没细想为什么自己这爱妾知道努尔哈赤脚上有七颗痣，只想赶快抓住他，送到皇上跟前邀

功。李成梁把事情前因后果一说，这个爱妾心里一咕咚，妈呀，这不是让我的小情人去送死吗？得救救他。

小妾一方面后悔自己不小心泄露出小情人的秘密，另一方面积极营救小情人。小妾找到努尔哈赤后，给了他一些盘缠，让他赶快逃。努尔哈赤非常感动，心想她对我的感情是真的，不只是肉体之欢。于是，感激涕零地和她分手，便骑上自己的大青马，还拉了自己的黄狗一起逃跑了——搞不懂努尔哈赤怎么没带上小妾，也许在他眼里，黄狗比小妾更重要。

努尔哈赤逃跑之后，小妾找了一棵柳树，将白绫往上一抛，就此悬柳自尽，也算是殉情吧！想必她对李成梁很不满，毕竟当时李成梁已经是老头了，虽然李成梁最后活了九十岁。

李成梁发现努尔哈赤逃跑，回来后又看到爱妾自杀，顿时心里明白了八九成。狂怒之下，他把爱妾的尸体脱光，亲手给了她四十大板。

前面说到那匹大青马为了救努尔哈赤而活活累死。这条黄狗也为努尔哈赤这个大英雄光荣牺牲了，事情是这样的，大青马累死后，努尔哈赤以为追兵已走，疲累至极，便躺在芦苇丛里睡觉。追兵们没有找到努尔哈赤，决定一把火把这里烧掉。当时，遍地大火，很快就要烧到努尔哈赤身边，可努尔哈赤还像死人一样睡着。黄狗不停地舔努尔哈赤，希望把他舔醒。但努尔哈赤太累，火已经烧了过来，努尔哈赤还在睡。没办法，黄狗只好自己跳进河里，浸湿全身，然后来到努尔哈赤身边打滚，将着火的草扑灭。努尔哈赤因此而活了下来，但黄狗却累死了——又是累死。

努尔哈赤醒来后，发现黄狗死去，非常感动，非常伤心，对着黄狗的尸体发誓：“今后我的子孙，永远不吃狗肉，不穿狗皮。”据说，这就是满族人不吃狗肉，不穿狗皮的来历。

上面的故事仅仅是一种传说，不过努尔哈赤在李成梁手下当兵确实是事实，毫无疑问，这是他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后来，他离开李成梁，即使不是被追杀，至少也是受到排挤和欺压。

荒唐的嘉靖皇帝

明朝的衰亡究竟从哪个皇帝开始，一直众说纷纭，但嘉靖皇帝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皇帝，在葬送祖宗的社稷方面，他确实做得不赖。

嘉靖皇帝的荒唐事是说不完的，尽管如此，我们还得说说。如果没有嘉靖这么胡作非为，可能轮不到后来努尔哈赤出头了。

嘉靖皇帝对治国毫无兴趣，对权力多少还有些兴趣。不过，他最大的兴趣是炼丹学道，第二兴趣就是虐待宫女。嘉靖皇帝虐待宫女的方式非常特别，他听信方士的话，说修炼长生不老药需要加入处女的经血做引子。为了保障宫女们身体干净，嘉靖皇帝不但要求她们是处女，还不准她们吃饭（一吃饭就得排泄，不干不净的），必须像蚕一样吃桑叶、喝露水。

这种要求确实非常变态，没几个宫女能受得了。不听话的话，嘉靖就凌辱，造成一批批宫女含恨而死。这些宫女实在受不了这么变态的皇帝，决定铤而走险，赌一场，反正也是死。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个宫女偷偷溜进嘉靖的寝宫里，预谋杀掉皇帝。这批宫女虽然没有谋杀成功，但是开创了一项纪录，在中外历史上这是唯一一起宫女谋反的案例。开创了纪录是好事情，但是这个代价付出得有点儿大，最后造反的十六名宫女不仅自己全部身首异处，而且家人受牵连，满门抄斩。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皇帝在睡觉，杀了他还不容易？怎么这些宫女连这么容易的事情都办不好？女人终究是女人，十六个女人谋杀一个睡着的男人，真是人越多越忙。她们先用一根绳子套在嘉靖的脖子上，接着又找一块布蒙在嘉靖的脸上，其余人则按着嘉靖的身子。可能想让嘉靖窒息而死吧！结果，慌乱之中把绳套打了死结，收不紧。收不紧就无法让嘉靖呼吸困难、翻白眼，麻烦来了。嘉靖大呼：“来人啊，一群贱人想刺杀朕，赶快给朕拿下！”

太监们、侍卫们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把这些宫女全部拿下，一律处死。王宁嫔和曹端妃因为涉嫌这起谋杀案，虽找不出确凿的证据，也被秘密处死。

朝鲜有一本史书，叫《李朝中宗实录》，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嘉靖虽然比较宠宫女，但是只要发现宫女有细小的错误，就不肯宽恕，一定要折磨个够；被折磨而死的宫女有两百多人，正是在这种积怨之下，宫女们才恶向胆边生，横了心改写历史。结果历史没有改写，反而搭上了许多如花似玉的性命，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悲剧。

明朝与道教颇有渊源，从朱棣寻访张三丰到嘉靖废朝求长生，其间不乏沉溺道术的皇帝。嘉靖的父亲朱祐杭就是一个道教的铁杆粉丝，从小对道家耳濡目染的嘉靖对道教的兴趣非常浓。刚刚当上皇帝的时候，他碍于内阁首辅杨廷和的面子，不敢肆意妄为。虽然迷恋道

教，但是有节有度，不至于过火。

二十五岁的时候，嘉靖还没有孩子，于是他极其虔诚地陷入道教崇拜中，希望太上老君能给自己一个儿子。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他极力宠信道士邵元节，邵元节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顺利地为他“求”得一个儿子，不幸的是，孩子出生不久就死去了。孩子虽然死了，但嘉靖相信道教是灵验的，可能自己的投入不够多。于是，他加大投资力度。不久，邵元节又为他“求”得一个儿子，嘉靖为了表示感谢，在北京为邵元节建造了一座真人府。

邵元节在荣华富贵中死去，另一个道士陶仲文接替了他的位置。用处女月经修炼长生不老药的提议就是陶仲文提出来的，嘉靖对陶仲文的恩宠比起邵元节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封陶仲文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相当于全国道教协会主席。后又给陶仲文加少保、礼部尚书等头衔，陶仲文的妻子获封一品诰命夫人。陶仲文的父母也得到封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为了找到“药引子”，嘉靖皇帝屡次进行海选，海选的条件是：女性，八岁至十四岁之间，处女。

如果说宠信道士还只是一种个人爱好的话，那也无可厚非；但是二十多年不上朝，将朝政全部交给奸臣严嵩那可是对老祖宗朱元璋极不负责了。一个费尽心力期望子孙江山能长治久安，一个不遗余力败坏江山社稷的根基，这个对比太鲜明了。朱元璋在天上看着这群后代，估计会气得直接从天庭自由落体——当然，如果有天堂的话，朱元璋肯定是拿不到入场券的，那他肯定得从地府里钻出来。

严嵩父子掌权之后，朝野上下一片乌烟瘴气，这父子俩贪污腐化到了什么程度呢？看看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的话就明白了，严世蕃曾经夸口：“朝廷不如我富。”

朱元璋、朱棣等人苦心经营的明朝大厦到嘉靖头上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加上北方蒙古兵屡屡进犯，山东一带倭寇猖獗，明帝国事实上已经飘飘欲倒，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性。

当时的明帝国已经病入膏肓，各种绝症到了晚期，我们来看看那时的明帝国到底患了哪些绝症。

皇帝无道——皇帝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果昏庸无道的话就会让百姓失去信心，觉得这个国家没希望，无道往往是亡国的征兆。

吏治腐败——官吏作为皇帝的管理者，与江山社稷和百姓福祉息息相关，明朝后期吏治腐化如同一堆烂肉，吏治的腐败将会直接导致农民造反和国家衰亡。

国库空虚——嘉靖皇帝奢侈无度，大兴土木，而官员们贪腐成风，没人管老百姓的死活。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国家没钱了，就意味着承受不起大的风险，随时面临着崩盘的危险。

农民起义——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了，自然会造反，造反为了一口饭，要想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得让他们吃饱饭，但当时的明朝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军队哗变——统治阶层腐败无能，自然会导致军心不稳，军人出来混，也是图个好前途，如果没前途的话，军人们的想法会特别多。

边境告急——蒙古族、女真族这些好战的部落看到明朝这头巨大的骆驼正在慢慢地瘦死，当然准备找准机会割几刀，本来这些马上民族就是做惯了强盗的。

自然灾害——越到乱世，灾害越多，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各种旱灾、蝗灾、洪灾、地震轮番登场，大有不搞垮明朝老天不罢休的意思。

这些痼疾除了自然灾害之外，其他的都是人为，但是当时的明朝政府没有能力解决好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所以，它的灭亡是注定的。只是这肥美的果实究竟花落谁家才是最大的悬念——对于我们这些后人来说就不是悬念了。

但在当时很少有人能预测到结局。李自成没能抓住这个机会，吴三桂也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中原最终落入了顺治的手中。

第三章 第一桶金

1583年，努尔哈赤二十四岁，本命年。这一年他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这事搁谁身上谁都会觉得是场灾难，然而努尔哈赤却从中看到了机会，英雄就是英雄，从死亡的地方能看到发达的机会。

一场灾难

要说这努尔哈赤活得也挺不容易的，小小年纪就失去了母爱，后来又被继母逼走，脱离家庭关系，赤手空拳打天下。

人生之路往往不是我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而是被推着上路的，走哪条道，命运说了算。1583年，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四岁，本命年。这一年他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这事搁谁身上谁都会觉得是场灾难，然而努尔哈赤却从中看到了机会，英雄就是英雄，从死亡的地方能看到发达的机会。

我们先说说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是如何成为明军的刀下冤魂的吧！

大家知道建州女真的部落是相当多的，这些部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加上和明朝的关系那就更是理不清了。但是对明朝来说，只有两种关系，即服从我的和反对我的。当时建州女真最大的一个部落是王杲部，王杲这人是勇无谋之辈，仗着手下有两千人就开始嚣张了。他打谁的主意不好，偏偏要打明朝这头庞然大物的主意。

王杲一挥手，兄弟们大张旗鼓地来到明朝边境，该抢的抢，该拿的拿。搞得边境鸡犬不宁，人人自危，家里有个漂亮媳妇的那更是整日提心吊胆。这种不法的行为当然让明朝政府无法忍受，继续忍受下去只会让天下的纳税人失望。

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这个王杲还是姻亲关系，觉昌安长子的女儿嫁给了王杲的儿子阿台，觉昌安的第四子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娶了阿台的女儿。这种关系理论上是够铁的，觉昌安的智商如果跟王杲一样，肯定是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儿女亲家一边。

不过，觉昌安是个聪明人。之前跟王杲结为亲家也只是想在这片白山黑水混下去，看到王杲居然在老虎身上拔毛，他知道王杲这厮迟

早会有灭顶之灾。眼下，最重要的事是和王杲划清界限，要让明朝相信，必须得有所实际行动啊！

觉昌安决定为明军带路，来个大义灭亲。负责剿匪的还是辽东总兵李成梁，这厮虽然一把年纪了，但只要上面召唤，立马扔掉酒杯、抛下美女为领导效力，所以才活了九十多岁，一生享尽荣华富贵。毕竟，为领导服务的精神非常到位。

1574年，在觉昌安的引路下，李成梁率领几万人的大军攻打王杲。这两人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还没过几手，王杲就落荒而逃。当然，王杲土匪出身，和正规军打仗不行，但是逃跑绝对有两下子的。李成梁追了他大半年，一直把他赶到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那里。王杲这人智商不高，也估摸着别人智商不高，这王台可不是傻子，你往我这儿跑，不是想害死我吗？危机危机，危与机的转化往往在一念之间，王台脑子好使，心想，你王杲想让我引火烧身，我就干脆借你这朵送上门的花献给明朝这个佛。

这么一想，啥问题都解决了，还捡了个大便宜。王台把王杲五花大绑，直接寄到北京去了。王杲的下场是很惨的，磔刑，先把肉从骨头中隔离出来，再把四肢砍断，最后再割破喉咙。

王杲虽然死有余辜，但是王台也太不厚道了。不光把人家送上断头台，还将别人的妻子儿女据为己有，只有王杲的儿子阿台逃了出来。

逃出来后，阿台身负奇耻大辱，视王台和明朝为生平最大的敌人。阿台纠集了一批人马，在古勒寨经营老爹的营生，干着强盗勾当，时不时袭击李成梁的部队。李成梁被惹毛了，决定将阿台一网打尽。听到这个消息，觉昌安担心了，因为他的女儿嫁给了阿台。觉昌安决定带着塔克世去营救女儿，同时希望能说服阿台识时务，早点儿归顺大明。

就在觉昌安和塔克世还在做阿台的思想工作时，李成梁的大军已经打了进来。李成梁早就对阿台一头火了，现在打进来，还不杀个痛快。明军杀红了眼，觉昌安和塔克世以及女儿一同被杀。死得确实冤，这下努尔哈赤很不痛快了，是的，一下子死了爷爷、父亲和姑姑，不赔偿一笔损失搁谁谁也不干。

努尔哈赤找到明朝官员：“你们赔还是不赔？”

明朝官员说：“赔什么赔，我们又不是故意杀的。”那意思是如果是故意杀的好像就会赔一样。

努尔哈赤急了：“天理何在啊！我家祖先为大明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到头来还被你们误杀，误杀之后连个安抚费都没有，苍天啊.....”

明朝官员：“好了，别像个娘们一样，我这里有三十匹马、十三副铠甲，就当是给你的亲人损失费了。别忘了，把他们的尸体抬走，我们不负责安葬工作的.....”

努尔哈赤问：“就这么一点点.....”

明朝官员：“好小子，已经给足你面子了，还敢要求，知不知道这是老朱家的天下。再说了，你家人被误杀，全是尼堪外兰的错，不是他出这馊主意，我们怎么会随便伤及无辜了.....”

尼堪外兰也是觉昌安一类的人物，都是女真族的，都竭力想讨好大明。这两人好比是大明的小蜜，小蜜跟小蜜之间那当然是暗地里掐得死去活来。尼堪外兰是图伦的城主，李成梁灭阿台的时候，他也想蹚蹚浑水。看到觉昌安父子也在其中，便唆使明军杀了他们。这是《大清满洲实录》的记载，杀死觉昌安父子的幕后真凶是谁很难说，只有一点可以确定，这父子俩确实在这场动乱中被杀。他们的死肥沃了努尔哈赤。

第一桶金，第一笔业务

明朝的最高领导者终觉有愧努尔哈赤，给了他一个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官职。努尔哈赤的发迹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有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下一步就是拓展业务了。

怎么拓展业务？这是考验努尔哈赤智商和力量的时候了，柿子总要挑软的捏。努尔哈赤决定先对尼堪外兰动手，尼堪外兰是明朝的一条哈巴狗，想必许多女真族的人巴不得有人收拾他。当然，打狗看主人是自古以来的潜规则，努尔哈赤至少从礼节上来讲要通知明朝官员：“尼堪外兰唆使明军杀害我祖父和父亲，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这事就一了百了。”

明朝官员没好气地回道：“你这小子怎么就纠缠不清啊！老子已经告诉过你，你祖父和父亲是我们大兵误杀的。已经给了你好处了，你还不罢休。想闹事你找错了地方，如果你敢找尼堪外兰的麻烦，老子也不跟你客气，和尼堪外兰一起搞你。”

努尔哈赤要找尼堪外兰的麻烦，明朝偏偏让尼堪外兰做建州诸位的首领。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明朝老大哥的立场了，纷纷倒向尼堪

外兰。努尔哈赤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许多努尔哈赤家族的人都站在尼堪外兰一边，表示要杀掉努尔哈赤这个不成器的后代。

到了这地步，努尔哈赤不起兵也没办法了。此时，努尔哈赤果断地起兵了，当然他不敢把矛头对准明朝，而是对准了尼堪外兰。至于那些归顺尼堪外兰的女真族都是墙头草，这一点努尔哈赤心里非常清楚。只要能拿下尼堪外兰，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他们乐得看努尔哈赤搞掉尼堪外兰。

根据《大清满洲实录》的记载，努尔哈赤在作出起兵决定之前，来回地摸着十三副铠甲，心想寒碜归寒碜，杀祖杀父之仇一定得报。在当时，努尔哈赤和尼堪外兰的势力没法比。努尔哈赤首先联系了对尼堪外兰恨得牙齿咯咯响的三个城主。为了让这些城主跟自己一条心，努尔哈赤不光跟他们称兄弟道哥们，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其中一个城主。想是努尔哈赤的妹妹不够多，否则的话他会一个城主送一个。

1583年，也就是万历十一年。这一年的五月，努尔哈赤联合萨尔浒城主诺米纳，邀他一起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诺米纳口头上答应了，心里却在想：努尔哈赤你搞篝火晚宴的时候从来没邀请我，一碰到流血的事情就找老子，看老子这回还不好好让你失落一下。

努尔哈赤也是不幸的，刚创业就碰到这样的合作者，替努尔哈赤悲一个。努尔哈赤的兵力还不到一百人，至于铠甲就只有十三副，很可能当时的铠甲非常贵，否则努尔哈赤没有理由不打造一些铠甲，这样至少显得比较重视士兵的生命安全。

来到城下的时候，努尔哈赤对诺米纳挥手示意攻城，诺米纳点头。当努尔哈赤的士兵攻城的时候，诺米纳却带着自己的人掉转马头，开溜了。看到这一幕，努尔哈赤非常气愤：“他娘的，这样忽悠老子，兄弟们，不靠这帮孙子了，我们自己干，冲啊！”

努尔哈赤虽然就这么一丁点儿兵，但这些兵个个跟他出生入死，个个是不要命的主。战场上的规律就是这样的，越怕死，死得越快。尼堪外兰在城楼上看着这帮亡命之徒，一阵阵胆战心惊，这样下去不行啊，我们这边全是怕死的，努尔哈赤那小子那边全是豁出命的，照这样砍下去我全部的人马都要被他们砍翻。咋办呢？尼堪外兰毕竟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立刻找到妻子儿女，带着家人马不停蹄地追求美丽新生活去了。

第一次唱主角就唱得这么精彩，努尔哈赤不愧是个好演员，没有辜负历史的舞台，没有让观众失望。现在大家看到了，尼堪外兰正在女真部落间狼狈地逃窜，而努尔哈赤开始对女真各个部落嘿嘿笑着。

看到这种微笑，大家心里都发抖，这分明是狼的微笑嘛！

努尔哈赤对各个酋长或城主说：“谁敢收留尼堪外兰这家伙，就是跟我努尔哈赤过不去。”

努尔哈赤的小弟又补充了一句：“跟我家大爷过不去，后果不是一般地严重。”

接着三年的时间，努尔哈赤开始在东北和尼堪外兰玩起了“二人转”，就是你追我、我追你的意思，同是男人，哪有追这么久的。努尔哈赤当然没耐心追尼堪外兰三年了，表面上努尔哈赤是追尼堪外兰，但是追着追着不知不觉就吞并了许多女真部落。尼堪外兰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运气这么好，老是险些被抓住，但就是没被抓住，自己一逃走，马上就有一个部落被努尔哈赤兼并，搞到后来没人敢收留自己了。

努尔哈赤这小子真精明啊！

第四章 小老板到大老板的成长之路

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努尔哈赤是一只雄鹰，注定要搏击长空。大明帝国的天空飘来一朵乌云，这朵乌云的名字就叫努尔哈赤。

女真族

我们先来说说女真族吧！

女真族最早生活在东北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三千多年前，中国史书称他们为“肃慎”。据说肃慎从舜帝开始就已经在长白山、松花江、黑龙江一带定居了。他们一直和中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有时联系很紧密，有时却不怎么往来。

汉朝和三国时，中原人称肃慎为挹娄，大概是鹿的意思，可能是指肃慎人经常吃鹿肉。到了南北朝的时候，中原人又称他们为勿吉，勿吉在满文的意思是森林。勿吉人靠山吃山，靠树吃树，用森林来为他们种族命名一点儿也不过分。隋唐时期，中原人称呼他们为黑水靺鞨，靺鞨和勿吉都是不同的音译。女真这个名称是从辽朝时开始启用的。当时为了避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名讳，称他们为“女直”。

辽朝将自己领土里或附近的女真人分成两类：熟女真和生女真——仿佛女真是一道出名的菜，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何谓熟女真呢？很简单，有辽国户口的就是熟女真。没有辽国户口的就是生女真，生的要想煮成熟的，得办个户口，交纳一定的税赋。

女真人最辉煌的时代莫过于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金国可能就是当时的统治者了。可惜出了一个成吉思汗，把女真人的梦想活生生地给捏爆了。元朝时，蒙古人实行了很不宽容的民族政策，将女真族分化开来。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实行怀柔的民族政策，女真族赢来了一个兴旺发展的时期。明朝的女真分成三大类：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

建州女真因为明朝设置建州卫而得名，这批女真部落以前大多是居住在松花江下游，后来又迁徙到绥芬河下游以及图们江和琿春江流域。永乐末年，他们又陆续迁徙到琿河上流的支流苏子河一带的新宾

县和桓仁县。

海西女真是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部落。松花江在元明的时候并不叫松花江，而是叫海西江。海西女真也包括黑龙江一带的女真部落。

野人女真是指乌苏里江以东、沿日本海一带的女真部落。明朝文献上的七姓野人就是这一带的女真部落。

生活在这个大动荡时代，努尔哈赤似乎注定担负着某种使命。努尔哈赤似乎感受到命运的召唤，很早的时候就定下了宏伟的蓝图：第一步，征服建州女真；第二步，征服海西女真；第三步，征服野人女真。当时，努尔哈赤并没有把明朝纳入自己的宏图大业中，因为这个目标对当时的努尔哈赤来说太遥远了。

如果把努尔哈赤比作一个小老板的话，这个小老板的战略还是不错的。再好的战略没有执行力也是不行的，但这个问题在努尔哈赤身上是不存在的。努尔哈赤第一个目标是苏克苏浒部，努尔哈赤所以首选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族聚居的地方。

苏克苏浒部萨尔浒城城主诺米纳以前忽悠过努尔哈赤一次，1583年秋天，诺米纳还来招惹努尔哈赤，口气强硬地说：“浑河部的杭甲和扎库木两个部落，你不可以骚扰；东住城和巴尔达两个城，是我的仇敌，你可以去灭了他们，不过得到的土地全部归我。否则，你的军队休想经过我的边境。”

努尔哈赤是何等人，能够忍受这种耻辱吗？努尔哈赤大骂一声：“诺米纳，嚣张得跟什么似的，老子就先收拾你！”

努尔哈赤虽然有脾气，但也不是一个莽夫。和部下商议之后，决定智取诺米纳。努尔哈赤假意和诺米纳约定，共同进攻巴尔达城。两军来到巴尔达城下的时候，努尔哈赤让诺米纳先进攻，诺米纳不是傻子，自然不会答应。努尔哈赤心想，这家伙毕竟在道上混过这么多年，不中招。努尔哈赤便带着手下，假意过去和他商量，对他说，既然你们不愿先进攻，那我们就先上吧，不过我们的武器不够用，能不能把武器借给我们。诺米纳本来是个挺精明的人，这时居然相信了努尔哈赤，可见努尔哈赤演戏的功夫也不赖。

努尔哈赤拿到武器之后，马上一挥手，士兵们冲上去，毫不留情地开始了一场大屠杀。诺米纳和他的士兵被杀得一个不留（遂将诺米纳、奈喀达及其兵，尽诛之）。随后，努尔哈赤迅速地拿下了萨尔浒城。此时，努尔哈赤的表现说明了他不仅有军事家的能力，还有政治家的眼光，但是手段过于阴狠。对于那些投降的士兵，努尔哈赤采取

了宽大的政策，逃跑回来的散兵，努尔哈赤还归还他们的妻儿，让他们继续留在萨尔浒城定居，并表示支援他们修葺城池。前提当然是，从今以后服从我努尔哈赤的领导。

通往大老板之路

努尔哈赤的第二个目标是董鄂部，董鄂部在苏克素护河部东边。1584年九月，努尔哈赤开始打董鄂部的主意了。这努尔哈赤是个有眼光的人，他之所以这时候把目光锁定在董鄂部翁鄂洛城身上，是因为恰逢对手正发生内乱。

说实话，努尔哈赤这时候还比较寒碜，他带着五百士兵征讨董鄂部的阿海巴颜。阿海巴颜有四百兵力，坚守城池不出。敌人不出来，是不是仗就没得打？当然不是，努尔哈赤想到了火攻。当时女真族的城池跟大明的城池没法比，大明的城池都是用坚固的巨石做成，火攻的话在上面烤烤石鱼还行，要想烧毁对方城楼不太现实。

但是女真族的建筑就不一样了，城池小不说，还有许多木材。这大火一烧，很快就蔓延到城楼上，还烧到了民房。眼看这城池马上就要破了，偏偏老天好像故意要跟努尔哈赤作对，忽然下起了大雪，扑灭了大火。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任谁心情都会焦躁，但努尔哈赤不同于常人，他很冷静。

努尔哈赤对大伙儿说：“都下雪了，大家还是回家跟老婆孩子吃饭吧！留下二十个兄弟在这里陪我。”

城内的人以为敌军撤退了，有几个人走出来看看情况。不料努尔哈赤带着伏兵跳了出来，杀死了四个人，获得两副铠甲。好歹是捞到一点点便宜了，努尔哈赤心里好受了一些，要知道，努尔哈赤最开始做的是小本生意，能赚一点是一点。

回家的路上，正好路过翁鄂洛城，努尔哈赤今天没赚到什么外快，心情很不爽，决定再做一单生意。翁鄂洛人见努尔哈赤这匹狼来了，赶紧躲进城里，猎枪都准备好了。努尔哈赤还是老一套，先纵火烧城。借着浓烟，努尔哈赤带着兄弟们爬上一个屋顶，对着城楼上的敌军一阵乱射。城楼上的士兵也对着努尔哈赤这边射来一阵阵箭雨。城内一个叫鄂尔果尼的将领一箭射中了努尔哈赤的头部，射穿头盔，深入指许。

努尔哈赤是一个非常猛的人，他拔出箭头，躲在烟囱后面继续射敌人。他激情又无畏的作战风格感染了手下，大家看老大都这么不怕

死，谁也不想做缩头乌龟。后来，对方的神箭手罗科一箭射中了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时，努尔哈赤再也挺不住了，一手捂着脖子，一手拄着弓从屋顶上下来。下来之后，就晕倒了。大家只好扶着老大回去，战事暂告一个段落。回去之后，努尔哈赤几度昏迷又苏醒。闹腾了一昼夜，血还止不住。到第二天，努尔哈赤又站了起来，带兵再次攻打翁鄂洛城。这次，一举拿下了该城，鄂尔果尼和罗科都成了俘虏。大臣们强烈建议杀掉这两人，因为这两人差点儿要了努尔哈赤的命。

努尔哈赤却说：“两军交战，都是为了取胜。他们射我只是各为其主，现在为我所用，自然是我射敌人。这么勇敢犀利的战士，即使是死于战争中都让人觉得可惜，我又怎么会因为射我两箭而杀他们呢？”

努尔哈赤不但没有杀他们，反而擢升他们为牛录额真，每人统领三百人。努尔哈赤此举不仅赢得了两位将领的忠心，也赢得了属下的尊重，这样一个宽仁大度的领导打着灯笼都难找啊！不跟努尔哈赤又跟谁呢？相信大家心里都会这么想。

更难得的是，这时候努尔哈赤才二十五岁，就能有如此成熟的政治家风范，让人不得不佩服。像这样具有领导风度的人，在今天的二十五岁青年中实在是凤毛麟角。

努尔哈赤第三个目标是哲陈部。公元1585年，也就是万历十三年，二月份，努尔哈赤带领二十五个披甲之士、五十个没有铠甲的士兵，就这么七十来个人去征讨陈哲部。这看上去更像是打群架，不像是发动战争，这个希望大家理解，一方面是努尔哈赤对自己军队的战斗力很自信，另一方面也是生意还没做大，成本不能投入太大。

哲陈部的山寨早就听到了风声，弓箭和猎枪都准备好了。努尔哈赤看讨不到什么便宜，便空手而归。这么看来，努尔哈赤更像是去打劫的，确实如此，他已经非常习惯偷袭这门战术了。

这次偷袭失败，结果萨尔浒、界凡、东佳、巴尔达四城的城主带着四百骑兵追了过来，跟着哲陈部的讷申、巴穆尼也疾驰而至。努尔哈赤看到追兵来了，回头将讷申斩于马下，又将巴穆尼射死。追兵们看努尔哈赤瞬息间杀死了两名大将，一时之间面面相觑，不敢上去。

接着努尔哈赤又让七个人埋伏在草丛里，故意把铠甲露出来。追兵们小心翼翼地向前，看到铠甲，说道：“你设了埋伏，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追兵们怕中埋伏，喊叫着撤退。

努尔哈赤就这样从容地退走，没有损失一名骑兵。

四月，努尔哈赤率领五百人的军队，正式讨伐哲陈部。不巧的

是，路上遇到大水，努尔哈赤只好命令大部队折返，带了三十铁甲兵、五十棉甲兵，继续前进。不想，有人把这个消息偷偷地告诉了哲陈部，于是那边的城主们拧成一根绳，召集起所有的兵，准备从后面打努尔哈赤一个措手不及。

其实，努尔哈赤已经在后方留下探子，在作战方面，努尔哈赤还是非常谨慎的。努尔哈赤安排的探子名叫古德章京，应该说古德章京这个人办事还是可以的，他确实探到敌军的行踪。可惜古德章京骑马准备去找努尔哈赤的时候，走到了另一条路上，没有发现努尔哈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战场上瞬息万变，当时又没有手机和GPS定位系统。

努尔哈赤深入敌人腹地后，忽然看到界凡之浑河和南山之间站着密密麻麻的一群人，大概有八百人的样子。这时，努尔哈赤队伍里有一对兄弟看到敌人这阵势，当即就吓破了胆，脱下铠甲，给别人：“哥们，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了。”

这兄弟俩叫扎亲和桑右里，努尔哈赤当然生气了，对哥俩发怒：“你们这两兄弟平时在乡里横行霸道，现在看到敌人多，你们就吓破了胆，还把铠甲给别人，丢不丢人啊？”

说完，努尔哈赤自己举起大旗，走到队伍最前面，对众将士（其实也就几十人）训话：“打仗这东西靠的是士气和勇气，只要我们不怕死，敌人就是纸老虎。不相信的话，我可以跟大家表演一下。”

说完，努尔哈赤骑马，冲在最前面，结果冲到离敌人不远的地方，马被射成了刺猬。努尔哈赤滚了下来，这一来，部下全都后退。努尔哈赤看了很生气，亲自带着弟弟穆尔哈齐和近侍颜不禄与兀凌葛冲了上去，最终四个人打败了敌人八百人。

关于这场战役，史书上讲得不是很详细，所以其真实性是存疑的。史书上说努尔哈赤带着这三人，拼命往前冲，给人感觉就像找死，也许正因为这看似自杀的行动让敌人感到害怕。努尔哈赤等人边跑边射，等靠近敌人后又挥刀猛砍，居然打乱了敌人的阵脚，敌人纷纷后撤。后面的敌人以为遇到努尔哈赤的重兵，这么一来引起了连锁反应，结果造成了四人胜八百人的奇迹。

虽然四人打败八百人，看起来不可能，但考虑到战场上心理战术的重要作用，还是有可能的。努尔哈赤砍杀了前面一群人，后面那些人不明所以，撒腿就跑完全是有可能的。

努尔哈赤的领导地位就是通过这些零星的战役建立起来的，没有谁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扎亲和桑右里的表现就说明努尔

哈赤的领导权面临着一场危机。为了化解这场危机，努尔哈赤几乎是豁出性命。这是努尔哈赤善于领导的一个表现，他没有像别的领导那样处死这两兄弟，而是通过证明自己的实力让大家心服口服。

领导权确立了，征战就容易得多，你发出命令，大家愿意执行。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两年，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哲陈部首领阿尔泰占山称王。听到这个消息，努尔哈赤非常恼火，心想我南征北战这么多年都没称王，你居然敢称王，太不给面子了。努尔哈赤率军攻打阿尔泰，没有什么悬念，阿尔泰兵败，被俘后斩首。

两个月后，努尔哈赤征讨巴尔达城。这一战，努尔哈赤再次发挥龙虎精神，身受五十多处创伤，仍然死战不退，一举击溃城内守军，毫无悬念地占领了该城。至此，哲陈部从建州女真中消失了，而努尔哈赤的名字却越来越响亮了。

接下来，努尔哈赤要打的是浑河部。浑河部最主要的城池是鹅尔浑城，此城的城主恰好就是努尔哈赤的仇人尼堪外兰，努尔哈赤所以一直迟迟不收拾尼堪外兰是有原因的。尼堪外兰在建州女真中势力最庞大，跟明朝的关系也最亲近，首先灭掉尼堪外兰的难度非常大，不如先剪除一些跟尼堪外兰有关系的小部落，等自己势力壮大了再来打掉尼堪外兰。到时自己势力坐大，杀了尼堪外兰，明朝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

1586年七月初一，努尔哈赤得到消息，尼堪外兰在鹅尔浑城，努尔哈赤对着部下大手一挥：“大家一定要排除万难，打掉尼堪外兰这头老虎。”据说，当时尼堪外兰正好有事外出，努尔哈赤虽然把城池攻下来，但没有发现尼堪外兰。就在努尔哈赤为找不到仇敌焦急的时候，忽然看到难民队伍里有四十个形迹可疑的人，努尔哈赤怀疑尼堪外兰可能混在其中。一时之间，很激动，冲了过来，欲揪出尼堪外兰。结果，四十支箭朝努尔哈赤整齐地射来，努尔哈赤受了三十处伤，不过他依然很猛，连杀九人才退回城里。

这事让努尔哈赤心里有些不平静，回到城里后，斩杀了十九个汉人，还抓获了六个受箭伤的汉人，本来这六人身上的箭头已经取出来了，努尔哈赤挺有黑色幽默的，把箭头重新安在这六人身上，让他们回明朝传达自己的意思：把尼堪外兰抓住，交给我，否则，你们知道的……

努尔哈赤是一个非常高调的人，竟然敢公然威胁明朝，现在我们经常讲低调，为了不给努尔哈赤抹黑，我们不妨说他是一个敢于在适当时亮剑的人。

这时候的尼堪外兰就像一块干瘪的橙子，利用价值几乎被明朝榨

取干净。权衡利弊后，明朝给了努尔哈赤一个答复：“好，我满足你的要求，尼堪外兰已经在我们这里了。但我们不方便把他送给你们（我们毕竟也是要面子的），你们还是自己派人来杀死他吧！”

努尔哈赤这人警惕性非常高，心想，你们莫不是骗我去那里，然后将我放在砧板上，剁成肉酱吧！努尔哈赤于是对明使说：“你们不会是要我吧？”

明使回道：“怎么可能？我们大明是堂堂的大国，怎么可能会要你呢？你要是不相信，可以派你的士兵过来，不必亲来。”

努尔哈赤心想，这还差不多。努尔哈赤派斋萨率四十人过去，尼堪外兰听说明朝让努尔哈赤过来捉他，吓得想逃跑。可惜，明朝这些过河拆桥的好手不给他机会，尼堪外兰就这么成了瓮中鳖。斋萨割下尼堪外兰的脑袋后，也没跟明朝说声谢谢，反而恶狠狠地对明朝边将说：“从今以后，每年要给我们的努尔哈赤大爷孝敬八百两纹银、十五匹莽缎。”

明朝边将愤怒地问：“我们凭啥要给你们银子和莽缎？”

斋萨面无表情地说：“和谐，为了大家以后的和谐。”

明朝边将不解地问：“和谐是好事，但为什么不是你们给我们送银子呢？”

斋萨想了想说：“这个问题去问朱厚熹同志吧！”

努尔哈赤第五个目标是完颜部，据说在进攻完颜部的当晚，有流星划过，努尔哈赤说这是克敌的征兆，大家精神抖擞，攻下完颜城，斩杀城主墨尔根。

万历十六年（1588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的主要部落，历经五年的时间，努尔哈赤终于从一个小打小闹经常被城管赶的摆地摊的变成一个大公司老板。这个过程是艰辛的，也是令人振奋的。

然而，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努尔哈赤是一只雄鹰，注定要搏击长空。大明帝国的天空飘来一朵乌云，这朵乌云的名字就叫努尔哈赤。

第五章 猛如虎，警惕如鼠

帝王之术是一门非常精深的学问，但不外乎两个词语：霸道和王道。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恩威并施，一个帝王如果能平衡霸道和王道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就算是一个明君了。

暗杀努尔哈赤的刺客们

一个成就非凡事业的人一定有非凡的地方，努尔哈赤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服。一个帝王光会打仗肯定是不够的，还得掌握帝王之术。那有人肯定要问了，是不是掌握了帝王之术就可以当皇帝呢？

当然不是，当上皇帝是无数因素综合的结果，而帝王之术则是最基本的条件。帝王之术是一门非常精深的学问，但不外乎两个词语：霸道和王道。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恩威并施，一个帝王如果能平衡霸道和王道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就算是一个明君了。

努尔哈赤对霸道和王道的理解非常透彻，我们可以从针对他的几次暗杀中看出端倪。

第一次暗杀发生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九月的某个晚上，这时候努尔哈赤刚刚创业，势力还很小。但是许多部落发现他志气不小，都想暗杀他。

这天晚上，夜色阴晦。一个刺客偷偷溜到努尔哈赤宅院的栅栏前，可能是动静太大了，惊动了努尔哈赤的看家狗古哈。古哈对着刺客狂吠，努尔哈赤在房子里一听，惊觉而起，让长女和两个儿子躲避，自己操起马刀，并对门外大声喝道：“外面到底是谁？既然来了，为何又不进来？你如果不进来，我就要出去了。你想试试我刀子有多锋利吗？”

努尔哈赤说完，就用刀柄击打窗棂，又用脚踹窗户，做出要从窗子里冲出去的样子。刺客手握刀子，眼睛紧紧盯着窗户。没想到努尔哈赤并没有从窗户里冲出去，而是从门里面出来了。刺客看到努尔哈赤时大惊，落荒而逃。努尔哈赤来到院子外面，看到自己的侍卫帕海已经横尸地上。

努尔哈赤巧妙地利用声东击西的策略破解了这次暗杀。这一事件再次证明了努尔哈赤是一个有勇有谋型的领导。

在第二次暗杀中，努尔哈赤的表现就更有意思了。那一天是万历十二年（1584年）的四月初一，夜深人静之时，努尔哈赤正在炕上打盹，忽然被门外的响声惊醒。努尔哈赤当即警惕起来，操起身边的大刀，悄悄打开门走了出去。借着朦胧的月光，他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手里拿着闪闪发亮的匕首，贴着墙根，正挨着窗户看什么。努尔哈赤走到那人背后，一拳打在他的后脑勺上，那人应声倒地。

接着，努尔哈赤放开喉咙大喊：“来人呐，抓贼啊！”

顿时，乱成一片，狗叫声，女人孩子哭声。侍卫们来到努尔哈赤跟前，看这人手中拿着匕首，说道：“大哥，这家伙看上去不像贼啊，估计是敌人派来的刺客……”

努尔哈赤呵斥说：“难道我比你傻啊！刺客啥派头我还看得出来，这家伙的脸上分明写着‘偷牛贼’三个字。”

侍卫还想争辩，努尔哈赤阻止了他，命人将这刺客拿下，厉声呵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跟我老实交代，半夜三更的，你在这里鬼鬼祟祟的，是不是想偷我家的牛？”

“这……”刺客支支吾吾的，努尔哈赤更加凶狠地问道：“不招是吧？好，来人呐，给他大刑伺候。”

刺客不懂努尔哈赤到底玩什么把戏，他自己都觉得行刺的动机这么明显，怎么努尔哈赤就看不出来，干脆就着台阶下，说：“我招，我招，我家里比较穷，看到你们的牛特别肥，一时思想动摇，想顺手牵几头牛补贴家用。”

努尔哈赤得意地对侍卫们说：“我说这家伙贼头贼脑的样子，肯定是个偷牛贼，没错吧！”

侍卫们心里很不爽，不懂为什么这么明显的事情努尔哈赤就看不出来，平白地便宜了这个刺客。一个侍卫提醒努尔哈赤：“老大，这人真不是个偷牛贼，他分明是想……”

努尔哈赤狠狠地瞪了这个侍卫一眼，说：“我说话你当耳边风啊，别搅和，看我怎么教训这个偷牛贼。”

努尔哈赤指着刺客的鼻子说：“小伙子，你说你年纪轻轻，好手好脚，干点儿啥不好？偏要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长年偷鸡摸狗，哪有不被人抓住的时候？趁着现在还年轻，早点儿金盆洗手，老老实实找个稳定的工作吧！……”

刺客被努尔哈赤教育得云里雾里，莫名其妙地一顿点头：“大哥，你说得太对了，我长到现在，还没有人对我这么掏心掏肺。大哥，我答应你，以后一定老老实实做人、堂堂正正赚钱。”

努尔哈赤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这就好，这就好，年轻人只要浪子回头，那是黄金也换不来的。我这里有一些碎银子，你拿回去补贴点儿家用，以后千万别干这勾当。”

刺客拿起银子，脚底抹油，一会儿就跑得不见踪影。

刺客走后，侍卫们不解地问：“老大，这人真是一个刺客，你怎么说他是偷牛贼，还把他放走呢？”

努尔哈赤淡淡地笑道：“你们真当我是傻子啊，我第一眼就知道是一个刺客。”

侍卫们更糊涂了：“那老大你还放走他？”

努尔哈赤哈哈大笑：“你们说说看，我们现在的势力有多大，能不能称霸建州女真各族？”

侍卫们也不隐瞒，说道：“离称霸建州还有十万八千里呢，咱们就这么点人，这么点破烂装备，随便来几百人就可以灭掉我们。”

努尔哈赤说：“这不就结了，我们实力现在这么单薄，所以应该少树敌。现在最要紧的是韬光养晦，不要跟其他部落结仇。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硬说那家伙是偷牛贼的缘故，如果说他是刺客的话，那就等于跟他的部落撕破脸，这就意味着跟对方摊牌，以后想要修好就不会有机会了。你们要记住，在这个险象环生充满了危险的乱世中，凡事不要说破，只要不说破，就有回旋和外交的余地……”

努尔哈赤这么一说，大家心服口服，领导就是领导啊，水平果然跟我们不是一个档次。这是努尔哈赤的帝王智慧之一：处理事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永远留有余地。在弱小的时候，努尔哈赤懂得自我保存之道；当势力庞大的时候，他又懂得吞灭他人的道理。像这么精明的领导，不成功似乎都难。

第三次暗杀发生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五月的一天晚上，这次暗杀跟上一次还不太一样，这一次不光有外敌，还有内贼。

根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记载，努尔哈赤准备睡觉之前，忽然发现一个婢女还不睡觉，而是坐在灶旁，把灶里的火弄得忽明忽暗。努尔哈赤觉得奇怪，这么晚了，你不睡觉，还在玩火，真有趣啊！努尔哈赤感觉不对劲儿后，穿上短甲，佩上弓箭，假装上厕所。

在上厕所的时候，努尔哈赤把箭搭在弦上。一边眼睛紧盯着篱笆

门，一边故意发出上厕所的声音。忽然，只见门外一个黑影靠近。只听“嗖”的一声，一箭射穿篱笆，接着传来一声惨叫声。努尔哈赤急忙提着裤子出门，那人还想跑，努尔哈赤追上去，又补了一箭，射穿了那人的脚踝。

努尔哈赤上前逮住那个人，这时努尔哈赤的两个弟弟也赶过来。质问之下，才知道这个刺客名叫伊素，跟努尔哈赤一个婢女以暗号勾结，图谋刺杀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的两个弟弟舒尔哈齐和雅尔哈齐都主张杀掉这个人。

努尔哈赤却下了一道让人无语的命令：“放了他。”

“为啥呢？”两个弟弟问，“这人可是要杀你的。”

努尔哈赤笑道：“他要杀我，难道我就一定得杀他吗？”

两个弟弟同时表示无语，努尔哈赤打发走那刺客后，就开始教育两个弟弟：“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杀人这种事本来就不是好事。今天你杀他，明天他杀你，冤冤相报何时了。杀了他一个，不幸的是一家。如果我们杀了他，你们说他的家人和部落能甘心吗？到时候他们要报仇，就得打群架了，我们人本来就少，一打群架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说呢，得饶人处且饶人，明白吗？”

两个弟弟还是不服：“照你这么说，那以后大家放下屠刀，从此不要战争就好了。可是现在，到处都在打仗，大哥你也在招兵买马。”

努尔哈赤教育人的兴致越来越高，说：“这你们就不懂了，在战场上不存在私仇。而且打仗时一杀一大群人，一旦你打败了对方，就是征服了对方整个部落，所以不用担心他们会报仇。而且战争是非常残忍的，一旦打败了对方，就会从心理上摧毁敌人的反抗意志。但杀一个人就不是这样，杀一个人很容易激起他们家族的仇恨。最好的方式是放他走，这样即使他不感恩，也不会再度加害于我们。你们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吗？”

两个弟弟鼓掌：“大哥说得实在有道理，跟着大哥，跟到老学到老。”

这也是努尔哈赤帝王之术的一个精髓：可以成批成批地杀死敌人，但不要随便得罪人，这样可以让自己看上去更仁慈、更人性，同时又雄才大略。聪明的帝王绝不会给人这样的感觉：我是个嗜杀的主。他会告诉人们：我本性仁慈，杀人是不得已的事。

硬 汉

崛起之后，努尔哈赤想建立一个都城。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拍板建造费阿拉城。在呼兰哈达山下，有一个平原，努尔哈赤把都城的地址选在这里。宫城建立好之后，努尔哈赤在这里称王。

称王之后，努尔哈赤的发展非常神速了。1593年，努尔哈赤灭掉建州女真附近的长白山三个部落。至此，用了十年的时间，混乱无序的建州女真成为努尔哈赤的家天下。写到这里，首先对努尔哈赤的勇敢表示佩服，努尔哈赤屡次身陷险境，却淡定从容，一般人真做不到。其次，要对努尔哈赤的智慧表示钦佩，看他那些左右逢源的手腕就知道是了解汉文化的人。努尔哈赤势力坐大之后，明朝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笼络，授予他建州都督僉事，等于承认他是建州女真的老大。

但努尔哈赤的胃口很大，很快就对海西女真垂涎欲滴。海西女真的地盘在松花江一带，他们有四个强大的部落：叶赫、哈达、辉发和乌拉。这四个部落又称为扈伦四部，其中最强大的两个部落是叶赫和哈达。

还别说，当努尔哈赤绿幽幽的眼睛盯着海西女真的时候，海西女真也警惕地打量着努尔哈赤，这家伙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就把建州女真都兼并了，他会不会打我家的主意？

叶赫是海西女真最强大的一个部落，首领纳林布禄和布寨两兄弟受努尔哈赤的启发，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统一步伐。他们一方面稳定努尔哈赤，一方面对哈达部落展开了攻势。对努尔哈赤，他们首先采取的是和亲政策，纳林布禄把自己十四岁的妹妹嫁给努尔哈赤。但努尔哈赤不为所动，依然虎视眈眈，和亲政策失败，纳林布禄便没把妹妹嫁给努尔哈赤。

纳林布禄看努尔哈赤这厮不好打发，决定先下手为强，便想威胁努尔哈赤，让他给叶赫部一块领土。努尔哈赤把纳林布禄的使者轰了回去，纳林布禄心想，努尔哈赤还真不是吓大的，便决定集合其他部落一起给努尔哈赤施压。都说人多力量大，看看这次能行不。

叶赫、哈达、辉发三个部落都派出使者，大摇大摆地来到努尔哈赤的都城费阿拉城。努尔哈赤先礼后兵，人家来了，总不能让人饿肚子吧！酒桌上，这些使者吃饱喝足之后，纳林布禄的使者首先狮子开口：“我的老大有一句话让我带给你，我很想告诉你，但是又怕伤了和气……”

努尔哈赤打断他：“有话快说，你不过是个传声筒，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明人不说暗话，我老大说，你的土地多得用不完，老大想要一块地开发开发。如果你不答应的话，老实说，我老大很没耐性的。”

听到这种话，努尔哈赤大怒，当即拔刀，把饭桌劈成两半，大骂道：“我还没欺负你们，你们倒欺负到我家里来了。你们叶赫部的这些胡须没长毛的首领，哪个在前线冲锋陷阵过？想威胁老子是吧，放马过来，我给你们上上战争课！”

努尔哈赤一发威，使者们当场哑口无声，灰头土脸地跑回去，阐明原委后，海西女真几个部落都很不爽，这努尔哈赤太嚣张了，完全不把我们海西女真放在眼里。如果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他倒把我们当成软蛋了。大伙儿一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

1593年六月，海西女真四部派了一支军队在长白山下打劫，没料到努尔哈赤早有准备，猛然杀了出来。海西女真偷鸡不成蚀把米，狼狈逃回。

纳林布禄在心里暗骂：“努尔哈赤，你真狠，迟早我会好好收拾你的，走着瞧吧！”

第六章 我是恶鱼我怕谁

努尔哈赤给两个儿子上了一堂政治军事课：“打仗是不能这么浮躁的，你们这么急切地渡河，就算胜利，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打仗就像砍伐一棵大树，哪能一斧头劈倒一棵大树。必须要先砍掉它的枝叶，然后再砍掉大树枝，最后才是砍倒主干。先从软的地方下手，这样由弱到强，就能灭掉对方。攻打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绝不可以一蹴而就。”

古勒山大战

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也就是公元1593年，纳林布禄发飙了，他汇集了九个部落的力量，组成一支三万人的联军，兵分三路，向建州的古勒山进发。

前面我们写到努尔哈赤打仗时经常是几十人上场，多的时候也不过几百人。所以，看到三万人，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概念了。这次，努尔哈赤还能保持常胜不败的纪录吗？

敌人虽然数量庞大，但努尔哈赤并没有惊慌，充分体现出一个卓越将领的素质。听到九部联军进犯的消息，努尔哈赤先让心腹兀里堪去刺探军情。兀里堪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这下努尔哈赤对敌军心里有数了，接着努尔哈赤开始部署自己的军队，然后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他的妃子富察氏看到努尔哈赤在大敌当前居然还睡觉，连忙叫醒他：“大爷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埋头睡觉，九个部落的大兵已经打来了，难道你不怕吗？”

努尔哈赤淡淡地说：“我如果怕的话，就算躺下来也睡不着啊！有什么好怕的，敌人来都来了，自然要好好招待一下他们，他就是纠集九百个部落的兵，我一样睡我的大觉。”

努尔哈赤如此从容的表现显然对士兵们是一剂安神药。开战之前，努尔哈赤郑重其事地拜神祭天，说道：“皇天啊皇天，后土啊后土，天上所有的神仙，你们都看到了。我努尔哈赤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和海西女真这帮强盗无冤无仇。现在他们无辜前来挑衅我，真是伤天害理啊！老天，保佑我们的正义之师歼灭这些侵略者吧！”

在开战之前，敌军一个人过来投降，这个人来历不明，投降的可

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努尔哈赤的兵力处于劣势。很有可能这是努尔哈赤的安排，这个投降的人详细地说了敌军的情况。努尔哈赤立刻分析道：“敌人的兵力来自九个部落，军心不齐，战斗力不强，只是一群纸老虎，我们只要仗着地势，一定能守住。如果他们找死想强攻，我们就送他们一程。大家不必多虑，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努尔哈赤说的一点都没错，我们来看看努尔哈赤是如何打赢这场战争的吧！

第一天，叶赫族进攻黑济格城，没有攻下。第二天又攻城，努尔哈赤亲自带兵据险而守。敌军攻不下来，努尔哈赤派遣一百人出战，叶赫部赶紧停止攻城，前来迎击，不敌，九人被杀。接着，叶赫首领又率众攻城，布寨因为冲在前面，被努尔哈赤部下一个叫吴谈的人杀掉。纳林布禄见兄弟被杀，悲伤异常，其他人都感到恐惧，几个贝勒逃跑，这样一来，阵形崩溃。努尔哈赤下令部队出击。

这一战，努尔哈赤大获全胜，杀敌四千，缴获战马三千匹、铠甲一千副。纳林布禄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兄弟被杀之后，他当时就悲痛得昏倒在地。像这样的人跟努尔哈赤开打，失败是必然的，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叶赫部让努尔哈赤归还布寨的尸体，努尔哈赤却把布寨的尸体割一半还给了他们。这一举措毫无疑问让彼此的仇怨更深。

这一战震惊了东北这片白山黑水，而海西女真因为这一战，元气大伤。从此以后，谁都知道努尔哈赤是一个可怕的角色，无疑为努尔哈赤后来进一步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还是看看努尔哈赤的精彩表演吧！

哈达与辉发

努尔哈赤决定先从哈达部下手。哈达部居住在哈达河一带，治所是哈达河北岸的哈达城。

哈达的酋长姓纳喇氏，名万。因为万和王音相近，明朝人便称他为王台。王台死后，第五子孟格布禄继承父亲的爵位，出任龙虎将军，为左都督。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哈达部曾经和叶赫部联合攻打努尔哈赤，但是到了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这对盟友却变成了仇敌。叶赫部打算统一海西女真，率兵攻打

哈达部。哈达首领孟格布禄打不过，便派人向努尔哈赤求救，还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到建州当人质，目的只有一个：大哥，快点儿发兵吧！

其实，孟格布禄没必要催，努尔哈赤巴不得早点儿发兵过去呢！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是想打过去，现在可以以拯救者的姿态领兵过去，既遂了愿，又做了一回好人，努尔哈赤何乐而不为！

哈达地处建州的咽喉要道，只要占领哈达，就可以把建州的疆域向外推进两百多里。孟格布禄请求努尔哈赤出兵，估计努尔哈赤心里乐开了花。孟格布禄引虎驱狼，不管怎么说，他没有太多选择，不是被老虎吃掉，就是被狼吃掉。

努尔哈赤立即派遣费英东、噶盖率领两千精兵前往哈达。纳林布禄也不是一个完全没用的角色，得知这个消息，修书一封给孟格布禄，对他说：“如果你将满洲来的两个将领抓住，就可以赎回自己的三个儿子。然后你可以尽力围歼努尔哈赤派来的两千人，如果你这么做我就把自己的妹妹（叶赫老女）嫁给你，咱们可以重归于好。”

叶赫老女就是叶赫那拉·东哥，老女在满语里的意思是最乖巧的小女儿。据说，这个公主是满蒙第一美女，迷倒了一群人，孟格布禄就是其中之一。面对美色的诱惑，孟格布禄挡不住了，回信说同意到开原镇讨论这件事。

开原镇和辽阳镇、广宁镇是明朝在辽东的三大重镇，开原镇原名是开元镇，后来为了避讳明太祖朱元璋之名，改成开原。开原是一个重要的关卡，女真蒙古等民族向明朝进贡都要经过开原验关才能放行。在开原城外，设有马市。

当时女真各族的间谍活动肯定搞得相当不错，孟格布禄和纳林布禄密谋在开原商议的消息很快就泄露出去了。努尔哈赤知道这消息后，大怒，决定直接攻打哈达。弟弟舒尔哈齐自告奋勇充当先锋，带着一千精兵，来到哈达城下。看到弟弟突然间这么勇敢，努尔哈赤很欣慰，这么多年的教育总算没有浪费口舌。

舒尔哈齐到达城下后，忽然目瞪口呆，原来城内的守军已经布防妥当。城楼上旌旗飘扬，兵士严阵以待。而且，城内的守军居然冲出来厮杀。舒尔哈齐见了，退缩不前，带兵掉头，跑到努尔哈赤身边，向努尔哈赤报告：“大哥，他们杀过来了。”

努尔哈赤大怒：“你以为城内没有守兵吗？”说完，亲自带兵去迎战。冲出来的守军看努尔哈赤亲自出马，又退回城里。努尔哈赤命令将士们攻城，城楼上的士兵不断地发矢投石，努尔哈赤这边损失很

重。但努尔哈赤铁了心要拿下这座城池，经过六天的苦战，终于拿下了哈达城。

努尔哈赤的大将扬古利率先进城，擒住了孟格布禄。孟格布禄原以为自己这下小命要丢，哪里知道努尔哈赤竟然过来亲自给他松绑，还把自己的貂裘给他披上。孟格布禄不懂努尔哈赤为什么要这样做，接下来，努尔哈赤做的事情更奇怪了，努尔哈赤对哈达的财物和武器丝毫无取，对哈达的兵民不加歧视，统一编户籍，迁往建州。

孟格布禄终于明白了，原来努尔哈赤是想一口把哈达吞下，所以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

努尔哈赤将孟格布禄带回费阿拉城“收养”，其实是软禁。努尔哈赤所以做事这么委婉，很大程度是考虑到当时明朝的影响力。明朝虽然强盛不复当年，但仍然是个大国，所以对北方这些部落，国家是有发言权的。作为一个大国，明朝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周边小国家统一，这样的话会威胁到明朝的统治。成吉思汗的崛起让后来的明朝统治者明白一个道理：分而治之，千万不能让他们统一。

所以，努尔哈赤虽然征服了哈达，但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占领哈达。为了逃避明朝追究事后责任，努尔哈赤故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孟格布禄，在古代生女儿好处真是很多。努尔哈赤的这些举动当然是做给明朝看的，戏份演足了。一段时间后，努尔哈赤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孟格布禄处死了。

明朝一听，这努尔哈赤不老实啊，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立马派遣使者来质问。努尔哈赤顿时慌了，明朝如果现在打过来，自己肯定不是对手，赶紧低头认错：“对不起，我错了，以后不敢了……”

为了表达自己悔过的诚意，努尔哈赤决定将先前嫁给孟格布禄的女儿莽古姬再嫁给孟格布禄的儿子武尔古代。但这只是努尔哈赤的权宜之计，没过多久，他就像囚禁武尔古代的老爸一样把他囚禁。一年以后，明朝皇帝下旨责令努尔哈赤把武尔古代送回哈达。努尔哈赤无奈，只好照办。没多久，经过战乱的哈达又遭遇了饥荒，哈达人向明朝伸出颤抖的手：“救救我们吧！”

明朝高昂着头，好像根本没看到这一切。努尔哈赤心想，你不管哈达的死活，现在我来管，你应该没意见吧！于是，带兵灭了哈达。

明朝日渐衰落，自顾不暇，也管不了那么多。努尔哈赤一看，心里已经了然，明朝已是一头病猫，机会来了。

现在轮到辉发部了。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辉发部，辉发部出现了一个相当狠的拜音达里。辉发部的始祖是昂古里、星古力。星古力七

传到旺吉努，旺吉努好比是明朝的朱元璋，他的长子先他而死，他的孙子拜音达里却不是朱允炆那号人物。祖父死后，他果断地干掉七个叔叔，自立为贝勒。拜音达里的这个做法毫无疑问让七个叔叔的家人们非常愤怒，他们联合起来，叛逃到叶赫部，引起了辉发部内部大震荡。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叶赫部早就想攻打辉发了，现在辉发首领的七个叔叔叛逃到这里，等于送给自己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历史又重演了，辉发告急，向努尔哈赤求救。这拜音达里真不是个好人，之前的哈达部首领是用自己的儿子做人质，他用七个大臣的儿子做人质，请努尔哈赤出兵。

人质不人质倒无所谓，努尔哈赤期盼的就是出兵。他拨了一千人马去辉发，打败叶赫部，镇压了辉发的叛乱之风。后来叶赫部的纳林布禄用计，告诉拜音达里说：“如果你撤回在建州的人质，我就将你们族里的叛逃者遣返。”

拜音达里信以为真，结果被纳林布禄结结实实地忽悠了一把。拜音达里又厚着脸皮对努尔哈赤说：“我被叶赫部忽悠了，对不起哈！从此以后，我老老实实在跟大汗混，只要你把女儿嫁给我就好了。”

努尔哈赤这女儿本来已经许给其他人了，但他不计前嫌，把女儿许给拜音达里。没想到，拜音达里这人出尔反尔，担心和努尔哈赤结盟会招致叶赫部的愤怒，竟然背约，不肯娶。努尔哈赤一听，当然很愤怒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初九，努尔哈赤亲自征讨辉发，五天后，辉发灭亡，拜音达里父子被杀。

一统海西女真

乌拉部位于松花江上游，在扈伦四部，离建州最远，需要七八天的路程。乌拉的首领是布占泰，这个布占泰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前面几个部落的首领都很平庸，对努尔哈赤来说，没有太大的挑战性。

布占泰也是一块打仗的好料，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阴谋家，城府很深。在古勒山之战中，他曾被俘虏，但他一点儿都不慌，镇定地对努尔哈赤说：“我是乌拉国首领的弟弟，现在被大汗擒拿，是生是死全凭大汗做主。”由此可见，此人确实胆识非凡。

当时，努尔哈赤就挺欣赏这个人的，将他留下来“收养”。这一待就是四年，这四年布占泰卧薪尝胆，和努尔哈赤虚与委蛇。努尔哈赤以为经过四年的调教，布占泰已经是个可以信任的人了。事实证明，努尔哈赤看错了，但也可以想见布占泰这个人城府之深。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努尔哈赤作出一个果断的决策，放布占泰回乌拉。布占泰回乌拉后，用阴谋杀害叔父和哥哥满泰及满泰的儿子，自己当上贝勒。布占泰当上贝勒后，和努尔哈赤有过五次联姻，努尔哈赤既是布占泰的岳父，还是他的妹夫。看起来，这两人的人情功夫下得很足，但形势比人情强，兵戎相见只是迟早的事。

双方大大小小的仗打了很多次，布占泰虽然精明，但打仗根本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被打得头冒青烟的时候，布占泰居然抬起了头，厚着脸皮对努尔哈赤说：“如果你再把亲生女儿嫁给我，我就相当于是你的儿子了，从此以后对你忠心耿耿。”

努尔哈赤居然答应了他，这个布占泰狼性不改，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射杀了努尔哈赤的女儿娥恩哲格格。到了这地步，努尔哈赤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随即发动了浩浩荡荡的征伐行动。

这次战争中，皇太极表现不错，攻克了临河五城，又夺取了金州城。与乌拉的军队隔河相望，皇太极和莽古尔泰急切地盼望渡河攻城。

努尔哈赤给两个儿子上了一堂政治军事课：“打仗是不能这么浮躁的，你们这么急切地渡河，就算胜利，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打仗就像砍伐一棵大树，哪能一斧头劈倒一棵大树。必须先砍掉小枝叶，然后再砍掉大树枝，最后才是砍倒主干。先从软的地方下手，这样由弱到强，就能灭掉对方。攻打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绝不可以一蹴而就。”

努尔哈赤这番课程可以说让后来的皇太极受益匪浅，皇太极和多尔袞就是这样一刀一刀地宰掉大明帝国的。

在努尔哈赤的指示下，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动手烧掉周边城池的房屋和粮食。布占泰无奈，只能再次举手投降。努尔哈赤笑着对儿子说：“看看吧，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学着点儿吧！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学的。”

努尔哈赤再一次容忍了布占泰，也许努尔哈赤是拿布占泰当小白鼠，来训练自己的忍耐力。一年后，布占泰毛病又发作了，娶了叶赫老女（先前许给努尔哈赤的那个美女），还将努尔哈赤的两个女儿囚禁起来。努尔哈赤亲自带兵征讨，布占泰带领三万人迎敌。这一战，布占泰又输得一败涂地，努尔哈赤攻下乌拉，布占泰只身逃到叶赫部。

努尔哈赤终于砍倒了乌拉这棵大树，接下来，努尔哈赤兵锋直指叶赫部。发动战争需要理由，这个理由不难找。努尔哈赤多次让叶赫

部交出布占泰，叶赫部置之不理，好了，理由有了。努尔哈赤四征叶赫部，其间还要跟明朝周旋，终于在1619年灭掉叶赫部。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

第七章 女真族最后一个大佬

努尔哈赤不仅会打仗，而且是个宣传高手，善于打造企业品牌，善于建构核心竞争力，善于吸纳三教九流的人等。

征服东海女真

东海女真属于野人女真的一支，野人女真的另一支是黑水女真。努尔哈赤首先看中了东海女真，东海女真又分为三部：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努尔哈赤就像切菜一样，怪不得努尔哈赤百战百胜，胜利了一辈子，因为对手太弱了。一个强者如果没有对手的话，也是寂寞的。当努尔哈赤真正的对手出现时，几乎摧毁了他的“战争观”，这个对手就是袁崇焕，我们在后面会讲到他。

努尔哈赤首先征讨的是瓦尔喀部，第一战就夺取了噶嘉路城，杀掉城主阿球。第二战夺取了安楚拉库路，这场仗是长子褚英打的。褚英是一个出色的将领，这也为他后来的灭亡埋下了伏笔。打完两场仗之后，就是和亲了，渥集部首领看到努尔哈赤的实力，上百个大臣跑到努尔哈赤面前进贡、求婚。努尔哈赤心想，这是好事啊，就把自己这边六个大臣的女儿许配给对方的六个大臣，还举行了集体婚礼。

婚礼举行完毕后，努尔哈赤又开始攻打瓦尔喀部，由此揭开了乌碯岩之战。在攻打的时候，布占泰突然出现了，还带着万人军队截击努尔哈赤。但努尔哈赤凭借着过硬的战争本领，击败了敌人，并继续向黑龙江下游挺进。

第四场战役是与渥集部之间的战役，开打之前，努尔哈赤就开始进行宣传战，对敌人喊话：“我已经打败了乌拉，你们渥集部三路还跟布占泰眉来眼去，我限你们尽快脱离和布占泰的关系，否则将兴兵讨伐。”

对方不为所动，努尔哈赤挥军攻打渥集部三路，攻城略地，俘获了两千人而归。

第五次战役是收复渥集部珊叶路，这支部落位于今天俄罗斯滨海地区刀毕河一带。这次出征的借口是珊叶路收留了被努尔哈赤打散的

逃兵。开打之前，努尔哈赤照例质问：“你们自己不投降就算了，干吗还要收容我的敌人呢？”努尔哈赤仅仅派出了千人的部队，就打垮了这个部落，将两千户人家收为己有。

总共打了十三场战役，努尔哈赤统一了东海女真。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真正目的是扩大财力和兵力，为将来进军大明做好准备。要想推倒大明，取而代之，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是基础。

招抚黑水女真

野人女真的一支居住在黑龙江附近，所以这支女真又被称为黑水女真。

黑水女真以前是由元朝管辖，元朝灭亡后，明朝接管该地。现在，努尔哈赤要接管这个地方，还是老办法，威胁加武力。照例，努尔哈赤需要找到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正好萨哈连部无辜杀害了七十名通商的人。努尔哈赤先采取和亲政策，但萨哈连部首领阳奉阴违，根本不买账。努尔哈赤不得不出兵了。

努尔哈赤一出兵，没有办不到的事。可以说，努尔哈赤大军所到之处，一路如摧枯拉朽，没有碰到像样的抵抗。努尔哈赤大老远来到这里，当然不会只是为了打赢一场战争。他率领大军向黑水女真各个部落宣传：“归附天命汗后，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如果不归顺，恐怕难逃妻离子散的下场……”

努尔哈赤说到做到，对于投降的人赏赐时非常大方。这么一来，大家也没必要自讨苦吃了。

努尔哈赤用兵这么多年，终于统一了辽东各族的女真部落。这是自完颜阿骨打创立金国以后，女真族的再一次统一。努尔哈赤是一个英雄，一个不容否认的英雄，虽然他实现理想的方式是铁与火。那么，努尔哈赤为什么能完成这个其他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呢？

首先，努尔哈赤是从苦难中崛起的，毅力非常强，只要他想做到的事情，一定会全力以赴，所以他才这么锲而不舍地统一女真部落。

其次，努尔哈赤看清了当时天下大势，明王朝正在衰落，内忧外患，迟早有崩塌的一天。而女真族混乱无序，群龙无首。努尔哈赤分析形势后，了解到女真族唯一的出路就是统一起来，然后伺机取代明王朝。

再次，在战争中，努尔哈赤一手拿着钢刀，一手挥着橄榄枝。这

一招非常管用，征抚并用，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更仁义，战争这种东西跟婚姻一样非常强调一个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但如果努尔哈赤做到了“仁至义尽”，对方还死不悔改的话，努尔哈赤报复起来也非常恐怖。

对虎尔哈部之战就说明了努尔哈赤这种特性，他派出三个大将攻打扎库塔城，三个大将谨遵努尔哈赤最高指示，围而不攻，不停地对着城内喊话劝降。结果喊了三天，城内毫无动静，将士们失去了耐性，怒发冲冠，拿下该城。接下来就是大屠杀，一共屠杀了一千多人。这在努尔哈赤部队中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努尔哈赤一贯标榜自己是“仁义之师”。

最后，善待俘虏。努尔哈赤善待俘虏也是出了名的，通过这一系列行动，让大家明白努尔哈赤是个“厚道”的人，只要你归顺他，他是绝对不会害你的，反而给你种种好处。史书记载，努尔哈赤对待俘虏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对于归降自己的人，努尔哈赤甚至亲自到衙门去赏赐。最高领导人努尔哈赤居然亲临衙门，主持赏赐达五天，这种“周公吐哺”的姿态，显然让许多人才感动不已。这样的领导上哪里去找啊？不归顺他又归顺谁。

正是在努尔哈赤这种政策下，女真族掀起了一股“海归流”，一波又波的人流涌向努尔哈赤，犹如江河涌向大海。

从这里可以看出，努尔哈赤不仅会打仗，而且是个宣传高手，善于打造企业品牌，善于建构核心竞争力，善于吸纳三教九流的人等。

第八章 蒙古，你好

明朝的想法是蒙古和后金你们打吧，我做裁判，打赢了有奖杯。努尔哈赤一看，这不好办，明朝想挑唆自己跟蒙古打起来。努尔哈赤见招拆招，制定了联合蒙古对抗明朝的策略。对于蒙古，他还是用老办法：“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

玩的就是和亲

本民族统一了，意味着自家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可以考虑对邻居下手了。

明朝后期，蒙古已经形成三大部落，分别是漠北的喀尔喀蒙古、漠西的厄鲁特蒙古和草原东部大漠以南的漠南蒙古。在这些大的部落下面，又分裂成许多小的部落。此时，中国版图上有三股最大的势力。力量最强大但正在不断衰微的是明朝这个老大哥，力量第二的是蒙古，蒙古自称拥有四十万铁骑，而此时努尔哈赤只有三万兵马。

明朝的想法是蒙古和后金你们打吧，我做裁判，打赢了有奖杯。努尔哈赤一看，这不好办，明朝想挑唆自己跟蒙古打起来。努尔哈赤见招拆招，制定了联合蒙古对抗明朝的策略。对于蒙古，他还是用老办法：“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

努尔哈赤首先和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打招呼：“你好啊！”科尔沁也算是一个比较强大的部落，心想努尔哈赤这老家伙以前从来不跟我打招呼，怎么突然就问好来了，一定是心怀鬼胎。

努尔哈赤见对方不甩自己，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其实，在此之前努尔哈赤就跟科尔沁部交过手了。当年，纳林布禄联合九个部落一起攻打努尔哈赤，其中就有科尔沁部。第二次交手是科尔沁支援布占泰。

看到努尔哈赤要出兵，科尔沁软了下来。努尔哈赤于是主动提出和亲：“听说你们贝勒明安的女儿挺贤惠的，我看还是嫁给我这个老头子吧！”就这样，努尔哈赤和科尔沁部结亲，维持了一段比较安稳的日子。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又娶了博尔济吉特氏，她就是后来有名的寿康太妃，此女是科尔沁君王孔果尔的女儿，直到康熙四年（1665年）才薨逝。

尝到和亲甜头之后，努尔哈赤开始和蒙古各部落和亲，一发不可收拾。

天命十一年（1626年）五月十六日，科尔沁部贝勒领袖奥巴要到沈阳来朝觐努尔哈赤，听到这个消息，努尔哈赤很兴奋，吩咐属下，要隆重接待奥巴这个识时务的才俊。努尔哈赤命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等重要人物远程接待奥巴，这些人走了三天，在开原境内的固城中等候奥巴。奥巴邻近沈阳的时候，努尔哈赤亲自出城十里，搭长篷迎接奥巴。奥巴看到这种阵仗，非常感动。

双方的领导人经过半个月的亲密接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确立了坚定的盟友关系。努尔哈赤还将自己的孙侄女嫁给奥巴——女儿都已经用完了，不得不承认，努尔哈赤是个非常好客的主人，英明的领导者。

六月六日，双方在沈阳城郊的浑河岸边举行结盟仪式。杀白马、乌牛，祭奠上天，指天发誓，从此以后后金和科尔沁部永结同盟。随后，努尔哈赤赐奥巴士谢图汗，并赏赐给他铠甲、金银、绸缎等，奥巴满载而归。

临行前，奥巴留下了新妻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奥巴本来就不缺少老婆，这场婚姻本来就是政治联姻，如果将新婚妻子带回去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如果她玩起谍中谍游戏就更不好办了。

从此，科尔沁部和努尔哈赤结下了牢固的同盟。

搞定了科尔沁部之后，努尔哈赤希望和喀尔喀部合作。喀尔喀部有五个部落，这五个部落打打停停，有时联合，有时争斗。这五个部落中最强的是介赛部，努尔哈赤首先想拉拢介赛部。不过介赛部自恃强大，不怎么给努尔哈赤面子。

据说，努尔哈赤为了拿下介赛部绞尽脑汁，还是没有想出好办法。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天晚上，努尔哈赤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天上飞着许多白鹅、白鹤等鸟，这些鸟在天空中飞得非常得意。努尔哈赤射了一箭，射中了一只白鹤，说：“终于得到蒙古的介赛部。”刚喊完，努尔哈赤就惊醒过来。努尔哈赤把这个梦告诉众人，大家都说这是吉兆，介赛自比天空中的大鸟，抓住白鹤就意味着好运要光临了。

还别说，这个梦真成真了，人都说好梦成真，看来多少也有些道理。1619年，努尔哈赤领兵攻打明朝的铁岭城。经过一番生死激战，终于拿下铁岭城，阵斩明朝将领喻名成。当夜，努尔哈赤就将军队驻扎在铁岭城。

就在半夜，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蒙古的介赛部落和扎鲁特部落带领一万多人马，星夜过来支援明军——很可能是想过来趁火打劫。后金的巡逻兵发现了这些人，双方发生了流血冲突。但后金的士兵发现这些人是蒙古兵的时候，不敢贸然进攻，去请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大喊：“这么好的机会还等什么，赶快打啊！”这时，大贝勒代善说：“如果打的话，不太好吧，以后怎么收场呢？”

努尔哈赤说：“打，我恨透了介赛人，放心地打，大胆地打。”

战争打起来后，蒙古人不敌，努尔哈赤下令士兵们追杀。许多蒙古兵掉进河里溺水而死，许多人被后金的士兵刀剑刺穿。这一战又是全胜，抓住了介赛部首领介赛和其他六个贝勒。

努尔哈赤仰天笑道：“好梦果然成真了。”

努尔哈赤最后有步骤地释放了介赛和他的俘虏，最终让介赛心服口服，和他建立了同盟关系，结为儿女亲家。

介赛和努尔哈赤结盟后，其他四个部落也先后与努尔哈赤结盟。结盟之后，努尔哈赤跟他们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从此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推倒明朝。

通过这种软硬兼施的做法，努尔哈赤迫使更多的蒙古部落跟自己结盟。虽然努尔哈赤的统战工作做得不错，但也有一匹难以驯服的烈马，这匹烈马就是努尔哈赤的心病——漠南的察哈尔部。

林丹这匹烈马

漠南的察哈尔部落是明朝的一颗棋子。明朝每年给察哈尔部四千两的银子，让他们好好地跟努尔哈赤作对。后来，增加到四万两，看来那时明政府已经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危害性。察哈尔的领导林丹见明朝这么重视自己，自然不把后金放在眼里。事实上他错了，明朝越重视自己，说明后金越可怕。

林丹让使臣给努尔哈赤带了一封信，语气傲慢地质问：“统率四十万之众的蒙古大汗向统率三万人的满洲英明皇帝问好，不知道阁下和明朝到底有什么仇，为什么偏偏跟大明过不去。今年夏天，我已去过明朝的广宁，城池暂且归我管，赋税暂且归我收。如果阁下不小心也带兵来到广宁，不好意思，我只好不客气了。如果阁下还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派遣使者来咨询。”

看到这种蛮横无理的信，当即就有人主张杀掉来使，努尔哈赤虽

然也气得七窍生烟，但还是镇定地表示：“这件事跟使者没关系，杀掉使者只会让世人骂我们心胸狭窄，先给使者接风，等我想到对策，再给使者一个答复。”

事后，努尔哈赤拟了一封国书，大灭林丹的嚣张气焰。信中，努尔哈赤首先驳斥林丹虚夸兵力，当年明洪武皇帝打到你们都城，听说当时你们也有四十万人，为何个个逃窜得跟老鼠一样，到最后剩下的也不过六万人。而且，这六万人也不尽属你的部落。你最多不过三万人的兵力，现在藐视我，真能吹啊！

信中还指出，林丹和明朝沆瀣一气，说：“你说广宁是你收税的地方，让我不要过去，如果过去的话，你会对我不客气。这不是成心找碴儿吗？我跟你本来无冤无仇，你居然为了广宁跟我撕破脸。皇天后土，我努尔哈赤坦荡光明，上天必定保佑我，真跟我打的话，你一定能对我不利吗？”

努尔哈赤还严厉谴责林丹：“你占着广宁，守着锱铢小利还沾沾自喜。真是目光短浅，如果你兴师攻下明朝的城池的话，获得的利益那才叫大。你如果怕和明朝为敌的话，可以和我联姻。在光明前途和蝇头小利之间你选择蝇头小利，什么眼光啊！你如果真的有志恢复大都，统率三四十万大军，跟我说出这样的狂言倒也可以理解。但你自己看看，你曾经也和明军交过手，结果徒然送了自己贝勒和从臣的命，毫无斩获地回来。你说说你这个人吧，没有打什么胜仗，没有攻下什么城池，口气还这么大。你以为明朝会真心重用你啊，只不过是利用你而已……”

最后，努尔哈赤不忘张扬自己志气，同时劝告林丹弃暗投明：“我征战这么多年，兵威无处不在，凡是跟我作对的，男子莫不死于锋镝，妇女莫不守活寡。连明朝都怕我，所以才用小利诱惑你跟我作对。现在我们同是关外民族，为何不一起联手对付明朝，明朝把你的老祖宗赶到沙漠里来了，是你的夙仇，明朝杀了我的祖父和父亲，也是我的仇人。我们本没有仇怨，何必要针锋相对呢？”

林丹收到这封信，头顶直冒火。此后，双方虽然一度剑拔弩张，但始终没有动武。因为双方都清楚，动武的话对谁都不利。

两个民族就这么一直处于僵持状态，这种僵持很显然对努尔哈赤是有利的，让努尔哈赤能够腾出手来对付其他部落，经营自己的事业。真正解决掉林丹这个麻烦，还要等到皇太极的时候。

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征讨察哈尔，打得林丹率众奔逃，俘获了林丹的儿子、妻子等人。多尔袞大军拿下苏泰福晋之弟南楚台吉，让他去招抚姐姐苏泰。随后，林丹部下的大臣贝勒

们一一投降。察哈尔问题就此正式解决。

第九章 内部清理：囚弟、杀儿、休妃

在清初有三大疑案：努尔哈赤囚禁亲弟弟舒尔哈齐，致使弟弟暴死；诛杀长子褚英及其党羽；休掉宠妃富察氏。

辣手无情灭亲弟

一个政权要扩张，无非就两个要点：征服外敌和管理内部。

在清初有三大疑案：努尔哈赤囚禁亲弟弟舒尔哈齐，致使弟弟暴死；诛杀长子褚英及其党羽；休掉宠妃富察氏。

这三个案子实际上都是努尔哈赤为了维护自己绝对领导权所采取的措施。别看努尔哈赤是一个非常英明的领导人，但部属们都很清楚，这个人再英明也是一头老虎，随时可以吃掉自己。部将们非常明白，自己面对努尔哈赤的时候是毫无抵抗力的，只能小心翼翼地别逆着这头老虎。

但是，努尔哈赤的家人却不一样，他们与努尔哈赤的关系更亲近。随着努尔哈赤逐渐年老，家族中分化出了几股不同的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以大弟弟舒尔哈齐和小弟弟雅尔哈齐为首的“反大哥集团”，第二股力量是以长子褚英为首的“反老爸集团”。其他的那些力量都还是站在努尔哈赤的立场上的，可以理解，除了努尔哈赤的亲弟弟和长子，谁还敢反对他。

舒尔哈齐是塔克世的第三子，和努尔哈赤同为宣皇后所生，比努尔哈赤小五岁。努尔哈赤为什么突然关押亲弟弟？舒尔哈齐是触犯了法律，还是触犯了努尔哈赤的权威？舒尔哈齐究竟是如何死的？这是清初第一大谜案，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关于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之间的矛盾，正史上没有详细记载，我们只能根据一些事迹探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有三处记载舒尔哈齐。

第一处是攻打哈达，舒尔哈齐自告奋勇为先锋，但是临阵却退缩，让努尔哈赤很失望，当众怒斥一句，让舒尔哈齐没面子。舒尔哈

齐的表现虽然让人失望，但毕竟是“工作不力”，应该罪不至死。从后来的行为来看，努尔哈赤也没有惩罚他，所以后来囚禁舒尔哈齐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第二处是攻打乌拉的时候，当时努尔哈赤和布占泰爆发了乌碯岩大战，努尔哈赤命令弟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等率领三千人到乌拉斐优城运送俘获的人口。他们到达斐优城外时，天空出现异象，夜晚非常隐晦，但是军旗上空却有光。舒尔哈齐说：“我随大哥征战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怪象，一定不是吉兆，我们还是退兵吧。”

褚英和代善坚决表示反对，褚英说：“是吉是凶已经确定了，如果我们就这么回去，如何向父皇交代啊？”

就在他们收纳斐优城附近的五百户人家时，布占泰带着一万人马突然杀出。褚英并没有惊慌，他冷静地跟大家分析形势：“以前皇父哪次打仗不是百战百胜，这次他虽然不在这里，我们当然也能打败敌人。布占泰以前就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这次还敢来拦截我们，不是找死吗？”

褚英这一番话说得大家热血沸腾，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接下来又是一场残酷的厮杀，布占泰虽然人数甚众，还是大败而逃。这一战，褚英和代善立的功劳很大。舒尔哈齐在干吗呢？他啥也没干，带着五百士兵躲在山下。后来，努尔哈赤准备处决跟舒尔哈齐一起躲避的两个大将，舒尔哈齐却说：“杀了他们，跟杀了我有什么分别。”

碰上这样一个弟弟，努尔哈赤只能自认倒霉了，这事就这么算了。

书中第三处记载直接就说舒尔哈齐在万历三十九年死去，享年四十八岁。

战场上的表现肯定不是舒尔哈齐被囚禁致死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或许在《清史稿·舒尔哈齐传》中能找到蛛丝马迹，其中有一段文字：“自是上不遣舒尔哈齐将兵。舒尔哈齐居恒郁郁，语其第一子阿尔通阿、第三子扎萨克图曰：‘吾岂以衣食受羁于人哉？’移居黑扯木。”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舒尔哈齐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让人失望，努尔哈赤从此不再让他带兵，相当于解除了他的兵权，舒尔哈齐心里很郁闷，对大儿子和三儿子说：“大丈夫怎么能够寄人篱下呢？干脆我们移居黑扯木吧！”

最关键的就是移居黑扯木，移居黑扯木就是分家自己过，用政治的行话说就是另立山头。这种事情是努尔哈赤的底线，他无法忍受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军队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努尔哈赤对舒尔哈齐发出通牒，让他尽快回来。但舒尔哈齐坚决不回，努尔哈赤于是诛杀了舒尔哈齐的大儿子和三儿子。事已至此，舒尔哈齐知道如果不回的话，自己这条命也会送掉，只好回来。

舒尔哈齐回来后，努尔哈赤剥夺了他的一切特权，并且杀掉他的近臣，将舒尔哈齐孤立起来。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同父同母的亲弟弟，这个亲弟弟除了不怎么会打仗之外，其实也没犯什么必死之罪，主要是跟不上形势。此时，努尔哈赤的事业蒸蒸日上，形势一片大好，你这时要来“离家出走”，这不是诚心跟潮流作对吗？舒尔哈齐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在中国古代可以算是最严重的错误了。

至于舒尔哈齐到底是怎么死的，一直没有定论。但不管是谋杀还是病死，他都是间接地死于努尔哈赤之手。努尔哈赤果然是狠角色，对自己的亲弟弟都能下手。后来，顺治帝追赠舒尔哈齐为亲王，谥号曰庄，是为庄亲王。

狠心诛长子

杀亲弟弟已经是够绝的了，但努尔哈赤还做过更绝的事，处死能文能武的长子褚英。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十六岁的努尔哈赤作出了一个骇人的决定：下令处死仍在狱中的长子。

当然了，史书上肯定会记载，褚英之所以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领导肯定是对的。我们先来看看正史是如何记载这件事的。

褚英，1580年出生，母亲是努尔哈赤的爱妻元妃佟佳氏。褚英这孩子挺像父亲的，特别会打仗，智勇双全。十八岁的时候就率军征讨安楚拉库路，大胜而归，努尔哈赤赐他为洪巴图鲁，封贝勒。巴图鲁是勇士、英雄的意思，前面加个“洪”字，相当于大英雄。二十七岁的时候，褚英跟随舒尔哈齐出征，参加了乌碯岩大战。舒尔哈齐迷信天象差点儿贻误战机，褚英独当一面，坚持出战，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这一战后，努尔哈赤封褚英为广略贝勒。

写到这里，大家一定纳闷了，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又是自己的儿子，努尔哈赤为他自豪还来不及，干吗要处死他呢？

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是个谜，我们来看看正史是怎么解释这件事的。根据正史的说法，努尔哈赤的大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确实考虑到

接班人的问题，据说努尔哈赤打算让褚英接班。为了让政权顺利交接，努尔哈赤让褚英代理一些国家政务。不过，褚英的表现让努尔哈赤很失望。努尔哈赤说褚英这个人虽然会打仗，但是心胸很狭隘，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所以努尔哈赤陷入了矛盾之中，是废掉长子呢，还是让长子接班？

有传言说褚英曾当众叫嚣：“一旦我即位，就把和我作对的各个兄弟和大臣全部杀掉。”我想，只要褚英脑子没病，应该不至于说出这样的话吧，说出这种话等于就是说千万别立我，一旦立我，我就大开杀戒。褚英心里是不是这样想，那没人知道，就像皇太极虽然没出口，还不是一样清洗反对自己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是褚英政敌造谣之言。

努尔哈赤帐下有四大贝勒、五位大臣，四大贝勒分别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五大臣分别是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四大贝勒、五位大臣相当于努尔哈赤政权的基石，他们坚定地支持努尔哈赤，褚英由于被推到储君的位置，难免和努尔哈赤发生一些冲突和矛盾。四大贝勒和五位大臣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打掉褚英集团，所以他们罗列了褚英的罪状，联名告发褚英。

那么，褚英有什么罪名呢？其实，这个罪名非常牵强。一是说褚英在四大贝勒和五位大臣之间挑拨离间，你说挑拨离间这东西算是罪名吗？四大贝勒、五位大臣都不是小孩子了，别人能随便挑拨得了？往往说人挑拨离间的人自己可能是挑拨离间者，归根结底，这种带有人身攻击性的罪名根本没法成立。第二个罪名是褚英向弟弟们索要财物，削夺弟弟们的实力，加强个人的权力。这一条无论事实是怎样的，都不构成死罪，以努尔哈赤的英明肯定是因为这些牵强的理由处死褚英的，而且作为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应该知道储君上位之前集权是必须的。

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努尔哈赤拿着这些检举书给褚英看：“这是你的兄弟们和大臣们控诉你罪行的书，你有没有什么要争辩的？”

褚英颇有自知之明，回答道：“我没有什么好争辩的。”

旁边的大臣和贝勒们说：“既然你已经认罪了，那么就不能由你执政，国家的大权不能交给你。”

训斥完之后，努尔哈赤让褚英闭门思过。据说，褚英并没有真诚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时时感觉“郁闷”，心术不善，不认己错，甚至“焚表告天”，在背后诅咒，等等。努尔哈赤很失望，真的很失

望，只好把褚英逮捕起来，于万历四十三年，即1615年八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下令将褚英处死。褚英，享年三十六岁。

那么，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呢？

真实情况应该是褚英是一个合格的储君，在他代理执政期间和老爸的政见发生冲突，英明的褚英意识到，老爸设置这么多贝勒和重臣，对自己将来的接班会非常不利，所以必定要采取一些措施削弱这些贝勒和大臣的权力，结果招致了这些人的集体反对，所以联名弹劾他。

褚英错就错在有点儿超前了，不该动手太早。想这个褚英，身为长子，最早跟着老爸南征北战，杀人放火的本领堪称一绝。褚英打了十八年的仗，在军队中也慢慢树立了个人威信，追随者也越来越多。加上，当时大家都认为将来继承人必定是褚英，所以很多人把前途押在他身上。

看到褚英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努尔哈赤心里肯定很不舒服。虽然褚英肯定没有和努尔哈赤作对的意思，但势力已经形成了，努尔哈赤虽然想把江山交给褚英，但现在自己还没死，儿子就自成一体，这种感觉是非常不舒服的。

任凭个人感情再强烈，任凭努尔哈赤再爱这个儿子，也抵不住形势的力量。当褚英利益集团形成之时，努尔哈赤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威胁。

褚英是个人，是人都会有弱点。在褚英代理执政期间，必然会把利益的天平偏向自己的亲信，这势必引起努尔哈赤集团的代表人物四大贝勒和五位大臣的不满。饱读史书的努尔哈赤很担心唐太宗玄武门之变的事情再次发生，如果不摧毁褚英集团，努尔哈赤睡不着觉，一旦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涌向褚英那边，褚英会不会提前发难，要了自己的老命。

说实话，努尔哈赤了解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不是弑父的料，儿子可以相信，但政敌却无法让人相信。

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努尔哈赤果断地向褚英下手了，反正努尔哈赤绝对不缺儿子。大人物就是大人物，连至亲都可以杀。

休宠妃之谜

天命五年（1620年），后金的宫廷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努尔哈赤

休掉了第二个大福晋富察氏，休掉没多久，富察氏就死了。这就是清初的第三大悬案，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富察氏姓袞代，曾经嫁给了威准，威准是努尔哈赤祖父的哥哥的孙子。威准死后，她改嫁努尔哈赤，同努尔哈赤生下皇五子莽古尔泰、皇十子德格类及公主莽古姬。《清史稿》中曾经记载，海西女真九部联军进攻建州，努尔哈赤在睡大觉，富察氏过来叫醒他，说敌人大军压境，你还睡得着……

从这事情上看，富察氏还是挺贤惠的一个妃子，而且努尔哈赤确实很宠爱她，最后怎么会落得这么个下场？

关于她的死，正史上记载只有寥寥一句话：“以富察氏在太祖时，获罪赐死故也”；“天命五年，妃得罪，死”。

说来说去，就是说富察氏犯罪了，然后就死掉了。也没说犯什么罪，怎么死的。看来，只能挖掘更多材料了。

《满文老档》是皇太极时期修的史书，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有点儿捕风捉影的味道，但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不少线索。

小福晋为了上位，给努尔哈赤打小报告，说富察氏几次送饭给大贝勒，大贝勒高高兴兴地吃了。富察氏又送饭给四贝勒，四贝勒收下但没有吃。此外，富察氏隔三差五派人去大贝勒家，也不知道干啥好事。此外，这个大福晋，有好几次黑夜还悄悄出门，真不知道那么晚了她还有什么要事。对此，努尔哈赤说：“小福晋，你未免有点儿八卦了。我曾经说过，等我死后把小儿子和大福晋交给大贝勒收养。有了我这话，大福晋和大贝勒交往多一点也很正常啊！”

书中还记载，大家在努尔哈赤家开会的时候，大福晋媚眼儿一个劲儿盯着大贝勒，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至于众大臣和贝勒们都觉得不妥。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一个事实：《满文老档》是在皇太极时期修的，皇太极对三贝勒莽古尔泰是非常看不顺眼的。

后来，许多人向努尔哈赤打小报告，说大福晋和大贝勒有奸情。努尔哈赤为了给自己留面子，说道：“大福晋偷盗了许多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还把这些财物隐藏了起来，你们赶快跟我把这些财物找出来。”

结果一找还真有一大堆，好了，可以给大福晋治罪了。努尔哈赤先和大福晋离婚，然后给大福晋治了一个盗窃罪。至于那个检举有功的小福晋代因扎，升到和努尔哈赤同桌共食、举案齐眉的地位。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努尔哈赤怀疑大福晋有私通罪。但是，如果

仅仅根据小福晋的检举，是不能给大福晋定罪的。继母给继子送饭是很正常的事，大贝勒吃了她的饭，不代表就吃了她豆腐。大福晋差人去问候大贝勒，也很正常，以后努尔哈赤死了，就指望大贝勒保护自己了，能不积极一点儿吗？开会时，大福晋眼睛盯着大贝勒，这个更是荒唐，眼睛盯着谁就代表跟谁有奸情吗？而且，是不是已经有谣言了，所以众人才感觉大福晋盯着大贝勒呢！总之，从法律上讲，私通罪证据不足。

但是，如果富察氏没有和代善私通，那努尔哈赤最后逼死他是不是有点儿过分呢？我们可以从几点来考虑。首先说说这个揭发人小福晋，小福晋如果没有一定的证据，如果不是觉得十拿九稳的话，纵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告发正在受宠的大福晋，何况她这一告发就连权势熏天的大贝勒也牵连在内。

最后努尔哈赤让四位大臣调查这件事，调查的结果只有努尔哈赤和四大臣知道，用四大臣的话说：“大汗听了我们的调查报告，不愿加罪儿子。”

努尔哈赤只能给大福晋安个“盗窃罪”的罪名，但这个罪名明显太荒谬了，大福晋贵为皇后，要多少钱还不有多少，犯得着盗窃吗？

受到伤害的努尔哈赤痛苦地问富察氏：“我给你的金银珠宝和荣华富贵还不够多吗？你穿着别人穿不着的名贵绸缎，我金山银山地养着你，你居然不爱我，蒙蔽我的双眼。不看我，却去看其他的人，我想不杀你都难啊！”

不过，努尔哈赤还是狠不下心来杀掉富察氏：“我就是杀你十次也不过分，但是想想你死了后，我那几个心肝宝贝将会哭成什么样啊！我不忍，我不忍啊……”

既然努尔哈赤不忍心杀掉富察氏，那么富察氏又是怎么死的呢？

莫非富察氏是因为羞愧自杀的？答案是：否。对富察氏之死，正史上根本没有记载，但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在《清史稿·莽古尔泰传》中，在大凌河围攻祖大寿的时候，莽古尔泰和当时的皇帝皇太极发生了冲突。莽古尔泰很冲动，也很无礼，不顾弟弟的阻止，对皇太极破口大骂，还准备拔刀砍过去。皇太极非常愤怒，说了一句让人吃惊的话：“你算什么东西，敢在我面前嚣张，你不过是个亲手杀掉母亲获取宠信的家伙！”（是固尝弑其母以邀宠者！）

皇太极的话中充满了蔑视，洋洋清史中，幸亏皇太极发了一次怒，否则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富察氏真正的死因。

写到这里，大家都对莽古尔泰很失望，母亲就算出出墙，也没有必死的理由啊！就算该死，动手的也不该是儿子。亲手杀死母亲的儿子肯定不是好儿子，这样的儿子肯定也不会有好下场。后面我们会看到，莽古尔泰的下场很惨。

第十章 后金缔造者

等到明神宗反应过来的时候，努尔哈赤的势力已经成形了。最后一次朝贡，也就是第九次朝贡，努尔哈赤自己没去，派遣了十几个人的使者，随便拎点儿东北的土特产，扔给万历皇帝：“要不要就随你咯！”

八旗制度

我们现在对八旗制度津津乐道，其实八旗制度并不是女真族的传统，而是努尔哈赤独创的。

万历十二年（1584年），努尔哈赤就创立了八旗的牛录。牛录在满语中是箭的意思，每人出一支箭，十人组成一个牛录，牛录的首领叫牛录额真，这是最早的牛录。努尔哈赤在这个基础上编三百人为一个牛录，牛录额真相当于大箭主。五个牛录设一个甲喇额真，五个甲喇设置一个固山额真，固山是旗的意思，成为固山额真相当于是旗主了。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四旗，都是纯色，分别为黄、红、蓝、白。后来，增设了四旗，分别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总共有八旗，八旗制度就这样确立了。

牛录额真后来又称为牛录章京，清朝入关后称为佐领。甲喇额真后称为甲喇章京，入关后称为参领。固山额真，也就是旗主，在入关后称为都统，梅勒额真在入关后称为副都统。

一个旗有二十五个牛录，计七千五百人；八旗有二百个牛录，合计六万人。这就是清朝入关前的兵力，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战斗力非常强。八旗作为努尔哈赤亲手缔造的军事制度，首要的目的就是战争。努尔哈赤作为八旗制度的最高领导人，掌管着军队的最高权力。努尔哈赤的子侄们为八旗的旗主，一些重要的将领可以当上副都统、参领和佐领之类。

在八旗中，连士兵都是有等级的，分别为旗丁、披甲人、阿哈三等。旗丁是女真族士兵，地位最高；披甲人是各个投降的民族和部落，地位次之；阿哈是奴隶，通常是汉人和朝鲜人，地位也最低。

八旗军以骑兵为主，步兵为辅。当然，八旗军最让人刮目相看的还是严明的军纪。每次打仗之后，一定赏罚分明，要进行战后总结。

八旗军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兵民合一，打仗时大家都是兵，闲暇时要进行耕猎。就是这样一支纪律良好的军队最终打败了明朝，打败了闯王李自成。

创建满文，发展满族文化

努尔哈赤不光是一个军事家，也是一个颇有建树的政治家。现在我们说的满文就是努尔哈赤创造的，以前女真部落有过一段时间的文字，大概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这种文字就消亡了，因为这种文字非常奇怪，说它像汉字它又不是汉字，说它像契丹字它又不是契丹字。由于这种文字难以辨识，逐渐从历史长河中消失了。

努尔哈赤为什么要创建满文呢？说实话，这是必须的。一个国家武力再强大，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字，也会被人看不起。再说，后金已经起来了，虽然大家都说女真语，不过用的官方文字却是蒙古文字，所有女真人都必须学蒙古文。

就努尔哈赤自己来说，他粗略地了解一些汉文和蒙古文，越了解他就越郁闷：为啥汉语和汉文是一致的，蒙语和蒙文也是一致的，咋就我们女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我如果不创制出满文的话实在有愧于后世子孙啊！行，说干就干。

努尔哈赤把这个艰巨又光荣的任务交给了额尔德尼和噶盖。额尔德尼很早就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战场上是一块好料，除此之外，这人还特别爱读书，精通蒙古语和汉语，在努尔哈赤帐下，算是一个难得有学问的人物。噶盖学问虽然比不上额尔德尼，但做事相当踏实。

说实话，接到这个任务，额尔德尼和噶盖都感到很为难：“老大啊，蒙古文字我们用了这么久，你说改就改，不太好吧！”

努尔哈赤说：“正因为用别人的文字用了这么久，所以才要自己创制文字啊！难道要永远躺在别人的文字中吗？”

额尔德尼说：“好是好，但是怎么下手呢？”

努尔哈赤说：“这还不好办，你们直接把蒙文的字母拿过来，对上我们的读音，这不就结了。难道我指望你们像仓颉那样从无到有地造字，惊天地、泣鬼神啊……”

努尔哈赤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白：抄袭，大胆地抄袭。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就是我们的东西，由于努尔哈赤的指导方针进步正确，轰轰烈烈的满文运动开始了。噶盖在创建满文的过程中因为犯了政治错误被诛杀。

额尔德尼根据努尔哈赤的指示，终于创制了因文见义的满文，这种满文又称为“老满文”，主要是区别于皇太极时期加圈点的新满文。额尔德尼算是满洲的仓颉了，虽然涉嫌抄袭，也算是文化的开创者吧！所以皇太极评价他是“一代杰出之人”。

不过人越杰出，死得越快，这似乎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现象。额尔德尼后来因为私藏财物和珍宝被努尔哈赤杀害，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知道了。

额尔德尼创建的老满文没有圈点，仍然存在一些缺点。后来，清太宗皇太极任命达海改进满文，达海学问很好，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经达海改造的满文称为新满文，康熙帝对达海的新满文评价非常高，亲自立碑表彰他的功劳。

满文创制成功以后，满族人如虎添翼，自信心大增。以前，他们感觉自己是一个流浪的民族，连文字都没有的民族从心理上是一个没有归宿的民族。满族的影响力在不断地扩大，满族，将会让整个大地震颤。

对此，大明还没有心理准备。

善于韬光养晦的老狐狸

努尔哈赤既是狮子，也是狐狸；他凶狠的时候非常凶狠，狡猾的时候也相当狡猾。从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到现在，明朝的表现实在让人太失望了。明朝的皇帝纵使糊涂，明朝的边将也不应该糊涂。其实，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努尔哈赤善于伪装，所以才没有成为明朝的眼中钉。

努尔哈赤习惯用朝贡的方式消除明朝的戒心。当努尔哈赤跪在大明的宫殿上，卑躬屈膝、唯唯诺诺之时，明朝的皇帝没理由认为这个人是个威胁啊！从1590年到1615年，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后金赴明朝朝贡达八次，其中七次是努尔哈赤亲自去的。第一次朝贡的时候，努尔哈赤三十一岁，最后一次朝贡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五十六岁的老人了。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五年，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努尔哈赤坚持不懈地在明朝面前装孙子，就算明知是假，万历皇帝也会被他这

种精神打动。

其实，在努尔哈赤后来的几次朝贡中，大明的边将屡次上书给皇帝，让明神宗小心努尔哈赤这老家伙。兵部尚书李化龙再次提醒皇帝：“我朝如果没事的话，努尔哈赤不会轻举妄动，一旦有事，这个人一定是罪魁祸首。”

神宗把这一切都当成耳边风，他那点儿脆弱的心思大部分都沉浸在酒色之中。等到明神宗反应过来的时候，努尔哈赤的势力已经成形了。最后一次朝贡，也就是第九次朝贡，努尔哈赤自己没去，派遣了十几个人的使者，随便拎点儿东北的土特产，扔给万历皇帝：“要不要就随你咯！”

万历皇帝傻眼了，以前努尔哈赤朝贡的话都会带上几百人，现在就派十几个人来，而且手上的东西分量明显轻了。完了，被这老狐狸骗了。

建立后金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八月，努尔哈赤从费阿拉城迁都到赫图阿拉，这个赫图阿拉就是努尔哈赤的祖先孟特穆选定的。

到了赫图阿拉后，努尔哈赤首先是扩建城池，至少可容纳十万人居住。修建了几年，终于把城池弄得像模像样了。虽然都城选定了，但努尔哈赤并没有急着称汗，一直等到1616年，努尔哈赤认为时机成熟了，才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国。

努尔哈赤在称汗之前，曾经召开会议讨论称号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国不可一日无汗，以前我们没有汗，受的苦实在是太深了。现在老天爷总算给了我们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是的，努尔哈赤就像是老天赏赐给我们女真族的救世主，我们应该顺应天命，称呼努尔哈赤为天命汗。

天命元年（1616年）正月初一，努尔哈赤举行了登基大典，尊为大英明汗，国号为“金”，也就是“后金”，年号为天命，这一年为天命元年。

虽然努尔哈赤尽量想把仪式搞得低调一些，但既然想出头的话，就没法遮掩。努尔哈赤刚一登基，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就上书给明帝：“奴贼建国后金，登基为汗，自称为朕。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绝对不能纵容，奴贼竟然招降我大国边疆将士。”

不过，明朝最高领导者仍然认为努尔哈赤不足为患，那么一丁点儿的人，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能搞出什么名堂来，最多不过在边境一带打家劫舍，暂且由他，迟早会算总账的。

国家已经建立了，怎么治国呢？努尔哈赤治国有什么特色吗？

努尔哈赤提出了一个口号：“君明臣良，同心共济，秉志公诚，励精图治。”从这个口号中我们能看出领导的治国方略，转译一下就是：“我一定要努力做一个贤明的领导，在我的贤明领导下，如果还有哪个臣子不贤良，那真是对不起我啊！以后大家要和我一条心，一心为公，励精图治把后金国建设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是跟天命作对，跟天命作对的下场大家应该很清楚。”

努尔哈赤的思想总的来说就是：君德、臣德。臣德就两点：努力工作，忠诚。

努尔哈赤辛勤了一辈子，就是为了有一天端掉明朝这个庞然大物，所以他忍忍忍。他要灭掉明朝不光是因为明朝杀了自己的祖父和父母，也是因为明朝腐化堕落，让他看到明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

第十一章 高举反明旗帜：七大恨

从此，明朝和后金的关系发生逆转，曾经的孙子变成了大爷，曾经的大爷变成了孙子。明朝变成防守的一方，后金变成进攻的一方。

七大恨

努尔哈赤用了两年时间秣马厉兵，一边磨刀，一边叫明朝爷爷。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点兵十万讨伐明朝。

努尔哈赤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征讨明朝呢？

第一个原因是努尔哈赤已经准备得差不多，兵器库里面的兵器已经塞满了，攻城器械也都造好了，兵士们也训练得差不多了。

第二个原因是明朝的政治越来越腐败，边疆的防备越来越松弛，墙上有裂缝了，推倒墙就容易得多。

第三个原因是努尔哈赤已经基本稳定了后院，统一了女真族，把内部的反对派清洗得差不多了。后方稳定，前线无忧，努尔哈赤可以放心地打了。

第四个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后金国遭遇了天灾，到处是饿殍和乞丐。努尔哈赤非常担心，再这么下去，国内估计有人造反了。努尔哈赤也算是了解历史，他知道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往往是在灾荒的年份发生的，灾荒之年社会矛盾往往会濒临一触即发的顶点。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在后金，努尔哈赤果断地选择了转移国内矛盾，将矛头直指明朝，发布了所谓的“七大恨”。“七大恨”的内容无非是：

- 一、明朝无故杀害努尔哈赤祖、父；
- 二、明朝偏袒叶赫、哈达，欺压建州；
- 三、明朝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强令努尔哈赤抵偿所杀越境人命；
- 四、明朝派兵保卫叶赫，抗拒建州；

五、叶赫由于得到明朝的支持，背弃盟誓，将其“老女”转嫁蒙古；

六、明当局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垦种之柴河、三岔、抚安之地，不许收获庄稼；

七、明朝辽东当局派遣守备尚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

努尔哈赤这“七大恨”成功地将女真人的民族情绪引导到明朝身上，既转移了国内矛盾，又缓解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压力。在“七大恨”中，叶赫老女给了努尔哈赤一个好借口，叶赫老女虽然死了很多年，但依然有利用价值，这就是努尔哈赤厉害的地方，他不光善于利用活人，也善于利用死人。

这“七大恨”不过是车轱辘话，绕来绕去就一个意思：明朝，我看你很不爽，要找你麻烦。

皇太极计破抚顺

对明朝的战争正式开始了，在努尔哈赤的计划里，首先是拿下抚顺、清河。

在进攻抚顺之前，皇太极出了一个鬼点子，得知抚顺的一个守将李永芳在四月初八这天要开马市，一直持续到二十五日。皇太极建议派出五十名奸细，混入抚顺城。到时，内外夹击，自可拿下抚顺。

在进军抚顺之前，努尔哈赤就提出了“四勿”：凡俘获之人，勿去衣服，勿淫妇女，勿离异其配偶。拒战而死者，听其死。若归顺者，慎勿轻加诛戮。

由此可以看出，努尔哈赤显然很看重“名声”，要打仗杀人也要杀得名正言顺。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兵分两路，左四旗进攻东州、马根单两处，努尔哈赤自己带领右四旗和八旗中的精锐护军进攻抚顺。

行军路上，努尔哈赤还不忘对蒙古两个贝勒作作秀：“朕看自古帝王即使身经百战，最后登上尊崇地位，但没有一个可以永享的人。这次朕发兵，不是图什么大位，只是因为明朝经常压迫朕，不得已才征讨的。”

努尔哈赤之所以选择抚顺，是因为抚顺是辽东一带的枢纽城池。努尔哈赤对抚顺非常熟悉，第一仗选在抚顺也是胸有成竹。

努尔哈赤对中国的兵书也算是个内行，深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他首先大张声势，大兵压境，将抚顺团团包围（队伍绵亘百里，旌旗蔽空）。围城之后，就开始进行心理战了。

守将李永芳，不要指望他是之前的于谦，也不要指望他是后来袁崇焕那样的人物。努尔哈赤抓到一个明朝士兵，让他把劝降书交给李永芳。在劝降书中，努尔哈赤一方面威胁说攻下抚顺只是举手之劳，另一方面诱之以利。我努尔哈赤知道你是个人才，如果你投降，我会更加重用你，让你和我最重要的大臣享受同等待遇。如果你坚持抗战的话，我到时要把城池屠杀得干干净净。

李永芳很纠结，他并没有立即投降，一方面让城中士兵加强防守，另一方面也在考虑要不要投降。这时，抚顺城内的后金奸细到处散播投降言论，以致人心惶惶。努尔哈赤命八旗军登城，明军的中军千总王命印等人抵抗身亡。李永芳心想，此时此景，再反抗下去也没用，不如投降吧！

李永芳投降后，努尔哈赤果然信守诺言，不杀城中军民。就这样，努尔哈赤半恐吓半诱惑地拿下了抚顺、东州和马根单三城，还拿下了抚顺周围的堡垒和寨子五百多个。这一战收获很大，俘获人畜三十万，归降的人民编为一千户。

努尔哈赤是个贼精明的人，他把在抚顺做贸易的十六个外地商人招来，给每人一大笔钱，让他们带着“七大恨”回去：你们给我散发这个传单，这笔钱就归你们了。

商人唯利是图，自然答应了。努尔哈赤此举在于告诉天下人，我努尔哈赤拿下了抚顺，我很厉害，明朝很弱。

努尔哈赤还释放了四个汉人俘虏，让他们带着“七大恨”回去给明帝。

抚顺等三城失陷的消息传到广宁，辽东巡抚李维翰急忙让广宁总兵张承荫带兵一万去支援。两军靠近时，刮起了大风沙，对八旗兵有利。明军死伤枕藉，大败而逃。

四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凯旋班师。对于抚顺降民，努尔哈赤给予了优待政策。为了表彰李永芳投降好榜样，努尔哈赤还将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嫁给他，授他为总兵官，仍然统领自己的士兵。

这个消息传到明朝宫廷，明神宗非常愤怒，一个小奴贼居然这么猖狂，你们这些大臣大将是吃干饭的吗？明神宗要求调兵遣将，拨款剿贼。不过他对问题的严重性显然估计不足，临时调集一些兵马，希望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努尔哈赤。最开始的时候，悬赏一千两拿努尔

哈赤的人头——估计努尔哈赤听到这个消息会非常崩溃。几个月后，努尔哈赤人头的价格就升到一万两了。

抚顺之战的胜利，让努尔哈赤意识到推翻明朝不是梦。他对明朝的腐败洞若观火，为了避免自己的后代犯同样的错误，他教育道：“国家的败亡，从来不是因为财力不够，都是骄纵腐败导致的。像夏桀、商纣、隋炀帝、完颜亮这些人，都是贪图享受、不思治国的人，所以国家才亡。你们一定要牢记这些历史教训，一旦重蹈历史的覆辙，我们离败亡也不远了。”

攻克清河

清河城和抚顺城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城池。抚顺是辽东的枢纽，四通八达，地位非常重要。而清河则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四面环山，易守难攻，有天险之称，只有东路通往鸦鹑关。

攻克清河城就没有拿下抚顺那么轻松了，七月二十一日，当努尔哈赤大军抵达清河城下时，清河城早已做好了准备。清河城只有五千守兵，临时又抽调来五千士兵，再加上城内有几千个闲散男丁，加起来也有一万多人。清河城还有一个撒手锏——大炮。清河城有一千多炮手。

最关键的是，城内有一个钢铁一样的将领，虽然只是个副将，但他表示要与城池共存亡。这人便是邹储贤。

努尔哈赤还以为像过去那样轻松，当他们攻城的时候，忽然发现许多门大炮对着自己狂轰，城上的滚木和礮石如暴雨一样往下砸。八旗军死伤惨重，城楼下全是尸体。八旗军八次进攻，八次被打退，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努尔哈赤的英名不必等到袁崇焕来终结，邹储贤就可以了。

但意外偏偏发生了。努尔哈赤有一个谋士叫范文程，范文程是北宋名相范仲淹的十七世孙，以前是明朝的一个官员，后来投奔努尔哈赤。范文程没有“汉奸”意识，投奔努尔哈赤后忠心耿耿，成为清初的股肱之臣，历经三朝四代不倒。当时范文程就对努尔哈赤建议说：“我们不能跟邹储贤硬拼，这人不怕死。我们最好是派间谍进入清河城做内应。”

努尔哈赤一听，对啊！得派谁呢，这个人得能够得到邹储贤的信任，还得忠心为我办事。这个人就是李继学，李继学是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双面间谍。努尔哈赤找到他的时候，他首先是不干，说明他

还是有良知的。但当来人把刀子架在他家人的脖子上时，他没法不干了。他不是那种可以为了大家舍弃小家的人。

李继学连夜准备了十多辆参车、皮货车和粮食车，带着一帮“伙计”往清河城去。快到清河城时，努尔哈赤的军队就跟在马车的后面。

邹储贤很早就与李继学认识，也知道李继学曾秘密为明军提供情报。但是现在战事正处于紧要关头，即便是李继学，邹储贤也不能轻易相信。因此问道：“你从什么地方过来的？”“从辽阳来。”“干什么的？”

“贺世贤副总兵有紧急军情让我交给你。”

“贺总兵在瑗阳，你却从辽阳来，这未免太不可信了吧。”

李继学于是按照范文程教给自己的话回答：“贺总兵的援军半道受阻，为了给你送信，特让我从辽阳方向来。这样可以避免后金察觉，再者就算被后金察觉了，看是从没有援兵的辽阳过来，也好消解他们的怀疑。”

范文程真厉害，这回答真可谓滴水不漏，但邹储贤并没有就此相信。

邹储贤又问：“贺世贤副总兵让你来这里就是为了送情报吗？”

李继学指了指身后的粮车，说：“贺总兵让我带了一些粮食过来，他怕城内缺粮，影响军心。”

就在这时，忽听远处有人冲李继学的商队大喊：“你们是干什么的？”

邹储贤在城楼上看到一群八旗兵朝李继学的人马冲过去，李继学的“伙计”也冲了过去，双方一顿厮杀，不少“伙计”倒地。

士官们着急地对邹储贤说：“参将大人，快开门吧，要不然他们都要被杀死了……”邹储贤还不愿开城门，但最终还是无奈地点点头。

城门一打开，这些“伙计”马上露出了真面目，斩杀城门处的士兵，然后把住城门，让早已埋伏在附近的八旗兵纵马进城。邹储贤大惊失色，率领将士们杀向城门。可惜为时已晚，越来越多的后金将士冲了进来，如潮水的后金军蜂拥而至，他只得退回城内。邹储贤奔回参将府，一把火烧了府邸，将家人烧死其中。

接着是一场血腥的巷战。

邹储贤上马提刀杀入八旗军中，杀死几个八旗兵后，忽然看到了李永芳。邹储贤对着李永芳破口大骂。大贝勒代善一看，好机会，忙让弓箭手把邹储贤射下马。城内一万余名明军和五百户居民，与八旗军浴血奋战。明军个个都是玩命的，所以这一战八旗军死伤甚多。

经过一天一夜的厮杀，清河城血战终于落下了帷幕。一万一千多名守城的明朝官兵全部壮烈牺牲，五百多户居民全部被屠杀。八旗官兵伤亡达八千多人。

打下清河之后，努尔哈赤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给明朝写了一封非常蛮横的信：“尔若不以我之值为值，我之是为是，欲战，我则订军期出边界，露师于外。或十日，或十有五日，挺身攻我，决一战……”

这口气狂妄得谁都受不了，由此可以看到努尔哈赤对明朝的刻骨之恨，但同时也说明胜利可以让一个人自我膨胀。

萨尔浒之战

清河失陷，震惊了明朝上下。

万历皇帝当然不能坐以待毙，立即开始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大家共同拿出了六个对策：

重新任命剿贼元帅。万历皇帝将辽东巡抚李维翰削籍为民，任命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相当于辽东军区司令员；周永春为辽东巡抚，相当于辽东地区的行政长官；除此之外，万历还急调山海关总兵杜松、保定总兵王宣、辽阳总兵刘綎、辽东总兵李如柏、开铁总兵马林等一起协助杨镐打掉努尔哈赤。

调集兵马。万历皇帝将福建、江西、浙江、四川、甘肃等地兵马调往辽东。但这些兵都不太愿意去辽东，一路上懒懒散散，非常勉强。最后，总算是凑齐了十万人马。

增加军饷。以前不打仗的时候，朝廷是尽量克扣员工工资，现在知道不给这些人发工资，仗就没法打，军人吃不饱，国家就会危亡在即。朝廷拨出了两百多万两白银，但真正到将士手中的有多少，只有天知道。

给朝鲜施压，让朝鲜一同征讨。万历皇帝给朝鲜写了一封信，要求朝鲜和天朝大国一起征讨奴贼。朝鲜当然是能应付就应付。

严明军纪。皇上说军纪一定得严明，不严明的话战斗力不高。所

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军纪不是一天就能严明的，其他方面搞不好，军纪想严明只怕也难。

万金悬赏。明朝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就非常小气，万历皇帝能够拿出一万两悬赏努尔哈赤的人头应该说是够大方的。当然，努尔哈赤人头的价值远远不止一万两。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谁有本事拿努尔哈赤的人头啊！

经过十个月的准备，援兵总算到达辽阳。朝廷担心劳师动众，时间一长，花费越来越大，所以屡次催杨镐快点儿动手。打仗这东西就像生孩子，不酝酿好，那不就是早产吗？所以，这场剿贼之战我们可以想象。

杨镐本是个腐朽贪污的老将，现在压力也非常大。于是，只好提前动手，在辽阳的演武场点兵，颁布了十四条军令，最后，杨镐底气不足地说道：“违令者斩。”为什么说杨镐底气不足呢？以前在抗倭战争中，他就谎报军情，明明吃了败仗，他却说击败倭寇，斩首多少多少。

这天，杨镐拿出皇上御赐的尚方宝剑，当着全军将士的面斩掉抚顺之战中临阵脱逃的将领白云龙。白云龙也够冤的，主将投降了，自己能不跑吗，自己没跟着李永芳一起投降就已经是不错的了。

誓师之后，杨镐兵分四路，直接杀向后金的国都赫图阿拉。

第一路是左翼中路，由山海关总兵杜松、保定总兵王宣等人率领，发兵两万五千，从抚顺出兵，直指赫图阿拉。

第二路是右翼中路，由前辽东总兵李如柏和参将贺世贤率领两万人，从清河出发，途经建州南部，向赫图阿拉进攻。

第三路是左翼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两万官兵，外加叶赫部两千盟军，从开原出发，途经建州北部，进攻赫图阿拉。

第四路是右翼南路，由总兵刘綎率领一万官兵，外加明朝胁迫朝鲜的一万三千士兵，从建州东部进攻赫图阿拉。

四路大军，总兵力有十万，号称四十七万，洋洋洒洒地涌向后金的国都。杨镐自己坐镇辽阳指挥，原计划在二月二十一日出征，但是当时大雪满天飞，于是改为二十五日进攻。山海关总兵杜松比较了解敌人，认为现在出兵不利，请求暂缓出兵。杨镐不同意，因为上头一直在催。总兵刘綎认为现在还不了解地形，不宜仓促出兵。杨镐听了大发脾气：“国家养士是干啥的？临阵就退缩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吗？如果再有推延塞责的，军法处置！”

兵法上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明军在这场战役开始就没有做到知己知彼，出兵之仓促让人咋舌。那努尔哈赤表现又如何呢？

事实上，在杨镐出兵之前，努尔哈赤就派人打探到明军的军情，知道杨镐准备兵分四路进攻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心想，你兵分四路，我就偏偏一路，集中优势兵力把你们逐个击破。

了解敌情后，努尔哈赤也不忘临阵磨枪，将武器擦得更锋利；还派出侦察兵，沿途搜集军情，一路勘察地形，在合适的地方设下埋伏。同时，坚壁清野，埋粮填井，撤回沿途的女真兵民，全部集中到赫图阿拉，这样就相当于把拳头捏紧了，只等对方过来，给予对方致命一击。

杜松首先出发，作为一员猛将，杜松打仗的本领值得肯定，但他为人骄横，刚愎自用，而且又很贪功。他率领二万多人，抵达抚顺关后，急行军越过五岭关，一路到达浑河。这时已经是夜晚了，大家都说就地宿营。杜松却自作主张，让人测河水多深，一看不到马肚子深，居然脱掉衣服，光着身子骑马过河。士兵们看他这样，都很吃惊，让他穿上衣服，他却豪放地说：“进入阵地，披坚执锐，全副武装，不是男子汉大丈夫。”

河水虽然不深，还是淹死了好几个人。渡河以后，杜松抓住了十四个女真人，又焚烧了几个堡垒，同时还让人回去报信，说有所斩获。仗还没打，满脑子想的全是如何邀功。

三月初一，杜松军已经到达萨尔浒山，这时其他各路军还在半路上，除了杜松本人，大家的积极性都不是很高。杜松孤军深入后，居然还将军队一分为二，一部分在萨尔浒山下安营，自己率领另一部分人马前去吉林崖，攻打界凡城。

杜松还没走多久，努尔哈赤就亲自率领六旗的人马来围攻萨尔浒山下的明军。明军也不是吃素的，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努尔哈赤一看，这帮明军还真是有备而来，火铳和大炮早已一字排开，就等努尔哈赤来攻了。努尔哈赤命令自己的先锋队伍冲，一时间，火光耀眼，炮声震天，八旗军被打得血肉模糊，肢体满天飞。不过，努尔哈赤丝毫不气馁，让先锋在前面冲，后面的骑兵负责射箭，那边枪炮隆隆，这边万箭齐发。努尔哈赤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只要靠近明军，这场战役就算结束了。

付出必要的代价后，努尔哈赤终于拔下了老虎的第一颗门牙。努尔哈赤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他知道这只是牛刀小试，更强的敌人还在后头。

努尔哈赤以极高的办事效率，率领军队来到吉林崖。此时，杜松正在攻打吉林崖山头上的伏兵，伏兵虽然只有五百人，但占据着有利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就在杜松对着山头上大吼“女真贼子们，赶快束手投降，大爷可以饶你们不死……”时，忽然一个探子过来对他耳语：“不好了，总兵大人，我们在萨尔浒山下的军队全部被奴酋歼灭。”

杜松满脸通红：“奴酋不得好死……”

还没骂完，一个士兵大喊：“不好了，总兵大人，奴酋带人杀了过来。”

困在山上的女真士兵听说努尔哈赤杀过来了，立刻冲下山，杜松腹背受敌。不久，就被敌人团团围住。杜松用兵虽然不高明，但绝对称得上是一条汉子，全军将士和敌人浴血奋战，全部战死。正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杜松，安息吧，为国而死，你是值得的。

杜松失败的消息传到中央政府，皇帝和高官们纷纷扼腕叹息：杜松啊杜松，你咋就这么不争气呢！

这时，皇帝发话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叹气了，还是总结一下经验吧，免得再犯类似的错误。”

大家你一言，我一言，终于总结出杜松的六大错。一、杜松这人刚愎自用——是啊，没事你冒进个啥；二、队伍错乱，为贼所击——不懂这些高官是如何知道队伍很乱，乱的标准又是怎样；三、杜松没有设立岗哨，被敌人诱惑而不自知——这一条说到点子上了；四、不会打仗，背水一战；五、轻骑深入，撇弃火枪兵；六、智不能料敌，谋不能服众。

失败后做个总结就像胜利后论功行赏一样，少了这一环节就不能算圆满。

三月初二这天，左翼北路的总兵马林，终于带着自己的人马来到了尚间崖。尚间崖距离萨尔浒山有三四十里，杜松全军覆没的消息马林也知道，看到士兵们士气低落的样子，马林宁愿他们不知道这个消息。

为了避免重蹈杜松的覆辙，马林丝毫不敢有任何懈怠，强打着精神督促士兵备战。他似乎有预感，努尔哈赤会找上自己，所以下令停止前进，就地安营扎寨。在这紧张的关头，马林灵感闪现，发明了一个方阵，方阵的最里面有三道土壕，土壕最外层是骑兵，骑兵的外层

是火枪兵，里三层全是精兵。整个工事质量绝对过关，到了这要命的关头，谁都不敢玩豆腐渣工程，毕竟一旦出事，死的是自己，不是别人。

除此之外，在尚间崖的西面有山，山上还驻扎着两个大营。马林认为，当然只是个人认为，这种三角之势固若金汤，八旗军想拿下来不太可能。从小我们就被告知，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一种形状，马林的想法从数学上来说是有根据的。

只可惜，这是打仗，三角形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努尔哈赤也看出了马林的企图，所以他想先折断其中最弱的一条腿。这条腿就是驻扎在山上的一个大营——龚念遂的部队。龚念遂这支部队属于重装部队，大炮、辎重、火器特别多。龚念遂大概有一万人，还有许多门枪炮。令人吃惊的是，居然被皇太极一千人拿下了。

怎么会这样？

这就体现出努尔哈赤高明的战术了，他并没有让士兵们一窝蜂地冲上去，接受对方炮火的洗礼。他让皇太极挑选一千骑兵，也就是敢死队，从中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八旗兵从缺口中涌进，这样等于是把敌人的大炮和火枪废掉了。胜利再次属于努尔哈赤，对于明军这又是一场悲剧。

拿掉龚念遂后，努尔哈赤带领几个人登上山顶，看到马林的队伍防守严整，命令士兵们停止攻打山上，下马作战。这次明军失败还是因为同一个原因：让八旗兵近身了。八旗兵能征善战，一旦近身，明军的火器就彻底失去作用。

马林倒也是个聪明人，看到八旗兵冲了过来，自己抢先一步逃跑。主将逃跑了，这仗还有得打吗？有。因为副将麻岩还坚持在第一线，可惜，麻岩不久战死。这仗真的没法打了，明军开始了大逃亡，死伤枕藉。

解决了马林后，就剩下潘宗颜驻扎在山上的部队了。现在我们大概也知道明军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没水平啦，三支部队就像三条腿，但这三条腿各自走动，根本谈不上任何配合。而且，他们完全没有共同的作战目标，只是等着敌人来攻。

所以，毫无悬念，潘宗颜全军覆没。

歼灭了明朝两路大军后，努尔哈赤见好就收，回到大本营，犒赏八旗子弟。还没休息多久，努尔哈赤就得到消息，刘綎和李如柏正在快马加鞭赶往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并不慌张，先命扈尔汉率领一千精兵前去阻延，接着又派二贝勒阿敏带着两千人马援助扈尔汉。这只是

前奏，两道命令发出不久，努尔哈赤就任命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率领大军给刘綎一个迎头痛击。努尔哈赤亲自带着四千人守着赫图阿拉，抵御李如柏的部队。

有人或许会奇怪了，努尔哈赤为什么把大部分的兵力用来对付刘綎呢？这是因为他对刘綎这个人比较了解，刘綎很早就参军了，是一个职业军人，不仅会打仗，自身的武艺也非常了得，一双大刀挥起来没几人敢上前。世人又称他为刘大刀，刘大刀不怕打仗，就怕被人逼着打仗。

这次出征，有点儿被明朝领导者赶鸭子上架的味道，所以他心里也不爽，只想快点儿杀敌。刘綎果然是个狠角色，一出马就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看到女真人就杀，不论老弱妇孺还是残疾人，总之心中这口恶气得出。这口恶气既是女真人造成的，也是大明的领导者造成的。但出气的对象肯定是女真人。

代善、阿敏、皇太极在阿布里岗设下埋伏，当刘綎的部队进入这片山林之中时，伏兵四起。刘綎和养子刘招孙力战而死。明朝又一路大军灰飞烟灭。

坐镇辽阳的杨镐得知三路大军全部覆灭的消息，非常震惊，也算他有自知之明，立即命令李如柏的军队撤退。李如柏本来就是胆小鬼，听到撤军的消息，欣喜若狂。撤军的速度比进军的速度快多了，就在班师的途中碰到后金的一队哨兵，也就几十人的样子。这些哨兵故意装作后面有大军的样子，明军惊慌逃窜，居然被几十人的巡逻兵斩杀了四五十人。接着是一路逃窜，还踩死了一些人。

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而且败得一塌糊涂，整个朝廷都感到震惊。但很少有人反思，泱泱大国为什么这么不堪一击。这场大败是明朝灭亡的一个征兆。

从此，明朝和后金的关系发生逆转，曾经的孙子变成了大爷，曾经的大爷变成了孙子。明朝变成守的一方，后金变成进攻的一方。

大明的灾难才刚刚开始，而它的灾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咎由自取的。落后就要挨打，腐败就要灭亡，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

处理朝鲜问题

萨尔浒大战胜利后，努尔哈赤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朝鲜问题？

我们知道，在萨尔浒之战中，朝鲜被明军胁迫，也派了一万三千人攻打努尔哈赤。朝鲜既是明朝的属国，也是一柄可以插入后金后院的尖刀。试想一下，努尔哈赤忙着跟明朝打仗，忽然老家被人端了，老婆孩子被人抢走了，这仗能打得安心吗？

所以，对朝鲜得认真对待，不能让它捅娄子。朝鲜是明朝的跟屁虫，明朝鄙视努尔哈赤，朝鲜就两倍鄙视努尔哈赤。朝鲜还经常称呼后金女真族为“贼”“女真小丑”等。

天命六年（1621年），朝鲜使者郑忠信出使后金，努尔哈赤问他：“你们怎么老是骂我是贼啊？我哪里像贼了？”

郑忠信笑道：“你有盗取天下的野心，不是贼又是什么？天下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萨尔浒之战，朝鲜元帅姜宏立听说明军覆没的消息，很惊慌。惊慌之后，他马上知道，现在不能跟后金作对，必须跟他们讲和。姜宏立暗中派人去联系后金，说是愿意求和。

四大贝勒收到姜宏立的信，给了他一个答复：“投降的话就派主将过来，否则开战吧！”

第二天，姜宏立就带着五千人马过来投降，对于投降的人，努尔哈赤总是欢迎的。他郑重地接待了他们，好酒好肉吃完之后，努尔哈赤修书一封，让朝鲜人带回国内，在国书中，努尔哈赤口气比较狂，现在我打败了明朝军队，还俘虏了你们的将领，你们以后是愿意为明朝办事呢，还是愿意为我办事？

两个月后，朝鲜才派使者答复。朝鲜在国书中详细陈述和明朝的关系，说明朝好比是朝鲜的父亲，你的要求我们实在办不到，不过我们愿意与你友好相处，互不侵犯。

朝鲜虽然打太极，互不得罪，但努尔哈赤还是比较满意，至少互不侵犯，以后可以放心收拾明朝了。

搞定朝鲜后，努尔哈赤开始打开原和铁岭的主意。说实话，萨尔浒战役让明朝上下胆战心惊，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非常惊慌，不少官员已经安排家属到南方去“度假”。言官们频频上奏章，但是大家都拿不出对抗后金的方案。怎么办？难不成就让这个烂摊子烂下去？

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初十，努尔哈赤率领四万八旗兵征讨开原，用突击战术攻下开原，上次那个逃跑的马林终于在开原战死。七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又率领五万精兵攻打铁岭。铁岭也是东北三镇之一，城池坚固，想当年李成梁就是镇守在这里。铁岭城军民死守，八旗军虽然损失颇大，最终还是拿下了铁岭。攻下铁岭之后，努尔哈

赤下令屠杀铁岭所有居民，将铁林城烧毁，变成一座空城。

八月，努尔哈赤又灭掉叶赫。这种打仗的效率确实非常惊人，不光打仗，努尔哈赤还不忘安抚蒙古：“老兄，放乖点儿，我很猛很大。”

努尔哈赤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崛起。

第十二章 命中克星袁崇焕

历史将证明，袁崇焕不仅是努尔哈赤的克星，也是皇太极的克星。然而，崇祯又是袁崇焕的克星，最终历史的车轮还是偏向清朝。

成功者的经验

边疆城池接二连三地失陷，让明神宗朱翊钧不得不进行认真的反思，他思前想后，觉得还是用人失误。于是，重新起用熊廷弼，赐给他尚方宝剑，担任辽东经略，掌管辽东的军政大事。

熊廷弼有真本领，在辽东整顿了一年，终于让形势好转。1620年八月，明神宗病逝，太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可惜，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为房事过度吃了一粒红丸而死，这就是明史上赫赫有名的红丸案，这到底是不是一起谋杀案现在已经无从得知。

然而，就在朱常洛待在位置上的一个月里，有人弹劾熊廷弼，熊廷弼受到钳制和责骂。朱常洛死后，他的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熊廷弼再次受到弹劾和攻讦，明熹宗不分青红皂白免去熊廷弼的官职，让袁应泰担任辽东经略，袁应泰是个志大才疏的人，到任之后，把辽东搞得一团糟。

努尔哈赤看明朝随意易帅，军纪松弛，决定攻打沈阳。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十日，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倾巢而出，用计再次拿下沈阳城。努尔哈赤的计谋之所以能得逞是因为沈阳总兵贺世贤有勇无谋，努尔哈赤先让他们取得一些小胜利，最后派兵叫战，贺世贤正喝着酒，带醉提刀出战。沈阳城被攻下后，七万明军被屠杀。

攻下沈阳后，努尔哈赤又击溃明军的三支援兵。拿下沈阳后，努尔哈赤直指辽阳，三月二十一日，又攻陷辽阳。从攻打沈阳到攻陷辽阳，前后不过十多天的时间，努尔哈赤用兵之神速实在让人吃惊。不过，明军的勇气是值得嘉奖的，辽阳的守兵没有一个投降，全部战死。随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

沈阳和辽阳一陷落，明廷晃动得非常厉害，一有危难，马上有人建议重新起用熊廷弼。明熹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任熊廷弼为兵部侍郎，并承认自己以前是听信了流言。明熹宗的意思很明显：熊老先生，你别跟我这个年轻人计较了。

应该说明熹宗刚开始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上台后果断铲除阉党，得知辽东危急，不惜认错请熊廷弼出山，还赐给熊廷弼尚方宝剑，给予他副总以下先斩后奏的权力。为了保证辽东官兵打好这场仗，他紧急拨出两百万两白银，不久又追加了两百万两，运了粮食和豆类一百多万担。

熊廷弼镇守山海关，总兵力有三十五万以上。应该说，对付努尔哈赤那点儿八旗兵是绰绰有余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很古老很有传统风味的问题。熊廷弼虽然是辽东名义上最高的领导，但朝廷并不信任他，而是信任他的下级辽东巡抚王化贞。熊廷弼和王化贞两人不合，结果是身为下级的王化贞掌握着三十多万的兵马，而熊廷弼只能调动一万的人马。这个结果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如果王化贞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和统帅的话，也还好说，关键是王化贞这个人不太会打仗，而且轻敌。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征讨广宁，首先包围了西平堡，由于熊廷弼布置得挺严密，努尔哈赤付出惨重代价后，才拿下西平堡。随后，努尔哈赤进攻广宁，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广宁的中军游击孙得功是一个叛徒，他打开城门，放努尔哈赤进城，广宁陷落。接着，一连串的小城望风而降。

春风满面的努尔哈赤不忘教育自己的子孙：“治国者千万不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这样只会让老天愤怒。一个人再有能耐也比不上大家的智慧，今后由你们八个贝勒执政，共同为国效力。”

努尔哈赤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什么事大家商量，千万不要独裁专断。

努尔哈赤攻陷辽东后，对汉人实行了高压政策，激起了汉人的激烈反抗。

汉人反抗的方式有很多，最普遍的方式是逃亡。由于努尔哈赤一路屠杀，许多汉人闻风丧胆，即使被迫投降，也在等待机会逃跑。根据粗略的估计，逃亡到关内的汉人就有上百万，逃到朝鲜的有几十万，逃到海岛上的也有几十万，另有几万人逃到山东。

第二种反抗方式是投毒，努尔哈赤经常发现都城辽阳的水井里面有毒，后来在一些食物中甚至也发现了毒药。这些事情搞得努尔哈赤草木皆兵，非常痛苦。

第三种反抗方式是叛杀，许多汉人投降后受到压迫和虐待，有些人忍无可忍，只好杀害八旗官兵。努尔哈赤对此非常气愤，他说：“我占领辽东后，这些投降的人我对他们已经很不错了，给他们

房子，给他们田地，给他们牲畜，没有霸占他们任何东西，他们为什么还要叛变呢？”

第四种方式最激进——暴动。由于努尔哈赤强令所有汉人剃头发，遭到了汉人的激烈反抗，甚至出现群体性的暴动事件。

泼胆汉袁崇焕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目的是入主中原，当然要入主中原，他首先要打下宁远。

宁远孤悬山海关之外，距离山海关有两百里。这块地方就像一个跳板一样，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宁远可以算是山海关的门户，只有打通了这块地方，才能进入山海关。

这时，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主管辽东边事，孙承宗也是一个脾气很硬的人，他主张积极对敌作战，收复城池，受到明熹宗的欣赏，给了他一把尚方宝剑。明朝的尚方宝剑是非常廉价的，没过多久，孙承宗就受到阉党的排挤，不得不告老还乡。不过，他培养出一大批人才，如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

孙承宗下台后，阉党派的高第上位。高第对后金非常畏惧，他下令关外的兵民全部撤退到关内，把宁远给敌人算了。这一政策遭到袁崇焕的坚决抵制，宁远兵民拒绝撤退。不过，宁远周边小城堡的军民全部撤到了关内。

我们知道，宁远之所以能坚持不退，是因为有袁崇焕这样一个骨头很硬的民族英雄。

袁崇焕，万历十二年（1584年）出生于广东东莞，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考中进士。后担任过福建邵武知县，本来只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但他一直关心边事，对于朝廷在边疆事务的软弱无能深感愤怒。天启二年（1622年），他利用进京朝觐的机会，单骑出关，查看边境，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书生。

回京后，袁崇焕对明熹宗立下了豪言壮语：“只要给我马匹、金钱和谷物，我一个人就可以守住边关。”也许是这种自信感染了血气方刚的明熹宗，明熹宗提升他为佥事，做山海关外的监军。袁崇焕后来又升为宁前兵备佥事。

眼见努尔哈赤大兵将至，袁崇焕面临着多大的压力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一个从未打过仗的书生面对的是四百多年来世界级的军事天才

努尔哈赤，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后面那个昏庸多疑的明熹宗和一帮指手画脚专好整人的大臣和阉党。这仗看起来是没法打的，简直没有太多悬念。

考验袁崇焕是庸人还是英雄的时候到了！

事实证明，袁崇焕不光是个英雄，还是一个超级大英雄。百战百胜的努尔哈赤居然面对一个文弱书生三战三败，乃至最后送掉了自己的性命。这种奇迹简直不太可能发生，可是的确发生了。

在袁崇焕身上，我们看到信仰与意志的力量一旦和认真负责的做事态度紧密结合会激发出多么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无坚不摧。可惜，拥有这种力量的人常常是众矢之的。袁崇焕这样的泼胆汉肯定是越来越少。

袁崇焕第一步是要加固宁远城，在他看来，只有把宁远城修得坚固，山海关的安全系数才有保障。朝中大臣全一边倒地反对，他们觉得宁远距离山海关太远，八旗军那么猛，肯定是守不住的，干脆退回关内，将所有力量凝聚在一起比较好。

幸好孙承宗了解形势，极力支持他。为了修好城墙，袁崇焕亲自定下标准，亲自监督，终于把一个原本不受人重视的宁远变成一个关外重镇。

幸运的是袁崇焕还有一个好搭档——满桂。满桂是蒙古人，骁勇善战那是不在话下。从袁崇焕镇守宁远开始，满桂的命运就和袁崇焕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袁崇焕虽然是文官出身，但性子刚硬，满桂是蒙古武将，脾气也很直。这两个人的合作虽然一点儿都不安静，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但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合作却是和谐的。发生争吵不代表不和谐，一团和气也不代表和谐。两人拍桌子大吼大叫是家常便饭，甚至到死，两人还在争吵。

但是，两人在内心深处却是惺惺相惜，互相敬重。他们知道，在战场上彼此都不可缺少，袁崇焕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满桂是一个英勇的实战派，互相弥补，共同前进。

袁崇焕治军也是相当有魄力的，从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端倪。他发现一名校官虚报兵额，贪吞军饷，当即牛脾气发作，把这个校官给杀了。他这个做法无疑让自己的导师兼保护伞孙承宗大怒，怒也是为他好，因为袁崇焕当时没有权力擅自处斩军官。后来，袁崇焕没有经过崇祯同意就杀掉毛文龙，为自己后来的死亡埋下伏笔，所以做人得低调，哪怕做正确的事情也得低调，不低调容易给自己招来祸端。

袁崇焕不愧是袁崇焕，他修建的宁远城确实比金汤还要坚固。一

直抵挡着八旗军的铁骑，如果没有吴三桂把清军引入关内，估计清军想入关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袁崇焕不只是说空话，还推出一系列计划，将工作具体实施，落实到人。而且袁崇焕特别能鼓舞大家的士气，他明确说道：“本道定与此城共存亡。”碰上这样一个有骨气的领导，将领们也纷纷表示与袁大人共存亡。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纠集大军进攻宁远。在努尔哈赤的眼里，宁远只是个小城，应该不会费太大的力气。闻知努尔哈赤大军来袭，袁崇焕割自己手臂的血作书，誓与众将士坚守城池。

当时，宁远城内守军不过两万，袁崇焕是总指挥，满桂是总兵，左辅是副将，参将是祖大寿。共有四面城门，满桂守东面城门，左辅守西面，祖大寿守南面，朱梅守北面。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领军五万抵达宁远城外。努尔哈赤还是用老招术，先让人招降，扬言说我带了二十万大军，如果你们不投降的话，我就踩平宁远，投降的话，好处少不了你们。袁崇焕不客气地回道：你来搞侵略，还虚张声势，我袁崇焕又不是吓大的，要打就打，何必废话。

努尔哈赤听了，大怒，好你个袁崇焕，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居然这么不给我面子，好，那我就打了。八旗军派出最精锐的士兵，推着双轮车，向城墙靠近，他们用铁椎砸城墙，砸破了十几处，城池依然稳固。此时，站在城楼上的袁崇焕下令开炮，十一尊西洋大炮轰隆隆地发出炮弹，轰死了不少的八旗官兵。袁崇焕又命令用木棉、硝磺和松脂混在一起，烧死城墙下的士兵，又杀了千余人。

努尔哈赤一看，不对啊，袁崇焕这厮是个内行，赶快命令部队撤退。

休整之后，第二次努尔哈赤攻东门，城没有攻下来，又死了一大批人。第三次攻城的时候，努尔哈赤可能是被炮弹的一个碎片击伤，眼看伤亡惨重，城池却岿然不动，努尔哈赤只好快快而归，宁远之役是努尔哈赤一生中最大的耻辱，这一年努尔哈赤六十七岁。

战事结束后，袁崇焕让人去城下看情况，捡到十万支箭，城墙上被八旗军挖出了七十多个洞。而此时，城内的火药和弹药已经用完了，袁崇焕捏了一把汗：幸好挺过来了。

努尔哈赤这辈子也够冤的了，打了一辈子胜仗，结果临到步入阎王殿之前吃了一次大败仗。回去之后，努尔哈赤很郁闷，身上的伤还

是小事，心中的那块伤疤始终无法解开。他搞不懂，凭啥袁崇焕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能把自己打败。

据说，努尔哈赤因此结了一块心病，从此吃饭不香、睡觉不酣，越想越气，乃至于看啥啥都不顺眼，最后干脆一命呜呼了事，甚至在生前都懒得交代后事，让自己一干儿子去玩吧！

历史将证明，袁崇焕不仅是努尔哈赤的克星，也是皇太极的克星。然而，崇祯又是袁崇焕的克星，最终历史的车轮还是偏向清朝。

努尔哈赤死后，并没有指定接班人，而是希望几个贝勒集体领导。袁崇焕因为这一仗一下子升到兵部右侍郎，在中国历史中，职位升得太快往往也意味着死期的临近。为袁崇焕高兴的同时，我们也为他捏了一把汗，幸好我们已经知道历史的结果，所以更多的是惋惜。

宁远之役前，袁崇焕确实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宁远之役后，那就不一样了。袁崇焕一下子就红了，成了大明家喻户晓的人物。

下篇 雄才大略的皇太极

第一章 他叫皇太极

努尔哈赤看这个孩子过于文雅，怕他将来性格柔弱，便经常带他去狩猎。在狩猎的过程中，皇太极练就了骑射的本领，据说他的箭术相当高超。

阿巴亥之死

人们常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这话对努尔哈赤肯定不管用，因为努尔哈赤是一个百战百胜的军事天才，而失败为成功之母是用来安慰那些经常失败的人的。再说，努尔哈赤已经步入晚年了，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想要雪耻不太可能。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不能从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努尔哈赤临死前感觉身体不舒服，急召大妃阿巴亥来见，八月十一日，背痛发作而死，享年六十有七。努尔哈赤是病死的，临死前只有大妃阿巴亥在他身边，史书记载说努尔哈赤让她殉夫。

阿巴亥是努尔哈赤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老婆，十二岁被人当作礼物送给努尔哈赤，长大后出落成一个绝世美女。努尔哈赤最为宠爱阿巴亥，阿巴亥也特别争气，接连生出了阿济格、多尔袞和多铎三个小子。虽然努尔哈赤特别喜欢阿巴亥，但阿巴亥却不怎么喜欢努尔哈赤，毕竟努尔哈赤比她大三十多岁，还经常要拿她幸御。搁谁谁都觉得委屈，没有享受爱情的阿巴亥只好思量着弄点儿婚外情，也算是慰藉自己苍白的婚姻生活。

找谁呢？谁有那么大胆子敢给努尔哈赤戴绿帽子？是的，没几个人敢，而且努尔哈赤把阿巴亥看得死死的。没办法，只好从近水楼台着手，从代善开始，阿巴亥轮流抛媚眼。美女就是美女，总有办法让人上钩，只有皇太极这家伙太不识抬举了。

对这些事，努尔哈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这个美女老婆宠爱得无以复加，不忍心伤害她，也不忍心对自己的儿子下手。

努尔哈赤让阿巴亥殉夫，这事能相信吗？

据说，努尔哈赤临死前准备把汗位传给多尔袞。这个说法可信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努尔哈赤临死前只有阿巴亥在场，

所以这个话肯定是从阿巴亥口中传出来的。不过，努尔哈赤生前最喜欢多尔袞倒是事实，因为多尔袞这小子特别聪明。

阿巴亥的三个儿子，一人手中掌握着一旗的兵力，总共才八旗，她一家就占了三个。再加上，阿巴亥是一个聪明美貌、工于心计的女人，所以毫无疑问让其他贝勒没有安全感。权力斗争向来是你死我活的，一旦阿巴亥掌权，其他贝勒还有没有活路都是未知的。所以，他们果断地站在了一起，甚至包括跟阿巴亥有一腿的人，这时为了共同的利益都站到了阿巴亥的对立面。

皇太极是个政治斗争的高手，带着大家一起来到阿巴亥面前，说什么父皇有遗命，让大妃殉夫。阿巴亥心想，搞错没有，让我死，我都为他生了三个孩子。阿巴亥支支吾吾，企图搪塞过去，但是皇太极岂是这么好忽悠的，厉声说道：“我们也只好遵循父皇的遗命办事！”阿巴亥含着一双泪眼望着这些贝勒：“我不想死，我还得照顾我的孩子。”

这时，皇太极带头下跪，地上跪满了贝勒：“父皇遗命，请大妃遵守。”

阿巴亥终于明白，自己不死，他们是不会放手的，她恨恨地看了大贝勒代善一眼，代善眼睛一直盯着地上，没说半句话。事到如今，阿巴亥知道只能去死了。

阿巴亥提出最后一个要求：“死可以，但允许我打扮得漂漂亮亮，也好去地下见大汗。还有，我两个孩子多尔袞和多铎还小，希望各位贝勒善待他们。”

皇太极说：“这个大妃可以完全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两个弟弟的。”

一代美女阿巴亥就此香消玉殒，享年三十七岁。这实际上是一场政治谋杀，因为以皇太极为首的贝勒已经充分意识到，阿巴亥如果不死的话，将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除掉阿巴亥只是皇太极通往最高权力的第一步，正所谓“万里长征从头开始”。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第八个儿子，俗称皇八，前面有一大堆老谋深算的哥哥，后面有一堆愤愤不平的弟弟，如何摆平前狼后虎，实在太考验皇太极的智慧了。事实证明，皇太极是经得起考验的。

政治巨星皇太极

在了解皇太极这个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皇太极的出身。皇太极的生母是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努尔哈赤死对头叶赫部的一个公主，名叫孟古格格，她的表哥布寨曾经参加九部联军攻打努尔哈赤，最后被杀死。叶赫部请求归还尸体，努尔哈赤割了一半尸体还给叶赫部。

这么一看，我们就发现皇太极这个人的出身真不好，不过是努尔哈赤战利品的副产品。所以，皇太极从一出生就是带着心理包袱的，这就意味着他要比别的兄弟更努力，才能得到努尔哈赤的欣赏和信赖。

七岁的时候，皇太极就为家里管账，要知道，小时候他不叫皇太极，真正的名字是黄台吉。黄台吉是满族人常见的起名方式，就像汉人中的二狗、三溜子之类，台吉就是胖小子的意思。再在前面加上个颜色，就是一个比较地道的满族名字了。从努尔哈赤为他取名的方式就可以看出皇太极一开始是不受重视的。

皇太极从小就比较爱读书，七岁的时候努尔哈赤让他管理家里的账，这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是比较少见的。书籍开拓了皇太极的眼见，也加深了他的城府。

十一岁的时候，皇太极的生母去世。二十岁的时候，皇太极就提刀上战场。三十三岁的时候，皇太极挤掉一个个政治对手。三十四岁的时候，皇太极登基。执政十七年，五十一岁的时候暴毙，死因至今是个谜。

皇太极如何登上皇位一直是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皇太极确实是努尔哈赤儿子中最为厉害的一个。

当时，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四个巨头。首先是朱元璋的后代崇祯皇帝，虽然治国一塌糊涂，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另一个是陕西豪杰李自成，闯王一路闯来，号称有百万之师；还有一个是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这个人自称拥兵四十万；最后就是皇太极了。这些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结果蒙古的林丹汗在青海病死，崇祯皇帝逼死皇后，砍伤女儿，自己在煤山上吊，李自成在九宫山战死，年仅四十岁。

笑到最后的是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皇太极成为最大赢家有运气因素，但更多的还是技高一筹，不佩服不行。

皇太极在政治上有四步高妙的棋。

首先，他纠正了父亲错误的民族政策，在努尔哈赤后期，对汉人采取了高压政策。皇太极觉得这样不好，只会激起汉人更激烈的反抗，对入主中原很不利。当然，我们不要指望皇太极提出满汉平等，

但他提出善待汉人，在皇太极的治理下，汉人不再是奴仆，而是人民。对于逃跑的人，皇太极也主张顺其自然，不要严惩。

对于汉族官员，皇太极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以前，汉族的官员位居满族大臣之下，有种种限制，甚至病故后，妻子还要给贝勒们做奴仆。皇太极说这是不人道的，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汉族官员待遇，重用谋臣范文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遇到疑难问题，皇太极就问：“范章京是怎么看的？”

其次，皇太极有三大发明。先是将自己老土的黄台吉改为皇太极，接着是改族名为满洲，最后是改国号为大清。不要小看这三次改名，这等于是为自己的集团作宣传。

再次，先打掉二贝勒集团，再打掉三贝勒莽古尔泰集团，然后挟持大贝勒代善，废除集体领导制，自己唱主角。此外，皇太极还进一步完善八旗制度，设置了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军。皇太极还仿效明朝设置了“三院六部二衙门”。

最后，皇太极汲取父亲的教训，加上自己几次和袁崇焕对决都失败的情况下，认识到红衣大炮的重要性。红衣大炮原本叫红夷大炮，因为是西洋人造的，所以有这么一个称呼；但满族人看到“夷”字非常不爽，后来掌权后也掌握了话语权，改红夷大炮为红衣大炮。知道了大炮的重要性，皇太极在沈阳也开了一个工厂，仿制这种大炮。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皇太极如何踩在三大贝勒的头上上位的。可以说为了当上最高领导人，皇太极是下了很大的苦工夫的。

女真这些游牧民族并没有嫡长子继承制，这就给了皇太极一个机会，虽然机会从一开始都是渺茫的。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继承制度，努尔哈赤生前的意思是谁有能力谁上，但能力这个事没有硬性的标准，是人都认为自己有能力。

当时有四个贝勒掌握着大权，皇太极要做的是用排除法，将三个贝勒一一排除掉。努尔哈赤曾经在生前幽囚舒尔哈齐，二贝勒阿敏是舒尔哈齐的儿子，所以汗位他是没有资格染指的，再加上他自己也犯下了一些过错。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哥，脾气暴躁，性格冲动，有勇无谋，之前曾杀死自己的母亲邀宠，所以很让人看不起，这样的人没什么威信，对汗位不会构成竞争威胁。

皇太极登上宝座的最大障碍是大贝勒代善，代善既有资格，也有威望，是可以继承汗位的。代善不仅立有许多军功，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兵权，而且为人宽和，有长者之风，深得人心。努尔哈赤生前对代

善也是相当的倚重，所以皇太极要想和代善争夺汗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皇太极是一个心机很深的人，在内心里他认为代善这样仁厚的人根本不配成为最高领导者。

然而，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故事却有助于皇太极登基。大福晋送饭给代善吃，代善傻呵呵地就吃了，但皇太极虽然接受了饭食，却并不吃，也就是两边不得罪，既不得罪大福晋，也不得罪老爸。这个秀作得那是相当的好，似乎是告诉世人，我皇八是个知大体、懂道德的人。这事情，在满洲贵族里闹得风风雨雨，代善的威望和声价陡然降低不少，争夺汗位的筹码一下子少了许多。所以，小福晋告发大福晋，很让人怀疑是皇太极在背后指使的。

皇太极就是这么一步步登上大位的。执政初期，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共同处理军国大事，相当于集体领导制。这肯定让皇太极很不舒服，打掉其他集团那是迟早的事。皇太极很轻松地打掉了二贝勒和三贝勒，代善是个聪明人，看情形不对，主动提出退出领导班子。

看到没有，皇太极能上位绝不是偶然，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力派政治明星。

第二个巨人

万历二十年（1592年），努尔哈赤的都城费阿拉诞生了一个婴儿。此人便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皇太极出生时的名字是黄台吉，这是满族人常见的一种取名方式。由此可见，努尔哈赤对这个孩子并不是特别关心。

《清太宗实录》说皇太极这个人长得非常伟岸，龙行虎步，有帝王之相。皇太极究竟长得啥样，我们不知道，但显然《清太宗实录》不会说皇太极长得贼眉鼠眼。

皇太极的母亲孟古格格是政治联姻的产物，当时努尔哈赤发展势头强劲，叶赫部不是其对手，首领只好将妹子嫁给努尔哈赤，以遏制他扩张的势头。孟古格格嫁过来的时候只有十四岁，四年后生下了皇太极。1603年秋天，孟古格格病重，思念远在叶赫的母亲，很想见一面。努尔哈赤派出使者到叶赫，希望能接岳母来费阿拉城。可惜，纳林布禄断然拒绝，大家知道纳林布禄和努尔哈赤的梁子非常深。以前，纳林布禄让努尔哈赤归还弟弟的尸体，努尔哈赤却把尸体切成两半，归还了一半。皇太极的母亲因此满怀遗憾地死去，年仅二十九岁。

皇太极称帝后，追尊母亲为孝慈皇后，但是他母亲生前是没有当上大福晋的，只当了侧福晋。在满族里，大福晋和侧福晋都是妻，都有正式的名分，至于小福晋、格格等都只是妾。

关于皇太极的幼年，《清太宗实录》里只有一段话：“性嗜典籍，披览弗倦。自幼命名皇太极，太祖甚钟爱焉。甫三龄，颖悟过人。七龄之后，太祖委以一切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巨细悉当。及长，益加器重。”

正史记载当然不能尽信，但从中我们仍然能看出皇太极确实很不一般，小时候是个心思缜密爱读书会管理的早熟小孩。

努尔哈赤看这个孩子过于文雅，怕他将来性格柔弱，便经常带他去狩猎。在狩猎的过程中，皇太极练就了骑射的本领，据说他的箭术相当高超。

从二十岁起，皇太极就随父亲征伐。皇太极参加的第一次战役是1612年攻打乌拉的战役，皇太极和五哥莽古尔泰表现都非常不错，只是在渡河的时候有些心浮气躁。努尔哈赤给他们上了一堂出色的军事课，甚至可以说是人生课，就是前面提到的砍一棵大树从弱枝砍起。

应该说，皇太极带兵打仗的本领也是不错的，不过，他的拿手绝招还是政治斗争。在政治上，皇太极那是相当的敏感。努尔哈赤与弟弟舒尔哈齐发生政治冲突的时候，皇太极二话没说，就站在了父亲这边。后来，努尔哈赤又与长子褚英发生权力冲突，皇太极又站对了边。说实话，这些给了努尔哈赤很深的印象。也许，从那时起他或许就知道这个孩子将来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正因为这些出色的表现，二十四岁的时候，皇太极就进入了国家的最高决策层，成为四贝勒之一。

谋略是皇太极一生中最重要的武器，皇太极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智力型的英雄。

第二章 治国奇才

一个执政者如果让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皇太极很早就领悟到这点。为了政权的稳定，他决定先缓和民族矛盾，接连发出了三道上谕。

更像是汉人的领导者

努尔哈赤留下了一个大摊子，能够守住这个大摊子就算不错了，然而皇太极的目标却不止于此。当然，为了实现入主中原的梦想，他必须先稳定这个摊子。

我们知道，对汉人烧杀抢掠，必然会激起汉民的愤怒。皇太极觉得让别人怨恨不是好事情，应该安抚，所以皇太极提出了让满族人大跌眼镜的仁政。

努尔哈赤的民族政策除了激化民族矛盾，并不能带来长远的利益。汉民受尽痛苦，整日生活在悲惨和恐惧中，一个执政者如果让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皇太极很早就领悟到这点。为了政权的稳定，他决定先缓和民族矛盾，接连发出了三道上谕。

第一道上谕是登基后第五天发布的：以前打算叛逃并和奸细有来往的汉民，事情属于过去，一律不追究；即使被人举报，也不处置；只有已经在逃被捉拿缉获的汉人才处死，没有逃跑的，即使被人举报，也不论罪。

皇太极这道上谕里有一个特别时髦的思想，估计连皇太极自己都没发现。也就是不以思想论罪，换句话说你想逃跑没罪；只以行动论罪，你逃跑了才有罪。这个思想是有前瞻性的，因为和现代的法律精神符合，皇太极不愧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唯一的遗憾是死得太早。在中国的历史上，太多因为言论获罪的人，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就掉脑袋，甚至九族被灭。更有甚者，还有腹诽罪，即使你没说，皇上猜你心里在骂娘也可以治罪。

皇太极的第二道上谕就比较长，讲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无非就是说从今往后，汉人和满人同属一体，没有贵贱之分，都是我皇太极的子民。这就意味着汉人和满人至少取得了名义上平等的地位。

皇太极的第三道上谕相当于给汉人解放，在努尔哈赤时代，有许多汉族的壮丁沦为大清贵族的奴仆。皇太极担心这些为奴的汉人受贵族欺负，决定把他们编为民户，给他们田地、给他们牛，让他们自力更生。

皇太极这一系列措施让汉人重新享受到自由民的感觉，极大地缓和了民族矛盾。

皇太极这么优待汉人，除了是为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着想之外，也有部分因素是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从文化性格上来讲，皇太极更像是一个汉人领导者。

“汉化”是皇太极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针，也是大清最后能够入主中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

缓和了民族矛盾后，皇太极致力于政治改革，皇太极读的书越多就越看不惯八旗的官僚制度，他觉得八旗官制一片混乱，有必要进行一些改革。皇太极实行政治改革有两大目的，首先是维护自己的权力，其次是完善国家体制。自己是第一位的，国家是第二位的，这一点大家不用怀疑。

皇太极第一个动作是让八旗旗主兼任议政大臣，如何理解皇太极这个动作呢？其中到底有没有什么深意？从前，在努尔哈赤时代，只有四个旗主有议政的资格，也就是四大贝勒。皇太极此举貌似是分权，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其实不是这样的，在皇太极眼里，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都是自己的障碍，他所以让八旗旗主都有议政资格，就是为了将这三大贝勒搞成少数派。这些享有议政资格的旗主显然对皇太极怀着感激之心，这样一来，皇太极不但没有放权，反而等于是收权了。

皇太极的第二个动作是每旗设两个佐管大臣和调遣大臣。佐管大臣负责管理，处理政务和司法问题，相当于文官，不用带兵打仗。调遣大臣专门负责军事事务，此外，还管理辖区内的刑事案件，如杀人、暴动之类的。

皇太极仿佛还觉得议政大臣不够多似的，后来每旗又增加了三名议政大臣，此举相当于扩大政治局常委。皇太极对此的解释是：“有很多懂政治懂治国的贤人，如果不让这些人来议政的话，实在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这些人说白了就是皇太极为自己培植起来的后盾，这样一来，哪个贝勒如果不太听话，皇太极一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还不整死他。

皇太极这些政策一出台，全国人民都说好。可见，皇太极在宣传这一块也是下足了功夫的。

皇太极自然谦虚地说：“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我也是汲取劳动人民的智慧才想出这些点子的。”

看大家兴致这么高，皇太极决定再搞几个项目。首先设立了文馆，相当于翰林院或者国家图书馆，主要任务是翻译汉文化经典，记录国家政事。文馆里刚开始有十名饱学之士，这些饱学之士整日沉浸在故纸堆里，研究中国历代帝王的得失。皇太极一有问题就来咨询这些博士。

皇太极第二个项目是设六部。皇太极说，明朝虽然腐败，但是它的一些部门机构还是好的，六部就是个好东西，应该拿过来用。所谓六部，就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六部交由六个贝勒负责，这些贝勒全部听命于皇太极。

文化这东西是免费的，物美价廉，所以可以放心地用。皇太极秉着这样的精神又模仿明朝设立三院：内三院、都察院、理藩院。

内三院主要是搞文史这块的，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宏文院。大名鼎鼎的范文程就是内秘书院的大学士。

都察院相当于御史台，这些大臣拥有弹劾谏诤的权力，皇太极的目的是用他们来监督各级官员，以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理藩院是蒙古衙门演变而来的，目前还只是处理蒙古问题，随着皇太极业务的扩大，处理的问题会越来越多，权力也会越来越大。

皇太极：汉官们，你们有福了

努尔哈赤是看不起汉族官员的，他之所以一度优待汉族官员，只是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换句话说，赤裸裸地在利用别人而已。

汉族官员刚开始受到重用的时候，感觉努尔哈赤这人很不错，后来被歧视后，才发现努尔哈赤把人当猴耍。

范文程是这批招降的汉官中一个典范。他出身名门，曾祖在嘉靖皇帝期间当过兵部尚书，祖父是沈阳卫指挥同知。

努尔哈赤发现范文程颇有戏剧性。攻克抚顺后，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范文程成为俘虏。范文程和其他十六名秀才已经被押到刑场上，准备斩首。努尔哈赤忽然突发奇想，问这些人：“你们会不会识

字？”秀才们答道：“我们是生员。”生员就是读书人的意思。努尔哈赤一听，喜上心头，当即把这些人放了，全部录用。

范文程一路做到大学士这个位置，由于范文程身份比较特殊，是名臣范仲淹的后代，努尔哈赤经常对人说：“小范是名臣的子孙，应该尊重。”

但是随着投降的汉族官员越来越多，努尔哈赤就越来越不重视了，逐渐把他们当成俘虏来看待，把这些汉族官员给贝勒和大臣们当奴仆。

皇太极上台后，决定给这些汉族官员平反。皇太极为啥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能在明朝当上官儿的，甭管他官职大小，肚子里多少都有点儿墨水。满人最缺啥？说白了就是文化。所以，皇太极对汉族官员是千方百计地笼络。只要你投降我，来我这边官职不变，子孙还可以世袭。如果有老百姓杀掉当地官吏的，可以根据你的功劳大小，授予一定的官职。单人来投降的，我皇太极负责给你发工资养老；率领一帮人来投降的，根据人数多少，给予你一定的官职。

皇太极这些措施分明是分裂明朝，不安好心，但是做得不着痕迹，看上去很像一个仁君。就说对祖大寿，皇太极可谓是“仁至义尽”，天聪五年（1631年），祖大寿被迫投降。皇太极非常信任他，甚至还放他回锦州去策反，结果这个祖大寿一去不回。写到这里，表示特别佩服皇太极，难道他没考虑到放祖大寿回去的风险？像皇太极这么聪明的人不可能连这个问题都没考虑到，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作秀，我是一个仁德的皇帝，大家跟我混吧！

祖大寿一去不返后，皇太极不仅没有生气，还像一个耐心的情人一样，等了祖大寿十年。十年后，祖大寿兵败，再次回到他的怀抱。

应该说，皇太极这个政策是卓有成效的，越来越多的汉官经不住诱惑，投向皇太极的怀抱。皇太极不光是诱之以利，还从人格上尊重这些投降的官员。

皇太极对汉人的优待在清朝的皇帝中实属罕见，有的甚至比对满族的官员待遇还好，这就引起了一些满族贵族的不满。在这些汉人中，范文程可谓是皇太极的心腹大臣。

做好这些舆论工作，入关便指日可待了，皇太极是这样想的，当然，他也清楚前面还有袁崇焕。不过，他自信这对他说来不是困难。

第三章 高手过招

这个皇太极太恐怖了，可以肯定皇太极绝非什么善类，然而他却看上去这么温和仁厚，这不是披着羊皮的狼是什么？皇太极是一个非常内行的政治家，一个内行的政治家绝不会把一副恶狼的嘴脸挂在脸上。整天凶巴巴的那是黑社会。

太极对太极

皇太极是一个政治高手，这一点相信大家都不怀疑。那么，他打仗是不是特别出色呢？从他之前的表现来看，应该说打仗方面可以给皇太极打个良，但是良跟优是有区别的。皇太极想要证明自己是优，就必须打几个漂亮仗。

袁崇焕一战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前途，喜得崇祯皇帝合不拢嘴，一直让他做到国防部副部长。就连兵部尚书王永光也不得不含酸带苦地承认：“这是八年来后金这帮贼第一次受挫，我们泱泱大国毕竟还是有人才啊！”

就连朝中那些钩心斗角的大臣和阉党也对袁崇焕寄予了厚望，斗的前提是什么？有国有家才能斗啊！所以大家一起默念观音菩萨，保佑袁崇焕守住边疆，这样我们在朝堂里就可以放心地斗了。

一时之间，袁崇焕成为大明王朝的红人。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唯一不高兴的可能就是高第了。可以说，这厮的猥琐把袁崇焕的形象衬托得更加高大。这位仁兄的表现实在太让人失望了，就连阉党都懒得保他，于是，只好卷起铺盖回家。

据说，得知努尔哈赤的死讯，袁崇焕还礼貌地派出了慰问团。皇太极是何等精明的人，袁崇焕跟自己非亲非故，不可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来吊唁吧！所以，一定是来刺探军情的。

袁崇焕派了三十个使者过来，名为吊唁，实为谈判和刺探敌情。当然，袁崇焕虽然胆大，还不至于缺心眼，在做这一切之前，他先请示了皇帝。

皇太极心想，你把我爹打得郁闷死了，现在又来假惺惺地吊唁，这时最好的出气方式是把这些使者的脑袋都砍了。不过，这种做法只

适用于莽夫，不适合皇太极这样的政治家。

对此，皇太极选择了忍。

他陪着笑脸迎接这些使者，还好吃好喝地款待他们，让他们参观自己的军队，让这些人享了一个月的福，临走前还送给他们一些马匹和牛羊，最后才依依不舍地跟他们道别。

这个皇太极太恐怖了，可以肯定皇太极绝非什么善类，然而他却看上去这么温和仁厚，这不是披着羊皮的狼是什么？皇太极是一个非常内行的政治家，一个内行的政治家绝不会把一副恶狼的嘴脸挂在脸上。整天凶巴巴的那是黑社会。

皇太极和袁崇焕虽然是对手，但彼此之间也有一种敬重，在正式交手之前，他们将始终保持客气和尊重的状态。

在正式开打之前，皇太极还是倾向于选择外交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所以，在遣返明朝代表团之时，他塞给代表团一封信。这封信没什么新颖的内容，就是希望两国和好，皇太极还特别提到诚信，就是说和好要有诚意，不能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袁崇焕让人传话给皇太极，和好是好事，但是呢，大明朝怎么可以和大满洲国并列在一起，不好意思，你这样写的话，我实在没法启奏皇上。

袁崇焕的态度很明确，不承认后金政权，换句话说，在我们眼里，你们后金还配不上是一个国家，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基地组织。

饶是皇太极脾气再好，听到这样的回答也头顶冒火，我皇太极好歹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你们明朝居然把我当成土匪首领，太过分，是可忍孰不可忍。皇太极最后还是忍了，因为他最擅长的就是忍。忍归忍，但这口气是必须出的。皇太极又给袁崇焕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很长，还附录了努尔哈赤当年的“七大恨”。

信的内容虽然很长，但通篇的意思只有一个，你们对不起我，我老爹当年有“七大恨”，传到我这里，此恨绵绵无绝期。怎么办呢？要消除我这些恨只有银子了。皇太极狮子大开口，估计明朝如果答应他的要求，没几年国库就空空如也。

收到这样的信，袁崇焕当然只是冷笑，败军之将还想讲条件。既然皇太极这么幽默，袁崇焕也决定幽默一把。他认真地给皇太极回了一封信，然后逐条逐条地批驳所谓的“七大恨”，末了还对他说，想要钱自己赚去。

皇太极这哥们是个锲而不舍的人，看目的没有达到，又给袁崇焕写了一封信。他竟然耐心地把袁崇焕批驳“七大恨”的理由又重新批驳了一遍，感觉两人像打笔仗一样，估计皇太极也有文人天赋。批驳完之后，皇太极口气小了点儿，说钱你们是必须给的，如果觉得多的话我可以减少一半，这些钱是补偿我精神损失的。

皇太极一边和袁崇焕书信交流，一边指派二贝勒阿敏攻打朝鲜，皇太极这人真不是一个闲得无聊就想跟人玩文字游戏的人。他和袁崇焕写信的真实目的已经暴露了，并不是真想要什么钱，而是先稳住明朝，好集中精神打朝鲜。

天启七年（1627后）正月初八，阿敏出兵朝鲜。朝军的表现没有出现意外，一个月后，平壤失陷。朝鲜国王以极高的办事效率臣服于后金。

明朝眼睁睁地看着朝鲜这个情人投入后金的怀抱，没办法啊，今非昔比，以前是财大气粗的大亨，今天只是个温饱都难解决的工人。后金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等振作之后再回来收拾你。

这事一出来，袁崇焕就知道皇太极不可告人的秘密了，原来皇太极这个人搞政治还是棋高一着啊！在政治上，袁崇焕和皇太极不是一个级别的，这一点甚至都不需证明，从袁崇焕后来的下场就知道。

袁崇焕终于知道皇太极有多阴了，原来这家伙是想先解决朝鲜，再来解决自己。袁崇焕立即给皇太极写了一封信，严词质问，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一边写信说修好，一边又攻打我们大明的附属国。你不是讲诚信吗？你的诚信哪里去了？老兄，我奉劝你不要活在过去的“七大恨”里，要开阔心胸，展望未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你说是吧，做人得看开点儿，要以和为贵。

袁崇焕也没闲着，一边跟皇太极书信往来，一边下令修固城墙。袁崇焕修的可不只是宁远城，他修的是宁远的前哨锦州城。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袁崇焕别出心裁，把几万民工直接调到锦州。除此之外，袁崇焕还主动出击，占领之前沦陷的一些城池，像大凌河、前屯、中后所、中右所之类，将防线全面加固，恢复了关外的屏障。

修城池不够，袁崇焕还召来了大量的农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在这里定居，就可以免费得到地。”这么做的好处是老百姓种田积极性高，城内的军粮就多。再加上大家都把这块地方当作自己的家，敌人来了肯定是拼着老命抵抗。

这些事当然也逃不过皇太极的眼睛，所以又轮到皇太极痛斥袁崇焕不讲诚信了。

双方都不讲诚信，怎么办？只能打了，有时候诚信也是打出来的。

忽悠整忽悠

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六日，皇太极率领六万大军，从沈阳出发，向锦州进攻。著名的“宁锦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踌躇满志的皇太极并不清楚等着他的究竟是什么。

说实话，一向能忍的皇太极这次做得有点儿急躁了。但他也是有苦衷的，因为新一轮的饥荒又来了，不抓紧时间赶快抢劫一番，估计老百姓温饱都成问题了。再加上袁崇焕正在修筑关外防线，等他修得像磐石一样坚固，以后打起来就更困难了。

为了粮食，大家把命豁出去。皇太极号召八旗子弟。

为了粮食，大家一定要赶走奴贼。袁崇焕动员大家。

应该说在开打之前，袁崇焕就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因素。先说天时，在辽东垦殖多年，粮食都很充足，后金却发生了饥荒；再说地利，城池都已经修得差不多了，我们居高临下守城，还怕你们不成；最后说说人和，宁远之战后，袁崇焕的威信和人气急剧攀升，可以说，袁崇焕发话，比皇帝还管用，大家信他啊！

也许除了一个人，满桂。满桂这个人性格比较冲动，人品其实也还不错，他跟袁崇焕的关系非常微妙。在宁远之战时，有一件事满桂对袁崇焕非常不满，这件事的起因是一个叫赵率教的人。

赵率教是河北蓟阳人，跟满桂一样都是非常不错的将领，袁崇焕很欣赏这个人。宁远之战时，赵率教驻守前屯，和敌人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满桂忽然派人请求赵率教支援，赵率教没理他。为啥？很简单，你兵力吃紧，我这里更紧啊！

仗打完之后，满桂心里老是惦记着这事，气势汹汹地要赵率教给一个说法。于是，袁崇焕出场了，袁崇焕的意思是两位都是国家栋梁，不要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斤斤计较。满桂是火暴脾气，认为袁崇焕偏袒赵率教，对袁崇焕很不服。

袁崇焕刚来的时候，满桂是宁远总兵，袁崇焕不过是宁前道。论官职，满桂比袁崇焕要高，不过明朝讲究以文制武，所以袁崇焕实际地位比满桂要高。这满桂心里肯定是有点儿别扭的。

宁远之战后，满桂升到右都督，袁崇焕升到兵部右侍郎兼辽东巡

抚，官职依然不如满桂，可实际地位还是比满桂高。满桂不高兴的时候，就奚落袁崇焕是个书生，袁崇焕凛然地说：“你道本道是个书生，本道却是将首。”

后来因为两人不断掐架，朝廷便让满桂镇守山海关，袁崇焕镇守宁远和锦州。袁崇焕不打无准备之战，修好城墙后，他又检视弹药库和粮仓，发现一切都还充足。就等你了，皇太极。

然而，皇太极真正来的时候，袁崇焕还是感到一些慌乱。因为皇太极行军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从出兵算起，五天的时间，皇太极的军队就包围了锦州。

非常荒唐的是，锦州城是没有正式守将的，袁崇焕还没有安排好，所以让赵率教在那里暂且管理几天。赵率教完全没有料到皇太极这么快就打了过来，看着城下黑压压的大军，赵率教暗叫倒霉。倒霉归倒霉，碰上了就跑不掉，只能想办法去应对。

赵率教毕竟是久经考验的将军，冷静下来后，就用绳子放下两个人，找皇太极谈判。皇太极糊涂了，我大军都已经来了，你才开始谈判。谈判也好，只要能投降，我是欢迎的。

皇太极于是给使者一封招降信，让他们带上去。之后，皇太极开始静静地等待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最是理想。但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一直等到晚上还没有任何信息。皇太极决定继续等，到了第二天，还是没有回信。皇太极感觉有点不太对，便走到高处瞭望，发现明军正在抢修工事。

不行，忽悠高手皇太极被人忽悠了。皇太极一声令下，打。

锦州城的兵力不到两万，皇太极的兵力是他的三倍多。应该说，锦州城没有理由攻不下来。皇太极纠集大军后，忽然下达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命令：停止进攻。

皇太极的这个命令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也好理解，他忽然看到城楼黑洞洞的炮口，想起老爹怎么死的，一时间有些胆战心惊，心想即使攻下了锦州城，估计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皇太极派出使者谈判，希望城内守军弃明投金。赵率教懒得理他，皇太极又派出使者喊话，到第三次派出使者时，赵率教已经不耐烦了：“你还是个老大不，要打就快点打。”

皇太极叹气，这人不懂政治，只好硬碰硬了，大手一挥，兄弟们上啊！可惜，宁远之役给了八旗军重大心理创伤，城楼上的大炮一发射，大家就人心惶惶。大家攻了几次，没敢玩命，就后退了。后来，

任凭皇太极叫骂，大家都不敢往前冲了。

皇太极是个仁君，总不至于把自己这些胆小的士兵全部都砍死。只好又坐下来写招降书，让人送到城门口，结果人还没走到城门口，就被人射死了。皇太极又写了一封，让人送，结果无人敢送。事情到了这一步，皇太极只好让人把招降信射进城内，早这么想的话，就少丢一条人命。

皇太极这些表现实在有点水，可见他军事上不能得“优”。你的士兵怕成那样，别人还会投降，如果投降的话，那真是有病了。皇太极锲而不舍地派使臣来城下喊话，说有事好商量，有什么问题不能在谈判桌上解决。

也许是皇太极的执着打动了赵率教，赵率教让人传话：“要谈判的话，派使者是不行的，要派使臣。”

皇太极很高兴，心想甭管你什么要求，只要愿谈，什么问题都是有希望的。皇太极挑了两个使臣，可是这两个人来到城下的时候，竟然无人理睬。两人干瞪眼，讨个没趣又打道回府。

被人忽悠得这么惨，皇太极决定第二天不惜一切代价攻城。可是第二天，城内的使者居然来向皇太极道歉，说：“昨天很不好意思，我们破事儿太多，你们又来得比较晚，实在不方便开门啊！你们今天再派人过来，要早点儿哦，我们一定会好好款待。”

皇太极真是好脾气，你们这些汉人真难缠，好，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皇太极又派出了两个使臣，使臣来到城下的时候，明军还是不开门。所谓款待就是让他们在烈日下暴晒，这两个使臣还挺敬业的，居然赖在城楼下不走，也不担心被明军射死。

赵率教终于来到城楼上，对两个使臣说：“你们还是退兵吧，退兵的话我们大明可以给你们一笔辛苦费。”

皇太极几乎要崩溃了，再也顾不得大汗的身份，破口大骂，这帮混蛋、流氓……

就在这时，突然又有使者走了进来，对皇太极说：“谈不是不可以的，你要谈我们怎么会不谈呢？就算你不谈我们也要谈啊，不过呢，城楼上地方小，空气流通不畅，所以不能在城里谈。在城外谈多好啊，空气新鲜，青草幽香。”

皇太极看这些人耍流氓，也决定流氓一下，他写了一封信：“你们这些人老是躲在城里，这不是英雄好汉的行为。是好汉的就出来真刀实枪地打，你们要是怕的话，你们可以出一千人，我呢就出十个

人，我们十个打你们一千个，如果我们输了，我就退兵。如果你们输了，你们就把城内所有的财物都给我。”

皇太极这招就是耍流氓了，他希望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术把明军引出来。不过，他也太小看了泱泱大国的文化，这些发明的专利权肯定是属于大汉民族的，用这招来忽悠未免有点儿班门弄斧的感觉。

这封信送进城后，石沉大海，就像很多文学青年投的稿子一样。皇太极当时有一种受伤的感觉，你要是不接受的话，至少也得给我写一封退稿信啊！你们到底玩弄着什么把戏啊？皇太极不懂，皇太极不理解，忽然觉得自己对汉文化的了解还很肤浅。

是的，有时间还得恶补恶补，不过这节骨眼上肯定是没时间了。

其实，赵率教也不是成心忽悠皇太极，没办法，人家打上门来了。为了保家卫国，忽悠忽悠敌人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在赵率教忽悠皇太极的时候，袁崇焕已经在调动兵马支援，他调的是满桂，人马只有一万。

不过千万别小看这一万人马，这一万人马是辽东最为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这支部队主要是由辽人组成，武器装备那是没话说，就连马匹也是最精良的。

满桂本来是想解围的，没想到半路上碰到了莽古尔泰的巡逻兵。双方一阵厮杀后，彼此都在心里感慨：“这厮不好惹，还是回家吧！”

满桂的表现让袁崇焕很失望，但也不能责怪他，毕竟人家才那么点儿人。袁崇焕决定使出一个新招，他秘密派人送一封信给锦州城，没想到这封信被皇太极给截住了。皇太极一看大惊失色，只见信上写着：赵率教同志，你不用担心，锦州被围，领导是清楚的；你就好好在那儿守，领导已经调集各路援军在宁远集结，蒙古援军也即将赶到，至少有七万人马；你就放心地守城，援军来了后，大家里应外合，一举歼灭贼军。

皇太极又被袁崇焕忽悠了，袁崇焕很聪明，辽东的人马大家都知道有多少，所以忽悠说领导从其他地方调集援军，还有蒙古军。水平确实相当高。

皇太极为防被围，将一部分军队撤除包围，在城外驻防。皇太极这人肯定让人非常烦，他攻又攻不下来，还不断地让人射箭劝降。这时，赵率教已经烦不胜烦，若干天后，皇太极没发现任何援兵。又决定攻城，可惜就是攻不下来，除了给自己的国家制造一些寡妇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

到了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已经对自己失望到极点，板着脸下了一道众望所归的命令：“撤退。”

所谓撤退就是饶过骨头去找肥肉，在皇太极的眼里，宁远是一块肥肉。让人不解的是，你皇太极连锦州都拿不下来，怎么能拿得下宁远呢？坐镇宁远的正是袁崇焕本人啊！

皇太极可能也来不及想那么多了，总之，如果就这么回去，实在太丢人。

硬碰硬

皇太极可能真的是被明军整得失去理智了，否则不会作出这么没有水准的决策。

他留下极少的人马监视锦州，自己率领大部队向宁远扑去。我们且不说赵率教一旦出城，明军前后夹击，就说这宁远城明显比锦州要坚固，力量也更强大。软骨头都啃不下来，怎么去啃硬骨头。

人一旦认死理了，一百头牛都拉不回。

当皇太极来到宁远城下时，他差点儿从马上摔了下来，他看到了一幕让自己无法相信的场景，简直就像海市蜃楼。

以前听说后金要攻打，明军总是把城门关得紧紧的，上面架着一大排大炮，各种弓箭啊、滚木啊、礮石啊，全部都准备好了。

这次的情景却完全不一样，明军列好了方阵，站在城门外，可惜没有手举花环，否则皇太极还以为是欢迎自己的。宁远的守军有三万五千人，兵力虽然比皇太极差了点儿，但个个高昂着头，看上去非常自信的样子。

饶是皇太极学问渊博，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袁崇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下令士兵停止前进。皇太极看了好半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等他明白过来后，发出一声咆哮：“袁崇焕，你看不起我，你当我是软柿子！”

皇太极精神已近崩溃了，自从出了个袁崇焕，原本一帆风顺的后金做啥啥不顺，当年跟着父亲攻打宁远，父亲死掉，宁远还在。几天前，自己打锦州，锦州毫发无伤，自己倒死了不少战士。袁崇焕这厮居然有城不守，在城外向我示威。老虎不发威，还真要被人看成是病猫了。这一仗如果不打的话，我皇太极以后在臣民面前就抬不起头了。

皇太极要打，但有人认为不能打，而且还是三个人：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快疯了，不光别人欺负，自家人也欺负，而且三个贝勒一个鼻孔出气。

三个贝勒为什么认为不能打呢？因为他们觉得明军好像是准备好了，信心十足，感觉这仗不能打。

皇太极说：感觉有个屁用，明明我们人多势众，别人都出来了，省去了攻城的麻烦。

可惜这三个贝勒坚定地站在一条线上：不能打。

皇太极很想发火，不过他还是忍了，温和地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再考虑考虑。”

三个贝勒前脚一走，皇太极立刻发出了进攻的命令，这么做，也算是给三个哥哥的面子，毕竟人家年纪大一点，吃的油盐要多一些。直接否定的话显得太不尊重兄长。

三个贝勒一回头，看到自己的人马都往前冲了。没办法，抄起家伙也冲了上去。

看到这里，我们也许觉得袁崇焕这人太高调了，你怎么就自信能打败这支曾经纵横辽东的铁骑？如果打输了，后果将多么不堪设想。别担心，袁崇焕虽然挺能忽悠的，但从不打无把握之仗。虽然历来八旗的铁骑所向无敌，但袁崇焕认为关宁铁骑也不赖，势均力敌。

但即便是这样，获胜的概率还是皇太极要大一些，因为皇太极的人数更多。皇太极是这样想的，所以才敢进攻，他相信一旦两军交战，明军的大炮就派不上用场了，袁崇焕总不至于把自己的士兵也轰死吧！

袁崇焕当然不会轰死自己的部队，但这不代表大炮不可用。大炮还是可用的，因为大炮射程远，可以轰击后金后面的部队，相当于把敌人的前后部队打出一段空当。

八旗军已经习惯了明军是一群怂包，但是两军兵刃相接，他们才感觉有些不对劲儿。这根本不是以前的那些明军，这支军队似乎不怕死，看到敌人就往死里搞。再加上城墙上的大炮不停地轰着后金的后续部队，整个战场变成了明军的翻身大表演。后金军节节败退，但是皇太极也很顽强，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拿下宁远城。

双方一直打到中午，死伤枕藉。如果这样打下去，这场战争的胜负依旧难以预料。但是，皇太极还忘了一件事，他轻轻松松地放弃锦州，没有带走一片瓦。锦州的赵率教又不是傻子，你带不走我一片

瓦，我就得拿你几条命。就在大家杀得正欢的时候，赵率教忽然冲了出来。

战争已经没有悬念了。

这一战，后金伤亡非常惨重，和硕贝勒济尔哈朗（舒尔哈齐第六子）重伤，代善的两个儿子重伤，死亡人数达四千多。

皇太极比他老爹还郁闷，人一郁闷就容易做错事。班师的路上，他突发奇想，还想碰碰运气，攻打锦州。人到了这个份上，只能用失败来形容了。

皇太极先围城，围了五天，也不知他想干嘛，突然就说要攻城。结果，皇太极又为国家制造了一大堆寡妇。一天下来，城下躺着三千具尸体。看着满地的尸体，皇太极心情终于平静了，于是下令撤退。

宁锦战役中，皇太极比他老爸更失败，损失了至少一万的战士。从这一战可以看出，明朝其实不是亡在清朝的手中，而是死在自己的手中。

袁崇焕打了胜仗之后，皇帝高兴，大臣高兴，太监高兴，老百姓高兴，总之全国人民都高兴。皇上高兴之余，升了袁崇焕一级，赏银三十两，三十两可以在老家盖一栋房子呢，没亏待你吧！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人们大跌眼镜，战斗英雄袁崇焕忽然提出辞职。

袁英雄为啥辞职呢？不会是为了几两银子吧！他不辞职不行啊，越来越多的人弹劾他，总之袁崇焕成了箭靶子，许多人朝他放冷箭。宁锦之战，功劳最大的是魏忠贤，其次是监军太监……在功劳名单上，袁崇焕排在靠后。

以袁崇焕这种脾气，怎么受得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再加上事情完成后，越来越多的人看他看不顺眼。

袁崇焕一提出辞职，上面马上就批准了。

当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肯定破口大骂：“魏忠贤，你干吗不早点儿把袁崇焕整下去？”

不过，崇祯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魏忠贤一党以后，又重新起用袁崇焕。且不说崇祯最后杀死袁崇焕，至少他能重用袁崇焕，就说明这个皇帝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昏庸。

第四章 袁崇焕之死

此时，崇祯为他的刚愎自用付出了代价，各地勤王的军队超过二十万，但大家都不敢随便出战。袁崇焕下狱之后，各地兵马人心涣散，大家都搞不懂这个喜怒无常的皇帝。打赢了是死，打输了也是死，只有按兵不动最安全了。

祸 端

根据《清太宗实录》的记载，崇祯是因为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误杀了袁崇焕。考虑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事真实性。我们先来看看如果是皇太极设计杀了袁崇焕会有什么影响，一是歌颂了皇太极的英明，这个人太聪明了，略施小计，就除掉了后金的心腹大患；另外一个就是说崇祯这个皇帝非常昏庸，连铁杆忠臣都杀，这种人不灭亡天理难容，这就为清朝取代明朝奠定了心理基础；还有一个就是说袁崇焕这人非常冤，这样的民族英雄都要被杀，那你明朝灭亡真是活该，清朝顺应历史潮流，乃是天命。

袁崇焕死得确实冤，崇祯皇帝确实有昏庸的地方，但这不代表袁崇焕就是因为你皇太极一个离间计而被杀的。早在皇太极施离间计之前，崇祯皇帝的案头上就摆满了诬告袁崇焕谋反的奏折，这些奏折全是汉人自己搞的。事实上，每个边官还不都像袁崇焕一样，如果没有诬告那才不正常。崇祯皇帝能当上皇帝，铲除阉党，就说明这个人并不傻。难道听到有人说某某边官谋反，他就不经调查杀掉？

真实的情况是，崇祯早已动了杀袁崇焕的念头，他杀袁崇焕不是因为什么谋反，他知道袁崇焕没有谋反的意思。那么，崇祯到底因何要杀掉袁崇焕呢？

这还得从袁崇焕的性格说起，袁崇焕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而有个性的人在官场上混往往会触犯很多东西。

袁崇焕曾经对崇祯夸下海口：“五年之内，可以恢复全辽。”

夸下海口，就得有实际行动，虽然袁崇焕表现不错，但后来就让人有些失望了。然而，袁崇焕做得最过分的一件事是斩杀毛文龙，虽然毛文龙不是崇祯的亲戚，崇祯也未必对毛文龙这个人有什么好感，但毛文龙作为地方大员，除了皇帝谁也无权斩他。袁崇焕这么做就是

越权了，而且越的是皇帝的权，严重地违反了官场规则。

现在的问题是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掉毛文龙呢？他跟毛文龙有仇吗？

我们来了解一下毛文龙这个人，毛文龙躲在皮岛上，位于后金的后方，手中有四万的军队，算是个地头蛇。地头蛇往往是很难调动的，这是事实。不过，公正地说，也不能怪毛文龙。因为当时没有手机，没有传真，要给毛文龙下命令必须穿过敌人阵地，或者是坐船绕道而行，特别费事。再加上明朝指挥非常混乱，一道命令发出去，可能命令还没到毛文龙那里，上头又改变了想法。所以时间一长，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定式思维：毛文龙不听指挥。

甭管毛文龙听不听指挥，但是他的存在对明朝是有好处的，对后金是不利的。因为他可以经常骚扰后金的后方，毛文龙这人毕竟猥琐，自然会保存实力不跟八旗军正面对敌，但骚扰也是一种战术，有时候还是非常管用的战术。骚扰虽然打不死别人，但是可以让别人发狂。

明朝的言官都是一帮整人的好手，就算你没问题他们也能揪出问题。而毛文龙还真有问题，所以弹劾他的人相当多，那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毛文龙到底有什么问题呢？说起来也有一大堆。

毛文龙镇守皮岛八年，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朝廷既然不闻不问，毛文龙只好自己谋生。虽然说打仗毛文龙不是很在行，但是发展经济还是有一套，估计也是被逼出来的。靠海吃海，海水是没法吃，那就吃过往的商船吧，顺便倒卖一些岛上的土特产。这么一搞的话，经济果真搞得有声有色，毛文龙的兄弟们跟他吃香的喝辣的，活得也挺滋润的。

说实话，毛文龙这人挺不容易，孤悬海外，自谋生路，顺便还牵制皇太极。虽然明朝交给他的任务他不是很积极，这也不能怪他，因为老板没发工资啊！以前的一些总督和巡抚都是明白人，挺体谅毛文龙的，所以毛文龙活得也还舒坦。

到了袁崇焕这里就不行了，毛文龙国难当头，你不打仗不说，还一门心思敛财，太可恶了。

毛文龙第一大罪状是经济问题，据说这八年来他的账目不清不楚，还捂着账本不让人看。用现在的话说，你毛文龙搞经济，做假账，不上税。说实话，毛文龙觉得很冤，我虽然没有上税，但是解决这么多人吃饭问题已经够难了，你朝廷呢，不闻不问，发那么一点工资，如果不搞经济，每月发军饷的钱都拿不出来。

毛文龙第二大罪状是虚报战功，这个也是事实，不过这是当时官场的一个潜规则。虚报战功还算好的，就怕那种被人打得稀里哗啦，还对上面吹歼敌多少多少。虽然是潜规则，一旦你提出来，而且找到了证据，还是可以法办的。

袁崇焕对毛文龙的这些猫腻心知肚明，在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袁督师下令：“所有运往东江的船队，必须先开到宁远的觉华岛接受检查，然后再开往东江。”

袁崇焕等于是设置了一道海关，一下子断了毛文龙的财路。听到这个命令，毛文龙感觉自己经营的“公司”要倒闭了。毛文龙遂向高层诉苦，说这样下去我没法混了，还是辞职算了。

崇祯虽然年轻，但也是一个打太极的高手，他安慰毛文龙：“这事慢慢说，别急，一定会解决的。”

就在毛文龙为财政发愁的时候，突然有人给他送来了十万两银子，更奇怪的是这个送钱的人居然是袁崇焕。袁崇焕只差没跟他说：“这钱是来买你命的。”

袁崇焕究竟什么时候动过杀毛文龙的念头呢？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袁崇焕在京城和大学士钱隆锡谈话的时候就说过：“毛文龙这个人如果可用的话就用，如果不可用就杀掉。”意思非常明白，如果毛文龙听指挥的话就可用，不听指挥的话就杀掉。所以，那种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因为看不顺眼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归根结底，大局为重，只是袁崇焕心目中的大局和崇祯心目中的大局有着微妙的不同。

为了杀掉毛文龙，袁崇焕决定先对他示好，示好才能让他疏于防备。毛文龙手下毕竟有几万人，一旦造反的话，袁崇焕估计也会头大。袁崇焕给毛文龙送去许多救济品和慰问品，并邀请毛文龙来宁远友情参观。

毛文龙来了，袁崇焕这时要杀掉他只是举手之劳，不过他并没有这样做，确实袁崇焕政治神经不太发达，但做事还是考虑得挺周全的。他知道如果在宁远干掉毛文龙的话，皮岛的那几万人很可能会散架，几万人一旦做土匪，或是投敌，那对于国家的安全是很大的隐患。

袁崇焕真诚地对毛文龙说：“你来到这里，我很感动，过些日子我也去你那里阅兵。”

不得不佩服袁崇焕的胆子，在毛文龙的地盘斩杀毛文龙。

袁崇焕到达皮岛的当天晚上，两人聊得还不错。阅兵的那天，毛文龙感觉不太对劲儿，毕竟是个老江湖，出事之前多少会有一些感觉。而袁崇焕的表现却非常淡定轻松，他随身只有十几个护卫。毛文龙又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天晚上，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毛文龙孤身一人来到袁崇焕的营帐。于是，开始了一场决定毛文龙命运的谈话。

袁崇焕问他：“你在岛上待了这么久了，为国家操劳得够累了，不如早点儿回家休息吧，听说你老家西湖的风景不错啊！”

毛文龙不识时务，或者说不了解袁崇焕，回答道：“没事的，没事的，文龙正当盛年，后金这般狗贼还没消灭，文龙岂能辞职呢？”

袁崇焕笑道：“这个你倒不用担心，我们会安排人才的，你放心回家休养就行了。”

毛文龙傻乎乎地说：“这帮兄弟跟我这么多年，估计别人很难带哦！”

袁崇焕干咳一声，说：“我这次来这里是为了犒赏你的军队……”

谈话结束了，毛文龙没有抓住最后的活命机会。袁崇焕早就对自己许诺，毛文龙可用则用，不可用则杀。所谓可用就是让毛文龙交出指挥权，所谓不可用就是死抓住手中的权力不放。可见，袁崇焕并不是看毛文龙不顺眼，而是为了掌握兵权，好统一调动，对付后金。

两天后，袁崇焕在山顶设置了一个营帐，准备在那里干掉毛文龙。毛文龙带着部队准备上山，袁崇焕的侍卫说：“这不是请客吃饭，不用带这么多人，带上你几个亲信就够了。”

毛文龙心想也是，见袁督师带着一大帮兄弟确实不太礼貌，便带着几个心腹将领上山了。

进了营帐后，毛文龙看到袁崇焕拉长了脸。毛文龙还没反应过来，袁崇焕就厉声呵斥：“好你个毛文龙，这几天我苦口婆心地跟你聊天，希望你回头是岸。没想到你执迷不悟，目无国法，你当本部是什么？”

毛文龙张着嘴巴想争辩，还不等他说话，袁崇焕就列举了他十二大罪状。

一、你毛文龙浪费国家粮食和钱财，整日龟缩在岛上，忽悠朝廷说恢复国土，时至今日，没看你恢复寸土。评点：这个真不能怪毛文

龙，毛文龙又不是个军事奇才，收复国土谈何容易；毛文龙只是官员中的凡客，混口饭吃而已，朝廷给的饭还不多，人是铁、饭是钢，怎么能说是浪费国家粮食呢！好歹，毛文龙也给皇太极挠过不少痒痒。

二、你毛文龙是牵制皇太极的，为何皇太极几次兵犯宁锦，这算得上是牵制吗？评点：这一条是说毛文龙工作态度不认真，至少是业务能力差；还算得当，但也不是很有道理，看看后来，皇太极直接绕过宁锦，打到京城去了。难道我们可以说袁崇焕是个摆设？

三、你毛文龙为了经济利益，经常骚扰朝鲜人民。

这些罪状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毛文龙死得有点儿冤。毛文龙被绑起来的时候，大喊：“冤枉。”

这么多罪状还冤枉，袁崇焕不理，坚持要杀他。毛文龙仗着自己是一品武官，手下又有这么多人，还想反抗。

这时，袁崇焕拿出了尚方宝剑，说道：“我答应皇上，五年之内平辽。我凭什么这么自信呢？因为我讲法度，今天如果不砍了你，以后我的法度谁还会听。皇上给我尚方宝剑，目的就是这个人。”

所谓的“这个人”，在毛文龙看来就是杀自己，毛文龙虽然是一品大员，心想皇帝要杀自己，也只能认栽了。杀吧，别灭九族就行。

事实上，袁崇焕是没有杀掉毛文龙的权力的。杀掉毛文龙后，袁崇焕善后的功夫做得不错，他唯一无法善后的就是那个远在京城的皇帝。

当崇祯收到毛文龙死讯时，大为惊骇（意殊骇）。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又必须用袁崇焕，所以忍下这口气，秋后再来算账。

袁崇焕杀毛文龙，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是非常失策的。清代杨涟评价说：“文龙守皮岛多年，虽有冒饷抗拒诸状，然其兵马强盛，将士多出其门……使留之以据大兵，不无少补。崇焕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朝亡国三大机。”

毛文龙有三个有名的部下：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这几位后来都造反了。前两位跟着吴三桂一起，是为三藩。之后，袁崇焕起用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祿，但他也造反了。这个结局想必是袁崇焕始料不及的。

死 期

我们知道，在杀袁崇焕之前，整个辽东盛传袁崇焕之所以杀毛文龙，是被皇太极收买了，想跟皇太极里应外合，一起端掉大明朝。

这种说法崇祯会信吗？崇祯多疑是肯定的，但他还没有丧失最基本的理智。如果袁崇焕要投敌的话，犯不着毛文龙什么事，只要打开宁锦的防线，对皇太极说：“北京欢迎你，财富全归你。”

所以，袁崇焕被杀肯定不碍皇太极什么事，皇太极虽然也玩弄了什么离间计，但这并不代表这笔功劳就可以算到他头上。就好像一个人早上起来看到太阳升起，不能说这太阳是因为我而升起。比喻虽然不恰当，但大概就是那么个意思。

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之后，也感到后怕，立刻给皇帝写了一封检讨书，承认自己没有权力杀毛文龙，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令袁崇焕感到吃惊的是，崇祯并没有生气，反而给了他一张奖状，夸他办事果断，为国家除了大害。袁崇焕受宠若惊，心里暗呼吾皇圣明。

崇祯的想法可能是这样的，你杀掉毛文龙，没关系，我给你机会，看你五年能不能平辽，不能的话再来收拾你。

就在袁崇焕计划如何复辽的时候，皇太极筹划着如何攻打北京。在此之前，皇太极吃了袁崇焕的亏，当然不会再吃饱了没事找抽。皇太极绝不会犯同一个错误，他决定不碰关宁防线。

皇太极想破脑袋，终于发现途经蒙古、绕远路突破长城这个好方法。这次，皇太极还邀上蒙古人：“哥们，借你的道，一起去发财吧！”

就这样，十万人绕远路，浩浩荡荡地跨过长城，来到明朝重镇遵化。遵化距离北京只有两百多里，相当于是北京的门户，遵化一旦失守，北京就岌岌可危。

远在宁远的袁崇焕听到这个消息，差点儿晕菜。皇太极，我在这里恭候你多时，你居然跟我玩兜圈子游戏，想整死我是吧！没错，皇太极就是想整死袁崇焕，皇太极本人当然没有能力整死袁崇焕，不过只要用用头脑，是可以借别人的手整死袁崇焕的。

袁崇焕急了，人一急就要犯错。也许皇太极在其他人的眼里是一头凶狠的大老虎，而袁崇焕呢，几次给皇太极下马威，在他眼里，皇太极可能只是个病猫。他居然让赵率教率领一万人去收拾皇太极。

一万人收拾十万人，袁崇焕的这个决策让人唏嘘。赵率教没有辜负袁崇焕的信任，虽然没能收拾皇太极，反而自己变成别人的点心，

也总算是为国捐躯。赵率教阵亡不久，遵化失陷。

遵化失陷，袁崇焕亲自带领大军，前去和皇太极PK。袁崇焕赶到京城郊外时，朝廷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兵部尚书王洽刚上台就下岗，非但不岗，连脑袋也被崇祯摘了。崇祯摘完王洽的脑袋，让老将孙承宗出马。孙承宗算得上是袁崇焕的恩师，应该说他上台对袁崇焕是有好处的。

袁崇焕在遵化附近的蓟州陈兵，就等皇太极过来。皇太极也许是被打怕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反正，看到袁崇焕就闪避，充分发挥了满族人机动性的特点。

皇太极绕过蓟州，继续向目标地区——京城——前进。

但袁崇焕认为这不太可能，京城是大明的都城，皇太极应该不至于有那么大胆子吧！在袁崇焕看来，皇太极不过是一个高级强盗，没什么大的志向，最多就是把京城周边的住户抢劫个遍。就连孙承宗也是这么看的，认为这帮人只是一伙强盗，只是人数多得恐怖而已。所以，孙承宗命令袁崇焕尽快赶到近郊，将皇太极给赶走。

接到命令后，袁崇焕并没有服从，此时的袁崇焕今非昔比，已经有了自己一套功夫。十一月十一日，袁崇焕开始了一个奇怪的用兵方式，这个方式最终送了他自己的命。

袁崇焕几万人追着皇太极十万人，皇太极停下来，袁崇焕也停下来，皇太极往哪个方向跑，袁崇焕也往哪个方向跑。皇太极也纳闷，不知道袁崇焕干吗，刚开始还有些紧张，后来一停下来就放心地抢。

袁崇焕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别说皇太极纳闷，崇祯也很纳闷，当时整个北京的人都很纳闷。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揣测袁崇焕到底想干嘛。袁崇焕和皇太极兜了五天的圈子，双方没有伤对方一根手指头。看起来很像是两人在预谋什么一样，所以怪不得北京城里风传袁崇焕投降叛变。

如果说通敌的话不太对啊，袁崇焕可以直接打开关门，也省得皇太极劳师动众绕那么远的路了。那么，袁崇焕为什么要跟着皇太极满世界跑呢？

这个问题实在让人费解。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袁崇焕的兵力只有几万，如果跟皇太极正面交手的话，是讨不到什么好处的。要想取胜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寻找更具胜算的战术。袁崇焕最擅长的战术是什么？守着城，一边跟敌人拼刺刀，城楼上大炮轰。这么一想，我们发现袁崇焕是想用老一套的方式击败皇太极，在皇帝眼皮底下打败敌人那是非常风光的。

所以，袁崇焕才示弱，故意把皇太极引到北京城下，然后背靠京城跟皇太极展开血战。这个战术确实非常高明，可惜的是袁崇焕千算万算，就是算漏了一个因素：这里是皇城！你把战争引到皇帝家门口，就是打胜了，也是巨大的政治错误。

也许，这才是孙承宗为何下令袁崇焕在城郊将敌人歼灭的原因。看到袁崇焕不能理解自己的苦心，孙承宗派人以皇帝使者的名义告诫袁崇焕：皇上呢，对你一直很看好，也相信你忠诚为国；你虽然打了几场漂亮仗，但也做错了不少事，杀毛文龙就不应该，现在把军队驻扎在城外更不应该；很多人怀疑你，你要好自为之，为国效力，否则，神仙也救不了你。

十一月十七日，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他前脚刚到北京，皇太极后脚就到了。给人感觉好像皇太极是跟着袁崇焕来的，这也难怪当时的北京人怀疑袁崇焕了。人民群众掌握的资料和信息不全，只能根据表象来判断了。

当时，明朝是有规定的，边防军队，没有经过皇帝允许是不许驻扎在皇城脚下的。事情到了这地步比较严重了，虽然事情突然，袁崇焕你至少得请示一下皇上，讲明自己为何要在京城下面守城。

崇祯在我们印象里是一个非常暴虐的皇帝，看到袁崇焕来京了，就召他进城。反正你来都来了，如果我这个皇帝拒门不见，搞不好真把你往通敌的路上推。

说实话，崇祯皇帝一肚子火，让你看着皇太极，结果他打到京城来了；你带兵勤王，结果又不跟皇太极交锋，现在还带兵来到城下面。

听说崇祯召见自己，袁崇焕感觉不太对劲儿，所以他脱下官服，穿着一身布衣，戴着黑帽子去见皇帝。

然而，崇祯看到他，并没有出现袁崇焕想象中的那一幕：“你怎么搞的？怎么让皇太极打到京城来了？”

相反，崇祯脱下自己的大衣，披到袁崇焕身上。袁崇焕很不解地看着崇祯，心想：老大，你这是什么意思？

两人互相说了许多关心的话，末了，袁崇焕提出一个要求：“我的士兵们这些天辛苦了，希望皇上能够让他们进城休整。”

崇祯果断地回答：不可以。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明朝，边防军队未经允许进驻城下都是违法，入城的话就特别过分了。

可能从这时起，崇祯就动了杀机，当然杀袁崇焕还得等他赶走了

皇太极再说。

北京城保卫战开始了，袁崇焕亲自带着九千人迎敌，莽古尔泰、多尔袞、多铎等率领四万大军向袁崇焕冲过去。莽古尔泰虽然是个莽夫，但最基本的力量对比还是清楚的，他相信这四万人冲过来，可以把袁崇焕部队冲得稀里哗啦散。

想法是好的，现实总是残酷的。莽古尔泰先冲击袁崇焕的左翼，可惜老袁指挥的军队很坚硬，结果是搞得自己的部队稀里哗啦。没关系，再来，莽古尔泰，你有的是机会。这一次，莽古尔泰冲击袁崇焕的右翼，怪了，还是很坚硬。没办法，大家暂时撤一撤，等莽古尔泰老兄琢磨琢磨一下战术。

琢磨来琢磨去，莽古尔泰老兄决定一窝蜂地扑过去，心想我冲不垮，一群人上去压也压死你们。结果很惨，莽古尔泰很惨，被人打伤了，贝勒阿济格被乱箭射成重伤。莽古尔泰搞不懂，怎么自己的人数这么多，居然被对手打得节节败退。但莽古尔泰是不会轻言放弃的，因为他是一根筋。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莽古尔泰最后不得不撤退了，明军胜利了。

那边皇太极亲自攻打德胜门，结果也没有讨到好处，这一战满桂身受重伤。皇太极还不罢休，决定发动最后一击，于是开始了左安门之战。这一战，尽管皇太极使出了全力，还是败在了袁崇焕手中。皇太极只好暂时撤退，驻扎起来。然而，等待袁崇焕的是死神。

这一天是1629年十二月一日，袁崇焕接到皇上圣旨，召他进宫讨论发工资的问题。皇上还让他带上祖大寿等人一同进宫。

打了胜仗，发工资和奖金是人之常情，袁崇焕带着祖大寿等部将一起往城里跑。奇怪的是，来到城门前却没人打开城门。就在袁崇焕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楼上放下了几个筐子，让袁崇焕等人坐在筐子里，然后拉上来。

这种召见的方式非常奇特，我们不知道袁崇焕坐在筐子里是什么感觉，但前往皇宫的路上他还是挺高兴的。

可是见到崇祯时，他傻眼了，这个崇祯一改往日礼贤下士的姿态，厉声质问袁崇焕：“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敌军为什么能长驱直入，进攻北京？你为什么要打伤满桂？”

袁崇焕沉默了，因为他知道皇上要整自己，皇上问这些问题不是让自己回答，而是找整人的借口。杀毛文龙那是很早的事了，崇祯当时不提，现在提出来，那自然是翻旧账；至于敌军长驱直入，袁崇焕相信崇祯也是明白的，皇太极绕道蒙古，跨越长城，避开了关外防

线；至于最后一个问题，对袁崇焕来说就更荒唐了，因为他都不知道满桂受伤，但京城里有人传言满桂是袁崇焕让人击伤的。

对这些问题，袁崇焕都没有回答，因为他知道任何回答都只会火上浇油。他面对的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独裁者，独裁者没有内政，独裁者看的是别人的态度。

看袁崇焕不说话，崇祯稍稍满意，沉默就代表认罪。来人呐，把袁崇焕押进大牢。

崇祯这个表现让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现在敌师大军压境，居然关押抗敌的主帅。更让人吃惊的是，居然有人夸赞崇祯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现代人翻案把脑子翻出毛病来了。

拿下袁崇焕后，崇祯让满桂接替袁崇焕成为总指挥，祖大寿率领袁崇焕的军队。崇祯满以为这样安排不会让军队哗变，事实上他还是错了，理论上这个安排很合理，但是他忽略了人的情感。祖大寿是袁崇焕一路提拔起来的，可以说对袁崇焕既感恩又怀着敬意，你现在这么突然一下子把我的恩师下狱，虽说提拔了我，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厚黑门徒。再说了，你可以拿下袁崇焕，也可以拿下任何人，保不准有一天你对我举起屠刀。

虽然崇祯笑咪咪地对大家说：“这事只与袁崇焕一人有关，大家还是各就各位，该干啥干啥。”

袁崇焕被抓时，祖大寿一句话都没说，不过根据史书记载，祖大寿当时发抖了。祖大寿发抖不是因为心理素质差，而是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奴贼曾经横行无忌，好不容易出了个袁督师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结果袁督师不但没有功劳反而有罪。

三天后，祖大寿看崇祯还没有释放袁崇焕，带着部队离开了京城，回到锦州。这就相当于造反了，我国古代的国情非常特殊，你带兵到京城下是造反，带兵离开也是造反。

这下，崇祯急了，这时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建议说：“让祖大寿回来也容易，只要让袁崇焕给他写一封信。”

崇祯想，这好办啊！让袁崇焕写就是了，袁崇焕也不能不写，除非他不想活命。当然，架子肯定是要摆的，不摆架子失去了谈判的资本。

没办法，崇祯只好让内阁大学士和朝中九卿轮流去狱中说服袁崇焕，这些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袁崇焕就是不写，看在这么多人锲而不舍的面子上，终于给出个理由：“皇上如果有诏书，让我写信，

我当然会写。再说，祖大寿之所以听我命令，因为我是督师，现在我是监狱里的犯人，就算写了也没用。”

袁崇焕的意思很明白，皇上你把我放了，官复原职，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但这样一来，皇上的脸还往哪儿搁。为了脸，崇祯坚决不低头，不肯下旨，只是派太监和大臣对袁崇焕进行思想轰炸。最后，还是老谋深算的余大成把袁崇焕搞定了，他对袁崇焕说：“你的忠心和功劳，天下人都知道。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们还是要以国家大局为重。”

“国家大局”四个字是很容易打动袁崇焕的，袁崇焕终于为国低头，给祖大寿写了一封信。祖大寿收到袁崇焕的信，大哭，哭完之后立刻带兵回北京。

十二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休息得差不多了，考虑到袁崇焕已经下狱，决定集中所有兵力，狂攻永定门。满桂在城下带着四万兵马，和皇太极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战斗。

结果是满桂战死，明军伤亡惨重，但守住了城门，打退了敌人，而且让敌人损失很大。皇太极只好再次撤退，驻守在遵化附近，等待有利时机再出击。

此时，崇祯为他的刚愎自用付出了代价，各地勤王的军队超过二十万，但大家都不敢随便出战。袁崇焕下狱之后，各地兵马人心涣散，大家都搞不懂这个喜怒无常的皇帝。打赢了是死，打输了也是死，只有按兵不动最安全了。

袁崇焕入狱后，关外的将士们纷纷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前大哭，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换袁崇焕出狱。孙承宗是袁崇焕的恩师，他当然不希望袁崇焕死，所以他一面安抚祖大寿放心打仗，立功后为袁崇焕赎罪，一面上书崇祯，请求从轻发落，让袁崇焕的部将赎罪。崇祯选择了沉默，怪不得有人说崇祯的领导做出了水平，确实很有水平。

有一个叫程本直的老百姓，非常钦佩袁崇焕，曾经求见他三次没见到，后来总算见到了袁崇焕，投到了他门下。袁崇焕被捕后，程本直愤愤不平，给皇帝写了一封火气很大的信，最后表示自己愿意为袁崇焕死。崇祯也是个牛脾气，你想死，我就成全你，最后把他给处决了。

主张杀掉袁崇焕的两个最强硬的人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当然朝中希望杀袁崇焕的大有人在，加上崇祯本来就对袁崇焕比较反感。所以，袁崇焕的罪名最终定了下来：谋逆。兵部尚书梁廷栋极力主张灭袁崇焕三族，后来因为余大成出面才避免了。

余大成半威吓半开导地对梁廷栋说：“袁崇焕其实并没有罪，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是金兵围城，皇上愤怒，需要发泄一下而已。跟你说吧，我在兵部做郎中，已经换了六位尚书，没有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现在做兵部尚书，如果有天金兵又打过来了呢？你今天灭袁崇焕三族，等于是开了一个先例，以后如果有问题，你得考虑考虑自己三族啊！”

事实证明余大成是很有预见力的，果然后来梁廷栋畏罪自杀。

梁廷栋一听，浑身起鸡皮疙瘩，最后和温体仁商议后，决定给袁崇焕定罪为凌迟，家人充军，母亲家和妻子家的人就不牵连了。

袁崇焕是很悲剧的，刽子手还没动手，老百姓就扑过去咬他。北京的老百姓被皇太极抢掠一番，满心都是悲愤，大家认为是袁崇焕把八旗军引了过来。这就是一代英雄袁崇焕的下场。

相比“汉奸”范文程混得风生水起，简直让人感慨世道怎么就这么不公平呢！

袁崇焕被杀这件事情沉重地打击了明朝军队的士气，在袁崇焕入狱后，明朝就出现了整支军队沦为流寇的事件；袁崇焕被杀后，明朝出现了整个部队向皇太极投降的事情。

其实，崇祯对杀袁崇焕也是比较犹豫的，从将袁崇焕下狱到最后将他凌迟，中间有八个多月的时间。中途，崇祯也想过把他放出来，再去守边。但最终，皇太极走后没过多久，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崇祯就动手杀袁崇焕了。一旦危机解除，袁崇焕就显得没那么棘手了，这时杀他就像杀一只菜鸟。难不成没有袁崇焕国家就不行了？崇祯不信邪。

在杀大臣这块，崇祯可以说深得老祖宗朱元璋的真传。崇祯当了十七年皇帝，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当时的大学士相当于丞相级别）、十四个兵部尚书。此外，他逼死或者杀死的督师包括袁崇焕在内有十一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兵部尚书中，革职的我们就不说，王洽被处死，梁廷栋和张凤翼服毒死，杨嗣昌自缢身亡，陈新甲被斩首，傅宗龙、张维国被关进大牢里……

第五章 大凌河之战

皇太极是一个仁君，没有处死阿敏，只是把他幽禁起来。打掉阿敏集团是皇太极树立个人权威的一个开始，独裁不是一天能做到的，皇太极能够做到有步骤、有程序、有条理地掌握独裁权力，已经说明了他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甚至可以说得上英明。

阿敏的问题

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有个大手笔，打掉了后金国的第三号人物——二贝勒阿敏。

我们知道，当年努尔哈赤就打掉了阿敏的老爹舒尔哈齐，现在努尔哈赤的儿子又开始对舒尔哈齐的儿子动手，子承父业大抵如是。

阿敏犯了什么错误呢？说实话，阿敏的错误也让人非常不理解。他的第一个错误是在征讨朝鲜的时候，纵容部下大肆抢掠，而且把抢掠的东西都运回来。看到这里，让人很纳闷了，打仗不就是为了财物吗？皇太极自己也是个抢劫高手，怎么这时就不理解阿敏呢？而且阿敏也没贪污啊，东西都运回来了。联想一下皇太极曾经提出的仁政，我们就明白了。阿敏同志破坏了皇太极的光辉形象，当然应该被整。阿敏犯的第二个错误更让人不理解了，这是什么错误呢？三个字：打不赢。天聪四年（1630年）五月，皇太极攻下了北方四城：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皇太极让二贝勒阿敏和贝勒硕托带领五千人镇守。阿敏自己镇守永平，总共才五千人，又拨了一些让其他人分守三城。

当时，明朝派遣孙承宗这个老资格的领导收复北方四城。孙承宗确实很厉害，第一天就收复了滦州，第二天又攻下了迁安，这阿敏看形势不对，又不好意思就这么跑回去。皇太极本来就看不顺眼，给他逮住错，那还了得。事实上，阿敏猜得没错，皇太极就想整他。

阿敏硬着头皮跟孙承宗打了一仗，结果五千人死得只剩千余人，阿敏自己也挂彩了，这才心安理得地逃了回去。就此，北方四城在阿敏手中全部丢失，整个时间只用了五天。听到阿敏逃跑的消息，皇太极当然非常气愤，非常震惊，非常失望。表演完这些复杂的情绪后，皇太极才平静下来，开始着手整阿敏，在这次事件中，阿敏又犯了一个皇太极非常忌讳的错误，他逃跑之时杀掉了大量归顺的汉民。

皇太极问他：“我说仁政，你是不是当耳边风？”

阿敏无语。

皇太极又说：“北方四城你丢的速度可以进吉尼斯纪录，想必你很自豪吧！”

阿敏还是无语。

皇太极最后说道：“沉默就代表默认。”

怎么整阿敏呢？皇太极分五步走，步步为营，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扎实，旨在让阿敏心服口服，哑口无言。

第一步是没收赃物。皇太极说：“以前我体谅阿敏打仗辛苦，三次让他把战利品带回家。这次，他居然抛弃我打下来的城池，杀害归顺我的老百姓，还把城里的财物都据为己有。这种行为实在难以容忍，现在我必须没收他的赃物，全部充公。”

大家都知道贪污受贿是不对的，皇太极这个做法让大家心服口服。

第二步是不让阿敏入城，听候惩罚。阿敏郁闷了，作为后金国的第三号领导人，享受这种闭门羹待遇，应该说是他始料未及的。更气的是，皇太极允许他的士兵入城，就是不准阿敏进来，换成谁估计也气得差不多了。

第三步是审讯，有问题的人一个个审，谁也别想逃脱责任，而且皇太极亲自到法院旁听。审讯的问题围绕着：为什么弃城而逃？为什么贪财怕死？为什么不跟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为什么把归顺的老百姓大批屠杀？

阿敏估计自己没法回答得让皇太极满意，干脆全部认罪。

第四步就是关押了。当然了，口才了得的皇太极少不了要对大家来一段训话。皇太极来到监狱里，看着这些曾经跟自己出生入死的将士，潸然泪下，问道：“才几个月的时间，难道明军突然就神灵附体了？哪里有什么神仙魔鬼，都是你们没有斗志啊！那些汉人，打起仗来什么德行我们早见过了……”

皇太极动情的演讲结束后，监狱里哭声一片，大家都泪流满面，包括皇太极自己。最后，皇太极微笑地离开监狱。

第五步是甄别好坏，问题大的就处理，问题小的可以留用。表面的规则是作战勇敢的可以留用，贪财胆小的继续关押；真实的规则是阿敏死党坚决打掉，不是死党的都可以出狱。

五个步骤走完之后，皇太极才真正开始动手对付阿敏。正像阿敏的名字一样，阿敏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皇太极召集了所有的贝勒大臣讨论阿敏问题，让他们放心地揭发和控诉。贝勒和大臣们不负所望，经过详细的材料分析，整理出阿敏的十六大罪状。

这些罪状经过专家组讨论过，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有根有据，阿敏就是长了翅膀也难脱身了。

总的说来，阿敏的罪行就一点：对皇太极有意见，有非分之想。

皇太极是一个仁君，没有处死阿敏，只是把他幽禁起来。打掉阿敏集团是皇太极树立个人权威的一个开始，独裁不是一天能做到的，皇太极能够做到有步骤、有程序、有条理地掌握独裁权力，已经说明了他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甚至可以说得上英明。

围攻大凌河

孙承宗收复北方四城后，亲自巡关，经过实地考察后，他建议崇祯现在最要紧的是修复大、小凌河两城，这两城就像两把锁链一样，可以和山海关连成一条防务链。

崇祯表示同意，让孙承宗先修大凌河。大凌河位于锦州以东三十里，是锦州的一个前哨。由于这座城池的关键地位，孙承宗让祖大寿负责这项工程。

皇太极的侦察行为做得非常不错，明军修筑大凌河的事情很快就传到皇太极的耳中。明朝总兵祖大寿和何可纲等人率领关外士兵和一些民夫修筑大凌河，准备抢在八旗军未到时竣工。得到这个情报，皇太极发出一声冷笑，你想抢在我来之前竣工，那我就给你一个惊喜吧！

祖大寿率领的是明朝最精锐的士兵，只要把这支军队消灭了，于是卸下崇祯的一条膀子。

战争之前，皇太极照例是要演讲的，他动员道：“从古至今，打仗这东西向来是有道者能打赢，无道者要失败。这是屡试不爽的天道。所以呢，我们打仗，绝对不可以仗着武力肆意滥杀，这样只会导致失败。用兵之道，最关键的是顺应天理，行仁义之师。天道这个东西是循环的，皇帝轮流做，但老百姓还是老百姓。现在天意站在我这边，明朝的老百姓迟早也是我的老百姓，所以希望你们能善待老百姓，严格遵守军纪……”

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祭拜太庙后，即刻率领大军出发。渡过辽河后，皇太极又不厌其烦地开始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的内容更长，还是老调重弹，什么老天站在我这边，什么军纪大家一定要遵守，什么只要有信心打仗一定赢，什么将军和士兵大家要互相爱惜……

虽然这些东西有点儿烦人，但确实很有效果。这就是宣传的力量，也是广告的威力。

八月初一，蒙古的一些部落前来和皇太极会师，皇太极给他们接风洗尘后，再次把自己的军纪跟蒙古人重申了一遍。

皇太极军抵大凌河时，城墙已经修完，雉堞完成一半。在城下俘获了一个人，得知修城工作已经进行了半个月，城内大概有一万五千兵马。

当天晚上，开会的时候，大家都主张攻城。皇太极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以前攻城吃了许多闷亏，与其攻城不如围城。等到城内粮食断绝后，自然不战而胜。

皇太极是个鬼点子特别多的人，他围城还围出了特色，用一个月时间让人在城池周围挖了一个圆圈，投降不，不投降困死你。

祖大寿大笑：“有种就困死我，我城内的粮草充足，可以支撑两年。”

皇太极听了也笑眯眯地回答：“行，那我就困你三年。”

如果真有两年的粮食的话，祖大寿也懒得跟皇太极喊话了。现在祖大寿唯一指望的是朝廷的援军，他已经让人给崇祯皇帝发送了急报。孙承宗接到消息，派吴三桂的老爸吴襄领一万人马去救援，据说三桂兄也在里面。你来救援，很好啊，攻城我不行，野战我还是挺厉害的。皇太极一招围点打援，明军来多少都在外面阻击。这招还真管用，吴襄硬生生被皇太极打了回去。

回去后，孙承宗拨出一支更大的人马，总计四万人，由张春率领。张春是个聪明人，赶到大凌河附近的时候，不但不进攻，还摆出防守的架势，等皇太极来攻。这张春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如果跟皇太极的军队在野外对砍的话，那是相当不划算的一笔生意。

张春建立营寨后，架起一排排大炮，就等皇太极来攻。皇太极没有让他失望，派出最精锐的骑兵，左右两路同时出击，攻击张春的两翼。事实证明，大炮的威力在当时是无可比拟的，几轮进攻下来，后金部队损失惨重。

就在张春为胜利而欢庆的时候，皇太极拿出了他的撒手锏：大炮。

当后金的部队朝张春开炮的时候，张春产生了错觉，以为是自己这边的人不小心搞出来的乌龙。当对面的炮弹不断飞过来时，张春终于才明白，敌人也有大炮。

其实，皇太极很早就对大炮感兴趣，早就委派一些人专门研究这门高新武器。造出了三十门大炮，拿出来试用，感觉还不错。

这件事震惊了张春，眼看战事发生变化，张春决定亲自上阵督战，希望能稳住军心。跟张春一起来的还有吴三桂的老爸吴襄，吴襄是一个猛将，而且又是本地人，熟悉地形，熟悉敌人。原以为带着他可以如虎添翼，没想到这不是翅膀，而是风筝，看到事情不对劲，吴襄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挣脱张春，自己逃跑了。吴三桂有这样的老爸，怪不得后来做起汉奸来游刃有余。

战事紧急的时候，如果有一队人马逃跑，那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果然，吴襄撒腿逃跑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大家开始了失败大逃亡，皇太极的铁骑冲上去，左砍右切，四万大军就这么没了。

祖大寿在城楼上看着这一切，几乎要绝望。现在留给祖大寿的只有一条路：突围。

祖大寿决定从南门突围，因为这里的守将是有勇无谋的莽古尔泰，不过莽古尔泰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祖大寿是拼了命要往外冲，莽古尔泰是拼了命要堵住祖大寿，双方厮杀得非常惨烈，均伤亡惨重。

莽古尔泰眼看抵抗不住，让人去向皇太极求援。然而，皇太极虽然答应了他，但援兵迟迟不到。莽古尔泰自知被弟弟忽悠了，一抹泪水，带着自己所有的兵力冲了上去，才把祖大寿堵回城里。

这事让莽古尔泰很上火，他找皇太极理论，说兵力太少，实在没法防，要求换防。皇太极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莽古尔泰一气之下，居然拔出刀子，要砍皇太极。幸好他的弟弟及时拦住他，才没出大事。

后来，莽古尔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越想越怕，连夜找到皇太极低头认错。皇太极一方面是个卓越的政治家，另一方面在权力斗争中也是相当阴险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他这些兄弟的支持，他是很难上台的，但上台之后他最大的目的就是除掉这些兄弟。所以，每到打恶仗硬仗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的兄弟派遣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如果兄弟战死了，可以嘉奖他为国捐躯；如果战事失利的话，回来正好借故

整死兄弟。

莽古尔泰后怕是有道理的，因为战事结束后，皇太极就把他关进牢房里，不久就莫名其妙地死去。

突围失败，祖大寿困守孤城。皇太极总是和颜悦色地对祖大寿说：“大寿，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不开，早点儿下楼，我们一起来喝点儿酒。”

皇太极绞尽脑汁要招降祖大寿，但祖大寿就是不理他。皇太极是一个很有耐心的猎人，他丝毫没有动怒，反而很欣赏祖大寿这种硬骨头。

祖大寿确实挺难的，因为粮食早已经吃完。刚开始几十天，大家把几千匹马宰了吃。马吃完之后呢，就只能吃人了。

看着这些，祖大寿快崩溃了。没办法，只能投降了，这样下去，就算不战死，大家基本上也把自己的人吃得差不多了。祖大寿一说投降，大家仿佛从地狱里看到一丝来自天堂的曙光，纷纷赞同。

所有人都同意投降，唯独一个人表示反对。这个人就是副将何可纲，何可纲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祖大寿英明地认为，绝对不能因为这个不同的声音，毁坏了全局的计划。你不投降，行，那我就杀了你。何可纲于是被祖大寿斩首示众。

祖大寿投降之后，皇太极对他友好得跟什么似的，甚至不让祖大寿跪拜，见面之后互相拥抱，宴席上还让祖大寿跟自己并肩坐在一起。皇太极投之以桃，希望祖大寿报之以李。祖大寿人在屋檐下，是没法不低头了。

祖大寿信誓旦旦地表示，虽然我们是被逼投降（围困三月，率众出降，倾心归汗），但归顺之后是绝对不会有二心的。若我们违背良心和道义，苍天在上，让我不得好死。当然，如果大汗你欺骗我，估计老天对你也差不多吧！

应该说，在政治上除了对自己的兄弟们心狠手辣之外，皇太极还是非常仁慈的，当即表示这个肯定会的，我皇太极出来混首先讲的是诚信。

诚信完了之后，皇太极就问了：“大寿，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你说说看，怎么拿下锦州吧！”

祖大寿当然不能回答说我说不上来，而是说这件事得从长计议。所谓从长计议，就是让我好酒好菜吃饱吃爽，一顿丰盛的宴席之后，祖大寿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计策。这个计策就是让我回锦州，来个里应

外合。

皇太极说这个主意好啊，心里却在想万一你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怎么办？不过，如果我不让他去锦州的话，又表示我不信任他。大家都觉得如果就这样纵祖大寿回去，万一回不来就损失大了。

皇太极考虑很久后，说道：“现在把大寿留在这里也是浪费酒肉，不如让他回锦州吧！即使他反叛不归来，也只是一个人而已，他的这些士兵都已经投降了。我们即使不放回大寿，明朝也会派其他人镇守，如果是个钉子户就麻烦了。大寿好歹跟我有点儿交情。即使大寿反叛，我们只要善待他的士兵和子侄，相信以后机会还很多。”

应该说，皇太极对风险的考虑是非常正确的。祖大寿留在后金暂时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放归后有可能献出城，即使没有献出，反正他的家人都在自己手上，以后还有机会。换句话说，放他回去比留在后金的利用价值更大。一个领导的水平就体现在这里，能不能看得更远，能不能为自己的集团谋取更大的利益。皇太极善于放长线，能不能钓到大鱼那就是结果了。

十一月二日，祖大寿进城。皇太极听到炮声，知道这是祖大寿发出的信号。皇太极就等祖大寿第二次发出炮响，这就意味着祖大寿已经动手了，埋伏在锦州城附近的后金军队就可以出动了。

可是，第二天皇太极没有听到炮声，第三天还是没有……

就在皇太极对这个人感到失望的时候，忽然收到祖大寿的密信。祖大寿解释说，由于进城仓促，身边人手少，一时之间没法动手，希望皇太极先生淡定，总会逮住机会动手的。

皇太极心想大寿说的也有道理，不如就多等几天吧！这一等又是好多天，皇太极感到极度的怀疑。就在这时，他又收到大寿的一封密信。大寿首先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然后就说，锦州城防守特别严密，一时半会儿只怕没法动手，太极先生你耐心等等吧，估计明年就可以动手了。

很明显，祖大寿在忽悠皇太极，他所以对皇太极这么客气讲礼，一方面是忽悠，另一方面也是担心皇太极为难自己的亲属和士兵。皇太极这人确实非常特别，别人这么忽悠他，居然任由别人忽悠，换作是秦皇汉武这样的人早把祖大寿家人都剁了，更不用说像朱元璋这样的皇帝了。

现在我们大概明白祖大寿杀害何可纲的苦衷了，杀何可纲可以取信于皇太极，找准机会走人。虽然他们抗争的方式不一样，但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一个是玉石俱焚的刚烈，一个是曲线救国的手腕。

就像祖大寿解释的，自己人手不够，没法下手。许多人由此推断祖大寿是真降，这种看法不太靠谱。因为不久，祖大寿就当上锦州城的老大，换句话说，只要他一声命令，可以立刻打开锦州城。

在此之前，锦州城的守将是邱禾嘉，邱禾嘉做事非常认真细心。虽然祖大寿对他没说真话，但他已经派人多方查证，得知祖大寿投降一事。邱禾嘉将这事报告给崇祯，崇祯看了之后没有任何反应。确切地说，也有一些反应，他让祖大寿取代邱禾嘉的地位，镇守锦州。

崇祯杀了袁崇焕后，祖大寿已经有“不听话”的行为，投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崇祯为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说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不光皇太极知道人才宝贵，崇祯也是知道的。有人会说了，崇祯知道人才的重要性，为啥还要杀掉袁崇焕？

可能这跟做人有关系，崇祯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杀掉袁崇焕。祖大寿和袁崇焕的区别在于，袁崇焕个性鲜明，而祖大寿则非常低调。

大凌河之战，孙承宗非常倒霉。最坚定地主张修墙的是他，现在墙没修好，敌人就冲了过来，把墙砸得稀巴烂，还把整个修城的队伍给没收了。一时间，朝野上下的唾沫全都飞向孙承宗。孙承宗受不了，辞职走人。

十年之后，皇太极再次攻打锦州，将锦州围困了一年，祖大寿才投降——这次是真降。不过，投降之后的祖大寿碌碌无为，始终没有为清军效力。皇太极其实也不是特别需要祖大寿效力的，他需要的是“榜样”的力量，祖大寿就像是他的政治产品的宣传演员。

投降不分先后

优降政策是战场上的攻心之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挖墙脚。虽然祖大寿招降得不是特别成功，但已经为皇太极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效益。如果没有祖大寿榜样的力量，后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归顺得或许不会那么顺利。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都是毛文龙得力的部将，毛文龙一死，他的副手陈继代领职务。陈继的能力差点儿，刚开始有袁崇焕罩着，还能勉强压住局面。后来，袁崇焕死了，皮岛上面人心思动，发生了兵变。为了争夺岛上的最高权力，将领与将领之间拿着刀对砍，兵士与兵士之间集体干仗。虽然明朝政府最终平息了纷争，但岛上人心涣散，许多人不想继续在岛上待了。

孔有德和耿仲明带着一班人马投奔了登州巡抚孙元化。孙元化和徐光启是同学，都是明朝了不起的科学家，孙元化的才能主要体现在武器研究方面，什么炸药大炮之类都是他研究的项目，他不但精通物理和化学，而且还懂葡萄牙语。这样的人在当时肯定是稀有之物，属于专家型官员。

听说孔有德和耿仲明来投奔自己，满脑子全是武器弹药的孙元化欣然同意。孙元化是一个优秀的人，优秀意味着对人情世故中厚黑那一套了解得比较少。

孔有德和耿仲明这两人并不是什么好鸟，否则后来也不会投靠了清朝，还混到三藩级别。这两人典型属于有奶便是娘的类型，他们之所以服毛文龙是因为毛文龙好酒好肉地招待他们。招了这两个人，也是孙元化倒霉，碰上两员工给钱就开工，不给钱连老板都要扁。

当然，这两位既然跟着孙元化，也想好好过几天日子。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人还算听话，不过后来就出状况了。

皇太极围困大凌河的时候，朝廷要调兵救援。孙承宗让孙元化出兵，孙元化就把孔有德派去了。孔有德二话没说，就带兵去救援。然而，半路上发生了意外，说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到孔有德手上却变成了大事情。

军队走在半路上，几个兵油子想补充下营养，居然跑到老百姓家里抢了几只鸡。这种事在当时应该是家常便饭，可惜当地老百姓非常彪悍，发现这事后，也没哭着嚷着让你赔鸡，而是直接把当事人抓住，狠扁一顿。

这事传到孔有德耳朵里，他很上火，不就几只鸡吗？孔有德是什么人物，连皇太极都不敢欺负，当地老百姓这种做法无疑极大地挫伤了孔有德的自尊心。

盛怒之下，孔有德索性让部下放心地抢，大胆地抢，洗劫了河北的六个县。这件事的性质非常严重，简直比土匪做得更过分。孔有德敢这么做，不是活腻了，而是拿定主意造反。

抢完的财物权且当作造反的第一桶金。1632年正月，孔有德非但没有去救援祖大寿，反而带兵掉头回登州，打算端掉老板孙元化，以登州做大本营，开始造反大业。耿仲明在登州城内做内应，两人这么一反水，很快就拿下登州城，孙元化沦为俘虏。

毕竟是自己前任老板，孔有德也没为难孙元化，只是把他留为人质，想跟朝廷谈判。

崇祯当然不会跟孔有德谈，立即派遣大军镇压叛乱。孔有德知道事情闹大了，非常担心。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孔有德知道再也没有回头路，也算他有良心，觉得自己的前任老板孙元化在这件事情上非常无辜，竟然把他放走了。

孔有德应该说做的是好事，但没想到却害死了孙元化。孙元化是大明王朝的铁杆粉丝，脱身后立即向京城飞奔，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要闯。他回到京城，崇祯非但没有任何感动，反而把他逮捕，审问之后判了死刑，没多久就砍了头。

崇祯先是委派谢涟为登州巡抚，这谢涟也跟孙元化一样，是个知识分子。谢涟到莱州后，不但没有能够剿匪，反而被匪徒给围住了。孔有德将莱州城团团围住，攻城孔有德不是很内行。双方就此陷入僵局。

朝廷听说巡抚不但没有剿匪成功，反而被围，大为吃惊，又派出了一拨援兵。

孔有德急了，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城池，结果还是攻不下。强攻不行，只好智取了。孔有德让人给谢涟送去一封信，说是愿意投降，希望谢大人笑纳。这倒是奇事，围城一方居然向被围一方投降。稍稍有些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但谢涟居然相信了，理由是朝廷的援兵马上到了，孔有德害怕了，投降是明智的选择。

谢涟决定亲自去受降，为了显示诚意，他还让莱州的总兵跟自己一起出去迎接孔有德。莱州总兵是从底层摸爬滚打起来的，强烈建议谢涟不要相信孔有德，可惜谢涟一门心思“以德服人”，执意要出城受降。

接下来这一幕很多人可以猜到，谢涟出城后，孔有德热情地招呼他，最后直接把他绑架了。孔有德以谢涟为人质，企图让莱州城投降。

孔有德让谢涟在城下面喊话，谢涟的表现很让他失望，他对着城上高呼：“一定要坚守，等待援兵到来！”

按一般的剧情发展，城楼下的贼兵肯定大怒，拿谢涟开刀。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贼兵并没有杀掉谢涟。倒是城楼上的总兵很听话，将炮口对准贼兵密集区，狂轰滥炸。果然下面死伤一大片，贼兵的密集区就是谢涟所在的地方，谢涟就此为国捐躯。

谢涟死后，孔有德觉得还是趁早脚底抹油，不要打莱州的主意了。

山东半岛基本上控制在孔有德的手上，他手中有四五万兵力，一般的明朝军队还干不过他。崇祯为防事态扩大，派了两个猛人过来，一个是朱大典，一个是吴三桂。

朱大典是新任山东巡抚，虽然也是个知识分子，但是饱读兵书，很有军事才能，性格也非常坚定，跟袁崇焕有点儿像。吴三桂是先锋，率领关宁铁骑，在莱州附近和孔有德遭遇，大败孔有德，追赶孔有德几十里，这一战孔有德损失近万人。

孔有德狼狈地退回登州城。

但接下来朱大典傻眼了，能不能攻下登州城，他毫无把握，因为登州城的城墙实在太厚了。

登州一直是明朝的军事基地，往关外各个要塞送粮食都是从登州出发，所以登州城修得非常坚固。而且，自从一根筋科研专家孙元化来到这里，将城墙修得更加坚固。孙元化主要是从事大炮研究，他是根据城墙抗击大炮的击打能力来修的。

所以，朱大典很怀疑自己能攻下登州城。

不过，幸好孔有德虽然狡猾，毕竟不是智力型人物，他不知道孙元化在登州城的防御上下了多大的功夫。加上手下的怂恿，孔有德决定充一回好汉，出城迎敌。出城作战的是孔有德的部将李九成，李九成是一个猛将，不过在关宁铁骑面前，他还是输得毫无悬念。不仅输了，连自己的命都丢了。

看到李九成死得那么惨，孔有德只有一个念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幸好，孙元化在登州城的时候把城池扩建到海边，孙元化原本是方便自己逃跑的。没想到，竟然方便了叛军逃跑，天意弄人。

孔有德实在很像一个混混头子，不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他逃跑还不是带着全军逃跑，而是带着一小撮亲信偷偷逃跑，当然带上这些日子抢过来的东西，以备东山再起之需。孔有德的想法很缺德，他连夜逃跑，以为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实在是错了。当兵的都不是傻子，主帅一逃跑，大家很快就知道，顿时城内乱作一团，大家抢着跑。

没想到逃到海上的时候，竟然也能遇到埋伏。孔有德得意扬扬之时，万没有料到黄龙会出现在前方。黄龙是谁，以前皮岛的总兵，也就是孔有德的顶头上司。当年孔有德投靠孙元化就是因为黄龙这个人手下很难混，可见黄龙的厉害。

这场海战俨然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屠杀，毛文龙之子毛承祿就是在

这场战争中被抓住的，而孔有德呢，常年在外混，练就了一流的逃命水平，总算捡回一条命。

毛承祿被送到北京后，享受了跟袁崇焕一样的待遇。

孔有德痛定思痛，现在整个大明帝国都在通缉自己，抓到了肯定是杀千刀；要想保住这条命，睡个安稳觉，只有推翻大明了，但凭自己的能力是完全不可能的。放眼四顾，在这世界最有可能推翻大明的还是皇太极，当时李自成还没有出头。

听说孔有德投降，皇太极非常欢迎，不仅欢迎，还用满洲最高的礼节接待他。皇太极让孔有德和耿仲明享受到贝勒的待遇，丧家犬孔有德自然感恩戴德，要为皇太极做点儿实事。孔有德为皇太极挖过来一个人才——尚可喜。

第六章 消灭林丹汗

有道是“攘外必先安内”，联姻也是安内的一部分。虽然皇太极首先给代善娶老婆，但这并不代表他跟代善关系友好，只是出于一种尊敬长辈的礼貌。皇太极一如既往地看代善不顺眼，而且是越看越不顺眼，一个人权力欲望膨胀之时总是看不惯那些分享他权力的人，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终于啃掉硬骨头

林丹是努尔哈赤的死对头，努尔哈赤解决不了的问题遗留给了皇太极。

天聪元年（1627年），林丹汗对蒙古的几个部落发动进攻，准备搞垄断经营。这些部落联合起来，组织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双方在今天的呼和浩特市大打出手，两败俱伤，而且伤得很重。

林丹在当时的漠南是个一号人物，没几个人敢得罪他。这些小部落纷纷寻求皇太极的庇护，皇太极欣然同意，于是该集团组成了以皇太极为盟主的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林丹。

第二年二月，皇太极率领一支精锐的骑兵在大凌河上游击败察哈尔部落的一个分支多罗特部，俘获一万一千多人。九月六日，皇太极再次以盟主的身份，调集各个部落的兵马，亲自去征讨察哈尔部，一直把林丹追到兴安岭，俘获大量的人马。

像林丹这样的大财主，皇太极这两刀只能算是给他放放血，而林丹就是血气足。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后患，只能割下他的脑袋，放血是不管用的。

天聪六年（1632年）四月，皇太极决定玩点儿大的，一举拿下林丹，统一蒙古。出征之前，皇太极对各个蒙古部落训话：“林丹这老狐狸很不厚道，现在我亲自率大军去征讨。为了保证计划顺利实施，我们必须军纪严明，你们要把我的命令传达给你们的将士，大军一旦起程，一切由军法说了算……”

四月二十二日，大军来到兴安岭，围着兴安岭绕了一圈，连林丹的影子都没看到。后来皇太极才知道，原来军中有几个亲察哈尔的蒙

古奸细，早在林丹出征前就偷偷骑着快马跑出去报了信。林丹听到皇太极大军来犯，带着整个部落的人往青海逃去。

这次出征虽然没能抓住林丹，但收获还是不少。

五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将大军分成三路。左翼方面，阿济格率领一万蒙古军，扫荡大同、宣府这一带的察哈尔余部；右翼方面，济尔哈朗和岳托率军两万，向黄河一带挺进；皇太极自己率领大军垫后，换句话说，哪路军队发现了林丹的大部队，就往哪一路冲。

结果右翼发现了林丹的大部队，其时，林丹还在半路上逃，正到达黄河边上，听说后面追兵来了，马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抢渡黄河。

皇太极突然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停止追击。皇太极满意地对大家说：“敌人已经逃离老巢，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到达，让林丹纠结去吧！”

正史夸大了皇太极这次出征成绩，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次出征并没有捞到多少实际的好处，但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说还是有很大价值的，让不可一世的林丹踏上了逃亡的路程，这对他的军队士气打击是非常大的。

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开始了第三次西征，行军的中途得知林丹在青海出痘病死。林丹一死，察哈尔部面临散架的危险，他的长子额哲下落不明。皇太极这下高兴了，一方面着手收拾林丹的余部，一方面派遣多尔袞等人查找额哲的下落。

多尔袞踏遍青海许多地方，偏偏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1635年三月末，正在多尔袞苦恼的时候，忽然林丹的大妃带着一千五百户众前来投降。多尔袞惊喜万分，谁知额哲不在其中，惊喜打了八折。

可是，随后多尔袞从大妃的口中得知了额哲的下落，惊喜顿时又翻了一番。这个大妃史称囊囊太后，又叫囊囊大福晋，是林丹八大妃之首，归顺清朝后改嫁皇太极，一直活到康熙十三年（1674年）才死。

有了地址，就可以按图索骥了。五月二十七日，多尔袞连夜造船，渡过黄河，抵达了额哲的住地，将林丹的妃子苏泰太后和她的儿子额哲一同抓住。这个苏泰太后后来改嫁为舒尔哈齐的第六子济尔哈朗。多尔袞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他不光找到了察哈尔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还找到了另一件宝物：传国玉玺。

多尔袞不知从哪儿得来的小道消息，听说传国玉玺在苏泰太后的手中，便向她伸手。多尔袞伸手，很少有人能拒绝，何况是阶下囚苏泰太后。多尔袞拿到传国玉玺后，非常兴奋，让人急报皇太极，写着：“我偶然拿到了传国玉玺，这玉玺以前就藏在元朝大内，后来被元顺帝带到沙漠里，自从应昌沦陷后，玉玺就失去了下落。两百多年后，有牧羊人在一个山冈上看见一只山羊，三天不吃草，用蹄子刨地（莫非这羊也想当皇帝）。牧羊人发现，觉得奇怪，便掘地，发现了传国玉玺。最后玉玺被元朝后裔博硕克图拿到，林丹灭了博硕克图后，玉玺又落入林丹的手中。”最后，多尔袞不忘拍马：“皇上你洪福齐天，这是老天赐给你玉玺，将来统一大业就指望皇上了。”

应该说，对待投降者皇太极是非常优待的，除了封额哲为亲王外，皇太极还将次女嫁给他。额哲的归附标志着曾经强大的察哈尔部终于土崩瓦解，皇太极通过自己的权柄和智慧统一了蒙古。

联姻与整人

对于额哲的归降，皇太极是非常重视的。在皇太极阵营里，跟着他打天下的往往还不如中途投降他的。

之后的场面是大家习惯的，皇太极热情又礼貌地接待了额哲等一行人。战败的一方对皇太极非常臣服，而皇太极呢，也对战败的一方非常尊敬，大家在友好又和谐的气氛中开始了宴会。林丹的老婆和女儿中不乏美女，宴会的过程中，皇太极等人酒不醉人人自醉。

皇太极一边喝酒，一边联想到联姻。联姻是个政治策略，既可以稳定察哈尔部的人心，又可以往自己的后宫里引进几个美女。皇太极这招一箭双雕。

皇太极首先给自己比较看不惯的人联姻，也就是大贝勒代善，自从打掉阿敏和莽古尔泰后，代善就是硕果仅存的老资格领导了。代善娶了林丹的妹妹泰松格格。接下来皇太极又把自己的第二女嫁给额哲，那意思无非是，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女婿了，别调皮捣蛋，老想着你爸的那些事儿，过去的都过去了。第三桩婚姻是将林丹的一个妃子伯奇嫁给自己的长子豪格。第四桩婚姻是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娶了林丹的妃子俄尔哲图。第五桩婚姻才轮到皇太极自己，皇太极娶了林丹的大老婆囊囊太后。第六桩婚姻是济尔哈朗娶了苏泰太后。

史书上常常记载这些婚姻是你情我愿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充分说明了没有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少数民族部落思想之开放，或者用个

更特别的词：纯朴。

有道是“攘外必先安内”，联姻也是安内的一部分。虽然皇太极首先给代善娶老婆，但这并不代表他跟代善关系友好，只是出于一种尊敬长辈的礼貌。皇太极一如既往地看代善不顺眼，而且是越看越不顺眼，一个人权力欲望膨胀之时总是看不惯那些分享他权力的人，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代善是一个宽容仁厚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人，汗位是轮不到皇太极的。可以说，没有代善的支持，皇太极是很难轻松地登上汗位的。史书记载说代善仗着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些自以为是——这些记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就算代善不是这样的人，皇太极赶他下去也是迟早的事，如果不是杀了他的话。

史书记载代善有四件事做得让皇太极很不高兴。

第一件事是多尔衮大军凯旋，皇太极打算亲自出沈阳迎接，照例皇太极要摆个姿态询问大家是不是合适之类的。代善说：“当年父皇在时，军队凯旋时，也是出门迎接。现在这么做，确实是符合先例的。”话虽如此，但是欢迎凯旋大军时，代善却提前三天单独行动，换句话说比皇太极早三天去迎接多尔衮。这难免让皇太极很不愉快，给不给面子是次要的，让人怀疑代善是不是跟多尔衮有什么阴谋。

第二件事是皇太极长子豪格娶了林丹的妃子伯奇，这件事激怒了皇太极的姐姐哈达公主。哈达公主为啥这么上火，因为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豪格，所以她愤怒地质问皇太极：“我的女儿还健在，你就让豪格另娶妻子，未免太过分了吧！”看在对方是自己姐姐的分上，皇太极没有发飙。不过，代善听说了这事，仿佛为了火上浇油似的，故意大张旗鼓，宴请哈达公主，先是派自己的小老婆去请，后来又亲自上门去请。请来哈达公主后，代善置办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宴席，席间说了什么话就不知道了，但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问题的关键是，代善之前和哈达公主并不友好，现在听说她和皇太极有矛盾，突然向她示好……

第三件事据说是因为一个女人引起的，这个女人是苏泰太后，估计她属于风韵犹存、风情万种的那种，所以身为太后，还是引起了代善的色心。苏泰太后的姐姐是济尔哈朗的老婆，老婆亡故后，济尔哈朗看到苏泰太后便一见钟情，仿佛看见了亡妻一样，希望皇太极能够批准把苏泰太后给自己。代善听说后，希望皇太极把苏泰太后给自己。渐渐地，两人擦出了不少矛盾和口舌。

第四件事也是关于女人的。囊囊太后是林丹的大妃，估计年纪大了，年老色衰，皇太极本来是想让代善娶囊囊的，因为囊囊身份最为

尊贵，而代善在后金国也是长者。代善竟公然拒绝了皇太极的要求，拒绝的理由是囊囊没钱，估计这只是借口，说到底还是嫌囊囊人老珠黄了。皇太极很生气，感觉很没面子，结果自己娶了囊囊。娶了囊囊后，接下来就是动手整代善了。

一切筹谋好了之后，终于在九月二十五日这天皇太极公开发难。大殿之上，皇太极公开宣读早已准备好的控诉言辞：“自古以来，有通过个人能力当上皇帝的，有通过继承权年幼当上皇帝的，有被众人拥戴上皇帝的，不管通过哪种方式，都是皇帝。既然是皇帝，就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怎么能够因为他们通过何种方式当上皇帝而产生轻重意识呢？现在我们正红旗的这些贝勒（代善一族），放肆的地方比较多……”

在政治斗争中，罪名向来是不重要的，如果我们死扣罪名，就完全误解了政治。倒是皇太极反问代善的一句话最能说明问题：“为啥我喜欢的你就一定厌恶？为啥我厌恶的你就偏偏要喜欢？你这不是诚心跟我作对、跟国家作对吗？”

在整人之前，皇太极又作了一次精彩的秀：“你们这么违逆我，我只好闭门不出了。你们干脆再推举一个强有力的人当大汗吧！我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也知足了。”

如果大家真的推举其他人，皇太极如果不跳出来一个个整死才怪。

众位贝勒和大臣听见皇太极这么说，纷纷大赞他英明，代善确实有问题。既然有问题，下一步就是给他制造问题，罗织罪名了。

最后，罗列了四大罪，可见代善的污点还是比较少的。

第一罪：征讨察哈尔时，代善三次请求独自回兵。大家不忘加了一句：“太祖在时，大贝勒敢这么三次请还吗？”一言蔽之，不尊重皇太极。

第二罪：代善的部队平常经常出外渔猎，导致马匹疲劳瘦弱，影响了战斗力。其实，出外渔猎都是经皇太极同意的，翻出这些旧账无非是在说：整的就是你。

第三罪：欢迎多尔衮凯旋时，代善单独行动，完全不把皇太极放在眼里。

第四罪：哈达公主的老公济农是个蒙古贵族，济农曾经在皇太极的领地哈达叶赫山上围猎。皇太极为这事很生气，代善附和说：“济农这事做得不对，怎么能够在皇上的地盘打猎。”后来皇太极公开讨

论济农的过错时，代善却矢口否认济农曾在哈达叶赫山上打猎。也就是说，包庇罪人，反复无常。

皇太极当然不至于处死代善，甚至都不敢罢免他的职位，只是想打击一下代善的气焰，收回部分权力，让代善学会如何和新领导共处，别老惦记着努尔哈赤时代，现在是皇太极时代了。

后来又有人揭发死去多年的莽古尔泰谋反一事，借着这个机会皇太极又打击了一批异己分子，至此皇太极的权力达到顶峰，所以大臣们纷纷进言让他登基称帝，和明朝的崇祯分庭抗礼。

第七章 皇太极的大清

改元称帝圆满结束后，皇太极效仿中原新皇帝登基，大赦天下，同时任命了一批高官。孔有德被封恭顺王，耿仲明被封怀顺王，尚可喜被封智顺王，俗称三顺王。

内部问题处理得差不多，蒙古也搞定了，皇太极感觉浑身舒坦，以前是强敌环伺，现在唯一强大的敌人就是明朝了。

天聪九年（1635年），时任都元帅的孔有德一直尸位素餐，终于做了一件实事，他向皇太极进言：“以卑职看来，历史上大凡有天命的人，必定会得到天命之符。昔日，周文王听到凤凰在岐山上鸣叫，现在皇上得到传国玉玺，这是非常吉利的征兆。传国玉玺历经两千年，传到陛下的手中，那真是陛下洪福齐天……”

孔有德拍马屁的功夫绝对是一流的。孔有德一拍，大家跟着拍。这些马屁全都拍到点子上了，皇太极最吃天命帝王这套。

为了龙登九五之尊，皇太极含蓄地推辞了大臣的进言。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发现皇太极的表现很奇怪，还当着朝鲜使者的面拿出传国玉玺，祭奠太祖时也拿出玉玺说事。满族的这些大臣有点儿搞不明白了，先前你又拒绝了称尊，现在为何反复拿玉玺说事。还是汉族的一些官员对形势比较了然，中国古代，但凡涉及称帝，新君们都会谦让再三，不把这个秀作足，是不会断然登基的。

大臣们再次进言，皇太极还是拒绝了。大臣们心想，皇太极老兄肯定是想把戏演足，于是接着进言。一遍两遍三遍拒绝都可以理解，到了四五次就让人怀疑了，太极老兄也许真不想当皇帝呢！

还是代善的第三个儿子萨哈廉聪明，他正在病中，皇太极探视他之后，他就对大臣们说：“只有诸位贝勒出面请求，他才会称尊。”

在萨哈廉的强烈建议下，诸位贝勒纷纷上书，请求皇太极称尊。皇太极回答：“善。”

所谓善并不代表马上同意，而是让我先考虑考虑。所谓先考虑并不是真的要考虑，而是先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皇太极深感权力高层人心不齐，所以让萨哈廉组织一次高层代表会议，会议中主要讨论思想和政治，在给官员们上够教育课程后，在以范文程为代表的大臣进言下，皇太极终于决定“顺应天命”。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正式接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改国号为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大清这个国号，皇太极是怎么想出来的，现在的历史学家们也说不出来。关于大清，传说努尔哈赤曾经被人追杀，一匹大青马为了救他脱离虎口累死了，努尔哈赤当时对着马的尸首说：“以后我建立国家，就叫大清。”

这个传说很显然是假的，因为努尔哈赤生前并没有把国号称为大清，只是称为大金。但很有可能这个故事是皇太极编造出来的，考虑到皇太极是一个擅长搞舆论和策划的人才，这不是不可能的。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大清既非来自汉语，也非来自满语，而是借用了蒙古语，大清国的意思是“善战之国”。

更离奇的是皇太极还创造出“满洲”这个词语，在皇太极之前，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这个词语的。

登极仪式开始了，皇太极在天坛前接受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者的朝拜，这些大臣纷纷行三跪九叩之礼。接下来是献宝了，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宝物献给宽温仁圣皇帝。

就在大家都对皇太极顶礼膜拜之时，忽然有两个不识时务的朝鲜使者拒绝行跪拜礼。这是很不和谐的，现场一度出现了骚动，许多人愤怒地表示，赶快把这两个家伙抓起来砍掉，估计这些人是为了讨好皇帝陛下。

每当大家情绪很激动的时候，皇太极总是显得很冷静，他非常淡定地说：“朝鲜使者罗德宪、李廓无礼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这是朝鲜国王对我们不满的表示，他想激怒朕，首先挑起事端，杀了他的使臣，然后好陷朕于不义。不过，他太小看朕了，朕从不屑于逞一时之气，朕不是一个琐碎的人。就算是两国交战，也没有杀来使的道理，所以，甭理这两人。”

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将沈阳改名为盛京，并在此扩建宫殿。

第八章 明朝的失败

这一仗，如果洪承畴不出奇招，是必输无疑的。洪承畴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洪承畴有什么高招呢？

扫荡京师周边

明朝是一个大胖子，皇太极谨记父亲生前的教诲，砍大树要从枝节慢慢砍起，吃胖子要一块一块地割。

在对明朝用兵之前，皇太极就定下了军事思想：“避实击虚，留干伐枝。”这个思想的意思是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报酬。

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召集出征的将领们开会，面授机宜：“你们这些即将出征的贝勒大臣，凡大军行进到一个地方，有什么决策的话要大家商议后再行动，切记不要轻举妄动。如果遇到城池，想进攻的话，先判断可不可以攻下，如果可以的话就攻，如果不可以就放弃。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当时就敞开胸怀讲，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此外，出征要善始善终，从开始到结束都要严格遵守军纪。”

大军出征一月后，皇太极估摸着阿济格已经抵达了长城脚下，便又派出另一支军队进攻山海关。为什么又派出一支军队，皇太极解释说：“阿济格统兵征明朝，马上就要进长城以内了。为了方便他从容进去，我们需要再派遣一支大军，佯装攻打山海关，明军必然会大军支援山海关。”

这招声东击西着实厉害。阿济格率领十万将士，进入长城后第八天就取得了丰富的战果，连败明军七次，俘获万余人。随后，清军经延庆进入居庸关，直逼北京。七月七日，清军来到昌平城下，城内有人做内应，昌平城立即陷落，明朝总兵巢丕昌投降。最后，清军到达北京的西直门。

崇祯很是惊慌，让文武大臣守住各门。阿济格看到这架势，谨遵皇太极的指使，避实就虚，砍伐枝干，没有选择攻打京城，而是围绕着京城周围伐木。对于京师周边的城池，难攻的立即放弃，容易进攻的马上进攻。阿济格没有陷在一城一地中，也没有丝毫的恋战情绪，抢到了东西才是王道。

阿济格带领人马迅速离开沙河和清河，七月十五日，攻克宝坻，杀死宝坻知县赵国鼎。二十一日，攻占定兴，攻克房山，抢劫涿州、攻下固安、进入文安、拿下永清，总之扫荡了北京的西南，抢夺了大量的人畜；随后，阿济格又转攻香河，进入北京东北的顺义，到达怀柔，洗劫西和。八月十九日，清军在密云和平谷一带屯兵。一个多月时间里，清军围绕着北京城打砸抢烧，战果辉煌，打了五十六仗胜了五十六仗，总共俘获人畜超过十八万。

当阿济格凯旋时，皇太极出门十里迎接：“兄弟，辛苦了，辛苦了……”

据说，阿济格回来时还瘦了不少，皇太极看了后，感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只差没说：“你办事，我放心。”

议和的失败

崇祯十一年（1638年），就在洪承畴和孙传庭把李自成打得只剩十八人的时候，张献忠也放乖了。西北的民变表面上是平息了，崇祯终于露出了多年来难得一见的笑容。崇祯原以为苦尽甘来，大明的天下还是有希望的。就在他期望再用十年的时间振兴明朝时，灾难再次降临。这一年，皇太极再次调动大军进攻明朝，清军分为两路，一路是由多尔袞率领的左翼军，一路是由代善之子岳托率领的右翼军。这两人都很猛，越过长城，对明军发动了猛攻。

当然，每次出征皇太极总要发表长篇演讲，这是他的部下必须忍受的。皇太极说：“征伐这种事向来不是朕所喜欢的，朕最大的心愿就是天下太平，可惜明朝不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才不得不去征讨他。如果遇到不抵抗我军的人，你们千万不要屠杀；即使不想跟我们回来的明军和汉民，只要不抵抗，也不要杀害他们。身为主帅，一定要以国家大局为重，千万不要为了贪一己之功而造成不必要的死伤……”

领导就是领导，虽然唠叨，但说出的话句句在理，皇太极不愧是个一流的领导。两路大军派出去后，皇太极决定亲自率领第三路大军去山海关一带，牵制明军。在皇太极亲自率领的大军里，三顺王就是先锋，这三个吃干饭的汉奸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那就是炮轰自己的国家，也许可以换种不那么触目惊心的说法，炮轰前任领导。

皇太极这人大脑确实可以，他知道关宁防线很难突破，所以让清军兜个大圈子，跑到密云一带。

密云的守军非常少，因为大家一致认为清军不可能从这里进攻。为啥呢？因为这里地势特别不好，到处是山，而且还是陡峭险峻的山。从这里进攻，还没到达密云，估计也会累得半死。明朝人比较懒惰，比较油，但是他们自己不会干的事，不代表皇太极不会干。众所周知，皇太极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领导，为了入关，为了治国，几乎是殚精竭虑。这世上还有什么他不会做的事，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清军大兵压境的时候，蓟辽总督吴阿衡还在喝酒，他睁着一双醉眼看着城下黑压压密密麻麻的清兵，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都是敌人。可能是喝高了，吴总督一时之间非常兴奋，人来得越多越好，来多少死多少。喝酒驾车容易出事，喝酒打仗那就几乎百分之百会出事。

吴总督居然仗着酒胆，带着几千人打开城门就向清军杀去。结果很现实，没有出现任何奇迹，吴总督毕竟不是郭靖郭大侠，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来去自如，事实上吴总督很快就倒下马，为国捐躯了。

密云城破了以后，京城岌岌可危，清军只需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京城脚下了。朝中照例是一片恐慌。只有崇祯比较淡定，崇祯这次表现似乎不太一样。其实也没什么玄妙的，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一切了。

半年前，就有人告诉他，今天这一切会发生。告诉他的那个人不是什么明军间谍，而是皇太极本人。皇太极为什么要告诉崇祯我想揍你呢？是皇太极受了什么侮辱，还是又被人忽悠了？

原来，半年前，内乱还没有平息，杨嗣昌给崇祯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东汉初年，主人公是光武帝刘秀。刘秀干了吗呢？刘秀跟匈奴议和了。杨嗣昌的故事虽然只讲到这里，那意思很明白，皇上你去跟清军议和吧！有人说，这不是卖国吗？事实上，当时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是不是卖国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皇太极整编了蒙古八旗军和汉人八旗军后，清军的军力接近二十万。明朝的军队人数当时撑死了也就八十万，在这八十万中真正可以打仗的只有四分之一，而且这四分之一的军队战斗力也比不上清军。要打是打不过他们的，这是议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打不过并不意味着也守不住，仗着地形和城池的优势，守应该还是可以守得住的。这是主战派的重要理由。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啊！杨嗣昌建议崇祯议和的目的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换句话说，议和只是缓兵之计。

杨嗣昌和崇祯都是明白人，且饱读诗书，刘秀这个故事的下文虽然没说，但彼此心知肚明。刘秀跟匈奴议和后，先解决了国内问题，国内问题一解决，就开始对匈奴穷追猛打，赶得他们满沙漠里逃窜。

当时，知道议和的只有三个人：崇祯、杨嗣昌、太监高起潜。议和这事涉及脸面问题，不能让更多人知道。崇祯是个非常要强的皇帝，真让他向敌人低头，是不太可能办到的，他最后自杀就是因为不忍低头受辱。

杨嗣昌找了一个算命的，让他到皇太极那儿秘密传达崇祯的意思，说是愿意和你议和。皇太极以仁君自居，别人上门索要和平，他总不能不给吧！事实上，皇太极的态度相当好，表示和谈是个好事情，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皇太极还把军队撤回基地。

和谈这事，迟早得让大臣们知道，否则怎么谈都没用。但是这个建议一提出来，就招致朝野的一片反对，朝堂之上，哗啦啦的全是骂人的口水声。这些当官的打仗不行，骂人的本事绝对是一流的，人总得会一两行。

在一个不应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硬骨头：黄道周。黄道周外号黄圣人，明朝灭亡后依然和清军死战到底。历史学家评价黄道周守正不能达变，敢于犯言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事无补。这个评价应该是公正的。

听说议和的事，黄道周立刻跳了出来，在皇帝面前和杨嗣昌展开辩论。黄道周知识功底是非常扎实的，学的刚好是理学，就辩论才能看，杨嗣昌跟他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一轮犀利言论下来，杨嗣昌哑口无言，因为他说过黄道周。

崇祯在一旁也帮不上杨嗣昌什么忙，只好出口恶气，将黄道周连降六级，下放到地方去。这口恶气虽然暂时出了，但和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黄道周都说了议和是天理难容的行为，是违背人伦的蠢举，而且说得有理有据。崇祯再刚愎自用，也不愿戴上天理难容的帽子。

前面讲到皇太极发兵之前，屡次说自己爱好和平，是明朝对不起自己，诸如此类。其实，皇太极也不完全是作秀。他好心好意地等待明朝议和，等了几个月，见明朝毫无动静，他再次感觉自己被忽悠了。一个被忽悠的人是愤怒的，一个被忽悠的皇帝更是可怕的，作为一国之主，被人忽悠不光是利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面子的损失和权威感的丧失。

皇太极默念：忽悠我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

崇祯：一个最能折腾的皇帝

出来忽悠，迟早都是要还的。

为了回报崇祯的“诚意”，皇太极派出自己最豪华的阵容：多尔衮、阿济格、多铎、岳托等人，全部都来了。

京城再度面临巨大的危险。紧急之下，崇祯只好把全国各地能打仗的人都调回京城。首先是祖大寿，这人打仗很猛，其次还有剿匪高手孙传庭等。

会打仗的人往往不容易驯服，像祖大寿、孙传庭这些人能力很强，但是指挥起来特别费劲儿。就说这祖大寿，能够指挥得动他的人实在太少，连崇祯都指挥不动，只有袁崇焕、孙承宗这样的人才指挥得了他。袁崇焕死后，祖大寿对国家兴亡一直处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

为了指挥这些桀骜不驯的战将，崇祯必须挑选一个更猛更强的人才行。幸好泱泱大国也不是没人，袁崇焕死后，还有一个卢象升。亡国时期出现的英雄人物，基本都是悲剧角色，像秦末的章邯、明末的袁崇焕等人，卢象升也是个悲剧。

听说皇帝委以重任，卢象升急急忙忙赶到京城。卢象升也是一个性格坚毅刚强的人，崇祯见了，开门见山地问：“现在怎么办？”卢象升果决地说：“主战！”

当时，崇祯身边的杨嗣昌和高起潜脸色立刻刷白，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崇祯一见气氛不对，马上打圆场：“那个和谈的事，都是谣言，别信那些，我也是主战的。”

卢象升说：“那就好，我立刻上任。”

第二天，他就收到崇祯送来的战马和武器，卢象升是个刚直的人，也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的人。他决定以死报国。

几天后，清军已经到达通州。此时，卢象升只有三万人马，但他决定干，而且干大的。当然，他虽然性情单纯，但也是一个熟读兵法的人，很有军事才能。他很清楚，如果和清军正面交手，自己这点儿人马是拿过来送死的。所以，他决定，夜间偷袭。

这是一个夜晚，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卢象升面对自己的士兵，下了一道狠命令：“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当斩！”

事实证明，这次偷袭非常成功，清军没有任何提防，因为他们想不到明军居然敢偷袭他们，他们已经习惯了明军抱头龟缩的样子。清军伤亡很惨重，就在卢象升带着人马砍杀清军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重大的问题：没有后军，无法扩大战果。

原来，高起潜秘密调走了他的后军。无奈之下，卢象升只好下令撤退。

卢象升找到杨嗣昌，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这样搞是行不通的，我现在负责防卫京城，你们如果要议和，我的下场就跟袁崇焕一样。”

杨嗣昌是个城府非常深的人，他也有苦衷。真正为难卢象升的其实还是崇祯，崇祯这人脾气暴躁，急功近利，虽然也善于做出所谓的成熟政治家风范，但一到节骨眼就掉链子。他发现卢象升上任以后，并没能遏制清军的气焰。所以，他又准备换人了，你说新督师还没上任几天，就准备换人，这皇帝也太有意思了。国家不亡也会被他折腾完。

就在崇祯打算换人的时候，一个叫刘宇亮的人站了出来。刘宇亮当时是内阁首辅，宰相级别的人物，看到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也是可以理解的。

崇祯这傻帽儿还当真了，很高兴地看着刘宇亮，刚夸奖完他，刘宇亮立即改口：“我说我去阅兵啊！打仗这事当然有专门的人负责……”

崇祯愤怒了，他最讨厌别人忽悠自己。其实，首辅大人倒也没打算忽悠皇帝，只是一时激动报国心切，忽视了自己的专长。

崇祯是牛脾气，你忽悠我，我就舍着大明完蛋也要让你做督师。首辅大人头顶冒汗，这时杨嗣昌站出来了，他说：“皇上还是不要为难首辅大人了，一把年纪，挺不容易的，有这个心就够了。现在能够担此大任的只有卢象升。”

没办法，三天后，崇祯不得不重新起用卢象升。

可是，卢象升的表现却很让崇祯失望，为啥呢？因为卢象升迟迟不出兵，任由清军在北京附近烧杀抢掠。卢象升为啥不出兵呢？难道没兵吗？不，有兵，五千人。看到这里，非常纳闷了，高起潜把大部队调走，崇祯干吗不管管他，还是这就是崇祯的意思？在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防范自己的将领。这样的领导和皇太极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松山之战

皇太极这人是不好忽悠的。

多尔袞的左翼军在幽蓟千里之内如入无人之境，将这片土地蹂躏得不成样子。随后又渡河，攻破山东济南到天津之间的城堡，攻克城堡有四十多座，十七次打败明军，俘获人口近二十六万。

岳托的右翼军表现也很出色，攻克城堡九座，投降城堡两座，击败敌人十六次，杀明军总督两名，俘获人口二十万。

这些战役中值得一提的是高阳城的陷落。

高阳城其实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县城，当时位处直隶，也就是现在的河北。这个小县城从地理位置来说很不重要，所以没多少兵，也没什么钱。但是它的陷落引起了明清高层的极大关注。

只因为这县城里有一个退休的老干部：孙承宗。

孙承宗可以说是培养军事人才的一代宗师，连袁崇焕这样的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可以说孙承宗为大明王朝奉献了自己一生的智慧和精力，可惜还是没有能挽回明帝国的大厦，这是一种悲哀。临到死，他还要为国贡献最后一份力量，虽然是绵薄的。

当清军打到高阳城的时候，忽然停滞不前，因为清军的高层已经知道这里住着一个德高望重的老者，这个老者不光德高，能力也是一流的。对于这样的人，皇太极是敬重的。

皇太极派出使者做孙承宗的思想工作，这样既表示给孙承宗面子，又能体现自己仁君的形象。事实上，皇太极是不抱什么希望的，毕竟这么多年的老对手，什么脾气都摸清楚了。

孙承宗是不可能投降的，虽然他明知守不住，还是带着全家老少一起走上城楼坚守。他这种做法与其说是要守城，倒不如说是出于职业习惯和道德情操。孙承宗的精神感动了县城里的老百姓，大家没有一人逃亡，跟着孙承宗一起迎敌。

结果没有悬念，高阳失守，孙承宗被俘。

对于被俘的孙承宗，清军给予了最高的待遇，希望他能弃明投清。口舌浪费得太多，可惜孙承宗坚如磐石。

依照常规，对于这种不肯合作的人最好的惩罚就是推出去砍了，以儆效尤。但是清军没有这样做，这个老头子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最好让他自尽。

孙承宗坦然地接受了，向紫禁城叩头，然后从容自尽。

孙承宗之死的信息传来，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卢象升是悲痛中的最悲痛者，他从孙承宗之死看出了自己未来的命运。

卢象升看着身后的五千士兵，那眼神是凄厉的，也是惨烈的。是该壮烈殉国的时候了！卢象升穿着孝服，带领五千人冲向清军主力。双方从上午打到下午，明军士气如虹，清军死伤惨重。卢象升的部队也被杀得差不多了，卢象升单枪匹马挥舞着大刀砍死了几十名清军，最终负伤力竭而死。

在关内，皇太极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关外的防线就像是用金刚石打造的，纹丝不动。辽西走廊上，有四个坚固的城池：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个城池中又以锦州城为核心，其他三个城相当于卫星城。

为了拿下这四座城池，皇太极决定围困锦州。

说实话，对于关外的这些城池，皇太极是有心理阴影的。因为他在关宁防线上吃的苦头实在是太多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连皇太极也不例外。

袁崇焕真是太牛了，虽然死去多年，但关宁防线依旧很猛，对皇太极有很强的威慑力。皇太极派兵攻了好几次，但都没有什么结果。皇太极决定动用所有的兵力攻城，并且上百门大炮对着锦州狂轰。

祖大寿站在城头，脸色冷峻，锦州城纹丝不动。皇太极快崩溃了，只好停下攻击，继续攻城。

被围三个月后，祖大寿向明廷发出求援书，不过祖大寿的求援书写得非常有个性的：“敌军把锦州团团包围，我们援兵来了之后，千万不要轻易冒进，不要担心我，我还撑得住，半年绝对没问题。”

崇祯收到祖大寿的求援信，立即召开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去救援，那么派谁去呢？

这时，卢象升和杨嗣昌都英勇牺牲了，剩下的人才中唯一靠谱的就是洪承畴了。

洪承畴是一个比较猛的人，打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人是说得着的。崇祯十三年（1640年）六月十一日，洪承畴带着四万步兵，奔赴杏山城，在杏山城城外驻扎。多尔袞率军前来阻拦，双方发生激战，多尔袞虽然没有打退洪承畴，但是也让洪承畴没法前进。

明朝先后派出五拨援兵，不但没有解锦州之围，反而损兵折将。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指挥八大总兵，

十三万兵马，再次解救锦州之围。

在锦州城里有一部分是蒙古的守军，皇太极决定诱降这支蒙古部队。蒙古军本来就是雇佣军，谁给的钱多就跟谁。就在蒙古军队偷偷出城的时候，祖大寿突然带兵杀了出来，和准备出逃的蒙古兵在城门口激战起来。清军反应也很快，听到激战声，第一时间赶过来营救，明军不敌，败入城内。

清军趁这个机会突破，占领了锦州外城。原本帮助明朝的蒙古贝勒诺木齐率众归降，皇太极给予了归降者极好的待遇。

突破锦州外城后，皇太极将锦州城团团围住。明朝多次派援军解救锦州，清军玩的是围点打援，来多少打多少。

洪承畴带着明朝十三万精兵来了之后，就在和清军不远的地方驻扎。每天按时吃饭睡觉，就是不跟清军开打。皇太极是个非常保守的人，看到洪承畴这次率领大军，那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也不打。

洪承畴不打的逻辑非常简单，清军的战斗力很强，如果跟他们硬碰硬，估计很难讨到好处。双方就这么僵持着，对峙了一年。

到了六月底，洪承畴突然率领大军偷袭多尔袞的那支清军。相安无事了一年，多尔袞完全没料到洪承畴会来这么一手，被打得稀里哗啦。这个消息传来，敏感的皇太极意识到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即将开始，于是调集了所有的军队前往松山。

为了确保清军能更多一些胜算，皇太极决定亲自指挥这场战役。此时，皇太极的健康已经出现了问题，鼻血流个不停。皇太极带病急行军，用了六天的时间到达松山。

清军的总兵力大概在十二万，明军的总兵力是十三万，从人数上说双方实力相当，明军稍占优势。但是将领方面，明军就明显不如清军，多尔袞、多铎、济尔哈朗、岳托等人个个骁勇善战；明军方面，除了宁远总兵吴三桂比较能打外，其他人都不太行，而且吴三桂也是出身于逃跑世家。

这一仗，如果洪承畴不出奇招，是必输无疑的。洪承畴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洪承畴有什么高招呢？

洪承畴觉得野战行不通，就必须寻求地利，所以命令军队抢占乳峰山，乳峰山是个制高点，在这上面固守的话，等于是多了座城池。就在洪承畴准备实施计划的时候，手下一个武官提醒他：“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是我军粮草匮乏，清军一旦抄了我们的后路，截了我们

粮道怎么办？”

也不知洪承畴是啥状态，他不仅没有听进那人的言论，反而斥责他：“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杌隒待着呢，需要你提醒我？”

很多人认为松山之战洪承畴失败就失败在没有听进这个人的建议，一世英名的洪承畴糊涂一时。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洪承畴是个军事家，这点是不需怀疑的。面对皇太极的大军，他很清楚，固守远比进攻要好得多。然而，更糟糕的是，后来洪承畴进攻的时候居然只带了三天的干粮，让人想不通他到底要干吗。

洪承畴本来是想固守，后来为什么又选择进攻呢？进攻的时候为何只带三天干粮？

要弄清这些问题，还得了解他身后的一个人——兵部尚书陈新甲。洪承畴其实是不想进攻的，不是怕死，而是担心打不过。但是陈新甲一直在催他，陈新甲催他，他还可以应付。更要命的是没钱了，没钱就耗不下去，更守不下去。

到了这地步，只能打了。

洪承畴让八大总兵主动袭击清军，也算是给上面一个交代，我打了。袭击的结果不是很理想，被清军击退，一路逃到塔山，被清军围住了。

这时，洪承畴只剩下一个选择，突围出去。他召集八大总兵商量如何突围，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工。可惜计划还没有实施，就有两个开溜的，一个是大同总兵王朴，一个就是出身于逃跑世家的吴三桂。

皇太极预料到明军今天晚上必然会逃遁，便部署好追击计划。事实证明，皇太极料事如神，明军果然在夜晚开始逃遁，中途到处遇到清军的伏兵，明军死伤惨重。八月二十二日，清军攻破塔山。吴三桂、王朴等人率军退入杏山城。后来，吴三桂和王朴又率军往宁远跑，结果被清军追击，死伤惨重。松山一战，清军斩杀明军五万多人。

现在，松山已经被清军彻底包围，明朝的救援计划失败。洪承畴在松山城内被困住了，围城以后，皇太极照例让人向城内射入劝降书，劝降书还提到如果祖大寿投降的话，将不计前嫌，仍然恩遇。

明军不为所动，任凭皇太极威逼利诱，就是不投降。不久，皇太极得知宸妃重病，对关外几城部署好包围之后，便快马回奔盛京。

围城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二月，清军才逮住机会，攻入松山城。这个机会还得感谢汉奸夏承德，夏承德是松山城副将，感觉突围无望，

便让人密约清军在他防御的地方，晚上竖起云梯登城，他在城里做内应。夏承德唯恐清军不相信，还把自己的儿子给清军做人质。

二月二十八日，清军进入松山城，生擒明朝总督洪承畴和巡抚邱民仰。得知这个消息，皇太极感到很惊喜，让人把洪承畴押到盛京。得知祖大寿的弟弟祖大乐也在城内，皇太极更高兴了，让人把他也一并押到盛京。

.....

招降洪承畴

一般的人物皇太极都是想尽办法拉拢，更别说像洪承畴这样超重量级的人物了。

别人投降就投降了，啥事都没有，洪承畴投降却比较多事，还闹出了一段绯闻。根据《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洪承畴之所以降清，完全是孝庄的功劳。孝庄也就是皇太极的庄妃，一个非常有心计的女人。

到底庄妃是凭借什么手段让洪承畴投降的呢？《清朝野史大观》里语焉不详，这不免让后世文人浮想联翩。有的说庄妃向洪承畴送汤献媚，有的说庄妃牺牲了色相。电视剧《孝庄秘史》就采纳了这种说法。

据说，洪承畴这人骨头也非常硬，最开始根本不想投降，准备绝食而死。洪承畴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洪某人只求一死明志。”皇太极在爱才方面跟周公有得一拼，怎么忍心这么优秀的军事明星就这么一死了之。皇太极和范文程这两只老狐狸商议之后，决定让大玉儿（庄妃）接手这个艰巨的任务。大玉儿毕竟是大玉儿，用她的妩媚和花言巧语打动洪承畴，皇太极就坡下驴，对洪承畴极尽优待，洪承畴就这么乖乖就范了。

我们来看看电视剧《孝庄秘史》中这对孤男寡女的对话。

庄妃：“你就是大明朝的洪经略吗？”

洪承畴：“你是谁？”

庄妃：“我听说经略一心殉国，心中敬佩，特来一睹威仪。”

洪承畴：“我殉我的国，与你有何相干？敢情你也是用花言巧语来劝我归降的吧？快省省力气走吧。”

庄妃：“这宫里头规矩大，我一旦被发现，立时就有杀身之祸。若不是真心仰慕经略，我何须冒险前来？谁晓得经略疑心这么重？也罢！”

洪承畴：“姑娘，我是将死之人，又何劳姑娘枉顾？要是连累了你，我又于心何忍呢？”

……

庄妃：“你跟我想象的一样。虽然饿了些天，但是却仍然英气逼人。”

洪承畴：“我死在眼前，顾不得了。求姑娘成全，容我死于花下，我死也瞑目了。”

这两段对话是非常暧昧的。

这些东西属于野史的范畴，历史上的洪承畴是不是真的中了庄妃的媚药才投降的？

如果洪承畴真是这种人的话，恐怕也当不上辽东经略了，庄妃固然貌美，但美貌在这里不起决定性作用。洪承畴降清跟庄妃没什么关系，跟范文程的关系倒是非常大。

洪承畴被俘之后，每天都扬言绝食，绝食了很多天还没死，可见这人抗饥饿的能力非常强。洪承畴绝食的消息传到明朝，京城里的人家喻户晓，大家纷纷感叹，又出现了一个民族英雄。崇祯也非常感动，感动之余他就想，我不能亏待洪先生啊！洪先生既然绝食了，估计现在也差不多挂了吧！当然，崇祯也不确信洪承畴到底有没有挂，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没挂，几天后也会挂，人是铁饭是钢嘛！

好，那就假设先生已经挂了吧！崇祯决定给洪承畴发丧，隆重悼念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洪承畴。

这边还在这里纠结，那边已经发丧了，一边是求生的欲望，一边是对死亡的崇拜。

皇太极几次劝降洪承畴都失败了，很气馁，又碰上了一个硬骨头，干脆推出去砍了吧！范文程就安慰皇太极，皇上，不要失望，慢慢来，这件事交给我去办就好了，我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范文程说话比较靠谱，皇太极就给了他一次机会。

范文程来到洪承畴的牢房里，可能是牢房里灰尘比较多吧，一缕灰尘从屋梁上落到洪承畴的身上。洪承畴用手掸了掸灰尘，这个不经意的动作没有逃过范文程锐利的双眼。看到这一幕后，范文程微笑

了，他没有劝降洪承畴，而是直接回去找皇太极。

范文程回去后对皇太极说：“皇上，你不用担心，洪承畴迟早会降的。”

然后，范文程就把自己看到的一幕告诉皇太极，说洪承畴很爱惜衣服，连衣服都爱惜的人怎么会想死呢？

皇太极一听喜上心头，披上大氅就去探视洪承畴。进了牢房后，皇太极二话没说，把大氅披在洪承畴身上，说道：“洪先生，你辛苦了，受委屈了。”

千言万语不及一句“你辛苦了”，洪承畴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忙跪在地上大呼：“皇上英明……”

我们千万别小瞧“皇上英明”四个字，这可不是客套话，也不是感情激动时说出来的，而是非常有意义的四个字。只有“皇上英明”，洪承畴才有得台阶可下，不是我洪承畴软骨头，实在是皇太极太英明了，我不归顺他就是跟天意作对。

从开始洪承畴拒绝给皇太极下跪，并傲慢地怒斥：“我乃天朝大臣，岂拜小邦王子乎！”到现在洪承畴主动下跪，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过程。

洪承畴无疑是在乎自己生命的，应该说不仅是在乎，而是非常热爱，热爱生命——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国家大义还是要坚持的，在生命和大义之间，洪承畴只能选择大义，因为明朝那边都把他当成民族英雄开追悼会了。他不能让普天下的老百姓失望啊！可是，他又热爱生命，怎么办呢？皇太极你得给我个台阶下啊，让我对普天下的大明子民有个交代。

当然，洪承畴内心里这种想法，肯定是没法对皇太极开口的。幸好，范文程识破了这一切，皇太极配合得很好，洪承畴遇上了明主，事情解决了。

事实证明，皇太极在洪承畴身上的投入是值得的，洪承畴后来为清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祖大寿再次投降

事实上，自从上次祖大寿一去不回后，皇太极就始终忘不掉他，曾经给他写信：“自从大凌河一别，有好几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你，希望能和将军再见一面。将军是去是留，我也不能勉强。将军

你虽然屡次和我兵刃相接，但我绝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将军不要妄自猜疑。”

皇太极的意思是你可以放心地投降，我绝不会因为上次的事为难你。祖大寿没有任何回音，这是祖大寿的风格。皇太极在耐心地等待，终于在1642年三月十日，祖大寿熬不住了，出城投降。投降后，祖大寿认罪：“我知道自己有罪，我和洪承畴的情况不太一样，我罪该万死。昔日被困大凌河时，粮尽投降，皇上不但不杀臣，反而优待臣。臣后来背弃圣恩，实在是罪该万死。”

皇太极想了想说：“大寿你说的也有道理，换到其他人手中你死一万次也不够。但你背叛我，一是为了前老板崇祯，二也是为了家人和亲戚。但让我杀你，我肯定是下不了手的。你是个人才，我不想损失你这样的人才。我常常对部下说，如果交战中遇到祖大寿，一定要生擒，因为我不想你死。只要你以后为我踏踏实实做事，我就心满意足了。”

祖大寿听了，连连叩头谢恩。祖大寿也是说好话不做好事，答应皇太极帮他老老实实办事，结果啥事也没办。投降以后，吃皇太极的，喝皇太极的，就是不给皇太极办事。侍奉二主的人，只要稍微有些良心，都是纠结的，祖大寿是一个纠结的人。

应该说，皇太极对祖大寿是非常恩遇的，几乎把他摆在跟贝勒多尔袞、多铎等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还赏赐给他五爪龙纱朝衣，这衣服就相当于后来的御赐黄马褂。皇太极的政治生涯虽然有很多作秀成分在里面，但是像他这样高瞻远瞩、胸怀宽广深邃的 leadership 者在封建时代实在是少之又少。我们当然不能拿美国总统的标准来要求皇太极。

洪承畴投降了，祖大寿投降了，很多很多人都投降了。崇祯感到惊慌，尤其是为洪承畴开完追悼会后，发现这人居然没死，很是失望。

第九章 结 局

几百年来，皇太极暴死之谜引发了后人无数的猜想。其中，在坊间流传最广的是皇太极死于谋杀。很多人怀疑凶手是皇太极的政敌兼情敌多尔衮，庄妃也是当事人之一。庄妃和多尔衮青梅竹马，后来嫁给皇太极，皇太极死后，两人公开出入，俨如夫妻，人们怀疑她和多尔衮合谋杀害皇太极也不稀奇。

崇祯的结局

崇祯是一个很悲剧的人，即使他性格中有一些弱点，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命运是一个悲剧。公正地说，他是一个天天向上的皇帝，掌权十七年来，每天都想把国家往好的方面推，但国家就像一栋烂掉的大厦，他越推倒得越快。

大明天下，奈何亡于联手！——道出了内心深处多少沧桑和无奈！

文臣个个可杀。——又是怎样的悲怆和愤怒！

得知锦州失守后，崇祯飘飘倒倒，差点儿站立不稳。崇祯的压力非常大，几近崩溃边缘。可是他不能倒下，他告诉自己，只要大明江山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撑下去，哪怕是撑死自己也无所谓。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些年来崇祯经常做一些离奇古怪的梦。有一天，他做了一个非常玄的梦。他梦见有人在他的手中写了一个字——有。据说，这个梦崇祯做了好几次。

他召集文武大臣，问大家这个梦到底有什么预兆。大家都说很好很好啊，有代表有啊，比没有要好得多。听到大家都这样说，崇祯心里好受很多，这个梦大概是说大明还有得救。

但崇祯的贴身太监王承恩听到这个梦后大惊失色，下朝后找到崇祯，对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梦，这个梦象征着大明的灭亡。

王承恩说“有”字其实要拆开来看，实际上是“大明”两个字组成的。上面是大字少一撇，下面是明字少一边，而且少的是“日”字，意味着大明江山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影子。

崇祯做这个梦的时间恰好就是李自成从深山里出来的时间。李自成出来的时候身边只有几十个人，一年后，就占领了好几个县城，人数飙升到上万人。李自成毕竟名声在外，1640年春节过后，他带领自己的农民军进入河南。这一年，河南大旱，李自成闹革命这么久也闹出经验来了，知道大旱对崇祯是不利的，对自己很有利。

进入河南后，李自成一挥手，河南的灾民纷纷向闯王的旗帜靠拢。不是灾民想造反，而是因为不造反实在没有活路了。没吃没穿的，朝廷还是征税。朝廷也没有办法，国内流寇四起，不镇压总不是办法，镇压就得花钱，花钱就得征税。何况清军那边压力相当大，每年的军费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朝廷要交税，行，李自成就弄个宣传口号：“吃他娘，穿他娘，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真是气死崇祯了，崇祯这边征税，忙着消除内忧外患，那边农民出身的李自成搞出个什么“闯王来了不纳粮”。

一句不纳粮，收买人心的作用那是比炸弹还强悍，群众一下子炸开了锅，天下还有这么个不纳粮的救世主，不跟他又跟谁？

崇祯无奈地感到大明的气数就快完了，剜肉医疮了这么多年，似乎就要走到一个尽头。说到气数，崇祯最开始是不相信的，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个坚定的人定胜天派，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到后来，狂澜已经倒了，如果再不相信，就是承认自己没能力，崇祯当然宁愿相信命数。

气数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用哲学的话来讲，就是一个事物自身的寿命期限，不光生命有寿命，王朝也有，制度也有。这就好比一个电器，有使用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各项零件开始出问题，如果继续使用的话，就很容易出问题。

那么一个王朝的寿命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同意因果律普遍适用的话，那么打从朱元璋打天下时起，明王朝的寿命就已经注定了。

让我们把目标聚焦在崇祯身上吧！这是怎样一个场景，京城上空，乌云遮天，大风起兮，灾难的消息从全国四方八方飞向京城。崇祯孤独瘦削疲惫的脸上是无尽的凄凉和怅惘，李自成又出山了，张献忠还在乱来，自己手下能干的将领死的死、降的降，陕西、四川、河南等被贼兵相继占领，关外的城池也是接二连三丢失。全国人民饥寒交迫，人吃人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一次会议上，崇祯终于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朕在位十四年，国家饱经忧患，灾难这么多。到如今，老百姓人吃人，贼寇四起，鞑虏欺负上门，都是朕失德啊！”

大臣们都说，皇上，这不是你的错啊，大明的气数将尽，这是谁也无法挽回的。

就在崇祯和大臣们哭哭啼啼的时候，李自成大军已经扩张到十几万人，占领了河南全境。李自成杀掉了陕西总督傅宗龙和汪乔年，接着又杀了福王朱常洵。随后，李自成进入陕西，击败孙传庭，占领西安。1643年，李自成纠集所有的兵力向京城进发，明王朝危亡在即。

三个月后，李自成的军队到达西直门。这一天是农历三月二十七日，李自成办事很讲效率，让士兵们火速攻城。明朝的文武百官更讲效率，还不等李自成把城攻下来，很快就打开城门欢迎闯王。

这一天，外城失陷；第二天，内城失陷。城破之时，崇祯用刀割破手指，在书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六字，接着又用血写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不是给大臣的，也不是给自己子女的，而是给李自成的。他对李自成说，我所以走到今天完全是被大臣害的，你可以把我碎尸万段，可以把我的文武百官全部都杀死，但一定要善待老百姓。

崇祯的自我评价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

崇祯是中国历史上因失败而自杀的唯一皇帝，应该说是一个有骨气的人，有骨气的人是值得欣赏的，但骨气并不能遮盖一个人的错误和缺点。人们对崇祯的印象不是特别坏，就因为这人勤政，不好酒色，生活相当简朴，亡国后与国同亡。

这真是一个要命的夜晚，多少国仇家恨涌上心头。不过，崇祯没有时间去悲哀，没有时间去痛哭。他必须先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再上吊。

崇祯命令皇后和妃子们上吊，看着梁上一副副摆动的躯体，他突然发现身边还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长平公主，也就是金庸《碧血剑》中的九姑娘，崇祯对她说：“孩子，你也上吊吧！”

九姑娘毕竟年轻，怕死，想逃走，崇祯用刀追她，砍断了她的手臂。九姑娘到底有没有被崇祯杀死，这个不知道，是个悬念，所以金庸才借用这段历史发挥。但这事情在历史上是真实发生的，并不是什么传闻。

有人说崇祯砍伤女儿实在太过残忍，不过拿崇祯本心来说，他是不希望女儿承受更大的侮辱。有人认为这是伟大的父爱，问题是崇祯

把自己的儿子赶出宫，让他跑掉，为什么不可以给女儿相同的待遇，所以伟大的父爱也谈不上。

这些事情处理完后，崇祯带着王承恩一路走到煤山，崇祯先上吊，王承恩后上吊。

大明王朝就此结束。

皇太极的结局

1642年五月，崇祯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宁远城，等待皇太极的接见。

其实，崇祯向来是不怎么把皇太极放在眼里的，自视天朝上国，清国不过是个弹丸小国。所以，之前皇太极多次致信崇祯，都如泥牛入海无消息。现在皇太极通过军事手段沉重地打击了崇祯，崇祯主动来求和，应该说是难得一见的机会。

皇太极并没有摆架子，而是表示愿意与明朝对话，派遣兵部官员前去宁远迎接明朝代表团。皇太极友好地接待了明朝的使者，好吃好喝地伺候了他们几天，最后让他们带一封信给崇祯。信的内容比较长，无非是说明清两国有矛盾是明朝的不对，最后也最重要的意思是明朝要给清国贡金，同时重新划分疆土。

皇太极要求明朝每年给清国纳贡黄金万两、白银百万两，强弱之势已经扭转，以前是后金向明朝纳贡，现在变成了明朝向后金纳贡。饶是形势如此，感情上也让人无法接受。

皇太极还要求明朝把山海关之外的领土，全部划归清国。皇太极多年来攻克关宁防线受挫，现在想不费一枪一弹就占有曾经花费了几十年都打不下来的地方，应该说想得太美，但也想得合理。

崇祯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愤怒是不必说的。但是，现在不咽下这口气不行，崇祯也不想和皇太极打笔仗，干脆懒得回他。

崇祯不回信，正中皇太极下怀，这样就有了发兵的借口。这时，清国的许多大臣极力主张大军直捣黄龙，拿下北京。大家都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攻取明朝的心脏。但皇太极一向是个保守的人，他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就如同砍树一样，先把两边的枝丫砍掉，然后再来砍主干。皇太极是个好儿子，谨记着努尔哈赤的教诲。

皇太极认为攻入北京不必急于一时，应该说这个策略是正确的。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皇太极没有料到，从容虽好，自己却从容不了

多久。

1642年十月十四日，皇太极命令阿巴泰为大将军，率领大军去砍伐明朝枝丫。出征之前，皇太极再次给他们申明军纪，强调“五勿”。

这次出征，战果也是丰富的。第二年的六月十一日，阿巴泰凯旋班师。这一次出征，阿巴泰歼灭了明朝的一个亲王、五个郡王，俘获明朝宗室上千人。攻克了六十七个县，占了八十八座城池，抢到黄金一万两千多两、白银二百五十万两，还有其他各种宝贵物品一大堆。俘获了近三十七万的人民，这些人民是不是真的愿意成为清国的人民就没人知道了。阿巴泰的表现不错，虽然皇太极抱病，还是亲自出城迎接。

然而，没有人想到两个月后皇太极居然“无疾而终”。更奇特的是，深谋远虑的皇太极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没有留下任何遗嘱。难道皇太极不知道皇位争夺的激烈程度？作为一个过来人，皇太极对此比谁都清楚。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留下遗嘱？

史书记载，崇德八年（1643年）农历八月九日，“是夜，亥刻（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上无疾，端坐而崩”。享年五十一岁。

说皇太极无疾而终，大家都不相信。好端端的一个人，又不是特别老，怎么可能会说死就死。史书的记载反而更加激起人们对皇太极死亡之谜的好奇。有人怀疑皇太极是被人谋杀的，也有人怀疑皇太极是病死的。

几百年来，皇太极暴死之谜引发了后人无数的猜想。其中，在坊间流传最广的是皇太极死于谋杀。很多人怀疑凶手是皇太极的政敌兼情敌多尔衮，庄妃也是当事人之一。庄妃和多尔衮青梅竹马，后来嫁给皇太极，皇太极死后，两人公开出入，俨如夫妻，人们怀疑她和多尔衮合谋杀害皇太极也不稀奇。

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皇太极生前最爱的女人并不是庄妃，而是她的姐姐宸妃。庄妃比宸妃提前九年入宫，但并不怎么受宠。1634年，时年二十六岁的海兰珠——来自蒙古草原的美丽女子，进入皇太极的宫中，成为他的侧福晋。

海兰珠的美丽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她的名气没有庄妃大，但显然更讨皇太极的欢心。皇太极很早就仰慕她的美名，见了她之后，相见恨晚，两人爱得如胶似漆。

皇太极称帝之后，海兰珠被册封为宸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皇太极还把她住的地方赐名“关雎宫”，以此来表达对海兰珠的爱慕之情。

很长时间以来，皇太极是没有立继承人的打算的，虽然长子豪格把秋水都给望穿了。1637年，宸妃生下皇八子后，皇太极喜出望外，召集群臣讨论立嗣的问题。如果这个皇八子能够自然成长，继承人应该就是他了，可惜这个皇八子只活了两百多天便夭折了。两天后，庄妃生下了皇九子福临。

自从皇八子去世后，皇太极再也没有提立嗣的问题。

有人会感到奇怪，皇太极总共有十一个儿子，除了三个夭折的，还有八个，从这八个中挑选一个继承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汉族皇权讲究的是嫡长子继承制，满族虽然没有这个规定，但长子豪格摆在那里。国赖长君，豪格当时已经三十五岁了，绝对算是个长君。而且豪格战功卓著，曾经还为了讨好父亲杀掉自己的老婆——莽古尔泰的女儿。

应该说，皇太极和豪格虽然是父子，但性格差异太大，豪格的性格倒是跟莽古尔泰有些像。所以，固然他是长子，但皇太极实在不看好他，而且认为豪格对自己不真心，父子之间猜疑很重。

皇太极之所以喜欢皇八子是因为喜欢宸妃，皇八子夭折后，海兰珠精神陷入恍惚中，情绪很低落，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皇太极虽然想尽办法安慰她，让她开心，但都不怎么管用。

后来前线告急，皇太极又不得不立刻赶到前线去。一路上，皇太极的鼻血不停地流，心里很痛苦，一边是战争，是国家大事；一边是宸妃，是痛失爱子心情抑郁的宸妃。皇太极经过六天六夜疾驰到前线，终于改变战局，打败明军。就在皇太极忙于前线的时候，忽然接到消息，说宸妃病重。

听到这个消息，皇太极快崩溃了，他知道如果宸妃不是病得特别厉害，宫中不会派人到战火纷飞的前线来报告。皇太极忧心忡忡，立即决定返京。为了快点儿回到宸妃身边，据说皇太极日夜奔驰，累死了六匹马。

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见到宸妃最后一面。听到宸妃去世的消息，皇太极大悲：“老天啊，你一直眷顾大清，却为什么不让朕与这辈子最爱的女人当面诀别！”

回到盛京后，皇太极径直奔向关雎宫，伏在宸妃的尸体上痛哭。皇太极虽然是一个政治动物，但是他对宸妃的爱情是真实的。政治家作秀，有时是必须的，但他不可能也不会在所有方面都没有真性情。

皇太极亲自为宸妃操办丧事，葬礼之后，皇太极没有进清宁宫居住，而是在宫中搭起一个临时帐篷，思念宸妃海兰珠，她也许是皇太

极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

宸妃离世之后，皇太极感觉自己身体和心灵都衰老了不少。一次，祭拜宸妃的时候，皇太极感慨地说：“山太险峻了就会倒下，树木太高容易折断，年纪大了就会衰弱，这是老天给我的忧虑。”

1643年农历八月九日，皇太极像平常一样办公，晚上端坐在清宁宫的暖炕上，无疾而终。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人把皇太极之死演绎成一个香艳的谋杀案呢？

后世野史说多尔衮和庄妃密谋杀了皇太极，金庸在《碧血剑》里更是借袁承志的眼睛把这一幕展现得活灵活现。袁承志本来是准备刺杀皇太极的，跟着皇太极来到庄妃的寝宫，皇太极发现庄妃正和多尔衮偷情。多尔衮来不及逃跑，竟把皇太极刺死了。

世人有这种猜测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当年皇太极逼死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夺取了最高领导权。但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作为文学的一种想象值得鼓励，但不能当成真实的历史来看。

史书说皇太极无疾而终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大家知道皇太极晚年有一个老毛病——经常流鼻血。流鼻血本不是个大事，但皇太极特别严重，据说有一次鼻血连续六天不止。引起流鼻血的原因很多，可能是体内火气过旺，也有可能是肾虚，还有可能是高血压。这几种可能在皇太极身上都有可能出现，现在没法给皇太极体检，所以具体原因我们不知道，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皇太极有病，并非像史书说的那样无疾而终。

这一点在史料中也是有记载的，史料中经常出现什么“圣躬违和”“圣躬不豫”等字样。1642年农历十月二十日，“圣躬违和，肆大赦。凡重辟及械系人犯，俱令集大清门外，悉予宽释。”

可见，皇太极不仅有病，而且病得相当严重，以至于用天下大赦的方式向上天祈求健康。当然，他的病可能跟宸妃去世受到的打击有关。皇太极的病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严重到他不得不交出权力，让其他人处理国家大事，尽管他贪恋权力，迷恋治国，可惜实在力不从心了。

崇德八年（1643年）农历四月初六，皇太极派人去朝鲜索要一种名为竹沥的药材，并要求朝鲜选派名医前来为自己会诊。根据《李朝中宗实录》的记载，皇太极患的病叫风眩之病。据说唐高宗李治患的就是这种病，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病，在当时是治不好的。这种病究竟是怎么引起的，现在我也不太清楚，通俗的理解就是阴阳失调。

风眩又有一种说法叫风痰。从崇德七年（1642年）开始，皇太极的压力越来越大，明清之间的战争处于白热化时期，皇太极诸事繁多，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加上丧失爱妃，难免痰火上升而头晕目眩，病情加重。竹沥是竹子的汁液，入药后可以祛痰。这么看来，皇太极很可能是病死的，而且是死于“痰疾”。

那么官方史书为何说皇太极无疾而终呢？那是因为皇太极从最后一年四月份开始，疾病似乎有所好转，在人们眼里皇太极身体逐渐康复，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假象。

接班人之争

皇太极就这么突然离世了，难为了那些活着的人。

清国的权力出现了一个真空，这个真空将由谁来填补呢？皇太极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连只言片语都没有。

清国前途未卜，当时有三个人最有可能继承皇位。

第一个人还是大贝勒代善，早在努尔哈赤死后，代善就有望成为最高领导者，最后出于各种原因被皇太极拔得头筹。皇太极执政后，代善的地位一直是二把手，哪怕是跟皇太极不和，这个位子也从来没有动摇过。现在，皇太极死了，代善要继承帝位可以说是举手之劳。

不过，代善不太可能再次继承地位，这不光是脸面的问题，还有人的心理习惯因素在里面。第一班车的时候你没赶上，再赶第二班车就没意思，跟小辈争抢显得太不自重。既然第一次代善没当上最高领导人，或者说不想当上最高领导人，那么，这次他更不会去蹚这个浑水，因为不适合，更何况代善是一个要脸的人。

第二个有望继承帝位的是睿亲王多尔袞，传闻说努尔哈赤生前最喜欢多尔袞，还留下遗言让多尔袞继承汗位。不过，多尔袞那时太小，才十四岁，没法和皇太极抢。今非昔比，现在多尔袞三十二岁，正当盛年，而且立下赫赫战功，与兄弟阿济格和多铎成为大清国的骨干力量。兄终弟及，在女真族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多尔袞是一只很有潜力的股票，地位比他高的只有代善和济尔哈朗，算是大清国的第三号人物。

第三个很有希望的人是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此时豪格三十五岁，也是战功赫赫的人物。应该说，皇太极虽然不是很喜欢豪格，但还是很重视他的。打仗时经常把豪格放在第一线，而且对他要求非

常严格。但豪格这人性格有点儿骄横和刚愎自用，经历过好几次大起大落。豪格在大清国的地位仅次于多尔衮，由于代善主动出局，竞争就在多尔衮和豪格之间展开。

豪格自信满满，因为他觉得自己功劳很大，又是皇太极的长子，自己不当皇帝谁当皇帝。豪格召集八大臣在自己家中策划“竞选”大事，八大臣商定一起推举豪格当皇帝，甚至强调用武力做后盾，如果有人敢反抗的话……

豪格很清楚，自己要当皇帝，需要得到郑亲王济尔哈朗的表态，他派去使者软磨硬磨，济尔哈朗总算同意他当皇帝。得到济尔哈朗的同意，豪格认为自己当上皇帝毫无悬念。

当然，多尔衮哥三个肯定是不服的。

决定接班人的会议在崇政殿举行，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四。两黄旗大臣索尼和鳌拜很早就来到崇政殿，并让卫士将崇政殿团团包围。会场上一片杀气，索尼和鳌拜首先表态：“我们吃先帝的，穿先帝的，先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如同皇天。如果不立先帝的儿子，我们宁死也要陪先帝。”

那意思很明显，如果有谁想染指帝位，那就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吧！

虽然里里外外杀气腾腾，多尔衮还是不慌不忙地说：“你们两个退下，讨论继承人的事，还轮不到你们发言。”

两人只好老老实实地退出去，毕竟帝位继承的事情只有诸王才有发言权。

现在最关键的是代善的态度，代善说道：“豪格是先帝长子，理当继承大统。”豪格一听，心安理得，这下皇位飞也飞不掉了。然而，令他恼火的是多尔衮三兄弟居然沉默不语，那意思很明显，我们不赞同。

豪格沉不住气了，大怒：“我年少德薄，非所堪当！”说完，居然耍大牌，径直走人。从豪格的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做人一定得淡定，再淡定一会儿，这皇位就是豪格的了，可惜豪格很冲动，很火爆。他也许是想让多尔衮三兄弟挽留自己，然而他低估了对手，对手并不是什么儒家信徒，从来就不相信什么礼仪客套，只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豪格走后，阿济格和多铎趁机劝多尔衮继位。然而，多尔衮考虑的问题更多，他知道万一自己同意了，搞不好跟代善和豪格就会兵戎

相见，便沉默不语。这时，他的弟弟多铎也沉不住气了：“如果睿亲王不想当，立我也行，太祖在遗诏里也提到我。”

多尔袞觉得多铎和豪格一个德行，很不满地说：“肃亲王豪格在太祖遗诏中也提到了，并不止你一个人。”

代善忽然笑里藏刀地说：“睿亲王多尔袞如果继位的话当然也是国家的福气，否则就应该立皇子，皇太极在的时候我一直辅佐他，现在走了，只要还有一口气，我还得为他出力啊！”

代善的意思很明白，多尔袞你要继位，我跟你没完。多尔袞的脑子飞快地转着，他知道现在朝中支持豪格的占多数，如果自己继位，势必引起国家的分裂，但他又很讨厌豪格，不想让豪格当皇帝，便说道：“肃亲王豪格既然坚决不愿意当皇帝，我们也不能勉强他，应该尊重他个人的意见。我也同意立先帝的儿子，咱们不妨让福临继承皇位吧。福临年纪小，就由我和济尔哈朗辅政吧！”

这个提议得到了双方的赞同，最后悔的人莫过于豪格。豪格这人命不好，本来应该他当皇帝，结果梦想落空。豪格满腹牢骚，逢人便大骂多尔袞，结果被人告发。豪格怎么骂多尔袞，也不知道他是知道什么内幕还是怎么回事，他逢人便说多尔袞有病，你们别跟着他，他不是长寿的料。事实证明，豪格的话是对的，多尔袞确实只活了三十九岁。但多尔袞没死，公然说出这样的话，简直是自己找死。

由此可见，豪格这人性确实不适合搞政治，结果是豪格被检举，多尔袞把他处决。当然，这一切都是在顺治帝的名义下进行的。顺治帝亲政后，给豪格平反，重新封他为和硕肃亲王。顺治十三年（1656年），豪格被追谥为肃武亲王，成为清朝第一个被追谥的亲王。

当然，福临能当上皇帝还得感谢母亲孝庄，因为皇太极的儿子众多，不立豪格不一定就非得立福临。孝庄这个躲在历史后台的女人在我们下一本书里会正式出场，这确实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女人。

好了，大清帝国的崛起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下一本书我们将讲述多尔袞、孝庄和顺治的那些事儿。

定鼎中原 大清风云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鹿鼎公子 著



貳

比野史
更靠谱

看性情boy顺治和文艺女青年董鄂妃
的真爱故事
看智商情商双高的多尔衮与孝庄问鼎
中原的霸业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比正史
更有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风云.2, 定鼎中原 / 鹿鼎公子著.—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93-7306-4

I.①大... II.①鹿... III.①中国历史 - 清代 - 通俗读物
IV.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4235号

策划编辑: 胡 艺 (ngaihu@gmail.com)

责任编辑: 韩璐玮 (hanluwei666@163.com)

封面设计: 古润文化

大清风云: 定鼎中原

DAQING FENGYUN: DINGDING ZHONGYUAN

著者/鹿鼎公子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32 印张/8.25 字数/158
千

版次/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093-7306-4

定价: 29.8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值班电话: 010-66026508

邮政编码100031

传真: 010-66031119

网址: <http://www.zgfzs.com>
010-66053217

编辑部电话: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66033393
010-66033288

邮购部电话: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清朝皇帝列表

姓名	庙号	年号	谥号	在位时间	皇陵
努尔哈赤	太祖	天命	高皇帝	1616—1626 年	福陵
皇太极	太宗	天聪 崇德	文皇帝	1626—1643 年	昭陵
福临	世祖	顺治	章皇帝	1643—1661 年	孝陵
玄烨	圣祖	康熙	仁皇帝	1661—1722 年	景陵
胤禩	世宗	雍正	宪皇帝	1722—1735 年	泰陵
弘历	高宗	乾隆	纯皇帝	1735—1795 年	裕陵
颙琰	仁宗	嘉庆	睿皇帝	1796—1820 年	昌陵
旻宁	宣宗	道光	成皇帝	1820—1850 年	慕陵
奕訢	文宗	咸丰	显皇帝	1850—1861 年	定陵
载淳	穆宗	同治	毅皇帝	1861—1875 年	惠陵
载湉	德宗	光绪	景皇帝	1875—1908 年	崇陵
溥仪	逊帝	宣统	—	1908—1912 年	华龙陵园



顺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丧仪合依帝礼诏

多尔衮（1612年—1650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卒于塞北狩猎途中，时年39岁。十三日讣文至京，世祖诏臣民易服举丧，二十日颁

诏布告全国“丧仪合依帝礼”，追尊为成宗义皇帝。

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四亲王及内大臣等告发多尔衮独擅威权，排斥异己，自称皇父摄政王，于是朝廷追论多尔衮谋逆罪，削爵、籍没、撤庙享，布告天下。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平反。

诏书为汉文楷书，钐“皇帝之宝”。



顺治通宝五式钱（背满汉文宁）

顺治通宝五式钱始铸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铜质，小平钱，这件顺治通宝钱直径2.7厘米，重5.5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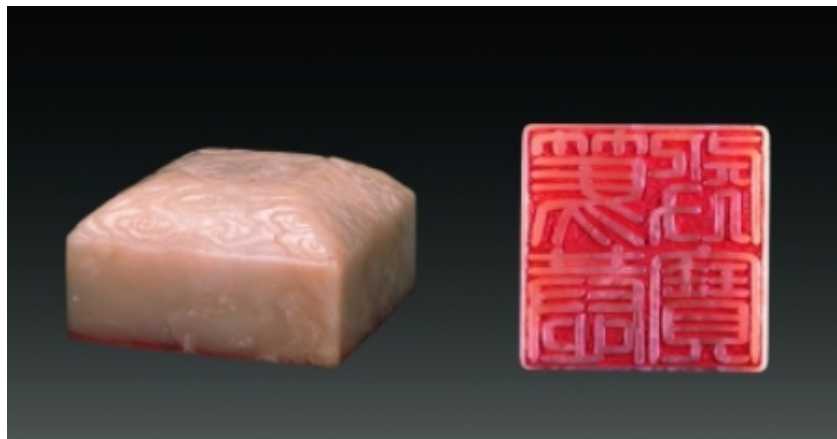
面文“顺治通宝”，楷书，对读。背满、汉文“宁”。



青花花鸟纹大莲子罐

清 顺治

此罐造型古朴，青花以浙青绘制花鸟纹，底足为平切底，胎釉结合紧实，周圈泛火石红。流传百年实属难得。



“笃恭殿宝”玉印

从此印造型、纹饰及印文上看，应为清代宫廷初期用印。此印应为清初顺治皇帝用印。笃恭殿是举行重大活动的地方，顺治帝福临登基皇位在此殿举行。此后，顺治在此发布多道命令。

青白玉，坛纽。印面为正方形，其上阳文篆书“笃恭殿宝”四字，印背雕刻云龙纹，龙为穿云正面龙，四周刻祥云纹。印文篆刻工整流畅，字体结构严谨，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总序

清史洋洋洒洒近三百年，三百年间怪事、奇事、惨事、恨事迭出，三百年年年都精彩，年年都有挥之不去的喜怒哀乐。整个清朝三百年，几乎囊括了人性中一切的极端面，三百年，道不尽的风云爱恨。

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骑兵，建立了后金，身后留下了无数的尸体，最终倒在宁远城下，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书生袁崇焕手中，就此郁郁而终，这是上天对一个暴力征服者的最大讽刺。随后，努尔哈赤诸子开始斗智斗勇，最后皇太极靠谋略成为老大。

皇太极穷其一生精力都在与明朝对抗，不幸暴毙后，大清国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多尔衮与豪格之争最终便宜了顺治。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后，成为皇父摄政王，将全国军政大权操于一身，顺治完全被架空。此时，孝庄和顺治母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危难关头，孝庄舍身保大清，稳住多尔衮，终于使大清逃过这一劫。

顺治是个痴情天子，亲政后喜欢跟母亲孝庄闹不愉快，结果自己和董鄂妃双双去世。康熙继位时才八岁，不过这是个早熟的孩子，也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很早就懂得帝王之术。在别人还是懵懂少年时，他就已经像个猎人一样盯紧了鳌拜，除掉鳌拜之后，康熙开始了自己雄才大略的一生。

康熙治国和外交不外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所以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鳌拜，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荡平准噶尔，击退沙俄侵略……在整个清朝，帝王之术在康熙手中达到顶峰。

然而，康熙也有缺点，他的法度不够严明，治国主要是依靠儒术和道术。雍正虽然上位不明不白，但当皇帝后弥补了康熙的缺点，雍正治国理念上最大限度地奉行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乾隆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他继位后，废除雍正的依法治国思路，重新走康熙的路子。但乾隆并不懂康熙真正的治国精髓，结果变成了外用儒术、内用权术，所以清朝在乾隆时期开始走向衰落。

自乾隆后期，动乱纷起，尤其是白莲教叛乱几乎烧遍整个中国。到了嘉庆手中，国家元气已大伤，嘉庆虽然是个仁君，可惜终究没有先祖那份雄才。他虽然减缓了国家的衰颓，但始终没能重振大清的雄风。到了道光手中，国家就更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欺负得

够呛，国内的动乱更是风起云涌。

咸丰就更悲剧了，太平天国和天地会起义，全国天翻地覆。更糟的是八国联军来了，他连个京城都保不住，年仅三十岁便郁郁而去。咸丰死后，朝政大权掌握在“龙夫人”慈禧手中，国家每况愈下，虽然中途出现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可惜终究是昙花一现。

清末虽然出现了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袁世凯这样的中兴名臣，但亡局已定，神仙也不能力挽狂澜。最终，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千古帝王，悠悠万事，功过自有百姓言，清朝这些事儿，就交给读者去慢慢品味吧！

序言

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崇祯上吊自杀。然而，李自成并不是真命天子的料，他当上皇帝后，农民军迅速腐化，对城内的百姓烧杀抢掠，北京城失控。更要命的是，李自成集团的二把手刘宗敏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据为己有。远在山海关的吴三桂得知这个消息，对李自成恨得咬牙切齿，这才与多尔衮勾结，引清军入关灭“闯贼”。

山海关一战，李自成被清军和吴三桂打得一败涂地，再次沦为流寇。多尔衮入关后，趁机将中原的政权据为己有。吴三桂骑虎难下，只好委曲求全活在清廷的羽翼之下，并协助清军消灭国内的反清势力。

一代枭雄李自成最后在湖北的九宫山战死，李自成虽然被灭掉了，但是中国还有很多反清势力。譬如，逃亡到南方的南明政权，还有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南明政权虽然是由朱家子孙领导，但实际上已经腐朽不堪，这些人根本没有志向光复大明，不过想仗着朱家子孙的头衔过几天醉生梦死的生活。

在南明政权中也出现过像史可法这样的民族英雄，可惜无力回天。清军在消灭敌对势力的过程中，手段残忍，动辄屠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其中最恐怖的大屠杀。

自从张献忠死后，大西政权出现了李定国这样的军事英雄，李定国有很出色的军事才能，但受到最高领导孙可望的排挤，导致军队最后发生分裂。大西军也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

国内的反对势力肃清得差不多时，多尔衮开始着手收拾政权内部的反对派，他逼死豪格，打击亲顺治的大臣，将朝政大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孝庄和顺治母子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如果不小心惹怒多尔衮，随时都会翻船。

孝庄是一个很有政治智慧的女人，她陪伴多尔衮犹如陪伴一头猛虎，除了随时察言观色，还一直将多尔衮的头衔提到皇父摄政王的地步，这才避免多尔衮弑君自立的野心发作。因为“皇父摄政王”这五个字，清史又留下了一桩重大悬案：孝庄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

这桩悬案至今没有定论。不过从顺治和孝庄的矛盾来看，孝庄与多尔衮的关系深深地刺伤了顺治幼小的心灵，所以顺治亲政之后，处处跟母亲对着干。孝庄也不是省油的灯，对顺治的宠妃董鄂妃百般刁

难，最后董鄂妃早逝，顺治不久也患上天花，与董鄂妃做了一对短命鸳鸯，比翼双双飞往天堂。

顺治的一生是一个悲剧，由于长期生活在多尔衮的阴影之下，他变得身心扭曲，一直没能找到身心的平衡，最后出家未成，短命而逝。生在帝王家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幸。

目 录

总序

序言

第一章 多尔袞摄政

英“熊”出场

裙带政治

机会是别人给的

第二章 逐鹿中原

三桂大兄

闯王大哥

历史的关口

李自成的败亡

第三章 南明的那些事儿

弘光政权

南明三大谜案

政权如走马灯

落魄王孙——坎坷一生的隆武帝

左良玉“叛变”与史可法殉国

马士英下落之谜

第四章 清军入关——规模空前的大屠杀

大屠杀

遗民与贰臣

第五章 清朝政治的操盘手

难人多尔衮

权力男人

第六章 大西政权的没落

张献忠之死

末路英雄李定国

第七章 孝庄与多尔衮的往事

这对男女很微妙

太后下嫁之谜

多尔衮之死

阿济格之死

第八章 顺治亲政

清算多尔衮

浪花淘尽英雄——评多尔衮

叛逆的顺治

第九章 一辈子都在死磕的母子

古怪的皇帝

痴情天子

太后信佛，但绝不是吃素的

顺治出家之谜

顺治之死

第十章 血字——顺治朝的文字狱

僧函可案

科场案

奏销案

哭庙案

庄氏史狱

第一章 多尔衮摄政

多尔衮耍手段之后，总算当上了摄政王，也就是大清国的实际领导人。可怜，小顺治才六岁，就被迫离开慈母的怀抱，坐在冷冰冰的龙椅上，看着下面一帮衣冠大臣们发呆。

英“熊”出场

一个旧的英雄死去，总意味着新的英雄出场。

如果没有英雄，历史的舞台将会是寂寞的。

清朝这个新英雄的名字叫多尔衮。

多尔衮在满语中是熊的意思，爱新觉罗在满语中是黄金般的意思，爱新觉罗·多尔衮翻译成中文便是“金熊”。我们看多尔衮的画像，长得也确实像熊，人如其名。

多尔衮可以说是清初第一大绯闻男，关于他的八卦和小道消息实在太多，这些花边新闻并不能掩盖多尔衮的功绩。虽然是个绯闻明星，但多尔衮是个不折不扣的实力男。

1612年11月17日这一天，多尔衮就出场了，准确地说，那时多尔衮是从阿巴亥的肚子里走出来，这是幸运，也是不幸。

多尔衮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与母亲阿巴亥有很大的关系，努尔哈赤非常宠爱阿巴亥，希望让阿巴亥的儿子多尔衮、多铎中的一个继承汗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阿巴亥不仅没有光荣完成使命，最后反而被以皇太极为首的贝勒群给逼死，那一年多尔衮十四岁。

应该说，自从第一次汗位争夺失败，多尔衮在清朝的舞台上始终处于配角的地位，有时候连配角都算不上。多尔衮优秀的地方在于他演好了这个配角，皇太极死的那天，多尔衮终于感觉到自己唱主角的机会来了。

皇太极死后到顺治入关登基这段历史中，有三个主角：多尔衮、孝庄太后、顺治帝。在这三个主角中，多尔衮又是男一号，孝庄是女一号，至于顺治帝，活在这两人的阴影中，充其量只能算是男二号。

我们先来为这个男一号做一份简历。

姓名：爱新觉罗·多尔衮

性别：男

生卒年：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享年三十九岁

民族：满

出身：老爸是努尔哈赤

学历：由于是满族，没有接受正规教育，自学成才

职业：杀人放火，争当一把手

人生格言：是我的迟早都应该是我的

最无法释怀的事：母亲阿巴亥被皇太极逼死

最遗憾的事：讨了一大堆老婆，只生下一个女儿

最强的绯闻女友：孝庄

职位升迁：王子——和硕额真（掌握一旗兵力的贝勒）——辅政（大清国第四号人物）——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追封为懋德修远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成宗）——被削官爵，撤掉庙享，子孙后代削职为民（也就一个女儿，还不知道是不是多尔衮的）

从多尔衮的简历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出身确实好，我们现在说的官二代、富二代都没法跟他比，他是皇二代。

当然，多尔衮首先得感谢有个好父亲，其次得感谢有个好母亲。多尔衮的父亲那就不必说了，超级牛的一个人。多尔衮的母亲虽然有些水性杨花，但能力好得那是没话说，一边把老头子努尔哈赤哄得屁颠屁颠，一边从容悠闲地在外偷情。多尔衮最痛苦的事情是碰上一帮难缠的兄弟，像代善、皇太极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善类，如果没有这些狼兄虎弟，汗位对多尔衮来说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因为这些兄弟的存在，多尔衮本来应该很美好的人生出现了许多坎坷。先是母亲被逼死，自己十四岁成为孤儿。母亲被逼死后，小小年纪的他就懂得一个道理，做人要靠自己。只要能沉得住气，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当上摄政王，辅佐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多尔衮当了七年摄政王，带领清军入关，统治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

多尔衮能够当上摄政王，差点还当上皇帝，不是因为背景好，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多尔衮之所以能够大权独揽跟他在皇太极时期的

表现有很大的关系，多尔衮的表现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非常出色。

在顺治元年的时候，多尔衮是叔父摄政王；第二年，他就升级了，升为皇叔父摄政王；到顺治五年的时候，他成为皇父摄政王，明明白白地在皇帝面前称老子。多尔衮是有这个资本的，不光是因为国家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还因为顺治母子也要倚仗自己。

所以，我们应该能够理解顺治的心情，顺治很排斥母亲孝庄，对多尔衮更是恨之入骨。这事搁哪个小孩身上反应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多尔衮死后，顺治毫不犹豫地褫夺了他的一切。

有人总结多尔衮有五大失败，其中就有死后被顺治帝褫夺一切。我们来看看这五大失败是不是真的很失败。

第一大失败是努尔哈赤死后，多尔衮争夺汗位失败。这次争夺汗位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多尔衮漂亮的老妈被皇太极逼死，其实这次失败压根就不干多尔衮啥事，纯粹是阿巴亥和贝勒集团的斗争。多尔衮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根本谈不上什么失败。而阿巴亥碰上了皇太极这样一个对手，也几乎没有胜算。

第二次失败是与皇太极长子豪格争夺帝位失败。这次失败勉勉强强可以说得上是失败，有人说，多尔衮那么有本事的一个人，没有当上最高领导者，实在很失败。失败这个词语被人们误用了，其实，换个角度来想想，多尔衮这次不但没有失败，反而可以说得上是非常成功。要知道，代善、济尔哈朗、豪格那些人摆在那里，你要想强做出头鸟那才是真的失败。作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多尔衮选择委婉掌权，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家又不是古惑仔，哪能生意谈不拢就回去抄家伙，抄家伙的话多尔衮估计是打不过人多势众的反对派的。

所谓的多尔衮第三大失败就更荒唐了，说多尔衮到死都和孝庄的关系不明不白，到现在一些专家学者还为此争论不休，所以很失败。这恰恰是多尔衮成功的地方，如果什么都让后人知道了，那才真叫失败。也算是给专家们留下了一个饭碗，谜一解开，饭碗就没了。

第四大失败倒是真的非常失败，多尔衮妻妾成群，只生了个女儿，这就让人非常怀疑这个女儿是不是他生的。但是这项失败是无奈的，换句话说，是多尔衮自己无法决定的，不能生出儿子，那不是他的错啊！想想，多尔衮多出色的一个人，没有儿子继承他的衣钵那可能是老天对他的惩罚。

第五大失败是顺治帝褫夺多尔衮的一切，这个失败也是多尔衮不能掌控的，而且跟第四个失败关系密切。如果多尔衮有儿子，想办法把顺治废掉也行，可惜，没办法。多尔衮死后，顺治想怎么着就怎么

着。要说多尔衮有多喜欢顺治，那也未必，大半辈子了，没个儿子，总得找个寄托吧！多尔衮连顺治老妈都未必很喜欢，又岂会把这小屁孩放在心上。

多尔衮跟孝庄的关系可能有这一层心理在里面：皇太极你生前逼死我老妈，你死后我就霸占你的老婆，还摆布你的儿子。

在上一本书的末尾我们曾提到，皇太极的未成年的孩子很多，多尔衮要做摄政王未必一定要立福临，难不成这孩子长得特别可爱，一看就是当皇帝的料？事实可能恰恰相反，顺治在当时看来就不是一块当皇帝的料。那多尔衮为啥要选择福临呢？

这还得从多尔衮的绯闻女友孝庄说起！

孝庄是个谥号，原谥号有十九个字：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这个谥号太长了，称呼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大家就简称她孝庄。

很多野史中把多尔衮和孝庄描写成青梅竹马的一对，好像是皇太极横刀夺爱一样。真实历史跟这相差十万八千里，孝庄不是满洲人，是蒙古人，据说还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孝庄出生于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跟建州女真隔着几百里，这两人要想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估计要用手机、QQ、MSN才行，而且还得视频，随时关注对方的成长状况。

多尔衮比孝庄大一岁，虽然隔着几百公里，但还是有机会见面。因为努尔哈赤和科尔沁部落很友好，经常交换女儿之类。孝庄的原名是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前面是姓氏，后面是名字，名字的意思是多子多福。孝庄生育能力很一般，只生出一个儿子，但福气确实是无双的。

这种无双的福气并不是来自于什么运气，而是来自于这个女人的心计和手腕。

裙带政治

有的陈年旧事会发霉，但多尔衮和孝庄那些事儿肯定是酝酿越久越让人遐想。历史学家有时候也有跟狗仔队一样的嗜好。

在电视剧《孝庄秘史》里，庄妃，即孝庄的小名又叫大玉儿，这个称呼来自于野史，野史称她为玉妃。根据野史的说法，庄妃小时候长得特别漂亮，皮肤像凝脂一样，皇太极娶了她后，封她为玉妃。这个说法是不可靠的，在皇太极生前，孝庄的称号是庄妃。至于玉妃这

个称号很可能是对海兰珠的昵称，海兰珠在蒙古语里的意思就是玉。

历史本身有夸大倾向，历史爱好者们更喜欢“添油加醋”。由于孝庄在历史中的独特作用，后人把她夸得天花乱坠，甚至认为她是满蒙第一美女。我估摸着孝庄可能也就刚够美女的资格，皇太极这人很奇怪，对蒙古女人特别感兴趣，他挑选老婆是为了政治需要，所以他对孝庄的要求应该也不是很高，只要对得起观众都喜欢美女就行。

皇太极生前，没看对孝庄怎么宠爱，男人，如果孝庄真的是绝世美女，相信皇太极不至于淡定至此吧！让皇太极唯一不能淡定的女人是孝庄的姐姐海兰珠，这才是个货真价实的美女。在皇太极生前，孝庄被忽视，在皇太极死后，移情别恋也是正常的。

那么，她跟多尔衮那些事儿，可能就有些愿打愿挨的成分在里面，不全是为了保全自己儿子的地位。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女人都需要爱情的滋润，虽然多尔衮是个花花公子，但以孝庄的地位，也没法找到更合适的。

多尔衮和孝庄虽然谈不上青梅竹马，但确实很有可能早就见过面了。

在庄妃一岁的时候，也就是1614年，她的亲姑姑哲哲嫁给了皇太极。可能庄妃也被人抱着参加了婚礼，那时多尔衮也才两岁，穿着开裆裤在地下爬，或许两人爬到一块儿抢糖吃也说不定。这种见面可以说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他们感情的建立毫无帮助和影响。

在庄妃两岁的时候，她还有一个机会可能认识多尔衮。那一年，努尔哈赤又从科尔沁部伸手要老婆。虽然努尔哈赤一把年纪了，但科尔沁部也不好拒绝。这次联姻，可能给庄妃和多尔衮一个见面机会，但即使见面估计也就两小孩你在我脑袋拍一下，我在你脑袋拍一下。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谓的两小无猜吧。

多尔衮和庄妃真正见面是在多尔衮十一岁，庄妃十岁的那一年。这时，多尔衮结婚了，当然结婚对象不是庄妃，不过庄妃也在现场。没人知道她当时是不是满脸醋意，但肯定的是，她会说一些祝贺多尔衮的话：讨老婆了，早生贵子啊！多尔衮则客气地回道：谢谢。

我们无法得知孝庄和多尔衮是什么时候产生感情的，总之满族人比较早熟，据说是吃肉吃多了。

两年后，孝庄也结婚了，当然那时还不叫孝庄，我们为了方便，统称她为孝庄。孝庄已经十二岁了，趁着这大好机会，捞一笔政治资本，这是每一个合格的家长都会想到的。当时，努尔哈赤还没死，孝庄的老爸就看中了皇太极，把孝庄嫁给了皇太极。

孝庄嫁过去的时候，皇太极已经三十三岁了。嫁给皇太极后，孝庄就和自己的亲姑姑一起侍奉这个中年男人。中年男人皇太极也许是个好皇帝，但未必是个好丈夫，哲哲跟他那么多年，硬是没有生下一男半女。科尔沁部把这个光荣的使命寄托在孝庄身上，希望她能一鼓作气生下几个胖小子。

可惜，这个孝庄也很不争气，跟了皇太极九年，毫无动静。没办法，皇太极先生的品位太过挑剔，非得海兰珠这样的极品美眉才能让他爱得死去活来。海兰珠来了不久，就怀上了孩子，本来皇太极爱屋及乌准备立这孩子为太子。可惜，海兰珠争气，孩子不争气，活了两百多天觉得活着没意思，买了张通往天堂的门票。这下，让皇太极和海兰珠伤心得跟什么似的。

大家都很伤心，唯独孝庄很开心。为啥呢？因为海兰珠的儿子死了还没两天，她就生下了福临，敢情这福临是踩着哥哥的尸体上道的。

努尔哈赤死后，孝庄的老公皇太极上位，多尔衮很失落。孝庄可能跟他说：“有啥好失落的，还是不是男子汉！”多尔衮抹着眼泪说：“我老娘被你老公逼死了，能不失落？”“好了好了，别失落了，我陪你出去散散心。”

可以想象，在皇太极生前，孝庄就应该挺照顾多尔衮的。否则等到皇太极两腿一蹬的时候，孝庄再哭哭啼啼地跑到多尔衮面前，那是行不通的，临时抱佛脚在多尔衮这儿不管用。因为多尔衮有寡人之疾，他可能缺少很多东西，唯一不缺的就是女人。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孝庄对多尔衮的投资是长线的，这也是孝庄成功的一个原因。

福临能当上皇帝，离不开母亲的苦心经营，多尔衮绝对不是一个容易打发的客户。福临能够当上这个傀儡，真的应该感谢这个伟大的母亲。

多尔衮耍手段之后，总算当上了摄政王，也就是说大清国的实际领导人。可怜，小顺治才六岁，就被迫离开慈母的怀抱，坐在冷冰冰的龙椅上，看着下面一帮衣冠大臣们发呆。

机会是别人给的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多尔衮的童年。

多尔衮出生于明朝万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年是公历1612年。

多尔衮出生时没有任何奇特的地方，当时还是凌晨，在赫图阿拉城的一间木头房子里，小家伙哭哭啼啼地来到人间。

多尔衮出生的时候正赶上大好盛世，努尔哈赤的企业办得越来越红火。当然，谁也没想到多尔衮将来会成为努尔哈赤公司的实际掌舵者，而且正是因为多尔衮的手腕与智慧，才让大清公司顺利度过危机，避免了破产的命运。考虑到当时竞争的激烈，崇祯、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我们就更加佩服多尔衮的CEO水平了。

努尔哈赤曾经在古勒山大败九部联军，抓获了乌拉贝勒满泰的弟弟布占泰。要知道，满泰的女儿阿巴亥就是多尔衮的母亲。在抓获布占泰后，努尔哈赤格外开恩，没有杀他，反而将他收养。但是，布占泰忍辱负重，在努尔哈赤的地盘苟且偷生，一朝离开，如同越王勾践，迟早要回来的。

智谋方面，布占泰是足够的，可是军事上他远远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布占泰回到自己的地盘后，杀掉亲哥哥，自己当上了贝勒，开始了与努尔哈赤的持久战。中间打打停停，打不过的时候就和亲，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布占泰送到努尔哈赤的后宫中的。

多尔衮在亲情这方面是非常尴尬的，父族是母族的大仇家，这事特别纠结。努尔哈赤最后灭了乌拉，布占泰流亡而死，阿巴亥就相当于败国之女。通常败国之女是做奴仆和奴隶的，至少政治地位是不会高的。

阿巴亥的人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个国家灭亡亲人离散的孤女是否有足够的坚强面对人生这次重大的考验？

我们的担心实在是多余的，阿巴亥绝对是一个女强人。我们就不说她夺人心魄的美貌了，我们就说她的心计、手腕和生存能力，阿巴亥绝对是一个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特别强的人。

努尔哈赤灭掉乌拉之后，举国欢庆。这欢庆的声音在阿巴亥听来是多么刺耳。她陷入了忧患和思索，当时阿济格已经八岁，多尔衮还在襁褓中，多铎还没出世。是啊，这母子三人将来如何在险象环生的后宫中活下去呢？

聪明人是一定会想到办法的，阿巴亥明白，自己与两个孩子的命运全系于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让他们活得很好，他们就可以活得很好；努尔哈赤让他们活得不爽，他们不可能活得舒服。

找到问题的关键，事情就好办很多。阿巴亥对症下药，取悦老男人努尔哈赤，最终不仅保住了原有的地位，还一步步获得了努尔哈赤的宠爱，让这个老男人把大部分的心思都放在她的身上。

史书对阿巴亥的记载非常少，但是有六个字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饶风姿，有机变。一个美貌又狡黠的女人，由于阿巴亥很给力，多尔衮的地位也有了保证。

日子一天天地过，多尔衮没有辜负这大好光阴，他勤于学习，喜好骑射，文武双全，是个不折不扣的上进少年。多尔衮的童年在母亲的庇护下成长，应该说前途一片光明，风雨之后很可能见彩虹。

天命五年（1620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不仅改变了阿巴亥的命运，也改变了多尔衮三兄弟的命运。

这一天，努尔哈赤召集八旗贝勒和大臣们开会，努尔哈赤发表了一番有礼有节的讲话之后，让各个贝勒指天发誓，从今以后一定要友好。努尔哈赤不是一个神经病，他不会莫名其妙地让自己的儿子和侄子们突然之间发表什么“互不侵犯条约”，其中一定有缘由。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人的誓词，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大贝勒代善的誓词，内容是这样的：我没有听从汗父的教导，没有听取众兄弟们的意见，以致听信妻子的谗言，丧失了汗父委托给我的军政大权，现在我手刃自己的妻子，以对过去的罪孽忏悔……

事情的经过是：代善听信小老婆的话，企图杀害自己的儿子硕托。代善这个人好色是出了名的，特别没出息的一个人，他就因为这事把太子之位弄丢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人也根本不配当继承人。

原来，努尔哈赤是借这次开会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第一，代善残害自己的儿子，革去他的太子之位；第二，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做自相残杀的事，都是自家兄弟，要友好（当然，努尔哈赤杀害自己的兄弟是形势所需）；第三，借着这个机会，提出一项新的制度——和硕额真，八个和硕额真共同议事，集体领导。

这对我们的主人公多尔衮来说是一个好事，他因此当上了和硕额真，圆桌边提前给他预留了一张椅子。

代善做的荒唐事可不只这一件，他竟然跟自己的后母富察氏通奸。虽然努尔哈赤没有跟他算账，但富察氏因此而死，阿巴亥顺利地

晋升为大福晋。

晋升为大福晋后，阿济格、多尔袞、多铎的政治地位就提高了一个档次，多尔袞兄弟们在政治上的机会首先要感谢代善这个老大哥自掘坟墓。

我们来看看代善是如何挖掘自己的政治坟墓吧！

第一件让努尔哈赤很不爽的事情是房产之争。根据《满老文档》的记载，代善有一次占了一大块地，在那里修房子。耽于享乐的代善把房子盖得相当不错，比努尔哈赤的住宅还好——这已经是错误了。有天，努尔哈赤过来视察。看到代善的房子修得相当好。代善及时补救道：“这栋房子修得比汗父的房子要宽敞舒适，希望汗父能在这里居住。”

努尔哈赤一听，满意地点头：“代善，你是个孝子啊，那好吧，为父也不客气，就在这里住下，你就去住我的房子吧！”

代善只得去住努尔哈赤的房子，结果很不舒服，老是嫌房子狭窄。二贝勒阿敏知道后，将此事报告给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很生气地说：“如果嫌我的房子不够宽敞，那我就住回我原来的地方吧！既然他舍不得他的这栋好别墅，那你就让他再搬回来住吧！”

就这样，努尔哈赤回到自己狭窄的地方去住，把好的别墅让给了代善。让归让，内心对代善失望是显然的。

这么一看，我们觉得代善实在是太差劲了，你的房子都已经给了老爸，你又舍不得。既要表现得非常孝顺，又要斤斤计较，反反复复的一个人，这样的人不懂韬光养晦。让最高领导人很没面子，这是犯了政治场的大忌。

代善做的第二件蠢事是虐待自己的儿子硕托，要知道，硕托不光是代善的儿子，还是努尔哈赤的孙子。努尔哈赤虽然跟自己的兄弟很不和，但是非常希望子孙后代能和睦相处，因为这些人都是他的子孙。

硕托和岳托都是代善前妻的儿子，岳托是长子，硕托是二子。这时候，代善的福晋是纳喇氏。人们不禁好奇，代善为什么要虐待自己的儿子，甚至打算处死他呢？原来，硕托和莫洛浑（硕托的一个属下）的姐姐私通，阿敏的弟弟斋桑古又和莫洛浑的妹妹私通。结果，这事被人告发，硕托和斋桑古都准备逃跑。努尔哈赤得知他们逃跑的消息，很担心他们叛变。最后，努尔哈赤派人把他们追了回来，杀掉了莫洛浑夫妻，把斋桑古和硕托囚禁起来。代善听到这事，极力主张杀掉硕托。努尔哈赤不答应，代善再三请求，也许他是想洗刷跟硕托

之间的嫌疑，怕人说硕托受他指使逃亡。在努尔哈赤得知他们是因为通奸而逃后，实际上就不准备杀掉他们了。

在努尔哈赤眼里，最大的罪孽不是通奸，别说硕托是和其他女人，就是像代善这样，勾搭自己的老婆，他都能忍。努尔哈赤唯一不能忍受的是叛变，像长子褚英，既没有做出代善那样有伤风化的事，也没有实际的谋反举动，仅仅因为具有了分庭抗礼的势力，就被努尔哈赤干掉了。

其实，代善当时已经面临着跟褚英一样的命运，只是能力差点，所以努尔哈赤觉得没必要下重手。你要杀硕托，老子偏不杀，反而保护硕托，让他跟着爷爷混。

努尔哈赤后来调查发现，岳托和硕托率领的部队比代善其他儿子要差，努尔哈赤要代善给出个理由。代善始终不肯正面回答，反而说硕托跟自己的一个小妾通奸。努尔哈赤很愤怒，你听信小老婆的鬼话，故意打压硕托，还说他和你的小老婆通奸。经过调查之后，努尔哈赤发现代善确实诬蔑硕托，便让代善亲自动手杀掉那个小老婆。

就这样，努尔哈赤废掉了第二个太子代善。太子之位一直是空的，皇太极不是以太子的身份上位，是通过权力斗争的途径登上了宝座。皇太极能够荣登大宝是因为阿巴亥集团的势力太强大了，如果阿巴亥弱一点，或许皇太极上位不会这么快。正因为阿巴亥强，大家都怕她，所以才坚定地支持皇太极，打掉阿巴亥集团的首脑阿巴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巴亥是努尔哈赤害死的，他不应该给没有丝毫战功的阿济格、多尔袞和多铎那么高的政治地位，甚至让他们各掌一旗。当然，努尔哈赤的和硕额真制度也是值得推敲的。有人曾认为这种制度颇具民主的雏形，其实这个跟民主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努尔哈赤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后代自相残杀，还有一点是他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后金国的统治。

努尔哈赤错了，和硕额真制度不但不利于团结，反而加剧子孙相煎的急迫性，而且更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统一。这种做法等于是将国家分成八个山头，山头与山头之间，军阀和军阀之间，大家说能和平共处吗？

民主制度的精髓是政府只有经过民选才是合法的，所以努尔哈赤的和硕额真制度跟民主制八竿子也打不着。皇太极上台之后，当然会打压那些限制自己权力的和硕贝勒，他这么做是没错的。如果不这么做，政令无法推行，政府高层就会陷入窝里斗的泥潭。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在斗倒阿巴亥集团和收回领导权力方面，皇太极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皇太极死后，多尔衮面临着跟皇太极当初相似的局面，不过多尔衮终究是棋差一着，没有打败皇太极集团，无缘九五之尊。

但毕竟当上摄政王也体现了多尔衮的个人能力。

第二章 逐鹿中原

当时的形势下，吴三桂是一个决定性的人物，就像楚汉争霸时的韩信一样，他把力量押在哪边，哪边的胜算就大大提高。在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吴三桂成为了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筹码。刚开始的时候，吴三桂的重要性不仅李自成没有想到，连多尔衮都没想到。

三桂大兄

我们再回到皇太极刚死不久那会儿，多尔衮将朝政摆弄妥帖之后，听到李自成正向北京挺进的消息，大喜。

喜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多尔衮是不会放过的，他将国政交给另一个摄政王济尔哈朗，自己率领大军向南挺进，企图大干一场，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未能实现的梦想。

在动手之前，多尔衮派人联络李自成，提出大家有福同享的口号。李自成没理他，心想我被洪承畴打得抱头鼠窜的时候，没听说你要跟我有难同当，现在想有福同享，没门。这让多尔衮很不爽。在出征之前，多尔衮曾咨询资深谋士范文程，范文程建议他入边直取北京，同时建议他严肃军纪。

大将军多尔衮率领十四万人马，浩浩荡荡地向中原冲去。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九（农历），多尔衮从盛京出发，一路上所向披靡，进展非常神速。四月二十一日，大军抵达山海关，镇守山海关的是明朝著名将领吴三桂。

吴三桂本来也可以算是大明的铁杆粉丝，他的老舅祖大寿曾经劝他投降，他坚决不同意，表示三桂生是大明人，死是大明鬼。在京城被攻破之前，崇祯急调吴三桂回京师勤王。吴三桂接到圣旨，二话没说就上路了。在走之前，吴三桂还把宁远城里面的物资和建筑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这一走，宁远肯定是保不住了。

吴三桂虽然看起来很听话，但是他的表现却让人很诧异。他不光是带兵走，还把老百姓也迁走，模仿刘备那招“爱民如子”。如果只是正常的迁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时候，皇帝的脑袋都快保不住了，你还带着五十万的老百姓慢悠悠地往回赶，人多物多，行军速度非常慢。吴三桂这么做也有他的理由，一方面他的家人还在北京，如果他

不回去勤王，崇祯可以把他全家人脑袋全部砍下来。但是，如果真的急行军回去，他不过几万铁骑，而面对的是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实力悬殊太大了，吴三桂这么精明的一个人，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做亏本生意的。

吴三桂刚到河北丰润的时候就听说李自成已经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不知道吴三桂究竟是什么反应。我估计他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感觉脚下的大地在塌陷，突然之间好像变成了个大明孤儿，不知道何去何从。

经历过最初的惘然之后，吴三桂不得不面对现实，冷静思考。摆在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是投降李自成；要么是投降清军。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吴三桂选择了李自成，一方面因为自己的家人都在他的手中，另一方面也因为大家都是汉人。投降李自成后，自己好歹也算是开国元勋，不能封王，至少也能封个侯。明朝的许多文武大臣都投降了李自成，自己不能跟不上潮流。

李自成方面，对吴三桂也是非常重视的，他进京后就给了吴三桂一封招抚书，你归顺我之后，封侯是底线。吴三桂安心了，大汉民族本一家，崇祯是老板，李自成也是老板，谁对自己好就是好老板，以后就踏踏实实地跟着李老板做事吧！我们前面提到，吴三桂的老爸吴襄是一个逃跑能手，归顺李自成后，他也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说这个李老板人真好，对我非常不错，现在天命属于李老板，孩子，你一定要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老爹的一番期望。

吴三桂好歹算是个孝子，于是，欢欢喜喜地去北京，而且一路上贴告示安民：“我吴三桂率领部队去朝见新老板李自成，一路上定当秋毫无犯，大家不必惊慌”。

要知道吴三桂最后为什么背叛李自成，我们还得先了解一下李自成进京后做了什么事。

李自成的农民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入北京后，李自成欣喜若狂。士兵们好多天没有吃饱饭了，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犒劳他们，打赏弟兄。可是，进入皇宫后，李自成大失所望，他遍寻皇宫，只搜出十七万两黄金，十三万两白银。李自成当时的反应不仅是失望，简直就是骇异，堂堂大明怎么会穷到这地步。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银子的话，是很难打发这帮为自己卖命的兄弟的，李自成陷入了不安之中，他担心军队会因此而发生动乱和哗变。

焦头烂额之中，刘宗敏献出了一条“宝计”：“老大，犹豫个啥，向京城的大户人家动手啊！”第一个向李自成献财的是曹化淳，献出五万银两，当农民军发现致富的途径如此简单之时，危机在暗暗酝酿。

当时，李自成似乎没有什么别的选择，百万大军等着吃饭和用钱，除了抢劫似乎找不到更好的出路。所以说，李自成是亡于形势，并非完全是后人说的腐化堕落。

后来，新朝宰相牛金星发布布告：“明朝的各官都要按次序来朝见新王，违令者斩。”

李自成把勒索明朝官员的事交给刘宗敏和牛金星，刘宗敏对这些人懒得审问，规定了各级官员必须献银的数量。然后下达一条非常简单的命令：“献出银子者免死，不献者，大刑伺候。”

刘宗敏虽然是个武夫，事实证明，在酷刑方面他是很有天赋的。一夜之间，北京城内此起彼伏的是官员的惨叫声。富人惨了，严刑拷打不说，家里还被抄。千万别以为穷人就翻身了，穷人也很惨，家里的粮食被抢掠，充作军粮。

整个北京城一片惨像，这时连李自成也看不下去了，他质问刘宗敏：“你们怎么就不把我的形象当回事呢？”

刘宗敏也是个非常厉害的人：“你是皇帝，行政大权归你，我是武将，杀烧抢掠这些事归我。大哥，你就别废话了，放手让我干吧！”

李自成沉默了，刘宗敏虽然是自己的属下，实际地位却几乎跟自己平起平坐，很多时候根本不买这大哥的账。回想李自成刚进京的时候纪律严明，到现在竟然变成了一帮强盗，简直让人痛心。

最糟糕的是，第一个向李自成投降的明朝国戚李国桢居然是第一个被拷打致死的。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案例，等于告诉世人，你们千万别向我李自成投降，投降我的没有好下场。

李自成脑袋这时候可能也进了不少水，他杀死李国桢的理由居然是：“你受大明皇帝宠信，按道理应该以死殉国，现在厚着脸皮向我投降，你好意思我还不好意思呢！”

事实证明，刘宗敏是个虐待狂，他自己没读书，虐待起读书人来如鱼得水。

暴力是获得财富最快的方式，李自成成功地证明了这点，仅仅几天的时间，李自成就从一个穷老板变成天下首富，聚敛财产达七千万银两。这个数目实在是太恐怖了，恐怕只有清朝的和珅才能让李自成逊色，可惜和珅是通过几十年的巧取豪夺，而李自成只不过几天时间就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吴三桂的父亲也在严刑拷打的范围之内，就在吴三桂屁颠屁颠地

往京城进发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这个消息，当真如五雷轰顶。再听说京城几乎沦为屠宰场和火葬场时，吴三桂简直崩溃了。自己这一进京的话，估计就是羊入虎口。所以呢，吴三桂降清并不是因为什么陈圆圆，陈圆圆只不过是一个漂亮的妾室而已。吴三桂首先是为了自保，其次是为了老父和一家老小，最后才是因为陈圆圆。

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只不过是明末的遗老写诗讽刺吴三桂而已，那批遗老非常痛恨吴三桂这个汉奸，所以丑化他为了一个妾室居然卖国求荣，不仅是一个不忠的人，也是一个不孝的人。

就算没有陈圆圆，吴三桂也是铁定和李自成撕破脸的。当时，吴三桂想到的是向清军借兵，而且是以大明孤臣的身份，口号是为崇祯复仇，多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李自成亲自带兵征讨吴三桂，军队不到十万人，随军同行的还有吴三桂的父亲以及崇祯的三个儿子，以此逼迫吴三桂就范。

吴三桂当然不肯就范，给多尔袞发了一封急信，请求清军支援。收到吴三桂的信，多尔袞是犹疑的，一是担心吴三桂这个逃跑专家骗人，另外也不了解李自成的底细，不知对手几斤几两。

吴三桂先和李自成交手，结果这支著名的关宁铁骑竟然不是李自成的对手。其实，清军本来的路线不是往山海关方向走，洪承畴熟谙中原地形，担心李自成洗劫北京后逃往西安，便让清军从蓟州和密云出发，切断李自成的退路。多尔袞接到吴三桂献关的消息，大喜，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直奔山海关。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山海关，在关外的喜峰岭上结营。在喜峰岭上，吴三桂与多尔袞开始了一场艰难的谈判。多尔袞要给吴三桂裂土封王，要求吴三桂归降；而吴三桂坚持要做大明孤臣，向多尔袞借兵，强调自己是“融资”，而不是被兼并。

听说李自成大军正往山海关赶来，多尔袞和吴三桂暂且抛开分歧，共同面对这个大敌。李自成从探子那里得知吴三桂与清军勾结，不敢贸然挺进，派遣明朝降将唐通和白广恩率领先锋骑兵赶到抚宁县东南一个叫“一片石”的地方。多尔袞本来还是比较忌惮李自成的，想想看自己两位前任领导折腾了那么多年也没攻下北京城，而李自成这个农民几个月的功夫就拿下了北京城，不是非凡之人又是什么。

唐通和白广恩的到来给了多尔袞一个测试的机会，他想测试大名鼎鼎的李自成军队有多大的本事。结果一试就试出来了，清军打得唐通和白广恩抱头鼠窜。这一战只能说是过过手，清军虽然胜利了，但是对整个大局没有影响，可以算是清军的才艺表演，给吴三桂这个客

户展示自己产品的质量。

为了进一步说服顾客，多尔袞又说：“三桂大兄为故主复仇，大义凛然。现在我率领大军入关，一定会严令士兵遵守纪律。如果有人敢抢哪怕只是一粒米，敢动哪怕一株草，我都会严惩不贷的。希望三桂大兄告诉关内的百姓，看到清军来了不要惊慌，大家都是友军。”

三桂大兄很感动，两人宰白马乌牛祭天。多尔袞看套住了三桂大兄，便得寸进尺：“三桂老兄，你还是剃剃头发吧，你看你头发都这么乱了，弄成像我这样的发型多好啊！”

三桂大兄当时准备冒火，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剃不行啊！只好跟着几个高级将领换了个发型，明军一时之间没法剃发，多尔袞便让他们在身上缠白布，混战之战，看到缠白布的，清军就知道是“盟友”。

条件都谈妥之后，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多少年来，多尔袞和皇太极的梦想在这一天变成现实，而且是兵不血刃，明朝人自己打开了这号称“天下第一雄关”的山海关。

李自成的灾难开始降临了，就人数来说他只有清军的一半。就战斗力来说，虽然他的农民军训练有素，但还不是清军铁骑的对手，就人心向背来说，李自成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支替天行道的王者之师，相反已经堕落为一支跟强盗部队。

李自成虽然知道吴三桂跟清军勾结，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清军已经入关，也就是李自成根本没想到吴三桂可以卖国卖得这么快，卖得这么有效率。

相对来说，李自成的压力不是很大，他觉得只要解决了吴三桂，然后据守山海关，抗拒清兵是不会有问题的。从这点可以看出，在搜集军情这块儿，李自成做得是非常失败的。

有道是哀兵必胜，用在三桂大兄身上似乎不是很合适。吴三桂的兵，那绝对是哀兵，皇帝被人端了，父子兄弟老婆被人挟持侮辱，这些事情实在是太可哀了。可惜，再大的悲哀也不能化为战斗力。吴三桂这支前锋和农民军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打着打着就快不行了，而此时李自成正带着吴三桂的老爸和崇祯的三个儿子站在高岗上悠闲地瞭望。

忽然，李自成大惊，原来一群辫子兵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李自成虽然也是从血雨腥风里走出来的人杰，但是看到这一幕也差点晕了，赶紧掉转马头逃跑。关键时候，就可以看出李自成不是一个一流的领导，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局限性。

李自成这一逃跑，就是用脚趾去想我们也能想到是什么结果。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奔逃的速度那是非常快的，农民军尸体的数目是跟李自成逃跑的速度成正比的。假如我们画一条描述李自成逃跑的路线图，我们会发现这条路线的前三四十里堆满了农民军的尸体。

多尔衮看到这么多的尸体，又看看身边的吴三桂，心想要是没有眼前这个人，就没有今天这么丰富的斩获，高兴之下，多尔衮立刻封吴三桂为平西王。

吴三桂和清军入关后，仍然存着复明之心，他进京后让人告知百姓和官员，让大家做好准备迎接崇祯的儿子继位。多尔衮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急了：“三桂大兄，你还想不想混了？”

吴三桂没办法，现在别人是大爷，自己是孙子，只能按照多尔衮大爷说的办。

闯王大哥

山海关一战失败后，李自成带着几千残兵，逃到永平。为了发泄愤怒，他把吴三桂的老爸千刀万剐，最后把首级挂在高杆之上。这种行为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出出气，但丝毫不能改变什么，就是让吴三桂更加恨李自成这个人。

令人吃惊的是，自从山海关一战失败后，曾经百折不挠的“闯王大哥”李自成忽然变得一蹶不振。二十六日，李自成逃到北京，手下只剩三万人。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匆匆忙忙地称帝，将吴三桂家里三十四口人统统杀掉。闻知吴三桂和清军进逼北京后，李自成火烧紫禁城，带领军队由山西河南两路逃亡西安。

有人评价李自成是一个不及格的政治家，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不仅是因为李自成用人不当，也是因为他缺乏一个领导者必备的手腕。

我们来看看李自成的人生履历。

李自成本来只是一个驿站中的无名小卒，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就是这么一个低薪的工作也没能保住，失业后，李自成为了混口饭吃，开始当强盗，造反。

李自成原名李鸿基，没读过什么书。十三岁的时候就和一帮无业青年在关帝庙里拜把子，由于李自成这个人很讲义气，再加上膂力过

人，骑射功夫了得，在当地有一定的号召力。李自成也不是天生就是反骨仔，在驿站工作的时候，他还是非常安分守己的，工资虽然不多，足够养家糊口，他就心满意足了。

可惜，工作没几年，明政府迫于财政的压力大幅裁员驿卒，这个新政策一下来，没什么背景的李自成就下岗了。下岗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连低保都没有。这样，一家老小没什么活头了。为了生存，李自成决定再找一份工作。可是很快他就发现，这年头工作特别难找，最好的且成本最低的工作就是造反，虽然风险大了一点，但是利润相当诱人。

李自成带着一帮流氓无产者，开始踏上一条崭新的道路。据说，在这之前，李自成还有过一段秘史。李自成失业之后，生活过得非常拮据，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打算造反。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他改变了初衷，他的老婆因为忍受不了贫穷的生活，背着他偷人。全身都是血性的李自成如何忍受得了戴绿帽子的耻辱？李自成一怒之下，干掉了老婆，逃到了偏远地区投军。

事实证明，李自成还真是打仗这块料，在军中没待多久就升到了把总的位置，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团长。那时候的李自成年轻气盛，性格非常冲动，当上把总后，他也只是一介武夫。平时有话不爱好好说，跟人谈不拢就抡起拳头狂扁别人。后来，因为欠饷的事情，居然把自己的上司给干掉了。

那时候的李自成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武夫，丝毫没有胸怀天下的志向。他造反不是为了推翻明朝，而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对他来说，造反就是抢劫。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李自成一造反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强盗，看谁有钱就抢谁，丝毫没有劫富济贫这种意识。

后来，有两个文人投靠了他，让他改变了政策。这两个文人就是李岩和牛金星，这两人关系虽然不好，但是一致同意要想干大事，必须收买人心。

李岩和牛金星都是通晓历史的，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农民起义虽然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但是，真正通过农民起义最后当上皇帝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建立大汉的刘邦，一个是建立大明的朱元璋。这两个人能当上皇帝，固然天时地利的因素很多，但绝对是有主观上的原因的。其他那些农民起义的领袖为啥就成不了大事呢？这跟领导的个人能力绝对有关系，但最关键的还是会不会用人。刘邦也好，朱元璋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非常会用人。

李自成刚开始完全是一个山大王，根本没有用人的意识。而且他还非常多疑，只要他看不惯的人，或者他认为有威胁的人，就直接铲

除，不考虑任何后果。手段残忍冷酷，没有理智。

所以，在李自成刚开始造反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深得民心，老百姓把他看成是个黑社会老大，对他防着呢！那些跟着李自成抢劫的，基本上都是流氓无产者，厌恶工作，喜欢不劳而获。

崇祯十三年年的时候，李自成被明军将领左良玉打败，逃到河南。在河南，他结识了李岩和牛金星，后来牛金星又给他推荐了宋献策。正是这些文臣谋士的加入让李自成逐渐地有了王者气象，在这些人的建议和改造下，李自成这支部队不再是一支毫无纪律的流寇部队，而是一支有理想有目标的正规军。

李自成率领大军向北京进逼的时候，崇祯本来是准备南迁的，连逃跑路线都确定了，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只等拔腿就逃了。

崇祯为何最后没有选择逃跑呢？

是这样的，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前的一个月，崇祯有一次召集群臣讨论南迁事宜。李邦华和李明睿都主张南迁，大家知道，崇祯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他即使心里想要南迁，也一定要大臣提出来，大家都觉得应该这么做，才会行动。

听了两个大臣的建议，崇祯又把眼睛转移到内阁首辅陈演身上，在此之前，崇祯曾经对陈演说过，南迁这个事还得先生表态啊！那意思很明显，即便是南迁，也要大家高高兴兴，都这么想才成。陈演如果点点头，也算是给皇上面子了。可惜，这个陈演城府太深了，他没有点头，也没有反对，只是沉默，令人难堪的沉默。

崇祯再三套他的话，希望他能赞成，可惜陈演不为所动。陈演到底在想啥，如果不了解官场那是很难知道他的心思的。有人总结做官的经验就是“多磕头，少说话”，陈演的想法大概也很类似，不赞成会得罪皇帝，搞不好还会亡国，到时后人就会把责任推到自己头上；赞成的话，大家也会骂自己这个首辅是个缩头乌龟，敌人来了就逃，跟南宋那帮没用的大臣有什么分别。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沉默，沉默无罪，开口有罪。

崇祯只好问他，你身为首辅，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你得拿主意啊？陈演是怎么回答的呢？陈演说，南迁一事是李邦华等人的主意，皇上圣明，一切全凭皇上定夺，此事微臣实在没有发言权。

听到这个回答，崇祯很愤怒，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感觉自己被鄙视了。陈演虽然没有直接鄙视他，但间接地鄙视了他。本来，提出南迁他就觉得脸上挂不住了，现在你陈演这种态度，分明是让他这个皇帝难堪。

就这么，也许只是为了一口气，崇祯决定放弃南迁。

人们常说人活一口气，其实更多的时候不应该为一口气冲动。崇祯这辈子就是太意气用事，导致了那么多的失败，如果他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忍气吞声，大明江山或许不会亡在他的手中。

在这朝堂之上，崇祯说出了一句气话：“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死就死吧，有啥大不了的，我是皇帝，活该为国家殉葬。

大家一听这话，知道皇上较真了，大学士蒋得璟提出一个权宜之计，建议让太子在京城监国，皇上带着文武大臣南迁。

可惜，崇祯一口回绝，由此可见，崇祯的脾气确实非常犟。

到李自成进京后，我们终于明白为何陈演当初沉默了，他和成国公朱纯臣带着文武百官跪迎李自成。在欢迎新君的工作上，陈演表现得非常积极，尽管如此，也没有收到预料中的效果，陈演很快就发现自己是在用热脸贴李自成和刘宗敏的冷屁股。

陈演这个人虽然在崇祯面前一副深沉模样，实际上在背后尽干些欺上瞒下的勾当。投降李自成后，他发现自己非但没有受到优待，反而备受侮辱和欺凌，刘宗敏的夹棍还没上来，他就乖乖地献出四万两银子。够大方吧，之前崇祯让他捐款打仗的时候，他一再说自己清廉，毫无余钱。花钱未必能买回命，李自成出征山海关之前担心后方这些明朝元老们作乱，决定将这些人斩首。陈演一听，吓得尿裤子，立即表示如果李自成能够网开一面，他可以献出自己所有的钱助饷。

尽管陈演付出了所有，最终还是难逃一死，相信他死的时候应该很怀念崇祯吧！

历史的关口

刘宗敏，陕西蓝田人，跟李自成是老乡。刘宗敏是打铁出身，身材非常魁梧，打仗从来不怕死。在李自成成功的路上，刘宗敏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李自成在潼关被围的时候，刘宗敏可以说是一直在李自成身边，跟他突围而去。

所以，李自成对刘宗敏非常器重，把他看成是好兄弟，两人之间更像是兄弟关系，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刘宗敏掌握着大顺军最精锐的部队，在军队中很有号召力，虽然他没什么文化，说话直来直去，但是在军队中他稳坐第二把交椅。

进京后，催饷的事情就落到刘宗敏头上。事实证明，刘宗敏的办事效率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他根本不讲任何道理，上来之后直接就大刑伺候。不拿钱就让你体会生不如死的感觉，比如他摧残大学士魏藻德就是一个极好的反人道例子。

刚开始刘宗敏让魏藻德掏钱，魏藻德说没有。

刘宗敏也没有驳斥他，而是问道：“你身为首辅，搞得天下民不聊生，你脸红不？”

魏藻德不脸红，说道：“那是先帝崇祯的责任，跟我没有关系。”

刘宗敏一听，立即让人掌嘴，骂道：“你吃崇祯的喝崇祯的，现在崇祯死了，你说他坏话，你这人也太不厚道了吧！打，给我狠狠地打。”

魏藻德还是状元出身，典型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哪里经受得住这种拷打和侮辱，立即表示要钱可以商量，甚至还说家里有个漂亮女儿，如果军爷看得起的话……

听到有钱有女人，刘宗敏自然不含糊，让人停止掌掴魏藻德。魏藻德钱拿出来了，女儿也献出来了，最后家产全被抄了，如果能保住命也算不错。但魏藻德连命也没有保住，先是手脚被夹断，最后脑袋被夹破，脑浆迸裂。

在刘宗敏的高压政策下，京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刘宗敏几乎没有一天不杀人的。

进京之后，农民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光是刘宗敏，大家都失去了理智。这时候，头脑清醒的两个主要人物是李岩和宋献策。狗头军师牛金星这时候也没有大局感，他唯一考虑的是自己宰相的位子，对李岩和宋献策这些人非常疑忌，担心他们跟自己争夺宰相之位。

刘宗敏没什么文化，跟着他混的那些弟兄们也没什么文化，大家对造反的理解非常简单，就是拿到银子后回到老家，做个地主乡绅，过着“老婆儿子热炕头”的生活。

李自成百万大军进京后数量锐减的一个原因是，大家抢到了钱，许多人揣着金银逃回家乡去了。一般老百姓造反不就是为了钱，为了老婆孩子吗？有了钱，谁还有心思拼命。

李自成出来混这么久，虽然不像自己的部下农民意识那么强烈，但本质上还是一个农民。他虽然知道要当皇帝，却没有考虑到当皇帝后，如何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情况。没有处置刘宗敏就是他很大的一个失策。

崇祯虽然上吊自杀了，但李自成并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的局面不容乐观，准确地说是危机四伏。但李自成并没有这种危机意识，从他只派区区几千人镇守辽东防线就可以看出，他既没有对形势的清晰认识，也没有那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感。

当时李岩曾经给他上书为他贡献问鼎天下的战略，李自成仅仅在上面批复：知道了。“知道了”这三个字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李自成心不在焉的样子。李岩的奏疏其实简单明了，一点也不复杂，他指出了四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筹备登基大典；二、追赃的时候要区别对待，对于清廉的官僚应当赦免；三、把京城的兵马调到城外驻守，听候调遣；四、招降吴三桂，封他为侯。

李自成真正关心的是第一个问题，说实话，李自成这时候的心理肯定是浮躁的。他老惦记着皇位，心中容不下其他的东西。追赃一事由刘宗敏全权负责，李自成不想管也管不了。第三个问题也没法解决，农民军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北京，你不让他们进城，等于是断送他们的财路。李自成毕竟不是朱元璋那样的铁腕人物，这一点也没法做到。至于第四个问题，更是被刘宗敏搞砸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吴三桂重要，但显然李自成、刘宗敏这些人丝毫没有意识到吴三桂到底有多重要。在当时的局势下，吴三桂不是一般的重要，而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在刘宗敏的追赃过程中，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未能幸免，一身老骨头哪能经得住粗暴的拷打，更令吴三桂气愤的是自己最漂亮的小老婆陈圆圆落入刘宗敏的手中，沦为玩物。如果这时候，李自成能够杀掉刘宗敏，也算是对吴三桂的一个交代，或许能挽回吴三桂。

当时的形势下，吴三桂是一个决定性的人物，就像楚汉争霸时的韩信一样，他把力量押在哪边，哪边的胜算就大大提高。在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吴三桂成为了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筹码。刚开始的时候，吴三桂的重要性不仅李自成没有想到，连多尔衮都没想到。

对于李岩的上疏，并没有引起李自成的重视，他根据自古以来形成的经验，明朝已经亡国，大顺朝取代明朝是顺理成章的事。李自成进京后，就派遣了明朝官员到地方上去任职，在李自成的意识里，定鼎中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没想到这中间隐藏的变数比他想象的要多得多。

李自成可能还抱着这样一层想法，吴三桂你现在走投无路了，你不得不投降，就算我不给你开支票，你也得投降我，更何况我还给你开了支票。

吴三桂最后选择与李自成对抗，虽然有冲冠一怒的成分，但更多

的还是理性选择。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认准李自成不是一个好老板，至少李自成的集团让人失望，加入这个集团是绝对不会有出息的。

吴三桂是一个心思非常深的人，说他是老狐狸并不过分，对于老狐狸最忌讳的就是采取武力。老狐狸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争取的，但李自成根本没有争取他，而是选择了直接开打，这绝对是下下之策。李自成这么做无异于逼吴三桂走上绝路，没有回头的余地。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李自成没有作出冷静明智的判断，从而造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失策，也因此葬送了大顺江山。

李自成的败亡

吴三桂从宁远城撤走后，等于是把关外防线拱手让给清军。当然，这时候已经无所谓让不lets了，明帝国的大厦已经崩塌，天下是谁的都还说不清楚。

多尔衮是一个对利益特别敏感的“商人”，李自成一攻破北京，他就知道有利可图，而且是大利。

中原现在是一个大蛋糕了，如何宰割这个大蛋糕，收获最大的利益是当前多尔衮考虑的问题。清朝以前是一支强盗军队，每次都实行定点抢劫，抢完之后就打包走人。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是该好好冷静下来，琢磨琢磨新的战略了。形势变了，政策也得跟着变。

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多尔衮觉得有必要咨询一下资深战略家范文程。这时，范文程正在泡温泉疗养，听到多尔衮召见自己，马上从温泉里爬起来，星夜赶往盛京。

范文程不愧是老江湖，一眼就看出现在跟秦末时的乱世差不多，老百姓最期盼的是出现真龙天子。范文程明确地指出，现在必须要争夺天下，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李自成。为了和李自成争夺天下，我们必须改变策略，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打砸抢烧，要安抚天下百姓。

在得到范文程的首肯后，多尔衮倾巢而出。也是多尔衮运气好，大军还没出动，吴三桂就投怀送抱。范文程当即建议，吴三桂这个人先拉拢，等大局定了以后，说话就由不得他了。

农民军在京城烧杀抢掠的时候，听说吴三桂“背叛”，李自成御驾亲征，双方在“一片石”一带展开了激战。战况非常惨烈，死伤甚众。清军突然出现让李自成猝不及防，李自成眼看形势不对，立即逃跑。

李自成逃到北京后，匆匆忙忙地举行了登基大典，算是百忙中圆

了皇帝梦。虽然明知这个梦不会长久，很快就会破碎，但李自成顾不上那么多了。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至少得过一把皇帝瘾。

多尔衮和吴三桂的大军跟在后面穷追猛打，李自成知道北京是待不下去了，决定回到老家西安。从北京到西安有两千多里的路程，李自成逃跑的过程中带了大量的金银珠宝，还没有出河北，就被清军狠狠地打了一顿。

这一仗发生在河北正定，李自成依山布阵，准备利用地形的优势，跟清军大干一场。没想到人一走下坡路，连老天都欺负，仗打到一半，突然间东风大作，黄沙漫天，而且风还是往李自成部队的方向吹。再加上李自成中了箭，军队士气大减。

这一战李自成输得又很惨。

李自成失败后，许多原先投靠大顺军的明朝遗老们纷纷举起反对李自成的大旗。失败加上叛变，让李自成变得多疑，原本挺不错的一个大哥忽然之间变得脾气乖戾，居然听信狗头军师牛金星的谗言，杀害了忠心耿耿又有贵族器量的军师李岩。

李自成杀李岩一方面是听信了牛金星的谗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后期老是犯错，没听李岩劝告，心里早已对李岩不满。这个时候，大顺军应该何去何从，在高层发生了分歧。一派主张往山西撤退，进军河南；一派主张是进军河南，最后退往陕西。

这两种方案虽然殊途同归，但里面却大有学问。李岩就是因为主张进军河南，受到李自成的猜忌，最后被杀掉的。李岩为什么要主张进军河南呢？因为现在农民军正处于低谷，河南的许多官员要么投降清朝，要么投降南明，人心不稳。李自成之前在河南累积了一定的声望，收复河南，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困难。目前，河南由南明控制，清军不敢轻举妄动，南明军队的作战能力就不说了，所以收复河南、东山再起是很有希望的。

李岩的战略是非常正确的，大军在河南一旦崛起，可以趁机捣平江南，大顺军就有可能起死回生。根据李岩的判断，南明政权不得人心，只要大顺军南下，一路上绝对是望风而降。李岩确实有大局观，但是李自成却疑神疑鬼，担心万一失败，会出现什么后果。李自成的迟疑给牛金星钻了空子。

牛金星私下里也认为李岩的战略有很大的可行性，在当时流年不利的情况下，应该说李岩指出的道路是一条光明的道路，考虑到李岩深谋远虑，这事八成可以办成。但是，成功之后，李岩必定是第一功臣，是丞相，到时候我老牛的地位往哪摆呢？为了保住自己丞相的地

位，牛金星决定背后给李岩一刀。

牛金星秘密找到李自成，对他说，李岩这个人非同一般啊！李自成说，没错啊，如果他很一般的话，我为什么要用他。牛金星说，老大我不是这个意思，李岩这个人能力特别强，他现在忠于老大是因为翅膀还没有长硬，一旦他重兵在手，是不会甘居人下的。

李自成一听，眉头打结。牛金星趁机又说，老大啊，这河南是什么地方啊！李岩的老家啊，到了那里，李岩一呼百应，到时你怎么办呢？十八子主神器，别到时候主神器的是李岩。

人的话语有时候就像刀剑一样锋利，牛金星的话句句插进李自成的心里。

李自成就问老牛，怎么“办”李岩？牛金星史学功底是相当厉害，想也没想就说鸿门宴。李自成不是项羽，李岩也不是刘邦。李岩最终被杀，李自成也没有夺得江山。此时，李自成的败亡已经成为定局。

一个月后，李自成从山西撤退到陕西。又过了八个月，多铎带领清军攻入西安，李自成又退回到以前打游击的商洛一带。

到了顺治二年的时候，李自成向湖广一带撤退。牛金星眼看李自成气数已尽，带着一帮人开溜了。1645年3月下旬，李自成撤离武昌，顺着长江东下，清军紧追不舍。在江西九江一带，李自成被清军偷袭，损失惨重。这一战，大将刘宗敏和军师宋献策被俘虏，清军直接处死刘宗敏，接受宋献策的投降。

最后，李自成逃到湖北的九宫山，一般的说法是他战死了。

正所谓天道有时，李自成把握住了打江山的机会，却没有把握住守江山的机会。历史曾经选择了李自成，但李自成的表现太让历史失望，所以历史最终又抛弃了李自成。

李自成的一生，尤其是他最后的岁月，如谜一样笼罩在世人们心中。我们来说说这个让后人困惑迷惑又爱又恨的闯王大哥吧！

第一，李自成的民族是个谜，一般人都以为李自成是汉族的，陕西米脂人！陕西米脂人没错，是不是汉族就得打一个问号了。《明史·李自成传》记载：“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李继迁是谁呢？李继迁是宋朝时党项族首领，老是跟宋太宗捣蛋的一个人。明史还记载李自成高颧骨、深眼睛、鹰钩鼻，典型的鲜卑人长相。李自成自己也认为是李继迁的后代。

李自成的第十五代孙、中国明史研究会会员李志强说：“李自成是西夏王李元昊之后，是党项民族拓跋氏，至今，闯王后裔仍保留着

原有民族的特性、相貌和习俗。”

西夏专家唐荣尧曾经跑遍大西北，经过考证后也认为李自成是党项人的后裔。《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经过实地考察后也认为李自成是西夏人的后代。

李自成是党项人的后代在学术界基本上是公认的，但是考虑到历史过程中的民族大融合，说李自成是汉族也没错。

关于李自成的第二大谜是为啥进京的时候百万大军，到征讨吴三桂时为何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马。有人说是瘟疫，但这个说法毕竟证据不足，只是猜测。这是一个谜，可能很多士兵抢了银子逃走了，也有可能军队内部发生分裂。然而，事实无法改变，李自成进京后，不仅军队的战斗力大减，而且军队的数量也大减。

李自成第三大谜是跟刘宗敏的关系，在人们的印象里，李自成和刘宗敏是铁哥们，两人很早就开始起义，刘宗敏一直对李自成忠心耿耿。进京后，据说刘宗敏霸占了陈圆圆，跟李自成闹出了不少的矛盾。男人为女人争风吃醋是正常的，但应当不至于因为这个原因影响大局。所以我们还得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刘宗敏跟李自成的关系，刘宗敏战功赫赫，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

刘宗敏在李自成集团中一直是第二号人物，之前可能还比较听李自成这个大哥的话。到了北京之后，曾经骁勇善战的刘宗敏好像变了一个人，沉浸在金银山和温柔乡中，整日跟陈圆圆缠在一起。除了腐化堕落之外，刘宗敏最大的乐趣是残暴，折磨明朝官员，奸污他们的妻女，可以说坏事都被他做绝了。但李自成却没有惩治他，可能是出于兄弟情义，也可能是顾全大局，总之非常为难。刘宗敏经常不把李自成的话当回事，李自成要当皇帝，刘宗敏第一个不满意。所以说，两人的关系是既有兄弟情义，又有很深的矛盾。后来，征讨吴三桂的时候，刘宗敏就公然不甩李自成，态度极其无礼。

李自成最大的一个谜还是生死之谜。七月份，李自成败走西安，后来又被清军赶出西安，全国各地流窜，最后逃到湖北通山县的九宫山，据说战死在这里，当然这只是学者们的看法。一般人死了就死了，没那么多事，可是李自成这一死，就死得扑朔迷离。之前，李自成就“死”过好多次了，结果都没死。

所以，关于李自成的生死就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死了，一种认为他没死。

我们先说认为他死了的这一派观点，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既然李自成死了，那他是怎么死的呢？

第一种说法是自缢说，说是自己上吊死的。阿济格向多尔袞奏报，说李自成逃窜之时，最后只剩下二十几个人，被村民们困住，逃脱不了，不得不自杀身亡。首先声明，阿济格没有亲眼看到，也是道听途说的。这种死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阿济格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多邀一些功劳。想李自成是何等人物，居然被村民困住了，而且还不得不自杀，李自成是杀人放火专家，村民看到他躲避都来不及，还敢困他？

第二种说法是战死说。根据《通山县志》的记载：“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九伯就是当地的一个豪族程九伯，先不说程九伯是不是真的杀了贼首，就算杀了贼首就一定是李自成吗？李自成手下那么多将领，任何一个将领都可以说是贼首。根据《程氏家谱》的记载：“剿闯贼李延于牛脊岭下”，李延是谁？有没有可能是李自成的的小名或是别名，但是翻遍李自成档案就是没发现他有一个小名叫李延。

当时，清军已经入关了，杀李自成可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啊，弄个三四品官来当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都争着说自己杀死了李自成，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多尔袞收到阿济格奏疏时，本来是相信李自成已经死了的，毕竟阿济格还是自己的亲哥哥。可是后来听到大顺军重现江西的消息，多尔袞顾不上阿济格是自己兄长，对他厉声叱责：“连我你都忽悠。”

所以，当时李自成是生是死一直是个谜，说他生，没看见他的人，说他死，就是找不到他的首级。

还有一种说法是误死说。这个说法更荒谬，说李自成率领二十骑，来到九宫山，让兄弟们在下面等，自己上山拜元帝庙，结果被当地村民当做小偷打死。

后来，李自成的养子张鼐告诉南明朝廷的大臣何腾蛟，李自成确实战死了，当时张鼐就在身旁。不过，何腾蛟没有献上李自成的首级。连张鼐都说李自成死了，这个消息应该假不了。如果李自成真的死了，为什么没有他的首级呢？只有一个原因，李自成的部下把他埋葬了，别人找不到。

认为李自成没死的一派又分为两种观点，这个传说流传极广，金庸在《鹿鼎记》里就采取了这个说法。李自成逃到了湖北石门县夹山一带，石门县的县志说李自成来到夹山以后，出家当了和尚，法名奉天玉和尚。1980年发掘出来的文物证明当年确实有这么一个奉天玉和尚，而且这个和尚死的时候没有按照僧规火化，却像寻常人一样安葬。据说，这个奉天玉和尚长得特别像李自成，在顺治元年出家，说话时满口陕西口音。加上李自成曾经自称为“奉天倡义大元帅”，人们

自然而然以为奉天玉和尚可能是奉天王的隐晦说法。

但是这个说法的疑点是，奉天玉和尚和地方官的联系特别密切，李自成的长相太明显了，如果真是李自成的话，怎么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跟官府联系。

李自成的后人还提出了青城归隐说，根据《李氏家谱》的记载，李自成兵败后，化妆成和尚投靠远在榆中青城（位于甘肃省内）的叔父李斌，据说李自成后半生非常老实，待在深山大沟里，最后葬在龙头堡子山下。

李自成是一代传奇的英雄人物，身前死后都让许多人牵挂，或恨之，或敬之。不管李自成是战死还是归隐，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李自成被历史抛弃了。历史虽然抛弃了李自成，文学家却没有抛弃李自成。李自成是中国梦古老的版本。

第三章 南明的那些事儿

清军来了以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意思大家都懂。当时明军却是留发留头，无发无头——剃了发的都杀。这下可把老百姓苦死了，碰上清军，不留下要死，为了保命只好剃发了；万一再遇到明军，到哪里去找假发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官的来了百姓遭殃，盗贼来了百姓还遭殃。

弘光政权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崇祯虽然明知国家已亡，仍然不死心，让自己的几个儿子逃出去，希望有一天还能东山再起。

大明的孤臣们跟着明朝的宗室后代逃到南方，明朝的一些遗老们决定在留都南京拥立朱家王朝的后代，然后效法太祖朱元璋挥师北上，重新夺回政权。这个想法绝对是好的，也是有志气的。

但是一到具体问题上，马上就发生了分歧。宗室后代一大堆，到底立谁呢？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桂王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儿子。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主张立潞王朱常淂，此人是明神宗的侄子，多才多艺，素有贤名。最终被立为皇帝的是福王朱由崧，因为朱由崧获得了南京一些掌握军权的将领支持。

明朝所有的缺点南明都继承了，但就是没有继承一个优点。就说亡国之君崇祯，虽然缺点一大堆，但是还是个管事的主，还是希望把国家治理好。南明这个小朝廷的表现实在太让人失望了，国难当头，这些人没想过如何去抵抗清军、如何剿匪，反而把民间选美活动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崇祯自杀的消息传到江南时，南京的大臣们就开始考虑推选新的接班人，崇祯的儿子们，当然也包括太子，下落不明。

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朱由崧登上了帝位。

朱由崧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福王朱常洵的长子，崇祯的堂弟。崇祯在北京自杀后，他于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十五日在南京称帝，次年改元“弘光”。

朱由崧以前跟父亲待在洛阳，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后，朱由崧

落难到江淮。清兵入关后，他又逃到江苏淮安。后来在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总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人的拥护下在南京称帝。

当时中国有四大政权，多尔袞的大清、李自成的大顺、张献忠的大西、朱由崧的南明。南明政权当时控制着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资源是最丰富的，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可谓是半壁江山。

虽然国家已经灭亡了大半，但南明政权丝毫没有励精图治的打算，反而醉生梦死，腐败不堪。朱由崧当上皇帝后，企图与清军联合，共同剿灭李自成、张献忠。朱由崧当皇帝期间，极尽享乐之能事，将大权交给奸臣马士英和阮大铖这些人，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

朱由崧排斥东林党人也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很传统，发源于窝里斗。在万历时期曾经发生过一次国本之争，万历皇帝非常宠爱郑贵妃，对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也爱屋及乌。郑贵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不断地在万历耳边吹枕边风。渐渐地，万历也就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

可惜，东林党人百般阻止，东林党人信奉祖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这场斗争持续了十年，朱常洵最后被封为福王，迁到洛阳。最后，朱常洵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杀死。因为这件事，朱由崧非常排斥东林党人。

东林党的两个代表人物钱谦益和史可法在福王上台之前，可以说极力阻挠，他们很清楚，福王一旦上台，东林党难逃被整的命运。幸好，福王的人品指数确实非常低，不用东林党去抹黑，他自己就已经够黑了。

东林党人总结出福王的七宗罪：贪婪、淫乱、酗酒、不孝、虐待下人、不读书、干预有司。然后，发出宣传的呼声，像这样的人怎么配做一国之君？

确实非常不配，但当时说话算不算数不是取决于人品，而是取决于候选人背后的力量。

史可法当时是南京兵部尚书，明亡后是一个大腕级别的人物。他是坚决反对立福王的，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他给另一个重量级人物马士英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劝马士英不要同意立福王。

马士英是凤阳都督，相当于凤阳军区总司令，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当然，对立继承人问题，马士英心里也没底。对他来说，谁当皇帝都无关紧要，皇帝是不是贤明跟他更没有关系。他最在乎的是这个

人上台后，我有什么好处。

史可法倒霉就倒霉在给马士英的那封信上。当时马士英拿着史可法的信想了半天，到底应该立谁呢？福王跟自己无仇，潞王也跟自己无仇，说实话，马士英真不知道该立谁。

马士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奸臣，但奸臣一般也是正常人，结果我们已经知道，马士英究竟为啥立了福王呢？

说来非常有意思，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情就让马士英下定决心立福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这个偶然事件跟凤阳监军卢九德有关，卢九德是一个宦官，跟福王的关系非常好。在东林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串通江南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抢先一步拥立福王。这些总兵官都是粗人，政治上那些谋略他们不是很懂，但是拥立之功这个他们是明白的。总兵刘泽清看到这三人都举旗拥护福王了，心想再不举旗的话就迟了，跟着就加入拥立福王的阵营。

马士英懵了，你们这些人怎么就不跟我商量，我好歹是凤阳总督，是你们的领导，我还没表态，你们就先斩后奏了。马士英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些总兵们都是武夫，跟他们动嘴皮子没用，如果还要这些人听自己的话，只有跟着大家一起把生米煮成熟饭。马士英一拍板，皇帝的人选基本上就确定了。对马士英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自己没有付出什么，还可以凭着拥立之功当上丞相。

在马士英的一手操纵下，朱由崧很快就进入南京，接受群臣的朝拜。

在拥立这事上，东林党失败了，东林党失败不是因为能力，也不是因为没有势力。确切地说，东林党输给了时间。他们不可能在福王渡江之前，把桂王接到南京，因为桂王远在云南。

马士英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立刻让福王当皇帝，而是很有分寸地说道：“福王现在来到了南京，潞王和桂王还在偏远地方待着呢！皇帝这个位子我们还是给崇祯太子留着，哪天太子回到南京，就让他当皇帝。现在太子音讯全无，就让福王暂且监国吧！”

这番话说得有礼有节，不服都不行。此时，一身是胆的史可法作出了妥协。

史可法平生最重的就是忠义二字，窝里斗可以先放一边，大明江山的大局要紧。

史可法非常明白，大明这个公司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要想让它

起死回生，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当然，这些措施并不能保证有很大的效果。

史可法第一件事是奏请朝廷设立江北四镇，安排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和刘良佐四个总兵镇守这四个地方。这相当于南明小朝廷的外围防线，史可法这么做就表示对四大总兵的重视，将国家的国防任务交给你们了，你们尽可能地发挥潜力吧！

小朝廷刚刚组建，没什么银子，所以防区内的军饷问题由各个部队自行解决。史可法当然知道这样会让士兵们不满，他又开了一个优惠条件：各位总兵如果能收复失地，这个失地就可以并入你们的防区内。相当于鼓励大家扩张，为了提高在外打仗将士们的积极性，史可法还建议朝廷给总兵们封伯爵，其中黄得功还封为侯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也得以封侯。

一下子把许多将领们爵位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很不寻常，与其说是给他们好处，不如说是希望你们卖力点，再卖力点，一定要挽救大明这个公司。史可法当然很清楚，给这些将领们封侯，允许他们兼并土地的后果。这个后果我们不用想就知道，造就一批大军阀。但出现这个后果的前提是大明公司没有倒闭，对于史可法来说，只要大明公司不倒闭，其他问题可以日后解决。

史可法操纵全局的时候，马士英有很强的失落感，这么搞下去，朝政就控制在你史可法一个人的手上了。马士英觉得，与其在凤阳督师，不如回到朝廷，控制朝纲。

仗着新皇帝是自己拥立上去的，马士英入朝之后，要尽手段，终于把史可法赶出朝廷。

在马士英的怂恿下，朱由崧于顺治元年五月十五日在南京正式称帝，是为弘光元年。第二天，弘光帝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马士英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取代了史可法的地位。

这个安排一出来，舆论一片哗然。大家纷纷为史可法叫屈，说皇上啊，你怎么能放着济世良相不用，用跟阉党有关系的人呢？

朱由崧当然不会理会这些，他选择阉党一方面是对东林党不放心，另一方面确实是想自己放心淫乐，把朝政都交托给马士英、阮大铖这些人。不管朱由崧选择哪个党派，都注定了南明政权的悲哀，因为最高领导者朱由崧就这样。他宠信奸臣，无所作为，没有防备清军，整日坐在秦淮河上的船上，沉沦在情歌艳舞之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据说，当时秦淮河上的灯船之盛，天下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秦淮河两边的房子，雕栏画槛，一片珠帘，粉纱红帐，醉客熏熏，简直是腐败到了极致。

弘光皇帝就整天沉溺在灯红酒绿之中，估计连老祖宗朱元璋都忘记了。真是要死也要快活，当时的形势简直危在旦夕，随时都有亡国的命运。

国家都已经不像个国家了，弘光皇帝仍然大兴土木、选拔宫女、穷奢极欲。在当上皇帝之前，弘光曾经承诺，豁免练饷，取消崇祯期间老百姓的欠粮等等，免掉各种加派。结果呢，这些政策一项也没有实行，赋税反而有增无减，老百姓们叫苦连天。

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南明政权如果能够争点气，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南明政权除了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最典型的的就是“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

我们先来说说大悲案，大悲姓朱，是一个和尚。他跟潞王的关系比较好，潞王信佛，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聊出感情了以后，两人还互相认了本家。东林党之前一直想立潞王为皇帝，所以弘光帝对潞王非常防范，害怕潞王夺走自己的皇位。后来，大悲和尚来到南京，弘光帝怀疑他是潞王的刺客，到这里来刺探军情，便将大悲和尚抓起来，没过多久就将他杀掉了。太子案的情况跟这个很类似，有一个叫朱慈粮的年轻人自称是崇祯的儿子，也从北方来到南京。弘光帝非常没有安全感，担心这个年轻人夺走自己的皇位，便先下手，将这个年轻人抓起来，关进大牢里。

最荒唐的是童妃案，李自成攻破洛阳之时，弘光帝还只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当时朱由崧侥幸逃脱，沦为落难王孙。在逃亡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姓童的女子，该女子对朱由崧非常好，两人结成患难夫妻，私定终身。朱由崧当上皇帝后，童妃千里寻夫来到南京，谁知弘光帝翻脸不认人，演绎了一个现实版的陈世美。他不光不认这个妃子，还把她关进牢里，折磨致死。

这三大案犹如三大石头，激起了千层浪，在整个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太子案，从弘光帝急不可耐地收拾“太子”时，大家就可以看出他内心那种仓皇和恐惧，这种恐惧是对自己地位的一种不自信。不免让其他人联想到，你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皇帝之位来路不正。

左良玉是明末一个特别厉害的将领，张献忠就是被他打得抱头鼠窜，据说左良玉曾经把张献忠逼入绝境，完全有机会灭了他。后来张献忠跟左良玉说：“你现在之所以受重视完全是因为我啊，我一死的话，你不但前途没了，还会因为以前的罪过被处死。”就这样，左良

玉放过了张献忠。

左良玉是东林党人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这个原因，朱由崧上台之后对他非常排斥。太子案爆发后，左良玉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他以“清君侧”的名义领军沿江开往南京。与此同时，豫亲王多铎率领大军攻占西安，打败了李自成，正以疾风扫落叶的势头横扫中原。多铎的大军已经快到达淮河了，弘光帝这时候非但没有考虑和左良玉“议和”，一起抵抗清军，反而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掉头攻打左良玉。

南明这时候仍然把“流寇”视为最大的敌人，弘光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联合清军消灭起义军，也就是一句老话，攘外必先安内。包括民族英雄史可法也是坚持这种看法，联合清军灭掉流寇，然后再跟清军争雄。

在你势力衰弱的时候，你想联合一个比你强大的人，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南明愿意出，出多少价钱却存在争议。有人主张和清朝以两淮为界，有人主张以河间为界限，甚至有人说弘光应该效法石敬瑁，给顺治当儿皇帝。有人觉得顺治那么小，你给他当儿皇帝脸上实在挂不住，还是尊顺治为叔叔好听点。弘光想想，给人当侄子也没什么，便派出陈洪范等使臣出使清廷，请求与清帝结为“叔侄之君”，希望两家同心协力，共灭流寇。

可惜，清朝根本看不起南明，多尔衮只认礼物，不认人。收下礼物后，非常傲慢地说：“我们很快就会发兵江南。叔侄的事就没必要提了，我们不吃这一套。”

南明的使团在北京备受侮辱，弱国无外交，说的真是一点没错。首席使臣左懋第和马绍愉还被清军扣押，陈洪范甘愿降清（做内应），清廷才放走使团。

清军这么傲慢，跟南明政权的软弱无能有很大关系。刚开始入关的时候，清军没想到可以统治全中国，抱着捞多少是多少的心理，对南明的态度还是非常有分寸的。但是入关之后，清军的心理就发生了变化，清军万万没有想到泱泱大国居然这么没有抵抗力，几十万人的军队进入人口接近一亿五千万的国家居然好像如入无人之境。这至今仍然是华夏民族的悲哀，就像马克思说的，中国人就像装在一个大麻袋里的土豆，如果不把袋口系得紧一点，就会散落一地。

在古代，将天下所有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绳子是皇权，如果没有皇权这根绳子，中国人都会变成流寇，所谓流寇不一定是指盗贼，流寇可以说是没有公民意识趁火打劫的人。唯一能够取代皇权这根绳子的就是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基础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公民和臣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臣民属于过去，公民属于未来。回首过去，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

就在多尔袞的事业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候，南明政权却像一艘漏水破船，缺口越来越多，整个统治从上层到下层都不稳定。弘光政权如此不稳，清军全看在眼里，所以态度越来越强硬。再加上越来越多的汉奸加入清军阵营，这些汉奸对于平定江南、统一全国比主人的兴趣还大，急着要做“开国奸臣”。这些汉奸们极力鼓吹不要和南明结盟，一定要让南明俯首称臣。

怪不得多尔袞给史可法的回信中一改往日谨慎谦虚的态度，突然嚣张地命令南明削号归藩。听到这个消息，南明崩溃了，装孙子别人都不待见。

弘光政权前后不到一年时间。1645年5月，多铎带领清军在扬州屠杀十天之后，迅速扑向南京。警报传来，弘光还在搂着美女喝花酒，听到多铎大军来袭的消息。弘光手中的酒杯掉在地上跌碎，愣了好一会儿，忽然醒悟过来，立即带着爱妃连夜出逃。

朱由崧逃到芜湖后，来到黄得功的军中。黄得功在南明也算是一个名将了，但是明朝气数已尽，保护明朝难免要搭上自己性命。朱由崧来了以后，也意味着清军尾随而至，黄得功立即摆开架势，和清军在水上列阵，展开决战。不幸的是，战争中黄得功被冷箭射死，至于放冷箭的是清军还是汉奸就无人能知了。反正，黄得功死后，部将田维马马上叛变，将朱由崧和爱妃捆起来，送给清军。第二年，朱由崧在北京宣武门外被处决。

南明三大谜案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南明三大谜案，这三大谜案确实非常扑朔迷离，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

我们先来说说真假太子之谜，从顺治元年底到顺治二年初，不到半年的时间，北京和南京同时出现两个太子，这两人都称自己是崇祯的太子朱慈烺，一个是由南向北来，一个是由北向南来。

弘光帝正在花天酒地，忽然接到一个报告，鸿胪寺少卿高梦箕声称，他北方家里的一个仆人在南下逃难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自称是崇祯的太子，讲得有鼻子有眼的。高梦箕觉得这事非同小可，立即向弘光帝禀报。

崇祯自杀之前，曾经让太子换上布衣逃难，但太子最后还是落入李自成的手中。李自成还封他为宋王，山海关一战李自成大败，太子也就因此失踪。

这次太子突然出现，吓得弘光帝头顶冒汗。弘光帝这人没什么志向，当上皇帝只是为了吃喝淫乐，他对自己皇帝的合法地位非常不自信，加上朝中有一股反对势力在，太子这一出现，甭管真假，首先让他提心吊胆。

马士英早就有言在先，如果太子回来，立即把国政还给太子。尽管担惊受怕，弘光帝还得非常小心地处理这件事情。他先派人把太子接到南京，同时附上一封信，表示自己以绝对的诚意欢迎太子回京。

太子接回来之后，最关键的就是判断真假。说实话，在座的诸位基本上都没见过太子，有人见过太子，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鉴别太子必须由那些曾经在太子身边工作过的人来完成，方拱乾、刘正宗、李景廉三位先生以前是太子的老师，他们在太子面前瞅了好一会儿，结果都摇了摇头，说毫无印象。

太监邱执中是整天陪太子玩的人，看了好半天，也说不是。

后来又问了一些细节的问题，这人回答不出来，于是大家一口咬定：这个是假太子。

既然是假的，那么就打吧！打完之后，这人终于承认自己不是太子，原名王之明，是驸马王昺的侄子，也算是皇亲国戚，了解一些宫廷的掌故。

据王之明供认，他冒充太子并没有别的企图，只是想整点银子花。

案子到这里，可以结了，冒充太子砍头都不过分，但事情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个案子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也不小。那就是参与辨认太子的人都说了谎话，王之明的供认很可能是屈打成招的结果。这个自称太子的人曾经非常高调地对外讲述自己逃离皇宫的种种经历，对宫里的一些情况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还能叫出一些太监的名字，再加上他的年龄和身材都跟太子比较吻合。所以，很多人怀疑这人就是真太子。

这件事情激起了民愤，底层群众大肆炒作这事，发泄对弘光政权的不满。对于老百姓来说，太子是真是假无所谓，关键是弘光下台。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诈骗案演化成一场政治危机。

当然，这个太子确实是个假冒产品，史可法在当时就凭借自己的经验判断出来，这个太子一定是假的。一般北来的人口进入南方都要经过淮安防区，在淮安防区过境人口的记录，并没有什么太子。史可法断定这个人一定是一直待在南方，根本不是什么北来的太子。

在此之前，史可法曾经派出使者到北京和多尔袞议和，根据这些使者的禀报，多尔袞在崇祯岳父周奎的家里杀死了太子，清廷以假冒的名义迫不及待地吧太子处死。史可法相信，被清廷处死的是真正的太子。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周奎曾经向清廷报告了太子的情况，清廷便派遣明朝的贵妃袁氏过来认，袁氏一看是假的。多尔袞立即顺水推舟，下令把这个冒充太子的人处死。一本清史就是一部谎言史，清史的话没几个人相信的。根据专家考证，真正的袁妃早已随崇祯殉难，让一个死人来指正太子，太荒唐了。所以，结论是多尔袞杀人灭口，这个人就是真正的太子。

大悲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大悲和尚并不是潞王的什么奸细，只是一个流浪和尚而已。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的一个深夜，一个衣衫褴褛的和尚在南京洪武门外叫门，而且这个和尚叫门的方式非常高调，把门弄得咣啷响。守门士兵一听，好大个胆，立即把这个和尚抓了起来。

“深更半夜的，你居然叫门，找死啊？”士兵们抡起拳头准备揍他。

这时，这个和尚说出的话让士兵们吓了一跳：“我是崇祯皇帝。”

士兵一听，赶紧收起拳头，甭管真假，先好好款待他再说，等验明真假再来处置。士兵们都知道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了，但乱世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崇祯或许找了个人替他去死也说不定。士兵们赶紧把这事上报给领导，领导听了也很吃惊，领导毕竟是领导，临危不乱，让人赶紧验明是不是皇帝。

可惜，这个和尚的心理素质非常差，见到领导吓得两腿打颤儿，说话哆哆嗦嗦，竭力想模仿皇帝的腔调，露馅得更快。和尚说了好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他想说啥，和尚也撑不住了，改口称自己为齐王。士兵们拿出刑具，和尚又改口称自己是吴王，这诈骗技术也太烂了。

最后这个和尚供认，自己不是什么皇帝，也不是什么齐王吴王，只是苏州城一个破庙里的和尚，乱世中，温饱得不到解决，所以才想出这个馊主意出来骗吃骗喝。

这虽然只是一起诈骗案，但是在朝野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阮大铖本想利用这个案子株连一大批东林党人，诬陷大悲和尚受东林党人指使。幸好马士英比较有分寸，他认为这事情不宜扩大，及时阻止了阮大铖。最后马士英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把大悲和尚处死。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越是乱世，怪事奇事就越多。大悲案、太子案过去没多久，就出现了童妃案。

事情是这样的，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南京城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妇女。这个妇女自称是弘光帝做福王时的妃子童氏，李自成攻破洛阳后童妃与福王朱由崧失散。现在听说福王当上了皇帝，所以千里寻夫。根据该女子的说法，她不仅是福王的妃子，还为福王生了一个皇子，现在正寄养在民间。

对南明的这些官员来说，如果能帮皇帝找到失散的妃子，并找回皇子，那可是帮了皇帝的大忙，是一个大好的升迁机会。

陈潜夫和越其杰妥善安置这个女子，并将她送到南京。

事实的情况跟陈潜夫和越其杰想象的有点出入，这个女子的到来并没有让弘光帝高兴，反而让他神经非常紧张。弘光帝是一个非常好色的皇帝，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自称童妃的女子容貌很平常，丝毫没有王妃的气质，让人简直无法相信朱由崧就这品味。朱由崧固然是个混蛋，是个好色皇帝，但越是这样的皇帝，对女人的品位应该不至于那么烂的。这一点，刘良佐、陈潜夫、越其杰也想到了，但他们想到更多的是乱世之中，这个女人竟然能千里寻夫，公然宣称自己是皇帝的妃子，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此女见到弘光帝后，双目含泪，款款下拜，确实很像是久别见夫君。但是，弘光帝却面如罩霜，根本不理睬她，当这个女人呼唤他时。他居然大骂这女子是妖妇，让锦衣卫对她严刑拷打。这个女子先是害羞，接着非常吃惊，跟着由吃惊变为愤怒，她从怀中掏出一叠纸，上面写着和朱由崧相识离散的整个过程。朱由崧让人拿过来看，刚开始表情轻蔑，不久面红耳赤，将纸扔在地上，命人把这女子关进大牢里。

十天后，该女子就魂归西天。

童妃到底是真是假一直是一个谜，当然这事的见证人只有弘光帝，文武百官是不知道的。弘光帝既然否认了，那就说明是假的了。但是，世间像陈世美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童妃是真是假很难说清楚。认为童妃造假者，一般认为弘光这人非常好色，而童妃才貌实

在太平常。但是，很多人认为童妃是真的，认为这个童妃很可能是朱由崧流落民间时认识的一个女子，两人同居了，最后朱由崧翻脸不认人。

童妃是怎么死的？

正史中没有记载，但是根据当时文人一些笔记的记载，童妃在监狱里受尽酷刑，狱吏要她承认不是朱由崧的妃子，她坚决不答应，最后被折磨致死。也有人说童妃是绝食而死。

当时有一个更可怕的推测，如果在今天，绝对是原子弹级别的猛料。有人推测，童妃是真的，但是弘光帝这个皇帝可能是假的，并不是那个福王朱由崧，只是民间的一个冒牌货。理由并不复杂，史可法也好，马士英也好，阮大铖也好，这些人都不知道原来的福王长啥样。乱世之中，说不定有人得到福王的印玺，然后冒充福王当上了皇帝。

当时民间很多人相信这个说法，这正好说明弘光帝人心尽失，离心离德。所以，弘光政权维持了一年多就垮台了。

政权如走马灯

南明的第二个政权是永历皇帝，永历皇帝朱由榔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桂王朱常瀛的儿子。清军入关后，他逃到广西，居住在梧州一带。公元1646年1月，在丁楚魁、吕大器、陈子壮等人的拥护下，称帝于广东肇庆，建年号为永历。永历皇帝在位十五年，是南明政权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后来被清军追杀，一路逃到缅甸，最后在昆明被吴三桂杀害，享年四十岁，死后不知道葬在哪里，或者根本没有墓葬也说不定。

永历称帝的时候，他的弟弟唐王朱聿粤也在广东称帝，建号绍武。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尤其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兄弟更不应该自相残杀。但永历政权和绍武政权水火不容，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大打出手。兄弟俩打得正火热的时候，清军来了，先灭掉绍武政权，绍武政权仅仅存在四十多天。

接着，永历皇帝逃到广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两个皇帝，一个当了四十多天就被人灭了，一个朝不保夕像落水狗一样被人追得到处跑，头上还顶着皇帝的帽子。这样的皇帝做得有什么意思，损人不利己，损害天下百姓，自己也没过上好日子。

逃亡的路上，永历皇帝终于认清了清军的狼子面目，制定了联合农民军协同抗清的决策。现在许多企业家认为衡量一个CEO好坏的标准是看他的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永历确实做得还可以，他的基本战略是对的。

永历先是和李自成大顺军的余部合作，在李自成死后，大顺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郝摇旗和刘体纯率领，一支由李过和高一功率领。这两支军队先后进入湖南，跟湖广总督何腾蛟等人联合抗清。1647年，原本反明的名将郝摇旗保护永历帝来到柳州，然后主动出击桂林的清军。郝摇旗是李自成手下的一员猛将，无论大战小战都是冲在最前面，李自成牺牲后，郝摇旗改名为郝永忠，也就是表示永远忠于闯王李自成。这年年底，郝摇旗在桂林西北的全州大败清军。接着，我们熟悉的事情又发生了，郝摇旗受到明朝将领的排挤，退回到湖北，扼守荆楚一带。郝摇旗上半辈子跟着李自成反明，下半辈子独自撑起大旗反清，直到康熙二年的时候，他还在和清军打仗，后来在四川巫山战败被俘后被杀。

总的说来，大顺军余部和明军联合抗清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湖南省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基本收复了整个湖南。湖南的胜利鼓舞了其他的省份，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一些降清的将领先后反正，重新回到明政权的怀抱。决策的胜利胜过千军万马。

短短的时间内，永历政权控制范围扩大到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这是南明时期出现的第一次抗清斗争高潮。

本来永历帝有望成为乱世中力挽狂澜者，可惜中国人的劣根性又带来了麻烦，再加上管理上的不善，短暂的繁荣成为昙花。所以，中国人总结出了一种人生经验：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宿命，而是民族的劣根性在作怪。从越王勾践开始，中国人就养成了可以共患难却很难同富贵的习惯。

好局面才刚刚开始，内部就斗开了花，各种政治势力互相攻击，农民军受到排挤，清军借着这个机会得以调整喘息，卷土重来。1649年到1650年间，清军反扑，著名抗清将领何腾蛟和瞿式耜先后在湘潭和桂林战役中牺牲，清军又重新占领湖南广西，许多收复不久的失地也先后丢掉。

在这期间，李自成的侄子李过病故，李过的儿子李来亨联合其他农民军将领，宣布脱离南明的政权，自主抗清。失去农民军的支持，政权内部又斗得死去活来，南明的军事力量越来越衰弱，士气越来越低迷。对永历来说，道路越来越难走了。

这时候，张献忠大西政权的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已经占领了整个云南。孙可望、李定国提出愿意和南明联合，永历只好接受他们的建议。不过，这次不是农民军投靠南明，而是永历投靠农民军。从此，永历就跟着孙可望和李定国了。

1652年，李定国率军八万出广西，打桂林，再次攻入湖南、广东。在攻打桂林的战役中，李定国打败了孔有德，导致孔有德全家自杀，就女儿孔四贞跑了出来。这是李定国第一个漂亮仗，接着李定国又击杀了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一出手就解决了两王，李定国果然是身手不凡，当时天下大震。与此同时，大西军的另一名大将李文秀带兵出击四川，收复了川南。诗人张煌言在福建一带抗清，抗清运动再次出现高潮。

本来形势又是一片大好，可惜老问题又来了，李定国出够了风头，孙可望不爽了，两人产生矛盾。如果只是吵吵嘴，哪怕动手打一场，也没问题啊！关键是这个孙可望心眼太小，居然想做掉李定国。李定国不想跟孙可望一般见识，暂避到广东，希望和郑成功会师，收复广州，可惜郑成功不怎么守时，结果李定国自己跟清军打起来了，损失惨重。随后，李定国撤到贵州，接走被孙可望劫持的永历皇帝。1656年，李定国带着永历皇帝回到云南。第二年，孙可望带军攻打李定国，又一起同室操戈的案例。孙可望仗着人多势众，想一举击溃李定国，没想到他人心不齐，许多将领倒向李定国阵营，结果李定国大败孙可望。

1658年，孙可望投降清军，贵州、广西落入清军囊中。第二年，清军派遣三路大军攻打永历皇帝。因为不想连累李定国，永历逃亡缅甸。缅甸人将他软禁在草房里，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李定国曾几次想迎回永历，但都遭到缅甸方面的拒绝。

1662年，吴三桂进军缅甸，要求缅甸国王交出永历皇帝。这个缅甸国王也是个混蛋级别的人物，他刚刚弑兄上位，统治尚不稳固，不想多惹麻烦，只好答应吴三桂的要求。缅甸国王派出三千人将永历皇帝的住地团团围住，并谎称要和永历立盟誓，根据缅甸的规矩，立盟誓的话大家得饮咒水，谁食言就要受到诅咒。缅甸国王通过这种方式将永历的随从引诱出来，出来一个杀一个，杀掉四十二个人以后。永历知道自身难保，问缅甸国王为什么要这样？

缅甸国王说：“吴三桂来要人，我没办法。”

永历一听，悲愤地给吴三桂写了一封信，控诉他背叛明朝，投靠清朝，忘恩负义，丧尽天良。骂完一顿解气后，永历又低下头颅，说自己现在的处境非常可怜，性命取决于你，如果你能给我一条活路的

话，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吴三桂没理他，确实吴三桂也没有必要理他，汉奸的骂名是背定了，干脆一背到底，何必为这个人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

缅甸国王将永历及其二十五个眷属一并交给吴三桂，吴三桂没有把他押到北京，而是押回昆明。吴三桂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押往北京途中被反清复明的人士劫走，将永历及其家眷押到昆明。吴三桂向清廷申请将永历等人在昆明就地正法。永历帝等人在昆明篦子坡被绞死，从此，篦子坡改名为迫死坡。

第四个政权是鲁王朱以海为首的政权。清军入关后，朱以海被拥立为监国。虽然没有称帝，但也监国了九年。朱以海刚当上监国，就和所谓的正统地位的福建隆武帝朱聿键的政权相互倾轧，争斗不已。1652年，清军攻破南明鲁王政权。不久，原明朝刑部员外郎钱肃乐在宁波起兵反清，并派遣张煌言去台州迎接鲁王。钱肃乐被清军打败后，朱以海前往厦门，投靠郑成功。郑成功是隆武帝的支持者，之前就对朱以海非常不满，心想大敌当前，你还和隆武帝自相残杀，破坏了大局。不过，朱以海好歹是明朝宗室，郑成功对他也是以礼相待。1662年，朱以海打算渡海重返南澳诸岛发展力量，引起了郑成功的不满，郑成功派人将他沉杀在海中。关于朱以海之死有不同的说法，也有人认为他是病死的。

南明第五个政权是定武帝朱本铉，朱本铉到底是不是明朝宗室后代一直是个谜，因为他是被李自成的部将郝摇旗拥立为皇帝的，所以很多人怀疑他可能并不是明朝宗室之后。朱本铉在位十八年，郝摇旗死后第二年他也死了，死因不明，葬处也不明。

南明第六个政权是唐王朱聿键的隆武政权。顺治二年，朱聿键建元隆武，他所建立的这个政权被后人称为隆武政权。朱聿键本是大明的唐王，明朝灭亡后，在郑芝龙等人的迎接下，来到福州，就任监国，不久就称帝，把福州作为临时首都，称为天兴府。隆武大封文武百官，郑芝龙享受的待遇最好，因为郑芝龙的拥立之功最大，封为平国公。

说来，郑芝龙这个人以前只是一个海盗，后来被崇祯招安，封为五虎游击将军。郑芝龙后来在金门大败荷兰人，升为福建总兵。自此，郑芝龙拥兵自重，学习毛文龙，垄断海上贸易，成为一个富可敌国的大军阀兼大商人。用郑芝龙自己的话说，我的一切都是大海给的，没有大海就没有我的今天。

确实，隆武政权主要依靠郑芝龙，郑芝龙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海，没有海，隆武政权的根基是不稳的，虽然本来也不是很稳。

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虽然是个民族英雄，但郑芝龙更多的是一个商人。在当时的亚洲范围内，郑芝龙打造出了一个海上王国，至少就海军力量来说，当时亚洲没有可以和郑芝龙匹敌的。清朝很重视郑芝龙，派遣资深降将洪承畴去诱降郑芝龙。郑芝龙虽然没有被诱降，但是心态发生了变化，跟清军对抗的时候也不再那么拼命了，很奇怪的一件事，投降又不投降，抵抗又不拼命。到底在想啥？

郑芝龙开始拥兵自重，保存实力，还将福建水军全部撤到晋江的安平，并撤回分水关施琅的部队。郑芝龙为什么这么做？不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真实情况，我们可能不会明白。但我们可以确信，精明的郑芝龙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商人做统帅有时候还真不行，郑芝龙不知为何，居然只给在前线打仗的黄道周发一个月的军饷，他没钱吗？肯定不是。吝啬吗？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更大的可能性还是派系斗争，最终让自己这派的势力占上风。黄道周最终因为粮草不济战败被俘，不屈而死。

活在郑芝龙这样一个后台的控制下，隆武皇帝肯定是不会很舒服的。隆武觉得这个皇帝当得很不自在，决定回到江西御驾亲征，哪怕轰轰烈烈战死也行啊，像崇祯一样落下个殉国的美名。但郑芝龙坚决反对他这样做，郑芝龙倒不是担心隆武皇帝的安全，他是怕失去这笔巨大的政治财富。从曹操开始，每一个人聪明的政治家都懂得“挟天子以自重”的道理。为了阻止隆武皇帝离开，郑芝龙不惜数万军民跪在道上，请求皇上为国家社稷考虑，不要离开。

可惜，隆武皇帝铁了心要离开，看来没少受郑芝龙的气。隆武来到福建南平，清军打过来之后，他又逃到汀州，不幸被俘虏。不过，隆武帝倒也不失为一个汉子，被俘之后坚决不投降，绝食而死。

隆武死了没多久，郑芝龙在十一月份正式降清。

落魄王孙——坎坷一生的隆武帝

隆武帝朱聿键在腐朽的南明中是一个不错的皇帝，他一生命运坎坷，虽然生在帝王之家，但承受的苦难比平民百姓还多。他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有望收复残破的江河。虽然最后复国之梦成空，沦为阶下之囚，但他仍然能够坚守内心的自由和原则，选择死亡。

朱聿键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即位前被封为唐王。

朱聿键从一生下来就很不幸，朱聿键不幸的原因是因为他老爸不幸，他老爸不幸的原因是因为舌头上长了一个大瘤子。舌头上长了个

大瘤子固然不幸，可是也没理由影响到儿子的幸福，难不成这大瘤子也传给儿子了？

这就要说到朱聿键的祖父唐王朱硕燝了。朱聿键的老爸朱器壘是唐王的长子，但唐王很讨厌朱器壘，就因为他舌头上长着个大瘤子。唐王很喜欢一个小老婆的儿子，想废长立幼。不过唐王的母亲魏氏不同意，在她活着的时候一直保护朱器壘父子俩。朱聿键十二岁的时候，这位曾祖母去世。这个曾祖母去世后，唐王便把这父子俩囚禁了起来，想把他们活活饿死。幸亏有好心人暗中给他们送饭，父子二人在监牢里才得以活命。

朱聿键在暗无天日的监牢里整整待了十六年，这十六年的时间他也没闲着，他借着青灯日夜看书学习，掌握了许多知识。

1629年，朱聿键的父亲被叔叔毒死。唐王朱硕燝想立二儿子为世子，被牛人陈奇瑜劝阻，只好立朱聿键为世孙。直到这时，已经二十八岁的朱聿键才从监牢里走出来。

崇祯五年，也就是1632年，祖父见佛祖去了。朱聿键继承王位，杀掉叔叔为父亲报仇。明末各地叛乱四起，烽火连天。朱聿键觉得身为朱家王朝的子孙，国家有难当挺身而出，便向崇祯提出借兵三千平乱。崇祯是非常多疑的，他担心藩王借兵作乱，拒绝了朱聿键。

朱棣以藩王的身份造反夺取天下，给明朝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是以后来的皇帝对藩王都非常警惕。藩王可以在自己的王府里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会有人找你麻烦，但绝对不可以带兵离开藩属地。

这个规矩朱聿键也是懂的，但是他压抑不住心中那团火，他宁愿犯规也不愿坐视国家惨遭蹂躏。头可以断，血性不可以没有。皇上不借兵，朱聿键就自行招兵买马，带着自己的人马跟流寇拼，结果被流寇打得太败。对此，我们给予理解，一个从小被关进监狱的人从来没打过仗，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就和人打仗，不输倒奇怪了。

不管朱聿键打赢打输，这么做分明是瞧不起崇祯，我不给你借兵，你倒自己招兵买马了。一怒之下，崇祯让锦衣卫把朱聿键关进凤阳监狱——政治犯待的地方。

崇祯自杀后，弘光帝继位，才把他放了出来，累计起来，他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四年。弘光虽然释放了他，但是并没有恢复他的政治地位，反而害怕他争夺帝位，让他在桂林好好待着，不能出来。朱聿键才走到杭州，弘光政权就完蛋了。

一个月后，在郑芝龙、黄道周等人的拥护下，朱聿键当上皇帝，

年号隆武。据说在朱聿键举行登基大典的那天，刮起了大风，雾气非常重，能见度很低。大风把小树都吹了起来，掌管玉玺的官员坐骑受惊，摔下马，玉玺碰坏了一个角。显然，这是非常不吉利的一个征兆。尽管如此，有黄道周这样的牛人在，君臣之间还是非常有决心匡复明朝的。

一生坎坷的朱聿键终于当上皇帝，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皇帝，他抚慰群臣，从谏如流，同意和大顺军的余部共同抗击清军。在生活作风上他也非常检点，只有一个老婆，也就是皇后曾氏，曾氏是一个贤后。

清军来了以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意思大家都懂。当时明军却是留发留头，无发无头——剃了发的都杀。隆武帝觉得明军这种行为是不好的，他下令禁止屠杀剃发的百姓，说：“兵行所至，不可妄杀。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

由此可见，隆武帝是一个能站在别人角度考虑问题的人。其实这一点很容易做到，但为什么偏偏那么多中国人做不到呢？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需要什么很高的智商，中国人又向来是最聪明的，为何从来不懂得最简单的道理？明白了这个原因就明白明朝亡国的真正原因。

隆武帝确实是一个好皇帝，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个傀儡皇帝。他的政权离不开郑芝龙集团，没有郑芝龙的财政和军事支持，他的复国项目就办不下去。

郑氏家族都是海盗出身，郑芝龙拥立隆武并不是为了什么光复大明，而是跟吕不韦打着一样的算盘，把隆武看成了可居的奇货。商人就是商人。在郑氏家族里，唯一对明朝忠心耿耿的只有郑成功。最为讽刺的是，郑成功居然是郑芝龙跟日本女人生的。郑成功原名郑森，在他年幼的时候，郑芝龙带他入宫见隆武帝。隆武帝貌似会看相，当时抚摸着郑森的背，居然说出了很有预见性的话：“可惜我没有一个女儿可以许配给你，你将来一定会为我大明尽忠，不要忘记了今天。”

也就是这天，隆武帝赐名郑森为朱成功，郑成功国姓爷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隆武虽然没有女儿，但还是封郑成功一个类似于驸马都尉的官职。郑芝龙投降后，郑成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父既不能为忠臣，子不以为孝子。”

当然，郑成功的一生也不是没有污点。他后来还是置祖国大陆于不顾，盘踞在台湾地区，跟荷兰人打仗。虽然我们不能苛求郑成功，因为确实清朝后来的势力太强大，不是郑成功一个人能对付得了的。郑成功为世人所诟病的地方是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尤其是软禁鲁王，

杀害鲁王（存在不同说法）。郑成功还毒死抗清名将张明振，令广大的大明遗民感到失望。

作为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郑氏家族大权独揽，干些卖官鬻爵搜刮百姓的勾当，比当时南明的一些贪污腐化的奸臣做得更过分。

我们可以想象隆武帝的处境，三面受困，一受制于郑氏家族，二要防备鲁王军队，三来李成栋带领的清军正在逼近。得知大明忠臣黄道周带领门生故吏，招募九千人北上抗清，最终被清军大败，黄道周慷慨就义，隆武帝悲愤欲绝。他既恨清军，又恨郑氏家族。

无路可走之下，隆武帝表示要亲自北伐，作困兽之斗。郑芝龙对此虽不满，但已经生了降清之意。

李成栋率领的清军在浙江一带势如破竹，先后攻下绍兴、东阳、金华、平州，很快攻陷郑鸿逵把守的仙霞关。隆武帝眼看亲征无望，决定取道汀州去江西，“御驾亲征”已变成“御驾亲逃”。隆武帝政权内部一盘散沙，大家离心离德，只能走下坡路；而李成栋却驭兵有方，指挥若定，两者对比实在太大了。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爱书如命的隆武帝仍然“载书十车以行”，边逃边读，边读还边逃。带着书搬家都不方便，何况是带着书逃命。隆武帝在汀州歇息过之后，第二天凌晨，突然有一队身穿明军军服的人在汀州城外叫门，声言护驾。守城士兵不知是计，城门一开，发现原来都是李成栋派出化装的清军。隆武帝听到外面一片混乱，拿着大刀进入府堂，被清军抓住，后来不屈绝食而死，跟他一同遇难的还有皇后曾氏以及未满月的皇子。

李成栋将隆武帝一家三口的人头献给清廷，得到清廷的重视，驻军福州，成为地方大员。

隆武帝在福州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听说隆武帝绝食而死，洪塘乡曹学佺跑到鼓山上面自缢，黄山乡郑愚谷、郑静之父子也相继殉国。郑愚谷本来是明军的一个水陆同知，隆武帝遇难之时他正在山林隐居，听说皇帝遇难的消息，郑愚谷悲愤万分，赋挽歌六章，其中有：“天翻地覆在斯时，谁是忧勤起义师”，“生死分明惟帝后，应驱雷击党人碑”等句，读来让人忍不住恻然。郑静之是郑愚谷的长子，国子监博士，听说隆武帝殉国，于是削发为僧，悲愤欲狂，疯疯癫癫，以至于血泪沾衣。出家也不能缓解他的痛苦，极度难受之下，他三次凝视北方，然后仗剑自杀。顺治四年（1647年）春节，福州百姓贴春联的时候，皆刷白眉，以此悼念隆武帝，后来演变成福州特殊的习俗。

隆武死后，郑成功果如他所期望的，奋战在抗清的第一线。顺治三年，清军南下，打进福建，郑芝龙打算降清，郑成功选择离开，到金门避风头。郑芝龙投降后，派人招降郑成功，希望郑成功能够做个孝子，跟父亲一起去投降。郑成功给郑芝龙写了一封信：从来都是听说父亲教儿子忠心，从来没听说过教儿子做贰臣；现在父亲你不听我的话投降清廷，如果将来有什么不测的话，我只能为你戴孝了。

郑成功占据南澳，以厦门和金门作为抗清的根据地。顺治八年和顺治九年，郑成功多次进攻漳浦。五月，清廷派遣马逢之总兵解救漳州之围，郑成功故意让他入城，进城之后来个关门打狗。直到十月份，清军派遣金砺才解救了漳州之围。

顺治十年，清军在广西、湖南战场上与李定国交锋，又在四川、重庆和李文秀交手，在这些战场上，清军屡吃败仗，首尾无法兼顾。便改变了方阵，决定招降郑成功。招降郑成功的人还是郑芝龙，这让郑成功非常郁闷。清廷本来是个吝啬鬼，这次不惜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公侯伯子男，这个郑成功的爵位比他老爸还高啊，不太合情理，但充分体现了清廷对郑成功的重视。

郑成功根本不买清廷的账，依旧广积粮高筑墙，准备好火器对付清军。顺治多次招抚郑成功均遭遇失败，没办法，招抚不成只好打了。可是打也打不赢，经常输。顺治十三年，顺治总算开窍了，下令实行海禁，规定福建、浙江、广东、江南、山东、天津这些地方，商船民船不得私自出海，如果和郑成功贸易，一旦发现，立刻就地正法，而且地方官员也要一并治罪。

这项措施相当于釜底抽薪，抽取的虽然不是郑成功的军事力量，但是比军事力量更为要命的经济力量。顺治十六年，清军主力正前往云南攻打永历政权，郑成功抓住这个机会，和张煌言一起攻克瓜洲。不久，进军江南，屡败清军，引起了顺治的恐慌，顺治吓得差点逃回东北。

最后在孝庄的斥骂下，顺治又打算御驾亲征。郑成功最终还是被清军打败，主力损失了一大半。清军进入福建后，郑成功感到势单力孤，决定寻找新的根据地。

明朝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地区。郑成功被清军打败后，一筹莫展之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何廷斌，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地区评议会的通事。他见了郑成功后，建议郑成功收复台湾地区，将台湾地区作为抗清的最后根据地。何廷斌还给郑成功进献了一幅台湾地区地图，提供了一条避开荷兰军队的航线，并自告奋勇充当郑成功的向导。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伟大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领两万五千人，指挥三百艘战船向祖国宝岛台湾进发。先占领澎湖列岛，再横渡台湾海峡，绕过荷兰炮台，在北港登陆。围困荷兰殖民者八个月后，荷兰殖民者投降，郑成功成为台湾的老大。

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因病去世，享年三十九岁。

左良玉“叛变”与史可法殉国

马士英拥立弘光帝的时候，左良玉的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好你个马士英，拥立皇帝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太看不起人了吧！说实话，以左良玉的势力，这时候他有看不起别人的本钱，别人断没有看不起他的资格。

左良玉虽然没有把持朝政，官也不是特别大，但是他拥兵八十万。别说你马士英，就是皇帝小子他也没放在眼里。

左良玉几次想出手，摆平弘光政权，但江西督军袁继咸和湖南巡抚何腾蛟经常劝他要以大局为重，“老左啊，现在什么时候了，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左良玉一听，也是啊，免得给世人留下话柄，只好勉强默认弘光政权的合法性。左良玉在摸不准形势的情况下，派了一个人去南京，这个人是他的心腹黄澍。黄澍的官职很小，到了南京后却非常拉风。有一次，他当着皇帝的面和马士英掐架，他居然揪着马士英的领口，狂扇了马士英几巴掌，随后滔滔不绝地列出了马士英十八条罪状。

真牛，朝堂之上，连皇帝都怕马士英，他居然把马士英不当人。可见，当时左良玉的力量。左良玉放个屁比皇帝发表一通演讲还管用。

马士英也不是软蛋，别人这么欺负自己，作为一个文人，他当然不能在朝堂上跟黄澍打架。但是，他也有他的手段，他充分利用了文官优势，找人弹劾黄澍，准备一鼓作气把他整死。

左良玉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光火，施加军事压力：如果不放人，我恐怕很难控制自己的部队了。马士英没办法，固然他整人的功夫绝对一流，但是面对军事压力却只能服软。

黄澍逃回来后，极力在左良玉面前煽风点火，控诉马士英的种种罪行。黄澍还提到太子案，说马士英企图谋害南都太子，我们不妨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向南京进军。除掉了马士英，整个朝政就是你左爷

说了算。

左良玉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社会阅历那是相当丰富，他见黄澍的话句句在理，而且这些理全都对自己有好处，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

我们来看看左良玉这个人，这个人绝对不一般，当年他剿匪非常给力，基本上李自成、张献忠都不是他的对手。眼看张献忠就要命丧在他的手中，忽然张献忠说，你今天要了我的脑袋，崇祯明天就要你的脑袋。张献忠这句话改变了左良玉的人生观，以前他是闷头做事，后来发现不行啊！做人还是得懂一些阴谋，否则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在剿匪的过程中，左良玉的部队发展到几十万人。可以说，左良玉的部队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些人往往不是什么善类。左良玉能够把这些人管得服服帖帖，说明左良玉这个人真不一般。

用现在的话说，左良玉能让这些人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混，绝对是一个很给力的领导。左良玉给力的地方就是不约束你们，你们爱抢就抢，爱杀人就杀人，爱放火就放火，我们好才是真的好，何必管别人死活。

所以，左良玉固然得到弟兄们的爱戴，但他的军队名声确实很臭。不过，左良玉丝毫不在乎名声，我能让这么多人吃饱饭，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已经很了不起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吧，吃别人的饭让别人无饭可吃吧！

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左良玉以“清君侧”的名义，顺流而下，到了九江时，遇到九江总督袁继咸。左良玉立即给袁继咸写了一封信：“老兄，跟我一起兵谏吧！肃清朝中妖孽，重振朝纲。”

袁继咸是个明白人，回道：“你这哪是兵谏，分明是兵变。”

左良玉表示：“真是兵谏，我可是奉了太子的密诏。”

袁继咸：“那好啊，拿出密诏。”

左良玉：“你怎么就死脑筋，要与时俱进。这事对你我都有好处，马士英这个混蛋把持朝政，搞得民怨沸腾，我们不干谁干？”

袁继咸语重心长地说：“你就不要掩饰叛乱的行为了。侯爷你这一发兵，不是自己人搞乱自己人吗？清军已经在虎视眈眈，侯爷这么做可是正中他们的下怀啊！侯爷不记得了，你这个侯爵的身份可是朝廷封的，你这么做可是忘恩负义啊！”

左良玉觉得袁继咸说的有道理，于是暂停进攻九江，然后连夜给

皇上写了一封信：皇上，我不是针对你的，只要你主动清除马士英一党，我就停止进攻。

可惜，为时已晚。

左良玉不想干，他手下的将士们想干，左良玉的将士们和袁继咸的将士们勾结，商量好了，一起打南京。左良玉已经控制不住形势了，加上这时，左良玉重病在身。看着自己的将士们攻进九江城，和里面的一些守军勾结，大肆抢劫和屠杀，左良玉长叹一声：“我对不起袁继咸啊！”

说完，左良玉就一命呜呼。这时，部将拥立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为主帅，继续扛起造反的大旗。左梦庚接受部下的建议，秘不发丧，继续以左良玉的名义烧杀抢掠。

听到左良玉兵变的消息，马士英慌了。他立即撤回江北防线的黄得功、刘良佐、刘孔昭等人，不要防守清军了，全力阻击左良玉。史可法也接到渡江勤王的命令。

多尔袞一看机会来了，命令多铎调集大军，准备渡江。

弘光帝不得不召集大臣开会，商讨对策。很多人反对撤回江北防线，本来就很难抵挡清军，你现在撤回，不等于是门户大开吗？

弘光帝赞同这个观点：是啊，左良玉好像不是针对我的，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呢，不能撤回江北防线。

马士英气得跳了起来：“你们不要为左良玉袒护了，左良玉分明是造反，以下犯上。我们宁可死在清军的刀下，也不能死在左良玉的手中，这是原则，死在敌人手中不是耻辱，死在乱臣贼子的手中才是耻辱。”

马士英很清楚，左良玉一来，自己必死无疑。

史可法也来到南京城下，要求觐见皇帝，遭到马士英的拒绝。弘光帝被迫接受马士英的建议，攘外必先安内，每每听到这句话就让人心痛。

左梦庚不是左良玉，他率领大军和黄得功等人激战，最后被击退了。当然，黄得功等人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清军坐收渔翁之利。

清军顺利南下，整个江南就暴露在清军的屠刀下面。史可法带着部队退守扬州，当时大量的难民涌进扬州，扬州成为抗清前线最后一道防线。史可法能不能守住扬州孤城呢？

史可法不是袁崇焕，扬州也不是宁远城，再加上清军已经今非昔

比，史可法的形势绝对是不容乐观的。多铎给史可法写了一封招降信，大意是说，扬州城肯定是守不住的，先生还是识时务投降吧！同时，多铎还让降将李遇春在城楼下做思想动员，结果遭到史可法的痛斥，史可法大骂李遇春投降变节，猪狗不如。

应该说，多铎给足了史可法面子，看降将招降无用，便让老乡带着书信去招降。史可法是一个硬骨头，招降信看也不看，直接扔进火堆里。多铎不断地给他写信，他不断地把信扔进火堆里。

史可法也自知城池守不住，写了五封遗书。第一封是给老母亲的，在信中，史可法自我批评，说自己是个不忠不孝的儿子，不能挽救国家，儿子现在决定与城池共存亡，希望老母亲能理解，不要太过悲伤。

史可法第二封信和第三封信分别是写给夫人和叔侄兄弟的，希望大家不要难过，好好生活。

史可法第四封信是写给养子史德威的，史可法没有儿子，将军中副将史德威收为养子，他把自己的后事交给史德威，希望史德威能够把自己葬在太祖高皇帝身边或者梅花岭上，梅花岭就在扬州城内，史可法此举显然是为了表示自己的人格像梅花一样高洁。

史可法第五封信是写给多铎的，他开门见山地对多铎说，我肯定会为国家殉难，只求高皇帝能够明白我一片忠心。

这是一场惨烈的防守战。史可法固然抱了必死的决心，多铎也是抱定了不拿下城池绝不后退的决心。据说，清军的尸体堆积到城墙的高度，最终城池被攻破。史可法准备举剑自刎，被手下将士夺下，护着他从一个小门逃跑，结果被清军捉住。

多铎对他比较礼遇，满面笑脸地说道：“久仰先生大名，如果先生能够归顺大清，不仅可以做大官，还可以一展抱负。先生想必听说过洪承畴洪老先生吧，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先生能够考虑考虑。”

史可法大怒，说道：“洪承畴算什么东西，活得猪狗不如，你要我学习他，做梦去吧！”

多铎是一个非常没有耐性的人，在史可法面前，他耗尽了自己的耐性，手一挥，砍了吧，省得麻烦。

在史可法临死前，低下高昂的头颅，请求多铎不要伤害城中百姓。我们不知道多铎是不是答应了他，即使答应了，多铎也食言了。他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屠城。于是，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屠城开始了。

几个世纪以来繁华的扬州城顿时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马士英下落之谜

说起大奸臣马士英，很多人恨得咬牙切齿。我们先别恨他了，从历史上看，他也不是十恶不赦之人，多少还是做了一些好事。比如，阮大铖想借大悲案清洗东林党时，就是被马士英阻止的，我们不管他阻止的动机是什么，但这种行为本身是好的。

马士英是贵州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郎中、知府。崇祯五年，当上宣府巡抚，上任不到一个月，他就重金贿赂当朝权贵，被太监王坤告发，被贬到南京。在南京时，马士英和阉党阮大铖过从甚密，因此被东林党人骂为奸臣。

东林党骂人的功夫虽然厉害，但也不是什么君子之党。我们就说说东林党的首领钱谦益，钱谦益这个人，最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后来清军攻破南京后，他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

我们发现，他的操守还不如一个女人。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事实。

清军攻入南京后，钱谦益带头剃发，夹道欢迎清军。钱谦益有一个老婆，这个老婆名声非常大，虽是青楼女子出身，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的名字叫柳如是，近代学者陈寅恪还为他写了一部《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浙江嘉兴人，江南名妓，秦淮八艳之首。她的出身非常贫寒，童年的时候就被人拐卖。从此零落风尘，最后进入青楼。

柳如是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青楼女子，她的名字“如是”便是取自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柳如是见过的男人实在太多了，但很少有动心的，直到遇见了钱谦益，她喜欢上钱谦益不是因为他是官，有房有车，而是因为钱谦益才华横溢。钱谦益比柳如是大三十六岁，看在才华的面子上，柳如是丝毫不介意。

明朝灭亡后，许多遗民自杀殉国。作为东林党的领袖，钱谦益选择了苟活下去，还在清朝做了官。柳如是对此非常愤怒：“先生，你如果不殉国的话，还有什么面目见世人？”

钱谦益脸色苍白，支支吾吾：“活着多好啊，干嘛要死呢……”

钱谦益降清后，柳如是立即和他划清界限，拒绝跟他一起北上。和柳如是的气节相比，钱谦益这个才子的人格是多么渺小啊！

至少在这点上，马士英比钱谦益要强，马士英的下落虽然是个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没有降清。在各种传说和记载中，马士英不是被清军杀，就是出家了，做了和尚或者道士。

在马士英和阮大铖把持朝政的时候，有人曾经在马士英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闯贼无门，匹马横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捣中原。

上联骂马士英，下联骂阮大铖。两人非常愤怒，下令彻查这件事，也没查出什么结果。马士英虽然是个奸臣，但并没有搞好各方面的关系，最要命的是他得罪了当时最大的军阀左良玉。清军进攻弘光政权时，左良玉也大军开进。弘光政权破灭后，马士英下落不明。

根据《明史》的记载，兵败之后，马士英带着残兵准备进入福建，结果唐王不让他进来。第二年，马士英在太湖被捉拿，斩首。

但是据当时的文人吴梅村《鹿樵纪闻》的记载，马士英又是完全不同的结局。兵败之后，马士英逃到天台寺中，后来被家丁找到了，献给多铎。多铎让人剥掉他的皮，充上草，放在路上。一时间，老百姓拍手称快。马士英字瑶草，生怀瑶死怀草，非常巧合。根据吴梅村的记载，马士英死于天台山的寺庙之中。

道光时期一个文人记载，马士英逃到新昌山的一个寺庙中削发为僧，后来被清兵捉到，斩杀在新昌山寺。然而，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暗示马士英在台州山被雷劈死，阮大铖则跌死在仙霞岭上，两人死的都非常惨。

由于明末清初，形势非常特殊，加上野史繁多，许多历史学家跟东林党或者阉党有瓜葛，所以对马士英的评价差别很大。光绪年间，贵州进士姚大荣曾经撰写文章为马士英平反，姚大荣认为《明史》将马士英列入《奸臣传》不妥当，马士英不是特别坏，而且没有投降清朝。

根据有关学者考证，在康熙年间的《清云圃志略》中记载了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马道士，根据书中的记载，马道士生于蜀地，法号道常，号常住。他单人涉大江，过越地，到南浦，经常跟人说他的人生经历。据说一些认识马道人的人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施舍给他东西他也不接受。一些学者经过考证认为，这个道士很可能就是弘光朝的首辅马士英。

马士英的下落，迷雾重重，如果他真是禅隐归道，也算是对自己罪恶一生的一种消解和忏悔吧！

第四章 清军入关——规模空前的大屠杀

在清军的官方资料里，充斥着“屠城”“杀无赦”这样的字眼。事实上，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对辽东汉人实行了大屠杀。入关之后，屠杀的规模更加庞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曾经给顺治上疏：“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大屠杀

据说扬州城破之时，史可法准备自刎而死，被部将阻止。史可法便命养子史德威砍死自己，史德威痛哭流涕，实在下不了手。最后，史可法在参将张友福的推拥下，出了小东门，途中遇到清兵，史可法大呼：“史可法在这里。”

看来，史可法为国殉难的念头非常坚定。尽管多铎一再放下身价，招降他，但史可法不为所动。史可法就这样英勇就义了。

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牢记养父的遗言，寻找史可法的遗体。可惜当时天气非常炎热，尸体腐烂得已经难以辨别，史德威实在无法从满城的尸体中找出养父，只好在梅花岭为史可法修了一个衣冠冢。

这之后，清军连续十日血洗扬州，人们将这段血腥的历史称为“扬州十日”，当时不分老幼，一律屠杀。五天后，清军开进南京城，弘光帝带着文武百官以及二十万士兵跪道迎降。

攻占南京后，清军悍然发布了剃发令，清军之前的政策并不是这样的，只是要求明军将士要剃发，现在不管是谁都必须剃发。这个命令发出后，各个地方的兵民纷纷反抗，其中江阴和嘉定两个地方的人民反抗得最为激烈。

顺治二年六月二十日，清廷委任明朝进士方亨出任江阴知县，方亨到任之后，立即执行剃发令。当地父老乡亲认为方亨是前明进士，应该会念及旧情，就联名给方亨上书，希望方亨不要绝情，能够给父老乡亲留发。哪知道方亨辣手无情（说实话，我们也不能怪他，他不执行命令，掉脑袋的就是他自己了），不为所动，如果不剃发，他就

强制执行命令。

许多人骂方亨：“你是明朝进士，头戴乌纱帽，身穿官服，却做清朝知县。你知不知耻，怕不怕羞？”

方亨也很愤怒：“别废话，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当地不少的文人在祠堂里发誓：“头可断，发绝对不可以剃。”

很快这种思想在民众中传开，事态越来越紧急，民变一触即发。方亨一见这情景，躲在衙门里不敢出来。他一边敷衍民众，说有事好好商量，不要走极端，一方面秘密派人去常州，请太守发兵，说江阴这里已经发生了民变。江阴百姓在城门口抓住了使者，质问以后，明白了方亨的阴谋。

愤怒的群众击杀了城内的清军，从衙门里揪出方亨。民众推举典史陈明遇为首领，拿起兵器武装反清。民众造反的消息传到清廷，清廷立刻发兵征剿。许多商人和富农拿出家里的财产充作军饷，起义的农民杀死方亨后，占领江阴城，公开举起反清大旗。

刘良佐奉命前来招降江阴军民，诱惑说：“只要你们投降，什么条件都好谈，反正大家都是大清的子民，有什么不好商量的。我保证只要你们投降，不会动你们一针一线的。”

城里的百姓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剃发这种事，自古未有，即使有百万大军临城，我们也绝不投降的。”

七月初一，清军开始攻城，陈明遇是一介文官，将城中防守的任务交给阎应元。到了八月中秋，江阴城还没有攻破。阎应元还给军民们发赏月钱，危难当头，大家一边赏月一边抗战，颇有古希腊人的风范。当时，江阴城有人作《五更转曲》，听后，就连城外的清兵都流泪：

宜兴人一把枪，

无锡人团团一股香。

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

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

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

八月二十一日，江阴城破，阎应元慷慨就义，临刑前赋诗一首：“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河山。”

城破之时，阎应元带领一千多人上马和清军巷战，杀死许多敌人，身上中了三箭。他想夺门而出，没有成功，便跳到了太湖中，可惜湖水太浅，被清军俘获。当他被押到刘良佐面前时，刘良佐失声痛哭。阎应元问他：“你哭什么？要杀要刚快点吧！”刘良佐什么话也没说，转身离开。当天晚上，阎应元被杀害。陈明遇则战死在疆场上。

江阴城破之后，又是一场大屠杀，剃了头发的不杀，和尚不杀，其他都要杀头。当然，这一战清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死者接近七万，当然，其中很多是投降的汉人。

江阴人民的保卫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极大地鼓舞了反清斗争。其中，最有名的是嘉定人民，结果是历史上著名的“嘉定三屠”。

清军进入南京后，原来明朝的嘉定县令弃城逃跑，清廷派周荃单骑到嘉定来招抚嘉定人民，这时候，嘉定人民还没有反抗，而是对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一个月后，新任的县令张维熙到嘉定就任。本来嘉定人民对清廷没那么反感的，忽然没过多久，传出了剃发令。一时间，城内人心惶惶，剃发比剃头还恐怖，这说明了习惯在人心中的地位。

随着剃发令越来越严，老百姓在街头奔走呼告，如丧考妣：“没有大明的官兵来保护我们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有人要给我们剃头，这比死还难受。只要有人敢起义，我们一定追随。”

后来，突然有人放话说，以前明朝的总兵吴淞即将带领军队进城解救百姓之困。病急乱投医，危难之时见了稻草就抓，老百姓一听吴淞将军即将到来，闻风而起，开始火烧清军船只，打击清军。

嘉定人民的起义具有很大的自发性，是对古老习俗的一种坚守，对外来习俗的一种反抗，加上这种外来习俗是强制性的，所以反抗必然也是极端的。大家也意识到这种缺少组织的反抗会是什么后果，便推举进士黄淳耀和前明官员侯峒曾为首领。

在这两个人的主持下，嘉定百姓据城而守，人人拿起武器。嘉定百姓没有杀掉县令张维熙，只是把他赶出城，在城上挂着白旗，上面写着“嘉定恢剿义师”，并挨家挨户抽丁。城内秩序井然，昼夜有人巡逻——要是早这样的话，明朝也不会亡国，只有危难之时人们才懂得团结。

六月二十四日，李成栋派遣弟弟李成林率领几十名骑兵，企图杀出一条道路，向外界求救。然而，李成林在出城之时被乡勇包围，李成林被杀死，尸体丢弃在路边。得知李成林的死讯，李成栋日夜对着副将哭泣——可见，这人虽然做了汉奸，但是丝毫没有泯灭人正常的

感情。

七月一日，嘉定已经聚集了十万的乡兵。可惜这些乡兵没有作战经验，和李成栋交战之时被打败。败退之时惨不忍睹，尸横遍野。更糟糕的是，当时河水暴涨，乡兵无路可退，只好跳进大水里，那个场面绝对是少儿不宜，太过血腥。李成栋指挥清军肆意屠杀，以泄弟弟被杀之恨。除此之外，李成栋还在城中挑选美貌女子，恣意淫乐。

李成栋率领清军攻进城后，接连屠杀了三天。清兵在杀人之前，先让百姓拿出珍宝和银子，骗他们说拿出银子就不杀人，结果不管有没有银子，一概被杀。

清军的屠杀远远不止这些，“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只是其中著名的案例。清军入关后到底屠杀了多少人没有确切的数目，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一些资料进行推算。

首先，我们可以清朝自己发布的屠杀文告，根据《清世祖实录》的记载，所有州县，如果能剃头投降，开城欢迎的话就让你们过好日子；如果抗拒的话，大军一到，玉石俱焚，所过皆屠。在1649年清朝在四川发布的文告中说：“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总之，在清军的官方资料里，充斥着“屠城”“杀无赦”这样的字眼。事实上，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对辽东汉人实行了大屠杀。入关之后，屠杀的规模更加庞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曾经给顺治上疏：“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记载清朝杀戮：“鞑靼全军入城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小孩、老人的哭声震天……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和反叛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的，都不惜代价用钱换命，以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根据官方的记载：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我们再看看地方县志的记载。

昆山大屠杀：被屠杀的十分之四，自杀的十分之二，被俘的十分之二，逃走的十分之一，藏匿起来侥幸逃脱的十分之一。时人形容说，杀戮一空，逃出城门被杀被踩死的不计其数。躲在山上寺庙里的妇女小孩，因为一个婴儿啼哭，顿时被搜出来，杀得血流成河，血从山上落下来仿佛瀑布。

南雄大屠杀：家家户户里只有燕子的声音，没有人声，尸体堆积如山，有的婴儿侥幸没被杀，还在娘的怀里找奶吃……

潮州大屠杀：留下骸骨十几万，和尚们把尸体收集起来，在西湖山上焚毁。同安县被屠杀五万人，梵天寺的和尚将尸体收集起来焚化，建了一个无祠亭，墓碑上刻着“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桥畔河堤，或者是残垣断壁，到处都是尸体，不下五千人，被俘虏的男女更是不计其数。

除此之外，清军还疯狂掠夺人口，将这些人当奴隶驱使，这项政策在皇太极时已经消停了，多尔袞掌权后又开始了。

遗民与贰臣

清军入关之后，遭难的是全天下的百姓，但在这期间，最纠结的还是知识分子。他们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面临着一场关系名誉和生死的抉择。

根据儒家的传统思想，忠臣不事二主，为人臣者要舍生取义。苟活还是殉国成为摆在明朝遗民面前最迫切的选择，明朝灭亡之后，大批知识分子自杀殉国，从容赴死。根据史料记载，有大批的遗民虽然没有选择死，但是也没有选择在清朝的眼皮底下过日子，而是选择了远涉重洋，到台湾地区、南洋或者日本去。据学者统计，明朝遗民的数目不下万人。

有遗民，有殉国者，就有贰臣。贰臣当然不是一个褒义词，贰臣是那些背叛明朝投降清朝的人，在当时，贰臣是非常受鄙视的。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贰臣也没有什么，都是为了生存。人首先要活着，然后才有其他。

清政府也非常不地道，对于那些投降的贰臣，他们可以贬低，极尽嘲笑，搞得这些贰臣们非常难堪。相比遗民，贰臣们虽然衣食不愁，依旧过着富贵生活，但是人格就要低贱得多。

清初最有名的遗民当数顾炎武，顾炎武是苏州昆山人。明朝灭亡后，他开始了漂泊生活。身负奇学，名满天下。弘光政权建立后，顾炎武担任兵部司务，企图一展抱负，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可惜，弘光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政权又为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把持。不久，弘光就被清军灭掉。顾炎武于是投笔从戎，在苏州参加了反清斗争。失败后，回到老家。

没过多久，剃发令又来了，顾炎武的一些好友又参加了反剃发斗争，但顾炎武因为老母有病，只好在家照顾。顺治二年七月，昆山被清军攻陷，顾炎武两个弟弟被杀害，老母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落了个终身残废。

七月十四日，顾炎武的母亲绝食而死，临终给他留了遗训：“勿为异国臣子。”

从此，顾炎武蓄发明志，表示与清朝统治者对抗到底。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顾炎武写下诗句：“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此后五年，顾炎武辗转于太湖沿岸，和各地反清复明的志士秘密往来。

顺治七年，顾炎武以前的一个仇家叶方恒告发了顾炎武。为了免遭迫害，顾炎武剃去头发，装扮成商人，继续在江南江北一带和反清复明的人士交往。顺治十二年，叶方恒和顾炎武家里的仆人陆恩勾结，以组织反清武装的罪名告发顾炎武。顾炎武得知这个消息，悄悄地潜回昆山，秘密处死陆恩。但顾炎武也因此被抓进监牢里，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才得以逃出狱。叶方恒派遣刺客在南京太平门外刺伤了顾炎武，并洗劫了顾炎武的老宅。

至此，顾炎武决定离开故土，远走中原。

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变卖家产，开始了游学生涯，足迹踏遍山东、江苏、浙江、河南、陕西、山西等地。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顾炎武以其精湛的学术造诣名闻天下。在游历名山大川的同时，顾炎武也不忘关注时局的发展，一直密切地关注反清复明斗争。顺治十六年，顾炎武到了山海关，怀想当年山海关一战，对清军入主中原一事悲愤不已，吟诵了一首《山海关》：长城古堞俯沧瀛，百二河山拥上京。银海仙槎来汉使，玉关秋草戍秦兵。星临尾部双龙合，月照平沙万马明。闻道辽阳飞羽急，书生急欲请长缨。

这首诗，怀想明朝边事，对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一事深恶痛绝。这一年夏秋之交，郑成功、张煌言率军挺进长江，一路战果辉煌，直逼南京。顾炎武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振奋，也跟着南下，希望能够有一番作为。可惜，还没走到扬州，就传来郑成功失败的消息，顾炎武只好怅然而归。顺治十八年，郑成功退到台湾地区，永历政权宣告瓦解。顾炎武满腔热血瞬时成空，一时心灰意冷，准备一辈子隐居，做一个学者。

顾炎武选择做一个遗民就意味着选择生活的艰难，因为封建社会士大夫基本不从事生产，换句话说，经济来源成了问题。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顾炎武面临着最大的危险是政治迫害。在康

熙二年，发生了一桩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庄氏史狱，金庸《鹿鼎记》就以这桩文字狱开始。事件的经过是庄氏编了一本明史，书中有许多“犯禁”的地方，特别是纪年都是用明朝皇帝的年号。庄廷鑑曾经邀请顾炎武也来编写这本书，不过顾炎武委婉地拒绝了，因此逃脱了这场文字狱。这场文字狱牵连非常广泛，遇难的人达到七十多人，其中有不少是顾炎武的好友。

康熙五年，顾炎武又遇到了一次灾难。山东莱州人姜元衡告发黄培收藏“逆诗”，并且指控顾炎武与黄培过从甚密，曾经到黄培家中搜罗《忠节录》。听到这个消息，顾炎武非常震撼，那时他已经感受到清政府可怕的力量。为了澄清事实，顾炎武从北京到济南自首。结果，被关进了大牢。在牢里度过了十个月，顾炎武才在友人的救助下出狱。

尽管生活如此窘迫，生命和财产没有保障，顾炎武仍然没有动摇自己的立场，坚持要做明朝遗民，拒绝清政府的征聘。

清廷修《明史》时曾经重金礼聘顾炎武，但顾炎武誓死不从，在回复信中，他郑重声明：“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一身殉之。”

直到康熙二十一年，顾炎武才病逝。

清初有名的遗民还有屈大均，屈大均是广东番禺人，广州沦陷后，屈大均的父亲命令他：“一定要洁身自好，不要在清廷当官。”屈大均谨遵父亲的教诲，为了保持对明朝的忠诚，他选择在家务农。

清军剃发令来了之后，屈大均和老师陈邦彦一起参加反清斗争，立志反清复明。斗争失败后，屈大均的老师陈邦彦殉国，屈大均无路可走，选择了出家。出家之后，屈大均没有戴僧帽，而是戴明朝士人常戴的青纱头巾。屈大均虽然皈依了佛门，但实际心理上还不是一个僧人，始终牵挂着明朝故国。

复国无望之后，屈大均在晚年以文字遣怀，书写了大量的作品。由于屈大均的立场是反清复明的，所以毫无疑问他的书在当时是禁书。屈大均六十七岁时死去，死后，清廷掘起他的尸体屠戮，并将他的两个孙子斩首。生前无难，死后遭灾，一生也算是可悲。

钱谦益和吴梅村都是被列入《贰臣传》的，钱谦益前面我们提到，他为了保命投降清朝。投降清朝后，他的人生仍然充满了坎坷和危险，在清廷的政治生涯中，钱谦益几次被牵连入狱。几次政治迫害的经历让钱谦益对清廷感到失望，返回常熟后，他暗中与反清复明的势力联络。

康熙三年，钱谦益病逝，他的一生充满坎坷，背负了贰臣的罪名，最后又反叛清朝，以明朝遗民自居，可以说非常尴尬，又非常无奈。

吴梅村也是一个明朝遗民，他刚开始的时候立场非常坚定，坚决不与清廷合作。后来，禁不住顺治的再三征聘和家人的怂恿，进入清廷当了几年的官。晚年，他深深为这段经历忏悔。他非常痛苦，他并不想当官，但是又担心拒绝清廷的征聘会给家族带来灾难。选择出仕后，又很不甘心，总之，进退维谷，最后选择隐居度过此生。

第五章 清朝政治的操盘手

多尔衮除了是一个战争的好手，也是一个管理高手。皇太极设立六部后，为了挑选一个吏部尚书，伤透了脑筋。他选来选去，最后还是不得不让多尔衮担任这个职位。

难人多尔衮

清军入关可以说是多尔衮一手策划导演的，多尔衮可以说是一个成功者，但他的成功是用无数尸体铺垫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多尔衮的前半生吧！只有了解他的早期经历，我们才能了解这个人。

别看多尔衮带着清军入关，又把福临接到北京，在这里建都，无限风光。在这之前，多尔衮的日子并不好过。自从母亲被逼死后，他就是一个难人了，天天要在自己仇人的眼皮底下过日子。

这段日子有十七年，我们很想知道这十七年多尔衮是怎么挺过来的。要了解多尔衮，我们还是先从他早期的经历说起，当时形势错综复杂，一切还得从努尔哈赤说起。

多尔衮一生下来就是王子，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从多尔衮的职位升迁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子之后他就是和硕额真了。努尔哈赤的儿子相当多，而和硕额真的名额只有八个，再加上有些额真是由他的孙子和侄子担任，说明要当上和硕额真，光是努尔哈赤的儿子还不够。

清初的历史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对外征战，一个是内部管理。无论是对外征战，还是内部管理，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对外征战，努尔哈赤总的来说很成功，但内部管理他却有很多失败的地方。

长子褚英是第一个废太子，不仅被废，连性命都丢了。褚英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人，可能由于年轻，办事情有些急躁，执掌权力后，排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个贝勒，打压努尔哈赤非常宠信的五大臣。由此引起了与父汗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升级为褚英集团和努尔哈赤集团的斗争。褚英的下场非常惨。

褚英之后，代善顺理成章成为了新一轮的接班人。代善的功劳仅次于褚英，被立太子实属情理之中。但是在天命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代善当着努尔哈赤和众兄弟的面作检讨。代善检讨的内容主要是：我没有听从汗父的教导，没有听取众兄弟们的意见，以致听信妻子的谗言，丧失了汗父委托给我的军政大权，现在我手刃自己的妻子，以对过去的罪孽忏悔……

代善听信小老婆的话，准备杀掉儿子硕托，这事引起了努尔哈赤的震怒。代善不得不杀掉这个多事的老婆，以期得到努尔哈赤的谅解。除此之外，代善发生了与继母通奸之事，太子之位就这么被他自己亲手弄丢了。

正是这次废除代善太子之位，努尔哈赤提出今后政事由八个和硕额真共同决定的新体制。没有这次代善被废，可能就不会有和硕额真的出现，多尔袞是没法染指权力的。事实上，努尔哈赤所谓的八个和硕额真实际上有九人，分别是莽古尔泰、皇太极、莽古尔泰的弟弟德格类、阿济格、多尔袞、多铎、代善的儿子岳托、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和济尔哈朗。可以看到，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都位列其中。

我们先说说为什么是九个人吧！努尔哈赤这样安排，实际上是因为多尔袞和多铎年纪太小，都才几岁，所以才让两人共掌一旗。我们知道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儿子，长子褚英已经被处死，最小的儿子费扬古还在娘胎中。这么多儿子，只有八个和硕额真的名额，阿巴亥就为自己的儿子争到了三个。由此可见阿巴亥的能量，史书记载她不仅长得妩媚，心思也非常深。

碰上这么一个好母亲，多尔袞等人是幸运的。代善的太子之位被废后，无疑为多尔袞兄弟三人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当然，只是机会而已，在尘埃落定之前，一切都可能发生。努尔哈赤那么多儿子，不一定要立多尔袞为太子。

现在，努尔哈赤将国政交给八大和硕贝勒，可以说是为阿巴亥开路，也可以说是为多尔袞开路。当时，努尔哈赤为接班人问题苦恼得不行。代善犯了大错，是没有资格继承这个高位的。莽古尔泰手刃生母，名声臭烘烘的，加上性情暴躁，肯定也是没法继承大统的。德格类是莽古尔泰的弟弟，因为母亲出了问题，也不好继位。

至于阿敏、济尔哈朗，都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是没资格继承汗位。岳托和硕托都是孙子，如果让他们继位，那一大帮子叔叔肯定很不高兴。这么一看，最好的人选似乎是皇太极了，皇太极很早就博得了智勇双全的名声，而且也是战功赫赫，让皇太极当继承人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努尔哈赤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首先是因为皇太极的出身不理想，他的母亲不是大福晋，只是侧妃；其次呢，皇太极这个人有点孤高自负，骨子里比较瞧不起其他兄弟。

此时，阿巴亥是大福晋，深得努尔哈赤的宠爱。当时看来，阿巴亥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非常有希望继承汗位。但是当时肯定是不方便立他们为太子的，因为年纪太小，不足以服众。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努尔哈赤立继承人的困难，所以最后才没有留下遗嘱，但是他的安排已经透露了心中的想法。而这一点早已被皇太极窥破，所以努尔哈赤前脚去阎王殿，皇太极就立刻逼死阿巴亥。这就叫快鱼吃慢鱼，皇太极如果再慢一点的话，等阿巴亥反应过来，很有可能就处于弱势地位。

在逼死阿巴亥这件事上，貌合神离的贝勒们突然立场变得出奇的一致。这是因为阿巴亥一派的权势太大了，阿巴亥的儿子上台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再加上这些年来，努尔哈赤对阿巴亥宠爱得无以复加，大家心里早就积蓄了不满。你想想看，这些儿子们出生入死，拿血汗才换来今天的地位，一个女人仅仅靠着宠爱就为自己的儿子获得了同等的权力。如果不逼死阿巴亥，实在是后患无穷，应该说皇太极考虑问题是周到的，虽然手段过于狠辣。

皇太极继位以后，等待多尔衮的是一个巨大的悬念。果不其然，皇太极不久就采取了措施，他把多尔衮镶白旗的十五个牛录夺了过来，给了谁呢？给了自己的长子豪格。此时，多尔衮虽然只有十四岁，但也知道别人在欺负自己。应该说，从那时候开始多尔衮就在心里默念“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多尔衮不敢把仇恨的目标对准皇太极，对豪格恨得咬牙切齿。

皇太极接下来第二个动作是提拔多尔衮，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我们来看看皇太极是怎么做的吧！阿济格已经成年了，皇太极看他不太顺眼，听说他为多铎说了一个对象。皇太极就问他：“你怎么搞的？你弟弟还小，就给他对象？这事经过我同意了吗？”阿济格争辩道：“这种小事也要经过大汗同意吗？”皇太极反问：“你觉得呢？”阿济格：“反正事情都已经做了，你说该咋办吧？”

皇太极：“不尊重我是要付出代价的，算了，你别当这个镶白旗的旗主，让给你弟弟多尔衮算了。”

你看，皇太极多聪明的一个人，故意给多尔衮兄弟制造矛盾。阿济格年纪大了，不好掌控，解除他的权力，让多尔衮负责，操纵起来特别方便。原来，皇太极是想拉拢多尔衮和多铎，让他们变成自己的棋子，对付其他几个旗的旗主，等利用成功后，多尔衮、多铎也长大了，那时正好可以收拾这两个棋子。

多尔衮人生之路就这么化险为夷了，但是在皇太极手下生存那绝对是一项技术活，不过这些都没有难倒多尔衮。多尔衮挺过来了。就

这样，多尔衮成为了皇太极的左膀右臂，到了后来，皇太极甚至都离不开这个人了。

经过时间的淘洗，在皇太极的文臣武将中，多尔衮排名第三，前面两个分别是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这两人资格是相当老的，比多尔衮大上几十岁。由此可以想象得出，多尔衮的能力有多强。皇太极封他为睿亲王，等于是承认，在我们满洲国，除了我最聪明，就是你了。

权力男人

多尔衮除了是一个战争的好手，也是一个管理高手。皇太极设立六部后，为了挑选一个吏部尚书，伤透了脑筋。他选来选去，最后还是不得不让多尔衮担任这个职位。吏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部长，主持官员的任免。所有官员都要经过多尔衮的首肯，才能上任，这就是为什么多尔衮在第二次汗位争夺大会上说话底气那么足，人家是有群众基础的。手中掌握大权后，多尔衮自然会对那些曾经伤害过，得罪过自己的人动手。

多尔衮最恨谁？自然是皇太极和豪格，但皇太极是最高领导，是多尔衮的保护人，你多尔衮不可能对皇太极有什么不友好的举动。多尔衮也不敢动豪格，这可是皇太极的长子。多尔衮只能对付那些皇太极看不顺眼的人，皇太极看谁不顺眼？

皇太极看不顺眼的人实在太多了，代善是首当其冲的。正好，多尔衮对代善也非常有意见，当时你要是支持我老妈的话，我老妈也不至于死了，现在我哥仁也不至于活得这么艰难。

怎么整代善呢？要整死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打压他还是可以的。这不，机会就来了。

满洲人是马上民族，长年累月在杀人放火，杀人放火是有风险的，总是会死人。所以，满洲人一般会用投降的人补充那些在战场上不小心挂了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清军不断壮大。但是这个投降的人也有先后之分，先投降的称为“旧满洲”，后投降的称为“伊彻满洲”。旧满洲比伊彻满洲享受的待遇要好，连投降都论资排辈，许多后投降的人就不满了，什么世道啊，难道投降也分先后？

这些不满的人选择了开溜，开溜的人恰好多数是代善的手下。皇太极这下得理不饶人了：“礼亲王代善，你说你咋个回事，连那么点人都管不好吗？”代善心想，我论资格比你老，别看你是领导，没我

支持，你能上来？所以很不爽地回道：“我的人马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不劳太极老弟你费心了。”

皇太极气得吹胡子瞪眼，多尔衮这时不怀好意地上了一道奏折，洋洋洒洒几千字，说的就一个意思，礼亲王代善治兵无方，以后就不让他的旗扩大了。皇太极一听有道理，就这么着。从此以后，正红旗和镶红旗的人马那是有出无进，死一个少一个，所以到最后，这两旗是八旗中势力最小的两个。

我们可以看到，在斗心眼方面，多尔衮可能仅次于皇太极。所以，皇太极死后，他没有为了个人的权力选择莽撞行事，而是顾全大局，和反对派作出妥协，让福临当皇帝，自己当摄政王。

我们再看明朝那边，表现得实在太让人失望了。国家都已经亡了，崇祯的几个儿子还斗得稀里哗啦的。所以，明朝不亡，那是没有天理的。

多尔衮绝对不是什么善类，在特殊时期他选择了大局，一旦腾出手来，小我就占上风了。

但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却非常让人意外，多尔衮处死了硕托和阿达礼，硕托是代善的儿子，代善早就想除掉他了，因为这事还导致汗位被废，阿达礼是代善的孙子。人们会说，多尔衮不是看代善一族不顺眼吗？处死他的儿子和孙子是很正常的事。

不正常，因为这两人是多尔衮的支持者，是多尔衮的爪牙，他们被处死的罪名是谋反。他们为啥谋反？还不是为了多尔衮，这两人看多尔衮没当皇帝，急了，准备杀掉豪格和顺治，强行拥立多尔衮。最后礼亲王代善大义灭亲，向多尔衮告发这两人，没办法，多尔衮只好把这两人处死了。

真实的历史是不是这样呢？硕托和阿达礼如果没有得到多尔衮的同意，敢谋反吗？真实的原因可能是多尔衮授意这两人去活动，可惜这两人把事情办砸了。这两人居然去拉拢两黄旗的大臣图尔格这些人，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阴谋变成阳谋，多尔衮能不气愤？

处死硕托和阿达礼之后，多尔衮也很后悔，很内疚。他作了许多补偿措施，将硕托的幼子接到自己家里，当成亲儿子一样养着。他还让阿达礼的弟弟接替阿达礼的一切职务，当然，这些补偿措施只能说明多尔衮知道这两人是好心为自己办事，但办了坏事。

多尔衮第二步是分化两黄旗的八位大臣，这八位曾经歃血为盟支持豪格。现在时势逆转，多尔衮执掌大权，自然有机会对他们实行分化。首先是拜音图家族叛变，不再支持豪格，坚定地跟多尔衮站在一

边。拜音图的弟弟巩阿岱还揭发郑亲王，说济尔哈朗在背后说多尔袞坏话。

多尔袞郑重其事地找济尔哈朗兴师问罪，济尔哈朗也很坦荡，表示我确实说了你的坏话，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多尔袞说，那好，你既然承认了，自己看着办吧！

济尔哈朗说，行，我知罪，这个摄政王的位子我没脸再坐下去了，我回家了。

多尔袞很满意，让弟弟多铎当上了摄政王。现在清朝大权就操在这哥俩的手中。拜音图叛变不久，何洛会也叛变了，何洛会不光叛变，还揭发了八大臣中的图赖、图尔格，说这两人说多尔袞坏话。

说我坏话是吧，削职为民吧！何洛会，你检举有功，可以升官。这么一搞，原先的八大臣只剩下四个了。

把豪格的羽翼剪除得差不多，多尔袞决定对豪格下手了。碰巧豪格逢人便说多尔袞这人有病，什么病我们不知道，根据豪格的说法多尔袞这人活不长。

多尔袞怒气冲冲地叫豪格过来，问他，这些话你是不是都说过？豪格也不隐瞒，我确实说过。多尔袞就说，你这样做不是故意破坏八旗的团结吗？我年龄比你小，但论辈分是你叔叔，你对长辈这样，你说该怎么办吧？豪格大声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不就想我死吗？我死就是了。

多尔袞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豪格点头，大丈夫说出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多尔袞问诸位亲王和大臣有什么意见？代善说，没意见。济尔哈朗也说没意见。大臣们都说，这个豪格确实该死。

多尔袞说，那你就自杀吧！

豪格也是个汉子，拿起刀准备自杀。事情到这一步应该没什么悬念了，但豪格命中注定不该这时候死。就在全场鸦雀无声，只等豪格血溅当场的时候，突然跑出了一个小孩子，搂着豪格的腿大哭：“我不要哥哥死，哥哥如果死了，我这个皇上就不当了。”

全场哗然，多尔袞眉头紧皱，小顺治哭着对多尔袞说：“你要杀我哥哥，就先杀了我吧！”

这么小的孩子尚且懂得亲情，整得豪格当场流眼泪。福临，你是个好弟弟，有你这么个好弟弟，哥哥死而无憾。

顺治的突然出现，搅浑了整个会场，一时之间，多尔袞也束手无策，总不至于连小皇帝也杀了吧！没办法，暂且留下豪格的人头，豪

格虽然沦为庶民，但总算是保全了性命。当然，豪格仍然可以带兵，毕竟打仗这家伙能干，不用的话是一种损失。多尔衮说，你虽然是庶民，一旦发生战争，你还可以带兵打仗。不过，打仗回来后，你仍然是个草民，人家打仗回来有功可以得赏，你什么都没有，你是义务兵，懂吗？

豪格说，我懂。

直到现在豪格才懂得这个道理，跟权力是没法讲道理的，虽然心里不服气，但从此确实乖乖听话。豪格当时的心里肯定是这样想，我才不是为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多尔衮办事，我是为我小弟弟，为了他，我什么委屈不能承受。

多尔衮心想，豪格，你别以为小皇帝能保你。现在张献忠在四川那边闹事，豪格你去吧，把张献忠的人头提回来送给我。豪格二话没说，带兵去四川，任务完成的非常好。豪格不光平定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还亲自射杀了张献忠。回来后，多尔衮连句表扬的话都没有。豪格也没有丝毫的怨言。

豪格越是没有怨言，表现得越是乖，多尔衮就越生气，豪格你这个莽夫还跟我玩城府了。到了1648年，多尔衮随便找了一个借口把豪格关了起来。我不能杀你，关你的权力还是有的。小顺治再哭再闹，哭呗，闹呗。

进了监狱的豪格如同进了地狱，被折磨得怎一个惨字形容，豪格是怎么死的？精神分裂而死。豪格死后，多尔衮又将豪格的福晋博尔济吉特氏纳为自己的妃子。多尔衮如愿以偿地打掉一个个对手，将大权控制在自己哥仨儿手中。摄政王啊摄政王，其实比皇帝还牛气。

这时候，多尔衮如果要废掉顺治，将江山收入自己的怀抱，应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第六章 大西政权的没落

狼与狼也是有差别的，愚蠢的狼见人就露出獠牙，聪明的狼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獠牙给藏起来，装出一副羊的面目。豪格进四川之前，就发布了安民告示：“朝廷命我出师剿匪，削平乱贼，百姓不必惊慌，我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

张献忠之死

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小的时候，他跟着父亲来到四川内江，在这里贩卖枣子。在四川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张献忠的一生。

那时，张献忠很小，将驴子的缰绳系到了一个富人家的石柱上，岂料，驴子拉屎粪便弄脏了石柱。结果，富人家仆人用鞭子狂抽张献忠的父亲，张献忠就在旁边看着，眼中噙满泪水，拳头捏紧，却敢怒不敢言。这件事对他幼小的心灵打击非常大。

长大后，张献忠加入农民起义军，逐渐爬到领导的位置。在张献忠的带领下，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多。顺治元年正月，张献忠攻入四川；六月，拿下重庆；八月，又攻下成都。先后杀掉明朝的端王和蜀王。十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改蜀王府为承天殿，将养子孙可望提拔到相当于丞相的位置。在大西政权内部，孙可望的地位仅次于张献忠，这就为后来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矛盾作了良好的铺垫。李定国的能力比孙可望强，可是地位却没有孙可望高，最后功高震上级，孙可望主动讨伐李定国，讨伐失败后，孙可望主动投降清朝。李定国直到死，也没有接受清廷的招降。

在张献忠生前，李定国是大西政权第三号人物。张献忠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张献忠给这四大将军赐姓张，分别封王。

张献忠最开始打着反明的旗帜，所以在四川遭到了故明势力的抵抗。对于不听话的人，张献忠习惯采取高压政策。顺治二年以后，张献忠在四川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一方面是清军的压力，一方面是四川百姓的反抗。这种处境导致张献忠变得焦躁，为了肃清一切反对的力量，张献忠听从了汪兆麟的建议，对成都居民实行了大屠杀。顺治二年七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张献忠亲自指挥部队在成都实行了一次大屠

杀，先杀掉男子，然后再逼着女人跳江。当时，自杀的人不计其数，根据记载，被杀的人不下四五十万。

成都大屠杀没过多久，张献忠杀心又起，他借着举行“特科”之名，命令各府县的生员一律送到成都。送到成都后，张献忠并没有举行什么特科，而是把这些书生全部聚在一起，来个集体大屠杀。当时，张献忠的养子孙可望看到这一幕，感慨地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辛苦奔波，为的是什？不就是为了百姓吗？没想到这一切付诸东流，实在太可惜了。父王这么做，实在让人无法理解。父王本来应该是百姓的首领，犹如身体的头部，现在砍掉手足，头又怎么能独活呢？有王无民，何以为国？”

张献忠倒行逆施的行为连自己的养子都看不过去，何况四川的官民。四川人民看到张献忠的野兽之心后，纷纷组织了许多武装力量抵抗大西军。曾英在重庆纠集部队，朱化龙在茂州组织了一支军队，曹勋带领人马盘踞在大渡河一带……总之，大西政权在四川民心尽失，四川的人民纷纷用马粪涂抹大西年号，刺杀大西官员。很多大西官员到任不到两三月就被杀害，有的县里面甚至几个月连杀十几名县官。

张献忠搞得民怨沸腾的时候，清军已经平定了江南。随即，多尔袞又任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征讨四川。张献忠的末日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四川人民的好日子就来了，这情景不过是走了一群狼，又来了几只老虎。老百姓横竖是被奴役，被屠宰。

狼与狼也是有差别的，愚蠢的狼见人就露出獠牙，聪明的狼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獠牙给藏起来，装出一副羊的面目。豪格进四川之前，就发布了安民告示：“朝廷命我出师剿匪，削平乱贼，百姓不必惊慌，我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

迫于清军巨大的军事压力，顺治三年八月，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在离开之前，张献忠下令屠杀所有妇女，收缴所有金银，凡是藏匿一两银子的人砍头，藏匿十两以上的剥皮示众。奇怪的是，张献忠收缴银子并不带走，而是将金银全部投进江里。

临走之前，张献忠还命人焚烧成都城，摧毁成都及其州县的城墙。就这样，背后是火光冲天的成都城，张献忠带着部队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成都，到达西充，驻扎在凤凰山上。张献忠当然很清楚凤凰山不是久留之地，又让士兵们砍光凤凰山上的树木，做成船只，打算渡江到湖广。

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大西军出现了叛变，骁骑营都督刘进忠投降清军。就向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一样，刘进忠引清军入川。历史一再重复，重复的不是历史，重复的只是人性。

四川的地形非常复杂，山多平原少。如果没有刘进忠这么一个好向导，清军是不会这么顺利地进来的。刘进忠直接把清军带到凤凰山下。根据史书记载，这天风特别大，雾气特别浓，完全看不清东西。张献忠早上起来，走出帐篷，忽然一个哨兵报告说后方有马蹄声和铠甲声。张献忠听了大怒，让人把哨兵绑起来，准备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斩首。但是，没过多久，又有很多哨兵传来相似的报告。张献忠不由得起了疑心，张献忠亲自带着亲兵来到凤凰山下，这时，大雾已经散开，张献忠看到下面密密麻麻的全是清兵。

张献忠离清军的距离很近，刘进忠一眼就认出了他，对豪格说：“这个人就是张献忠。”

豪格急忙拉弓，一箭正中张献忠的胸口，张献忠当即摔下马，气绝身亡。当时，张献忠军营里有一个外国传教士，他曾记述张献忠的死亡过程：

献忠闻警，不问详细，是否果系清兵马队，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膀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太监见献忠已亡，先奔回大营，高声叫道：大王已被射死。声震各营，一时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

张献忠一死，结局不难想象，大西军是失败大逃亡，清军是胜利大追杀。清军斩首数万级，获得马匹一万二千匹。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带着几千残兵、几万家口，从重庆南下，辗转来到贵州，后来在云南建立了四将军政权，联合南明，继续抗清事业。

末路英雄李定国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失去了最高领导，抗清事业由四将军继承，但这四将军之间的矛盾也挺多的。

四将军都是张献忠的养子，在跟随张献忠南征北战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孙可望年纪最大，跟张献忠的时间也最长，张献忠死后，起义军都称呼孙可望为大哥。张献忠生前最器重的人是孙可望，论理，张献忠死后，孙可望是毋庸置疑的领导人。

事实上，孙可望也确实当上了起义军首领，但是平辈太多，局面并不好控制。部队占领贵阳后，在军队去向问题上首先发生了争执，

矛盾首次公开化。孙可望主张率军进入岭南，李定国则坚持要向云南和广西一带发展，这样的话可以方便联合南明。

应该说，李定国的建议要好一些。所以，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孙可望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意往云南、广西发展，联合南明势力。

李定国的战略确实是有效的，进入云南和广西后，大西军再次发展到二十几万人。孙可望随即称王，设六卿，以“兴朝”为年号，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应该说，孙可望治国能力并不差，至少不比张献忠差。孙可望在自己的地盘内，分田地给老百姓，对于特困家庭还给予特殊补助，比如给他们耕牛和种子，让他们自力更生。在孙可望等人的努力下，大西政权又出现了繁荣局面。

孙可望吃水不忘挖井人，政权稳固后，他为张献忠建立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太庙，称呼张献忠为“老万岁”，一切大事，都要先告太庙而后行。张献忠以前自称为秦王，这时，孙可望请求南明封自己为秦王，以示继承张献忠的遗志。

确定了联明抗清的政策，行动起来就有方向了。1652年，大西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定国率领，总共有八万人，经由贵州出湖广，直逼桂林，进而攻取广东肇庆；另一路由李文秀率领，总共有六万人，出四川，下重庆，攻成都，直逼关中。

孙可望则坐镇指挥。

这次北伐，大西军作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在事前就规定了军纪，有五点全军将士必须牢记：“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物。”显然，这次出征跟以前很不一样，这次是哀兵，是正义之师，为了更崇高的目的而出征。也正因为纪律严明，士气高昂，所以这次北伐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

正如，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一样。这次北伐也导致了一个可怕的结果，李定国在北伐的过程中表现得实在太出色了，引起了领导孙可望的疑忌，最终同室操戈，将大西政权带向没落边缘。

李定国跟张献忠、李自成一样，也是农民出身，也是陕西人。崇祯三年，李定国才十岁，他就参加了张献忠的起义军。小小年纪，他就一身是胆，毫不怕死，因为作战勇敢，他得到张献忠的宠爱，随后张献忠将他收为义子。常年战争的经历培养了李定国超强的军事直觉，虽然他是个文盲，但是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

后来，张献忠又让人教会李定国读书写字，李定国的文化水平我

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最爱看的就是兵法书籍。李定国作战非常勇敢，但对待士兵非常谦和，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此次北伐，李定国第一个劲敌是定南王孔有德，孔有德是一名元老级的战将。战争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孔有德被迫带着全家一起自焚。短短几个月，李定国就收复了桂林和广州全境，一颗新兴的军事明星正冉冉升起。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李定国是应该有望成就一番大事的。

李定国出师大捷，永历朝廷立即封他为西宁王。与此同时，清廷派出亲王尼堪率十万八旗军阻击李定国。尼堪是褚英的第三个儿子，非常骁勇，非常善战，一生战功赫赫，然而，他的光荣注定要在李定国的铁甲面前碰得粉碎。

尼堪到达湘潭后，首先来了个饿狼扑食，击败南明马进忠的部队，马进忠被迫退到宝庆。十二月份，尼堪扑向李定国所在的长沙市。李定国看到清军锐气正足，人多势众，硬拼的话估计胜算不大，便主动退出长沙，在衡州附近设下埋伏圈。尼堪接连几战都胜利了，不免有些骄横，想进一步扩大战果，来不及多做调整，便指挥部队乘胜追击，结果走进了李定国的埋伏圈。

被围之后，尼堪自知中计，对众人说：“我清军上阵杀敌，还从来没有退却过，今天被围，也要死战到底。”

尼堪不愧是一条汉子，在激战中被乱刀砍死。

李定国的兵锋太锐利了，接连杀掉两个亲王，这件事不仅引起了清廷的震动，也让大西政权感到不安。

和李定国相比，孙可望是一个文人，不免想法就多一点。孙可望是以“军师”的身份受到张献忠赏识的，张献忠把他看成是身边非常重要的谋士。

孙可望当上秦王后，排场比永历皇帝还大，过着奢侈又气派的生活。这不仅引起了天下人的不满，也让大西政权内部的许多将领不爽。外敌还没有消除，内部矛盾就变成了最大的隐患。其中，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矛盾最深。李定国对孙可望指手画脚的作风不满，孙可望则担心李定国威望越来越高，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一日，这天是孙可望阅兵的时间，孙可望有言在先，一定要等主帅来了才可放炮升起帅字旗。令人非常痛苦的是，结果李定国一到就升起了帅字旗，孙可望来了以后大怒，说：“你们这是明摆着眼里没有我，我还是不是你们的老大啊？”

大家自然是劝他息怒，但这种怒气是没法熄灭的，如果不责罚李定国，孙可望咽不下这口气。李定国脾气也很犟，说道：“我和你是兄弟，是因为父王死了，你才当上主子。今天是这样，不代表以后也是这样。你以为我必须仰着你的鼻息才能过日子？”

看到行刑的人过来，李定国大吼：“谁敢打我？”

孙可望看到这场景，非常难受了，准备骑马离开演武场，以此相威胁。这时，许多人抱着李定国哭道：“大爷啊，你还是认错吧！不然一旦决裂，我们大西军就要散架了，就会被清军剿灭。”

李定国听到这话，终于低下头，忍着愤怒承受责打。打完李定国后，孙可望抱着李定国大哭：“今天因为大义而让弟弟受辱，我心里很难过，希望弟弟谅解。”李定国也说：“大哥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大局，定国心服口服。”

尽管两人好像是和好了，但是矛盾却仍在继续。

北伐胜利后，永历政权极力拉拢李定国，疏远孙可望。而李定国也不想再在孙可望手下做事了，像对待君父一样对待永历皇帝。这毫无疑问引起了孙可望的愤怒，孙可望想效法刘邦出云游梦泽擒韩信，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李定国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去赴会。结果在赴会的路上，刘文秀的儿子给他送来信，告诉他孙可望想杀他。

李定国愤怒地写信责骂孙可望：“不要妄听谗言，自相残害以败坏国家。”

永历政权认为孙可望想废帝自立，故意拉拢李定国牵制孙可望，授予李定国“屏翰亲臣”金印。李定国得到这玩意儿如获至宝，感恩戴德，李定国当然不是在乎这个金印，只是有了这个东西，自己就处在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上，保卫大明，这个理由多么堂皇，一下子扭转了舆论形势。不再是李定国背叛领导孙可望，而是孙可望想篡明，李定国成了正义的一方。

李定国知道孙可望迟早是要打自己，希望联手郑成功，邀请郑成功一起攻打广东。结果郑成功没来，李定国在肇庆被清军打败，退守到南宁。

顺治十三年，李定国和刘文秀、白文选等人将永历朝廷迁到云南昆明，这事挑战了孙可望的底线。顺治十四年，孙可望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十四万大军征讨李定国。结果仗还没打出感觉，孙可望的部队纷纷临阵倒戈，投向李定国。最后，孙可望率领六百多人投向了清军。

孙可望投靠清军后，获得了“义王”的封号，出于对李定国的愤恨，孙可望将大西军的机密全都告诉了清军。清廷从来不是什么善类，当他们确信孙可望不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在狩猎中，以误杀为名射死了孙可望。

孙可望降清后，李定国虽然执掌了大西军和永历朝的大权，但是却因此陷入了精神困惑中。他对将领们越来越不信任，时时刻刻担心他们会降清，所以对部下控制的非常严。为了避免孙可望降清事件的再一次出现，李定国挟持了许多将领，要他们誓死效忠南明，怀有二心的立即予以诛杀。

从此，大西军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大家都互相猜忌，往日那种团结合作的局面很难再看到了。以前的四将军，现在只剩下李定国。孙可望降清，这个不用说，艾能奇战死了，刘文秀因为对李定国有功，部下势力非常大，遭到李定国的猜忌，李定国不放心他一个人在贵州，将他召回云南。回来后，刘文秀郁郁寡欢，不久就病死。

应该说，这次内乱给大西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导致了后来的失败。

顺治十五年，清军派出三路大军攻入云南，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吴三桂。在三条战线上，李定国均遭遇了失败。永历皇帝带着文武大臣仓皇逃入缅甸，李定国和白文选也紧随永历皇帝进入缅甸，缅甸人派出十万大军围剿。李定国虽然杀出重围，但没有救出永历皇帝。

此后，清军一再招降李定国，都遭到了严词拒绝。李定国仍然进行着无望的反清复明运动，得知吴三桂处死永历皇帝后，李定国怒攻心，原本生病的他病情越来越重。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国病逝，临终给儿子留下遗言：“可以死无全尸，一定不可以投降。”

由此可见，李定国并不是单纯地利用永历政权，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应该是忠心耿耿地拥护南明政权。这种拥护很有可能是一种精神支柱，显然后期他已经陷入了精神泥淖中。但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李定国坚定抗敌的精神终归是可钦可佩的。

第七章 孝庄与多尔衮的往事

孝庄这么精明的女人，又经常跟多尔衮泡在一起，多尔衮心情的变化她自然是第一个敏锐地感觉到。孝庄现在面临着两项重要的任务，一方面是保住儿子的地位；一方面是安抚多尔衮，绝对不能让这个权力野兽发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对男女很微妙

小顺治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因为他是自他以后清朝九代皇帝中唯一一个享受到母爱的，这是幸福，也是不幸。从小顺治后来对于母亲的叛逆和反感来看，孝庄带给了他非常大的痛苦。

清朝在定鼎中原后，模仿明朝的规定，即皇子出生后必须交给专门的保姆抚养，这使得母子之间见面的机会并不多。福临在幼儿时，一直是由母亲亲自抚育。当上皇帝后，自然不能再和母亲同食同住。孝庄和姑姑孝端文皇后商量，打算将小皇帝移居到五宫之首的清宁宫，也就是孝庄姑姑哲哲的住所。说实话，孝庄很舍不得这个孩子，所以选派了自己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伺候这孩子。

苏麻喇姑在历史中的名气虽然不是很响亮，在清初的历史舞台上也算是一个非常厉害，非常优秀的女人了。

苏麻喇姑是蒙古人，出生于科尔沁草原的贫民之家。随着苏麻喇姑长大，她的美丽贤惠远近闻名，终于被科尔沁的贝勒府发现，提拔她做布木布泰的贴身侍女，布木布泰后来成为闻名天下的孝庄太后，能够一直跟她混下去的女人肯定也非等闲之辈。

苏麻喇姑一生陪伴着孝庄，抚育了两代帝王，顺治和康熙，她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随着与这些皇亲贵族的接触，苏麻喇姑的文化修养也在不断地提高，从一个文盲变成一个掌握满、汉两门外语的知识分子。更难得的是，她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还曾担任过康熙最早的启蒙老师。

苏麻喇姑和孝庄相处时间达六十年，表面上她们是主仆关系，私下里多以姊妹相称。所以，苏麻喇姑在宫中的地位非常高，但是她为人却非常谨慎。孝庄称呼她为格格，康熙称她为额娘，她仍非常谦恭，小心侍奉这些领导，总是自称奴才。

康熙二十六年，孝庄去世，苏麻喇姑顿时感觉生命失去了重心，精神受到沉重打击。康熙担心她精神出什么问题，基于对她性格的了解，康熙决定让她抚养自己的十二子胤禔。按照清宫的规定，只有嫔以上的女人才有资格抚养皇子，当康熙把这个任务交给她时，她深深地体会到康熙的一片好心。

为了报答康熙，她从悲伤的阴影中走出来，努力抚养这个孩子，把自己那无微不至的母爱全都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她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康熙末年的太子争夺战中，大家斗得你死我活，而胤禔却很少介入，基本保持中立的姿态。即使雍正当上皇帝后，他也没有受到打击和排挤。在乾隆年间，他以七十九岁高龄寿终正寝，活得比康熙还长。这些都得感谢苏麻喇姑与世无争的教育思想。

苏麻喇姑是一个非常淡薄宁静的女人，终身未嫁，晚年笃信佛教。她信佛跟别人不太一样，她不是为自己祈福，也不是要去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她信佛的目的是为皇家祈福。应该说，苏麻喇姑是极品女仆，是主子都会喜欢这种仆人。

苏麻喇姑生活上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习惯，比如她常年不洗澡，只到年终的时候才用少量的水清洗身体，洗完之后还把脏水喝掉。她还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是不吃药，病得再严重，她都不吃药。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有这种奇怪的生活习惯。在今天的她，她肯定是一个非常不讲卫生，而且不相信科学的人，但事实证明，她的身体非常棒，活了九十多岁。

在康熙四十四年九月初七，苏麻喇姑停止了念佛，闭上了双眼，离开了这个她侍奉了一辈子的大清。

话说这顺治搬到清宁宫后，多尔袞经常以讨论国事为由跑到清宁宫去。讨论完了，就去清宁宫旁边的永福宫，孝庄就住在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交往越来越亲密，顺治虽小，时间长了也慢慢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史书记载顺治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从他保护豪格就可以看出，这孩子确实很聪明。他那么小，就知道亲疏，知道谁对自己好，谁对自己坏。但顺治也有一些缺点，他体弱多病、神经过敏，由此导致他年纪很小的时候脾气就特别倔强易怒。

生活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宫廷里，一个小孩子是没法单纯的。顺治早逝可能就跟在宫廷里长久受刺激有关系。在多尔袞把豪格支走，去打张献忠的时候，顺治就大哭大闹：“你们怎么这么坏？难道我们大清国没人了吗？为什么非要让我哥哥去受苦。”

顺治对着母亲大吼：“额娘，我明天就要降旨让大哥回来。”

这时，多尔袞突然走过来，瞪了顺治一眼。孝庄本能地握住孩子的手，苏麻喇姑赶紧冲了过来，将小顺治抱走。

“站住！”多尔袞厉声喝道。苏麻喇姑听到这么凶巴巴的声音，吓得全身发抖。还是孝庄见过大场面，她拉着多尔袞的衣袖，温柔地说：“老大，你别吓着孩子，有什么事我们慢慢再说。”

苏麻喇姑见状，赶紧抱着小顺治跑了个没影。

多尔袞面无表情，脸上笼了一层秋霜，他坐在虎皮大椅上，很不高兴地看着孝庄。孝庄识趣，赶紧去给多尔袞大爷斟茶。

多尔袞心情稍微好了一点点：“你这个孩子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孝庄：“小孩子嘛，摄政王你就别跟他计较了。”

多尔袞：“现在就这么不听话，将来还了得。”

孝庄：“摄政王教训得对，赶明儿我好好教育他。”

多尔袞：“看到福临这样子，我真是恨铁不成钢啊！我当年扶持他，就是希望他做一个好皇帝，如果变成废铜烂铁……”

孝庄赶紧拉住多尔袞的手：“快别这么说，小孩子只要好好教育，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皇帝的。”

多尔袞把手放在孝庄的脖子上，冷冰冰地说：“也许你说的对，我们进房去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把这个小淘气教育成人吧！”

孝庄：“一切谨遵摄政王大爷的吩咐。”

多尔袞：“他要是有你一半乖就好了。”

也不知为啥，小顺治对这个哥哥特别喜欢，根本不听多尔袞和母亲的劝告。听说豪格即将带领军队回来，他喜出望外，和大臣们讨论豪格回来后应该用什么礼节欢迎，还特地咨询当年豫亲王多铎平定江南后的礼节。这让多尔袞很生气，豪格回来后居然无人问津，门庭冷落。

小顺治的失望那是不用说了，孝庄这时候心里是咋想的？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可以转化成：儿子与情人哪个更重要？

毫无疑问是儿子，准确地说，这时候的孝庄应该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自从多尔袞率领清军入关，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进入了北京，然后迎皇太后和皇帝在紫禁城二次登基。短短的时间内，多尔袞消灭了流寇李自成和张献忠，可以说此时他的声望已经达到了顶点。

他虽然名义上是个摄政王，实际地位跟皇帝完全没两样。

这就导致了大清国只知有摄政王而不知有皇帝的情况，小顺治心里肯定很不爽。这么聪明的一个小孩，肯定知道自己是个傀儡，虽然他未必知道傀儡这个词语，但整天被人耍，这种感觉他还是清楚的。而多尔衮是不是心里就很爽快呢？也不是。多尔衮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当然有了，自己功劳这么大，却只是个王，从礼节上讲还得向那个懵懂的少年行跪拜礼。多尔衮虽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是为什么偏偏就不是皇帝呢？

随着事业越来越稳定，多尔衮的情绪却越来越糟糕，糟糕的原因只有一个：为啥我就不是皇帝？

孝庄这么精明的女人，又经常跟多尔衮泡在一起，多尔衮心情的变化她自然是第一个敏锐地感觉到。孝庄现在面临着两项重要的任务，一方面是保住儿子的地位；一方面是安抚多尔衮，绝对不能让这个权力野兽发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可以看看多尔衮从刚开始当摄政王到现在的变化。最开始，济尔哈朗是第一摄政王，多尔衮是第二摄政王。结果济尔哈朗下去之后，多尔衮变成第一摄政王。接下来，多尔衮又变成了叔父摄政王，跟着是皇叔父摄政王。孝庄发现，每一次升级之前多尔衮都是烦躁不安的。所以，只要他烦躁不安，孝庄就揣摩到多尔衮的心思，在幕后推动，让多尔衮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孝庄将自己的感情编成一张网，牢牢地网住多尔衮，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孩子免于受伤害，才能让大清国免于受伤害。可惜，小顺治又怎么能体会到母亲的良苦用心。

一边是愤怒的顺治，一边是野心勃勃的多尔衮，孝庄夹在中间太难了。

顺治呢，年龄小，看不清形势，他意识到多尔衮侵犯了自己的权力后，心中想的就是出口气。一次在慈宁宫中，当时孝庄和多尔衮都在场，顺治见多尔衮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气不过，当即摆出皇帝的架势，要给多尔衮一个下马威。虽然对方只是一个小孩子，但是多尔衮还是感觉自己被冒犯了。

看到多尔衮一张脸变成了猪肝色时，孝庄明白了，多尔衮很愤怒，多尔衮很想取代顺治。没办法，为了取悦多尔衮，孝庄只好和多尔衮达成共识，牺牲豪格。

豪格死后，顺治在宫中几近发狂，暴跳如雷，拿着个鞭子见到人就打。就在顺治要死要活闹个不停的时候，孝庄和多尔袞两人正在房间里秉烛夜谈。孝庄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她首先肯定多尔袞对大清国所作的巨大贡献，然后感谢他这么多年来对自己母子的关照，还阐述了自己对多尔袞的一腔衷情。最后，希望多尔袞原谅顺治这孩子，这都是自己平时疏于管教。

其时，顺治已经当了五年的皇帝，从豪格之死中，他感觉到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孝庄嘱咐苏麻喇姑好好教育顺治，苏麻喇姑来到顺治房间，屏退了所有人，对顺治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闹了，要听话，以后不要表达自己的看法，一切都按摄政王说的做，不要和王公大臣们过于接近，如果你喜欢玩，就自己找个地方好好玩。

顺治吓坏了，一个劲儿地点头。

这时候，朝中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了。多尔袞先是将自己的力量渗透到两黄旗中，执掌正蓝旗的豪格死后，多尔袞又将正蓝旗交给多铎。代善的正红旗也渐渐地落入多尔袞的掌控之中，镶红旗的命运也大抵如是。

整个朝中全是多尔袞的爪牙，大臣们对端坐在宝座上的顺治越来越不敬，形势虽然对多尔袞很有利，但多尔袞的心情也越来越烦。一方面是高处不胜寒，一方面又是道德与欲望的冲突。应该说，唯一能体会多尔袞痛苦的人是孝庄，他经常和孝庄聊天。

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多尔袞选择了放纵来释放压力。其实，多尔袞在早期并不是一个特别好色的人。但现在，他一头扎进了欲海中，也渐渐地远离了孝庄这个红颜知己。

孝庄非常明白多尔袞痛苦的原因。他想夺权，然而又有心理负担和压力。以孝庄对这个男人的了解，她认为多尔袞最终还是会夺权的。这些日子里，孝庄经常找姑姑哲哲商量对策，可惜哲哲搬到北京后经常生病。孝庄只好独自面对这危局。

之前，对多尔袞的几次晋封，都是孝庄在背后以小皇帝的名义颁布的。每一次效果都非常好，多尔袞很满意，朝廷大臣们也觉得太后英明。豪格死后，在八旗和朝廷中掀起了惊涛骇浪，王公大臣们分成两派，一派是拥护多尔袞，一派是拥护小皇帝。在这汹涌的暗流中，大清国的政权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危险。

孝庄太后待在深宫中，她的地位虽然非常高，但却是孤独的。朝中全是多尔袞的人，她唯一的亲信就是苏麻喇姑。苏麻喇姑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她不仅负责在太后和小皇帝之间传话，还掌握着一些秘

密的渠道，可以和驻扎在北方的那些忠于小皇帝的王公大臣接头。

为此，苏麻喇姑也付出了代价。一次，孝庄命令侍卫席那布库的妻子侍奉皇后，那人却不愿意，孝庄只好派苏麻喇姑去请，结果被席那布库狠扁了一顿，差点把苏麻喇姑打死。可以想象当时的形势有多严重，一个内侍大臣竟敢把皇太后最亲近的侍女差点打死。事发之后，皇太后还不敢声张，对外说苏麻喇姑是从马上掉下来的。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孝庄和顺治的处境有多危险。更可以看出，孝庄的城府与聪敏到了何种地步。

太后下嫁之谜

清朝留给我们的悬案实在太多了，孝庄有没有下嫁多尔衮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孝庄与多尔衮的关系，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孝庄嫁给了多尔衮；一种认为孝庄虽然没有嫁给多尔衮，但是两人是情人关系；还有一种认为孝庄非但没有嫁给多尔衮，而且两人是清白的。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民间流传孝庄下嫁多尔衮到底是因何出现的。说来，还是皇父摄政王的“皇父”二字惹的祸。再者就是当时南明的著名诗人张煌言写的一首诗：

上寿筋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诗中明明白白提到慈宁宫和太后婚，当然，诗人的话从来都是让人怀疑的。那为什么太后下嫁多尔衮流传得这么广呢？

那是很多人认为孝庄嫁给多尔衮是形势所需，持有这个观点的人有八个看似无懈可击的证据。

第一，通过和多尔衮结成政治婚姻，可以保全顺治的皇位。人们认为孝庄如果不嫁给多尔衮的话，顺治帝皇位坐不稳，其实嫁不嫁他皇位都坐不稳。当然，那些认为孝庄嫁给多尔衮的人确实抓住了一点，多尔衮不能生孩子，孝庄嫁给他的话不用担心生孩子，从而对顺治帝构成威胁。这个说法看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有道理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

第二，弟娶兄嫂是满洲的旧俗，确实如此，这种事情在满洲经常

发生，满洲没有汉族那些伦理道德，人们也视为正常。这个证据的关键是，有这个习俗不代表所有人都按这个习俗办啊！就算孝庄愿意嫁给多尔衮，多尔衮愿不愿娶还是个问题呢！

第三，多尔衮自称为皇父摄政王，什么叫皇父摄政王，许多人的理解是多尔衮以父亲的名义摄政。既然都是父亲了，那说明孝庄嫁给了多尔衮。这个证据非常荒谬，慈禧还让光绪喊她亲爸爸呢，莫非慈禧就是光绪的亲爸爸？但是当时的汉人并不这样想，听到皇父摄政王的称呼，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莫非那个太后嫁给了多尔衮？弟弟娶嫂子，对于当时深受三纲五常教导的汉人来说，口味确实太重了，想不好奇都难。你没娶皇帝的老妈称什么皇父啊，既然敢这么自称，那说明肯定是娶了人家老妈。

第四，就是张煌言的那首诗。其实这个论据完全可以排除，诗人的诗是绝对不可以作为历史考据的论据，像《荷马史诗》这种毕竟是少数。张煌言是反清志士，反得很郁闷，写几首诗给清朝泼脏水，发泄发泄情绪是很正常的，我们表示理解，但绝不能拿这个当证据。

第五，据说一些学者从顺治的谕旨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在1660年，顺治皇帝颁布了一道谕旨，谕旨中说：“睿亲王摄政之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眷恋慈衷，赖以宽慰。”许多学者从“每经累月放得一见”看出了问题，是啊，福临当上了皇帝，孝庄要见他还不容易，为什么只能“萦怀弥切”。

学者们认为这中间肯定有什么问题，母子之间不能见面，说明中间一定有什么挡着。是谁挡着呢？除了多尔衮似乎没有其他人了。既然可以肯定是多尔衮，那么多尔衮用什么方式阻止孝庄和福临见面？很多人猜测，太后之所以跟顺治见面困难，是因为太后已经不在宫里了。太后不在宫里，又会在哪里呢？在多尔衮的家里，她已经嫁给多尔衮了。这是学者们的猜测，根据这些捕风捉影的话判定孝庄下嫁给多尔衮了。

第六个证据就比较玄乎了，跟风水墙有关。古代帝王是非常讲究风水的，都觉得能当上皇帝光靠个人努力还不够，还得有祖宗的庇佑。清朝有三处陵寝，一处沈阳，两处河北。大家知道，皇家的陵寝周围有一道围墙，相当于把陵寝保护起来。奇怪的是，孝庄的陵寝却在圈子之外，不在三个陵墓中的任何一个里面，孤零零地悬在外面。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根据古代皇家陵寝的规矩，皇帝的妃子，不管是死在皇帝前面，还是死在皇帝后面，只要没有犯谋杀皇帝这样的大罪，都要葬在皇帝的墓旁。跟皇帝关系亲的就葬在皇帝身边，跟

皇帝关系疏远就葬在外围，但一定是在风水墙里面。

孝庄虽然跟皇太极的关系不是很亲，但也没有理由葬在风水墙之外啊！整个大清朝，就孝庄一人的坟墓是孤悬的。例外总会激起人们的兴趣，人们会猜想其中到底有什么蹊跷。

野史中有这么个记载，孝庄逝世后，她的遗体本来是准备运到关外的昭陵，和皇太极合葬。就在这时，灵异事件发生了，当孝庄的棺椁运到清东陵附近的时候，突然之间变得沉重，一百二十多个人都抬不起棺椁。当天晚上，康熙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孝庄对他说：“不要让我跟太复合葬，棺椁停在什么地方，就是安葬我的地方。就地安葬就行了，一定要牢记我的话，不可以违逆。”

野史虽然不可靠，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正史对此也有记载，《清史稿》中孝庄文皇后的传记中说，孝庄在临死前给康熙留下遗言：“太宗皇帝已经葬了许多年，不要为了我轻易动他的陵墓，况且我心里只惦记着你们父子，葬在孝陵附近就可以了，我不会有什遗憾的。”

孝庄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不想和皇太极合葬，跟皇太极的感情不是很深，心里只挂念着顺治和康熙父子俩，这两人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一个是自己的孙子。说实话，孝庄对顺治的感情不是很深，倒真的很爱孙子康熙。康熙也很听话，祖母这样安排，就照她说的做。到康熙驾崩，孝庄的棺材还没入土，一直搁在地面上。直到雍正三年，孝庄才入土，雍正把他葬在孝陵外面，取名为昭西陵。昭陵是皇太极的陵墓，不过皇太极的陵墓在沈阳，孝庄葬的地方在河北。

孝庄生前说的太宗安葬已久，不想扰动他，这只是个借口。在孝庄逝世一年前，中宫皇后哲哲逝世后，便是撬开皇太极的陵寝，葬在皇太极的身边。后来，慈禧太后死后，咸丰都葬了四十七年，还是把他的陵寝撬开，把慈禧葬在他的身边。所以说，孝庄绝对是一个特例。她为什么没有跟皇太极合葬，一直飘在风水墙之外呢？这是让历史学家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孝庄之所以没有跟皇太极合葬是因为她生前又嫁给了多尔衮，孝庄身受汉文化影响，觉得嫁给了多尔衮，死后又跟皇太极合葬，心理上不适应。

至于孝庄说自己只牵挂顺治康熙父子，不在乎是不是跟皇太极合葬，这个理由也非常牵强。事实证明，孝庄对顺治的感情是非常淡薄的，当然这跟顺治让她失望也有关系。顺治帝生前非常看不惯孝庄，觉得她作为一个太后，怎么能跟多尔衮眉来眼去，把自己的脸、皇家的脸都丢光了。他哪里知道孝庄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他，要他理解孝庄那是不太可能的事。

顺治死后，孝庄一直没有去他坟墓看，直到康熙有一次劝她，才在顺治陵前走了一遭。所以，学者们猜测，孝庄为啥没有葬在皇太极身边，一定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这个苦衷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连孝庄的孙子都觉得没法埋在那里，甚至连重孙雍正也觉得没法埋在那里。

第七个证据似乎是个铁证，据说有人在皇宫内部档案中亲眼见过孝庄太后下嫁的诏书。这个人叫刘文兴，是一个学者，他在194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文中提到他的父亲是晚清内阁学士，在收拾大内档案的时候，发现了太后下嫁多尔衮的诏书。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如果真有人见到这份诏书，那么这诏书现在在哪里呢？没有人知道，除了刘文兴之外，也没有其他人说过这份诏书。

第八个证据最荒唐了，有人说《红楼梦》里曾暗示太后下嫁。《红楼梦》中焦大骂贾府除了门前的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连猫狗都没干净的，还骂有人养小叔子。有人附会说，这是借小说指桑骂槐，实际上骂的是孝庄跟多尔衮。还说元妃省亲实际是暗示孝庄嫁给了多尔衮，书中的荣国府实际上是睿王府。这个说法虽然新颖，但确实有些荒诞不经。

以上都是认为太后嫁给了多尔衮的证据。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太后没有下嫁多尔衮的观点。

要说孝庄和多尔衮的关系完全清白，这是不太可能的，大多数人认为孝庄和多尔衮是一种情人关系，并没有婚嫁这样的事实。

婚嫁绯闻首先是“皇父”这两个字引起的，论者认为皇父只是一个称号，是表彰多尔衮的功勋的，跟什么父亲不父亲的没有半点关系。真实情况可能就是这样，多尔衮取得“皇父摄政王”的称号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先是摄政王，然后是叔父摄政王，接着是皇叔父摄政王，最后才是皇父摄政王。一些学者就指出了，中国古代也有君王称大臣为父的，比如武王称姜尚为尚父，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项羽称范增为亚父，这些称呼更多的是表示一种尊敬，不代表真就是父亲。多尔衮的情况跟这个是一样的。

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批驳风水墙的说法，论者认为孝庄入关后，四十多年的时间就是照顾顺治和康熙这父子俩，她对这父子俩，尤其是小孙子康熙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孝庄太后提出不葬在昭陵也是有道理的，死后也要在皇城附近，看着孙子康熙把江山搞好。大家都知道，孝庄跟皇太极是没多少感情的，一方面是皇太极老婆太多，另一方面是皇太极把爱情都给了海兰珠。雍正后来匆匆埋葬了孝庄是因为

当年是皇太极和孝庄结婚百年纪念日，而且雍正为孝庄陵寝取名为昭西陵，意思就是跟皇太极的陵寝遥遥相对，虽然不在一起，但是也是牵挂的，所以孝庄葬不葬在风水墙内跟多尔衮没多大关系，更不代表嫁给了多尔衮。

至于有人说见到太后下嫁的诏书，反对者认为根本没必要批驳，你让他拿出那文件来就行。而且，孝庄是一个非常低调内敛的人，就算她第二次嫁人，也不会写个诏书，弄得满城风雨。我们回头看看孝庄的一生，发现她一辈子从来没有强出头过，说她改嫁确实不太可信。

大家知道，多尔衮死后，顺治对他是非常薄情的，如果他的母亲嫁给了多尔衮，在母亲在世的时候，他下手应该不至于这么痛快吧！

所以说，太后下嫁纯属子虚乌有。太后下嫁这个传言最早在浙江一带流传，不是在北京。浙江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南明政权的所在地，也就是诗人张煌言写歪诗的地方。在顺治六年至七年，朝鲜八次派使者到中国，这些使者回国没有一次提到太后下嫁这个事。有人说是不是朝鲜使者不敢说啊。我们再看看康熙帝死了后，雍正继位。朝鲜也派使者过来了，回去后《李朝实录》上就写了：“雍正继位，惑云出于矫诏。”雍正政治问题，孝庄是作风问题，孰轻孰重一看便知，连政治问题都敢说，如果孝庄真嫁给多尔衮，难道朝鲜使者连这个都不敢说？

话说回来，孝庄嫁不嫁多尔衮，那是他俩的事。

多尔衮之死

多尔衮的一生看起来是非常风光的，江山美人要啥有啥，然而真正走进他的生活，却发现这个人也有很多不幸的地方。生前和死后都很不幸。

多尔衮十四岁丧母，而且母亲是非正常死亡。从此生活在皇太极的阴影下，为了自保和发展，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可以说是拿命去换取皇太极的信任。皇太极哪次重大战役少得了多尔衮，一路这么南征北战过来，一路这么出生入死过来，多尔衮终于成为一个实力派，成为皇太极的左膀右臂。但是，这么辛勤努力地工作也让他积累了许多内伤外伤。所以，豪格才说他体弱无福。

多尔衮率领大军入关后，中国大地一片混乱，流寇到处都是，南明几个政权掐得死去活来，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多尔衮政权内部更是

钩心斗角的非常厉害，多尔衮作为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可以说全国的命运都系于他一身。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不病死，可能也会累死。掌握大权之后，多尔衮跟顺治和孝庄之间又发生了摩擦，有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将具体权力交给手下的王公大臣们，自己则一头扎进欲海，寻求放松和解脱。

可以想象，当时多尔衮的压力确实非常大。他不光沉溺在女色中，对烟草也非常依赖，基本上是个烟不离手的主。多尔衮常年让朝鲜供应烟草，常年吃肉，又纵欲过度，这些都是非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多尔衮就有眩晕的毛病。

本来政事和军务就特别繁忙，你再饮食无度起居无节，这样只会让健康更加恶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尔衮眩晕的频率越来越高，以前身上遗留的战场上的伤也经常性地发作。

多尔衮最后几年，心境也非常糟糕。顺治七年，多尔衮最信任的人——弟弟多铎病逝，接着多尔衮的元妃去世。同年二月二十五日，多尔衮公然召集王公大臣贝勒开会，将豪格的媳妇博尔济吉特氏纳为后妃。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都认为这事做得非常过分，把自己的侄子整死，还把他的媳妇纳入后宫。多尔衮的这个做法有些反常，不像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行为。只能说他对豪格恨得咬牙切齿，这么做就是为了羞辱九泉之下的豪格。

二月二十八日，多尔衮忽然发布了一道非常奇怪的命令：各部事务有不需入奏的，由亲王满达海、博洛、尼堪等人处理。换句话说，多尔衮大胆地放权，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多尔衮这个人是非常贪权的，这时候怎么会拱手将大权交给手下呢？唯一的解释是多尔衮处境很不好，身心两方面都快扛不住了。

五月三日，根据史书记载，多尔衮的福晋去世之后，贝勒巩阿岱违反了礼节，多尔衮将他降为镇国公，罚俸一年。巩阿岱是谁呢？他是多尔衮异母兄弟的第三子，和多尔衮算是平辈，此人对多尔衮忠心耿耿。多尔衮入关后，任命他为吏部尚书。打败大顺军后，巩阿岱又被升为辅国公。多尔衮为什么对自己的亲信给予了这么大的惩罚，是不是证明了后期的多尔衮性格反复无常，情绪变化无端？这个巩阿岱在顺治九年的时候，卷入了大清算的风暴中，因为和多尔衮过从甚密，最后被处死。

七月初四，多尔衮觉得北京酷热难当，下令在关外建立一座大城充作避暑之用，还向内地九省加派二百五十万两白银。想当初，清兵入关时提出废除明末三饷的口号，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多尔衮

突然加派钱粮，这让人不理解，你这个摄政王是做什么的，现在天下还没定，你的政策就出尔反尔，还要不要大好江山。

七月初十，多尔衮身体不舒服，当着大臣的面抱怨说这个小皇帝怎么回事，我生病了他也不来看我，我真失败。结果，顺治帝听到多尔衮的抱怨，亲自来府中看望多尔衮，是不是受了孝庄的指示我们就知道了，反正顺治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这些事情都充分说明了多尔衮在生命最后阶段，情绪非常不稳定，这种不稳定的情绪很有可能是自身的身体状况引起的。此时的多尔衮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英明神武的摄政王了，他仿佛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整日沉溺于享受之中，声色犬马样样不少。

根据史学家谈迁的记载，多尔衮临终前曾经与兄长阿济格密谈。到底谈了什么，无人知道。我们只看到，阿济格和多尔衮密谈之后，立刻快马加鞭带着三百骑兵往京城冲去。这事被翰林院大学士刚林知道了，他抢在阿济格到来之前赶回京城，让诸王和大臣们立即关闭九门，严加防范，阿济格三百人马到了之后，全部被拿下，除了阿济格，余人全部被处死。

就在举办多尔衮丧礼的第四天，大学士刚林奉命前往摄政王府收回两样东西：信符和赏功册。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多尔衮尸骨未寒，顺治就要动手收回。信符相当于兵符，国家遇到战争或者大的灾难时，皇帝就是用这东西调集全国兵马。这东西向来是由皇帝亲自保管，多尔衮摄政后以特殊时期特殊政策为由，把这个东西移到摄政王府，相当于把王府变成国家的五角大楼。这毫无疑问是多尔衮巩固自己权力的一个大步骤。

赏功册，无疑是八旗将士的功勋档案，这东西本来也只能为皇帝所有。多尔衮把这个东西也拿回王府，赏功册向来是汗王和皇帝权力的象征，八旗军以征战为生，掌握了将士们的赏罚权等于是掌握了军队的最高领导权。

收回信符和赏功册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措施，是政权转移的一个象征。小顺治当时才十三岁，哪里懂得这件事的意义。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一切的幕后推手就是孝庄太后。

多尔衮独裁掌管大清国七年时间，现在猝然离世，按常理说很容易引起政局的动荡。大清国一时之间似乎群龙无首，顺治帝是名义上的领袖，要确保顺治帝顺利接班，又到了孝庄付出的时候。

当时，八旗军内部斗得非常厉害，八旗军经过多尔衮的改造和吸收，已经越来越乱了。这时，只有孝庄太后能出面调停，代表小皇帝

周旋在各股势力之间。而且，孝庄当时的威望很高，能够得到各方的尊敬和信任。

孝庄从蒙古草原来到后金的时候，努尔哈赤还在位。她历经了天命、天聪、崇德、顺治三代四朝，长达二十五年，政坛的什么风风雨雨她没见过。虽然是一个女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眼光与阅历是其他人不能比拟的。

孝庄进言多尔袞为皇父摄政王的时候，就已经对应对局势做好了准备，她命令苏麻喇姑联系仍然忠于皇帝的大臣和王公们，让他们密切注意摄政王多尔袞的行迹。

应该说，多尔袞刚刚去世的时候受到的待遇是非常高的。十二月二十日，顺治帝降哀诏，用一种非常惋惜非常悲哀的语气向全国人民宣布多尔袞的死讯，并表彰了多尔袞的盖世功劳，还规定了二十七天内，无论官民一律服孝，另外禁止人民在这段期间内屠宰和办婚事。十二月二十五日，顺治帝再降诏书，加封多尔袞为皇帝，追尊为义皇帝，庙号成宗。

所以，下面的场面应该是预料之中的。当多尔袞的灵柩抵达京城时，顺治皇帝居然亲自主持盛大的迎灵仪式，而且脸上的哀痛之情人人都能看到，这显然麻痹了许多仍然拥护多尔袞的大臣。一边办丧事，一边让人进入摄政王府收回信符和赏功册，这么成熟的政治手腕很难想象是顺治能干出来的。

阿济格之死

谈迁在《北游录》里记载，多尔袞在喀喇城打猎时突然发病，病中密召阿济格密谈。到底谈了什么，无人知道。只知道之后阿济格带着三百人马快马加鞭赶回京城，这事被大学士刚林知道了。刚林立刻启程，一昼夜疾驰七百里，率先进入京城，告诉皇帝阿济格的异常主动。各个亲王立即关闭九个城门，严守以待。阿济格到来之后，三百人马全部被拿下处死，至于阿济格下落不明。后来才发现，阿济格被幽禁了。

多尔袞死后，阿济格是不是派三百骑兵进京，并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只有谈迁这个记载。但是根据阿济格刚入京就被囚禁，应该说，谈迁的记载是有一定根据的。

根据清朝官方史书的记载，多尔袞死后第三天，阿济格派人问正白旗的大臣吴拜、苏拜等人：“劳亲郡王什么时候可到？”劳亲郡王是

谁，阿济格的第五子。吴拜等人政治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听阿济格派人这么问，意识到阿济格这是在跟咱们打招呼，要咱们支持劳亲。吴拜等人认为，一旦支持劳亲，下一步可能就是夺取政权了。为了防范阿济格图谋不轨，吴拜等人跟上面通了声气，加强防守。

说实话，当时的阿济格也是非常焦躁的，多尔袞跟他谈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多尔袞肯定是不想权力旁落的。阿济格和多铎的儿子多尼当时被隔离了，阿济格曾经质问正蓝旗的护军统领阿尔津和僧格：“你们为什么不让更多尼来我的府上？你们这些混蛋做得太过分了，你们居然还挑拨我跟劳亲的父子关系……”

总之，阿济格脾气很不好，搞政治的如果脾气不好那是要吃亏的。大家认为，阿济格过早地暴露了内心的想法，什么想法呢？企图占有正蓝旗和两白旗，抢班夺权。

阿济格显然不是搞政变的料，要是这块料的话，也不至于轮到今天才发威，早把弟弟多尔袞推上皇位了。

阿济格想收买的两个人，吴拜和阿尔津都倒向了皇上；皇上年纪还小，他们主要是跟郑亲王济尔哈朗和满达海几个亲王接触。阿济格图谋政变的计划几乎等于是公开了，阿济格打仗还行，搞这种事真让人摇头。

济尔哈朗就说了：“如果阿济格拿到两白旗，国家肯定要乱。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好好对付这个害群之马。”

但阿济格接下来的表现就像个傻蛋，他非但没有意识到情况对自己不利，反而公开地对济尔哈朗说：“我老弟多尔袞很后悔当初收养多铎的儿子多尔博，所以后来他收养了我的儿子劳亲入正白旗。”这意思无非是说，多尔袞很看好我的儿子，你们应该捧他的场。

阿济格还向亲王博洛说：“你和济尔哈朗、满达海这三人是没法理政的，当务之急是赶快议立摄政王。”这些话实在是太明显了，阿济格的政治水平比他弟弟多尔袞差得太远。

阿济格犯的错误远远不止这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莽夫企图染指政治的悲剧。阿济格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假如你是莽夫，千万不要选择政治，尤其不要选择中国的政治。

在护送多尔袞灵车返京后，阿济格身上佩着大刀。济尔哈朗注意到这点，当即对手下说：“英王护送灵车都带佩刀，像这样来迎丧，简直太无礼。我们一定要小心提防，英王举动莫测，不能不防。”

此外，英王的儿子劳亲带着四百多人守护灵车，仿佛有什么不可

预测的事情要发生一样。

结果，这些事情整得大臣们人心惶惶，大家纷纷揭发阿济格图谋不轨。大家召开会议，讨论阿济格问题，结果一致认定阿济格确实有问题，犯了大罪，应当被监禁起来。第二年新年后，再次召集常委会议，还是讨论阿济格问题。会议结束后，阿济格的十三个牛录被皇帝没收了，另外七个牛录当成小费赏给检举有功的多尼。阿济格府中的一些汉人奴仆允许离开主人，做自由民，并将阿济格的财产充公。

阿济格的儿子劳亲革去王爵，降为贝子。阿济格的前锋统领席特库，明知多尔袞逝世，没有在第一时间向诸王报告，反而佩戴着刀、带领兵马，准备跟着主子一起谋反，被斩首处决。同时被处死的人还有毛墨尔根、穆哈达、马席等人，被处罚和牵连的人也很多。

经过这一案，阿济格一派从此一蹶不振。作为多尔袞一派最大的刺头，多尔袞死后，小皇帝一派是容不下阿济格的。即使阿济格行止端正，被打压也是必然的。从阿济格的表现看，他并不是真的要谋朝篡位，只是想发动诸王大臣，支持自己当摄政王。

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三十日，监禁中的阿济格发飙，对看守者说：“听说我两个儿子给人家做奴隶，家里的女人也发配给别人做奴仆……你们这么干的话，我要拆掉牢房，起来造反……”

中午时分，果然有人在拆牢房，狱卒立即向上面报告，诸位大臣开会之后，作出决定，处死阿济格。顺治皇帝赐死阿济格及劳亲，阿济格案至此结束。

第八章 顺治亲政

说实话，听到多尔衮的死讯，孝庄是根本没有时间为多尔衮哀悼的，当前最要紧的是如何应对这种剧变，如何让帝国稳固。帝国的未来是非常不清晰的，朝中大臣多是多尔衮的亲信，王公大臣们很多是变色龙，你不知道他们会倒向哪边。此时，孝庄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帮助自己的人，这个人必须对大清忠心耿耿，而且是个谋略高手。应该找谁帮忙呢？

清算多尔衮

阿济格的案子揭开了清算多尔衮的序幕。

接下来就是大清洗了，我们很难想象这样成熟的政治手笔是出自十三岁的福临手中。对于孝庄这个女人，我们实在应该刮目相看。

说实话，听到多尔衮的死讯，孝庄是根本没有时间为多尔衮哀悼的，当前最要紧的是如何应对这种剧变，如何让帝国稳固。帝国的未来是非常不清晰的，朝中大臣多是多尔衮的亲信，王公大臣们很多是变色龙，你不知道他们会倒向哪边。

此时，孝庄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帮助自己的人，这个人必须对大清忠心耿耿，而且是个谋略高手。应该找谁帮忙呢？孝庄想到了德高望重的范文程。皇太极在世的时候，经常召范文程进宫议事，所以孝庄也经常看到范文程，对于这个大清国的栋梁之臣，孝庄以师礼相待。

多尔衮逝世后，政局不明朗，孝庄不方便用太后的身份召见朝廷重臣。每到这时候，总少不了一个人的身影，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见到范文程后，警惕的范文程就低声说：“小心隔墙有耳。”两人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范文程才感慨地说：“太后的处境老朽了然于胸，你不必赘言，时间紧迫。我只想知道，太后是否一切以大清江山为重，没有其他的想法？”

苏麻喇姑忙不迭地点头。

范文程终于郑重地说道：“摄政王虽然对我们大清有很大的功勋，但是位极人臣，形式上跟皇帝没什么区别，这是对朝廷的蔑视

啊！即使摄政王自己没有想法，但是一帮宵小在他耳边蛊惑，导致悖逆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摄政王不忠之举越来越多。也是上苍保佑我大清，居然让摄政王猝死关外。不过，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两白旗和正蓝旗的王公大臣仗着武力，气焰嚣张；现在武英郡王准备浑水摸鱼，形势那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出现一个有手段有魄力的人，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危险势力斩草除根。除此之外，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苏麻喇姑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范文程的话她牢记在心，一字不漏地复述给孝庄太后听。

孝庄听完后，一言不发，良久才说道：“霹雳手段我可以做得到，也必须去做；菩萨心肠，纵然我心怀此念，也未必能做得圆满。”

顺治八年（1651）二月十五日，有人控告多尔袞谋反，尽管这时多尔袞已经死了。控告者是谁呢？苏克萨哈，正白旗的议政大臣，以前是多尔袞的亲信。他控告多尔袞什么呢？

苏克萨哈说多尔袞死在行猎之地，侍女吴尔库尼要殉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时候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是人之将死其言也恶，这侍女本来活得好好的，现在要跟多尔袞陪葬，是人都不爽。你让我陪葬，我就告你谋反，我们现在没法知道吴尔库尼的心思。

吴尔库尼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如果没有她告多尔袞谋反的事，估计这女人就不会在史书中出现。在电视剧《孝庄秘史》中，吴尔库尼所以揭发多尔袞是因为多尔袞拆散了她和自己心爱的人。真实情况怎样，我们并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多尔袞非常喜欢这个侍女，虽然这个侍女身份低微，但多尔袞指定让她殉葬，那意思是死后都让你陪。

吴尔库尼为什么揭发多尔袞，一直是个谜。她这个揭发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揭发完了之后还是该怎样怎样，自杀殉葬了。当然，也有人认为她是被灭口的，不是自杀。具体怎样，我们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了。

多尔袞死后，吴尔库尼找来罗什、博尔辉、苏拜、詹岱、穆济伦五个人，告诉他们：“在摄政王王府里有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王爷没有让其他人知道，你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偷偷放进王爷的棺木中。”

如果说吴尔库尼是为了求生的话，她这个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她也自杀殉葬了。将黄袍这些东西作为陪葬品，简直就是谋反

的证据。当然了，这事情很有可能是栽赃，压根就不关吴尔库尼什么事。

这事发生后，告发多尔衮的人越来越多，俨然变成一股潮流。墙倒众人推一定是没错的，墙没倒去推是有风险的。

不久，有人告发多尔衮在永平府一带圈房，准备把两白旗的人马搬到那儿。顺治帝接到举报后，自然是让大臣们认真调查。接着，又有人举报说何洛会曾经依附多尔衮，辱骂豪格的儿子，顺治说好好调查。

调查的过程应该说是非常有效率的，结果是告发的事情都是真实，多尔衮私制黄袍、率两旗驻扎永平、阴谋叛逆，这些罪行都是确凿的。判决很快就下来了，多尔衮的家产和人口被没收，养子多尔博和养女东莪送给亲王多尼。何洛会被抄家，凌迟处死。苏拜没有举报多尔衮棺材内的违禁品，本来也应该处死，但顺治帝格外开恩，免死。

如果认为对多尔衮的清算到此结束，那我们就太小看了孝庄。

二月二十一日，济尔哈朗、满达海、博洛和尼堪四位亲王联合大臣们联名上奏，要追论睿亲王多尔衮的罪状。所谓追论就是以前讨论的还不全面，现在必须综合更多材料，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人的罪状。多尔衮的罪状那是相当地多，我们不妨列举一些主要的。

一、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

二、擅权独断，作威作福，任意罢免选拔人才，一切公文自己裁断，僭称圣旨；

三、不让济尔哈朗摄政，擅自让自己的弟弟多铎当上辅政王；

四、整死肃亲王豪格，逼纳其妃；

五、以朝廷自居，令诸王、贝勒、贝子公侯等每天都到自己的府上上班；

六、排场跟皇帝一样，浪费国家资源；

七、亲到皇宫内院；

八、诋称太宗皇太极之即位“原系夺立”；

九、逼取皇上侍臣归到自己的旗下；

十、私制帝服，藏匿御用珠宝；

十一、欲带两旗移至永平。

.....

顺治拿到罪状一看，心想，这些大臣真是好样的，看到这张罪状，大家都觉得多尔衮人神共愤。如果宽恕的话，实在是天理难容。但多尔衮已经死了，家产也被没收了，还能怎么处罚他呢？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首先是剥夺多尔衮的爵位和名誉，顺治帝下诏：“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多尔衮）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从多尔衮死后被追尊为成宗皇帝，到剥夺庙享剥夺一切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政治这东西说变就变，从中可以看见人性之丑陋。可以这样说，政治放大了人性的丑陋。

当然，这还没有结束，西洋传教士卫匡国记载，顺治帝对多尔衮跟自己母亲的暧昧事非常痛恨，加上一一直看不惯多尔衮，顺治帝下令鞭尸。将多尔衮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用棍子打，用鞭子抽，最后枭首示众。鞭尸这种行为如果没有刻骨的恨是做不出来的，但究竟是顺治想鞭尸，还是孝庄想鞭尸，抑或是两人都想鞭尸，这个就说不清楚了。

老外看到鞭尸这种行为，除了佩服中国人的创意之外，对中国人人性中的那种恨也是非常佩服的。

在清算多尔衮的同时，顺治也在积极为长兄豪格平反。二月，顺治帝封豪格的儿子富寿为和硕显亲王，将豪格的功劳重新记录在赏功册上，并且归还豪格的财产。

令人吃惊的是，清算多尔衮的过程中，大学士刚林也受到了处分。根据谈迁的说法，多尔衮死前和阿济格密谋，正是刚林识破了阴谋，连夜赶到京城，才将政变扼杀在摇篮里。在多尔衮死后，刚林的功劳是非常大的。他不仅告密，提前扑灭了一场政变，还帮助皇上从多尔衮的府中收回信符和赏功册。即便功劳如此大，由于刚林多年追随多尔衮，济尔哈朗认为这个人不可信，始终是一个祸患，所以选择了杀人灭口。刚林被处死后，家产被没收，妻子为奴。

还有一个大学士祁充格，因为以前跟着多尔衮混，擅自修改《太祖实录》，参与多尔衮的谋反，最后也被判了死刑。清算运动很快就扩大化了，汉人大臣范文程、宁完我、王文奎等人也被人告发，曾经和多尔衮狼狈为奸，但是顺治皇帝并没有给他们治罪，其中原因我们也不得而知，应该有一些潜规则在里面。当然，跟顺治帝深受汉文化有关系，跟幕后人物孝庄的态度也有关系。

四月份，又惩处了大臣巴哈纳，罪名是谄媚睿王，将户部金银送到多尔衮家中。巴哈纳也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历任户部尚书和刑部尚

书，是个位高权重的人。巴哈纳被给予革职处分，家产被没收了三分之二。

冷僧机也被处分了，冷僧机以前是满洲正黄旗人，跟着三贝勒莽古尔泰混。皇太极打掉莽古尔泰时，冷僧机非常识趣，自首保命，此后就跟着皇太极混。多尔衮掌权后，冷僧机又跟着多尔衮混，而且还得到多尔衮的宠信。冷僧机的罪名是为多尔衮说话，污蔑两黄旗大臣，到处强调当年立顺治的是多尔衮。冷僧机为了讨好多尔衮，还把珍贵的白狼裘献给多尔衮，没想过这么好的东西应该献给皇上。大家商议之后，决定把冷僧机处死。不过顺治帝却饶他一死，批道：“姑从宽免死为民。”

八月，吏部尚书谭泰被人告发，罗列罪状十多条，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谭泰曾经在多尔衮府上表示“我死亦在此门，我生亦在此门”。议政王大臣商量之后，认为谭泰和子孙都应该问斩。顺治网开一面：谭泰就地正法，籍没家产，子孙免死。

冷僧机逃过第一劫，却没有逃过第二劫，也许是做错了什么事。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顺治皇帝突然颁布了一道谕旨：“拜音图、巩阿岱、锡翰、席那布库、冷僧机这五个人曾经依附多尔衮，朕心知肚明，之所以从轻发落是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没想到这些人死不悔改，还敢藐视朕，扰乱国政，朕实在是不能再原谅他们了。”

议政王大臣们又开始搜罗这些人的罪状，这些大臣们当然是希望从严发落，而顺治一定是从宽发落，以此彰显君王仁慈，皇恩浩荡。

顺治说，拜音图这个人庸弱无能，到了晚年，更是昏聩，看在他年老体迈的份上，就免他一死，关在牢里吃套餐。巩阿岱、锡翰、席那布库、冷僧机这些人呢，死不悔改的东西，全部就地正法，没收家产。

本来这五人的家人也应该一并处死的，但皇恩总是浩荡的，不必要的死伤是皇帝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你们都不必死，老老实实做老百姓吧！

经过一年多的清洗和淘汰，多尔衮的党羽总算剔除得差不多。如果说这次清算有什么特色的话，就是只在高层内进行，没有扩大到下层官员，更没有扩大到平民百姓。这个做法是非常明智的，没有引起国家的动荡。

多尔衮一世戎马，为大清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却遭到这种待遇估计是他始料未及的。直到一百多年后，出现了一个喜欢下江南，喜欢到处享乐的乾隆，才给他平了反。乾隆是个享乐主义者，心里没那

么多怨恨，觉得这人对我们大清有功，不该是这么个待遇，应该给他平反。看来，有时候做好事只需要平常心。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孝庄和顺治这么做就做坏了。当时，国家不稳，皇帝又很小，满朝多尔衮的爪牙。小皇帝要树立威信，加强皇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再说，多尔衮本来就视自己眼中钉肉中刺，顺治不拿他开刀拿谁开刀，何况还是个死人，毫无还手之力。

浪花淘尽英雄——评多尔衮

政治这东西不是非常残酷，而是绝对残酷。在政治角逐中，几乎没有第二名的立足之地。

多尔衮摄政七年，权力无边，他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没有篡位。如果他篡位当了皇帝，后来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而且他当时的情况确实具备篡位的资本。

在中国历史中，权臣一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从春秋时期晋国的赵盾到明末张居正、清末袁世凯这些人。像曹操这种，虽然自己没篡位，但儿子篡位的就不会有什么风险。权臣、丞相、摄政王这些职务在中国历史中都是风险非常高的职业。

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是一代权相，辅佐明神宗十年。张居正掌权期间，利用手中权力，整顿朝纲，惩治腐败，加强军事力量，清查税收，创造了一段时间的盛世。万历头十年边境安定，国库充实，出现了少有的太平盛世的景象。张居正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不光是靠左右逢源的做人技巧，应该说主要还是依靠霹雳手段，你要改革，必然会触动一群人的利益，要想改革成功，没有铁腕是不行的。

不用怀疑，张居正的改革得罪了许多人，甚至连皇帝都得罪了。当小皇帝长大成人，自然渴望摆脱这个严师的影响。张居正死了以后，反对者们开始给他罗列罪名，明神宗突然觉得自己被张居正骗了很多年，于是向死去的张居正举起了屠刀。张居正的罪名何其多，其中就有一条是谋反，当然，明神宗并不真的相信张居正谋反。只是剥夺了他的一切称号，将他的家产充公，子弟发配到边远地区，亲信大臣一一革职。

多尔衮和张居正的地位很像，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相同。张居正是为了国家大局着想实行改革，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反击他更多的是为了自身利益。多尔衮的情况不太相同，多尔衮掌权之后，打压异己，虽然为国家立了大功，但对于对手多尔衮下手也非常重。多

尔衮死后，对手们更多的是为了报复而清算他。

政敌们对多尔衮更多的是恨，这些仇恨都集中在多尔衮的头上，并没有涉及具体的政策。多尔衮和张居正都对本朝作出了巨大贡献，张居正的被打倒是跟他的改革密切相关，而多尔衮的被打倒更多的是因为权力斗争。

乾隆皇帝为多尔衮平反时说，多尔衮虽然独断擅权，但是没有谋逆的意思，如果谋逆的话，当时多尔衮手中掌握兵权，想自立为帝并不是什么难事。这里要说明，多尔衮没有谋逆，不代表他不想当皇帝。

多尔衮对于清朝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但是在政治上，远远赶不上皇太极。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察。

经济和民生方面，多尔衮做得远远不如皇太极，他大肆圈地，处决逃人非常残酷。入关后，多尔衮对于反抗的汉人实行了恐怖的屠杀政策，如果是皇太极，这种事情是不会出现，或者至少出现得非常少。多尔衮自始至终没有统一中原，跟他的政策不无关系。多尔衮在文化上也毫无建树，他真正的功劳就是为清朝打下江山。

如果把皇太极比作一个一流的政治家，多尔衮最多只能算是二流。多尔衮应该算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

叛逆的顺治

福临从六岁当皇帝，到十三岁亲政，中间有七年的时间。这七年他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变成一个熟悉权力斗争的少年，开始对自己身处其中的这个环境有所了解。他没有成熟，但是他开始觉醒。

福临继承了皇太极和孝庄的基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可惜他没有机会接受皇太极那样的教育，很小的时候就被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上，来不及按照生命本来的轨迹成长。特殊的环境加上天生的敏感，导致福临这孩子性情特别暴躁，喜怒无常。

这也不能怪他，换作是别人，结果可能也差不多。如果你头脑迟钝一点还好，偏偏福临很聪明很敏感，所以就很痛苦。

他的内心强烈地缺乏安全感，这导致了他的感情，无论是好的感情还是不良的感情都特别强烈。他无法理解自己的母亲，也看不惯自己的母亲；他很讨厌多尔衮，却又惧怕他的权威。他很愤怒，他很生气，但是他没有办法。终于等到多尔衮死掉，一切似乎可以重新开

始。

狠狠地报复了多尔衮一通之后，顺治发现自己并不幸福，他还是那样喜怒无常，还是那样动辄生气。他发现环境依然很复杂，自己依然掌控不了很多东西，连自己的幸福和自由都无法掌控，他很压抑，情绪特别敏感，经常和母亲闹别扭、发脾气。

他发现自己是那么反感那个别人称之为太后的母亲。

在顺治短暂的一生中，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用时髦的话来说，他没法和谐。本来母子之间应该很和睦才对啊，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不是提出过什么恋母情结吗？母亲和儿子本来不应该有那么多矛盾的，顺治帝为啥这么恨自己的母亲，估计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中间可能有个过程：恋母——恨父——恨母。

母子关系不好，君臣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夫妻关系也一样。最后没办法，只好一头扎进佛教中，可惜就连出家都失败了，在内外交困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二十四岁的顺治患上天花，一命呜呼。

顺治帝有“痴情天子”的称号，那是基于他对董鄂妃的迷恋，其实董鄂妃还是他从他弟弟那儿抢过来的。为此，他弟弟受不了，自杀了。要说顺治纯情，真不太可能，根据洋鬼子汤若望的描写，顺治是个非常好色的皇帝。当然，这并不影响他对董鄂妃的痴情，好色跟痴情有时候并不矛盾。像他老爹皇太极，老婆一大堆，还是对海兰珠情有独钟。

顺治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十三岁的顺治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亲政大典，名义上是顺治掌权，但是背后仍然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孝庄。二月初十，顺治率领文武大臣给孝庄上尊号——昭圣慈寿皇太后。

皇太后随即也有所表示，亲自给顺治下了一篇《诰谕》，这份《诰谕》可以看作是教导小皇帝如何当皇帝的，我们不妨摘录下来，确实挺有道理，是封建社会里做好皇帝的指导性文件，凝聚了孝庄历经政治波涛后的大智慧。

为天子者，处于至尊，诚为不易。上承祖宗功德，益廓鸿图；下能兢兢业业，经国理民，斯可为天下主。

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治国必亲忠远佞，用人必出于灼见真知，莅政必加以详审刚断，赏罚必得其平，服用必合乎则。毋作奢靡，务图远大，勤学好问，惩忿戒嬉。倘专事佚豫，则大业由兹替矣！凡几务至前，必综理勿倦。诚守此言，岂惟福泽及于万世，亦大孝之本也。

这番话说得非常漂亮，体现了孝庄的一片苦心。如果顺治帝能够将其谨记于心，即使赶不上儿子康熙，估计也是个不错的皇帝。可惜顺治非常叛逆，表面上谨遵母后教诲，背地却按着自己那套行事。

根据史书记载，福临亲政的第五天，他妈给他找来了一个皇后。这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孝庄亲哥哥吴克善的女儿，论理亲上加亲，在没有近亲不能结婚的意识的古代，绝对是美事一桩啊！就连福临也认为这女孩子不但容貌可以称得上是佳丽，而且心灵手巧称得上贤惠。但是当大臣们请求在二月内举行婚礼的时候，顺治帝却说这事得从长计议，暂且还不行，容我慢慢考虑。

顺治的表现让孝庄的老花镜都快掉下来了，儿子这是咋的，怎么变成这样了？

孝庄不理解的是，孩子长大了不由娘，以前你说啥是啥，现在你指东，他偏要往西。因为顺治帝正在长大，他的独立人格正在形成。

顺治从一出生就是皇太极的儿子，老爸死后，母亲为他打理一切。母亲跟多尔衮斗智斗勇，他是看在眼里的，他的江山是母亲给他的，现在母亲又给他安排了一个老婆，什么都是母后做主，母后英明，母后伟大。那么，顺治的自我呢？他的尊严呢？他的独立人格呢？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多尔衮死后，顺治仍然还只是一个傀儡。不，他已经受够了做傀儡的日子。他要亲手构建自己的幸福，所以他不能接受母亲为自己安排的老婆。这可能就是青春期的叛逆，顺治发育得稍早一些，十三岁也不算太早熟，加上是古代，加上是在宫廷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行为和心理。

这一沉寂就是八个月，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八个月后敲锣打鼓的，顺治拉长着脸娶了这个皇后。可以想象，母子之间发生过多少次争吵。婚礼的第二天就册封了吴克善的女儿为皇后，婚礼确实非常隆重，场面极其热闹。我们可以想象顺治的心情有多烦。

顺治与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相处了两年的时间，就遇上了婚姻之痒，受不了啦，要闹离婚。

顺治十年（1653）八月下旬，顺治帝降旨命礼部讨论废后的事情。这道圣旨下来，群臣一片哗然，大学士冯铨、陈名夏、刘正宗等人联名上奏：“臣等不胜惶恐，窃以为皇后母仪天下，此事关系重大，希望皇上三思而行。”

顺治看了奏章，气不打一处来，下了一道圣旨批评这些大臣：我

也知道皇后母仪天下，关系重大，所以才要废后啊！不能让无能之人当皇后啊！你们好好反思吧，怎么替朕办事的？

还没等大臣们反思，第二天顺治就把皇后降为静妃。不久，顺治帝又增补了一条废后的理由：这桩婚姻是多尔衮在世的时候定下的，没有经过选择，从册立皇后开始，朕就觉得很满意。

在中国古代的宫廷里，废后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顺治帝废后的理由实在不充足。皇后并没有什么重大失德的地方。

孝庄虽然知道自己这孩子脾气很怪，万万没有料到他会来这一招。孝庄是个聪明的女人，而且做事非常稳重，她知道孩子的举动非常奇怪，所以更加不能采取强硬手段，威胁孩子。事实上，当年顺治不愿结婚的时候，孝庄就让苏麻喇姑去做孩子的思想工作。那时候，顺治已经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了，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自己现在太嫩，不是母后的对手。

两年后，顺治觉得自己已经很拉风了，可以跟孝庄对着干了。顺治指责当年多尔衮和孝庄为自己指定亲事，在当时看来是毫无道理的，在现代当然体现了追求自由恋爱的精神。由于顺治不是一个艺术家，更不是思想家，所以没有理由这么离经叛道。别说你是皇帝，就是平常百姓，也得遵守父母之言啊！顺治的圣旨如此指责自己的母亲，显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也许顺治帝也知道自己闹得非常过分，为了让自己的要求看起来更合理，他又找了一个借口：我跟皇后相处三年（实际才两年）了，三年的时间居然从未和皇后做过夫妻之间应该做的事情，这样下去怎么了得，一旦后继无人，岂不是对不起江山社稷，我顺治可不想做这个罪人，大家说怎么办吧？

顺治这番话可不光是对母亲和大臣们说的，还是对普天下老百姓说的，多聪明的一个人，知道争取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把握住舆论的力量。那么小的年纪就追求自由的婚姻，有事没事还想着入佛教，感受宗教的温暖。顺治帝，真的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年轻人。

我们平常人思想前卫、行为叛逆都让老一辈的看不惯，更别说一国之主了。一些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汉臣们，以礼部尚书胡世安为首，经常在皇帝耳边唠叨，兹事体大，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

礼部员外郎孔允樾仗着自己是孔子的后代，逮住皇帝，大声质询：“皇上啊，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可以轻易决断呢！老臣看到圣谕里说皇后是无能之人，当时没把老臣晕死。皇后在位三年，没

看做啥错事啊！皇上怎么可以用无能来形容皇后呢，难道皇上不知道这很伤人啊！”

顺治沉默不语，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孔允樾一看不妙，便想替顺治打圆场：“我也知道皇后让皇上不是很满意，那皇上也可以模仿旧体制，设立东西二宫，分而治之吧！一国两后不也挺好的吗？”

顺治还是不说话，孔允樾吓坏了，哎呀，我的妈，今天是不是玩大了，会不会掉脑袋。想到这里孔允樾额头上汗水如注，壮着胆子说：“老臣既然是圣人后代，又担任礼官，碰到这种事情正是职责所在，如果我怕斧头的话，只怕也对不起皇上，对不起老祖宗了。皇上如果不高兴，就把我砍了吧！”

顺治帝冷冷说道：“我不会砍你的，你给我回家好好凉快去。”

“皇上圣明。”说完，孔允樾就匆匆走了。

有意思的是，顺治故意让整个朝廷讨论废后一事，朝廷里所有中级以上官员都要对这事发表看法。我们不禁要问，顺治帝到底在想什么？他究竟是想废后，还是另有目的？

废后一事有点吸人眼球的感觉，其实，顺治帝确实有这个意思。当然，他不光是要吸引眼球，还要通过这一事件测试自己手中的权力到底有多硬，达到收权的目的。换句话说，顺治帝把废后一事当成整风运动来玩。

废后一事针对的真正对象是孝庄，一切都是做给孝庄看的，你让不让我独立，不让我独立我跟你没完。什么叫独立，独立就是乾纲独断。大臣们为难了，一边是皇帝，一边是太后，怎么办呢？

当然是太后更重要，太后是实力派，所以大臣们纷纷联名上疏请求皇上收回成命。顺治心想，你们不买我的账，那好啊，不按照我说的做就要办人了。

朝廷顿时吵得沸沸扬扬，礼部尚书胡世安和员外郎孔允樾提出个折中方案，皇后已经立了，轻易废掉是很不好的。不妨保留皇后，仍正位中宫，另外再设立东西两宫。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应该说这个意见是非常不错的，可是对于青春叛逆期的顺治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年轻人都是比较冲动极端的，顺治回道：“我也知道废后容易引起非议，但我实在受不了皇后，你们的意见不好，再好好想想。”

顺治的意思很明显，不废后我绝不善罢甘休，根本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顺治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甚至都不接见苏麻喇姑，他不想

作出任何让步。

孝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应该能够看出儿子废后的真正动机，直到此时，孝庄才明白让儿子亲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清国从此他一个人说了算，自己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削弱。

如果说孝庄要阻止顺治的话，是绝对有能力做到的，不光是因为孝庄有这个权力，而且也因为顺治这个做法不合圣人之道。再加上废后势必影响大清和蒙古的关系，为了国家大局着想也不应该废后。蒙古一直都是大清的盟友，因小失大那是得不偿失的事。孝庄只要站出来，就可以把这件事叫停。

可她没有这样做，她选择了妥协。也许她太了解这个儿子，也许她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想当年，多尔衮入关的时候，顺治还只是一个黄毛小子，在多尔衮面前毫无安全感，皇位随时可能被人取代。多尔衮死后，儿子终于亲政。这几年，他一直努力学习，勤于国政，已经有了人君的气象。他迫切地想要建立自己的权威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因为废后这事情挫了他的锐气，那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更要紧的是会降低皇帝的威信。这跟垂帘听政就没什么分别了，以后皇上还怎么治理国家，发号施令？

为了成全顺治的威权，孝庄再一次作出牺牲，牺牲了自己的侄女。孩子，别痛苦了，为了大清江山，别计较个人得失，我们女人只能在背后支持男人，哪怕受伤也无怨无悔。孝庄主动出面，说服了以议政王济尔哈朗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同意顺治帝废后。

孝庄这么做，等于是向天下人宣布：大清国皇帝顺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不得强迫他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大清国的权力掌握在他一人手中。

顺治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母子之间的感情就日渐淡薄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母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彼此之间的伤害越来越深。

第九章 一辈子都在死磕的母子

宫里人都觉得顺治皇帝就像个虐待狂，有很严重的暴力倾向。但是在施政方面，他经常表现出体恤百姓爱民如子的特征，他颁布的一些政令很受老百姓欢迎。他刚亲政的时候，就废除了多尔衮统治时期的几大弊政——圈地、投充、追捕逃人等，安抚工作他做得还不错，所以顺治帝虽然活得短暂，但在人们眼里仍然不失为一个明君。

古怪的皇帝

写到这里，或许我们有点反感顺治帝。你说这孩子，你妈对你那么好，你干啥要跟她过不去啊！其实，认真想想，我们还真不应该怪他。一个人的性格跟他的成长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顺治生长的那个环境我们可以想象。六岁死爸，从此就离开妈妈的怀抱，进入深宫当皇帝，身边全是宫女太监什么的，这些人本来就不正常，你要指望顺治正常这太难了，加上顺治帝总忘不了多尔衮带给自己的心理阴影。

聪明从来不是衡量一个皇帝好坏的标准，许多昏君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大脑不够用。明朝后期的几个皇帝也是非常聪明的，但大都昏庸、变态，甚至非常荒唐。顺治帝虽然没到这个地步，但表现也确实够奇怪的。说他是昏君肯定是小题大做，说他性格怪诞那是没有问题的。

顺治的一生很短，仅仅活到二十四岁，从他短暂的一生可以看出，这人可能有多重人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描述中了解。汤若望不仅是一个传教士，也是一个天文学家，他来到中国后，历经崇祯、大顺、顺治和康熙四朝，是一个老牌的中国通。

汤若望进入大清宫廷后，很快就和孝庄、顺治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顺治经常称呼这个满头白发的洋人为“老爷爷”。走遍半个地球的汤若望对人对事都有一套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很早就看出顺治这个人优点与缺点都非常明显。例如，他也说顺治很聪明，长得很英俊，有慧根，甚至比较早熟。除此之外，他觉得顺治天性仁厚宽容，能够听得进逆耳忠言，但是也很容易受坏的思想影响。用汤若望的话来说就是“容易受恶势力影响”，所谓恶势力在天主教里就是指魔鬼了，但这话汤若望肯定没法直接说出口，毕竟对方是个皇帝，说话得考虑脑

袋。

对顺治身上的一些缺点，汤若望也洞若观火，他就曾经指出顺治酷嗜游猎，老子早就说过“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所以，汤若望接着说顺治内心会忽然想起一种狂妄计划，而以一种青年人的固执坚决施行；有时一件小事就能让顺治暴怒，导致他的举动跟一个发狂发疯的人一样。

汤若望这些描述在中国的正史和野史中是看不到的，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他凭借天文学和西洋科技得到清朝宫廷的赏识，做到钦天监的高位，得以近距离观察太后和皇帝。加上他可以以一种局外人的角度观看宫廷里发生的一切，所以他的记录应该有很大的真实性。

不光是外国传教士觉得顺治帝喜怒无常，就连许多禅宗高僧也觉得顺治帝这人脾气特别暴躁。

宁波天童寺的高僧木陈忞在顺治十六年九月奉旨进京，在京城待了八个月，顺治帝对他极为尊崇，赐他“弘觉禅师”尊号。这个时候，福临已经二十二岁了，亲政十年。根据这个老和尚的说法，这个皇帝喜怒无常，不时鞭打左右。老和尚实在看不下去，借着讨论禅学劝诫他：“参禅学道之人不可任情喜怒，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

面对着高僧的教诲，顺治还没疯狂到拿起鞭子抽老和尚的地步，只得点头说：“我知道了。”所谓知道就是我晓得是这么回事，但就是改不了。愤怒的性格，就像火种一样，可以压抑一段时间，但始终是要爆发出来的。

宫里人都觉得顺治皇帝就像个虐待狂，有很严重的暴力倾向。但是在施政方面，他经常表现出体恤百姓爱民如子的特征，他颁布的一些政令很受老百姓欢迎。他刚亲政的时候，就废除了多尔衮统治时期的几大弊政——圈地、投充、追捕逃人等，安抚工作他做得还不错，所以顺治帝虽然活得短暂，但在人们眼里仍然不失为一个明君。

满族人发育比较早，一般男女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可以谈婚论嫁了。被一大群太监和宫女包围着，一个人想要心理正常并不容易。从史料中可以知道，顺治是在十三岁结婚的，但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庶妃巴氏就怀孕了。巴氏生的这孩子不到两岁就夭折了，过早生孩子，可能是孩子很难长大的一个原因。

庶妃巴氏之前不过是一个宫女，顺治宠幸她时只有十二岁，她因为生下皇长子钮钮被封为庶妃。又过了一年，顺治跟另外一个庶妃生下了福全，再过一年，生下了玄烨。在生育这块儿，顺治表现得很上进。

不过，在顺治的后宫中有五个博尔济吉特氏，没有一个博尔济吉特为他生下一男半女。由此可见，顺治帝是非常固执的，对于母亲家族的女性坚决不碰。所以顺治说跟皇后共处了两年，没有夫妻之实应该是事实，当然这不能怪皇后，只能说顺治这个人太偏执了。

顺治皇帝与皇后相处了两年，没有任何结晶。但这两年里，他和其他的妃子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福全，一个叫玄烨。

顺治一生中，史册记载的皇后和妃子共有十九位，两个皇后都没有产出，其他妃子为他生了八个皇子，五个公主，其中只有四个皇子活了下来，成活率只有二分之一，比较低了。

虽然老婆一大堆，但顺治好像对她们并没有多少感情，除了董鄂妃。对皇后，顺治帝特别恨。对于自己的这些儿子女儿，除了董鄂妃生的第四子外，他也几乎没什么感情。临终前，他考虑继承人的时候甚至打算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堂兄弟。可以想见顺治性格之怪异，恐怕就是孝庄也猜不透他的心理。

顺治废后的时候是十五岁，那时候包括孝庄在内，大家认为这应该是一时的，是特殊时期特殊发作，过一段时间，顺治肯定会慢慢变好的。事实恰恰相反，掌握大权后，顺治的性格不但没有变得温和，反而变本加厉。现在他是想怎样就怎样了，今天想用鞭子抽谁，那个人肯定是躲不了，过了几天，又觉得干啥都没意思，想去寺庙当和尚，谁也拦不了他。

总之，你不知道他想做什么，他身上有一股冲动，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股冲动来自哪里。换句话说，他生命中有一种压抑，他一直想突破这个压抑，这个压抑到底是什么，估计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他只能设想是多尔衮，但是多尔衮已经死去很多年了，多尔衮的阴影真的有那么大吗？

顺治的一生是躁动不安的一生，最后染天花而死对他来说真是一种解脱。他解脱了，孝庄也解脱了，满朝的文武大臣也解脱了。中国将迎来一个新时代，康乾盛世。中国将出现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康熙大帝。

顺治十六年（1659年）六月，南明的延平郡王郑成功率军穿过台湾海峡，从东南沿海登陆，一路上势如破竹，大败清军，接连攻克瓜洲、镇江，大军围困江宁。一时南方各省人心晃动，纷纷有密谋起义的举动，整个江南各省陷入了紧急状态，清廷上下大感震动。

我们是不是很想知道顺治帝是啥反应，我们可以从顺治玛法（老爷爷）汤若望的回忆录中了解到情况：

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对他加以斥责，她说，他怎么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他一听皇太后的话，这时反而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发誓说他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绝不更改自己的意志。为了强调自己的决心，他居然用剑把皇帝的御座劈开。那意思是说，如果有人敢对他御驾亲征说一个不字，他就一剑把谁劈死。

皇太后枉然地尝试着用言语平复皇帝暴怒的心情。另派皇帝以前的奶母到皇帝面前进劝。可是这更增加了他的怒气。各城门已贴出了官方的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当时全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王公大臣排着长队到汤若望这里请求援助。若望应允，至皇上面前呈上奏疏，并且很深沉地恳求，不要使国家破坏到这地步，这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当时皇帝的情绪就转变了过来，请若望起。现在他知道，“玛法”的意见是好的。所以，各城门上又贴出了一张新布告，晓谕人民，皇上之出征已作罢了。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顺治帝的脾气是相当暴躁的，可以瞬间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中也可以看出，顺治和汤若望的关系还是比较铁的，文武百官包括皇太后的话都不听，偏就听得进去一个洋鬼子老爷爷的话。

汤若望是一个天主教徒兼科学家，没什么私人立场。他在天启二年的时候来到广东，认识了徐光启，后来徐光启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帮助崇祯修订大明历法。在大明朝廷内，汤若望发挥专长，不仅修订历法，还帮助明朝研制西洋大炮，为此，崇祯皇帝还经常赏给他牌匾。崇祯十三年，汤若望升任北京天主教教区区长，并允许在宫中举行弥撒。

崇祯对汤若望还是不错的，所以汤若望刚开始对清朝政权没什么好感。多尔衮进京后，为了防止满汉混居，大搞拆迁，本来汤若望的教堂也要从城北迁到城南。大家都知道，拆迁是关系到民生的事，汤若望很不希望教堂被强拆，于是给多尔衮写上访信，请求不要强拆。没想到多尔衮居然给他面子，准许他留在原地，这让他对清廷产生了一些认同感。

没过多久，汤若望就向清廷毛遂自荐，为他们制作测量星体的仪器。这就是做科学家当医生的好处，不怕改朝换代，技术性人才在谁手下做事都吃得香。就这样，汤若望在清廷里也混得风生水起，为清朝创立了新历法，当上了钦天监，获得了太常寺少卿的头衔。

也不知道是汤若望会做人还是怎么回事，顺治这家伙对谁都不

好，就跟汤若望比较亲。孝庄呢，也很信任汤若望。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汤若望，此人真的是多才多艺。他不光懂天文，会造大炮，还会治病。顺治的第一任皇后从蒙古来到北京后，突然生病了，宫里的太医都治不好，汤若望看看就治好了。这使得孝庄非常感激这个老头子，在大家眼里，汤若望是非常神奇的一个老头子，他懂得一些别人都不懂的东西。后来，顺治帝封汤若望为光禄大夫，甚至还封汤若望祖宗三代为一品大官。这种荣誉只有马可·波罗才能比拟。

顺治甚至免除了汤若望的跪拜礼，对这位老人的尊崇到了极点。顺治经常去教堂里和汤若望聊天，王公大臣在顺治眼里啥都不是，偏偏对一个老人这么尊敬，是啥道理呢？难道顺治那时候就知道崇洋媚外？可惜，那时中国是天朝大国，不存在这一说法。

用顺治自己的话说：“大臣们都很虚荣，都打着自己的算盘，汤若望不是这样，他的奏疏语言充满慈爱，读来让人流泪。”顺治还对别人说：“玛法的人品非常好；别人都不爱我，在我面前装成哈巴狗一样是为了牟取利禄；我经常问玛法要什么东西，他很自足，从来不爱利禄，只爱我。”

汤若望前后给皇帝上了三百多道奏章，这些奏章都是关系到国事和民生的，从来没有为某个集团牟取利益。所以，我们能够理解顺治帝为什么信任和喜欢汤若望了。这些奏章中，有四道最为典型：一、阻止皇帝迎接达赖喇嘛，汤若望对喇嘛教非常排斥，他认为皇帝如果出塞迎接喇嘛，那是一种耻辱。二、敬谨亲王尼堪被大西军李定国埋伏斩杀后，皇帝原本打算将亲王手下的两百多将土处死，汤若望毅然上书，认为这样做不好，请求免除这些将领的死刑，改罚为降职。三、皇帝有一次突发奇想，想在长城北边搞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顺治如果真是想搞军事演习，也可以理解成强兵，但事实上他只是把这个当成游戏。汤若望听了，对顺治阐明弊端，玩这游戏可能导致很多老百姓误伤，结果顺治采纳了。四、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围攻南京，顺治帝吓得手足无措，先是想逃跑，后来又准备御驾亲征，汤若望最后把他劝住了。

顺治患上天花死了之后，孝庄就找到汤若望，问：“汤老师，小顺治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死了。他留下几个孩子全是未成年少年，老二福全已经九岁了，老三玄烨才八岁。现在到底是应该立福全为皇帝，还是立玄烨呢？”

汤老师想都没想，就说：“当然得立玄烨了。”

孝庄问：“为啥一定要立玄烨呢？”

汤老师说：“因为……很简单，小玄烨已经得过天花，不再那么

容易死了，虽然这小孩脸上满是麻子，将来活的可长了。”

孝庄一听有道理：“就立玄烨吧！”

汤若望真是大清的贵人，是大清的贵人也就是中国的贵人。但是在顺治帝死后，他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险些被处死。很多人控告汤若望宣传的天主教是邪教，结果康熙取缔了天主教，判处汤若望绞刑。但说也奇怪，也许是上帝显灵，就在这时京城发生了地震，古人比较迷信，怀疑是不是老天不让处死汤若望，加上孝庄太皇太后为汤若望说情，汤若望才逃过这一劫。

在康熙八年的时候，康熙又为汤若望平反，恢复了汤若望的一切名誉，不过这时汤若望早已魂归上帝了。汤若望一生虽然深得顺治帝信赖，但也不是没有遗憾，他曾经想让顺治信奉天主教，并且奉天主教为国教。这个是失败了，我们知道顺治帝是信仰佛教的。

痴情天子

在跟董鄂妃相恋之前，福临还和一名汉族女子发展过一段短暂的恋情，这个女人的出身也非常不错，是汉奸孔有德的后代。孔有德虽然是汉奸，但好歹是封了王的，所以他的女儿孔四贞也算是一个郡主。

张献忠死后，他的养子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率领部队进军广西桂林，当时奉命镇守桂林的就是恭顺王孔有德。入关后，孔有德改封为定南王。被大西军围困之后，孔有德无处可逃，只好关门自焚。在自焚之前，他杀掉自己家人，只有一个女儿逃了出来。这个郡主叫孔四贞，只有十三四岁，是个花木兰式的女孩，常年跟随父亲打仗，骑射本领非常好。

孔四贞逃出来后，只身来到京城。孝庄念孔有德全家为国捐躯，将孔四贞纳入慈宁宫收养，封为和硕格格。孔四贞进宫后，福临正在废后，两人相见后，很是投缘。孔四贞是一个非常外向活泼的女孩子，她跟福临很快就打成一片，形影不离。有了孔四贞，顺治眼里就再没有其他妃子了，更不用说皇后。

孝庄虽然成全了顺治废后的想法，心里却对自己的侄女和整个科尔沁博尔济吉特家族非常愧疚。所以，她耐心地对儿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谈到祖宗创业的艰难，谈到今天之所以能在中原当皇帝，离不开当年漠南蒙古各个部落的支持，所以，孩子啊，我娘家是为大清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对这些，顺治也点头表示赞同。

孝庄于是顺水推舟：“既然你不中意表妹，那我再帮你选个皇后吧！”

这个皇后是孝庄的侄孙女，跟前任皇后性格完全不同，前任皇后特别爱吃醋，顺治不临幸她，她也不让顺治临幸别人。而这个皇后性格非常沉静，人很好，典型的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型。福临虽然没有拒绝这桩婚姻，但好像还是不怎么喜欢皇后，只要是博尔济吉特氏，他仿佛觉得烫手山芋似的，就好像有什么心理阴影。看到顺治整天跟孔四贞在一起，皇后也只能在深宫里叹息，是的，她除了叹息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总不至于要死要活吧，这样既丢面子，还没效果。碰到顺治这样的浪子，只能由他去吧！

孝庄看到儿子这样子很不高兴，她担心新任皇后可能再度被废，便一再强调“满汉不得通婚”，一方面是给福临施压，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孔四贞好自为之。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孝庄的意料，这说明她的智慧远远赶不上福临胡闹的速度。

福临突然不迷恋孔四贞了，这是好事吧？表面看来，确实是好事。

事实上，却是天大的坏事。福临移情别恋了，而且对象不是皇后，是自己弟弟博穆博果尔的老婆。

博穆博果尔是皇太极最小的儿子，脾气非常刚烈，在顺治十二年的时候受封为襄亲王。他的老婆董鄂氏是满洲的世族，董鄂氏的父亲鄂硕曾经担任内阁大臣。董鄂氏十四岁的时候嫁给博穆博果尔。

鄂硕跟着多尔衮一起入关，积极响应多尔衮的号召，带着全家移民到北京。鄂硕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的人，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形势，他率先招聘了一批汉人為自己服务。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因为这事关系到董鄂氏的一生，因而也影响了顺治帝的一生。

有人就奇怪了，不就招聘了几个汉人吗，怎么就关系董鄂氏的一生，还影响到皇帝的一生？

不急，我们慢慢道来。鄂硕此举无疑为自己的子女提供了一个接触汉文化、学习汉语的机会。董鄂氏就是这么一个牺牲品，她的求知欲非常旺盛。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不知不觉就受到浸染，开始想象自己是唐诗宋词中的深闺少女，慢慢地，气质就出来了。这种气质在满族中肯定算是异类，但偏偏很容易吸引顺治。

完了，爱情的火花一旦点燃，肯定会烧死几个人的。这是皇宫，不是江湖，所以得淡定，像李敖说的，只爱一点点是最好的。

董鄂氏是一个非常沉静的女孩子，而博穆博果尔则非常活泼好动，看着董鄂氏整天抱着书啃，博穆博果尔气不打一处来：“难道你老公我就这么不堪，连一本破书都不如？”

董鄂氏：“什么啊？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这不是很好吗？”

博穆博果尔：“你不是很喜欢看中文书籍吗？那里面讲的三从四德，你有没有看进去啊？”

董鄂氏：“有没有看进去是我自己的事。”

博穆博果尔：“你未免太不讲理了吧！”

董鄂氏：“不跟你说了，我要进宫服侍皇太后。”

在清初，根据老规矩，像董鄂氏这种身份必须进宫侍奉后妃。董鄂氏的身份非常高，服侍的对象是皇太后。这样一来，跟顺治就有机会见面了。根据规定，顺治每天早晚必须去见皇太后。顺治的女人虽然非常多，但自始至终他不明白情这种东西是咋回事，所以对于书中什么梁山伯祝英台非常羡慕，用现在的话说，这小子看琼瑶看坏了脑子。

顺治觉得，我是皇帝，不是禽兽，所以我必须要找到爱情。

某一天，顺治按照惯例去慈宁宫向孝庄问安的时候，忽然发现孝庄身边有一个很有气质的美女。顺治躲在一棵树下注视着那个女子，首先发现这个女子衣服穿得很得体，既衬托出身材，又显出了身份和气质，接着他又发现这个女子举手投足之间有一股说不出的扣人心弦的气质。当时，顺治就在心里感叹：好一个气质美女啊，正是我朝思暮想的类型。

结果，顺治向皇太后问安的时候，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美女。这美女很懂风情，仿佛知道顺治心里想啥，顺治盯着自己的时候，她总是垂目作温顺状。

自此，顺治让太监去打听这美眉是哪家的，有没有主。太监回来告诉他，这女孩已经名花有主了，而且主人还是顺治的小弟弟博穆博果尔。听到这个消息，顺治反而更高兴了，都是自家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有一天，董鄂氏去坤宁宫侍奉皇后，进了坤宁宫后，发现皇后去了皇太后那儿。董鄂氏便在那里干等，顺治得知这个消息欣喜若狂，立即跑到坤宁宫去，平常很少见他去坤宁宫。

这是董鄂氏和顺治第一次独处，据说顺治非常紧张，董鄂氏反倒显得平静。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董鄂氏没有其他想法。交谈之间，顺

治对董鄂氏的好感以几何级数增长，这女子不光气质超凡脱俗，对汉文化简直如数家珍，真是难得的才女啊！

想当年，福临亲政后，为了掌权，他让文武大臣将一切奏章都交给自己，不必请示郑亲王济尔哈朗。掌权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让自己更辛苦。这些奏章大多是汉文，首先福临的汉文必须要过关。为了能够顺利阅读奏章，总结历代帝王的治国经验，福临可以说是下了苦功的，拼命学习汉语，经常闻鸡读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的付出总算有回报了，福临成为了一个颇具汉文化修养的皇帝。

汉文化在当时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文化，福临得知董鄂氏跟自己一样，对汉文化怀有深厚感情之时，顿时有了知音之感。

这一切怎么逃得过孝庄那双犀利的眼睛，为了防患未然，孝庄居然改变老惯例，停止命妇入宫服侍。福临也不是傻子，看到母后这么做，就知道是冲着自己来了。

这也不能怪孝庄了，福临你这孩子太不尊重母亲娘家人了。你表面上是去看母后，实际上想见董鄂妃。董鄂妃前脚进慈宁宫，你后脚就来了。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呢？孝庄太了解福临了，她知道这个孩子一旦想做什么事，九头牛都拉不回。

顺治也不服输，心想老妈你坏我好事，行，我自有办法。顺治知道博穆博果尔很喜欢带兵打仗，于是就封他为硕襄亲王，让他带着八旗军到南方去打仗。当时博穆博果尔只有十五岁，让这么一个没有军事经验的人去打仗，这一招非常阴险。总之，只要支开了博穆博果尔，就有机会去见董鄂氏了。

孝庄渐渐想通了，自己给儿子找的两个皇后都很不讨好，其实并不是顺治跟皇后们有仇，而是跟自己过不去。恨屋及乌，只要是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就反感。

为了牵制顺治，孝庄想起孔四贞这个棋子，以前顺治不是喜欢孔四贞吗？好，就立孔四贞为仅次于皇后的东宫皇妃。顺治帝看出了孝庄的意图，坚决不同意。结果让孝庄无地自容，顺治让天下臣民觉得孝庄出尔反尔。这件事中最难堪的就是孔四贞了，孔四贞好歹是一个郡主，结果这么不被人尊重。最后，孔四贞以“自幼许配”为由，嫁给父亲的老部下孙延龄。

话说这个博穆博果尔，接到带兵打仗的消息，自是乐得不行。一身戎装，坐在马上，志得意满，全然没想到老婆可能在家里跟皇帝哥哥乱搞。

许多老将自然看不惯博穆博果尔纨绔子弟的样子，加上他年少无

知，好勇斗狠，赏罚不明，处事不公，引起了下面强烈的不满。还没和敌人打仗，军中就流传着关于他的谣言。这些谣言无非是董鄂氏红杏出墙，主帅头顶的帽子绿油油的。

博穆博果尔刚开始还不信，可是后来流言越传越广，到处都在说皇上和董鄂氏有一腿。一天晚上，博穆博果尔出去的时候，忽然在营帐外听到士兵讨论这事，内容非常让人上火。博穆博果尔听了，直接操起大刀，朝那几个值班士兵扑过去，见人就砍，能砍死多少是多少。直到一些部将跑过来抱住他，才避免了更严重的事情发生，然而不少士兵已经被砍死。

第二天，博穆博果尔决定不打仗了，回宫找皇帝哥哥算账去。博穆博果尔回到家里时已经是黄昏，问仆人董鄂氏在吗？大家都说董鄂氏在皇宫里服侍太后。博穆博果尔不信，直接冲向皇帝住的地方。到了皇宫，他发现侍卫已经列队排在那里，仿佛专门等着自己。

博穆博果尔也顾不得许多了，大骂：“福临，你给我出来，你到底把我老婆藏在哪儿了？”

直接喊皇上的名字是大不敬的行为，侍卫们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大胆。”

这时候，皇上出来了，大怒：“你是不是找死啊，还不快滚。”

博穆博果尔就这么灰溜溜地逃回了家，总算董鄂氏还知道家在哪里，晚上终于回来了。回来后，两人不停地争吵，一直吵到第二天。

博穆博果尔老纠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给我戴帽子？”

董鄂氏：“没有，你瞎琢磨个啥，我跟皇帝哥哥只是朋友。”

“你不承认是吧？”

董鄂氏：“跟你说说不明白，你自己静一静吧，我现在要去宫里服侍太后。”

博穆博果尔：“你这女人死不悔改，在外面偷人还若无其事，反了你……”

没想到，博穆博果尔这话恰好被闯进来的顺治听到了。顺治甩手给了博穆博果尔一个耳光：“你反了？你也不看看她是谁的女人，你敢欺负朕的女人，吃了豹子胆了……”

博穆博果尔目瞪口呆，这世上还有天理吗？老婆偷人，教训老婆结果被奸夫甩耳光。看着顺治牵着董鄂氏的手若无其事地离开，博穆

博果尔的人生观崩溃了，一时想不开，自杀了。

我们看看汤若望是怎么记载这件事的，精明的汤若望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只是客观地记叙事实：

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的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打了一个极其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博穆博果尔这一死可以说非常给力，否则顺治还真得下一番苦工夫才能把董鄂氏纳入后宫。顺治不光要纳董鄂氏为妃子，还想册立她为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这一切，孝庄忍了。她不能不忍，她就这么一个儿子，总不能把他废掉吧！

册封董鄂妃为皇贵妃大典后的第九天，顺治又做了一件非常过分的事。他一方面恭奉宝册，在上面加上孝庄皇太后的尊号；一方面公然下令太庙牌匾内停止书写蒙古文字，只能书写满汉两种文字。这是赤裸裸地表达对母亲不满，还把这种不满扩大化，延伸到整个蒙古。这么做，简直是视皇太后如无物，不仅鄙视了皇太后，也鄙视了广大的劳动人民。要知道前线还有数万蒙古将士在奋勇杀敌，这么做简直是让他们寒心啊！

太后信佛，但绝不是吃素的

看起来，在顺治与孝庄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顺治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面对顺治帝这么疯狂的行为，孝庄冷冷的没有任何表示，我们确实无法理解顺治的所作所为，也许只有孝庄能明白。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是这么奇怪，光用叛逆不足以解释。

对于顺治用自己的名义所做的一切，孝庄始终选择沉默。顺治伤害她的族人，她还是没有任何行动。

孝庄似乎沉寂了，会任由顺治帝欺负下去——如果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孝庄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只因顺治是自己的儿子，所以才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摆平他，但她相信这个机会很快就会出现。

顺治十四年的时候，董鄂妃为顺治生下皇四子，很可惜这个孩子活了两个月就夭折了。顺治破例追封他为荣亲王。

董鄂妃皇子早殇不久，孝庄以圣躬违和为借口，移居到南苑去养

病，并且命令后妃和百官必须要前去问安。当时正值寒冬腊月，董鄂妃的身子又一向不是很好，加上儿子早逝，其状况可想而知。孝庄的手段就是高啊，比顺治高出太多，她整人是不露痕迹的。大家都来向我问安，总不至于有人怀疑我整你吧！再说了，这也是规矩。

我们想想看，一个刚生育儿子，儿子又早天的女人，身心的痛苦岂是常人所能想象的，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冒着大雪从紫禁城赶往几十里外的京郊伺候孝庄。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痛苦，可以想象孝庄没有少折磨她。董鄂妃就是在这时种下了病根，后来身体越来越糟糕，三年后逝世。死后被追封为孝献皇后。

董鄂妃死后，顺治痛不欲生，简直想去黄泉路上把董鄂妃拉回来。当然，在顺治内心里，董鄂妃早逝的罪魁祸首便是那个深沉严苛的母亲，可是他又不能杀掉自己的母亲，甚至不能公开地反对自己的母亲。怎么办呢？只好强忍着愤怒去讽刺和揭露这个人，这在顺治亲自为董鄂妃撰写的《董妃行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顺治对孝庄的控诉与愤怒，那种愤怒简直是想亲手把这个母亲给宰了。

《行状》刚开始说：年十八，以德入掖庭，婉静循礼，声誉日闻，为圣母太后所嘉许。……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

这段文字是啥意思呢？表面上看好像是将董鄂妃和孝庄的关系描述得很和谐，太后夸奖她，她把太后侍奉得非常好。我们不妨来翻译一下：董鄂妃十八岁因为品德端方成为我的老婆，为人非常温婉安静，而且很懂礼，名声一天比一天好，太后也经常夸奖她。董鄂妃对太后好的绝无二话，察言观色仿佛子女，来回跟着如同婢女，就是这样，这个老太婆还经常刁难她——当然，这个是意译。

其中，顺治还记载有一次要侍奉太后去温泉疗养，当时董鄂妃有病不能前去。皇太后却说：“若独不能强起一往，以慰我心乎？”——我这个老太婆好不容易想去疗养一次，你就不乐意了。董鄂妃没办法，只好抱病前去。顺治对此非常激愤，当然他不敢直接骂孝庄，就在文中说：“盖日不忍去后如此。”就是说，孝庄这个老太婆特别爱董鄂妃，一刻都不愿离开她，由此可见顺治的愤怒。

在《行状》的最后一段，顺治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竟然想象太后死去的场景，当然他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说自己很孝敬这位慈母，只是身为男子，有些事情需要避嫌，只能仰仗董鄂氏了。

即皇太后千秋万岁后诸大事，俱后是类。今一朝崩逝后，脱遇此朕可一一预及之乎？将必付之不堪委托之人，念至于兹，朕五中摧

痛，亦不能伤痛无已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太后有一天死翘翘了，肯定是由董鄂妃来操办丧事。现在爱妃不幸逝世，以后太后死了，这么大的事交给谁呢？只怕会交给不能胜任的人，每每想到这里，朕五脏六腑都是痛的，爱妃你死得太早了，以后太后死了我指望谁为她操办丧事啊？

太后还没死，就想象太后已经死了，虽然话说的非常好听，但也是大不敬。顺治的想法实在太过奇怪，居然想象母亲逝世后，董鄂妃为她办理一场规模空前的丧礼。

《行状》中说董鄂妃入宫多年，为人谦和低调，对太后很尊敬，对宫中的保姆和仆人都很优待。作为皇贵妃，她管理着后宫的妃嫔宫女，宽容仁厚，没有丝毫的吃醋之意。

我们回头看看董鄂妃的一生，如流星一般短暂，却充满了无法言喻的不幸。她首先是跟一个没有共同语言的男人结婚，后来皇帝把她从这个男人手中抢走，这个男人自杀了，作为一个女人，我们不知道她用什么态度面对这种事情。显然，她心里肯定是非常痛苦，虽然并不爱那个男人，但毕竟是名正言顺的丈夫，结果这个男人因为自己而死，好歹欠人一条性命。

嫁给顺治后，尽管顺治对自己非常宠爱，但孝庄却对她极尽折磨，而且折磨得不露痕迹。那种痛苦，没有宫廷生活经验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所以说，董鄂妃的一生肯定是不幸的。如果孝庄这个婆婆看自己顺眼的话，好歹一生会比较平静。但生活注定是一场悲剧，儿子早逝似乎就是一个征兆，顺治对她如火的爱情并不能挽回什么，地位的尊崇似乎也不能减少不幸。

我相信董鄂妃一定有这样的感触：与其生活在帝王将相的家庭，不如生长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里，至少可以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

董鄂妃死后，顺治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还赐死了三十多个太监和宫女，这样方便董鄂妃去阴间后还有人照顾。

董鄂妃死时年仅二十二岁，顺治死时年仅二十四岁，这样的年纪在现在刚够法定结婚年龄。在封建社会，连一个皇帝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幸福，更不用说一般人了。生活在今天，我们应该感到幸运，还是社会主义好啊！

我非常不理解的是，碰到一段凄美的爱情，为什么有的文人就喜欢往妓女身上扯。在某些文人看来，具备这样条件的在当时非秦淮名妓董小宛莫属，正好两个人名字中都有一个董字。《清朝野史大观》

对此言之凿凿，证据是两个文人的诗词，一个是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一个是冒辟疆《梅影庵忆语》，冒辟疆是江南名士，说话有斤两，他曾经在青楼里认识董小宛，后来娶她为妾，清军入关后，董小宛落入清军手中，这个董鄂妃呢就是那个江南名妓董小宛。

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首先董小宛比顺治大十四岁，当董小宛在秦淮名声大噪的时候，顺治才两岁，董小宛死的时候，顺治只有十三岁，搞不懂为什么有人把董小宛附会成董鄂妃。

顺治出家之谜

顺治一生是非常复杂的，首先这个人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其次他在政绩方面还是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他从小生活在多尔衮的淫威之下，精神受到很大的扭曲。多尔衮去世后，顺治开始亲政，亲政之后，他与母亲的矛盾不断恶化。为了治理好国家，顺治精心研究汉文化，学习汉语言，颁布了一系列的仁政。

但说实话，在私生活中，这个人确实谈不上仁慈。他动辄处于暴怒状态，表现出精神病人的一些症状，行为非常离谱乖张。当然，我们可以对顺治的遭遇表示理解，童年的不幸常常会伴随一个人的一生。虽然他的性格让人很不喜欢，但是在治国方面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大清国入关后最开始的十年里，他不但让GDP稳定增长，而且为以后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治国方面，顺治没有民族歧视——不对，还是有民族歧视的，歧视蒙古族。总的说来，他采取的是柔性治国方针，尽量放低姿态接纳民意，同时积极开展改革。明末贪污腐败成风，顺治为了整顿吏治，针对各个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和赏罚条例。经济方面，顺治废除崇祯的许多苛捐杂税，为了加速经济的发展，他积极推行垦荒。

顺治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千古明君，但也绝对不是个昏君，他虽然对宫里人脾气暴躁，但对大臣们还是有虚怀纳谏的雅量。譬如，户科给事中朱之弼曾经给顺治上了这样一道奏疏：

今日之病在六部，六部之病在尚书，尚书之病在推诿，推诿之病在皇上不择人、不久任、不责成效、不定赏罚。

即使任事之人，视国事如家事，犹恐废弛；今则尽如事外之人，

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劳任怨之意少。事稍重大，则请会议；不则迁延日月，诿之行查而已；不择卸责于人，听督抚参奏而已；不则畏首畏尾，听科道指名而已；不则苟且塞责，毋庸再议而已。上下推诿，以为固然，曾有担大事、发正言，以图实济者乎？

朱之弼不光放胆直谏，甚至将一切问题的责任都推到皇帝身上。换做是一个昏君，不把他脑袋砍了，也要让他回家养老。顺治时年只有十八岁，非但没有生气，甚至连否认都没有，更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承认事实，虚心采纳意见，然后晓谕六部要整肃一新，不得懈怠。

当然，顺治在治国方面也有一些污点，比如郑成功打过来之后，他吓得要逃回辽东，被孝庄鄙视一番后，居然又说要御驾亲征。这时候，顺治已经二十二岁了，表现还这么冲动，确实有些不应该。

在私生活方面，人们对顺治的印象更差，他自负又自私，对母亲很不尊重。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董鄂妃很钟情。

董鄂妃去世之后，顺治万念俱灰，顿时产生了皈依宗教的思想。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天主教和佛教。考虑到顺治帝和汤若望的关系，天主教本来是很有希望的。

顺治确实很尊重汤若望，他从汤若望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小顺治眼里，汤若望就像一部百科全书，什么天文历法、日食月食、彗星金星之类，他全懂；汤若望还经常给他讲西方的人文风俗，在天性浪漫的顺治眼里，这些知识确实非常酷。

汤若望确实是清初非常牛气的一个外国人，不要说他死后混到一品的地步，就说他所记载的一些东西，现在我们一般都当成信史来看，正史太暧昧，野史太不可信，时人的笔记也不足为证，偏偏大家就信汤若望。

据说，顺治喜欢跟汤若望交往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西洋老头懂的东西确实多，能够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却是因为跟汤若望在一起，他非常放松，不像跟大臣们在一起那么紧张。所以，小顺治特别喜欢跟汤若望闲聊，亲切地称呼他为阿玛。

当然，汤若望也有让小顺治不高兴的时候，汤若望非常讨厌太监这种不人道的制度，他希望顺治不要制造更多的太监，不仅如此，他还希望顺治能够放弃男女之爱，专心服侍上帝，宣扬天主教。顺治自然无法接受这种要求，相反，汤若望提出这种要求后，他将心比心，觉得自己这么喜欢女人，难道汤若望真那么淡定？

为了解开心中这个谜团，他让人日夜监视汤若望，可惜，顺治失

望了，密探监视了许多天，回报顺治：汤神父每天晚上在教堂诵经之后，就返回卧室就寝，没有任何其他的举动。

顺治长叹一声：“汤爷爷真是了不起的神人，但是我还是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他是个知行合一的好朋友。”

汤若望和顺治的友谊一直维持到顺治去世，虽然顺治对禅宗倾心，但内心深处一直很尊重汤若望，甚至在临死前，他还接受汤若望的谏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佳话，一位中国皇帝和一位外国神父建立起了超越利益关系的友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顺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接受佛教的，刚开始的时候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想以礼法和仁德治理天下，成为一代明主。对于佛教，还有几分排斥的意思。

顺治十年的时候，曾经与大学士陈名夏讨论历史的时候，说到国祚这个深奥的问题，说着说着就扯到鬼神和宗教上面，陈名夏向皇帝大力推荐喇嘛教，说这玩意可以延长国祚。顺治当时就说了：“喇嘛教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不可信，他们说驱鬼，鬼才相信呢，不过是蛊惑人心罢了。”

由此可见，顺治当年还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小青年。但是，四年后，他的人生观就发生了改变，他开始陆续召集一批高僧进京。有人认为顺治这么做可能是受了太监的影响，但不管受谁的影响，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顺治有佛缘，他的内心是不会改变的，也是不会欺骗自己的。

憨璞性聪就是顺治最早认识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禅师，这位高僧是福建延平顺昌人，十五岁的时候在天王寺出家，二十五岁起开始云游。和尚云游就像政治家到处演讲一样，名声就这么打出来了，憨璞性聪每到一处都讲经说法，逐渐打造出了全国性的影响力。

公元1657年，顺治驾幸南海子，经过海慧寺，在那里遇见了憨璞性聪，两人进行了一番密谈。这一年十月，顺治把憨璞性聪召进宫里，问他佛法：“从古至今，帝王治理天下，都是代代相传，日理万机，闲暇时间特别少。我现在对佛法非常感兴趣，想学习佛法，但时间又特别紧张，得找一个好老师学才能提高学习效率，得找谁呢？”

憨璞性聪既然是高僧，自然不会脱口而出：“跟我学吧！”相反，他谦虚地拍马屁：“皇上你是金轮王转世，天生有大善根有大慧根，正因为你天性有佛性，所以才相信佛法，皇上不用跟人学就能无师自通，不学自明啊！所以，皇上你不仅是一国至尊，也是佛门至尊啊！”

听到这么拍马屁的话，我们简直很难相信是出自一个高僧之口，可见要做高僧不光得会佛法，马屁功夫也是应该学会的，多学几门技术总是有用的。

顺治对这位高僧的回答很满意，不久就册封他为明觉禅师。这位明觉禅师留下了一本《憨璞性聪语录》，里面不光收录了他的语录，还有一些他赠给太监的诗文，诗文中对一些太监极尽歌颂之能事。现在，我们总结这个和尚有三大绝招：佛学、马屁功夫、写诗。当这三大绝招糅合在一起的时候，绝对是必杀的，没有人能抵挡得住，所以顺治被俘虏了。

憨璞性聪博得顺治宠信之后，对主子是非常忠诚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憨璞性聪接连给顺治介绍了许多佛门顶尖人才，这些人才中有木陈忞、玉林琇、茆溪森这些业内著名人士。

我们得说说顺治为什么对天主没有好感，倒是对佛教的兴趣这么浓厚。

首先，顺治接受汉文化熏陶太深，汉文化既包括儒家文化，也包括佛教和禅宗，佛教虽然是从印度传来的，但经过上千多年的本土化过程，已经演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了。

其次，顺治的一生饱经忧患，在后来的岁月里，情感受到重大打击，爱子早逝，爱妃亡故，跟母亲的关系僵得特别厉害。这些都给他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所以万物皆空的佛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他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入帝王家？”可以想见，他心灵深处那种对人生感到无奈的感觉。

我们先来说说得道高僧玉林琇吧！

玉林琇的全名是玉林通琇禅师，他是江苏江阴人，俗姓杨，出身于名门望族。从小生长在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里，也是很有个性的人，十八岁成年的时候，他也不考科举，居然跑到磬山寺当和尚。当和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和尚也有能力高低之分。不久，他就换个高级一点的寺庙，浙江湖州报恩寺，在这里待了几年，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当上寺庙主持。升迁速度之快，实为佛门所罕见。据说他是一个风格非常严峻的人，很受佛门弟子的好评。

公元1658年的时候，玉林琇已经是佛门中的一个名流了。憨璞性聪一推荐他，就引起了顺治的重视，顺治派人召他进宫。他居然摆出名士风范，拒绝了。后来，顺治帝再三邀请，他才勉强决定赴京。中途到了天津后，玉林琇又打算不去了，准备在天津饿死算了。为啥？因为他对明朝有浓厚的感情，不愿意见清朝的皇帝。可是，皇帝不请

到他誓不罢休，一直拖到第二年二月十五日，他才进京见了皇帝。

进京之后，事实再一次证明玉林琇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和尚，见过大场面，有自己坚定的人生信仰。对于顺治的问题他对答如流，言语处处藏着机锋，回答得不仅有佛理还有哲理。顺治当时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将他留在京城，时常向他请教佛理。还问他可不可以为自己取个法号，玉林琇给他提供了十几个字，让皇帝自己选：“最好用丑一些的字眼”。最后，顺治自己挑选了行痴两个字，在玉林面前自称弟子。顺治封他这个师父为大觉禅师，后来晋升为大觉普济禅师，最后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从一个和尚混到国师，我们再一次对玉林琇的能力表示钦佩。

有一次顺治问玉林琇：“悟道之人还能有喜怒哀乐吗？”

玉林琇回答：“什么是喜怒哀乐？”

顺治一听，高明啊，师父不愧是师父，境界非同一般。

玉林琇又说：“不要说喜怒哀乐了，就是江河大地都是因为妄念而生，只要没有妄念，连江河大地都不存在。你说人做梦发生的事情，是有还是无？”

顺治一听，恍然大悟，人生就好比一场梦，虽然在梦里觉得很真实，其实一旦大彻大悟，就发现那一切只是一场空。想通了以后，顺治神情变得愉悦，忽然有种解脱之感，心中对这位国师也越来越尊重。

玉林琇看摆平了顺治，便提出离开京城。顺治挽留不住。玉林琇第二次进京的时候正值董鄂妃去世，是顺治心如死灰的时候。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顺治出家之谜。

讲到顺治出家之谜，得介绍一个人，茆溪森。

茆溪森是玉林琇的弟子，根据佛门的规矩，可以算是顺治的师爷了。董鄂妃逝世之后，茆溪森一直陪伴着顺治。顺治悲哀之余，想要落发为僧，他要求茆溪森为自己剃度。茆溪森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和尚，对宫廷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不了解。皇上要求他剃度，他想也没想，剃度就剃度，师弟既然开口，哪能不帮忙。就这样，茆溪森在万善殿为皇帝落发。

这个消息一传出，宫廷里炸开了锅。皇上一剃度，接下来就是要举行皈依大典出家。首先愤怒的是孝庄，她不仅对顺治很愤怒，更吃惊茆溪森胆大包天，竟然为皇上干这种事情，你这不是要毁我大清江山吗？孝庄心里很清楚，自己这个不听话的儿子一旦想干什么事情，

连动车组都拉不回。怎么办呢？出面阻止可能让情况更糟糕，孝庄不愧是孝庄，她知道这时候唯一能影响顺治决定的就是玉林琇了。所以她让人快马加鞭去湖州召玉林琇进宫。

听说了这件事，玉林琇知道徒儿茆溪森闯下了大祸，他一路上大骂茆溪森脑子少根筋。为了阻止顺治出家，他进宫之后，立即将茆溪森捆起来，然后在殿外搭起高台，准备将茆溪森就地火化。玉林琇当然不是要置徒儿于死地，这位和尚是个有大智慧的人。果然，不多久，顺治就赶过来了，连忙答应不出家，让他赶快放了茆溪森。顺治出家，再次演变为一场闹剧，就像上次御驾亲征一样。

从这事情中可以看出玉林琇确实是一个很有手腕的高僧，曾有人说玉林琇这人为人阴鸷，平常不怎么说话，但是野心非常大，表面上宠辱不惊，实际上行沽名钓誉之事。在他晚年，因为弟子仗着他的权势强占别人的地盘，他的寺庙被烧毁，后来“终日危坐”而死。

当然，对顺治影响最大的还是名僧木陈忞。木陈忞是广东人，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在崇祯十五年就当上了宁波天童寺的主持，木陈忞俗姓林，从小就非常聪明，博览群书。长大后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进宫后住在西苑一带，伴随皇帝达九个月之久。

木陈忞也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对于皇帝的喜好非常了解。顺治跟他坦诚相待，经常让他不要把自己当成皇帝，就当成佛门弟子就行了。

木陈忞这个人以前对明朝感情非常深，在清兵入关后，他冒着断头的危险写下了怀念故国的诗文集《新蒲绿》，对清朝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和不满。当他跟顺治朝夕相处九个月后，有些人接受不了，写诗讽刺他：“从今不哭新蒲绿，一任煤山花鸟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木陈忞也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和尚。

顺治对木陈忞非常尊重和器重，封他为弘觉禅师，视他为老师。平时，木陈忞除了与顺治讨论禅学之外，两人还畅谈古今人物，对历史发表评论。木陈忞不仅对历史了如指掌，而且对文学也很有造诣，可以说，经史子集他样样都熟悉。更了不起的是，木陈忞拍马屁的功夫也是一流的，拍得不着痕迹，浑然天成。

他经常夸皇帝虚怀好学，能够通晓天下百姓的喜怒哀乐，还说顺治天生就有慧根，上辈子就是和尚。顺治对他非常掏心，连自己身上的弱点都告诉他。木陈忞把这些都写进了诗文中，但正因此雍正对他非常反感，因为他泄露了皇家隐私。雍正上台之后，给木陈忞安了个宗门罪人的罪名，打压木陈忞这一支佛门力量。

应该说，顺治在宗教信仰上还是不错的，他以一个皇帝的身份信仰佛教，并没有把自己凌驾在佛教之上。也没有媚佛佞佛，大修寺庙什么的，所以说，顺治是个好皇帝，他没有因为自己喜欢佛教而把纳税人的钱花在和尚头上。

纵观顺治后来的日子，他虽然出家未遂，但确实是真心向往佛教。身为一个皇帝，连选择宗教的自由都没有，这对顺治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为了弥补这种遗憾，他让太监吴良辅替自己出家，也算是完成最后岁月里最大的心愿。

顺治之死

我们来说说吴良辅这个人吧，能够替皇上出家，这种人跟皇上的关系那可是非同一般。吴良辅从小跟皇帝一起长大，既是顺治的奴才，又是顺治的伙伴。吴良辅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太监，由于顺治的信任，他很早就开始弄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顺治对此也是知道的，但他为了袒护吴良辅，公然置自己制定的宪法于不顾。

顺治死后，在孝庄太后的授意下，康熙帝处死了吴良辅。

1661年1月30日，顺治突然宣布不早朝，并免掉诸王和大臣们在节假日向自己问候行礼。这在注重礼法的封建社会是非常反常的一种行为，顺治帝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第二天，《清实录》记载，这天“上不豫”，皇上身体不舒服。尽管身体不舒服，皇帝还是移驾到宣武门西南的悯忠寺，在这里督令工匠搭建戒坛，因为这一天正是吴良辅代他落发出家的日子。

从悯忠寺回来后，顺治就感到很不舒服。《清实录》对于顺治之死，记录得非常简单。清朝有两个皇帝的死亡记录非常简单，就是皇太极和福临这父子俩。我们发现这父子俩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死后，直接掌权的人跟他们关系不好。皇太极死后，最有权势的人是多尔衮。顺治死后，最有权势的人是谁呢？

不是康熙，是孝庄。

《清实录》记载：“上大渐（皇上进入弥留状态）。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之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

“丁巳（1661年2月5日）夜子刻（午夜十二点左右），上崩于养心殿。遗诏颁于天下。”

史书的记载就这么简单，从顺治皇帝感觉身体不舒服到死亡前后不到五天的时间。史书中丝毫没提到皇帝到底生什么病，是怎么死的，有没有给予什么治疗。

在顺治从染病到死亡这短短五天的时间内，从史书上我们是看不出什么波澜来的，但我们可以猜想其中的暗涌绝对是非常不平静的，因为这关系到大清的未來。

《清实录》虽然没有记载这段时间宫廷里的明争暗斗，但我们依然可以从时人的记载中了解到事情的真实情况。

董鄂妃死后，顺治帝形容枯槁、心如死灰。虽然他是全国权力最大的一个人，但觉得生活已经没意思，想遁入空门，结果连这点小小的心愿都完成不了。不过，让吴良辅代为出家之后，他总算是觉得完成了一桩心愿。

从悯忠寺回来后，顺治就趴下了。顺治不是抑郁而死，而是患上了天花。现在，天花很好治，但是在当时天花是个不治之症。天花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如果患者没死的话，以后就不用担心再患天花了，不过脸上会留下标记：麻子。

谈迁在《北游录》里曾经记载过“驱疹”：

满人不出疹，自入长安（北京）多出疹而殆，始谓汉人之染也。于是民间以疹闻，立逐出都城二十里。而都城外俱满洲赐庄，彼痿人子（穷人）安所适乎？多茹泪弃婴道侧，或恋一室，不能单外，至毙其子女，见闻交痛。……疹家报兵司马，即引绳度邻右八十步，绳以内，官吏俱不许入，都民始安。乙未（顺治十二年）春，仍逐痘如前，以驾（皇帝）在南海子（南苑），遂禁人南出。

谈迁这段话介绍了当时驱疹的过程，当时的看法是满人不出疹，入关之后才开始出疹，出疹的人中大多都死了，满人认为是被汉人传染的。这大概就是入关的代价吧，清军入关的代价实在是太小了，如果不是汉人没用、自相残杀、管理无能的话，中国就不会有清朝了。

承德避暑山庄不仅是一个避暑的地方，也是一个避痘的地方。清人对于避痘是非常重视的，康熙小时候就为了避痘，被保姆带到关外，但还是出疹了。

当时有一个文学侍臣曾经详细记载顺治驾崩的情景，这个人名叫张名宸，顺治驾崩后，他亲自参与守制尽忠活动，长达二十七天。

根据张名宸的记载，正月初二，顺治驾临悯忠寺，观看吴良辅落发为僧。初四，九卿大臣向顺治问安，发现顺治不舒服。初五，大臣

们又问安，看到宫殿各门上的门神和对联全部都去掉了。初七，释放监狱里的犯人，本来人满为患的囚室里突然空空如也。后来，民间又传来圣旨，禁止炒豆，禁止燃灯，禁止泼水（民间避痘的习俗），大家才知道原来皇上生病是因为出痘。初八，各衙门的官员们洗漱完毕后，穿好朝服准备去上班，突然传来公文说，除了中堂和礼部，其他官员都可以回家了。中堂和礼部官员进宫必须摘掉顶戴，当时张名宸大惊，他知道按照惯例，肯定是皇帝驾崩了。根据张名宸的描述，他当时很震撼很悲哀，皇上才二十四岁，就突然离世，太让人伤心了……当时，城门全都紧闭，士卒们在城楼上戒严，街道寂寥，没有行人，气氛非常阴暗。到了二鼓，才宣布遗诏，当时凄风飒飒，黑云惨淡，气氛非常压抑。

另据《汤若望传》的记载，在继承人问题上，顺治与孝庄及文武大臣发生了冲突：

一位继位的皇子尚未诏封，皇太后立促皇帝作这一件事体。皇帝想到了一位从兄弟，但是皇太后和亲王们的见解，都是愿意皇帝由皇子中选择一位继承者。皇帝使人问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完全立于皇太后的一面，认为被皇太后选择的一位太子为最合适的继位者。这样，皇帝最后受到汤若望的劝促，舍去了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还不到七岁的皇子为帝位继承者。

我们都知道这位继承者就是康熙，康熙之所以能继位不是因为什么其他方面的考量，而是因为他患过天花。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顺治帝在得知自己患有天花后，急召亲王大臣们入宫讨论继承人问题。在继承人问题上，顺治坚持要从堂兄弟中选择一个。这就让人非常费解，他放着四个儿子不立，为什么要选择堂兄弟呢？有人推测，他这是为了发泄对皇太后的不满。其次，在摄政人选上，顺治一改祖宗旧制，拒绝从皇室诸王中挑选，这无疑是对多尔衮当年独裁专政的一种反抗。

孝庄得知顺治的意图后，让苏麻喇姑请汤若望到慈宁宫一趟。顺治这些年虽然一头扎进佛教，但是对汤若望一直非常尊重，他们之间保持着真挚的友谊。孝庄相信，汤若望一定能圆满完成这个任务。

顺治见到汤若望后，让他坐在御榻上，问他对继承人有什么看法。汤若望是个非常直率的人，有啥说啥，他明确地表示不赞同立堂兄弟。因为这么做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容易引起争执，对清朝和国家都不利。

顺治沉默了，良久才问道：“四个皇子年龄都很小，你说应该选谁？”

汤若望重复曾经对孝庄说过的话：“长幼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选一个已经出痘的皇子。”

顺治当时有四个儿子，最大的是福全，八岁；其次是玄烨，七岁；至于陈氏生的常宁，只有三岁；钮氏生的龙禧，更小，只有两岁。头脑稍微正常的人就会把目标锁在福全和玄烨身上，这两人中，玄烨是出过痘的，而福全没有。

说实话，顺治对这四个皇子的父爱那是少得可怜的，当汤若望提到福全和玄烨时，估计顺治还要在脑子里搜索他们长啥样的。无论谁继承皇位，对顺治来说都无所谓。

初六的晚上，顺治感到病情加重，急召近臣学士王熙进宫，让他草拟遗诏。

正是寒冬深夜，宫中阴风阵阵，几个太监手提着宫灯，在黑夜中闪烁。王熙跟在后面，感觉仿佛能够听到鬼哭声。进入养心殿后，王熙跪拜，顺治强打着精神说：“我患痘了，恐怕时间不长了，你赶快听我的话，记下诏书内容。”

此时此景，心肠再铁石的人也免不了动容，王熙也不例外。不过他心里还在琢磨另外一层事，如果皇上诏书的内容跟太后的想法有矛盾，那该怎么办呢？

皇上一边说，王熙一边记，心里却想将来如何把皇上诏书的内容转陈给太后。王熙退下后，又在乾清门的书房里三次修改诏书。到了第二天，把诏书呈给皇帝时，顺治正在更衣，当时非常疲惫，没说要看看诏书，只让王熙把诏书交给麻勒吉。麻勒吉是满洲正黄旗人，汉文化功底比当时许多汉人大学士还厉害。

当天晚上子时，顺治帝薨逝于养心殿。

顺治英年早逝不免让人觉得遗憾，有一个叫吴伟业的文学家写了一首长诗，暗示皇帝并没有死，只是出家去了。后来，金庸在《鹿鼎记》里采用了这种说法。

吴伟业是何许人也？吴伟业号梅村，江苏昆山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他和钱谦益、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独自开创了“梅村体”诗歌。明亡之后，吴伟业为了保持名节，一直对清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消极抵抗姿态。

顺治十年的时候，朝廷再三请他出山，入朝为官。吴伟业虽然很不愿意，但面对父母二老的请求，也只好勉为其难。入朝后，吴伟业做到国子监祭酒这个职位。在朝中待了四年，他便告老还乡。在吴伟

业晚年，对于这段经历深感耻辱，认为侍奉清朝这四年“误尽平生”。

吴伟业死后让人在自己坟墓上题：诗人吴梅村之墓。这位大诗人被认为深得白居易遗风，是一代叙事诗高手。他曾写过一首《清凉山赞佛诗》，这是一首叙事性的长诗，确实很长，比《长恨歌》还长。诗人最喜欢说一些语带双关，含有弦外之音的话。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大家认为这讲的是董鄂妃之死，董字拆开就是千里草。诗中的“南望苍野坟，掩面添凄恻”讲的是福临与董鄂妃生的皇四子早夭之事。至于“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仿佛是说顺治并没死；“尝闻穆天子，六飞骋万里”——当时人认为这话很明显是说顺治到“西天”出家了。吴梅村因为在清朝当过官，跟皇帝比较接近，而且他又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所以很多人相信他说的，顺治没有死，而是出家了。

也有人根据顺治的遗诏断言顺治没死，而是出家了。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将死之人怎么可能思维这么有条理、语气这么淡定，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私事，侃侃而谈。顺治的那份罪己诏书更像是生前长时间拟成的，不像是临死的时候突发奇想的。王熙在记录诏书之后，作了三次修改，这也是很不寻常的。

像王熙这么特别的人，当时肯定有很多人围着他问：“皇帝临死前跟你说什么了？说来大家听听啊……”

王熙终生没有把皇帝跟自己的谈话告诉别人，连他的子孙和弟子都不知道。捂得越紧，别人就越怀疑。也许是真的什么事都没有，但你捂住了，难免让人想起“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个成语。

康熙当上皇帝后，几次奉皇祖母孝庄的命令上五台山，就是清凉山。这难免让多事的人怀疑是不是顺治没有死，而是在五台山出家。如果顺治不在五台山出家，康熙为什么几次去五台山呢？游山玩水，观赏佛教建筑一次也就够了。何况天下之多，寺庙何其多，为何偏偏就喜欢五台山？

怀疑归怀疑，想象归想象，这些东西并不能成为顺治出家未死的证据。因为有太多当事人回忆顺治临死前的情景，我们就用别人的记录作证据，我们还是用老汤的话吧！

汤若望记载顺治临死的情景：“如同一切满洲人们一般，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这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在宫中特为侍奉痘神娘娘，是另设有庙坛的。或许是他对于这种病症的恐惧，而竟使他真正传染上了这种病症。在这个消息传出宫外之后，汤若望立即亲赴宫中，流着眼泪，请求允许他觐见万岁……顺治病倒三日之后，于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间夜间驾崩，享寿还

未满二十三岁。”

汤若望的中文没法跟吴梅村比，这个我们别介意，他说顺治死了应该是不会撒谎的。至于文中说顺治未满二十三岁，那是计算方式的不同，我们把顺治从娘肚子里的时间也算进去了。

顺治死前留下一份罪己诏，诏书里全是骂自己，口气很像是站在孝庄的立场上，所以很多人怀疑这份诏书“被修改了”。诏书中总共列举了自己十四条罪状：

一、在用人和管理方面没有效法祖先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而且汉化程度非常深，改变了不少满族的淳朴旧制，结果导致国家没有治理好，老百姓没生活好（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

二、没能报答圣母布木布泰的养育之恩，于孝道有亏。

三、提前于圣母离世，反而让圣母哀痛。

四、跟宗室诸王贝勒们接触太少，给他们颁恩不多，导致关系疏远。

五、满洲八旗大臣，世代尽忠，竟不相信他们，反而相信和重用汉族大臣，导致满族大臣精神懈怠，没有心情工作。

六、个性好高骛远，不能虚怀若谷接受别人的意见，很多有用人才未被重用。

七、对一些不法大臣纵容姑息，明知他们有问题，还用他们。

八、国家财政负担很重，兵饷不足，宫中又奢靡浪费，“厚己薄人，益上损下”。

九、在建造宫殿和器物方面，务必要求精益求精，但是在治国方面却没有这种精神，不知道自我反省，不体察老百姓的辛苦。

十、不知道用礼仪克制感情，董鄂妃的丧礼办得过分隆重。

十一、仿照明朝设立太监的十三衙门，明知有弊端，还不以为戒。

十二、自己性情贪图安逸和闲静，和大臣们接触得少，导致上面和下面感情沟通不畅。

十三、自以为很聪明，听不进别人的劝告。

十四、明知道自己有错，还不及时反省，导致错误越来越严重。

在遗诏的后面，顺治点名让玄烨继位，命索尼、萨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遗诏显然经过修改，顺治重用汉臣取得很

大成就，显然不会以此自责。为董鄂妃，甚至连江山都不要，更不会自责说丧礼办得太过隆重。

顺治这个遗诏让人看起来感觉有些怪，历朝历代如果国家遇上天灾人祸，时局大乱之时，皇帝会下罪己诏。这么做既是向老天认错悔罪祈求保佑，又是向黎民百姓表示皇帝认错了，你们也该体谅体谅他吧！但是像顺治这样罪己诏的却是从未有过，这不是罪己，这完全是作践自己。不管自己做了好事坏事，一律说成是坏事，而且把痛骂自己的话赤裸裸地写进诏书里。我们知道，顺治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当了皇帝后，做了不少好事。他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重用汉人，现在反而说自己重用汉人重用错了，这不是荒唐吗？

好了，最后我们可以来评价顺治的一生了，我们不必说他是一个多好的皇帝，也不必说他是多么可悲的一个人。我们只需记住一点，为了追求自由，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很不讨人喜欢。

个性在历史中是首先被淘汰的——这也许是顺治给我们的教训。在个性解放方面，顺治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第十章 血字——顺治朝的文字狱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政权的稳固光靠武力是无法长久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可以是统治的工具。清政府一方面吸收汉民族文化，加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对汉文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担心文化的劣势最后转变成政治的劣势。所以，他们对于文化和文字的监控比以往朝代都要敏感。

僧函可案

清朝是中国文字狱最深的一个朝代。在我们的印象里，清朝统治者并不昏庸，为什么文字狱这么严酷呢？

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皇帝自身的修养来考虑，得看这个政权的性质。满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它通过武力入主中原，虽然掌握了暴力和强权，但是文化上并不具备优势。可以说，清朝入主中原，它的文化就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包围。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政权的稳固光靠武力是无法长久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可以是统治的工具。清政府一方面吸收汉民族文化，加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对汉文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担心文化的劣势最后转变成政治的劣势。所以，他们对于文化和文字的监控比以往朝代都要敏感。

顺治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皇帝，但是在顺治朝还是出现了几起震惊国内的文字狱。我们先说说第一起文字狱——僧函可案。

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的大热天，南京城外突然来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僧人，该僧人举止很有风范，一看就知道是有来历的。这个僧人虽然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俗人，但是他神情非常紧张，手里紧紧抓着一个布包，布包被他手心的汗水浸湿。

这僧人心理素质显然不是很好，立即引起守城士兵的注意。对士兵的吆喝和搜查，僧人感觉特别慌张，哆哆嗦嗦地从衣服里掏出一块通行令牌，希望士兵能够直接放行。士兵把令牌交给值班的霸气军官，军官一看就知道是洪承畴发的。

出乎这个僧人的意料之外，八旗军官居然把令牌扔在地上，喝令

士兵盘查。士兵们毫不客气，从僧人手上抢过包裹，慌乱之中，包裹掉在地上。从里面滑出一部手稿和一封信，僧人大惊，但很快就淡定了，一副任你千刀万剐的姿态。

八旗官兵见这个僧人目中无人，将他押到牢里。几天后，顺治收到洪承畴的一封奏疏，洪承畴解释说：“这个僧人名函可，是我以前会试的老师原明朝礼部尚书韩日缵的儿子，已经出家多年。顺治二年正月，他从广东到江宁印刷藏经，正好碰上我们大军平定江南，受阻未归，困在省城。我在江南，从来没有跟他见面。他来到广东后，托人向我要了一张令牌；出于故人情谊，我给了他一张，但是对他约束很严。在出城盘验的时候，他不小心把这身上的东西掉了出来，里面有一封福王写给阮大铖的信，还有一本他自己写的书，里面有一些应该屏蔽的词语，函可不愿烧掉这些东西，现在自取其咎——这些我事前并不知情。我跟他本来有交情，按理不该为他说话，但事已至此，也得向上面解释清楚，此事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函可是明末典型的遗民，他眼看山河破碎，既不能救国救民，又不屑投降，于是选择了出家。出家之后，他依然心系国事。得知南京拥立弘光政权后，函可毅然离开寺庙，来到南京。不过，在南京待了一段时间，他就感到很失望，弘光政权实在是太腐朽了，复国的梦想再次成为泡影。函可目睹弘光政权的腐败，并将这段经历写在自己的书《变记》中。

当时审判函可的是八旗官员昂邦章京巴山，他对函可严刑逼供，并想借着这个案子扳倒洪承畴。函可在审讯的过程中多次被打得昏迷，不过他始终没有屈服，坚持此事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

之后，函可被押往京城，考虑到洪承畴牵涉其中，再加上这时清廷需要利用洪承畴，多尔袞没有进一步深究，选择了对其从轻发落，将函可发配到沈阳，洪承畴则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因为清初的特殊形势，函可案得益于洪承畴的保护，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函可在顺治十六年病逝，函可案虽然没有扩大化，但开启了清朝文字狱的先河。

科场案

顺治十四年正月十五日，顺治皇帝颁布谕旨，宣布废除科举中投拜门生的陋习。

顺治为什么要颁布这项谕旨呢？说来，跟一场科场舞弊案有关系。

这一年，天灾人祸特别多，四川一带频发地震。京城北京好几个月都没有降雨，旱情非常严重。封建时代，皇帝自称为天的儿子，天灾意味着老天对你的统治不满。顺治是一个好皇帝，面对天灾，第一反应就是自我检讨。除此之外，顺治还命大臣们，对于监狱里的犯人一定要认真审理，不要出现冤假错案。

顺治的这些做法并没有减少灾情，相反，灾情越来越严重。六月，杭州、嘉定、湖州、南京、绍兴等南方城市遭到了特大暴雨袭击，无数城郭被毁，不少人畜在大洪水中淹死。不久，江南的一些城池也遭遇了暴雨。九月份，北京又发生了地震。

老天突然之间降下了这么多灾难，让顺治帝非常惊慌：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然而，这还只是天灾，这一年，人祸也不少。

十月二十五日，顺天科场舞弊案被人揭发。

顺天乡试考场，有乡试生员四千人，贡监生一千七百多人，录取名额只有二百零六人。在当时人眼里，这个录取比例是非常低的。可能，我们现在的许多公务员考生会说：“这些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是曹本荣、宋之绳等人。僧多粥少，很多人就想到了走后门，现在走后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当时还没那么普及。顺治帝也没有完全适应走后门这种习俗，所以才有震怒的感觉。结果，有钱有地位的人大肆送礼，趁机结交一些官场要人。

榜单出来之后，大家一看，明白了：潜规则。高干子弟必中，富家子次之，穷人极少，或者干脆没有。榜单发布之后，一片哗然。许多考生不服，纷纷“上访”。

这事传到顺治耳朵里，令他勃然大怒，要求吏部和都察院对此事追查到底。顺治帝当时发出了这样的呼声：“若不重加惩治，如何惩戒将来？”

案子一查，揪出了一大堆。一些证据确凿的行贿学生立即享受到斩首的待遇，而且家产籍没，家人被发配到边远地区。

几个主考官先放在一边，待会儿再审。这个科场案非常不公平的是，顺治并没有将考官斩首，只是降级处分。这是不公平的，但是他解决问题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顺治亲自主持复试，由此可见他对

教育的重视，最终顺治选择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

顺天科场案刚刚平息，又出现了江南科场舞弊案。

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江南科场案被人捅了出来。江南科场案作弊者更多，榜单公布后考生一片哗然。主考官离开之时，一些考生跟在后面大骂，甚至有人向主考官扔石头。许多学子写诗讽刺主考官方犹和钱开宗，有的才子不惜撰写传奇，揭露考场内幕，这些诗文很快就流传到京城，惊动了顺治皇帝。

工科给事中阴应节上奏：“江南考场上，舞弊太多，发榜后士卒愤愤不平，不少人在文庙前哭泣，有的还殴打考官，议论纷纷……”

顺治帝立即将考官方犹和钱开宗革职，押到京城审问。对于江南的举人，顺治帝亲自在西苑瀛台主持复试。在复试中有十四个文理不通者被革去举人，在这些文理不通者中，居然有著名诗人吴兆骞。吴兆骞绝对是一个才子，他通过乡试确实是凭着真才实学。那为什么顺治帝认为他文理不通呢？说来，也是这个才子心理素质不行，在皇帝面前他非常紧张，发挥失常，连话都说不清楚，自然文理不通了。

心理素质不好常常会吃闷亏，吴兆骞因为发挥失常，顺治帝误认为他是通过作弊过关的，将他流放到宁古塔。直到康熙二十年，在纳兰性德的平反下，吴兆骞才被赦免，重新回到京城。

顺治帝对江南科场案进行了严厉的查处，主考官方犹、钱开宗斩立决，其他十五名考官也被处以绞刑，家产充公，妻子儿女没入官。一些作弊的举人被重打四十大板，没收家产，并和家人一起流放到宁古塔。

顺治对科场案非常重视，这在今天看来是无法理解的，现在考试作弊实在是太普遍了，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重视科举制度的公平性，不光是维护皇权，也是维护广大下层人民的利益。一旦科举腐败，草根阶层想要向上流通实在太难了。顺治的处罚虽然重了点，但他的做法无疑是深得人心的。

顺治非常明白，科举关系到吏治，而吏治决定国家的兴亡。基于这样一种思想，顺治多次借科场作弊案告诫文武百官，一定不要徇私舞弊，否则有损国家。为了确保科场的公平性，顺治多次修改科场条例。

尽管顺治一厢情愿要杜绝科场舞弊，但是面对利益的诱惑，严刑峻法从来都是无力的。科场黑暗一直伴随着清朝的灭亡。

奏销案

顺治十六年，酷吏朱国治就任江宁巡抚。朱国治既是一个酷吏，又是一个贪官。他上任后，立即风风火火开始清查积欠的赋粮。第二年，朱国治在嘉定捉拿了几十名欠粮的乡绅。又过了一年，朱国治弄好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上一共有13517人，全都是“逃税分子”；此外，朱国治还提交了254名衙役名单，这些人要么办事不力，要么跟地方勾结，朱国治主张从严处置。

也许我们会觉得朱国治这个人真不错，办事非常有效率。客观地说，这个人绝对是有办事能力的，否则皇帝也不会派他去。

朱国治办事固然有效率，但是效率太高不免也会让人起疑。事实上，在朱国治的名册中，确实有一些“逃税避税”的土豪劣绅，还有一些是已经交了赋粮，但是政府忘了注销的。自古以来，中国政府部门办事就是拖拖拉拉，粗枝大叶，像这种别人已经补交了的，你忘了注销，现在又来问你要钱要粮，这是多冤的事啊，政府不作为，让老百姓为这个不作为埋单。名单中还有一部分人没有欠粮，但是因为得罪了小吏，小吏故意写他欠了。总之，里面的问题非常复杂，如果不去细细侦查，肯定会制造冤假错案。

朱国治把名单递上去后，朝廷不分青红皂白，下令不问官职大小，不管欠了多少，一律革职查办。这件案子在清初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就是名噪一时的奏销案。

探花叶方蔼因为欠赋米一厘而被革职，所以民间流传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说法。清廷这么严厉地对待奏销案，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借机打击江南缙绅阶层，江南地区是反清最为激烈的地区。清军当政之后，蓄意打击江南也是可以理解的。

朝廷开始放话，把这些欠粮分子全部押解到北京。这个命令一出，江南人心惶惶，达到了朝廷想要的效果。接着朝廷又放宽命令，限定到某某日子，如果能够完成纳粮可以免于提解。这命令一发出，大家赶快筹银子筹粮，实在没钱的可以借贷。当时，唯一借贷的地方是清兵军营，俗称借营债，利息相当高。许多人因为借贷搞得倾家荡产。

所以，我们大可以怀疑，所谓的奏销案很可能是清廷蓄意打击江南大户人家的一个阴谋。在奏销案中，许多明代的世家大姓破产，成为平民百姓，有的世家子弟从此和科举无缘。一些被褫夺功名的读书人更是前途尽毁，对人生感到绝望。

前面说到的那个江南探花叶方蔼，明显就是被冤枉的，作为一个探花，他不至于穷到交不起一厘的税吧，事实上他是被人陷害的。直到康熙铲除鳌拜后，才给叶方蔼平反，将他重新召到宫中。

哭庙案

说起哭庙案，不能不提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金圣叹。

金圣叹是钱谦益的外甥，明亡后改名金人瑞，同舅父一样，金圣叹也是个闻名于世的大才子，与舅父不同的是，他非常注重气节。其为人固然狂放不羁，品行却高洁不可辱。

有一次钱谦益过生日，金圣叹迫于母命，不得不给钱谦益写祝寿词，结果金圣叹送给钱谦益一副对联：“一个文官小花脸，三朝元老大奸臣。”

金圣叹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时人多认为金圣叹是一奇才，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并不在创作方面，而是在文学批评这块。他对《水浒传》《西厢记》等书的评点堪称批评典范。

顺治十八年（1661年）初，顺治帝驾崩，根据礼制，皇帝死后，全国人民都要默哀。消息传到苏州，苏州巡抚朱国治立即组织各级政府设堂哭灵。苏州的文庙里设有灵堂，老百姓可以在这里哀悼。

对死人的怀念往往可以变成对活人的痛恨。

三月四日，金圣叹、倪用宾等人率领一百多儒生在文庙里哭灵，哭着哭着，大家跑偏了主题，开始咒骂县官任维初。金圣叹草拟了一份哀悼顺治皇帝的哭庙文，亲手击鼓，许多百姓前来观看。接着，这些读书人就跟大家说如果不弹劾贪赃枉法的任维初，大家以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秀才们带着群众来到苏州府衙门口，江苏巡抚朱国治、按臣张凤起、道臣王纪等地方高官都在衙门里。秀才们跪着进衙门哭顺治，门外的群众有上千人，群众的情绪很强烈，都在高喊着“打倒知县”。朱国治担心群众发生暴动，很紧张，便让衙役逮捕带头的人。抓捕了十一人后，群众一哄而散。

事实上，哭庙案可以算是奏销案的余波。朱国治来到江南后，不顾苏州许多地方出现灾荒，强行催逼钱粮，老百姓称他为“朱白地”，意思是他所到之处，都要被搜刮，只留下一片空白的土地。1661年，任维初出任吴县知县，他来了以后，秉承朱国治的风格，不

惜用一切手段催逼钱粮，有一些人在他的大刑之下死去。

如果任维初是依法办事的话，最多只能让人痛骂一句：“太残忍，毫无人性”。关键是任维初并不是张汤那样的酷吏，他一边对老百姓用刑，一边将粮仓中的粮中饱私囊，然后又公然把这些粮食转卖给老百姓。正好，吴县的人民借着为顺治哭丧的机会，痛斥任维初。

朱国治歪曲事实，给皇帝上了一道疏，痛斥哭庙秀才的三大罪状：一、鸣钟击鼓，号哭抗粮，震惊了先帝的灵位；二、目无朝廷；三、擅写匿名揭帖，触犯了大清律令。

三月二十一日，清廷派出满洲官员郎叶尼到江宁会审。江宁会审一开始，朱国治又将同情和支持哭庙行动的书生顾予咸、程翼苍、朱嘉遇、薛尔长等九人也株连在内，程翼苍又供出了金圣叹和丁子伟。

奇怪的是，金圣叹被牵连后，突然就变成了案子的主犯，受到严刑拷打。案子审讯下来的结果是，哭庙中的十八个秀才被全部处斩。临刑之前，金圣叹一边喝酒一边笑道：“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金圣叹是一个幽默的大师，据说在监狱里等着杀头的时候，他把狱卒叫来，说有要事相告。狱卒久仰金圣叹的大名，以为大师有什么天大的秘密要告诉自己，便拿起笔墨等着金圣叹写下来。金圣叹指着狱卒给他的饭菜说：“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狱卒顿时觉得这位大师真的很幽默，这个狱卒想不到的是，金圣叹很有超前意识，这个秘方放到现代是可以制造一种新食品的。

传说金圣叹有两个儿子，小名梨儿和莲子，行刑之前，两个儿子望着即将诀别的父亲，泪流满面。金圣叹对他们说：“哭有何益，不如我给你们出个对联吧！”

虽然马上砍头，金圣叹依旧从容不迫，文思敏捷，他说出上联：“莲子心中苦。”

两个儿子哪有心思对对联啊，金圣叹看他们黯然神伤的样子，说道：“好了，别难过了，我帮你们对下联吧：梨儿腹中酸！”

“莲”与“怜”同音，“梨”与“离”同音，行将就戮的金圣叹仍然才华横溢，如此淡定，这样的境界确实让人佩服，让人想起了阿基米德。

至于酷吏朱国治，下场更惨。奏销案和哭庙案之后，朱国治自知做得太过分，老百姓对自己恨之入骨。后来，他家中有丧事，按理要回家守丧。朱国治很担心失去权力后会遭到报复，在新任巡抚还没有

到来之前，他就提前离开。结果这事被言官参了一本，说他擅离职守，朝廷将他革职。几年后，朱国治才复出，到云南做官，刚巧碰上吴三桂反清，朱国治牵连其中，因克扣军饷被将士们烹杀，尸骨无存。

庄氏史狱

明末清初，很流行民间修史。当时，明帝国已亡，政局不稳，本来应由官方史书承载的任务落到了民间史学家的头上。庄廷鑑的《明史辑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

其实，《明史辑略》的原作者并不是庄廷鑑，虽然这本书确实是由庄廷鑑出钱出力编纂的，但最早的作者是前明大学士朱国桢。

朱国桢，浙江人，万历年间进士。天启年，朱国桢当上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级别已经相当于宰相。所谓树大招风，高位没待多久，奸党就弹劾他。于是朱国桢决定告老还乡，不理朝中纷争。

回家之后没事干，朱国桢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模仿司马迁的《史记》写一部明史。在这部史书里，朱国桢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并以朱史氏为名发表了大量的评论。遗憾的是，这本书还没有完全竣工，朱国桢就逝世了。朱国桢做官比较清廉，随着他的逝世，朱家的家境渐渐衰落。迫于生计，朱国桢的后人将这部《明书》以一千两的白银卖给了同乡庄允城。

庄允城真是花钱买罪受。庄允城是一个富商，商人怎么会买罪受呢？原因是不懂政治。

庄允城也是望子成龙心切，他的儿子庄廷鑑从小就很有才华，可惜眼睛瞎了。庄允城想起《史记》中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经常以此勉励儿子。他所以花重金买下这本《明史》，也是希望儿子能够流芳百世。

庄廷鑑以朱国桢的《明书》为蓝本，再参考其他一些资料，招揽宾客，共同编纂明朝史书，后取名为《明史辑略》，共一百多卷。

庄廷鑑确实希望通过这本书名垂后世，他投入了极大的心血。书成之后，他邀请了本地的知名学者、崇祯年间的进士李令哲为这本书作序。为了进一步扩大书的影响力，他还邀请当时的一些名人参与修订此书，并将他们的名字写在书的前面，庄廷鑑是一番好意，万万没想到害死了这些人。

顺治十七年，这本书终于正式刊印出版了，没过多久，庄廷鑑就去世了。商人庄允城非常悲痛，为了纪念儿子，他大量刊印此书。当时，庄允城出版这书丝毫没打算赚钱，他花费重金推广这书，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儿子，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庄允城万万没有想到，死神正等着他。这便是清初最大的文字狱——庄氏史狱。庄氏史狱给几十人带来了杀身之祸，甚至连几岁的小孩都不能幸免，可以想象这个案子有多么严酷。但是，离奇的是，有三家同样受到牵连却得以幸免，不但幸免，还分到了庄家的一些财产。这又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三个逢凶化吉的人分别是查伊璜、范骧和陆圻。查伊璜就是金庸的祖先，浙江海宁人，崇祯时候中举，参加过南明鲁王政权的反清活动，失败后在家当老师。查伊璜、范骧和陆圻都是当时江南的名士，和庄廷鑑是同乡。庄廷鑑把他们的名字也放在书的前面，本来他们也没在意。

顺治十八年，一次聚餐中，三位文人雅士谈到了此事，范骧取来一本《明史辑略》给查、陆二人看。查、陆二人啧啧满意，说：“我们参阅，上面有名。”说明，最开始这三人对此还是满意的。

但是没过多久，这三人忽然将庄廷鑑告到官府，说庄廷鑑没有经过他们同意擅自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封面上。这三位名士的态度怎么转变得这么快呢？其中必有隐情。

隐情并不复杂。范骧有一个朋友，叫周亮工，这个人在清朝当过布政司，还做过户部侍郎，后来得罪了领导被解职。当看到范骧的名字位列《明史辑略》的参订人里，以他对清廷的了解，他觉得很不受。他说虽然书中记载的是事实，但是很多地方用词大不敬，所以他建议范骧向官府检举。

这三位名士便向官府检举，官府人员却说：“文章之事，不便备案。”显然，已经被庄允城买通。康熙元年，严州司理认为这事关系重大，便拿着稿子去问学道胡尚衡的意见。胡尚衡根本不当一回事，严州司理便让湖州府调查此事。

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听到这事，邀功心切，花了六两银子买了一本《明史辑略》，让自己的两个学生认真查看，想浑水摸鱼，自己都不肯动手，这样的教授也够懒的。这两个学生从中挑出了几十处“大逆不道”的文字，赵君宋将这些文字记录下来，准备上报邀功。没想到，庄允城得到这个消息，早已到官府打点完毕。

庄允城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

没想到，灾难只是还没有露面而已。李廷枢是顺治年间的进士，在浙江粮道工作时，因为贪污受贿分赃不均与归安县县令吴之荣相互揭发，最后两个人都判了绞刑。在监狱里待了六年，相当于死缓性质。恰逢顺治十六年，朝廷下来了一个大赦的诏书，两人才出狱。六年的监狱生活，让两人化敌为友，而且还互相联姻。

李廷枢以前是湖州知府陈永命的主考，相当于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古代官场是比较可靠的。李廷枢听说有人告发庄廷鑑，不想落人之后，赶紧买了一本，唆使陈永命一起去勒索庄允城。庄允城知道后，给陈永命送去几千两银子。陈永命拿到银子后，追回《明史辑略》书版，劈碎烧毁。李廷枢没想到，陈永命真不是个好学生，拿到银子后，一个都不给自己这老师。

李廷枢很生气，他把这本书交给自己的亲家吴之荣，希望吴之荣能够敲诈一笔钱。吴之荣是旗人出身，他很清楚满洲人忌讳什么，拿到书本一看，吴之荣就喜上心头。最开始，吴之荣并没有想置人于死地，只是想勒索一笔钱。

吴之荣登门造访，庄允城不理他。吴之荣看庄允城不买账，便向浙江将军柯奎告状，柯奎是满洲人。吴之荣对他说：“庄氏是巨富，可以狠狠地敲诈一笔。”结果，庄允城给柯奎送了一笔巨资，可惜柯奎一分钱都没有给吴之荣，估计是庄允城在背后故意这么叮嘱他：不要给吴之荣这个小人一分钱。

吴之荣非常气愤，庄允城这是明摆着看不起自己，给谁都送钱偏不给自己。怒从心里来，恶向胆边生。吴之荣再次翻了翻书，看着书中这么多犯忌的地方，发出恶毒的笑意。吴之荣心想，庄允城，我就不信告不倒你，你的书里面对清朝皇帝的先祖直呼其名，就凭这一点也可以治你死罪；还有，在书里面，对于努尔哈赤的崛起，你却站在明朝的立场，用“兹患”这样的词语，要知道，清廷一直很自豪地称这是“龙兴”；对于明朝和清朝的战争，你这本书完全是站在明朝的角度，对于明朝的失败，非常痛惜，对于清朝的失败则喜形于色，反政府的立场也未免太鲜明了吧！

吴之荣虽然产生了恶意，但他毕竟只是一个贪财的人，并不是大奸大恶十恶不赦之徒。他又厚着脸皮来到庄允城的府上，卑躬屈膝地说，只要你给我一些银子，让我有个台阶下，这事情就解决了。庄允城是牛脾气，他就是不答应吴之荣，这让吴之荣感觉无地自容。庄允城实在讨厌吴之荣，买通了本地守道，控告吴之荣敲诈勒索，守道立刻派兵将吴之荣赶出境。

吴之荣多方活动，敲诈无门。无奈之下，他转而敲诈《明史辑

略》的出版人朱佑明，在敲诈方面，吴之荣绝对是个锲而不舍的典型，换作别人，经历这么多失败早已放弃。

朱佑明也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大商人，他曾经购买了一间豪宅，并花费重金买下朱国桢的匾额“清美堂”。朱佑明将这块匾挂在家中的正堂上，颇为自得。应该说，朱佑明从身上拔一根毛也能满足吴之荣的需求。但朱佑明就是不拔，朱佑明当然不是什么铁公鸡，他只是瞧不起吴之荣这样的小人。吴之荣的本来就已经很低的自尊心再一次受到严重的伤害，这一次他被朱佑明撵到吴江去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之荣铁了心，要报多次被撵之仇。以前是为了银子，现在是为了尊严。吴之荣知道向省里告是没有用的，这些人都被庄允城买通了，现在唯一的途径就是进京上访。吴之荣将书中犯忌的字句全部摘录下来，并将书中原指朱国桢的“朱史氏”下面添刻“即朱佑明”等字，就这样，吴之荣揣着全部“犯罪事实”来到北京。小官吴之荣当然没法见到皇上，他首先向刑部控告朱、庄两家。

你还真别说，这个案子一到北京就引起了高度重视。为啥呢？北京是政治中心，是皇亲国戚待的地方，地方上认为是小问题到这里就是大问题了。

清朝统治者自打入关后就没有睡过一天踏实觉，他们很清楚，入关容易守城难。汉人向来视周边少数民族为夷狄，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现在你统治他们，他们心里肯定不舒服。而且，汉人一向以自身的文化为自豪，清朝文化在他们眼里就跟现在朝鲜在我们眼里差不多。对清朝最不满，最为看不起清朝的就是江南的那些贵族和文人，这些人借着文学交流的机会，动辄写诗讽刺我们英明的统治者。顺治皇帝虽然不好相处，但也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皇帝，他很早就下令禁止文人自由结社。为了打击这些文人，朝廷不惜制造冤假错案。

庄氏史狱发生在顺治年间，最后是在康熙朝结案。康熙元年十一月，刑部派满族官员罗多到湖州调查。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救得了庄允城了，皇帝不差钱，所以贿赂不管用。经过一番初步的审理，庄允城和朱佑明就被押解到北京，打入刑部监狱。

我相信，在监狱中庄允城一定非常后悔得罪小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庄允城就病死在监狱里。朱佑明在监狱里碰巧和赵君宋关在一起，朱佑明知道赵君宋是最先告发庄氏史狱的，便对赵君宋说，只要你替我掩饰，我出狱后给你一半的家产。审讯过程中，赵君宋说自己家中有原版的《明史辑略》，在原版的《明史辑略》中没有“即朱佑明”这样的字，没想到的是这不但没有挽回朱佑明的生命，反而搭上了更多无辜的生命。

这吴之荣上京告朱、庄两家，是因为敲竹杠受了侮辱，跟那些参与修订作序的人无冤无仇，况且他和参与作序的李令皙还是好朋友，他绝对不想自己的朋友受到牵连。所以，吴之荣在向刑部检举之前，已经把书中记载序文和参与修订者那几页给撕掉了。本来，这些人有可能不会受到牵连。但是赵君宋供出自己家中有原版的《明史辑略》，一下子就把整个案子扩大化了。

当时康熙还是一个小孩子，做不了主，台面上是四个辅政大臣拿主意，台下是孝庄在幕后操作。不管是四个辅政大臣还是孝庄，对汉人都是没多少好感的。四大臣以皇帝的名义将朱、庄两家人和参与修订的人及其父兄子侄，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全部处死。被处死的有七十多人，其中被凌迟的有十八人。这些人的妻妾孩子，全部发配功臣做家奴。

据说康熙二年正月二十日早上，湖州城城门紧闭，八旗官兵到庄氏史狱受牵连的人家中捉人，只要是涉及的人，家里的大小人口，包括奴婢，全部被抓。仅李令皙一家就抓了一百多人，当时正值新年，许多人到李家拜年，荒唐的是，连这些拜年的人都没能幸免，也被抓了起来。

庄廷鑑虽然在案发之前就已经去世，但由于是主犯，也没能逃脱惩罚。惩罚的方式是开棺碎尸，捣毁墓碑。清廷借着庄氏史狱打击那些对清朝不满的人，为了增强这种震慑力，凡是《明史辑略》中提到的人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全部锒铛入狱。不仅如此，连刻板、印刷、校对的人都不放过。更有甚者，连买书、看书、藏书的人也受到株连，这一案件，受牵连的人达到两千多。

庄氏史狱固然有吴之荣这样的小人推波助澜，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清政府对于思想的残酷禁锢。一个统治阶级，尤其是像清朝这样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统治阶级，它的政权根基是很不牢固的，所以高压政策便是统治阶级的不二选择。

有清一朝，中国一度非常强大，康乾时期中国领土面积达到历史上的峰值，十二清帝也都不是什么昏庸的皇帝。但强大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整个清朝，国民奴性最重，思想和个性都被压抑得相当严重；直到晚清时，这种情况才得到了改观。

清朝与其说是败在列强手中，不如说是败在自身的僵化腐朽中，专制独裁终究不是强国之道。

康熙大帝 大清风云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鹿鼎公子 著



叁

比野史
更靠谱

智擒鳌拜、削平三藩、抗击沙俄、统一台湾
再现文韬武略、鲜活生动的千古一帝
因祸得福、少年天子、九龙夺嫡、文字狱案
盛世背后隐藏了多少帝王心术和寂寞悲凉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比正史
更有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风云.3, 康熙大帝/鹿鼎公子著.—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93-7307-1

I.①大... II.①鹿... III.①中国历史 - 清代 - 通俗读物
IV.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4236号

责任编辑: 胡 艺 (ngaihu@gmail.com)
计: 古润文化

封面设计

大清风云: 康熙大帝

DAQING FENGYUN: KANGXI DADI

著者/鹿鼎公子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32
数/268千

印张/8.25 字

版次/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093-7307-1

定价: 29.8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值班电话: 010-66026508

邮政编码100031

传真: 010-66031119

网址: <http://www.zgfzs.com>
010-66034985

编辑部电话: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66033393
010-66033288

邮购部电话: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清朝皇帝列表

姓名	庙号	年号	谥号	在位时间	皇陵
努尔哈赤	太祖	天命	高皇帝	1616—1626 年	福陵
皇太极	太宗	天聪 崇德	文皇帝	1626—1643 年	昭陵
福临	世祖	顺治	章皇帝	1643—1661 年	孝陵
玄烨	圣祖	康熙	仁皇帝	1661—1722 年	景陵
胤禩	世宗	雍正	宪皇帝	1722—1735 年	泰陵
弘历	高宗	乾隆	纯皇帝	1735—1795 年	裕陵
颙琰	仁宗	嘉庆	睿皇帝	1796—1820 年	昌陵
旻宁	宣宗	道光	成皇帝	1820—1850 年	慕陵
奕訢	文宗	咸丰	显皇帝	1850—1861 年	定陵
载淳	穆宗	同治	毅皇帝	1861—1875 年	惠陵
载湉	德宗	光绪	景皇帝	1875—1908 年	崇陵
溥仪	逊帝	宣统	—	1908—1912 年	华龙陵园



康熙帝读书像

《康熙帝读书像》轴为观者展示了大有作为的君主勤勉苦读的一面。图中康熙帝盘腿端坐，凝神静思，仿佛正在深思书中精华。身后书盈满架，排放齐整，传达出像主涉猎广泛、勤勉好学的信息。纵观全图，宫廷画家显然受到了欧洲绘画技法的影响，这反映出中国画家正在初步尝试用一种外来的艺术技巧创作本国题材的绘画，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青花万“寿”字大尊

康熙青花瓷器的最显著特点是造型挺拔，胎体坚缜，釉面莹亮，俗称“紧皮亮釉”，青花发色靓丽明翠，被推为清代青花瓷器之冠。此尊通体以青花书写“寿”字，分布于口、沿、腹、足四个部位，总共一万个“寿”字，寓意“万寿无疆”，是康熙皇帝过万寿节（诞辰）时，御窑厂敬献的礼品。

尊上的“寿”字，全部采用不同书体的篆字书写，排列整齐，纵横成行，字体大小肥瘦随器身的凹凸曲折而加大或缩小，顺畅自然，体现了制瓷艺人的匠心，只有经过丝毫不差的缜密安排才能写成整整一万个“寿”字，而且字字工整，使整个器物显得庄重非凡。



《山水花卉神品·牡丹》

恽寿平（1633—1690年），初名格，字寿平，号南田，又号云溪外史、白云外史，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清代著名画家。初工山水，笔墨秀峭，后多作花卉，重视写生，往往用水墨淡彩，清润明丽，自成一格，有“恽派”之称。人称其笔有仙气，与王时敏、王鉴、王翥、王原祁、吴历齐名，为“清初六大家”之一。

释文：

吹罢琼箫咽凤尘，粉痕暗减镜中春。低垂翠袖红妆侧，舞倦龙绡一美人。

雨過高天雪晚晴
山迢遞月明中
春風寒
寒以楊柳搖曳
寒光度遠空

柳條邊望月

释文：

雨过高天霁晚虹，关山迢递月明中。春风寂寂吹杨柳，摇曳寒光度远空。
玄烨自幼好读书，留心翰墨，对董其昌书法尤为推崇，其传世的书法作品大都以学董字为主。他在老师沈荃的指授下刻意临摹，使董字风靡朝野。玄烨此书在学董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审美意趣，书法笔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疏朗匀称，体现出闲适、自然的情趣，代表了其书法艺术成熟时期的水平。

总序

清史洋洋洒洒近三百年，三百年间怪事、奇事、惨事、恨事迭出，三百年年年都精彩，年年都有挥之不去的喜怒哀乐。整个清朝三百年，几乎囊括了人性中一切的极端面，三百年，道不尽的风云爱恨。

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骑兵，建立了后金，身后留下了无数的尸体，最终倒在宁远城下，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书生袁崇焕手中，就此郁郁而终，这是上天对一个暴力征服者的最大讽刺。随后，努尔哈赤诸子开始斗智斗勇，最后皇太极靠谋略成为老大。

皇太极穷其一生精力都在与明朝对抗，不幸暴毙后，大清国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多尔衮与豪格之争最终便宜了顺治。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后，成为皇父摄政王，将全国军政大权操于一身，顺治完全被架空。此时，孝庄和顺治母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危难关头，孝庄舍身保大清，稳住多尔衮，终于使大清逃过这一劫。

顺治是个痴情天子，亲政后喜欢跟母亲孝庄闹不愉快，结果自己和董鄂妃双双去世。康熙继位时才八岁，不过这是个早熟的孩子，也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很早就懂得帝王之术。在别人还是懵懂少年时，他就已经像个猎人一样盯紧了鳌拜，除掉鳌拜之后，康熙开始了自己雄才大略的一生。

康熙治国和外交不外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所以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鳌拜，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荡平准噶尔，击退沙俄侵略……在整个清朝，帝王之术在康熙手中达到顶峰。

然而，康熙也有缺点，他的法度不够严明，治国主要是依靠儒术和道术。雍正虽然上位不明不白，但当皇帝后弥补了康熙的缺点，雍正治国理念上最大限度地奉行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乾隆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他继位后，废除雍正的依法治国思路，重新走康熙的路子。但乾隆并不懂康熙真正的治国精髓，结果变成了外用儒术、内用权术，所以清朝在乾隆时期开始走向衰落。

自乾隆后期，动乱纷起，尤其是白莲教叛乱几乎烧遍整个中国。到了嘉庆手中，国家元气已大伤，嘉庆虽然是个仁君，可惜终究没有先祖那份雄才。他虽然减缓了国家的衰颓，但始终没能重振大清的雄风。到了道光手中，国家就更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欺负得

够呛，国内的动乱更是风起云涌。

咸丰就更悲剧了，太平天国和天地会起义，全国天翻地覆。更糟的是八国联军来了，他连个京城都保不住，年仅三十岁便郁郁而去。咸丰死后，朝政大权掌握在“龙夫人”慈禧手中，国家每况愈下，虽然中途出现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可惜终究是昙花一现。

清末虽然出现了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袁世凯这样的中兴名臣，但亡局已定，神仙也不能力挽狂澜。最终，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千古帝王，悠悠万事，功过自有百姓言，清朝这些事儿，就交给读者去慢慢品味吧！

序言

提起康熙，有人说他是千古一帝，有人说他是罕有的圣王。不过说真的，康熙确实是清朝最出色的一个帝王，他的一生，守成固然不是问题，开疆拓土更是奠定了大清辽阔的版图。

康熙小时候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孩子，孜孜不倦地学习儒家的经典。在骑射方面，康熙的成绩也非常不错。在政治上，康熙就更早熟了，十四岁便用计擒拿鳌拜，铲除了心腹大患。

在二十岁的时候，康熙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撤藩。这个决定引发了八年动乱，虽然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也差一点让大清国走向灭亡。事后，康熙也认识到这个决策过于冲动鲁莽，因此在治国方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

康熙是一个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皇帝，随着执政经验的积累，治国和用人才能逐渐臻于化境。施琅原是台湾郑芝龙手下的一员海军大将，后来与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发生矛盾，郑成功杀了他父亲，他不得已投降清朝。投降清朝后，施琅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收复台湾时，康熙想到了这个人，冒险一用，施琅果然不负所望，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收复了台湾。

后来，俄罗斯人不识趣，侵犯清朝边境。康熙恩威并施，既击败外敌的侵略，又没有将军事行动升级为侵略行为，打得俄罗斯人心服口服，与清朝签订《尼布楚条约》，换来了边境一百多年的和平。在康熙的对外手腕中，明眼人能感觉到其中的黄老之术，不卑不亢，刚柔并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动武，总是先示人以仁义，人不知好歹，最后才以武力取胜。

康熙对付草原枭雄噶尔丹就更加精彩了，他对噶尔丹的政策是欲擒故纵，让噶尔丹自己走向不仁不义的不归路。最后，康熙力排众议，三次亲征，终于击垮噶尔丹。噶尔丹被击垮后，西北一带的各方势力都臣服在清政府的威权下。

西藏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事实上，在康熙之前，西藏虽然与清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名义上并不属于清廷的版图。西藏发生叛乱之后，出现了“真假达赖”之争，康熙派军队入藏平叛，设立军政府，对西藏政府进行改组。从此以后，清政府在西藏设立驻藏军队，西藏成为大清版图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皇帝，康熙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他身上有着太多的悲剧。他最爱的是原配孝诚仁皇后，但孝诚仁皇后只活了二十岁。孝诚仁皇后的儿子胤初很早就被立为太子，在众多皇子中，康熙对胤初的爱最为深厚。可惜，偏偏这个胤初是个忤逆不孝的儿子，当了近四十年的太子，时时盼望康熙早日归天。

康熙对这个儿子爱之深恨之切，两废两立，可惜太子终究是朽木难雕。最后直到康熙逝世，他都没有确立继承人。所以雍正即位之后，世人多传说他是弑父夺嫡。这对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来说，确实是一个大悲剧，然而人无完人，我们又怎么能苛求康熙呢？

目 录

总序

序言

第一章 康熙来了

康熙降临

晨钟暮鼓——康熙的读书生涯

少年天子

四大辅政大臣

鳌拜执牛耳

智除鳌拜

幕后高人

第二章 削藩——帝国最惊险的时刻

帝国身上的三颗大肿瘤

假戏真做

愤怒的吴三桂

丧钟为谁而鸣

康熙的补救措施

隔江对峙

耿精忠的失败

尚之信的叛降

吴三桂的败亡路

第三章 康熙妙手取台湾

台湾大佬郑经

姚启圣和施琅比赛收复台湾

台湾回归祖国怀抱

第四章 寸土必争——康熙大战沙俄

罗刹来了

雅克萨之战

《尼布楚条约》

第五章 大漠孤烟马蹄疾——康熙亲征噶尔丹

噶尔丹是何方神圣

大漠锋镝，康熙首征噶尔丹

灭其主力，康熙第二次亲征

强敌灰飞烟灭

第六章 西藏，神秘的地方

当年西藏

真假达赖

入藏平叛

第七章 康熙的治国之道

重视民生，反对拆迁，鼓励垦荒

重商节俭，德法兼顾

正本清源——康熙的管理之术

第八章 家事更比国事烦

皇帝好做，父亲难做

太子党风云

太子疯了

争储夺位

太子复位

再度被废

“朱天保”上奏之密

第九章 康熙朝悬案

妖人案

“大内密探”江南织造

南山案

朱三太子案

第十章 康熙之死与雍正继位

韬晦大师

权谋之路

康熙之死，雍正继位

第一章 康熙来了

康熙十六岁，亲政不满两年，用现在的话说还是一个花季少年。但是这个花季少年绝对没有心思去谈情说爱，卿卿我我，他的面前是一头巨大的老虎，他必须打掉这个老虎。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大清江山，或者是为祖母，他都不能逃避，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打掉这个老虎。

康熙降临

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清圣祖康熙降临人世。

康熙原名爱新觉罗·玄烨，是顺治的第三个儿子。康熙是满汉混血儿，他的母亲佟佳氏的祖先本是汉人。佟佳氏的父亲是固山额真佟图赖，先祖本是汉人，以经商为业。古代经商不像现在，可以注册一个公司，在一个固定的地点经营。古代经商总是要迁徙，全国各地奔走，佟家人就这样全国各地跑，最后在抚顺落脚。

我们知道抚顺是火线区，当时大明和后金这两家“公司”都在争夺抚顺。据说，佟氏的叔祖父养性倾向于后金这家后起之秀，暗中与努尔哈赤勾结，被明朝发现了，将他逮捕入狱。进了监狱后，养性玩起了真人版的越狱游戏。还真的越狱成功，之后投奔后金，得到努尔哈赤的赏识。

努尔哈赤对于投降的人从来都是欢迎的，为了表彰养性弃暗投明，努尔哈赤将宗女嫁给他。这样一来，养性就变成了努尔哈赤的亲戚，身价倍增。不久，养性的哥哥养真，也就是佟氏的祖父领着全族人投奔后金。

在皇太极时代，养性被提拔为汉人的昂邦章京，相当于明朝的总兵。也就是说，养性是汉人军队的总司令，这个总司令比后来的总司令权力还大，他不仅拥有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还有汉人的行政管理权。

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设立汉人八旗的时候，佟氏的父亲佟图赖升任正黄旗固山额真，相当于正黄旗的老总。清军入主中原时，佟图赖立功不小，所以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加封为太子太

保。官位的显赫，让佟家跟皇室的关系更加密切。佟图赖因此有机会将女儿嫁给顺治，佟佳氏嫁给顺治后，十五岁生下玄烨。虽然佟佳氏很少得到顺治的爱情滋润，但玄烨继承大统后，佟佳氏被尊为皇太后，也算是一个有福气的女人。

康熙也是个孝子，他当皇帝后，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心，将舅舅佟国纲率领的汉军提升为满洲镶黄旗。

所以说，康熙是一个标准的混血儿，混血儿的智商一般都比较高。

康熙的出身非常好，但他的生活也不完全是幸福的，首先他缺少母爱。根据清朝皇家规矩，皇子生下来后，生母不需过问，一律交给特定的保姆抚养，事实上很多朝代都有这种规定。这个规定虽然无情，但它真正的目的当然不是反对天伦之情，而是为了防患未然，以防后宫干政。事实上，康熙缺失的不仅是母爱，父爱也是少得可怜。顺治是个对家庭很不上心的人，不管是对妃嫔，还是对孩子，他都表现得非常冷淡。

康熙出生后就远离了生母，每隔几月母子才能见一次面。而且见面之后，约束很多，活生生就像探访监狱里的犯人，母亲不能跟子女过于亲密，孩子长大后，母亲不能跟孩子说太多的话。

清初流行天花，顺治就是因此而死。在康熙两岁的时候，为了躲避天花，乳母带他离开紫禁城，住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寺庙里。不过，康熙还是没有逃脱天花的侵袭，最终也感染了天花。幸运的是，康熙没有死，只是在脸上留下了麻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康熙后来当上皇帝还得感谢这次天花。

康熙晚年回顾幼时经历时曾说：“朕幼年时，为了避痘，跟着保姆离开紫禁城，没有在父母膝下享有一天的天伦之乐，现在想来深感遗憾。”

从感情上来说，乳母跟皇子之间的关系比生母更密切。乳母不光抚养皇子，还负有教育皇子的重任。所以在清朝皇室中，乳母的地位是很高的。如果皇子登上帝位，一般会加封乳母，不少乳母的家族就是因此而大富大贵，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家族就是这么起来的。

康熙的乳母孙氏是正白旗汉军一个下级军官曹玺的妻子，康熙即位后，封曹玺为江宁织造，孙氏为一品诰命夫人。曹玺死后，长子曹寅接替江宁织造的职位。康熙南巡的时候就是住在曹寅家里，有传言说江宁织造其实是大内密探，负责为康熙搜罗江南美女，同时收集地

方的信息。

晨钟暮鼓——康熙的读书生涯

离开乳母后，康熙主要是跟太监们玩耍，太监们既是他的仆人，又是他的玩伴。这时候，负责康熙教育责任的主要是祖母孝庄太皇太后。

孝庄自感在顺治身上的教育失败，所以对孙子们要求非常严格。康熙刚刚能够走路说话时，孝庄就着意按照帝王的标准训练他，饮食、言行、举止都有严格的要求。在康熙五岁的时候，孝庄让亲信侍女苏麻喇姑教他学习满语。

苏麻喇姑心灵手巧，知书达理，做事很有分寸。尽管是一个女人，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根据史料记载，苏麻喇姑要求非常严格，几乎是手把手地教康熙识字书写。所以，在现代影视作品中，苏麻喇姑居然和康熙玩起了恋爱游戏，这当然不太可能，苏麻喇姑至少比康熙大四十多岁。

八岁那年，康熙当上皇帝。孝庄以太皇太后的身份辅政，呕心沥血地把康熙教育成一个好皇帝。康熙十岁的时候，生母逝世，孝庄将康熙收养在慈宁宫，耳提面命，朝夕教诲。康熙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老祖母的教诲，断不至于有自己的今天。可见，孝庄对康熙的影响。

清初，对皇帝的要求非常严格。大家很明白，只有把皇子们培养成贤明能干的人才，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从幼年开始，皇子们就必须用功读书，锻炼身体，努力朝文武双全的方向发展。到了五岁，皇子们必须去上书房读书，由宫中专门聘请的师傅教授学问。这些师傅在皇帝的授意下，自然是秉着严师出高徒的宗旨，努力教出优秀学生。

一旦在钦天监上学后，皇子们必须按时上学，绝对不可以迟到旷课，否则会受到惩罚。在紫禁城的神武门上设有更鼓，五鼓打更的时候，皇子们就必须赶到上书房。这时候，天色微明，大家都在睡觉，即便是皇宫中，也只有少数供役的人在忙碌。皇子们就在太监的引领和敦促下，进入上书房，老师们早已等在那里正襟危坐。

老师教他们读书、写字、背诗文。到了中午，侍卫们给皇子送来午餐，吃完之后，继续学习。下午时候，侍卫会送来点心，吃完之后练习骑射，到了薄暮的时候，一天才算结束。可以说，这种学习强度

不比现在的高考生小，做皇子也不容易。

在众多皇子中，康熙不论读书还是骑射都是非常认真努力的。根据史书的记载，康熙每天读的书，一定要背下来，从来不肯欺骗自己，凡事都非常认真，巨细无遗。如果碰到不懂的地方，康熙一定请教老师或者同学，直到自己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绝不蒙混过关。

《清实录》记载，康熙五岁后，好学不倦，经常通宵达旦读书，对于帝王之道、圣贤心学和六经要旨等等，无不融会贯通，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在骑射方面也是这样，康熙曾经跟一个叫墨尔根的侍卫学习骑马射箭。康熙回忆说，墨尔根要求非常严格，只要有任何小的姿势或者方法不对，他就立刻指出来，一丝不苟。墨尔根认真负责的态度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让康熙学得一身精湛的骑术，更让他从这种训练中感受到了治国之道。

少年天子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这一天对大清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大清的CEO顺治帝因为染上天花，在养心殿驾崩。

第二天，北京实行全城戒严，文武百官全部待在紫禁城里听候命令。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忐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高层的安排总是神秘的，在事情没有公布之前是绝对不会让外界知道的。

一切都充满了悬念，谁将继承大统成为大家心里最好奇的问题。

初九，大家心中的谜底终于解开。三皇子玄烨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他身穿孝服在父亲灵前宣读告文，玄烨一出场，大家心里就有底了。行过三跪九叩之礼后，玄烨换上礼服，前往慈宁宫问安。

一切该走的程序都走过后，玄烨来到太和殿，宣布登上皇帝宝座。大家紧张的心情终于平复了下来，只见坐在龙椅上的玄烨宣读贺表，宣布天下大赦，并于第二年定为康熙元年。说到这里，得解释一下，新皇登基，只要不是通过谋反改朝换代，出于尊重先皇的原因，一定要第二年才能改元。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宋太宗赵光义，在宋太祖死后不久就改元太平兴国，正因为过于仓促，显得急不可耐，所以大家怀疑他弑兄篡位。

玄烨当上皇帝，很多人没有料到，因为玄烨是庶出，而且脸上有

星星点点的麻子，不太雅观。

顺治生前，跟他老爸一样，没有考虑继承人的问题。顺治最爱的女人是董鄂妃，原本想册立董鄂妃的儿子为太子，可惜这孩子死得太早。从此之后，顺治再也没有提及接班人的事情。

直到临死前，他才考虑这个问题，不过他并没有要把皇位传给玄烨的意思。临终前，顺治想把皇位传给堂兄弟，这个想法在汉族看来有点奇怪，但是在满族并不奇怪。满族最开始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努尔哈赤创立了和硕额真制度，这个制度其实就是削弱君权。而且中国自古就有“国赖长君”的说法，顺治的孩子们都太小，如果立小皇帝的话，他也担心多尔衮擅权的事情重演。

在顺治最后的几天里，召来了礼部侍郎王熙，让王熙记录他的临终诏书。王熙本来就很紧张，听到顺治的遗言更加紧张。这些遗言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事关重大，而且非常敏感。后来王熙三次篡改诏书，有人怀疑幕后指使者就是孝庄太后。

顺治到底跟王熙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王熙此后对此事绝口不提，把秘密带进坟墓里。

继承人问题关系的不只是个人问题，还是集团利益的问题，一个继承人后面是一个庞大的派系。顺治想立堂兄弟为帝，自然会引来以孝庄为首的势力不满，孝庄是一个保守谨慎的女人，绝不允许政治大洗牌的事情发生。在孝庄看来，政治洗牌即使不会引起动乱，至少也会引起震荡。

顺治想立堂兄弟，这个堂兄弟究竟是谁呢？

有人推测是和硕安和亲王岳乐，岳乐是努尔哈赤的孙子、阿巴泰的儿子，时年三十七岁。岳乐不光有政治资历，而且战功彪炳，更重要的是他一直都是顺治的支持者。换句话说，在顺治和孝庄唱对台戏的时候，他总是站在顺治这一边。从思想上来说，岳乐是一个开明派，积极主张汉化。

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在发往西方的报道中详细谈到了顺治想立堂兄弟之事，但是他也没提到这个堂兄弟的名字，我们不妨看看安文思是怎么写的：

堂兄弟看到皇帝行将就木，告辞请求允许他回家。但是皇帝的头脑仍然清醒，怀疑他要搞鬼，耍花招。一是由于他的年纪，二是他从来是他的左膀右臂。当他准备离去时，皇帝非常理智地对他说：堂兄啊，我现在已经快不行了，你还要走，不如留下来陪我吧。你就住在厢房里，晚上我还要与你共商国家大计，归天时，希望有你守在身

边。待王爷退入厢房后，皇帝召来了几位大臣，宣布儿子为其继承人，留下了遗嘱，便一命呜呼。对此，他的堂兄一无所知。只是早晨他叩拜新王时，他才得知此事。当时京城的大门都已经关闭了，城墙头和要地均由新王派遣的士兵守卫。在皇帝驾崩的当天晚上，四位大臣开始辅佐少年天子，统治整个帝国.....

从安文思的文字中，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当时发生的那一幕幕。顺治想传位给堂兄弟，让他待在皇宫里等消息。结果，孝庄传来的人马来到，篡改诏书，将皇位传给玄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孝庄实行戒严，将城门关闭，重兵把守，以防不测。

玄烨当上皇帝看起来无风无雨，波澜不惊，实际上帝国内部暗涌四起，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惊涛骇浪。久经风浪的孝庄将这一切控制在无声无息中，不愧是一个高明的政治操盘手。妙手控局，无风无雨。

孝庄是一个智慧的女人，她不仅稳定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还为帝国选了一个杰出的CEO。那时玄烨不过八岁，孝庄为什么会选中他呢？

当时备选的主要是皇二子福全和皇三子玄烨，这两人都是庶出。事实上，由于顺治对皇后很不感冒，顺治的孩子基本都是庶出，他没有跟任何皇后生下过一儿半女。

庶出不要紧，玄烨至少还得跟福全比一比，福全比他年长，这是福全的优势。但是，福全也有自己的劣势，首先一点就是，福全没有患天花，脸上没有麻子当然雅观一点。可是，当时满人对天花视若魔鬼，如果有一天福全不小心患上天花一命呜呼，这大清国岂不又要折腾一番。玄烨得过天花，所以汤若望说：“立玄烨啊，这孩子得过天花，以后命长着呢！”

如果认为玄烨当上皇帝完全是因为天花也不全对，玄烨也有个人素质方面的优势。

在玄烨五岁的时候，曾经和福全、常宁一起去向父皇问安。顺治不知为何，心血来潮，问这些小孩们将来有什么志向。常宁那时才三岁，连志向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自然无法回答，只能沉默。福全回答说：“愿意做一个贤王。”从福全的回答中，可以看出这个人没什么远大的志向。玄烨回答说：“我长大后一定要效法父皇，为国家竭忠尽力。”玄烨的话说得很漂亮，其实就是想当皇帝，大家都觉得这孩子不一般。

玄烨明显比其他孩子机警聪敏，孝庄选定他应该说是眼光的。

四大辅政大臣

大清以前是由摄政王辅政的，多尔衮的精彩表演让顺治寒透了心，最后弄得国家只知有摄政王不知有皇帝的地步。

为了避免历史重演，这次绝对不能再让亲王摄政了，孝庄为帝国挑选了四个辅政大臣。在这四个辅政大臣中，鳌拜虽然排名末位，却又是名声最大的。

第一个辅政大臣是索尼，索尼不是一个品牌，他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是清朝不折不扣的元老。努尔哈赤时代，他在文史馆工作，那时还非常年轻。皇太极时代，他混上三等甲喇章京，相当于明朝的游击将军。皇太极死后，索尼坚定支持立皇太极的后代为帝，多尔衮摄政后，找他麻烦，将他免死赎身。顺治亲政后，召回索尼，为了表彰他的忠诚，晋升他为一等世袭伯，并升任内大臣兼议政大臣。索尼是四朝元老，两朝顾命大臣，在四辅臣中列居首位，大家是没有意见的。

第二个辅政大臣是苏克萨哈，在四个辅政大臣中，苏克萨哈的出身最为特别，他是满洲正白旗人，以前是多尔衮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苏克萨哈的父亲苏纳一路跟随努尔哈赤出生入死，最后得到赏识，被努尔哈赤招为驸马。苏克萨哈凭借着这层身份，仕途一帆风顺，再加上他本人才干确实不错，在皇太极时候，他就当上三等甲喇章京。多尔衮摄政后，他混上议政大臣的职位，并晋升一等公。多尔衮逝世后，苏克萨哈又敏感地意识到政治风向的改变，及时告发多尔衮“阴谋篡逆”，因此受到顺治的重用，顺治提升他为镶白旗护军统领。后来在围剿农民军过程中，苏克萨哈晋升为领侍卫大臣，外加太子太保头衔。顺治弥留之际，苏克萨哈在皇帝床前泪流满面，表示要为顺治陪葬。顺治对他说：“你不知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帮助新皇治理国家是难事吗？”

苏克萨哈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当上第二辅政大臣我们一点也不奇怪。

第三个辅政大臣是遏必隆，遏必隆跟后来的大贪官和珅同姓，钮钴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遏必隆的父亲是清朝开国功臣额亦都，母亲是和硕公主。皇太极时代，遏必隆承袭一等昂邦章京，相当于明朝的总兵。多尔衮摄政后，遏必隆挨整了，被籍没一半家产，削职为民。顺治亲政后，遏必隆官复原职，还提升为一等公。没过多久，又荣登议政大臣行列，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头衔。

第四个辅政大臣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人物，这人名叫鳌拜。由于在现代的影视作品里，鳌拜出场的频率实在太高，所以大家都对他有个最基本的了解。无论在哪个电视电影里，鳌拜给人的感觉都是高大威猛、嚣张跋扈，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让我们从正史的角度来了解一下这个人。

鳌拜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鳌拜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可以说是皇太极的铁杆家将，从鳌拜的人生履历上看，这个人确实是个有实干才能的人。皇太极一路提拔他，从甲喇额真到三等梅勒章京，再到赐号巴图鲁（勇士），然后到一等梅勒章京、护军统领，最后到三等昂邦章京。鳌拜没有平步青云，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功劳一步步爬上去的。多尔衮摄政后，鳌拜好几次差点被整死，最后都被顺治救了。

现在的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大多把鳌拜这个人妖魔化了，看这些作品我们觉得鳌拜这个人简直是人神共愤，死一万次都不够。鳌拜没有这么可恨，鳌拜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元老。说鳌拜谋反的人完全是以讹传讹，但如果鳌拜没有谋反，为什么会落得那个下场？

鳌拜虽然没有谋反，但是擅权却是事实。鳌拜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人，性格咄咄逼人，即使他没有谋反的举动，性格和举止也构成了对皇权的挑战。康熙拿掉他也是情理之中。

我们来回顾一下鳌拜这个人在历届政治斗争中的表现吧！皇太极死后，多尔衮急欲染指最高权力，想坐稳龙椅。这时，皇太极的家臣们不同意了，说多尔衮你要这么干，就跟你玩命，其中态度最凶的就是鳌拜。史书记载，鳌拜这个人有勇无谋，大体应该是正确的。

鳌拜勇猛到了什么地步呢？据说他臂力骇人，一箭射到门楣上，十几个侍卫都拔不出这支箭。多尔衮摄政之后，鳌拜也老是跟他过不去，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鳌拜这人缺心眼。多尔衮很想干掉鳌拜，对多尔衮来说，干掉鳌拜并不是一件难事。

这不，有一次多尔衮翻查鳌拜的档案，发现鳌拜以前犯了一个错误，于是下令捉拿鳌拜，斩立决。眼看鳌拜就要人头落地，顺治听到消息，赶快过来，救了鳌拜一命。

总之，多尔衮找了鳌拜好几次，几次都准备斩了他，结果都被小顺治救了。我们说，鳌拜这个人命大。

可惜，顺治一死，鳌拜的霉运就来了，当然霉运来的时候还让人以为是好运。康熙是鳌拜宿命克星，康熙智擒鳌拜一直传为历史美谈，真实历史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一点。

鳌拜执牛耳

像鳌拜这种性格，绝对是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四位辅政大臣中，鳌拜垫底，心里肯定不会舒服。何况，排名第二的苏克萨哈是自己的死对头，不出一口恶气鳌拜实在不能罢休。

索尼年纪最大，虽然位居首位，但是精力不济，给人感觉没几个年头。索尼当然不会为了那点权力搞得自己晚年生活充满阴云，所以，索尼基本是不问世事的：你们去争吧，别干扰我的夕阳生活就行。遏必隆是个性格软弱的人，他也不会争权夺利，而是坚持明哲保身的主张。

剩下的两个就是苏克萨哈和鳌拜了，这两人都是厉害的角色。如果让两人在擂台上打一场，苏克萨哈肯定不是鳌拜的对手；但论起智谋，鳌拜又不是苏克萨哈的对手。政治斗的是什？大家一定会说是斗智，如果是这样的话，苏克萨哈似乎是必胜的。实际上，政治不完全是斗智，有时候也是斗狠斗势。所以，到底鹿死谁手一时半会还看不清。

孝庄安排这四个人组成一个集团是非常明智的，因为，毫无疑问，这四个人无法组成一个良好的团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一旦组成了团队，中间必定会出现一个领导者，这个领导者一旦出现就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只有这些人斗得死去活来，才能保证康熙亲政时候收回大权不会有太大的阻碍。

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苏克萨哈这个人头脑是非常灵活的，在四人中，他的智商是最高的。他善于交际，朝廷上下到处有他的死党，对于一些有才能的汉人，他非常虚心接纳，收到自己的门下。鳌拜想斗倒他，绝非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鳌拜也意识到这点，所以跟苏克萨哈结为儿女亲家。可惜，政治斗争你死我活，容不得半点亲情。

苏克萨哈的地位是不利的，其他三人都看他下。因为他以前是多尔衮的鹰犬，助纣为虐，其他三人都被多尔衮整得很惨。现在风水轮流转，三人当然希望能好好整一下苏克萨哈。

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孝庄想册立索尼的孙女为康熙皇后，苏克萨哈立即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特别搞笑，说这两人八字不合，不宜立她为皇后。索尼心里当然很不舒服，不过为了一个宁静的晚年，还是忍忍吧！

索尼可以忍，鳌拜就不能忍了。只有扳倒苏克萨哈，鳌拜才能走向个人权力的顶峰。

要扳倒一个人，得要有一个矛盾突破口。鳌拜选择的突破口是“易地案”。

清军入关后，曾经强行在京畿五百里内跑马圈地，分给王公贵族和功臣将士。圈地过程中难免涉及利益分配的问题，多尔袞当年想长期驻扎在永平，下令永平的地不能圈。这算什么性质的问题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搞特殊化，如果只是领导者一人搞特殊化，大家还能理解，你是领导没办法。但如果是整个利益集团搞特殊化呢？大家心里肯定不服气了，养一头老虎远远比养一大群狼要划算。

多尔袞把本该属于镶黄旗的好地段给了自己的正白旗，把不怎么好的地段给了镶黄旗。当时，引起了镶黄旗很多人的不满。多尔袞掌权的时候，不满没用。多尔袞死后，镶黄旗的人又开始嚷嚷，要夺回自己的地段。在整个事件中，苏克萨哈一直默不作声。

鳌拜暗中指使本旗的人给户部写信，要求将黄白两旗的地方交换。在这件事上，索尼和遏必隆顺水推舟：鳌拜你放心干，我们支持你。当时户部尚书是大学士苏纳海，他阅读讼书后，上奏说：圈地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现在大家都已经安居乐业，在土地上生活了许多年，不应该让他们迁走。

苏纳海说的也有道理，关键的问题是他本人就是正白旗的人。在鳌拜看来，苏纳海这么做是故意跟自己过不去。鳌拜决定利用自己的权力，将苏纳海置于死地。

于是，鳌拜将自己换地的奏疏和苏纳海反对的奏疏一并让议政王、贝勒、大臣们商议。商议迟迟没有结果，鳌拜竟然擅自下命令，要求换地。听说要换地，旗人和汉民都人心惶惶，这件事惊动了孝庄。当然，孝庄也没有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只是责骂四大辅臣。

鳌拜的命令下达下去一个多月，换地的事还没弄好。鳌拜不由担心苏纳海和苏克萨哈结党坑自己。鳌拜担心计划流产，决定先下手为强，他首先要剪除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这三人，在他看来，这三人是苏克萨哈的羽翼。

鳌拜以玩忽职守的罪名将这三人的逮捕，交给刑部判罪。刑部断定这三人的鞭一百，除了妻妾外，一切家产籍没。事情的整个过程是逃不过康熙的眼睛的，至少逃不过孝庄的眼睛。

也许是在孝庄的授意下，康熙召集四大辅臣，询问换地之事。鳌拜坚持应该重典惩治这三人的，索尼和遏必隆唯唯诺诺，附和鳌拜。苏

克萨哈心里很清楚，鳌拜这是打狗给主人看，真正的目的是压制正白旗，矛头直指自己。所以，苏克萨哈一言不发。康熙也是个明白人，知道鳌拜很想置三人于死地，始终没有答应鳌拜的要求。

鳌拜这时候也许是被权力冲昏了头脑，他竟然无视康熙的态度，以“迁延藐旨”“妄行具奏”的罪名将这三人处死。苏纳海正被关押在刑部，突然看到鳌拜派来两个卫士要绞死他，居然从容不迫地说：“我是大臣，本有礼仪，快取酒来。”豪饮一番后，苏纳海让家人在地上铺了一块布，脱衣躺在上面，自己用弓弦勒死自己。朱昌祚和王登联也被处以绞刑，不过他们都没有苏纳海死得这么爽快豪气，都是被处死的。

处死这三人后，换地之事办得八九不离十了，鳌拜松了一口气。他却不知道灭亡离他不远了。

智除鳌拜

在换地一事上，鳌拜做得太过分了，他绕过一切，独断专行。不要说其他那些大臣的态度他不在乎，就是孝庄的脸色他也不看看，至于康熙反对诛杀三大臣，他更是当作耳边风。

从这以后，鳌拜的气焰非常嚣张，俨然成了四大辅臣中执牛耳者。索尼年老体迈，看着鳌拜一天比一天跋扈，心里非常忧虑。索尼当然无意和鳌拜争权，只是这样下去，他感觉帝国危机重重。所以，在临死前他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康熙十四岁，索尼动员三辅臣和自己一起奏请康熙亲政。康熙以年龄尚幼为借口，让四大辅臣继续辅政。六月，索尼病逝，幸运的是索尼是四大辅臣中唯一一个善终的人。七月，康熙把索尼等人请求皇帝摄政的奏折给孝庄看，征询孝庄的意见。得到孝庄同意后，康熙决定择日亲政。

康熙亲政后并没有完全收回辅臣的权力，倒不是康熙不想收回，而是鳌拜不愿放弃手中权力，再三请求：“皇上您日理万机，有那么多事情要处理，微臣怎么能不为皇上分忧呢？”

鳌拜等人仍然以辅臣身份处理军国大事，只是定期要到乾清门向康熙汇报。康熙亲政就这么变成了夹生饭，康熙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在康熙眼里，鳌拜就是个黑山老妖，自己的旨意大多无法执行，

这个老妖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还公然宣称是圣旨。

苏克萨哈看到鳌拜的所作所为，知道机会来了，现在向鳌拜摊牌，就表明自己是支持新皇帝的。然而，苏克萨哈没料到，小皇帝后面有一个高人，政治投机并不能挽救他，相反，康熙可以利用他的死，除掉鳌拜，一箭双雕。

苏克萨哈突然变得强硬，以前在鳌拜面前他很低调，现在拒绝和鳌拜联名上奏，还说：“教导主子，大家如果有什么看法的话，可以自行上奏，没必要一起。”

鳌拜一听，感觉不对劲，他这分明是要跟我分庭抗礼，莫非他得到了小皇帝的支持？

苏克萨哈很清楚，自己和鳌拜的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为了保全性命，他向康熙提出：“请皇上允许臣去为先帝守灵，这样臣才能有一线生机，保全性命，也可以报答先皇的遗恩。”

鳌拜知道这事后，立即以“辅臣称旨”的名义，质问苏克萨哈：“又没人逼你，在这里怎么就不能安生？守灵怎么就可以活命？”

苏克萨哈的死期来临了，康熙却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不知道是不敢伸，还是不愿伸。

鳌拜与同党班布尔善等人，在遏必隆家的马圈内密谋，给苏克萨哈罗列出二十四条罪状，将苏克萨哈和他的儿子查克旦凌迟处死，其他子女兄弟等全部处斩，家产籍没，连苏克萨哈的族人和前锋侍卫等等都处斩。

最奇怪的是在处死苏克萨哈的判决书上，康熙是签过字的，并不是一无所知或者完全被鳌拜排除在外。康熙后来回顾此事时说：“朕亲政之初，鳌拜告发苏克萨哈，并交给王公大臣审议，王公大臣们都畏惧鳌拜和遏必隆的权势，全都叩请朕杀掉苏克萨哈，朕一时精神恍惚，但朕不忍心凌迟处死苏克萨哈，所以降旨绞死……现在想来，后悔莫及。”

这事让人深思，苏克萨哈是不是完全死于鳌拜之手？显然不是，康熙显然对苏克萨哈也没有什么好感，鳌拜除掉苏克萨哈，康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鳌拜。从整个流程来说，里面浸透着一个帝王高超的政治智慧。

整死苏克萨哈后，鳌拜更加跋扈。四个辅臣死掉了两个，只剩下遏必隆和鳌拜，本来遏必隆在鳌拜之前，上朝的时候遏必隆向来是在鳌拜的右边。今非昔比了，遏必隆是个聪明人，他觉得再这样下去，

搞不好下一个被整的是自己。

一天上朝时，遏必隆故意后退几步，卑躬屈膝地对鳌拜说：“我怎么好上座，大人先请吧！”鳌拜听了，哈哈大笑，也不谦虚，昂首阔步走进大殿。从此以后，鳌拜面前尽是溜须拍马之人，这也让他的覆灭成为一桩无法避免的事情。没有人提醒他：其实，鳌拜你很危险，树大招风，康熙随时会对你出手。

马屁精们将鳌拜吹捧为“圣人”，康熙迫于压力，给鳌拜的爵位也一再提升。康熙六年，授鳌拜一等公，第二年，加鳌拜太师头衔。

一时之间，鳌拜成了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此时的他，春风得意，翻云覆雨，谁也不敢不给他面子。很多人依附鳌拜，其中包括兵部尚书噶褚哈和吏部尚书阿思哈。没过多久，鳌拜的党羽就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各个部门的实权。这样一来，朝廷里的很多文武官员都是鳌拜一手提拔起来的，许多重要事情，鳌拜等人先是在家里私下商议。

鳌拜根据个人喜恶任用官员，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塞到各个部门里。对于那些不服自己的人，鳌拜不是撤职就是赶尽杀绝。譬如蒙古都统俄纳、拉哈达和宜理布等人仅仅是在议政时不肯附和鳌拜就被撤职。内大臣费扬古跟鳌拜有一些老纠葛，鳌拜将他处死，还杀了费扬古的两个儿子，并将费扬古的家产收为己有。

可以说，鳌拜基本上架空了康熙。

权力可以将一个人腐化，鳌拜之前并不是这么一个欺君罔上的人。现在鳌拜是横在康熙面前的拦路虎，不仅擅权独断，而且行止粗暴，就像一个无法无天的屠夫，在朝堂之上也不遵守礼仪，康熙在他眼里就是一个黄毛小子，他动不动就在康熙面前对大臣破口大骂。康熙曾经非常愤怒地回忆说：“鳌拜这个人，在朕的面前都不知收敛，稍有不合他意的地方，便在大堂之上辱骂大臣。作为一个臣子，鳌拜在朕的面前理应心平气和地说话，可是他经常发怒，在朝堂上大吼……用人方面，完全自作主张，撇开朕……”

纵观鳌拜的所作所为，康熙除掉鳌拜只是早晚的事情。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十六岁，亲政不满两年，用现在的话说还是一个花季少年。但是这个花季少年绝对没有心思去谈情说爱，卿卿我我，他的面前是一头巨大的老虎，他必须打掉这个老虎。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大清江山，或者是为祖母，他都不能逃避，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打掉这个老虎。

一个花季少年能制服得了一头大老虎吗？何况这个鳌拜远比老虎

要凶，这个任务看起来简直是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有很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它们都需要人去面对，一旦你勇敢去面对，就会发现它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艰巨。

鳌拜是三朝元老，在帝国的权力场和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早已培植了一大批党羽，鳌拜的势力渗透到中央的各个部门里，可以说是盘根错节、根深叶茂。如果稍有不慎，小皇帝可能打虎不成反被老虎吃掉。

康熙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件事，认为不能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拿下鳌拜，因为政治斗争有个过程，一旦开始等于是向鳌拜发布讯号，我要办你，而这么做的结果很可能引火烧身。对于鳌拜，只能采取非正常手段，先通过非正常手段把鳌拜制服，然后再通过正常手段除掉鳌拜。

花季少年就能有如此城府，怪不得长大后变成康熙大帝。

康熙是一个非常有耐性的猎人，为了麻痹鳌拜，他韬光养晦，装成是酷爱玩耍的少年，整天和侍卫们练习摔跤，甚至在朝堂上都耍着玩。鳌拜一看，康熙这小子贪玩得很，根本无心从政，鳌拜心里放松了不少，对康熙也不再戒备。经常在宫里进进出出，不再有任何戒备。

一天，鳌拜照例昂首挺胸目中无人地走进朝堂上奏，康熙突然做了一个手势，一群埋伏好的侍卫一拥而上，将鳌拜七手八脚地套牢。鳌拜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些身手敏捷的侍卫就将他捆绑起来。

这种戏剧性的事情简直就像是出自文学作品中，但真正确确在历史上发生过。

很显然，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索尼的儿子索额图就参与了这件事，索额图当时已经是吏部侍郎，为了配合康熙擒拿鳌拜，居然进宫做了侍卫。索额图因为擒拿鳌拜有功，一个月后升任为大学士。

说鳌拜对康熙的行为毫无觉察也不对，宫中到底有鳌拜的眼线，鳌拜不可能不了解康熙的动向，不过他万万没想到康熙敢在大殿上擒拿自己。加之当时朝中全是自己的势力，鳌拜实在没想到康熙的胆子居然这么大，竟敢擒拿自己。

接下来的问题是：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这些个侍卫真能制服得了他？就算人手众多，鳌拜又猝不及防，被制服了。那为什么鳌拜被抓后，他的党羽没有谋反？

事情还得从鳌拜的性格说起，鳌拜这个人作威作福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他根本就没有谋反的举动，鳌拜是异姓臣子，依据满族传统，奴才对主子必须保持高度忠诚。鳌拜从小就生活在家法严厉等级森严的满族社会里，奴才和主子的思想特别根深蒂固，骨子里是不敢谋反的。

当然这只是我的判断，鳌拜表面上是一头老虎，骨子里还是一条狗。

鳌拜被抓了之后，也没有争辩，所有罪名都承认了，说明鳌拜骨子里还是认康熙这个主子的。这时，鳌拜为了保全性命，突然揭开衣服，袒露身体，露出身上的累累伤痕。鳌拜说：“这是我以前为了救你的祖父留下的伤痕，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康熙一看，触动很大，最终免鳌拜一死，判处无期徒刑，鳌拜的儿子也免死。

鳌拜被捕后，遏必隆和一等侍卫阿南达等也被抓了。经过详细调查，并没有发现遏必隆有结党的痕迹，但遏必隆明知鳌拜结党作恶，却不进行弹劾阻止，被革去爵位，一等公爵的封号传给儿子。鳌拜的一些党羽比鳌拜的下场还惨，内大臣兼大学士班布尔善、鳌拜的弟弟穆里玛和侄子塞本得以及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吏部侍郎等人，全部处以死刑。

对于一些趋炎附势、巴结鳌拜的小人，康熙选择从轻发落，教导训诫一番之后，继续做官。

幕后高人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康熙亲政之初，孝庄在背后遥控指挥。在许多人眼里，孝庄就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如来佛，康熙的主观能动性根本就没有凸显出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很难解释康熙后来的作为，那时孝庄已经死去了多年，康熙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既打败噶尔丹，又把俄罗斯搞得服服帖帖。在康熙时代，清朝的版图达到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

由此可见，即使康熙在十几岁的时候，也是有自己独立思维的，绝对不是任何人的傀儡。既不是鳌拜的傀儡，也不是孝庄的傀儡。所以，康熙和孝庄的关系事实上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温情：一对感情深厚的祖孙。由于处在权力的高位上，两人的关系事实上是非常微妙的。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康熙智擒鳌拜这件事情是在孝庄的授意下进行的，还是康熙“自作主张”的。

要解开这个谜并不容易，只能根据史料发现蛛丝马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收有一份《康熙帝钦定鳌拜等十二条罪状谕》，里面的日期是“康熙八年五月十二日”，但是《清圣祖实录》里面记载康熙捉拿鳌拜的时间为“康熙八年五月戊申”，也就是五月十六日。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康熙捉拿鳌拜的时间比史书记载提前了五天，史书记载的这天实际上并不是擒拿鳌拜的时间，而是向王公大臣宣布鳌拜罪状的时间。

中间这五天，康熙在干啥呢？为什么他没有立即向朝臣宣布鳌拜的罪状？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康熙和孝庄的关系。

这五天的时间里，康熙就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为啥？因为捉拿鳌拜这事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张，所以现在他正在等慈宁宫那边的态度。

康熙为啥事先不请示孝庄？因为他认为孝庄不会支持自己，一个是怕自己把事情办砸，另外以孝庄的性格也不会同意做这么出格的事情。四个辅政大臣是孝庄亲自选定的，康熙亲政后，孝庄又挽留辅政大臣。康熙曾经就亲政的事情亲自询问过孝庄，孝庄以一个长者的眼光说道：“钱粮、刑罚这些事，事关重大，你又不了解，如果出错了，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毫无疑问，四大辅臣把事情搞得也挺乱的，尤其是鳌拜，但是孝庄一直坚持维稳逻辑，不想把问题进一步弄复杂。

一般人认为孝庄对康熙非常信任，康熙也对孝庄很信任。事实上，真是这样吗？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孝庄对于这个孙子能否管理一个庞大的帝国是心存怀疑的，这种怀疑非常正常，搁谁谁都怀疑，一个少年能够管理一个庞大的帝国吗？我们看看历史上那么多昏君暴君就知道了，那些人大多是成年人，结果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而康熙还未成年呢！

当然，孝庄最担心的还是康熙身上有顺治的影子。可以说，顺治已经给孝庄造成了心理阴影，偏偏康熙身上有很多顺治的影子，比如喜欢汉文化，父子俩都有叛逆倾向。所不同的是，康熙似乎比顺治更沉稳、更细心，也更现实，但是他们父子在精神层面是相通的。孝庄对顺治更多的是否定，而康熙却更多的是认同，他觉得当时很多人没

理解父亲，父亲虽然脾气暴躁，其实是一个天才的管理者，高瞻远瞩，秉性真纯。

所以，康熙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顺治“平反”，他想告诉世人，我老爸是被人抹黑了，没有宣传说的那么差劲。他为顺治修建了“孝陵神功圣德碑”，通过歌颂顺治含蓄地表达了对孝庄当年崇尚满洲贬低汉人的不满。

这些做法毫无疑问让孝庄很担心康熙变成下一个顺治，这可能就是孝庄为什么让辅臣继续辅政的原因。孝庄已经六十多岁了，她不想再承受折磨，不想再有任何风浪，此时的她又如何能够理解胸怀天下雄才大略的康熙呢？换句话说，孝庄只想守着一亩三分地，别出乱子就行，而康熙却想独步历史，成为开疆拓土的千古帝王。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顺治身上的那些叛逆和敏感，康熙都继承了。但是更可怕的是，康熙比他父亲多了沉着、勇气和城府，俨然是一个经过改良修复的升级版顺治。

鳌拜擅权康熙早就看不下去了，如果不尽快拿下鳌拜，他感觉朝政会越来越混乱，自己的权力也会面临着诸多不稳定因素。既然不能请示孝庄，那就来个先斩后奏。

擒拿鳌拜之后，康熙最担心的莫过于孝庄的态度。如果孝庄不同意这事的话，康熙估计也只能乖乖地放了，除非他敢进一步软禁太皇太后——康熙不是没有这个胆子的。康熙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木已成舟后，孝庄如果否定他，事情就不好收场，顺水推舟是人的正常本能。当然，康熙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和祖母翻脸，自己单干，让祖母出局。一个花季少年能有这么惊人的权谋和敢作敢当的勇气，确实让人震惊，让人佩服，也让人心底发寒，而这正是帝王的本色。

应该说，顺治的一生致力于对孝庄的叛逆，但顺治至死都没有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最终这个任务被他的儿子康熙完成了。相信，顺治九泉之下也会瞑目的。

结果出来了，康熙胜利了，孝庄妥协了。孝庄虽然妥协了，但提出不要把斗争扩大化，尽量避免引起社会动荡。这一点，康熙欣然接受，毕竟他不是朱元璋那样的刽子手，动不动就喜欢集体屠杀。

扳倒鳌拜，康熙的人生之路就顺畅得多。然而，这件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康熙不光打倒了权臣，还结束了孝庄幕后操纵国政的局面。从此，大清国康熙一个人说了算。

康熙成为权力竞争的最大赢家，在对待祖母孝庄上面，就表现得

特别孝顺，这种孝顺似乎有些过了头，过了头的东西就给人作秀的嫌疑。孝庄外出疗养，一向亲政的康熙也会陪同前往，不离左右，在世人眼里，康熙绝对是一个孝顺孙子的典范。甚至连自己的儿子夭折、皇后生病，康熙也居然瞒着不告诉祖母，还是陪着祖母。

康熙这么做或许是为了弥补孝庄对自己的不满，一个权力熏天的女人突然之间没有了权力，肯定会有失落感的，哪怕这个女人的权力欲望不是那么强。康熙坚持这么做只是为了告诉祖母一个道理：人走了，茶还是热的，没有权力，亲情还是有的。

后来的二十多年里，康熙隔几天就向祖母请安一次，孝庄感动之余分明也觉得这孩子还防着自己，怕大臣跟自己走得过近，分了他的权。孝庄其实不是一个权力欲望特别强的女人，到了晚年，她也只想好好过日子，犯不着跟孙子去争权。

从此以后，康熙开始逐步实现自己心中的宏伟蓝图。

第二章 削藩——帝国最惊险的时刻

当年，经略洪承畴来到云南的时候，吴三桂请教他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畴回答说：“不要让云南一日太平，只有天天出乱子，你才能保住地位扩充势力。”洪承畴一语道破法门，让吴三桂受益匪浅。

帝国身上的三颗大肿瘤

打倒鳌拜反帝王集团后，康熙又把眼光投向了远在边地的三藩。

这三个人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先说说辽东人尚可喜。尚可喜在崇德元年被封为智顺王，顺治年间，跟随多尔衮追击李自成，李自成战死后，他回到辽东旧地。顺治三年，大顺军余部在南方起义，尚可喜奉命平定湖南。顺治六年，因平叛有功晋封为平南王。随后，他又击败桂王，不久，又在广西打败大西军余部和桂王的联军。由于尚可喜功劳卓著，清廷让他镇守广东。

耿仲明也是辽东人，以前和定南王孔有德都是毛文龙的部属，毛文龙被杀后，他们先投靠孙元化，后来又造反，绑架孙元化，最后投靠皇太极。在多尔衮入关，追击李自成的过程中，耿仲明也出力不少，李自成战死后，耿仲明还师辽阳。顺治三年，耿仲明出征湖南，立功不小。顺治六年，耿仲明进封靖南王。后来，耿仲明随尚可喜征广东时，部将藏匿犯人，清廷削夺他王爵，罚银五千两，耿仲明吓傻了，畏罪自杀。他的儿子耿继茂取代他的位置，和尚可喜合力拿下广州。清廷论功行赏，让耿继茂继承父亲的王爵，接着耿继茂又立下了不少战功。顺治十七年，耿继茂镇守福建。耿继茂的儿子耿精忠同豪格女儿结为夫妇，被封为和硕亲王。康熙十年，耿继茂病死，耿精忠承袭靖南王爵位。

吴三桂我们就不用介绍了，这个人的知名度实在太高，绝对是汉奸中的明星人物。在三藩中，吴三桂的功劳是最大的，对于大清定鼎中原最给力。

三藩让康熙感到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军事力量的雄厚。

清朝定鼎中原后，为了节省开支，让三藩裁军。结果，名义上，耿、尚两藩各有兵力三千人，吴三桂有一万多人。实际数目肯定比这

个要庞大，何况三藩一直在扩充实力。《闽中纪略》记载耿精忠光是王府里就有万余兵甲，地方上一些兵力也有很多，而且府中男子十四岁以上，全部配发弓箭，天天训练。除此之外，三藩还有绿骑兵和投诚兵，绿旗兵是由投降的明军组成，耿、尚二藩有绿骑兵各七千人，吴三桂有绿旗兵几万人。至于投诚兵则是指农民军的投降部队。这么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知道三藩实力的可怕。

三藩可以说是三家庞大的家族企业，重要将领都是由他们的亲信担任。在大清版图内，三藩俨然三个独立王国。吴三桂等人虽然在军政大事上会通知一下清朝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是自个儿说了算。

吴三桂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CEO，坚持散财聚人的原则，出手大方，到处网罗人才。各行各业的人，只要有利用价值的，他都愿意重金收买。为了表现出礼贤下士周公吐哺的姿态，吴三桂甚至对一些地方上的小官也亲自接见，可见其野心之大。许多人才纷纷聚集到吴三桂的府上，吴三桂还让他们签卖身契，你为我服务多久，我给你多少钱，是特别有经济头脑的一个人。

耿精忠和尚可喜也纷纷模仿吴三桂，只是他们没有吴三桂那么财大气粗而已。如此庞大的开支，如果仅仅依靠朝廷的俸禄和兵饷肯定是不够的，事实上，三藩的经济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大多数经济活动违法了帝国的法律，比如私设赋税、霸占津口、收购物品等等。

三藩的存在严重地侵害了帝国的利益，而且不光是利益，简直就危及帝国的存亡，所以把三藩比作帝国身体上的三颗肿瘤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康熙削藩虽然本质上是狡兔死走狗烹，但确实是专制时代不得不做的一件安邦大事。

假戏真做

众人拾柴火焰高，三藩的气焰一天比一天灼人，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说实话，在深宫里长大的康熙是指挥不动这些大军阀的，藩镇势力一旦坐大，便会犯上作乱，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常识。对于熟读史书的康熙来说，不用别人提醒他也知道藩镇对于国家的危害。

削藩固然是帝王所渴望，但是削藩是一项高技术的危险活，搞不好连自己的性命、帝国的前途都要搭进去。康熙这么年轻的一个帝王

能够完成这项高难度技术活吗？

康熙十二年（1673年），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康熙不顾群臣的极力反对，一意孤行要撤藩。这是康熙一生中做出的最错误的决策，尽管后来不少拍马屁的人认为康熙圣明，这些人是以成败论英雄，看到康熙最后削藩成功，大家纷纷拍马屁。

公正地说，康熙削藩是非常冒失的，正如国外学者评价，削藩差点葬送了整个大清帝国，虽然最后叛乱被平定，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八年来民不聊生，死伤枕藉。削藩的行为是没有错的，错就错在没有选好时机，没有采取正确的手段。

我们还是来看看整个事情的经过吧！

早在康熙六年之前，御史大夫杨素蕴等人就弹劾吴三桂擅权不法，不过当时清廷慑于吴三桂的权势，非但没有对吴三桂采取手段，反而重罚弹劾的官吏，安抚吴三桂。

事实上，在四大辅臣辅政时期，清廷就已逐步削弱三藩权力。吴三桂在征讨云贵的时候，为了方便统一调度，顺治授予他“大将军印”。吴三桂平定云南后，按照规定应该上交，但是吴三桂却迟迟不交。后来，还是大臣找到吴应熊，对这个驸马说：“以前，永历在缅甸那边闹事。所以才给你父亲一个将军印，为的是方便他调度。现在天下已定，你父亲还留着这东西，到底是何居心？”

吴应熊一听，显然是朝廷派这个大臣来向自己讨将军印的，连忙飞书一封给父亲。吴三桂无奈之下，忍痛归还将军印。

让康熙无法容忍的是，吴三桂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置关税，圈占土地，掠夺人口，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三藩就像大清国养的三头老虎，这三头老虎不但不做事，反而消耗庞大，以顺治十七年为例，清廷的财政收入是两千六百万两，光云南一省就要九百万两。《圣武记》中说：“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

三藩凭什么开口要这么多钱呢？主要是用于军饷。三藩在边疆故意制造战火连天、天下还未平定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三藩的一种策略。

当年，经略洪承畴来到云南的时候，吴三桂请教他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畴回答说：“不要让云南一日太平，只有天天出乱子，你才能保住地位扩充势力。”洪承畴一语道破法门，让吴三桂受益匪浅。

三藩将儿子送到京城入侍，实际上是做人质，表示忠心。康熙表

面上也给予他们优厚地位，招他们为驸马，提升他们的爵位。康熙七年，提拔吴应熊等人为太子太傅。这样一来，清廷的一些机密消息很快就传到三藩那里，这是清廷之前没有想到的。而且，三藩之间也互相联姻，将利益关系联系得更紧密。

康熙十年（1671年）正月，靖南王耿继茂上疏说自己旧病复发，没有能力处理军务，希望把这个职位交给长子耿精忠。康熙想了想，准许耿精忠接管军务。同年十一月，尚可喜也上疏请求让长子尚之信接替自己。这些康熙都准许了，为了安定三藩的心，他还不断派人给三藩送去贵重物品。

三藩都是老江湖了，康熙的这些做法当然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内心深处，三藩对康熙是极为不信任的，他们相信兔死狗烹的事情迟早都会发生，现在只是酝酿而已。

在三藩中，尚可喜可以说是最想明哲保身的一个人。早在顺治十年的时候，他就以东西平定自己又有病为借口，提出解兵养老。顺治很奇怪，他居然挽留他，劝他“不必遽以病情”。顺治十二年，尚可喜又提出想回辽东故地养老。顺治又不同意，当然当时广东的局势还没有稳定，还需要尚可喜压住局面。

从尚可喜三番两次的表现看，说明他内心深处非常担心有朝一日遭遇杀身之祸。

吴三桂底气比尚可喜要足一些，他抱着边走边看的态度，不排除有一天造反的可能，毕竟吴三桂造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经过洪承畴的点拨后，吴三桂非常希望云南多事，即使没有事，他也要弄出一些事情来。

康熙二年（1663年），吴三桂派兵征剿当地的少数民族，捣毁他们的巢穴，捉拿他们的首领。这么做一方面可以伸手向清廷要军饷，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自己的地盘。康熙四年，云南的一些酋长联合起来抗清，吴三桂奉命镇压。到康熙六年的时候，云贵一带的局势才逐渐安定下来。

云贵一安定，吴三桂心里就发慌。只有边境不断滋事，他才能睡得安稳。

为了制造紧张局势，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吴三桂向朝廷报告说蒙古干都台吉进攻丽江，敌人大军入境，云南全省人民人心惶惶。为了安定人心，吴三桂决定亲征，为大清国的和谐做出应有的贡献。

其实，当时根本就没有蒙古入侵的事，蒙古只是要求和吴三桂通

商。吴三桂虚张声势，故意渲染战争的假象。随后，吴三桂又诓骗清廷，声称蒙古已经撤兵，现在是隆冬时节，估计敌兵暂时不会过来。吴三桂还说已经吩咐各营官兵严密防守，自己暂时班师大本营。

糊弄清廷是吴三桂的拿手好戏。当然，为了让清廷放低对自己的警惕，吴三桂也会作出交权的姿态，比如交还大将军印，辞去云南都督等。康熙四年五月，吴三桂又提出裁军，听说裁军康熙大喜，立即批复。裁军对吴三桂来说只是少拿些军饷，但吴三桂赚钱的路子实在太多，他是不是真会裁军实在让人怀疑。

平南王尚可喜回辽东养老，康熙求之不得，只可惜军权还是控制在尚之信的手里。

尚之信接管军务后，搞得一团糟，骄横跋扈，肆无忌惮，连自己的父亲都不放在眼里。以前，父亲的部属得罪过自己的，如果是小梁子，尚之信就鞭打，如果是大梁子，尚之信就大开杀戒。而且，尚之信在向父亲报告军务的时候也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尚可喜非常郁闷，怎么把摊子交给这么一个人？考虑到他毕竟是嫡长子，而且又有一些才能，尚可喜不忍心废了他。尚可喜有一个叫金光的幕僚，这个人很有谋略，尚可喜将他视为顶级谋士，碰到什么问题，一定要请教他。

一天，金光突然逃走了，尚可喜知道后，立即派人把他追回。为了惩罚金光，也为了让他以后没法逃跑，尚可喜让人挑断金光的脚筋，从此金光成为跛足，人们又称他为跛金。

尚可喜虽然挑断跛金的脚筋，但是对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器重，甚至待遇更好。跛金逃跑的一个原因就是尚之信，他看到尚之信做事没有分寸，担心日后会引来家破人亡的祸事，便向尚可喜献计：“现在朝廷最忧虑的事情是藩镇尾大不掉，我看大王不如带着子孙和亲信们归耕辽东，这样既可以避难，又可以让朝廷欢喜，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尚可喜一听，有道理，便给康熙上疏：“臣已经七十了，精力衰退，想回辽东养老，希望朝廷给我发一笔养老费吧！”

康熙二话没说，同意了。不过康熙是有条件的，你尚可喜自己退休想把广东交给尚之信，这不行，康熙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法律，说老藩王离开了，小藩王就该上任。要走可以，要钱也可以，军队必须留下，交给朝廷接管。

尚可喜一看，玩砸了，什么都没有了。命是保住了，富贵呢，恐怕不能永享。

康熙这招借力用力的政治武功固然精彩，不过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场大波把帝国带向风雨飘摇的险境中。

康熙撤藩的消息一传开，吴三桂和耿精忠感觉如五雷轰顶，好日子看来要到尽头了。说心里话，吴三桂和耿精忠都是超级赌徒，宁可赔了身家性命，也不愿拱手交出军政大权。但是，形势不由人啊，尚可喜已经撤了，耿精忠问吴三桂：“我们该咋办呢？”吴三桂想了想说：“皇上撤了尚可喜，一定会接着撤我们的，如果让皇上逼我们撤藩，我们反而会陷于被动，不如自请撤藩，也好看上面的意思，说不定上面为了大局，会挽留我们，给我们几年时间，我们就利用这几年时间扩大势力……”

吴三桂的意思耿精忠是明白的，耿精忠决定先上疏请求皇帝撤藩，说：“臣做藩王已经两年了，远在边地特别想念皇上，只是广东人太不老实，老是闹事，所以一直没敢跟皇上说撤藩的事。近日平南王尚可喜归隐，让臣也心动，臣代表部下官兵，请皇上撤藩。”

耿精忠提出撤藩后，待在北京的吴应熊急了，他派人送信给父亲，催促说：“老爸，朝廷对你的疑心最重了，他们两个都表现不错，你赶快意思意思一下吧！”

吴三桂犹豫良久，认为自己是边防大将，军力强大，朝廷暂且还不敢动自己，自请撤藩的话，朝廷应该会挽留的，因为我吴三桂比其他入强啊！

吴三桂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向康熙提出撤藩：“臣吴三桂镇守云南十六年，每天都思皇恩浩荡，只希望在工作岗位上幸福地死去，怎么敢遽然请求退休。只是听到平南王尚可喜蒙皇上恩准，过好日子去了，我也想好好休息，希望皇上恩准撤藩。”

康熙毕竟年轻，接到这样的奏疏，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当他把吴三桂请求撤藩的奏疏拿到朝堂讨论时，出现了他意料不到的情况。

大多数大臣都反对撤藩，只有兵部尚书明珠和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才支持撤藩。康熙看没有达到效果，又主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此事，结果还是大多数不主张撤藩。

但康熙一意孤行，心中老早就打着削藩的算盘，他首先表明：三藩手握重兵，日子长了，始终是一种祸患。接着又信心十足地表示：“三藩的子侄不少留在京城做人质，料想他们应该不会叛变。”

年轻人康熙错了，那些歌颂康熙天纵英才的人也错了。在处理撤藩问题上，康熙告诉世人：我不是什么千古一帝，我只是一个年轻

人，一个渴望达到目的而思虑不周的年轻人。

愤怒的吴三桂

康熙是铁了心要撤藩，立即向兵部、吏部、户部发出指令，让他们做好撤藩的善后工作。

康熙的使者很快就到了云南，使者向吴三桂宣读了诏谕，诏谕首先歌颂吴三桂精忠报国，镇守边疆多年，为皇帝分担南方之忧；接着，诏谕又指出，自古帝王能够平定天下，无不是靠军队和武臣的功劳，一旦四海平定，帝王们必定要班师息兵，让百姓和士卒都休养生息，这样对皇帝对武将都有好处；平西王你年纪也大了，长年驻扎在蛮荒之地，想必也想过一种游山玩水诗情画意的生活，你不妨来北京陪皇帝，君臣偕乐，这样既可以让子孙后代永享王爵，又能国家安定，君臣和睦，多好啊！

吴三桂傻眼了，他被康熙的“真诚”震怒了，康熙你还当真了。康熙确实很认真，撤藩工作他做得细致入微，尽力满足三藩在物质上的需求。撤藩是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的，这些康熙都说没问题，康熙努力做到仁至义尽。

据说，撤藩令下来之后，吴三桂气得说不出话来，两眼无神，呆若木鸡。也能理解，一辈子不要脸不要命就换来这点家底，康熙要一下就拿走，搁谁谁郁闷。

吴三桂本来只想做个姿态，表示我忠于清廷，他满以为康熙会挽留他，让他继续镇守云南。没想到，康熙居然真的同意，弄假成真，不好收场啊！

吴三桂愤怒、无语、紧张、痛苦、郁闷……

碰到这种事情，没有人可以非常淡定的，但吴三桂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很快就冷静下来。他很清楚地看到，撤藩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生死存亡的大事，如何应对，绝对不能冲动。

摆在吴三桂面前的路有两条：一、听从组织安排，响应撤藩政策；二、孤注一掷，起兵造反。听从组织安排会有什么结果呢？听从组织安排后，吴三桂还是一个王爷，还是一个有钱的大腕。但是，作为一个军人，他将失去自己的军队和军权。要知道，吴三桂所有荣华富贵的基础都在于手中的那支军队，他的一生是战争的一生，他能够混到今天，都是出生入死得来的。没有军队的吴三桂就没有安全感。

吴三桂费尽心机想逃脱免死狗烹的历史定律，可惜规律就是规律，任凭吴三桂再狡猾，这一天还是来了。历史上，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没有通过任何流血事件就解决了中央集权问题。宋太祖是唯一一个成功绕过免死狗烹历史定律的人。

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吴三桂你交出兵权又有什么，子孙后代永享富贵不是一样好吗？

吴三桂绝对不是一个傻子，如果有谁能够保证交出兵权后一定能永享富贵，我想他还是会交出的。但历史是残酷的，更多的情况是交出兵权就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很容易被灭族的，别说永享富贵。何况，吴三桂是汉人，康熙是清朝皇帝，两人之间的差距本来就大，要建立良好的信任很难。

吴三桂的部将也是极力主张造反的，他们说：“大王的军威举世第一，大王振臂一呼，天下必定云集响应，到时兵锋所指，可以迫使清军划地求和，学习刘邦的榜样，迫使清军交还世子和世孙。如果我们迁到辽东，他日朝廷一旦吹毛求疵，恐怕我们就只能引颈就戮了，起兵的话，反而可以保全自己。”

部将的这些建议也不是没有道理，甚至可以说是很有道理的。

吴三桂作出思考状，认真地分析了形势。吴三桂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他觉得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武功都是不可一世的，换句话说，有造反的实力。再加上云南的地形，东连贵州，北控川蜀之地，自己经营这么多年，资金雄厚，兵甲坚利。

再看看自己的军队，自己的亲军是老牌劲旅关宁铁骑，战斗力非常强，其他的士兵大多是从孙可望、李定国那里投顺过来的，这些人个个都是身经百战，一心追随自己。吴家军的战斗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加上平时吴三桂很以自己的治军为自豪，“治军整严，号令肃然，屯守攻战之宜，无不毕具”。

部将们纷纷催促，大王，你还等什么，反啊！

吴三桂捻着胡须说：“本王的党羽门徒遍布全国各地，云南十镇的大帅、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总兵吴之茂、陕西提督王辅臣等，都是本王的心腹。本王若举兵，这些人个个会马前鞍后。”

部将们齐声说：“不错，反观清廷，出生入死的开国老将们纷纷谢幕，康熙小儿，乳臭未干，岂是大王的手。只可惜，世子和世孙还在他们手上。”

吴三桂自信地说：“本王势力在这儿，何况应熊又娶了公主，料

想康熙小儿不会杀掉应熊，最多用应熊来要挟我们。”

部将：“大王所言极是……”

吴三桂：“反！”

吴三桂虽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造反专家，但这次总觉得有点悬，便去求教谋士方光琛。方光琛也是一个牛哄哄的人，自比管仲、诸葛亮，这个人最擅长的是摆高人的架子，作秀功夫高明。方光琛的父亲以前是吴三桂的上司，两人是世交，与其说方光琛是吴三桂的幕僚，不如说是吴三桂的知交。

吴三桂第一天上门见方光琛，向他透露了自己谋反的心意，方光琛没有说话。吴三桂第二次上门明确表示自己要谋反，方还是没说话。第三天，天色未明，吴三桂就登门造访，这时方光琛还睡在床上，吴三桂在他的床前焦急地询问谋反之事。方光琛觉得吴三桂反意已决，就坐了起来，给吴三桂分析形势。吴三桂立刻拜方光琛为军师。

随后，吴三桂派兵扼守云南关口，来往的行人，只许进，不许出。表面上，吴三桂听从组织安排，暗地里一再拖延时间。造反，能不能凝聚人心最关键，作为造反专家吴三桂对此比谁都清楚。

为了确定部下是不是跟自己一条心，吴三桂积极挑起战士们的同仇敌忾之心。这些天，他忙着在各营里跟大家喝酒，每次酒过三巡，吴三桂总会慢慢地站起来，满目沧桑地扫视大家，然后长叹一声，悲凉地说：“老夫和诸君共事三十多年，今日天下太平了，我们反而没了用武之地。现在皇上坚持让我们迁到关外，以后就不会有这种喝酒的好机会了，来，大家多干几杯，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再见面。”

说完之后，吴三桂一饮而尽，饮完之后，老泪纵横。在座的官兵们常年跟随吴三桂，在云南这块土地上吃香的喝辣的，他们的利益和吴三桂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吴三桂这么一说，群情激愤，纷纷起立，向吴三桂效忠：“我等愿听大王调遣，大王何日举兵？”

在整个造反过程中，造反的理由是非常关键的。吴三桂肯定不能说康熙让我撤藩，所以我要造反。谋士刘茂暇给吴三桂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啊！大王最好立明朝后裔为皇帝，讨伐清廷。这么一来，相信天下人会纷纷响应大王的号召。”

应该说刘茂暇的意见是非常好的，无奈这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吴三桂的首席军师方光琛，书呆子方光琛说道：“以前大王因为兵力不足，出关借兵，天下人还能够谅解。后来

明朝永历皇帝逃亡缅甸，大王奋力追到，把他杀了，这已经让天下人无法原谅了。眼前，大王的兵力完全可以收复河山，如果立明朝后裔的话，成功之后该怎么办呢？是学习张良炼丹云游，还是再杀一次明朝皇帝，让天下人的口水淹死。杀了一次故国皇帝，难道还想杀第二次？”

吴三桂一听，汗毛倒竖，觉得方光琛说的有道理，决定自立名号。在这次造反中，吴三桂一开始就错了，这似乎注定了这场造反的失败。你说你都杀了明朝皇帝一次，再杀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呢？为啥就拉不下脸皮？就算不杀，平定天下后，你让皇帝“禅让”不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吴三桂失败还是失败在脸皮不够厚上面。

丧钟为谁而鸣

吴三桂从来就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很早就就看出反清复明这面旗帜的号召力。

宴请将士之后，吴三桂让将士们在校场集合，用一种煽动性的口吻对大家说：“朝廷一再催促我们，我们马上就要迁移了。最近，朝廷的使臣轮番催促，让大家赶快动身。如果我们不马上迁移的话，说不明大家会遭到使臣的侮辱。”

一些士兵大喊：“走就走吧，朝廷何必苦苦相逼呢？”

吴三桂煽动说：“朝廷的命令，确实不可拖延，但想想大家已经在云南安家，这种荣华富贵谁都不愿放弃。大家想想，你们的富贵究竟从何而来？”

大家都说：“都是靠殿下才有这样的洪福。”

吴三桂摇头说：“不是。”

大家说：“是依靠皇上才有今天的福气。”

吴三桂神秘地说：“确实是依靠皇上，但不是依靠现在这个皇上，而是依靠先朝的皇上。没有大明，就没有我吴三桂今天。后来闯贼作乱，偌大明朝居然没有勤王之师。为了保卫京城，为崇祯皇帝报仇，我不得已向清兵借兵。最后，混到今天这个局面，全是靠大明朝的余荫啊！永历的坟墓还在云南，我们要离开，怎么说也得去故国君主的坟前道个别吧？”

到了约定时间来到永历坟前，吴三桂的表现却让大家很意外，他突然指着自己头上的帽子问：“我们先朝有这样的帽子吗？我们先朝有这样的衣服吗？”

吴三桂这么一说，勾起了广大官兵的故国之思。吴三桂还宣布老臣必须穿戴先朝的衣帽祭奠国君，为了将祭奠永历的仪式搞得风风光光，吴三桂下令十一月十八日正式祭奠永历，由使臣带头出发。

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死在吴三桂的手中。现在，吴三桂在永历的墓前，想起自己为清军剿杀南明，立下汗马功劳，如今，清廷的使者肆无忌惮地侮辱自己，如果真交出权力，还不任由清廷宰割。想到这里，吴三桂越加气愤、悲痛，竟放声大哭。在旁人眼里，吴三桂似乎是为了永历、为了大明而哭。

吴三桂一哭，全军将士跟着哭泣，在哭泣的过程中释放对清廷的不满。

第二天，吴三桂在校场举行阅兵典礼。阅兵典礼上，吴三桂看军容整肃，不由得捋须微笑。接着，吴三桂上马亲自表演了一番，他坐在骏马上飞射三箭，箭箭中的，发出铿锵的噔噔声。士兵们一片喝彩声，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老当益壮，又在马上来回耍着长枪、大刀，端的是虎虎生风，豪气不减当年。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战斗的号角在中原大地上吹响。

这一天，西风惨烈，云南境内阴云密布，连路上的行人都能嗅到杀气。只听一阵马蹄声过去，原来是吴三桂的女婿吴国柱率领先锋部队包围了巡抚官署。巡抚朱国治被捉住，自从来到云南后，朱国治一直趾高气扬，不把吴三桂放在眼里。朱国治的下场非常惨，吴国柱将朱国治碎剐于市，然后割下头颅见吴三桂。

吴三桂假装大惊，捶胸顿足：“国柱，你们这是在害我啊，我全家被灭无所谓，那些跟我出生入死的将士们只怕也有灭族之罪啊……”

部将们一听，纷纷喊道：“干脆反了……”

吴三桂听了，心里窃喜。

吴三桂在谋反之前，云南府同知刘昆就得到秘密消息，了解吴三桂在铸造“天下都讨兵马大元帅”印玺的事情。刘昆还把这个秘密告诉朱国治，并建议朱国治千万不要把吴三桂惹毛了，让他尽量给吴三桂放宽期限，别逼他，与此同时，密奏朝廷派出重兵扼死吴三桂的出

路。只可惜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并没有引起朱国治的重视，最终朱国治不但丢了自己的性命，还让大清承受了巨大的风险。

处死朱国治后，吴三桂又快马加鞭派人将钦差大臣折尔肯和萨达礼软禁，与此同时，在交水一带，吴三桂的人马立即俘虏正在筹备撤藩事宜的高显辰。

消息封锁之后，吴三桂让官兵蓄发，脱掉清服，换上明服，旗帜一律用白色，帽子一律是白色，以此悼念亡明。吴三桂自称为天下都讨兵马大元帅，设前后左右四大金吾将军，并秘密派人联络各地的反清力量。随后，吴三桂发布了讨伐清朝的檄文。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有文采的檄文，我们不妨摘录下来：

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告天下文武官吏军民人等知悉：

本镇深叨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贼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惨矣！东宫定藩之颠踣，文武瓦解，六宫恣乱，宗庙瞬息丘墟，生灵流离涂炭，臣民侧目，莫可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勤王讨贼，伤哉！国运夫偈可言？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为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势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莫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令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骨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兹彼夷君无道，奸邪高涨，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霄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吏酷官贪，水惨山悲，妇号子泣。以至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崩地震，地怨于下；官卖爵，仕怨于朝；苛政横征，民怨于乡；关税重征，商怨于涂；徭役频兴，工怨于肆。

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襄义举……义旗一举，响应万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愤……倘能洞悉时宜，望风归顺，则草木不损，鸡犬不惊；敢有背顺从逆，恋目前之私恩，忘中原之故主，据险扼隘，抗我王师，即督铁骑，亲征蹈巢覆穴，老稚不留，男女皆诛；若有生儒精谙兵法，奋拔

岩谷，不妨献策军前，以佐股肱，自当量才优擢，无靳高爵厚封；其各省官员，果有洁己爱民、清廉素著者，仍单仕；所催征粮谷，封贮仓库，印信册籍，赍解军前。其有未尽事，宜另须条约，各宜凛遵告诫，毋致血染刀头，本镇幸甚！天下幸甚！

这篇檄文文采斐然，通篇都是谎话，不过确实起到了宣传作用。檄文一传出，天下骚动，人心思叛。许多人纷纷向吴三桂投降，云南提督张国柱、永北总兵杜辉、布政司霍之英等人，第一时间投降吴三桂，获得官职。对于不服从的人，吴三桂的政策是消灭。

短短的时间内，吴三桂的大军就膨胀到二十多万，各方守将纷纷归降，吴三桂的兵锋直指贵阳。甘文焜是清朝的一个忠臣，誓死不降，被镇远守将江义包围后自尽，吴三桂大喜，一路兵不血刃进入贵阳。

接着，吴三桂挥师向湖广挺进。

康熙的补救措施

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席兰泰，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等人，得知吴三桂叛乱的消息，立刻逃出贵阳，向京城飞奔。

这些人跑到镇远的时候，忽然发现镇远城戒备森严，封住了所有出口，而且驿站里根本不提供马匹。党务礼、萨穆哈等人心急如焚，后来找关系弄到两匹马，两人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抄小路离开镇远，飞奔到沅州。沅州还不属于吴三桂的控制区，党务礼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丝毫不敢歇息，立即进入湖南境内，得到驿马后向京城一路狂奔。

在马上狂奔了十一个昼夜，他们终于赶到北京。到了北京后，党务礼等人没有先去皇宫见皇帝，而是直奔兵部衙门。下马的时候，几人喘着粗气，没法说话，头晕眼花，不得不抱着柱子。兵部的官员们见此情景，急忙扶住他们，让人端来几碗水，撑开他们的嘴巴，把水灌了进去。

过了好一会儿，党务礼和萨穆哈才慢慢恢复一些气力，说道：“反了，吴三桂反了……”

当吴三桂谋反的消息传到朝廷时，朝野震惊，康熙也很震惊，不过没有慌乱。当时反对撤藩的索额图此时力举诛杀那些建议撤藩的大

臣，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吴三桂承认错误，请求息兵。但康熙拒绝了，康熙还算一个敢作敢当的皇帝，他说撤藩是自己的决策，不能将过错推给大臣（朕素不肯诿过臣下……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

应该说，康熙此时已经意识到撤藩的害处了，当时他确实有点傻有点天真，以为满足吴三桂物质上的需求，就能撤藩。他太低估了吴三桂这个人，如果不是吴三桂时运不济，没有天命，大清江山就要毁于康熙这个明君的手中。

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后，康熙并没有一味自责，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解决问题。如果说吴三桂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老姜，那么康熙还是正在成长和成熟的青年。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没有慌乱，没有恐惧，而是镇定从容正视现实。

在军事调度方面，康熙表现出了他运筹帷幄的天赋。他派遣八旗劲旅前往荆州，扼守渡口，防止吴军渡江，荆州成为阻碍吴三桂的重镇。康熙选择荆州可以说是很有眼光的，荆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将荆州作为对付叛军的大本营和要塞，非常具有战略意义。

康熙任命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大将军，统领多罗贝勒察尼，都统觉罗朱满，觉罗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尔度齐、鄂尔泰，前锋统领硕岱等大批满洲将领前往荆州镇守。

同时，康熙任命孙延龄为抚蛮将军。孙延龄是孔有德的女婿，孔有德被李定国打败后，全家自杀，只有女儿孔四贞逃了出来，孔四贞后来嫁给孙延龄。孙延龄一直镇守广西，广西与贵州交界，把广西交给孙延龄这样的老将，对于遏制吴三桂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康熙料想吴三桂必定进军四川，因为四川和云南接壤，吴三桂为了问鼎天下，肯定要将四川收入囊中。康熙命令镇守西安的将军瓦尔喀星夜奔赴四川，并且叮嘱瓦尔喀：“凡是由云南进入四川的险要之地，一定要派重兵把守。一旦有机会，一定要和其他地方的部队一起讨伐贼军，不过，一定得小心，得看准。”康熙让大军驻守四川有双重的战略意义，既可以防止吴三桂入蜀，又可以乘机捣毁吴三桂的大本营云南。

除此之外，康熙还让陕西总督哈占严守西北防线，不给吴三桂扩大地盘的机会。

对于江南江西一带，康熙也非常重视，康熙认为，江南江西一带水路发达，如果不严加防守的话，很可能成为吴三桂进犯江苏、浙江的一个跳板，江南素称鱼米之乡，一旦吴三桂控制江南，帝国就失去

一块重大的财政蛋糕，战事上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事实上，吴三桂叛变不久，耿精忠就响应他的号召，准备和吴三桂一起夹攻江西。没想到，康熙早就有所防备，切断线路，让吴三桂和耿精忠没法会师。结果，耿精忠的部队被遏制在浙江和江西交界的地方，进又进不了，退又不想退。

康熙又在兖州、太原布下重兵，各地兵马互相策应，什么地方告急，临近的部队就去支援。为了在第一时间掌握军情，康熙命令兵部除了驿站之外，每四百里设置笔帖式、博什库各一名，负责将军情第一时间上报给朝廷。康熙这个政策对于整个战局的扭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样可以在最快的时间掌握军情，从而根据形势做出正确的决策。

从康熙的补救措施看，他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干的皇帝，是一个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皇帝，用现在的话说，实事求是。

除了进行周密的军事应对外，康熙也积极展开了政治大战。康熙将吴三桂定为罪魁祸首，对于其他的人，康熙表示，只要能够悬崖勒马，弃暗投明，不仅不株连，反而可以给予优待。康熙这么做，从政治上瓦解敌人，一步步地孤立吴三桂。

吴三桂叛乱不久，康熙就下令停止撤耿、尚二藩，力图稳定这两大势力。尽管康熙没有稳住，但是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康熙知道吴三桂混迹权场和战场那么多年，是一个出名的老油条，为了防止吴三桂策反，康熙一再叮嘱各地将领和官员：吴三桂这个人狡猾非常，你们一定不要受他蛊惑。为了增强将领和官员们对策反的免疫力，康熙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康熙很清楚，这种时候，只有信任才能抵挡叛乱之风的蔓延。

刚开始，康熙发布谕令，绝不株连旁人，只惩办首恶吴三桂。这个话别人会相信吗？说实话，大家都不相信，都怀疑。当康熙发现大家都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话时，反复发出类似的谕令，告诉大家，绝不株连别人，你们千万不要怀疑，我说话算数。为了表示自己说话算数，康熙说，吴三桂有许多亲戚在全国各地当官，只要他们安分守己，依然可以当官。削除吴三桂爵位后，康熙晓谕云南人民，官民仍就原位。对于沦陷区的官员和百姓们，哪怕他们割掉辫子，换了明朝发型，康熙也说：“事出突然，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可以原谅的，只要不助纣为虐，一律赦免。”

针对吴三桂的讨伐檄文，康熙指出，清廷对吴三桂可以说恩重如山，吴三桂不仅不思报答，反而举起反叛大旗，大逆不道，贻害苍

生，简直是理法难容，人神共愤。

对于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康熙本不打算动他。议政王大臣一再奏请康熙惩办吴应熊，说吴应熊跟其他人不同，是吴三桂的儿子，不能从宽发落，应该拿下。康熙这才将吴应熊软禁起来。议政王大臣不满，力主康熙杀掉吴应熊。但康熙仍然心存善念，不忍诛杀。吴应熊虽然是反贼的儿子，但也是自己的姑姑和硕公主的丈夫。康熙自幼跟和硕公主待在一起，关系非常亲密，他不忍心杀害吴应熊。何况留着吴应熊，等于掌握一个和吴三桂谈判的大筹码。

吴三桂的军队不断壮大，丝毫没有想跟康熙和解的意思，康熙愤怒了。加上在京城里的吴应熊也蠢蠢欲动，据说在京城里放了四把大火。康熙最终铁下心来，将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处死。

吴三桂正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接到吴应熊被诛的消息，一时间痉挛起来，就像个死人一样。吴三桂真的没想到康熙会杀掉儿子，他这才知道，康熙虽然年轻，但是心狠手辣并不输于自己。

吴三桂开始意识到，眼前这个对手不能小看。

隔江对峙

吴应熊被杀之后，吴三桂非常愤怒。他铁手一挥，吴军迅速进兵湖南。在逼近沅州时，湖广总督蔡毓荣提前派遣总兵蔡世禄镇守。康熙认为沅州是云南和贵州的门户要地，蔡世禄一个人守不住，立即调遣湖广提督桑峨去沅州支援。结果，援兵还没赶到，沅州就失陷了，总兵蔡世禄沦为俘虏。

听到沅州失陷的消息，湖南巡抚卢震放弃长沙，逃到岳阳市。得知这个消息，康熙很愤怒，敌军还没到，朝廷大官居然逃跑。康熙下令捉拿卢震，处以死刑。

在调度方面，康熙是非常英明的，一再展现自己优秀CEO的天赋。了解到吴三桂大军向湖南湖北进发，他让护军统领硕岱率领前锋士兵前往常德扼守。考虑到武昌的重要性，康熙又让都统朱满率兵在武昌、汉阳一带防御。

虽然康熙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和调整，可惜手下的这些人执行不力。都统们行军非常迟缓，花了一个多月才赶到荆州、武昌一带。这时，常德和澧县还没有被叛军控制，此时，都统们应该尽快赶到常德和澧县，安慰好当地军民。但是，都统们害怕吴三桂，不敢向前进。

结果，吴三桂乘机占领了常德和澧县，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清军拱手献城。

不久，吴军大将张国柱攻下衡州，挺兵长沙。长沙城人心惶惶，官兵们都不愿守城，拱手将城池献给吴军。接着，吴应麟和张国柱率水陆联军进攻岳州，岳州参将李国栋打开城门献城。

吴三桂从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起兵，到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就将贵州和湖南控制在自己手中。前锋军队正在湖北蓄势待发，隔着长江，吴军和荆州的清军对峙。形势即使说不上一片大好，也可以说前途无量，前景让人乐观。

这时，吴三桂兵威震动天下，那些对清朝不满的人纷纷响应他的号召。为了聚拢更多的力量，吴三桂散布谣言，到处发传单，说清朝无道，马上就要灭亡，他顺应天命，吊民伐罪。吴三桂还没进四川，四川那边就已经响应了，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洪和吴之茂等等表示要归顺吴三桂；就连康熙寄予厚望的孙延龄也背叛主子，响应吴三桂。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大佬尚之信相继叛清，如果吴三桂能协调好各方的叛清势力，清朝的灭亡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大清国烽火燎原，康熙做出了很好的决策，可惜没几个人认真执行。形势本来对吴三桂一片大好，吴三桂如果能利用这大好形势，渡江向京城进逼，整个爱新觉罗家族就会变成热锅上的蚂蚁。可惜，吴三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湖北松滋这里，突然停滞不前，待了有三个月之久。吴三桂的谋士刘玄初在云南给吴三桂写了一封信，让他赶快渡江，跟清军展开大决战，然而吴三桂却充耳不闻。

吴三桂为什么打到长江边上就不再前进？几百年来，历史学家一直为此争论不休。

吴三桂不渡江确实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只要渡江就可以把军事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如果再派遣间谍策反北方的官员，那么清朝的灭亡指日可待。六个省份表示归顺吴三桂，此外，还有台湾的郑经也表示反清复明，这些人有的可能心怀异心，但都属于对付清朝的力量。

吴三桂为啥没有渡江呢？说实话，还是被记忆害的。因为渡江之后，他要面对的是满洲八旗军，满洲八旗军以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八旗军可是相当彪悍。吴三桂之所以没渡江，就是因为没有必胜的把握。

吴三桂没有想到的是，今天的八旗军跟昨天的八旗军完全没有可比性。事实证明，八旗军和八旗子弟都在不断堕落，康熙让八旗军去

阻截吴三桂，结果这些人都不敢跟吴三桂正面冲突，士气可想而知。吴三桂只要发动攻击，八旗军定会全军溃败，因为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反清，八旗军无论是战斗力还是心理承受能力都大不如以前。

吴三桂已经是一个老人了，锐气和豪气都消磨了许多，何况吴本人身上一直都有小家子气，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个人的利益，而没有气吞山河的帝王雄心。他只想跟清廷谈判，划江而治，还托达赖喇嘛代自己去说服康熙，结果遭到康熙的拒绝。

兵法上说有进无退，本来你兵锋犀利，忽然停下来歇几个月，这简直是挫自己的锐气。不进则退，争天下本来就是一场豪赌，要么一无所有（连命都没有），要么拥有一切，绝对不可能说你拥有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地方。

吴三桂这次反叛，从兵法上来讲，只有闪电战才有机会，绝对不能够持久战。一来，老百姓都想过安稳日子，如果你快速拿下清朝江山，老百姓是乐意支持你的，毕竟你是汉人，你当权大家不用剃阴阳怪气的头发；二来，清朝的实力不容小觑，占据GDP很高的江南各省，打持久战你也不是对手啊；再说，人家已经是大统了，在中原皇帝都传了两代，舆论上不利。

只能闪电战，可惜吴三桂放弃了，他放弃了整个江山。

吴三桂放弃过江可能跟个人迷信也有关系。据说，吴军到达澧县时，忽然天降大雨，雷电交加，闪电恰好劈中了吴三桂的车子，车夫的衣服和头发都烧焦了。吴三桂不知这到底暗示什么，后来听说衡山上面有座岳神庙，庙里藏着一只神龟，这只白色的神龟非常小，只有铜钱一般大。

吴三桂听说这只小白龟非常灵验，便到衡山上占卜。吴三桂把神龟放在一张全国地图上，然后，闭着眼睛祈祷，发现这神龟在地图上爬来爬去，就是不出长沙、岳州、常州，最后爬到云南就停止不动了。吴三桂很吃惊，又占卜了一次，发现还是这个结果，再占卜了一次，仍然是这个结果。

吴三桂心想，神谕大概是让自己别出长江，以云贵为根据地，实现划江而治的理想，以后再图发展。

如果事情真是如此的话，康熙应该感谢这只神龟。

听到吴三桂求神龟问卦的事，谋士刘玄初在云南当场气得吐血身亡，临死前留下一句话：“惟望天早生圣人以靖中华耳。”潜台词是：老吴你宁愿相信一只乌龟，居然不相信我，我瞎了眼了。

这里我们说说刘玄初这个人，刘玄初在吴三桂的谋士中实力排在第一。刘玄初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刘茂暇，他当时力主立明朝后裔为帝，可惜被假面军师方光琛搅黄了。刘玄初最早是跟着刘文秀混的，后来投靠吴三桂帐下。说诸葛亮神机妙算那是徒有虚名，别人吹出来的，而这个刘玄初却真可以算得上神机妙算。他很早就看出康熙要撤藩，吴三桂造反时，他力主立明朝后裔为皇帝，不这样做的话，得不到南明的一些遗老的支持，这些遗老成事不足，但是坏事却有余，还有，立明朝后裔，百姓从心理上也能接受你。

对于康熙的决策，刘玄初也能预测，他知道康熙下一步要出什么牌。可惜，他辅佐的是吴三桂，吴三桂这个人当大财主和大军阀都绰绰有余，可惜偏偏就不是皇帝的料。他没有那个王气，没有那种总揽天下秦皇汉武的气魄和胸襟。

刘玄初之于吴三桂就像郭嘉之于曹操一样，曹操失去郭嘉后，人生突然变得不顺。赤壁之战大败后，曹操仰天长叹：“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也！”

论起雄才大略，吴三桂比不上曹操，刘玄初死后，吴三桂一再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刘玄初死后不久，吴三桂就解除了手下第一猛将马宝的职务。接着，是一连串的军事惨败。

耿精忠的失败

早在吴三桂起兵之前，耿精忠就有了谋反的念头。康熙十二年（1673年）八月，他让人带着一封密信来到台湾。收信人是台湾首行政长官郑经，在信中，耿精忠大大地赞扬了郑经的忠心：阁下您在海外孤忠高悬日月，实在让人敬佩，我们虽然在清朝的卵巢下生活，但其实是委曲求全。现在，开创大好局面的时机很快就到了，你我不妨联手，建立万古基业如何？

郑经收到这封信后大喜，两个月后就派遣水军到澎湖等待，一旦耿精忠起兵的消息传来，立即响应。吴三桂造反后，康熙第一时间派遣使者告诉耿精忠：“你不用搬家了，以前的军队也归你管。”耿精忠便让人通知郑经，宣布计划暂缓实行，先观察一段时间。

清廷派福建总督范承谟安抚耿精忠，范承谟将兵部交还给耿精忠兵权的文书交给耿精忠，耿精忠却正眼不瞧范承谟。范承谟非常生气，却只能忍气吞声。随后，耿精忠跟朝廷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耿精忠担心范承谟暗算自己或是搜集情报，他觉得自己不能干下去了。

恰好，福州街头传来谶语：“七星再拜真天子，分明火从耳边起；杀尽三山牛出血，身骑白马军中止。”这谶语什么意思呢？七星是指七口井，恰好耿精忠府门口就有七口井，火从耳边起，火和耳正好组成一个耿字，那意思就是说耿精忠要当皇帝。

谶语一出，耿精忠通知郑经，然后抢先发难。囚禁了范承谟全家后，耿精忠效法吴三桂让官民蓄发，打出“反清复明”“除暴安民”的口号带领一万人的军队迅速地占领了福建。

一个吴三桂就已经让康熙坐立不安，耿精忠的叛乱无异于雪上加霜。危急关头，康熙并没有失去理智，充分显示了一个优秀CEO的危机公关能力。

康熙明确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吴三桂，对于其他人，康熙表示，只要迷途知返，不仅不追究责任，还给予优待和赏赐。征剿和招抚两手并用，康熙的目的是分化和瓦解敌人，将吴三桂孤立起来。

康熙一边安抚耿精忠，希望他弃暗投明，一边派遣大将希尔根、赖塔和根特巴鲁，兵分三路，对耿精忠进行围剿。

由于耿精忠一意孤行，康熙下诏削除耿精忠的王爵，扣押耿精忠在京的兄弟，同时康熙还发布公告，表示胁从的人不问罪，及时回头的人重重有赏。康熙在征剿耿精忠之前，就对大将们说，只要耿精忠投诚，就当善待。康熙反复强调说，耿精忠和吴三桂的情况不同，耿精忠家族效忠清朝四十多年，渊源深厚，耿精忠的背叛更多的是一时无知，受吴三桂蛊惑。过了两个月，康熙又将耿精忠的兄弟们释放出来，声称耿精忠的弟弟远在北京，没有和耿精忠密谋，所以无罪释放，官复原职。

康熙所做的这一切虽然没有让耿精忠立刻回头，但对于塑造自己的英明形象有很大帮助。这是一场舆论战、政治战，康熙只有将自己明君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才能让天下人感觉吴三桂等人是谋反作乱，反之，吴三桂等人就是替天行道吊民伐罪了。

在平叛过程中，浙江总督李之芳是比较给力的，他总是亲临在第一线，几次和耿精忠的部队交战，击败耿精忠。所以，耿精忠一直在福建周边兜圈子，始终打不开局面。

面对清军一连串的军事打击，耿精忠的部队屡遭重创，他手下的那批将领把耿精忠的脸面丢尽。部将曾养性连吃败仗，退到温州死守，仗着温州四面有水，暂时抵抗住清军的攻势；另一员大将马九玉则依靠江山、常山、开化三县的大山，利用河流，阻挡清军的进攻。

看到耿精忠处于困境，郑经伸出援助之手，不过郑经开出的条件

让耿精忠无法接受，郑经要“借”泉州和漳州。耿精忠迫于形势，接受了郑经的条件，但是郑经帮忙打退清军后，耿精忠又食言，不想将泉州和漳州交给郑经。郑经火起，强夺泉州和漳州，两人因此反目成仇。

清军见机，袭击屯兵九龙山的马九玉，在清军的炮火轰击下，马九玉战败，率领三十多个骑兵逃走。江山、常山失守后，耿精忠一路衰到底，部将纷纷献城投降。

到了这个地步，耿精忠仍然不肯投降，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不会放弃。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进入福建的一条险要的关隘石塘，耿精忠派心腹大将连登云领重兵把守，企图阻止清军进入福建。可惜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清军兵分多路，接连攻破耿精忠的大营，将耿精忠围住。

到了这时，耿精忠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军事上连连失败，政治上内外交困，内部问题更严重，将士逃亡，军饷匮乏，部将不听指挥。除了这些不利因素，耿精忠还得提防郑经。

对于穷寇，康熙并没有赶尽杀绝，他让康亲王杰书前去招降耿精忠。耿精忠犹豫不决，他想投降，但是又有太多的担心。他一方面担心康熙帝秋后算账，另一方面担心范承谟将来会报复自己。自从造反以来，耿精忠将康熙的忠臣范承谟关在牢里有两年多，这两年多，范承谟在牢里也没有闲着，本着对耿精忠的刻骨仇恨，范承谟每天都在牢里写七言绝句，这些诗全是骂耿精忠的，汇聚成一本诗集《百苦吟》。

耿精忠心想，如果我投降的话，作为大清的忠臣，你范承谟将来在皇上面前说我坏话，我就算投降也难逃一死。这么一想，耿精忠恶向胆边生，决定杀人灭口。耿精忠将范承谟及其兄弟、幕僚和家奴总共五十三人全部杀害，并焚尸荒野。其中，有一个看守敬佩范承谟的人格，偷偷地在荒野捡了一块没有烧完的骨头，跑到京城，向康熙禀报了范承谟的死讯。听到这个消息，康熙极为悲伤。他用隆重的礼节为范承谟哀悼，并加封范承谟太子太保和兵部尚书头衔。

康熙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虽然他隆重哀悼范承谟，却没有收拾凶手耿精忠。对于投降的耿精忠，他仍然给予优待，让他继续当靖南王，并征讨郑经，将功补过。康熙这么做很显然对范承谟不公，看到这里，我们不禁为范承谟惋惜了。可是，先别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康熙。

在当时的情况下，康熙不能收拾耿精忠，一方面是需要利用耿精忠对付郑经，另一方面他已经对天下做出承诺，投降的不追究。如果

收拾耿精忠的话，等于是自食其言，其他的叛乱分子必然会负隅顽抗到底。

康熙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利用耿精忠打败郑经，等到三藩平定天下太平的时候，他才动手收拾耿精忠。耿精忠的下场是非常惨的，凌迟处死，子孙部下皆斩。

尚之信的叛降

三藩中，尚可喜是最聪明的一个人，他对形势看得很清，既想维护自己的地位，又想保持跟清朝的和睦关系。

康熙十三年（1674年），户部尚书梁清标带着撤藩的圣旨来到广东时，尚可喜非常不安。接见梁清标后，尚可喜一言不发，气氛十分紧张沉闷。梁清标晚上在藩府睡觉的时候，能够听见藩府甲兵兵器发出的声响，梁清标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天亮之后，尚可喜带着尚之信等一行人匆匆赶到，众人异口同声地请求：“现在动身很困难，我们愿意守广东，报效朝廷的恩德。”

尚可喜不愧是老谋深算，一个概念转换，就把不愿撤藩转换成报效国家。

梁清标也是个聪明人，他这次来不只是为了撤藩，也是试探尚可喜的意思。梁清标说道：“诏令还没有宣读，平南王怎么就说动身呢？在我离京之前，皇上曾私下里对我说，平南王忠心耿耿，功高劳苦，跟别人有所不同，可以永远镇守广东。今天要撤的仅仅止于平西王。”

此言一出，气氛顿时解冻，藩府内紧张情绪骤然冰消，出现了个皆大欢喜的局面。藩府内载歌载舞，张灯结彩，一片欢乐的场面。尚可喜热情地招待了梁清标，在拜谢梁清标的时候，尚之信呆头呆脑地愣在那里，尚可喜踢了他一脚。从这个小事就可以看出，尚之信根本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料，偏偏这样的人还喜欢造反。

吴三桂造反后，送信给尚可喜，希望他举兵响应。尚可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把吴三桂的使者押起来，送给清廷，还修建了“尽忠楼”，表示对清廷绝无二心。

不久，耿精忠在福建拉起反叛大旗，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在广西响应吴三桂的号召。孙延龄这人很不厚道，他自己反叛就反叛，居然拉尚可喜下水，在反叛檄文中扬言“三藩并变”。尚可喜知道这事后又

急又怕，立即向康熙上疏表白：“老臣虽然和耿精忠结为亲家，但是精忠谋反这事，老臣根本不赞同。老臣已经七十多了，虽然愚蠢鄙陋，但也不至于蠢到向反贼求功名富贵！老臣唯一的心愿就是守护岭南，为皇上全忠。”

尚可喜这份奏疏表达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我没谋反，第二个意思是别撤我，还有半个意思：如果撤我，说不定我也会反的。

康熙看了尚可喜的奏疏，对着心腹说：“尚可喜是个聪明人啊，我喜欢这种人。”

心腹拍马屁说：“因为圣上也是聪明人啊！”

康熙微笑，接着说：“在这个危急关头，尚可喜能识时务，朕一定要善待他。”

康熙下旨褒奖尚可喜忠贞无二，让他协助总督金光祖，合力剿匪。潮州总兵刘进忠向耿精忠投降，尚可喜命儿子尚之孝讨伐刘进忠，与此同时，尚可喜上奏，希望由尚之孝继承自己的王爵，康熙没有二话，点头同意。康熙给予了尚可喜极大的信任和权力，康熙下令，凡是督抚提镇以下，一概听从平南王节制，一切调兵遣将的事情，由尚可喜斟酌裁定。第二年正月，康熙加封尚可喜为平南亲王，虽然只是多了一个字，却有亲疏之别，一般来说，亲王只封给王室家族里的人。

尚可喜发兵后，屡次传来捷报，但是并没有取得大的胜利。刘进忠被打败后，把郑经从台湾请到潮州，打败了尚之孝的部队。与此同时，耿精忠进入江西等地，和吴三桂形成犄角之势，切断了清军在江西和广东之间的联系。吴三桂接着与高州的叛军祖泽联合，在广东迅速打开局面，先后拿下雷州、德庆、开建和电白等县，继而下东莞，入南海。清朝的水师总兵孙楷和副将赵天元都归降了。

尚可喜剿匪不力，忧愤交加，躺在床上起不来，只好让尚之信掌管军事。

本来尚可喜是比较看好尚之孝的，但尚之孝自从被打败后，没有理由再担任主将了。尚之信人品不好，尚可喜也知道，没办法，但他是长子，尚可喜又没有特别能干的儿子。

前段时间，尚可喜申请让尚之孝继承自己的爵位，早已让尚之信憋了一肚子火。吴三桂看到这个裂缝，决定收买尚之信，承诺事成之后，封尚之信为王。

尚之信是一个从来不拒绝诱惑的人，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

月二十一日，他果断地发动兵变，杀了尚可喜的谋士金光，接管平南王职权。事成之后，吴三桂让人送来“招讨大将军”印，尚之信感动地接受了。

尚之信“归顺”吴三桂后，两广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钅和陈洪湖也归顺吴三桂。吴三桂势力如日中天，吴三桂命尚之信派兵看守平南王府，尚之信照办不误，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全都看管起来。

尚之信谋反之事让尚可喜无地自容，尚可喜本来剿匪不力就已经感觉有愧于康熙，现在儿子谋反，让他悔恨交加。尚可喜本已重病在床，知道没有机会翻盘，事到如今，只有以死明志。尚可喜想投缢自尽，被下属发现，虽然被救活，但病情越来越重。临终前，他让儿子给自己穿上清帝赐的朝服。

尚可喜死后，尚之信掌握了一切大权，弟弟尚之孝“闲居广州”。为了拉拢尚之信，吴三桂又封他为辅德亲王，尚之信虽然接受了，但玩起了权术，为了保存实力，他不听吴三桂调遣，想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吴三桂要进入广州，他以种种借口拒绝。清军袭击长沙时，吴三桂让尚之信袭击清军后方，尚之信纹丝不动。尚之信深知此举得罪了吴三桂，让人给吴三桂送去了十万两黄金。

十万两黄金能平息吴三桂的愤怒吗？尚之信冷静思考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尚之信又后悔那十万两黄金。在康熙十五年十二月，自知得罪了吴三桂的尚之信向康熙伸出了橄榄枝：“我们父子世受国恩，怎么敢怀有异心呢？这件事纯粹是吴三桂这个奸人挑拨，我愿意将功补过，希望皇上能够给个机会啊！”

康熙虽然知道尚之信这个人不可信，但是为了孤立吴三桂，他还是接受了尚之信的投降。

尚之信在承袭平南亲王王爵后，老毛病又犯了，千方百计保存自己的实力，让广东成为自己的永久领地。吴三桂指挥不动尚之信，康熙也指挥不动。康熙命尚之信进入湖南讨伐吴三桂，尚之信以潮州总兵刘进忠还没投降为由，拒绝出兵湖南。

后来，康熙几次让尚之信协助剿匪，他都置之不理，完全是耍康熙玩。康熙非常生气，但是非常时刻，说话还是挺委婉的：“没有立刻发船到韶州，导致错失战机，平南王啊，这不能不说是你的失误造成的。”

尚之信这种人属于典型两边不讨好，像这种人，只有一种前途，自己当皇帝。否则，无论是康熙得天下，还是吴三桂一统江湖，尚之信都不会有好下场。

吴三桂死后，天下局势迅速扭转，以前局势对清廷不利，现在天平倒向康熙这边。吴三桂的将领纷纷叛变，胜负之势已经明朗。这时候，自以为聪明的尚之信主动提出要进广西剿匪，康熙马上准奏。康熙这个人不愧是一个忍术高手，他何尝不是对尚之信恨得咬牙切齿。

尚之信干的混账事实在太多了，虽然归顺康熙，但他根本不把康熙放在眼里，他曾对金光祖说：“皇上让我出兵，却连一个黄顶戴都舍不得，太小气了吧！”

还有一次，他对盐驿道僉事李毓栋说：“你到这里来，事事跟我作对，我就是一刀砍了你，你以为皇上能把我怎么样？”其嚣张可见一斑。

一次宴会中，尚之信喝酒喝高了，对一个巡抚说：“如果不是我归顺清廷，你现在能在广东混吗？以后在这里，什么事都顺着我，要知道，敢杀巡抚朱国治的不光只有吴三桂一个人。”巡抚没有被吓着，当即严词斥责尚之信，尚之信又狡猾地笑道：“酒话，酒话，老兄你别当真，哈哈！”

巡抚没跟他计较，反而建议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京城入侍，他却不识时务地说：“天下还没有平定，怎么可以送幼童出门远行呢？”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言语嚣张，尚可以理解。尚之信还做过更过分的事，叛将孙楷宗归降后，康熙已经原谅了他，尚之信却把他打死，这是公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尚之信曾派护卫张存到京城，结果被康熙看上，升张存为总兵。尚之信听了狂怒，百般侮辱张存。护卫张士选因为一句话得罪了尚之信，就被他射成残疾。

收拾尚之信的日子很快就到了，天下平定后，康熙让人检举尚之信的不法行为，最后裁定尚之信有谋反罪，理应诛灭三族。但康熙考虑到尚可喜的功劳，从宽发落，最后说道：“尚之信这个人，不忠不孝，罪恶滔天，本来应该处斩，但是朕曾经授予他亲王头衔，决定法外施恩，赐死；至于其家属，由于平南王尚可喜忠贞不二，一概赦免。”

康熙的政治手腕和权术智慧在处理三藩问题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吴三桂的败亡路

这场叛乱的主角无疑还是吴三桂，在整个平叛过程中，康熙对所有人都收买，唯独对吴三桂姿态强硬，誓要灭掉吴三桂，由此可见，

吴三桂实力之强大，已构成了对清朝赤裸裸的威胁。

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正式自称为周王，废弃康熙年号，称周王元年。一般认为，这是吴三桂造反过程中最大的失败，吴三桂在造反初期，打出明朝后裔的口号，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在自称周王，无疑给世人野心家的感觉，而且反反复复，让人失去信心。在檄文中，吴三桂曾明确表示立明朝后裔。这是吴三桂造反之路第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

这个失误是不应该的，因为有一些门客已经指出，不应该改年号，应该奉明朝为正宗，自己仍然称平西伯——这是崇祯皇帝封给吴三桂的爵位。门客还建议，应该像以前讨伐李自成一样，全军缟素，昭告天下反清复明的决心，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得到普天下汉人的支持，更能得到明朝遗老遗少的辅佐。应该说，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但是吴三桂出师顺利，短短两个月之间就拿下几个省，以至于吴三桂集团的大多数人认为单凭武力就可以推翻清王朝，不必立明朝后裔，免得以后麻烦。这是典型为了省去小麻烦招来大麻烦。

后来，吴三桂礼聘明朝少卿李长祥，询问他大计。李长祥让他赶紧立明朝的后代，收拢天下百姓的心。“一定要立崇祯的后代，这样效果最好。”李长祥说，可惜吴三桂不爱听这话。

吴三桂的一些幕僚举出项羽立义帝的例子，他们说：“当初项羽立义帝为主，最后义帝反而调兵遣将，让项羽陷入困境。如果将来我们打下天下，那明朝后裔又该往哪里放呢？总不至于杀掉吧？”

李长祥看到自己的计策得不到采用，心怀失望地离开吴三桂。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吴三桂没有主见，在政治远见这块，他远不如年轻的对手康熙。

吴三桂自立周王让很多明朝遗老遗少感到失望，这些遗老遗少的宣传能力又特别强，无疑他们会抹黑吴三桂。说实话，吴三桂也不是傻子，他也很想得到这些人的支持，可惜这些人不跟他合作，至少在他们眼里，吴三桂这人野心太昭然了，哪怕你作作秀也好啊！

吴三桂曾经聘请明朝的遗老谢四新出山，谢四新给吴三桂留了一首诗：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卧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吴三桂读到这首诗，痛骂：“腐儒，书呆子，小人。”

这些人固然是腐儒，可吴三桂就没有想到自己是不是太蠢，为何捷径不走要抄远路，阳光大道不走偏要挑羊肠小道。

原明朝的士大夫对吴三桂可谓恨得牙痒，有说吴三桂大逆不道，有说吴三桂愚不可及。甚至在响应吴三桂的一些地方将领中，这事也产生了不小的消极影响。其实大家都知道，就算你吴三桂立明朝的后代，将来江山还是你吴三桂的，但姿态在政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了这个姿态，你才能给大家仁君的感觉，大家才会迁就你很多的缺点。

如果说恢复明朝社稷，天下老百姓肯定是举手欢迎的，大家都不愿意拖着一根长长的可笑辫子，大家都希望汉人治汉。但这个前提是有大明这个招牌，人都是恋旧的，何况国家社稷这样的大事，谁都不愿意暴发户突然当皇帝。

吴三桂出师之初，犹如秋风扫落叶，各地闻风而降，这种架势仿佛吴三桂就是真命天子一样。

吴三桂迅速在湖南一带站稳脚跟，将整个湖南纳入势力范围。吴三桂的胜利就像一个冲击波，所有那些对清朝不满的人，纷纷举起反清大旗。

襄阳总兵杨来嘉在谷城起兵，杨来嘉是福建人，以前是郑经的都督，在康熙三年降清。随后，鄖阳副将洪福带领着自己的亲兵投降吴三桂。更大的叛变还是在四川，吴三桂从起兵伊始，就对四川给予了高度的战略重视。康熙对四川也非常重视，四川与云南接壤，吴军很可能进犯四川，康熙派重兵把守四川各个重要关口。

康熙的援兵还没有到达四川，就传来四川都督郑蛟麟和川北总兵谭弘叛变的消息。郑蛟麟和谭弘以前都是明朝的旧臣，郑蛟麟是明朝的都司，谭弘以前是明朝的总兵官。吴三桂封郑蛟麟为总督将军，谭弘为川北将军。与此同时，四川巡抚罗森、总兵吴之茂也投靠吴三桂。

康熙急了，催促大将军瓦尔喀火速进军四川，同时安抚郑蛟麟等人：“朕能够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完全是被吴三桂胁迫，身不由己，只要你们及时回头，朝廷绝不为难。”

叛乱之势迅速在全国蔓延，甚至蔓延到京城，清朝的统治危在旦夕。这一切实在出乎康熙的意料之外，他万万没想到撤藩会引起这么大的连锁反应，所以在平定三藩之后，他不仅拒绝臣子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反而当众悔罪。从此以后，做出任何决策都显得慎之又慎。其

实，康熙的想法是这样的，他认为天下太平，老百姓都不希望打仗，撤藩后，三藩就算叛乱也很难形成大的气候。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汉人的民族精神。

在京城，一个叫杨起隆的人，自称是朱三太子，密谋在京城发生暴动。杨起隆和部众约好，以放火为暗号，聚众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来，但引起了京城百姓的不安，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骚乱，康熙只惩治了闹事的头目，对于其他人等一律从宽赦免。四个月后，又传来河北总兵蔡禄密谋造反的消息，康熙第一时间派遣阿密达到河北处理这事，阿密达先下手，将蔡禄全家拿住。平息了京城起义和粉碎蔡禄谋反的意义是重大的，这就等于稳固了后方，为康熙全力平叛奠定了基础。

起兵三个月，吴三桂控制了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四省，但是连锁效应更大，福建、江西、浙江、广东、陕西等地纷纷叛清，响应吴三桂。事实上，悄然之间，这场叛乱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已不仅仅是吴三桂跟清朝争夺权力的斗争，而是汉族和异族统治者的斗争。

位于广西的孙延龄因为娶了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掌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叛乱发生后，康熙对孙延龄寄予厚望，希望他牵制吴三桂的后方。但孙延龄这个人也对清廷不满，为了日后和吴三桂共享富贵，孙延龄以议事的名义把一些忠于清廷的将领召集起来，然后一声令下，早已埋伏好的刀斧手将这些将领一网打尽，手段够狠够辣。

孙延龄接着胁迫广西提督马雄投降，马雄不从，两人打了起来。马雄虽然打赢了，但势力不如孙延龄，听说吴三桂的大军已经来到广西，宁愿投靠吴三桂，吴三桂遂封马雄为怀宁公。

吴三桂企图化解孙延龄和马雄之间的矛盾，可惜效果不大。吴三桂也是个惜才的人，他更加看重马雄，因为马雄还是比较能打仗的，而孙延龄仗着势大，能力不怎么样。

在湖南打仗的时候，吴三桂让孙延龄支援，孙延龄却找种种借口拒绝。吴三桂于是对孙延龄猜忌，让人密切监视他的动向。

孙延龄是个左右摇摆的人，加上他的老婆孔四贞跟清廷的关系密切，在孔四贞的说服下，孙延龄又产生了归顺清廷的想法，这事也没逃脱吴三桂的耳目。吴三桂派自己的从孙吴世琮前去做掉孙延龄，吴世琮来到桂林后，借口找孙延龄议事，让孙延龄来自己的大营，孙延龄不知是阴谋，前来议事，结果被杀死，胸膛被刺了个凉透心。

接着，吴世琮召见广西巡抚马雄镇，作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劝马雄

镇投降。哪知马雄镇刚烈忠贞，不仅不投降，反而对吴世琮破口大骂。吴世琮脾气并不火爆，看自己无法说服他，便让马雄镇休息，第二天又找能说会道的人劝降，置办了盛饌招待马雄镇。可惜，马雄镇不吃这套，将桌子掀翻在地。吴世琮看招降无望，便将马雄镇的全家绑起来，当着马雄镇的面将他全家一一杀掉，当屠刀悬在马雄镇头上时，马雄镇毫无惧色，依旧痛骂吴三桂，最后饮刀而死。马家女人也都是刚烈之辈，听说男人们都被杀害，在家里集体自尽。

杀害马雄镇全家后，吴世琮仍然觉得不解恨，将他们全家的尸骨暴尸四十余日。就这样，吴三桂控制了广西。

在这个大动乱时代，有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影响到大局的走向，分别是平凉的王辅臣和甘肃的张勇，这两人以前都是吴三桂的部将。吴三桂跟这两人的关系都挺密切的，以前他们跟着吴三桂混的时候，吴三桂就非常欣赏他们骁勇善战的本领。这两人如果起兵的话，就等于可以控制陕西和甘肃一代，大西北就可以纳入势力范围，加上两人兵力雄厚，直接可以威逼京城。有了这两人的支持，吴三桂问鼎天下应当不是什么难事。

然而，令吴三桂没有想到的是，昔日的爱将居然拒绝了他。理由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康熙对这两人恩情也很深，比吴三桂还要深，在收买人心这块，康熙比吴三桂更拿手。王辅臣不仅没有背叛，还将吴三桂的使者押送到北京，交给康熙发落。

但考虑到王辅臣、张勇和吴三桂的关系，康熙仍然不是十分放心，派遣钦差大臣莫洛到陕西担任经略，统领一切军政大事。

然而，不久就发生了变故。吴三桂的军队兵分三路包围了宁羌，康熙命莫洛前去救援。

莫洛到达宁羌州不远的地方时，跟王辅臣的军队相隔不远。两军莫名其妙就打起来了，王辅臣亲自上阵，击退莫洛。战斗中，莫洛当场死亡，王辅臣大获全胜。

王辅臣叛乱的消息传来，康熙大惊，他实在不懂王辅臣为什么突然叛变。所以他招来王辅臣的儿子王继贞，问他原因。王继贞也不知道，吓得浑身发抖。康熙安慰他说：“你不用害怕，这事跟你无关，我知道你父亲忠贞，应该不至于做出谋反的事情，一定是跟经略莫洛闹矛盾了，所以才误入歧途。你马上回去，宣布朕的命令，你父亲无罪，杀莫洛罪在众人。希望你父亲能够继续杀贼。”

康熙让人给王辅臣带去一封信，在信中，康熙没有一句责备王辅臣的话，反而夸他忠贞不二，一定是被叛贼胁迫，随后，康熙又回忆

了和王辅臣交往的一些细节，娓娓道来，就像是一封写给老朋友的信。

王辅臣收到信后，非常感动，给康熙回了一封信，详细阐明了自己叛变的原因。根据王辅臣的说法，他之所以叛变是因为莫洛排挤他，伤了他的自尊。

王辅臣的说法显然不能尽信，莫洛排挤他可能是事实。但事实上，他已经收取了吴三桂的贿赂，听说他起兵的消息，吴三桂立即给他拨了二十万两白银，王辅臣呆在西北这么穷苦的地方，第一次有人这么大方地给他拨款，他想不动心都难。康熙虽然一再承诺不追究他，但王辅臣始终心怀疑虑，担心这只是康熙的权宜之计。尤其是自己杀害了莫洛，康熙能这么算了么？莫洛是清朝贵族，康熙的心腹，难道康熙会让莫洛白白死掉？

所以，王辅臣表面上归附清廷，实际上跟着吴三桂抗拒清兵。西北越来越乱，叛将越来越多，随后，王辅臣又攻打兰州。在西北一带，能够撑起大梁的就是张勇了，为此，康熙封他为靖逆侯，将甘肃全省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他。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宁夏发生兵变，张勇的得力助手陈福被乱军杀死。张勇推荐赵良栋取代陈福的位置，张勇、赵良栋、李进宝被誉为“河西三汉将”。最终，这三人和王辅臣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收复了陕甘，为康熙立下了巨大的功劳。

吴三桂饮马长江之时，没有及时渡江与清军展开决战，这是吴三桂集团的第二个重大决策失误。吴三桂做出这个决策一方面可能真是迷信，跟那只神龟有关。但他也有自己的战略考虑，吴三桂这个人一生求稳，一旦渡江的话，将会冒很大的风险。一旦受挫的话，后方的根据地云贵很可能不稳。

吴三桂停止前进，给了康熙一个很好的喘息时机，与此同时也让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磨损了锐气。

康熙从全国调集了二十万兵马，其中有很多是蒙古兵，和吴三桂展开了决战。吴三桂的手中的兵力是二十万，加上一些策应部队，大概在三十万左右。双方都不可能轻易取胜，这再次证明吴三桂军队的战斗力还是非常强的，没有趁热打铁实在是可惜。

吴三桂二十万精锐部队主要集中在湖南，吴三桂非常重视岳州这块地方，他把岳州交给自己的侄子吴应期。吴应期是一员猛将，由他镇守岳州，吴三桂比较放心。就目前来说，吴三桂完全具备了划江而治的资本。但霸业的根本就是不可能与人共享天下，偏安一隅的结果

就是灭亡。

要么得到所有，要么一无所有。

说实话，清军总司令康熙这时已经捉襟见肘了，到处都有请求增兵的折子，但康熙手中已没有多少兵了。康熙一再敦促统帅勒尔锦夺取岳州，结果喊了两年，勒尔锦还是按兵不动。于是，清军和吴军形成了荆岳对峙之势，清军守着荆州，吴军守着岳州。

清军在西北战场上取得胜利，扭转了局势，图海、张勇等人打败王辅臣后，等于剪掉了吴三桂的一只大翅膀。

康熙十六年（1677年），全国战场的形势发生战略性的转折。清军经过短暂的战略性撤退后，很快就开始了全面反攻。西北战场收服王辅臣，将四川叛军逐回老巢。康熙十七年十月，耿精忠投降，福建平定，清军进一步收复东南地区。

反攻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清军开始对吴三桂进行战略包围。清军选择湖南的茶陵和攸县为突破口，并迅速撕裂缺口，将战果扩大。不久，清军又攻克郴州、桂阳、兴宁等城镇，招抚了吴三桂的总兵王育民等人。

军事上的失败导致吴三桂内部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将领之间矛盾凸显。吴三桂手下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叫高大杰，此人打仗非常厉害，能攻能守，曾多次击败清军。但是他和另一个将领韩大任有矛盾。韩大任这个人比较会玩关系，爬到高大杰的头上，对他百般侮辱欺负，最后高大杰郁闷而死。

韩大任镇守吉安，结果被清军击败，一路逃到湖南。途中，他听从谋士的建议，带领上万精兵投靠了清廷。接着，清廷又招抚了韩大任的余部近五万人。可以说，韩大任的投降让吴三桂承受了重大的损失。不久，吴三桂的水师将军林兴珠也投降。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六十七岁，造反整整五年了，吴三桂却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看到吴三桂的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部下为了让他打起精神，建议他称帝。吴三桂心里清楚，自己很快就会走进山穷水尽的地步，称帝不过是完成内心的一个愿望而已，但他还是选择了称帝。

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建国号为周，改年号为昭武。吴三桂的这个举动是毫无意义的，他放弃过江的机会，最终走到这步田地，不是因为战术的错，吴三桂打仗还是很厉害的。吴三桂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

决战终归是要来的。在长沙大战中，吴三桂余勇犹在，双方总共投入了十几万的兵力，吴三桂大军分成三路，和清军展开厮杀。吴三桂三路都旗开得胜。

清军也展开了对岳州的进攻，可惜没有半点进展。在局部战场上，吴三桂军队仍然表现出了骁勇善战的一面，可惜大势已定，纵是天神下凡也不能力挽狂澜。

到了这时候，清军还不敢跟吴三桂交战，对他存着畏惧心理。

岳州城强攻不行，清军便将其围困起来，岳州城闹饥荒。吴三桂派兵救援，可惜被阻回。吴应期没办法，只好派兵出击，成功地突围了出去。岳州再次回到清军手中。吴应期的这次逃跑，说得好听点是突围，其实是为吴三桂造反大业敲响了丧钟。

回想吴三桂的一生，我们不必用意识形态的词语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枭雄，一生轰轰烈烈，阴谋与大气并存，金戈铁马，荣辱共存，他的一生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是非观来评价这个人。

吴三桂是一个生命力非常顽强的人，他始终在与命运抗争，没有坐以待毙，无论是当年保卫明朝，还是后来为自己的奋斗，以及现在守住自己藩王的地位。

临死之前，吴三桂也没有选择绝望，选择消沉，他想进行最后一搏，至少这种爱拼的人生态度值得后人学习。

在吴三桂去世前，他布置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他派遣胡国柱、夏相国带领几万人分别进入广东和广西。这两人也非常给力，夺取了大量城池，尤其在广西，几乎将广西全境收复。

可惜，局部的胜利并不能改变什么，吴三桂的人气指数直线下降，部属们纷纷离他而去。六月份，他的结发妻子张氏病死，吴三桂的精神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不久，他就病倒了。重病中，他让孙子吴世璠来衡州，吴世璠是吴应熊的儿子，吴三桂将帝位传给孙子。说是帝位，其实是个烂摊子。

吴世璠还没赶到衡州，吴三桂已经病逝。康熙得知后，立即全面进剿吴军。在清军的威逼下，吴应麟带着吴世璠从贵阳逃到云南，接着，吴应麟在交水纠集兵力，打算废掉吴世璠，自立为帝。大将郭壮图得到消息后，率军到交水，诱惑吴应麟出城犒军，将吴应麟当场勒死。

这次内乱还只是一个开始，接着，内乱越来越多。一些将领密谋擒拿吴世璠和郭壮图献给清军，吴世璠得知这个消息后自杀，郭壮图父子也双双自刎。清军进入云南后，到处寻找吴三桂的尸骨，有一天挖出了十三具尸骨，全都焚烧成灰。其实，这些都不是吴三桂的尸骨，吴三桂的尸骨只有少数人知道。后来，吴三桂的侄子出面，供出吴三桂的尸骨所在。康熙对吴三桂充满了刻骨之恨，将他的尸骨锉成灰，分发给各省。

历经八年的削藩战争，康熙终于险胜，清帝国度过了最惊险的时刻，康熙仍然心有余悸。所以，臣民们要求给他上尊号的时候，他断然拒绝。这不是什么帝王的品德，什么谦逊治国，是他对过去所作所为的反思。他没有想到撤藩会引起那么大的危机，抛开将黎民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不说，他差一点就为自己的冲动葬送了清帝国。

第三章 康熙妙手取台湾

一天，郑成功登台瞭望后，穿上明朝朝服。坐在高台上，一边喝酒，一边看明太祖朱元璋的《皇明祖训》。读到第二章的时候，郑成功忽然发出感慨：“我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说完，郑成功双手遮面，就这么去世了。

台湾大佬郑经

康熙元年五月初八，一代风云人物郑成功在台湾去世。

据说，郑成功在临死前，满脑子想的还是光复大明，他拖着病体勉强登台，用望远镜瞭望澎湖列岛。

真是一代忠臣，让人想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

一天，郑成功登台瞭望后，穿上明朝朝服。坐在高台上，一边喝酒，一边看明太祖朱元璋的《皇明祖训》。读到第二章的时候，郑成功忽然发出感慨：“我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说完，郑成功双手遮面，就这么去世了。

郑成功死后，由于没有指定继承人，台湾内政发生了危机。郑成功的弟弟郑袭暂时摄政，权力就像美女，很容易让人迷恋。郑袭忽然滋生了即位的想法，而远在厦门的世子郑经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他可不允许叔叔篡位，抢先一步在厦门即位。

叔侄两人争权，导致台湾内政混乱，人心涣散，将领间互相猜忌。清廷以为有机可乘，派遣福建总督李率泰和靖南王耿继茂前往厦门，向郑经招安。

此时，郑经处于内忧外患中，台湾本土控制在叔叔手中，前方是清廷大军，不跟清廷谈判活不下去。此时此景，郑经选择了妥协。他先让自己的族人率领八千人投降，自己跟清廷谈判，表面是谈判，其实是拖延时间。为了取得清廷的信任，郑经陆续上缴明朝的公侯伯印以及土地清册。

第二年，郑经带着心腹周全斌、陈永华和冯锡范等人打回台湾，平息内乱，一改此前的态度，拒绝招抚。

郑袭失败后，投降了清朝。十月，清廷任命靖南王耿继茂为统帅，兵分三路进攻厦门、金门和泉州。除了泉州一路，清军大败外，另外两路都取得了胜利，攻克了厦门和金门。

康熙三年（1664年），镇守铜山的周全斌降清，郑经率领战舰撤到台湾。就这样，郑成功经营多年的沿海根据地全部落入清军手中。

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清廷派遣福建总兵孔元章，带着郑经舅舅的信前往台湾和郑经协商，希望两岸进行通商。清廷主动示好是有条件的：郑经必须向清廷俯首称臣，定期纳贡，并送子入京做人质。郑经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不剃发，像朝鲜那样拥有高度的自主权。对此，清廷不能接受，谈判破裂。

后来，孔元章又几次赴台协商，但都没有达成共识。不过，在这个过程中，郑经巧妙地实施了一个反间计。他在言谈中不经意地问了句：“听说施琅和阁下关系好，有没有文书作为交往的凭证呢？”

孔元章听在心里，回去后把这事马上告诉了清廷。清廷还真像蒋干一样中计了。

施琅是福建晋江人，早年是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施琅跟随郑芝龙降清。后来，郑成功邀请施琅一起反清，施琅拒绝了他。郑成功一怒之下，将施琅的父亲、弟弟、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子都杀了。由此，两人结下深仇大恨，施琅发誓要报仇。

施琅从小就生活在海边，水性很好，而且对郑氏知根知底，可以说是康熙收复台湾的一个利器。康熙元年，施琅被提拔为福建水师总督，在攻克厦门和金门的战役中，施琅都立下大功。康熙三年（1664年），清朝授予施琅为靖海将军，负责训练水师，为渡海攻台作准备。

施琅的事业正在步步高升之时，孔元章忽然把这个消息告诉清廷，清廷不免怀疑施琅跟郑经勾结。清廷原本对于降将就不是很放心，便将施琅调到京城监视，授官内大臣。随后，清廷撤销水师，焚烧战船，将水师调到外省，导致攻台计划流产。

康熙八年（1669年），再派遣豪华使团出使台湾，希望郑经能以大局为重。郑经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剃发，像朝鲜那样。

郑经的政治太极玩得出神入化，让康熙这样的资深忍者都禁不住烦躁起来。康熙甚至差点做出让步，答应郑经的条件，结果被明珠阻止了。

吴三桂造反后，耿精忠在福建响应，并邀请郑经一起出兵。郑经

如约，出兵攻占了泉州、漳州、潮州三郡。康熙十四年，郑经和耿精忠联合攻打广东，拿下许多城池。耿精忠是个非常贪婪的人，势力壮大后，没有如约将事前答应的漳州和泉州送给郑经。郑经很生气，后果比较严重，郑经直接攻下了漳州和泉州，据为己有。

康熙十五年（1676年），耿精忠投降，清军收复了漳州、海澄一带，将郑经赶到厦门。

当时，吴三桂虽然在走下坡路，势力还是非常强大。康熙为了集中精力对付吴三桂，决定对郑经做出让步。康亲王杰书奉命与郑经谈判，但郑经提出的条件比以前更苛刻，不仅仍然坚持以前的原则，还加上了许多附加的条款。如果息兵的话，清廷必须出让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四府。康亲王做出让步，表示可以不剃发，可以像朝鲜那样，但是不同意给郑经的军队发粮饷。

郑经一看，你让我做你的藩属，又不给我发工资，可以啊！但是你必须再割出一部分沿海城市给我。双方仍然一边谈一边打，但是由于地盘问题一直谈不拢。

吴三桂死后，清廷平定了三藩，集中精力攻打郑经，将郑经又打回台湾岛。

姚启圣和施琅比赛收复台湾

姚启圣，浙江会稽人。其人任侠豪迈，轻狂不羁。

根据一些野史笔记的记载，姚启圣这个人力大如牛，胡须非常长，目光炯炯有神，像闪电一样逼人。姚启圣年轻时到各地浪游，一次睡着了，鼾声如打雷，有个仆人偷看，发现他就像一尊老虎雕塑一样。姚启圣这个人性情非常豪爽，花钱如流水，到处打抱不平，完全就是金庸群侠传里面的人物。

那么姚启圣是怎么发迹的呢？

耿精忠造反的时候，姚启圣捋须大笑：“一竖子耳，在我眼里他就像池塘里的青蛙，能有多大作为啊，哈哈！”

当然，姚启圣也不是光说不练，他很快就证明自己说的不是空话。他和儿子姚仪散财，招募了几百人，投到康亲王杰书的麾下。很快，姚启圣由于屡立战功，得到杰书的赏识，提拔为温处道僉事，耿精忠投降后，姚启圣擢升为福建布政司，负责征讨郑经。康熙十七年，姚启圣升任为福建总督，才五年的时间，姚启圣就从一个被革职

的知县当上了一省总督，升官确实很快。

也就是从这时起，姚启圣这个名字跟台湾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两年后，姚启圣晋升为兵部尚书、太子太保，此人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但姚启圣却是个狂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御史徐元文弹劾姚启圣，列举他七大罪，并建议将他革职查办，永不叙用。姚启圣的罪名主要是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生活堕落，包养一大批歌女舞姬，还强占他人妻子；排挤同僚，侵占他人功劳。

对于这些指控，姚启圣态度强硬，一概予以否定。对于这些指控，康熙并没有追究，他知道姚启圣是个可用之才，当时正是用人之际，不但没有处罚姚启圣，反而给他加官晋爵。这是康熙用人高明的地方，他知道姚启圣虽然轻狂，得罪了不少人，但是对朝廷忠心耿耿，永远处于可控范围中。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必要追究。

平定台湾的任务落到姚启圣头上，姚启圣在陆地上大战还行，但对于水战并不精通。所以，姚启圣给康熙推荐了一个人。施琅，要不要用施琅，康熙是犹豫的。施琅的能力康熙看得一清二楚，但是他不太相信施琅这个人。一方面是因为施琅背景复杂，另一方面上次郑经的反间计至今还施加着影响，加上后来康熙解除施琅的权力，把施琅召到北京。施琅进京后的生活过得很不如意，不仅政治失意，连经济也比较困难。

在京期间，施琅仍然密切关注郑氏集团的动向，研究海战方面的兵书，准备有天再次报效朝廷，澄清别人对自己的怀疑。

真正让康熙下定决心启用施琅的保荐人是李光地。李光地是康熙的亲信大臣、内阁学士，李光地曾和施琅谈论战事，施琅对战事的精辟分析深深地让李光地折服。李光地从此佩服施琅的才智和谋略。

康熙二十年七月，一天退朝后，康熙让明珠和李光地单独留下，询问他们对郑氏的策略。李光地分析了多年来招抚失败的原因，表示招抚这条路走不通，只能用兵。康熙问他：“用兵的话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

李光地打起了太极：“点将，这么大的事，臣怎么敢参与呢？”

康熙又说：“就你看来，有没有可以信任的人，说说无妨啊！”

李光地还在犹豫，康熙一再催促他。最后，李光地说道：“此事非同小可，让我好好考虑几天吧，考虑完了我会给圣上答复的。”

康熙不等李光地答复，就催促明珠去问，李光地委婉地说道：“要说信任的话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值得信任的人，综合考虑，还是施琅更适合一些。”

康熙于是亲自召来李光地：“施琅的能力朕知道，但是你能保证他不会有其他的麻烦事吗？”

李光地想了想说：“施琅的才略确实无与伦比，但是为人比较孤傲，成功之后让兵民相安，约束自己还得靠圣上妙手妙法啊！”

在李光地的推荐下，康熙于是在内庭召见施琅，问他计策。施琅对答如流，精辟地阐述了对台的用兵之策，康熙帝很满意，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太保头衔。

施琅被提拔的这年，郑经去世，年仅十二岁的郑克塽继位。郑氏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激烈，人心涣散，为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契机。

施琅来到福建后，姚启圣感觉到巨大的压力，他发现，这个人在狂傲方面并不输于自己。

施琅跟姚启圣一样，也是个很自负的人，做事雷厉风行，而且不买姚启圣推荐之恩的账。

从上任开始，施琅就要求掌管指挥征讨台湾的独立指挥权，姚启圣当然不高兴了。当施琅把康熙的密信交到姚启圣手里，姚启圣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施琅独断专行。

姚启圣是负责招抚工作的，施琅却是来打仗的，目标不一样，工作当然无法协调。姚启圣非常担心，自己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被施琅搅黄。但施琅就像一个疯子一样，一再奏请快点攻打台湾。姚启圣急了，也上奏请求征剿。

对于两人的竞争，康熙看在眼里，笑在心里。

因为各种原因，康熙没有立即让他们征剿台湾。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下令由施琅负责，进剿台湾。

这年六月，施琅率水军从铜山出发，不小心被流矢射中了眼睛。施琅没有半刻停顿，号召全军快速前进。和刘国轩经过一番血战之后，终于拿下澎湖列岛。

澎湖一破，台湾基本宣告失败。施琅就像一个复仇的疯子，不拿下台湾誓不罢休。姚启圣在一旁沉不住气了，立即上奏，要求由自己收复台湾。

六月初八，施琅收到郑克塽的乞降信，郑克塽表示愿意剃发称臣，永居台湾，报效朝廷。施琅却断然拒绝，八月，施琅大军进入台湾。郑克塽带领文武百官前去迎接，并在台湾张贴安民剃发的告示。

台湾归降的消息传到京城，正是中秋佳节，康熙很是喜悦，亲自写诗赞扬施琅，授予他靖海将军，封靖海侯，并赐御袍。

看到施琅名利双收，姚启圣一气之下，回到福州，居然发病死掉。

后人常常夸康熙会驾驭人才，用名利做诱饵，让属下疯狂竞逐，由此收到超乎寻常的效果。

台湾回归祖国怀抱

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等人奉命来到京城。康熙授予郑克塽公爵头衔，刘国轩和冯锡范为伯爵，给他们分配上等住房。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刘国轩起了很大的作用，施琅特地保荐了他。施琅说台湾岛地势险恶，波涛汹涌，要想轻易夺取恐怕很困难，在这种情势下，刘国轩依然决定归顺朝廷，免致生灵涂炭，功劳实在不小。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提拔刘国轩为直隶天津总兵官，刘国轩临行前，康熙亲自召见他，对他说：“台湾那地方郑氏控制了六十多年，朕知道你一直心怀忠诚，前次施琅用兵征剿，你能顺应天命，让我很感动，所以特地提拔你为天津总兵官。天津这地方跟其他地方不同，应该多注意安抚工作，让兵民相安，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我对你的期望。”

此后，康熙还赏赐刘国轩大量的土地，答应刘国轩三代可以继承他的爵位。

台湾已经属于清政府，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弃留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现在肯定不算问题，领土当然是越大越好，寸土必争。但是当时，人们更多的是考虑实用价值。譬如，当时就有很多朝廷大员和封疆大吏认为台湾孤悬海外，容易滋生盗贼，干脆不要了，直接守着澎湖列岛就行。还有人建议说，把台湾岛上的人民迁到内地，将台湾岛弃置不用。

康熙年间，人口大概有四五千万，面积却比现在还大，所以不用担心住房紧张耕地不足的问题。某些人主张放弃台湾岛也是可以理解

的，但这种观点是缺乏远见和战略意识的。作为一个领导者，康熙一时之间也拿不定主意。

这时，施琅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他对台湾实在太了解了，他告诉康熙台湾千万不能丢，如果不要台湾必然会酿成大祸，收下台湾却可以永镇边疆。这种见识是非常明智的，台湾就像大清国的一个海外基地，不沉的航空母舰，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有极高的战略意义。施琅还反复强调，台湾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荒岛，台湾是一个宝岛，物产丰富，土地肥沃，在这里生活的人民什么都不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如果将台湾人迁到内地，他们肯定是不乐意的，再说台湾人口密集，迁徙很不容易，而且要花费巨资；另外，台湾也是对付红毛怪（荷兰殖民者）的一个防守要地。

康熙并不是什么都懂，他英明的地方在于能够听取大家的意见，深思熟虑之后，康熙表示：“台湾这块地方关系重大，放弃不要的话肯定不行；如果迁徙当地人民，又担心人民流离失所，抱怨多；派人镇守的话，又担心形成地方割据；如果换人，三年一守，换来换去的话，对当地人也不太好。”

最后，康熙决定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派遣一个巡道负责，台湾隶属福建。这样一来就削弱了台湾的地位，防止镇守台湾的人养虎为患。康熙派遣的驻台士兵也不多，只有八千，这些士兵统一受福建总督节制。

不久，康熙就任命杨文魁为第一任台湾总兵官，临行前，康熙叮嘱他：“台湾远在海角，刚刚平定，人心可能不稳，而且那里土著人什么都有，你到了以后，一定要安抚有方，该立威的就应该慑之以威，该施恩的应该怀之以恩，总之要达到海外升平，一片和谐。”

在台湾问题上，康熙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妙手政经”，这些经验对于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第四章 寸土必争——康熙大战沙俄

这些人非常野蛮，穿着兽皮，拿着火枪，冲进了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这里是女真人的聚居地。当地人非常害怕这些野蛮人，因为这些人非常凶狠，他们烧杀抢掠，将当地人像猎物一样捉住，然后戴上枷锁，强迫他们做奴隶，甚至还把人宰了吃。

罗刹来了

清朝的发祥地在东北一带，所以在清王室眼里，东北一直是龙兴之地，跟别的省份有所不同。

清朝入关之后，东北一带由此防守空虚，就在康熙平三藩收台湾的时候，一群不速之客闯入了满洲人的龙兴之地。

这些人非常野蛮，穿着兽皮，拿着火枪，冲进了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这里是女真人的聚居地。当地人非常害怕这些野蛮人，因为这些人非常凶狠，他们烧杀抢掠，将当地人像猎物一样捉住，然后戴上枷锁，强迫他们做奴隶，甚至还把人宰了吃。满洲人虽然也野蛮，和这些人相比却只能算上小巫，加上入关后深受儒家思想洗礼，满族人俨然成了诗书礼仪的贵族。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些野蛮人是从哪里来的。后来，这些人自报家门，他们要清朝皇帝归顺他们的沙皇，做沙皇的臣仆。这些人恶狠狠地说：“如果不归顺的话，我们沙皇就要武力解决问题，将你们的男女老幼杀得一千二净。”

罗刹是佛经里的词语，原意是食人恶鬼，由于哥萨克人在东北一带表现得跟食人恶鬼没什么两样，所以当地人就称他们为罗刹。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沙俄殖民者吧！

沙俄的历史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从秦始皇时候就开始了。沙俄在以前是四分五裂的，有一段漫长的被入侵的历史，后来，成吉思汗的子孙占领了沙俄，建立了金帐汗国。

到十五世纪末，沙俄才独立，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首都在莫斯科。十六世纪下半叶，沙俄积极对外扩张。崇祯五年的时候，沙俄在勒拿河畔建立雅库茨克城，逐渐将魔爪伸向我国黑龙江地区。

崇祯十六年（1643年），雅库茨克的首领戈洛文派遣波雅科夫闯入黑龙江的达斡尔，骚扰女真人，做出了种种令人发指的事情，以至于后来一提到哥萨克，黑龙江人就想起吃人野兽的样子。当时，政府鞭长莫及，没人管这里的事情。当地人民只好组织起自发的武装力量。

一次，七十多个哥萨克人到达斡尔村庄抢粮食，达斡尔人给他们一个突然袭击，击毙了十名强盗，击伤了五十多人。在精奇里江的河口，女真人袭击了沙俄侦查队伍的营地，杀死了二十四人。到了顺治二年（1645年）时，波雅科夫带领的一百三十人只剩下五十多人，他们在黑龙江实在混不下去了，不得不逃回雅库茨克。

顺治六年（1649年），雅库茨克来了一个新的统领——弗兰茨别科，他任命哈巴罗夫为头领，率领七十名哥萨克人组成远征队，向黑龙江进军。七十人，确实非常藐视清廷。清廷还没出面，哈巴罗夫就遭到了当地人的激烈反抗，哈巴罗夫吃了当头一棒，终于清醒地意识到：想靠区区几十个人去征服人口稠密的达斡尔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于是，哈巴罗夫匆匆赶回雅库茨克，申请调动六千人征服黑龙江全境。沙皇并不是一个大方的人，肯定不放心把六千士兵交给哈巴罗夫，但也给他增拨了两百的人马，要求哈巴罗夫拿下达斡尔，并让哈巴罗夫给清朝皇帝递交一封信。在信中，沙皇非常嚣张地表示，如果清朝不俯首称臣，就要将清朝人全部杀光。

哈巴罗夫带领几百士兵来到黑龙江，攻打雅克萨，达斡尔酋长阿尔巴西就住在这附近。哈巴罗夫占领雅克萨后，在这里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企图将这里作为进一步进攻黑龙江的据点。哈巴罗夫以阿尔巴西的名字将雅克萨命名为阿尔巴津。接着，他们开始对附近的村庄四面出击，用洋枪洋炮对付赤手空拳的村民，血腥和残酷顿时在黑龙江边蔓延开来。

在桂古达尔村庄，罗刹们遭到了当地人的激烈抵抗，当地人使用的武器是竹箭。罗刹用大炮打败了当地居民，制造了惨无人道的血案，杀死居民六百六十一人，夺走妇女二百四十三人，抢走儿童一百十八人，只有十五个居民逃走。更让人愤怒的是，这些野兽居然用父母的尸体来烧烤孩子，然后吃掉。

沙俄的野蛮行径激起了清朝人民的愤怒，当沙俄进一步入侵之时，当地居民一边抵抗一边向清军报警。镇守宁古塔的清军昂邦章京率军阻击沙俄入侵者，当地的人民纷纷协助清军作战。就在清军和人民冲进敌人堡垒的时候，昂邦章京海色居然下了一道愚蠢的命

令：“不准杀死哥萨克，捉活的。”结果给沙俄以可乘之机，他们趁机拉回大炮，对清军进行了轰击，清军付出很大伤亡，被迫撤围。

这一战，清军虽然被打退，但是震惊了沙俄。哈巴罗夫不得不撤走，随后，沙皇又任命斯捷潘诺夫为达斡尔地区长官。顺治十二年的时候，清军都统安达礼重创俄军，后来由于粮草缺乏，安达礼不得不班师离开，导致斯捷潘诺夫在黑龙江横行。

顺治十三年（1656年），又有一支沙俄军从叶尼塞斯克出发，闯进石勒格河流域，在顺治十五年占据蒙古族居住地尼布楚，并将尼布楚据为己有，在这里建筑堡垒。

斯捷潘诺夫带着五百人在松花江一带横行无忌，终于遭到清军的阻击，宁古塔昂邦章京带领一千四百人在松花江畔和俄军展开激战，击毙了头领斯捷潘诺夫，杀敌二百七十多人。随后，清军收复雅克萨，摧毁俄军堡垒。

顺治十七年（1660年），宁古塔总管沙尔虎达子巴海得知俄军在费亚喀部落西岸，立即赶到那里，埋伏起来，当俄军出现时，发动突然袭击，大败俄军。胜利之后，清军并没有进一步巩固成果，而是撤军离开。

康熙四年（1665年），沙皇派遣切尔尼科夫斯基再次攻占了雅克萨，之后任命切尔尼科夫斯基为雅克萨长官，并将雅克萨划入本国的尼布楚。侵略者们以雅克萨为据点，开始向黑龙江中下游渗透。

这次，侵略者比以前更高明了，不再像以前那样野蛮，反而展开了外交战和心理战，极力拉拢少数民族的首领，进行分裂和颠覆活动。达斡尔酋长根特木耳本是清朝的四品官。在沙俄的引诱下，居然叛国，逃亡尼布楚，结果导致了中俄之间的“逃人纠纷”。

康熙十二年（1673年），陆续有一些将领叛逃。当时国内不稳定因素正酝酿，康熙并不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

早在顺治的时候，沙俄就派遣使者进入北京，当时沙俄使者不肯下跪，由此导致外交上的礼仪危机，结果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对沙俄的侵略行为，康熙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而沙俄虚与委蛇，一面和清廷周旋，一面继续进行武装侵略活动。

康熙八年和九年，清廷两次派遣索伦等人到尼布楚交涉，要求沙俄当局立即停止无耻的侵略行为，并将叛国分子根特木耳等人遣返回国。可惜，沙俄对这些都置之不理，沙俄不吃软，只吃硬，康熙在心里摸透了沙俄这个特点，决定时机来了，就好好教训一下沙俄。

康熙九年（1670年）四月，沙俄的使团来到北京，态度强横，要清朝低头服输，并允许北京与沙俄自由通商。面对这么狂妄的使者，清廷居然仍然非常友好。这就奇怪了，其实康熙等人完全不知道使者在说什么，宫廷里没有一个懂俄文的，所以对于对方的侮辱性言辞和内容一无所知，反而善待他们，临走时还给他们许多礼物。这无疑让沙俄以为清廷是软柿子。

不久，康熙让索伦带着国书去尼布楚，国书中表示愿和沙皇永修友好，但沙皇必须履行两个条件：一、归还根特木耳等人；二、不得骚扰边境。沙皇将康熙的要求当成放屁，根本不做任何回应。

康熙十四年（1675年），俄方派出以尼古拉·斯帕法里为首的百人使团来京，俄方使者给康熙一份国书，要求他允许两国互市，清朝每年将四万两左右的银子和其他宝贵物品运往沙俄，购买清朝需要的货物，指定海陆通商航线，释放被俘虏的沙俄人。对于边境问题和遣返叛徒回国的问题，沙俄使者却只字未提，康熙问起时，他们借口看不懂汉字，所以没办法照办。

但康熙还是以礼相待，不跟这些人一般见识。尼古拉在京期间，不光是为了外交，更多是为了刺探清朝情报。他曾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那里得知一些情报，南怀仁告诉他：“如果不引渡根特木耳，康熙一定会对俄作战，康熙打算先攻打阿尔巴津和尼布楚要塞，先发制人。现在之所以没打，是因为在准备，如果边境的哥萨克士兵能够安分守己，停止骚扰，皇上或许不会攻打。”

有人认为南怀仁是个间谍，康熙看错了他。但笔者怀疑南怀仁的那番话可能是康熙的计策，目的是希望沙俄能够知难而退，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效果。一个比利时人犯不着为了俄国出卖自己的信仰，康熙对待南怀仁一直不错，待之以师礼，他有必要跟自己的皇帝学生过意不去吗？

沙俄不为所动，后来清朝出现了三藩动乱，沙俄趁火打劫，加强武力扩张，企图占领整个黑龙江。几年间，黑龙江鸡犬不宁，康熙忙于三藩，无暇顾及。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这帮强盗做出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他们把二十几个猎人诱骗到一个房间内，活活烧死。

康熙彻底明白了，跟这帮强盗没道理可讲，这些混蛋根本不要什么和平，只有武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康熙对大臣说：“罗刹骚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多年，他们抢掠的地方离我朝发祥地很近，如果不迅速剪除的话，恐怕边境的百姓从此不得安生，朕从亲政以后，就时刻关注着罗刹问题。”

在征讨之前，康熙先大量搜集情报，了解敌我形势。三藩之乱给康熙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从此他做事慎之又慎。

雅克萨之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在黑龙江东岸古城的废墟上建立起黑龙江城，也就是瑷珲。在这里架上大炮，预备军舰，布置一千五百名官兵，由宁古塔的副统领萨布素率领。第二年冬天，康熙又增派一千宁古塔和达斡尔官兵到黑龙江城。这年冬天，康熙又从北京派出六百士兵前往黑龙江城。为了对付俄军大炮，康熙又从全国各地将大炮运往黑龙江城。

在粮草方面，康熙也下了很大工夫，他很清楚，如果粮草不充足，即使战争胜利了，也无法巩固胜利果实。康熙给黑龙江城送去了大量的粮食，这些粮食可以维持三年。

康熙二十二年，萨布素率领一千人在黑龙江一带巡视，前锋部队遇到了六十六名沙俄侵略军，萨布素下令迅速包围俄军，俄军无奈之下，只好选择缴械投降。在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中，黑龙江人民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拿起武器，保卫家园，击杀外来的侵略者。当地人民配合清军消灭俄军，为他们做向导，给他们提供食物。军民同仇敌忾，赶走了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雅克萨变成了一座孤城。

这些行动为决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五月，副都统马喇和萨布素商量，决定先割取俄军的田禾，等俄军粮草陷入困境，再派轻骑剿灭。康熙接受了这个计策，让萨布素兵分两路向雅克萨进发，一路军队捣毁俄军田禾，另一路埋伏起来，如果俄军出现，就伺机灭掉。

可惜，出于种种原因，萨布素并没有执行康熙的命令，他的理由是毁掉对方的田禾不方便，徒然让士卒疲劳。这个理由非常奇怪，由于我们不在现场，无法知道当时的情况，萨布素的话肯定是借口，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萨布素是一个优秀的将领，而且相当清廉。他当时之所以这么做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很愤怒，指责萨布素坐失良机。在随后的一些作战中，康熙对萨布素也很不满。

萨布素在1702年郁郁离开人间，他虽然是一个抗俄英雄，但始终得不到康熙的好感，在官场上颇为失意。

康熙在武力备战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途径。对于被俘的俄军，康熙要求部众善待，不准杀戮一人。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月，为了让俄军尽快撤出雅克萨，康熙致书沙皇，国书由投降的俄军带到莫斯科，这番国书有礼有节、恩威并在，内容如下：“以前，我们两国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没有骚扰过我们的边境；后来，你们入侵我边境，骚扰百姓，民不聊生。本来，朕应该立刻发大军征讨，但恐这么一来，伤了两国的和气，让边境百姓受苦，所以不忍发兵。朕以前把自己的想法和态度告诉了你们使臣，还派人到雅克萨和尼布楚反复讲明立场，至今没有看到你们派人来回信。你们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跑到我国来，滋事抢掠。即便如此，朕也不想立刻征讨，只是派遣官兵，截断你们的去路，对于投降的罗刹，朕一个都没有杀，反而恩养他们……但你们始终不知好歹，仍然无法无天，这是在逼朕动刀子啊！如果你们尚有爱民之心的话，希望你们体谅你们的百姓，免得他们承受战乱之苦。希望你们立刻撤出雅克萨和尼布楚，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家，如果你们能做到这点的话，两国就相安无事，和睦相处。”

对于康熙的警告，沙俄根本懒得理会。和平解决边境问题是没有希望了，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命令都统公彭春、前都统郎坦、班达尔沙和萨布素为将领，率领满汉蒙达斡尔等众多民族的军队前去攻打雅克萨。听到这么多民族的军队，很多人一定以为是十几万大军吧，事实上只有三千人。

三千人在边境战场上规模还是非常大的，从前面我们看到，经常是几十上百人交战。三千大军从瑷珲出发，分成水陆两路，进攻雅克萨。

刚开始几天，行军很不方便，下了暴雨，雷电交加，江水泛滥，尤其是水军根本前行不了。几天后，大雨停了，部队才继续前进。行军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这时，军队中缺少肉食，忽然看到几万头鹿从山上疾驰下来，将士们都非常兴奋，纷纷拿起弓箭打猎，一次获取了五千头鹿，肉食问题完全解决了。

六月初，清军终于抵达雅克萨，将指挥部建立在雅克萨对面的一个小岛上。六月二十三日，清军来到雅克萨城下，在交战之前，清军将康熙的书信交给俄军。在书信中，康熙再次表示只要俄军撤出雅克萨和尼布楚，兵戈之事就可以避免。

先礼后兵，康熙的政治智慧在当时世界绝对是一流的。不过，俄军并不买账，他们仗着城堡坚固，对清军出言不逊，更别说迂回沙俄内地了。

清军于是包围了雅克萨。二十五日清晨，俄军的一支部队坐船来支援雅克萨城，清军将领林兴珠带着士兵跳进水中，拿到大刀冲向敌船。由于在水中，俄军的炮火完全不管用。看着清军勇猛的样子，俄军惊呼：“大帽鞅子。”

清军靠近船只后，大砍敌军的脚，俄军死伤大半，纷纷坠入江中。侥幸逃脱的俄军头也不敢回，这一战，清军没有损伤一个人。

赶走了俄军援军后，清军开始集中火力攻城。俄军有大炮，清军也有大炮，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最终俄军不敌，清军的神威大炮轰得俄军伤亡惨重，以至于俄军的神甫不得不捧着十字架向上帝求援。看到俄军吓破胆后，清军开始在城墙周围堆积柴火，准备焚烧城堡。雅克萨长官托尔布津吓得满头是汗，再这么抵抗下去，可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无奈之下，托尔布津向清军投降，并且表示再也不来雅克萨了。

失去二十多年的雅克萨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令人伤心的是，最终雅克萨还是失去了。不过，这已经是几百年后的事了。

战场上的胜利并不能弥补决策的失败，清军在攻陷雅克萨之后，没有在雅克萨驻军，甚至没有割取雅克萨附近的田禾，就将全部将士撤回瑗珲。

令人气愤的是，清军放走托尔布津后，托尔布津回到尼布楚，碰上了拜顿的援军。拜顿是德国的一个军事工程师，得知清军撤离雅克萨后，他建议托尔布津再次占领雅克萨。这次，托尔布津带了五百人，再次占领雅克萨，并将附近的田禾收割，用作粮草。在拜顿的指导和监督下，俄军开始修建堡垒，由于有专家指导，堡垒比以前修得更坚固。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萨布素侦查到俄军又回到雅克萨。萨布素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报告康熙，请求率舰队亲自去征剿。康熙还以为这是个谣言，他觉得罗刹不至于那么大胆，后来从一名俘获的俄军口里得知情况属实。

康熙下令：“罗刹又在雅克萨城盘踞，如果不快速扑灭，他们势必会积粮固守，时间长了，要拿下来就比较困难了。”

萨布素和郎坦等人率领两千多官兵由瑗珲出发，分水陆两路，在七月十八日抵达雅克萨城下。到了以后，还是老一套，先警告俄军“速回本土”，俄军当然不买账。这次，托尔布津有军事专家拜顿的支持，加上火器充足，城防坚固；对比之下，清军由于紧急调动，炮火明显不足，主要武器还是弓箭大刀。尽管如此，清军还是主动出

击，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屡次击败俄军。

当然，这次要攻下城池确实没上次那么容易。雅克萨一带冬天来得特别早，八月份就特别寒冷，康熙让萨布素做好结冰时期的打算。在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打仗，天气是影响胜负的至关重要因素。一旦结冰，肯定对攻城一方不利，守城者在城堡内至少不会挨冻。

萨布素不愧是一个优秀的边防大将，他针对各种情况，很快就出台了一揽子计划。首先，敌方城池坚固，萨布素暂停攻城计划，而选择长期围困敌人，他在城墙三面挖了壕沟，设置了木桩鹿角这些障碍物，同时在城对面的岛上筑起指挥所，当作士兵们的过冬营寨。萨布素还将炮口对准雅克萨，封锁江面；大江两岸驻扎有水师，防止敌人从江上逃走，此外，还在城上游的港湾内，埋伏好战船，堵截从尼布楚那边过来的援军。

萨布素负责围城，索伦在从后方运来粮草。

就这样，面对清兵的重重包围，俄军被困在城中无计可施。俄军几次企图突围，都失败了。托尔布津在一次突围中激战身亡，随后，拜顿接过指挥权。拜顿虽然是个军事技术专家，但是对于俄军当前的处境没有任何办法，城内俄军缺乏粮食和柴火，饥寒交迫，不少士兵病死饿死。八百多俄军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个人，眼看这些俄军除了投降再也没有活路，鉴于上次的经验，投降了清军会放过他们吗？这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康熙再一次伸出了橄榄枝，或许有人非常郁闷，仗都快打赢了，干嘛还要送橄榄枝。要知道，康熙并不是打仗的将领，他是一个政治家，准确地说，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全歼雅克萨城内的俄军容易，但是修得百年和平难啊！再加上这时候蒙古部落的一个叫噶尔丹的酋长很不安分，噶尔丹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看到沙俄在边境滋事，意识到翻江倒海的机会来了。噶尔丹企图和沙俄勾结，在清朝北部边疆攻城略地。康熙不希望也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安内必先攘外，要想把内部的叛徒剿灭，必须先安定这些好事的罗刹。

康熙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境问题，并将这种意向用国书的形式交给沙皇。

沙皇本来也是个很强硬的人，但是考虑到雅克萨的俄军已经陷入绝境，如果不谈判的话，城内俄军就会全军覆没，雅克萨城一样是丢。万般无奈之下，沙皇接受了和谈的建议。

九月，沙皇派遣使者魏牛高到北京，通知清廷，俄国政府愿意接

受和谈，已经指派戈洛文为大使举行边界谈判，希望北京方面能够撤回雅克萨的军队。

康熙面露微笑，立即下旨撤回雅克萨的清军，允许城内罗刹自由出入。康熙二十六年正月，朝廷派遣了一些医生到雅克萨去为清军治病，康熙对萨布素下令：“我军虽然和罗刹对垒，现在既已和谈，就不再是敌人，如果城内有罗刹生病，也给他们治疗。”

五月，清军主动后退二十里，七月，俄国谈判代表已经抵达边境。康熙再次命令清军撤退到瑷珲和嫩江一带，充分显示出了和谈的诚意。

《尼布楚条约》

外交是战争的延续，打仗并不困难，两次雅克萨之战清军都取得了胜利。这场外交战能够全胜吗？

在清军解除了对雅克萨的包围后，俄方反而一再拖延，故意让清廷焦躁，以此增加在谈判中的筹码。罗刹也会耍赖，所以怪不得金庸在《鹿鼎记》里让韦小宝这样的无赖与俄国人谈判。

俄方一再拖延，一年半后，戈洛文才派遣斯捷潘科罗文到北京，告诉康熙谈判地点定在色楞格。康熙表示同意，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派遣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佟国纲、尚书阿喇尼以及将军马齐、马喇等人前去谈判。除了谈判的人之外，还带了两百前锋士兵、四百护军、两百八十个火器营的士兵。

临行前，康熙对索额图说：“罗刹侵犯我边境，占据我尼布楚、雅克萨等地，收留我叛徒根特木耳，在我黑龙江边筑城，我们两次发兵，才逼得他们谈判。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都是我们的地盘，不可让给罗刹哪怕一寸土地。根特木耳这些人，一定要罗刹归还，只要他们归还了，我们也归还他们的俘虏。划定疆界后，可以允许边境的人民自由通商。”

索额图等人五月出发，七月下旬，到达克鲁伦河，不巧遇上了草原枭雄噶尔丹。噶尔丹打败蒙古喀尔喀部落后，称雄于草原。索额图等人前行的道路受阻，康熙让他们暂时先回到北京。清廷让前锋将领索罗希前往色楞格，告诉他们受阻的原因，并建议俄方再派遣代表到北京，重新商定谈判的地点和时间。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戈洛文再次派使者到北京，提议

在尼布楚举行谈判。就在这时，噶尔丹征服了喀尔喀全境，势力逐渐庞大，暗地里与沙俄勾结，准备南下。由于形势的转变，康熙不得不在与沙俄的谈判中做出让步，以便及早腾出手来对付噶尔丹。

沙皇方面，对戈洛文的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如果不能以黑龙江为界，最后的让步也应该把国界定在牛满河或者精奇里江。如果对方连这个都不接受的话，我们还可以再退一步，以雅克萨为界，但黑龙江与牛满河、结雅河沿岸的渔猎场全部归我们。如果清朝人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话，没办法了，只能打了，所以军事方面也要准备好。”

沙皇也是个贪婪的角色，他想通过外交的方式得到战争得不到的东西，侵吞清朝黑龙江的大片领土。

然而，沙俄国内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真正的扩张重心在欧洲，但是这一年沙俄的远征军在克里米亚遭遇失败，由此引发了国内的动荡，贵族和商人们都不希望俄国再和清朝发生战争。此时，沙皇也希望尽快和清朝议和，达成协议。在谈判之前，沙皇命令军队撤出雅克萨，并要求拆除防御工事。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三十一日，索额图等人到达石格勒河，距离尼布楚只有几里路，不久，萨布素带领的一千五百官兵也抵达尼布楚。让人气愤的是，戈洛文却迟迟没有来到。索额图多次派人到尼布楚催问，俄方却敷衍塞责。后来，戈洛文来信说明迟到的原因，并要求清军水师退到下游。

谈判的时间定在八月二十二日，地点设在尼布楚与河边的空地上，谈判的场所是郊外搭建的帐篷。谈判的原则是平等，双方都不得凌驾在另一方之上，两国使臣可以各带三百名侍卫，侍卫只能带冷兵器，不能带火器之类。会场外面，双方可以布置五百名卫队。

八月二十二日，第一次谈判大会正式开始，中方代表除了索额图、佟国纲、马喇、萨布素、郎坦等人外，还有两个西方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他们负责翻译；俄方代表是戈洛文、弗拉索夫和科尔尼斯基。

戈洛文首先发言，他把中俄战争的责任全都推到清朝身上，诬陷清朝没有宣战就派兵侵犯沙皇的国界，所以沙皇才派遣大量精兵，携带无数的弹药来讨伐敌人，直到收到清朝皇帝的和谈信，热衷于和平的沙皇陛下才放下兵器，派我们这些人过来谈判，所以清朝应该对受害者俄国进行赔偿。

当翻译把戈洛文的话翻译过来后，索额图火冒三丈，痛斥戈洛文

一派胡言，指出沙俄是侵略者，在黑龙江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清朝皇帝是忍无可忍才出兵讨伐，即便如此，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没有杀害任何投降的罗刹。索额图一番义正词严的控诉让戈洛文哑口无言，戈洛文不想就谁是谁非这个问题争执。

他一再抗辩说尼布楚、雅克萨是沙俄先民开拓的地方，甚至说黑龙江流域自古就归沙皇陛下。沙俄企图通过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取得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索额图明确表示不可能，他说道：“敖嫩河、尼布楚向来是我女真部落居住的地方。我们皇帝几次出兵都没有攻打尼布楚，并不是不想夺回这块地方，只是不忍心让你的人民死于屠刀之下。皇帝如此仁义，就是希望你们能幡然悔悟，及时回头。如果你们想强占这块地方，我们皇帝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索额图要求沙俄交出尼布楚和雅克萨，退到色楞河以西。不过，第一次谈判没有得到结果。

第二天，进行了第二次谈判。戈洛文仍然坚持以黑龙江为界，索额图明确表示拒绝。戈洛文看这个方案不可能被中方接受，便抛出第二个方案，以牛满河和精奇里江为界，想把精奇里江东面和西面的大片领土包括雅克萨据为己有。索额图拒不接受，但此时索额图犯了一个错误，他亮出了底牌。他以为沙俄做出了让步，康熙又喜欢尽快达成协议，便把康熙最后的底线，也就是以尼布楚和音果达河为界摊了出来。这样一来，等于是把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的大片清朝领土让给沙俄。

尽管中方代表已经做出了重大让步，而且这个方案也满足了沙皇的训令，但是戈洛文仍然耍尽手段，想多占有有一些领土。看着戈洛文卑劣的表演，中方代表非常愤慨，索额图直接说道：“除了尼布楚外，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其他边界。”

这样一来，会议中断，谈判陷入僵局。双方一度剑拔弩张，沙俄增派了三百名火炮兵，索额图也采取措施，准备将尼布楚包围起来。

谈判仍然在继续，中方翻译张诚和徐日升告诉戈洛文：“如果不将雅克萨及其附近的地区让给清朝，和谈不会有任何结果，到最后可能还是要通过武力解决。”

沙俄虽然固执己见，但清政府已经做出了让步，而且军队也已经准备好，再加上尼布楚一带的少数民族早已忍受不了沙皇的压榨，准备和清朝军队联合，共同反抗沙俄。沙俄在尼布楚的军力本来就不多，西伯利亚那边也没有兵力可以支援，如果逼清军走极端的话，很可能引起整个贝加尔湖以东的殖民区产生动荡，戈洛文可不想冒这个险。

九月七日，中俄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土地属于清朝。黑龙江和乌苏里江都是清朝的内河，清朝同意让出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原属于清朝的土地，并允许沙俄在边境通商。沙皇同意将黑龙江内的军队撤回国。

在边界处建立了一个永久的界碑，可惜后来清政府不争气，还是让沙俄把雅克萨等大片领土夺了去。无论如何，这个条约奠定了中俄边境百年和平。

第五章 大漠孤烟马蹄疾——康熙亲征噶尔丹

噶尔丹在西藏求学时非常刻苦，深得班禅博克多的欣赏，班禅圆寂后，噶尔丹跟随达赖学习，不仅学佛法，也学武功。这些学习无疑培养了他强悍的意志力。

噶尔丹是何方神圣

清朝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很多，但唯一称得上大帝的只有康熙。康熙一生不仅在文治方面有声有色，在武功方面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康熙一生，指挥和经历的战争实在太多了，真正做到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唯一让康熙没有坐在帷幄之中的是一个叫噶尔丹的人，因为他，康熙三次御驾亲征。想想当年，对付吴三桂的时候，康熙都没有亲自出马。这个噶尔丹究竟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康熙接连三次不远万里到草原上征讨？

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也就是在这一年，天山脚下蒙古的一个部落里，诞生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就是噶尔丹。

从努尔哈赤时代起，满洲跟蒙古就是世代姻亲的关系。清朝的成功也离不开蒙古人的支持，但是在康熙时，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逐渐崛起。噶尔丹就像一条贪吃蛇，陆续吞掉其他一些蒙古部落，发育得越来越壮硕。

噶尔丹是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个儿子，据说他从小就是个转世活佛，所以在他十三岁的时候，送到西藏去学习。

噶尔丹在西藏求学时非常刻苦，深得班禅博克多的欣赏，班禅圆寂后，噶尔丹跟随达赖学习，不仅学佛法，也学武功。这些学习无疑培养了他强悍的意志力。

康熙四年，噶尔丹的父亲去世，哥哥僧格继位。康熙九年，发生了内乱。在内乱中，噶尔丹的哥哥僧格被同父异母的兄弟车臣和叔叔干掉。听到这个消息，噶尔丹召集哥哥逃散的士卒，在阿尔泰平原打败敌人。回来后，噶尔丹杀掉车臣，囚禁叔父，击杀堂兄弟巴哈班

第，一举夺取政权。

康熙十一年（1672年），噶尔丹脱掉僧衣，自称台吉，正式当上准噶尔部的首领。后来的事实证明，噶尔丹是一个军事强人，康熙十六年（1677年），他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统一了卫拉特各部。同年，五世达赖授予噶尔丹“丹津博硕克汗”，噶尔丹大有当年努尔哈赤的雄风。

噶尔丹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他不会到此为止。接着，他又用了两年的时间，征服了天山南麓的回疆，结束了叶尔羌汗国一百六十年的统治。

噶尔丹的征战就像是一道冲击波，在大草原上引起了巨大的震荡。草原英雄噶尔丹很快就引起了康熙的重视，康熙得到情报：“噶尔丹攻克了回疆的萨马下汗、哈萨克、布鲁特、叶尔钦、哈斯哈尔、塞拉姆、吐鲁番、哈密等国，攻下的城池有一千两百多座。简直就像当年的成吉思汗。”

康熙眉头深皱，他很清楚，噶尔丹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最终的目的就是统一蒙古，达到与清廷对抗的目的，然后效法当年的蒙古和满洲，夺取中原神器。

“决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康熙对自己说。

康熙毕竟不是崇祯，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历史重演。

统一西蒙古后，噶尔丹策马直指东蒙古。他将自己的大本营从伊犁迁到东面的阿尔泰山，所有的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巨大的军事风暴即将来临，带来这个噩梦的人就是噶尔丹。

对于噶尔丹，康熙仍然按照自己的套路出牌，首先伸出温柔慈祥的手，抚摸噶尔丹的头：“孩子，别闹了，都是一家人。”

对于康熙的安抚，噶尔丹表面上臣服，但是丝毫没有放松扩充势力。噶尔丹也是一面稳住清廷，一面攻城略地，壮大自己。噶尔丹会按时向清廷纳贡，后来达赖给噶尔丹加上大汗的头衔，康熙本不愿意接受噶尔丹的贡物，因为接受就意味着承认对方是汗。但为了大局的稳定，康熙还是接受了。

跟清廷搞好关系后，噶尔丹想攻打西河套蒙古，在打之前他们先试探康熙的意思。康熙非常明确地说：“西河套蒙古属于卫拉特内部事情，跟你完全没有关系。”

噶尔丹虽然对西河套垂涎三尺，但还是忍住了，没有攻取，兵锋越过西河套，向漠北蒙古冲去。

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这里有三个大的部落，土谢图、车臣、札萨克图，在三个部落中，土谢图部落的势力又是最大的。

噶尔丹很早就把土谢图锁定为自己的目标，但由于土谢图汗跟其他部落联合起来，噶尔丹不敢贸然动手。后来，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发生纠纷。札萨克图汗成衮死后，儿子沙喇继位。为了调解两个部落之间的纠纷，康熙派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带领札萨克图汗沙喇到库伦和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会盟。达赖则派出使者噶尔旦西勒图出面调解。多尔济本人没有参加这次会盟，让弟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代替自己。这个人非常强硬，在会盟中要求跟噶尔旦西勒图平起平坐，并且拒绝交还札萨克的逃众。

这次会盟的失败给噶尔丹带来了机会，他借此斥责多尔济的弟弟不尊重达赖的使者，挑拨沙喇和多尔济的关系，扬言只要沙喇攻打多尔济，自己就派兵支持。沙喇听信了噶尔丹的话，派兵攻打多尔济，没想到途中被多尔济派人击杀。多尔济联合女婿罗卜一起对付噶尔丹，并杀害噶尔丹的弟弟。

噶尔丹终于找到了开战的机会，他以喀尔喀不尊重达赖和枉杀自己的弟弟为借口，对漠北蒙古进行了大扫荡。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率领三万大军翻越杭爱山，在特穆尔一带击败土谢图汗多尔济的儿子噶尔旦台吉。紧接着，噶尔丹让弟弟罕都阿拉布坦进攻额尔德尼召，击败了哲布尊。随后，噶尔丹亲自率军越过土拉河，东取克鲁伦河的车臣汗牧地，然后班师回到土拉河畔。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联合喀尔喀三部落的兵力，倾巢而出，同噶尔丹展开了生死决战。大战三日，尘土蔽天，喀尔喀那边全军崩溃，几十万人纷纷南逃。

喀尔喀的溃败引起了各方势力的关注，沙俄首先抓住机会，看到喀尔喀部落走投无路，决定诱降。喀尔喀的一些上层领导人也主张投奔沙俄，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提出了反对意见：“俄罗斯素来不信佛，不仅语言和服装和我们不同，风俗也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投奔他们实在不是长久之计，不如我们投奔清朝皇帝吧！”

哲布尊的意见一出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土谢图汗于是让哲布尊带领两万人投奔康熙，对此，康熙非常重视，让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前去慰问，将他们安置在归化城、张家口、独石口一带，给他们粮食，给他们牲口、金银还有茶布，并让他们在科尔沁水草地一带游牧。

一连串的胜利让噶尔丹自我膨胀起来，他觉得自己现在是草原上

了不得的人物了，康熙不敢不买自己的账。他甚至向康熙写了一封信：“如果喀尔喀等人投奔天朝，希望皇帝能够拒绝他们，或者抓起来交给我，我一定会好好报答皇帝陛下的。”

康熙对噶尔丹的回复是：“朕统治宇内，把大家都看成同胞，一视同仁，希望各族人民能共享太平，没有离乱之苦。希望阁下能和喀尔喀人民和睦相处，不要再滋生矛盾了。”

康熙要求噶尔丹归还喀尔喀的土地，噶尔丹当然不会听从，否则他辛辛苦苦流血流汗是为了什么。

对于野心勃勃的噶尔丹来说，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大漠锋镝，康熙首征噶尔丹

漠北蒙古丧失，漠南蒙古就成为抵御噶尔丹的重要屏障。

在决战之前，康熙依然按照自己的套路先招抚噶尔丹，他屡次派遣大臣对噶尔丹做思想工作，收效甚微。他又要求达赖喇嘛派出一个有名望的喇嘛和清廷大臣一起劝说噶尔丹以和为贵。

噶尔丹在礼节上对清廷使者优待有加，表现得特别恭顺老实，并声明自己也是大中华家族的人，自己就是皇帝的臣民。一方面态度极好，另一方面任何实际行动都不采取，恭顺层次仅停留在言语上，这正是康熙的老祖宗努尔哈赤当年玩的把戏。

经过长年的征战，噶尔丹手下已经有几十万大军了，实力是外交的本钱。噶尔丹仗着自己势大力强，公然拒绝康熙的建议，他对使臣说：“我若与土谢图汗讲和，那我弟弟的命，谁来赔偿？我一定会灭掉喀尔喀的，抓住哲布尊。”

噶尔丹已经得到西藏达赖的支持，他进一步谋求沙皇的支持，噶尔丹几乎每年都要派人进入俄国，希望跟俄国建立军事同盟，并得到俄国的枪炮资助。俄国方面也是来者不拒，只要有甜头的事情都干。

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噶尔丹就让使者带着信去见戈洛文，希望戈洛文能够出兵协同作战。戈洛文则保证俄国军队会用实际行动支持，对此，康熙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他一方面谋求和平途径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命令亲王福全对噶尔丹准备南下的大军进行抵御。八月，康熙又命自己的舅舅侍卫内大臣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监视噶尔丹的动向，同时，康熙还命令蒙古各部落集结，随时听候调遣。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五月，噶尔丹带兵四万，沿着克鲁伦河下游行军，渡过乌尔扎河，扬言借兵俄罗斯，一同灭掉喀尔喀。康熙立即致书俄国沙皇，质问道：“噶尔丹扬言和你们会兵，共同入侵喀尔喀。喀尔喀已经归顺了我大清，如果误信了谣言，这可是违背誓言重新开启兵祸了，希望你们尽快停止这种可能导致两国纷争的行动。”

上次两次雅克萨之战的惨败，让沙皇对康熙始终心存畏惧。收到康熙的警告，沙皇最终只好收敛，不敢出兵。

噶尔丹是一个猛人，没有沙皇赞助，也绝不会放弃军事计划的。六月，噶尔丹沿着格尔格河进军，来到乌尔会河畔。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带着军队紧紧跟随噶尔丹，阿喇尼的任务是监视噶尔丹，康熙一再叮嘱阿喇尼千万不要和噶尔丹正面冲突，等各路兵马聚集以后再前后夹击。

不过，阿喇尼没有遵守康熙的指示，后续部队还没到来之时，他就向噶尔丹发动了进攻。阿喇尼派遣了两百个蒙古武士偷袭了敌人的前锋部队，然后派五百个喀尔喀人骚扰敌人护送牲口和辎重的队伍。看到敌人的牲口和辎重，蒙古军和喀尔喀军争先恐后地抢夺，军纪一片混乱。看到部队一片混乱，阿喇尼下令撤军，可惜部队已经混乱，不听使唤。噶尔丹立即将部队分成两翼，布阵等待敌人。阿喇尼派遣清军进攻，噶尔丹让部队齐发火器。清军惊恐之下，连连败退。

接着，噶尔丹兵分两路夹击清军，清军溃不成军。阿喇尼擅自出战让康熙很愤怒，革去他的议政头衔，并降四级。

七月，噶尔丹挺军深入乌珠穆沁。康熙明白，必须重拳出击了，他命令哥哥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儿子胤禔为副将军，从古北口出发；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和硕简亲王雅布、多罗信郡王鄂札为副将军，从喜峰口出发；康熙自己，则率领中路军，亲自征讨噶尔丹。

康熙这次是铁了心要将噶尔丹一网打尽，为了一举摧毁噶尔丹，康熙屡次派使者去噶尔丹那里，扬言要和谈，实际是为了麻痹噶尔丹。

康熙的舅舅佟国维率领先锋部队，康熙对他说：“先遣部队到达前线后，如果噶尔丹准备逃跑，你们一定要全力追击；如果噶尔丹前来迎敌，千万要稳住，不要主动跟他们硬拼。”

佟国维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康熙说：“你可以告诉噶尔丹，圣上特派遣和硕裕亲王和皇子前

来，和你和谈，申明礼法，从此以后，结盟友好。”

康熙还让人送给噶尔丹牛羊，噶尔丹也派人到清军大营里，一再表示愿意和清廷修好，秋毫无犯。与此同时，噶尔丹强烈要求清廷交还土谢图汗和哲布尊等人，声称只要清廷做到了，自己马上撤军。

七月底，噶尔丹大军深入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由此可见，噶尔丹根本不把康熙放在眼里。清廷抚远大将军福全赶到时，噶尔丹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依林沮水，噶尔丹创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阵形。他让成千上万的骆驼趴在地上，背上放着箱垛子，垛子上盖着湿润的毡毯，士兵们躲在箱垛子后面射箭，这个阵型号称“驼城”。

清军隔河列阵，彻底占据了先进武器的优势，他们用炮火疯狂地轰击对面的驼城，顿时炮火齐发，响声震天，战况激烈，从下午一直打到晚上，驼城被轰得七零八落，清军骑兵和步兵同时出击，将敌人的营垒全部攻破，但清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康熙的舅舅佟国纲就在这场战役中中枪身亡。

由于夜晚已来临，清军不得不收兵。

晚上，噶尔丹的使者济隆带着七十多人来讲和，竭力为噶尔丹开脱，济隆说：“这事也不能完全怪噶尔丹，喀尔喀几个部落的人也不太厚道，他们的部下无知，抢了我们的牲口。我们的汗不过是一个小头目，怎么敢在大清皇帝面前嚣张。只不过他仇视土谢图汗和哲布尊，才犯了错误，现在他已经不想索回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了。”

连夜，噶尔丹还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表示：“现在蒙皇帝示好，以后不敢再犯喀尔喀了。”明明是被打服了，还说是示好，噶尔丹不愧是个聪明人。

当时康熙不在场，福全相信了噶尔丹的谎言，自作主张，放了噶尔丹，还让其他部队不要拦截噶尔丹。就这样，噶尔丹顺利地逃脱。如果这时福全能够大军齐出，噶尔丹早就被擒获了，后来那些麻烦就能避免。可惜，福全心地仁厚，相信了他，为了这事，事后他还受到康熙的责备，被革去议政并罚薪一年。

在逃跑这块，噶尔丹表现出了不亚于战场上的英勇，他连夜偷渡什拉穆楞格河，翻过大磧山，一路逃到科布多。虽然脱离险境，噶尔丹的部队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只剩下几千伤残兵。

人已经逃走了，康熙本着穷寇莫追的原则，给噶尔丹发出了最后的警告：“以后不得再侵犯归附清朝的喀尔喀一人一畜，如果违反誓言，必定追击到底一网打尽。”

灭其主力，康熙第二次亲征

放走噶尔丹后，康熙仍然不信他，康熙觉得噶尔丹这个人狡诈成性不可相信。

康熙在张角隘口，独石口、大同和宣府一带，随时准备出征，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姿态。

乌兰布通惨败后，噶尔丹处境极为凄惨，没有牲畜，人员大量减少。为生计所迫，噶尔丹不得不低头请求清廷给一些粮食和白银，以解燃眉之急。清朝的理藩院一口回绝，康熙却法外施恩，赏赐给噶尔丹千两白银，同时派遣大臣招降噶尔丹，承诺只要归降，一定妥善安置，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噶尔丹也是一个高明的对手，他看出康熙的两手做法，也还之以礼，派出两千男女到清军驻地，表面是归顺，暗地里让这些人充当奸细，四处搜集情报。安稳一段时间后，噶尔丹又要求清廷将多尔济和哲布尊交给自己，对于噶尔丹的无理要求，康熙给予了严厉的谴责。

噶尔丹被拒绝后，心里很不服气，开始在边境挑起事端。康熙派遣使者到阿拉布坦那里通好，噶尔丹的部署半道截击他们，将使者们杀害，劫走全部行李。此外，噶尔丹还挑唆其他人背叛清朝，阻止班禅入京。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秋，噶尔丹率领三万骑兵渡过克鲁伦河，对喀尔喀部落进行大肆抢掠。上次战败让噶尔丹记忆犹新，所以这次他没有进入漠北，只是扬言等借到俄罗斯六万鸟枪兵，将大举进攻，这分明是公然向康熙宣战。

康熙必须回应噶尔丹的挑衅，当然征讨的困难康熙也非常清楚，他说：“朕亲历其间，比较了解塞外情形，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难用兵的地方。那里是不毛之地，经常无水，到了沙漠地带，运粮特别难……”

困难重重不过是为了表示康熙的钢铁决心，康熙又说，噶尔丹违背约定，横行无忌，如果不灭了他，边境将永不得安宁。康熙召集三品以上的武官商讨灭敌之策，大家都认为非常困难，都不愿劳师远征。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仍然坚持剿贼，更令人吃惊的是，康熙居然要再次御驾亲征。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我上一次征讨噶尔丹，众人都劝阻，只有费扬古支持我。后来两次征讨，就没有人赞同我了，是我执意如此。”

这一年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四十二岁的康熙带领十万兵马，兵分三路，再次前往大漠讨伐噶尔丹。东路军由抗俄名将萨布素率领，西路军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统领，中路军是康熙亲率的禁卫军。

行军途中，无论多小的事情，康熙都要亲自过问，然后做出具体的指示。远征大漠，粮草还可以自己带，但是淡水却带不了那么多，寻找水源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饮水问题主要靠掘井解决，这事由户部侍郎思格色负责，他负责掘井，掘好一口井后，他回来向康熙禀报。康熙问他：“一口井能解决多少人马的饮水问题？”

思格色回答不上来，康熙很生气，骂他为官昏聩，让议政王大臣撤了他的职，贬为一般的士兵。后来，康熙派遣副都统阿迪视察水草情况，阿迪回答说：“现在冰雪冻住了，不容易开掘。”

康熙很生气，说：“用兵之道，贵在神速，大兵行军，断不可缺水，时当春季，地脉当融，即使冰冻也可以凿开。”

世上最怕认真二字，康熙的命令下达以后，没过多久，就掘出了好几口井，把地下的冰层凿开后，醉人的清泉就涌出来了，全军一片欢腾。为了方便大家饮水，康熙让军队围绕着井扎营，这样士兵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饮水，不会造成拥挤。每口井康熙都让官兵把守，以保证用水的安全。

康熙每天都起得很早，起来后他就看到军营里炊烟缭绕，心中颇多感慨。

在这段漫长的征途中，面对着沙漠的风光和草原的广阔，康熙心中难掩诗意之情，在征途中，他写下了一首诗：

四月天山路，今朝浩瀚行。

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

战伐因声罪，驱驰为息兵。

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

在这首诗中，康熙表达了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不辞辛苦坚持亲征的战斗精神，也流露出了一定的自豪感，所以他才敢很有底气地反问：“帝王中，像我这样御驾亲征，穿越沙漠、高山、草原的有几个呢？”

康熙有一个特点，一旦做出了决定，一定会坚持到底。大军到达科图时，有传言说噶尔丹已经逃走了，远远地不知躲在什么地方。扈从大臣佟国维、索额图、伊桑阿等人反复启奏，希望康熙能够班师回

北京，留下西路兵对付噶尔丹就行了。这些大臣平时在北京城里养尊处优，过着天堂般的生活，现在要来这塞外遭罪受，肯定不适应。他们请求康熙回京是可以理解的，更多的还是一种自私的心理，并不是为了康熙。

康熙很愤怒，严厉地斥责了他们。康熙说：“怯懦是最大的无耻，半途而废是世上最没出息的行为。”

康熙一般很少这么愤怒的，可这时必须愤怒，佟国维、索额图这些人的想法并不是少数人的想法，很可能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理，一旦这种心理蔓延开了，一定会影响士气动摇军心。所以，康熙必须向全军表现出自己的决心，不灭了噶尔丹绝不班师回朝。

康熙对大臣们说：“如果有不敢奋勇向前，怕死退后的，杀无赦。我们一定要杀了噶尔丹，或者擒住他，所以我们是不能后退的。如果我们撤退的话，噶尔丹必会集中兵力歼灭西路军，所以，希望大家勇往直前，直捣对方老巢，从今以后不要再说后退两个字。”

中路军慢慢地靠近了噶尔丹的驻地，但是西路军还没有到来。其实，这西路军行军路上出了一点状况，途中人畜相继死亡，许多有水草的地方被噶尔丹给烧毁，前路一片灰烬，西路军不得不绕道而行，因此耽误了行期，没法如期和中路军在土拉会师。

看到西路军久久没有到来，大臣们开始议论纷纷，有的说中路军应该暂缓前进，等待西路军的到来。有的说不用等西路军了，为了防止噶尔丹窜逃，应该火速出击。

康熙陷入了沉思，半晌，他想出了一条妙计：“噶尔丹以前不过是一个强盗，向来没有远见卓识，他听信别人的话，以为我军不能到这里，所以胆敢侵略喀尔喀。现在我军靠近噶尔丹，费扬古的西路军很快就会到土拉。如果我们等待费扬古到来一同出击，肯定来不及了，如果中路军贸然和噶尔丹全面交锋正面拼杀，仍然要冒大风险。现在最好的情况是，我们慢慢靠近噶尔丹，然后派遣使者请噶尔丹过来会盟，噶尔丹如果知道我亲自来，必定会逃窜。噶尔丹一逃窜，我们立即追杀。如果噶尔丹向土拉那边逃走，必定会遭遇到费扬古的军队，这样一来，噶尔丹必定灭亡。”

众大臣惊呼妙计。康熙随即命人带着礼品前往噶尔丹的驻地巴彦乌兰，在敕书中，康熙告诉噶尔丹：“朕的大军已经向你逼近，希望你好自为之，朕不忍生灵涂炭，还想给你一次机会，你自己过来与朕会盟吧……”

噶尔丹还不相信康熙会亲自来，便跑到孟纳尔山上眺望，瞥见军

营中果然挂着龙旗，还放着皇帝乘坐的銮车。在御营之外有帷幕围起来的皇城，皇城之外又有网城，旗帜飘扬，军容整齐。噶尔丹大声惊呼：“简直是天兵从天而降。”

正如康熙所料，噶尔丹带着部队拔营逃跑。噶尔丹中计了，康熙之所以设这么个计，其实是没有完胜的把握。他需要噶尔丹逃窜，自乱阵脚。

得到噶尔丹逃跑的消息，康熙命令大臣马思哈率领骑兵去追。噶尔丹跑得特别快，接连奔驰五昼夜，逃到特勒尔济口，费扬古的西路军已抵达了昭莫多（今天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图拉河上游南岸）。昭莫多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大森林，这里有一片广阔的大草原，草原蔓延到肯特岭下，远望这片山岭，千山万仞就像屏障一样，所以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漠北的著名战场。

费扬古在距离敌营三十里的地方扎营，他先派遣统领硕岱、副都统阿南达率领四百人前去叫阵，将敌人诱到昭莫多。费扬古事先带领士兵在山头上列阵，并派一部分军队列阵于土拉河西，将军孙思克带领着绿营骑兵登上另一个小山峰。噶尔丹率领一万骑兵，想抢占山头制高点。

清军占据有利地势阻击噶尔丹，噶尔丹生生被逼到东崖下面。接着，噶尔丹大军依靠悬崖，拿出火铳，对着清军一阵射击，清军则拿出弓弩，对着敌人疯狂射箭。费扬古下令藤牌兵进攻，并在前进的过程不断移动拒马木，以防敌人骑兵碾过来。噶尔丹无法，下令全部骑兵都下马，拿着武器，冒着清军的炮火向前冲去，一副不怕死的精神。清军的骑兵也下马，和敌军短兵相接，这是一场硬对硬的死磕，狭路相逢勇者胜，战斗非常激烈，两军伤亡相当。

一直打得夕阳西下，双方仍然难解难分。费扬古在山上看噶尔丹后方人马没有动，估计是妇女和骆驼。费扬古立即指挥沿河部队分两路出击，一支部队和噶尔丹部队交战，另一支部队杀向敌人的后方。

看到伏兵四起，后方被袭击，噶尔丹军心大乱，仓皇溃逃，清军四面追击，杀得敌人丢盔弃甲。这次战役中，噶尔丹损失两千士兵、三千妇人，清军俘获的牛羊和财物更是数不胜数。噶尔丹的妻子阿努也在这次战争中阵亡，噶尔丹逃跑时身边只剩下几十个骑兵。

昭莫多之战是清军和噶尔丹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这一战歼灭了噶尔丹的精锐主力，从此噶尔丹没能再恢复元气，最终导致了噶尔丹最终的败亡。

接到捷报后，康熙大大表扬了费扬古，并让他在科图驻防。六

月，康熙返京。

强敌灰飞烟灭

经过两次惨败，噶尔丹精锐主力丧尽，财产所剩无几，大本营伊犁又被侄儿占领，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九月，回京才三个月，康熙又坐不住了，他决定再一次御驾亲征。这次亲征很显然比上两次要轻松多了，康熙没有像上次那样带着大军在沙漠里穿行，而是直接来到归化城（呼和浩特市）视察。十一天后，康熙前往鄂尔多斯打猎，还到处散发这个消息，实际上是一边打猎，一边等待噶尔丹前来投降。

康熙之所以这么悠闲，是因为噶尔丹已经失去了抵抗的资本，除了投降别无活路。康熙亲自写了一封招降书，印了几百份让人分发，所以康熙很自信噶尔丹一定会过来投降的，康熙对部下说：“即使噶尔丹不来投降，他的部众必然溃散，纷纷前来投降。”为此，康熙命令费扬古停止对噶尔丹进行征剿，旨在给噶尔丹投降的时间。

确实，噶尔丹主力部队被歼灭，大本营又被侄子占据，之前控制的一些区域纷纷脱离噶尔丹的控制。噶尔丹想回伊犁，又担心侄子吃掉自己；南投西藏，又嫌路途太远，中途很多地方都被清军控制；噶尔丹也想投靠俄罗斯，但是又怕沙俄不敢接纳自己。结果，只好像孤魂野鬼一样在草原上晃荡。

昭莫多战失败后，噶尔丹也做过一些努力，收集残兵，还形成了五千人的军队。他带着这些人在台库勒举行一次会盟，商讨今后的决策。在会议上，噶尔丹这个失败的强人还是统一了思想，不过他并没有能解决内部矛盾，先后有不少人马叛逃，脱离他的控制，正如康熙所料。

但康熙很显然低估了噶尔丹的生存能力，在入冬前，噶尔丹已经赶到萨克萨图古时克，这里野兽很多，解决了噶尔丹生计上的困难。噶尔丹的流浪军团居然在这里渡过了严寒的冬天。

康熙等了很久，始终没有等到噶尔丹，不过他等到了噶尔丹的使者寨桑格垒，这人是噶尔丹营帐中为数不多的外交高手，多次跟清廷打交道。使者表示噶尔丹愿意投降。康熙则表示噶尔丹必须亲自来投降，康熙给噶尔丹七十天的时间，如果七十天后噶尔丹没有来，即将发大军征剿。

噶尔丹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派，从没真心打算投降。当时，噶尔丹的部属大多主张投降清廷，大家都说这个森林里野兽虽多，但是我们来了以后，野兽都惊骇四散，以后没法维持生计了。

噶尔丹沉默无语，丹济拉等人劝他投降，噶尔丹都不同意。噶尔丹不仅不投降，还派遣使者去找康熙，让康熙归还以前投靠清朝的人。结果，这个使者不仅没有完成使命，反而举家投奔康熙。噶尔丹已经众叛亲离，虽然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但噶尔丹还是决定要与清廷对抗到底。

到了这地步，连最忠于噶尔丹的丹济拉也脱离他，噶尔丹两次召他，他都不理睬。他派人去召另一个亲信杜哈尔阿拉布坦，结果杜哈尔阿拉布坦反而抢走了来人的马驼。部族中的人散的散，背叛的背叛，有的人甚至配合清廷追剿噶尔丹，噶尔丹的侄儿甚至想抓住噶尔丹向清廷邀功。

面对这种处境，噶尔丹即使不死，也难成气候了。就在康熙从宁夏坐船返京的途中，收到费扬古的奏章：噶尔丹已死。

关于噶尔丹之死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病死，有的说是自杀。费扬古和噶尔丹的手下都说是病死，但康熙对此很怀疑，认为噶尔丹是自杀。只有自杀，才能突出康熙在政治上的胜利，康熙想证明是自己击败了对手的生存意志，而不是什么疾病。

回京后，皇太子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文武百官在德胜门外跪迎凯旋的皇帝。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九月十二日，噶尔丹的遗骸被运送到北京，悬挂在城门外示众。不久，依照吴三桂的例子，挫骨扬灰，以警后来者。

这次战役不仅维护了清廷内部的稳定，也扩展了清帝国的领土，清朝将边境线延伸到阿尔泰山一带，并将广阔的喀尔喀蒙古正式纳入版图，清帝国的领土达到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第六章 西藏，神秘的地方

关于桑结嘉措的身世，西藏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桑结嘉措是五世达赖的私生子。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像五世达赖这样的高僧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们在五世达赖的传记里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可疑的迹象……

当年西藏

在元朝的时候，西藏就隶属于中央政府。当然，西藏享有比较高的自治权，在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统治。康熙在处理西藏问题时表现出了成熟的政治智慧，既借鉴了历代统治者的智慧，又做出了一些自己的创新。

在元朝以前，西藏不叫西藏，而是称作吐蕃，金庸《天龙八部》里面的鸠摩智就是来自吐蕃的。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由于他们信仰喇嘛教，所以赋予喇嘛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喇嘛教又分为四个教派，其中以宁玛派最为古老，宁玛在藏语里本身就是古老的意思，这个教派也最为神秘，继承了吐蕃时期的一些密咒，所谓的西藏密宗跟这个教派就有很大的关系。宁玛教派的喇嘛穿着红衣红帽，又叫红教。

第二个教派是萨迦派，萨迦派是北宋年间创立的。萨迦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灰白色的土地，这个教派的起源跟吐蕃一个贵族的后代有关。北宋熙宁六年，吐蕃贵族后裔昆·贡却杰布在今天萨迦寺附近发现一个山坡，这块山坡的土地呈白色，而且有光泽，呈现出祥瑞。贡却杰布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便出资在这里建造了一个寺庙，名为萨迦寺。萨迦派就是这么来的，萨迦派有血统和法统两种传承方式。

第三个教派为噶举派，噶举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口口相传，该教派在藏传佛教里支脉最多，该教派主要通过对人体的修炼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由于该派僧侣都穿着白衣白帽，俗称白教。

第四个教派是格鲁派，格鲁是善规的意思，该教派提倡僧侣应该严守戒律，该派僧侣穿着黄衣黄帽，俗称黄教。

那么，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是怎么来的？

活佛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元代，由于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对元朝有功，忽必烈封他为“西天佛子，化身佛陀”，从此，人们就开始称西藏高僧为活佛，在当时活佛不是特指，而是泛指修行到一定境界的僧侣。活佛制度创立以后，活佛才成为教派领袖人的称呼。

1252年，忽必烈召见国师八思巴时，也召见了噶举派法事噶玛拔希。噶玛拔希见八思巴受宠，不愿跟随忽必烈，反而投靠了蒙古大汗蒙哥。蒙哥封噶玛拔希为国师，并赐给他一顶金边黑帽和金印。1283年，噶玛拔希圆寂之前，为了保持本教派的既得利益，提出佛法不灭生死轮回，并说自己还会化身再来人间，临终前他要求弟子们找到一个小孩继承自己的衣钵，并告诉他们这个小孩就是自己的化身。像这样的小孩又被称为转世灵童，活佛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活佛转世制度一直传到今天，还在继续。

需要说明的是转世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上面提到的达赖转世制度，一种是班禅转世制度，后者是康熙一手打造的产物。

根据格鲁派的理论，达赖是千手观音的化身。以前，西藏掌权的教派是红教，也就是宁玛派，红教允许喇嘛娶妻，达赖的位置父子相传，所以没必要创立活佛转世制度。后来黄教掌权，由于黄教禁止喇嘛娶妻，这就涉及继承人问题，同时为了保持教派的神秘感和既得利益，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

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寻找转世灵童呢？总不至于逮住谁就是谁吧？

达赖在临死前会给出一个指定的地点和方向，然后根据达赖圆寂时诞生的一些婴儿，由达赖弟子寻找确认。

一般来说，在遴选灵童的时候有五道程序。

首先是弟子根据达赖生前的指示去寻找，必须注意的是，需要等达赖逝世一年后才能寻访。有时候能找到一个灵童，有时候会找到好几个。

如何确定找到的这个人就是灵童呢？这就涉及第二道程序，辨认器物。弟子们会拿来达赖或者班禅生前最喜欢的器物，然后把一些同类的器物放在一起，让灵童去抓。如果灵童抓到活佛生前最喜欢的器物，说明就是灵童。

即使通过了这两关还不够，还得在寺庙里请护法神降下神谕，如果神谕的结果和辨认器物的结果一致，那么这个灵童基本上就通过了。假如有好几个灵童，而且都通过了这三关，那么就需要进行第四道程序了。

第四道程序是金瓶抽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灵童就在御赐的金瓶前面抽签，谁运气好谁就是灵童。

第五道程序是得到皇帝的认可，由皇帝签字盖章，结果才算生效。

灵童转世是真是假，我们这里就不讨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灵童不是一找到就可以成为达赖，必须在十八岁成人后才能承袭达赖的职位。

早在清军入关之前，清朝就和西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皇太极时代，达赖、班禅等人就向大清进贡。顺治时候，五世达赖桑结率领班禅和顾实汗使者到京城朝觐皇帝，受到顺治的隆重接待。

康熙初年，青海蒙古和清军发生冲突。三藩叛乱期间，吴三桂曾经派人寻求达赖和顾实汗的支持，青海的很多蒙古贵族，有一部分人支持吴三桂，甚至在康熙十四年进攻了清军。对于这些，康熙都看在眼里，他一再叮嘱达赖要“约束部落，勿为边患”。康熙还邀请达赖一同出兵云贵川一带，达赖虽然表面上点头，但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在吴三桂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达赖还为吴三桂求情：“如果吴三桂最后穷途末路，请求圣上免他一死。我希望你们俩能裂土讲和。”

达赖的请求让康熙非常生气，他怒道：“朕是天下四方的统治者，怎么可能跟别人裂土平分天下？”

平定三藩叛乱后，康熙让达赖归还吴三桂划给他的土地，以此表达对达赖的不满。

当然，西藏内部矛盾也非常复杂，要想了解当年西藏复杂的局势，还得从桑结嘉措这个人说起。五世达赖对桑结嘉措特别喜爱，桑结嘉措八岁的时候，他就把他召进布达拉宫。要知道，桑结嘉措不是什么灵童，这种特殊的照顾不免有些蹊跷。

关于桑结嘉措的身世，西藏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桑结嘉措是五世达赖的私生子。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像五世达赖这样的高僧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们在五世达赖的传记里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可疑的迹象。1652年（顺治九年），五世达赖进京之前的某天，从哲蚌寺到色拉寺去，沿途经过了拉萨贵族仲麦巴的家，并在那里过夜，当晚，仲麦巴的主妇侍寝，也就是陪他睡觉。传记采取了隐晦的说法，说千手观音化身的达赖在那里遗留了一颗宝珠。

后来，鉴于五世达赖对桑结的特殊感情，很多人相信这个传说是真的。

五世达赖将桑结接到布达拉宫以后，对他精心栽培，不仅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学者，更希望让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1676年，第三任第巴辞职时，达赖指定桑结嘉措继任这个位置。第巴相当于藏王，是西藏这块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地位仅次于宗教领袖达赖。对于这样的一个职位，桑结嘉措以自己太年轻、资历不够为由拒绝了。布达拉宫的财务总管扎仓涅巴罗桑巴金担任了这个职位，不过他仅仅是起一个缓冲作用，目的是让桑结嘉措稳着陆。三年后，这个人就辞职了，桑结嘉措稳稳地坐上了这个位子。

五世达赖还专门颁布文告，详细介绍桑结嘉措的学识、品德和能力，希望僧众同意他当上第巴。这份文告至今还在布达拉宫正门口处德阳厦过厅的南墙上，下面端端正正地打着五世达赖的两只金粉手印，由此可见五世达赖的良苦用心。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二月二十五日，五世达赖在布达拉宫圆寂，这就意味着西藏最高权力出现真空。桑结嘉措果断地做出“秘不发丧”的决定，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五世达赖的意思。

桑结嘉措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彻底，每个环节都受到严密的控制，他们在布达拉宫里选择了一个跟五世达赖长得很像的人，让这个人伪装成达赖，在宝座上摆摆样子。同时，对外宣布达赖要长期进修，一切事务由第巴暂行处理。桑结嘉措不愧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人，他一方面要代理达赖处理政教事务，一方面还得保护达赖的肉身，并修建灵塔。最关键的是，还得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下寻找转世灵童。

桑结嘉措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秘密与噶尔丹勾结，反对和硕特部的顾实汗子孙，顾实汗是成吉思汗弟弟的十九世孙。桑结企图通过噶尔丹的力量赶走和硕特部落。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之时，桑结嘉措曾经派遣济隆活佛到噶尔丹军中诵经；噶尔丹战败后，济隆活佛又以讲和为由拖延时间，让噶尔丹得以逃跑。

正是在这期间，发生了真假达赖之争。

真假达赖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军在昭莫多打败噶尔丹。在缴获的物品中，康熙发现了桑结嘉措和噶尔丹交往的文书，此外，还从投降的战俘中得知五世达赖早已圆寂。

八月，康熙派人持敕书到西藏，揭露桑结嘉措勾结噶尔丹、欺骗

朝廷的罪行。使者来到后，要桑结嘉措就以下四个问题作出答复：

一、五世达赖早已去世，为何不向皇帝报告？秘不发丧到底是什么意思？

二、为何要跟噶尔丹狼狈为奸，帮助噶尔丹搞分裂活动？济隆活佛为何不但不阻止噶尔丹，反而为噶尔丹诵经助威？噶尔丹战败后，济隆活佛为何用缓兵之计让他逃走？应立刻将济隆活佛送到北京来。

三、五世达赖圆寂后，为什么不让五世班禅主持事务呢？清廷邀请五世班禅进京时，为何恐吓班禅说：“你这么说的话，噶尔丹将会击杀你。”请立刻让班禅主持政务，并让班禅进京朝觐。

四、立刻将嫁给青海和硕特部的噶尔丹女儿送到北京来。

康熙在诏书中毫不客气地表示，如果没有给上述问题一个圆满的答复，将立即发兵进攻西藏。软硬兼施是康熙的看家本领，在处理各种问题上他做得游刃有余，随心所欲不逾矩。

桑结嘉措针对康熙的强硬，不敢不给出答复：

一、五世达赖圆寂已经十六年，当时情况紧急，时运艰难，为了防止西藏地区发生动乱，所以才秘不发丧。现在六世达赖已经十五岁了，我们将在康熙三十六年为他举行坐床典礼，恳请皇帝在此之前对此事保密。

二、济隆活佛确实有罪，我们已经革去他的职位，并抄没他的家产。我们一定会遵旨将他送到北京的，还望皇帝开恩，不要杀了他。

三、五世班禅没有赴京不是因为那个原因，只是你们派出的使者说出了一些恫吓的言语，所以才没去的。关于班禅何日赴京，我们一定会详加讨论的，到时给皇帝一个圆满的答复。

四、噶尔丹的女儿是在噶尔丹攻打喀尔喀之前嫁给博硕克图济农的儿子，他们结婚前噶尔丹还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所以他的女儿实在是无辜的，希望皇帝不要拆散他们，以免妻离子散，多不和好。

康熙毕竟是一个明君，虽然他对桑结嘉措很不满，但是为了各民族的团结和友好，他还是做出了让步。康熙本着“不生事为贵”的原则，宽恕桑结嘉措的罪行。桑结嘉措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将济隆活佛送到北京。济隆到北京后，遭软禁病死。

尽管得到康熙的原谅，但桑结嘉措已经无法控制住西藏的局面了。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正月，噶尔丹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便上疏弹劾桑结嘉措：“第巴桑结嘉措这个人在达赖死之后秘而不宣，分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他诈称达赖之言，在喀尔喀中制造混

乱，如此好事唯恐天下不乱的喇嘛，实在是自古未有。希望皇上能够明察，不要让法门受玷辱，请陛下荡涤法门，使之干净吧！第巴这个人做的坏事当然远不止于此，他还监禁班禅，派两个红帽喇嘛诈称是达赖的化身，第巴如此破坏法门清誉，实在是天理难容神佛共怒啊！”

康熙对此并没有做出明显的表态，他很清楚，策旺阿拉布坦是在跟桑结嘉措争权，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引起麻烦。

看桑结嘉措不顺眼的远远不止策旺阿拉布坦，和硕特部汗王对第巴也非常不满。康熙四十年（1699年），和硕特部的达赖汗去世，其子旺扎尔继位，两年后，旺扎尔的弟弟拉藏汗赶走哥哥，自己登上汗位。拉藏汗继位后，跟桑结嘉措的矛盾更加激烈，并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在拉萨发生战争，桑结嘉措兵败被杀。这样一来，和硕特蒙古重新取得在西藏的统治地位。

拉藏汗的这些军事行动无疑深得康熙欢心，心腹仇敌被拉藏汗清除了，康熙的心情是喜悦的，他给予了拉藏汗充分的信任。

西藏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矛盾盘根错节，宗教领袖达赖和军事集团和硕特汗王是自古就存在矛盾，他们都想夺得西藏的最高统治权。顾实汗死后，青海的台吉们和西藏的和硕特汗之间为了争权也发生了冲突，青海的这些台吉们内部又有许多分歧和矛盾。各种势力都想挟持达赖以提高自身的威望，真假达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五世达赖死后，居然出现了三个六世达赖。

真假达赖之争的肇始者是拉藏汗。康熙四十四年七月，拉藏汗突然给康熙上了一道奏章，陈述了“假达赖”事情的整个经过，拉藏汗的意思是由桑结嘉措确立的仓央嘉措六世达赖根本不是真的转世灵童，这个仓央嘉措好酒好色，哪有佛门高人的半点样子。拉藏汗请求康熙废黜这个达赖，然后寻找真正的转世灵童。

这个仓央嘉措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的表现又有什么异于活佛的地方呢？

仓央嘉措来到布达拉宫后，他的表现跟前世完全不一样，他也很聪明，不过他的聪明停留在对爱情和诗歌的追求上，跟人们印象里的活佛迥然有别。他写了很多有名的诗句，我们不妨摘录几首：

心中爱慕的人儿，若能够百年偕老，不亚于从大海里面采来珍奇的异宝。

凛凛草上霜，飏飏寒风起。

鲜花与蜜蜂，怎能不分离？

为爱人祈福的幡儿，树在柳树旁边。

看守柳树的阿哥，请别用石头打它。

一个活佛居然是写情诗的高手，这是人们无法接受的。桑结嘉措生前也试图纠正他这种离经叛道的倾向，可是根本不起作用。当桑结嘉措被杀后，拉藏汗将他押往北京。令人吃惊的是，在行至西宁口的时候，这位“假达赖”居然病故。究竟是不是病故无人清楚，有人说他是被害，也有人说他到五台山云游去了。

仓央嘉措死后，拉藏汗受命寻找真正的转世灵童。拉藏汗立伊喜嘉措为新的六世达赖，伊喜嘉措当了十一年达赖，而且经过班禅和康熙皇帝的确认，但是始终无法得到藏族人民的承认。西藏人民始终认为仓央嘉措是六世达赖的真身，尽管拉藏汗苦口婆心地告诉人们仓央嘉措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可惜无法动摇百姓对仓央嘉措的信仰。由于西藏内部对这个达赖不信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以青海台吉和拉藏汗不合为由，派遣侍郎赫寿入藏，协助拉藏汗管理西藏事务。这是清廷第一次派遣驻藏大臣，由于西藏的局面比较复杂，康熙派人到西藏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通过提升班禅的宗教地位来缓解西藏的宗教危机。

由于西藏上下对伊喜嘉措很不满，拉藏汗的压力很大，如果这个傀儡得不到西藏人的拥戴，那他的统治权就会受到威胁。后来，拉萨上层找到了一个名叫格桑嘉措的人为真达赖的转世灵童。康熙再次让班禅确认这个真假，班禅仍然认为这个是真的。

康熙皇帝废黜仓央嘉措的行为引起了西藏人民的抵触情绪，他支持的拉藏汗在西藏也深陷政治危机。在西藏内部，逐渐酝酿起一股风潮，企图寻求准噶尔部落的人来赶走拉藏汗。

后来西藏发生动乱，拉藏汗被杀，伊喜嘉措被囚禁在拉萨的药王山上。

入藏平叛

西藏上空风云变幻，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窥伺已久，他感到夺取权力的机会到了。

早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策妄阿拉布坦就试探性地邀请仓央嘉措到准噶尔来讲学，遭到拉藏汗的拒绝。为了消除拉藏汗的戒

心，他又改变政策，与拉藏汗和亲。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策旺阿拉布坦和拉藏汗结为儿女亲家，与此同时，他又积极联络西藏的反对势力，密谋推翻拉藏汗的统治。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一月，策妄阿拉布坦派堂弟策零敦多布以护送女婿噶尔丹丹衷（拉藏汗的儿子）夫妇回藏省亲为借口，秘密组织了一支六千人的军队向西藏进发。此外，策旺阿拉布坦还组织了三百人，对格桑嘉措所在的青海塔尔寺进行突然袭击，计划抢夺格桑嘉措，然后护送格桑嘉措进入布达拉宫。

策零敦多布不走寻常路，选择了一条极为隐蔽的路线。他从南疆和田出发，翻越巍峨的昆仑山脉，再途经阿里，抵达藏北的那曲。这条路线非常艰险，海拔很高，一路上人烟稀少，之所以选择这条路有两个原因，既能避免被清军发现，又能出其不意攻击拉藏汗。

当这支部队出现的时候，完全出乎拉藏汗的意料。在藏北纳木错湖畔，拉藏汗匆匆和敌人展开战斗，但这一切出乎拉藏汗的意料，他始终觉得和谈是可能的，因此贻误了战机。再加上准噶尔军队事先已经对西藏内部进行了分裂瓦解，拉藏汗的军队很快就被打败。随即，准噶尔军队包围了布达拉宫，杀死拉藏汗，囚禁了伊喜嘉措。

准噶尔军控制西藏后，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屠杀和劫掠，非黄教的寺庙被摧毁的有五百多所。

由于西藏地方遥远，康熙很晚才得知这个消息。他立即派遣满族将领额伦特和蒙古族将领色楞去征讨，两人统帅七千人，从青海出发。色楞率领先锋部队侦查，额伦特带主力尾随。不过，这次出征因为准备不充分，而且两个将领脾气不和，在到达藏北那曲一带时遭到准噶尔军队的袭击，清军大败，额伦特战死。这次失败的主要责任还在于色楞，色楞有勇无谋，轻敌冒进，他带着先锋队进入敌人埋伏圈后，看到敌人后退，不知是计，拼命追赶，结果让全军都深陷泥潭，再加上粮草也被敌军切断，结果全军覆没，色楞本人也阵亡。

准噶尔取得了这次胜利，非常得意，他们继续向东进军，打算和清廷争夺巴塘、里塘等地，甚至企图进犯青海、云南。

清军失败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大家熟悉的场面又出现了，王公大臣们纷纷说西藏偏远，地形险恶，不宜出兵；康熙却力排众议，认为如果不出兵西藏，边境将不堪设想，所以必须出兵。当然，在出兵之前，康熙要总结上次失败的原因，在康熙看来，失败的原因就是不够重视，准备不足，派出的兵力不够多。

这次，康熙任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胤禩为抚远大将军，统领三路

大军开赴前线，号称三十六万大军，实际数目可能也就五六万人。

为了孤立准噶尔，康熙还进行了政治工作，争取青海蒙古王公的支持。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康熙提拔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康熙的目的是让年羹尧开辟由四川进军西藏的路线，能够保证各路兵马随时开入西藏，让西藏断掉天高皇帝远的念头。年羹尧上任之后，不负所望，在成都驻兵，并设立驿站。康熙还让大臣带领满洲兵一千人、蒙古兵一千人、吐蕃兵两千人、绿营步骑兵各一千人，护送新达赖入西藏，所有这些事情都由年羹尧总理。

虽然康熙很积极地备战，务求胜利，但是大臣们还是很担心，实际情况正如康熙所料，清军所向披靡。准噶尔军队根本就没有做出有效的抵抗，其时，藏人早就对准噶尔部不满，准噶尔军队在西藏的残暴行径引起了藏人的不满。清军进入拉萨后，藏人普遍表示欢迎。

清军进入拉萨这天是九月十五日，拉萨上空晴朗无云，满汉大臣、蒙古各部落的首领、西藏的喇嘛贵族纷纷欢迎清军，然后在布达拉宫为格桑嘉措举行隆重的坐床典礼。

根据《清圣祖实录》的记载：“喇嘛人等感激圣主再造弘恩，罔不踊跃欢欣，男女老幼襁负来迎。见我大兵，群拥环绕，鼓奏各种乐器……”

清军护送达赖入藏，由此赢得了藏族人民的欢迎，充分体现了康熙处理民族问题的高明手段。

接下来，康熙要做的是重建西藏的行政机构。

康熙让清军统帅延信将军先成立临时的军政府，军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清除准噶尔分裂势力的余孽，并打击准噶尔的支持者。对于那些违法作乱的喇嘛也丝毫不留情面，该杀的杀，该囚禁的囚禁。

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终于完成了西藏政府的改组工作。康熙废黜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第巴一职，改设多名噶伦共同负责行政工作，这是康熙为了促进西藏稳定而实行的分权制度。刚开始的时候封了三名噶伦，这三名噶伦都是当地人，但是都非常忠于清廷。康熙既采用了藏人治藏的方法，又直接控制了西藏的地方政府，一举两得。

在蒙古王、众贝勒、台吉和酋长们的请求下，康熙允许他们在拉萨为自己建立丰碑，永垂不朽。随后，清军在拉萨留下三千人的驻藏军队，为了保持对西藏的有效控制，清政府还在西藏周边驻留军队。西藏如果出现动乱，这些军队会第一时间赶到，这无疑维护了西藏的

稳定。

由于康熙的雄才大略，结束了蒙古部落对西藏的控制权，西藏再次进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第七章 康熙的治国之道

始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这是康熙治国的最大特点。他治国并没有什么新奇的花招，只是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真真切切地关心人民的利益，仅此而已。

重视民生，反对拆迁，鼓励垦荒

我们知道，康熙并不是开国之君，但是他却做了很多开国皇帝必须做的事情，所以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既是守成之君，又是开疆拓土的大帝。

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这个算法是依照清军入主中原来算的，在康熙前面有四个对清朝起着重大作用的领袖，分别是他的曾祖父努尔哈赤、祖父皇太极、叔祖父多尔衮和父亲顺治。

顺治在位十八年，清朝并没有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康熙登基以后，仍然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譬如战火不绝、割据政权独霸一方、经济萧条、财政匮乏等等。

清军入主中原后，在京畿大肆圈地，霸占了以前汉人的土地，由此引起许多强烈的反抗。清军对汉族地主和农民的反抗采取了极端的军事措施，烧杀抢掠，手段非常残忍。这段时期是多尔衮执政，随后多尔衮又推行了“逃人法”，这项法令在皇太极时基本废去，多尔衮重新启用，对汉民族采取了高压政策。

清初的暴政对国计民生带来了重大的危害，顺治亲政后，进行了一些改革，废除了多尔衮的许多弊政，为后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康熙始终将民生放在执政的首要地位，只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社会才可能和谐，政权才能稳固。当然，康熙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他用实际行动解决了民生问题。

康熙实施了以下措施：

一、将荒熟土地分给臣民。康熙八年（1669年），将十七万顷的明朝藩王荒熟土地交给百姓，让他们开垦种植。所谓荒熟土地，既有荒地，也有直接可以种植的熟地。十二年（1673年），他又责令各省

开垦荒地，为了鼓励开荒，他免费给开垦者种子、口粮和工具。康熙将这些土地命名为更名田，这种田租赋相对要高一些，但由于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经营者手上，所以老百姓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二、保护土地产权，释放奴婢为民。康熙八年，康熙对户部官员说：“这些年，一直将民间的土地圈给八旗，以致老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让朕很同情。以后圈占民房的行为应当永远禁止，今年圈占的土地，全部返回民间，并将古北口一带的空地拨给农民耕种。”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将奉川、锦州的荒地给百姓开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对大学士说：“田地是老百姓的恒产，已经给他们的不能再收回，大臣们如果有超出规定数量的土地，必须申报户部，有用时再拨给百姓，老百姓的土地不要轻易去动。”对于妄行圈地的人，康熙选择从重治罪。康熙的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对民生的关注，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心系天下的明君的胸怀。

康熙甚至认为即使是军国大事，都不能触犯平民百姓的土地，这种理念出现在三百年前确实让人佩服，现在的许多官僚完全不可望其项背。康熙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对于治国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执政者最重要的是让人民富足，让人民富足的办法是教会他们生财之道，让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发财致富，藏富于民是立国的根本，想起现在的与民争富让人感慨。

此外，康熙还制定了一项政策，禁止汉民投充到满人家里为奴，让百姓自力更生，发展农业。

三、鼓励军垦。在顺治年间，就有人提出了要军垦，不过当时只是提提，没法实施。康熙年间，这道政策才得到实施。最早，军垦是针对投诚兵制定出来的政策，投诚兵以前是跟清军打仗的兵，这些兵的待遇和福利都要差很多，而且他们都拖家带口，如果不实行垦荒的话，会带来很多麻烦。军垦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食问题，还为国家增加了课税。

在赋税方面，康熙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不过，在康熙初年，轻徭薄赋的政策无法实现，由于连年的战争，在初期这个政策无法实现，但是康熙却反对有官员借口国家战争，从苛捐杂税中谋取私利，勒索百姓。对此，康熙严令禁止，他提出：“让百姓休养生息是最重要的事情，执政者一定要清楚，什么是利政，什么是弊政。对国家好对百姓好的事情要做，对国家坏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不要做。”

平定三藩后，康熙就着手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地主阶级和小民一律按同等标准交税，并降低赋税。康熙五十年，在赋税方面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改革，赋税不再按照人口来

收，人丁增加税不加，只按照田地的多少收税。

康熙所做的还远不止这些，他还严禁官吏扰民，禁止官吏私自征派各种赋税，一再告诫地方官：“累民之事，即使只是丝毫也不能做。”

康熙以身作则，每次外出巡行，力求避免扰民，跟他的孙子乾隆完全不一样。乾隆一出门，劳民伤财，花费甚巨，贪腐成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和孝庄太皇太后驾临五台山，在山上碰到不少百姓背着粮食米豆，康熙有些奇怪，让随从去询问。村民们都说这是为太皇太后和皇帝到来做准备。

康熙随即对阿兰泰说：“太皇太后驾临五台山，一切费用都由宫廷出资，本无丝毫取自百姓，这些粮豆究竟有何用处，应该尽快查明。”

经过询问才知道，五台县的知县担心太皇太后和皇帝来了以后，食用不够，所以从老百姓那里买了一些粮豆，并不是向百姓科派的。康熙深知地方官贪得无厌，往往借着机会搜刮小民，康熙严词说道：“知县从老百姓手中买的，未必尽信。朝廷的一切出行都由内廷解决，以后这些事情地方官不要再插手，不准再让老百姓准备什么。”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临行前，康熙召来户部、工部等官员，晓谕他们：“朕出行的一切用度从俭，大家把一切要用的物品准备好，不要让地方官从民间派取，扰害百姓。”

始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这是康熙治国的最大特点。他治国并没有什么新奇的花招，只是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真真切切地关心人民的利益，仅此而已。

重商节俭，德法兼顾

康熙跟一般封建帝王不同，他没那么仇视商业，他不仅没有看不起商业，反而认为商业自古就是一个社会不可分割的部分。

康熙曾说：“国家要和谐，必须做到四点：执政者全心执政为民，经商的人踏踏实实经商，务农的要勤勤恳恳务农，读书的要兢兢业业读书。这四种人如果能安居乐业，互不侵扰，国家就一定能强大。”

康熙对工商业不仅没有贬抑，而且给予了支持。当然，其中原因

比较复杂，可能是因为清朝初年，战争很多，为了缓解巨大的开支，商人做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战争期间，商人要缴纳的关税往往是最重的。在前期，康熙仍然对商人实行重税，没办法，经常要打仗，开支太大了。

平定三藩后，康熙适时改变了做法，他认为再这样下去，会让商民陷入困境，对国家有很大危害，所以决定革除弊政。具体做法是调低税率，并且禁止关卡勒索商人，让商人能够更好地经营和贸易。

为了给商人塑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康熙公布关税征收条例，如果出现勒索者，商人可以通过控告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对于私自征收杂税的官员，康熙表示严惩不贷。

康熙很早就意识到官商勾结的祸害，官商勾结会直接导致市场垄断，导致缺少背景的小商人经营困难，最终受害的是消费者，也就是广大人民。清初，管理物价的机构是牙行，牙行后来日益变成盘剥商人的官僚机构。康熙正本清源，对牙行进行了改造，让牙行变成一个相对清廉的机构，为商人谋利，而不是祸害商民。

对于向商人额外征税的行为，康熙严令禁止。康熙还统一了度量衡，方便全国各地的商人贸易。对于那些抢劫勒索商民的兵痞，康熙要求各级将领予以严厉打击。

综上所述，康熙虽然生在三百年前，但是已经意识到了商业对于社会的作用。正因为康熙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康熙中后期，全国的经济呈蒸蒸日上之势，尤其是江南，工商业最为繁荣。

当然，康熙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而不是一个资本主义领袖。他所做的一切还是从王朝的根本利益出发，商业始终不是主流。所以，在康熙晚年，出现了海禁和矿禁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目都是为了王朝的稳定。当然，对商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打击。在制定这些政策时，康熙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照顾商民的利益，他并没有实行像朱元璋那样严厉的海禁，还是允许沿海渔民出海打鱼。“不能断了渔民的生路啊！”康熙这样跟大臣说。

一个封建社会的帝王，能够做到这样优秀确实已经是很难得了。

那么，康熙又是如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呢？

在这方面，康熙主要是吸收儒家思想，他认为自古成功的帝王无不是以德服人，只有上层懂礼，下层才会有仁义，良好的道德是一个社会稳定富强的基础。

为了塑造一个良好的道德社会，康熙以身作则，杜绝奢侈。康熙

有一次下江南，回去的时候，江南文武百官乡绅百姓几十万人为他送行，结果康熙说道：“朕早就听说过江南富庶，来这里以后，见这里城市繁华，看上去确实很富裕。但是江南的人情却没有北方纯朴，过于奢华，过于粉饰。你们这些当官的，要廉洁奉公，爱护百姓，崇尚节俭，拒绝奢侈。只有这样，朕才能安心啊！”

可以说，康熙为了倡导节俭之风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可惜，这些风气到他孙子乾隆手中化为乌有。在为自己修造宫殿时，康熙都要求务求节俭，如果不是孝庄让人修缮康熙的寝宫，康熙根本就不会想要这么做。在修建皇后陵寝时，康熙都要求节俭。

康熙之所以这么看重节俭，在于他有一个观点：明朝就是因为奢侈亡国的。明朝亡国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奢侈无疑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基于这种认识，康熙对宫廷的开支作出了很大的调整，务求节俭。明代光禄寺（掌管膳食的部门）每年用的木材多达两千七百万斤，木炭达一千两百万斤，到康熙时分别减为六百多万斤和一百多万斤；明代宫殿的楼亭门数多达七百八十六座，到康熙时只有其十分之一。

康熙的节俭也是他“民为贵”思想的一个体现，他经常对左右说：“国家的财政出自人民，民力有限，所以要节约爱惜。能够节约，国家就有余裕；倘若奢侈，将会劳民伤财，祸害百姓。”

当时有一个法国传教士曾经给路易十四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讲述了康熙的生活习惯，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外国人对于清朝皇帝的看法：

清朝皇帝，或者因为他拥有的无穷财富，或者因为他疆土的广阔富饶，说他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君主也许是没有人反对的。尽管如此，他真正用于自己身上的一切远远谈不上奢侈……就其个人有关的方面看，那种恬淡朴素简直是没有先例的……除了循例供奉的东西外，他毫无奢求，他满足于最普通的菜肴，从未有丝毫的过度，他的淡泊超过了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他的衣着，除了几件宫廷里极为常见的过冬黑貂、银鼠皮袄外，还有一些在中国算是最普通、最常见，只有小百姓才穿不起的丝绸服装。逢到雨天，人们有时看到他穿一件毡制外套，这在中国被视为一种粗制的衣服……总之，在他周围的一切，人们丝毫感觉不到那种其他亚洲君主处处要摆出来的穷奢极侈的排场……他不为个人浪费钱财完全是出于一种贤明的节约，以便把金钱用于帝国真正的需要。康熙深信君主的威信和伟大不是依靠外在的豪华，而更多的是在于他道德的光辉。

从康熙的治国之道，我们能感觉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康熙在治国方面也确实效仿古人，他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在坚持教化和德治的同时，康熙对于法治也不疏忽，他一再强烈法律必须严肃、稳定，不要随意变更。

康熙认为，德与法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光靠德不足以治国，光靠法也不能缔造太平盛世。

正本清源——康熙的管理之术

吏治自古以来就是封建帝王最为头疼的一件事，一个朝代衰亡的前奏往往是吏治腐败，官僚欺上瞒下，百姓水深火热。皇帝纵然变成千手观音也难以处理天下杂事，所以，一个国家能不能治理好，首先得治理官吏。

贪官可以让仁政变成恶政，清官能够消解恶政的毒性，由此可见，官吏集团对于整个帝国的作用。

事实上，康熙很早就知道公务员办事效率不高的问题，在古代，这叫怠政，现在一般的说法是为政不作为。康熙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说实话，很难，但康熙还是一步步地努力，力求提高整个官僚集团的效率，树立起官僚集团的声誉。

康熙发现文武官员中有一个陋习，他们借着过节送礼行贿。康熙对此非常愤怒，并认为这是明朝陋习，大清的官员不应该这样，但是要解决这种陋习非常难。康熙曾经对直隶巡抚格尔古德说：“这些总督啊，巡抚啊，贪婪的占多数，朕心里是雪亮的。”后来，他又跟礼部尚书汤斌说：“天下有才能的官僚不少，但是操守清廉的官员却很少见。”康熙说出这番话时非常无奈，纵使康熙文韬武略，南征北战，对付敌人很厉害，但是对于自己手下的这批官僚也感觉无可奈何。

康熙十八年，京城发生地震，康熙命令文武百官上书言得失，官员们总结出了六大问题，其中就有“吏治腐败，民生艰难”，地方官为了前途，谄媚上司，搜刮百姓。京城的一些大官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巧立各种名目中饱私囊，地方的官僚如果要向户部报销的话，是必须得送礼的。不送礼的话，户部官员就对其百般刁难。送够了礼，即使虚报，也可以通过。贪腐事件已经形成集团化的趋势。

官员们在推荐人才的时候，习惯于推荐自己的亲朋好友，互相包庇，结党营私。即使像康熙这样贤明的君主都拿不出非常有力的措施对付这些官场腐败现象。譬如，康熙发现山西巡抚穆尔赛贪酷成性，秽迹昭彰，但当康熙问大学士和九卿们穆尔赛这个人为官怎么样时，这些人居然一起包庇，说穆尔赛这个人是一个好官，为政清廉，体恤百姓。

康熙的首席大臣明珠也是一个贪官，但康熙始终没有动他。康熙曾经对明珠说：“明朝末期，君臣隔阂，导致天下有难，百姓生存难，上面不守道，下面不守法，结果亡国了。”康熙的言外之意是希望明珠能够收敛点，可是管用吗？说实话，没多大作用。

但对于吏治，康熙绝不会不闻不问，他多次表明自己整饬吏治的决心。康熙公开说：“现在什么事情都可以慢慢做好，唯独吏治安民这件事最不能迟缓。”

为了整顿官吏，康熙实行了考核制，定期对官员进行抽查。在康熙后三十年里，处理了一千五百多个官僚，这些人要么因为“才力不及”，要么因为“浮躁”被降职调用，还有一千五百多人被革职。受到表彰的清官和有能力的官员有七百多人，被惩处的官员有五百多人，被辞掉的老弱干部有两千七百多人，这些老弱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仍然霸占在岗位上，让康熙很不满。

康熙的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仍然还只是治标。除此之外，康熙在思想教育方面也花费了大量的心思，但是思想教育是所有方法里效果最不好的。这些官僚都是聪明人，你跟聪明人说老生常谈的道理不管用。

当然，康熙还实行了另一个有效的方法：密奏。密奏可能存在挟私报复的情况，康熙并不会一味相信密奏的内容，会进行核实工作。用密奏的方式查贪官，效果比思想教育要好得多，通过这种方式，康熙查出了大量的贪官。

贪官是查不尽的，康熙能力再强也没有三头六臂，所以在治贪的同时他积极宣扬清官，树立榜样作用。

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他召见了直隶巡抚于成龙，当面夸奖他：“你是这年头第一清官，朕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希望你能够始终保持这种气节，像你这样的人就是我大清的栋梁啊！”康熙经常对大臣们夸奖于成龙，希望大家以于成龙为榜样。对于成龙，康熙屡次给予荣誉和经济上的嘉奖。于成龙死后，康熙因为他操守始终如一，加封太子太保，谥清端，并亲自送给于成龙家人“高行清粹”的匾额。

事实证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康熙推出一个于成龙是希望出现千百万个于成龙。虽然一时间不可能出现这么多清官，但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清官逐渐形成了一股力量。大清的官僚体系里出现了一股清流，像傅腊塔、格尔古德、范承勋、王鹭、彭鹏等这些人都是清官。

康熙不仅提拔清官，而且对清官进行了必要的保护。康熙很清楚，清官廉吏在官场上很容易受到排斥，对于那些攻击清官的言论和行为他从不轻易相信，而是切实考察。江宁知府陈鹏年是一个清官，康熙南巡来到江宁时，陈鹏年极力阻止总督增派钱粮，结果总督为了整他，让他接待康熙。康熙的近侍照例找到陈鹏年，向他索贿，陈鹏年不理。近侍便故意陷害陈鹏年，在康熙卧榻上放一个蚯蚓篓。

这事发生后，康熙当然不高兴了，心想，你这个陈鹏年是怎么接待我的，居然在床上放了个蚯蚓篓。但康熙在江宁织造府的时候，曾经问了一个小孩子：“你们这里有好官吗？”小孩当即说出了陈鹏年的名字。康熙再派人调查，发现陈鹏年确实是一个清官，他觉得这事不对劲，陈鹏年应该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于是派人去调查，发现是别人想陷害陈鹏年。还有一次，陈鹏年被人陷害入狱，百姓们纷纷为他请命。这些事情被康熙发现后，力保陈鹏年，并接连将他升为浙江巡抚、兵部侍郎、左都御史、两江总督、河道总督、吏部尚书等等。

康熙经常鼓励官员们要做清官，他说：“做好官，不仅自己光荣，还能光宗耀祖，反之则身败名裂，留下骂名，做贪官有什么好的？”

巡视的时候，他对山东官员说：“做官啊，清廉放在第一位，当清官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但百姓景仰，就是卸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立祠庙，岂不是美事。百姓的口碑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各位好自为之。”

奖掖清官的同时，康熙对贪官的打击也毫不手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处决了贪官王永祚。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揪出了蔡毓荣贪污集团，鉴于蔡毓荣平定吴三桂有功，免死刑，发配黑龙江。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展开了对穆尔赛贪污案的清查，再次挖出了一个庞大的贪污集团。

总之，在康熙执政期间，始终将吏治作为头等大事。虽然康熙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譬如他就始终没有拿下大贪官明珠，但他在吏治方面做出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第八章 家事更比国事烦

在太子位置上坐了三十多年，胤初的心情已经有点变态，确实，这个等待太漫长，容易让人疯狂。有一次，围猎的时候，他听说康熙身份欠安，心情很兴奋，几次派人去察看康熙的日常起居。还有一次，他本人偷偷地来到康熙帐前，扒开帷幄的缝隙，偷看里面的情况。不巧，这事被其他皇子撞见了，将这事告诉了康熙。

皇帝好做，父亲难做

作为一个皇帝，康熙能够打八十分以上。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好父亲，至少比他老爹顺治强得多，康熙是一个非常有父爱的皇帝，但别人眼里的好父亲未必是儿子眼中的好父亲。

作为一个父亲，康熙有太多的痛处，以至于最后雍正继位都不明不白，到处流传雍正夺嫡篡位。我们来看看康熙与众不同的一面吧！

一切还得从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初八的那天说起，这一天康熙结婚了，年仅十二岁。新娘是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这次婚姻是一次政治婚姻，当然也不排除小康熙爱上了那个比他大三个月的小姑娘，不过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康熙刚继位时政局不稳，让他早点结婚是为了生儿育女，给大清国一颗定心丸。同时，方便康熙早点成熟，早点亲政。康熙跟他爸顺治一样，虽然早婚，但其实也不早。他发育得比较早，很早就对女性表现出了“雄心勃勃”的兴趣。孝庄看到康熙那么早就对女人感兴趣，不希望他闹出什么笑话，所以早点让他结婚。孝庄是一个非常注重礼仪的人，康熙一生深受他影响。

结婚两年后，康熙才生下第一个孩子，而且是个男孩，不过这个孩子没保住。康熙再接再厉，生了十来个小孩，接连夭折了七个。

幸运的是，康熙和赫舍里氏非常恩爱，康熙后来回忆她说：“皇后节俭居家，宽仁待下，仪型允备，淑德著闻。”这场包办婚姻开出了爱情的花朵，这是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幸福的一件事，至少，顺治的悲剧不会再重演了。

康熙八年（1669年），灭掉鳌拜之后，赫舍里氏又怀孕了，为康

熙生下了一个儿子。对这个孩子，康熙非常珍爱，给他取名为“承祜”，希望承上天的保佑，这孩子能茁壮成长。

承祜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很得夫妇俩的欢心，只可惜两岁半的时候，这孩子也夭折了。这对夫妻俩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皇后因此陷入了悲伤之中，就像当年皇太极的爱妃海兰珠丧子一样。

康熙的悲痛也可以想象，孩子的去世让他心情灰暗，遇事消极。大臣们纷纷劝他节哀顺变，皇后受得打击更大，儿子去世后，她不久就陷入了一场大病中。

就在康熙陪同祖母孝庄温泉疗养的时候，忽然接到皇后病重的消息。康熙是一个非常注重孝道的人，他不敢把这事告诉祖母，但精明的孝庄从康熙脸上看出了什么，问他原因。康熙如实相告，孝庄让他赶快回去照顾皇后。康熙于是连夜赶到皇后身边，在康熙的精心照顾下，皇后的病情好转，恢复了健康。

三藩叛乱之时，康熙帝焦头烂额，就在这内忧外患之中，皇宫中再次传来喜讯，皇后再次临盆了。但这次似乎有点……有点难产，或许是受了吴三桂叛乱的惊吓吧！总之，这次状态不是很好。

皇后没有让康熙失望，经过艰难挣扎，终于生出一个男孩。可惜，当太监把这个消息告诉康熙时，康熙却凝固了，没错，孩子保住了，大人没保住。

欢乐和痛苦同时来到，吴三桂等人还在那边折腾，康熙陷入了沉默中。皇后去世时不到二十一岁，如花的年华，康熙为她洒尽泪水。

当时战火纷飞，全国大乱，康熙在百忙之中仍然为皇后辍朝五日，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皇后的灵柩停了二十一天，康熙几乎每天都到皇后的灵前祭酒，然后一个人坐在那里默默流泪。皇后去世三年后，康熙没有册立皇后，后来还是在孝庄的要求下，册立了新皇后。

康熙对皇后的感情非常深，曾经写诗怀念：“月掩椒宫叹别离，伤怀始觉夜虫悲。”

也许正因为这份深情，皇后留下的儿子才享受到了清朝三百年来没有一个皇子享受的待遇，他生下来不到两年就被立为太子。这个太子就是胤礽。

胤礽并不是康熙最大的儿子，但却是嫡长子，他的地位在康熙所有的子女中是最尊贵的。康熙之所以给他这么好的待遇，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亡妻的怀念。胤礽两岁的时候，康熙推翻祖制，立他为太子。

康熙对这个孩子寄予厚望，希望他有一天能成才，继承大统。所

以，亲自担任他的教育重任。尽管康熙日理万机，还是抽出时间亲自教太子四书五经，每天临朝前，都要督促太子背诵昨天学习的内容。如此耳提面命，寄予了深厚的父爱。

太子六岁时，康熙为他请了著名的大学士授课。太子的表现也非常不错，继承了父母基因，各门课程都非常优异，文武兼备。而且太子长得仪表堂堂，有君王之相，康熙非常喜悦，特地为他建造了一座园林，以便随时能够见到太子。

康熙经常亲自检查太子的功课，一次，他问太子的老师汤斌：“太子的书读得怎么样？”

汤斌回答：“太子聪明睿智，学问精深，实在是江山社稷的福分。”

老师们虽然有拍马屁的嫌疑，但由此也能看出太子确实不是庸碌之辈。到了夏天时，太子坐在那儿学习，既不让人挥扇，也不脱衣服，端坐着看书，而且没有厌烦的样子。由于刻苦用功，太子的满汉文水平都相当高。以至于大臣们都说：“我们虽然也学过满文，但不能精通，看到皇太子的满文书法，臣等真是望尘莫及。”

汤斌甚至对皇太子说：“皇上对太子要求过于严格了，这么炎热的天气，功课又这么重，恐怕太子吃不消啊！”

康熙说：“太子每天苦读，寒暑未断，从来没有抱怨过，如果是我强迫他，他也不会这么聚精会神啊！你们都看到了，我什么时候逼过他？”

康熙兴致来了，还让汤斌教其他皇子一起读书，不过，这场声势浩大的读书活动最后却是以闹剧收尾的。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康熙对太子的教育也是失败的。

康熙自夸地对大臣说：“朕宫中从来没有不读书的子女，现在诸皇子虽然不是由大学问家教他们，但都能读书。朕也非好名的人，所以向来对皇子的读书，没有刻意去逼。现在特意召开皇子读书活动，到时你们可以看看皇子们的表现。”

汤斌拿出经书，教皇子们阅读，皇子们读得朗朗上口，让他们解释意义时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康熙在一旁很是得意，大臣们马上拍马屁：“现在我们亲眼目睹了皇子们的读书讲义，体会到皇上教子的良苦用心，连我们都受到激励和鼓舞。”

康熙一听，兴致来了，说：“朕幼年读书的时候，每次都会读上一百二十遍，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现在朕让皇子们也按照这个标准来

读，大家都说太多了，每篇只要读十几遍就行。朕不赞同，你们看看太子的书法，写得很地道吧？如果不是朕让他下苦功夫，能达到这个层次吗？”

康熙又让几个老师秀一下书法，然后让大家评论，大家都说很稀松平常。

康熙更得意了，亲自在绫缎上写了一首程颢的七言诗，果然苍劲有力，大臣纷纷拍手赞扬。

这场读书活动更像是一场表演，其中有康熙的虚荣心在作怪，所以到最后戛然而止。

那些陪伴太子读书的老师们在整个过程中受尽了折磨，一方面要承受康熙和太监们的冷嘲热讽，另一方面还要想方设法阿谀奉承，而且马屁还得拍出新意。这些老师大多是年长之人，每天陪着年轻人读十几个小时，累也累昏了。读书秀的第三天，老师耿介中途晕倒，不得不出宫调养。三天后，汤斌也称病请假。

康熙认为这些人消极怠工，非常生气。明珠等人趁机进谗言，说太子在写书法时，汤斌擅自用红笔圈点，简直是没大没小。还有人说，太子读书时，汤斌拿着书打瞌睡。

这些事可能是真的，但是作为一个六十五岁高龄的老师，整日这么辛苦也是可以理解的。结果，康熙对这些老师们作出了不公正的处分。耿介被革职，汤斌也被革职，太子的满文老师哈塔受到降级处分。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结局，太子的老师纷纷下岗，这个结果无疑是说明太子天资聪明禀赋很高，老师们都不称职，通过打压老师来提高太子。这是康熙对太子的溺爱，最终的后果还是由太子来承担。

太子党风云

康熙对儿子们，尤其是对太子的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爱一旦过头就会变成溺爱，反而会对孩子的身心不好。

康熙十七年（1678年），太子五岁，康熙正忙于平定三藩。在这期间，太子出痘了，康熙非常着急，抛开军务，陪了太子十二天，直到太子没有大碍。之后，康熙还在太庙里祭奠，感谢上天和祖宗保佑太子平安无事，并重赏治疗太子的人。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他带着太子、四阿哥胤禛、十三阿哥

胤祥南巡，到达山东德州时，太子突然生病。康熙立即改变南巡计划，在德州停留十几天，专门照顾太子，还让太子的叔外公索额图过来陪太子。

当然，对于其他皇子，康熙也表现出了父爱滔滔的一面。

康熙的溺爱导致了太子的骄纵，在恭顺一面之外，太子还有暴戾的一面。谁只要违拗了他，他就会显得暴躁无比。康熙虽然节俭，但太子非常奢侈，在跟随康熙南巡的过程中，太子向地方官员狮子大开口，康熙就算惩治贪官，也没法惩治太子啊！地方官谁敢得罪这个未来的皇帝啊？还不得乖乖拿出银子。在江宁的时候，就因为清官陈鹏年不配合，太子就差点要把这个人处死，幸亏康熙还算明智。

太子的骄纵是一天天养成的，在宫里宫外他的口碑并不好，熟悉的人说太子刚愎自用好杀人，喜欢虐待下人。连皇室宗亲和朝中大臣，太子都不放在眼里，太子曾经亲手打过平郡王纳尔苏和海善，对朝鲜的使者也非常傲慢，以至于朝鲜的使者回去说：“如果太子当政，清朝必亡。”

康熙在亲征噶尔丹的时候中途生病，特别想念太子，让他过来探望。当时太子只有十六岁，还没有脱掉贪玩之心，来了之后，看到生病的父亲，丝毫没有忧虑之色，反而喜形于色。康熙很吃惊很生气，觉得太子不孝，就把他打发了回去。

回京后，康熙找借口杀了几个太子身边的人，想以此给太子敲敲警钟，不要听小人的话，别在外面乱搞，太子曾经和几个人搞同性恋，康熙也知道这事。

可惜，康熙的敲打并没有起到作用。太子依旧我行我素，性情乖戾，康熙很寒心，以至于他愤愤说道：“隋文帝就是因为不能预知到儿子隋炀帝的罪恶，才不得善终；我只要还活着，就不会容忍太子做出不忠不孝的事情。”

从这时起，康熙心里就产生了废太子的想法。可惜，康熙实在没法对太子下手，每每想起过世的皇后，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对太子的溺爱中，尽管他给了太子许多机会，但太子从来就没有珍惜过。

康熙对太子不满，太子对康熙更不满：你这皇帝要做到什么时候啊？

太子曾经公开对别人说：“纵观古今，有坐过四十年的太子吗？”

太子等得花儿都谢了，开始失去耐心了。确实如此，再等下去，当上皇帝也是个老头了。但是太子这种话毕竟是大不敬，对康熙的心

理冲击可想而知。

还有一件事情让康熙对太子很失望。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月，北京的天气非常炎热，康熙带着儿子们离开北京，前往热河行宫避暑，热河行宫也就是现在的承德避暑山庄。康熙这次去承德带了八个阿哥，其中有皇太子胤初和十八阿哥胤祹。这个十八阿哥还不到八岁，就跟着康熙来这里避暑打猎。

他们先在热河住了一段时间，接着便继续往北，带着大批人马围猎。就在大家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十八阿哥突然病倒。开始还只是发烧，康熙以为不是什么大事，把十八阿哥留在驻地，带着部队继续前行。走着走着，照看十八阿哥的人忽然快马加鞭赶过来报告康熙，说十八阿哥病情加重，非常危险。

康熙一听，立刻回到十八阿哥的身边。赶回驻地后，发现十八阿哥的情况果然不太好，两腮红肿，高烧不退。可惜驻地缺乏医药，康熙心急，派人去宫中接御医来诊治。

十八阿哥病重的时候，康熙经常把他抱在怀里，喃喃自语。幸亏御医赶到，小阿哥的病情终于得到好转。康熙很高兴，给坐镇北京的胤祉和胤禛发了一份手谕：“十八阿哥现在已经好转，想是没有大碍了，你们可以放心了。朕一个年迈的人，也仿佛获得新生一样。”

康熙对十八阿哥如此重视，可见他老年得子，舐犊情深。为了十八阿哥，康熙放弃狩猎，带着队伍回京城。但是在半路上，十八阿哥又发病了，而且这次病情更重，跟上次的症状还有一些不一样。即便是御医，也毫无办法，最终，还没到京城，十八阿哥就染病身亡。

失去胤祹那一年，康熙五十五岁。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康熙虽然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也经不起老年丧子这样的悲痛。十八阿哥之死让他痛不欲生，然而，让康熙更加气愤和不解的是：随行的其他皇子对十八阿哥之死根本无动于衷，尤其是太子，对小弟弟的病情丝毫不关心，小弟弟死后，在他脸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悲伤的神色。

康熙很难理解，这些儿子个个能文能武，自己对他们个个都不错，给了他们应有的父爱，但为什么他们居然毫无手足之情呢？自己并不是一个冷漠的父亲，他们没理由冷漠无情啊！再说了，太子当时已经有子女了，难道他体会不到我的痛苦？

由于太子的特殊地位，时间一长，在他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这是古今的通例，太子是未来的储君，当然会有很多人向他靠拢，以便取得政治利益。康熙也确实是把太子作为储君来培养的，在

出征或者出巡的时候，康熙一般会让太子代理朝政。太子接触权力多了，自然会上瘾，当太子还是不如当皇帝好啊，问问历史上所有的太子，估计都是这种感受。

索额图是太子的叔外公，他是索尼的儿子，不仅跟太子的关系密切，跟康熙的关系也非常好。康熙在擒拿鳌拜之前，屡次召索额图进宫商议对策，最终铲掉了鳌拜及其党羽，实现了亲政的愿望。索额图因此飙升到国史院大学士，一年后加封保和殿大学士，权倾一时，地位相当于宰相。

康熙朝中最有权力的两个人物，第一是索额图，第二是明珠。明珠是康熙惠妃那拉氏的堂叔，地位当然不如索额图尊贵，但也是皇亲国戚，再加上有能力，在康熙朝相当红。当时，京城流传一句谚语：“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

索额图和明珠的关系非常不好，两人不仅政见不同，而且互相争宠，积怨很深。在朝廷上斗来斗去，这一切康熙都看在眼里，但最高领导者就喜欢保持这样的平衡，防止某个人独大，造成鳌拜那样的权臣局面。索额图和明珠虽然关系不好，但两人还是有相似的地方，都喜欢擅权。索额图在擅权这块过于嚣张，而明珠则相对阴险。京城里还有一则顺口溜：“天要平，杀老索；天要安，杀老明。”可见，百姓对这两人是恨之入骨的。

刚好索额图、明珠属于两个敌对的派系，索额图是太子党的领袖，明珠是皇长子胤禔的外叔公。而且，胤禔比太子大两岁，是太子的兄长，只不过是庶出，地位低于太子。胤禔本人心里也不服，只是不好表现出来而已。再加上胤禔这个人常年征战，在众兄弟中威望最高，见识和阅历都比其他人要高。

明珠纠集了一帮人围绕在皇长子周围，形成了“皇长子党”的雏形，与太子党形成对峙之势。对索额图和明珠之间的明争暗斗，康熙本来是不想干涉的，但是现在他们把太子和皇长子也卷了进来。康熙不能坐视不管了，经过认真的考虑，康熙选择保护太子，遂严厉打击皇长子党，将明珠罢免。

明珠失势后，太子一党势力更加庞大，俨然形成了一个小朝廷。大臣们为了将来的前途，蜂拥聚拢在太子身边，这是一本万利的投资，而且保险系数很高。康熙皇帝已经是老人了，终有归西的一天，将来的朝政还是这个未来的储君说了算，现在正是最好的投资时刻。

作为太子党的首领，索额图更是上蹿下跳，四方奔走，竭力提高太子的地位和威望。为太子制定礼仪的时候，索额图授意太子的服饰一律用黄色。每年的三大节日，太子接受百官朝贺，一律行两跪六叩

之礼，与皇帝的三跪九叩之礼只差一个档次。索额图的这些措施无疑把太子抬到跟皇帝差不多的位置，引起了康熙的不满。康熙责备说：“太子所用的仪仗和礼仪，有些过分，几乎与朕相同。”

这件事激化了康熙和索额图的矛盾，很早的时候——亲征噶尔丹之时康熙就对索额图不满。康熙的中路军逼近噶尔丹的军队，但是费扬古的西路军还没赶到。噶尔丹散步谣言说俄国的六万鸟枪兵会过来一起打清军。索额图是胆小怕死之辈，一再要求康熙后退。

每逢战争，索额图总是慌里慌张，贪生怕死。后来，征讨噶尔丹胜利后，康熙回京，把索额图大骂了一顿。自此，索额图觉得颜面尽失，没脸继续坐在位子上，便提出了退休。尽管如此，这不代表索额图真心认错，他心里其实对康熙怨言颇多，尤其是他没想到康熙并不挽留自己。所以，勾结一众人，紧紧抱住太子这棵大树。

在德州时，太子病重，康熙叫索额图过来陪他。但索额图不懂规矩，骑马直接到太子门下，视皇帝如无物。索额图与太子一起，做了许多让康熙不高兴的事情。

康熙终于发作了，以“结党营私，议论国事”的罪名将索额图抓捕起来，康熙指责索额图：“你做大学士的时候就贪污行贿，我把你革职了。后来又起用你，没想到你不思恩，就是养一条狗，也懂得主人的恩。像你这样的人真是不知好歹，我本来想派人去抄你的家，搜罗证据，但担心牵连的人太多，闹得举国不安，所以才没这样做。我若是不先制住你，你反倒会先发制人，对你这么做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可以就地正法。”

从康熙的话中，我们能发现康熙这么做显然是怀疑索额图跟太子密谋篡位，而且康熙也深知太子党人多势众，盘根错节。康熙不想把这事办得举朝震动，只是将索额图和他的家人全部软禁起来，并拘留索额图的同党额库礼等人，将索额图及其同党在朝做官的子孙全部革职。

据说索额图被囚禁之后，大臣们依旧怕他，很少有人敢检举揭发他。这种心理也可以理解，索额图虽然被囚禁，毕竟位高权重，只要没处死，说不定哪天就会得势。至少太子一旦登基，索额图肯定会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看到大臣们无人敢检举索额图，康熙更加气愤，他感觉自己被架空了，所以下了狠心，处死索额图及其两个儿子。

对处死索额图，康熙丝毫不后悔，多年后他还愤愤不已地说：“索额图实为本朝第一罪人。”这是帝王的思维方式，凡是威胁到他权威的人，一定要抹黑丑化打倒。这时的康熙早已忘记索额图是帮

助他铲除鳌拜的第一功臣，当年康熙经常说“索额图是本朝第一功臣”，前后对比，我们能看出权力的冷酷无情。

索额图之死，对于太子和太子党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康熙没有对太子怎么样，但危险已经来临。太子的地位开始岌岌可危。

太子疯了

索额图死了，稍有警惕性的人都会感到自危，但是太子却浑然不觉。这是康熙把他害的，多年的骄纵让太子觉得自己是天经地义的太子，没人能取代自己的位置，没人能对自己构成威胁。

胤初仍然脾气不改，经常殴打臣民，惹起了一片反对之声。看到太子如此不争气，康熙恨铁不成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导火索一样，让事情往最坏的方向发展。

在太子位置上坐了三十多年，胤初的心情已经有点变态，确实，这个等待太漫长，容易让人疯狂。有一次，围猎的时候，他听说康熙身份欠安，心情很兴奋，几次派人去察看康熙的日常起居。还有一次，他本人偷偷地来到康熙帐前，扒开帷幄的缝隙，偷看里面的情况。不巧，这事被其他皇子撞见了，将这事告诉了康熙。

康熙非常愤怒，将皇子和大臣们全都召来，当面痛斥这些没有心肝的儿子们，康熙骂得最狠的还是太子。他骂道：“没人比你更过分，你平常就不听我教诲，目无法纪，我包容了你几十年，你什么时候悔改过？平常你就挥霍无度，花费比我还要多，我不跟你计较了。跟我南巡的时候，你居然向当地官员索要贿赂，这不是跟我的政策公开唱对台戏吗？你十八弟病危的时候，你居然无动于衷，像你这种不孝不仁的人怎么当太子啊？你昨天深夜在我帐外窥伺，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想看我死了吗？你还派了一大堆人在监视我，是吧？”

说到这里，康熙流出了眼泪：“你不知道你这么做让我寒心吗？我这个皇帝真可怜，还得每时每刻防备着自己的儿子，每天都要担心会不会被儿子毒死，你说我哪点对不起你啊？”

康熙泣不成声，一时激动，晕倒过去。这一次，康熙真的受伤了。他当众宣布废除太子。

回京后，康熙祭奠太庙，昭告天下，正式宣布废除太子。此外，康熙将太子交给皇长子胤禔看管，并诛杀了太子的六名党羽。

康熙是本着处理政变的态度处理这个事情的，他私下里认为太子

想谋害自己，为索额图报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太子虽然有结党的嫌疑，但还不至于谋反。索额图之前肯定跟太子商议过继位以后的问题，但还不至于说要发动政变，囚禁康熙。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实力，还因为康熙的威望非常高，无人能取代。如果通过政变的方式让太子继位，肯定会发生动乱，无法维持局面。

废掉太子后，康熙的精神也受了很大的打击，六天六夜无法入睡，心情无比灰暗，甚至感觉到死亡的阴影。在这事情，康熙有一种巨大的受挫感，自己这么对太子，对太子倾注了无限的心血，没想到居然把他培养成一个不仁不孝的人。康熙号称“仁孝治国”，这个结果对他简直是一种讽刺。

在教育方面，康熙是失败的。雍正吸取了这个教训，让皇子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先拜老师，尊师重道，才能培养出合格的王子，否则只是纨绔之徒、品性恶劣之辈。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宫里传来一个消息：废太子疯了。

根据太监的报告，胤礽忽然站立，忽然坐下，言行失常，形同鬼魅，睡觉也不在一个地方，经常迁来迁去，吃饭吃七八碗都不知道饱，喝酒喝二三十杯都不知道醉。一句话，胤礽中邪了，鬼附身了。

胤礽的这种表现很可能是精神失常，身为太子本来压力就大，那么多兄弟盯着，被废之后压力就更大了。

康熙听了这个消息大惊，终于给胤礽之前的行为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胤礽并不是个坏孩子，只是因为中邪了。

在野史笔记《十叶野闻》中也记载了废太子发疯之事，不过野史给出的解释不同，认为废太子之所以发疯是被四爷胤禛下迷药，我们不妨来看看：

胤禛青少年时经常只身行走江湖，结交奇人异士，以备日后不时之需。有一次，胤禛漫游到河南嵩山，便进少林寺拜少林武僧为师，并在那里习武半年。后来，师傅见他并非习武之人，便教了他一些皮毛后赠他一铁杖让他下山。

回到京中，胤禛遇到太子宾客在街上仗势欺人，把人家打得满头是血，当时却又无人敢管。胤禛心中不平，便走过去问苦主为何如此，旁边的恶少大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管这闲事？你难道有三头六臂，不想活了不成？”胤禛大怒，盯着此人看了半晌，突然抽出铁杖猛击其头，把那恶少打得脑袋开花，其他人见胤禛把恶少打死，吓得一哄而散。

太子党人得知胤禛回来后，便深夜派遣刺客去雍亲王府行刺。当夜，胤禛正在一喇嘛的陪同下诵经，突然见窗外白光闪闪，上下无定，觉得非常奇怪，便命喇嘛去看看怎么回事。喇嘛说：“殿下不用担心，我已派某力士去办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胤禛见院中的树枝都有如刀削，蓄养的恶犬有身无头，还有数十名武士横尸园中。胤禛正惊诧间，喇嘛过来禀告说：“这些都是昨晚来行刺的剑客，他们技穷力竭，被力士所杀。今晚他们可能还要来报复，请殿下当心。”

胤禛听后，赶紧命手下侍卫加紧防范。当晚，果然风声鹤唳，屋宇震摇，只听得屋顶上金铁鸣动，两边人马在屋顶上决斗，哐哐当当，甚为激烈。次日，太子宫的人惶惶出去抢购数十棺木，雍亲王府也是如此。这时，太子宫和雍亲王府都在广招喇嘛前去诵经做道场，朝中大喇嘛被雍亲王府先招了去，不料他前脚刚进，后脚就有人命他立刻赶去太子宫。大喇嘛碍于雍亲王府的情面，只好说不能复命。太子听后大怒，扬言要将大喇嘛捕杀。大喇嘛心里害怕，便托国师求情才逃过一劫。

这时，有个奇士从四川来，到雍亲王府求见胤禛。两人一见，胤禛发现是原来结交过的好朋友，十分高兴，便留他下来，谈论技击武艺。两人谈得正开心，奇士突然作色道：“殿下有难，为什么不告诉我啊？”胤禛问：“你怎么知道？”奇士道：“听说太子宫新得一个奇人，能以铁冠在百里外取人首级，今晚就要来祸害殿下了。幸好天不绝殿下，让我得知此事，今天是特来报讯的。”胤禛问：“那你有什么办法对付？”那奇士冷笑一声：“他是以喇嘛咒语为护符施展其法术的。今晚我们以贝叶蒙首，那铁冠必然来而复去。我们可以先在庭外张一袈裟，就像蜘蛛张网一样，铁冠到时必然跌落其中。”

当晚胤禛听从其言，果然获得铁冠。太子听说铁冠丢失，十分恼怒，而后竟然积恨成疾。胤禛得知后，派大喇嘛前去太子宫，说：“我有阿肌稣丸，可以治殿下的病。”太子道：“你不是帮着胤禛的人吗？我哪里敢吃你的药？”大喇嘛说：“哪里哪里，胤禛暴虐，众叛亲离已经很久了。他现在已经遨游四方，不敢回来，殿下要是不信，可问某喇嘛。”某喇嘛本是太子的亲信，但其实也是大喇嘛的徒党。太子不知其计，便问某喇嘛，喇嘛说：“大喇嘛是西天活佛之师，其丸能治百病。服之必然有效。”太子相信了他，便令大喇嘛进药丸服用。

殊不知，阿肌稣丸本是媚药，或者兴奋药，并不能随便使用，一旦滥用的话，必然致使神经中枢受到过度的刺激，最后形态癫狂，无法自制。服用几天后，太子果然便发狂了，他在屋里大喊大叫，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最后连大小便都失禁了。太子妃大骇，赶紧上报

康熙帝。康熙帝派人去看视，得到回复说太子已不复成礼，安静的时候就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奄奄一息，躁动的时候就像野兽一样狂呼乱叫。康熙不得已，只好下诏废其储位。

这段野史很有意思，他把太子被废一事说成是雍正策划，让太子发狂，然后被废的。实际上，太子发狂是在被废之后，并不是在此之前。

就康熙的理想来说，最好的情况就是太子仁德贤良，众皇子围绕着太子，悉心辅政，一心为公，太子呢，也全心治国。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的，康熙捧太子，结果太子势力过大，威胁到了自己的权力，康熙不乐意。康熙让皇子们从政历练，结果威胁到太子的地位，太子心里不爽。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愉快。

康熙对儿子的培养有一个标准，首要的希望是培养成君王，能够治理天下的那种人；其次是贤王，能够辅佐君王安天下打造朗朗乾坤的那种；再其次是大将军，能够带兵打仗做大元帅的那种；更次之的是搞学术，做大学问家，像淮南王刘安那种，能够推出《淮南子》这样的名作，当然不要学习刘安造反。最次的是培养成一个书画家，好歹也是雅士，也是艺术家。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就是一个酒囊饭袋了，康熙是不会培养只有种田才能的儿子的。

争储夺位

太子一废，皇子们个个都活跃了起来，他们从地平线上看到希望了，大家都意识到，现在全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就看谁的本事大。

这是康熙万万没有想到的，康熙是个重感情的人，至今还沉沦在悲痛中。他万没有料到这些儿子们丝毫不体谅自己的心情，也不照顾一下胤初是他们的兄弟，居然迫不及待地暴露出对储位的欲望。康熙的心情更凉了，他想到了齐桓公，想到了隋炀帝，这些人不得善终，全是因为没有好儿子啊！

康熙先是劝儿子们：“十八阿哥刚死，胤初又发生了这种事情，我现在身心交瘁，只想能够好好安度晚年，你们不要再争夺了。储君之事我自有决断，你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到时候按照我的圣旨办。”

康熙想要儿子们和睦，这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蠢蠢欲动的人是皇长子胤禔，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年纪最

大，当年就在明珠的指导下跟太子争过。

胤禔这个人，确实是有才能的，按照康熙的教育标准，他应该算得上是一个能带兵的大将军吧，当然，也不是特别优秀的大将军，跟韩信这种肯定没法比。考虑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胤禔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胤禔十八岁的时候，康熙就让他协助伯父福全征讨噶尔丹，当时胤禔的表现说不上很好，也不算特别差。

那次，清军在乌兰布通打败了噶尔丹，本来是有机会一举歼灭噶尔丹的。但清军内部意见不统一，结果让噶尔丹逃脱。康熙很生气，后来收到了胤禔的密奏，胤禔把责任全推到福全身上。康熙愤怒之下，让胤禔提前回京。

胤禔回来后，康熙教训他：“裕亲王是你的伯父，也是你的上司，你不仅越级上奏，还说他的坏话。你知道忠孝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吗？”

在这次出征中，胤禔犯了不少过错，福全本打算回去后参他一本，后来得知康熙已经责备他了，想想算了，便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从这事可以看出，胤禔这个人虽然没有太子那么过分，但人品也不是特别好。福全是康熙的哥哥，当时若不是康熙出痘，继承大统的很可能就是福全。康熙岂容自己的儿子对二哥不敬？

受了这次训斥，此后，胤禔在战场上的表现还算可以。

太子被废之后，胤禔觉得这下该轮到自己了。加上康熙让他看管太子，并为自己护驾，他觉得这是康熙在暗示：将来由你继承大统。

人一旦有了贼胆，行为就变得放肆，胤禔头脑有些发热，上奏说：“胤初品行卑污，为人不齿。如果父皇想诛杀他，不必亲自动手。”

还没当太子，就想置废太子于死地，对于这种人，康熙是很看不惯的。所以他召集众皇子，说道：“你们中如果谁想钻营当太子，就是国贼，国法不容。”

康熙还当面对胤禔说：“我虽然废掉太子，让你保护我的安全，但是没有立你的意思。你秉性急躁愚顽，当不了太子。”

康熙让胤禔、胤禔和九阿哥胤禔看管胤初，胤禔为了气胤初，将康熙废掉太子的告天文书给胤初看。胤初不耐烦地回道：“我的太子之位是父皇废的，他要废就废，何必告天。你又何必给我看呢？”

胤禔将胤初的话添油加醋地转达给康熙，康熙听了后很生

气：“朕乃受命于天，怎么可以不告知天地。胤初还这么愚顽，实在让人生气。以后他的话就不用转奏给我了。”

胤禔又把康熙的话告诉胤初，胤初回答说：“父皇说我其他不是，我不辩解。如果说我谋反，我不服，我根本没这个想法。希望你把这话代我转奏。”

胤禔听了，大喝道：“父皇说了，你的话以后不用转告给他了。”

一旁的九阿哥胤禩觉得这事很重要，说：“二阿哥刚才的话很重要，不告诉父皇恐怕不好。”

胤禔怒道：“父皇都说了，你何必管这闲事。”

这时，四阿哥胤禛站了出来说：“九阿哥说的没错，这事如果不告诉父皇，以后追问起来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转奏。”

胤禔说：“不可以。”

胤禛也急了：“你不奏，我奏。”

胤禔心想，如果我不让奏的话，到时父皇知道反说我的不是了，只好服软，同意上奏。

胤禔这人做事确实冒失，后来他又上奏说：“相面人张明德给八阿哥胤禩看过相，说八阿哥今后一定大富大贵。”

胤禔跟八阿哥的关系比较好，本来是觉得自己没希望了，给八阿哥做个人情，没想到好心办坏事。康熙大怒，让人把张明德抓起来，因为此事，胤禔也被软禁起来。

胤禔跟八阿哥虽然不是同母，但关系非同寻常。胤禩的母亲很早就去世，是由胤禔的母亲惠妃抚养长大的，所以两人形同亲兄弟。

胤禔这招不仅害了自己，也害苦了八阿哥。康熙怀疑胤禩在他背后拉帮结派，搞什么阴谋，当众骂胤禩奸柔成性、野心勃勃，还下令将胤禩软禁起来。康熙实在被这些儿子们搞怕了，居然将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和十三阿哥都囚禁起来，防止他们兴风作浪。

在软禁期间，三阿哥胤祉还是兴风作浪，他向康熙揭发胤禔迷信喇嘛教巫术，诅咒废太子，并在废太子的住处放了邪物。康熙听后，原本脆弱的神经绷得更紧，他立刻派人去搜查，果然查出了“证据”。此时，康熙的头脑已经很不清楚了，他没想到胤禔可能是被人陷害。

康熙对胤禔失望到极点，他觉得胤禔的罪过比胤初更大，下令剥夺胤禔的王爵，并永远囚禁。

康熙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毕竟是亲骨肉，所以朕不忍杀之。”为了防止胤禔将来有报复行动，他派人严加看守胤禔。

胤禔活了六十三岁，其中二十六年的时间是在高墙中度过，虽然贵为皇子，活得却毫无自由。第一轮争夺战中，看似最有希望的皇长子胤禔却最先出局。

三阿哥胤祉平时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他为什么要搞垮胤禔呢？

我们先来了解三阿哥，胤祉在康熙所有的儿子们是最温文尔雅的，学问也最好，所以他出手结束胤禔的政治生命就让人特别起疑。他是受人指使？还是自己动手？如果是自己动手，又有什么动机呢？

胤祉从小就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各门功课都非常优秀，他曾经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没有扎实的学问，康熙也不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但胤祉是一个很低调的人，看上去没什么政治野心，还曾经主持过孔庙的祭奠。

大阿哥和二阿哥都被软禁后，胤祉就是年纪最大的皇子了。也许正因为这点，所以他也起了司马昭之心。康熙生病的时候，胤祉表现得非常积极，日夜在一旁照顾。胤祉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学问家，编写了很多图书，康熙很欣赏他的才干，但是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合适的政治家。胤祉自己心里会不会也是这样想？从他的表现中，我们就知道他绝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书呆子。

胤祉走的是低调政治路线。康熙末年，这时候胤祉很受宠，发生了“孟光祖事件”。

孟光祖是胤祉的幕僚，在胤祉最受宠的时候，他忽然打着胤祉的旗号到全国各地奔走。根据当时的规定，皇子的门客如果要到其他各省活动，必须先申请，批准了才能行动。但孟光祖却没有走这些程序，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在各省之间畅通无阻，这就像是胤祉做巡回宣传一样。

孟光祖活动的时候，经常以胤祉的名义馈赠给地方大员一些礼品，在四川时，给四川巡抚年羹尧送了厚礼，在江西时给江西巡抚佟国勳送了大礼。那意思仿佛是给这些人通气，告诉他们胤祉就是未来的继承人，你们以后要多多支持他的工作。根据规定，阿哥跟地方大员来往，地方大员必须登记，然后上报朝廷。但地方大员都没上报，显然是不想得罪胤祉。所以孟光祖活动了几年才被康熙发觉，接下来是我们熟悉的一幕，孟光祖被正法，地方大员要么革职要么降级，但也到此为止，不会追查到胤祉头上。

由此可见，胤祉是有政治野心的。雍正继位之后，也因此指责过

胤祉，说他以储君自命，觊觎大位。

太子复位

康熙万万没有想到，废掉太子会惹来这么多的麻烦。

储位问题让康熙头脑紧张，想到这个问题，他本能地感觉到一种恐惧。但是这个问题迟早都要解决，谁能帮自己呢？

康熙想到了久违的老臣李光地。李光地是汉人，跟索额图和明珠不一样，他是凭着自己的实力爬上来的，一路中进士，点翰林，做到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还曾担任过太子的老师。

康熙与李光地的关系就像刘邦跟张良的关系一样，李光地不是一个权臣，而是一个有智谋的大臣，所以他们君臣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

在要不要杀掉胤禔和胤礽的问题上，康熙就咨询过李光地的意见。李光地说，废黜太子囚禁胤禔都可以，但是杀掉自己儿子的行为却万万不可，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种不祥的事情。

康熙把自己的困境都坦然告诉李光地，说储位未定，阿哥们个个都蠢蠢欲动，不立储不行啊！要立储的话也不知道立谁。

李光地静静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这是皇帝家事，发表任何意见都必须特别小心。

看到李光地不说话，康熙只好将自己心里的想法全都说出来：“之前朕所以废掉太子是因为太子看到自己兄弟死了，冷漠无情，毫无关心之意。二来也是因为太子最近暴虐无常，完全丧失了心智。不过，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都是大阿哥在后面搞鬼，让太子中邪了。这次找你来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立储的问题。”

李光地听出来了，康熙的言外之意是想复立胤礽。对于中邪一说，理学出身的李光地当然不相信。李光地郑重地说：“我现在身居高位，鬼物都不敢近身，何况是二阿哥这样尊贵的人。邪魔之说，皇上万万不要相信。”

李光地的言下之意似乎是不主张复立胤礽。

康熙假装没有听出来，问道：“如果不是邪魔，又是什么呢？”

李光地说：“人性。人的地位一旦尊贵无比，就容易产生骄纵的情绪；日子过得安逸了，就容易放纵。骄狂放纵的日子过久了，人的

神志很容易昏聩，听不进去别人的任何话。一旦在这种状态中沉湎久了，就很容易改变人的性情，让人狂妄自大，是非不分。”

康熙当然不愿就这么放弃胤初，他问道：“二阿哥还能改过来吗？”

李光地以前做过胤初的老师，对胤初很了解，他说道：“要他变成一个正常人，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要付出一些代价，除非二阿哥能够清心寡欲见心明性，不要再过那种糜烂的生活。只要他心境淡泊，时间长了，自然能恢复本性。”

康熙点点头，不过似乎没有听进去，对这种比较玄妙的东西，这位现实的皇帝并不是特别上心。他说道：“朕想再让二阿哥当太子，结束众皇子们明争暗斗的局面。”

李光地听了显然不太赞同，但他不好正面反驳，只说：“二阿哥的病需要时间调养，不可操之过急。”

康熙说要立谁为太子，谁都无法阻拦，他这次召李光地来，更准确地说不是为了征求李光地的意见，是希望李光地把复立胤初的信息传递出去，看看朝野上下的反应。也希望大臣们能够揣测皇帝的心思，主动请求复立胤初，这样一来，自己也有面子了，将来也有回旋余地。

但李光地这个人非常谨慎，他知道这事情事关大清国体，再说他本人并不赞同复立胤初，所以始终没有把这事说出去。

看到李光地不配合自己，康熙只好自己动手了。康熙选择的地方是畅春园，他想在这里搞一次民意测验。作为一个皇帝，康熙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作为一个处处以明君标榜的皇帝，他不会粗暴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常常会表现出礼贤下士体察民意的姿态。

这一天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熙把大臣们召到畅春园开会。大臣们从康熙选择的地点就感觉到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例会，畅春园是前废太子读书的地方，当然是有含义的。

大臣们到齐后，康熙说道：“朕这段时间心力交瘁，主要是废掉太子后，无人为朕分担政务，所以才劳累啊！现在，各位从众阿哥里面推荐一个出来当太子，谁的得票最高，朕就让谁当太子。不过，大阿哥乖戾暴虐，不在入选之内。”

康熙还提醒大臣们，不要搞小团体，秘密串联，更不要互相打听，抱着从众的心理。在这次投票中，康熙剥夺了一个人的投票权，这人就是大学士马齐。康熙为何要禁止马齐投票呢？马齐是富察氏，

满洲镶黄旗人，家世显赫。马齐担任过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和议政大臣，是朝廷的重臣。康熙禁止他投票是因为马齐跟八阿哥胤禩的关系很好，是“八王党”的领袖。

作为一个很要面子的皇帝，康熙也拒绝承认自己是想要立胤禩。他对大臣们说：“上次朕召见二阿哥，有人猜测朕想重新立二阿哥，于是便献殷勤保奏二阿哥，如果你们这样想便错了。立储之事朕自有分寸，到时你们遵旨就行了，不必妄自揣测。跟二阿哥关系近的人不必高兴，跟二阿哥关系远的人也不必担心。”

对于康熙的这个举动，大臣们都非常困惑，不知道他想干嘛。除了在上古禅让制时代，从来没有听说过由大臣们推举国君的，当然，满族在入关前，还有大臣推举的模式，但是入关之后这个模式就取消了。

八阿哥胤禩的人缘是最好的，在当时众阿哥中他最会玩关系。听说康熙搞什么选举，他的支持者们纷纷活动，他们在手心写了一个八字，见人就把手心给人看，希望大家都投八阿哥的票。加上八阿哥人缘确实好，有这么卖力的宣传队伍，人气想不高都难。

结果很明显，八阿哥以绝对的优势击败其他皇子。得知这个结果时，康熙目瞪口呆，经过这么多事情，康熙已经是草木皆兵。他担心这个结果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过康熙已经有言在先，强忍着怒火说：“立储之事关系国本，你们要用心点，八阿哥从来没有处理政务的经验，新近又获罪，再者其母身份低微，希望你们能再想想。”

大臣一听，明白了一个道理：皇帝说话是不算数的，在皇帝的统治下，任何看似民主的东西都只是形式。这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作为官僚集团的首领康熙并不需要用说话算数来体现自己的英明。

康熙当时还有一种嫉妒的心理，八阿哥年纪小，没什么威望和军功，居然能够赢得这么高的支持率。如果让他当了太子，搞不好自己都变成冷门了。我是皇帝啊，我想立谁就立谁。

后来，康熙又召见了王公大臣，再三强调说自己最近老梦到孝庄太后和孝诚仁皇后（胤禩的母亲），梦中，这两个女人都是一脸的不高兴，显然都对胤禩被废表示不满。康熙又说，二阿哥上次中邪，迷失本性，现在已经痊愈了。

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他再次宣布立胤禩为皇太子。康熙虽然搞过一次民主实验，但这个实验的目的是通过民主的形式实现自己的目的，一旦目的失败，康熙马上转向独断。事后，康

熙对李光地挺生气的，在畅春园的时候，李光地并没有站起来号召大家选胤礽。

李光地是个聪明人，回答说：“立储之事，关系重大，只应该由皇上一人乾坤独断，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怎么能做决定呢？”

康熙也没有怪罪李光地，反而交给他一个光荣的任务，让他主持太子复立的工作，并好好教导胤礽。李光地尽自己的职责对胤礽说：“勤思学道，笃志正学，天聪益开，天性益厚，此乃为君之道。”

康熙尝到溺爱的后果，也劝胤礽：“那些规劝你的人，都是你的恩人；那些奉承你的人，其实是害你。以前指出你毛病、批评过你的人，你不要放在心上，更不要报复他们，他们是为你好。”

为了兄弟和睦，造就明君贤王的局面，康熙又说：“你的兄弟中，四阿哥能够体会朕的心意，爱朕之心殷勤孝顺，可谓是诚孝。五阿哥心地善良，为人厚道。七阿哥和蔼可亲，八阿哥也称得上贤明，裕亲王生前经常说八阿哥脾气好，心地仁厚，脚踏实地。你要跟他们亲近，让他们将来辅佐你，这样国家才会昌盛强大。”

复立太子的时候，康熙也没有冷落其他儿子，封三阿哥、四阿哥和五阿哥为亲王，七阿哥和十阿哥为郡王，九阿哥、十二阿哥和十四阿哥为贝子。人气最高的八阿哥什么都没得到，这个结局是意料之中，因为他让康熙心情不爽。

再度被废

康熙对太子寄予厚望，希望他洗心革面，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刚开始的时候，太子还比较收敛，康熙和李光地的话能起到一点作用。太子对康熙承认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认错之后他又说：“虽然我犯了这些错，但有人利用我的错来陷害我也是事实。”

也许太子说的是实话，但这样的话是康熙不喜欢听的，在康熙看来，这是冥顽不化的一个证据。太子还对康熙册封其他阿哥感到不满，尤其是三阿哥、四阿哥和五阿哥册封为亲王，已经明显威胁到太子的权威。以前阿哥中最高不过郡王，跟太子隔开了档次，现在位置如此近，意味着这个太子之位很不稳固，地位大不如从前。

太子缺乏自知之明，其实他被废最根本的原因还不是自己性格乖戾，而是形成了太子党，威胁到康熙的地位。想不到复位没多久，太子又故态复萌，在他周围很快又聚集了一帮大臣和心腹，随着太子的

羽翼越来越丰满，康熙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

在太子的党羽中，有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都统鄂都等人，这些人都是掌握着大权和实权的人物，主管国家的命脉——行政、军事、刑罚。除此之外，太子又开始作威作福，到处勒索，在地位尚不稳固的情况下，这无异于引火烧身。

原户部尚书王鸿绪因为推荐八阿哥被罢官，回到江南后，曾经对人说：“东宫虽然复位，圣心却依旧不稳。”一语道破关键，太子此时最好的选择是明哲保身韬光养晦。

不过，康熙还是一如既往地溺爱这个儿子，正像他后来对人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儿子，也有自己不喜欢的儿子。碰上自己喜欢又不肖的儿子，这是宿命。这么多年来，朕默默忍受着这种痛苦，这是别人无法理解的。二阿哥的行为让朕痛心无比，他让我谴责谁，我就谴责谁，他让我惩罚谁，我就惩罚谁，他让我流放谁，我就流放谁。除了他让我处死的人，我没有照办，一切都顺着他。我原本以为一切顺着他，他就会心情安静快乐，心情安静快乐就会从善，没想到适得其反。”

顺着一个人，就会让一个人愉悦快乐，愉悦快乐就会从善——康熙这个逻辑实在有失一代明君的水平。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有人举报步军统领托合齐等人在东宫违法聚会，听到这个消息，年老的康熙身子晃了晃。有人说，太子在家里宴请客人很正常的事情啊，康熙不至于反应这么强烈吧！如果太子宴请的是文人雅士，饮酒赋诗还可以理解。但太子宴请的是军政要人，这是康熙无法容忍的，他再一次感到手中的权杖亮起了红灯。一个老年人是脆弱的，一个老年的皇帝对皇权尤其敏感，哪怕是自己的爱子，他也未必放心。

康熙心想，就算太子安分守己，他的党羽中只怕会有奸诈之人怂恿他做大逆不道的事情。兵部尚书耿额以前就是索额图派系里的，现在他跟太子走这么近，会不会吹耳边风，让太子为索额图复仇。想起这些，康熙不寒而栗。

多疑是人性的痼疾，康熙既然怀疑到了耿额和整个太子党，不管有无实据，要先下手为强。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对太子党展开了清洗，将耿额、齐世武、鄂都等人抓了起来，托合齐很机警，他一闻情况不对，立即主动提出辞职。但托合齐最后还是被抓了起来，病死狱中，死后被康熙挫骨扬灰——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人一般都是威胁到康熙的皇权，或者康熙自认为皇权被威胁了。

齐世武死得更惨，康熙对待他拿出了罗马人的残暴，将他钉在墙上，齐世武在墙上哀嚎几天后死去。康熙用对付吴三桂、噶尔丹的残忍来对付这些没有犯明显错误的大臣，可见其内心深处对皇权已经形成了病态的依赖，以及对任何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惧和警惕，哪怕这个人是自己最喜爱的儿子。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太子再次被废。再次废掉太子，康熙显得特别从容，应付自如，他说：“朕第一次废黜太子的时候，感到痛心疾首，但这一次不会了，朕觉得泰然自若。”

最后康熙下了一道死命令：“以后如果有人说不胤改邪归正，请求复立的话，推出去斩首。”

尽管如此，康熙仍然对储位真空感到烦心，这意味着诸皇子又要开始白热化的竞争了。从努尔哈赤开始，清朝所有的皇帝都对立储一事感觉焦心，康熙也没能逃脱这个规律。归根结底，还是个人倾向跟客观事实的矛盾，立储中考虑的因素太多，互相牵制。

太子被废后几个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上疏说立储是国本，请求皇帝再立一个太子。康熙对此感到烦心，敷衍道：“立储是大事，朕怎么会不知道？但事关重大，也不能随随便便就立一个。”

为了让大臣们心服，康熙还援引历史说：“本朝自开国以来就没有立储的先例，太祖皇帝生前没有立太子，太宗皇帝也没有。在前朝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宋仁宗三十年没有立太子，不立太子也没什么。我们可以看看汉唐的那些太子，如果太子年幼，还没什么事情。只要太子年长，周围总会聚集一帮宵小之徒，搞不好就会闹出一点事情来。”

皇权就像一个放大镜，将人性自私丑陋的一面放大许多倍，所以，在太子这事情上不能把错误完全推到太子身上。至于，太子是否真像史书记载的那么不可救药，也不能完全相信，里面应该有渲染的成分。当然，太子自身做得不够好，应该也是事实。

康熙似乎不想再立太子了，在所有皇子中，八阿哥地位很低，但似乎深得人心，连裕亲王福全生前都说他好话。如果立其他阿哥为太子，大臣们不服的肯定很多。但康熙是肯定不会立八阿哥为太子的，对于抢自己风头的人他一向不欣赏。

但是储位孤悬，皇子们都垂涎三尺，就连两度被废的不胤都仍然不甘心，想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康熙本人似乎也产生了一点点后悔之意，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会试题目是“放太甲于桐宫”，太甲是商朝的太子，因为暴虐无道被伊尹软禁在桐宫，三年后，太甲洗心革

面，后来又被迎接回来复立为太子。康熙出这么个题目，很多人猜测他可能想再度复立胤礽。

胤礽本人大概也听说了这事，很希望康熙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康熙五十四年，准噶尔部落再次闹事，康熙决定派兵征讨。得知此事后，胤礽想利用这个机会摆脱困境。他趁医生给自己看病的机会，用矾水写信，交给医生，希望他转交给正红旗的都统，让他保奏自己为大将军，带兵出征。结果，医生出宫的时候被搜查出来，胤礽的梦想泡汤。

“朱天保”上奏之密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二十日，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朱天保的人给康熙上了一道奏折，看完这道奏折，康熙的反应非常强烈，他居然想动刀杀人。

这究竟是一道什么奏折呢？居然让颇有修养的康熙大动肝火。说来，这事还跟太子案有关，朱天保在奏折中说：“二阿哥性本仁孝，虽然因为思想作风的问题被废，但这些过失都是因为小人的唆使，如果将他身边的奸佞都罢免，那么二阿哥潜在的仁德就会彰显出来。”

康熙看完这道奏折，很生气。晚年的康熙神经比较敏感，他立即把朱天保召过来质问。

康熙问道：“你在奏折中说二阿哥仁孝，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朱天保：“我的父亲朱都纳告诉我的。”

康熙说：“你父亲当年了解的，是二阿哥还没有得病，学问和骑射都还过得去的时候。但自从得了病，他头脑不清楚，行为怪诞，丧心病狂。二阿哥曾经在朕的面前骂翰林院学士徐梦元，侮辱徐梦元的父母，不仅如此，他还把徐梦元推入河中，揪上来后继续打。不仅如此，他对自己的亲戚也很粗鲁，常常破口大骂，这些情况你了解吗？你凭什么说他仁孝？”

朱天保语塞，只好说：“奴才不知，冒昧陈奏，请皇上降罪。”

经过追查，康熙得知是朱天保的父亲朱都纳和岳父戴保指使他这么干的，一个月后，康熙告知审判结果：“朱天保为了日后得宠，违规上奏，还出卖了自己的父亲和岳父，可谓是不忠不孝的典型，立即正法。戴保也正法，朱都纳免死，妻子入宫。”

处死朱天保的时候，康熙还让朱天保的父亲前去观刑，从这件事

情中可以看出，康熙后期心理发生了微妙变化，这个一向以仁孝治国的明君似乎也开始变得残暴乖戾。

在康熙一朝，立储之事几经风波，最后以失败告终。

第九章 康熙朝悬案

南山案中康熙重拳出击，目的就是为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民间学人不要妄自修史，朝廷掌握着话语权和最终解释权。

妖人案

众所周知，康熙是按照儒家的理想治国的。康熙一直奉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但是对佛教、道教和天主教也采取了包容的态度。

在康熙一朝，怪力乱神的事情很少见，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个值得一提的案子：妖人案。

这个案子因为语焉不详疑云丛生，又增加了几分神秘，成为清初又一个悬案。

乾隆年间的历史学家蒋良骥在《东华录》中对此事有记载，里面说九卿中很多大臣，包括王鸿绪在内上疏参劾楚人朱方旦，说这个朱方旦自号二眉道人，以修炼为名，行欺世盗名之实。这个道人有很多信徒，经常自吹古人所谓的圣贤者就是得道之人，道在哪里呢？道人说，就在我的两眉之间，所以朱方旦又自称二眉道人。这个道人的信徒把他比作继孔子后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圣人。

在正史中是这样记载的：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初五，康熙在乾清门听政，大臣们捧着文书，向康熙奏道：“根据宗人府提供的材料，前革职将军勒尔锦赋闲在家的时候结交江湖术士朱方旦，并赠送朱方旦‘至人里’和‘圣人堂’的匾额。此外，前湖北巡抚张朝珍也给朱方旦送过‘圣教帝师’的匾额……”

康熙听完后，并无多大的反应，只说：“这件事不用查了，朕早已知道，赠匾之事确实属实。勒尔锦在锦州带兵的时候，朕就知道这事了，而且朕早已嘱咐勒尔锦，朱方旦是个狂妄小人，遇上军机大事万万不要听从他的意见。朕也记得张朝珍曾经对钦差大臣说朱方旦是一个神奇的人，应该跟他见见。张朝珍曾经在衙门里隆重接待过朱方旦，这些事情朕都很清楚……”

一段时间后，审判出来了：勒尔锦拘禁，张朝珍因为病故，无法追究，但革去世职；朱方旦及其亲传弟子俱斩首。

官方的记载就这么多，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朱方旦是楚人，这里盛产巫术和民间迷信。清官张伯行是一个大学问家，他记载朱方旦善于“修养练气”，朱方旦自称懂得奇术，能够预知吉凶。民间传言他的法术非常灵验，很多公卿和百姓都很相信他。

朱方旦的信徒相当多，从湖广到江浙，到处是他“歪理邪说”的足迹。据说他光临一个地方，连封疆大吏都跪地相迎。

如果朱方旦是一个骗子的话，偏偏他的文化水平也相当高，还出了一本《中说补》的书，这其实是一部关于中医和气的书。由此可见，这人多少还是有些水平的，不是纯粹的江湖骗子。

朱方旦神秘的地方还不止于此。他曾经触犯过刑法，当年湖广巡抚董国兴把他押送到京师。刑部讨论后准备问斩，朱方旦已经被送到法场去了，忽然太皇太后的懿旨到了，要求释放朱方旦。

就这样，朱方旦被召到宫中，在迷信神神鬼鬼这些事情上，孝庄跟慈禧有类似的地方。她很宠朱方旦，问他事情，朱方旦居然能够屡屡说中。这样一来，朱方旦红遍紫禁城，王公贵族大都奉他为活神仙。朱方旦实在是太红了，红到他自己都觉得忙不过来，累得受不了。于是，请求康熙让自己回乡修道。康熙也批准了。

回到湖北没多久，三藩叛乱，湖北一带已经乱了。朱方旦投到顺承郡王勒尔锦的门下，勒尔锦对他非常推崇。后来，湖北巡抚张朝珍也听说了朱方旦，了解后，又对朱方旦五体投地。勒尔锦失势后，朱方旦失去了靠山，自谋生路，到江浙一带传道。

这样一个人在那个迷信的年代很容易被妖魔化，民间的传说不断地丰富着朱方旦的形象，丰富过头了，其人的真实面目就逐渐走样。孟森在《朱方旦案》中写道：“历史稍久，则传闻失实，语多怪诞，不可究诘矣。”

在乾嘉时期文人随笔中，朱方旦被描述成任我行那样的人，他羽翼丰满之后，企图带领信徒去龙虎山阴谋篡夺张真人的权，这些笔记还把朱方旦的妻子描述成狐妖。甚至说，朱方旦想攻打龙虎山是受了狐妖的怂恿。最后，张天师用计除掉了这个狐妖，朱方旦从此一路下坡，走向了穷途末路。

这些笔记的记载毫无疑问不是真实的，但确实说明了一个问题，朱方旦在民间的影响力很大，这才是朱方旦被清廷恼恨的真正原因。

清廷究竟给朱方旦治了哪些罪呢？

首先是思想罪，朱方旦传播了异端思想，违背了圣人之道。朱方旦提出了哪些异端的思想呢？首先他提出了思维在脑，这个观念比较现代，可能跟朱方旦的从医经验有关，也有可能朱方旦接触了一些西方传教士传播过来的科学知识。在中国传统思想里，主管人思维的器官是心脏，这对传统的儒家学说是一种冲击，统治者对此很快就感觉到了。

西方传教士南怀仁也曾经提出过人的思维、知识不在心里，而在大脑中。这种学说受到了一些守旧大臣的驳斥，康熙勒令南怀仁烧掉异端书籍。

朱方旦第二个罪名是以下犯上，朱方旦不过是一介平民，却自比圣人，把自己抬到跟皇帝差不多的位置，这分明是对皇帝大不敬。

朱方旦第三个罪名是诬蔑圣贤，朱方旦的弟子公然叫嚣孔子思想已经过时，朱方旦是新时代的圣人。这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绝对是大逆不道的。

朱方旦的第四个罪名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由于朱方旦常年活跃在民间，聚集了众多信徒，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是非常不安定的因素。在统治者眼里，朱方旦的这个组织很容易发展成流寇，明教和白莲教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过，有一个事实必须说明，朱方旦只是影响了社会安定，并没有破坏社会安定，换句话说，朱方旦从来没有组织任何形式的起义。

王鸿绪为了让康熙下定决心拿掉朱方旦，故意将朱方旦跟黄巾军的领袖张角和元末的明教领导人刘福通相提并论，说这个朱方旦心怀鬼胎，现在不除，日后恐怕会酿成巨祸。

然而，让人吃惊的是在清宫的 secret 档案中，我们发现了康熙的另一面：原来康熙也包养民间术士。这下我们就释然了，如果康熙真的对道术非常排斥，朱方旦也不可能发展成那么大的声势。

康熙跟他的父亲不太一样，从正史中，我们很难看到他对佛教、道教特别感兴趣，包括耶稣教。这可能跟康熙所受的教育有关，康熙十二年，他在弘德殿讲经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道教。当时熊赐履就进言说：“自古以来，圣主明君就没有沉溺释道的，即使有这样的皇帝，像秦始皇、梁武帝，最后也是贻笑千古，只要沉溺释道，便会损伤君德啊！希望皇上能够引以为戒。”

康熙对此表示赞同，说道：“这是正确的言论啊，朕一定会牢记在心。”

后来，康熙又对熊赐履说：“朕生来就不喜欢仙佛，所以你让朕远离异端邪说，崇尚正学，朕一听便心领神会，绝无动摇。”

康熙十一年（1672年）二月，康熙陪孝庄前往赤城泡温泉。一天，康熙前去太皇太后行宫问安，回来的时候忽然看见路旁跪着一个道士，康熙很奇怪，便让明珠去询问。道士叩头说：“我是金阁山上灵真观里的道士，恰逢圣主来这附近，希望皇上能够赏赐给我们一面锦旗，并给小观赐个名号。”

如果是一般的皇帝，可能就答应了，不就一个名号吗？但康熙很严肃，他对臣子们说：“这个道士不是个好东西，妄求朕给他赐号，然后愚弄老百姓。”

康熙拒绝了那个道人，随后便下谕：“朕亲政以来，像这种请求给道观寺庙赐号的行为，一概不准。历史上喜好佛教和道教的皇帝，没几个得到好处，反而会受损。梁武帝嗜好佛教，不住在宫里，反而住在寺庙里，结果怎么样呢？竟然饿死在台城。宋徽宗喜好道术，结果呢？父子都成了金人的俘虏。这就是古人的教训啊！真正的道士应该清静无为，修养身心，干嘛要请朕赐号呢？有名无实算什么真道士？像这种贪婪的道士本来应该给他个教训，现在谅他初犯，朕就不跟他计较。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绝不饶恕。”

从这些正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康熙这个人是不信怪力乱神的。让我们还是揭开历史的帷幕，看看康熙另一面吧。

根据清宫档案，康熙甚至让手下秘密招募术士。事情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在康熙晚年，策妄阿拉布坦发兵入藏，康熙派遣部队镇压，结果远征军全军覆没，天下震惊。清廷从此把入藏看成是危险之旅，康熙为了振作士气，让人寻访一些会“法术”的道士在军中。有一个叫李庆安的道士到了前线，施展了一些法术，奇怪的是，还真的挺灵验，连前线的将军也上奏说这个人确实有真本领会法术。

李庆安也是一个非常狂的道士，他曾经对康熙夸下海口：“不用大军，只要给我几百人，让我训练，我亲自率领，就可以剿灭策妄阿拉布坦。”

对于这些东西，康熙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甚至让前线将军严守机密，千万不可泄露。

康熙对李道士非常器重，授予他密奏的特权，还专门给他一个特殊的奏匣，看到这种匣子就知道是李道士的密奏了。

除了行军用术士，在养生这块，康熙也秘密招揽了一些江湖术士，修习气功养生之道。康熙曾经收到一封密折，密折中提到民间有

一个王真人，这个人静养的功夫出神入化。康熙很好奇，让人去请这个人。

密使回报说：“王真人练的是先天贯通三教的套路，没有勉强造作的劳苦，纯粹以自然无为存神顺化为根本，似乎是一个真正的真人。但他说口诀不能轻易传，需要皇上下圣旨，才能传。王真人说，有慧根的人很快就入道，资质中等的需要十来天，资质下等的也只要个把来月。我们细查他的言行，考察他的举止，确信这个人有真功夫。只不过因人资质不同，需要试了才知道。”

康熙批道：“知道了。王真人的真传，朕会留心的，但有些犹豫。朕政务繁多，担心入道之后，误了正事，你们找两个人先试试，看看情况如何。”

后来，两个太监练这个功夫，感觉效果还不错，刚开始时眼前一片空明境界，过了一段时间觉得有大片黑色和黄色的气体在交战，此时腹中有暖气升起，然后纯黄色的暖气竟然源源不断；几个时辰后，身心仿佛进入了晦冥状态，似睡非睡，但又明朗如初，这就是道教中的杳冥境界。

我们不知道康熙有没有练这套功法，但是很显然，康熙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对道佛之事完全不感冒。

“大内密探”江南织造

要想了解这些“大内密探”，我们先讲一个发生在康熙三十七年的故事。

这事发生在苏州，一个身份卑微的家仆孙云带着一帮地痞流氓，闯进苏州一个绅士的家里闹事，后来又在街上众目睽睽之下殴打该绅士。这个绅士叫陆经远，是一个有来头的人。他本人是康熙二十一年的进士，当过知县、御史、国子监丞、通政使等官职，虽然说不上是什么高官，但起码是朝廷的正式官员。而且此人的舅舅是当朝大学士徐元文。

肇事者不过是一个家仆，居然敢打这么有来头的人。这让人好奇，更让人好奇的是案发后，地方政府居然没有立案，而是互相推诿，观望四方。

可见这个家仆的背景也不小。后来，苏州织造出面，羁押了肇事者和地痞，官府才敢立案。

案件一审，才发现那个家仆是苏州织造府内司库的一个家奴，他的主人是李永寿，李永寿是苏州织造大人李煦的亲戚。

家奴最后被治罪，不过李永寿一点事都没有。

李煦给康熙上了一道奏章，说：“李永寿系包衣下人，不思安静谨慎，仰报皇上洪恩，辄混买无赖之徒，平日不能教训，临事不能约束，以致殴官抄抢……”

我们注意到，在李煦的奏章里出现了“包衣”这个词语，其实，这正是地方官府不敢给李永寿治罪的真正原因。

什么是包衣呢？说白了，就是满人的奴隶。

有人更奇怪了，奴隶不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吗？身份不是更低微吗？如果这么想就错了。早期包衣的身份确实很低，他们大多是战争中被俘的人，当然也有少数因为赤贫而自愿为奴的人。奴隶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一天为奴，终身为奴，而且子孙后代世代代为奴——我们同情还来不及，怎么他们会享有那么多特权？这恰好说明了理论和现实是两码事。

在1620年左右，满人将包衣纳入旗下，并设置了军制，包衣直接受皇帝或亲王控制。包衣的后代因此成为皇帝家奴，这就是曹寅和李煦家世的渊源，曾经烜赫一时的荣国府说白了以前不过是家奴。

曹家祖先是在1621年沈阳沦陷时沦为包衣，李家的祖先要晚二十多年，后来这两家都归属于正白旗，成为内务府包衣。

祸福相依。本来做奴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戏剧化的事情出现了，由于这些家奴跟皇室的关系特别近，久而久之，他们的地位比八旗中的自由人还高。他们长年待在皇帝身边，很容易被皇帝视为亲信。皇权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历代皇帝都相信跟自己关系近的人。

包衣一般没有官职，但这不是绝对的，如果他们的后代中表现出过人的能力，升官的机会比那些读书人还多。包衣一旦做官，他们就有了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朝廷的官员，另一个身份是皇帝的间谍和密探。

曹玺的老婆曾经是康熙的乳母，康熙是个很注重孝道的人，对曹玺一家十分照顾。曹玺去世时，康熙亲自登门慰问，康熙几次南巡都在曹家落脚，俨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李家比曹家地位更高，李煦的母亲曾经是康熙的保姆，李煦的表妹入宫做了康熙的嫔。

在康熙朝，曹李两家享尽荣华富贵，这固然跟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密切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担负起了一项重要的职能，为皇帝搜

集情报。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急匆匆地给康熙发了一道奏折，奏折中说他的家仆王可成不幸在路上将奏折遗失，希望皇帝恕罪。康熙朱批：“你所奏的是密折，跟地方官不是同一类型。朕赦免你和你的家人。这种事别让外人知道。”

由此披露出了康熙朝重要的制度——密折制度，康熙没有建立起像明朝锦衣卫、东厂那样的特务组织，但皇帝又不能缺乏一个情报组织，密折制度应需而生。

康熙对密折制度做出了一些规定，为防止这种制度蜕变成特务组织，他规定密折内容仅限于雨雪粮价、吏治、盗贼、社会流言。

密折中最重要的还是地方上的状况，由于这些案件往往跟地方官的利益有瓜葛，地方官往往不会如实奏报。这种情况下，康熙就需要自己的亲信给自己传来第一手的信息。

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江南科场案，曹寅先后给康熙发了六道密折，而李煦送上去的奏折更多，有十四份。没有这些奏折，康熙很难了解地方上的真实情况。密折制度对康熙朝的治国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密折制度虽然保密，但久而久之也会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这样一来，六品织造的权力比封疆大吏还大。地方大员自然会向织造们靠拢，这样一来，特权看上去风光，却隐藏着致命的危险。织造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写密折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的。比如，有一次李煦给康熙写了一份请安的折子，顺带报告了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消息。康熙大怒，朱批道：“请安的折子不该与这种事混在一起写，甚为不敬。你以为你认识几个臭字，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君心难测，曹李两家都有这种感觉，而且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做的是一件得罪人的事。皇帝有时候会怪罪自己，地方官员呢肯定会对自已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难免也会中伤自己。由于密折制度涉及官场利害，很难独善其身，所以在雍正朝的时候，曹李两家都被抄了。

江南有三个织造，名义上的工作是负责皇家的纺织工厂，并将这些丝绸运往北京。织造们品级很低，俸禄也很一般，但是个个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可见这是一个肥差事，织造们相当于皇帝钦定的包工头。

就拿曹寅来说， he 有三个工厂，六百六十四张织布机，两千五百名专业工人，至于学徒和仆役就更多。曹寅的俸禄是年薪一百零五两白银，年终红利一百零八两。如果要贪污朝廷的拨款也很难，朝廷拨

给的经费也不高。光靠朝廷的拨款是不可能维持这么大的开支的，所以这些织造们个个都发挥资本家的天赋，他们想办法让钱生钱。

曹寅生财之道是向康熙借钱，然后收购铜矿，赚了不少钱。八年后，曹寅还想继续，康熙叫停了他。后来，他又投资盐业，赚的钱更多。曹寅后来担任巡盐御史，利用职务谋求了巨大的私利，并由此导致了亏空，虽然因此被起诉，但是在康熙朝曹李两家始终高枕无忧。

在发家致富这块，最美的差事莫过于接待南巡的皇帝。不仅皇帝赏赐，地方官员也纷纷贿赂。

曹李两家经营几十年，积累了万贯家私，但是破产只在一夜间。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在畅春园驾崩，这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另一些则是灾难的征兆。在雍正元年的时候，李家首先被控贪污公款。

雍正这个人跟他父亲不一样，凡事他父亲生前喜欢的人他都讨厌，凡事他父亲生前讨厌的人他都给予重用。雍正刚上台不久，就撤了李煦的职位，此时，李煦已是风烛残年。

新上任的苏州织造胡凤翥到任不久就查出李煦亏空的问题，并上奏给新皇帝雍正。雍正立刻派两江总督查弼纳调查此事，查弼纳办事很有效率，很快就把李煦在京城和苏州的两处家产全部抄查。更惨的是，李煦的家人和仆人也全变成奴仆，拉到街上去拍卖。雍正对年羹尧特别好，让年羹尧自己去挑选。

曹家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灾难降临的时候比李家晚了六年。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塞楞额给雍正参了曹家一本，说是江宁织造的杂役路过山东时，骚扰勒索驿站。雍正是个对腐败非常痛恨的皇帝，让人立即查清这件事。

查出来的结果反倒跟骚扰勒索没有多大关系，结果发现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作风不正，亏空很多。第二年年年初，曹家就被抄。雍正将曹家的人给大将兼好友隋赫德为奴，后来隋赫德看到曹寅的遗孀艰难度日，无法养活自己，便将崇文门外菜市口的十七间房拨给他们。曹家就这么衰落了，曹家如果不衰落，曹雪芹也没办法写出《红楼梦》。

曾经名噪一时的“大内密探”就这样走向了不归路。

我们发现导致曹李两家破产的罪名都是亏空，至少名义上是这样，说明亏空是实有其事。

曹李两家都很善于经营，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亏空呢？

这跟曹李两家承担康熙南巡的费用有关，当然，曹李两家花钱也是非常大方的。康熙在生前就警告过曹李两家：“以后各方打点的费用就免了，奉承上司的费用也取消，好好补足盐差的亏空吧！如果不听朕的金玉良言，以后你们会后悔莫及的，你们要为子孙后代的身家性命考虑啊！”

可见，亏空问题在康熙朝大家就心知肚明，康熙出于情感上的原因，一再给曹李两家机会，让他们补上亏空。康熙还曾帮曹寅还上了三十二万两的债务，但是到了雍正期间事情就没这么好办了。

不过，经济原因只是曹李两家败亡的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政治上的。

李煦曾陷入“党争案”中，有人控告他曾经给八阿哥赠送漂亮的奴婢，八阿哥当时的人气很高，李煦在他身上投资也是正常的。但对于明察秋毫的雍正，这事肯定是不愉快的。

雍正继位后，对昔日的政敌进行了大清洗。雍正曾经指责曹頔到处跑关系，跟一些王子们关系过于亲近。雍正还警告他，如果他违法乱纪，就是王子们也救不了他。

从雍正的谕旨中我们可以看到，曹家被抄也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原因，再加上曹寅生前是支持太子胤礽的。九阿哥胤禩是雍正的政敌，最后被雍正迫害致死。胤禩跟曹家是有来往的，在康熙时代胤禩曾经参与制造江宁织造的镀金石狮子，这是曹家和胤禩交往的直接证据。

由此可见，曹李两家还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南山案

大清一朝，发生过一百七十多次文字狱，南山案是清朝最大的文字狱，也是唯一一个被后代皇帝平反的文字狱。为南山案平反的正是雍正皇帝，至今人们摸不透雍正平反的真正原因，但这事似乎在验证这样一个推断：凡是康熙喜欢的雍正都厌恶，凡是康熙厌恶的雍正都接纳。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十二日，左都御史赵申乔突然参劾翰林院大才子戴名世，说这个人恃才傲物，妄窃文名，还是贡生的时候，就私自刻印文集，里面文辞狂逆，信口雌黄，颠倒是非；现在当上了朝廷命官，仍然作风不改，依旧口无遮拦，轻狂不羁，希望皇帝能够给他一点惩罚和警告。

从赵申乔的动机看，他似乎跟戴名世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并没有想要置人于死地，只不过是希望皇帝能够教训教训这个狂生，打压一下他的气焰。

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对这个案子并不重视，此时他忙于废立太子之事，焦头烂额。但是刑部接到这个案子后很较真，此案很快就升级了，戴名世以前的恃才傲物和狂放不羁很快就变成大逆不道的罪名。

这还得从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说起，这本书讲到了南明的一些情况，用了弘光、隆武、永历之类的年号。就戴名世本意来说，他是想如实完整地记录当时的历史，但恰好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大忌。

从审判的阵容就可以看出清廷对此案的敏感程度，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共同审理了这个案子，对戴名世进行严刑拷打。

戴名世不得不认错说：“《南山集》《子遗录》等等都是我年轻时写的狂乱文章，当时糊涂，不知触犯了大忌。没有和任何人商议，也没有让任何人整编这本书。我当时参考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看到此书有混乱悖逆之语，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就照搬里面的话。”

戴名世的供词迁出了方孝标，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在供词中说，父亲方孝标喜欢游山玩水，以前到过云南贵州一带，返乡后写了《滇黔纪闻》，其中记载了弘光、隆武、永历的年号。方登峰是个不孝子，他还供出父亲曾当过吴三桂的幕僚，虽然时间很短，但毫无疑问已是大逆。

最后，刑部议定：戴名世凌迟处死，祖父子孙兄弟以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贯，只要十六岁以上，不管残疾健康，一律斩首；十五岁以下的男子，以及母妇妻妾姊妹等等，全部发配给功臣家做奴隶，财产入官。方孝标依律当被凌迟处死，不过人已去世，应当挫骨扬灰。为方孝标作序的汪灏和桐城派的领袖方苞被判绞刑，后来改为免死，发配东北。这场文字狱中问罪人数多达数百人。

让我们了解一下案情的整个发展过程。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年出生，曾经隐居南山，时人称之为南山先生。他的家世虽然称不上显赫，也是书香之家，祖父和父亲都做过知县。戴名世跟桐城派领袖方苞是亲戚，他的母亲是方苞的姑母。戴名世这个人从小就很有才气，因为才华甚高，为人难免有些恃才傲物。同时，他这个人又比较愤世嫉俗，由于小时候受的教育影响，年轻时他对清廷很不满，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他对反清的民族

英雄进行了热烈的歌颂。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了生活，戴名世逐渐对清廷妥协。三十岁的时候，戴名世与好友参加科考，成为贡生，三十四岁时，他又被推荐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由于戴名世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

在京城的时候，他给同乡张英的儿子当家庭教师，张英当时担任都察院左都副御史。有一次，张英问戴名世：“世间最可恶的是哪种人？”戴名世回答说：“媚人者最为可恶。”

张英笑道：“不然，媚人者因好媚者而媚之，所以好媚者最为可恶。”

张英虽然不是个才子，但是思想言谈显然比戴名世更深刻，戴名世固然有才，却难脱书呆子气。

戴名世后来在京城参加乡试，可惜落榜了。在京城的日子，戴名世很不得志，他愤世嫉俗，自视清高，但没人买他的账。

最后，戴名世不得不四处游历，在这个过程中，他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而且还编纂了一些重要的图书，譬如《小学论选》《四书朱子大全》等等。

晚年，戴名世仿佛看透了世界（现实是无法逃避的东西），再次回到科举路上，这次他中了举人。但是第二年的会试却名落孙山。

五十七岁的时候，戴名世时来运转，中了会元，接着在殿试中又中了榜眼，康熙钦点他为翰林院编修。当官之后，戴名世并没有意气风发，反而消沉低落。李光地曾说他“颓唐无精神”。至于那个给戴名世带来灭顶之灾的《南山集》，是他的门生龙云鄂把他的文章收录整理而成。

赵申乔在康熙五十年参劾戴名世，但是最后的终审是在康熙五十二年，前后持续一年半的时间。康熙一开始对南山案是慎重的，他说道：“戴名世等是个大案子，朕要仔细考虑。”

此案拖了很长时间，中途似乎有很多转机，因为案犯都是朝廷命官，所以在狱中受的待遇不算差，他们住在比较好的房子里，可以和外面书信往来。李光地曾经为他们说情，可惜没有多大的效果，反而惹怒了康熙。由于朝廷中有许多人求情和营救，案犯们并没有感觉到临头，像重要嫌犯刘岩和方苞中途还出狱做官。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初六，康熙下旨：“戴名世从宽免凌迟，立即处斩，方登峰兄弟等人从宽免死，发配黑龙江。案件牵连

的家属本应处死的全部流放……”

戴名世在狱中非常后悔，因为写文章时不小心用了几个词语就招致杀身之祸，确实很冤。但在狱中有段时间，他又抱着希望，认为自己可以获救，他在诗中写道：“长系年余身尚在，尧仁千古仰宽容。”

当然，戴名世最后还是难逃一死，不过康熙还是给予了一些仁慈，他的儿子没有被追究，也没有被发配，而是回到原籍。戴名世被斩首后，允许其友人收拾他的尸骨，葬在南山。

在这个案子中还出现了一个误判，这是关于方氏家族的。

赵申乔参劾戴名世根本没想到会连累到方孝标。康熙认为方孝标参与了吴三桂谋反，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方孝标确实曾在云南游历，当时正逢吴三桂造反，不过方孝标并没有成为吴三桂幕僚，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短暂的接触。方孝标很可能建议吴三桂立崇祯后裔，吴三桂拒绝后，方孝标就离开了。

康熙说方孝标当过吴三桂的大吏，显然是弄错了。康熙说的人是方光琛的儿子方学诗，吴三桂失败后，方光琛家人大多被杀，只有方学诗逃出在外。方学诗跟方学士是重音，大臣都叫方孝标为方学士，康熙听着就以为是方学诗。

在这个案子中，方家唯一得到赦免的是方苞，作为桐城派的领袖，他的才华是不必说的。李光地屡次在康熙面前为方苞说话，当时康熙正缺一个古文高手，在朝廷中，方苞的水平数一数二。为了朝廷的利益，康熙不仅释放了此人，还提拔重用他。这是才华带来的特权。

南山案中康熙重拳出击，目的就是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民间学人不要妄自修史，朝廷掌握着话语权和最终解释权。

这个案子并没有到此结束，最让人意外的是雍正刚继位不久就为这个案子平反，赦免了涉案人员。前后只有十年的时间，案子就得到了平反，这是让人欣慰的。雍正曾经对方苞说：“你们是被人陷害，朕了解到情况，当然要宽恕你们。”乾隆年间，为了改修《明史》，乾隆公开下旨说，可以用南明皇帝的年号。乾隆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因为你要记述明朝的历史，要做到客观完整，用明朝的年号是很正常的，并无任何大逆不道的地方。

朱三太子案

说到朱三太子，让我们还是回到明朝亡国崇祯自杀的那天。

闻知李自成大军进城，崇祯知道国破家亡的时刻到了，为了防止家人受辱，他让妃嫔和女儿们自杀，其中有一个女儿怕死，崇祯亲自用刀去砍她，砍断了她手臂，但她还是跑了。但是崇祯对三个儿子却不是这样的。崇祯一共有七个儿子，其中二子、六子、七子都早殇。

三个儿子分别是太子朱慈烺、三子朱慈炯、四子朱慈照。城破之时，崇祯叫来三个儿子，对他们说：“贼军已经攻进来了，你们现在是皇子，以后就是平民百姓了，各自逃命吧！如果你们活下去，不要忘了社稷父母大仇。”

说完，崇祯就赶他们出宫。这三个皇子出逃后，除了太子被李自成捉住后，其他人都不知所踪，就连太子后来也神秘失踪。这三个皇子就像阴魂一直缠绕在清朝统治者的心头。

在多尔袞执政时期，曾经出现过南北太子案。没想到在康熙朝的时候，居然出现了个朱三太子。

这个朱三太子可能是指定王朱慈炯，但是时隔这么久，没有人能证实朱三太子的身份。朝廷曾经多次捉住了“朱三太子”，但也无法辨出真假。

吴三桂起兵造反后，在京城突然出现了朱三太子，这事实上只是一个旗号，这些人聚集在周公直的家中商讨起义事宜。头领是一个叫杨起隆的人，这个人的底细我们不清楚，可能是类似于陈胜吴广那样的人。杨起隆这个人还是比较有胆略的，他利用白莲教为掩护，积极发展起义队伍。

他自称是朱三太子，甚至连年号都提出来了——广德，起义者头裹白巾，腰缠红带，他们约好时间，决定在京城内放火起事。

不过，杨起隆起义的秘密当晚就被人泄露出去。由于官府当夜抓人，情急之下，杨起隆决定立刻起义。起义者拿出刀剑和藤甲，举着火把，开始上街。清军看到了，立即向兵部尚书明珠报告。都统图海率军包围了周府。杨起隆带领义军杀出重围，杀出一条血路后杨起隆身边只剩下六骑，他的妻子马氏被捉住。

皇帝眼皮底下发生这种事情，可想而知康熙的愤怒。为了抓住这个所谓的朱三太子，康熙下令关闭京城九门，进行血腥抓捕。两百多名起义者先后被杀，有人密告杨起隆还没有逃远，还躲在京城。杨起隆这人仿佛有通天之术，康熙始终没有抓到他。时间久了，康熙认为杨起隆已经逃出京城，便下令全国通缉。就在这时，杨起隆又悄悄地回京，贯彻那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箴言。康熙二十二

年，杨起隆出现在金玉相的家中。然而，杨起隆非常警惕，他意识到有人告密后，立刻逃离了。官府来了以后，又扑了一场空。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杨起隆的消息，他好像人间蒸发了。

整个三藩动乱期间，朱三太子层出不穷，在陕西一带也捉住了一个朱三太子。这个人自称是杨起隆，原名朱次门。刑部官员把他押到大堂上，让杨起隆的妻子和同伙们辨认，没人认识这个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不但不是朱三太子，也不是杨起隆，不过是一个八旗逃人，曾经加入杨起隆的队伍，托名造反。

康熙十六年，福建也出现了一个朱三太子，纠集一些海上兵力，个个裹着白头巾，和郑经的军队一起打清兵。康熙十八年，安亲王岳乐在湖南也抓住了一个朱三太子。这个人自称朱慈炯，最后也被认定是冒牌货。

看来乱世之中，许多平民百姓都想过一下太子瘾。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中，康熙来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祭奠，虽然打败了朱元璋的子孙，但康熙对这个铁血帝王还是尊敬的。看到陵墓倾颓，康熙让曹寅等人修葺了孝陵，此行中，康熙感慨道：“朕想找到明朝后裔，授予他们职衔，让他们世代守护着祖宗陵墓。”

没人知道康熙这话是不是发自真心，很多人怀疑他是引诱明朝后裔上钩，明朝后裔没有任何反应，没人会冒着生命危险来找康熙要一顶乌纱帽。

就在康熙放弃希望的时候，苏州的李煦给了他一个密折，在浙江发现了一群人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作乱。康熙让官府行动，抓住了抗清志士张念一，在审问张念一的过程中发现了朱三太子的下落，看来这个张念一终究不是夏明翰，抗清归抗清，志士还称不上。最终，在山东汶上县捉住了朱三太子。

这个朱三太子似乎是真的，根据他自己的交代，他叫朱慈焕，是明朝后裔，崇祯的第五个儿子，曾经落入李自成手中，后来飘零到南方，在老家凤阳投靠了一个姓王的乡绅，然后跟着他姓王。随后，他又出家为僧，以王士元的身份进入浙江余姚县胡家。介绍了自己的出身，朱三太子反复强调说自己从来都没有跟清廷作对的意思。

朱三太子还说了自己的苦衷，自己一方面要躲避清军的搜捕，另一方面还得躲避那些心怀叵测之人，所谓心怀叵测之人是想借着朱三太子的名号造反的人。

朱慈焕曾经被几拨人拥戴过，但是他很害怕也很为难，所以，他后来就开始东躲西藏，尽量不让这些人找到。由于长期流亡，官府追逼，他的妻妾、女儿和大儿媳都上吊自杀，三个儿子和孙子也进了监狱。他独自逃跑后，化名张用观，到山东汶上县教书。

在这事上，康熙非常狠，让朱慈焕祖孙三代七人进京，然后传明末老太监来辨认，老太监认不出来，康熙认定他为假冒，下令凌迟处死，子孙斩首。

这个人是不是假冒没人知道，但他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年纪已经七十五，一再表示要谢清朝三大恩：灭掉流寇，报了父仇；对于我朝子孙，从不杀害；皇帝还赏脸祭奠了太祖陵。可惜，康熙并没有手下留情。

这个朱三太子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真是假，对于清廷似乎并不重要。就像刑部官员说的：“朱某虽然没有谋反之事，但未尝没有谋反之心，应该处决，以息混乱。”刑部官员的话说出了统治者的心里话。

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出现了朱三太子起义，起义者是台湾的朱一贵，他自称明朝后裔，儿子叫朱三太子。其实，这时候朱三太子早已不是指某个人了，而变成了一种符号，象征老百姓对故明的思念。

直到雍正的时候，还有人自称明朝后裔，准备起义。对此，雍正不无感慨地说：“以前改朝换代，前朝的宗姓大多臣服于后朝，即便不臣服，也会退隐山林，隐姓埋名，从来没有像本朝这样，有这么多刁民诈称宗室后代，蛊惑人心借机起事。”

在雍正期间也爆发了好几起朱三太子案，雍正之后，朱三太子才销声匿迹。

第十章 康熙之死与雍正继位

自从康熙死后，雍正一生不住畅春园，死后也不葬在清东陵，好像有意躲避自己的父亲。畅春园是康熙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这么好的地方雍正却不要，反而另外拨款修建圆明园，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另外，康熙平生最喜欢去热河避暑山庄，雍正当皇帝后一次都没去过。更让人诧异的是，雍正为自己选定的陵墓远远避开清东陵，选择了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后人称之为清西陵。这确实让人费解，如果雍正不是十分厌恶自己的父亲，那就是有意要回避什么？

韬晦大师

胤禛的兄弟们个个不是等闲之辈，但是像胤禛这样城府极深胸怀韬晦的确实很少。在他的兄弟们为储位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雍正却冷眼旁观，不动声色。

在漫长的储位争夺战中，雍正从来没有强出头，所以大家都不提防这个人，都没把目光聚焦在这个人身上。

太子二度被废之后，储位争夺更加激烈，胤禛也感到焦虑，这时候他的举动有点不可思议。他完全抛开争权夺利那些烦心事，而是选择礼佛参禅。胤禛这么做是因为他深深地感觉到，争储弄不好会闹出人命来的，还是明哲保身比较好。

这段时间里，胤禛经常朗诵唐伯虎的《一世歌》：

人生七十古来稀，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和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需满把金樽倒。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也许这首诗的意境跟胤禛这期间的心态很契合，这是一种淡定又超然的心态，在胤禛身上不乏城府，城府加上超然最终让胤禛笑到了最后。

胤禛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想当皇帝的，即使在太子第一次被废后，他也没那想法。基于这种心态，在太子争夺战中，他始终抱着局外人

的态度，没有非分之想。太子第二次被废后，胤禛的思想发生了动摇。要知道胤禛是四皇子，上面除了太子，就两个哥哥，大哥很快就被关进牢里，比自己年长的只剩下三阿哥了。

胤禛本人能力也不差，如果说没想过太子之位是不太可能的，但大哥的悲惨遭遇让他明白，觊觎太子之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胤禛的心腹戴铎曾给他写了一封信：

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亦可以报知遇于万一也。谨据奴才之见，为我主子陈之：

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

戴铎极力怂恿胤禛加入争储行列，认为这是关系荣辱的最重要关头，康熙虽然是个圣明的皇帝，但是心中对太子人选始终没有定夺。诸王钩心斗角，有不并立之心，也就是说如果其他人当上了太子，小心将来受损啊！接着，戴铎夸赞胤禛德才兼备，深得人心，是大清优秀的CEO。总之，一句话，一定要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了帮助胤禛夺储成功，戴铎给他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建议：第一，搞好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第二，搞好跟朝廷官员的关系；第三，培养人马，收拢人心，壮大自己的实力。

戴铎对胤禛真是忠心耿耿，他还说道：“庸众的父子关系好处，但是英明的父亲难相处啊！兄弟少，手足之情好处，兄弟多了，关系不好处！为啥呢？跟英明的父亲相处，如果你不展现自己的优点，恐怕会被他嫌弃，如果过于展现自己的长处，又会让他心里不舒服，猜忌你。兄弟多了，各有各的爱好，各有各的想法，彼此之间争强好胜，互相攀比，也不好相处。”

怎么处理好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呢？戴铎给出了四字箴言：孝、诚、和、忍。只有这样才能左右逢源，各方不得罪。

胤禛是怎么回复的呢？我们不妨摘录下来：

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汝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从胤禛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城府之深。他首先肯定戴铎的话是为自己好，说的话也是金玉良言，但是却对自己毫无用处，因为自己

根本没有争储之心，如果有争储之心的话，早就不是这么样了。胤禩还说继承皇位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躲都来不及，又怎么会去争呢？至于君臣的利害关系，个人的荣辱跟这个毫无关系，无祸无福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气。从胤禩后面的两个“慎之”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不想，而是这种事得非常谨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行了。

自此以后，胤禩就开始秘密结党营私，一方面处心积虑网络人才，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被康熙发觉，竭力给人中正的感觉。

事实上，自从激发了对皇位的兴趣，胤禩的野心越来越大了，但他从不表露出来。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戴铎被派往福建担任知府，戴铎相当于胤禩的私人密探，他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用密信的方式告诉胤禩。

其中，有一次戴铎告诉胤禩，他在武夷山看到一个奇异的道人，戴铎想为主子祈福问卦，道人测了一个万字，万是福气多多的意思，跟胤禩的名字以真祈福正好应合。胤禩听了非常愉悦，认为自己离皇位又进了一步。

康熙六十年（1721年），戴铎从知府升到道员，后来因为生病想回京，他首先请示胤禩。胤禩给他回信说，你不要这么没出息，你要一直待下去，做到总督和巡抚，相信我。

康熙晚年曾经召抱病在老家的李光地回京商量建储大事，康熙问李光地谁比较适合，李光地诚恳地说：“众皇子之中，八王最为贤明。”戴铎立刻反唇相讥：“八王性格懦弱，比不上四爷德才兼备，恩威并济。”

胤禩虽然对康熙服侍得挺周到，但康熙好像始终跟他隔着一道墙一样，很长时间他都没有把这个儿子跟太子之位联系在一起。胤禩曾经为废太子说话，还让人拿下废太子身上的锁链，给康熙留下了仁慈的印象。康熙病重的时候，胤禩亲自端药送水，比其他阿哥表现得要真诚殷勤。

后来康熙封他为亲王的时候，他还表示想降低自己的爵位，以便和其他阿哥们平等。这种行为虽然作秀，但很容易引起其他地位较低的阿哥们的好感，也容易让康熙赏识。

胤禩在处理兄弟关系上也很有有一套，他很清楚众阿哥们私下里斗得死去活来，甚至到了以命相搏的地步。但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依旧跟所有阿哥正常往来。

在当时的众阿哥当中，会玩关系、会察言观色这方面只有八阿哥胤禩跟胤禩有得一比，但是胤禩的城府和韬晦不及胤禩。

胤禛能够登上帝位也不是偶然的。

权谋之路

内外妥帖之后，胤禛开始紧锣密鼓地拉拢人才，在胤禛的集团里有戴铎，武有年羹尧。此外，还有湖广提督魏经国、副都统常賚、商州知州沈廷正、武会元金昆等等。

尽管阵容已经很庞大了，胤禛还想拉拢更多的人。大学士马尔哈齐给胤禛介绍礼部侍郎蔡珽，胤禛召他来见。蔡珽以大学士不便去王府为借口拒绝。后来，胤禛又让年羹尧亲自去请，蔡珽还是不来。后来，蔡珽在热河行宫陪康熙，刚巧胤禛也在。胤禛再次让年羹尧的儿子年熙去请他，蔡珽这次再也不好意思拒绝了。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胤禛为了拉拢人才，不惜大费周章，可见其志不小。形成了自己的小集团后，胤禛要求门人对自己保持绝对的忠诚和服从。对于管理属下，胤禛也很有一套。

年羹尧是他面前的红人，官也做得顺风顺水，有段时间忽然不那么恭敬了，在给他的信中没有自称奴才，而是自称官职。胤禛很生气，他听说三阿哥和十四阿哥也在拉拢年羹尧，便大骂年羹尧是恶少，甚至抓住年羹尧给自己信中写的话，其中有：“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之不负王爷也。”胤禛吓唬年羹尧，光凭“异日”这两个字，我就可以告得你抄家灭门。胤禛当然不会把这些信抖搂出来，如果抖搂出来，自己也会跟着年羹尧一起遭殃。

对于亲信戴铎，胤禛的脾气也不是很好，经常责骂他，怕他变心，恩威并施，控制艺术把握得炉火纯青。

在权谋之路上，胤禛不停地笼络着各种各样的人才，隆科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隆科多是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是国舅佟国维的儿子，以前隶属于八阿哥党，其实，隆科多跟胤禛的关系更密切，因为胤禛的养母是佟佳氏（佟国维之女孝懿仁皇后），从这点可以看出，八阿哥真是个人物，如果不是康熙刻意打压，继承皇位的是他无疑。

后来，八阿哥胤禩彻底没戏了，隆科多加入胤禛的阵营，胤禛的皇位之路越来越宽了。

胤禛还有一个铁杆支持者，十三阿哥胤祥，胤祥自己是没有希望的，他把宝全部压在四哥身上，成为胤禛小集团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物。

到了康熙暮年的时候，在众多阿哥中，胤禛的势力已是最庞大的，门下掌握军政大权的人遍布四方，朝中也大有人在。其他阿哥的势力明显不如他，三阿哥虽然跟康熙关系比较近，但是势力太小，八阿哥以前是竞争对手，随着这些年来康熙的打压，已经成不了多大的气候。还有一个十四阿哥，据说康熙非常宠爱他，但十四阿哥在外面带兵，有一定的兵权，却对政治不是十分熟悉，党羽也不是很多。

经过多年的经营，四阿哥胤禛已经是独占鳌头了。

胤禛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人，但他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终于博得康熙的好感和信赖。在晚年，康熙与胤禛的交往日渐频繁，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很放心地交给这个儿子。胤禛也确实有办事能力，做事果断，手腕灵活。就拿佟国纲的儿子鄂伦岱和胤禛结党一事来说，康熙就很不满，常常抱怨说鄂伦岱以皇亲国戚自居，不尊重长辈，甚至在皇帝面前都敢顶撞。当时胤禛就骂道：“这种乱臣贼子，如果交给儿臣，儿臣一定会立即诛杀。”

康熙是个重亲情和孝道的人，他没拿鄂伦岱怎么样。但是雍正当皇帝后，没有饶了鄂伦岱，他揪住鄂伦岱在乾清宫里面随地大小便的事情小题大做，说鄂伦岱对皇家不尊重，即行处死。

胤禛在办事这块比康熙更较真，更具责任心。

二废太子后，康熙让胤禛审问太子党的重要人物，步军统领托合齐。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顺治的淑惠妃去世，康熙发现办理丧事的人很不负责，做事潦草，便让胤禛去查办此事。胤禛接到任务后，立即对工部和光禄寺进行彻查，对一些办事不力贪污受贿的官员进行了惩办。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策妄阿拉布坦又犯上作乱，康熙询问胤祉和胤禛要不要出兵，胤禛主张出兵，时人认为他是想获得军权，自己担任抚远大将军。也许康熙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让十四阿哥胤禛带兵，胤禛跟胤祉是亲兄弟。但因为这事，他们兄弟心里埋下了怨恨。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明朝十三陵被盗，康熙让胤祉和胤禛去调查，并祭拜。同年，孝惠皇太后去世，康熙病重，丧事交给胤祉和胤禛两人处理。

康熙六十年（1721年），举行六十年登基大典庆祝，胤禛被派到盛京祭拜祖陵。这么大的事，康熙本想亲自去，但由于身体不好，就委托胤禛去做。胤禛回来后，又祭奠太庙。冬至的时候，胤禛又代表

康熙祭天。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康熙是把胤禛当成继承人来培养的。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距离康熙驾崩还有一个月，通仓和京仓亏空的事情泄露，康熙派遣胤祉和胤禛去调查。通过这次实际的调查，胤禛掌握了国家经济内部的第一手资料，他看到貌似繁荣的康熙王朝内部千疮百孔，外面金光闪闪，里面却腐朽不堪。什么GDP啊，仓库盈余啊，都只不过是数字游戏，并不是国家的真正财富。当时，胤禛意识到，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国家会继续亏空下去。胤禛上台后，立即着手清查亏欠，追查那些烂账。

通往帝王之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只要走得踏实，哪怕一开始并不是皇帝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最终也会凭借实力得到各方的青睐和支持。

康熙之死，雍正继位

晚年，康熙颁布了一道谕旨，回顾自己的一生。

康熙说：“我年轻的时候，身体相当好，极少生病。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我已经快七十了，在位近六十年。从黄帝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四千多年了，这期间，至少有三百多个皇帝，在这些皇帝中，我可能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后来，康熙的孙子乾隆本来可以在位时间超过康熙，考虑到康熙的谕旨，做到六十年时他禅位于嘉庆，这也是孝道的一种体现）……”

康熙继续说：“古代有很多帝王短命而死，后来的史学家和文人总是喜欢讽刺这些人，说这些人纵欲无度，所以早死。就连一些英明的皇帝，他们也要鸡蛋挑骨头，把人家说得一无是处。这些人真是不了解情况，其实很多帝王之所以早死是因为国事繁重，他们多数人是累死的……这世上没有几个人能长命百岁，很多帝王都很忌讳死字，搞到最后，连个遗诏都没机会写。对此，我丝毫不忌讳，人总是要死的，江山注定要移交给下一代，这些我都知道……我在位这么长时间，享有天下最尊贵的地位，是天下最富贵的人，对君位弃若敝屣，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经过我多年的经营，天下能够太平无事……”

康熙晚年深受病痛折磨，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公开继承人是誰。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康熙反而更加渴望过一种有生机的生活，越是晚年，他越是喜欢打猎。虽然他无法拉弓，无法策马奔腾，但他会

欣赏别人打猎，呼吸沙漠草原上的粗犷之气，感受生命的原始滋味。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天气特别寒冷，冬天已经早早降临了紫禁城。在皇宫之中，康熙情绪烦躁，来回走动，像个不安分的顽童。康熙感到一种难言的孤独和寂寞，是的，没人能化解的寂寞。他忽然决定出去，透透气，散散心。

康熙决定去南苑打猎，走到城外，看到一望无际的平原，康熙心里顿感舒畅很多。但是，走着走着，康熙忽然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好像这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不欢迎自己一样，康熙有一种晕眩的感觉，接着就不省人事了。

十一月初七，康熙的身体稍微好转，回到畅春园休息。到了十三日，病情再次加重。从康熙发病到驾崩才一周的时间，人们或许会想，康熙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康熙是在行猎的途中染病的，当时正值冬天，寒风萧萧，冰雪飘零。康熙本就是一个老年人，还是个身体不好的老年人，偏要喜欢强撑着，表示“老当益壮”，在路上着了凉，染上了风寒。说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也就是感冒而已，但对于一个暮年人来说，病来如山倒，小病也可以夺人性命。

病中，康熙并不认为自己这次会有生命危险，他跟一般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感冒是小病，想当年自己金戈铁马，难道这点感冒还能要了自己的命？

因为康熙的病情加重，便让胤禩代他举行祭天大礼。这些日子胤禩跟他走得特别近，胤禩很重视这次祭天大礼，所以每天都斋戒，对父亲也很关心，一天要去问安几次。每次康熙都说：“朕身体好了点儿。”

也许正因为康熙最后的日子，胤禩陪伴在父亲身边，所以外人才怀疑他篡位。从康熙后来交给他一些重大的任务来看，雍正应该不是夺嫡篡位。只不过康熙生前没有立储，临终留下口谕难以服众，尤其是其他的一些阿哥，心里更是不服，所以雍正夺嫡这个流言才流传开来。

十三日凌晨两点，康熙病情突然加重，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立即让人召胤禩进宫。胤禩当时可能在城外办事，其他的阿哥们都到齐了，他还没来。上午九点多胤禩才赶到畅春园，这天康熙召见了胤禩三次，两人肯定是谈了一些话，但历史没有记载，我们也无法知道。

当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康熙就轰然驾崩，离开了这个他无比眷恋的人间，只可惜他真的无法再活五百年。

我们一定很好奇，胤禛又是怎么样当上皇帝的呢？

有这么一个说法，胤禛在到达畅春园之前，康熙已经召集了众阿哥和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到床前，对他们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这个记载出现在雍正编纂的《大义觉迷录》中，其他的书都是参照雍正的这个版本，由于是自说自话，难免会让人怀疑其真实性。

但是根据胤禛的记载，他是从隆科多口中得知这个消息的，这就让人迷糊了。因为胤禛来了之后，还跟康熙密谈过很多次，没有理由这么重大的消息是从隆科多口中得知，像这么重大的事情，康熙当然会当面告诉胤禛，开诚布公让大家都知道。

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康熙生前并没有指定任何继承人，但是留下了遗诏，遗诏指定的继承人是胤禛。作为一个垂死的老人，是不希望看到在自己弥留之际儿子们还愤愤不平为皇位吵得死去活来的，那么谁还有心思理会将死的父亲呢？所以，秘密建储制度的真正发明权应该归康熙，雍正只不过是把父亲的产品改进升级了一下。

如果是这样，雍正为什么又要捏造事实说在自己没来之前父亲就当众宣布自己为继承人呢？其实，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表明自己是正统的合法的，没有任何弄虚作假。在雍正期间，质疑他篡位的言论相当多，他编出这段情节也可以理解。

雍正继位后，和大臣们商议康熙的庙号，最后确定为圣祖，圣是表彰康熙的仁德，祖是表彰他的功绩，只有功绩相当大的皇帝才能称祖，连皇太极这么厉害的皇帝都只得了个太宗庙号。当时，雍正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刺破中指，用血写出了“圣祖”二字。

康熙的陵墓又叫景陵，在顺治的孝陵东南约两里的地方。景陵曾两次被盗，一次是军阀孙殿英为了解决军费问题盗取清东陵，景陵是其中之一。第二次是抗日战争刚结束不久，一群土匪把魔爪伸向了清东陵。景陵被盗之后，没有经过清理，导致墓穴内积水，一代明君康熙的尸骨泡在积水中，情何以堪。

康熙之死和雍正继位是清史的一大疑案。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康熙是被雍正毒死的，雍正在给康熙进入参汤的时候，放了毒药，再加上民间传言雍正喜欢跟江湖奇人来往，这个说法似乎很可信。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对此有过记载，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那天晚上，就皇帝号呼之声不安之状来看，即使没有人下毒，也肯定是突然发生了什么变故。”一些清史学者也提出了雍正继位是宫廷政变的说法。

雍正下毒，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这是从人性最阴暗的一面来揣测的。但雍正没有太大的必要这么做，就算他毫无人性，纯粹从利害角度也没必要。康熙是重病在身，活不了几天，你还要毒死他，就这么等不及吗？再说，雍正处理朝政已久，势力非同小可，就算康熙不想立他，他依然可以做到自立。

这就涉及第二个疑点：雍正是不是篡改了遗诏？

当时有人传言说康熙本来想传位于十四阿哥，结果雍正把十字改成了于，就变成了传位于四阿哥。这个说法仔细一推敲就发现漏洞百出，在清朝，书写皇子的名字的时候前面必须加一个皇字。如果康熙真想传位十四阿哥的话，也是这样写：传位皇十四子。雍正改过来就是：传位皇于四子。语句不通，而且清朝写“于”一般不是用这个字，而是用“於”。而且，朝廷诏书，尤其是继位这种大事肯定是用满汉两种语言书写的，你改得了汉文诏书，改得了满文诏书吗？所以，说雍正篡改遗诏也不太可信。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相信雍正篡位，跟雍正后来古怪的性格也有关系。自从康熙死后，雍正一生不住畅春园，死后也不葬在清东陵，好像有意躲避自己的父亲。畅春园是康熙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这么好的地方雍正却不要，反而另外拨款修建圆明园，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另外，康熙平生最喜欢去热河避暑山庄，雍正当皇帝后一次都没去过。更让人诧异的是，雍正为自己选定的陵墓远远避开清东陵，选择了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后人称之为清西陵。这确实让人费解，如果雍正不是十分厌恶自己的父亲，那就是有意要回避什么？

而且雍正是相信鬼神的，他这么做很容易让人怀疑他篡位后，没脸在地下见自己的父亲。如何解释雍正“生不住畅春园，死不葬清东陵”呢？说实话，还没有找到非常完美的解释。当然，也有可能是雍正想走出康熙大帝的影子。

但仅凭雍正的这些行为和习惯就判定他篡位，明显证据不足。康熙晚年的一系列举措就是在给雍正铺路，他还有必要篡位吗？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雍正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皇帝，在有的方面甚至超过了康熙。

非常有意思的是，雍正葬在清西陵以后，给自己的儿子乾隆出了一个难题，百年后是陪父亲呢，还是陪爷爷？乾隆很为难，最后想出了个折中之策，规定隔代葬一陵。乾隆跟康熙隔一代，所以就跟康熙葬在东陵，嘉庆跟雍正隔一代，就跟着雍正葬西陵。

整个康熙王朝就这样结束了，在王朝灿烂的背后潜藏着腐败的种子，雍正跟康熙的性格完全不同，跟他的儿子乾隆也脾气迥异。在中

国历代帝王中，雍正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同时也是非常神秘的一个皇帝。

他的知名度不亚于父亲康熙和儿子乾隆，但名声却不太好，在下一本书中我们将走近这个神秘的帝王。

雍正王朝 大清风云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鹿鼎公子 著



肆

比野史
更靠谱

超个性，职业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一人
极杰出，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
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
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比正史
更有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风云. 4, 雍正王朝/鹿鼎公子著.—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93-7308-8

I. ①大... II. ①鹿... III. ①中国历史 - 清代 - 通俗读物
IV. 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4232号

策划编辑: 胡 艺 (ngaihu@gmail.com)

责任编辑: 张 津
古润文化

封面设计:

大清风云: 雍正王朝

DAQING FENGYUN: YONGZHENG WANGCHAO

著者/鹿鼎公子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32
数/175千

印张/8.5 字

版次/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093-7308-8

定价: 29.8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010-66026508

值班电话:

邮政编码100031

传真: 010-66031119

网址: <http://www.zgfzs.com>
010-66053217

编辑部电话: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66033393

邮购部电话:

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雍正帝读书像

雍正皇帝自幼及长素以读书为重，登极之后依然如故，举行经筵，继续不间断地学习。他熟悉经史典籍，儒释兼通，能吸取前代的治世经验，完善统治方式与手段。《雍正帝读书像》绘写他端坐于锦垫之上，手捧书卷，默默沉思，仿佛在体味书中三昧。



胤禛行乐图册·松涧鼓琴

这是雍正行乐图册中的一幅。图绘身着汉服，临溪而坐的胤禛专心抚琴的场景。通过他舒展优雅、慢拨琴弦的举止，不仅可以感受到悠扬的琴声与潺潺的溪水、幽淡的月光及高古的松柏合韵成拍之美，而且仿佛可以聆听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画外之音。



雍正手书对联

这是雍正亲笔手书的一副对联。对联行笔稳健流畅，结体整肃，书法遒劲，柔中有

刚，有娟秀之美，无燥动之气。这十二个字，字字发自肺腑，是一代君王人生最好的写照。



珊瑚红底五彩牡丹纹碗

此件珊瑚红底五彩牡丹纹碗制于雍正早期景德镇御窑厂，器形及色调均沿续康熙朝官造珐瑯彩瓷风格。“雍正御制”款识，意指此为专属帝王自身使用之器。康熙以降，造办处御制珐瑯彩瓷多见浓色底上绘明艳娇蕊，华贵耀眼。

总序

清史洋洋洒洒近三百年，三百年间怪事、奇事、惨事、恨事迭出，三百年年年都精彩，年年都有挥之不去的喜怒哀乐。整个清朝三百年，几乎囊括了人性中一切的极端面，三百年，道不尽的风云爱恨。

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骑兵，建立了后金，身后留下了无数的尸体，最终倒在宁远城下，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书生袁崇焕手中，就此郁郁而终，这是上天对一个暴力征服者的最大讽刺。随后，努尔哈赤诸子开始斗智斗勇，最后皇太极靠谋略成为老大。

皇太极穷其一生精力都在与明朝对抗，不幸暴毙后，大清国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多尔衮与豪格之争最终便宜了顺治。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后，成为皇父摄政王，将全国军政大权操于一身，顺治完全被架空。此时，孝庄和顺治母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危难关头，孝庄舍身保大清，稳住多尔衮，终于使大清逃过这一劫。

顺治是个痴情天子，亲政后喜欢跟母亲孝庄闹不愉快，结果自己和董鄂妃双双去世。康熙继位时才八岁，不过这是个早熟的孩子，也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很早就懂得帝王之术。在别人还是懵懂少年时，他就已经像个猎人一样盯紧了鳌拜，除掉鳌拜之后，康熙开始了自己雄才大略的一生。

康熙治国和外交不外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所以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鳌拜，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荡平准噶尔，击退沙俄侵略……在整个清朝，帝王之术在康熙手中达到顶峰。

然而，康熙也有缺点，他的法度不够严明，治国主要是依靠儒术和道术。雍正虽然上位不明不白，但当皇帝后弥补了康熙的缺点，雍正治国理念上最大限度地奉行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乾隆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他继位后，废除雍正的依法治国思路，重新走康熙的路子。但乾隆并不懂康熙真正的治国精髓，结果变成了外用儒术、内用权术，所以清朝在乾隆时期开始走向衰落。

自乾隆后期，动乱纷起，尤其是白莲教叛乱几乎烧遍整个中国。到了嘉庆手中，国家元气已大伤，嘉庆虽然是个仁君，可惜终究没有先祖那份雄才。他虽然减缓了国家的衰颓，但始终没能重振大清的雄风。到了道光手中，国家就更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欺负得

够呛，国内的动乱更是风起云涌。

咸丰就更悲剧了，太平天国和天地会起义，全国天翻地覆。更糟的是八国联军来了，他连个京城都保不住，年仅三十岁便郁郁而去。咸丰死后，朝政大权掌握在“龙夫人”慈禧手中，国家每况愈下，虽然中途出现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可惜终究是昙花一现。

清末虽然出现了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袁世凯这样的中兴名臣，但亡局已定，神仙也不能力挽狂澜。最终，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千古帝王，悠悠万事，功过自有百姓言，清朝这些事儿，就交给读者去慢慢品味吧！

序言

顺治和康熙当上皇帝都有很大的运气因素在里面，但雍正和皇太极一样，能当上皇帝，全凭个人的能力。

雍正做皇子时并不被康熙看好，因为雍正从来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不管是他的父亲康熙还是儿子乾隆，都不喜欢他。雍正之所以不讨人喜欢主要是因为他个性严苛，缺乏人情，做事心狠手辣。雍正固然不讨人喜欢，但治国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康熙末期，官僚集团开始腐败，随着康熙年龄的增大，再加上家事烦心，对这些事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雍正上台之后，立即大刀阔斧整治腐败。

在雍正身上，两面性非常明显。就治国方面来说，他是一个英明的皇帝，尤其在吏治这块，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雍正堪称数一数二的能手。他的许多改革都将清朝的统治推向鼎盛，比如设立军机处、修订法律、实行摊丁入亩制度、推行耗羨归公和养廉银制度，这些改革在整顿吏治、改善国计民生方面的效果非常明显。

康熙末期的衰败在雍正手中得到了扭转，清朝的元气也在雍正的手中不断上升。

但是在对待反对派的问题上，雍正是非常残酷的，绝对没有手下留情的余地。他的亲弟弟胤禔被他终生圈禁，八王党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死的死关的关，连他的亲生母亲都被他气死。雍正用铁血政策让朝中的人明白：跟我合作的一定有好处，站在我对立面的绝对没有好下场。

对于自己的两大功臣年羹尧和隆科多，雍正的表现则显得非常阴狠。需要用他们时，将他们捧上天，等到政权稳固，再出阴招，将年羹尧和隆科多党羽一网打尽，双双逼死。

雍正是一个很难评价的复杂人物，说他是明君一点都不过分，因为他确实在其位谋其政，是一个勤政的好皇帝，一生批阅奏折超过千万字，以至于很多人都说他是累死的。但事实上雍正并不是一个仁君，跟朱元璋一样，他身上有很重的杀气，一旦有人触了他的逆鳞，他定要逼得这个人走投无路。

在治国方面，雍正外用法家内用权术，手段刚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他提拔的许多人都是那种敢于得罪人的“硬汉”，像李卫、

田文镜这种人便是如此。

跟清朝的很多皇帝一样，雍正也是暴亡，暴亡的原因可能是丹药中毒。由于雍正极其善于作秀，很多人不知道他沉迷于道术，在宫中，雍正花费巨资让道士们为自己炼制丹药，结果这些丹药反而要了他的命。

种种迹象表明，雍正并非像他自己宣扬的那样不近女色。朝鲜使者出使清朝后，曾在史书中记载，雍正由于纵欲过度，导致下半身瘫痪。

所以说，雍正可能远远比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整天对着奏折挑灯夜战的皇帝要复杂得多，读了这本书相信读者会有更深的体会。

目 录

总序

序言

第一章 城府哥雍正笑到最后

淡泊是一种策略

雍正继位戒备森严

第二章 挤掉眼中刺

先从亲弟弟开始吧！

老八最可恨，先剪他翅膀

八王党要收拾干净

康熙儿子们的命运

第三章 功臣血宴

雍正坐山观虎斗

与年羹尧决裂

年羹尧的末日

隆科多也在黑名单中

第四章 政改必须拿着斧头

“特务政治”

神秘的军机处

纠正社会不正之风

修订法律

第五章 搞经济改革一定要精打细算

亏欠多少补多少

耗羨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摊丁入亩

清理民间欠粮

货币政策

第六章 整顿八旗，调解满汉

解除旗主权力

解决八旗生计

调解满汉矛盾

第七章 一个疯狂书生引发的文祸

无辜的岳飞后代

审讯

穷秀才的春秋大梦

雍正怪招处理

文祸在继续

第八章 雍正的驭人之道

李卫当官

允祥受宠之谜

能人鄂尔泰

首席秘书张廷玉

模范督抚田文镜

用人就是一手刚一手柔

第九章 西北不安宁

年羹尧平青海之乱

善后处理

经营西藏

用兵准噶尔

用兵准噶尔的得失

第十章 改土归流与苗疆之乱

由来已久的土司制度

鄂尔泰的建议

父业子竟

第十一章 雍正与外国

开放海禁

东南亚诸国来朝

严格限制外商

雍正与天主教

恰克图条约

第十二章 雍正暴毙之谜

吕四娘寻仇

曹雪芹“林黛玉”联手毒死雍正

丹药中毒

入葬西陵

第十三章 揭秘雍正的双面性格与家庭生活

工作狂

雍正的双面性格

雍正的特长与爱好

雍正的家庭生活

第十四章 雍正不为人知的一面

其实他很奢靡

雍正与西洋画家郎世宁

佛性难洗君王心

第一章 城府哥雍正笑到最后

这时候，胤禛的表现跟胤禩完全相反，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整日沉醉在佛教和诗词中。胤禛知道，储位固然好，皇帝自然尊贵，但里面风险太大了，搞不好什么都捞不着，还落得个粉身碎骨。康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皇帝，跟精明的人玩精明是非常不划算的策略，与精明的人相处不妨大智若愚，与愚蠢的人相处不妨耍一些聪明。胤禛的心术之高明由此可见一斑。

淡泊是一种策略

这本书我们将要讲述清朝历史上最有争议的皇帝：雍正。

雍正的原名是爱新觉罗·胤禛，康熙的第四子，出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换成公历便是1678年12月13日。胤禛出生的时候平淡无奇，没有任何祥瑞的征兆，史书记载也相当简单：“丁酉，今上皇帝生，上之第十一子也，母曰乌雅氏。”——这就是中国史书的写作风格，惜字如金，对皇上都如此，遑论其他人。

胤禛是康熙的第十一个儿子，因为前头夭折了不少，所以胤禛排到了第四位，前面有三个哥哥，分别是胤禔、胤礽和胤祉，就排行来说，胤禛算是年长的儿子，这对于他将来竞争皇位是有利的。

我们再说说胤禛的母亲吧，乌雅氏是蒙古女人，隶属满洲正黄旗，父亲威武是个护军参领。胤禛母亲出身并不高贵，诞生胤禛的第二年她被封为德嫔。不过，胤禛没有太多的时间享受母爱，胤禛幼年交给皇贵妃佟佳氏抚养的，她是一等公佟国维的女儿，在逝世前被册立为皇后。康熙为什么把胤禛交给皇后抚养呢，因为这位皇后没有生过孩子，又特别喜欢小孩。所以，看到五岁的胤禛活蹦乱跳的样子，康熙就想到了应该把他过继给佟贵妃。

佟贵妃对胤禛非常喜爱，视为己出，不幸的是六年后她忽然一病不起。这一年胤禛十一岁。得知佟贵妃病危的消息，康熙在她逝世的前三天封她为皇后。有的读者可能奇怪了，康熙不是很宠爱佟贵妃吗？怎么直到她快死了才封为皇后？

说来，这跟康熙的迷信有关系，前两个皇后都死得挺早，康熙认为自己克妻，就没有再封皇后。佟佳氏死后，康熙再也没有封皇后，

他始终相信克妻这种说法。

佟佳氏一死，胤禛相当于丧失了半个母亲，佟佳氏虽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但抚养之恩如同生母。之后，有一段时间，胤禛相当忧郁。为了怕他出什么意外，康熙还特地放下政务陪他。胤禛后来痴迷佛教，可能跟这段经历有关。

在早年，胤禛跟其他皇子一样，受到良好而又严格的教育。在老师们的严格管教之下，胤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老师们的水平都是一流的，大都是康熙朝的大官和理学家。这些老师中，对胤禛影响最大的是礼部尚书顾八代。顾八代不光学识渊博，人也相当正直清廉，胤禛评价他“品行端方，学术醇正”。顾八代退休后，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他死后，家里甚至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胤禛得知了这个消息，心里很难受，以学生的名义为老师操办丧事。

可以说，顾八代对胤禛的思想和精神有很大的影响，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后来雍正治国。

长期以来，胤禛并没有受到康熙的格外重视，过着一种书斋式的生活。所以，胤禛的古文功底很好，写了大量的诗。饱读史书无疑也增加了胤禛的智慧，提升了他的修养，让他在以后的储位斗争能够隐而不发、韬光养晦。胤禛一生也写了不少的诗，这些诗作跟李白杜甫这些人写的自然没法比，但是对仗工整、意境幽美，不是粗制滥造之作，比起多产诗人乾隆好上不止一个档次。

我们不妨看看胤禛在镇江金山寺题的一首诗：

暮宿金山寺，今方识化城。

雨昏春嶂合，石激晚渐鸣。

不辨江天色，惟闻钟磬声。

因知羁旅境，触景易生情。

诗中充满了佛教意蕴，反映了胤禛内心深处的另一面。而他内心深处的这一面对他继承大统有很大的影响，胤禛能够变成雍正皇帝跟他在两次废太子中的表现有很大关系。康熙第一次废掉太子后，大阿哥胤禔和八阿哥胤禩觊觎储位，公开活动，受到康熙责备后，依然没有收敛。

有时候太聪明了反而会给自己招来麻烦，胤禩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众皇子中，没有人比他更会笼络人心，在这方面连康熙都不是他的

对手。朝中的文武官员大都看好胤禩，连大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都与他结盟。这样一来，太子被废后，胤禩的人望最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对此，康熙是反感的，对儿子拉帮结派他一向深恶痛绝，太子就是因此被废的。

这时候，胤禩的表现跟胤禩完全相反，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整日沉醉在佛教和诗词中。胤禩知道，储位固然好，皇帝自然尊贵，但里面风险太大了，搞不好什么都捞不着，还落得个粉身碎骨。康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皇帝，跟精明的人玩精明是非常不划算的策略，与精明的人相处不妨大智若愚，与愚蠢的人相处不妨耍一些聪明。胤禩的心术之高明由此可见一斑。

在受封亲王的时候，胤禩主动提出降级，说自己本来爵位已经够高，现在又受封亲王，而一些弟弟们爵位还不过贝子，同样是兄弟，怕他们心里不舒服。

在整个争夺储位的过程中，胤禩表现出中立的姿态，既不支持任何一方，也不反对任何一方，这样一来，其他各方斗得你死我活，胤禩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我们不知道胤禩沉溺佛道和山水是麻痹康熙和政敌的一种手段，还是这就是他本真的性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确实这种策略很有效果，让他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雨中安然走过，最终登上大宝。

胤禩写过一首诗《国居》：“懒问浮沉事，闲娱花柳朝。吴儿掉风曲，越女按鸾箫。道许山僧访，棋将野叟招。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看到这么具有老庄气息的诗句，谁能想象得到这个人潜藏着政治野心。胤禩的《山居偶成》则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再一次向世人展现自己的“淡泊”：“山居且喜远纷华，俯仰乾坤野兴赊。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年荣辱镜中花。金樽潦倒春将暮，惠径葳蕤日又斜。闻道五湖烟景好，何缘蓑笠钓汀沙。”

在《题布袋和尚》里，胤禩更是把这种掩人耳目的思想发挥到极致：“笑呵呵，呵呵笑，笑世人，笑不了。笑他田地置方圆，笑他房屋嫌低小。笑他饮食羨膏粱，笑他衣服求精好。笑他妻妾恋如花，笑他性命轻如草。笑他名利认真求，笑他贪得生烦恼。不如看破笑呵呵，肚皮藏世界，布袋括山河。日月轮回眼，乾坤自在窝。开口笑时空色相，安心坐下念弥陀。世间真实见，此袋尽包罗。紧捏着，不过。若还宽放些儿也，贫者无人富者多。呵呵复笑笑，笑笑复呵呵。”

这些诗歌既可以看成是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也可以说部分地反映了胤禩的真实心情，因为在储位的争夺过程中，他并没有太大的优

势。他的兄弟们能人实在太多了，要想脱颖而出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保存实力，直到该出手的时候才能出手。

我们先来说说胤禔的竞争对手，十四阿哥胤禵。胤禵受到康熙打压后，胤禵变得异常活跃。他是胤禔的亲弟弟，同母所生，在争夺储位的阿哥里年龄是靠后的。他之所以打起了储位的主意，跟康熙对他的欣赏是分不开的。胤禵知道，要想成为储君，人缘还得好，不仅要皇上喜欢，还得臣下拥戴。

胤禵积极联络朝野人士，尤其对德高望重的大学士李光地非常重视，但李光地这个人原则性很强，他没法拉拢，只好退而求其次，拉拢李光地的门人陈万策。胤禵为了扩充自己的影响力，对官员和士人们大肆拉拢，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十四爷虚贤下士”的说法。明眼人都知道十四爷对储位兴致很浓。

不久，西藏发生叛乱，胤禵的表现机会来了，他向康熙请求带兵平叛。胤禔也提出了这个要求，结果康熙把这个机会给了十四阿哥。康熙对胤禵出征高度重视，他亲自主持祭告礼，临行前，他在太和殿亲自把大将军印交给胤禵。胤禵骑马出天安门的时候，康熙率领诸王以及二品以上的官员送行。因为这次出征，胤禵的身份从贝子上升为亲王。

康熙将十几万大军的指挥权全权交给胤禵，由此确实可以看出他对胤禵的信任和重视。胤禵也确实有将兵才能，他到了之后没有急于开战，而是选择整顿军队。中途，康熙召胤禵回京，跟他讨论用兵策略。

离京之前，胤禵对京城中争储的事情很不放心，他对胤禔说：“皇父年纪大了，如果有什么好歹，你一定要及时通知我。”胤禵倒不是关心皇父，而是怕自己错过储位。当上大将军后，胤禵羽翼正在不断丰满中，但由于资历威望甚浅，一时还没有形成气候。连八阿哥胤禩都选择支持他，胤禵自知自己没有希望，希望这个弟弟能够入主东宫，成为未来的皇帝，胤禔跟着胤禵一样，也在康熙面前夸奖他，说我们兄弟都不如胤禵。

胤禵到了前线后，打仗反倒成了次要的事情，扩充实力延揽人才倒是主要的事情。胤禵还请人为自己算命，算命的人吹捧他“贵不可言”，可以当上皇帝。外人的吹捧和支持无疑让胤禵对皇位牵挂在心。对于皇位，胤禵也表现得相当饥渴。

胤禵这个大将军跟一般的大将军可不一样，废太子胤礽曾经就想要做这个大将军，可惜没机会。胤禵的这个大将军权势甚至超过当年统一中原、平定三藩时的大将军，炙手可热，位高权重。后来，胤禔

说他：“妄自尊大，作出种种不法的行为，我朝大将军如此行事者，从未闻之……”可见，胤禩的与众不同，在当时很多人眼里，这个大将军位不过是登上太子的一个桥梁，相信胤禩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康熙指望他立下战功，然后顺理成章地封他为王，再过渡到太子。

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还出自雍正，他认为如果康熙真想立胤禩就不会让他在外带兵。康熙本身年老多病，如果真想立谁，肯定把他放在身边，以保完全。这种说法有道理，但是忽视了一个细节，康熙是一个对自己身体非常自信的皇帝，他从不觉得自己会不久于人世，对他来说，立一个人跟让这人在自己身边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到底谁是康熙心目中最适合的人选呢？说实话，还真没有特别完美的人选，就个人喜好来说，康熙更喜欢胤禩；但是从理智上来说，他认为胤禩更适合做一个皇帝。作为一个经过大风大浪的年老皇帝，康熙看人还是有一套的。正因为感情跟理智产生冲突，他才迟迟没有作出决定，他还想继续观察，换句话说，他是想多给胤禩一些机会，如果他能抓住机会，立下战功，并且不断成熟老练，那么皇位就是属于他的。

很显然，胤禩并没有让康熙特别满意。

雍正继位戒备森严

康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皇帝，相信在内心深处他是自信自豪的。然而，太子一事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在封建社会里，皇储绝不仅是家事，而是国家的大事，这事如果没处理好，政绩得扣分。

康熙第一次废了太子后，大病一场，大男人都流出了无奈的泪水。第二次废太子，他说啥事都没有，感觉很稀松平常。真是这样吗？恐怕还是康熙的要强之语，第二次废掉太子后，康熙也很伤心，体质明显下降。

康熙最后是带着遗憾去世的，他本是一个杰出的帝王，却因为没处理好储君的事，留下了心头大憾，临死都没有幸福的感觉。

康熙一死，皇位落到雍正手中。雍正还没坐上皇位，社会上就流传他“弑父篡位”的传言。流言说雍正给康熙进了一碗人参汤，康熙喝过之后就腹中绞痛而死。这个传言是没有道理的，康熙当了六十年的皇帝，警惕性相当高。加上太子事件，他对其他人从来不敢过于相信，雍正想要通过下毒谋害他，委实不太可能。而且，了解康熙生活习惯的人都知道，康熙是不喝人参汤的。

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病重，苏州织造李煦给康熙上密折，请求康熙赐给曹寅一些人参，当时康熙是这么回答的：“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从小人处来的。”在康熙看来，服用人参是南方人的习惯，北方人跟人参不合，康熙自己就不吃人参，怕“无益有损”。

西洋人马国贤详细地记载了康熙驾崩：

1722年12月20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我当时与安哥拉神父暂住在皇上的一个叔父家中，当晚吃过晚餐，突然听到一阵嘈杂的声音从宫中（畅春园）传出，我深谙这个国家的情况，因此立刻将室门关闭，同时告诉我的同伴，如果不是皇帝驾崩，就是北京城发生暴乱了。

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攀上了一堵临街的墙向外面张望。令人吃惊的是，我看到大群马队正在向不同方向疾驰，最后，在一队步卒通过时，我听到他们在交谈中说：“康熙皇帝晏驾了。”

后来，我从御医口中获知，康熙皇帝钦点四皇子雍正为继承人，立刻即位，并得到众人的拥戴。新皇帝首先要做的，是为大行皇帝（死去的皇帝）更衣，并在当晚移灵。新皇帝则乘马在众皇子、皇孙和宗室王公簇拥，以及无数武装士兵护卫下，前往紫禁城。

第二天，我和安哥拉及赛格罗神父回到京城，原想去宫里向康熙皇帝之死表示悼念，但却始终没有获得允许。康熙皇帝崩逝后数日，当大丧仪注正在进行，新皇帝雍正同时宣布了大行皇帝的遗诏，正式宣布由他继承皇位。这在整个帝国，兴起一阵惊诧。

从马国贤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即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这往往是一种危险的征兆。当别人反应过来时，第一句想说的话是：“怎么是这个人当皇帝？”第二句话可能就是：“凭什么啊？”

雍正对危险性估计得很足，所以康熙死后第二天，他就命令隆科多关闭京城九门，这样一来，那些想兴风作浪的人也就没有机会。

康熙在清朝皇帝中并不算是猝死，从生病到死亡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不像雍正，从不舒服到暴毙只有两天的时间。蹊跷的是，在清史中，康熙之死留下了太多的疑点，根据实录的记载，康熙的病是一天天好转的，当然这个不可信，很可能只是一种假象，或者是康熙自己的感觉。最可疑的是御医的诊断、用药的经过在史书里只字未提，有人可能会说史书一字千金，生病用药这些小事不值得书写进去。事实不是这样的，清末的同治和光绪之死都有大量的就医诊断用药的资料。

也就是说，雍正无论如何逃脱不了篡位的嫌疑。如果把这个案子交给法庭，他们也判断不出什么，只能作出推测，无论是支持雍正还是否认雍正篡位的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所以这只能算是一个无头公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根据朝鲜人的记录，康熙在临终前留下了遗言，说第四子胤禛最贤明，可以继承大统，胤禛的儿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可以封为太子。《李朝实录》还说康熙弥留之际交代了雍正几件事：“废太子和皇长子性格脾气不好，还像以前一样囚禁他们，但要让他们丰衣足食，让他们善终。废太子的第二个儿子朕很喜欢，封他亲王。”

康熙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想雍正继位之后将废太子和皇长子置于死地，所以提前打声招呼，他相信自己的话在死后还是管用的。雍正也确实给康熙面子，没有为难废太子和皇长子，但是对于康熙没有提到的阿哥，雍正则毫不留情，大打出手。

雍正继位之后，封胤禩和胤祥为亲王，虽然他没有封废太子的次子弘皙为亲王，但也封了郡王。第二年，雍正在北京西郊盖了一个王府，让弘皙过去住。雍正二年，废太子去世，雍正追封他为和硕理亲王，按照亲王的规格给他治丧。皇长子直到雍正十二年才去世，雍正也没有为难他，在生活上给了他很多照顾。

在《李朝实录》里提到大学士马齐受康熙遗命，力挺雍正。我们知道，马齐以前是“八王党”的领袖，如果他和隆科多一起支持雍正，那么这似乎说明雍正继位确实是康熙的意思。

雍正继位之后，对马齐也很看重，授予他很高的官职。但是，马齐似乎并无意为雍正效力，除了主持康熙的丧事和编修《圣祖实录》比较用心外，对其他的事情他一概很消极。雍正并没有因此而为难马齐，雍正五年，雍正指定马齐的侄女富察氏为弘历的嫡福晋（相当于未来的皇后）。

在雍正继位的过程中，隆科多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隆科多掌握着京城的卫戍部队，可以调动两万人马。他用手中的军队维护了新政权的稳定，所以在雍正王朝前期，隆科多跟年羹尧成为雍正最重要的大臣。

第二章 挤掉眼中刺

我们看到，雍正在前期进行政治清洗的时候，并没有动辄举起屠刀。这是不是代表他很仁慈，怕见血呢？从后来的情况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之所以不杀，并不是不想杀，而是不敢杀。刚刚继位，政权不稳，杀多了很容易引起叛乱和政变。

先从亲弟弟开始吧！

雍正当皇帝后，他的兄弟们名字中的“胤”全都必须改成“允”，尤其是雍正的亲弟弟，名字中的两个字必须全改。允禩原名是胤禩，雍正继位后，他就变成了允禩。

康熙死后第二天，雍正就任命八阿哥允禩和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和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允祥是雍正的铁杆支持者，隆科多是雍正继位的得力干将，他们两人得到提拔大家都理解。但雍正为何重用昔日的政敌允禩呢？

这实际上是雍正的一种策略。雍正继位，根基浅，人心不稳，一方面他要笼络人心，先稳住八王党；二来，这么做也可以给文武大臣一个印象：我雍正是一个宽容大度的皇帝。总理事务大臣位高权重，是新王朝的核心人物，雍正让允禩和马齐进入这个阵容，确实非常有胆识，对稳定人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隆科多和允祥是雍正的心腹，雍正即使提拔允禩和马齐，有允祥和隆科多限制他们，他们也做不了什么手脚。这一招确实高。

不光如此，雍正封允禩和允祥为亲王，给予了允禩在康熙朝没有的待遇。雍正还大封允禩的亲信，致使以前八王党的一些人弹冠相庆，有人到允禩家里来道喜，允禩的妻子乌雅氏有先见之明，说道：“有什么可喜的？不知道哪天就会掉脑袋哩！”允禩本人也看得很清楚，对大臣说：“皇上今天加恩，未必不是为了明天诛杀。现在皇上对我施恩，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心的。”

雍正还任命允禩的亲信阿尔松阿为刑部尚书，但阿尔松阿怀疑雍正是向自己伸出毒钩，将来有天用这个职位害死自己，所以推辞不肯接受。应该说，允禩等人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忧虑。

对于拥兵在外的允禩，雍正就是想办法让他回来，削夺其手中兵权。雍正致信给允禩说：“皇考的丧事，如果你不能亲临，只怕你心里也不安宁吧，你还是尽快回来吧！”雍正一面召允禩回来，一面让辅国公延信赶到甘肃，接管允禩的帅印，并让川陕总督年羹尧监督延信。

允禩回京，完全是逼不得已。当然，允禩也可以选择兵变，率领大军开向北京，但他没有这样。原因何在？说来，还是雍正高明，雍正早已安排年羹尧牵制允禩，如果允禩想要挥师直捣北京，年羹尧必然在半道阻击，允禩并无必胜的把握。此外，雍正厚待允禩，让阅历尚浅的允禩产生错觉，以为雍正没有加害兄弟们的居心，所以失去戒心。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雍正提拔重用允禩用意深远啊！雍正不愧是个权谋大师。

允禩回来的路上一脸阴沉，还没到北京，他就给雍正写了一份公文，请示他是先去景山拜谒先皇灵柩，还是先祝贺新君登基？允禩这道题是故意让雍正难堪的，故意将新皇与死去的康熙对立起来，暗示雍正篡位。

雍正貌似大度，让他先去拜谒先皇。允禩径直赶往寿皇殿在康熙灵前哭拜，恰好当时雍正也在那里。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雍正一副傲慢威严的样子，允禩悲愤至极，两眼冒火。本来，允禩认为父亲宠爱自己，如果父亲不是死得这么突然，皇位一定会传给自己的，现在被雍正捷足先得，昔日的兄弟今天变成君臣，想来允禩觉得耻辱非常。

是的，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变成了别人的，金钱是这样，权力更是这样。

当然，出于礼节，允禩不得不给雍正叩头，但允禩实在无法做到在雍正面前叩头，于是选择远远地给他叩头。论理，他还应该向新皇帝表示祝贺的，但他实在说不出口。雍正为了显示大度，主动朝他走几步，但允禩仍然不肯正眼瞧雍正。允禩的侍卫拉锡见此，拉着允禩往前走，让他去跟雍正道贺。事后，允禩大骂拉锡，还向雍正告状说：“我是皇上的弟弟，拉锡不过是一个下人。如果我有什么不是的地方，请皇上惩罚我；如果拉锡做错了，请皇上将他就地正法，以正国体。”

允禩表面上是对拉锡不满，其实是向雍正提出抗议，心术如此高明的雍正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这正好给了雍正一个机会，雍正就坡下驴，大骂允禩心高气傲，不服管教，借机剥夺他的王爵，降为贝勒。

雍正元年三月底，雍正送康熙灵柩到遵化景陵，再次下旨教训了允禩一番，允禩心里不服，允禩怕事情闹大后不好收拾，让允禩跪下，允禩才勉强跪下。事后，雍正返京之前，让允禩留下来看守景陵，并让李如柏监视允禩，相当于软禁允禩。

雍正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为了让大家心服口服，他还找来允禩昔日手下的将军询问：“听说允禩以前在军中喜欢酗酒行凶？”允禩的将军们连忙矢口否认，雍正大怒，命人将这些人永远囚禁起来，甚至将他们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也关押起来。这样一来，允禩势力等于被雍正轻而易举端掉。

雍正对亲弟弟下这样的毒手，让他们的母亲德妃非常为难。雍正请她搬到宁寿宫来往，她以服丧为由拒不接受。德妃也经常为允禩说情，可惜雍正丝毫不动情，而允禩也相当倔强，不肯低头服软。一个母亲处在这种境地里，简直是生不如死，看着大儿子把小儿子整得生不如死，做母亲的肝肠寸断却毫无办法。终于，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德妃暴毙，从生病到死亡不过十几个小时。

关于太后之死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太后是自杀的，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大。允禩的太监何国柱说皇太后是自杀的，根据何国柱的说法，太后要见允禩，雍正大怒，不允许，最后太后在柱子上撞死。允禩的太监马起云也是类似的看法，不过说法不太一样，马起云说雍正准备让允禩去西藏见活佛，太后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雍正不理，太后愤怒至极，在柱子上撞死。

太后死得确实蹊跷，但具体是怎么死的，恐怕还是个谜，允禩和允禩都是雍正的政敌，他们的证词当然也不能全信。太后死后，雍正封允禩为郡王，作为补偿，但是仍然把他囚禁起来。后来，允禩的福晋去世，雍正给她指定了一块墓地，允禩以风水不好为由拒绝，经允禩劝辞，他才勉强接受。

经过这么多打击和惩罚，允禩心里郁结着仇恨，气愤至极，给雍正上了一份奏折说：“我现在快走到尽头了，一身是病，活不了多久……”那意思是：你现在满意了吗？

允禩的厄运一直持续到清高宗乾隆继位。乾隆继位之后，允禩终于恢复自由，被封为辅国公，允禩最后活了六十八岁，比雍正还多活了十年。

老八最可恨，先剪他翅膀

如果说允禩很倒霉的话，那么允禵的命运就是悲惨了。

允禵的母亲宜妃生前深受康熙宠爱，仗着这层关系，康熙死后，她跑到康熙灵堂前，仍旧摆出母妃的架子，眼里丝毫没有雍正这个新君。以雍正的脾气是无法忍受这种无礼的。

当然，雍正不好直接拿父亲的老婆开刀，按雍正的习惯，一向喜欢先砍枝叶，然后再砍倒整棵大树。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三，雍正借口宜妃的太监张起用违法做买卖，将他发配到土尔鲁，这是打狗给主人看。允禵的太监李尽忠被发配到云南边地当苦力，太监何玉柱发配给披甲人做奴隶，这些太监们家产籍没。雍正还给出优惠条件：“如果不愿发配也可以，就地自裁，死后尸骨仍然发往发配之地。”

以雍正残酷的性格，事情当然不会到此为止，同月，他又逮捕了为允禵料理家务的礼科给事中秦道然。当然，雍正一定会给出理由：秦道然这个人仗势欺人，贪赃枉法。雍正把他家抄了后，发现他家所有家产加起来也不到一万两。抄完秦道然之后，雍正还不满足，大骂允禵“文才武略，一无可取”，后来，雍正借口允禵从前线回来，前方缺人，让允禵前去西宁。允禵清楚这是在变相发配自己，推说要为父皇守灵，不愿去。

雍正不同意，命令他立刻过去。允禵到了青海大通县后，年羹尧就派人过来监视他，雍正还提醒年羹尧不要让看守士兵被允禵收买了。允禵在大通待了一段时间，便上奏请求回京，雍正简单地批复一个“知道了”，就没有再回音，私下里仍然让年羹尧加紧看住允禵。

后来允禵派人到河州买草，看看牧地，这事被雍正知道了，让宗人府给他治罪，说他“违反军法，肆行边地”，将他贝子的爵位革去。

八王党的中坚分子除了允禵，还有允□。他也是铁杆支持八王的，在雍正上台之前，他极力阻止，所以雍正对他恨之入骨。在康熙生前，曾经指定十阿哥允□掌管正黄旗事务，雍正上台之后无法容忍他继续掌管正黄旗了，以免他日久坐大。雍正即位十天后，就剥夺了允□手中的权力，将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个都统全部换成自己的人马，等于是把允□给架空。

喀尔喀蒙古的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城拜谒康熙灵柩，没想到来到之后一病不起，直接跟随康熙到极乐世界去了。雍正正好借机找允□的麻烦，他让允□护送哲布尊的灵龕回喀尔喀。允□不愿离开京城，说自己没钱准备马匹和行李，雍正不许，命他赶快行动。不得已，允□只好上路，到了张家口后，允□不愿继续往前走，居然在张

家口那里住了下来。雍正得知后，很高兴，终于可以收拾人。他故意问允禩：“应该怎么处置允禩呢？”

允禩说：“给允禩发一道公文，让他继续前进。”

雍正阴沉地说：“允禩既然不愿去，何必让他继续前行呢？你回去再想想，这事应该怎么处理。”

允禩待在张家口后，既不前行，也不让人回来向皇帝请罪。雍正大怒之下，让允禩回到京城，一回京城，就开始将他治罪抄家。审判的结果是：革去王爵，永远囚禁，抄没银两六十多万两。这下，雍正得理了，质问允禩：“你说没钱准备行李，从你家里抄出的六十万两又作何解释呢？”

至此，不得不佩服雍正手段之狠，他打击允禩，分化八王党，还让允禩议罪，把皮球踢给允禩。如果允禩袒护允禩的话，正好可以借机打击允禩，如果允禩提议惩办允禩的话，雍正就拍手附和，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允禩获罪是允禩一手制造的。这一招，狠狠地打击和分化了八王党。

在雍正的铁腕之下，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雍正虽然厚待允禩，严厉打击允禩、允禔和允禩，好像对兄弟们区别对待，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允禩是他最强劲的对手，所以康熙一死他就对允禩下手，在火势来不及蔓延的时候就灭火，效果很好。至于厚待允禩，只不过是把他绑在自己的龙车上，让他不能兴风作浪，等到腾出手来，随时可以把允禩推车下碾死。允禔因为母亲的关系，有一定的号召力，如果母子联合起来是有可能乱政的，所以雍正毫不手软地收拾了他们。允禩并不是八王党的核心人物，对他处罚得严厉一点暂时不会引起八王党的骚乱，而且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在对待政敌的过程中，雍正软硬兼施，克制又残忍。他先后剥夺了允禔正白旗和镶黄旗军权以及允祐的正蓝旗军权。不过，雍正采取了打一巴掌抚一巴掌的策略，解除他们军权后，雍正又拉拢他们，提升允禔为履郡王。但允禔知道雍正的居心，丝毫不感激雍正，反而心怀不满。结果，雍正大怒，以允禔“不知感激”为由，革去他的王爵，仍命他“固山贝子一职上行走”。允祐则显得识时务多了，他明白雍正的意图，立刻脱离和允禩、允禔的关系，对此，雍正很满意，大手一挥，封他为亲王。

我们看到，雍正在前期进行政治清洗的时候，并没有动辄举起屠刀。这是不是代表他很仁慈，怕见血呢？从后来的情况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之所以不杀，并不是不想杀，而是不敢杀。刚刚继位，政权不稳，杀多了很容易引起叛乱和政变。雍正对此是非常清楚的，

他经常责备兄弟们：“你们这些人恣意妄行，其实就是想让朕把你们治罪，然后让世人骂朕兄弟相残。”

雍正还说过：“允禩很想激怒朕，让朕怒极杀人，等杀人多了，众叛亲离，然后你们这些人就可以侥幸起事了，朕是不会上当的。”

尽管雍正没有对兄弟们大开杀戒，当时朝野上下也有很多人议论雍正，说雍正凌逼弟辈，挟私报复。当时很多朝廷大臣也对雍正的做法不满，翰林院学士孙嘉淦公开上书，要雍正“亲骨肉”。

如果换做一般的皇帝，肯定会大怒。但雍正不仅没有惩治孙嘉淦，反而提升他为国子监司正，表示自己并不是不懂得亲骨肉的人，也不是听不进别人意见的皇帝。雍正这招高明的地方在于，把世人的言论堵回去：不是我不亲骨肉，是有些人太过分，我没法亲。

雍正虽然手段狠辣，但也不想落个诛杀兄弟的罪名，所以他喜欢采取软刀子让兄弟们走投无路，自己选择死路。比如，大臣们经常奏请让雍正把允禩杀掉，雍正却表现出了自己“宽大”的一面，他说：“允禩和允禔、允禩这些人应该区别对待，允禩只是糊涂，行事狂妄，另外两个人却阴险狡诈。”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雍正对自身的安危也非常谨慎，雍正初年，发生过两次险情。一次是出宫祭祀，隆科多说有刺客，在祭案下面搜查，最终证明是虚惊一场。还有一次是到东陵祭拜，隆科多说诸王可能有变，要及早防备。雍正后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像康熙那样秋狩，主要是担心被人刺杀。

对书呆子阿哥允祉，雍正也没有让他过得舒服，当然，允祉的威胁不大，没必要大动干戈。雍正只是把允祉的手下陈梦雷给收拾了，也算是警告允祉要安分守己。雍正说陈梦雷是耿继茂叛逆案中的从犯，以前康熙赦免了他，他还不思悔改，仍然招摇无忌，作出种种不法的事情。虽然康熙已经宽恕了他，不适宜加重刑罚，但也要发配到边远地方，让他好好反思。

小喽啰们收拾得差不多了，雍正开始把斗争矛头直指允禩，在真正打倒一个人之前，雍正总要先来一点点点心。对雍正来说，小点心就是侮辱责骂，雍正指责允禩在母丧的时候，虚伪矫情。不久，他又当着诸王大臣的面指责，说允禩从前就作恶，朕即位后不计较他过去的过错，但他还是不知痛改前非，仍然私心很重，对大位仍然抱着侥幸的心理。说完，雍正让大臣们给他议罪，而且雍正让大臣们如实揭发，不可以有丝毫的隐瞒。

第二年春，青海的叛乱被年羹尧平定，雍正的位子坐得更稳，这

意味着他可以举起屠刀了。

八王党要收拾干净

雍正二年七月，发表了《御制朋党论》，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意味着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表面上，这篇文章是攻击欧阳修的《朋党论》，文中说：“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异说，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夫罔上行私，安得谓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论，而小人之为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济其同利之实，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且如修之论，将使终其党者，则为君子，解散而不终于党者，反为小人乎？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修阶之厉也。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

允禩的死期似乎快到了，中间雍正却停顿了一段时间，原来他要对付年羹尧和隆科多。

八月，雍正召集宗室诸王训话，严厉谴责允禩、允禩、允禩、允禩这些人结党营私，企图造反。雍正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雍正发起总攻的讯号。

虽然因为年羹尧和隆科多的事放慢了步伐，但雍正还是时刻惦记着八王党，中途经常跳出来责骂他们。十一月，雍正宣布以叛国罪处置八王党人，接着就是应接不暇的政治斗争。

雍正三年二月，雍正召集诸王大臣，严厉斥责允禩，说允禩不按规矩，跪迎圣旨，反而说自己是打算出家的人，不受君臣约束；允禩也好不了哪里去，他在祈祷疏文中，竟然写“雍正新君”这样的字，分明是大不敬；鄂伦岱在乾清门当着众人的面，把降给阿尔松阿的御纸扔在地上……

这段时间雍正一直在对付年羹尧和隆科多。雍正四年，终于腾出手。正月初五，雍正发出一道圣旨，罗列允禩的罪状。惩治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将允禩削除宗籍，逐出宗室。允禩的妻子革去福晋头衔，回母家，派人严加看守，不可和允禩往来。后来，允禩被降为民王，囚禁在高墙里。与此同时，允禩也被抄家，贝子鲁宾曾经为允禩和允禩联系，此时被揭发后，也被圈禁起来。镇国公永谦由于袒护允禩，被革去世爵。

三月，雍正又剥夺了允禩的名字，给他取了个“阿齐那”的名字，这是个满语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确切，有说是“狗”，有说是“不要脸”，总之是一个侮辱性的词语。

这样一来，舆论对允禩等人的同情越来越多，都觉得雍正这个人冷酷无情，毫无手足之情。雍正对此很伤脑筋，他总是说：“你们都是被他愚弄了，不是朕苛刻，他一点都不冤枉……”

很少有人相信雍正的话，他的话也不足为信。

这时，正黄旗有一个叫蔡怀玺的人去了景陵，想见允禩。允禩被整怕了，不想再多事，拒不见他。蔡怀玺不死心，写了“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这样的字条扔到允禩的院子里，意思无非是说将来起事十四爷还是要做皇帝的，到时候可以九王允禩的母亲为太后。

蔡怀玺的不法举动被马兰峪总兵范时绎察觉后，被送进监狱。大约同时，天津人郭允进起事，此人称遇到了洪觉禅师，得授兵法，并散发“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的传单。八佛指的是八王允禩，传单号召大家在十月起来造反，推翻天怒人怨的雍正，立八王为皇帝。

这些造反活动当然难逃雍正法眼。五月，雍正向全民公布允禩、允禩、允禩的罪状，还将允禩改名为“塞思黑”，“塞思黑”也是满语，意思不清楚，有人说是“猪”的意思，有人说是“可憎之人”。允禩的下场是非常惨的，他被关押在保定，牢房是三间小房，四面都有高墙，前门是封闭的，不能随意开启，食物装在一个铁桶里传进去，外面有专门的官兵把守。

牢房又小又暗又潮，允禩手脚被套着锁链，在狱中受尽折磨。不到三个月，允禩就病死在牢中，得到允禩的死讯，雍正没有任何的怜悯，只说：“允禩这个人罪有应得。”

外界不相信允禩是病死的，都认为是雍正下的毒手。楚宗在奏折中说，他押允禩到保定的时候，李绂曾经对他说可以“便宜行事”。雍正和李绂都说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有人说李绂受雍正之命谋害了允禩，雍正便把责任全推到李绂的身上，说允禩生病的时候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你应该把他病死的情况告诉大家。李绂自然只能沉默，老老实实地把黑锅给背上。

蔡怀玺事件发生后，雍正对允禩更加不放心，把他从遵化调到京城景山的寿皇殿里，让他对着康熙的画像缅怀父亲的养育之恩。不久，蔡怀玺被迫自杀。

鄂伦岱、阿尔松阿以前是八王的人，雍正给他们治了个结党作恶的罪，将两人抄家处斩，妻子没入内务府。七月，天津造反头领郭允进被捉住后砍头。九月，允禩在幽禁之地死亡。雍正说他做的坏事太

多，服了冥诛，阎王爷代自己动手了。

允禩一死，在康熙和雍正两朝枝繁叶茂的八王党宣告破产。

对那些同情和偏袒八王的人，雍正也是毫不留情的。山西人令狐士义以前受过允禩的资助，听说允禩被关押，提出“愿附有道之主，不附无道之君”的口号，表示要联合山西和陕西的军民，一同营救允禩。最后，允禩没有救出来，令狐士义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在审理允禩太监李大成的时候，没有奏请斩立决，雍正不高兴，故意找高成龄麻烦，说高成龄和阿齐那、塞思黑关系好，有意偏袒他们，于是将审判官高成龄变成案犯。

允禩因为是雍正的亲兄弟，出于对母亲的尊重，雍正也不便把他处死。

至此，雍正王朝终于得到有效的巩固，雍正曾经对诸王大臣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大臣之中，只要有一个人，明奏或者密奏，说允禩比我贤明，为人稳重，能够对社稷国家有福，我就立刻让位，没有丝毫迟疑。”

说出这样的话，说明雍正当时的处境确实很尴尬，名义上是皇帝，但是威权严重不足。现在对手都被消灭了，放眼天下，再也没有威胁到自己统治地位的人。

雍正能不嘚瑟吗？

康熙儿子们的命运

在雍正兄弟中，唯一得到恩宠的是十三弟允祥，这跟他投资正确有关系，他很早就依附雍正，忠心耿耿，没有丝毫僭越之心。允祥是由雍正的生母德妃抚养长大的，雍正跟自己的亲弟弟允禩不亲，跟允祥关系倒挺近。雍正继位没多久，允祥就被封为亲王，雍正八年五月初四，允祥逝世，雍正将胤祥的名字还给他，配享太庙。

允祉是雍正的哥哥，也是一个比较识时务的人，雍正登基的时候第一个下跪的人就是他，而且他是一个学者，没什么政治野心。但是在康熙晚年，允祉还是受到了重用，甚至有争储的希望。雍正是一个记仇不记恩的人，他上台之后，首先打击允祉的门人，后来又让允祉守了一段时间的陵。不过，允祉在雍正朝倒还平静，他没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也没有和雍正发生什么冲突，不过他的儿子弘晟犯了错，被革去世子之位。

雍正六年，允祉因为追讨一个大臣的银两，在朝堂上公开大吼，惹恼了雍正，被降为郡王。八年，雍正恢复允祉的王爵，几个月后，雍正又剥夺了允祉的王爵。允祉这次被惩罚的原因用现在的话说是“迟到早退”，当时雍正最宠信的弟弟允祥去世，在治丧期间，允祉经常来得晚去得早，雍正一气之下，给他拟定了十二大罪状，大臣们说应该处死他，雍正说，算了吧，还是从轻发落，革爵幽禁。

雍正十年五月初九，允祉逝世，活了五十六岁。乾隆当家后，恢复允祉的爵位和宗室地位，将他的名字收入皇家玉牒。不过，允祉的大儿子弘晟虽然被释放，但无官无爵，成为闲散宗室。允祉的小儿子弘景被封为贝子，子孙沿袭爵位。

五阿哥允祺相对平淡很多，在康熙朝的时候他就几乎是一个隐形人，到了雍正朝更加不用说。允祺一生无风无雨，死得很平静，他和允祉在同一天去世，终年五十四岁。

七阿哥允祐是个残疾人，由于没有卷入过储位之争，加上做事情认真负责，被雍正封为和硕淳亲王，雍正八年去世，终年五十一岁。

十二阿哥允禔先是被封为多罗履郡王，由于没有搞好和雍正的关系，两年后，又降为贝子。没过多久，允禔又犯错，被降为镇国公。允祥去世以后，雍正才恢复允禔多罗履郡王的爵位。雍正的丧事就是允禔操办的，乾隆在位期间，允禔被封为和硕履亲王。乾隆三年，皇太子永璉夭折，允禔继续操办丧事，简直可称得上是治丧专家。乾隆十六年，时年六十六岁的允禔唯一的儿子弘昆去世，为了安慰叔父，乾隆把自己的儿子永璘过继给他。允禔的母亲一直活到九十七岁才去世，母亲去世六年后，允禔去世，终年七十九岁。

十五阿哥允禩在雍正四年被封为贝勒，三十九岁时突然病故。十六阿哥允禄对数学挺有天赋，参与编修了《数理精蕴》一书，允禄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政治作为，但一直得到雍正的赏识。雍正元年，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去世，无后，雍正让允禄袭取庄亲王的爵位。雍正驾崩后，允禄是四辅政大臣之一，乾隆前期重用允禄，给予他双倍的薪俸。后来，允禄跟乾隆的皇子们交往频繁，遭人参劾。

乾隆觉得允禄这个人平庸无能，成不了大事，跟皇子们往来不过是饮酒作乐，是以从宽发落，免去他的职务，保留了他亲王的爵位。此后，允禄老实了许多，乾隆三十二年，允禄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十七阿哥允礼由于年龄较小，二十六岁之前没有被封过，因此也谈不上什么储位之争。雍正继位后，封允礼为果郡王，后来又派允礼处理西藏事务。雍正驾崩后，允礼成为辅政大臣之一，被晋封为亲王，可惜允礼天年不永，四十二岁时就逝世。允礼没有子嗣，乾隆让

他的弟弟弘瞻承袭他的爵位。

二十阿哥允祹，康熙去世时他才十七岁，储位之争跟他更不沾边，雍正后来封他为贝勒。但允祹这个人非常懒，雍正曾骂他“人本庸愚，性复懒惰”。十一年，雍正派他去祭陵，结果这个懒弟弟走到通州就打道回府，说生病了，其实是嫌累。第二年，雍正又让他去祭陵（雍正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明知这人懒，偏要让他去干），这次，他还是托病不去。雍正愤怒之下，将他连降三级，从贝勒降到镇国公。

乾隆继位之后，恢复了允祹的贝勒爵位，尽管如此，乾隆其实比老爹更狠，让他带着三十九人去守陵，让你祭陵你懒得去，那好，你就整年守在那里吧！这位懒人在那里待了二十年，直到乾隆二十年死在那里，结果他也葬在那里，终年五十岁。

最后四个阿哥跟乾隆的年纪差不多，他们都没受到雍正的迫害，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

第三章 功臣血宴

雍正对年羹尧的好已近乎肉麻的程度了，物极必反，君臣关系太近往往是一种危险的征兆。

雍正坐山观虎斗

年羹尧和隆科多是雍正最重视的两个心腹重臣，两人在雍正继位和巩固皇位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没有年隆二人，雍正坐不上皇位，至少坐不稳皇位。

对年羹尧，雍正宠信至极，继位后，授予他一等公爵号，加封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赐给年的儿子年富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还将年羹尧的妹妹由侧福晋晋升到敦肃皇贵妃。在平定青海叛乱前，雍正为了笼络年羹尧，下令：“西北军务，交给年羹尧全权处理，调兵遣将、动用粮草、边防等等事务一切按照年羹尧的意思办……”

雍正还命令四川提督岳钟琪：“西北防务，都由年羹尧全权调度。”

雍正不仅让年羹尧掌管西北地区的军权，还让他参与政事，有问题都会咨询年羹尧，以示对他的尊重。

为了让年羹尧死心塌地，雍正还对他的家属关照入微，经常把其家属的情况告诉年羹尧，以示对其家人的关心。有一次，雍正让人从北京快马飞奔西安，用了六天的时间，仅仅是为了给年羹尧送去新鲜的荔枝。年羹尧平定西北后，位高权重，俨然是没有封王的西北王。

在平定青海叛乱后，雍正竟然称年羹尧为自己的“恩人”，他发谕旨给年羹尧：“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去疼你，用词语来描述你的功劳太无力。西北危险之际，朕正好心烦意乱，你给朕的奏折中总是安慰朕，不想朕有任何的烦扰，其中的情感朕岂能不知。你是如此体谅朕，朕全都感知到了。每每向怡亲王谈到你的时候，朕总是难以禁住泪水。朕有你这样的臣子，实在是一种幸运啊！”

在封赏方面，雍正对年羹尧毫不吝惜，查出苏州织造李煦的家产后，将李煦的所有房屋都赏给了年羹尧，仆人也是任由年挑选。

雍正还在大臣面前夸奖年羹尧，他说：“像年羹尧这种为国出力

的人，是国家的栋梁，不但朕依靠他嘉奖他，朕的子孙和臣民们也该对他尊敬仰赖，如果有一点点的负心，就不是朕的后代。如果臣民对年羹尧有一点点的不敬，就不是朕的子民。”

年羹尧虽然远在边陲，对于朝政的影响也不可忽视，雍正的姿态可以理解为稳住年羹尧，担心他思想不稳定。雍正常常让年羹尧上密折议政，年羹尧和雍正的书信往来至今还有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

雍正正在惩办允禩后，就把允禩交给年羹尧看管，后来雍正还问年允禩的情况。年羹尧也算是个厚道人，他实话实说：“允禩颇知道收敛。”这样的回答显然是让雍正无法满意的，雍正告诉年，允禩和允禩是不可能改变的，你一定要小心提防。

在用人和决策方面，雍正也常常和年羹尧商量，经常以年羹尧的意见决定人事的去留。雍正曾听到人们议论京口将军何天培，由于众说风云，雍正不知道何天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便问年羹尧。葛继孔是江苏按察使，年羹尧参了他一本，立刻被雍正降职。赵之垣是代理直隶巡抚，年羹尧说这个人是纨绔子弟，雍正听了，立刻将此人撤职。雍正准备让宋可进担任江西南赣总兵，年羹尧说这个人不可用，黄起宪适合这个位子，雍正马上采纳他的建议……

年羹尧受到雍正这般器重，难免会有骄矜之气。

雍正元年春天，年羹尧进京，路过陕西，发现该地欠收，便让巡抚征收钱粮，巡抚没有照办。年羹尧将此事告诉雍正，雍正将巡抚撤职，等于是肯定了年羹尧越境管事的权力。年羹尧可能没意识到他的举动触犯了帝王的忌讳，虽然雍正不仅没批评他，还按他的意思办事。

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回京。雍正让礼部制定迎接年羹尧的礼仪，结果一个侍郎因为拟定得不够妥当，被降一级。年羹尧进京时，王公以下的大臣都要跪地迎接，坐在高头大马上的年羹尧对文武百官甚至懒得看一眼，骄矜如此，已伏大祸。对那些问候他的王公大臣，年羹尧也只是点点头，似乎这些人全不入他的法眼。

雍正对年羹尧的好已近乎肉麻的程度了，物极必反，君臣关系太近往往是一种危险的征兆。

隆科多的地位也非常尊崇，雍正视之为第一功臣，封一等公，加太子太保头衔，兼任总理事务大臣和吏部尚书。当然，隆科多和雍正的关系不及年羹尧，毕竟隆科多曾经投靠允禩。为了表示对隆科多的尊重，雍正还尊称其为舅舅，实际隆科多并不是雍正的舅舅。这时，

隆科多是“密勿大臣”，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丞相。雍正说他是“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同样非常肉麻。在对待功臣方面，肉麻几乎是雍正的一种策略，通过这种方式稳住自己的统治集团，淡化内部矛盾。

偏偏雍正手下的左膀右臂矛盾不断，年羹尧看不起隆科多，在雍正面前指责隆科多能力平常，不能担大任。隆科多则指责年羹尧性情狂傲，为人嚣张，而且见风使舵，不能相信。

两权臣互掐，对雍正来说并不是坏事，但是也不能让他们掐得太过火，那样会影响高层的稳定。雍正经常居中调停二人的矛盾，希望将相和，国家昌盛。有一次，雍正在年羹尧请求年内进京的奏折上批道：“舅舅隆科多说，有些事必须等你来才能商量。”等于是告诉年羹尧，隆科多很尊敬你。

为了澄青年羹尧对隆科多的误解，雍正还说：“舅舅隆科多，朕以前不了解他，现在才知道，他是先皇的忠臣、朕的功臣、国家良臣……”

为了让年羹尧和隆科多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雍正自作主张要把年羹尧的长子年熙过继给隆科多当儿子，隆科多的脾气比年羹尧要好，得知这个消息，他很高兴，说自己命中注定该有第三个儿子，现在得到皇上的恩赐，好像是得到上天的赐予一样。隆科多将年熙更名为得住，并表示从今以后和年羹尧团结友好，隆科多说：“如果我二人给人感觉像两个人，那么就是有负皇上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年羹尧当然也不会不给面子了。

年隆的和好也是雍正的一种策略，要稳定全国首先必须安内，因为要安内，雍正难免纵容年隆两位权臣。这两人功盖当时，但是也骄纵擅权，不过他们的骄横很大程度上是雍正一手培养起来的。

连年羹尧保举的官员都说年羹尧“狂纵”，这事肯定不虚。戴铎就揭发年羹尧违规让家奴桑承鼎当官，来喜说雍正听任隆科多等人擅权，用人唯亲。对于这些言论，雍正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说这些话都是无知言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无知言论，雍正的心思他们揣测不了，不久，雍正就开始收拾年羹尧和隆科多，罪名恰恰就是之前这些人提出的。

权谋大师雍正当然比谁都清楚权臣对君权的危害。年羹尧和隆科多权势虽然煊赫，但雍正很早就给他们套上了项圈。隆科多的职位最高，但雍正不让他当大学士，让他与大臣有一定程度的隔绝；年羹尧尽管手握兵权，雍正却不让他朝中当官，两人都受到了制约。所

以，隆科多官职再高，也无法跟地方大员联络，掌控兵权，年羹尧兵权再重，也不能和朝中大臣结党。而且，雍正不断拔高隆科多和年羹尧的地位，故意让这两人处于风口浪尖，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最后，朝臣必然站在自己这边，要求严惩隆科多和年羹尧。

雍正的心术实在太高明，高明得让人感到害怕。

与年羹尧决裂

年羹尧跟雍正的关系有点类似于鳌拜跟皇太极的关系，年羹尧追随雍正长达三十多年，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为雍正王朝的巩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功高震主向来为人君所忌讳，年羹尧的下场是很惨的，死前被罗列了九十二条罪状。一般人可能无法理解，雍正为什么对自己的心腹重臣出手这么狠。民间甚至有传言说雍正是年羹尧的私生子，说是雍正的母亲以前是年羹尧的女朋友，怀孕后被送进宫里。这个传言当然不足为信，不过雍正跟年羹尧的关系确实非比寻常。

年羹尧跟雍正关系特别的地方在于，年羹尧其实是雍正的家奴。有人会奇怪了，年羹尧不是进士出身吗？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爬上去的，怎么会是雍正的家奴呢？

年羹尧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明朝永乐年间一个叫严富的人身上，严富在永乐年间中了进士，结果发榜的时候写错了，写成了“年富”。年富的子孙后来流落到辽宁，在努尔哈赤时代成为了后金的奴隶，也就是包衣。

到了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时，年家分属于胤禛的门下。康熙四十八年，雍正被封为雍亲王，这一年年羹尧的妹妹被选入雍亲王的府中，当上侧福晋。年遐龄跟着发迹，当上了湖广巡抚。

年羹尧还有一个哥哥叫年希尧，此人非常厉害，既是官员，也是学问家。年希尧做官做到工部侍郎、广东巡抚，学问就更厉害，他是个数学家，出版过《测算刀圭》《面体比例便览》《对数广运》和《算法纂要总纲》等书，此外年希尧对绘画也有研究，出版过透视学专著《视学》。

年羹尧的才能更多的表现在军事上，而年希尧则显得多才多艺。后来因为年羹尧案件，年希尧和父亲年遐龄都受到了株连，两人一度被免职。

关于雍正，有许多神秘的传说，血滴子就是其中最玄的一个。据说，雍正因为继位不合法，创立了一个神秘的特务组织——血滴子，血滴子的头头正是年羹尧。据说血滴子是一个神秘的暗器，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一圈匕首，能够远距离取人的首级。血滴子这种东西不仅在正史里没有记载，连野史中也没有。它第一次出现是在武侠小说中，这跟雍正的酷政和密折制度息息相关，所以小说家为这个皇帝创造了这么一种神秘的武器。

年羹尧既然是血滴子的头领，肯定凶残无比，电视剧里对此大加渲染，说有一次雍正让年羹尧到一个地方去杀掉恶霸，结果年羹尧把全镇的人都杀光了。

让我们还原年羹尧一个真面目吧！

年羹尧的身份是包衣，根据清朝的规定，包衣也可以参加科考。年羹尧在康熙三十九年考中进士，之后授予翰林院检讨。

三十岁左右，年羹尧就当上了四川巡抚，成为地方大员。年羹尧上任之后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受到了康熙的嘉奖。在清军与准噶尔军队交战之中，年羹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受到康熙的提拔，当上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情。康熙末年，年羹尧当上川陕总督，成为当时封疆大吏中最有权势的一个人。

1721年九月，青海发生叛乱，年羹尧负责平叛，他利用当地土著之间的矛盾，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

在康熙逝世前后，雍正与十四弟的皇位争夺战进入白热化，后来雍正继位，允禩不服。允禩手握兵权，却没有选择兵临北京，其中年羹尧起了重大的作用。年羹尧镇守西北多年，善于将兵，是以允禩不敢轻举妄动。

雍正元年冬天，就在雍正和兄弟们掐得头晕眼花之时，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其时，雍正的兄弟们正等着看雍正的笑话，他的处境非常窘迫。如果不能平定这场叛乱的话，他的统治基础肯定会动摇。这个艰巨的使命就落在年羹尧身上，年羹尧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仅仅用十五天就平定了这场叛乱。

而且，年羹尧为官非常清廉，并不是像传言中那样是个残酷、腐化的大将军。

这样的关系，很难想象雍正对年羹尧举起屠刀，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缘由吧！

在康熙末年的争储中，雍正就和年羹尧埋下了矛盾。当时，雍正

为了笼络人心，让年羹尧去请蔡珽，但是蔡珽没有给年羹尧面子，从此两人结下梁子。

年羹尧担任四川总督时，巡抚一职空缺，康熙后来任命蔡珽为四川巡抚。蔡珽一来，年羹尧无法再一手遮川。两人本来就有梁子，加上彼此都不服输，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这期间，年羹尧经常利用手中权力为难蔡珽，经常向康熙打小报告，给蔡珽穿小鞋。幸好，康熙是明白人，他让蔡珽担任四川巡抚本就为了牵制年羹尧。

1722年冬，康熙病倒了，不久就去世。四川的局势对年羹尧越来越有利，不久，蔡珽威逼知府蒋兴仁，导致他死亡。蔡珽因此被罢官，年羹尧让自己的心腹王景灏接任四川巡抚。

蔡珽被送到北京后，雍正不仅没有拘禁他，反而召见了。蔡珽向雍正诉委屈，说自己在四川时年羹尧如何诬陷自己，接着，蔡珽又说年羹尧这个人如何如何贪婪暴虐。雍正是否相信蔡珽的话，我们不知道，反正雍正没有处罚蔡珽，反而提拔他为左都御史，为将来收拾年羹尧准备好一把匕首。

对于蔡珽问题，雍正就是这么解释的：“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如果将他处置，人们一定会说朕是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这样等于是授予世人年羹尧把持朝政之柄，对年羹尧也不好。”

雍正对年羹尧态度发生实质性的转变是在他第二次进京的时候，这一次雍正同样对他很热情，要九卿们讨论如何给年羹尧加恩。不久，雍正犒赏年羹尧的军队，外界传言说雍正是按年羹尧的要求办事，还说雍正是年羹尧的傀儡，被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些传言究竟是外界传出的，还是雍正一手制造的，不得而知。

雍正开始活动了，十一月十五日，对大臣们说：“朕又不是年幼的皇帝，难道非得听年羹尧的话才知道怎么做？朕自认为能力并不差，许多诸王大臣们办不了的事情朕都可以办好，诸王大臣看不到的地方朕可以看到。朕身为天子，总领天下，年羹尧只不过是有一大将军的才能，又不具备天子的聪明才智。那些说年羹尧坏话的人无非是设计害他，至于那些议论隆科多的人也不过是出于嫉妒。”

雍正这番话表面是辟谣，其实是隐隐告诫年羹尧和隆科多。后来，甚至有人建议将年羹尧扣在京城，不要让他回陕西。但雍正觉得时机不成熟，还是放年羹尧回陕西了。

年羹尧的末日

年羹尧离京的时候，没有意识到雍正已经起了杀心。

对于年羹尧，雍正很有耐心，他是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诛杀。雍正首先向李维钧透露了惩办年羹尧的意思，他在李维钧的奏折上批道：“这几天年羹尧陈奏了一些事，朕怀疑他居心不良，大有耍弄聪明揽权扩势的意思。你和他关系密切是奉朕的意思才这样的，所以不必担心，不过要逐渐和他疏远。”

后来，湖广总督杨宗仁在奏折中夸奖年羹尧是纯臣，雍正很生气，在奏折上批道：“年羹尧到底是什么人？根据你知道的，如实奏来。纯字可以用在年羹尧身上吗？朕以为不可以。这事一定得保密。”

雍正正在王景灏的奏折上批：“年羹尧这次来见朕，态度非常乖张，好像朕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一样，不知道是他的精神颓败导致，抑或是功高志满目无君上。你虽然是年羹尧推荐的，不必要依附他，朕实在太了解年羹尧了，他没什么能耐的。”

雍正还向李成龙交底：“近日年羹尧擅自作威作福，受贿逞奸，朕很反感。”雍正对宋可进说：“年羹尧很不喜欢你，你要多加防范，不要露出破绽，被他指摘。”

类似的批示相当多，雍正要求这些大臣们和年羹尧、隆科多保持距离，达到瓦解这两人的目的。

以上还只是前戏，真正对年羹尧下手还是将他调离陕西。

雍正二年十二月，写了一份文书，劝说功臣要保全名节：“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

在给年羹尧的朱批中，雍正说：“自从你走后，有人说你立了大功，你的话皇上不好不听从，这人说话不知轻重，朕已经把他关起来了。”

雍正对年羹尧的公开批评是从三年正月的金南瑛事件开始的，年羹尧回到陕西后就让胡期恒弹劾陕西驿道金南瑛。雍正认为年羹尧就是搞朋党，党同伐异，因为金南瑛是允祥和朱轼推荐的，不属于年羹尧派系，所以年羹尧想整他。

雍正三年二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大臣们纷纷上贺表称颂雍正朝乾夕惕、励精图治，年羹尧也上了一份贺表，但不小心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阳朝乾”。关于年羹尧写错字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写成了“夕阳朝乾”，一种是说写成了“夕惕朝乾”，如果是后一种说法，文字的意思没变，语句也通，如果是前一种写法，不仅不通，也是大不敬。

不管怎么说，文字狱只是个引子，点燃了雍正心中酝酿已久的火药。年羹尧辩解说，自己写错了。雍正认为，年羹尧平时没这么粗心，显然是故意这样写的，不打算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到自己的名下。雍正说：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年羹尧自恃功高，有大不敬的意思。

年羹尧的末日就这么降临了，一场错别字点燃的火灾。

年羹尧开始厄运缠身，自己的心腹先后被撤职，先是甘肃巡抚胡期恒被撤职，由岳钟琪兼任。紧接着，代理四川提督纳秦别调回京，由赵坤接手。朝堂之上又开始了站队活动，凡是支持和同情年羹尧的都受到打击。将年羹尧的“同党”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雍正开始收拾年羹尧本人。

四月，雍正让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并调离陕西，前往杭州担任将军，年羹尧写了个折子谢恩，雍正的批复非常有意思，翻译一下大概是：“我听到有谣言说，三江口会出皇帝，嘉湖会变成战场。现在我让你在这里做官，而且你之前的奏折中也谈到浙江省天象之类的，如果你真想自称为帝，这也是天意，我也无法挽回；如果你不肯自立为帝，统领几千兵在这里，你也不会容忍三江口有人称帝……我的心实在寒透了，上天在上，我如果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我，不知上天会如何惩罚你……”

年羹尧到了杭州后，立刻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当时有人劝雍正不要对年羹尧惩治过严，担心激起年羹尧的叛变。雍正对此毫不理会，认为是浅陋之见，确实，朝政经过雍正的铁手调整，已经没有人有资本可以和雍正抗衡了。

墙倒众人推，到了杭州后，官员们纷纷揭发年羹尧，年羹尧俨然变成了肉靶子。雍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皇帝，他把那些揭发年羹尧的奏折全部发给年羹尧，要他回奏。六月，年羹尧的儿子们全部革职发配，老部下也纷纷被株连。

七月，九卿奏请将年羹尧就地正法，雍正没有这么做，而是革去年的将军之职，以闲散章京的身份安置在杭州。此时，年羹尧如同一头待宰羔羊。

雍正正在处死年羹尧的过程中充分地展现了谨慎的一面，考虑到年羹尧是本朝功臣，诛杀他必须动用强大的舆论力量，给世人一种感觉，不是我雍正想他死，而是大家希望他死。

雍正召集各地地方大员，让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应该如何处置年羹尧。大家都是聪明人，急着表功。广西巡抚李绂就说：“年羹尧阴谋叵测，狂妄无礼，擅权已久，大逆不道，法理难容……”田文镜也说应该处死。

九月，雍正下令逮捕年羹尧。又用了三个月罗列了年羹尧九十二大罪，为了表示宽大，雍正勒令年羹尧自裁，父亲和兄弟革职，年羹尧的儿子年富斩立决，其余十五岁以上子女发配到广西、云南等地。

最有意思的是，雍正在令年羹尧自裁的谕旨中居然说：“你自尽后，如果稍有怨恨之意，那么佛教中所谓永堕地狱万劫不复也不能消减你的罪孽。”

年羹尧被杀的首要原因还是他功高震主后不知收敛，仍然作威作福，触犯了雍正的大忌。第二个原因是年羹尧亲信和党羽太多，他们占据一些要职，对皇权构成了威胁。第三个原因是年羹尧聚敛财富，最后抄家从他家里抄出一百一十多万两银子，就年羹尧的职位来说，这么点银子真不算多。但雍正治贪是出了名的，他对贪官也非常反感。

有意思的是，年羹尧案件还牵连到读书人。一个叫汪景祺的人，浙江钱塘人，颇有文才，可惜仕途不顺，便寻思着投靠了年羹尧。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后，志得意满，汪景祺适时提醒他要低调内敛，为此他写了一篇《功臣不可为》的文章给年，对年说功臣不好做，问题就出在皇帝身上，功臣为皇帝平乱，往往会受到猜忌，因为皇帝认为能够平乱的人一定也能作乱；功臣封赏后，常常受到小人的嫉妒和中伤，要是仗着自己的功绩在君王面前提建议的话，往往被君主视为骄横。所以，功臣到最后总是难逃一死。

汪景祺写这篇文章时，年羹尧正逢人生最得意的时候，所以根本没理会汪景祺。后来抄年羹尧家时发现了这篇文章，反倒成了年羹尧的一大罪状。此外，还发现了汪景祺的一首七言绝句，里面有“皇帝挥毫不值钱”的句子，雍正看了后，气得七窍生烟。汪景祺最后被砍头，妻子发配到黑龙江为奴，五族内任公职的亲戚全部革职。

钱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进士，跟年羹尧本来没什么关系，后来看到来年羹尧发达了，就想攀附，为年羹尧写了几首谄媚的诗，将年羹尧比作周朝的召伯、汉代的卫青和霍去病。钱名世甚至鼓吹应该在青海为年羹尧立碑。雍正觉得钱名世简直是一个无耻文人，文人中的败类，但仅凭这些拍马屁奉承的诗，杀了他又不太合理。雍正想出了一

个更毒的办法，亲笔写下“名教罪人”，让钱名世挂在自家大门上方，而且命令所有进士出身的文官每人写一首诗讽刺钱名世，还让钱名世出钱刊印这本诗集，发往各地。雍正这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确实厉害。

威武一世的年大将军就这样走向了人生的终点，论起才干，年羹尧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可惜没能处理好与皇帝的关系。年羹尧也不是非死不可，如果他能知道进退，功成名就之后能够淡泊权力，或许就不是今天的结局。

跟年羹尧犯了相同的错误还有隆科多，雍正的左膀右臂都没能逃脱卸磨杀驴的命运。

隆科多也在黑名单中

隆科多虽然死在年羹尧之后，但遭疑忌还早于年羹尧。

隆科多犯的错误跟年羹尧很相似，都是擅权，但也有所不同，年羹尧还有作威作福飞扬跋扈之罪，隆科多为人低调一些，没那么嚣张。这也是隆科多后年羹尧而死的原因。

很早的时候，就有人说隆科多这人擅权自高，百官对他“莫敢仰视”，唯其命是从——这话听起来就像是离间之语，但隆科多擅权确实是事实，他手掌大权。在康熙朝，隆科多看见皇子一般是单足跪安，到了雍正时候，隆科多看到皇子时站得笔挺。

隆科多显然比年羹尧聪明，他也很早就预料到有一天会兔死狗烹，所以到处留有后路。比如，为了防止雍正抄家，他把财产转移到亲友家里和寺庙里。隆科多从来不相信雍正是真的对自己好，他老早就见识到了雍正的心狠手辣，非常担心有一天轮到自己。聪明归聪明，不幸的是，隆科多转移财产的事被雍正知道了，这等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搞得自己很难堪。虽然雍正没有及时惩治他，但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

雍正二年，隆科多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的职务，步军统领掌握军权，雍正老早就想收回来了，只是不好开口。现在隆科多自己提出，那是求之不得。雍正让隆科多的对头巩泰接替了这个职位。隆科多显然比年羹尧更懂得官场的进退，但是退得还不够，对雍正这样的皇帝来说，远远不够。

在惩办年羹尧的时候，雍正就想把隆科多捎带一起办了，雍正曾

经说隆科多故意阻挠查办年羹尧的官员，还说隆科多跟年羹尧一样贪污欺诈不知感恩，而且揽权结党。他甚至对官员们说：“像隆科多这样的小人，见了他之后完全不必跟他讲礼。”

雍正三年五月，雍正发动大家集体攻击隆科多，到了六月，隆科多的儿子和年羹尧的儿子同时被惩罚。第二年正月，雍正让隆科多去阿尔泰岭，跟策旺阿拉布坦谈判，之后再和俄国使者讨论两国的疆界。在与俄国人谈判中，隆科多坚决要求俄国归还属于中国的领土。就在隆科多谈判之时，雍正隆在隆科多家里发现了“玉牒”，这是记载皇家宗谱的东西，非常神圣，除了宗人府，外人是不能查看的。隆科多私藏玉牒，属“大不敬”之罪。当时有大臣建议雍正等隆科多谈判完了之后再修理他，但雍正觉得外部问题远远没有内部问题重要，下令将隆科多召回，治罪。

隆科多离开后，中方代表不能坚持国家的利益，向俄国作出了许多让步，贝加尔湖一带和唐努乌梁海以北的大量原本属于中国的地区划归俄国。雍正急于置隆科多于死地，显然不想让他在外交中立功，到时候让自己收拾起来不方便。

十月，诸王大臣们给隆科多罗列了四十一条大罪，大不敬罪五条，扰乱朝政罪三条，奸党罪六条，不法罪七条，贪婪罪十六条等。雍正下令将隆科多永久监禁，禁地设在畅春园附近，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当年你隆科多就是在畅春园拥护我起家，知道我太多的秘密，现在我就让你在畅春园终老，让你体会因果循环的滋味。

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隆科多死之前说过这样的话：“白帝城受命之日，既是死期已至之时。”

话里似乎有不少隐情，可惜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这些隐情，隆科多将这些秘密带进了坟墓里。

第四章 政改必须拿着斧头

雍正有一句名言：“遇挫折，当取出丈夫硬心肠，发狠去做。”从雍正的话里，我们能感受到朱洪武的余风，事实上，雍正的许多政治斗争和改革也是以朱洪武为榜样的。

“特务政治”

雍正有一句名言：“遇挫折，当取出丈夫硬心肠，发狠去做。”从雍正的话里，我们能感受到朱洪武的余风，事实上，雍正的许多政治斗争和改革也是以朱洪武为榜样的。

朱元璋创立了锦衣卫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雍正虽然没有创立这么个组织，但也布下了众多的耳目，这些耳目通过密折的方式为他监视臣下的动静。

雍正初年，密折制度主要是用来对付那些倒皇派，后来则主要用于揭发检举贪官污吏。密折跟一般奏折不同的地方在于，密折只有皇上一人能看到。奏折属于正式公文，上面要盖公印，先交给通政司，通政司再转到内阁的手中，内阁最后才转交给皇帝，由于能看到的人太多，很多官员们不方便讲实话。而密折制度则隐蔽得多，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都可以写进去，雍正想用这种制度让官员们互相监督，互不信任，人人自危，从而有效遏制贪污腐败，同时还能将大权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实在是一举多得。

密折制的专利权应该归到雍正老爹康熙的名下，雍正只不过是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已。在康熙朝，密折的作用很有限，到了雍正朝，密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了，而且拥有密奏权限的人也越来越多。

雍正的主要功绩在于将密折制度化、公开化。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制度，呈送密折不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皇帝规定的，只是内容不准对外公开而已。

如何让密折中的这个密字真正发挥效应呢？万一有人泄密怎么办？这个问题，雍正考虑得显然很成熟。他规定，凡是自己批阅过的密折，当事人看过之后要立即交上来，不可以存备份，更不能相互传阅，违规者处以重罚。

为了让写密折的人保密，雍正屡次告诉他们这是一种荣誉，一般人想要没机会，雍正对这些耳目说：“如果朕不保密则对不起你们臣子，如果你们臣子不保密就对不起朕。”这样一来，密折制就起到了笼络人心的作用，让臣下觉得皇上非常重视自己。

还别说，这种密折制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譬如，查嗣庭案子发生后，雍正在李卫的密折中批示，要求李卫带着杭州将军在第一时间抄掉查嗣庭的家，雍正还叮嘱千万不要让人知道。如果雍正用公文的方式告知李卫，很有可能半道被人截获消息，从而让查嗣庭提前做出准备。密折在这种时候就显示出了它的威力，让人防不胜防，从而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将案子侦破。

密折制度最大的漏洞是泄密，秘密一旦泄露出去，而雍正又没有在第一时间得知密折泄密，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譬如，雍正在甘肃提督路振声的密折中表扬了路振声的弟弟路振扬，结果路振声把这事告诉了弟弟。路振扬居然愚蠢地给雍正写了一份密折说，谢谢皇上的赏识。这一下坏事了，雍正非常气愤，痛骂路振声，说他是一介武人，秉性粗鲁，姑且饶他一次。

密折制有好处，也有坏处，两方面雍正都考虑到了。雍正担心一些小臣利用密奏权力作威作福，谋取私利，导致官场混乱。为此，他苦口婆心，再三叮嘱教导那些小臣不要辜负君主的信任，应该公正无私，为国家办事。

为了防止密折造假，雍正还规定了密折纸张的颜色、规格以及外包装的种种细节。在密折制的各个环节，雍正都制定了规范，为了让密折制良好运作，雍正花费了不少心思。

密折制直接将内阁撇在一边，从而削弱了内阁的权力，加强了君权，而且这种制度还制约了封疆大吏的权力。封疆大吏不再只手遮天，由于受到监视，所以事情无论大小都不敢自作主张，只能乖乖地请示皇帝。当时总督、巡抚不能随便弹劾一个小县令，只要小县令为官清廉，总督都没法排挤他，因为皇帝可以通过密折得知事情的细枝末节。密折就像一张法网，雍正将帝国的官僚全部纳入监视范围之内，从而有效地控制整个帝国。但也正因此，他有做不完的事情，所以雍正必须是中国最勤政的皇帝，他不勤政的话，密折制度就办不好。

密折制最大的作用是加强了中央集权，跟朱元璋当年废除丞相设置特务机构起到了相同的效果，但又没有朱元璋做得那么过分，达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所以，雍正说自己继位以后事事不如父亲，只有通达下情，洞悉政务这方面比父亲强。

除此之外，密折制度在官员之间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让他们互不信任，互相监督。

雍正二年四月，河南巡抚参奏学道王某，说他声名虽然平常，但还没有坏到极点。雍正三年六月，岳钟琪参奏年羹尧离开陕西时，只有几十人送行，这些人都是平常得到年羹尧赏赐的人，岳钟琪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了下来。

借助密折制度，雍正有效地控制了官员，如果有谁在背后说他坏话，他很快就知道了。说坏话还是小事情，如果臣子们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官官相护，雍正可以通过密折了解到详情，从而给不法官员以潜在的震慑，让他们不敢为所欲为。

当然，密折制度本身并不光彩，说白了就是告密，它充分利用了人性阴暗的一面。在雍正推广密折制度时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密折制度会让小人得志，君子遭诬陷。

对此，雍正无法回避，他公开承认这确实具有告密的特征，他说：“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雍正的耳目绝不仅仅限于官员，还有一些士兵和无业人士。有一个故事最能说明问题，有一个官员要觐见皇帝，头一天买了个新帽子，第二天见皇帝时，免冠谢恩。雍正笑着说：“小心点，别弄脏了你的新帽子。”

官员王云锦在元旦那天跟好友玩叶子戏，中途丢了一片叶子。上朝后，雍正问他元旦干什么去了，王云锦如实回答。雍正听了非常满意，说他小事都不欺骗皇帝，是个好臣子，不愧为状元郎。说完，雍正从袖子里抽出王云锦丢失的那片叶子：“给，下次玩得开心点。”

雍正耳目虽然相当多，但他并不会完全相信耳目。他很清楚，耳目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时也会欺骗自己。至于如何识别真假，雍正凭借的就是自己的阅人经验了。

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雍正一生批了上千万字的奏折批文，这绝对是可以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神秘的军机处

在雍正之前是没有军机处的，怎么雍正偏要弄出这么个玩意儿，他的真实目的何在？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军机处是个什么东西。

在康熙朝后期，由于党派太多，聚讼纷纭，导致朝纲混乱，管理

困难。雍正即位之后，实际上接受的是一个混乱的摊子，各种问题纠缠在一起。大凡军国大事，都需要集体讨论，虽然最后的决策权在皇帝手中，但皇权仍然受到制约，不能随心所欲。

雍正七年，策旺阿拉布坦再次发动叛乱，为了有效地打赢这场战争，雍正决定成立军机处，由允祥、张廷玉和蔡廷锡负责军机处。军机处的全称是“办理军机处”，当时大臣们并不了解军机处的真实性质，不知道雍正干吗设立这样的机构。

雍正设立军机处表面上是为了更好应对军事变故，但其性质跟密折制是一样的，削弱大臣们的权力，一些军国大事由军机处秘密决策，等于是剥夺了大臣的议政权力，由皇帝直接裁断，进一步地加强了皇权。

军机处成立后，其人员由皇帝点名，代表的自然是皇帝的意志。

军机处的发展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个机构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说明雍正的创造还是符合时代的需求的。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这些大臣主要是从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议政处中挑选。军机大臣相当于雍正的私人秘书，他们必须随时在皇帝身边，只要皇上有什么急事要事就会找他们商量。所以，军机处就设在乾清宫内，离雍正的寝宫养心殿很近。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承认军机处是正式的衙门。

军机处的上班时间非常变态，凌晨三点就开始上班，雍正至少每天召见军机大臣一次，有时一天好几次。

军机大臣的主要职责有：

一、皇上发诏书或者回复奏折时，由皇上口述，军机大臣书写，然后转发下去。

二、当皇上碰到难以决策的事情时，军机大臣提供意见和建议。

三、军机处要将各种奏折以及皇上的朱批都弄一个副本，妥善加以保存。

军机处的设立表面上是这个机构分享了其他机构的权力，但其实质是皇帝分享了臣子的权力。军机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三个人，而且这三人都都是兼职，以后有所增加，但最高峰不超过十一人。军机大臣都是兼职，没有专门担任这个职位的人。

军机大臣一个重要的品质就是保密，绝对地保密。军机处的办公地点与外廷隔绝，就是为了防止外来人员进入。军机处的办公地点也

是灵活的，如果皇帝在圆明园居住，军机处跟着搬到圆明园。如果皇帝要巡游，军机大臣也要跟着走，不能耽误办公。

军机处刚刚创建的时候，既不是正式的衙门，也没有印章，雍正十年，才有提议给军机处印章。印章制成后，交给内奏处保管，印匙由领班军机大臣随身携带，“军机处”三字金牌由值日章京佩戴。如果需要军机处的印章，值日章京必须凭借金牌到内奏处领印章，光金牌还不够，还得凭借金牌向领班军机大臣那里索要印匙。到了这一步，还不能私自打开，必须要在多人的监督下，才能打开印匣，取出里面的印信。印信用完后，金牌交给领班章京，印匙归还领班军机大臣，印信重新归放到内奏处。

这一套制度非常繁琐，但也相当严密，可见雍正的良苦用心。

雍正没有想到的是，军机处居然比自己想象的效果还好，军机处办事效率非常高，因而不断完善，形成了固定的编制。军机处的创立影响了清朝后来的整个历史，由于军机处掌握重权，从而让内阁形同虚设、议政处名存实亡。

雍正简直是一个专制天才，他用自己的“智慧”将君主专制推向了顶峰，大有超越朱元璋之势，事实上也确实超越了朱元璋。

雍正的一系列措施很容易让人想到朱元璋，但是他跟朱元璋仍然不尽相同，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取消丞相，虽然也是中央集权，但是朱元璋忙不过来，只不过找几个大学士做顾问，由于不是皇帝身边固定的领导班子，办事效率不高。而雍正设立军机处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光加强了皇权，也提高了行政效率。

所以，在集权这块，雍正超越了朱元璋。

纠正社会不正之风

雍正元年，实行了一项重要的改革。

在封建王朝中，有一个行政衙门叫六科，在这个衙门里做官的人叫给事中，这个官职最早是秦始皇设置的，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个职位虽然官职不高，在隋唐时是正五品，明朝时更低，才正七品，到清朝时，满人给事中是正四品，汉人是正七品。

给事中的主要任务是传达皇帝的命令，并检查下面的执行情况。具体说来，六科的任务是将皇帝批阅的奏章从内阁取出，然后重新抄写一遍，分发给相关部门。六科不仅有转发奏折的权力，还有驳回

权。如果六科发现皇帝的命令有欠妥的地方，可以将文件封好，重新打回内阁。除此之外，六科还有检查六部的权力，如果他们认为六部执行不力，可以参奏。所以，六科虽然职位不高，但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雍正看来，六科的权力太大，影响了自己的行政效率。雍正想到一个法子，让六科变成都察院的一个附属机构，首先六科的人选由都察院来决定，并且严格规定了各科的给事中数目。六科的题本都要盖上都察院的印信，这等于是把原本属于给事中的考核权交给都察院，这样一来，给事中就不得不生活在都察院的卵翼之下，职能被削弱了大半。

雍正的这项改革等于是把给事中和御史混合为一，雍正的这个做法在当时又被称作“台省合一”，所谓台是指御史台，都察院在唐朝又叫御史台，省指的是门下省，门下省是之前的说法，在明清时都称六科。

雍正这么做的目的，还是四个字，大权独揽，让自己的政令更好地传达和执行。明末党争的教训，雍正仍然牢记在心头，明朝的灭亡跟言官乱政有很大的关系，清初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在康熙后期的储位之争中，六科官员仍参与其间。雍正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决心改变这种情况，限制六科官员，防止他们干涉朝政。

在削弱给事中权力的同时，雍正加重了御史的责任，御史的权力也许不意味着比以前更大了，至少他们要做的事情更多了，更多的时候，雍正把御史当成钦差大臣来用。对雍正来说，御史就是自己的监控器，他增加御史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监控和弹劾不法官员。

雍正还做了另一项前无古人的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不是很有名，也没有收到特别好的效果。

雍正脑子里凭空想象出了一个“观风整俗使”官职，雍正是如何想出这么个奇怪的官职呢？

这还得从浙江人说起，浙江的文化是相当发达的，才子众多，但也有一些弊端，浙江等江南人士结成朋党，垄断科场，浙江籍的官员遍布朝野，宾客散布在各个衙门中。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而且两人文采都不错，他们的案子让雍正产生了感触，他再联想到欧秀臣为允禩造势，杭州又发生了摊丁入粮的运动，所以浙江人在雍正心里的印象非常差。

雍正四年八月，浙江巡抚李卫上奏说浙江人刁滑，风俗凶悍，动不动就漏报钱粮，时常发生命案。雍正觉得浙江省风俗败坏，人心浇

漓，民心很难被圣德感化，倒是狼子野心很容易在那里找到共鸣。十月，雍正决定派遣官员到浙江查问风俗，对官民进行劝导。确定了官员之后，到底用什么官名呢？雍正一时也没想到合适的，后来吏部建议说，唐太宗在贞观年间派遣李靖巡行天下，号“观风使”，我们不妨取名为“观风整俗使”吧！

雍正接受了这个建议，任命河南学政王国栋为观风整俗使，让他与李卫和袁共济，治理好浙江。王国栋到了浙江后，召集各地的文人绅士到孔庙中训话，除了做思想政治工作，王国栋还负责清查钱粮，王国栋办得还不错，到任不到半年就被提拔为湖南巡抚。

雍正在其他省份也设置了“观风整俗使”或“宣谕化导使”，效果不如王国栋在浙江省做得那么好。

修订法律

历朝历代，修改法律可是一件大事情。中国古代有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说法，但对于雍正来讲，这种思想包袱是没有的，他的执政原则是：凡是有利于统治的他都做。

清朝的法律基本是把明律直接搬过来用，大约在顺治三年制订。在康熙朝，法律有所改动，但改动很小，当时是以《现行则例》的名字颁布执行。

雍正元年，御史汤之旭指出《现行则例》有一些缺点，譬如，它拟罪轻重不一，有时候犯法的事情相同但是处罚却不一样，所以需要重新作一些修改。

对于合理的建议，雍正从来都是采纳的。他让吏部尚书朱轼负责修改法律，对法律这事雍正很重视，一字一句都要亲自过目。

对法律的修改，关于盗贼的比较多。康熙年间，窃贼、逃人以及窝藏逃人的主人，都处以割脚筋的刑罚。雍正认为，这个刑罚将受刑者变成残废，无异于破坏了生产力，应当谨慎使用。第二年，经过仔细考虑后，雍正认为这个刑罚受刑的人太多，没有区分其中的轻重，也起不到警戒的作用，下令永久废除。

雍正六年，修改盗窃法，奴仆如果偷了主人的东西，按照一般平民盗窃罪论处，免掉在脸上刺字，仅仅处以流放罪。雍正认为直隶省盗贼猖狂，为该省量身定做了一款法律，作案盗贼团伙不分主次，全部正法。直隶盗贼案减少之后，雍正又取消了这个特殊条例。

对于一些法律的修改，雍正表现出了他非常人性化的一面。清朝秋审时，本来把案件分成情实、缓决、可矜、可疑四种，第一种是立即执行死刑的，后面三种还需进一步审理和查看。康熙五十年以后，对于死刑犯实行了酌情处理，如果死刑犯的高祖、曾祖、祖父母或者父母有七十以上的而且有疾病需要抚养的，家里又没有其他成年的男丁，可以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由皇上决定是否处以死刑；如果是流放罪，改为杖打一百，然后回家养育亲人。

雍正继位以后，进一步将康熙的人性化处罚发扬光大，他规定，杀人者首先要赔偿足够的银两，其次才涉及偿命的问题，如果不赔钱的话，等于是让受害者没有物质上的补偿，应当立即正法。对于犯有流放罪的犯人，雍正从轻处罚，杖打一百，让他们回家赡养父母。

雍正十一年，制定了一个更人性化的法令。如果丈夫不小心把妻子打死了，而他的父母都已亡故，没有人承袭香火，可以将案犯关上两月，打四十大板，留他们回家保留香火。

在江西永新县发生了一起有意思的案例，有个叫朱宁三的农民，是个盗贼惯犯，有一次因为盗窃被抓，他的哥哥朱伦三不得不卖掉儿子为他赔偿。朱宁三仍然屡教不改，后来偷牛又被抓，朱伦三便和侄子朱三杰把朱宁三淹死。案发后，刑部判朱伦三流放罪，朱三杰则坐牢。雍正对这个判法很不满意，他认为朱宁三是连累家族的罪人，朱伦三和朱三杰为了家族利益和社会安定处死朱宁三，实在是情非得已，为宗族剪除恶人，训诫子侄，用家法来治理也不为过。所以，雍正决定将朱伦三和朱三杰无罪释放。

在福建建安县有一个叫魏华音的乡民，偷割别人的稻禾，还将已故的哥哥独生子勒死，然后嫁祸于人，企图逃脱自己的盗窃罪。刑部拟罪时，打算按照长辈杀死晚辈的罪论刑，在封建社会，为了照顾尊长，法律规定，长辈害死晚辈可以减刑。但看到这个案子，雍正极不赞成，他认为魏华音虽然是死者的叔叔，但此人的凶狠歹毒已经超越了伦常，所以不能按照尊卑长幼来论刑。像这样的案件，过去都没有现成的例子，雍正要想重新判，必须修改法律，对于这种情节恶劣的，雍正裁断后处以绞刑。雍正对法律的修改考虑得比较全面，既照顾到长者的权威，又不纵容长辈为非作歹，让法律显得更合乎人性。

当然，雍正的有些改革跟现代的法律精神是相违背的，不过有当时的社会需要。譬如，他规定犯有死罪和流放罪的人，不论官民，只要情节不是很恶劣的，都可以捐银买命。买命钱不是确定的，跟各人的身份地位有关。三品及以上的官员需要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需要五千两，五品六品的官需要四千两，七品及以下包括进士、举人的需要

两千五百两，贡监生两千两，老百姓一千二百两。如果是充军流放罪，则根据上面的标准乘以百分之六十；如果是徒刑及以下的罪，根据死刑的标准乘以百分之四十。

雍正制定这个刑罚的时候，西北正在打仗，急需军费。这项法律大大地增加了军费，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雍正之后，清朝战事仍然很多，乾隆有十大武功，后来又有太平天国、鸦片战争，所以，这项法律一直保存了下来。

说实话，雍正本人也知道这个法律跟法律精神是相违背的，所以在实行的过程中他要求从严把握，对于那些情节恶劣影响极坏的人，再多的钱也买不了命。

雍正虽然是一个非常严苛的皇帝，但是执行还是相对公平的。对死刑犯的判决，雍正表示要慎重。雍正规定，对于秋审后情实的犯人也要三次重奏，最后由皇上裁决要不要处决，在一些细节问题上，雍正往往能做到明察秋毫。

雍正是一个对司法非常敏感的皇帝，这可能跟他深沉严苛的性格有关。他对各种案子也很有兴趣，在研究命案的过程中，他发现故意杀人和谋杀的占少数，大多数的命案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引起，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果酿成了命案，事后，当事人也后悔。雍正认为这都是因为老百姓无知，不懂法律，考虑到法律条文的繁琐，老百姓文化层次又低，雍正让地方官把殴打杀人的律例摘录出来，贴在乡里，并派地方官详细讲解，务必让大家都知道法律是怎么回事。

从上面的事情可以看出，雍正是一个务实的皇帝，虽然难免严猛了一点，但这丝毫无损于他执政为国的名声。

第五章 搞经济改革一定要精打细算

一般来说，新皇继位的时候，都会表示豁免官员的亏空。但雍正再次吃螃蟹，拒绝这么做，以示自己对贪赃枉法深恶痛绝。雍正解释说，豁免官员只会助长贪官污吏的侥幸心理，从而让他们越陷越深，只有严厉打击才能遏制腐败。

亏欠多少补多少

康熙后期，贪污腐败成风，人民和国家的财产被官僚机构鲸吞，在康熙末年，国库只有七百万银两。在雍正继位之前，由于实地调查过这些问题，事实上已经了然于胸。

雍正继位之后，立即大力实行经济改革。

一般来说，新皇继位的时候，都会表示豁免官员的亏空。但雍正再次吃螃蟹，拒绝这么做，以示自己对贪赃枉法深恶痛绝。雍正解释说，豁免官员只会助长贪官污吏的侥幸心理，从而让他们越陷越深，只有严厉打击才能遏制腐败。

上任一个月后，雍正就要求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问题，一旦发现亏空，三年之内要如数补交完，而且不准从民间征收苛捐杂税。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补足亏空，将治以重罪。补完亏空之后，如果以后还出现亏空问题，也治以重罪。

为了有效地查清亏空问题，雍正元年正月，发出设置会考府的命令。雍正把整个任务交给允祥，并对他说：“如果你不能清查，朕就另派大臣，如果大臣没有能清查的，朕就亲自查出来，绝不留漏网之鱼。”

以前各部动用的钱粮，都是自行奏销。成立会考府后，这么做就行不通了，一切钱粮奏销都要经过会考府的稽核，徇私舞弊的难度比以前陡然增加了不少。会考府成立三年，驳回的奏销事件占总事件的百分之十七。

允祥查出户部亏空库银二百五十万两，这亏空的钱如何收回来呢？这种问题也许能难倒别人，但不在雍正的话下，雍正命令户部历任官僚合赔一百五十万两，剩下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填补。在清查

中，难免涉及皇亲国戚和高官巨宦，对此，雍正一视同仁，绝不徇私。十二阿哥允禩以前掌管过内务府事务，为了补足亏空，居然把家里的东西拿到街上去卖。十阿哥允䞿补偿亏空，赔了几万金，还没补足，雍正直接抄了他的家。内务府官员李英贵和张鼎鼐挪用百万两银子，雍正也径直抄了他们的家。

在清查亏空的过程，雍正抄了太多的家，也因此落下了“好抄家”的骂名。

亏空先是从中央的部门查起，不久就开展到地方，许多官僚的家产被查封，譬如：湖广布政使张胜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广西按察使李继谟、江苏巡抚吴存礼、原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布政使李世仁……还有我们熟悉的曹寅和李煦……

在抄家这方面，雍正俨然是个专家，但是仍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譬如：通政司官员钱以垵建议雍正正在抄家的时候，同时抄衙门，以防止官员将财物转移到衙门里。雍正觉得这个建议不错，欣然接受。雍正抄家确实出了名，当时社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打麻将时都有了“抄家和”。

对于这些不满的舆论，雍正没有回避，而是坦然地说：“如果听任贪官敛财，将国家人民的财产肥自家子孙，那么国法何在？又如何警示人心呢？抄了贪官的家，既是对贪官酷吏的惩罚，又可以利用这些钱作国家公事之用，有何不好呢？”

一般被抄家的官员都会被革职，这又是雍正与众不同的一个措施。以前官员还可以留任，补足亏空。雍正有自己的看法，如果允许贪官留任，为了弥补亏空，他们必然会继续贪污。雍正打击贪官的力度是非常大的，雍正三年，湖南被参劾的官员超过一半。十年，担任直隶总督的李卫上奏说：“在任三年以上的官员寥寥无几。”

为了有效地收回赃款，雍正想了许多别出心裁的法子。譬如，他命令贪官的亲戚代为赔偿。雍正认为，很多贪官喜欢把赃款存放在亲友家里，而且这些人平时也参与分赃，要他们代为清偿，合情合理，所以连这些人的家产都有被抄的可能。不过，这个措施牵连太广，不得人心，四年之后，雍正就把它取消了。

在征讨赃款的过程中，雍正还禁止代偿。雍正元年正月，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该省官员帮助前任总督补清亏空，雍正坚决不同意，他说即使地方官民再富裕，钱多得没处花，也不能为他人补漏洞，有钱大可以为地方兴利。雍正看到代偿存在很大的弊端，很容易成为腐败的温床，譬如地方官可能借助代偿和当地乡绅勾结，也有可能借机征收老百姓的钱粮。

在清查亏欠的过程中，难免有许多官员畏罪自杀，对这些畏罪自杀的官员雍正反而加重处罚力度。

雍正四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参奏李滨亏空钱粮，李滨得到消息后就自杀了。雍正并没有因为他自杀就这么算了，自杀的官员不少，但雍正一个也没放过。他说：“犯官知道官职和财产保不住了，想一死了之，来个死无对证，然后把赃款留给子孙。我们决不能让犯官的狡计得逞，犯官死了，要继续拷问他们的家人和亲友。”

应该说，雍正的政令还是执行得不错的，但对于雍正这样的人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由于他以前深入官场一线，了解官员们的所思所想，他知道一些官员依然在敷衍自己，所以采取严猛的手段进行全国清查。

在清查的时候，雍正非常严厉，但是结案的时候，相对宽松，这是一种统治策略，让官员存着感恩的心理。

雍正的严猛手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清查工作进行了三年，各省清偿了一部分亏空，有的省做得更加彻底。譬如直隶总督李维钧在二年八月报告，说该省亏空四十一万两，到本年六月已经偿还了二十万两，剩下的二十一万两明年保证还清。

河南的情况也很不错，雍正二年，田文镜担任河南布政使，不久就升任为巡抚。田文镜深受雍正信任，他到任后，立即清查亏空，田文镜执法甚严，对贪污官员毫不容情。田文镜在任不到两年就弹劾了二十二人，补清了亏空。

对于田文镜雷厉风行的作风，雍正很欣赏，雍正说：“田文镜参劾的官员最多，鄂尔泰风格则完全不同，从来不轻易弹劾人，但两人都有自己的绝招。”田文镜因为工作出色，雍正将他捧为模范督抚。

雍正四年，大规模清查江西的钱粮亏空，江西各地亏空甚多，但是巡抚却偏私，清查不力。雍正让巡抚留在任上，派人去调查，随后换上新任的巡抚伊都立，但伊都立“为人软弱，好沽虚名”，无法完成清查重任。雍正遂又让吏部侍郎迈柱亲自到江西清查，迈柱到了以后，遭到了江西按察使积善的反对。雍正却高度赞扬迈柱，说他到任以后，为了国计民生，不避嫌怨，是个好官。

雍正五年，福建布政司沈廷奏报仓谷亏空，雍正对福建巡抚毛文铨很生气，认为他故意欺瞒，派广东巡抚杨文乾和许容为钦差大臣，前往福建调查。杨文乾和许容带来上谕：“清查即将进行，可能有赃官为了掩人耳目借富民的粮食暂充府库，如果有人借的话，借出的立即成为官家财产，发现后也不归还，希望大家好自为之。”

在清朝的法令中，挪移公款的处罚较轻，而贪污受贿的处罚则较重。所以，许多官员被查出有贪污情节时，往往巧施手腕，将贪污的赃款报成是挪移，以此避重就轻。雍正对这些官员的所作所为和心理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他明确说道：“借挪移之名，掩盖贪污之实，想以此逃脱重罚。那朕就跟你们来个将计就计。”

结果，雍正铁手一挥，挪移的罪比贪污的罪反而更重。由此可见，雍正做事不拘泥于教条，注重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耗羨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大家知道，古代主要是以银子和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和铜钱在保存、熔铸、运输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损耗，所以在征收时有一定的附加税。这个附加税又称为耗羨或者火耗，这个附加税通常由地方征收，被纳入地方财政，算是地方上的一个额外收入。

由于耗羨的数目没标准，所以主动权就掌握在地方官的手中，他们往往随心所欲地征收，借此增加百姓的负担。雍正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刚即位的时候，雍正就说了：“现在钱粮火耗越来越重了，重到每两增加四五钱银子，如此剥削民脂民膏，国法何在？”

在康熙朝的时候，就有人建议耗羨归公，但是康熙没有采纳，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可能跟康熙的宽仁性格有关，他不想得罪普天下的官吏。雍正元年，湖广总督杨宗仁再次提出这个建议，杨宗仁说：“地方上的公款消费，都是从小民那里勒索过来的。不如让各州县在原来的耗羨银里面节省出两成，交给布政司库房，充作公费之资，此外禁止派增其他税收。”

雍正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同年，山西耗羨问题严重，雍正要求山西的耗羨银全部归公，一部分抵偿该省的亏空，一部分用作官员的养廉银。

雍正二年年初，河南巡抚石文焯奏称：“河南省有耗羨银四十万两，除了公款支出和官员的养廉银，还剩下十五万两，这十五万两可以用来弥补亏空。”

山西和河南两省率先拉开耗羨改革的序幕。雍正觉得时机到了，就让朝臣议论这项改革。大多数官员并不赞成，他们提出了一些看似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比如，有人认为耗羨是各州县应得之物，跟上面没关系；还有一种说法是把以前不是正税的火耗当成是正税收入，让人感觉是增加赋税；更有一种荒谬的说法认为，如果公开征收火耗等

于是让火耗这种私征形式合法，简直就是鼓励官员贪婪。

官员们的说法貌似有道理，其实背后有利益链条，所以他们反对这项改革。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却对雍正的改革表示支持，他说这样做不仅不是鼓励官员贪婪，而且可以避免官员征收苛捐杂税，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分出一部分充当养廉银，可以让百官感受到皇上的恩赐。

尽管如此，官员中反对的声音还是更多。最后，雍正下了决断，批评反对的官员目光短浅，强调火耗归公势在必行。

这项政策实行以后，与之相伴随的就是养廉银，养廉银的目的是增加官员的额外收入，让他们有足够的 ability 过上小康或者富裕生活，杜绝贪污受贿的念头。

明清两朝，官员的俸禄很低，低到甚至无法应对官员的正常开销。雍正创立养廉银制度也是意识到这一点，耗羡归公后，断绝了地方官的财路，如果不给他们另外开辟一个财源，他们不可能不贪污，因为没有人会贴钱做官。

养廉银根据官职的高低分为不同的级别，最高有几万两，最低只有几百两，一般而言，养廉银高出俸禄十几倍。养廉银制度解决了地方各级官员的经济问题，但是京官问题却没有解决，地方官照例还得向京官送礼，雍正对此也是清楚的。为了解决京官的经济问题，雍正决定实行双倍俸禄。

清史学家孟森注意到养廉银制度已经具备了近代政府财政预算的前瞻性，夸奖雍正为改革吏治绞尽脑汁。

有史以来，中国官场的陋规就相当多，这些陋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对王朝的统治非常不利。向上司送礼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陋规，如果上司身兼数职，下属就必须送好几份礼物。山东巡抚黄炳向雍正建议，应该废除这些陋规，他说巡抚一年收的礼，比养廉银要多出好几倍。如果不消除陋规的话，各级官员肯定还会给上司送礼，一送礼无疑又得加派赋税，到时养廉银制度并不会养廉。

雍正觉得有道理，下令废除陋规，当然要废除陋规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能慢慢来。在这方面，河南巡抚石文焯做得比较好，他知道如果陋规不除，下级官员还会加派银两，所以拒不收礼，而且还 将各级衙门的一切陋规全部废除。田文镜继任后，比他做得更好，他不仅自己不收礼，还严格约束家人和下人，连门包和小费都一概拒绝。当地有一个惯例，逢年过节都会向上司送上土特产，这种惯例又 称为土例，但田文镜一概不收，也严禁地方官收礼。

对于那些贪恋陋规的官吏，一旦发现，雍正就会严加处理。雍正五年，御史博济到了江南后，勒索驿站送礼，江南总督范时绎参奏之后，雍正立即将博济革职。对于那些守着陋规不放的官员，雍正打击起来毫不手软。

反对陋规之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虽然我们不能说雍正完全赢了，但他至少跟贪恋陋规的官员打成了平手。可惜，到了乾隆手中，陋规又故态复萌，而且越来越严重。

在官场中，为了有效遏制贪腐行为，雍正不仅重拳打击贪官，而且实行株连政策，连贪官的上司一同受到惩罚。雍正意识到，下属犯罪跟上司的纵容或者监督不严有很大的关系。雍正这招虽然有些过火，但确实很有效果，为了防止受株连，上级官员必定会约束下级官员，以防他们影响到自己的仕途。这个建议最早还是田文镜提出来的：“要想禁止各州县的加派行为，首先要禁止上司，只有禁住了上司，才能消除陋规。”

为了有效地根绝腐败，雍正还加强了对中央官员的约束。以前，地方官向户部缴纳钱粮时，每一千两银子要多交二十五两的“余平银”，雍正意识到这是产生腐败的一个温床，刚上任的时候就下令削减十分之一的“余平银”。

后来，允祥又建议雍正彻底取消“余平银”和“加色银”这些灰色收入，雍正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批准，肃清了官场歪风。

在当时也有假币，针对假币的泛滥，雍正同样以严刑峻法禁止民间私自铸钱。为了有效地打击铸钱业，雍正要求各省督抚要秘密查访，一旦发现，要给予严厉打击。知情不报者与案犯同罪，不知情的地方官也要连降三级，甚至铸造假币附近的邻居无论知情还是不知情也要枷锁一个月，杖打一百，流放一年。

在封建社会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譬如火耗这种东西应该由所有纳税人来承担，但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一些地方官也是势利眼，他们不敢得罪当地的富绅，往往把火耗转嫁到小民身上，从而使小民的负担更重。这种不平等造就了政府、绅衿、小民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雍正认为，这个矛盾错在绅衿，决定剥夺他们的特权，让他们跟平民百姓一样，实行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

元年，在河南实行“士民一体当差”政策，引起了河南的一些生监的不满，河南的一些生监在县学教官杨倬生的带领下，控告知县张可标。雍正查实情况后，将那些闹事的生监绳之以法，表彰知县身体力行推行新政策。

摊丁入亩

封建社会一向是按人丁交税的，有多少人头交多少税，看似非常公平合理。但仔细一看却发现不是这样，里面有很多不确定不可控的因素。

许多人为了逃税，故意隐藏人头数目，这种事情在地主家里最为严重，地主良田多，丁役多，交的税多，隐藏丁役就能逃不少徭役。

很早就有人意识到这种徭役制度不合理，在明末的时候，就有一些地方官吏进行了改革。比如，崇祯八年，汉中府城固县实行了“丁随粮行”的新法。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在康熙年间激起了下层的反抗，无奈之下，康熙颁布一项政策：以后增加人丁，永远不加赋税。

康熙的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矛盾，但仍然不公平，以前丁役不均的情况仍然存在。随着人丁的增加，平均摊到每个人身上的赋税相对减少，如何重新计划丁银便陷入了混乱之中。解决这个问题一劳永逸的方法是按亩收税，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你家有多少亩的地，就交多少的粮。这个办法确实好，是由御史董之燧提出来的，但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最后，雍正决定先在几个省份试行，结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即使这样，朝廷中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山东巡抚黄炳支持雍正的改革，他认为这是缓解民困最有效的方式，作为一个体察民情的封疆大吏，他感到按丁纳粮很容易造成贫民逃亡，如果摊丁入亩，有地的交税，没地的就不用交，可以减少贫富差距，这才是善政。

可惜由于朝臣反对过多，雍正并没有立即接受黄炳的建议，甚至责备黄炳轻率，让他管好自己省内的事情就行了。一个月后，直隶总督李维钧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李维钧还解释，这项改革肯定会招致那些大地主的反对，他们田地多，交的税肯定多，所以不乐意。

雍正又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再次交给户部讨论，意见纷纭。有人说按亩分摊同样不公，因为很多地方土地测量并不准，而且地有好坏之分，好的地产量高，不好的地产量低。这些也是实情，不过李维钧也有办法，他说把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根据地的质量来交税。雍正听了，大为赞赏，他让李维钧去办这事。

后来，李维钧对雍正说，他受到一些权势的孤立，怕事情办不好。雍正对他说：“你放心地去办吧，有朕支持你就够了。”

历时半年的摊丁入亩讨论终于结成正果，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康熙

年间就提出来，但一直悬而未决。由此可见，在办事和改革这块，雍正确实超越了父亲。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浙江官员在推行这项改革的时候，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反对，他们聚众到衙门口喊冤，巡抚法海居然惊慌失措，被这些人吓住了，表示暂不实行改革，可见改革难，推行改革更难。

雍正四年七月乡试时，浙江钱塘县上千富绅来到县衙，抗议摊丁入亩，他们还劝说商人罢市。对此，新上任的巡抚李卫没有妥协，采取了铁腕手段，制服了阻挠改革的闹事者，最终让这项改革在浙江省顺利推行。

在这方面，河南巡抚田文镜办得也相当不错，李卫、田文镜这些人在雍正朝都受到了重用。之后，各省陆续实行摊丁入亩政策，效果一天比一天显著。当然，这项改革的全面完成还是在乾隆朝。

摊丁入亩是一项惠国利民的政策，富人交的税多，穷人交的税少，跟现在的税收政策类似，我们再次看到了雍正的前瞻意识。

当然，这项政策的最终受益人还是清政府，有田的交税，就避免了无田者交不起税这个问题，税收有保证，国库也充实。有些人认为这是取消了人口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只是将丁银并入到田地之中，换了一种更加合理的收税方式而已。

摊丁入亩是中国赋税史上一项重大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理民间欠粮

如果说雍正之前的改革让官僚们的日子难过，那么眼下这个改革就让老百姓叫苦了。

清理积欠是指向民间的一个政策，而且重点是放在江南地区。江南最富庶的省份是江苏，江苏每年缴纳的税银超过三百五十万两，在全国各省中排名第一。在江苏省中，缴税最多的是苏州、松江、常州三府。赋税越重，欠的也就越多。

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十二年中，江苏积欠税银八百八十一万两。雍正上台之后，可没有康熙那么仁慈，这笔钱他是一定要拿回来的。江苏巡抚张楷请求给江苏十年的时间还清这些钱，雍正答应了他。后来，雍正发现张楷的话是空话，对江苏的印象更差，要求严厉整治江苏官场。

六年，雍正派遣户部侍郎王玘和刑部侍郎彭维新带领四十多名候补官员来到江苏，到各州县清查积欠。他们的任务是在一年之内追回全部积欠，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仅苏州府就关押了一千多人，结果，整个江苏省人心惶惶，有混乱的苗头。雍正一看，认为不能把事情闹大了，便要求停止追查，先查官场上的人，民间拖欠的，以后再处理。

到雍正九年时，清查工作才结束，从康熙五十年到雍正四年，江苏总计欠银一千零十万两，其中被官吏和豪族侵蚀的有四百七十二万两，接近一半。雍正决定，官吏和豪族欠的在十年之内还清，民间欠的在二十年内还清。

福建省的积欠要少很多，只有四十四万两，其中民欠的有三十三万两。雍正也派遣钦差大臣专门处理此事，在福建，积欠和亏空同时处理。后来，福建省出现了灾荒，民间欠收，雍正格外开恩，不再追究积欠。

山东省的积欠相对较多，有三百多万两，这笔钱直到雍正死还是三百多万两，乾隆即位之后，免除积欠，山东人民欢呼。

各省都有积欠，数量却有很大的差别。积欠者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官僚，有大地主，也有中小地主，还有自耕农。在清查积欠的过程中，雍正也区别对待，官吏的属于侵欺、地主的属于包揽、平民的属于民欠。雍正打着惩治贪官污吏的幌子执行这项政策，其实是掩人耳目，在积欠这事上，民欠的数额最大，所以这项政策的主要对象还是平民。

当时很多人逃税，逃税的方式是隐瞒田产。对此，雍正是无法容忍的，他接受田文镜的建议，在河南率先推出自首隐田政策。所谓自首隐田政策就是鼓励民间自首，报出自己隐藏的田产，只要你自首的，以前隐藏的税粮不用交，对于失于考察的官员也不查办，从今以后，你按规定缴税就行了。如果不自首，结果却被发现了，那就要进行严厉惩治。

这个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跟田文镜的大力执行有关系。雍正所作的这一切，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加清廷的财政收入。

货币政策

古代很多皇帝不懂经济，雍正可能是一个例外，雍正当然也没有学过什么经济学，只不过他是一个细心的人，平时喜欢思考，在实践

中摸索出了一些独到的经验。

清朝跟其他朝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非常明显地排斥商人，这跟商人对清朝的江山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因此，清政府始终把商业看成是财政的一块大蛋糕。

清朝商业相对比较发达，所需要的货币就更多，当时很少有纸币，主要是铜钱、银子、黄金。最主要的流通工具是铜钱和白银，不过当时铜矿严重不足，导致钱币很少，流通出现了困难。根据供求关系，这势必导致铜贵银贱的现象。本来，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一两银子值一千文铜钱，但实际上换不了这么多。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导致货币的混乱，雍正也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雍正九年，京城钱价昂贵，户部尚书建议国家出钱，用九百五十文换一两银子，等以后经济发展了，就用一千文兑换。这其实是调整比例，努力做到一两银子值九百五十文。可惜，这个数字跟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当时一两银子大概只值八百多文。

任何时代都会有假币，尤其是在钱不够用的时候。古代铜钱并非全是由铜制成，通常会混合一定比例的铅。加入铅之后，钱就更坚固，拿在手里也更沉一点，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这点。康熙制造的铜钱铜与铅的比例是六比四，质量相对较高，雍正制作的钱比例是五比五，质量相对较差，而且上面的字明显更模糊一些，看上去有些像假钱。这无疑给制造假钱的人机会。

当时的假钱也是用铜做的，不过很轻，质量也很次，铸字更加模糊。当时有一种沙板钱，里面铅多铜少，比官方的制钱要小，更薄，上面有许多小砂眼，所以叫做沙板钱。这些劣质的假钱，在一千文中掺入三四十枚，居然可以合法地通行。

当时由于铜钱短缺，造假钱有暴利，如果不遏制这股不正之风，货币市场就会陷入混乱。雍正二年，沧州步军统领衙门查获了刘七等人的铸钱案。

私铸钱扰乱货币市场在当时显得尤为严重，因为清政府垄断了造钱业，所有铜矿都不允许私人开发。这些造假钱的人得不到原材料，唯一的办法就是熔化制钱来打造成本更加低廉的假钱，这么一搞，制钱会越来越少，私铸钱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大。

为了整顿货币市场，雍正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首先，他禁止使用铜器，收集铸钱原材料。四年，雍正下令，除

了乐部必需的铜器之外，一概不允许用铜器，有铜器的必需交给官府，然后官府给你一定的补偿。如果有违令的，将治罪。九月，雍正又下令，只有准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使用铜器，其他人一概不准使用，拥有铜器的人，三年之内必需上缴（有偿）。十二月，雍正亲自带头交出铜器，表示以后宫中不使用铜器。

雍正带头，京城里的臣民们自然不敢不给他面子，但是地方上对此没有多大的反应。五年，雍正又派出官员到各地收购铜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后来，雍正想，一些边缘地方的百姓离交铜器的衙门太远，而且他们手中铜器也不会很多，让他们交铜器确实不太方便。雍正提出可以用交纳铜器代替税粮。

田文镜给雍正提了个建议，允许私藏铜器的绅衿之家的奴仆告发主人，只要证据确凿，告发者立刻可以恢复人身自由，主人还要被治罪，用这种方法迫使大户人家交出铜器，不可谓不狠，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但雍正这个政策执行得并不是很好，为什么？表面的原因是铜器大多是成品，老百姓爱惜，不舍得当成废铜交出。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他收购铜器的价钱出得太低，起码你要根据铜钱的价值来收购别人的铜器啊！想用收破烂的价钱让别人交出有利可图的东西，不符合客观规律，即使有严刑峻法支持也很难成功。

在这个问题上，雍正始终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开发铜矿，让制钱能够满足市场的流通需要。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一个改革者苛求太多，作为一个改革家，雍正背负的骂名已经相当多了，其中就有“爱银癖”，他成了世人眼中的葛朗台，这显然是对他的误解。

第六章 整顿八旗，调解满汉

雍正大为失望，痛骂这些八旗子弟，最后强迫他们去耕种。强扭的瓜不甜，这些八旗子弟过去后，不安分守己好好生产，反而偷偷卖掉牛、农具，出租井田。井田制实行十年后，雍正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失败。

解除旗主权力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首创的，在创立之初，旗主分别由努尔哈赤的子侄担任。

旗主与旗下的关系过于密切，皇帝如果要发号施令的话，必须通过旗主。这就留下了一个隐患，如果皇帝跟旗主的关系不好，有可能会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况。对于那些威信很足、皇位坐了很长时间的皇帝还好说，但如果是新君即位，威信不足，如果旗主中有人抱成一团，拥护其他人，那就危险了。

由于旗主的位子世袭的，旗主与旗下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这对皇权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雍正是一个非常专制的皇帝，对他来说，任何威胁到皇权的东西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只要他发现了，一定会全力铲除。

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清朝的皇帝们就在谋求削弱旗主的权力，毫无疑问，这是对创始者努尔哈赤思想和制度的一种背叛，但也是形势所趋，不得不为的一种手段。皇太极和顺治将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升为上三旗，由皇帝直接领导。剩下的五旗称为下五旗，依旧由各旗主掌管。

康熙时期，进一步剥夺旗主的权力，他让自己的儿子胤祐管理满、蒙、汉正蓝旗三旗事务，等于是取代原来的旗主。事实上，雍正继位之后，八旗旗主的势力已经非常衰微了。但对雍正来说，只要八旗旗主还有影响力，他就不能不动手改革。

刚开始的时候，雍正继承康熙的思想，任用自己相信的皇子和王公管理八旗事务，比如，他让康亲王崇安管理正蓝旗三旗事务，十七弟允礼管理镶红旗。尽管这些人都是他钦点的，但他仍然发现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无论是崇安还是允礼，身份都相当高，管理各旗后，地

位攀升，有时候自己的命令也未必能很好地下达。雍正感觉到代理人 与自己的矛盾，大权有被分割的感觉。而且，他任命的这些人往往与 各旗都统发生摩擦，由于权限不明，这是难免的。

六年，雍正取消了崇安、锡保、德昭等人管理旗务的权力。七 年，雍正任命庄亲王允禄管理镶白旗满洲都统；九年，改允禄管理正 红旗满洲都统事务；十年，任命平郡王福彭管理镶蓝旗满洲都统事 务。这是一项改革，管理都统事务跟管理旗务有所不同，管理都统事 务相当于一个兼职都统，管旗务的相当于旗主，都统必须听命于旗 主。都统是一种官职，不能世袭，也不是终身制，由皇上任命，属于 流动的官职。

雍正的这个政策实际上就是取消八旗的旗主，换句话说，以后不 需要旗主了，每个旗设置一个最高长官，这个长官跟其他官员一样， 随时可能被调走。

就这样，雍正又不动声色地剥夺了八旗旗主的权力，这权力回到 了谁的手中？皇帝，大权独揽一人之手。

剥夺了王公们的统治权不说，雍正还进一步给他们限定，禁止他 们在八旗中挑选人员到自己的府中做差役，最多只能挑选一些人当护 卫。如果想弄一些人做包衣，必须上奏申请。下属如果犯罪，王公要 及时上奏，交给刑部处理。也就是说，王公们不断失去了八旗的统治 权，连袒护下人和处罚下人的私权都没了。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最 终的目的是告诉王公们，在国法面前没有家法，这个国家，我雍正一 个人说了算。

此外，雍正严禁王公们勒索属下。雍正元年，一些王公的门人到 外省做官，王公们便伸手向他们勒索。雍正清楚，这样一来，势必导 致这些人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所以严令禁止。

第二年，有人揭发公爵星尼向门人王承勋勒索了几千两银子。雍 正非常重视，对王公大臣们说：“星尼不过是一个公爵，王承勋也不 过是州县级别的小官，就勒索了几千两银子。如果勒索者是王公，门 人是地方大员，那这银子不知道多少能打得住？以后，这种事情必须 禁止，如果发现了，将裁掉下五旗王府佐领下人，永不叙用。”

雍正是一个真正有治国头脑的人，他对王公下手，一方面是为了 乾纲独断大权独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达到长治久 安的目的。收回王公的权力是反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如果腐败只是 从官僚阶层入手，显然只是触到腐败的表面。

解决八旗生计

八旗在清朝属于上层阶级，在人们常识里应该不存在生计问题的。

确实，在清军入关之初，八旗人口很少，大家都是官僚，有俸银有耕地，生活根本不是问题。但是，雍正继位之后，入关已经八十多年，八旗人口大量增长，官职和兵额都有限，加上汉族、蒙古官员的加入，留给八旗子弟的官位更少了。而且，清政府有个非常荒唐的规定，八旗子弟除了当官和当兵，不能从事其他职业，这表面上是让他们当贵族，无形之中却让他们的生存能力退化。

八旗子弟由于长期和生产绝缘，加上生活上又喜欢比排场，导致他们入不敷出，生活艰难。这些问题当然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他屡次批评八旗子弟丢掉尚武的传统，追求享乐主义生活。而且，雍正知道八旗子弟最喜欢逛戏园子，经常喝酒赌博，成天斗鸡斗蟋蟀，其中很多人靠着变卖祖产过日子。

清朝毕竟是靠八旗起家的，如果八旗堕落下去，雍正担心国本受损。为了防止旗人堕落，雍正严禁八旗子弟斗鸡酗酒，号召旗人崇尚节俭。这些口号当然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雍正五年，顺承郡王锡保报告说，贾富成偷了军粮，还向人放高利贷，雍正命他追查，将追查得来的粮饷奖励给破获这案子的官兵。

六年，雍正在京城附近设立二十四个八旗米局，专门调查禄米的买卖，雍正想通过这种方式限制八旗子弟的靡费。真可谓用心良苦，简直像八旗子弟的严父，可惜子女不争气，父亲再严也不管用。

为了保证八旗子弟的温饱，元年，雍正从内帑中拨出八十万两银子，分给八旗。这种资助对于奢侈的八旗子弟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八旗的兵额是固定的，但人口却一直在增长，于是多余的人丁越来越多，这些八旗子弟又不会干其他的营生，所以生活越来越差。雍正想通过扩大兵源解决这些人的生活问题，可惜政府财力有限，只能增加一点，这对八旗子弟来说，也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

当然，八旗有田地，八旗庄田属于公田，旗人有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论理是不能随便买卖的。当使用的时间一长，他们也就变成了实际拥有者，所以很多人将田产典卖。雍正追查这件事时，考量到买卖旗地沿袭已久，不便依法惩治，但又不能不管。最后，雍正决定

动用内库的钱，将卖出的地按原价赎回，雍正限定原业主在一年内赎回，过期不赎，可以让八旗内的其他的人赎回。雍正这么做目的是保住旗人的产业，不让这些田地流失。

雍正的这些措施仍然无法挽回八旗子弟的堕落态势。雍正还通过屯耕的方式，鼓励八旗子弟自食其力。雍正在热河开垦了三处屯田，挑选了八百个没有产业的八旗子弟前去开垦。后来，雍正又在喜峰口设置屯田，让八旗子弟去经营。

雍正还实行井田制，在京城以南的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地划出大量的土地作为井田，让没有产业的八旗子弟前去耕种。每户人家给一百亩私田，十二亩半公田，私田在外，公田在内，另外给十二亩半的地方给这些人盖房子。甚至给每户人家发放五十两白银，购买耕牛、农具、种子。私田收入归耕种者，公田收入归公。这么好的政策，居然没有几个八旗子弟愿意去。

雍正大为失望，痛骂这些八旗子弟，最后强迫他们去耕种。强扭的瓜不甜，这些八旗子弟过去后，不安分守己好好生产，反而偷偷卖掉牛、农具，出租井田。井田制实行十年后，雍正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失败。

可以说，雍正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殚精竭虑，可惜无法挽回旗人的颓势，只是减缓了旗人退化的速度。

调解满汉矛盾

满汉矛盾在整个清朝一直存在着，在清初和清末最为突出。雍正曾经感叹，其他朝代结束了，改朝换代时前朝宗室都会对新朝表示臣服，唯独清朝取代明朝，许多不法分子打着明朝宗室的名义造反。

雍正元年九月，雍正说他发现了一道康熙不曾发出的谕旨，谕旨称赞朱元璋统一华夏，文韬武略，连唐宗宋祖都比不上，所以派人寻访朱元璋的后裔，供养其后代。第二年，雍正找到正定知府朱之璉，说他是明朝后裔，让他负责明朝陵墓的祭祀。

朱之璉是朱文元的后代，朱文元是明朝宗室简王的后代，在松山战役中被俘，入了八旗。雍正拿朱之璉做文章，就是为了表达满汉一家的思想，让大家拥护清朝的统治。

在雍正朝，仍然有汉人借朱明的名义造反。甘凤池两次被抓住，释放后，坚持不懈地从事反清活动，世人风传甘凤池气功了得武艺高

强，越传越神，很快甘凤池就成了反清的领袖。甘凤池身边有一个叫周昆来的人，本姓朱，据说是明朝宗室的后人，曾在苏州见过朱慈焕，互相认了亲。

李卫及时发现了甘凤池的活动，安排间谍打入对方内部，甘凤池等人相继被逮捕。

雍正一手打击反清运动，一手抬高明朝后裔的地位，意在向世人表明，大清和明朝后代并不是水火不容的，造反者纯粹是无理取闹。

直隶一带，满汉的矛盾尤为突出。因为这里是旗人的聚集地，旗人仗势欺人，与汉人经常发生冲突。

雍正元年，直隶巡抚李维钧密奏房山县的庄头李信和宛平县的庄头索保狼狽为奸，霸占地盘，抢夺居民的牲口，还发放高利贷，勒逼百姓，抢占民女，殴民致死。雍正让李维钧严查，为受害百姓出气，雍正清楚，像这样的事情往往与上面的王府有关联，所以告诉李维钧不必有任何忌讳。

尽管如此，李维钧还是有所顾忌。李维钧是汉人，如果惩治旗人，担心遭到王公贵族们的报复。雍正再次表示，让他放手查办，秉公执法。在雍正的大力支持下，李维钧才放开手脚，处理作案的分子。

对于违法作恶的人，雍正向来不姑息，哪怕是皇亲贵族八旗子弟。康熙末年，旗人许二打死汉人刘国玉，雍正刚继位，本来新皇登基一般都会赦免犯人。但雍正却不赦免许二，他认为许二仗着自己是旗人行凶作恶，情节恶劣，如果不处决的话只会纵容更多的旗人犯罪。

清军入关后，旗人和汉人在法律上从来没有平等过。汉人如果犯了流放罪必须老实地充军，旗人却可以改为枷号、杖责，实际是减轻刑罚。雍正觉得这种政策跟自己的法制思想不太一致，遂召集大臣商议让旗人和汉民同等处置，废除折刑法。

一些大学士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个法律虽然不太好，容易让旗人犯罪，但是满人和蒙古人缺乏谋生之道，如果把他们发配，他们恐怕很难生存下去。雍正一听，没办法，还是按照既有方针办事吧！

在官僚集团中，也存在民族歧视。满洲官员瞧不起汉族官员，这是清朝历来的制度决定的，满官比汉官享有更多的特权。雍正对此却说：“在朕的眼里，满汉官员皆为一体。朕对臣下极为公平，从来不看其他的東西，就看这个人能力怎么样。”

清朝的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等高官，满汉都可以担任，但主事的，却一定是满人。譬如，军机大臣可以是汉人，但首席军机大臣一定得是满人。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像张廷玉这样深受雍正器重的汉人，就可以担任主事的，比满人尚书的职位还高。

雍正六年，上朝的时候，张廷玉不敢走在满人傅尔丹的前面，虽然论官职张廷玉要高一级。张廷玉向雍正请求让傅尔丹走在自己前面，但雍正不同意，一定要张廷玉走在前面。

对于满汉官员的矛盾，雍正并没有过分偏袒满人。譬如，杨文乾担任广东巡抚的时候，广州将军石礼哈和官员阿克敦、常赉、官达等人想谋害他，被雍正窥破，痛骂了他们一顿。

雍正曾自豪地说：“朕治下的官员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满人迈柱，也有汉人李卫、田文镜、杨文乾，他们虽然出身不同，但都能竭忠尽力。至于那些挟私倾轧的小人，不管是满人汉人还是蒙人，在朕这里都得不到重用。”

雍正的潜台词是：朕是一个非常英明的皇帝。

但清朝满人官员占据优势是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满官是汉官的下属，往往也瞧不起自己的上司。雍正知道这是满人的积习，对此非常警惕。

雍正说：“天之生人，满汉一理，其才质不齐，有善有不善者，乃人之常情，用人惟当辨其可否，不当论其为满洲为汉人也。”

这并非雍正的真实想法，让我们看看雍正是如何对宗室大臣说的吧：“我希望你们中能够多一些有出息的人，如果宗室里有一个有出息的人，就等于是满洲里有一个有出息的人。如果满洲里有一个有出息的人，汉人里也有一个有出息的人，我一定先用满洲里有出息的人。”

雍正用人的原则是：先把机会留给宗室，然后留给满人，再次留给汉军人才，最后才留给汉民。前提是得有才能，如果宗室里没有合适的人才，只好在满人里挑选，满人里没有，就在汉军里挑选，汉军如果还没有，就在汉民中挑选。

在调解满汉矛盾方面，雍正确实作出了一些措施。但他的根本思想还是满汉有别，维护满人的统治地位。譬如，雍正极力维持满族的语言文字，担心有一天汉化后，满洲文化会消亡。他这种担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的直觉。而且，雍正禁止满汉通婚，想维护满洲的独立地位和统治地位，这等于是螳臂当车，逆流而动。雍正本人就有汉人血统。

第七章 一个疯狂书生引发的文祸

曾静对吕留良崇拜的五体投地，他在《知新录》中说：“皇帝应该由世上的大儒来做，不该由世上的英雄做。在春秋时，有资格做皇帝的是孔子，战国时应该是孟子，秦以后为程朱，明末应该由吕留良来做。”

曾静的意思是现在就应该他做皇帝。

无辜的岳飞后代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陕西总督岳钟琪喝完酒刚回到衙门，突然有一个人手持一封书信拦在他的轿前，扬言有要事禀报。

侍卫们正准备把来人轰走，岳钟琪拉开帘子一看，见这个人不像官差，便让人接过他的书信。岳钟琪拿到书信，顿时一惊，只见信封上写着“天吏元神”的字样。岳钟琪感觉这事不小，立刻让人把送信的人看守起来，匆匆进入衙门，屏退左右，拆开信查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封信直看得岳钟琪凉汗淋漓。正如岳钟琪所奏：“臣不忍卒读，不忍详阅……恨不得立刻吃了逆贼的肉。”

这究竟是什么样一封信，让岳钟琪如此惊慌。

给岳钟琪写信的人是湖州郴州的一个秀才，名叫曾静。曾静听说岳钟琪尽忠爱民，雍正却非常怀疑他，想要削夺他的兵权，岳钟琪不高兴，想要谋反。曾静万万没想到，他听到的只不过是流言，真实情况刚好相反。

雍正不但没有怀疑岳钟琪，而且对他非常信赖和器重。岳钟琪接替年羹尧担任川陕总督后，功高遭人忌，在曾静投书之前，诽谤岳钟琪的奏折就有一箩筐。雍正任命岳钟琪为总督之前，议政大臣和署理直隶总督蔡珩就说岳钟琪这个人不可深信。蔡珩显然非常嫉妒岳钟琪，岳钟琪进京后，蔡珩故意在他面前放烟雾弹，说怡亲王允祥对他非常不满，傅鼐告诉他要小心。允祥是雍正最信任的兄弟，蔡珩说这话无非是告诉岳钟琪，雍正对他很不放心，想借此挑拨岳钟琪和雍正的关系。

当时，背后说岳钟琪坏话的人何止蔡珽，很多人借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将来有一天可能会替汉人报仇，以此劝说雍正不要重用岳钟琪。上层这么说，更不用说市井流言了，陋井小巷到处流传“岳公爷”要带领川陕兵丁造反。社会上的传言是越传越有模有样，有人甚至说岳钟琪已经被雍正谴责，他的儿子已经被捉拿在案了。

这些传言仅仅反映了民众的一种心理诉求，这种诉求不光是恢复汉家天下，也是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冲动。

事实上，雍正对岳钟琪很信任。但曾静并不知道这些，他本着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想借助岳钟琪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此，曾静给岳钟琪写了一封信，说你是岳飞的后代，岳爷爷曾经抗金，你身为他的子孙，当然应该继承他的遗志，现在你手握重兵，正好可以血洗宋朝和明朝的耻辱。

这封信让岳钟琪非常紧张，他给雍正上了一道奏折，请求雍正解除自己川陕总督的职务，以便让自己享尽天年。当时，西北乱局未定，正是用人之际，雍正自然不肯答应岳钟琪的要求。

雍正朱批道：“卿的一片至诚之心，朕怎么会不理解呢？朕待卿犹如骨肉，卿是朕的国家栋梁，便是父母之恩也不过如此。卿怎么能提出辞职这种要求呢？朕虽然不是圣明之主，自负洞察世情，绝不会为流言所误，卿在那里放心地干吧……”

岳钟琪决定找陕西巡抚西琳共同审理投书之人，西琳是满人，岳钟琪选他意在表明自己绝无谋反之心。在这件事上，岳钟琪必须非常小心，有人要他以岳飞后代的名义造反，这绝对是一件非常敏感的政治事件，处理不好，有可能招致抄家灭门之罪。雍正虽然表示信任他，但圣心无常，年羹尧和隆科多就是前车之鉴。所以，在这件事上岳钟琪再小心也不算过分。

审讯

岳钟琪字东美，四川成都人，父亲岳升龙曾担任四川提督。岳钟琪是南宋著名将领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康熙六十年，岳钟琪平定西藏叛乱，擢升为四川提督。雍正元年，岳钟琪跟随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年羹尧被解除职位后，岳钟琪接替了他，掌管西北十万大军。

《清史稿》对岳钟琪评价很高，认为岳钟琪性格沉毅，足智多谋，治理部下很严，又能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像岳钟琪这样的汉人被拜为大将军，又能让满洲将士对他心服口服，在康熙乾隆三朝也就岳钟

琪一人而已。

岳钟琪又看了这封信，写信者是一个自称“南海无业游民”的人，那个送信的人自称张倬。岳钟琪本来邀请西琳一起来审讯，但西琳正在校场检阅士兵，未能按时前来。岳钟琪不便私自审讯张倬，一个人在房内来回踱步，忽然想到，这个人既然敢来投书，一定有后台，如果猝然审讯的话，只怕不能得到实情。

岳钟琪叫上满人按察司硕色，然后传张倬过来见面。

张倬进来以后，岳钟琪没有摆出审讯的架子，而是非常客气地请他坐，奉上茶水，和蔼地问他家里的一些情况。

张倬说自己曾在江夏住过，但对老师的地址绝口不提。

岳钟琪说：“你不想说，那如果我想见你老师，到哪里去找他呢？”

张倬回答道：“只要你按照我老师说的去做，我自然会让你去见我老师。”

岳钟琪：“你老师现在在什么地方？”

张倬：“广东，我从广东过来的。”

岳钟琪：“你老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大老远给我投书？”

张倬：“我们在广东时，听说朝廷三次召你你都不去，所以老师才让我给你投书。我到了陕西后才知道根本没这回事，本来不打算投书了，后来觉得不应该白跑一趟，所以给你投书了。”

岳钟琪：“现在是太平盛世，你老师为什么有谋反的想法？”

张倬：“什么太平盛世，官吏腐败，百姓生活困苦。”

岳钟琪：“你这是扯淡了，哪里没有穷人，大多数人生活得很好就是盛世。”

不管岳钟琪怎么诱导，张倬就是不肯说出老师的所在。傍晚的时候，西琳才来到总督府，和岳钟琪一起审问张倬，但张倬誓死不说出老师的住址。岳钟琪决定用大刑逼迫他招供，没想到张倬是一条汉子，屡遭重刑，多次昏死，居然就是不说实话。

岳钟琪担心，继续逼供的话，可能让张倬死于大刑。到时候，这案子就变成了无头冤案，雍正不免怀疑他想杀人灭口，到时还会连累西琳。于是，岳钟琪决定停止用刑，和西琳商讨，明天用计诱惑他说实话。

第二天早上，西琳就躲在密室后面倾听，岳钟琪命人将张倬带到签押房。

岳钟琪不紧不慢地说道：“以前，你们湖南有一个叫邹鲁的人，跟年羹尧合谋，后来又自首了。像你们这样的人来找我游说，你说我能信吗？我又怎么知道你不是别人派过来试探我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你用刑，看看你是不是有诚意。”

张倬说：“你昨天那样对我，我不可能再相信你。”

岳钟琪正色说：“你跟我说的事情关系重大，我只能那么做。昨天你不该在衙门口递书，那么多人盯着；还有，见面之后，你含糊其辞，一句真话也不说，叫我怎么相信你。至于用刑拷打你，也是有深意的，自古就有用鼎镬伺候说客的习惯。昨天我看到你这个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确信你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不为利害所动。所以今天和你坦诚相见，希望你也推心置腹，告诉我实情。起事之事可是当真？”

张倬仍然不松口，说道：“你昨天那样对我，今天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再相信你了。你别再浪费口舌了，我来到这里这条命就没想着出去。”

岳钟琪软硬兼施，张倬无动于衷，一天过去，没有任何收获。

张倬已经打定主意咬定青山不放松，决不能出卖自己的老师，只求岳钟琪早点处决自己。

岳钟琪一宿未眠，绞尽脑汁想撬开张倬嘴里的话。思考了一夜，他想出了个欲擒故纵的法子，打定主意后，岳钟琪便好好睡上了一觉。中午起来后，他再次召张倬。

经过大刑伺候后的张倬身体显得非常虚弱，连走路都必须要有搀扶。岳钟琪站起来，挥手让侍卫们全部回避。岳钟琪亲自扶张倬坐在椅子上，还倒了一杯茶送到张倬手中。

接着，岳钟琪以话家常的口气说：“自古以来，只有天下频繁发生变故，才有人从中起事，现在天下太平，没有一个省动荡，你的老师却要我在陕西贸然起事，有接应的人吗？传檄到哪里，哪里可以用兵，哪里又支持我们？对这些你了解吗？如果不了解，又凭什么起事呢？”

张倬回答：“这个倒不难，只要你让我相信你会起兵，我保证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一定会云集响应。”

岳钟琪问：“你这么肯定？”

张倬答：“这六省的百姓生活困苦，饱受清廷之苦，你起兵，他们当然会响应。”

岳钟琪心里终于有底了，说道：“你既然想得到我起兵的凭据，不如先带我去和你的老师当面议议如何？如果还有其他起事的人，大家一起商量商量不是更好吗？”

张倬立刻答应好，接着就反悔：“这不太好吧，你还没有给我凭据，我没有理由带你先去见我老师。”

岳钟琪生气地说：“你既然始终不相信我，那我就放你出去，你爱干啥干啥去，跟我没关系，行吗？”

张倬有些不敢相信地说：“什么？你要放了我？这几天你审讯我，一定有人知道，将来朝廷问罪于你，你这不是惹祸上身吗？”

岳钟琪故意装作无奈的样子说：“我不放你又能怎样呢？不放你的话，势必要将审讯的经过如实禀报，以后朝廷里凡是想谋反的人，都会来找我，到时候我还要不要过自己的日子？所以，只能放你，如果外面有谣言，我就说是个腐儒，对时政乱发评论，跟他逐条解释清楚了，他也就头脑清醒了。”

岳钟琪的话听起来非常恳切，张倬差点相信了他。但想起岳钟琪前后的转变太大了，心里不由起疑，心想，绝不能因为贪生而害了老师。想到这里，张倬只求速死。

张倬说：“你说的虽然动听，但我来这里已经决心赴死，你还是赶快杀了我吧，别浪费时间了。就算你放我，我也不会走的。”

审讯再次中断。当晚，岳钟琪把审讯的内容上奏给雍正，岳钟琪说奸贼张倬狡诈非常，软硬不吃，即使用计诱他，也不上套。岳钟琪请求将张倬押送到京城，由雍正派遣王公大臣审讯。

雍正却不答应，硬要岳钟琪审理这个案子，为了表示自己对他完全相信，还教给他一些骗取口供的方法。雍正批道：“这事还是由你来审理，你刚开始做得有点急，不应该当天就对他进行审讯，应当循循诱导他说出实话。他既然有胆做这种事，就说明是个不怕死的亡命之徒，即使解送到京城，估计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接着，雍正教岳钟琪如何套出对方的话，而且让岳钟琪在问话时不要有任何忌讳，只管问，问完之后一一奏来。

岳钟琪决定改变方式，先将张倬放出来，把他安置在一间房子里，然后送上好酒好肉。连续几天的审讯让张倬身体受苦、精神紧张，骤然换了一个环境，软软的床，美酒佳肴，吃饱喝足之后，张倬

睡意袭来，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醒来后，侍卫再次把他带到签押房。这次，张倬感觉到不一样的气氛。案桌上没有任何卷宗，倒是有一个香炉，里面红烛燃烧，香烟缭绕。

张倬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却见岳钟琪穿着官服正襟危坐。接着，岳钟琪说了一些“激切之言”，这些言语不便上奏给雍正，便以“激切之言”带过，内容无非顺着张倬的想法说，答应跟他结为兄弟，从今以后一起造反，同甘苦共患难。

岳钟琪见过大场面，演起戏来就像真的一样。张倬不过是长沙安仁县的一个乡民，没见过什么世面，哪里知道人心的险恶。虽然他对岳钟琪始终不太放心，但总是习惯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他总是想，如果岳公爷说的是真心话，那么天下苍生就有救了，老师的理想也可以实现了。假如一多，就让他失去了分辨能力，他心里的期盼不断地误导着他。

接着，岳钟琪对他发了一阵牢骚，说自己如何受到雍正的猜忌和朝臣的排挤，听得张倬如痴如醉，甚至想开口安慰岳公爷：“公爷，你也别太放在心上，这事就过去了，咱起来推翻这清朝。”

岳钟琪看张倬着迷了，便拉着张倬的手说：“兄弟，从今以后跟着大哥打江山，为汉人出一口气。”

此时，张倬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只是一味地点头：“好好好……一切听从岳公爷的安排。”

雍正看到岳钟琪奏折中“盟誓”这一节，批道：“读到这里，朕禁不住满面流泪，爱卿的忠心，感天动地。像这样的盟誓，一定会为爱卿消灾减罪赐福延寿。朕的喜悦之情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雍正给臣子的朱批很多时候都相当肉麻，看到这么肉麻的话岳钟琪当然不能表示反感，只能以肉麻回应：“嫌犯已经供认了真实姓名是张熙，臣为了得到实情，所以假装和张熙盟誓。看到皇上消灾减罪赐福延寿的话，臣感动得流泪，感动得浑身发抖，惊喜之情无法自控。想想臣出身卑微，遇见了旷古难得的圣明君主，享受亘古未有的恩遇，真不知道是前世修了多少劫才换来今天的待遇。”

穷秀才的春秋大梦

张熙是长沙府安仁县人，家境贫寒，喜欢读书却一直没有机会。

直到二十五岁的时候遇见了郴州人曾静，曾静考秀才的文章得到湖南省第一名。张熙因此非常仰慕曾静，拜到他的门下，跟着他读书。

几年下来，师徒二人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读书。曾静的藏书极为有限，读完之后，曾静让张熙到全国各地去买书。

张熙遵从师命，由长江南下，前往浙江人吕留良的家里买书。这时吕留良早已去世，但他是清初的名儒，名声在外。张熙去之前，吕留良的儿子吕葆中也逝世。张熙去的时候，吕留良的孙子正好在家，让张熙挑选了几部书。张熙带回去后，曾静发现其中有吕留良的诗稿，其中有《钱墓松歌》和《题如此江山图》两首诗，曾静以为吕留良是天下知名的大儒，他的文章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而，他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差错牵出了一场重大的文字狱。

在晚清的野史和武侠小说中，江南八大侠中有一个叫吕四娘的女侠，传说这女子就是吕留良的女儿。还有独臂神尼，传说是崇祯砍断手臂的女儿，后来她练就一身武艺，深夜入宫，一剑砍掉雍正的首级，将雍正的脑袋放到吕留良墓前祭奠。最后，雍正下葬时不得不用黄金人头代替。这些当然都是传说，不足为信，反映了人们内心对于雍正的痛恨。

张熙供出师傅曾静和一些来往亲友的地址后，岳钟琪立即快马加鞭让人向雍正报喜。雍正一方面奖赏岳钟琪，一方面立即派人去湖南缉拿相关犯人。

雍正让副都统海蓝去湖南，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一起缉拿案犯。海蓝到达长沙后，当天晚上就采取行动，在宁远县捉拿了嫌犯刘之行和他的学生陈立安，在永兴县缉拿主犯曾静，在安仁县捉获张熙的父亲张新华及张照、张勘等人，在华容县查拿嫌犯谯中翼。

张熙的父亲张新华时年六十岁，原名张仕璜，以前考中了秀才，后来因为例考不到被除名。由此可见，张家虽然贫穷，也是耕读世家。根据张新华的供认，张熙是他的二儿子，跟着曾静读书，这些年来，张新华发现儿子言语越来越狂妄，经常说出一些出格的话，张新华干脆把他扫地出门。之后，张熙就住在曾静家里，师徒二人，臭味相投。今年，张熙回来将家里的薄田拿出去典当做盘缠，说是要到陕西投书。

张新华的供词：我被曾静所愚，儿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不能管束，实在该死。

张熙的哥哥张照的供词：我只晓得种田，他们做的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曾静虽然是一个穷酸秀才，但是也有骨气，他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是一人做事一人当，跟其他人没太大关系。曾静五十岁，是个秀才，每次例考都名列前茅，有一次考试却被列为第五等，也就是最末等，因此遭到除名。曾静说自己有好几年前就有投书的想法，可谓是酝酿已久。

第一次审讯时，海蓝问了他一个迫切的问题：“你说六省一呼可定，有什么凭据吗？”曾静回答说这是跟张熙商量的，当时看到一些地方流行瘟疫，有可能会天下大乱，所以就这么说，并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

海蓝将审讯的情况及时上报给雍正，并将在张新华家里搜出的曾静逆书交给雍正。海蓝在奏折末尾，把曾静比作禽兽，说如果不是皇上的恩威，只怕抓不住犯人，因为犯人想自尽。

雍正怪招处理

谁也没有想到，曾静案牵出了一场惨烈的文字狱，整个案子持续四年之久，直到雍正十年十二月才宣告结束。

曾静、张熙谋逆案在所有朝代几乎都是死刑，重者可能灭族。当时，朝廷上下也都主张将案犯处死，认为这两人如果不杀的话不足以平民愤。雍正的判决让大家大跌眼镜，他竟然不追究他们的罪过，宣布无罪释放。

接着，雍正就和曾静公开辩论，就投书内容辩论，雍正本着“平等”的态度要从思想上说服曾静，之后，将辩论的内容编成《大义觉迷录》，让曾静师徒二人回到湖南宣讲《大义觉迷录》。雍正还特别告诫地方官员，不要嘲笑讥讽这师徒俩，并留下一份奏折，让自己的子孙不要因为他们诋毁自己而追究杀戮。

这个结果发生在以刻薄寡恩著称的雍正身上，确实让人感觉很意外。乾隆上台之后，将曾静和张熙凌迟处死，收缴《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

曾静的书中，给雍正罗列了十大罪状。雍正把曾静的观点分为四个部分，逐条批驳。

首先，曾静认为雍正是个失德的暴君，罪恶滔天，禽兽不如，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荡、怀疑忠良、任用奸佞。在曾静看来，这十条罪状证据确凿。曾静相信康熙是被雍正害

死的，雍正母亲也是被逼死的，甚至废太子胤初都是雍正杀的，总之一切罪名都往雍正头上堆。

其次，华夷之分大于君臣的伦常。这个观点已经不再是针对雍正了，而是针对整个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根据封建伦常，做臣子的应该对君主忠诚，曾静也赞同，但曾静认为华夷之分是更大的伦常。曾静说明朝皇帝丧失德行，臣子也失去操守，所以导致中原陆沉，夷狄乘虚而入，窃取神器，如此大变，天地震怒，鬼哭狼号。在曾静看来，清军入关是天地间最大的不幸。在《知新录》中，曾静引述孔子评价管仲的话，管仲背弃以前的主人，侍奉齐桓公，孔子还赞许管仲，为什么呢？就因为无论是公子纠还是公子小白都是华夏之人。曾静主张，对于夷狄应该赶尽杀绝，除了砍杀之外没有其它办法。思想可以说非常偏激。

再次，百姓困苦，造反是吊民伐罪替天行道的行为。

最后，岳钟琪是汉人，而且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没有理由不伸张民族大义，他觉得岳钟琪手握重兵，如果不造反的话，就是对不起自己的祖宗。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曾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人，相当自负，把自己看成了拯救时代的先驱者，认为自己能够号召汉人赶走满人。他很清楚这事情是要杀头和灭门的，但依然敢这么做，说明内心的精神力量相当强大，这种力量就是儒家思想。

在完成整个行动时，曾静也显得非常从容镇定，首先他选对了投书之人，从审讯的过程来看，张熙是靠得住的，软硬不吃。他叮嘱张熙不能莽撞，逆书可投则投，不可投速速返乡。曾静甚至说，如果出现了差错，立即自尽，不连累任何人。

事发之后，曾静非常坦然，没有将过错推给其他人。可能，雍正欣赏的就是这种骨气，所以不忍杀了他，还当廷跟他辩论，两人像唱双簧戏一样，开创了古今历史不曾有过的奇闻。

到了朝堂之后，曾静知道，如果继续跟雍正较劲，那就生不如死了。所以，他立刻换了另外一副面目，迎合雍正的需求，由此可见，曾静也未必是腐儒。

在亡明之恨这块，曾静认为清朝入关，给汉人带来了极大的创伤，所以有恨，所以要复仇。

针对这一点，雍正解释说：“明末政教不修，朝纲废弛，盗贼四起，民不聊生，流寇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亡国怎么能怪本朝呢？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崇祯殉国而死，这时候明朝就已经亡了。后来，吴

三桂向我朝借兵，消灭了流寇。后来世祖（顺治）皇帝君临万邦，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不仅为明朝报仇雪恨，而且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朝明明有德于明，怎么会有亡明之恨呢？所以说，我朝得国比商汤还要名正言顺。”

曾静当然只能点头了，这时雍正也给曾静一个台阶下：“弥天重犯（曾静）对这些全然不知，不了解过去的历史，这也不能完全怪他，都是因为他很早失去父亲，又生活在穷乡僻壤，独居十多年，所以孤陋寡闻，听信流言，以为我朝天下是从明朝手里抢过来的。其实，明朝天下早就丧于流寇之手，我们只不过是把流寇赶走了。现在，弥天重犯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了，了解到我朝是通过仁义建国的，我朝的皇恩不仅让亡明的后裔感恩戴德，而且连草木都动情啊！”

曾静附和道：“对，由此看来，汤武虽然也是以仁义兴国，但终究是臣弑君，道德上不免有所亏欠。只有本朝的天下得于流寇之手，名正言顺，光明正大。所以，明朝后裔和汉人莫不感恩戴德，都希望为本朝效力至死。”

最后，雍正得出结论：“弥天重犯从前过于无知，语言狂妄，妄引《春秋》以自误，所以才得出亡明之恨的荒谬结论。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悔恨痛哭，简直生不如死。而且蒙受本朝厚恩，无地自容，从此虚心传授《大义觉迷录》以求良心无亏。”

雍正曾对岳钟琪说，曾静诬蔑自己也是好事一桩，正好可以借此洗刷自己的冤屈。雍正很早就知道朝野上下许多人议论自己，只是自己不便公开出来表态，是以隐而不发，泛泛而谈。现在曾静等于是把那些言论公开化了，雍正可以公开申辩，澄清事实。雍正认为，曾静这么一个小民如此议论自己，肯定是有来由的，这些谣言肯定是从宫廷内传出去的，传播这些谣言的明显是阿齐那和塞思黑。加上曾静早有不臣之心，听到这些言论，立即一拍即合。

雍正将曾静谋反跟允禩集团联系在一起，可谓是一大发现，既澄清为什么有人骂自己失德，又指出自己是合法即位。此案中，雍正第二个奇招是将曾静和吕留良联系在一起。

吕留良是曾静师徒的偶像，在曾静和张熙家中都搜出了吕留良的诗文。张熙曾经把吕留良的书给岳钟琪看，岳钟琪没有看出反清的意识，张熙给他一一指出来。张熙的这些看法都来自于曾静，曾静刚开始也没看出吕留良诗中的反清大义，后来反复推敲，才洞悉其意。曾静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华夷之别大于君臣之伦。

曾静对吕留良崇拜的五体投地，他在《知新录》中说：“皇帝应

该由世上的大儒来做，不该由世上的英雄做。在春秋时，有资格做皇帝的是孔子，战国时应该是孟子，秦以后为程朱，明末应该由吕留良来做。”

曾静的意思是现在就应该他做皇帝。

曾静把吕留良和孔孟程朱相提并论，吕留良真有那么厉害吗？

吕留良，号晚村，浙江石门人，顺治十年中秀才。后来，思想突变，后悔曾获取清朝功名。康熙五年，吕留良放弃功名，到处演讲，名气颇大，许多人尊称他为东海夫子。吕留良一个重要思想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他说：“德祐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南宋德祐二年，元军攻入临安，南宋灭亡，元朝建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吕留良眼里，这是一个巨大的浩劫。现在清朝的情况也一样，吕留良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从缅甸被送回国后，满汉皆倾心，向他下跪，处死永历帝时，天地晦暗，日月无光，连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遭到雷击。

康熙十八年，开设博学鸿词科，有官员推荐他，他誓死不就。第二年，地方官又以山林隐士的名义推荐他，他仍然不去。由于名声太大，总有人推荐他做官，吕留良反感至极，最后削发为僧。这些做法无疑让他的名声更大。

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继承了他的思想，希望发生天变，经常夜观星象，扬言数年之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严鸿逵以看清朝笑话为乐，索伦发生地震，他说老天对清朝不满……

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也是一个坚定的不合作派，他写诗：“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还说“更无地著避秦人”，他还摘录了吕留良的门人黄补庵的诗句：“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

雍正明白，吕留良是这些人反清思想的根源，决定首先驳倒吕留良的思想。雍正指责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雍正说自古以来能够成为国君的人，都是有德之人，符合老百姓的需要，跟是不是夷狄没有关系。对汉人所谓的华夏之别，夷狄是禽兽，雍正非常反感，他说虞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他们并没有因为地域的原因而当不上君主，当上君主后也没有因为地域原因损伤了他们的圣德。所以，雍正说夷狄和中原不是什么人兽之别，而仅仅是籍贯的不同。

顺便，雍正还为清朝作了一些宣传。他说清朝开疆拓土，是中国臣民的幸运。汉人所谓的“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是非常无知的话，这种服装是天命汗遗留下来的传统。雍正特别强调，南北朝

时，君主只能统治一方，南北互相诋毁。朱元璋虽然经天纬地，但威望和德行还不足以招抚蒙古，在清朝的统治下，四海俱臣服，这不是幸事是什么？

这场辩论表面上看雍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曾静等人“心服口服”，还为他免费宣传。结果是，雍正的那些事儿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古人也不愚蠢，看到政治教材绝不会完全相信，所以，这么一来，雍正篡位的传言越来越重了。

文祸在继续

吕留良案件要更复杂。雍正八年十二月，刑部拟出结案意见，雍正命人交付各省学政，询问他们的意见。之后，要求大家主动焚烧吕留良的著作，先把宣传工作做到家。雍正还让大学士朱轼批驳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和语录，朱轼就是以前推荐过吕留良的官员。批驳完了之后，再刊印发行。

到雍正十年，吕留良案子才定下来。判决如下：

吕留良和他的儿子吕葆中以及门人严鸿逵戮尸梟首。

吕留良另外一个儿子吕毅中以及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斩立决。

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全部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做奴隶。

吕家家产入官。

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发配给功臣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两千里。

刻书人车鼎臣和车鼎贲以及与吕留良过从甚密的孙克用、收藏者周敬輿秋后处决。

吕留良的门人房明畴、金子尚革去生员，携妻子流放三千里。

被处分者中甚至有吕留良的同乡朱振基，他是吕留良的粉丝，担任广东连州知州的时候，他供奉吕留良的牌位，因此被革职查办，死于狱中。

这个案子的结果委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用雍正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出奇料理”。谁也没有想到谋反的曾静反而无罪释放，而已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反而被开棺戮尸。

曾静之所以能活下去根本原因是雍正想利用他作为活生生的宣传

机器，为自己打赢舆论战和思想战。吕留良所以获罪可以说是文字狱，因为吕留良没有做任何反清的事情，仅仅是因为言论和思想获罪。

曾案和吕案之后，雍正更加重视钳制臣民的思想。文字狱接连发生。

七年十二月，湖南巡抚赵弘恩在浏阳县发现了《朱姓家规》一书，书中有“侏儻左衽，可变华夏”的话。赵弘恩借题发挥：“现在这个圣明世道，大家享受和谐和恩德，居然有人敢如此狂吠，实在是大逆不道。”其实这句话是汉人的普遍观点，并没有反清的特殊含义。雍正指示赵弘恩不必深究，不过要对朱姓严厉教育。由此可见，狗比主人更可恶。

广东巡抚傅泰发现著名学者屈翁山诗文中有多悖逆之词，隐藏不平之气，书中碰到明朝称呼之处都空抬一字。屈翁山死了接近三十多年，他的儿子屈明洪担任惠来县教谕，听到这个消息，自动到广州投监，交出父亲的诗文。傅泰严审之后，上报雍正，请求按照大逆罪梟兽戮尸。雍正认为他的儿子自首，应该减刑，便将他的后人流放到福建，诗文焚毁。

江苏崑山人徐骏，是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中过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本来前途无量，但因为写了一首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发，说他思念旧明，对本朝大不敬。雍正便将徐骏斩立决，文稿全部烧毁。徐骏出身于官宦之家，年轻时轻狂暴虐，据说曾经用毒药害死了自己的老师，因此受人鄙视。但他的“明月清风”则纯粹是文人附庸风雅的用词，根本不涉及反清。

雍正八年，福建汀州府上杭县有一个童生范世杰，读了《大义觉迷录》之后，向福建的观风整俗使刘师恕痛骂曾静，歌颂雍正，受到刘师恕的表扬。后来，福建的学政戴瀚来到汀州，他又送上呈文，痛斥曾静，对曾静指责雍正的言论一一加以驳斥，而且添油加醋，说雍正继位之前，以子道事父母，以臣道事君父，接受皇位时，三兄有抚驭之才，谨遵父命，让弟弟当皇帝，而圣君不敢自以为是，三揖三让，最后才升堂践祚。范世杰还说雍正继位之前兄弟和睦，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弑兄屠弟的事情，他还说雍正世道比三代（夏商周）都强，生活在这个时代，纵做鬼也幸福。

范世杰本想通过拍马屁的方式获取做官的机会，没想到居然被戴瀚关押起来。戴瀚问他三兄让位的话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范世杰说，在汀州城里大家都这样说。戴瀚把那话理解成允祉有做皇帝的才能，应当当皇帝，所以对范世杰进行了严厉拷问，并一一上奏给雍正。雍

正大大地赞扬了戴瀚一番，还说范世杰不过是一个企图通过侥幸进身的小人，不会有什么背景，不必扩大化。

戴瀚和福建总督刘世明、巡抚赵国麟一起审问范世杰，问他三兄让位到底是怎么回事。范世杰诡辩说，所谓三兄不是指允祉，而是说三个哥哥。戴瀚问他凭什么说三兄有抚驭之才，范世杰回答说他也知道，只是觉得天子家里的龙子龙孙应该都是贤才，他们让位说明皇上才能更加出众。这显然是诡辩，因为范世杰曾经听说朝廷有个三爷，虽然有才，但秉性残暴，做不得皇帝。

三位高官审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只好给范世杰安了个造谣生事的罪名，将他押回地方，要地方官严加管束，每天早晚高声朗读《大义觉迷录》。以后如果还多事的话，即治以重罪。

浙江淳安人吴茂育是宛平县的县丞，著有《求志编》，被自己的族弟吴霁告发，浙江总督程元章立即审问，评论该书：“语言感慨，词气不平，肆口妄谈，毫无忌惮。”该书有李沛霖作的序，纪年处只用干支，不写雍正纪年，分明是对当朝不满。雍正夸奖程元章办事用心得体，雍正还说这种人比盗贼更有害，一般的盗贼行迹在外，容易抓住，也容易惩罚，但思想盗贼却很难抓住，如果没有一定的细心和耐心，这种人是很容易逃在法网之外的。雍正还说判断一个地方官称不称职，就看他有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要怕麻烦，就敢于找麻烦，这才是好官。吴茂育的另一个版本的《求志编》里，有他自己的自序，里面就写了雍正纪年。这个案子后来不了了之，估计里面的悖逆之言纯属欲加之罪。由此可见，在雍正朝，文字狱之严酷。

文字狱是清朝最残酷的政策之一，也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

第八章 雍正的驭人之道

在用人方面，雍正敢于用那些乖张狂妄的官员，而且有自己的理论依据：“下属中敢顶撞上司的人，不可能是彻底糊涂的人，这些人必然有自信的地方。你们这些封疆大吏，千万不要因为下面一些小人的搬弄是非，而错误地把有才干的人也一起株连了。作为地方大员，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要被下面的意见蒙蔽了。”

李卫当官

雍正朝，在现代影视剧里出场率最高的一个官员可能就是李卫了。

这个李卫，电视剧里说他出身非常卑微，还在扬州要过饭，最后居然成为雍正的三大廉吏之一。历史中的李卫是这样的吗？

历史中真实的李卫跟电视剧里描写的有所不同，江苏徐州人，麻子脸，身材非常高大，一米九几。李卫不但不是个要饭的，而且家庭非常富有，家里有许多马匹。李卫是个爱马之人，喜欢搜集良马。李卫家里有钱，家人为他捐了个监生资格，所以说李卫不是科举出身，而是捐纳出身。

李卫有一个特点，大字识不了几个。家境虽然富裕，但是他从小就不爱学习爱学武，他常常幻想用武功报效祖国。当官以后，李卫设置了一个勇健营，专门教士兵练习搏击拼杀之术。捕盗的时候，李卫都要亲自冲在前面。李卫是个对战场非常迷恋的人，当上巡抚后居然向雍正主动请缨，要上战场杀敌。结果，雍正让他很失望：“这些事儿还轮不到你。”

我们一定很好奇，像李卫这种没有文化的人是如何被雍正看中的呢？

康熙时代，青海发生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在平叛的过程中，朝廷缺钱。这个时候，一向有爱国心的李卫就对老爷子说：“我们为国家捐点钱吧！”这一捐就捐了几十万两银子，康熙非常感激，就给李卫挂了个官名，也就是所谓的捐官。捐官一般不会马上重用，暂且挂个名，有了合适的位子再上。

康熙五十九年，李卫终于得到重用，升任为户部郎中，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康熙的意思是，李卫家里的钱花不完，让他管钱，应当不会贪污。他的想法是对的，但这种逻辑不能推演，不能说所有家里有钱的人都不会贪污。贪不贪污只跟李卫个人的品性有关系，跟他家里是不是富裕没有必然的关系，有钱的人贪污的大有人在。

李卫真正得到重用还是在雍正的时候，雍正推行火耗归公政策时，李卫帮了大忙。当时有个亲王仗着自己是皇帝兄弟，坚持要收火耗，要把这个钱据为己有。李卫的官没人敢大，怎么办呢？李卫便让人写了个字条：某某亲王的火耗。然后将银子包起来，贴上字条，往那一搁，这一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亲王想要火耗。这下，亲王的脸丢大了，没办法，他只好向李卫道歉，让李卫撕掉字条，表示以后不敢再要火耗。

这事，让雍正对李卫刮目相看，给了李卫一个“勇敢任事”的评价。

李卫真不愧雍正这个评价，他三十六岁的时候，雍正让他做云南盐驿道，这个官职听起来不拉风，实际上是雍正放在边疆的心腹大臣。云南是边疆，容易乱，容易走私，税收很难收。当年吴三桂坐在这里那么多年，不交一分钱的税，还让朝廷每年拨款九百万，可以想见云南是一个非常难控制的地方。

这里的税收特别难收，雍正必须找一个得力干将把这事办好。最适合做这件事的莫过于勇敢任事的李卫了。还别说，李卫来了之后，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就把税收给收上来了，云南财政扭亏为盈，当年就盈余三万多两。

雍正很高兴，立刻升李卫为云南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地位仅仅在总督和巡抚之下。接下来李卫的表现让雍正有些不满，李卫仗着雍正的宠信，经常写奏章弹劾云南的官员，而且他还不是偷偷摸摸地干，是明目张胆，干完之后还让别人知道我弹劾你了，结果把很多官员都得罪了。雍正怕李卫继续干下去，云南会玩完，便把他调到浙江去了。

李卫当上了浙江巡抚，虽然是浙江巡抚，但是雍正允许李卫兼管江苏的事情。到任之后，在抄家这块李卫显得相当拿手。曹雪芹家就是被李卫抄的，说实话，也只有李卫这样的人敢抄，要知道曹雪芹的爷爷曹寅跟康熙可是发小，两人关系那么好，一般人不敢动他们家的。

李卫这个人性格狂放，但是又相当精明，他有一股任侠之风，但也懂得官场中的那一套。像这种人，因为没有城府，雍正不免更加相

信他，袒护他。两江总督范时绎对李卫就相当不满，对雍正说了李卫不少坏话，但雍正丝毫没拿李卫怎样，体现了雍正正在用人方面的自信。

在雍正朝中，像李卫这样完全没文化的人当上地方大员的例子是相当少的。雍正封的三大廉吏分别是鄂尔泰、田文镜、李卫，其中，鄂尔泰学历最高，进士出身；田文镜学历次之，没有考上科举，但也是一个监生；李卫则是个纯粹的文盲。

李卫做官的风格跟这些人都不一样，他既是一个干将，又是一个贪玩的人。他干活非常拼命，干完活之后呢可以几天不上班，专门玩乐，工作享乐两不误。

李卫做事非常怪，不拘成俗。他到西湖玩的时候，看到西湖这么多年没人修了，就下了一道命令，让人重新翻修西湖。

维修西湖是要耗费很多钱的，这些钱谁来出呢？李卫自己是不会出的，当地的有钱人出，出了钱，修一个小庙，在庙里弄一个牌坊，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捐了多少钱。名留青史的好事大家一般还是愿意出份子的，即使是葛朗台，但巡抚开口，也不能拒绝啊！

西湖修好之后，李卫建了一个特大的庙，请了一个职业画家，把自己全家的画像都画出来，供奉在庙里。西湖的景色是相当美丽的，李卫觉得，如果在西湖里办公就舒服了。可是西湖中间都是水啊，不能在水上盖房子啊，李卫一想，干脆坐在船上办公吧！

就这样，李卫整日整夜坐在船上。如果有人找他办公，必须得划船过去，没船的话你就自己游过来，李大人是不会迁就别人的。

由此可以看出，李卫这个人非常高调，雍正念在他功劳大的份上，这些小事也不跟他计较，但乾隆就不一样了。乾隆四十五年，那时李卫已经去世了四十多年，乾隆南巡的时候来到西湖，看到李卫的像还在庙里供着，乾隆就生气了：有完没完，快撤了吧！

对李卫最看不惯的莫过于与他并列为廉吏之一的田文镜。田文镜曾在雍正耳边说李卫这不好那不好，最好革职查办，以免误导其他官吏。雍正怎么回答的呢？雍正说，他这个人确实有毛病，有时候盛气凌人，不懂礼节，但这些都是小毛病，我们私下里交换下意见就行了，用不着非得把他参掉。

后来这事被李卫知道了，李卫对田文镜非常生气，从此不理他。田文镜心想，这人受皇帝宠信，我这么一搞给人感觉就像个小人似的，得跟他缓和关系。后来，李卫的母亲死了，田文镜想借这个机会，给李卫送一份厚礼，这份礼确实很厚，二十万两银子。

都说礼多人不怪，收到礼物后，李卫一看是田文镜送来的，把来人轰出去，礼品扔出来，骂道：“我母亲如果活着，连小人一勺子水都不喝。”

李卫就是这么牛，连田文镜都不放在眼里。

李卫这人刚直不阿，却也明白事理，他虽然没读书，却为读书人出过不少力。我们知道，雍正继位之后，江浙一带经常发生反清复明的运动，这些反清复明的活动，背后往往都有读书人在操纵。雍正一怒之下，禁止江浙考生参加科举。这一禁就是七年，李卫来到这里后，身为这里的父母官，他也希望自己这里多多出人才啊！所以，苦口婆心求雍正高抬贵手，允许江浙考生参加科考，这一求就求了好几年，雍正终于答应了。没想到，江浙学生一参加考试，当年的状元、榜眼、探花全都落入江浙人的囊中。

这李卫真了不起，自己没读书，却能让读书人感恩戴德，做官做到这份上，可谓是做出了境界。

在打击盐业走私这块，李卫也相当干练。浙江是产盐大区，走私食盐的贩子多如过江之鲫。封建社会，政府一项重要收入就是盐税，所以每个王朝都把盐业盯得很紧，走私超过了多少斤就是死罪了。食盐是一个暴利行业，官办盐业的价格是成本价的几十倍，这么大的一个利润空间，是很难禁止的。

李卫是怎么打击私盐的呢？

第一，设立专门缉拿私盐走私贩的组织。为了打败那些大的走私贩子，还必须加强武装。有个姓沈的大盐枭，部众数百名，拥有好几艘大船，经常击败打击走私的官兵，气焰非常嚣张。李卫重用干将韩景琦，终于将沈氏拿下。

第二，盐贩子往往跟地方官勾结，所以要想打击盐贩子，少不了要整治官场。李卫加强官场纪律，奖惩分明，严厉约束地方各级官员。

第三，李卫在走私最为频繁的地方——海宁县长安镇设置巡盐千总，专门负责缉拿私盐贩子。

第四，控制产盐地，官家将所产的食盐全部购买，然后再分销给各商户，让他们再转手卖。

第五，降低食盐价格，让老百姓用得起食盐。

李卫的这些措施狠狠打击了猖獗的盐贩子，在浙江出现了食盐多私盐少的局面。遗憾的是，李卫调离浙江后，私盐业又猖獗了起来。

来。

雍正实行摊丁入亩改革的时候，在浙江省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如果没有李卫的强力推行，不可能进展得这么顺利。李卫在浙江做了不少造福百姓的事情，他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最让人脍炙人口的事情是活捉了大侠甘凤池，甘凤池是武侠小说中飞檐走壁的高手。其实，这甘凤池根本称不上大侠，李卫把他抓住后，还没有用刑，他就把同党全部都招了出来。

李卫只活了五十一岁，所以最后我们来说说他是怎么死的。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抑郁症，一种是肝炎。

抑郁症跟乾隆有关，肝炎就是自己身体的问题。据说乾隆即位之后，李卫的好日子就结束了。乾隆这个人一生写了几万首诗，虽然这些诗都很菜，但至少说明这个人读书相当多，古文功底是没有问题的。而李卫呢，一个文盲，乾隆能喜欢这种人吗？乾隆上台之后，重用学识渊博的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些人。

李卫呢，只能靠边站了，新皇帝觉得这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不愿跟他多接触。以前，李卫经常参鄂尔泰、张廷玉这些人，现在风水轮流转，鄂尔泰整他的时候到了。

就这样，李卫失宠了，很郁闷，加上本身又有肝炎，所以乾隆上台三年后，他就死掉了。

允祥受宠之谜

雍正跟自己的兄弟们关系都不好，允祥是一个例外。用雍正的话来说，允祥是一个贤王，自己是一个圣君，虽然有点臭美，但两人关系铁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雍正是中国历史中疑心非常重，也许仅次于朱元璋的皇帝。允祥和雍正有这么一层关系，允祥的生母去世很早，随后交由雍正的母亲德妃抚养。两人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允祥从小就跟雍正比较投缘，结果，雍正反而跟自己亲弟弟允禔的关系倒不是那么亲近了。

很早的时候，允祥就跟定了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四哥，这才是他稳坐雍正朝二把手的真正原因。后来，在所有的政治风波中，他都坚定地站在雍正这边。

在康熙在位的时候，允祥没有被封为亲王。雍正即位后，立即封

他为亲王，总理事务。允祥这个人很聪明，他不像年羹尧和隆科多那样，受重用之后反而更加谨慎，竭力辅佐雍正。他实在太了解雍正，他知道这是他自我保存的唯一办法，雍正这个人辣手无情，一旦你侵犯了他的权威，亲兄弟也杀。

从一开始，允祥就想老老实实做一个本分的亲王。

雍正执政之初，立了四个辅政大臣，第一个就是允祥，第二个是隆科多，第三个是允禩，第四个是允禩的党羽马齐。这四人中，雍正唯一信任的只有允祥。隆科多是帮助雍正上位的功臣，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得不笼络。而允禩党羽甚重，雍正提拔他是为了稳定大局。

正如雍正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辅政之初，阿齐那包藏祸心，扰乱国体，而隆科多作威作福，事实上只有怡亲王一人傲然独立其中，稳定大局，从而让奸邪之辈不能发作。”

允祥这个人是非常会做人的。雍正考虑到他平时非常节俭，援引康熙年间分封亲王每人每年二十三万银两的例子，给他二十三万银两。他坚决不肯接受，雍正再三颁发谕旨给他，不得已，他接受了其中十三万两，余下的十万两说什么也不肯要。雍正另行施恩，准备扩充他的警卫队，他也坚决不接受。

后来，雍正又要增加他的待遇，他又不接受。雍正心里感慨：真是个好弟弟啊！

雍正看允祥这么清廉，便放心地把财政大权交给他。在清查亏空中，雍正也把最高权力交给允祥。允祥呢，也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手握权力之后，没想过弄权徇私，而是踏踏实实地办事，认账不认人，努力为雍正改革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两兄弟在治国方面配合得非常默契，雍正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之所以有这种配合，跟允祥的智慧是分不开的。

雍正四年，雍正让允祥为自己寻找墓地，雍正信佛，相信灵魂不灭，所以对建造陵寝格外重视。他想找一个上好的风水宝地，这种事只能交给允祥。

允祥于是带着一干人等，跋山涉水，就像风水先生一样实地勘探。第二年春，在九凤朝阳山看到了一块墓地，雍正也觉得可以。后来开工之后，发现土地中杂有沙石，雍正不满意了，说规模虽大，但里面夹有沙石，不可用。允祥于是继续寻找，发现遵化没有理想的陵地，便来到易县的泰宁山太平峪，找到了一块上好的陵地。允祥上奏说：“这块地是乾坤聚秀的地方，阴阳在这里汇聚，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这才觉得满意。

允祥这次又立功不小，雍正决定在自己的万年吉地中赏赐一块“中吉”之地给他。

允祥听了，不但没有高兴，反而非常惶恐，他说这块地只有大富大贵之人才能享用，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臣子，绝对不能在帝王的陵寝上修建坟墓。允祥是多么明智的一个人，雍正是否真心赏给他不得而知，但他如此回应确实很讨帝王的欢心。

后来允祥在涑水县境内为自己找了一块平善之地作为墓地，认为像这样的墓地才适合自己，奏请雍正批给自己。雍正答应了他，接到圣旨后，允祥高兴得手舞足蹈。当天，允祥来到自己墓地后，从地上捧起一把土，连水都不喝，直接吞下，以此表示皇恩浩荡，自己感激不尽。

允祥就是这么一个谦虚的皇弟，一个很会做人的臣子。他病重之时，雍正经常要过来看他，他执意不肯，说皇上日理万机，千万不要为了小臣耽误了国事。在逝世之前，他反复叮嘱家人：“丧事要按照一般亲王的礼仪办，不得逾越半分，丧事一切从俭。”

1730年夏，允祥病逝，年仅四十四岁，雍正辍朝三日，悲痛万分。雍正亲自祭奠，素服一个月，一月内不举办任何宴会。

你说，有这么一个兄弟，雍正能不珍惜吗？

能人鄂尔泰

鄂尔泰是满洲镶黄旗人，生于康熙十九年，康熙五十五年当上内务府员外郎，从此在康熙朝就没有再升过官。所以，他这官做得并不痛快，康熙六十年元旦，他作诗：“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还写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鄂尔泰对于仕途非常失望，完全没料到自己后来出将入相，成为一代名臣。

康熙年间，雍亲王雍正请求鄂尔泰为自己帮忙，鄂尔泰说皇子应当坚持自己的道德，不应该结交外臣，拒不答应雍正。雍正不但没生气，反而认为这个人刚正不阿，是个忠臣，父亲没有重用他实在可惜。

雍正即位不久，便召见鄂尔泰，赞扬他：“你虽然官很小，但是却敢抗拒皇子，说明你这个人很有原则，以后我让你做大臣，你也一定会坚持原则的。”

雍正元年，雍正命鄂尔泰为云南乡试的副主考，鄂尔泰办事一丝不苟。五月，雍正就擢升他为江苏布政使。任用鄂尔泰充分体现了雍正的识人之术，他看出鄂尔泰可用，不仅不计前嫌，反而放心重用，胸襟确实博大。

雍正三年，鄂尔泰又升为广西巡抚，鄂尔泰赴任的途中，雍正又发来一道圣旨，调任他为云南巡抚同时管理云贵总督事。四年十月，雍正授予鄂尔泰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六年十二月，雍正让鄂尔泰兼管广西，封为云贵广三省总督。雍正十年正月，鄂尔泰被召回京城，被封为保和殿大学士，居首辅地位，相当于丞相。一个月后，加封一等伯。后来，苗疆叛乱，鄂尔泰平叛不力，被削去伯爵，留男爵，担任苗疆事务大臣。

鄂尔泰凭什么升官这么快呢？难道仅仅因为他刚直不阿吗？

鄂尔泰所以在雍正朝备受恩宠，光凭刚直不阿是不够的。这跟他为雍正做的事情有关，雍正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时，他为雍正详细地草拟了方针、措施，得到雍正的欣赏。随后，鄂尔泰认真地执行改土归流政策，对这项改革的成功付出了不少的血汗。

此外，鄂尔泰对用人挺有研究。他经常和雍正讨论用人之道，往往切中肯綮。哈元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后来平定苗疆之乱的张广泗也是鄂尔泰推荐的。而且，鄂尔泰对自己推荐的人才有客观清醒的认识，他评价哈元生：“人固然勇敢，但是有点接近残忍刻薄，才能可以用来做大将，不适合做统帅。”事实证明，哈元生确实只是一个将才。

鄂尔泰评价张广泗：“这个人意志坚定，胸襟开阔，但是有些固执，属于那种能够办好实事的人，但是不具备统筹大局全面规划的能力。”换句话说，张广泗可以做一个部门经理，但是当不了CEO。

雍正对鄂尔泰的识人之术是非常赞同的，他说：“爱卿的眼光，超越常人。”

当然，鄂尔泰也有受人指责的一面。比如，雍正是个嗜好祥瑞的人，鄂尔泰在这方面做得无人能及，难免给人拍马屁的嫌疑。其实，鄂尔泰心里清楚，祥瑞这种东西就是用来糊弄老百姓的，但他也知道，雍正正是要用这些东西巩固自己的统治。大理的一个县令刘某奚落鄂尔泰拍雍正马屁，身居高位的鄂尔泰不但不记仇，反而公开称赞他正直，向雍正推荐他。对鄂尔泰来说，报祥瑞并不是拍马屁，而是在政治上给予雍正大力支持，所以他才能够坦然面对批评。

鄂尔泰有一句名言：“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

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鄂尔泰的话听起来非常玄，实际上他是鼓励人们在官场上要辨明大是大非，至于个人恩怨那些小节不要锱铢必较。由此可见，鄂尔泰是一个政治家，确实有丞相之才。

张廷玉跟鄂尔泰关系不好，但是也非常佩服他的眼光，甚至将鄂尔泰关于“糊涂”的言论奉为金玉良言。

雍正与鄂尔泰的关系自始至终都非常好，虽然后来因为他平乱不力给予了象征性的惩罚，但是并没有因此疏远鄂尔泰。

除了在公事上，生活上雍正也给予了鄂尔泰适当的关心，以此表明君臣之间并不完全是公私关系。

首席秘书张廷玉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康熙十一年生，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后担任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

雍正即位之后，张廷玉晋升为礼部尚书，协办翰林院掌院学士事。第二年，调任户部尚书，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四年，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六年，转到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七年，担任军机大臣，加少保头衔。八年，赐轻车都尉世职。

张廷玉在雍正朝绝对是一个大忙人，一身兼任的职务繁多。有时候，雍正一天召他三四次。遇到公务繁忙时，通宵达旦处理事务。雍正把他和鄂尔泰看成是自己的左膀右臂。

张廷玉这么一个大忙人，然而遍查《清实录》却发现张廷玉并没有干什么事情，这是为什么呢？

说白了，张廷玉不是干具体某件事的人，他是皇帝的首席秘书，他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文字工作，这种工作繁琐枯燥，当然不像平定苗疆之乱那样清清楚楚，可以摆在台面上说。如果说鄂尔泰是雍正的张良的话，那么张廷玉的工作有点类似于萧何了。

军机处的规章制度就是张廷玉制定的，《圣祖实录》也是张廷玉主修的，张廷玉的功劳外人看不出来，雍正自己最清楚。所以，他给予张廷玉非常优厚的酬劳，雍正五年，他赏赐张廷玉一个当铺，价值三万五千两白银。张廷玉得了小病之后，雍正对左右说：“近来我感觉臂膀很痛。”左右好一会儿才听出雍正的弦外之音。

雍正需要处理那么多的奏折和政务，张廷玉如果不给力的话，雍

正估计会死得更早。所以，雍正一再对张廷玉施恩，还赠给他一个春联：“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以此表达了君臣二人的关系，一个是皇恩浩荡，一个是文治无量。张家世代代用这个对联作门联，表示不忘皇恩。

张廷玉做官奉行沉默是金的原则，在他看来，埋头做事就行了。他经常对人说，富贵荣辱自有天命。他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说：“经常见到皇帝想用的人，或者遭到弹劾，或者得病，或者死亡，结果却没有用。而皇上不想用的人，或因为有人推荐，或一时间没有适当的人才，反而见用了。所以说，人生有一定的定数，荣辱进退全凭命数，我们凡人只要埋头做事就好了。”

因为埋头做事沉默是金，雍正赞扬张廷玉“器量纯全”。雍正说这话也是有深意的，以前在康熙朝的时候，张廷玉是鄂尔泰的上司，后来雍正把鄂尔泰提拔到张廷玉头上。张廷玉纵然再沉默是金，心里难免也有不甘心的，他的那番“命数理论”更多的还是用来安慰自己。

张廷玉和鄂尔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雍正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确实有独到的用人之术。而且，这两人虽然不和，但是并没有影响到工作，反而各安其职，井水不犯河水，由此可见雍正驭人之高明。

模范督抚田文镜

田文镜，康熙元年生，在雍正的股肱大臣中算是最年长的了。田文镜不过一监生，康熙二十二年时因为没有合适的人才，候补的他当上了县丞，后来又升为县令。做了三十多年的官，康熙五十六年时，田文镜才升为内阁侍读学士。

雍正元年，田文镜开始发迹，出任山西布政使，第二年担任河南藩司，不久又升为河南巡抚。雍正五年，晋升为河南总督，外加兵部尚书头衔。六年，为河南和山东两省的总督。雍正十年冬，田文镜病死，雍正给他上谥号“端肃”。

雍正给田文镜的评价是：“老成历练，才守兼优，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

雍正的评价是有据可寻的。元年春，田文镜奉命去华山告祭，路过山西，发现闹饥荒，但巡抚德音谎称无灾。回来后，田文镜如实禀报给雍正。雍正立即让他去山西赈灾，罢免德音的职位。

田文镜担任河南巡抚后，发现封丘出现了罢考事件。田文镜力举镇压，以维护雍正的新政。但河南的学政张廷璐却支持学生，张廷璐是张廷玉的弟弟，田文镜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他仍然参劾张廷璐，雍正大大地赞扬了田文镜，给予张廷璐处分。田文镜所到之处无不以废除陋规为己任，哪怕因此得罪权贵，雍正对此非常欣赏。

田文镜在河南的时候，经常遭到人们攻击，大家说这个人非常刻薄。对此，田文镜非常清楚，但他表示自己不怕人言。前往山东之前，他就扬言推行河南的政策，即使闹得山东怨声载道也在所不惜。对此，雍正表扬田文镜是“巡抚中第一人”，各省如果都能学习田文镜，那么天下就可以大治了。就这样，雍正把田文镜树立为模范督抚。

当然，田文镜这个人终究是个老练之人，他所作的那些有很大的表演成分，但确实也做了不少的实事。譬如，他后来给李卫送礼，这是公然行使陋规，而他之前也可以说是废除陋规的一面红旗。

我们知道田文镜是以揭发德音隐匿灾情起家，讽刺的是，在他晚年也隐匿灾荒，最后被人捅出来，闹得满朝非议。雍正考虑到他立了不少大功，最后还是保了他。

后来田文镜的做官作风完全变了，经常报什么祥瑞、人瑞、丰登之类的，报喜的次数越来越多，就不习惯报忧了。八年，河南发生水灾，田文镜不但不报灾荒，反而说民间家里充实，可以自给。后来，灾民纷纷逃亡邻省，湖广总督迈柱将逃民送回原籍，并报告雍正。

田文镜的谎言被拆破后，不但不承认，反而狡辩说，直隶、山东、江南的饥民逃到河南后，河南的商人囤积居奇，导致粮价上涨。

第二年春，河南的饥民纷纷离乡背井，四处乞讨。田文镜不但不救济，反而竭力掩盖事实。雍正知道这事后，袒护田文镜，说：“田文镜是实心办事的大臣，绝对不会无视民生艰难，估计是他这些年来年老多病，精神不济，被下面的人欺骗了吧！”

雍正为什么要袒护田文镜呢？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他有功劳，另一方面也是封建君主习惯把祥瑞说成是上天表扬政治好，把灾荒看成是上天的不满。田文镜一心维护雍正统治，所以瞒着灾荒不报，雍正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田文镜跟李卫属于不同类型的人，李卫是真心办事的人，田文镜除了会办事之外，私心相当重。田文镜属于汉军正黄旗人，地位比较低，他很想跻身到上三旗里面去，但是又不便把自己的心思透露给雍正。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心思透露给河南布政使杨文乾。杨文乾再将

他的想法转达给雍正，雍正知道后，立即提拔他进入上三旗，还由他自己选择。结果，田文镜选择了正黄旗。

事后，雍正以一种责备的口气对田文镜说：“我们君臣之间，恩重义深，有什么想法，你直接告诉朕不就行了。以后如果有什么不好开口的话，千万不要再吞吞吐吐，直接告诉朕就行了。”

用人就是一手刚一手柔

雍正正在打击自己兄弟的时候手段非常残忍，容易给人留下这人无法容人的印象，其实雍正并非不能容忍不同观点，只是不能容忍对自己有威胁的政敌。

朱轼在康熙朝时颇受重用，雍正即位后，继续重用他，封他为太子太傅，兼任吏部尚书。但是朱轼不仅不感恩，反而处处跟雍正唱反调，雍正想推行耗羡归公，朱轼就表示反对。雍正没有因此而记恨，反而升他为大学士，让他教育皇子。后来朱轼生病，请求退休，雍正挽留他说：“你的病如果不可医，朕怎么能忍心挽留呢？如果可以治好的话，你又怎么忍心辞去呢？”

话说得非常动听，让人无法拒绝。

另外一个反对火耗归公的御史刘灿，雍正开始以为他有私心，后来看他心地还算纯正谨严，提拔他为福建汀漳道。他赴任之后，揭发督抚的不法行为，结果奏章被截回，刘灿气得用头撞墙。后来，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密参刘灿为人浮躁。雍正保护他，说他只是感恩图报过于急切所以才失礼，没什么大错。

雍正是一个很有自己判断力的人，他不容易受臣下的意见蒙蔽。

在用人方面，雍正敢于用那些乖张狂妄的官员，而且有自己的理论依据：“下属中敢顶撞上司的人，不可能是彻底糊涂的人，这些人必然有自信的地方。你们这些封疆大吏，千万不要因为下面一些小人的搬弄是非，而错误地把有才干的人也一起株连了。作为地方大员，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要被下面的意见蒙蔽了。”

雍正经常说为政的第一要义在于用人，治天下的根本就是用人，其余都是细枝末节。

用人的前提是知人，知人还得胸怀博大，能够容人的缺点和一时的错误。有一次，河南布政使田文镜举荐了两人，结果这两人都不是人才，田文镜向雍正请罪。雍正怕打消他推荐的积极性，安慰

道：“知人需要极大的智慧，连皇帝都觉得困难，即使是亲生儿子时间长了也难保他不会改变，你不用自责。”

对所谓的清官，雍正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认为光具备操守还不行，还得对皇上绝对忠心，会干实事。对于那些洁身自好，却不会治理地方的官员，雍正认为他们是沽名钓誉之徒。

在用人方面，雍正经常打破成例，破格使用那些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的人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卫，李卫性格粗野，大字不识几个，而且脾气特别暴躁，经常骂上司，甚至经常把雍正的朱批公之于众。这些毛病，雍正都清楚，雍正认为，李卫天性如此，很难改正。正如鄂尔泰所评论，李卫这个人虽然狂直不谨，但长处很多，做事全心全意，从不瞻前顾后，而且心气高傲，为人正直，是个非常难得的人才。雍正对此非常赞同。

雍正对大臣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有时候显得有些过分。如果大臣生病，雍正会表现出极大的关心，或派医生过去医治，或者赐药。年羹尧受宠之时正值壮年，但是却气血两亏。雍正知道后，赐给他“天王补心丹”等名贵药材，让他爱惜身体，不要在无用的事情上劳心。田文镜受重用时已经六十岁，经常头痛发烧感冒，雍正非常关心他的身体，派遣医生为他治疗。李卫虽然身体壮硕，但体质不行，曾经多次在工作中吐血，雍正认为这是李卫急于报效，用心太过。所以，屡次劝他戒骄戒躁，要量力而行，不要透支身体。雍正的这些关怀可以看做是情感的投资，也是用人技巧的一面，收效非常好，可以看成是用柔术。

柔术只是雍正用人的一面，雍正还特别擅长权术，他总是揪着别人的过错让人效死力。雍正对尹泰和尹继善的父子驾驭就是一种权术的考量。尹泰原本是国子监祭酒，康熙末年，闲居在锦州。雍正还是阿哥的时候，曾经到奉天去祭奠祖陵，住在尹泰的家里，了解了尹泰及其子尹继善，认为这两人都挺有才的。

雍正元年，尹继善考中进士，被召回京城，授内阁学士，从此以后，父子俩飞黄腾达。雍正让尹泰以左都御史的身份协理奉天将军。尹泰已经年过七十，思想保守，精力不济，把盛京管理得一团糟，雍正两次惩处了他。尹继善显然比父亲的能力更强，雍正觉得他是封疆大吏的料。雍正让他做署理江苏巡抚，为了让他安心做事，雍正还将他老爸官复原职。

雍正一面做好事，一面放出了警告的狠话，他告诫尹泰要改掉老毛病，还叮嘱尹继善，不要学习老父的坏毛病，之所以赦免你爸，是因为可怜他年老，另外也因为你是可造之材。尹继善感激涕零，发誓

要为国家做一辈子牛马。雍正就是这样，让人在心惊胆战中过日子，让人不得不效力。

对于藩邸旧人，雍正并没有格外重用，许多人反而闲置不用，例如：戴铎、戴锦、博尔多等人基本上处于闲散状态。像常賁、沈廷玉、傅鼐这些人，虽然被启用，但都受到罪责和斥骂。在主子当上皇帝后，这些人不但没有好日子过，反而整天生活在心惊胆战中。

在世人眼中，雍正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也确实如此，他在朝野中布置了大量的密探。傅鼐身败名裂后，本来应该发配到黑龙江，但是雍正却别出心裁，他让傅鼐去盛京，公开监视已经失势正在接受检查的蔡珽，让蔡珽一切事情都必须通报给傅鼐，傅鼐只能监视，不能干涉蔡珽，让这两个人互相恼恨。由此可见，雍正的心理是非常阴暗的，他总是从阴暗摸索出控制人的办法。

密折制度也是用来监视群臣的，目的是把所有的人都操控在自己的手中，雍正最讨厌的是臣下结为朋党，一旦发现这种行为，雍正会毫不留情进行打压，有时候到了非理性的地步。

第九章 西北不安宁

准噶尔是一个游牧民族，擅长骑兵，机动性很强，历来讨伐他们就很难。清军要想跟他们作战，必须有强大的骑兵。骑兵好找，但如何保障军需是个问题。前线跟内地距离太远，又多是荒漠地带，粮食很容易受到敌人的截击。

年羹尧平青海之乱

康熙亲征噶尔丹时，固始汗后代八家台吉谒见了康熙。康熙封他为亲王，并授予部落里其他的人一定的爵位，这实际上象征着青海和硕特部受到清朝的管辖。

康熙末年，固始汗子孙的势力重新崛起，罗卜藏丹津承袭了亲王爵位，以固始汗嫡孙自居，谋求成为青海和硕特部落的首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罗卜藏丹津不惜和策妄阿拉布坦勾结。

雍正元年夏，罗卜藏丹津在察罕托罗海召集各个部落的首领，要大家放弃清朝的爵位。罗卜藏丹津自称达赖浑台吉，要求统驭各个部落。当然，有人要统一，有人肯定不乐意，和硕特的另一个亲王察罕丹津和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不赞同，罗卜藏丹津就派兵攻打。

察罕丹津等人逃到甘肃河州，雍正妥善地安置了他们。

针对这场叛乱，雍正采取了两手政策。一面派人给罗卜藏丹津宣布谕旨，让他罢兵修好，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会惩治；另一方面，雍正命令年羹尧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出兵平叛。

罗卜藏丹津对雍正的警告置若罔闻，反而将责任全部推到察罕丹津等人头上。随后，他假装要罢兵，把雍正的使者常寿诱惑到察罕托罗海，囚禁起来。此外，罗卜藏丹津还和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门联系，希望他能支持自己。塔尔寺是喇嘛教的圣地，察罕诺门信徒众多，得到他的支持意味着势力的大增。察罕诺门选择支持罗卜藏丹津，顿时，归附罗卜藏丹津的人多达二十万。

得到察罕诺门的支持，罗卜藏丹津如虎添翼，叛乱迅速在青海蔓延，甘肃、四川一带人心也不稳。

雍正元年十月，罗卜藏丹津大军对西宁府周围的南川申中堡、西川镇海堡和北川新城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年羹尧在奏折中向雍正反映：“叛军包围南川、西川、北川，每处都聚集着贼众两三千人，贼众攻城放火，无所不为。”

警报传到京城，雍正决心用武力平叛，尽管这时国内局势不是很稳定。此时，雍正最能仰赖的就是年羹尧了，他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延信为平逆将军，岳钟琪为奋威将军。雍正谕令边防的大臣、总督、巡抚等等全部听从年羹尧的调遣。这时，雍正和年羹尧正处于蜜月期，两人关系非常好，难怪有人怀疑雍正是年羹尧的儿子。

年羹尧接受命令后，立即率军从甘肃来到西宁。随后，年羹尧对战争作出了周密的部署，派兵驻守在永昌和布隆吉河一带，防止叛军作乱；又分兵守在巴塘、理塘、黄胜关等地方，截断敌军的进藏通道。年羹尧还请示雍正让靖逆将军富宁安屯兵吐鲁番，隔断叛军与准噶尔部落的联系。

布置妥当之后，年羹尧下令进攻西宁周边的叛军，一一将罗卜藏丹津的党羽击溃。罗卜藏丹津看到部众这么不堪一击，不由得发了慌，主动送还清廷的使者常寿，向雍正请罪，希望清廷能罢兵言和。

年羹尧虽然有调度权，但这事不好自作主张，便请示雍正。雍正坚定地说，不可以求和，用武力消灭叛徒。

雍正作战态度坚决，十二月，许多蒙古的部落纷纷投降清朝，总计有十万余众。雍正二年正月，岳钟琪先后平定了作乱的喇嘛，在攻打郭隆寺时最为激烈。郭隆寺的喇嘛素来和罗卜藏丹津关系不错，抵抗得非常顽强。岳钟琪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在他的指挥下，斩了几千个喇嘛的首级，其余的喇嘛纷纷逃到山洞里。最后，岳钟琪用火堵在山洞口，把他们活活熏死了。清军以三千的兵力击败上万喇嘛军队，属于以少胜多，连年羹尧都夸奖岳钟琪厉害。

二年二月，年羹尧召集各路将领商议，年的意思是调兵两万，从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河四个方向会攻。岳钟琪提出意见说，青海地域辽阔，敌军不下十万，如果我军分散的话，反而会四面受敌，不如趁着春草未生，派出五千精兵，直捣敌巢。

雍正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采纳岳钟琪的建议，让岳钟琪负责这次作战。二月初八，岳钟琪领军出击，经过一昼夜的时间，找到了敌人的巢穴。此时，敌人还在睡梦中，听说敌军偷袭，仓皇之态可想而知。罗卜藏丹津为了逃命，居然穿上女人的衣服，连夜逃往准噶尔。岳钟琪穷追不舍，每天追三百里，一直追到桑罗海，最后无路了，才归还。虽然岳钟琪没有抓住罗卜藏丹津，但俘获了他的母亲和妹妹，

还有其他一些部落的首领。

这场战役历时十五天，杀敌八万，收降数万，获得牲口和武器无数。雍正说这次胜利是十年以来从未经历的奇功。雍正很高兴，封年羹尧为一等公，岳钟琪为三等公。

不久，年羹尧又肃清了叛军的残部。

善后处理

平定青海叛乱后，年羹尧提出了十三条善后建议，雍正全部接受了。这些建议分别是：

一、根据青海和硕特诸部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分别给予奖赏或者惩罚，恩威并用，以此警示那些反复无常的部落。

二、仿照喀尔喀蒙古，实行札萨克制度，给和硕特各个部落制定游牧地，编为佐领，授予佐领为札萨克。让他们内部不能互相征战，也不能反抗中央。各个部落每年举行一次会盟，盟长由大清皇帝制定，不许他们私自推选。

三、以前和硕特人进贡没有规律，现在将他们的部落分成三班，三年一班进贡一次，九年一个轮回，进贡时马匹骆驼自备。和硕特人和内地的贸易，指定在西宁和西川口外的日月山进行，每年交易四次。

四、在青海的喀尔喀蒙古人，以前受到和硕特的统治，为了分化和硕特，允许喀尔喀设置佐领，建立札萨克，听命于中央政府。

五、青海的藏人原本受制于和硕特，需要定期缴纳赋税。现在应该把这些藏人统一编户籍，设立卫所，由我们来收税。再挑选一部分藏人任命为千户、百户、巡检，他们负责帮我们收税，我们收的税最好要比他们之前交给和硕特部落的要少，以便抚慰。

六、应该安抚达赖和班禅这些人。譬如，每年赏赐五千斤茶叶给达赖，班禅两千五百斤。过去藏人和内地贸易，要两处交税，既要交给清军，又要交给达赖。为了促进贸易的发展，不如两地都免收税。

七、整顿青海的喇嘛寺。喇嘛寺是这次叛乱的一个重要力量，而且这些喇嘛寺特别大，多的有几千，少的也有五六百人。这些喇嘛收钱收粮，很容易成为叛乱势力的温床。所以，最好规定每个喇嘛寺里不准超过三百人，而且不能收税，他们的衣食住行由政府解决。

八、从西宁到北川口、大通河、野马河、甘肃扁都口，这些地方应该沿途建设一些城堡和土墙，严禁蒙古人进入这里游牧。

九、在西宁这些地方应该增加驻军，以便随时弹压。

十、在藏人居住的许多地方，应该设置驻军。

十一、设立一些新的军营，相应地减少一些旧的军营人数。

十二、在西宁和甘州、凉州之间，屯田种地，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流放的犯人押到这里干活。

十三、年羹尧从西宁撤回西安，办理川陕总督的事务，岳钟琪留兵四千，负责善后。

年羹尧还提出禁止青海十二事，雍正认为他的建议周密有效，都采纳了。平定叛乱，再加上这些善后措施，使得清政府有效地控制了青海。在康熙时期，中央政府对青海的控制还停留在间接统治的层次上。

青海平叛虽然名义上解决青海蒙古人叛乱的问题，但其实也涉及西藏问题。青海与西藏毗连，稳固了青海，有助于解决西藏问题。成功解决青海叛乱问题，固然有年羹尧、岳钟琪等人的大功，但也离不开雍正的英明决策。雍正一开始想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可惜行不通，之后便坚决主张武力，哪怕罗卜藏丹津再三请罪请求息兵，雍正都不答应。这次胜利，充分显示了雍正用人的高明，他将大权委任给年羹尧，同时又给岳钟琪充分的自主权。比如，岳钟琪曾经上奏给雍正，说军情千变万化，请求不必事事先请示年羹尧再行动。雍正批道：“朕信得过你，凡事都以持重为上。西边有年羹尧和你两位，朕可以高枕无忧了。希望你们快点成功，早点传来捷报。”

如果不是雍正充分放权，信任年羹尧和岳钟琪这样的人，平叛不可能如此顺利。

经营西藏

青海问题解决后，便是西藏的问题。

在雍正刚继位的时候，四川巡抚蔡珪上奏从西藏撤兵，根据蔡珪的说法，这样做的目的是安定八旗的人心。雍正认为这种想法极为荒唐和孟浪，用雍正的原话说就是“以皇考举行此事为非”。有意思的是，这段历史是篡改过的，雍正当时其实是赞同蔡珪的看法的，后来局势发生变化，为了体现自己的英明，雍正改写了这段历史。

实际上，在元年的时候，他已经将驻藏军队撤到四川的察木多（今西藏自治区昌都）。所以说，雍正刚继位的时候，对西藏的控制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放宽了。

雍正初年，西藏内乱酝酿，雍正将铁手伸向西藏，加强对这个地区的控制。这一年，西藏五个噶伦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大家知道噶伦是康熙设置的官位，用来分化西藏的势力。五个噶伦又分成两派，一派以贵族康济鼐和颇罗鼐为代表的后藏势力，另一派以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为代表的前藏势力。七世达赖的父亲索南达杰支持前藏势力，刚开始，两个派别都忙于防范准噶尔，所以彼此的矛盾掩盖了起来。

平定青海叛乱后，雍正故意提拔康济鼐，让他骑在阿尔布巴等人的头上。作为一名贵族，阿尔布巴地位比康济鼐高，实力也更强，甚至得到了七世达赖父亲的支持，雍正这么做分明是挑起他们内部矛盾。阿尔布巴公开表示：“我跟康济鼐的功绩一样，同受大清皇帝恩宠，名声和地位都一样，如果让我给别人提鞋，我可不愿意。”

雍正三年六月，驻军西藏的四川总兵周瑛奉旨回京，第二年，驻扎在西藏的礼部侍郎鄂赖也奉旨回京。结果，西藏的事情就完全交给西藏人自己处理，佛父索南达杰趁机干政。

三年十一月，雍正派遣鄂齐、班第等人再次入藏，阿尔布巴等人得知这个消息，亲自到察木多迎接。四年六月，鄂齐等人抵拉萨后，宣布康济鼐为“总理”，阿尔布巴充当康济鼐的下手，为“协理”。鄂齐还表示雍正希望康济鼐和佛父索南达杰一同进京。

对此，阿尔布巴很不满，佛父是同情阿尔布巴的，也很不满。其时，川陕总督岳钟琪派遣参将王刚随鄂齐入藏，王刚回来后，告诉岳钟琪：“阿尔布巴等人和康济鼐见面时，虽然极为恭谨，看上去也特别和气，其实这些人私下里沆瀣一气，故意把康济鼐孤立了起来。钦差刚到西藏时，达赖的父亲看上去特别高兴，踉跄迎接，后来听说要让他和康济鼐一起赴京，马上又称病，推辞不去。很明显，阿尔布巴这些人和他们的领导康济鼐貌合神离，有叛乱的倾向。”

岳钟琪第一时间将这些情报转达给雍正，雍正担心阿尔布巴这些人在西藏闹事，更害怕他们和准噶尔勾结，雍正指示岳钟琪要做好准备。此外，雍正接受鄂齐的建议，革掉隆布鼐、扎尔鼐两人的噶伦职位，孤立阿尔布巴。

五年正月，雍正正式任命内阁学士僧格和副都统马喇为驻藏大臣，阿尔布巴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定先干掉康济鼐和颇罗鼐两人，再造成西藏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既成事实，迫使清政府承认。

六月十八日，阿尔布巴勾结隆布鼐等人，经过精心的策划，借口噶伦议事的机会，在大昭寺中将康济鼐一伙人杀死。不久，他们又进攻后藏的颇罗鼐。

七月二十日，雍正派出的使者来到距离拉萨只有三天路程的地方，阿尔布巴派人去迎接说：“现在七月是黑运月，此时入藏非常不吉利，你们还是八月来吧。”阿尔布巴想拖延时间，打败颇罗鼐。

后来八月来了，阿尔布巴也没有打败颇罗鼐，只好十里外跪迎钦差大臣。僧格和马喇到了后，连忙询问康济鼐被杀之事，七世达赖称这件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阿尔布巴则顾左右而言他，说颇罗鼐是个叛徒，不出几天就可以把这个人击败。

僧格等人了解到实情，立即汇报给雍正帝。雍正命令陕西、四川、云南等各路兵马做好准备，以备调遣。雍正认为，只要出兵西藏，将达赖喇嘛迁到西宁，西藏就可以永远无事。后来，他深入考虑到，如果出兵的话，万一阿尔布巴狗急跳墙，挟持达赖逃亡准噶尔，那等于是让事情进一步恶化。所以，雍正决定暂不出兵，岳钟琪不赞同这种观点，他深知事情的严重性超出了雍正的预料之外。

岳钟琪说，阿尔布巴勾结达赖及其父亲，他们狼狈为奸，形成党派，为了自身的利益，公然杀害朝廷命官，如果这样的人都不除掉，西藏后患无穷。岳钟琪建议在春暖时节派大军入藏，同时发兵讨伐准噶尔，同时解决两个大麻烦，岳钟琪还建议先解除阿尔布巴的职务。不过，鄂尔泰并不赞同这种看法，他认为“以抚为上，剿杀次之；羁縻为上，驾驭次之”。

雍正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他既不赞同鄂尔泰的主张，又不敢按岳钟琪所说的出兵，他非常担心阿尔布巴挟持达赖潜逃准噶尔。犹豫来犹豫去，他只好让岳钟琪派人前往拉萨，告诉僧格、马喇等人不要受阿尔布巴的迷惑，要心里明白，凡事偏袒颇罗鼐一方。

十一月中旬，事情出现了转机。阿尔布巴因屡屡不能战胜颇罗鼐，居然请求清政府出兵入藏。接到这个消息，雍正喜不自禁，立即答复说来年春天就出兵入藏。没多久，准噶尔的首领策妄阿拉布坦逝世，真是天助雍正。

六年五月，清军分南北两路向西藏进发，北路由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统迈柱率领八千四百人，南路由四川总兵周瑛率领四千人，两支部队同时入藏。六月十五日，周瑛接到消息，颇罗鼐已经占领了拉萨，擒拿了阿尔布巴等人，正等候清朝官员过来审理呢！

清军进入西藏后，按照雍正说的，诛杀了叛乱分子阿尔布巴等

人，颇罗鼐被封为贝子，代替康济鼐，总理西藏事务，雍正还特地赏他三万两银子。

平定了阿尔布巴叛乱之后，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和管理。清朝一方面将西藏的政务委任于颇罗鼐一身，另一方面在西藏设立办事衙门，派遣驻藏大臣两人协助颇罗鼐管理。此外，还留了两千士兵在西藏。

派遣驻藏大臣的同时，清廷还决定将七世达赖父子移到内地，雍正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达赖父子是作乱的根源。

青海叛乱虽然平定了，但是准噶尔那边又不安分了。策妄阿拉布坦死后，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噶尔丹策零扬言说要送回康熙年间掳走的拉藏汗的两个儿子，换句话说，就是要干涉西藏内政。

用兵准噶尔

前面说道，雍正二年时，岳钟琪曾经打败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带着两百人逃到准噶尔，被策妄阿拉布坦所收容。清政府再三索取罗卜藏丹津，策妄阿拉布坦却始终不肯交出来。一时间，清军和准噶尔在边境地带对峙起来，气氛紧急，剑拔弩张。

策妄阿拉布坦死后，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接替。雍正决定一鼓作气解决准噶尔问题，在西藏问题上，雍正习惯将西藏问题和准噶尔问题一起考虑。雍正说：“西藏和准噶尔的事情，跟安南（越南）、俄罗斯等海外国家不一样，其关系到内蒙四十八旗，还有西海蒙古、喀尔喀蒙古人的问题。准噶尔一天不安静，西藏的事情一天就办不好，西藏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蒙古部落肯定心怀二心。这是国家社稷的大问题啊！”

在雍正看来，西藏和准噶尔关系非常密切：准噶尔安稳了，西藏这边也不会生事；准噶尔如果很不平静，那么西藏这边也会有动荡。雍正认为，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喇嘛教，不论准噶尔还是西藏人，都相信喇嘛教，换句话说，达赖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只有达赖才能控制局面，所以一旦发生混乱，各方势力都争夺达赖。

雍正决心抓住机会，趁着西藏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去世这样的好机会，出兵准噶尔。雍正让岳钟琪做好准备，兵分两路，准备讨伐准噶尔。

准噶尔是一个游牧民族，擅长骑兵，机动性很强，历来讨伐他们

就很不容易。首先，清军要想跟他们作战，必须有强大的骑兵。骑兵好找，但如何保障军需是个问题。前线跟内地距离太远，又多是荒漠地带，粮食很容易受到敌人的截击。雍正最开始打算用驮马运输，但成本太大，行动不方便，很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

岳钟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提出车战的办法，具体思想是将运输和作战合为一体，并且通过车体作为掩护。按岳钟琪的说法，战车长五尺，宽两尺，一个人推，四个人保护，大家轮流推。一车五人，五车为一伍，五伍为一乘，四乘为一队，十队为一营。军需放在车上，驻防时，大家以车作营盘，打仗时，两队冲锋陷阵，三队紧跟着，其余五队围绕着营盘环护，堵杀冲入大营的敌军。

雍正接受了这个建议，下令打造战车，并密令各省督抚选出一些士兵，充作运粮兵。

七年二月，准备工作到位后，雍正历数准噶尔首领的罪恶，说新继任的噶尔丹策零毫无悔改的意思，对准噶尔用兵是完成圣祖未竟的事业。雍正照例走走形式，让大家讨论一下该不该用兵，尽管反对意见很多，但只是个过场。

三月，雍正下令两路大军同时出发，讨伐准噶尔，北路由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率领，屯兵阿尔泰山，西路由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率领，双方会师后攻打伊犁。

噶尔丹策零听说岳钟琪率军两万出哈密，派出使者来到岳钟琪的军营，使者告诉岳钟琪，罗卜藏丹津密谋杀害噶尔丹策零，阴谋未遂被抓，噶尔丹策零准备把他献给清朝。噶尔丹策零的意思很明显，希望雍正不要发兵，自己会跟清廷好好合作的。

岳钟琪将这个情报告诉了雍正，并声称自己怀疑噶尔丹策零的诚意。雍正想了想，让两大将军暂停行军，并召他们回京，面授方略。然后，雍正给噶尔丹策零发了一个谕令，让他请求封号，并将他所有的部下都编旗分佐领。

雍正的谕令毫无疑问让噶尔丹策零非常恼火，正好，岳钟琪回京了，噶尔丹策零率军两万袭击了科舍图的清军，来个先下手为强。岳钟琪和傅尔丹回京后，提督纪成斌和副将军巴赛分别暂时代管他们的将军印。科舍图距离纪成斌的大营比较远，纪成斌完全没有料到噶尔丹策零会来这一手，噶尔丹策零乘虚进入科舍图牧场大肆劫掠，总兵樊廷、副将冶大雄率军两万赶来救援，后来，张元佐总兵也赶过来救援。激战了七天七夜，总算夺回了大部分的骆驼和马匹。

雍正嘉奖了樊廷等人，将纪成斌降为副将，并让北路军的副将查

弼纳赶过来支援西路军。科舍图的失利应该说是雍正决策的失误，他误信噶尔丹策零之言，将主帅召回，导致军机延误。但雍正却责怪岳钟琪，甚至怀疑他搞鬼。九年二月，岳钟琪奏议军机事宜十六条，雍正却说他的奏折无一可取之处。后来，又派人监视岳钟琪，时常责备岳钟琪，说他带着两万九千人马，一味防守，不知御敌，调度无方。五月，雍正任命石云倬为西路军副将，名义是协助岳钟琪，实际是牵制他。满人查郎阿在岳钟琪出兵的时候，就代理川陕总督，岳钟琪事实上又受到查郎阿的限制。事实上，此时的岳钟琪受到重重的监视，这无疑打击了他的积极性。

九年六月，噶尔丹策零得知西路军牲口匮乏，不能进攻，便派遣大小策凌敦多布率军三万进攻北路军。进攻之前，噶尔丹策零先派人向傅尔丹诈降，傅尔丹有勇少谋，未能核实敌情，就轻信了他们，由准噶尔人领头，率领一万人前进，企图击破博克托的准部。副都统定寿、海国、永寿这些人虽然极力苦谏，说敌人可能是使诈，不要轻敌前往，但傅尔丹就是听不进去。

六月二十日，傅尔丹率领军队进入敌人的埋伏圈，两万多准噶尔部队对清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当傅尔丹派出增援部队时，清军的前锋部队已经被击溃。这一战清军大败，退到科布多。

失败的消息传到雍正耳朵里，雍正为了掩饰，不但没有怪傅尔丹，反而说：“这一战损兵败绩，固然有罪，但朕也有不是，是朕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逼着傅尔丹出战，所以宽恕傅尔丹的过错。”

雍正甚至把自己的腰带赐给傅尔丹，说：“朕知道你们很愤怒，知道你们很想报仇，但还是希望你们理智。敌人即使来了，也不要轻易追击，如果能坚守，你们就算是有功劳了。如果科布多难守，可以退到察罕瘦尔。”

大胜清军之后，噶尔丹策零的野心不断增长。九月，噶尔丹策零让小策凌敦多布率领六千骑兵，作为先锋，向克鲁伦河方向进攻。大策凌敦多布拥兵两万，作为后援。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率领部众阻击，重创小策凌敦多布，斩杀了敌方的巴图鲁。

傅尔丹失利后，岳钟琪请求由自己派兵进入乌鲁木齐，雍正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同意了。岳钟琪兵分三路，攻向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附近的敌人纷纷迁徙，死伤甚重。

十年二月，噶尔丹策零派六千人骚扰哈密，其时，岳钟琪屯兵巴里坤，拥兵三万。当时是冬天，大地积雪，不方便作战。哈密那边发来求救信号，岳钟琪命曹勣前去救援，曹勣在二堡附近打败敌人。岳钟琪又让石云倬截断敌人后路，岂料石云倬动作迟缓，让敌人提前逃

走了。

事后，岳钟琪弹劾石云倬，结果雍正反而责备岳钟琪，说他思想游移导致战守混乱，要他好好反省以观后效。鄂尔泰也趁机弹劾岳钟琪，说他身为大将军，在边疆只手遮天，然而智谋不足以料敌，勇敢不足以在战场上歼灭敌人，玩忽职守。雍正一听，连鄂尔泰也说你不好，削去岳钟琪公爵和少保头衔，降为三等侯。后来，雍正又把岳钟琪召回京城，当面指责他：“掌管国家军旅重务，却把这些事情视同儿戏，而且赏罚不公，号令不一，平时不体恤将士，也不善于接受别人的建议，为人刚愎自用。”

随后，雍正命查郎阿代理岳钟琪的职务，查郎阿是满人，雍正等于是把西路军最高统治权交到满人手里。雍正任命张广泗为查郎阿的副将，张广泗到了以后，说岳钟琪的车骑营战法根本不适合西北地区，而且岳钟琪在统兵作战这方面也毫无章法。查郎阿也对岳钟琪很不满，于是参劾了岳钟琪、纪成斌、曹勳等人，雍正下令将纪成斌、曹勳这些人立斩于军营，至于岳钟琪，先囚禁起来。

雍正十二年，大学士奏议将岳钟琪处死，雍正没有作出决断。

十年六月，噶尔丹策零率领大军越过阿尔泰山，傅尔丹在乌逊珠勒与其会战，结果大败。噶尔丹策零于是轻松来到杭爱山，抢夺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土地。八月，噶尔丹策零袭击喀尔喀蒙古中最强大的部落策凌部落，策凌是大清的额驸、和硕亲王、喀尔喀大札萨克，驻在本博图山。当他听说噶尔丹策零偷袭自己的领地，掠夺自己的子女时，非常愤怒。他割断头发和马尾誓天，亲率两万蒙古兵驰援，同时急报顺承郡王锡保，请求他同时出兵，两路夹击敌人。

策凌带着两万人半夜时分从小道上山，到了第二天早上，犹如一群天兵天将出现在准噶尔部队的上面。策凌的人马从山上疯狂往下冲，很多准噶尔人还在睡觉，来不及准备就被踩得人仰马翻。准噶尔的部队无法应战，只能仓皇逃窜。

策凌穷追不舍，一直将噶尔丹策零追到鄂尔浑河边的额尔德尼昭（光显寺），这个地方左边是大山，右边是大水，无路可逃。策凌见状，率领大军对准噶尔进行一番杀戮，杀死了上万敌人，山谷里到处是尸体，河水几十里都是红色。

到了夜晚，噶尔丹策零率军突围而出，从推河逃走，什么辎重牲畜啊，都来不及带走，全部都塞到山谷，以阻碍追兵。

策凌和锡保给驻扎在拜达里克城的将军马尔赛发了一封信，请他出兵拦截噶尔丹策零。马尔赛手中有一万三千的人马，如果出城拦击

的话，可以全歼噶尔丹策零。但不知为何，马尔赛却拒绝出兵，尽管他手下的副将达尔济苦苦请求，副都统傅鼐也急切希望出兵。

当将士们看到逃窜敌军完全没有阵形，居然不顾主将的反对，自己出去追敌，结果斩获了千余名敌人。不过，敌人的首领噶尔丹策零早已逃走。这次战役策凌居功甚伟，雍正封他为超勇亲王，大加赏赐，并授予他为定边副将军，屯兵科布多。那个拒绝出兵的马尔赛被斩首。傅尔丹作战不力，削去官爵，留在军营里戴罪立功。锡保临阵怯懦，被罢免靖边大将军职位，年轻的多罗郡王福彭取而代之。

自从张广泗来到西路军后，军容有所改观，壁垒坚固，贼兵来了就会受创伤。

光显寺大败后，噶尔丹策零元气大伤，派人来请和。雍正看到出师这么久，没什么战果，便下令停止进攻。十一年五月，雍正召集策凌、查郎阿等人进京，讨论要不要继续开战。策凌、查郎阿主张继续打，张廷玉却主张议和，认为先安抚为上策，如果准噶尔不老实的话，再征剿不迟。大学士傅鼐很赞同张廷玉的意见。雍正最后决定议和，派遣傅鼐和阿克敦与准噶尔谈判。直到雍正死，谈判也没有达成最终协议。最后，这个烫手的马铃薯交给了乾隆。

用兵准噶尔的得失

雍正在西北两路用兵，总的说来是没有收到很大的效果的。作为最高领导者，他的决策失误和用人失败是用兵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雍正对于准噶尔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策妄阿拉布坦死后，他认为这是向准噶尔进攻的最好时机。事实证明，他判断失误，继位的噶尔丹策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此外，噶尔丹策零用计说送罗卜藏丹津进京，雍正听信了他的话，结果延误军期，挫伤了士卒的锐气。作战之后，清军接连败北，如果没有策凌的两次胜利，清军就血本无归了。

北路军几次失败，跟雍正的用人有很大的关系，北路军先后用了三个主帅。首先是傅尔丹，其次是锡保，最后是马尔赛。

傅尔丹这个人有勇无谋，担任靖边大将军时，轻信敌人，惨遭失败，后来担任振武将军，也不能克敌制胜。事实证明，傅尔丹这个人没有统帅之才。据说，有一次岳钟琪和傅尔丹商量军机大事，岳钟琪亲自来到傅尔丹的帐中，看到墙壁上挂满了兵器。岳钟琪问他有什么用，他说这是我平常习武用的兵器，挂在这上面可以激励全军将士。

岳钟琪出来后，说道：“身为一个大将军，不靠谋略，而仰仗勇武，离失败也不远了。”

顺承郡王锡保根本不是打仗的料，他是个八面玲珑协调关系的人，雍正让这样的人当大将军无非因为他是满人。马尔赛也是一样的，至今人们还猜不透他当时为什么不拦截穷寇。福彭为人比较老成狡猾，深得雍正的信赖，可惜他也不是大将军的料，担任大将军期间，也没有什么作为。

岳钟琪是一个优秀的将领，跟随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时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才能，也正因此，雍正对他期望很高。可是在科舍图刚一失利，雍正就把责任推到岳钟琪身上，对他又猜忌又贬损，让人把岳钟琪严密监视起来，让庸才查郎阿取代岳钟琪。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雍正用人的另一面，根据个人的好恶奖惩，没有依据客观的赏罚标准。傅尔丹在和通绰尔失败后，雍正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赐给他御用腰带，后来傅尔丹再败，雍正也只是象征性地削他的爵位。与傅尔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岳钟琪，雍正刚开始的时候对岳钟琪宠信有加，科舍图失利，主要责任在雍正自己和纪成斌，敌人在哈密逃跑，罪在石云倬，结果雍正处罚岳钟琪，将他下狱论死，这种奖惩带有很大的任意性。

说白了，还是满汉地位的不平等，汉人将士的地位比不上八旗将士，这种不平等导致了赏罚不公。赏罚不公难免会让军心不稳，绿营士兵难免会对上面不满，影响了士气和战斗力。这时的八旗军早已失去了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的那种拼搏精神，他们安逸惯了，讨厌征战，但绝不是和平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打仗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马尔赛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人。马尔赛公开说：“做大将军还不如发配到黑龙江安逸舒服。”

这样一个大将军会统率怎样一群士兵呢？不用想也知道，偏偏雍正对汉人不信任，要用窝囊废制约和监视像岳钟琪这样的人。所以，西北两路用兵基本上是失败的。

尽管如此，也不能完全抹煞雍正的功绩，策凌的两次胜利毕竟给予准噶尔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让他们主动求和，为乾隆解决准噶尔问题奠定了基础。

最后说说岳钟琪的命运，雍正毕竟还是明理的人，没有让岳钟琪重蹈祖先岳飞的命运。但岳钟琪也在班房里蹲了五年，乾隆即位后，释放了他，但此时岳钟琪已沦为平民。乾隆十三年，因为用兵金川，乾隆想起了曾经叱咤风云的岳钟琪，重新启用他。岳钟琪不愧是将才，在金川之战中立功甚伟，为了嘉奖他，乾隆恢复了他的爵位，封

太子太保，授三等公，赐号“威信”。

乾隆十五年，西藏发生叛乱，岳钟琪以六十四岁的老迈身躯前去平叛，再立战功；两年后，岳钟琪又负责平定杂谷土司苍旺之乱；又过了两年，重庆人陈琨叛乱，岳钟琪前去平定，这次平叛是他人生的终点，在凯旋的路上这颗将星终于陨落，终年六十八岁。

第十章 改土归流与苗疆之乱

雍正是中国专制独裁的集大成者，他不能允许大清的版图上还有其他土皇帝。

土司的罪恶由来已久，不光清廷想整治土司，属民们也强烈地渴望摆脱土司的控制。有的村子里全村的人都要求离开土司，申请归地方政府管辖。

由来已久的土司制度

在我国西南的一些省份，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的一些地方，住着许多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生产力很低，文化发展参差不齐，有的在偏远山区，跟中央政府的关系松松散散。

对这些少数民族，对这些山区人民，中央政府一直采取跟内地不同的怀柔政策，也就是羁縻政策。在唐太宗的时候就设置了羁縻州县，这些地方的刺史由当地的首领担任，宋朝沿袭了唐朝的旧制。元朝建立后，将这些羁縻州县纷纷纳入内地州县，对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度。

土司职位可以世袭，他们与中央的关系就是定期纳贡缴税。明朝建立后，仍然沿用了土司制，而且进一步完善，土司跟中央的关系更紧密了，要负责驻防征调等任务。到了清朝，仍然沿用土司制度。顺治五年提出口号：“各处土司，应该世代守护着自己的地盘，不要听从叛贼的诱惑。凡是没有归降的土司，尽快归降，我们给予优待……”

土司制很有民族自治的味道，尽管他们的继承是世袭的，但也要中央政府的批准。不过，在土司内部，中央政府就干涉不了，征多少税完全由他们自己说了算，土司内部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比如对于他的属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些中央政府都管不了。

还有一些地方，连经过中央政府承认的土司都没有，这些地方通常是由当地的头领控制，这种制度又叫做土舍制。土司和土舍们表面上臣服于中央，实际上都是林林总总的割据政权，他们和中央政权利益有冲突。明朝就作出了一些改革，对于一些条件允许的地区，取消土司制，实行郡县制，派遣流官前去治理。改土归流思想在明朝时期

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当时实行得比较少。

到了雍正的时候，土司制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土司们对属民的加派问题日益严重。事实上，属民完全沦落为土司的奴隶，土司杀死属民好比杀一条狗，土司抢夺属民的子女根本不会受到任何追究。很多土司私定刑罚，私设刑堂，以致属民很长时间只知道有土法而不知道有国法。

土司与土司之间经常为了掠夺土地和人畜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有些土司的势力就会得到恶性膨胀。在明代，土司甚至对中央政权发动过进攻，清朝虽然没有这样的事，但是土司抢劫的事情经常发生，中间有大量的汉人被屠杀。有的土司统辖数百里地，拥兵数万甚至数十万，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湖广永顺保靖土司彭氏、云南丽江土司木氏、贵州水西土司安氏等等，他们拥有大量的地盘和军队，甚至有自己的官吏、法庭和监狱。

这些土司们俨然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妨碍了一个国家的统一，也不利于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雍正是中国专制独裁的集大成者，他不能允许大清的版图上还有其他土皇帝。

土司的罪恶由来已久，不光清廷想整治土司，属民们也强烈地渴望摆脱土司的控制。有的村子里全村的人都要求离开土司，申请归地方政府管辖。

到了康熙雍正的时候，清政府里有许多有识之士要求对土司制进行改革，云南提督蔡毓荣说：“土司时代承袭，既不是通过选举，也不是通过中央任命，很容易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有人甚至提出，土司制度是天地间的缺陷，如果任其发展，则会养虎为患。

雍正二年，幕客蓝鼎元还提出削弱土司的具体办法：根据土司所犯的罪行轻重，削夺土司的村落，缩小土司的管辖范围；罪行严重的，则直接剥夺其土司的头衔，将其统辖的地方和属民交给州县管理；若是不方便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就将作恶的土司除掉，将他的领地分给属民的子侄和亲友。

在改土归流之前，清政府首先对土司进行分化和削夺。

鄂尔泰的建议

对于土司问题，朝臣们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广西巡抚李绂认为土

司固然可恶，但也是维护少数民族稳定的一种力量，所以，现在还没到推行改土归流的时候。

雍正对土司的恶行深恶痛绝，他屡次对云贵等省的提督谈到土司的恶性，让他们加强对土司的管理，当然，雍正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加强”措施。

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要在贵州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的村寨边建营房，还准备增加防汛设施，这无疑涉及拆迁。当地的土司不肯合作，用大石头堵住路口，不让清军建立营房。当时，署理贵州巡抚石礼哈和提督马会伯都想用兵，不过雍正没有批准，他认为两人虽然有道理，但担心他们年轻孟浪，怕他们没处理好事情，反而惹出更大的事情来，所以叮嘱他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后来，雍正派何世璜为贵州巡抚，何是招抚派，他认为用兵只会把事情闹僵，只有招抚才行之有效。然而，何世璜上任之后，没看他有什么招抚绝招，一无所成。

三年冬，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不久，召高其倬回京，询问他关于少数民族的意见。高其倬主张出兵，高其倬实在是太了解土司了，这些土司无法无天，除了武力他们什么都不买账。第二年春，雍正询问鄂尔泰的意见，鄂尔泰来到云南后，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他亲眼看到一些土司烧毁清军营房。鄂尔泰也主张用兵：“穷究到底，杀一儆百，让他们不敢再犯。”

雍正很看好鄂尔泰，认为他是才德兼优的大臣，一定能够担负这个使命，便同意了他发兵。

在长期的用兵过程中，鄂尔泰对土司问题看得更加透彻了。九月，他正式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鄂尔泰说：“这些土司互相残杀，互相掠夺，不少无辜的汉人被害，属民们生灵涂炭，这是边疆大害，不可以不除。只有实行改土归流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只是擒拿首恶，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鄂尔泰还提到改土归流有失败的可能性，很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朝臣的批评，所以，这件事要做好必须殚精竭虑。如何改呢？鄂尔泰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的人，只要没收他的田赋就行了，根据他的家庭人口，给予一定的补偿，并授给他们终身的官职，以资鼓励。这些措施目的是让土司懂得反抗不如归顺。

雍正对改土归流政策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最开始不赞同到调查研究，再到最后赞同。这个过程离不开他认真听取臣下的意见，能够

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

父业子竟

雍正四年四月，鄂尔泰兵分三路，进攻长寨，一路途经谷隆，一路途经焦山，一路途经马洛孔。随后，鄂尔泰亲自来到贵州，到长寨等地巡视。

长寨等地是苗疆的心腹地，这里的土司尤其猖狂。夏天，官兵们焚烧敌对土司的寨子，可是没有抓到他们的首领。副将刘业浚作战犹豫，迟疑不前，贻误战机。鄂尔泰便任命总兵石礼哈前去搜剿，石礼哈大获全胜，歼灭了敌人的首从，缴获弓箭四千五百多张，毒箭三万多支，铠甲和牲畜更是不计其数。

鄂尔泰便在这里设置参将营，扼守这一带的险要。鄂尔泰还在这里设立了保甲，推行保甲法。接着，鄂尔泰趁着余勇未歇，又在广顺、定番等地招抚了六百八十多个寨子。不久，在永宁、永丰、安顺等地招抚了一千三百九十八个苗寨。贵州西、北、南三面的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鄂尔泰便集中兵力向东面的苗岭山脉和清江、都江流域进攻。

根据鄂尔泰的说法，这里的苗患更甚于土司，对这里的苗人，连贵州土司都钳制不了。苗人地盘蔓延几千里，在这里盘踞着一千三百多个苗寨，古州在其正中间。

六年，鄂尔泰推荐贵州按察使张广泗率兵剿匪。张广泗是个实干型人才，他带兵深入古州地区和古州江流域，雷山县地区、九股河上游地区以及丹寨县等地区，也都被张广泗给降服了。张广泗拿下这些地盘后，在这里设置了厅县，安排了同知等官员处理民事，并在各地驻设官兵。

古州和台拱等地设置流官之后，土司的势力依然不可小觑，还没平定多久，苗人几次想暴动。雍正觉得，苗人如此不安分，一定是缺少教化，便安排几个大官到贵州去训导，可惜没有任何效果。

第二年，古州和台拱还是发生了叛乱。叛乱者以古州和台拱为中心，攻陷黄平，洗劫凯里，围困丹江厅，气势汹汹。雍正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董芳为副将军，领兵剿匪。七月，雍正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总理苗疆事务大臣，还让允礼、弘历、弘昼、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协助张照处理苗疆事务。

张照到任之后，反对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政策，密奏雍正，改变改土归流政策，放弃苗疆，所谓放弃不是允许其独立，只是说不插手苗疆的内部事务。张照还拉拢哈元生一起弹劾鄂尔泰，哈元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不愿做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张照转而拉拢董芳，不断在雍正面前夸奖董芳，诋毁哈元生。

张照是才名满天下的大学士，对军事一窍不通，他来到苗疆后，整天就想怎么搞垮鄂尔泰，心思很少用到正事上面来。在张照的理论轰炸下，雍正逐渐对改土归流的政策产生了动摇，到后来，他已经完全相信了张照的话，认为改土归流不是一个好政策。

乾隆即位后，罢免张照，重用张广泗，最终完成了改土归流的改革。

云南的土司也相当猖狂，乌蒙、镇雄、东川三个土府地域辽阔，土司势力强悍。这三个府以前都属于云南，朱元璋收取天下后，将这三府划归四川。明朝曾经打算在镇雄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来因为当地的土司陇氏反对而作罢。康熙三十一年，清政府也准备对东川实行改土归流，但由于撼不动土司的利益，改革徒劳无功，流于形式。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鄂尔泰建议雍正将东川再次划归云南，得到雍正的同意。雍正让总兵刘起元驻扎在东川，随后鄂尔泰奏请马龙州知州担任新任的流官知府。就这样，在东川成功地实行了改土归流，无非是增加了两种东西，一个是军队，一个是衙门。

接下来轮到乌蒙和镇雄了，乌蒙的土司是禄万钟，镇雄的土司是陇庆侯，两个人年纪都比较小，所以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他们的叔叔禄鼎坤和陇联星手中。鄂尔泰让刘起元招降禄鼎坤，禄鼎坤被招降后，禄万钟邀请陇联星一起攻打禄鼎坤。鄂尔泰遂派哈元生支援禄鼎坤，接连攻破关隘，禄万钟败退到镇雄。鄂尔泰又招降陇联星，陇联星投降后，禄万钟和陇庆侯等人逃到四川，后来也投降了。

就这样，乌蒙和镇雄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哈元生因为屡建战功，很快就升为云南提督。

当然，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叛乱是家常便饭，但也没有能阻止新政策的步伐。从雍正四年到雍正去世，接近十年的时间，基本上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六省完成了改土归流改革。

第十一章 雍正与外国

在雍正眼里，一般人信仰天主教还可以理解，皇室宗亲信奉天主教就是大逆不道，理由很简单，皇权受命于天，你相信上帝，置天与皇权于何地？

开放海禁

如果说明朝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更近的话，那么自清朝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显得更加密切，尽管有些交往不一定是友好的。

雍正的对外思想基本上是继承康熙的，但是也跟康熙有些不同。康熙对于西方的传教士采取一种非常理性的态度，一方面利用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反感他们传播天主教，尤其对教皇格勒门企图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厌恶。

清初有两次禁海令，第一次发生在顺治朝，结束于康熙二十三年。禁海令撤销之后，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很快，海外贸易就繁荣起来，中国商人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日渐频繁。

本来形势一片大好，后来却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就跟现在有些留学生不回国一样，康熙很快就发现，每年出海的船只有千余艘，回来的却不过五六成，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就相当于大量的财富和人口流失海外。中国古话说的好，肥水不流外人田，要想不流外人田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禁止跟外面交流。

康熙五十六年，也就是1717年，再次颁布禁海令，明文禁止出海南洋。这就是清初的第二次海禁。第二次海禁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禁止中国船只出航日本，也不禁止外国船只来中国，但是却严格禁止中国商人去南洋经商。只进不出，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思维方式。

禁海令显然不利于贸易的发展，沿海的许多商民对此很不满，结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可以禁海，我可以走私，只要不被发现就行。

直到雍正继位，海上走私依旧猖獗。台湾官员蓝鼎元是一个反对

海禁的学者，雍正二年，他上书说：“福建、广东沿海等地，人稠地狭，耕地不足，当地居民靠海谋生的十有五六。他们往往在内地制造一些精美的手工品，这些手工品在内地是随处可见的便宜货，但是如果运到外国，就可以当成珍稀物品来卖，每年都能赚取巨大的利润，这就为我们中国敛聚了大量的财富，光是海关收入这块就不小了。禁海之后，百害无一利，只会让沿海居民越来越贫困，迫使以前的商人变成游手好闲的人，最后变成盗贼。”

蓝鼎元的看法代表了一部分官员的观点，但是雍正坚持康熙的路线，认为海禁政策宁严勿宽。蓝鼎元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他没有解决问题，怎么解决许多商人不回来这个问题，商人不归国家的税收就少了，这才是清廷禁海的真正原因。

雍正三年，福建省秋季欠收，第二年春又闹饥荒，许多地方出现抢米事件。沿海的一些官员借此再次提出开放海禁，以缓解饥荒。

福建巡抚毛文铨奏称：“往年开洋之时，有很多洋船到厦门，各省的商人都到厦门来贸易，税收多得不得了。可是海禁以来，几乎就没什么税收，恳请皇上开放海禁。”

闽浙总督高其倬也上奏：“福建这地方地狭人稠，没多少田地可耕种了，许多良民选择上梁山。开放海禁让他们出海贸易多好啊，富人可以当船主，贫穷的人可以当水手和舵手，一条船可以养活上百人并且还有余钱留给家属……”

在沿海官员的轮番上奏下，雍正终于松口了，同意了高其倬的要求，准许福建对外贸易，这一年是雍正五年，即1727年。不过，雍正是非常保守的，他开放福建的海禁后，仍然对其他省进行海禁。在颁布这项旨令的时候，雍正还为康熙解释，说康熙过去实行海禁是体恤百姓，怕内地的人民迁徙到外地。

这次开放海禁还有限制条件，出海船只的省份有限制，出海的港口也有限制，只能在指定的港口出入，方便政府收税。同年，雍正又开放广东海禁。雍正七年，李卫上奏说，浙江和福建相邻，福建开放海禁，浙江商人肯定不舒服，可能会偷偷跟着福建商人一起进行海上贸易，干脆让浙江跟福建享受相同待遇吧，雍正遂同意开放浙江海禁。

开放海禁之后，雍正又作了一些专门的规定，出口船只必须按规定时间来回。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回来的，雍正也制定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如果是因为账钱没有收清，可以到来年六七月回港；如果是被大风刮到其他省的，可以让该省的官员盖个印，说明情况后回籍；如果是被风浪刮翻没有证据的，可以找到幸存的乘客，或者邻近

的乘客，了解情况后登记在册。如果故意捏造情况，推迟回港的船只，一定严加查办。

雍正还对那些逗留海外没有回国的人作出了类似赌气的规定：不准回国。本来，清政府的政策是允许海归的，但是几年以来，雍正发现坐商船回来的游子甚少。雍正感觉这些人不给自己面子，认为这些人都是不安本分的人，如果给他们自由，听任他们来去自由，这些人就更加没有顾忌，反正随时都可以回去，干脆在国外多待一段时间吧！所以，雍正限定了一个期限，逾期不回的人不准回国。

雍正还解释说自己的目的并不是逼这些人早点回来，就算他们全都回来，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些人在国外待那么久，想必是人伦丧尽，没有故国之情，这样的人回国之后，肯定有一大批奸淫邪恶之徒。雍正的这种看法当然毫无道理，无非是一种天朝上国皇帝的思维方式，他总觉得自己是天朝上国，自己统治下的百姓很幸福，大家都愿意在这里生活，如果逗留海外不归，是这些人出了问题，而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是不是统治过于专制。

控制别人、限制别人是雍正对人的一大特色，开放一个小小的海禁，居然有如此之多的限制。但不管怎么说，开放了毕竟是比较康熙更进步了，这也确实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措施。

从雍正五年到六年，从厦门出口的福建商船有二十一艘，七月以前返回了十二艘，带回大米一万一千多石，还有燕窝、海参、苏木、牛皮等货物，带回流落南洋的居民三十多人，有的人在海外生活了十七八年。这些人回来后，雍正一方面安排他们回原籍，另一方面让地方官严密查访，看这些人是不是国际间谍。

东南亚诸国来朝

越南是明朝时中国的附属国，两国的关系很友好。清朝建国后，越南依旧对中国称臣，每三年进贡一次。在雍正朝，中国与越南的关系非常好，不仅官方交往密切，民间也常有商业往来。

当然，越南也是许多反清人士的避难所。清初，这样的人特别多，后来，又有许多广西、云南的人移居到越南。雍正曾经对此愤愤不平地发表评论：“这些无知愚民，抛家弃业，居然跑到交趾去开矿。”雍正是没有商业头脑的，在他看来，离开天朝，跑到弹丸小国去创业简直就是不懂沐浴浩荡的皇恩。

这些到越南创业的华人把母国的文化也带到这里，对越南的经济

和文化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尽管是附属国，而且也很友好，但毕竟两国接壤，难免会有一些纠纷，这些纠纷主要发生在边界上。在明朝的时候，两国就发生过边界纠纷。明朝时，中越两国以云南省开化府南240里的赌咒河为界。不过，明朝官员粗枝大叶，以为铅厂山下的一条小溪就是赌咒河，致使中国失去120里的土地。到了康熙二十二年时，铅厂山下小溪以内的几个村寨又被越南人占领了，最后以马伯讯为界，又失去了40里。

到了雍正朝，云南总督高其倬上奏：“按旧的边界来算，应该把二百四十里之境全部收回，交趾有都龙和南丹两个厂，都在原来属于我们的边境里，安南国王把这两个厂看成是很大的利润生产地。如果我们要回来的话如同抢他的宝贝，他肯定不肯。请圣上定夺。”

雍正显得非常大方，说：“朕素有怀远之心，与邻国纠缠边疆问题时，只要不是太大的地方，何不成人之美呢？在威与德之间，朕认为德更重要。都龙和南丹这些地方，在明朝时就为安南所有，我们就不收回了，还是以小溪为界吧！”

雍正四年八月，两国将国界定于铅厂山。没想到安南国王还不满意，继续骚扰雍正，雍正不堪其烦，将这个问题交给鄂尔泰。鄂尔泰接手之后又划给越南80里，安南国王听了非常高兴，上疏表示感激。雍正心想，原来是个知好歹的啊，就又赏赐给他40里地。等于在雍正手中，给了越南120里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皇帝高兴，他可以随便把领土给别人。在皇帝眼里，领土是自己的，并不是国家的，更不是百姓的。

中国和泰国之间的关系则相对简单。从古至今，中泰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友好。清朝建立后，顺治九年，泰国国王第一次派人到中国来朝贡。后来，康熙规定泰国每三年朝贡一次。康熙六十一年，清政府让泰国在进贡的时候，运三十万石的米，分别送到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售卖，而且康熙给他们免税，但是如果超过了规定的数目则要征税。

雍正年间，泰国大米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让雍正很高兴。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的哥哥、广东巡抚年希尧上奏罗列了泰国进献的贡物。雍正听了龙心大悦，赞扬泰国：“暹罗（泰国古称）不辞艰险给我们送来谷种、果树、洋鹿、猎犬等物品，确实恭顺有加，他们的货物就一概免税吧，作为对他们输诚向化之心的奖励吧！”

泰国给中国的贡物，除了大米外，主要是沉香、苏木、犀角、翠竹等物品，从中国购买的物品主要是丝绸和瓷器。雍正后来下令，永

远免除泰国物品的税收，对于向自己臣服的人，雍正表现出非常大度的一面。泰国的使者秉承国王的意思，提出要买东京弓（满人用的弓）和中国铜钱，礼部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禁品，无法出卖。但雍正听了后，显得非常豪爽，不仅同意，而且无偿地送给泰国。在雍正看来，这不是贸易，而是宣扬国威。

总的来说，雍正朝，中泰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

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在雍正时期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呢？

应该说，自古中国跟这些国家的关系就比较友好。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朝建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到海外四处觅食。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1571年西班牙舰队占领了菲律宾的马尼拉，1619年荷兰军队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

到了雍正年间，这些国家已经有了悠久的被殖民的历史，基本上断绝了跟中国的交往。在这期间，只有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岛国苏禄国跟中国保持着交往，这个岛国在1915年被并入菲律宾。早在明朝万历时，西班牙舰队就攻打苏禄国，但由于苏禄人占据着地利，还有他们誓死保卫领土的决心，西班牙人最终败兴而归。

雍正四年，苏禄国王毋母汉未母拉律林派遣使者带着贡物到了福建，福建官员奏报后，雍正十分高兴，说：“苏禄国远在海外，越洋而来，从来没有让他们进贡，他们居然主动输诚向化，应该表扬。他们来京的路上，沿途官员要好生招待，一切待遇从厚。”

苏禄使者到京后，雍正热情地招待他们，并确定了苏禄国五年朝贡一次。雍正十一年，苏禄国国王奉表谢恩，并请求雍正帮他一个忙，国王的祖先东王于永乐年间朝贡时病逝于山东德州，东王的两个儿子在中国守墓，国王请求雍正翻修东王的坟墓，并照顾东王两个儿子的后代。

雍正一口应承，让人把东王的墓道、享亭、牌坊等翻修，并在东王的两个儿子安都禄（后代改姓安）和温哈喇（后代改姓温）的后代中各挑选一人，授予官职和俸禄。

雍正年间，中国和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些殖民国家交往断绝，但是民间的交往却非常频繁。雍正年间，印尼雅加达的华人超过一万，待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华人超过两万，而菲律宾的华人近四万。

雍正开放海禁后，许多商人来到这些国家，与他们进行贸易，有

的人甚至定居在那里。

严格限制外商

在雍正朝，外商想要来中国贸易，必须停靠在广州港口。

雍正三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有十艘，其中英国船只有六艘，法国船只一艘，其余是南洋一些小国的船只。这些洋船带来的商品并不多，主要是一些黑铅、哔叽、胡椒、檀香、苏木等物品。当时的署理广东巡抚常赉说：“没多少货物，大半都是一些外国的银钱。”

来到广州的外国船，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一律停靠在黄埔港口。之后是严格的管理，船上的炮位由中国官员卸下来，暂且保存，离开时再发还。水手等人都要在船上等候，不得上岸，然后由海关进行征税和查货。中国与外贸无关的官员，一律不得进入外商船只。到了十一月、十二月，外商船只就必须离开。

与外商谈生意的官员又叫洋商或者官商，当时外号是“十三行”。雍正三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在行商中设立行头，专门让其中的六家商行处理外贸事务，这是清政府垄断外贸的一个措施，官商勾结，不让民间商人介入。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有渊源的。

当政府介入并垄断外贸时，要想没有腐败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些负责外商的官员贪污情况非常严重。当有人说杨文乾贪污时，雍正根本不信，他认为杨文乾是个一心为公不避嫌怨的好官员。所以当其他人揭发杨文乾时，雍正不仅不相信，还保护他。

真相出来的时候，雍正感到很意外，杨文乾的贪污情况让人发指。广东海关每年额定税收是四万两银子，杨文乾却以溢耗之名将多得的十一万两银子揣进自己的腰包；除此之外，对于外商带来的银两，杨文乾每两要抽三分九厘，中饱私囊两万两银子；根据清政府的规定，红颜色和黄颜色的绸缎不准出口，杨文乾却私下里允许，每匹绸缎抽银七钱，这一项得银一万两；外商船只回去之前，杨文乾不管他们买了多少货，根据他们携带的银两，每两加抽一分，获银四万三千两；此外，杨文乾还以孝敬皇上为名（其实是留着自己用），从外商船上挑选精巧的物品，这笔钱由洋行的中国商人支付，计约万两。

总的算下来，杨文乾贪污二十万两。

杨文乾这个人是雍正手下一个能干的大臣，在其他方面非常清廉，偏偏涉及外商时就贪污无障碍。雍正洞察出了他的心理：“以为

外商之事无关国计民生，贪污多少，都不会有损中国百姓，这样既可以得到实惠，又能自我感觉清廉。”事实上，很多官员跟杨文乾的想法很类似，在其他地方当官很清廉，到了洋行就本性大暴露。之所以有这种思想，跟他们的愚昧是有关系的，对外商盘剥，无疑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回国之后肯定要说你坏话，这是损伤国体；其次，你这么做，以后谁还愿意跟你做生意，长此以往，没人愿意跟你交流，中国的经济必然落后。

当然，雍正也没有过分为难杨文乾，仅仅是让他吐出赃银，调换工作岗位而已。

我们知道，西方列强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其实早在雍正时，就对鸦片非常警惕。那时卖到中国的鸦片还很少，但雍正已经下令严禁贩卖鸦片烟。七年，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国在陈远家中查获三十三斤的鸦片，陈远被判处充军之罪。陈远觉得自己冤枉，说他的鸦片是药用的，不是鸦片烟。巡抚刘世明交给药店鉴别后，发现确实是药用鸦片，还没有制成烟，便将陈远无罪释放，但是鸦片要没收。

刘世明本想参李治国审案不明，又怕世人误会，以为解除烟禁，所以给雍正一道密折。雍正的看法是：“李治国在此案上虽然有欠明察，但也是因为实心办事过于仓促，情有可原，不参他是对的。至于没收陈远鸦片就不对了，如果这个人确实犯法了，就应该绳之以法。如果没有犯法，那干吗还要把他的东西储存在府库里。小民们生活不容易，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血本，本来就错怪了他，就更不应该夺了他们的生计。即使是想留着日后作证据，也没有必要全留着，留一些样本就行了。这虽然是小事情，但是身为封疆大臣，千万别因为事情小就无所谓。”

在对广州外商进行严格管理之外，雍正的眼光也没有放过澳门的外商。在康熙末年，禁止中国商人到南洋去贸易，结果澳门的外国人揽过这笔生意。他们不断地增加船只，扩大交易，在雍正初年已经有二十五只洋船了，澳门领土上居住着三千五百多西洋男女。

元年，通政司右通政梁文科奏请在澳门增设官兵，随时准备弹压。第二年，孔子的六十六世孙孔毓珣提出建议：“澳门现在有洋船二十五只，我们给他们限定，不能超过这个数目，船只坏了可以修，但不能再添，防止他们贸易扩大后，会有更多的西洋人过来居住。葡萄牙派来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更换，但是其他的人随船来随船去，不可以澳门逗留。”

雍正批准了他的建议，限制了洋人的贸易活动，那些在澳门的洋人必须遵守清朝法律，还得缴纳赋税，如同侨民。

雍正与天主教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许多西方传教士开始涌入中国，一直到康熙年间，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统治者对天主教的基本态度是：不提倡，不干涉。

但是康熙末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罗马教皇屡次派使者来华，命令中国的天主教徒不可以尊孔，不可以祭天，甚至不可以祭祖。康熙对此非常生气，说道：“看了罗马教皇这个告示，发现这些洋鬼子根本不懂中国的道德和伦理，就是和尚和道士中异端者信口雌黄也不过如此。这么嚣张，那好，从今以后西洋人就不要在中国传教了，免得他们多事。”

没想到，康熙这一纸禁令下来后，居然持续了一百二十年。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才取消这个禁令。

雍正对天主教的反感比康熙更甚，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看到康熙允许天主教传播，雍正当时就很不理解，康熙禁教之后雍正坚定地支持他。

康熙虽然下了禁教的决定，但是执行起来比较困难。禁止传教？那别人已经盖好的教堂是不是应该拆了？已有的信徒是不是应该关起来？对这些，康熙都没有作出指示。雍正继位后，浙闽总督觉罗满保上奏说，西洋人在各省盖教堂，经常暗地里传教，人心渐渐被他们蛊惑了。觉罗满保建议雍正将这些传教士都送到京城里做奴仆，或者驱逐到澳门。

雍正虽然批准了这个粗暴的建议，但是让他们执行起来时温柔点，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沿途帮着他们点。雍正这么说不代表他更善于替别人考虑，仅仅是担心教民闹事。至于，那些信仰天主教的人则勒令他们尽快改变信仰，不可继续迷误。

德国传教士戴进贤到北京后请求雍正不要将他们驱逐到澳门，雍正让礼部讨论应该怎么做。礼部回答说：“这些西洋人在中国，倒也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对吏治没有什么大害。他们带来的历法和算法这些东西，对于民间毫无用处，他们宣传的东西跟圣人之道完全是两码事。愚民轻信了他们的话，终究不是好事儿。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各省的西洋人全部安排到广州的天主教堂里，不许他们外出传教，也不许老百姓信教。”

雍正的回复是：“对西洋的这个天主教，我也没有什么深恶痛绝的地方，只是这个教派对中国的圣人之道没有什么益处。你们再考虑

一下，如果确实没有害处，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也不要过于为难他们。”

天主教之所以在中国遭禁跟罗马教皇的禁令有很大关系，如果罗马教皇不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尊孔、祭天和祭祖，康熙可能就任其发展。所以，其根本原因还是天主教文化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主导思想，虽然儒家思想并不排斥外来宗教，譬如像佛教和伊斯兰教等等，但前提是这些宗教能够跟儒家思想融合，至少没有冲突。

罗马教皇的态度非常强硬，不仅让中国的天主教徒改变风俗习惯，而且宣称那些尊孔、祭天和祭祖的中国天主教徒为异端，这种情况不要说清朝统治者，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忍受不了。

雍正初期虽然也禁教，但还不是特别严厉，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态度大变，对天主教越来越严苛。

事情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雍正最厌恶的人就是八王允禩，而储英的曾孙苏努恰恰是允禩的支持者，雍正恨屋及乌，连带苏努也恨上了。在雍正刚刚即位的时候，不方便公报私仇，所以他静候时机。苏努的第六个儿子勒什亨是正黄旗和正红旗的副都统，雍正就从他下手，于元年二月将他逮捕，理由是结党营私。勒什亨的弟弟乌尔陈为他说情，结果被打入勒什亨的同党。

雍正将勒什亨和乌尔陈一起发配到西宁，没想到发配西宁以后，勒什亨和乌尔陈居然加入了天主教。当时有个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跟着他们来到西宁，两人都是人生遭遇重大挫折的人，在穆敬远的说服下加入了天主教。这事后来被川陕总督年羹尧知晓，上报给雍正。

这样一来，雍正等于是握住了勒什亨和乌尔陈的把柄了，当然也让他更加厌恶天主教。雍正立刻将穆敬远召回，然后将苏努及其十三个儿子全部解职。

四年，雍正腾出手来对付允禩。阿齐那、塞思黑案件不断升级，苏努一家也受到牵连，苏努已死，便挫骨扬灰。五年正月初八，有人呈报《关于处死信奉伪教教徒之事宜》，详细说明了苏努儿子加入天主教的情况，说苏努的儿子们扬言宁愿被正法，都不愿弃教。这分明是为了激怒雍正的仇恨，让他对天主教更加憎恶。雍正公开宣称苏努的儿子们愚昧不法、背弃祖宗和朝廷。大臣们建议雍正处死他们，但雍正还是想给他们一次机会，派诚亲王允祉去说服他们放弃天主教。结果他们说：“既愿意为皇上效力，又不愿放弃信仰。”

根据刑部的意见，应该把苏努子孙三十九人全部斩首，雍正没有

同意，只是赐死苏尔金和乌尔陈等人，其余人改为长期监禁。当时的传教士添油加醋，宣传说这是一起迫害信奉天主教亲王的事件，洋人是没法理解中国政治的，雍正整苏努一家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以前支持允禩，信仰天主教只不过是火上浇油而已。

在雍正眼里，一般人信仰天主教还可以理解，皇室宗亲信奉天主教就是大逆不道，理由很简单，皇权受命于天，你相信上帝，置天与皇权于何地？

雍正最开始对天主教并没有过分的反感，但是不断发生一些事情引爆了他的愤怒。

在康熙六十年，康熙让葡萄牙传教士张安多带着自己的书信去意大利见罗马教皇。张安多还没回来，康熙就已经去世了。迎接张安多的是雍正，张安多不仅带回了罗马教皇的两个使者，还带来了葡萄牙大使麦德乐。引爆雍正愤怒的就是这个麦德乐。

张安多和教皇的两个使者先到北京，其时，麦德乐还在广州等候圣旨。教皇在信中向康熙表示感谢，祝贺雍正登基，同时感谢雍正释放传教士德里格，希望雍正慈悲，继续释放毕天祥和计有纲。教皇的要求非常多，还希望雍正多多照顾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甚至要求雍正允许他们传教。

雍正回了一封非常古老的信，教皇及其翻译能不能看得懂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不过信的意思极为简单：“朕对传教士一视同仁，只要他们不犯法，朕绝不会为难他们的。”

雍正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突然颁下一道让所有传教士意外的圣旨，他召见为清廷服务的二十名传教士，不是找他们训话，而是宴会招待他们。所有受召见的传教士都觉得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破天荒的荣誉。召见的过程中，雍正跟这些传教士们亲切地交谈，雍正问他们瑞典跟俄罗斯打得怎么样了，天主教跟东正教有什么区别等等，雍正还告诉传教士，很多人说他们不孝敬父母。传教士对这些都作出了解释。

宴席上，雍正说不久就会召见麦德乐，所有参加会见的传教士都能得到礼物。这些传教士们感到雍正的态度似乎有所好转，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四月份，麦德乐来到北京后，先见了北京的传教士，传教士们介绍了雍正的政策，并说雍正已基本解决了教皇信中提到的问题。麦德乐深受鼓舞，以为这个皇帝好说话，打算在受召见时提出两个要求：一、要求雍正归还各省的天主教堂；二、要求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

传教。很多在中国待了许多年的传教士劝他不要这么做，一方面这跟清廷的政策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由他提出也不合适。

麦德乐不听劝告，雍正召见他那天，他果然提出了这两个要求。本来大家都很高兴，他这一说，雍正脸色马上转阴，当场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

当天雍正就发表讲话：“中国有中国的教，西洋有西洋的教，西洋的教没有必要在中国流传，就好像中国的教没有必要在西洋流传一样……”

传教士们听到雍正的讲话后，纷纷指责麦德乐，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对此作了记载：“这就是麦德乐先生不听从我们劝告的结果，他的贸然行动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之后，麦德乐先生非常后悔，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如何跟皇帝打交道了。”

不久，麦德乐就坐船回欧洲了。但是他却让在华的传教士们日子更难过了，六月初一，雍正召集了在京的所有传教士，并对他们发表了一通讲话，法国传教士宋君荣记录了这次讲话，内容摘录如下：

朕允许你们留在京城和广州，允许你们在京城和广州之间往返，允许你们和欧洲通信，你们还不知足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很多人控告你们吗？朕知道你们人不坏，如果你们碰到一个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恐怕早就赶你们出境了。麦德乐居然让朕给你们发执照，以便让朕知道你们中哪些人是好人（合法的），哪些人是坏人（非法的），朕不想这么做，因为朕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不管怎么说，朕不需要传教士，如果朕派和尚到你们欧洲去，你们的国王也不会允许的。

汉明帝任用印度僧人，唐太宗器重西藏喇嘛，这两个人都受到了世人的憎恨。皇考让你们在各省建立教堂，也有损声誉。朕曾竭力反对皇考这么做。朕怎么能允许有损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怎么能帮助你们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的教义？喇嘛教最接近你们的教，而儒家跟你们的教相去最远。你们错了，你们不过二十来人，却企图攻击其他一切教义。要知道你们自认为好的品质，在中国人身上也有，中国各种教派身上荒唐的东西你们也有。你们称天为天主，其实是一码事。和我们一样，你们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你们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还有什么永恒的受难和幸福——还有比这种神话更荒唐的吗？

……

难道我们满洲人祭祀用的竿子不是跟你们的十字架一样荒唐吗？在儒生、喇嘛、和尚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他们的教义，你们

也是这样的。大多数欧洲人夸夸其谈什么天主啊、天堂啊、地狱啊，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谁真的见过他说的那些东西？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不过是欺骗小民的？以后你们要经常来朕这里，朕得好好开导你们。

雍正对于宗教的认识，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深刻的，在讲话中，他阐明了对天主教的态度。禁止但不敌视，能够理解但对中国毫无用处，不过一种宗教一旦生根，就很难禁掉了。十年，在广州发现十五所秘密的天主教堂，传教士中中国人比西洋人还多，教徒有一万两千多人。

恰克图条约

中俄自从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两国渡过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两国没有矛盾和冲突，军事上的冲突没有，但是在边界问题和通商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

在彼得大帝时期，沙俄实行扩张政策，屡次对外征战，军费高昂导致国库空虚。所以，沙俄急需和中国通商来赚钱。在康熙三十七年到康熙五十六年间，俄国官方和中国进行了十次贸易，每次俄国商队都超过了规定的二百人，有时甚至达到八百人。然而，沙俄就像一条贪婪的鲨鱼，一方面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还寻思着蚕食中国土地，尤其对喀尔喀蒙古地区蚕食得特别严重。

除此之外，沙俄还经常引诱中国边民，教唆他们叛逃。沙俄种种不法的行为激起了康熙的愤怒，五十七年，康熙禁止俄国商队入境。

俄国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型国家，康熙一强硬，他们就软化。康熙五十八年，俄国派遣特使伊兹马伊洛夫出使中国，缓和中俄矛盾。伊兹马伊洛夫说好话后，康熙同意了俄国的通商请求。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沙俄说好话不做好事。

康熙六十一年，得知俄国和准噶尔互通信使，立即召见俄国的驻京大使郎克，指责俄国政府违约。郎克狡猾地说，自己只是商业代表，这个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郎克的话表面上是有道理的，当时他在北京的任务就是负责商业方面的事情。康熙很生气，立刻把郎克撵出中国，随后将俄国的商队全部扫地出门。可以说，中俄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俄国单方面的破坏。

雍正继位之后，继承了康熙的对俄政策，拒绝让俄国商队进入中国。这下，俄国政府没辙了，只能降低姿态跟雍正和好。雍正三年，

沙俄派萨瓦伯爵率领代表团来华与清政府谈判。萨瓦临行前，俄国外交部授予他四十五条训令，商业部交给他二十条训令，另外，沙皇还给了他一些“锦囊”。

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他此行必须完成的任务，主要有：一、和中国缔结商业往来的条约，如果不能扩大商贸的话，至少要恢复中断了的商务往来；二、如果中国坚持要先解决边境问题，为了核心的商业利益，应该在边境问题上向中国作出一些让步；三、在和中国划定疆界时，不要把矿区、有价值的土地和战略要地划给中国；四、告诉中国，俄国已经决定引渡八十四名叛逃者；五、设法让卡尔奇特斯基主教秘密进入中国，然后设法为他争取在北京居住的权利，再设法让他拥有到全国各个郊区巡视和传教的权利，还必须设法让中国同意给主教一块地方建教堂；六、尽可能准确地探知中国的军事实力和资源。

这次谈判一共持续了两年，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谈判地点在北京，第二阶段的谈判地点在边境处布拉河。

第一阶段的谈判持续了半年多，俄国为了让中国尽快通商，收买了中国官员马齐。马齐向俄国代表团反映了中国方面的态度，由于沙俄急于和中国通商，中国也急于解决边境问题。经过三十轮谈判之后，双方达成了协议。两国互相引渡逃犯，每三年俄国商人可以自费到北京进行贸易，中国同意俄国在北京设立教堂，派遣留学生。

第二阶段的谈判在布拉河畔，清政府这次派出的首席谈判代表是隆科多，第二阶段的判断主要是确定边界。在边界问题上，隆科多寸步不让，从而让谈判陷入僵局。像隆科多这种强硬的态度最适合对付俄国人，可惜后来雍正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把他调了回来，接着便开始把隆科多往死里整。隆科多被调走后，策凌当上首席代表，从前面我们知道，策凌打仗非常勇猛，但谈判显然不太内行。

经过四十八轮谈判，策凌与俄方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俄方代表萨瓦签订这个条约后，立即向沙皇报喜，说又得到了大片领土，萨瓦直言不讳地说：“新的边界，对俄国极其有利，俄国领土实际扩展到蒙古境内好几天的里程，有些地段甚至有几个星期的里程。”

萨瓦洋洋得意地说，他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隆科多被调离，另外收买了一些中国官员，得到了一些情报。萨瓦甚至把新修建的堡垒的功劳也算上去，好像中国对这个新堡垒产生恐惧心理，才签订了条约。

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1728年11月1日），中俄正式在恰克图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恰克图条约》表面上对中国不利，俄国占了

大便宜。但当时情况比较特殊，准噶尔问题让雍正至为头疼，所以他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以便稳住俄国，好全力对付准噶尔。雍正签订这个不太平等的条约确实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像雍正这么精明的一个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是不愿付出这么大代价的。

当然，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没有身临其境，就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第十二章 雍正暴毙之谜

在专制时代，雍正算得上是一个勤政的好皇帝，自诩不好色也不好酒，可惜这始终是一种疑问，美酒佳肴，再加上后宫一大堆美女，一个人需要多么强悍的意志力才能抵抗啊！

我们无法推知雍正是否好色，却可以肯定他沉迷于道佛和丹药，雍正死后没几天，乾隆就下了一道谕旨，把炼丹的道士全都赶出宫。乾隆这么做，似乎是在暗示雍正的死可能跟道士和丹药有关。

吕四娘寻仇

十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不可否认的是雍正在执政期间，改革的力度是非常大的。他用十三年时间翻修大清这座已经开始腐蚀的巍峨大厦，直到他死，都没有竣工。不过，他已经做了绝大部分的事情。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一股阴风吹过圆明园，大清最具争议的帝王雍正驾崩，享年五十八岁。

关于他的死，众说纷纭，疑云重重。因为雍正走得实在太匆忙了，从生病到死亡不到三天的时间。

在雍正首席秘书张廷玉的《自订年谱》中有详细记载，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偶感不适，但仍然像往常一样听政。二十二日，雍正身体不好，半夜二鼓的时候，急召王公大臣进宫，张廷玉和鄂尔泰等人纷纷赶往圆明园。二十三日子时，雍正就龙驭上宾。

雍正因为死得过于仓促，难免有人揣测他的死因，加上雍正生前得罪了不少人，有人说他是遇刺毙命的。这种说法大多见于稗官野史中，如《满清外史》《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据说这个刺客叫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孙女。

雍正六年，发生了吕留良文字狱，吕氏一门，要么被处死，要么被流放。唯独吕四娘聪明伶俐，带着母亲逃了出来，躲在民间，隐姓埋名。后来吕四娘遇到了武林高手甘凤池（李卫抓住的那个没有骨气的“侠客”），甘凤池教四娘武艺，四娘勤学苦练，终于练得一身好武功。后来，吕四娘乔装改扮，偷偷混入宫中，在雍正睡熟之时砍下他

的脑袋。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相信，1981年的时候，考古学家曾经想发掘雍正的泰陵，开棺验尸，判断这个传说的真假。还没有动工的时候就接到上级的通知，停止了泰陵的发掘工作。

还有一个版本的说法是文字狱后，吕四娘偷偷混进宫里，以宫女的身份伺候雍正，伺机得手的。

这种说法不太可信，并不是因为太离奇而不可信。而是跟事实不符，吕留良案子之后，吕家并没有漏网之人。雍正八年，社会上有谣言说吕家有漏网之人，雍正便讯问李卫：“外间传言说有吕氏孤儿，一定要好好追查，如果查出有吕氏孤儿，朕可不能轻饶你……”

李卫不久上密折说：“吕氏一门，不论男女老幼全都监禁，连吕留良父子的坟墓也派人重重监视。”李卫的性格我们知道，做事情认真负责，是雍正朝第一大直脾气的清官。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吕四娘，是不是有可能混进宫里呢？也不太可能，在清朝罪犯没入功臣家为奴的例子不少。但雍正对吕案却没有这样处置，因为吕案关系重大，属于情节严重的犯人，所以只能发到宁古塔，做披甲人的奴仆。

既然不太可能，为什么吕四娘刺杀雍正流传了两百多年呢？其实野史的这个传言还是来自雍正的宠臣鄂尔泰的传记。

根据《鄂尔泰传》的记载，雍正暴毙那天没有任何异样，跟往常一样上朝，午后忽然召鄂尔泰进宫，此时，外间已经风传雍正暴毙的事情。鄂尔泰来不及套上马鞍，就往宫里飞奔，以至于腿骨都磨出血，入宫以后，鄂尔泰在宫里待了三天三夜才出来，没吃一顿饭。当时天下太平，而且乾隆已成年，为什么仓皇到这个地步呢？所以，人们纷纷猜测遇刺说或许是真的。

然而，这个证据也不可靠。查看鄂尔泰的十几种版本的传记，只有袁枚的《行略》中有类似的记载。但是里面也没有提到雍正当天就驾崩了，更没说到鄂尔泰几天没吃一顿饭。而且《行略》的记载本身就有夸大和渲染的倾向，不是严格的史书。

其实，雍正真正暴亡的时间可能是二十二日晚上，也就是说比史书记载的死得更突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史官之所以写成二十三日时就是为了削弱暴亡的效应，给人感觉雍正的死亡推迟了一天，其实时间相隔很短。

袁枚可以算是鄂尔泰的一个门生，后来受鄂尔泰的后人之托为老

师写传记，自然想突出雍正驾崩之时鄂尔泰的那种急切焦急，之后又写鄂尔泰拥立新君，袁枚把这些功劳全都堆到鄂尔泰一人身上。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雍正驾崩之时身边有很多人，包括大学士张廷玉。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雍正不是被刺杀的，更不是被吕四娘刺杀的，那为什么这个传言的市场这么大？

首先，跟雍正这个人有关系，雍正干了太多在一般老百姓看来大逆不道的事情，譬如谋父夺嫡、逼死兄弟、抄家流放等等，有些不是事实，但流传很广。因此，一般的人对这个皇帝有一种仇恨的心理，自然希望他不得好死。而且雍正的性格非常奇怪，给人很神秘的感觉，人们连血滴子都能想象得出来，那么吕四娘又为何不能刺杀雍正呢？

其次，汉人对满人的统治一直心有不甘，雍正上台之后为了维护统治又实行了铁腕政策，百姓是敢怒不敢言。杜撰一个像吕四娘这样的巾帼英雄，可以满足内心深处的遗憾，我们汉人的一个女子就杀掉了雍正，这跟谣传乾隆是陈阁老的儿子性质是一样的。

再次，圆明园确实出现过刺客，不过这是嘉庆朝的事情，将嘉庆朝发生的故事安在更加神秘的雍正头上，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雍正死得实在太仓促了，一般人理解不了，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突然死了呢？自然而然就联想到刺客。

还有一种说法更离奇，说雍正是被宫女缢死的，这种传说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但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这个说法出现在清末的《梵天庐丛录》中，说是在雍正九年，宫女和太监吴守义、霍成等人在雍正睡熟之际，用绳子勒他，就在雍正快断气的时候，太医过来救活了他。宫女想勒死皇帝这种事情确实有，但不是发生在清朝，而是在明朝的嘉靖年间。雍正和嘉靖的庙号都是世宗，可能有人搞混了。

另有人说雍正是被湖南卢氏妇人杀的，卢氏犯了谋逆罪被处死，他的老婆会剑术，想为他报仇，进入畅春园，杀了雍正。我们知道的情况是，自从康熙死后，雍正再也没有进过畅春园，显然造谣者把畅春园跟圆明园搞混了。

曹雪芹“林黛玉”联手毒死雍正

最颠覆人的观点莫过于曹雪芹和“林黛玉”毒死雍正了，这简直是旷世奇闻，我们不妨也了解一下。

提出这个观点的是霍国玲、霍纪平姐弟两人，在这姐弟俩看来，曹雪芹写《红楼梦》这本书就是为了痛快淋漓地骂雍正。我们知道，曹雪芹本来是富二代，雍正上台后，抄了他的家，让他过上了贫困的生活。霍氏在此之外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说这个雍正夺走了曹雪芹心爱的人，也就是书中的林黛玉，霍氏说历史上林黛玉的真实原型是竺香玉。

在霍氏的《红楼解梦》中，提到康熙五十四年，曹寅的儿子曹颀病故，妻子马氏生下遗腹子天祐，这孩子便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而雪芹则是后来用的化名。在康熙的时候，曹家是非常风光的，家里经常养一些戏班子，戏班子里有一个小女孩叫竺香玉，小名红玉，是曹家从苏州买过来的，此女便是林黛玉的原型。

雍正六年，曹家被抄，举家从金陵迁到北京。天祐和香玉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不幸的是，雍正八年选秀女，天祐的叔父曹頌的妻子王氏为了邀宠，怂恿曹頌将香玉认作义女，然后送到宫里。他们希望以此邀宠，博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香玉进宫且后来被纳为妃子甚至还立香玉为皇后（亏霍氏想得出来）。所以，曹雪芹决定复仇，夺回自己的爱人。曹雪芹进宫混了个“管理御用和尚道士”的职位，后来又和香玉取得了联系。雍正十三年秋天，曹雪芹和香玉最终合谋用丹砂毒死了雍正。雍正死后，香玉以悼念先皇为由，再次出家当尼姑，到香山一带的寺庙里进修。曹雪芹也到香山一带定居。两人经常在一起品茶读书，度过了九年的幸福时光。乾隆九年，事情被揭发，香玉自尽，曹雪芹远走异乡。

但我们知道，雍正的皇后在史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孝敬宪皇后，内大臣费扬古的女儿，还有一个是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在雍正生前钮祜禄氏还不是皇后，乾隆即位之后她升格为皇太后，后来尊她为孝圣宪皇后。哪有什么竺香玉皇后啊！霍氏对此当然也清楚，解释是乾隆在历史中抹去了这段历史。

尽管从雍正的元配皇后死了后，后宫四年的时间没有皇后。但后宫无主在历史上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连皇后都没册立。就拿雍正的父亲康熙来说，元配赫舍里氏死后他就不想再立皇后，几年后迫于孝庄的压力才封钮祜禄氏为皇后，钮祜禄氏死后，康熙四十多年里没有立皇后。

历史没有竺香玉这个人的资料，霍氏便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乾隆身上，根据霍氏的说法，像乾隆这样的皇帝，想抹去一个人的历史轻而易举。但事实上，即使贵为帝王，也不能随意抹去历史。中国史官有一个传统，客观书写。皇帝可以在政治上专制独裁，但是不能让史官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篡改删除历史，即使要篡改历史，也得悄悄地有技术地进行，不可能粗暴地把历史直接删了。再说了，如果竺香玉是雍正的皇后，那等于是乾隆的皇太后，他可以不尊重自己的皇后，也不能不尊重父亲的老婆啊！

在霍书中，还有一个惊人的推测。雍正的妃嫔刘氏在雍正当皇子时就封为贵人，生不出一男半女，到雍正十一年时突然生育皇子弘瞻，霍氏推测弘瞻很可能是香玉所生，香玉出家为尼后，将弘瞻托付给刘氏抚养。乾隆九年，谋杀案暴露，香玉自杀，乾隆便将弘瞻记到刘氏门下。

其实，女人婚后十多年生孩子很正常，尤其是在皇宫里更正常，皇帝的妃子太多，某个人要想经常被临幸，概率很小，临幸那么几次，不怀孕的概率很大。而且，清廷里皇子出生后有严格的程序登记的。

所以说，整个什么竺香玉都是捏造，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真被雍正封为皇后，即使乾隆有本事把她的资料全部抹去。乾隆也没本事抹去野史和外国的记载，尤其是朝鲜官方的记载。有人可能说，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乾隆可能指示朝鲜方面删除这个皇后的资料。乾隆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这种话他是没可能说出口的，因为这有失国体。就算他能说出口，朝鲜也没遵守的必要。在《李朝实录》中充斥着大量的对清廷不敬的记录，仿佛有意看清廷笑话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朝鲜的国名还是朱元璋题的，自始至终不忘明朝，《李朝实录》记载康熙五十年后，骄奢淫逸，举措颠倒；还记载雍正沉溺淫色，下半身很长时间不能动弹。朝鲜的史书不受清廷检查，如果竺香玉确实存在，没必要隐瞒。

从人情这个角度来看，曹雪芹谋杀雍正也说不通。曹雪芹可能对雍正不满，但根本谈不上恨之入骨。雍正抄家是全国范围的，并不是针对曹雪芹一家，也不是报私怨，而是因为曹家有亏空。连雍正的兄弟们为了填补亏空都把家里的东西摆到大街上去卖，曹雪芹还有什么理由对雍正恨之入骨。

雍正在抄曹雪芹家时，发现他家已经没多少钱了，雍正听了还颇为同情。让他们一家进京，安排房子给他们住。七年，雍正自掏腰包为曹頔补足亏空，还允许曹雪芹到曹家去读书。所以，在抄家这块，曹雪芹不应该对雍正有深仇大恨，除非是个不明事理的人。

就算真有竺香玉这个人，根据霍氏的说法，雍正夺走了曹雪芹心爱的人，貌似曹雪芹有理由恨雍正了。首先，宫廷选秀可不等于雍正夺走竺香玉，霍氏把选秀和抢占民女混为一谈。而且香玉之所以进宫

还是曹頔安排，曹雪芹要恨首先恨他叔父，曹頔的目的是东山再起。想必，香玉在进宫之前也明白自己的任务：得到皇上的宠爱，让曹家再次富贵。如果说雍正封她为皇后，可谓恩宠至极，曹雪芹和香玉都没有任何理由恨他，你们的目的也达到了，不感谢皇帝，居然想谋杀了他，这……

如果霍书的描写是真实的话，那么雍正简直是一个冤大头，他对香玉情深义重，封她为皇后，对她百依百顺，香玉却给他戴绿帽子，最后还和奸夫一起毒死他。

退一万步来说，雍正确实死于情杀，乾隆能不过问吗？就算是一个县城里死了一个小民，也要验尸。一旦追查起来，很容易就能发现凶手，从乾隆驱逐道士的行为来看，他也知道父亲确实是死于丹药中毒，如果香玉有嫌疑，只怕难以逃脱罪责。九年之后，乾隆才查出实情，结果当做贼案草草了结。事态平息后，曹雪芹又回到香山住，这实在太荒谬了。害死皇考这种事在一代雄主乾隆这里竟能这么草率，想想乾隆是怎么对待曾静和张熙吧，那两人还只不过是诋毁雍正，结果雍正也释放了他们，乾隆还是把他们凌迟处死。

所以，曹雪芹竺香玉联手谋杀雍正虽然看起来新颖，但没有可信度。

丹药中毒

年轻时，雍正身体很好，甚至有传言他会武功。继位后，雍正也经常说自己身体好。雍正七年开始，雍正的身体开始出状况了，差点一病不起。

八年，雍正自己形容这场病：“朕从去年就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当时没在意。今年二月，忽然发寒热，饮食也没规律，夜里很难入眠，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多月。到今年五月怡亲王逝世，朕亲自发丧，抒发了心情哀痛之情，没想到病慢慢好了。”

八年正月，雍正让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人为自己推荐医术高明的郎中。后来，李卫给他推荐了一个叫贾士芳的道士。贾士芳本来是北京白云观里的一个道士，允祥曾经向雍正推荐过他，但雍正觉得他没用时就把他遣出去了。李卫这次又举荐了他，看来这个道士可能真有两把刷子。

贾士芳来了后，一边给雍正念经，一边帮他推拿。看来，效果很好，雍正还对鄂尔泰说贾士芳的调治很有效果。没过多久，雍正就感

觉不对劲，他觉得贾士芳能够操纵自己的健康，想要自己的身体好就好，想要自己不舒服就能让自己不舒服。所以，雍正宣布贾士芳是妖人，竟将贾士芳斩掉。

有学者指出，七年后，雍正可能是私生活越来越放荡，伤了身体，不得不乞灵于丹药。根据一些学者考证，贾士芳被斩的原因可能并非如此简单。雍正处死贾士芳后，并没有对其他道士产生反感，很可能是因为贾士芳属于道士中的北宗——全真派。全真派讲究修身养性，去掉七情六欲，所以贾士芳很可能是因为劝谏雍正不要耽于酒色，触了雍正的痛处被杀。

在专制时代，雍正算得上是一个勤政的好皇帝，自诩不好色也不好酒，可惜这始终是一种疑问，美酒佳肴，再加上后宫一大堆美女，一个人需要多么强悍的意志力才能抵抗啊！

我们无法推知雍正是否好色，却可以肯定他沉迷于道佛和丹药，雍正死后没几天，乾隆就下了一道谕旨，把炼丹的道士全都赶出宫。乾隆这么做，似乎是在暗示雍正的死可能跟道士和丹药有关。中国历史上，皇帝死于丹药的不乏其人，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就可能是死于丹药。

雍正在治国方面跟他的老爸康熙一样信奉儒教，康熙虽然对道术有所涉猎，但是一直很克制，没有沉迷。雍正却不一样，雍正在宫中蓄养了大量的佛道之士。康熙对科学比较感兴趣，所以宫里安放着许多传教士，对于占卜和炼丹，康熙也有兴趣，但没有过分陷进去，所以康熙说：“朕虽然用喇嘛、和尚、道士，但并没有让他们占卜。”其实，康熙说的还不是实话，从他的一些朱批可以看出来，康熙也信占卜那一套。康熙虽然不相信丹药，但还是经常让道士们在宫廷内炼丹，可能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吧！道士炼好丹药后，康熙自己不尝，让道士自己尝，结果很多道士自尝苦果，不幸暴毙。

雍正的文化修养相当高，为人的城府也相当深，治国相当老道。在治国上，他以儒家为宣传手段，但真正实行的是法家思想。在个人的信仰上，他倾向于佛教；涉及养生这块，他又非常相信道教，他认为通过道术的修养和服食丹药，可以延年益寿。雍正特别推崇紫阳真人，认为他的《悟真篇》是炼丹的真经，所以在雍正的诗歌里有大量关于炼丹的诗。

雍正究竟从何时迷恋丹药，我们不知道，找不到可靠的资料。很显然，刚当皇帝的几年，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忙这些事情，即使有兴趣，也只能放一边。六年以后，千头万绪的国事终于被他整顿得条理清晰，这时候也有余闲了。当然，此时他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想找

一些道士来帮自己延年益寿也是情理之中。

史书记载了雍正生病的情况，忽寒忽热，睡卧不宁。这病可能是操劳过度引起的，也可能是酒色伤身引起的。当然，从史书上来看，雍正既不好酒，也不好色，事实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曾静曾经攻击雍正酗酒好色，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对此进行了反驳。

雍正说：“朕不好酒是出于天性，以前提督路振扬进京问朕，皇上看上去全不像喝酒的样子，怎么外面有传言说皇上好饮酒。现在弥天罪人诽谤朕酗酒，跟外面的传言是一个道理。”

雍正二年，山东巡抚黄炳进献荔枝酒四箱，雍正在密折上批道：“像这样的东西不能多献，朕从来不善饮酒，原本就是用来赏赐给别人的。”

至于好色，雍正更是不承认：“朕自幼就不好色，当皇帝以后宫人少得可怜，朕常常自问：天下有几个像朕这样不好色的人。”

这是雍正单方面的说法，当然不可尽信。在朝鲜的《承政院日记》中，记载有朝鲜君臣的对话，里面谈到雍正的好色问题。朝鲜的臣子说：“雍正沉溺女色，病入膏肓，身体自腰以下已经很长时间不能动了，年纪都快六十了，看来是死定了。”根据朝鲜官员的看法，雍正六年以后，国家安定，雍正逐渐腐化堕落。朝鲜的记载只能当做参考，也不能当成直接的证据。

雍正并非死于酒色，不幸的是，恰恰死于自己所宠信的道士手中。

当时很多人希望雍正早点死，不过现在我们知道，雍正死得早对大清是一种损失，甚至对中国都是一个损失。如果他活到父亲康熙那岁数，历史会是什么样呢？如果他活到儿子乾隆那岁月，历史又会是怎样的呢？我们不知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历史将要发生变化，清帝国的根基可能会更稳固一些。

道家的真谛确实有延年益寿的作用，雍正倾心道家本来也是一件好事，如果他真按照紫阳真人的思想去做，估计也不会早死。因为紫阳真人在《悟真篇》中说的金丹，其实不是指外丹，而是指内丹，内丹是通过修炼精气神，在体内形成的。在《悟真篇》中，紫阳真人明确指出外丹为旁门左道。

雍正八年，四川巡抚宪德给雍正发了一道密折，在四川成都仁寿县，有一个叫龚伦的人，活了九十多岁，善于养生，八十六岁时还让小妾生了孩子，龚伦精通岐黄之术，有龚仙人之称。雍正让宪德去拜访这个人，要好好对待这个人，然后快速把他送到京城。宪德后来奏

称，这个人生于崇祯时，在雍正六年时就已经去世。雍正听说他去世，觉得非常可惜，但仍不甘心，问宪德：“他的儿子中有没有懂得父亲养生之道的，必须优待他们，然后婉转跟他们说，才能得到实话。”

可惜，龚伦的儿子没有得到真传，或者得到了，怕出什么差错，没人敢担这个责任。宪德没法，只好又给雍正推荐了一个王道士，没想到这个王道士是个臭名昭著的骗子，后来被雍正撵走。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雍正当年求长寿之急切，也由此可以判断出他当时的健康状况一定不太好。

后来李卫推荐了贾士芳，没想到雍正最后斩了贾士芳。贾士芳死后，据说圆明园里阴魂不散。雍正不得不请龙虎山的道士娄近垣来驱鬼，娄近垣由此获得宠信。

贾士芳死后，雍正不但没有怀疑道士，道教活动反而更加频繁。在皇宫里，钦安殿是专门从事道教活动的，此外，雍正还让道士们在太和殿和乾清宫等主要宫殿里放上神板，还在寝宫养心殿里设置斗坛。为了做法事，雍正一次就让苏州织造为道士们做丝缎法衣六十件。

雍正最宠信的还是后来南派的张太虚与王定乾两个道士。

雍正炼丹，这是绝密事件，你在正史是找不到记载的。但是，仍然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在内务府账本《活计档》中，记载圆明园东南的秀清村在内务府总管海望主持下，先后运进四千斤煤炭，然后用铅汞为雍正炼丹。

丹炉一打开，就没有再停止。根据档案记载，在雍正最后五年，平均每个月往圆明园运送炼丹的物品至少有两三次，总共有煤192吨，木炭42吨，还有大量的铁、铜、铅制器皿，以及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物，并有大量的杉木架黄纸牌位、糊黄绢木盘、黄布（绢）桌围、黄布（绢）空单等物件。这些物品，都是炼丹必需品。

娄近垣虽然是个道士，思想却非常世俗，有许多王公大臣问他养生之道，他回答说：“王公们锦衣玉食，就已经是神仙了。”由此可以看出，娄近垣这个人不简单，不完全是个修道的道士，雍正很宠信他，赏给他一万七千两银子，拨款大修龙虎山上道教宫殿。雍正暴毙后，娄近垣回到了道观，再也没有受到新皇帝的青睐，年八十终老于龙虎山。

张太虚和王定乾专门负责为雍正炼丹，现在我们知道，丹药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对人体有剧毒，所以雍正很有可能是服食丹药中毒而

死。

入葬西陵

雍正死后，遗体被运往皇宫，安置在乾清宫里。九月十一日，又将他的棺木移送到雍和宫，也就是做皇子时住的地方。乾隆二年三月初三，雍正棺木才下葬清西陵的泰陵地宫。

顺治和康熙都是葬在遵化的清东陵，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雍正为什么要与众不同，葬在清西陵呢？

第一个问题是：究竟是不是乾隆的安排呢？答案：否。清西陵是雍正生前指定的墓地。在雍正生前，指派允祥为他寻找晚年吉地，自从允祥找到以后，就一直修建陵墓，直到雍正死，陵墓都没有修好。所以说，这件事情跟乾隆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人纷纷猜测，雍正之所以不葬在清东陵，就是因为谋父篡位，通过卑鄙的手段登上皇位，继位后又对手足展开杀戮，所以害怕在地下见到康熙。这种看法认为，雍正选择西陵是因为心中有鬼，再加上他真的相信鬼神之说，所以极力回避康熙。

我们不妨回头看看雍正生前是如何对待陵寝之事，雍正四年，雍正吩咐允祥去办理山陵大事。第二年，他又派总兵李楠带着风水先生去东陵，打算在东陵选择一块风水宝地。由此可以看出，雍正最开始是打算葬在东陵的。后来，允祥找到了九朝阳山地，雍正也觉得风水不错，就让他们施工。施工后发现这块山地带砂，不是风水宝地，只好作罢，让允祥继续寻找。后来在易县找到了一块万吉之地，也就是现在的清西陵。

这里确实是一块宝地，西有云濛山，北有泰宁山，南临易水河，奇峰环抱，清水蜿蜒流过，而且土质很好，不含砂。雍正和大臣们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块宝地，当时雍正也考虑到这个问题，自己葬在这里的话有些不妥，根据清朝的规矩，子随父葬，祖辈衍继。如果自己葬在这里，会不会有人说自己不孝？

于是，雍正故意让大臣们商量，看看这么做是不是跟古代帝王的古制有什么不合的地方。大臣们引经据典，说这么做跟古代的体制没有什么不合的地方，自古就有先例。雍正一听，眉头舒展，说道：“这样的话，朕就心安了。”

由此可以看出，雍正选择西陵并不是怕死后见到康熙，而是觉得

西陵这块地风水很好。有人可能奇怪了，难道东陵的风水不好吗？东陵的风水也好，确实好，但是最好的地方都被顺治和康熙占了，雍正去的话，只能选择相对偏僻的地方，这对于自视甚高的雍正来说是有些委屈的。

泰陵这个名字则是乾隆取的，应该比较符合雍正的心愿。

第十三章 揭秘雍正的双面性格与家庭生活

雍正是一个有着狂热倾向的人，说他是一个工作狂并不过分。像这样的人做事情难免会有一些急躁，尽管急躁，雍正却并不粗心，相反很细心。在雍正身上，同时具备躁狂和严谨两种性格。雍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一方面他残忍苛刻，另一方面他又讲究公正，心怀仁慈，时时以有德之君自居。

工作狂

雍正是一个权力欲非常强的皇帝，当皇帝是他最热爱的一项工作，因为有兴趣所以有动力。在政治上，雍正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所以他才那么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对雍正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管理好一个国家，让各个阶层的人都各居其位，各安其职。

雍正是一个有着狂热倾向的人，说他是一个工作狂并不过分。像这样的人做事情难免会有一些急躁，尽管急躁，雍正却并不粗心，相反很细心。在雍正身上，同时具备躁狂和严谨两种性格。雍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一方面他残忍苛刻，另一方面他又讲究公正，心怀仁慈，时时以有德之君自居。

虽然对工作有一种狂热的喜欢，但雍正的爱好很多，比如炼丹学道，爱好精美的器皿，喜欢秀书法，喜欢写诗，对绘画也颇能欣赏。

雍正这个工作狂究竟狂到什么地步呢？

根据雍正自己的说法，有时候处理朝政的时候，尤其是处理那些紧急事务的时候，他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精神倍增。雍正六年十月是秋审的时候，雍正负责在犯人的名字前打钩，这工作看起来非常轻松，其实很累。不光是打钩这么简单，在决定是不是打钩之前，他要详细研究案例，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应该处决。

雍正对大臣说：“人命关天，所以做这事时朕特别费神，不敢有丝毫疏忽。对朕来说，这是很稀松平常的。朕每天处理政务，从日出到日落，精神都好得很，从来没有觉得困乏。如果休闲了片刻，反倒觉得不舒服。朕勤于政事，实在是天性乐于此，并不是勉强的。”

我们可以看看秋审那会儿，雍正一天的办公情况。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上午，雍正发出一道上谕，严令督抚不得借耗羨归公之名贪污；接着，又发出一道上谕，讨论贵州改土归流的事情；接着，批准户部奏请，在京城建立粥厂。这些事情干完后，雍正又处理了刑部发来的两个案子，还有工部奏议的山东官员制造战船的案子。随后，批准刑部尚书励廷仪《肃清盐政事宜四款》的奏疏，还批复了山西提督袁立推荐官员的奏折。

下午，雍正来到洞明堂，和大学士马齐、张廷玉等人审阅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三十八个杀人犯。雍正认为，凡是用刀刃杀人的犯人都应该处以死刑，不是用金属利器的，可以考虑减刑。毕竟人命关天，雍正随后又召刑部尚书德明和励廷仪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最后才钩决。

二十四日上午，雍正根据翰林院的奏请，补授日讲起居注官，之后分批接见官员，总共有十四批官员，每批有拟正、拟陪人员。雍正通过和他们面谈，然后确定任用哪些人。下午一两点，雍正到达洞明堂，钩决七十五个犯人。在讨论刑罚时，雍正问得非常仔细，比如其中有一个叫刘二的犯人，因为使用假银子而犯法，刑部拟定处以绞刑，雍正问在康熙时有没有对用假银子处以绞刑的。大学士徐梦元回答说，这是新例，以前没有，雍正听了，决定把这个案子先缓一缓。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雍正断案是努力追求明察秋毫的。当时，全国的官员都知道雍正非常勤政，大家都觉得太过分，纷纷奏请皇上不要太过操劳。雍正还有在夜晚工作的习惯，尤其是批阅那些密折，雍正更习惯在晚上。他曾经对鄂尔泰说，白天工作没有闲暇，而且有时候心境不宁，只有在灯下批阅，反而精神更好。

在工作时间上，雍正不分昼夜，只要精神好，晚上也工作。在地点上，他更是不拘一地，甚至在温泉疗养的时候，也批阅奏折。正因为雍正工作如此疯狂，有人说他在理政的十三年里比康熙六十一年做的事情还多。

雍正的双面性格

雍正的朱批中有这样一段话：“遇事举动，外要柔和，内存刚毅，若能如此为之，才是大丈夫。若外刚而内柔，则不足取也。”

雍正这是教导臣下做人要外柔内刚，在雍正身上也确实体现着这种性格，不过，窃以为雍正身上刚猛残酷的一面远远多于慈柔。

雍正残忍的一面大家都见识过，他对待自己的政敌，对待那些曾经跟自己争权的兄弟们是非常残酷的，他不仅逼死了允禩和允禵，还说他们是服冥诛，这等于是把别人打死，然后再踩上几脚。宗室中只要得罪过雍正，都没有好下场。

在对待功臣年羹尧和隆科多事情上，雍正也充分展现了自己心狠手辣的一面。他对年羹尧好的时候，说出的话非常肉麻：“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朕实庆幸之至……”

对隆科多，雍正尊称为舅舅，左一个舅舅隆科多，右一个舅舅隆科多，无比亲热。

然而，年羹尧手握军权，党羽众多，让雍正有威胁感。本来去除威胁，只要解除对方的军权就行了，但是雍正做得相当绝，剥夺年羹尧的军权和职位之后，给他罗织罪名九十二条，他还逼迫年羹尧自杀，甚至说：“如果你九泉之下还恨朕的话，那么真是不知好歹，就是堕入十八层地狱也不能洗清你的罪孽。”心肠之狠，实属罕见。

隆科多虽然不像年羹尧那样功高震主，但是也位高权重，让雍正很不爽。显然，雍正对隆科多的恨稍稍少于对年羹尧的恨，但也给隆科多列出了四十多条罪状。最后，隆科多死于囚禁的地方。

还有钱名世的案子，钱名世不过是江苏一个文人，给年羹尧写了几首拍马屁的诗，被查了出来。雍正说他是文人中的败类，不配为儒林中人，亲笔书写了“名教罪人”四个字，让钱名世挂在自己的大门上。此外，雍正还让全国各地的官员每人写一首诗讽刺钱名世，再由钱名世收集出版，然后发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在糟蹋人方面，雍正很有天赋，这根本是不把人当人。

雍正这么做表面上是糟蹋钱名世一个人，但其实是糟蹋了天下的读书人，读书人为了混口饭吃，写几篇拍马屁的文章在历朝历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雍正让这些人写诗讽刺钱名世，其实是等于让他们写诗讽刺自己。所以，很多人并不愿意这么做。如果有人写不好，敷衍了事，雍正就重重处罚他们，甚至比对钱名世的处罚更重。通过钱名世案，雍正向天下的读书人心里捅了一刀。心肠的狠毒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

雍正的狠不只是表现在钢刀杀人上，雍正更擅长用软刀子杀人。杨名时，康熙三十年进士，担任学政时，经常提拔出身贫寒的学生，深受康熙重用，于康熙五十九年担任云南巡抚。期间，他清廉守正，官声非常好。但雍正却认为他是沽名钓誉，三年，雍正授予他云贵总督的职位。雍正曾因为杨名时泄露密折的内容，终止杨名时书写密折

的权力，后来，又恢复了。可是后来杨名时又误将奏折中的朱批写进了题本里，雍正认为他是故意这么做，以表示对密折制度的不满。

怎么处置杨名时好呢？雍正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个损人的招数。

他让鄂尔泰去云南做巡抚，同时兼管云贵总督。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下属管理上司，杨名时做什么都必须向鄂尔泰禀报，以此让杨名时颜面无存，在云南各级官员面前丢份。

雍正五年，杨名时即将被免职之际，上疏请求修治洱海。雍正想，他早不题请晚不题请，这时候题请分明是沽名钓誉，想博得好名声，顺便给下一任留下重担。雍正说，好，既然如此，你就别离开云南，继续待在那里吧，洱海就由你来修了，一切费用自己出。杨名时是个清官，根本拿不出钱来兴修水利。待在云南，比待在监狱里还难受。雍正这么做，就是因为他认定杨名时是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还有一层原因是为了推行新政，杨名时是老资格的官员，对新政有一些不满的地方，雍正拿他开刀，想起个杀鸡儆猴的作用。

后来，雍正死后，乾隆召杨名时进京，群众夹道欢迎。可见，不管雍正如何打压杨名时，公道自在人心。

雍正对官员防范、苛刻之外，也有施恩爱护的一面。

雍正六年，安徽学政李凤翥建议对拖欠欠粮的生监加重处罚，给他们三次期限，期限一过，就在县衙里当众责打，褫夺博取功名的权利。雍正对此的看法是，读书人懂道理，所以在征粮上应该比一般老百姓要求更严格一些，但是应该考虑到一旦当众责打读书人，这辈子他们都抬不起头来，褫夺他们博取功名的机会，他们一辈子就没有进身的机会。雍正说即使这些读书人不珍惜功名，我也替他们惋惜。所以不要做得这么绝，而且读书人中有贫有富，对于富裕的应该要求严格一些，对于穷人，多给他们宽限时日吧！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雍正并不是一个完全冷酷的人，他还是有恻隐之心的。

还有一次，雍正在阅读《圣祖实录》的时候，发现以前的四川总督李国英作战英勇，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便让人去寻找他的子孙。李国英的孙子李永升以前当过南阳总兵，可惜很不称职，经常收受陋规，后来被人参革，到驿站效力。雍正召见李永升后，授予他为参领，对他说：“纵然你不学你的祖父做一个好官，但是朕实不忍心忘记你祖父的功劳啊！”在这件事上，雍正表现出了念旧的一面，他不忍心冷落功臣的后代，所以又召回他，用仁爱之心教育他。

雍正在朱批中对臣子关爱的地方很多，有的很虚伪，有的却是真

情流露。这充分说明了他性格的矛盾性，一方面他残忍刻薄，疑心很重，另一方面在不伤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他又有仁爱的地方。

雍正的特长与爱好

鄂尔泰编纂的《清世宗实录》中对雍正有这样的记载：

天表奇伟，隆准欣身，双儿半垂，目光炯照，音吐洪亮，举止端凝。……幼耽诗书，博览弗倦，精究理学之原，旁彻性宗之旨。天章埉发，立就万言。书法遒雄，秒兼众体。每筹度事理，评鹭人才，因端竟委，烛照如神。韬略机宜，皆所洞悉。

一看这评价，很容易就闻到一股强烈的马屁味。这个没办法，鄂尔泰是拿工资的，雍正的发工资的。抛开这个不说，我们发现里面也不全是信口阿谀之词，说的大体还有那么回事儿。

雍正声音洪亮是事实，根据《李朝实录》的记载，朝鲜官员李柳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回国后，对国王说雍正“气象英发，语言洪亮”。

鄂尔泰说雍正饱读诗书，对理学和宗教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这个是不假的。雍正小的时候受过严格的教育，学习课程包括文武两个大的方面，文化方面又包括满文和汉文。雍正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子，期间读了大量的书，不比现在的作家读书少，至于儒家经典，他更是滚瓜烂熟。

雍正读书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儒家的教科书里，说人君以天的心为自己的心，而人臣以君主的心为自己的心。雍正认为这个观点和君臣同心同德的观念不合，不论人君还是人臣，都应该以天心为自己的心。换句话说，那种逢迎巴结的臣子并不是好臣子。

除了精通经学之外，雍正对历史也相当烂熟。他统治期间，经常吸收前朝的历史经验，从而有利于自己的统治。雍正的许多权谋和韬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历史的经验。

雍正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相对不如康熙，他更相信天人感应的学说。在这个基础上，雍正对鬼神非常迷信，办事一定要选黄道吉日，譬如岳钟琪西路军大迁移之时，雍正要先看历书决定时间。地方官赴任的时候，雍正也要给他们选定日期，一定要选择吉日出行。

有一次年羹尧要进京，雍正却不让他进来，理由是年羹尧的八字

今年不宜进京。雍正还让年羹尧不要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八字，以防仇家用巫蛊厌胜之术伤害自己。雍正还让鄂尔泰和岳钟琪把八字告诉自己，鄂尔泰和岳钟琪都觉得这是极大的恩宠。雍正对鄂尔泰说：“因为你身体虚弱，所以要你的八字，看看你能活多久。”

因为迷信八字算命，雍正跟一些江湖术士交往甚多，浙江有个史瞎子，名声很大，有人把他推荐给雍正。可能是这个史瞎子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后来雍正把他发配到辽东。

文采方面，雍正也相当不错，他写的那些诗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名作，但平仄对仗工整，意境也很地道。在雍正的朱批中，文字非常简洁流畅，从中我们也能看到雍正的文采和思想。书法更是雍正非常自豪的一个才能，当然这跟康熙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康熙皇子们的书法都非常不错。雍正能够写得一手好字应该感谢康熙的严格要求，宫殿里许多匾额都是雍正亲笔书写。康熙逝世后，要写《景陵圣德神功碑》，雍正先让擅长书法的允祉、允祐及翰林院中的书法高手写。之后，雍正又要亲自来写，他说这么做不是为了自耀其长，实在是因为父亲去世，悲思之情很深，如果不亲笔书写的话，过意不去。写完之后，雍正让大臣们评价，说谁写得好就用谁的，大家不必有所顾忌，实话实说。大臣们自然纷纷恭维雍正的书法最好，理当用雍正的墨迹。

雍正曾把自己和父亲康熙作比较，认为自己事事不如乃父，但是唯有洞察下情这块比父亲做得好。说实话，雍正这话还谦虚了点。其实，雍正是非常自信的，他相信自己的政治智慧，相信自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帝王。五年，雍正说过这样一番话：“朕已经五十岁了，处理的事务和政事上的历练都很多，再加上朕非常勤政，宵衣旰食。对是非曲直心里有定见，不致为流言所浮动。”

雍正甚至坦言自己的能力比任何臣子都强，前面就说过年羹尧只不过是总督的料，远远不具备做天子的才能。他曾在李绂的奏折上批道：“你自从被擢用以来，识见实属平常，看人的眼光也不是很老到深刻。朕所以用你，是因为你性情直率、心地纯良。你只要听朕的教导，将来有一天肯定能更加成熟的。……在智慧上，你确实比朕差远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朕经历这么多的事，所以在动心忍性这块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朕。如果以为能够背诵几篇老套的文章，说话掉几句书袋子，就怀有轻视朕的心思，你将来恐怕后悔莫及……”

雍正深知做一个皇帝不容易，所以铸造了“为君难”宝印，深知当皇帝不容易，皇帝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整个国家，比大臣们更应该谨慎。一个皇帝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广开言路，如果臣下有非常荒谬

的建议，也不能惩罚，因为这样一来就没人敢提建议了。

所以，为君之道既要从谏如流，又要有自己的看法和原则。

雍正的家庭生活

我们先来说说雍正跟母亲的关系，根据正史的记载，雍正跟母亲的关系很和谐。

据说乌雅氏生病后，雍正放下政务，亲自到永和宫里去照顾母亲。正史记载，这段时间雍正亲自为母亲熬汤煎药，昼夜不离母亲左右，直到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后，雍正悲痛得肠子都快断了，望着母亲的遗体，雍正哭号震天，茶饭不思。丧礼极其隆重，雍正极其痛苦。这幅画面对了解历史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称之为孝子图。

十个孝子九个假，所以我们不能相信正史的记载。皇太后死去不久，社会上就有传言说她是被雍正逼死的，起因是她想看望被囚禁的十四子允禩，雍正不允许。最后，太后就在铁柱上撞死了。雍正认为这种传言是塞思黑和阿齐那传出去的，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惩治。

此外，雍正还对逼母传言作出了辩解，而且自认为辩解得无懈可击，极为高明：一、太后本身就有病，是痰疾，加上康熙死后，悲痛交加无以释怀，最后旧病复发而死；二、太后天性仁慈慈祥，言下之意是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作出撞柱自杀的事；三、康熙生前就很看不起允禩，绝对没有将皇位传给他的意思，太后对允禩也很不喜欢，曾经对人说：“我只知道皇帝是我亲生儿子，允禩在我心中跟众阿哥一样，没有格外更亲之处。”允禩想要拜见太后，太后都不答应，更别提太后会主动要见他……

让我们奇怪的是，雍正的辩解是在六年后和曾静对簿公堂时说的，太后死的时候，雍正丝毫没有公布她有痰疾，到底有没有痰疾没人知道。雍正虽然表现得很像一个孝子，但事实上太后对于他的“孝道”好像非常冷淡，好像知道这个人在演戏一样。对于雍正登基，太后的反应是：“这事我没想到，连做梦都没想到。”说明雍正即位，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大冷门。

新皇帝即位后，生母一般都要举行典礼，尊为皇太后，并上徽号、表文、册文、金宝。乌雅氏开始坚决不接受“仁寿皇太后”的尊号，在雍正和大臣们坚决要求下才回答说：“知道了。”但她还是不愿意举行典礼，并借口说康熙的梓宫还没有移送景陵，举行典礼不适

合。后来，康熙移送景陵后，雍正也没有再提起这事。还有一件事非常蹊跷，雍正即位后，让太后从永和宫搬到皇太后居住的永寿宫，但是乌雅氏坚决不搬。这两件事情有些奇怪，似乎雍正当上皇帝后，乌雅氏持一种消极不合作的姿态，好像不愿正视雍正当皇帝一样。

丧礼之隆重也有些反常，雍正声称自己悲痛欲绝，有一天哭过几十次的记录，雍正还表示要素服斋戒三十三个月，尽三年谅阴之礼。做得如此过头反而让人怀疑他是在演戏给世人看。当年夏天，天气炎热，雍正不顾自己身上的畏暑症，也不理臣下的劝阻，坚持每天要到母亲的梓宫前祭奠。可是，在母亲逝世三周年时，雍正却借口身体不舒服，没去母亲陵前祭扫。这是非常奇怪的，中国古代最重礼节了，尤其注重对亡者的礼节。母亲逝世三周年大礼都不去，很容易被人讥讽为不孝，但雍正对此不在乎，似乎有风平浪静之后高枕无忧的感觉。

考虑到雍正对兄弟们的所作所为，乌雅氏自杀的可能性很大。

我们再来看看雍正的后宫生活，雍正这个人是个不知疲倦的作秀的天才，他非常在乎自己在世人和后人眼中的形象，所以竭力给世人留下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形象，他最怕的就是给人留下好色皇帝的形象。所以，他当皇帝后，没有扩充后宫，后妃基本上是以以前王府中福晋、格格升过来的。

皇帝的婚姻多是政治联姻，顺治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几任皇后都是孝庄为他挑选的，顺治一个都不喜欢。康熙也是这样的，不过还好他和皇后之间产生了爱情。雍正做了四十多年的皇子，一般来说，皇子的婚姻与政治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譬如，雍正和年贵妃的婚姻就是实打实的政治联姻。

年氏是年羹尧的妹妹，雍正娶年氏的时候年羹尧的地位还不是很突出，所以一开始，政治联姻的因素不是很大。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年羹尧变成了封疆大吏，雍正还只是一个皇子，所以他竭力拉拢年羹尧。

从康熙五十四年到五十九年，年氏为雍正生下了三男一女，可惜全都不幸夭折，最大的活到了八岁。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其他妃子生子，可见雍正专宠年氏。雍正专宠年氏应该是有政治目的的，裙带关系在政治斗争中是很重要的，如果雍正对年氏不好，必然会影响与年羹尧的合作。稳定了年氏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稳定了年羹尧。

不仅善待年氏，雍正对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也相当好，简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父亲。雍正当皇帝后，年氏被封为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

随着雍正跟年羹尧关系的破裂，年贵妃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雍正三年十一日，发出一道上谕，意思是年贵妃已经得了重病，万一死去了，一切按照皇贵妃的礼仪办，此外还大大夸奖了年贵妃的才德。人还没死就预先假定对方死了，给人感觉就是巴不得此人早死。果然如雍正所料，年贵妃没过多少天就死了，到底是怎么死了就没人知道了。

而且，连年贵妃葬的地方都是一个谜，有人说葬在遵化城九凤朝阳山，但是在那里没有看到她的墓地，有人说她葬在雍正的泰陵里面，是乾隆将她移葬在里面的，但究竟怎样还有待证实。

年贵妃死后一个月，年羹尧家族和党徒就开始遭殃了。

接下来我们说说雍正跟子女的关系。

中国古代讲究多子多福，作为帝王，更是后宫一大堆，只要有能力，能够生出一大堆的子女。这看起来是好事，多子多福嘛，但也是坏事，学过生物的人都知道，一个种群的数量如果发展过快，很容易对环境构成压力，从而破坏生态平衡。帝王的子女如果过多，无非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他们每个人都是皇子皇女，消耗太大了，而且又不从事生产。当然，古代的皇帝们可能认识不到这点，但他们至少可以认识到，子女过多，很容易造成家庭的破裂，雍正对此深有感触，自己的兄弟过多，导致储位争夺白热化，惨不忍睹，差点对大清江山构成威胁。

雍正吸取教训，只生了十个儿子，其中只有四个活到成年。而且这十个儿子几乎都是雍正做皇子时生的，当皇帝后的十年里，雍正直到十一年才生了弘瞻，大概是想再次证明自己不好色，是一个勤政的好皇帝。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他避孕措施做得好。

雍正的四个成年儿子分别是弘时、弘历、弘昼、弘瞻。弘时是长子，关于弘时，史书记载相当少，《清史稿》中有这么一句话：“弘时雍正五年以放纵不谨，削宗籍，无封。”

弘时性格可能比较倔强，不受约束，生活放纵，很难得到康熙和雍正赏识，弘时干脆破罐子破摔。在康熙晚年，允祉的长子弘晟和允祺的长子弘昇都被封为王府世子，弘时当时的年龄也达到了标准，却没有受封，充分说明康熙不看好他。

雍正建立秘密建储的制度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朕的诸皇子尚幼，立储之事，现在怎么可以进行呢？”

真实的情况是当时弘时已经十九岁了，都已经成年了，怎么说年幼呢？难道雍正开玩笑吗？雍正不是一个会随便开玩笑的人，他说出

这种话表明他早已把弘时排除在储位之外。

弘时就算得不到康熙的赏识，那他究竟为啥也让自己的父亲这么不爽呢？要知道，雍正才四个儿子，把父爱分成四份也有四分之一。

在雍正三年的上半年时候，雍正似乎对弘时还抱有希望，当然不是指望他继承大统，只是希望他做一个贤明的皇子。雍正为自己的皇子特地从全国各地招聘有名的老师，弘时的老师是王懋竑，此人是一个理学专家，五十一岁考中进士，考中进士后，康熙居然没有把他留在京城，他只能回乡教书，可谓是尝尽人间沧桑。确实如此，王懋竑对程朱理学研究得非常透，讲究淡泊无欲，还对王阳明的心学深有体会。雍正让这么一个人来教育弘时，可谓是用心良苦，对症下药，希望弘时能够改邪归正。

后来，王懋竑的母亲病逝，只好回家守丧。临行前，雍正对他说：“不必遵制守丧三年，料理完丧事就回京吧！”可见，雍正对王懋竑的教育是满意的，在王懋竑守丧期间，雍正经常派人催他进京。

第二年八月，王懋竑赶到京城时，却发现再也见不到皇上和弘时了。只好客居旅馆，半年来无所事事。又过了一年，他收到圣旨，让他回家养老。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测雍正和弘时产生了矛盾，而且矛盾激化，父子绝情。那段时间，雍正将已经过继给允禩的弘时从玉牒中除名，并交给允禔抚养，换句话说，不要这个儿子了。

这难免让人猜测，雍正为什么要对亲生儿子这么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如此残忍地对待弘时呢？

在史书中是找不到记录的，有学者猜测，雍正正在打击八王允禩集团时，弘时站在允禩的立场为他说话。结果，引爆了雍正的终极愤怒，直接将他从宗室里除名。弘时对雍正肯定也没有好感，因为雍正很早就让他与储位绝缘，在他看来父亲偏心，自己是长子居然这么没地位；另外一个方面，弘时了解雍正这个人，知道父亲是个两面派，在争夺储位的过程中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些都导致弘时对雍正缺乏起码的尊重，所以选择支持允禩来表达自己对雍正的不满。

弘时的下场是很惨的，最后死于囚禁之所，年仅二十四岁。这就是跟一个皇帝作对的下场，哪怕这个人是皇子，也不会有什么例外的。

弘昼比乾隆小三个月，两人从小同吃同住，虽然不是同一个母亲，但比同母兄弟更亲。也许正因为关系这么近，乾隆当皇帝后，弘昼很不开心，他时时处在皇兄的权威之下，郁郁寡欢，思想变态，居

然喜欢玩一种“装死人”游戏，他躺在那里装死人，让别人绕着他哭。最后，弘昼抑郁而死，终年五十五岁。

弘瞻事实上是由乾隆抚养长大的，雍正生弘瞻时已经五十六岁，一般老人对于幼子是特别宠爱的。雍正去世后，乾隆对弘瞻照顾得非常周到，正因为过于溺爱纵容，导致弘瞻变成一个骄纵不法的纨绔子弟。后来，乾隆对他略施惩罚，他一时间心里适应不了，居然活生生给吓死了，终年三十岁。

雍正是一个极少天伦之乐的皇帝，在他的四个儿子中，唯一让他满意的是弘历，其他几个儿子都拖累了他的名声。

第十四章 雍正不为人知的一面

雍正是一个善于制造舆论的皇帝，他不仅善于治国，也是一个作秀的高手，之所以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的谜，就是因为他高超的“造假”本领。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某个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能永远地欺骗某一部分的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雍正欺骗了当时很多人，也欺骗了后世很多人，但他无法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其实他很奢靡

雍正是一个善于制造舆论的皇帝，他不仅善于治国，也是一个作秀的高手，之所以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的谜，就是因为他高超的“造假”本领。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某个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能永远地欺骗某一部分的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雍正欺骗了当时很多人，也欺骗了后世很多人，但他无法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譬如，雍正留给后人这样的印象：一个勤政的好皇帝，生活节俭，不好色，但是个性严苛。

所以雍正死后，很多人认为他是累死的。但是，真实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雍正服食丹药暴亡，并不是累死的。

很长时间，人们都认为雍正是一个非常节俭的皇帝，不仅正史如此记载，民间也大多持有这种看法。然而，清朝内务府的《活计档》却暴露出了一个真实的雍正，他不仅不是一个节俭的皇帝，而且相当奢靡。

作为一个皇帝，奢靡无可厚非，但一边奢靡一边把自己打造成尧舜禹汤那样的皇帝，就非常虚伪了，这简直就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雍正确实是这样的人，用伪君子来形容他并不过分，当然他这么做有很强的政治动机，但这些并不能成为道德缺陷的借口。雍正喜欢抄家，一方面是反腐，充实国库，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中饱私囊。抄

家之后，金玉古玩从全国各地滚滚涌进皇宫中。

元年三月十八，怡亲王允祥献出五十六幅古画；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内监呈上镶嵌宝石的黄金托盘八十七件，雍正吩咐让作坊加工；元年十月初七，庄亲王献上玉簪一八七十九件、珊瑚二十件、玉戒指十三件……

这些都是珍宝啊，然而很多东西雍正看都看不上眼，让人拿开，别碍着他的金眼，其实很多是稀世珍宝，由此可见雍正之奢侈。

要想了解雍正的私生活我们可以从清廷的造办处来寻找蛛丝马迹，造办处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机构，里面有大量的作坊。皇室里面的日常用品和艺术珍品很多都在里面加工，皇家的奢侈或节俭在这里一览无遗。

雍正喜欢下棋，棋盘和棋子都是特制的，棋盘必须出自宫廷顶级画家的手笔，宫廷画家唐岱和郎世宁都画过棋盘，棋盘用象牙或银母（云母）制成。在制作象棋棋子时，雍正让太监刘玉拿来一个棋子，对他说：“棋子上面要镶嵌珐琅片，棋盘要做成折叠式的，要做得紧凑些。”

还有一次，雍正让内务府做檀木围棋，棋盘分上下两面，上面下象棋，下面下围棋，要用象牙镶嵌，里面颜色也有格外的要求。

雍正也喜欢玩骨牌，牌和匣子的制作都有严格要求，质料非常考究。

除此之外，雍正也非常喜欢盆景艺术，对一些花花草草奇异石头很感兴趣，他尤其喜欢将荔枝树做成盆景。

在宫中有许多宝格，用来放置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雍正甚至亲自设计宝格，他在给内务府郎中海望的上谕中说：“‘九洲清宴’陈设的宝格两层都是楠木的，里面放着古玩，看着不起色。你照着这个尺寸，再做两架黑漆宝格……宝格外面的口线，用紫檀木包镶。内做锦套，外面用布面纺丝裹套。再做一木套箱，下安穿绳眼，将格内安上玛瑙、玉器、磁铜等古玩……”

宝格里的宝物都是顶级的，而且要不时更换。雍正看腻了就要换上更好更新鲜的，雍正十三年七月九日，雍正对年希尧说：“九洲清宴宝格里有一个空处，你根据尺寸，寻找一个合适的宝物，或者玉器，或者铜器，或者瓷器，记住，一定要上好的。”

所谓上好的就是年代久远，秦砖汉瓦那种类型的，达不到年代久远，再好看的宝物也称不上是上好的。

这些记载跟我们印象中的雍正实在相差太远，无论正史野史，雍正给人的印象总是严肃、狠毒、刻薄寡情，但是真实的雍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一面，甚至给人好犬好色的刘邦一样的感觉，这是雍正和亡国之君隋炀帝身上共同的东西。故宫中有一张雍正戴西洋假发的画像，雍正去世前二十天，还让寻找像西洋人那样上翘的黑胡子，死前二十多天且有如此闲情雅致，可见此人天性爱玩，是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只是他身上责任感特别强烈，没有因为享乐而耽误正事。

雍正还特别喜欢玩具，在记载中多次出现“自行虎”这种玩具，这是一种木质的老虎，里面有发条，上好发条后，可以行走一段距离。

雍正虽然没有做什么大兴土木的事，但是对于园林也相当喜爱。圆明园本是离宫，但雍正把大半的时间都花在这里。他花了大量的银子来装饰圆明园，譬如耗巨资在里面做了一个人工瀑布。雍正还喜欢看戏，圆明园里的戏台非常豪华。正因为雍正喜欢看戏，野史中记载有雍正看戏杀人的传说。

鸟和狗一直为八旗子弟所喜爱，雍正也不能免俗，他经常下旨让内务府做鸟笼。雍正养狗的资料就更多，外地进贡了一条好狗，雍正还让郎世宁为狗写生。雍正甚至为狗做老虎衣、麒麟衣。

写到这里，相信读者对雍正有了一个更加立体鲜活的印象，雍正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但做得有些过分，奢靡过了头。在政治上，雍正不喜欢受制掣，乾纲独断。不过，雍正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虽然奢侈，却也有节约意识，譬如他经常命令“废物”再利用。

三年十月，他让海望把鼻烟壶改造成水壶；四年三月，海望献上一件寿山石罗汉，雍正说旁边的狮子不太好看，让他改成西洋狗；四年五月，海望拿出一个雕竹香筒，雍正让他把这个改造成晾衣架，用来挂毛笔或者衣帽；更荒唐的是，他还让将痰盂改成棋盒，如此“节省”确实匪夷所思。

雍正私生活奢华的地方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告诉我们雍正的私生活有多奢华，不如说揭示这样一个道理：宣传和真实从来不是一回事，更多的时候是相反的。

雍正与西洋画家郎世宁

郎世宁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画家，他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传教，可惜由于清政府的政策这个理想无法实现。

一般的传教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听天由命，过一种郁郁不得志的生活，但是郎世宁却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用一支画笔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为了迎合雍正的审美趣味，郎世宁改用中国画笔，将西洋画法和中国画法融为一体，放弃强烈的明暗对比，不使用投影技术，却保留西洋画的立体效果和焦点透视。

由于郎世宁画工深厚，很快就得到了雍正的欣赏。但是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却很少，他逝世于乾隆三十一年，活了七十八岁。《清史稿》里有他的传记，不过只有四十二字。尽管字数寥寥，但对郎世宁的评价很高，说他精通各种画法，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画得惟妙惟肖。

尽管清史中对他记载非常少，但在国外的一些著作里详细地介绍了他。所以，我们大致能了解郎世宁的生平。1688年7月19日，他出生于意大利米兰，19岁加入教会，堪称一个绘画天才，曾为教堂作壁画。1715年，即27岁时来华，在宫廷内担任画师，经历过康熙乾隆三朝。郎世宁逝世后，乾隆赐他侍郎头衔，赏银三百两给他治丧，郎世宁葬于北京阜成门外葡萄牙墓地。

郎世宁本来不是想在中国画画的，可惜来的不是时候，没法传教，但是郎世宁从来没有忘记传教。乾隆期间，郎世宁三次请求乾隆放开对宗教的限制，前两次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三次失败了。

我们还记得雍正曾召集二十名教士共进晚餐，其中就有郎世宁。宋君荣在给法国国王的信中提到雍正特别欣赏意大利画家郎世宁。

乾隆曾经赐给郎世宁一个正三品的头衔，这当然只是荣誉头衔，不管实事的。郎世宁在雍正朝却连荣誉头衔也没有，身份就是西洋画家。这并不是雍正不愿封外籍人士为官，譬如徐燮德就当上钦天监监副，戴进贤当过钦天监监正，外加礼部侍郎头衔。雍正没封郎世宁大概是把郎世宁看成是私人画家。

宫廷画师的待遇也分三六九等，最高的待遇是月薪十一两银子，有时候奖金比工资高多了，一幅画画得让皇帝满意，往往大手一挥，抵得上一年工资。我们不知道郎世宁的工资和奖金，以他跟雍正的关系，工资应该低不了。

宫廷里一般都会给画师供应膳食，我们来看看一些画师的伙食。德天赐和巴茂正每天有三斤肉，每月七只半菜鸡。潘廷章、贺清泰每天例肉三斤、菜肉三斤。每人每天白面十四两，白糖、澄沙各五钱，甜酱一两六钱，时蔬三斤，红枣、桃仁、龙眼、荔枝、葡萄各二两，时鲜水果八个。

伙食固然丰富，但管理也相当严格，充分说明在宫廷里混饭吃也

不容易。画师们要遵守很多规矩，首先，不可以做私活，只能为宫廷服务。其次，不可以偷懒，耗费钱粮，如果发现懒惰者和旷班者，要从重责罚。怡亲王允祥还命令官吏到画坊里到处巡视，如果发现谁没来，就要惩治。

今天一些在设计公司里工作的艺术家有的苦衷，这些宫廷画师们全有。比如，他们不能擅自动笔，不能自己想怎样画就怎样画，要服从领导的安排，画画的准绳不是艺术价值，而是领导的满意程度。在画画之前，先得弄个类似素描一样的东西交给上司，上司批准了才能作画。在画画的过程中还要遵守许多规则，法国画师王致诚曾经对朋友发牢骚说：“掣肘太多了，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相信这样的牢骚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乾隆曾经批评王致诚：“你这个油画虽然画得还不错，但是水彩画让朕不太满意。”领导满不满意是终极标准，领导可能完全不懂绘画，但他可以随时解雇你。最后，乾隆还派来中国一些平庸的画师来指导王致诚，让王致诚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雍正对郎世宁没那么苛求，不过也有让郎世宁很不爽的时候，譬如有一次画小狗，雍正就批评说：“你这个狗画得虽然好，但是尾巴上的毛太短了，身体也小了些，再画一张吧！”郎世宁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重新画了一幅，没想到八天后，雍正还让他再画一张。郎世宁这次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

雍正五年，让郎世宁在圆明园万字房围屏空白处作画，画完之后，雍正说：“画面太稀疏了，再修改修改吧！”

七年，让郎世宁画窗棂画，郎世宁呈上三张画稿，雍正只批准了其中的一张，雍正还指导郎世宁怎么画，在画里面要加入什么元素。

尽管雍正看起来很苛刻，但是和乾隆相比，仍然算是一个好老板，乾隆更挑剔，而且也更喜欢折磨人。乾隆二年，谕令画师们画圆明园巨幅画，限期五十天内完成。由于要求苛刻，时间紧迫，王致诚发出这样的感慨：“供职于内廷，简直形同囚犯。”

郎世宁的取材确实很广泛，花草、鸟兽、人物都有。郎世宁甚至画过双圆哈密瓜，动物中郎世宁还画过老虎，后来这幅画落到日本大阪的阿部房次郎的手中。郎世宁是唯一一个出现在《活计档》中的西洋画家，而且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宫廷的“画状元”满洲人唐岱对郎世宁的才能表示自愧不如，唐岱是山水画高手，对油画和水彩都不是很擅长，而郎世宁是个多面手，什么都能画。

作为一个画家，郎世宁生活应该是很不错的，不过也很辛苦，即

使到了晚年，也没多少时间休息，在乾隆手下干活不轻松。但他乐此不疲，显然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尽管没有实现传教的愿望，但多少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满足了内心的成就感。我想，这就是郎世宁甘愿埋骨异乡的原因。

佛性难洗君王心

雍正对佛教是很痴迷的，年轻时曾经雇人代自己出家，这是当时贵族的一个习惯。当皇帝后，他自称四和尚，并将雍亲王府改造成喇嘛寺。

根据雍正自己的说法，他从少年起就非常喜欢阅读佛教典籍，以此显示自己很有佛性。成年之后，雍正跟僧侣们交往比较密切，一方面这确实是他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也是障眼法。说来，他能当上皇帝还得感谢佛教呢！

在康熙五十一年和五十二年间，雍正在自己的府里举行法会，跟佛门高僧切磋，得到章嘉的指点，据说突破了三关。章嘉赞许雍正得到了善知识，从此心性自由无拘束。雍正则尊称章嘉为自己的恩师。

即使在信佛这块，雍正也表现出了好胜的一面。他自诩佛法高深，要找京城里有名的高僧辩论，最后迫使对方承认：“王爷的智慧实在高深莫测，贫僧自愧不如，无可奈何。”

雍正为了掩盖储位争夺，曾经编辑了《悦心集》，里面收录了无名氏的一首醒世歌：“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经》中空是色，《般若经》中色是空。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

雍正即位后，自称十年未谈禅宗。真实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的，雍正不仅谈论佛道，还自称为“释主”。在和允祥交谈时，他自称野僧，还写下了一首诗：“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纳人间个野僧。”

五年，大臣庆贺黄河清晏，蒙古王公也在其中，要求为雍正诵经祈福。雍正笑说：“如果蒙古地区因为做佛事人畜兴旺，那是受朕之赐，朕就是释主了。”

雍正给自己取了很多名号，比如破尘居士、圆明居士，以示自己是个不一般的皇帝，得道高深。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收徒，十一年，他收了十四个徒弟。其中，俗家子弟八人，和尚五人，道士一人。看来，雍正觉得当皇帝还不过瘾，还想当教主当圣人。

跟佛走得太近，难免会让佛与政治搅和在一起。文觉禅师在宫中时，雍正曾多次召他一起讨论军国大事，把他当成重要的谋士。据说在年羹尧、隆科多、允禩、允禵的案子中，文觉禅师都出了不少主意。

雍正十一年，文觉禅师奉命回江南朝山，仪式和王公等同，所到之处地方官无不对他顶礼膜拜。

还有一件事能反应雍正对佛的真正态度，迦陵性音是雍正的老朋友，雍正当皇帝前，两人经常坐而论道。雍正当皇帝后，性音并没有像其他和尚一样水涨船高，只因他对权势没兴趣，想去庐山隐居修行。到了庐山后，性音拒绝与官场来往，四年之后圆寂。雍正夸奖性音“深悟圆通，能阐微妙”，追赠他为国师，将其语录收入经藏。

但是，几年之后，雍正忽然性情大变，说他早看出性音这个人品行不端，经常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所以在登基之后把他赶出京，以维护法门的清规。更过分的是，雍正说性音的语录含糊处不少，根本没有大彻大悟，这等于是在否认了性音的佛品之后进一步否定性音的能力。雍正将性音的封号取消，还不允许性音的门徒记录自己以前和性音的谈话。

雍正为什么一反常态呢？史书没有记载原因，我们猜测可能是性音跟门徒说了什么话，这些话涉及雍正的隐私，又恰好传到雍正的耳朵里，所以雍正大怒，前后判若两人。

朝臣中大多还是儒家的信徒，对于雍正崇佛，大家心里都不满。

譬如，雍正五年，雍正问左都御史沈近思：“听说你年轻时入过佛门，敢情你也精通一些佛门真谛，不妨说与朕听听。”雍正当然不是真心向他请教佛法，雍正早已自诩教主了，自是想借着机会卖弄一下。

然而，沈近思却回答说：“臣少年时确实在佛门待过一段时间，但那是因为穷困潦倒，等到参加科举后，专心于经世之学，以便报效国家，又怎么会有闲情研究佛学呢？臣知道皇上聪明天纵，早就领悟了大乘的学问，但是天下万机全都系于皇上一身，臣希望皇上做尧舜，不要做释迦。即便是臣懂得佛学，也不敢妄自向皇上陈说。”

沈近思的话带着典型的儒家色彩，在当时是非常冠冕堂皇的，雍

正只好当面认错，说以后改正。

有一次，雍正宴请群臣。宴席上，有人为了拍雍正马屁，大谈禅学。这时，雍正问户部侍郎赵殿最：“你懂禅学吗？”赵殿最说：“不好意思没学过。”雍正笑道：“没学过没关系，你也谈谈对禅学的看法吧！”

赵殿最对佛教很反感，于是用儒家的道理阐释一通，雍正哭笑不得，对群臣说：“别人是慧根，他是钝根啊！”

许多官员甚至从实际行动上抑制佛教。雍正三年，御史钱以瑛上奏，请求让各省督抚勒令僧尼还俗。唐山县令还驱逐和尚，强行把僧舍改为民房。有的地方甚至建议把僧舍改成书院……

对这些行动，雍正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但还是能保持相当的克制。比如，那个唐山县令做得就有点过分了，雍正下旨把他抓了起来。侍郎留保以开导县令的口气为他说情：“这些僧人都是没有生计的穷人，寺庙就相当于收容所，皇上留下他们，就如同周文王爱民一样，把他们当做鳏寡孤独来照顾。”

那个县令不知是不懂，还是装不懂，总之仍然对佛教仇视。雍正听留保说话好听，也没有为难那县令。

对于自己信佛扬佛，能言善辩的雍正也作出了“高明”的辩解。他一方面说佛教确实对治理国家没有任何裨益，另一方面又说佛教有益人的身心，还说治国之道自有古代圣王的哲学，而佛法是见心明性的学问，所以自己从来不让僧人参政。这显然是狡辩，雍正也知道让僧人参政瞒不了所有的人，便又为自己辩解说：“乃祖顺治曾经召僧人玉林琇进宫研究佛学，这就如同黄帝到崆峒山寻访广成子，询问修身治国之道。”

雍正的言下之意是：顺治习佛如同黄帝问道，黄帝是中国第一圣王，他这么做是对的，那么顺治的做法也是对的，而自己恰好是效仿顺治。

雍正信佛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兴趣和愿望，算不上是真正的信仰。雍正对权力有着超强的欲望，这种欲望从根本上是与佛性抵触的，所以我们后人完全不必把他信佛当真，说成是他的一种爱好和兴趣更合适。

如果雍正真的领悟了佛法，我们很难想象他是如何面对那么多屈死在他手中的冤魂。当然，我们抱着善意的态度，希望雍正此刻正在西方极乐世界享受着极乐。

风流天子 大清风云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鹿鼎公子 著



伍

一个古代“高富帅”
一个风流倜傥的深情帝王
一个集政治家、学者、诗人、旅行家
于一身的另类皇帝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比野史
更靠谱

比正史
更有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风云 . 5, 风流天子/鹿鼎公子著.—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93-7309-5

I. ①大... II. ①鹿... III. ①中国历史 - 清代 - 通俗读物
IV. 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44242号

策划编辑: 胡 艺 (ngaihu@gmail.com)

责任编辑: 韩璐玮 (hanluwei666@163.com) 封面设计: 古
润文化

大清风云: 风流天子

DAQING FENGYUN:FENGLIU TIANZI

著者/鹿鼎公子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32

印张/8.5 字数/163千

版次/2016年5月第1

版

2016年5月第1次

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093-7309-5

定价: 29.8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

号

值班电话:

010-66026508

邮政编码

100031

010-66031119

传真：

网址：<http://>

www.zgfzs.com

010-66053217

编辑部电话：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66033393

010-66033288

邮购部电话：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清朝皇帝列表

姓名	庙号	年号	谥号	在位时间	皇陵
努尔哈赤	太祖	天命	高皇帝	1616—1626 年	福陵
皇太极	太宗	天聪 崇德	文皇帝	1626—1643 年	昭陵
福临	世祖	顺治	章皇帝	1643—1661 年	孝陵
玄烨	圣祖	康熙	仁皇帝	1661—1722 年	景陵
胤禩	世宗	雍正	宪皇帝	1722—1735 年	泰陵
弘历	高宗	乾隆	纯皇帝	1735—1795 年	裕陵
颙琰	仁宗	嘉庆	睿皇帝	1796—1820 年	昌陵
旻宁	宣宗	道光	成皇帝	1820—1850 年	慕陵
奕訢	文宗	咸丰	显皇帝	1850—1861 年	定陵
载淳	穆宗	同治	毅皇帝	1861—1875 年	惠陵
载湉	德宗	光绪	景皇帝	1875—1908 年	崇陵
溥仪	逊帝	宣统	—	1908—1912 年	华龙陵园



《乾隆大阅图》

郎世宁（1688—1766），意大利传教士，任内廷画院供奉，画法参照中西，善写生人物、花鸟，尤工画马。

此图系郎世宁为乾隆皇帝精心绘制的宏幅巨作，艺术技艺高超，反映了乾隆年间的国力昌盛和中西文化的高度融合，共有《幸营》《列阵》《阅阵》和《行阵》四卷。



《山居图》轴

此图系公元1760年弘历亲笔所绘。图近处疏木坡丘，静水潺潺；隔岸柴院茅屋，掩映从间；远木深深，岗峦缓缓。此图为“平远”小景，山石、树木、屋舍之勾勒、点染不求笔墨，信笔草草。



“大清受命之宝”玉玺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展出的清朝传位玉玺，为清初诸帝使用，是乾隆钦定“盛京十宝”之一。

皇帝之印称“宝”为清制，皇帝的印信称为“御宝”。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乾隆帝对交泰殿所藏前代皇帝御宝重新考证排次，将其总数定为25方，详细规定了各自的用途和使用范围。



《抱朴子言避热图》册

徐扬，生卒不详，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乾隆南巡至苏州，因献画遂入画院，供奉内廷。

图中山高涧深，云雾缭绕；松下问答，空谷幽幽。图中山石、树木、人物衣着之勾勒、皴擦、晕染系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但人物面部些许明暗处理则源于西洋绘画技法。

总序

清史洋洋洒洒近三百年，三百年间怪事、奇事、惨事、恨事迭出，三百年年年都精彩，年年都有挥之不去的喜怒哀乐。整个清朝三百年，几乎囊括了人性中一切的极端面，三百年，道不尽的风云爱恨。

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骑兵，建立了后金，身后留下了无数的尸体，最终倒在宁远城下，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书生袁崇焕手中，就此郁郁而终，这是上天对一个暴力征服者的最大讽刺。随后，努尔哈赤诸子开始斗智斗勇，最后皇太极靠谋略成为老大。

皇太极穷其一生精力都在与明朝对抗，不幸暴毙后，大清国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多尔衮与豪格之争最终便宜了顺治。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后，成为皇父摄政王，将全国军政大权操于一身，顺治完全被架空。此时，孝庄和顺治母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危难关头，孝庄舍身保大清，稳住多尔衮，终于使大清逃过这一劫。

顺治是个痴情天子，亲政后喜欢跟母亲孝庄闹不愉快，结果自己和董鄂妃双双去世。康熙继位时才八岁，不过这是个早熟的孩子，也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很早就懂得帝王之术。在别人还是懵懂少年时，他就已经像个猎人一样盯紧了鳌拜，除掉鳌拜之后，康熙开始了自己雄才大略的一生。

康熙治国和外交不外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所以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鳌拜，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荡平准噶尔，击退沙俄侵略……在整个清朝，帝王之术在康熙手中达到顶峰。

然而，康熙也有缺点，他的法度不够严明，治国主要是依靠儒术和道术。雍正虽然上位不明不白，但当皇帝后弥补了康熙的缺点，雍正治国理念上最大限度地奉行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乾隆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他继位后，废除雍正的依法治国思路，重新走康熙的路子。但乾隆并不懂康熙真正的治国精髓，结果变成了外用儒术、内用权术，所以清朝在乾隆时期开始走向衰落。

自乾隆后期，动乱纷起，尤其是白莲教叛乱几乎烧遍整个中国。到了嘉庆手中，国家元气已大伤，嘉庆虽然是个仁君，可惜终究没有先祖那份雄才。他虽然减缓了国家的衰颓，但始终没能重振大清的雄风。到了道光手中，国家就更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欺负得

够呛，国内的动乱更是风起云涌。

咸丰就更悲剧了，太平天国和天地会起义，全国天翻地覆。更糟的是八国联军来了，他连个京城都保不住，年仅三十岁便郁郁而去。咸丰死后，朝政大权掌握在“龙夫人”慈禧手中，国家每况愈下，虽然中途出现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可惜终究是昙花一现。

清末虽然出现了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袁世凯这样的中兴名臣，但亡局已定，神仙也不能力挽狂澜。最终，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千古帝王，悠悠万事，功过自有百姓言，清朝这些事儿，就交给读者去慢慢品味吧！

序言

乾隆不是清朝最英明的皇帝，最英明的皇帝是康熙；乾隆不是清朝最勤政的皇帝，最勤政的皇帝是雍正；乾隆也不是清朝最仁厚的皇帝，最仁厚的皇帝是嘉庆；但乾隆却是清朝最有福气的皇帝，康熙说乾隆的福气将来超过自己，一点不错。乾隆盛年继位，无风无雨，没有任何人跟乾隆抢皇位。乾隆继位时，雍正已经为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该做的事情雍正基本上都做完了。乾隆活了八十八岁，实际掌权时间超过康熙在位的时间。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福气如此深厚的皇帝，他的身世却不明不白。有人说他的生母是承德避暑山庄的傻大姐，有人说他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乾隆到底出生在什么地方，连他的儿子嘉庆都搞不懂。

除了身世离奇之外，乾隆在其他方面都是非常正常的，帝王之术在他手中发挥到极致。说到聪明，乾隆可能超过了康熙和雍正，但论起大智慧，他又远远比不上祖、父，所以他可以用权术干净利落地收拾鄂尔泰和张廷玉党羽，但是他却无法遏制官僚集团越来越腐败的趋势。乾隆可以大手一挥，减免天下百姓的赋税，让万民得到真正的实惠，但是对于造反的“暴民”，乾隆杀起来毫不手软，比康熙和雍正残忍很多倍。

乾隆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善与恶、正与邪在他身上发挥到极致。世人都清楚乾隆是一个风流的皇帝，这可能跟他六下江南的风流艳遇有关系，但乾隆的真正面目并不是一个风流天子，而是一个乾纲独断杀伐无情的皇帝。乾隆心肠之狠、手段之猛在清朝皇帝中也是数一数二的，这在文字狱中的表现尤为明显。

乾隆自己喜欢到处题诗，但是在乾隆朝当官写诗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乾隆对文字很敏感，他曾经根据两句诗推断出幕后有一个造反集团，而且还真被他料中了，所以他对自己的文字直觉非常自信。乾隆有一个癖好，喜欢从别人的文章诗句中推测出这个人的谋逆不轨之心。乾隆明显对文字狱有一种变态的嗜好，所以乾隆朝的文字狱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乾隆朝轰动全国的文字狱案件中，一个独裁君主内心深处的阴暗面暴露无遗。

当然，在生活中乾隆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皇帝的，一生深爱原配

孝贤皇后，孝贤皇后三十多岁离开人世后，乾隆再也没有找到真爱，所以才沦落为一个风流天子。乾隆一生留下了太多风流韵事，以至于有传言连福康安都是他的私生子。

我们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概括乾隆的一生：权术、武功、女人、风雅。乾隆的一生从来就没有离开权术，权术是驾驭整个帝国的基本手段。在位六十多年，乾隆穷兵黩武，处处彰显帝国的武力，也拓展了大清的版图，武功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好大喜功的一面，但也属于他政绩的一部分。至于女人和风雅，对乾隆来说都是私生活不可或缺的情调，文治武功之外，还需要女人和风雅来陶冶性情。

晚年，乾隆称自己为十全老人，这十全并不是什么文治和德政，而是指十次征战。由此可见，在内心深处，乾隆跟清朝的皇帝们一脉相承，都认为武功远比其他东西要重要。在乾隆身上，流淌着先祖们暴力打江山的血性。

目 录

清朝皇帝列表

总序

序言

第一章 扑朔迷离的身世

出生地之谜

乾隆的身世为何这么玄乎

离奇的生母

一、承德的贫家女

二、热河行宫的傻大姐

三、丑女版国母

四、正史中的版本——钮祜禄氏

陈阁老的儿子

第二章 有个性的皇帝

祖孙情

不走父亲的路

皇帝的“仁”

弘历能行

新瓶旧酒

第三章 收拾父亲遗留下来的摊子

边疆难题

乾隆点将

边疆要安抚

第四章 帝王心术

流产的叛乱

盘根错节的朋党

逐个击破朋党

第五章 弹压“暴民”不手软

米价上涨引发的心灵创伤

取缔大乘教

福建老官斋教徒暴动

清水教大劫

王伦起义

第六章 还原十全武功真相

第一次金川之战

第二次金川之战

制服准噶尔这头野兽

议和罢兵

准噶尔内乱

讨伐准噶尔

风波再起

一战定江山

一统回疆

艰难搞定缅甸

弹压林爽文起义

出兵安南

反击廓尔喀

第七章 乾隆反贪“风暴”

宦海惊魂——大贪官李侍尧逍遥法外之谜

李侍尧案发，和珅审理

李侍尧认罪

一审死缓

二审斩立决

三审网开一面

乾隆为何对李侍尧法外施恩？

惊天大案——甘肃冒赈案

通省都是贪官

冒赈中的猫腻

明察暗访

大批贪官落马

审判官陈辉祖也卷入案中

一个牛脾气揪出一群贪官

第八章 六下江南——处处留情真风流

民间热议：乾隆为何六下江南

离家的孩子要回家

微服私访

寻花问柳

炫耀书法，卖弄文采

同是南巡，康乾有所不同

劳民伤财的南巡

南巡途中的故事

问君做了多少事？

第九章 天子也风流

贤后一去不复返

红颜未老情已绝

南国有佳人

神秘美女香妃

福康安真是乾隆的私生子吗？

第十章 十全老人的外交手腕

对于传教士往死里整

来自大洋彼岸的梦魇

洪仁辉事件

马戛尔尼访华

第十一章 千古一病文字狱

吓死大臣的伪稿案

两个不要命的疯子

制造文字狱让乾隆很刺激

写诗是刀剑上的舞蹈

一柱楼里飘出死亡气息

死神从天而降

怎么就给盯上了呢？

刘罗锅干的好事

帝王心黑似洞

第十二章 “恋”上和

真实的和珅

读心高手

第一章 扑朔迷离的身世

乾隆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曾静的脑袋砍了，继承了爱新觉罗家族对舆论管制的优良传统，扭转了他父亲极其有限的人权倾向。即便如此，乾隆也无法回避自己的身世问题。

首先，乾隆的出生地就是一个谜。这个谜直接关系到乾隆是谁生的。

出生地之谜

乾隆是中国古代活得时间最长的皇帝，享年八十八岁，算上他当太上皇的时间，也是中国掌权时间最长的帝王。

乾隆在历史上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但是他的身世却不明不白，稀里糊涂，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浙江海宁，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说乾隆是汉人，金庸把这个民间传说引入《书剑恩仇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家洛与乾隆之间离奇曲折的故事。

乾隆身上的谜实在太多了，这些谜直接关系到乾隆继位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乾隆的父亲雍正曾被人怀疑继位不合法，对此非常头疼，不得不放下九五之尊的架子平心静气跟书生曾静辩论。最后是越辩越黑。

乾隆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曾静的脑袋砍了，继承了爱新觉罗家族对舆论管制的优良传统，扭转了他父亲极其有限的人权倾向。即便如此，乾隆也无法回避自己的身世问题。

首先，乾隆的出生地就是一个谜。这个谜直接关系到乾隆是谁生的。

关于乾隆的出生地，有两种说法：一个是雍和宫，一个是承德避暑山庄。这个说法在乾隆统治早期就出现了。

在清代的官方资料里，乾隆出生于雍和宫。《清高宗实录》里明确写道：“高宗纯皇帝，讳弘历，世宗宪皇帝第四子也……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

雍和宫位于北京城东北，现在是一座喇嘛庙。康熙年间，雍正住在这里，那时候叫雍王府。雍正当皇帝后，将自己的王府改成喇嘛庙，更名为雍和宫。

为什么官方记载得明明白白的资料会引起这么多不同的意见呢？

为了证明自己出生在雍和宫，可以说乾隆也是费尽心力，在《御制诗集》里再三提到自己诞生于雍和宫。

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初七，也就是古代的人日节，女娲在第七天造人，所以这天也就是人的节日。这一天，乾隆到雍和宫礼佛，写了一首诗：

首岁跃龙邸，年年礼必行。

故宫开跌宕，净域本光明。

书室聊成憩，经编无暇横。

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

乾隆在人日这天来雍和宫礼佛，想起了自己当年出生在这里——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写得声情并茂，仿佛是为了告诉世人，我乾隆百分百是在雍和宫出生的。这方面的诗句还有很多，譬如：“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十二幼龄才离此，讶令瞥眼七旬人”“虽曰无生俞宗旨，到此每忆我生初”“尚忆初生我，忽来八十翁”“跃龙池自我生初，七岁从师始读书”……

类似的诗句实在是太多了，乾隆一再强调自己是出生在雍和宫的东厢房。不仅如此，乾隆还在一些诗中作注，强调自己确确实实是出生在雍和宫的。乾隆在诗句下写道：“我确确实实是在康熙辛卯年出生在雍和宫的……我在康熙辛卯年出生在这雍和宫里，到十二岁时离开，祖父把我召到宫里抚养。”

越是强调越是让人怀疑。当时，朝野上下有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很多人认为乾隆并不是出生在雍和宫，而是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狮子园，乾隆的儿子嘉庆就持有这种看法。说白了，这事可能连乾隆自己都不清楚。

最早对乾隆出生地提出质疑的是军机章京管世铭，管世铭曾多次跟着乾隆到承德避暑山庄打猎，并先后写下三十四首诗记录打猎的过程，其中在第四首诗中提到了乾隆的出生地点：

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

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

管世铭还在这首诗下加了一个注：狮子园是当今皇帝的降生之地，乾隆常常在先帝驾崩的忌日到那里小住几天。

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面的一座园林，背靠着一座状如狮子的山，是雍正做皇子时的房产。在承德山庄避暑的时候，雍正一家就住在这里。管世铭担任军机章京的时间很长，消息灵通，他说乾隆出生在狮子园，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绝不是信口开河的。嘉庆对此也是认可的。

嘉庆刚刚登基的那年，乾隆在避暑山庄过万寿节，嘉庆写了一首诗，开头两句是：“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姻缘。”嘉庆还在诗下面作了一个注：康熙辛卯年建立山庄，皇父在这年诞生于都福之庭，其中的因缘巧合实在不可思议。都福之庭是各种各样的福气汇聚的地方，意指承德避暑山庄。

第二年，乾隆又在承德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下面又有一个注解，明确说乾隆诞生于承德避暑山庄。

嘉庆写的这两首诗都是为乾隆祝寿的，乾隆应该看过。但是，史书没有记载乾隆的反应。估计乾隆是不太高兴的，又不能明说，而嘉庆呢，并不知道老父心中的死结之深。

乾隆的身世为何这么玄乎

雍和宫是乾隆自己坚持的出生地点，狮子园呢，是其他人的看法。那么，乾隆到底出生在哪里呢？

嘉庆十二年，编纂《清高宗实录》和《圣训》的时候，嘉庆审阅书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他发现这两本书都把父亲的出生地点写成了雍和宫，嘉庆看着疑窦丛生，怎么会这样呢？皇父明明是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嘉庆心想，这些史官们也太粗心了吧！愤怒之下，嘉庆招来史官们质问：“你们怎么搞的，连皇父的出生地点都搞错？”

没想到史官们居然一点都不慌张，他们不紧不慢地拿出“证据”，所谓的证据就是乾隆自己写的诗文和注脚。很多史书说，面对白纸黑字，嘉庆的疑惑解开了。事实，恰好相反，他陷入了更大的困惑中。虽然他默认史书将皇父的出生地点写成雍和宫，但始终猜不透父亲为

什么一定要强调自己出生在雍和宫，后来才想通了：关于父亲的身世，流言太多，只有出生在雍和宫才能断绝流言，如果是出生在狮子园，恰好可以给这些流言可乘之机。

当然，乾隆到底是不是出生在狮子园，嘉庆自己也不知道，也是听人说的。虽然嘉庆在官方文书中同意将乾隆的出生地改为雍和宫，但是并没有把这件事公之于众。

到了道光朝，乾隆出生地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时年六十一岁的嘉庆在承德避暑山庄打猎，突然驾崩，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在驾崩之前，嘉庆的身体很健康，没有什么病，所以关于嘉庆之死又成为清宫的一个谜案，有传言说嘉庆是被雷劈死的。

传闻描述得有鼻子有眼，说嘉庆到达避暑山庄后，稍微休息片刻，就率领大队人马奔向木兰围场。然而，这次非常特别，嘉庆等人围猎了几天，也没发现什么猎物，老虎、豹子、熊之类的根本没看到，就连平常遍地都能见到的麋鹿都很少。嘉庆非常扫兴，决定提前收工，结束秋狩。

没想到回来的路上，天气突变，原本秋高气爽，晴空朗朗，突然之间，雷电交加，大雨倾盆。那么多人，偏偏闪电就击中了嘉庆皇帝，将他击落马下，当场身亡。还有一种说法是嘉庆在承德避暑山庄处理政务，突然之间被闪电电死。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雷电跟嘉庆有仇，别人不劈，就劈嘉庆。

还有一个说法更八卦，说嘉庆喜欢一个小太监，经常跟那个小太监偷情。这天，来到承德避暑山庄后，嘉庆和小太监玩得更过火，两人在“烟波致爽殿”后面的一个名叫“云山胜地”的小楼里寻欢作乐。就在他们淫乐之时，忽然一道闪电从云层中劈下来，在嘉庆身上炸开，嘉庆当场丧命。

遭雷劈后，嘉庆尸体烧焦，面目全非，没办法收敛入棺。为了防止皇帝被雷劈这样的丑事被外界知道，大臣们经过商议后想出一个办法，把一个相貌和体型跟嘉庆相似的太监绞死，然后再进行尸体化妆。将嘉庆的遗骸放在棺材底部，上面躺着的是经过化妆的太监尸体，通过这种方式掩人耳目，然后将遗体运到北京埋葬。这个说法虽然广为流传，但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嘉庆这一死不要紧，他的遗诏可害苦了道光了，这份遗诏中再次提到了乾隆的出生地，仍然把乾隆的出生地说成是承德避暑山庄。遗诏说：“皇父乾隆当年就是诞生于承德避暑山庄，今天我死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大臣们都觉得遗诏没问题，把遗诏公开发布，还发往了清朝的各个藩属国。这个新继位的道光皇帝也认为乾隆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所以没看出问题。后来，他查《清高宗实录》才发现了问题。出了问题后，他立即快马加鞭，命令以每天六百里的加急速度，让人把发往各藩属国的遗诏追回来。

为了使遗诏与《清高宗实录》一致，道光不得不改写遗诏，把遗诏中乾隆诞生于承德避暑山庄改写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

道光为了结束争论，决定一锤定音，将乾隆的出生地定在雍和宫，从此不准朝臣有任何异议。道光甚至修改父亲嘉庆的诗集，把里面说乾隆诞生于狮子园的说法统统改了过来。道光企图断绝“谬种流传”，可惜嘉庆的这些诗早已流传开来，这种修改不但没有起到根绝流言的作用，反而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结果让乾隆的出身更加扑朔迷离。

至今，历史学家还弄不清楚乾隆的出生地究竟在哪里，我们可以作一个猜测：如果乾隆诞生在雍和宫会怎么样？如果乾隆诞生在雍和宫，那么清王室皆大欢喜，一切正统，乾隆是血统纯正的皇帝。站在乾隆的立场上，他肯定坚持自己是出生在雍和宫，不管是不是真的出生在雍和宫。确定了这一点，乾隆自己的《御制诗集》就不能作为他诞生在雍和宫的证据。除非能够找到其他一些证据，否则我们不能根据乾隆自己的说法断定他出生在雍和宫。

管世铭、嘉庆等认为乾隆出生在狮子园，他们都不是乾隆的仇人，没必要故意丑化乾隆，而且丑化乾隆会担很大的风险。所以说，管世铭和嘉庆说乾隆诞生于狮子园肯定是有一定根据的，虽然可以肯定他们都没亲眼见到乾隆出生于狮子园。我们也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证明乾隆出生在狮子园，但是综合考虑，狮子园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离奇的生母

乾隆的出生地不明不白，难免让人怀疑他的生母出身。

关于乾隆的生母说法更离奇，至少有四种说法。

一、承德的贫家女

道光之后，第一个说乾隆生母有问题的是晚清著名学者王闿运，王闿运不仅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诗人，曾经担任曾国藩的幕僚，交

游甚广。在王闾运的《湘绮楼文集》中，有一篇《今列女传》的文章，里面说乾隆的母亲是钮祜禄氏——这点跟正史记载相同，所不同的是正史说乾隆的母亲钮祜禄氏是满族八大家之一，出身名门。但是在王闾运的记载中，不是这样的，钮祜禄氏只是一个满族的贫家女，老家在承德。

对此，王闾运作了非常详细的记载，他说乾隆的母亲住在母家，家里贫穷，没有奴婢。十三岁的时候，她来到京城，最后误打误撞居然被选为宫女，被分配到雍王府做使唤丫鬟。有一年，身为皇子的雍正生了大病，这个宫女悉心照顾他，接连几十天衣不解带，让雍正非常感动，事后，雍正对她非常好，生下了乾隆。

王闾运的这个说法引起了清朝遗老的一片反对声，遗老们提出的反对意见也很在理，他们认为清廷对皇室的血统非常重视，选秀女的要求也极为严格，想混入选秀的队伍是不太可能的。一些对清史素有研究的学者也不赞同王闾运的说法，有些人认为王闾运的文章喜欢自由发挥，没有太大的可信度。

王闾运这个说法之所以流传这么广，也有他的道理，他把乾隆的生母跟承德联系在一起，让人联想到乾隆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相，或者距离真相有多远就没人知道了，反正它有一定的影响力。虽然信的人不多，却让乾隆身世越来越糊涂。反对者的意见是清廷对血统非常重视，选秀的过程非常严格，应该说这种反对意见不太给力。就血统来说，康熙是满汉混血儿；过程非常严格也不能成为否定过程中出疏漏的理由，美国的监控设施应该很严吧，“9·11”还是发生了。

二、热河行宫的傻大姐

王闾运的说法启发了一些人，有人开始猜测乾隆会不会是汉人女子的后代，这个汉人女子恰好住在热河一带，不正好跟乾隆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对应吗？

正像胡适说的“大胆猜测，小心求证”，即便是最离奇的猜测也是值得鼓励的，只要能自圆其说。还别说，这个说法还真跟胡适有关，虽然不是胡适提出来的，但是由胡适记录下来的。

1922年初春的一天，在香山双清别墅里有两个人在闲聊，一个是民国初年的国务院总理熊希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学者胡适。当时窗外正下着小雨，熊希龄告诉胡适，他曾去过热河行宫，看到行宫内“东宫”（太子园）之前有一座低矮的茅草屋。“东宫”是当年雍正居

住的地方，怎么前面有一个茅草屋呢？不伦不类。熊希龄看到这一幕心中泛起阵阵疑惑，便到处询问其中的缘由，但是行宫之内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

最后，熊希龄找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宫役，他告诉了熊希龄其中的缘故，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件事，我们不妨摘录下来：

乾隆帝生母为南方人，译名“傻大姐”，随其家人到热河营生。时方选秀女，临时缺一，遂把她列入充数。后来太子（雍正）病重，傻大姐在侍女之列，服侍最勤，四十余日衣不解带，太子感其德，病愈后遂与她有关系，她后来在一个茅棚内生一子，即乾隆帝也。后来乾隆帝就在产生之地作此茅屋，留为纪念。

胡适很赞同熊希龄的“傻大姐”说法，并且认为乾隆确实很像傻大姐的儿子，胡适的这个说法让人很怀疑，乾隆是中国最多产的诗人，怎么像傻大姐的儿子了？从遗传学来说，乾隆确实不像傻大姐的儿子，也许乾隆是一个劳民伤财的皇帝，但他绝对不是个呆滞蠢笨的人，所以从基因的角度来说，乾隆不像是傻大姐的儿子。但乾隆毕竟有雍正这样的父亲，即使母亲真是个傻大姐，也有可能是很聪明的。所以，遗传学也不能否定乾隆是傻大姐的儿子。

那个老宫役说雍正是太子，雍正明显不是太子，一些人据此说老宫役说话漏洞百出不足为信。这些人过于书呆子了，老宫役是没什么文化的人，在他们眼里，最后当上皇帝的那个人在没当皇帝之前自然就是太子了，跟一个农民讨论茴香豆的茴四种写法，然后证明农民错误，这种做法毫无意义。

所以，老宫役虽然用词不当，但说法未必是错误，但是也没有其他有力的证据证明他说的话就是真相。

这个说法仍然存疑，有待考证。

三、丑女版国母

1944年，关于乾隆生母问题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版本，《古今文史》半月刊上登载了一篇名为《清乾隆帝的出生》的文章，作者是上海著名的杂文作家周黎庵。

周黎庵参照清朝遗老兼清史学者冒鹤亭的说法，披露了乾隆的出生之谜。周黎庵的观点更具戏剧性，他认为乾隆的生母姓李，是个丑陋无比的汉人女子，在热河行宫里当丫头，干一些粗活。有一年雍正跟随康熙到木兰围场狩猎，射中了一头鹿。大家知道，鹿血有壮阳作

用。满族人习惯用鹿血补肾，雍正回到行宫后，让人把鹿宰掉，然后用大碗接鹿血喝。喝着喝着，不觉喝过了头，雍正顿时浑身燥热，血脉偾张。雍正放眼望去，身边又没有妃子，突然一个拿着烧火棍的丑女走了过来。雍正顾不得那么多了，直接拉过这个丑女就地幸御。

之后，雍正就把这事忘在脑后了，他没有料到自己已经播下了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乾隆。当年的冬天，雍正跟随康熙回京。第二年秋天，这父子俩又来打猎了。这时，这个姓李的丑女大腹便便，孩子快要生了。她找到雍正哭诉，康熙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让人查出来后，痛骂了雍正一顿。

为了避免李氏褻渎了宫殿，康熙指定她到一个马厩里临盆，李氏就在这里生下了乾隆。乾隆登基之后，念念不忘出生时母亲的凄凉光景，每年都要拨款修这个草房，所以这个小小的草房两百多年来一直保存完好。据说，乾隆南巡的时候几次带着皇太后，见过太后容貌的人都说太后奇丑无比。

周黎庵的观点是建立在冒鹤亭说法的基础上，而冒鹤亭是一个有来头的人，他曾经担任过热河都统的幕僚，这个说法他也是从热河行宫的宫监口中得知。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看到乾隆的生母经过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从满族贫女到汉族傻大姐，再到汉族丑女——整个过程中，清朝国力在不断下降，乾隆生母的身价也在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故事虽然越来越具有戏剧性，也显得越来越完整，更加能够自圆其说。

台湾地区学者庄练和历史学家高阳都赞同这个说法，并为此进行了论证。庄练经过大量考证后，认为正史中关于乾隆的身世记录是捏造的，乾隆应该出生于热河行宫，母亲是李氏。

庄练提出三条证据证明乾隆的生母是李氏。

一、根据《清圣祖实录》的记载，康熙五十年七月，皇子雍正曾专程到热河向康熙请安，这个时间恰好是乾隆生母临盆的时候，康熙召雍正到热河，就是为了向他询问这件事。

二、管世铭曾经再三提到乾隆诞生在狮子园。

三、官方史书《热河志》专门将这间简陋的草房写进史书中，并和其他典雅的楼阁一起写入狮子园的房屋中，这足以证明草房非同小可。

这三条证据足够证明乾隆的生母是李氏吗？说实话，不能够，证据不足或者说没有直接证据。雍正确实在康熙五十年去热河请安，但

是史书没有记载康熙是让雍正和李氏对质，而是让他过去度假休闲。针对第二条证据，就算乾隆出生在狮子园，也不能证明他就是李氏生的。那个引起争议的草屋虽然疑点重重，但也不能据此猜测乾隆的母亲是李氏，她就是在这里生下乾隆。

有“历史刑警”之称的高阳也认为乾隆的母亲是李氏，他也有自己的证据：

一、根据《清会典》的规定，亲王可以封侧福晋四人，但雍正当皇子时只有两个侧福晋，分别是年氏和李氏，钮祜禄氏是满洲八大族之一，父亲是四品内大臣，如果她真的生下乾隆的话，理应享有侧福晋的名号，但是在雍正继位之前，她一直是格格，地位很低。

二、高阳的第二个证据是乾隆在给钮祜禄氏上尊号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诞育”二字。高阳说，在清朝，凡是因为生子而被尊为太后者都会在尊号前加上“诞育”二字，但是乾隆在给钮祜禄氏上尊号的时候，只用了“鞠育”这样的字，高阳认为这是抚养而不是生养的意思。

高阳的第一个证据多少还有一些道理，第二个证据出现了漏洞，在古汉语里，鞠育既有抚养的意思，也有生养的意思，最早见于《诗经》：“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父母生我养我的意思，“鞠育”的正确解释是“生养”。

综合来看，认为乾隆的母亲是丑女也不是完全凭空捏造，但是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这个观点要想让人完全信服，必须挖掘出更多的证据。

四、正史中的版本——钮祜禄氏

正史中的白纸黑字写着乾隆的母亲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是满族的一个豪族，出了不少大人物。不过，乾隆生母的这支钮祜禄氏则显得相对寒碜，没出现什么大人物，是大族中比较寒微的一支。钮祜禄氏的父亲只是个四品官，祖父没有一官半职。

根据正史记载，钮祜禄氏也是在十三岁的时候被选上秀女，进入雍王府伺候雍正。她的姿色和才貌都不是特别出色，身份一直是格格，相当于小妾。钮祜禄氏比雍正小十四岁，虽然年轻，可惜雍正对她没多少怜惜之情。雍正当上亲王后，钮祜禄氏的地位没有任何改善。

进入雍王府七年后，她生下了唯一的孩子乾隆。但是，她却没有因此而富贵，一直当着格格，直到雍正登基，她才被封为妃子，当时

乾隆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在康熙生前，非常喜欢这个孙子，甚至有传言说康熙就是为了将来让这孙子当上皇帝才传位给雍正的。基于这一层原因，雍正登基后，钮祜禄氏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先是被封为熹妃，后来又晋升为熹贵妃。

乾隆登基后，钮祜禄氏被尊为皇太后，作为一个女人，她登上了至尊的地位，但是依然不改淳朴的本色。以前，在雍王府的时候，她的身份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女仆，干很多粗活。当上太后，她并没有养尊处优，仍然保持着平常人的那种朴实。钮祜禄氏没多少文化，作为一个太后，她从不干涉朝政，而且生活节俭，是一个慈祥善良的老妇人。

这个钮祜禄氏的身体也非常健康，由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晚年时她仍然显得健朗，经常跟着乾隆出巡，游山玩水，爬山的时候健步如飞。这个老妇人活了八十五岁，乾隆的高寿显然是继承了她的基因。

钮祜禄氏是一个慈母，乾隆是一个孝子，母子的关系非常融洽。乾隆知道母亲早年受了不少苦，所以想极尽孝道，让母亲晚年享尽福气。乾隆经常去母亲那里请安，亲自伺候母亲吃饭，还常把母亲接到自己居住的圆明园里面来。每逢给母亲祝寿，乾隆都是极尽奢华，一定要把太后的寿诞做得比自己的生日更加隆重。乾隆的孝心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居然让人把母亲掉的头发收集起来，然后存放在一个金塔里面，称为金发塔。

在乾隆的诗作里面，有大量歌颂母亲的诗歌，如果说乾隆的孝道完全是作秀的话，那一个人还不得累死，所以这里面肯定是有真情实感的。母亲病逝后，乾隆悲痛欲绝，穿孝服，跪在母亲灵前不起，昼夜不进食。此后近一年的时间，这个诗情满腹的皇帝居然没写什么诗。

母子之情如果可以作假的话，那我们只能感叹乾隆作秀的功夫太强了。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正史中记载的钮祜禄氏就是乾隆的生母。

那么，这是不是证明乾隆就是出生在雍和宫呢？不一定，一个折中的理解是乾隆出生在狮子园，生母就是身份相对低微的钮祜禄氏。乾隆之所以一再强调自己出生在雍和宫，就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和流言，这些流言不仅会玷污自己，也会玷污母亲，为此，他不惜编造一个善意的谎言。

陈阁老的儿子

关于乾隆身世最离谱的传说莫过于流传在浙江一带的偷龙换凤的传说。这种说法在清末开始流传，之前的传说都还肯定乾隆的父亲是雍正，只是母亲不明不白而已，这个传说干脆说乾隆的生父不是雍正，乾隆是浙江海宁陈阁老夫妇的儿子。

传说中，乾隆的生父是陈世倌，是杭州海宁的一个盐商，俗称陈阁老。这人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与雍正的关系非常好，往来比较密切。某年某月某日，雍亲王的一个妃子和陈阁老的妇人在同一天都产下了孩子，雍亲王那边生的是女儿，陈阁老这边生的是儿子。听说两家同日生产，雍亲王非常好奇，让陈阁老把孩子抱到王府上来看看。

雍亲王夫妇看到这个孩子后，特别喜欢，竟然产生了调包的想法。

良久，雍亲王把孩子抱了出来，送还给陈阁老，然后就送他出府。陈阁老回家后，打开襁褓，发现之前的大胖小子变成了丫头。陈阁老大惊，但他很清楚这件事情关系重大，一旦漏了风声，可能会搭上全家性命。所以，他让家人不要声张。

没过多久，陈阁老就辞职回乡，精心抚养女儿。这个被换走的儿子，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这个传说一出炉，就迅速流传开来，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一些“证据”印证着这个传说。有人说，乾隆六下江南，四次住在陈阁老的家里，其实就是为了探望亲生父母。还有人说乾隆在海宁屡次召见陈家子弟，对他们勉励有加，如果不是关系特别，有必要这么好吗？更有人绘声绘色地说，乾隆为陈阁老亲自书写了两块匾额，一个叫“爱日堂”，一个叫“春晖堂”，我们还记得孟郊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春晖是用来歌颂父母之爱的。乾隆题的两块匾分明就是在暗示陈阁老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嘛！因为这层关系，陈家在雍正和乾隆时代飞黄腾达，得到了很多特殊照顾。

这个传说听起来非常动人，有鼻子有眼。那么，雍亲王的女儿后来怎么样呢？传说也给出了合理的结局。陈家对这个女儿非常好，给她最好的教育和优待，长大后，她嫁到常熟的大姓蒋家里，她的丈夫是大学士蒋廷锡的儿子蒋溥。蒋家对这个“公主”也非常看重，特地为她盖了一栋豪华的楼阁，人们称之为公主楼。这个公主嫁到蒋家后，还带来了自己的嫁妆，嫁妆里面有御赐的金莲花，可以证明公主的身份。

这个传说非常完整，很容易让人相信，在民间流传得非常广，从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影响力。在《书剑恩仇录》中，乾隆是陈阁老的儿子，刚出生没多久就被雍正强行换走。陈阁老托红花会的总舵主于万亭秘密进宫，把自己的亲笔信交给乾隆，在信中，陈阁老将当年偷龙换凤的经过详细讲了出来，还指出乾隆左腿有一块胎记。得知身世后，乾隆向乳母求证，乳母所讲跟陈阁老一样。书中最精彩的一个地方莫过于乾隆的同胞兄弟陈家洛劝乾隆以民族大义为重，恢复汉人江山，可惜没有成功。虽然是亲兄弟，终因为环境不同造成了思想上的差异。陈家洛最后以悲剧收场。

对于这个传说，著名的清史专家孟森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得出结论：乾隆不可能是陈阁老的儿子。

我们来看看孟森的分析吧！

一、从历史记载的乾隆跟陈阁老的关系来看，他们不可能是父子关系。在清宫档案中，乾隆六年陈阁老因为犯错被革职，乾隆还当面责备陈阁老猥琐无能，不称职，总之是领导骂下属的话，丝毫不讲情面。而且乾隆对陈阁老的责骂并不只有这一次，很多时候都是在公众场合。如果是父子关系，这是很难想象的。孟森还指出，陈家鼎盛并不是因为跟乾隆的关系，这个陈家本来就是海宁的大族，在明朝末期就开始发迹，在康熙和雍正时登上了顶峰。在乾隆时期，陈阁老并没有得到特殊的关照，反而不断走下坡路。

二、陈阁老家里确实有“爱日堂”和“春晖堂”两块匾，但孟森考证出来这并不是乾隆题的，而是他的祖父康熙题的。所以，这块匾暗示陈阁老夫妇是乾隆父母就纯属瞎编。

三、乾隆六下江南，四次住在陈阁老家里，并不是为了探望什么父亲，而是为了视察钱塘江修坝工程。钱塘江大坝关系到国计民生，对国家的财政和漕运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乾隆才对此高度重视。在海宁县里，陈阁老家里的条件最好，乾隆住在他这里也就丝毫不奇怪了。乾隆第一次住进陈阁老为他修建的隅园里，就为这园子取名为“安澜园”，可见他的目的是希望钱塘江平稳，造福苍生。乾隆在安澜园确实住过四次，但从来没有召见过陈阁老的子孙。

四、雍正没必要实行调包计。在乾隆出生之前，雍正已经有了一个八岁的儿子弘时，而且有一个王妃正临盆。雍正又不是没有儿子，没有必要拿别人家的孩子来为自己增加筹码，再说了，当时皇位争夺激烈，到底谁继承大统谁都不清楚。如果雍正当不上皇帝，纵使抱来这么一个儿子又有什么意义呢？雍正是一个做事非常谨慎的人，这么精明的一个人不可能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他调换别人的儿子，这

事一旦被揭发，前途尽毁，他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做这弊多利少的事情吗？

五、根据清王室的规矩，换子的可能性太小。如果王府中有皇孙诞生，必须立刻上报，宗人府再写专门的奏折给皇帝，然后皇帝为皇孙取名。如果雍正当年生了个女儿上报，后来又变成了一个儿子，他怎么跟上面交代呢？上报程序非常严格，雍正要想瞒天过海难度太大。

六、传说中雍正的女儿最后嫁给蒋家，而且蒋家为他修建了一座“公主楼”，但是经过考证发现，常熟人都不知道家乡有什么“公主楼”，连蒋家后人也不知道，甚至连“公主楼”的遗址都找不到。而且，那个所谓能证明皇女出嫁的金莲花，在清宫嫁女档案中也找不到这么个东西。

经过重重考证，孟森认定乾隆是海宁陈家的儿子纯属虚构，既没有事实的根据，也没有逻辑的说服力。

考虑到这个传说产生于清末，当时正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潮兴起，这个传说的目的当然不只是娱乐，更多的还是汉人的排满意识，有浓重的政治意识，其目的是为了应和“恢复大中华”的思潮。

第二章 有个性的皇帝

康熙与乾隆的见面充满了巧合因素。若不是那年圆明园的牡丹花开得特别鲜艳，若不是雍正有心提出请父亲来赏牡丹，这事或许就不会发生。

祖孙情

有一种传说，康熙之所以在临终前传位给雍正是为了雍正将来把皇位传给弘历。这种说法并非来自于野史趣闻，而是来自于乾隆自己的说法，裕陵前有一块《神功圣德碑》，那上面记载了乾隆一生的功绩，其中就讲到了这件事，说乾隆十二岁的时候，跟康熙在牡丹台宴饮，康熙说这个孙子的福气超过自己，决定将来把皇位传位于这个孙子。

这个说法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雍正只是一个过渡，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怪不得历史学家在书写康乾盛世的时候，也直接忽略雍正。这个说法到底有几分真实性，我们无从考证，但康熙和乾隆的祖孙之情确实为后人称道。

要知道，康熙光儿子就一大堆，孙子那更不用说了，很多孙子康熙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乾隆是如何在这些人中脱颖而出呢？

乾隆在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出生，在他身上有81.25%的满族血统、6.25%的蒙古族血统和12.5%的汉族血统。

虽然这祖孙俩关系不错，但他们真正见面的时间还是很晚的，在康熙六十一年，也就是康熙生命中最后一年，康熙与乾隆第一次见面，地点在圆明园，也就是雍正住的地方。当时乾隆是十二岁，第一次见到自己至高无上的祖父。

康熙与乾隆的见面充满了巧合因素。若不是那年圆明园的牡丹花开得特别鲜艳，若不是雍正有心提出请父亲来赏牡丹，这事或许就不会发生。

晚年的康熙为储位的事情伤透了脑筋，在储位事情上，只有雍正表现得那么淡然，如今雍正提出赏花，正好可以让老皇帝解解闷。

这一天是三月十二日，康熙驾临牡丹台，一边赏着牡丹花，一边

喝着美酒，吹着春风，烦恼不知不觉就消逝了。

就在这时，雍正提出让皇帝见见自己两个儿子，雍正说：“这俩孩子长到现在，还没见过祖父的圣颜呢！”

康熙顿时露出慈祥的皱纹，说道：“好啊，朕也想见见两个皇孙，听说他们的书读得相当好，你把他们叫过来看看吧！”

一般历史学家认为，雍正让康熙见弘历，其实是一种策略。这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康熙若很欣赏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登位确实有帮助，这可能是历史学家有此猜测的原因。

康熙的孙子接近一百个，弘历能够见到康熙，的确是一种幸运。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因为这一见而有了联系，有了纽带。

见到两个孩子时，康熙顿时放下手中的酒杯。这位阅尽沧桑的老皇帝的目光立刻锁定在弘历的身上，弟弟弘昼没有给康熙留下什么印象。康熙的目光落在弘历身上，弘历身材比较长，容貌也很清秀，两只乌黑的眼睛充满了灵气。在行礼的时候，弘历显得大方得体，没有小孩子常有的紧张，弟弟弘昼则显得紧张局促。

康熙阅人无数，一眼就认定弘历这孩子与众不同。康熙慈爱地让弘历到自己跟前，亲切地跟弘历聊了起来，聊着聊着就聊到读书上来，弘历回答得得体大方，康熙听了，圣心大悦。

康熙认定弘历是自己孙子中最出色的，皇帝的喜爱是巨大的政治资本。回到畅春园后，康熙心里还是放不下弘历，又让人去询问雍正关于弘历的种种琐事，雍正心里极为高兴，这意味着他的政治投资收到了极大的效果。论起心术之高明，雍正似乎还在康熙之上。

没过几天，康熙又让雍正把弘历的八字送过去。古人比较相信生辰八字，认为人一生的吉凶祸福都藏在生辰八字里，康熙此举似乎是想看看弘历八字中有没有“大福”，所谓大福恐怕就是当皇帝。这对雍正一家来说，是非常好的迹象。

几天后，康熙再次驾临圆明园，这一次是康熙主动来的。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把弘历带到宫中，自己亲自抚养。

经过大师们的研究，弘历的八字终于出来了，看到这个结果，康熙非常惊喜，弘历的福气真的可以超过自己。“乾隆八字”至今还藏在故宫博物院中，上面有相士的批语。乾隆的八字是：辛卯丁酉庚午丙子。批语是：此命富贵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脚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

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祯祥。

乾隆的八字出奇的好，这可能是康熙打算把他带到宫中恩养的原因。在此之前，享受过这种待遇的只有太子的长子。

康熙厚待弘历，最大的受惠者是雍正。康熙即使再喜欢弘历，也不可能像朱元璋那样直接越过儿子传位给孙子。雍正把弘历介绍给康熙确实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当然在此之前，雍正并不知道康熙会青睐弘历，但这是他试探老皇帝的一个机会，如果老皇帝把自己列入候选人的行列，肯定会关心自己的儿子。事实应该也出乎雍正的意料之外，他没想到康熙会如此喜欢弘历这孩子，陡然之间，雍正的政治资本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四月，康熙出塞外巡视，带上了弘历。祖孙二人形影不离，在这接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他天天跟祖父待在一起。时值夏季，避暑山庄的风景非常不错。在山庄南部，有一个湖，湖边有一个宫殿，康熙亲自为这个宫殿题名“万壑松风”。康熙在这里处理政务，弘历也陪着他，练习书法。

一天，弘历正在鉴始斋里读书，忽然听到祖父喊他，弘历跑到门口一看，只见祖父正站在湖中的一个龙舟上。弘历急忙跑过来，康熙看了，生怕他跌倒，大声喊道：“慢点儿，慢点儿。”当弘历跑到湖边时，康熙的龙舟也抵达湖边，弘历跳上船，康熙一把揽他入怀，说道：“慢点，有点闪失那还了得。”康熙的爱孙之情真挚可感，多年后弘历还牢记在心，六十年后弘历在诗中还提到此事。

承德避暑山庄分布着大量的湖泊，夏天的时候，一眼望去，荷花蔽天。某天，康熙和弘历在这里赏莲花。来到湖边的“观莲所”时，康熙指着窗外的荷花问：“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吗？”弘历一听，立刻背出《爱莲说》。不仅背出来，弘历还讲解其中的意思。康熙听了，很是欣慰，连连称赞。

康熙对弘历的考验不光是文化方面，骑射也是少不了的。八月初，康熙带着弘历到木兰围场狩猎。秋风飒爽，弘历豪情万丈，跟着康熙围住了一头大熊。康熙用火枪击中一头大熊，大熊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康熙为了给这孩子一个荣誉，特命弘历前去射死那头熊。弘历犹豫着，迟迟没有上前，康熙一看，觉得不对，平常挺欣赏这孩子的，怎么这会儿他这么胆小。康熙大声说：“弘历，犹豫什么，还不快点上去！”

弘历只好带着几个侍卫策马过去，当弘历靠近大熊的时候，大熊突然翻身跳起，扑向弘历。所有人都惊呆了，情急之下，康熙朝大熊连开几枪，终于打死了大熊。这事让康熙非常后怕，同时又觉得弘历

逃过这一劫，命很大，他对大家说：“弘历这孩子的命大，如果他听我的话，早点过去，熊起来后马受惊，就要出大事了。这孩子命真大啊！”

当时，弘历的母亲钮祜禄氏正好在避暑山庄的狮子园里，康熙忽然突发奇想，指名要看看钮祜禄氏。这对一个皇帝来说，简直是破天荒的举动，康熙连自己的孙子都没认全，居然产生了看看孙子母亲的想法，说明他在内心深处确实非常重视弘历。他看弘历生母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看看她的面相。

当康熙来到狮子园时，终于看到了钮祜禄氏，康熙自己懂一些相术，身边也有一些相士，看到钮祜禄氏的面相后，康熙啧啧叹道：“果然是有福之人啊！”日后，钮祜禄氏果然成为地位尊崇的太后。

受到皇帝公公的召见，是钮祜禄氏一生中的大事。在此之前，她一直是被人忽视的，钮祜禄氏长相虽然谈不上沉鱼落雁，但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母亲，始终有一副健康的体魄和平民本色。

康熙屡次说乾隆有福气，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封建迷信，但也可以寻找一些遗传学上的解释。爱新觉罗家族有优良的基因，这从努尔哈赤以来的历代皇帝身上可以看出来。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等人都有极高的智商、强大的自制力和无穷的能量。乾隆继承了这些来自父系的基因，乾隆的母亲又给了他什么呢？首先是健康强健的身体，其次是稳重淡定的性格。皇宫中的女人由于缺乏身体锻炼，体质并不好，但钮祜禄氏是一个例外。乾隆当皇帝后，钮祜禄氏跟着他游山玩水，爬山下乡，高兴得就像一个孩子。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能有这样的体魄和心态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在身体素质上，乾隆明显超过父亲雍正，这跟母亲的优良基因是分不开的。

不走父亲的路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大帝驾崩，弘历的父亲雍正继位。

雍正元年，举行祈谷大典。回来后，他特地召弘历来养心殿，赐一块肉给弘历吃。除此之外，雍正没有说任何话。弘历也没有说话，默默地吃掉这块肉。这虽然只是一块肉，却有很大的象征意义。本来雍正对儿子们是一视同仁的，这次大典后单召弘历，想必有另一层意

思。聪明的弘历知道，父亲有意将自己立为储君。

但这件事是不能说出来的，大家心照不宣就可以了。鉴于康熙朝因储君的事情弄得朝纲混乱，皇帝和大臣们都束手无策，雍正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雍正不想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本朝，但是如果自己立太子的话，还是会发生兄弟相残互相攻讦的事，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既立储君，又让皇子们相安无事？

经过八个多月的思考，雍正终于解开了这个死结。他发明了秘密建储的制度，这项发明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

想出这个法子后，雍正在乾清宫召集满朝文武，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从今以后，立储之事不公开。朕将未来的储君写在匣子里，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个匣子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另外留一份朕亲笔书写的圣旨，藏在圆明园中。将来只需把两处密诏一对，就可以确定新君是谁。”

雍正规定，密匣子只能等自己死后才能拆开，拆开密匣子后，需要去圆明园找到雍正亲笔书写的诏书，对过以后确定无误，皇位基本就决定了。这项制度既解决了储位空悬的问题，又解决了储君与皇帝争权和兄弟不睦的问题。这项决定还可以避免大臣们投资太子党，形成结党营私的局面，对皇权形成干扰。

三个月后，康熙的周年忌辰到了，雍正特命年仅十三岁的弘历前去祭奠景陵。第二年的这天，雍正还是让弘历去祭奠景陵。这些做法耐人寻味，无疑是告诉世人弘历就是未来的皇帝。

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也就是雍正十三年，史上最勤政的皇帝驾崩，雍正死亡非常突然，从生病到死亡才一天的时间。由于雍正生前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他死后，权力过渡很平稳。临死前，雍正召亲信大臣张廷玉和鄂尔泰，并告诉他们藏在圆明园的密诏在什么地方。总管太监从圆明园中找出诏书，跟乾清宫大匾后面的密匣中诏书一对，传位给弘历。

政权过渡非常平稳，第二天弘历就颁布了三道谕旨，行使帝王权力。随后，弘历将父亲生前宠信的道士张太虚和王定乾等人赶出宫。此举大概说明了弘历意识到丹药对雍正身体的侵害。

当上皇帝是乾隆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兴奋之后不免有一些遗憾和怀旧，乾隆是有诗人气质的，他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当年颇有少年心，上马飞驰下马吟。今日殷忧胜潇洒，壮怀减却查难寻。”

说实话，这首诗写得真的很烂，不过情感倒也真挚，无非是做皇帝很烦恼之类的，还不如当一个平民百姓自由快活呢——这是古今中

外很多贵族喜欢发的“富贵牢骚”，真让他们去做平民百姓，打死他们都不干。

顺便说说乾隆跟雍正的关系，虽然是父子俩，但乾隆并不喜欢雍正。在生性洒脱的乾隆看来，这个父亲实在是过于严苛，很难让人亲近。乾隆继位之后，很少提及这位父亲，即使提到了，口气也很平常，没有体现出对亡父的怀念和爱戴之心。倒是康熙，乾隆经常怀念，康熙是一个慈祥的祖父，乾隆七八十岁还怀念当年康熙抱着他在承德避暑山庄玩的情景。就性格来说，乾隆跟雍正完全相反，跟康熙很接近，两个人都是很有“人情味”的皇帝。而雍正给人的印象是刻薄寡情，所以雍正在世人里的印象并不好。

作为一个皇帝，雍正是挺冤的，他十三年里作出的改革比康熙六十一年还多，为乾隆盛世铺平了道路。在执政的十三年中，雍正几乎是拼命在工作，但拼命工作换来的结果却是大家的反感。雍正的改革对社会触动极大，几乎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被他搅动了。雍正总是给人铁面无情的感觉，他很少表现出仁爱的一面，即使有所表现，也显得相当生硬和虚假。这样的皇帝很难受到众人的拥戴和喜欢，所以雍正生前死后都是骂名滚滚。

乾隆就比他的父亲雍正幸运得多，他二十五岁继位，年龄相当合适，而且他接手的摊子是少有地好。康熙和雍正把该做的事情都替他做了，在乾隆期间，国泰民安，人口大量增加。乾隆在位六十多年，吃喝玩乐，最终以八十八岁的高龄去世，将一个开始腐烂的摊子交给嘉庆。

乾隆当上皇帝后，立志做一个明君，跟康熙一样，他主张用仁义治理天下。早在当皇帝之前，乾隆就研究过历代帝王，在这些皇帝中，乾隆真正觉得不错的就是汉文帝和唐太宗。在乾隆看来，汉文帝比唐太宗还差了一截，他以唐太宗为榜样，希望有一天能够跟唐太宗齐名。

对乾隆来说，父亲雍正肯定不是心目中理想的君王，要想成为明君，得改变父亲的治国方略。

这位新继位的皇帝还没意识到他的父亲雍正对于他真正的意义，雍正是一代明君，在他短短的执政岁月里，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解决了继承人斗争问题；创建密折制度，将大权集于一身，有效地控制了群臣，遏制了贪污腐败；创建军机处，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改革八旗制度，推行摊丁入亩的政策，规定耗羡归公，设立养廉银制度……

可以说，雍正把该做的都做了，为乾隆留下了一个盛世的基础。

由于雍正的改革无孔不入，得罪了大多数的人，雍正也因此留下了骂名。连乾隆刚开始也觉得他刻薄寡情，直到自己做了多年的皇帝，他才开始理解父亲。

乾隆即位之后，首先将雍正曾经关押的宗室亲戚们释放，归还爵位。

康熙以宽仁治国，雍正以猛严治国，乾隆也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方略：以孝治国。

乾隆刻意表现自己仁厚的一面，不仅优待宗室子弟，而且从宽处理雍正朝的积案，对于在年羹尧和隆科多案子中受牵连的人，酌情录用。为了安慰广大士人，乾隆还宣布从今以后，一切文章和考试，大家可以自由发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智，不用担心触犯忌讳什么的。乾隆还解释说，如果把恭敬和避讳混为一谈，就是误解了古人的意思，乾隆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虚怀若谷的皇帝。

在处理曾静和张熙投书案时，乾隆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对曾静和张熙，雍正并没有横加杀戮，而是将他们咒骂自己的文章以及自己辩解的文字合编成一部《大义觉迷录》，让他们回家，给乡亲们讲解《大义觉迷录》。此外，雍正还保证说：“我的子孙将来也不能因为你们的诋毁而对你们穷加杀戮。”乾隆即位两个月后，就撕毁了雍正的契约，杀掉这两人。乾隆有自己的理由：“对曾静和张熙的宽大，只能在雍正朝。吕留良诽谤我的祖父，所以我父亲杀了他，曾静和张熙诽谤的是我父亲，我父亲没有杀他们，但对我来说，曾静和张熙诽谤的是我的父亲，所以我必须杀了他们。”

乾隆的意思仿佛是说：“如果他们诋毁的是我，就可以逃脱死罪，不过轮到我儿子时，他们的死期就到了。”这当然只是一种借口，真实的目的还是维护清朝的统治。

乾隆真是一个幸运的皇帝，他接手的是一个股价不断上升的帝国。刚继位不久，他发现国库如此充实，便下达了一个惠民的政令：雍正十二年欠的赋税统统免交。这确实是一个很得人心的措施，减轻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皇帝的“仁”

雍正对兄弟的无情我们已经见识过了，在历史上，“阿齐那”和“塞思黑”直逼吕后的“人彘”。雍正不仅对兄弟们辣手无情，还将兄弟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开除在爱新觉罗家族之外。

乾隆很清楚，父亲的这些措施不论有无必要性，都会引起全社会的反感。古人注重孝悌之情，即便手足相残是一种政治需要，也不能表现得这么出格。即位一个月后，乾隆颁布了一个诏书，在诏书中乾隆说道，允禩和允禵这些人咎由自取，但他们的子孙是无罪的，不应该摒弃在玉牒之外，应当恢复他们的宗室地位。

乾隆给了这些人的子孙丰厚的物资，算是政治上的弥补。乾隆的仁政一时之间让大家感受到完全不同的风气，从前雍正朝严酷的气氛顿时得到消融。

对于皇家的代理人官僚集团，乾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他们严密监控。在古代政治中，一朝天子一朝臣实在是家常便饭，但乾隆没有这么做。他没有罢黜过去的那些老臣，也没有蓄意提拔一些新人来打压老臣。对雍正朝的重臣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些人，乾隆非常尊敬，尊称他们为“先生”，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

在即位之初，乾隆处处以唐太宗为榜样，他认为得人心远比控制人重要，也更有效果。对那些在雍正朝触犯法律的人，比如著名将军傅尔丹和岳钟琪在雍正朝因贻误军机获罪，两人已被判死刑，乾隆无罪释放了他们。像查嗣庭和汪景祺这样的文字狱重犯，已经被处决，乾隆允许他们流放的家属回祖籍。至于那些被雍正抄家的官员，乾隆一概停止查抄，抄家之风点到为止，没有补足的亏空不用再补了。

不到三个月，两千多个官员就从乾隆的仁政中得到好处。这些官员们在雍正的时候整日提心吊胆，随时担心项上脑袋。乾隆一下子就笼络住官僚集团，就这个意义来说，康熙当初说他有英雄气概是不错的。

乾隆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孝子皇帝，刚当皇帝后，虽然政务繁忙，他也没有因此让孝道有丝毫亏损。隔三岔五给母亲问安侍膳，对母亲的生活关怀备至。

大家知道，乾隆是一个相当奢侈的皇帝，但是刚登基的时候，乾隆却非常节俭，连过年过节大臣们给自己进献礼物他都不接受。但是对于母亲的生日，他却办得非常铺张。

无论是仁君和暴君，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皇帝。皇帝身上都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皇权的绝对把握，绝不允许别人分享这“神圣”的权力。即便是对自己的母亲，在权力这块，乾隆也是敏感的。

即位三天后，乾隆就召集太监和宫女，叮嘱他们：“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你们绝不可在太后面前讨论政事，让太后心烦。太后仁爱，生我养我，有什么事，母子之间自然会相互交流。宫廷之中，绝

不可以随意风传市井之言，如果有什么传言，先跟我说。如果符合太后的心意，我自然会告诉太后。以后，如果你们随意在太后面前散布流言，必治以重罪。”

乾隆的意思很明白，防止太后干政。

有一天，乾隆和母亲聊天，母亲说顺天府东面有一座破庙年久失修，快要倒塌，希望乾隆能出点钱修修，事情虽小，也是好事一件。乾隆听了，满面愉悦地答应了下来。太后走后，乾隆马上拉下脸，严厉责备太后身边的太监张保和陈福，骂他们在太后面前胡言乱语。乾隆告诫他们，以后这种事情，如果不先行陈奏，决不轻饶。

对自己母亲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乾隆斥责张保和陈福，显然是给太后传递信息，我是孝子，也希望你能做一个慈母，不要随意干政。太后也是一个明白人，从此不再管其他事，安享晚年。乾隆这是防患于未然，熟读史书，他深知太后干政和外戚专权的坏处。

对自己的兄弟们，乾隆也不放心。登位不久，乾隆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皇族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乾隆的两个弟弟分别是弘昼和弘瞻，乾隆跟弘昼的关系更亲，两人从小一起生活，一起读书。十二岁的时候，乾隆被康熙带到宫中，时常想念这个弟弟。

乾隆当上皇帝后，兄弟的关系反而疏远了不少。乾隆一方面想做一个好哥哥，另一方面也提防弟弟觊觎皇位。在生活上，乾隆对两个弟弟极尽照顾，赏赐丰厚，还经常和他们一起饮酒赋诗，但乾隆经常旁敲侧击：“只要做到不干政，就能保全富贵和名誉。”

有一次，乾隆让弘昼给八旗子弟做监考，考试开始后，乾隆仍然待在考场。弘昼对他说：“你回宫吃饭吧，这里有我就行了。”乾隆虽然点头，仍然坐着不动，想多观察一会儿，怕这些八旗子弟作弊。

弘昼看自己的话没起作用，心中恼恨，说道：“你难道连我都不相信，你不会认为我会被他们收买了吧？”

乾隆听了，脸色顿时阴沉，但他毕竟是个有涵养的皇帝，没有争执，甩袖而去。

乾隆走后，弘昼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心中后怕。第二天，他找到乾隆，当面认错。乾隆淡淡地说：“你也知道错了。昨天，如果我跟你争执，双方吵了起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只怕你现在能不能站在这里都是问题。你说话虽然难听，但我清楚你心肠是好的，所以原谅了你，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了。记住，虽然你地位尊崇，但做事也一定要谨慎。”

乾隆说完，弘昼背上凉汗直流。

还有一次，弘昼给太后跪安后，坐到了太后宝座旁边的一个藤椅上，没想到犯了大错，因为这个藤椅平常是乾隆坐的。乾隆指责他不懂礼节，在太后面前跪坐无状，就因为这事，弘昼被罚俸三年。

生长在皇家是没有自由的，弘昼很快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是经过这些挫折后，弘昼性情逐渐改变，他知道政治是碰不得的，那东西不属于自己的。身为皇帝的弟弟，地位何等的尊崇，在物质方面，弘昼要什么有什么。正如马斯洛所说，除了物质需求外，人还有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

弘昼被乾隆剥夺了“干政”的自由后，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还不如一个朝臣有成就感。长期下去，弘昼产生了变态心理，居然在王府中玩起了扮死人游戏，他经常躺在棺材里，让下人为自己哭丧。“活死人”反映了他真实的心理，他欣赏别人为自己哭丧的样子，与其说是一种恶作剧，不如说是以一种反讽的眼光看自己，内心的孤独乾隆恐怕很难知道。

弘历能行

彪悍皇帝雍正去世了，在去世之前他最担心的问题是：弘历这小子能行吗？

我们不要责怪雍正，能人都这样，因为自己太厉害，所以对别人都不怎么放心。雍正去世前的心情跟一代雄主唐太宗的心境非常相似。

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唐太宗病危，紧急召集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元老进宫，对他们说：“太子仁懦，这个大家都晓得，我怕一口气喘不过来，将来这孩子被人欺负，你们替我好好照顾他……”

知子莫若父，李世民太了解李治了，幸好他自信自己对老臣们不错，他们应该不至于欺负自己的儿子。但作为一个乾纲独断的皇帝，把江山社稷交给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就是至死也不能完全放心。

雍正也是这样的，在他生前就经常批评乾隆过于仁宽。乾隆即位之后，就着手改变父亲的治国方针，将刚猛调整为刚柔并济，充分说明雍正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幸运的是，仁慈只是乾隆的表面，或者说一面，在乾隆骨子里深深藏着凶狠残忍的一面。

当乾隆的兽性被激发起来时，这条龙并不比雍正更温柔，是的，

雍正，你真的没必要担心，安息吧！

在没有法治的年代，拨乱反正几乎是那些深受不白之冤的人唯一的出路。

第一个吸引乾隆注意力的人是杨名时，杨名时在当时名气颇大，不仅官声清廉，也是个理学内行。大家知道，乾隆很钦佩那些有学问品格又高的人，像杨名时这样在雍正朝承受不白之冤的人，他是不会错过的。

在乾隆召回杨名时之前，杨名时以戴罪之身在昆明待了七年，当乾隆发出一道上谕：“杨名时为人诚朴，品行端方，皇父在京时原欲召令来京，未曾降旨。”对政治敏感的人立即意识到，政治的风向标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政治风气即将到来。

那么，杨名时究竟是怎么得罪了猛龙雍正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提到雍正朝的名臣李卫。在大家印象中，李卫是个勇敢任事的好官，敢做敢当，不畏权贵。这些看法都对，但不是李卫的全部。李卫也是人，也有阴暗的一面。全祖望、卢文昭、彭绍升这些人说杨名时之所以倒霉就是因为李卫在背后说他坏话，在雍正朝的密折中确实可以发现李卫中伤杨名时的奏折。李卫用了诸如“徇私”“欺罔”这些词语，并没有罗列杨名时不法的证据，这就给人党同伐异的感觉。

杨名时被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跟雍正唱对台戏，雍正打算一展身手，挽救数千年的吏治颓风，杨名时却不买账，经常批评时政。

雍正四年七月，也就是李卫打小报告后的两个月，雍正降了一道谕旨，指责以杨名时为首的五位督抚虽然名声不错操守还行，但是做事八面玲珑，四面讨好，总想做“好好先生”。雍正号召这些人向勇于任事、雷厉风行的田文镜和李卫等人学习。杨名时如果能认识到“错误”，“虚心”向田文镜、李卫等人学习，可能后来就不会挨整，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心气甚高的杨名时做不到，他公开对上谕进行反驳，还含沙射影地讽刺田文镜、李卫这些人。可想而知，雍正有多愤怒，他痛斥杨名时死不悔改还嘴硬。雍正从杨名时的反驳中感觉到他对自己的不满，从此以后对杨名时的印象跌到谷底。雍正五年，他对鄂尔泰说：“杨名时这个人太可恶了，朕五年来对他以诚相待，没想到他狼子野心还不改，丝毫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朕整治科甲积弊的时候，杨名时挺身而出，居然充当反对派领袖的角色，一字一言含讥带讽。”

雍正对杨名时恨得咬牙切齿之时，痛骂道：“杨名时这种人不过

是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跟今天的意思不同，光棍意指无学问无品德），简直是个名教罪人，国家害虫。如果不灭了他嚣张气焰，科甲的积弊就没法改了。”

在这个关系前途性命的时刻，杨名时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不小心把前任总督高其倬密折奏请的内容写进题本里，李卫也犯过这种错误，不过雍正认为他本性粗心。杨名时这么做，雍正认为他是故意的，不尊重自己，立即下旨说杨名时对密折制度不满，故意泄露密折内容，这样的人实在是怙恶不悛，罪该万死。

后来，雍正派人去云南调查杨名时，名为调查，实为罗织罪名。杨名时也识时务，干脆什么都认了，唯独不认“巧诈居心”，这是杨名时的基本信念，诚实是他作为一个理学家的信仰。由于杨名时对这条罪状不接受，刑部便奏请将杨名时“斩监候”，雍正当然不会蠢到把他斩首，只好退让，他不认就算了，反正其他罪名也很多。

由于杨名时实属正义凛然的官员，在正义面前，权力的黑手有时也不得不退让。但雍正绝对不甘心退得狼狈，最后演变成胶着状态，让杨名时一直以戴罪之身待在云南。

公道自在人心，杨名时的案子无疑是个冤案，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即使处于政治高压之下，人们不敢公开说出来，但大家心里自有一杆秤。乾隆在宫中念书时，曾经问恩师蔡世远，杨名时是个什么样的人。蔡世远直截了当地说：“这时代心里还存有尧舜君民之道的人，只有杨名时一个人而已。”

蔡世远是对乾隆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老师。乾隆曾回顾对自己最有影响的三个老师，第一个是奠定自己基础知识的福隆翰老师，另一个是引导他领悟儒学真谛的朱轼老师，还有就是让他精通理学以致用的蔡世远老师。

乾隆即位之后，立即为杨名时平反，随后，谢济世、李绂、蔡珽等人的冤案也纷纷得以昭雪。

谢济世是个御史，他获罪是因为参奏宠臣田文镜，御史的本职工作就是弹劾人，本来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幸的是，谢济世弹劾的内容跟李绂参奏的内容很相似，以至于雍正认为他们是有预谋有组织地攻击田文镜。那么，蔡珽又是怎么卷进来的呢？蔡珽是李绂的推荐人，雍正有理由怀疑蔡珽是谢济世和李绂的幕后主使。

雍正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自负的人有一个极大的缺点：不相信自己是错的，认为自己的判断力是准确的。雍正也不管事情真相如何，便开始着手整谢济世、李绂、蔡珽等人，刑部通常都不是按法律

办事，主要是按皇帝的意志办事。跟往常一样，刑部拟定对这几人斩立决，然后雍正照例没有批准，显示特别宽仁。

雍正甚至还解释为什么不杀他们，他说这件事背后必定有大奸大恶之人在指使，这个人的目的就是逼自己杀掉言官，然后落下千古骂名，雍正说：“我不上当。”最后，雍正将谢济世充军。既然雍正说有大奸大恶之人，那为什么不追查这个人呢？雍正的理由是，追究起来估计会株连一大片，所以见好就收。这个谎言技术水平太低了，所以官员姚三辰听到这个辩解时，露出不以为然的讥诮神色。不幸恰好被雍正看见了，雍正一怒之下将他革职，并说姚三辰和查嗣庭、汪景祺是一丘之貉。雍正的意思是他们都是浙江人，都心怀鬼胎。

对李绂的处理则完全不同，雍正亲自在朝堂上审讯李绂，雍正喜欢吓唬人，声色俱厉地质问李绂，李绂却面不改色，相当淡定地说：“臣罪当诛，希望皇上早点正法，以警戒那些不忠的臣子。”听审的大臣们吓得面如土色，李绂却镇定自若，没有半句乞求哀怜的话语。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

刑部拟定了斩决，李绂在狱中却坦然如平常，在监狱里照旧每天读书，吃饱喝足，晚上睡觉也香甜。看守们看到这一幕，都说李绂是个“铁汉子”。最后，雍正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赦免他的死罪，为了表示惩罚，让他去修《八旗通志》，等于是解除他的权力。

刑部给蔡珽定了十八条罪，拟定为死刑，雍正改为监禁待决。这一监禁就监禁到乾隆年间，这样的日子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每年处决犯人的时候，都会把蔡珽也拉出去陪斩，蔡珽眼睁睁地看着犯人人头落地，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这种恐惧的目的就是从精神上折磨人。

乾隆上台后，杨名时、谢济世、李绂都得到提拔，只有蔡珽无罪释放，成为闲散游民，出来八年后，蔡珽郁闷而死。对蔡珽来说，出监狱不过是走进另一个更大的监狱而已。乾隆为何对蔡珽区别对待呢？蔡珽确实有贪污之实，这可能是乾隆没有起用他的真正原因。

新瓶旧酒

乾隆的“新政”让杨名时、谢济世和李绂等人深受鼓舞，谢济世接到进京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泛起阵阵涟漪，这涟漪的名字叫“皇恩浩荡”。

谢济世激动之下，竟然起草了一份奏折，让乾隆取消密折制度。谢济世说现在天下大治，密折制度很容易制造阴郁气氛，让小人谗害

君子，被穿小鞋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告自己，没法申辩，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大臣互相猜忌，君臣互不信任的悲剧。谢济世让乾隆效仿唐太宗，从谏如流。

用乾隆的偶像来打动乾隆，谢济世的建议应该说是很有杀伤力的。乾隆有没有接受呢？

刚继位的乾隆毕竟年轻，对谢济世大加夸奖，谢济世深受鼓舞，高兴得不行。回京的路上，谢济世的心情非常舒畅。让谢济世更兴奋的是乾隆对雍正的三大模范督抚的评价，乾隆很快就对田文镜定论，说这个人苛刻搜刮、匿灾不报，让河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乾隆还说，雍正朝三大名臣中，田文镜不如李卫，李卫又不如鄂尔泰。

那些在雍正朝被打压的人，听到新皇帝如此表态，哪个不心存感激。乾隆是冒着被人指责为不孝的罪名为他们翻案。

官场中也有一些眼光深刻的人，河南总督王士俊就是这样的人，对乾隆新政，他一直保持冷眼旁观的姿态。蛰伏一段时间后，他就嗅出乾隆新政面临的困境，乾隆改革的幅度过大，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乾隆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必须回到雍正政策上，必须延续雍正的政策，保持政权的连续性。

果然，在乾隆元年上半年，乾隆忽然抛出一句“矫枉不可过正”的话，乾隆还说治国要遵循中庸之道，宽严相济，两者不可偏废。

王士俊自以为嗅到了新的政治气息，自作聪明地给乾隆写了一个奏章，大意是：“雍正朝政策虽然过于严苛，但根本原因在于大臣们不奉公守法，错不在先帝。现在有一些新进之辈，动不动就指责先帝的政策，这些逢迎谄媚之辈甚至说‘只要将世宗时事情翻案，就是好的条陈’这些人实在太可恶了……”

王士俊发这个奏章原本是为了政治投机，他自以为比别人提前嗅到了政治新动向，但他没想到这一节：就算你看到了潮流，也不该由你来引领这个潮流。

乾隆接到奏章后，非常愤怒，王士俊这是在否定自己的新政。还有多少个潜伏的王士俊呢？万一这些人集体发难，自己的政策就面临危险了。

乾隆将王士俊的奏章分发给大臣们看，让他们谈谈看法。但是，大臣们集体选择了沉默。为何？

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没人能准确地预知乾隆对此事的态度。乾隆看大臣们不发话，只好自己表

态，痛斥王士俊，说此人居心叵测，借口直言，实则是想搞政治投机。

乾隆表态后，朝臣马上活跃了起来。第二天，御史舒赫德就参奏王士俊。巡抚傅德也参王士俊，说他丧心病狂。王士俊因此而被刑部关押，拟定斩立决，乾隆改为斩监候，第二年法外施恩，将王士俊削职为民。

这次风波虽然平定了，但乾隆的思想却陷入了激烈的斗争中，他不仅反思皇考的政策，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新政。宽政有宽政的好处，也有弊端，严政有严政的好处，也有弊端。宽政的弊端在康熙朝就表现出来了，严政的弊端在雍正朝也很明显。想来想去，乾隆觉得只有宽严相济这一条路可以走。

乾隆元年初一，七十六岁的杨名时病逝，乾隆赞扬他“学问纯正，品行端方”，追加太子太傅头衔，谥号“文定”。

杨名时去世后，政治气氛已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乾隆第一次让李绂尝到了苦味是因为保举进士之事，李绂这个人特别爱才，推举人才这事让他很兴奋，结果李绂推荐了一大堆，还让同僚跟着自己一起保举。

不知为何，乾隆对此很不高兴，觉得李绂这个人爱慕虚名，指责了他几句。李绂随后回奏说：“老臣多言滋事，今天蒙圣上教诲，以后一定永远不再妄言。”乾隆回答说：“你这不是妄言，而是妄举。朕即位以来，从来没有因为哪个臣子‘妄言’而加以处分，你这么说是企图避重就轻，降二级以示警戒。”

乾隆八年，李绂请求告老还乡，乾隆问他：“你还有没有什么要上奏的？”李绂说：“慎终如始。”七年后，李绂在家乡临川逝世，乾隆对此非常冷淡，连个谥号都懒得给他。

接着来说说谢济世，他的命运也不比李绂好。有一段时间，谢济世负责重新编纂《大学注》《中庸疏》等书，删去了曾经被雍正指为“怨诽”的文字，并说自己是遵古本，不遵程朱。结果，乾隆大怒，让他掂量自己几斤几两，骂他跟程朱有云泥之别。

乾隆二年，谢济世上书建议乾隆“去邪勿疑”“出令勿贰”，乾隆听了，逆耳得很，指责他废话一大篇。谢济世没想到，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明君变得越来越专断独裁了，这对一个御史来说真是一场悲剧。

乾隆二年，劝谏的人越来越少了，谢济世压抑得厉害，居然斗胆劝谏，还说正因为半年以来没人进言，自己不能跟着别人一样沉默。不用说，谢济世又触了逆鳞，乾隆痛骂他上奏的言论怪诞支离，分明

是想通过攻击君主博取名声，居心阴险简直是国家的害虫。

谢济世快崩溃了，在崩溃之前他作出了一个明智的抉择，请求乾隆允许自己回家照顾老母。乾隆心想，苍蝇走了也好，至少可以清净许多。乾隆让他担任湖南粮储道，换句话说，就近照顾老母，不断你的工作，继续拿薪水。

尽管远离了京城，谢济世还是没有远离麻烦，湖南巡抚蒋溥跟谢济世有私怨，向乾隆告发谢济世在湖南私自刊印自己注的《大学注》和《中庸疏》。乾隆以诋毁程朱的罪名，要对谢济世进行惩罚，不过好名的乾隆又说自己从来不以文字罪人，只要谢济世把书烧毁就行。

谢济世死于乾隆二十年，在死之前乾隆准备整他，幸好那时谢济世已经垂垂老矣，还没逮捕，就已经撒手人寰。

谢济世死后十三年，风波还没有消停，受齐周华“逆书案”的牵连，在谢济世的儿子谢梦熊家中抄出《梅庄杂著》。乾隆看过该书后说：“如果谢济世还活着，朕一定将他明正典刑。”

这就是御史谢济世寄予厚望的明君乾隆。明君如同明星，只是一种光环，谢济世也许永远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第三章 收拾父亲遗留下来的摊子

乾隆了解到张照是个制造麻烦的人，而不是解决麻烦的人，便将他调回京城，任命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

边疆难题

雍正猝然离世，虽然给乾隆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局面，但也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新皇帝，战争绝对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乾隆也意识到这点，他对大臣说：“现在最紧要的事情莫过于对苗疆用兵。”

西南民族问题是历朝历代执政者都关心的问题，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这些少数民族实行的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酋长制和中央集权的结合，有点民族自治的味道。土司相当于少数民族的首领，职位可以世袭，但必须听从中央政府的指挥，除了要缴纳规定的税收之外，还得听从号令，以便得到中央政府赐予的爵位和名号，有了这些，土司的统治才是合法的。

土司制度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对于这些地方的人民来说，他们不仅要承受中央政府的剥削，还得承受土司的剥削，一般来说，土司的盘剥比中央政府更厉害。由于土司是封闭地区的小霸王，只要他们不作乱，中央政府一般不管制他们。贵州地方上的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时人记载，苛捐杂税是汉人的十倍以上。

不同土司之间，往往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力大打出手，结果导致这一带动荡不安，天灾人祸频发。在明朝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缓和这些地方的矛盾，削弱土司权力，由中央派遣官员直接治理。

雍正当台之后，对西南少数民族也非常重视，曾派遣鄂尔泰、哈元生等将军前往西南，征剿并用。然后，雍正在这里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什么是改土归流政策呢？其实这是个简写的词语，全称是改土司制为流官制，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土司的特权，从而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从政治和经济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然，雍正的这个做法还能起到瓦解地方势力的作用，消弭帝国内不安定的因素。

你要拿掉土司的饭碗和权力，土司当然不会答应，虽然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和中央政权反抗，但是必要的挣扎还是会有。雍正从不指望土司们会乖乖听话，所以他让鄂尔泰率领重兵，以武力推行这项政策。

武力终究还是管用的，任凭土司们再顽抗，终于抵挡不住鄂尔泰的大军，就这样鄂尔泰控制了这些区域的少数民族。雍正高兴，封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拜保和殿大学士，担任军机大臣，兼任兵部尚书，外加一等伯。

但是，鄂尔泰在雍正九年返京之后，苗疆人又开始活跃了起来，叛乱的苗头时燃时灭。雍正十二年，苗疆一带谣言四起，说是苗族会出现一个王，带领大家走向新世界。谣言出来后，就有闹事者，叛乱从古州开始，八妹、高表等苗疆人以官吏征粮不公为由，发动起义，叛乱之火迅速蔓延开来。

叛军迅速飙升到两万多人，攻打当地的驻军。刚开始的时候，清军对叛乱表现得非常迟钝，在兵力布置上也有很多失当的地方。贵州省有三万驻军，但是一些紧要州县却只有几十个官兵。在台拱，有一名参将，一千驻军，苗人起义后，将驻军团团围住，驻军竟毫无办法。最后，哈元生带领六路兵马，历经重重艰辛，才把叛乱给平息下去。

奇怪的是，在台拱附近的黄平县和清溪县，只有几十名驻军。这么点人，让他们作战完全不可能，就算是守城池，都显得寒碜。

苗变之后，雍正对各级官员的无能非常愤慨。雍正严厉斥责古州的文武官员镇压不力，听到叛乱，没有在第一时间予以扑灭，导致叛火越来越大。总兵韩勋带着三千人马在王岭击败苗人后，没有对逃众进行追捕，也受到了雍正的批评。清平县的县令邱仲坦，看苗民围攻邻县的时候，严令本县的人不得逃避，等到苗民攻打清平时，他顿时吓破了胆，自己率先逃跑……

总之，这些官员的表现让雍正很失望，加上他们互相扯皮，把责任全都推给别人，雍正很生气，决定重拳出击，快速平定苗疆之乱。

雍正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随后，雍正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钦差大臣，副都御使德希寿协助张照前往苗疆。为了保证这场战斗在最快的时间里取得胜利，不久，雍正又任命果亲王允礼、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以及户部尚书魏廷珍和工部尚书徐本等人一同前往苗疆。高层阵容相当豪华，甚至给人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兵力方面，除了贵州本省的官兵外，又从广东广西调兵八千，湖南湖北调兵五千，云南四川调兵一万七千，直隶调兵五千。合计有四五万的兵马，皇上亲自指挥，钦差坐镇苗疆，扬威将军率领六省大军会剿，论理是没有理由不速战速决的。

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如此气势磅礴的阵容，居然时时受困，处处不能奏效，官员之间仍旧继续扯皮。由于都是大人物，底气很足，互相不服，各自为政。看来，雍正这位管理高手对用兵终究有些外行，豪华阵容往往很难收到效果，打仗不是比品牌，看的是实效。譬如，雍正任命张照为钦差大臣，张照当然不是一个庸才，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学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才名传遍天下，可惜在打仗这块他完全是个外行啊！

在指挥权这方面，雍正也没有分清楚，这么多大佬聚在一起，意见相左，指挥起来难度非常大。最后，指挥无力，征讨无功，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征剿不力，官兵们怕被皇帝处罚，开始杀良民邀功，由此战争陷入恶性循环。从一开始，清军作战就完全乱了套，后面更是如此，不分良民乱民，一概砍头。清军的暴行激起了苗民的激烈反抗，征讨战深陷泥淖。

一直到雍正去世，叛乱仍在继续，没有丝毫扑灭的征兆。苗兵接连攻下黄平、清平、余庆、清溪等县，兵锋所至，清军疲于奔命。贵州省内的汉人纷纷逃亡到邻近省份，全国震动。

乾隆点将

雍正并没有留给乾隆太多的难题，苗疆之乱算是一个。

古州叛乱发生后，鄂尔泰引咎辞职。张照来到贵州后，并没有把全部心思用在平乱上面，由于鄂尔泰是他的政敌，他进一步攻击鄂尔泰，说改土归流并非善策。张照甚至怂恿哈元生攻击鄂尔泰，哈元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拒绝了张照。

张照看无法拉拢哈元生，便支持董芳，从而导致前方将帅不和。董芳虽然是副将，但由于有张照的支持，可以调动的兵力反而比主帅哈元生多。

乾隆即位后，很多人都在说改土归流政策不好，有的甚至主张放弃苗疆。在这件事上，新皇帝表现出了自己的魄力，他力排众议，坚

持用兵，肯定改土归流的政策。

由于乾隆曾亲自处理过苗疆事务，倒也没有显得束手无策，他采取了三个大动作。

一、撤换前方主帅。乾隆了解到张照是个制造麻烦的人，而不是解决麻烦的人，便将他调回京城，任命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张广泗隶属汉军镶黄旗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曾经跟随鄂尔泰处理过苗疆事务。雍正六年，张广泗先后平息苗疆之乱，因战功擢升为巡抚。后来，张广泗又带兵讨伐准噶尔，因功擢升为湖广总督，此人是个实干派。

二、乾隆下令禁止前方战士滥杀无辜，要求将士们剿抚并重。对前方将士杀良冒功的行为，乾隆早已有所耳闻，他知道这么下去，只会让这场战争变得遥遥无期。只有一手拿兵器，一手拿橄榄枝，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争。

三、乾隆批驳放弃苗疆的言论，坚持改土归流政策。当然，在当时的环境下，提出放弃苗疆的人也不是说任由苗疆从祖国分裂出去，只是说不管那里的事，他们自己想怎样就怎样。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混乱抱着这种态度，威信何在？乾隆深谙此道，所以坚决反对。

虽然雍正因为苗疆之乱，生前曾后悔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但乾隆却坚持这个政策是对的，应该说确实是有自己的思想和胆识的。

张广泗来到前线后，细致入微地了解基层情况，总结出清军的利弊得失，找出劳而无功的根本原因。张广泗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详细分析了清军的失误，这些失误除了大家众所周知的将帅不和、指挥失当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轻敌，叛乱发生后，地方官对事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大家都以为苗人叛乱不过是一阵风，很容易扑灭。二是战略失误，清军虽然有几万官兵，但兵力绝大多数用于沿途布防，这样无疑是分散自己的势力，真正用于打仗的兵反而很少了。所以，张广泗强烈建议，集中优势兵力，直捣对方老巢，击溃对方主力。

乾隆看完奏折，深为信服，立即赋予张广泗军政大权，让他放手征剿。

张广泗在镇远纠集大军，亲自选拔精兵良将，对他们面授作战机要。一切布置好之后，兵分三路，一路进攻上九股，一路进攻下九股，张广泗则亲自率兵进攻清江。

乾隆元年春，张广泗又增进八路人马，陆续攻破许多苗寨，苗人

不敌，纷纷躲进牛皮大箐。牛皮大箐并不是什么牛皮帐篷，而是指苗岭的雷公山，海拔两千多米，苗人认为雷公就住在这上面，在雷公山上用牛皮搭建的住处就叫牛皮大箐。据说上面危岩刺云，雾雨冥冥，极为险峻，上面的苗寨绵延几百里。

苗人躲在这里，以为官兵不可能爬到这上面来，盘算着等官兵走后，再下山活动。可惜，他们小看了张广泗，张广泗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他率军团团围住各个出口，一步一步进逼苗寨。

张广泗不避险阻，誓要平息苗人，到处搜捕和追剿，苗人苦不堪言。更让苗人崩溃的是，张广泗居然发出一道命令：苗人如果捕杀了一个苗人，就可以免罪。这样一来，许多苗人自相残杀，还没交战就已经发生内乱。苗人被捕杀被饿死的不计其数，到了秋天，清军攻破一千两百多个寨子，赦免了三百八十八个表现良好的寨子，斩首一万七千人，俘虏两万五千人，缴获武器数不胜数。

闹腾了一年多的苗疆之乱终于平息了下来。

乾隆点将表现出了一个君王慧眼识人的一面。

边疆要安抚

二十五岁的乾隆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力排众议，钦点张广泗平息苗疆之乱，可以说为自己的统治建立了威信。

乾隆提拔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贵州巡抚，授予他三等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世职，每年赏赐养廉银一万五千两。

此时的乾隆称得上是一个英明的皇帝，他并没有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而是积极将精力投入到战后的重建工作中，这项任务的艰巨程度堪比平乱。

乾隆总结了这次苗变的原因，对张广泗说：“古州之变，主要是因为苗民本属化外之民，进入我大清版图后，受到礼法限制，需要交纳一定的赋税，虽然我们对他们征收的赋税很少，不过是表示隶属大清而已，但苗民不懂礼教，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从今以后，免除他们的赋税。”

乾隆元年七月初九，颁布圣旨，宣布永远免除苗民税赋，并且向苗民解释为什么要对他们用兵以及为什么要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乾隆说，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将苗疆收入版图，而是为了让苗民能够沐浴皇恩，接受教化和文明的熏陶，共享太平盛世之福，本来我们

给你们征的税就是全国里面最少的，不过是象征性地表示你们是我大清国的子民而已，没想到你们还要作乱，危害了无辜的百姓，我们不得已才发兵征剿的。

乾隆也解释了为何要免除苗民税赋，他首先肯定苗民也是自己的赤子，很多造反的苗民骨肉相离，也挺可怜的，而且大多数参与叛乱的人不过是胁从，还有不少与叛乱绝缘，所以加以抚恤是应该的。乾隆对大臣们说，苗民之前的税赋虽少，但不排除地方官征收苛捐杂税，只有将正税完全免掉，才能避免他们与地方官发生矛盾，从此各安本分，即使要闹事，也找不到理由。

乾隆颁布的另一项政策是尊重苗俗，他认为苗民的风俗和内地百姓完全不同，一时之间难以教化过来，因此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比如，诉讼之事，可以按照当地的风俗来解决，不必要官员来审理。

乾隆颁布的第三项政策是屯田，这个政策乾隆是经过反复考量才决定的。张广泗曾经提议将获罪苗民的田产交给汉民来耕种，乾隆反复思考后认为不妥，他说苗民反复无常，现在虽然被制服了，难保以后不出乱子，如果将叛逆苗民的田地分给汉民，恐怕有朝一日苗民会再作乱，到时候，耕种的汉民反而受害。最后，乾隆决定将这些田产用来军垦，一方面让军队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有变，也可以就近防御。

吏部尚书顾琮不同意乾隆这个决定，他认为这么做是掠夺苗民的田地，让他们无以为生。对于乾纲独断的乾隆来说，反对意见当然是无效的，张广泗很好地执行了乾隆的政策，乾隆非常满意。

后来，云南总督尹继善来京，说到军垦之事，尹继善也表示反对，他的看法跟顾琮是一样的，认为这么做只会招致苗人的怨恨，有害无益。尹继善是个封疆大吏，有丰富的处理边地事务的经验。他这么说，乾隆就不得不再次权衡。最终，他决定听从劝告，取消屯兵计划。听到这个消息，张广泗急了，他上奏强烈要求屯兵，据理力争，甚至用身家性命担保。

看张广泗态度这么坚决，乾隆又动摇了，决定允许张广泗屯兵。

到了乾隆三年时，两广总督鄂弥达上了一篇很长的奏疏，大谈苗疆屯兵的害处。一、苗人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谋生，过去田地有余，能够养家糊口，如果收了他们的田地，将来人多地少，势必连生活都成问题；二、屯兵不会自己耕种的，将来肯定会雇佣苗人来耕种，久而久之，苗人的地位就会等同于奴隶，这里本来是苗人的田产，现在世代代反而被外人奴役，不出十五年，恐怕

还会再次出现叛乱。

乾隆看了后，思想再次动摇，他甚至说这道奏疏的意思跟自己的想法一致。但张广泗是封疆大吏，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他办的，他请示要屯兵，我也不好驳他面子，不过我始终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

乾隆再次把自己和大臣们的意见谕示张广泗，希望他作出回应。

张广泗不愧是一个强硬派，仍然坚持要屯兵，大谈这么做的好处。根据张广泗的说法，屯兵是必需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必须得这样，才能保证苗疆的稳定。针对反对派意见，张广泗一一反驳，他说屯兵的田是那些已经绝了户的苗人田地，至于没有绝户的田地仍然归苗人自己保留。张广泗还保证说，一定让军人自己耕种，绝不让他们奴役苗人，而且张广泗还说苗人的荒地非常多，绝不会出现人多地少的局面。张广泗最后表示，自己一定严格军纪，不让士兵侵犯苗人田地。

乾隆帝终于被张广泗说服了，最后拍板同意张广泗的意见，但他要求张广泗一定要抚恤苗民，千万不能让他们再生出事端。

事实证明，张广泗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不仅维护了苗疆的稳定，还促进了苗疆的经济繁荣。以前，苗疆没有的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芝麻、麦子等农作物，全都移植过来了。军垦之后，收成也非常好，军队的吃饭问题解决，不用再像以前一样从其他省份运送军粮到贵州。

苗疆以前没有市场，现在有了市场有商贩，种植物也不再局限于农作物，也有一些经济作物，譬如茶叶、桐树等等。

第四章 帝王心术

权势使人昏聩，张廷玉和讷亲都不懂得收敛。最后，两人的下场都非常惨，讷亲在攻打金川的时候忽然收到乾隆寄过来的一把刀，这把刀是讷亲的祖父遏必隆用过的，乾隆让他用这把刀自裁。

流产的叛乱

这事还得从庄亲王允禄说起，允禄是雍正的十六弟，在雍正的兄弟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允祥。可以说，允禄是雍正朝的既得利益者。

乾隆上台之后，为了缓和宗室关系，善待在雍正朝受到迫害的王公。这事乾隆办得不错，但是以允禄为首的既得利益群体不高兴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在新朝不如旧朝受宠，正在不断地失势。客观地说，乾隆对允禄还是不错的，命他总理事务，领取双倍俸禄。

可惜，失势就是失势，对于一个贪恋权力和既得利益的人来说，小恩小惠是不管用的。

允禄既然对新朝不满，想结党保住自己的利益，那么他就必须要结交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康熙的嫡长孙、胤禔的嫡长子弘皙。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大清江山就应该是落在弘皙的手中。康熙最开始也确实是打算遵循嫡长子继承制的，只可惜后来与太子胤禔的矛盾激化，致使皇位旁落到雍正这一支。在雍正当皇帝时，弘皙不敢有怨言，这个人毕竟是自己的叔叔，而且心狠手辣。到了乾隆当皇帝时，弘皙开始有想法了。我们知道，宋太祖死后兄终弟及，赵光义即位后曾表示将来把皇位还给赵匡胤的儿子，虽然他后来没还。弘皙当时也想到了那段历史，他觉得清朝的皇位原本是属于我家，我爸没当上皇帝是因为跟爷爷关系不好，你雍正当完了皇帝，也该把皇位还过来了。

弘皙和允禄是这个集团的灵魂，除此之外还有允禄的儿子弘普和宁和，允祥的儿子弘昌和弘皎也参与其中。说实话，乾隆对这些人都有恩，弘普在乾隆元年受封为贝子，宁和得了个“额外世袭公爵”。为何叫额外世袭公爵呢？本来允禄一家只有一个人能世袭爵位，现在乾隆给了宁和一个机会，允许他的后代世袭，等于是给了允禄一家两个世袭爵位。

雍正跟允祥的关系非常好，允祥死后配享太庙，雍正还打破祖制，命允祥怡亲王的王爵世袭罔替，这可是极大的恩宠，俗称铁帽子王，在整个清朝历史中，只有十二个铁帽子王，其中有八位是开国功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何谓“世袭罔替”吧！

在了解这个制度之前，我们先粗略地了解一下清朝的封爵制度。皇族爵位是封爵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皇族爵位共有十二等，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和奉恩将军。

清朝封爵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功封，一种是恩封。功封是臣民在战争和治国中立有大功受封，恩封是皇帝加恩所封。承袭爵位的方式也有两种，一般情况下是降等承袭，也就是说子孙承袭爵位每一代就要下降一个等级，降到辅国将军就不再降了。第二种承袭方式就是我们说的世袭罔替，就是说爵位传承之时等级不变，子孙后代永远可以保持这个爵位。这样的人又称为铁帽子王，整个清朝只有十二个铁帽子王，我们来看看这十二个铁帽子王。

第一个是和硕礼亲王代善，第二个是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第三个是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第四个是和硕豫亲王多铎，第五个是和硕肃亲王豪格，第六个是和硕庄亲王硕塞（皇太极第五子），第七个是多罗克勤郡王岳托（代善长子），第八个是多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代善的孙子）。前面八个既是皇亲贵胄，又是开国功臣，都是清初很有分量的人物。后面四个铁帽子王，第一个就是允祥，第二个是和硕恭亲王奕訢（道光第六子），第三个是和硕醇亲王奕譞（道光第七子），第四个是和硕庆亲王奕劻（乾隆帝十七子永璘六子绵性长子）。

允祥的两个儿子参与弘皙、允禄集团确实让人感到意外，此外参与谋反集团的还有恒亲王允祺的长子弘昇。弘昇在康熙末年被封为世子，后来被雍正削去爵位，乾隆即位以后封他为郡王，掌管火器营事务，应该说对他也是有恩的。然而，这些人却不约而同地加入了反对派，无疑让乾隆对“仁政”二字感到困惑。

乾隆执政三年后就察觉到了这个“地下党”，不过当时证据不足，所以没有采取行动。四年冬，终于有人告发弘皙和庄亲王允禄“结党营私，往来诡秘”，乾隆立刻让宗人府审理此案。

宗人府审理之后，奏请将这些人革去王爵，永远圈禁，特别强调弘皙不知畏惧，抗拒认罪。乾隆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允禄不过是庸碌之辈，言下之意是干不了大事，有贼胆无贼力，所以从宽处置，免

去他的双俸和职位，保留王爵。而弘昇不过是吃饱了没事要生事的家伙，永远监禁，保留爵位；弘昌是秉性愚蠢，弘普是行为不检，弘皎是没有识见，停止给这些人发薪水。

在这些人中，对弘皙的处罚最为严厉，革去了他的亲王爵位，但没有囚禁他，允许他仍然住在王府里。

乾隆对这个案子的处理是非常低调温和的，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大开杀戒。但是到了十二月，案情突然变得严重，弘皙的亲信富宁突然跑到王府告发弘皙犯有弥天大罪。乾隆大惊，让平郡王福彭审理此案。福彭背景很厚，是岳托的五世孙，也是乾隆的同窗好友，由此可见乾隆对此案的重视。福彭还有一个身份，曹雪芹的表兄弟，是以很多人推测《红楼梦》影射的是宫廷斗争。

福彭很快就查出弘皙的巫师安泰，安泰的口供让福彭震惊。根据安泰的供词，他曾在弘皙的府中作法，在作法过程中安泰浑身颤抖，自称是祖师降灵到自己身体上，随后弘皙问了他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可以构成大逆不道的罪名，弘皙问他：“天下会太平多长时间？准噶尔什么时候到京城来？皇上寿考如何？我将来还有‘升迁’的机会吗？”

这些问题暴露了弘皙的野心，最让人费解的是他为何问准噶尔何时到京。我们知道，准噶尔是清廷的死对头，弘皙问准噶尔何时入京，难免让人怀疑他和准噶尔勾结，企图改天换日。弘皙不仅觊觎神器，而且付诸实践，福彭查出，弘皙仿照宫廷内务府体制，设立了掌仪司、会计司，私下里意淫当皇帝的感觉。

乾隆指责弘皙昏暴鄙陋居心大逆，让福彭和九卿议罪，最后大家一致奏请革去弘皙宗室，立即正法。乾隆免他死罪，囚禁在景山东果园。在处理谋逆案时，乾隆拿捏得很有分寸，充分显示了一个成熟帝王的高明心术。乾隆时代跟雍正时代最大的不同是政治斗争没有那么激烈，没有那么势如水火，如果再像雍正那么做，就不是强人了，而是蠢人。

盘根错节的朋党

自古以来，皇帝最厌恶的一件事就是臣下结党，结党不光是营私，还威胁到皇权。在打击朋党方面，朱元璋和雍正都是专家，说是专家，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招数，无非是将人从肉体上消灭，从精神上折磨。

朋党问题同样纠缠着乾隆，这个朋党问题还是雍正留下来的。我们知道，雍正有一对左膀右臂，分别是鄂尔泰和张廷玉。在鄂尔泰进入内阁之前，张廷玉已经相当于内阁首辅了，不料鄂尔泰后来居上，张廷玉心里的不痛快可想而知。

雍正死前留下遗诏，允许鄂尔泰和张廷玉百年后配享太庙，这个荣誉非常高，自大清开国到雍正去世只有十二个臣子享受到这个待遇，其中没有一个汉人。张廷玉可算是第一个汉人了。奇怪的是，无论是鄂尔泰还是张廷玉似乎都不重视这个恩典，也许这两人思想比较超前，配享太庙什么的都太空，人死后什么都没有，还是生前把握住可见的好处比较实在。

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的关系很不好，两人都是军机大臣，都在军机处上班，但往往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不仅如此，两人还互相挖苦，互相讥讽。譬如，有一个夏天，鄂尔泰进来后摘下帽子，为了缓和气氛，问大家：“这个帽子放什么地方呢？”张廷玉冷笑道：“这顶帽子还是放在自个儿头上为妙。”鄂尔泰听了，脸色阴沉，一句话也没说，好几天鄂尔泰心情都糟糕至极。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的矛盾，大家都心知肚明，于是不同的人就依据自己的好恶和师承分投到两人门下。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派别。在雍正时期，鄂尔泰和张廷玉不敢结党。乾隆时期可不一样了，首先乾隆是晚辈，他们都当过乾隆的老师，论年纪也可以做乾隆的父辈，加上两人位高权重，自然充当了党魁的角色。

乾隆很生气，忍了他们很久了，直到乾隆五年才发难。乾隆发难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皇帝，大臣仗着资历老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这让他的自尊心往哪搁啊？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召集文武百官开会，措辞严厉地警告大臣：“为人臣者有臣德，不要成天想着巴结权贵，枉自揣摩。”乾隆甚至点了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名，当然也给他们留下面子，乾隆说鄂尔泰和张廷玉不会有党派之心，只是下面的人喜欢乱作非为，满洲的人想依附鄂尔泰，汉人想依附张廷玉。最后，乾隆愤怒地质问群臣：“你们这么瞎搞，把鄂尔泰和张廷玉当成手握大权的人，那么朕在你们眼里又算什么呢？”

群臣立刻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意识到党派跟皇权的矛盾。只不过，乾隆认为满人依附鄂尔泰、汉人依附张廷玉，这个看法有些片面。固然有相当多的满人依附鄂尔泰，但是依附他的汉人更多，譬如封疆大吏张广泗、张允随就是鄂尔泰的门徒，回族人哈元生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像杨名时、方苞、胡中藻等人跟鄂尔泰的关系也

相当好。连文坛怪杰郑板桥都对鄂尔泰心悦诚服。

郑板桥也算是鄂尔泰的门生，郑板桥中进士的那年，鄂尔泰正是主考官。鄂尔泰有意把自己打造成清廉正派的儒学名臣，加上他非常爱才，所以聚集在他门下的人才特别多，其中以汉人居多。郑板桥是个愤世嫉俗的人，连乾隆都敢批评，后来还傲然辞官，这样一个人却对鄂尔泰尊敬有加，说明鄂尔泰确实有过人之处。

张廷玉与鄂尔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鄂尔泰思想开明的话，张廷玉则显得相对保守；如果说鄂尔泰汉化非常严重的话，张廷玉则满化得非常厉害，张廷玉满文非常好，能够用满文写文章，在今天肯定是个国宝级的学者；如果说鄂尔泰有尊重人的前沿意识的话，张廷玉身上则表现出奴才气，张廷玉为官相当谨慎圆滑，聚拢在他周围的大体是一些圆滑之人，除了蒋廷锡比较正直之外，很难再找出一些正派的官员。

当然，在张廷玉的门下也不乏大量才智之士，汪由敦就是其中的优秀人物。汪由敦和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是知交，赵翼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学问冠盖当时，胸襟广阔，从不嫉妒别人的长处。

逐个击破朋党

乾隆上次训话之后，结党现象并没有改观。为此，乾隆伤透了脑筋，他决心打破僵局，重新整肃朝纲。

突破口终于找到了。

乾隆六年四月，御史仲永檀奏参步军统领鄂善，奏参的内容是鄂善收取贿赂一万两白银。本来，这个案子跟朋党没有关系，但随着案情的深入，逐渐牵连出了朋党案。

案情是这样的：俞君弼是一个富商，为工部承揽了一个建筑工程，俞君弼没有儿子，中途病故后，女婿许秉义出头主持丧事，邀请同宗、内阁学士许王猷前来吊唁，以便增加自己夺取遗产的筹码。只因俞君弼有一个嗣孙俞长庚，所谓嗣孙并不是指亲生的孙子，而是同宗里过继过来的孙子。俞长庚为了不落下风，找到鄂善这个后台，给他送了一万两银子。鄂善果然给力，作出了有利于俞长庚的判决，还将许秉义治罪，并革了许王猷的职。

许秉义和许王猷不服，于是托人找到仲永檀，仲永檀也非常给力，立即给乾隆上了一道奏章，弹劾鄂善。最绝的是，仲永檀在奏章

中居然意味深长地将张廷玉也卷了进来，说这个张廷玉亲自差人送帖到俞家吊丧，张氏门人徐本、赵国麟还亲自去跪奠……寥寥数笔，就把案子往最危险的方向推动，由此可见，御史的笔比刀还厉害。

然而，仲永檀太低估乾隆了，乾隆绝不是一个昏庸的主。他第一反应是仲永檀是鄂尔泰的门生，仲永檀考进士那年主考官就是鄂尔泰，乾隆意识到此案可能跟派系斗争有关系。为了显示对此案的高度重视，乾隆召集怡亲王、和亲王、鄂尔泰、张廷玉、徐本等人公审。

在审理的过程中，乾隆甚至亲自询问鄂善，希望他主动坦白。看到乾隆和颜悦色的样子，鄂善以为皇上很仁慈，心想皇帝应该不会重罚自己，竟承认自己收了一千两银子（鄂善以为将收取的银子降为十分之一罪名就轻很多）。事后，鄂善想，受贿超过八十两就是死刑了，第二天又推翻原供。没想到鄂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推翻原供等于欺君，比贪污的罪名更大。

乾隆盛怒之下，将鄂善的案子交给刑部处理，刑部很快就查出鄂善受贿之实。刑部建议将鄂善处以绞刑，乾隆垂泪让鄂善在家自尽。鄂善身兼兵部尚书和护军统领之职，是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的一品大员。

乾隆原本不打算对张廷玉朋党一事深究。但赵国麟却不肯罢休，赵国麟是个道学家，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听说仲永檀奏告自己到俞家跪奠，这是用传闻诬蔑自己的清白。为了表达不满，赵国麟提出辞职。乾隆知道赵国麟这是在发泄对自己偏袒仲永檀的不满，此时仲永檀已经升到左副都御使。乾隆最不喜别人要挟自己，将赵国麟连降两级。赵国麟是一根筋，依旧不依不饶，乾隆很不耐烦，干脆把他革职，但也不准他回家，以闲散身份待在京城。

仲永檀表面上看是升官，其实末日正向他悄悄走近。

在末日来临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这段插曲将仲永檀的死期推后一年多。

谱写这段插曲的是一个叫刘统勋的人。刘统勋，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进士，曾当过乾隆的老师。乾隆即位后，出任内阁学士二品大员。乾隆六年，刘统勋当上左都御史。鄂善案子爆发后，刘统勋认为是时候向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个党魁出手了。

在第一份奏折中，刘统勋直指张廷玉结党营私，说桐城（张廷玉是桐城人）张姚两姓占据当地缙绅的一半还不止，张家在朝廷当大官的有十九人之多，姚氏和张氏世代联姻，当官的也有十个人。刘统勋说张家的门第太显赫了，张廷玉与父亲张英先后担任宰辅，至于翰林

就更多了，满门皆翰林，翰林院可以直接开到张廷玉家中。刘统勋并没有从其他角度攻击张廷玉，仅仅是指责张廷玉任人唯亲，搞家族企业，说明刘统勋深谙盛极而衰的道理。他攻击张廷玉，没有分毫涉及张廷玉和鄂尔泰之间的恩怨，这无疑给乾隆一个感觉，刘统勋完全是为皇家考虑，对派系斗争并不感兴趣。

在第二份奏折中，刘统勋说讷亲（额亦都曾孙）职位太高、权力太大，身兼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吏部尚书协办户部事务、军机大臣、议政大臣等职，导致他位高权重，颇有些刚愎自用。刘统勋建议削减讷亲的职务，并让乾隆晓谕他盈亏之道，让他谦虚低调一点。

收到这两份奏折，乾隆非常欣喜，这对困于皇权受抑的乾隆来说犹如及时雨。乾隆立即将这两封奏折交给大臣学习，最后乾隆告诫张廷玉和讷亲，让他们收敛，不要辜负自己的期望。

可惜，权势使人昏聩，张廷玉和讷亲都不懂得收敛。最后，两人的下场都非常惨，讷亲在攻打金川的时候忽然收到乾隆寄过来的一把刀，这把刀是讷亲的祖父遏必隆用过的，乾隆让他用这把刀自裁。

之后，张廷玉行迹有所收敛，但仍然以太平宰相自居，终于让乾隆忍不住对他动手了。张廷玉虽然没有被杀，但是受尽乾隆的挫辱，最后黯然回乡，乾隆甚至削去他伯爵的称号，还剥夺他配享太庙的权利。

不久，就轮到鄂尔泰遭殃了。自从升任左副都御使后，鄂尔泰的得力干将仲永檀开始得意忘形。乾隆七年十二月，轮到仲永檀倒霉了。事情是这样的，仲永檀在参奏乐部大臣张照时，私下里找鄂尔泰的儿子鄂容安商议，这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乾隆耳朵里。乾隆龙颜大怒，将仲永檀和鄂容安一起革职，交与刑部议罪。

鄂容安是鄂尔泰的长子，雍正十一年中进士，当时还不过二十岁，年纪轻轻，前途无量。中了进士后，鄂容安就跟着父亲进入了军机处，是军机处最年轻的军机大臣。

本来鄂容安前途无量，乾隆也相当重视这个比自己小三岁的未来栋梁，仲永檀和鄂容安密商奏折的事发生后，乾隆对鄂容安非常失望。此案经过刑部审讯，仲永檀和鄂容安都对事实供认不讳，刑部最后拟定，以泄露机密罪定刑。没想到一向宽容的乾隆却认为拟罪过轻，他说仲鄂二人在密奏之前就商议，奏完之后又召回，明显属于结党营私，打击与自己关系不好的人。乾隆让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一同出击，重新再审。

大家很快就揣摩出圣意，知道乾隆是想揪出幕后指使者，这个幕后人物不用想都知道是鄂尔泰。三个部门很快就查出鄂尔泰是这事件的主谋，最后刑部建议对仲永檀和鄂容安进行刑讯逼供，还将鄂尔泰革职查办。乾隆忽然一反常态说：“不必了，仲鄂两人罪行昭彰，不必再审。至于鄂尔泰，不用革他的职。”

看来，乾隆没有搞垮鄂尔泰的意思，只是想狠狠地给他脸色看。在结案时，乾隆斥责道：“仲永檀这个人恶迹昭著，鄂尔泰却经常在朕面前说他品行端正，显然是包庇党羽，鄂尔泰对儿子鄂容安显然也失于教导。这件事朕不忍深究，一旦深究，恐怕鄂尔泰也承担不起，到时国家就少了一个能办事的大臣。朕希望鄂尔泰能反思，朕以前能用你，今天能宽恕你，难道将来就不能惩治你吗？请好自为之，悔过自新，继续为国家效力。”

还没判刑，仲永檀就瘐毙狱中，有人怀疑他是被张照谋杀的，但没有证据。至于鄂容安，刑部判他充军戍边，乾隆法外开恩，让他继续在上书房行走。

到这里，可以说乾隆成功地化解了朋党之争的毒害，从此以后，大权尽揽于乾隆一人之手。事后，乾隆向大臣解释说，是鄂尔泰和张廷玉逼着自己选择严苛的，决不会因此而改变宽仁的政策。

此后，乾隆的帝王心术日臻成熟，大有超过乃父之势。

第五章 弹压“暴民”不手软

乾隆一向以爱民自居，但他爱民的前提是顺民，无条件地顺。百姓应该明白了，乾隆的爱民不是真爱，把爱改成统治二字更恰当。

米价上涨引发的心灵创伤

乾隆经常以爱民皇帝自居，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词语是“乾纲独断”，似乎乾纲独断和爱民没有冲突。皇帝说乾纲独断在我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但其实在明朝之前，哪个皇帝说这样的话，大家会觉得非常奇怪，而且肯定是不喜欢的。

在中国的汉唐盛世里，乾纲独断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在那时人们的心中，这往往是“暴君”才说出的话。譬如，唐太宗就说过这样的话：“天下如此之大，百姓如此之多，国家事务千头万绪，如何正确处理、正确判断，需要宰相筹划，百官一起商量，然后才能执行。国家大事，岂可天子一人决断！”

唐太宗说的是实话，你天子就算是政治天才、管理高手，也不可能是个全才，对什么事情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才需要大家商量。但这样势必会“分权”，所以朱元璋一统天下后，废除丞相，将国家大权操于一人之手。从此以后，乾纲独断成为一种潮流，历经雍正的改革，到乾隆时代，专制制度走向巅峰。

在乾纲独断的社会里，没有人能限制皇帝的权力，这自然可以提高皇帝政策的执行效率，但也让臣下和百姓失去权利和自由。统治者想怎样就怎样，百姓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时间一长，国家走向腐败，就是以暴易暴的循环了。

乾隆十三年四月，江苏发生饥荒导致苏州米价高抬，许多老百姓买不起粮食，生存受到威胁。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当年江苏多地阴雨绵绵，下了几个月，导致很多地方积水，影响了粮食的收成。后来四五月份，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徐州、通州等地居然下了冰雹，这在南方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东西。这冰雹一下还持续了很多天，进一步减少了粮食的收成。这样一来，米价疯长，人心惶惶。百姓急切希望政府能干预米价，让大家都能买得起粮食。

官府对此反应非常冷淡，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有一个叫顾尧年的汉子对官府的行政不作为非常愤慨，他写下了“无钱买米穷民难过”八个大字贴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跑到巡抚衙门大声哭诉，要求官府救济百姓，平抑米价。他这一哭引来了许多饥民，大家跟着他一起哭。巡抚衙门前顿时人山人海，哭声一片。

巡抚的名字叫安宁，从名字似乎可以看出这人是维稳派。安宁认为自己是达官贵人，出面跟乱民交涉是降低身份，便将这事交给知县郑时庆处理。对于这种事情，官府的处理方式很简单，不用动脑筋就知道把带头的抓起来。逮捕顾尧年之后，动乱并没有平息，饥民们纷纷冲进县衙，让县令释放顾尧年等人。郑时庆可不买账，激起了众人的愤怒，场面开始失控，乱民们开始打砸县衙，郑时庆吓得赶紧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就在事态不可控之时，署理苏州知府姜顺蛟赶了过来。姜顺蛟还算是一个冷静沉着的人，他让大家先安静下来，自己去请示巡抚，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的。愤怒的百姓们跟着姜顺蛟来到巡抚衙门，由于人太多了，场面再次失控，人群将巡抚衙门的栏杆给挤倒，在外面大喊大叫，喊声震天。巡抚安宁认为老百姓已经谋反了，派兵进行弹压，捉拿了三十九个带头的人。

在这乱哄哄的节骨眼上，顾尧年的朋友陆高、吴宝等人趁机冲进县衙救出了顾尧年。可惜没过几天，他们又被官府抓获。

安宁将这事上奏乾隆，大肆渲染暴民如何如何可恶。收到奏报之后，乾隆一度很激动，准备在苏州驻防八旗官兵，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不宜将事态闹大。所以，乾隆让巡抚安宁好好教训闹事的元凶，给苏州百姓一个警示。如何警戒呢，乾隆说，把他们当众杖毙，自可以杀一儆百。

顾尧年等人被抓住后，百姓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领头人，大家想起了两江总督尹继善，在苏州百姓心中，他是一个好官。大家指望尹继善能够救出顾尧年等人，所以纷纷转发匿名传单，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吉甫如来天有眼，禄山不去地无皮。”收到这个传单后，安宁气得吹胡子瞪眼，他知道后面一句骂的就是自己，因为唐朝安史之乱的安禄山跟自己一样名字前面都有一个安字，但是吉甫是谁安宁就搞不懂了。他把这个上奏给乾隆，乾隆一肚子墨水，一看就知道吉甫是两江总督尹继善。周宣王时戎狄逼近镐京，尹吉甫带兵勤王，打败了敌人，维护了周朝的安定，受到了百姓的一致称颂。尹继善和尹吉甫同有一个尹字，加上尹继善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官声不错，乾隆判断这个人一定是尹继善。

要不要派尹继善去处理暴乱事件，乾隆着实伤透了脑筋，因为他看尹继善不顺眼。尹继善这个人到哪里都受到称颂，不管是百姓也好，还是当地的豪绅也好，都对他交口称赞，这本来是好事，但乾隆觉得像这种左右逢源的人正是父亲所警惕的巧宦。再说了，尹继善这么一搞，大家都称颂他了，谁还理解皇恩其实比这更浩荡呢？

最后，乾隆还是让尹继善去苏州了，有人说这么做是为了维稳，估计真实原因是故意让苏州百姓改变对尹继善的看法，让他们痛恨尹继善。显然，在尹继善临行前，乾隆已经给他交底了。乾隆警告他：如果你沽名邀誉，损害国家利益博取刁民称颂，那就等着我取你的脑袋吧！

尹继善来的时候，百姓以为救星到了，讽刺的是，在打死顾尧年、陆高等人的那天，尹继善和安宁共同临场监视。相信这事对苏州百姓的精神打击是残酷的，众目睽睽之下，这三十九人被活活打死，谁也无法救他们，在专制的天空下，皇帝的意志甚至大于天。

这一次，受伤的不只是尹继善，苏州的百姓全都受伤。他们发现，仁政也好，清官也好，全是靠不住的。

乾隆一向以爱民自居，但他爱民的前提是顺民，无条件地顺。百姓应该明白了，乾隆的爱民不是真爱，把爱改成统治二字更恰当。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事把乾隆说成是一个暴君，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维护统治出发。譬如乾隆在位期间，五次普免天下钱粮，相当于免掉全国一亿五千万两白银，他还三次免掉漕粮一千万石，这些做法在中国古代都是极为少见的，但这不代表乾隆爱民，只能说他深谙统治之术。与此相反，对于那些胆敢叛逆的刁民他也毫不手软，不是斩立决，就是凌迟处死。

取缔大乘教

领教了乾隆的“两手政策”（一手施恩，一手施威）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乾隆是如何对待民间那些秘密宗教的。对于皇帝来说，宗教只有两种，一种是正教，一种是邪教。所谓正教就是对统治有利，或者至少是无害的，所谓邪教则是祸害国家、危及社会稳定的宗教。

乾隆前期，天下虽然太平，但远远没有达到圣王统治下四海升平的境界，人民的反抗也一直没有消停过。这些反抗组织大多伪装成宗教形式，我们知道朱元璋就是依靠明教发家的，宗教是一种很有煽动性的组织，对乾纲独断的乾隆来说，这是需要格外警惕的。

当时，比较流行的地下宗教有大乘教、罗教、宏阳教、收元教、长生道等，这些地下教派跟白莲教和明教有许多相似之处，组织严密，主张偏激，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其中，以大乘教的传播最为广泛，这个大乘教跟佛经原义中的大乘教完全是两码事。

乾隆十一年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密奏乾隆，妖人张保太的党徒流入贵州、四川，请求下令缉拿。张保太是云南大理鸡足山人，大乘教的创始人。康熙年间，张保太就开始在鸡足山上传教，自取法名“道岸”。康熙二十年，张保太创立大乘教，自称“西来教主”。张保太创立大乘教的时候，正值平定三藩之后，当时中原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纷纷渴望“明主”出现，所以说张保太从创教开始就是不怀好意的。

作为一个教主，张保太是成功的，他很快就把大乘教“发扬光大”，全国各地都有信徒。终于，他引起了雍正的注意。雍正八年，张保太被逮捕，本来是准备把张保太等人处以绞刑的。后来乾隆登基，天下大赦，张保太悔罪回乡，继续在暗地里从事传教活动。

乾隆六年，张保太西去，教主的职位由继子张晓接掌。不过，张保太的再传弟子刘奇能力更强，很快就取代张晓成为教主。刘奇当上教主后，以云南、贵州、四川为大本营，开始向全国蔓延渗透，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

张广泗上奏之时正逢大乘教呈燎原之势，这个奏章引起了乾隆高度的重视，他批示张广泗，对这种事一定要严惩不贷，尽快抓住祸首，永除祸患，胁从的人不要追究。

随后，乾隆下了九道谕旨，指示云南、贵州、四川、江苏、直隶、湖广、江南、江西、山西等地通缉大乘教的大小首领。云南总督张允随首先发力，逮捕了张晓和刘奇的徒弟刘钧、杨声等六个重要的人犯，张晓和刘钧被凌迟处死，杨声斩立决。

张广泗是取缔大乘教的发起人，办事更为卖力，他缉拿了张保太的弟弟张二郎。通过审讯从张二郎的口中得知大乘教的聚会时间和地点，结果将大乘教的一些重要人物一网打尽，逮住了贵州大乘教的首领魏明璉。张广泗接着对魏明璉进行审问，得到了大乘教内部信息以及各地掌教人的资料。随后，张广泗上奏，其他的人都好抓，只有一个叫朱牛八的首领很难通缉，因为朱牛八显然不是真实姓名，牛八合起来是个朱，这个名字隐含着怀念朱明的深意，似有反清复明之意。

当时，朱牛八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朝中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大乘教可以算是白莲教的分支，而朱牛八似乎是白莲教的首领，在邪教的宣传中提到：“清朝气数已尽，四方正佛出自王门。胡人灭

亡之后，何人登基？牛八原来是土星。”直接指明朱牛八是未来的皇帝。

朱牛八的线索一度中断，直到有一天，一个教徒来到四川巡抚衙门口，案情才有了突破。根据教徒胡恒的口供，朱牛八是贵州罗贡生家里的女婿。张广泗立即展开缉拿，可惜没有抓到此人，更蹊跷的是根据胡恒提供的信息，贵州仁怀县安罗里虽然有一家姓罗的，但这个人不是什么贡生，而且在这一带根本没有传教的痕迹。

四川巡抚纪山由于追查大乘教不力，多次受到乾隆的责骂，乾隆甚至骂自己没有知人之明，让纪山很没面子。其实，纪山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在四川时抓住了大乘教骨干129人，只是一些首领没有被抓住。后来，纪山加大追查力度，抓住了首领李奇和苏君贤。

各省搜捕大乘教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的情况。北京虽然贵为帝都，大乘教的活动却非常猖獗，首领是一个叫吕斋婆的人。四川巡抚纪山审问刘奇时，刘奇不知道吕斋婆的情况。湖广总督审问金友瑞，他也不知道吕斋婆的下落。吕斋婆的女婿张天序在贵州被抓获，但也没有供出吕斋婆的下落。

这场全国范围内的血腥大捕杀持续了近九个月，一些主要案犯纷纷被缉拿归案，一一正法。虽然像朱牛八和吕斋婆这样神秘的人物逃脱法网，但已经兴不起什么风浪了。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宣布结案，所有邪书收缴焚毁。

福建老官斋教徒暴动

罗教可以追溯到明朝嘉靖时，当时山东即墨县有一个叫罗清的人，此人创立了罗教，被教徒们尊称为罗祖。罗清是一个颇有思想、颇有头脑的人，他吸收了佛教的“万物皆空”理论，认为“真空”是宇宙的本源，又糅合了道教和宋明理学的理论，认为万般都是无极化。所以，罗教又被称为“无极教”和“太极教”。

福建老官斋教是罗教的一个支派，在官府眼里，这个教派就是大乘教。乾隆十三年三月，福州将军新柱上奏，说老官斋教是罗教的化名，也就是大乘教（这位将军显然没搞清大乘教跟罗教的区别，不过他看到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就是两者都是邪教）。根据新柱的说法，老官斋教是由浙江处州府庆元县姚姓远祖普善传来的，普善留下了《三世因由》一书，书中说初世姓罗，二世姓殷，三世姓姚。他们都是天上的弥勒佛化身的，号为无极佛祖。男女老幼都可以加入这个

宗教，不过必须吃斋，凡是教徒，都必须用普字作为教名。

乾隆初期，庆元县姚氏后人姚正益每年都会来福建传教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教徒不多，后来人数越来越多，教徒们都把姚正益奉若神明。

这些教徒们自号老官斋教徒，经常聚在一起吃斋，地方官当时没在意。后来，他们的声势越来越大。乾隆十二年十一月，斋明堂首领陈光耀搭建长篷，聚集大量乡民，大家一起点烛念经，引起了地方官的不安。事情告发后，官府派人把首领抓住。

这事发生后，各堂的堂主都惶惶不安，担心牵连到自己。于是，一些首领居然商议劫狱。其中，有一个叫宋锦标的教徒，他的妻子严氏是一个女巫，自称能通神。她竟然扬言受到祖师的感召，弥勒佛降灵到自己身体上，准备治理乱世。这样一来，很多教徒深受鼓舞，他们搜集各种兵器，还模仿政府军设置了元帅、总兵、副将、游击、守备、千总等军衔，每人头上裹一块破布，正式拉开暴乱大旗。

几千名教徒就这样浩浩荡荡地直奔宁府城，最先告诉官府老官斋教徒叛乱消息的是一个叫张国贤的布贩子。当时，张国贤经过县城附近，被教徒扣押。幸亏张国贤机灵，中途逃出，匆匆赶往府城，向知府徐士俊禀报。徐士俊觉得张国贤是大惊小怪，太平盛世怎么可能有暴乱，一定是张国贤弄错了，那些教徒不过是私下里聚会什么的。后来收到官兵报告，徐士俊才知道一切都是真的，立即派遣官兵镇压。

这些教徒毕竟只是一些乌合之众，官兵一来，轻易就把他们打散。许多教徒往山里窜，结果官兵进山捉拿了三百多人。

事情报告到乾隆这里，他不但没有赞扬徐士俊弹压有功，还将他撤职，理由是：邪教建立斋堂，发展到图谋不轨，作为知府平时不注意防范，导致酿成事端，理应承担责任。

对这次暴动，乾隆非常关心，当他得知为首的魏现逃脱后，指示地方官一定要把此人缉拿归案，乾隆说这个犯人的情节特别严重。对于其他教徒，乾隆也主张从严处理，多杀几个人，让奸徒们知道畏惧，有助于维护稳定。

后来，官兵在深山老林中将魏现抓捕。在处理此案过程中，乾隆一反往日的宽大，定了六等罪：首犯凌迟处死，助谋斩立决，宣传邪教蛊惑愚民的处以绞刑，被胁迫的犯人充军，知情不报的流放，不知情的教徒暂缓处理。

结果，一人被凌迟处死，四十九人斩首，九人被绞死，一人绞候

（有待进一步审理），发配充军的八十八人，杖责有九十九人，罪犯家属入奴发配的有十九人，还有几十人或自杀，或瘐死狱中。

这个案子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的统治思想，仁政只是表面文章，治国根本还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这次暴动虽然规模小时间短，但是给乾隆的冲击很大，他觉得这些乱民真是不知好歹，实行仁政他们反而得寸进尺。随后，乾隆决定清查邪教，将老官斋教全部关门大吉。

清水教大劫

乾隆三十九年，被历史学家称为盛世转衰的转折点，这一年也是多事之秋。

自从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中原大地再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一百年的平静积累了大量的热能，终于在这一年爆发。

这事还得从乾隆三十七年春天开始。自从乾隆先后以铁腕取缔大乘教和老官斋教之后，民间的地下宗教更加隐秘，教徒们再也不敢招摇过市，以至于官府认为在政府的铁腕打击下，国内基本肃清了邪教势力。

山东濮州人谌梅打破了官府的幻想，这一年春天，他带着“邪书”来到河南临颖县，不幸被官府查获。随后，官府顺藤摸瓜，找到了邪教的头领，濮州人王中。由此，将潜水极深的清水教拉出水面。

王中被捕之后，山东巡抚徐绩准备拿他开刀，当成政绩献给皇上。徐绩先搜罗王中的逆书，希望从中发现谋逆的证据，别说，他真的让他搜到了。在王中的“邪书”中有这样的话：平明不出周刘户，近在戊辰己巳年。徐绩问王中作何解释，王中也相当聪明，说“平明”是天明时运气流转，讲的是气功导引之术，练习气功应该在天微明时起来。徐绩心想，你厉害，旋即挑出更致命的句子：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钓周相八百秋。这句话谋反的意思还不明显吗？王中也有自己的解释，说太公、八百秋等话不过是教导人们修身行善，这样才能延年益寿，活得像姜太公那么长。

徐绩没辙了，只好将整个审案过程上报给乾隆。与此同时，河南巡抚何熠奏请将王中绞死。

收到徐绩的奏折后，乾隆没有研究案情，而是仔细观察“平明不出周刘户，尽在戊辰己巳年”这两句诗，他觉得其中大有蹊跷，绝不

像王中所说的那样是气功导引之术。经过仔细辨认，乾隆发现“明”字有改动痕迹，很可能是“胡”字。如果是“胡”字，那么这个案子就大了，不仅是邪教，而且是企图推翻大清的邪教。文化深厚的乾隆认为根据王中的诗，幕后应该还有两个更高的首领，这两个首领分别姓周和刘。得出这个结论后，乾隆立即命令军机大臣传谕徐绩，暂停对王中处置。乾隆想揪出幕后黑手，而且他相信自己的直觉。

可惜，乾隆的谕旨还没有到山东，巡抚徐绩就已经把王中绞杀。

这样一来，线索突然中断，幕后黑手似乎可以逍遥法外。然而，随着案情的发展，竟然证实了乾隆的判断。从一句诗居然能够判断出篡改的痕迹，还能推测出幕后的元凶，不得不佩服乾隆见微知著的本领。

五月，河南巡抚何熠审理案犯李孟炳，王中的头上还有一个姓刘的老教主，这个人本是个监生，本名刘省，祖上有做官的。刘教主旗下有三个教派分支，分别为先天、中天、后天，王中只不过是支教的首领。乾隆得知，为自己的智慧兴奋不已，立即下令捉拿刘省，最后在刘省的卧室地下刨出一万两千多两白银，这笔钱是教主刘省多年从教徒手中搜刮而来的。

就这样，清水教萝卜带泥，被连根拔出。

清水教原名八卦教，是由康熙初年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创立的，是以刘佐臣是清水教第一代教主。第二代教主是他的儿子刘儒汉，第三代教主是他的孙子刘恪，刘省是第四代教主。像所有的宗教一样，清水教也有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清水教的头目们自称喝一杯水，七七四十九天可以不吃不喝，清水教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在刑讯逼供下，刘省供出了离卦、震卦、坎卦等八卦教主要头目，从而揭开了邪教的隐秘网络。刑部给刘省拟罪凌迟，他的弟弟刘省愆和长子刘铨斩立决。八月，乾隆将刘省的处罚改为斩立决，其弟和其子改为斩候。到秋审时，刘省愆处斩，刘铨仍然有待进一步审理。

如果清水教案子就这么结束的话，那它充其量还是一个小案子，远远谈不上是大劫。刘省虽然是清水教的教主，但他没有翻起多大的浪花。

清水教最重要的人物不是这个刘教主，而是一个叫王伦的人，正是这个人，用自己的实力在清王朝的心脏部位踩上了三脚。

王伦起义

王伦究竟是何方神圣，能够震撼一代雄主乾隆，让他体会到害怕的感觉。

王伦也是山东人，家住寿张县党家庄。二十三年前，王伦认识了清水教的一个堂主张既成，跟随他加入清水教。在清水教中，王伦是一个本领高强的人，拳脚功夫了得，据说还会气功，经常在家乡左近的几个县行医传教，跟刘省装神弄鬼故作高深藏在家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王伦的教徒很快发展到几千人。

名誉教主刘省被抓住后，王伦知道自己的好日子也不长了，与其等人用刀来砍，不如自己先拿起刀去砍别人，还能占个先下手为强的便宜。

王伦虽然属于清水教一个分支的首领，但事实上他的权力最大，加上他为人看病不收钱只收徒，所以三教九流的人士都愿意跟他混。而王伦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收的，王伦应该很早就开始想造反，一路上他胸有成竹，注意挑选那些精干强壮的人。说明王伦多少还是有见识的，知道造反群体贵精不贵多。

王伦被大家称为是“收元之主”，以区别清水教的刘姓教主。

王伦之所以选在乾隆三十九年春，固然跟刘省被抓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东发生了饥荒。官府不但不赈灾，反而额外征收，许多农民无以为生，清水教此时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而这些民众正如唐太宗所谓的“能覆舟”的水。

看到饥民纷纷投奔自己，王伦以为大势所趋，是时候造反了。七月，他召集清水教的骨干人员，决定在八月二十八日起事。

造反是中国历史中风险最大的一个行业，当然如果成功的话，收益也是最大的。若非拥有非凡能耐的人是不敢轻易造反的，所有造反的人都需要一个旗号，换句话说，都要一套蛊惑人心的宣传。王伦的舆论也非常蛊惑人：“在八月以后，有四十九天大劫，跟随我的人可以免遭劫难。”王伦还预言在大劫之时，将会有大风雨。

八月二十八日五更，清水教部众如期起事，寿张县内的教徒在半夜打开城门，迎接其中一个头领梵伟进城，他们随即围住衙门，杀掉知县沈齐义，占领城池。第二天，教徒们迎接王伦进城。这几天果然如王伦所预言的那样风雨大作，于是，相信王伦的人越来越多。王伦随后又攻下堂邑县和阳谷县，部众发展到几千人，还缴获了数百辆

车，由于寿张、堂邑、阳谷三县城池低矮残破，王伦决定攻下临清作为暂时的大本营。

九月五日，起义军占领距离临清四十里的柳家庄。七日，山东巡抚徐绩带兵五百，围攻柳家庄。说是围攻，其实非常荒唐，官兵们胆子非常小，老远看到义军，就稀里糊涂乱放枪，结果起义军到他们跟前时，他们的枪炮已经用完了。徐绩等人反而被围住，最后一个叫惟一的满人总兵带兵救了徐绩。

徐绩捡回一条命，当即躲在临清城里。在攻打临清的过程中，王伦不知用了什么计策，让官兵们的枪炮失效。守城官兵认为王伦用了邪术，把鸡血狗血往下面洒，官兵们昏庸至此，战斗力可以想象。

后来，德州、青州和直隶相继派兵增援，才解了临清之围。

乾隆是九月五日收到奏折，才得知王伦叛乱的消息。乾隆传谕徐绩：“这种奸民，实在罪大恶极，这个案子特别严重，要按叛逆案来处理，跟平常百姓游行示威有所不同。一旦抓获，为首的立刻凌迟，同党斩首。要多办一些人，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大家知道怕处。抓到王伦后，将他全家斩首。”

临清有两个城，旧城城墙坍塌，但是面积很大，人口稠密。新城主要是做军事用的，城墙坚固，但里面人相对较少。看到新城久攻不下，王伦带着部众在旧城宿营，为了抵御官兵，王伦将车子堵在街头巷尾。这时候，王伦的部队已经发展到上万人。可以想象，这个人还是有一定的领导能力的。

没过多久，兖州总兵惟一、德州驻防城守尉格图肯率军来到临清旧城外和王伦交战，没想到官兵不堪一击，没坚持多久就败退东昌。王伦接着这个机会阻断漕运，趁机劫夺漕粮，义军控制运河之后，官兵就不敢再南下。

乾隆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就在这朝野震动的关键时刻，给事中李漱芳站了出来，上了一道见解深刻的奏折，他说奸民之所以滋事，主要是由年成歉收和地方官隐瞒灾情引起的，这些“奸民”主要是还是是一些填不饱肚子的饥民。李漱芳还说，山东的很多饥民往京畿之地流徙时，路过卢沟桥，官兵居然派兵拦截，不准他们北上，目的就是怕皇上知道灾情。

在奏折中，李漱芳也承认，其中确实有一些奸民，譬如像王伦这样的，但大多数都是平常老百姓。李漱芳是希望官兵在镇压时把握好一个度，不光是镇压，也要安抚饥民，改良吏治。

李漱芳的建议应该说是很好的，但是敏感的乾隆认为李漱芳是在

为刁民说话，纯属沽名钓誉。乾隆甚至否认山东遭灾，乾隆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山东受灾，地方官早告诉我了，既然没告诉我，就说明没什么灾情了。话虽如此，乾隆还是派大学士舒赫德去山东实地查访。

舒赫德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山东指挥剿匪，舒赫德来到德州后，了解到惟一和尉格图肯临阵脱逃之事，上奏给乾隆。乾隆指示，立即将这两人在军前斩首。舒赫德还密奏徐绩被围时惊慌失措的样子，乾隆说徐绩的事以后再处理。

舒赫德毕竟精干，他率领三路大军围攻义军。义军在城外阻击，终因寡不敌众退回城里，随即展开了巷战。巷战非常惨烈血腥，义军势单力孤，终究不是官兵的对手。有两千多义军在巷战中战死，官兵们后来得知王伦在一栋楼上，将楼团团围住。见此情景，王伦的副帅王经隆劝王伦投降，王伦说：“我宁愿烧死在楼上，也不投降。”

最后，王伦点火，烧死在楼上，有人看到他头发和胡子烧焦了，仍然站在楼上，目光淡定。这人确实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不是生活在专制时代，应该能做成一番大事。

正如王伦所预言，有一场大劫，但这个大劫不是什么天变，而是官府带来的血光之灾，大量的人被屠杀，无数的人流离失所。

事情平息之后，乾隆觉得是时候处理“不知顺逆大义”的李漱芳了。舒赫德在山东实地查访后，证实了李漱芳所说，山东地区确实歉收，地方官一味隐瞒灾情。乾隆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让舒赫德再查。舒赫德洞悉圣意，再次查访后上奏说：“山东地区并无灾情，也没有加征一说，这次民变完全是因为王伦等邪教徒图谋不轨。”

接下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理李漱芳了，乾隆批评李漱芳沽名钓誉，为乱民造反提供借口，简直是蛇蝎心肠。接着乾隆自比明君，说自己从来不愿以言论治人罪，只不过李漱芳见识平庸、心术不正，降为礼部主事。四年后，礼部员外郎空缺，吏部尚书永贵建议李漱芳补缺。乾隆又骂永贵沽名，罢了永贵吏部尚书的职位。

李漱芳从底层动乱中认识到盛世帝国潜藏的衰败因素，及时提醒乾隆关注民生，进行吏治改良。应该说是极有远见的，也是为帝国的长治久安着想，但他意识不到这点，只关注表面的“立场”和眼前的利益。

无论如何，清朝的衰落正是从乾隆开始，而苦果将由乾隆的子孙们来吞咽。

第六章 还原十全武功真相

乾隆酷爱炫耀文采，这个大家知道，在历史上很难找到比乾隆更勤奋的诗人，也很难找到一个皇帝像乾隆这样喜欢题字。大家有所不知的是，乾隆也非常喜欢炫耀武功。晚年，他自诩为十全老人，意思是他有十大武功。

第一次金川之战

乾隆酷爱炫耀文采，这个大家知道，在历史上很难找到比乾隆更勤奋的诗人，也很难找到一个皇帝像乾隆这样喜欢题字。大家有所不知的是，乾隆也非常喜欢炫耀武功。晚年，他自诩为十全老人，意思是他有十大武功。

我们来看看是哪十大武功。

武功一：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第一次平定大金川战争。

武功二：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达瓦齐之战。

武功三：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平定准噶尔阿睦尔撒纳之战。

武功四：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平定回疆大小和卓之战。

武功五：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征讨缅甸。

武功六：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之战。

武功七：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

武功八：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征讨安南之战。

武功九：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反击廓尔喀之战。

武功十：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第二次反击廓尔喀。

看来乾隆对武功很痴迷，把对同一个敌人的不同阶段战争都拆开来一分为二，这也不能怪乾隆，不这么做就没有十全，要十全肯定得注水。

我们先来看看两次平定金川之战。

金川位于四川省西北，分为大金川和小金川，这里盛产金矿，是

以得名。在金川地区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其中以藏族居多。在改土归流之前，金川一直是由土司管辖。

大小金川位于青藏高原，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交通极为不方便。在雍正时期，有一个叫莎罗奔的人投靠岳钟琪，为平定西藏立了大功，被封为大金川的安抚司，相当于以前的土司。从此，莎罗奔就把大金川当做是自己的地盘，有了地盘就想扩大地盘。小金川的地盘由土司泽旺控制，泽旺这个人性格懦弱。

莎罗奔为了控制小金川，把自己的侄女阿扣嫁给了泽旺。阿扣嫁给泽旺没多久，就给他扣了一顶绿帽子，勾搭了泽旺的弟弟良尔吉。乾隆十年，莎罗奔伙同良尔吉，攻取了小金川，泽旺沦为阶下囚。

事情发生后，川陕总督庆复和四川巡抚纪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建议乾隆不要介入他们的斗争。乾隆觉得有道理，便让他们调解。

庆复和纪山给莎罗奔施压，无奈之下，莎罗奔释放泽旺，归还土司印信。尽管如此，莎罗奔却无法克制扩张的野心，他深深迷恋在势力扩大的状态里。乾隆十二年正月，莎罗奔准备发兵攻打土司革布什咱，一番劫掠之后，又先后攻打土司鲁密和章谷。莎罗奔大有吞并大小金川的势头，乾隆终于坐不住了。

三月二十一日，乾隆任命张广泗为川陕总督，对金川进行进剿。张广泗是乾隆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才，在贵州处理苗疆之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乾隆眼里，张广泗就是一个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专家。

张广泗接到这个任务后，自信满满，觉得这次肯定也是手到擒来。不久，张广泗就向乾隆报告，现在手中有汉、土官兵两万人，这些士兵各怀心思，不能指望他们作战有多勇猛，汉人部队严重不足，请求紧急调拨两千人马。乾隆立刻批准。

刚进四川不久，张广泗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收复了毛牛、马桑等地。张广泗更加得意，他大言不惭地对乾隆承诺：“各路大军已经准备好了，分路进发，直捣敌人巢穴，贼众不日可破。”

很快，张广泗就为他的轻敌和骄傲付出代价。金川跟贵州的情况不太一样，这里山高路险，山寨林立，而且藏民们非常凶悍。在这种地形里作战，张广泗觉得非常痛苦，而且还得处处提防暗箭。面对敌人坚如磐石的山寨，张广泗更是一筹莫展，甚至向乾隆诉苦，说敌人的山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打下来非常困难。

已经夸下了海口，纵使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得上啊！仗打得非常吃力，每攻下一座山寨，张广泗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一年过去了，

战事没多少进展，却耗费了数百万的银两。乾隆很生气，责骂了张广泗一顿，继续让他打，还给他送来了一个助手，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岳钟琪。不过，有张广泗在，岳钟琪很难发挥作用，因为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

随后乾隆还派遣了一个重量级人物到四川，这个人便是首席军机大臣讷亲。讷亲固然位高权重，但是他从来没有打过仗，对军事一窍不通。如果说岳钟琪还有点靠谱的话，讷亲就是完全不靠谱，让这样一个人来和张广泗合作，真搞不懂乾隆是派人来协助呢，还是派人来捣乱？

讷亲来了以后，麻烦就更多了。张广泗这个人是非常有个性有脾气的，所以他有一个习惯：不把上司放在眼里。讷亲呢，也有一个习惯：他最讨厌别人不把他放在眼里。结果两人很不合，经常扯皮，性格决定命运。自从讷亲一来，战事更加不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讷亲是一个优秀的文官，处理政事还是很有经验的，并不是一个窝囊废，只不过不善于打仗，所以讷亲最后被斩是无辜的，真正的责任在于乾隆。他把一个不适合干某行的人放到该行某个岗位上，结果那人没干好，他还把责任全都推到那人的头上。

由于征战失利，乾隆一怒之下，将张广泗于军前处斩，然后给讷亲寄了遏必隆曾经用过的刀。讷亲用自己祖父的刀自尽，想必他觉得自己一定很冤，本来在朝中处理政事好好的，你偏偏要让我到金川来，分明是送我上绝路。

两个主帅被杀之后，乾隆让自己的小舅子傅恒（福康安的老爸）出任金川统帅。傅恒来到金川后，接受岳钟琪的建议，取得了一些胜利。乾隆和傅恒都是聪明人，知道金川很难打下，连年征战已经耗费巨资，财政吃紧。现在正好取得了一些小胜利，可以体面地结束战争了。

就在乾隆传谕傅恒班师回朝之时，岳钟琪居然收服了莎罗奔。要知道，莎罗奔以前是岳钟琪的部下，对岳钟琪非常佩服。和清军抗衡了两年，莎罗奔的元气也快耗尽，所以向岳钟琪请降。岳钟琪艺高人胆大，居然带着几十人去莎罗奔的营地，接受他的投降。

第一次金川之战就这样结束了，历时三年，动用军队八万，耗掉白银一千一百万两。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赔本的战争，耗费巨资不说，两个重臣被斩首，而且这两人都是人才。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并没有换来多久的和平，不久就引发了第二次金川战争。

如果让我们给“武功一”打分的话：一分。给出一分的理由是，乾隆起用了岳钟琪，也算是用对了人，岳钟琪收降了莎罗奔，这是这场

战争中唯一的亮点。

第二次金川之战

第一次金川之战受惠最大的是岳钟琪，他不仅重新获得了三等公爵封号，还得到“威信”的赐号，获得兵部尚书头衔。在雍正朝，岳钟琪因为作战失利，罚款七十万两银子，乾隆全部免掉。

莎罗奔年老后，他的侄子朗卡接替了他的位子，朗卡跟他叔叔是一个性格——也许这就是朗卡得以继承叔叔衣钵的原因。朗卡是一个野心勃勃，进攻性特别强的人，他屡次攻击和劫掠其他土司。

乾隆三十一年，四川总督阿尔泰为了调解各个土司之间的关系，居然出面让朗卡的女儿嫁给泽旺的儿子僧格桑。阿尔泰没有料到的是，自己好心办了坏事。阿尔泰本来的目的是让各个土司和平共处，防止一方坐大。没想到大小金川的土司联姻之后，居然合起来欺负其他的土司。就这样，大小金川的土司连番掠夺其他土司。

乾隆三十五年，朗卡病故，他的儿子索诺木继承职位，而此时小金川的泽旺也因年老将土司事务交给儿子僧格桑。

乾隆三十六年，索诺木和僧格桑相互勾结，攻打革布什咱，杀害了土司色楞敦多布，接着进攻沃克什和明正两个土司。阿尔泰奉命派兵镇压，其办事非常拖沓，就像他肥胖的身体一样，办事效率相当低。乾隆实在受不了他，免掉其职务，让云贵总督德福接替他处理四川事务。

然而，德福来到以后，比阿尔泰还不如。阿尔泰好歹是准备办事的，但德福却上奏说，这地方环境怎么怎么糟糕，我军在这里如何不适应，还说土民虽然刁钻，但是没有妄念。乾隆看了，非常生气，仍命阿尔泰署理四川总督。可惜，人的毛病是很难改的，阿尔泰归位之后，还是非常拖沓，经常找各种理由推迟用兵，估计是不敢打，毕竟张广泗、讷亲的前车之鉴还不远。不打的话最多是降职和丢官，如果打的话可能就是丢命了。

乾隆很失望，也只能失望，总不能把他斩了吧！只好革掉他大学士和总督的职位。

随后，乾隆让大学士温福和户部侍郎桂林前去四川。为了平定金川，乾隆可以说出手非常大方，他从陕甘调兵一万七千，从贵州调兵八千，再加上四川的兵力，总共有六万两千五百多人。至于拨款就更

庞大了，合计两千九百万两白银，乾隆甚至说，只要荡除贼寇，就是再多花一千万两，朕也没有怨言。当时清朝的库银也不过八千多万两，乾隆一出手这么豪放，让人震惊。

到达四川后，温福和桂林拟订了作战计划，温福率军从汶川出发，桂林领军从打箭炉出发。温福和桂林还算给力，先后攻破巴朗拉和穆巴宗堡寨，接着直逼小金川。僧格桑仗着地势险要，极力坚守抗拒。清军经过两个多月的狂轰滥炸才打开小金川的门户。不久，温福攻克了阿喀木雅，乾隆三十六年十月，桂林攻破五座碉堡，二十多座石卡。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到四月，桂林战果更加辉煌，一路击破，直逼小金川的咽喉僧格宗。

看到前方捷报频传，乾隆非常高兴，夸奖前方将领，让他们尽快捉拿贼首。可惜好景不长，就在大家高兴之时，前方忽然传来战败的消息。桂林部将薛琮带领三千人在墨垄沟被小金川军队围住，薛琮向桂林求援，桂林却没有营救，导致薛琮全军覆没，仅有两百人泅水逃回。

乾隆一气之下，解除桂林的职务，调任阿桂接替他。此后，清军又取得了一些胜利。然而在乾隆三十八年，清军却遭遇了一次惨败，主帅温福阵亡。温福阵亡后，乾隆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全权负责剿匪事务。为了确保阿桂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乾隆向前线派送了大量的军饷、弹药和援兵。阿桂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优秀将领，手下有一大批猛将，如海兰察、明亮、福康安、丰绅额。在阿桂的指挥下，清军很快攻克了小金川，随后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向大金川。中途，僧格桑病死，索诺木献出僧格桑的头颅向阿桂乞降，阿桂不理他，继续进攻。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索诺木自知山穷水尽，捧着印信，带着全家和部众两千多人到清军大营投降。第二次金川之战就此画上了句号。这场战争历时五年，耗资七千多万两白银，调兵十多万，终于结束了，百姓可以喘一口气了。

战争结束后，乾隆为了永绝后患，废除了金川的土司制度，设置流官，加强对金川的控制。从此以后，金川就变成帝国的直接辖区。如果要给乾隆这次武功打分的话，可以打五分，虽然代价很大，但毕竟解决了国家内部的分裂和割据问题，将整个国家纳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将金川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制服准噶尔这头野兽

议和罢兵

从康熙开始，清廷与准噶尔的矛盾就从来没有停歇过。

康熙收服了一代枭雄噶尔丹。

雍正与噶尔丹策零打得难解难分。

到了乾隆头上，准噶尔仍然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雍正十一年后，噶尔丹策零感觉耗不起，便向雍正示好，主动释放清军俘虏，希望大家能够握手议和，追求双赢机制。

对于清政府来说，连年对准噶尔用兵，军费开支早已让财政捉襟见肘，也耗不起。从康熙五十六年到雍正十一年，清廷在军费上的开支高达七千多万两白银，当然这些开支远远比不上乾隆朝的军费开支。军费如此之高，是很难达到盛世的，所以，停止用兵也是雍正的心愿。

雍正让群臣商议后，决定接受议和策略。为了表示诚意，雍正下令驻扎在科布多的清军撤到罕瘦尔，一个月后，雍正派遣使者前往准噶尔。噶尔丹策零盛情招待清廷使者，出城十几里迎接。

尽管双方都很热情，礼仪也很周到，但是谈判之路却非常曲折。清廷使者傅鼐提议准噶尔和喀尔喀以阿尔泰山为界，噶尔丹策零对此不能同意，坚持要以杭爱山为界。对此，傅鼐果断地表示拒绝。谈判一再中断，直到雍正驾崩，双方都没有达成共识。

乾隆即位之后，在边界问题上丝毫没有让步，在接见准噶尔使者时，乾隆一再强调：“边界问题应当按照皇考的方针办事。”

乾隆的强硬姿态让噶尔丹策零非常愤怒，召集各大台吉开会。会议中，只有少数人支持按照清廷的要求划分疆界，大多数人都对清廷表示不满。

乾隆三年秋天，双方再次举行谈判，然而都是互不相让，结果谈判失败。十二月，噶尔丹策零作出了一些让步，放弃阿尔泰山以南地区，提出新的定界方法，以阿尔泰山为界，准噶尔部落在山北游牧，喀尔喀在山南游牧。同时，准噶尔部享有特权：每四年，可以在北京和肃州进行一次贸易。

一纸合约换来了二十年的和平，合约的签订对双方都有好处，兵戈平息，国库充实，百姓安宁。这份合约也为乾隆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和平基础，没有稳定的国内环境，很难想象会出现盛世。

准噶尔内乱

乾隆十年九月，噶尔丹策零病死，对于准噶尔部落来说，这是内乱的征兆。

噶尔丹策零死后，他的儿子们继承准噶尔部落的“优良传统”，很快就火拼起来。准噶尔部落不久就陷入了混乱之中。

噶尔丹策零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是喇嘛达尔扎，次子是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幼子是策妄达什，女儿是乌兰巴雅尔。

乾隆十一年，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才十二岁，但是他母亲的身份尊贵，得以继承汗位。可惜这个小朋友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大汗，史书说他昏庸无能残暴嗜杀，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就能把这些滔天的罪名给揽上，真是了不起。姐姐乌兰巴雅尔总是劝他不要胡闹，他不仅不听，还把姐姐和姐夫囚禁起来。

这么胡闹的小朋友如果放到中原来，凭着三纲五常的束缚，或许还能统治一段时间，但准噶尔都是如狼似虎的人，哪里容许他恣意妄为。

小朋友也知道，对自己汗位威胁最大的是哥哥喇嘛达尔扎。乾隆十五年夏天，小朋友想借着打猎的机会杀掉哥哥，结果，阴谋败露，不仅没有杀掉哥哥，反而被哥哥先发制人。喇嘛达尔扎挖出弟弟的双眼，将他囚禁在阿克苏，然后顺理成章地登上汗位。

没想到，喇嘛达尔扎这个汗位也坐不安稳，虽然他是长子，但身份低，是庶出，所以很多人不服。许多台吉想谋立幼子策妄达什，被喇嘛达尔扎识破，将他们的阴谋粉碎。就这样，幼子被杀死，噶尔丹策零的三个儿子只剩下长子喇嘛达尔扎。

阿睦尔撒纳和班珠尔逃到达瓦齐那里，达瓦齐是巴图尔珲台吉的后代，大策凌敦多布的孙子，在额尔齐斯萨拉太这块地方游牧，这地方很险要，他们人口又多。最让人担忧的是，根据达瓦齐的说法，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可以优先继承汗位。所以，喇嘛达尔扎对达瓦齐非常警惕。

一日不除掉达瓦齐，喇嘛达尔扎就睡不安稳。他打算派人去召达瓦齐商议事情，然后借口把他杀掉。达瓦齐也不是傻子，果断地拒绝了他。没办法，喇嘛达尔扎只好派兵擒拿达瓦齐。达瓦齐见对方赶尽杀绝，决定投靠清廷。

乾隆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达瓦齐率领五千人往北京方向赶去。

沿途不断受到追兵的袭击，达瓦齐在通哈尔垓击败了追兵，但是仍没有甩掉追兵。随后，在纳林布鲁尔河和阿尔泰山一带，又遭遇上万追兵的拦截，幸好阿尔泰山道路狭窄，达瓦齐逃了出去，跑到了哈萨克。

但是，达瓦齐的家属和部众很多都被喇嘛达尔扎抓住了。不久，喇嘛达尔扎又派出三万人马前去擒拿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达瓦齐等人又仓皇出逃，来到新疆塔城，收集部众千余人，昼夜前行，在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突围进入伊犁，居然偷袭成功，杀死喇嘛达尔扎。达瓦齐就此登上了汗位。

准噶尔注定是一个无法平静的部落，达瓦齐即位之后，并没有迎来和平。又有人说达瓦齐昏庸无能，嗜酒好杀，人心尽失。小策凌敦多布的孙子纳莫库基尔噶尔是第一个归降达瓦齐的人，但也是第一个起来反抗的。在宰桑的支持下，他带兵和达瓦齐打了起来。

内乱让准噶尔的许多台吉无所适从，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和车凌孟克商量：“现在准噶尔混乱至此，永无宁日，大家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不如永远归顺天朝吧！”

就这样，他们带着一万多人，离开自己的游牧地，归顺了清廷。

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的联盟是建立在反对共同敌人喇嘛达尔扎的基础上，当共同敌人被消灭后，两人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乾隆十八年，阿睦尔撒纳提出分割准噶尔的要求，等于是要求达瓦齐把准噶尔分一半给自己，达瓦齐当然无法忍受这种要求。此后，达瓦齐屡屡派兵攻打阿睦尔撒纳，可是连连吃败仗。第二年六月，达瓦齐倾巢而动，率领三万八千人，围攻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寡不敌众，不得不率众出逃，直奔北京，就这样，阿睦尔撒纳也投降了清朝。

常年的内战让准噶尔人民饱受创伤，生活困苦至极，乾隆冷眼旁观已久。

乾隆十八年八月，大臣舒赫德上奏，请乾隆派出使者与达瓦齐修好。乾隆听了大骂，说我泱泱天朝虽然不至于乘人之危，但也没有落到要跟一个犯上作乱的部落乞和的地步，达瓦齐本来就是旁支，居然弑主作乱，自立为台吉，大逆不道之辈，跟他们修好是玷污我们。

这年冬，三个车凌已经率领部众来到京城，乾隆一方面让人妥善安置他们，一方面对追击他们的宰桑玛姆特表示极大的愤慨，认为他强行入边，是对清军的藐视。乾隆认为，如果不狠狠地教训一下准噶尔部队，他们强大以后，气焰会更加嚣张，出入更加肆无忌惮。

乾隆十九年，乾隆决定武力征伐准噶尔，五月初四，乾隆对军机

处下了一道命令：“准噶尔部落多年来，一直不安分，不是内乱，就是挑衅我们，还经常与哈萨克为难。现在是灭掉他们的最好时机，如果失去了这个机会，等他们恢复过来，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明年，兵分两路进攻伊犁。”

由此可见，皇上的话是不可信的，之前乾隆还说过堂堂天朝是不会乘人之危的，现在却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乾隆是一个对形势敏感的皇帝，他在这时候提出对准噶尔作战的决策是英明的，也是有底气的。清朝入关之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的经营，政治逐渐稳定，经济渐次繁荣。在顺治的时候，财政还经常出现赤字，到了康熙末年的时候，国库已经有八百万两银的盈余。到雍正的时候，已经有六千万两的余银。作战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了，再加上准噶尔部落陆续有归降的人马，征讨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些人，他们熟悉地形，了解准部的作战风格，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缺。

用兵准噶尔这件事，乾隆没有让汉族大臣参与讨论，即便是满族大臣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只有大学士傅恒一人赞同用兵。傅恒跟乾隆的关系非同一般，是乾隆皇后的弟弟。

雍正九年清军惨败，让这些人仍然谈虎色变，不愿深入敌境。这些人的意见丝毫不能左右乾隆的想法，对乾隆来说，进攻准噶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乾隆十九年六月，陕甘总督永常提出“裹粮剿匪”的建议，让清军带足六个月的粮食，保证剿匪成功。这本来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却受到了乾隆的批评，乾隆说，以前岳钟琪就是这么办的，这是绿旗（汉军）遗留下来的陋习，本来就不是一个好办法，况且这次情况跟以前更不同，现在准噶尔内乱，人心不一，我们趁机攻取应当用轻骑灭掉他们，如果携带数百万斤的粮食，连照看粮食精力都不够，怎么可能攻取敌人。和蒙古交战，应当利用蒙古人的机动战术，士兵只能随身携带少量的干粮，主要的粮食从敌人那里获取。

乾隆的看法表面上有道理，但他没有考虑到从敌人那里获取粮食是无法保证的，但军队又必须要粮草，以无法保证的东西作为行军的支持显然有很大的风险。

乾隆计划在二十年秋向伊犁进军。这时，阿睦尔撒纳建议：“秋季，我军固然马肥，敌军也是如此。不如就在春天进攻，趁他们没准备好，一战擒获，不留遗患。”玛姆特也赞同这个意见，乾隆觉得有道理，便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决定两路大军在二月出发。

讨伐准噶尔

乾隆十九年五月，乾隆命令军机大臣开始准备。十二月，五万大军已经纠集，整装待发。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副将军，从乌里雅苏台出发，途经阿尔泰山，与西路军会师伊犁。

乾隆二十年二月十二日，阿睦尔撒纳率领六千哨兵，从乌里雅苏台出发。八天后，班第率领三千察哈尔士兵出发。二十五日，前准噶尔将军萨喇尔率领六千哨兵从巴里坤出发，三月八日，永常率领大军出发。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都是准噶尔部落里的大人物，乾隆故意让他们做先锋，用意深远，想利用他们的号召力让更多的准噶尔人归降。之前，就有人奏请派出更多的清军，乾隆不同意，坚持要“以夷制夷”。

班第和阿睦尔撒纳在西喇托辉会合后，继续向额米尔进军。四月中旬，两路清军都到达博罗塔拉河地区。班第侦察到达瓦齐前往察卜齐雅，不等两路军会合，便率领轻骑追赶。二十七日，达瓦齐退到格登山。班第和阿睦尔撒纳、萨喇尔商议，决定两路大军同时进攻。清军还没有到达伊犁，许多准噶尔部队望风而降。清军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伊犁。

五月，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率领清军渡过伊犁河，向格登山进发。达瓦齐率领上万人，背靠山崖，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可惜，此时达瓦齐早已人心尽失，军容不整，马匹疲惫，指挥起来非常吃力。

五月十四日，清军抵达格登山。当天晚上，阿睦尔撒纳派遣勇士阿玉锡率领二十二名士兵去偷袭敌营。阿玉锡直扑达瓦齐大营，准噶尔部队突然遭袭，惊慌失措，纷纷逃窜。达瓦齐梦中惊醒，不知虚实，率领两千人一路狂奔。光是这一晚上，就有四千多人投降。

达瓦齐翻越天山一路南逃，清军一面追击，一面对沿途的人民发出檄文，要他们协助捉拿达瓦齐。达瓦齐逃到乌什后，只剩下一百名骑兵，乌什维吾尔族的首领霍集斯是达瓦齐的好友。对霍集斯来说，朋友是可以出卖的，清廷是万万不能得罪的。他假装好酒好肉招待达瓦齐，等把达瓦齐灌醉后，便命人将他绑起来，献给清军。

至此，准噶尔之乱平定。

胜利后，乾隆召回远征军，留下五百士兵镇守伊犁。阿睦尔撒纳由于作战勇敢，被封为亲王，享受双倍俸禄，又称为“双亲王”。班第、萨喇尔封为一等公，永常因为筹办军需时没有遵从圣旨，故没有封赏。达瓦齐被押送北京后，乾隆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封他为亲

王，给予优厚的待遇。

风波再起

准噶尔是非常好战、非常有活力的一个部落，也是一个永远无法消停的部落。

乾隆很清楚，准噶尔一旦强大而统一，对清廷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对乾隆来说，治理准噶尔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分而治之。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乾隆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噶尔臧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四个汗的地位是平等的，仿效喀尔喀部落设盟旗，盟旗由四汗共同掌管。换句话说，乾隆想要四汗互相制约，不使一方坐大。

应该说，乾隆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他早已看出阿睦尔撒纳不是等闲之辈，给他双倍工资他还不满意。阿睦尔撒纳从来就没有真心归附清廷，他只不过是借助清廷的力量消灭自己的敌人。达瓦齐被灭之后，阿睦尔撒纳的野心逐渐显现出来。

早在进攻达瓦齐的时候，阿睦尔撒纳的野心就有所显露。进军伊犁前，他奏请乾隆赏给他一个印文，以便招降辉特部。乾隆当时就感觉这个人想称霸一方。后来，到了塔本集赛之后，他居然停滞不前，在这里逗留很多天，借口查办人口，暗中将自己的人马迁移到博罗塔拉，以便占有伊犁的牲畜财物。

由于在战场中阿睦尔撒纳表现很好，骄气也一天比一天重，他变得越来越专权独断，不断玩弄手段，制造舆论想当四台吉的领袖。阿睦尔撒纳扬言：“我们跟喀尔喀不同，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的领导，恐怕人心不齐，容易出乱子。”

阿睦尔撒纳非常希望乾隆能收回成命，立自己为四部总汗。乾隆当然不能同意。

早在任命阿睦尔撒纳为先锋时，乾隆就对他不放心，让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做他的副将，以便监视他。如果阿睦尔撒纳有反叛的迹象，立刻收取他的将军印。乾隆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班第、萨喇尔、鄂容安联名上奏，认为阿睦尔撒纳不法之处甚多，可以确定他想将准噶尔据为己有。

乾隆得到这个消息后，让班第等人先发制人，趁阿睦尔撒纳不备，立即擒拿，就地正法。班第却以清兵很少为由，不敢贸然行动。

七月十日，阿睦尔撒纳启程前往热河行宫觐见乾隆。他心里打定主意，借此拖延时间，把家人转移走。根据俄国的史料记载，阿睦尔撒纳截获了乾隆给将军们的“书信”，内容无非是限制和监视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本想让乾隆同意他当准噶尔首领，看到这些信后他知道这个想法不可能实现了，于是才下定决心叛逃。

逃跑是不能走正路的，阿睦尔撒纳很懂得这个道理，于是绕道额尔齐斯，沿途抢掠。乾隆正在木兰秋狝的时候，忽然得知阿睦尔撒纳叛逃的消息。不久，乾隆又得知阿睦尔撒纳准备攻打伊犁，于是任永常为定西将军，锐意剿匪。

阿睦尔撒纳回到准噶尔后，极力煽动各个台吉叛乱。定北将军班第和参将大臣鄂容安率军从伊犁撤退时，被叛乱的厄鲁特部落围住截杀，班第拼死力战，最后自尽。鄂容安本是鄂尔泰的儿子，一介书生，当此情景也只好选择自杀，可惜他迟迟下不了手，只好闭上眼睛，让仆人动手。萨喇尔逃到崆吉斯河，最后还是被厄鲁特俘获。

一战定江山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乾隆在前往祭奠孔庙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天大的喜讯，阿睦尔撒纳被策凌擒获了。可惜，乾隆进入山东境内，才知道这竟然是个误报。其实，这只不过是阿睦尔撒纳的缓兵之计。空欢喜一场，乾隆很生气，下令将策凌和王保等人治罪，任命达勒当阿和哈大哈分兵擒拿阿睦尔撒纳。

这一年，喀尔喀的和托辉郡王青滚杂卜也发生了叛乱，哈大哈率领的北路军只好后撤。由此，清军后方的补给线被切断，前线清军的命运岌岌可危。喀尔喀大有“崩溃”之势。准噶尔全境已陷入混乱之中，许多台吉纷纷作乱。这些台吉中，最让乾隆憎恨的是厄鲁特部落，这个部落生性贪婪残暴，反复无常，忽叛忽降。乾隆要求清军不惜一切代价追杀此部，所谓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结果，还没有叛逃迹象的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及其下属首先成了清军刀下之鬼。

沙克都尔曼济部下有七八千人，本来已经奉旨暂住西路军军营巴里坤，打算明年再迁回故地。没想到准噶尔和喀尔喀叛乱成风后，乾隆已是草木皆兵，密示西路军大将雅尔哈善，如果发现沙克都尔曼济有可疑的地方，可以乘其不备，全部捕杀。

十二月十六日，这天大雪纷飞，气候寒冷。雅尔哈善不知道从哪里获知沙克都尔曼济跟已经叛乱的扎那噶尔布通气的消息，雅尔哈善认为，沙克都尔曼济叛乱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遂于当天晚上带兵来到沙克都尔曼济的牧场，后者对他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好酒好肉招待雅尔哈善等人。没想到，雅尔哈善吃饱喝足以后，半夜起来一刀把沙克都尔曼济解决了，还杀了他部落里四千人，余者全部俘虏。

乾隆认为雅尔哈善办得好，授予他内大臣头衔，给他封一等伯。但是根据礼亲王昭梈的记载，事情真相却不是这样的，雅尔哈善之所以捕杀沙克都尔曼，一方面是为了邀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缺饷，立功后可以向乾隆伸手要钱。据昭梈记载，雅尔哈善回来后，祭奠祖庙时说了这样的话：“李广因为杀降没有封侯，最后失道自刎，现在我的罪过比李广还要重，反被封为一等伯，连祖宗都不吃我的贡品！”

后来，雅尔哈善果然因为贻误战机被乾隆杀了，正印了那句话，杀降不祥。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乾隆任命亲王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车布登扎布为左副将军，兆惠为右副将军。在出征前，乾隆下了一道非常阴险的命令，凡是厄鲁特投诚的人，立即将他们头领解送到京师，其他人等也要迁到内地。乾隆说，等我军到达了巴里坤，就可以对这些投降的人分别处理，所谓分别处理，无非就是杀掉成年男子，然后将女人和小孩赏给有功的官兵。

厄鲁特祸不单行，清军还没有来，他们就自相残杀，再加上瘟疫流行，死伤一大片。所以清军来了以后，厄鲁特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清军很快就收复了伊犁等地。

随后，清军进击准噶尔，俘获了阿睦尔撒纳的侄子达什车凌。阿睦尔撒纳虽然当上了准噶尔的大台吉，但是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他显得不堪一击，连抵抗的意志都没有，策马奔腾，带着二十人仓皇逃向哈萨克。清军深入哈萨克境内，搜捕祸首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迅速从一个叛徒首领沦为逃犯，地位一落千丈，他还以为自己在哈萨克可以混得开。没想到哈萨克大汗阿布赉表面欢迎他，说希望咱哥俩明天好好喝一顿，暗地里让人把阿睦尔撒纳的马匹放走，准备擒拿他。幸好，阿睦尔撒纳警觉，及时带着家人逃走。

阿睦尔撒纳一路逃到俄国，请求加入俄国国籍，享受政治保护待遇。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外交纠纷，乾隆引用《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要求俄方归还犯人。就在两国关系骤然紧张之时，忽然传来阿睦尔撒纳病逝的消息。

乾隆派喀尔喀亲王桑斋多尔济去恰克图验尸，要求他把阿睦尔撒

纳的尸体运回来。桑斋多尔济派人到恰克图验尸，发现阿睦尔撒纳的尸体保存完好，确认就是他。但是俄国却拒绝归还他的尸体，乾隆认为，既然已验明尸体，不运回也罢。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乾隆正式宣布准噶尔内乱已平定。如果我们给乾隆的这两次武功打分的话，我觉得应该有八分，及格了。平定准噶尔，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奠定了中国辽阔的版图，这本是史无前例的好事，为什么只打八分，而不是十分呢？因为在这次征讨过程中，杀了太多的人，其中有很多是无辜的人民，也有一些是已经投降的人。

厄鲁特部落在强盛时有六十万的人口，经过准噶尔之战，病死的人有十分之三，逃入俄国和哈萨克的有十分之一，被清军杀死的有十分之五，最后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一。

一统回疆

准噶尔的叛乱刚刚平定，回部又发生内乱。乾隆有的忙了。

回部是居住在新疆天山南部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在当时，伊斯兰教又被称为回教，所以清朝称当地人为回部。回部与准噶尔邻近，长期受其奴役，准噶尔为了控制回部，将回部首领都弄到伊犁作人质。马罕木特是回部一个深得人心的首领，噶尔丹策零为了控制回部，将他软禁在伊犁。马罕木特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大小和卓兄弟也被噶尔丹策零圈禁起来。

和卓在伊斯兰语里是“圣裔”的意思，也就是穆罕默德的后代，可惜在强大的武力面前，祖宗穆罕默德也帮不了他们。准噶尔对回部的欺压是非常没有人性的，回部种植的东西，不论是谷麦还是蔬菜，到了收割季节，先一分为二，一半归准噶尔，一半归回部，然后再从回民的另一半里征收十分之一。准噶尔派到回部的头目，所到之处，一定要用酒肉和妇女好好款待。

清军将回部民众从准噶尔的奴役中解救出来，长期受囚禁的大小和卓兄弟也获得了自由。乾隆对这两兄弟深表同情，想借助他们的威望和宗教影响力来安定回部民众，命大和卓管理叶尔羌回部，小和卓管理伊犁回教。

可惜，小和卓不但不知感恩图报，反而得寸进尺，想摆脱清廷，自立为王。小和卓不仅想自己单干，还怂恿大和卓跟自己一起摆脱清廷。乾隆二十二年，乾隆拿出少有的好脾气，派使者前来招抚这对反

骨兄弟，然而这兄弟俩是铁了心要反，居然把乾隆的使者给干掉了。

乾隆气得吹胡子瞪眼，怒道：“决不能任由使臣被杀，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乾隆任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征讨大小和卓。说实话，乾隆实在低估了回部的力量，乾隆心想，不可一世的准噶尔都被我制服，昔日准噶尔的奴才居然敢跟我叫板，这不是找死也是找抽。雅尔哈善原本是文官出身，因为屠杀沙克都尔曼济受到乾隆赏识，其实乾隆也清楚，这个人并不擅长用兵，但他武断地认为，对付回部这些乌合之众，像雅尔哈善这样的人已经足够了，如果用像阿桂、兆惠这样的一流将军，反而是杀鸡用牛刀。

雅尔哈善率领一万八旗兵和绿营兵，一路打到回部北方重镇库车城下，将城池包围。然后，雅尔哈善作出诸葛亮羽扇纶巾的样子，整天和人下棋，也不出击，坐等大小和卓自动投诚。部将阿奇木建议他应尽快出击，因为敌人有两条路可以逃遁，但雅尔哈善根本不理睬，自信和卓两兄弟一定会送上门来。

终于有一天，雅尔哈善无法再淡定了，士兵听到城中有驼铃之声，告诉雅尔哈善，敌人可能正准备逃走。雅尔哈善仍然不相信，但是心里已经在打鼓，没法像以前那样羽扇纶巾悠闲下棋了。

两和卓在夜晚时分，从西门潜走，沿着北山口逃之夭夭。把守西门的顺德纳听到士兵报告认为夜晚不适合发兵，到了第二天白天才派兵去追，刻舟求剑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如果这时能追到敌人那就怪了。事后，雅尔哈善把责任全都推到顺德纳身上。乾隆将顺德纳革职，同时责备雅尔哈善也有责任，让他尽快攻下库车城，并追击大小和卓。

库车城依山而建，城坚墙厚，易守难攻。提督马得胜带着绿营兵挖地道，可惜过于急躁，被敌人发现，结果用干柴堵住地道，将六百多清军活活烧死。雅尔哈善再次把责任全部推给下属马得胜，写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雅尔哈善是一个推卸责任的高手，一有问题就让人来扛。乾隆让这样的人做主帅确属用人失当。

库车之战从五月打到八月，没有半点成效。雅尔哈善再次上奏弹劾他人，把战事进展不顺的责任全都往别人身上推。收到雅尔哈善的奏章，乾隆终于发作，痛斥雅尔哈善作为主帅，不但没有引咎自责，反而往别人身上泼脏水，完全没有主帅的样子。随后，乾隆让兆惠去军中，将雅尔哈善押到京城，最后雅尔哈善在京城被正法，正应了当初杀降不祥的预言。

兆惠再次担任了主帅，可惜兆惠还没到库车，回人已经放弃了库车城，退到萨克苏，等待他们的是一座空城。兆惠又挺军到萨克苏，回部许多小头目纷纷请降。听到回部许多部落受抚的消息，乾隆以为征讨回部将要马到功成，不需继续派遣援兵。兆惠带领四千兵士进攻萨克苏，没想到后面援兵中断，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兆惠在黑水营被数倍于己方的回兵围困三个月，与回军五次激战，双方都伤亡惨重，兆惠也几欲丧命。乾隆得知前方战况，紧急调拨援兵，终于，清军两路夹击，击败了大小和卓。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兆惠和福德率领大军对大小和卓的大本营叶尔羌和喀什噶尔进剿。黑水营大败之后，大小和卓已经失去了作战的信心。而此时回部的人民早已对他们的统治不满，不想跟着他们一起沉沦。大小和卓于是胁迫几千回人跟自己一起逃亡，在逃亡途中受到清军无情的追击，大小和卓在逃亡的途中被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擒获。素勒坦沙割下两人首级献给清廷，至此回部叛乱平定。

如果给乾隆这次武功评分的话，可以给个五分。小小的回部居然耗费两年才搞定，跟乾隆用人失误有很大关系。后来任命兆惠是对的，但中途停止增援又犯了大错，差点导致兆惠全军覆没。之所以给五分，是因为乾隆虽然犯了一系列错误，但毕竟知错能改。

艰难搞定缅甸

从元朝开始，缅甸就是中国的附属国。忽必烈曾经三次讨伐缅甸，迫使缅甸称臣纳贡。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缅甸设立宣慰使司，确立了缅甸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万历年间，缅甸见中国由盛转衰，开始肆意掠夺边境，明朝出征讨伐。明末清初，中原动荡，缅甸伺机吞并中国洞吾、古刺、木疏、木邦等部族。

清朝建立后，中国和缅甸的关系并不密切，直到乾隆十六年，才确立了朝贡关系。可惜，好景不长，缅甸发生内乱，新国王不仅拒绝向中国纳贡称臣，还时常劫掠云南普洱一带。

乾隆三十年，缅甸军队像黄蜂一样来到云南九龙江，疯狂扫荡财物牲畜。云贵总督刘藻派兵作战，可惜指挥不当，加上军队疏于战事，吃了败仗。刘藻因此被革职，乾隆还骂得他抬不起头来，自尊心很强的刘藻最后自杀谢罪。

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乾隆任命杨文乾的儿子杨佩之担任云贵总督。杨佩之赴任后，缅甸那边正在发生瘴病，缅军陆续从云南撤退。

杨佩之正好收复失地，其实别人人都走了，他只要派人过去踩在那片土地上就算是收复。杨佩之似乎是一个运气非常好的人，尽管捡了大便宜，在乾隆眼里也是立功。

乾隆大大夸奖了他一番，杨佩之无形中膨胀起来，以至于认为缅甸这个弹丸小国打起来一定很容易，干脆主动出击，将他们国王抓起来，这可是盖世功劳啊！当然，杨佩之也考虑到刘藻的前车之鉴，担心军事失利后晚节不保，毕竟杨佩之当时已经七十岁。但是杨佩之身边的幕僚和将士们比杨佩之更激动，他们特别想立功，极力怂恿杨佩之，他们说自从杨公来了之后，许多土司纷纷归附，缅甸人不过一群乌合之众，杨公一发威，这些人还不抱头鼠窜。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杨佩之上疏乾隆，请求发兵出征缅甸。乾隆认为杨佩之老成持重，做事一定是胸有成竹的，便回复说：“公办事，朕放心。”但也建议他，凡事慢慢来，不可操之过急。

杨佩之的部将们早已摩拳擦掌已久，跃跃欲试，纷纷想立功，领一笔丰厚的奖金，下辈子就不用愁了，或是拿个世职，子孙后代就有了铁饭碗。心思不可谓不好，可惜急功近利往往坏事。

乾隆并没有明确批准杨佩之出征缅甸，但是大家看到乾隆的谕旨，以为是让杨佩之便宜行事。许多将领急不可耐地孤军深入敌境，结果大家发现缅甸并不是软柿子，清军作战接连失利。杨佩之非常惊恐，他怕乾隆降罪，竟然谎报大捷。杨佩之可能忘了清朝有密折制度，明朝皇帝好糊弄，清朝皇帝自从雍正以后就很难糊弄了。乾隆很快得知实情，将杨佩之革职，押送到京城，最后赐死。

乾隆三十二年，乾隆任命大将明瑞为云贵总督。这次，乾隆明确告诉明瑞，主动征讨缅甸，“一定要挽回面子，什么都可以损失，面子一定不能损失”。乾隆是最爱面子的一个皇帝，明瑞的责任是为皇帝挽回面子，是的，一场因为面子而引发的侵略战争。缅甸人如果知道真实原因，一定叫苦连天，早知道这样，我们给你面子就得了，何必来真的。

明瑞是块打仗的料，他刚到缅甸，就一展犀利风采，接连打败缅甸军队。最后，一直打到缅甸首都阿瓦附近。也许是因为太犀利了，他似乎忽视了粮草问题，孤军深入后，补给不够，结果反被缅甸军队围了起来。另外一个将领额勒登额距离明瑞两百里，看到明瑞被包围，居然不去营救，因为他跟明瑞的关系不太好。

陷入绝境后，明瑞没有慌张，他带领少数人殿后，掩护大军突围。突围成功后，明瑞居然主动自尽。乾隆闻讯，非常震惊，立刻杀掉额勒登额等人，祭奠明瑞。

乾隆三十三年，乾隆派大学士傅恒为征讨缅甸统帅，开始了第四次征缅之旅。傅恒到了缅甸之后，虽然打了几场胜仗，但是不久士兵们染上瘴疠，死伤大半。傅恒本人也染病，卧床不起。这时，阿桂立了大功，为乾隆挽回面子，他截断缅甸粮道，缅甸只好派人求和。乾隆也耗不起，对方求和其实也是给自己台阶下。双方达成协议：缅甸按时给清廷纳贡，清军归还攻占缅甸的领土。

就这样，历时四年，用兵几十万，耗银一千三百万两的缅甸之战结束。如果要给这次武功打分的话，最多是一分。这是一场典型吃力没讨到好处的战争，耗费巨资不说，损伤大量优秀的将士，国威受损，最后貌似缅甸臣服了，要定期纳贡，但估计纳贡的收入比起付出的代价实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只能给一分，这一分没其他的意义，就是总算挽回了点面子。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实际利益固然重要，但面子也不能不要。

弹压林爽文起义

林爽文起义发生在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

林爽文原是福建省漳州府平和县人，乾隆三十八年跟随父亲移居到台湾。四十九年三月，林爽文加入天地会。由于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很快就成为天地会的领袖。林爽文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大哥，在他的领导下，天地会日渐强大。

天地会的发展，引起了台湾官府的注意，随即官府展开搜捕。林爽文没有坐以待毙，他纠集了两百人，推举年长的刘升为盟主，揭竿起义。就这么两百人，居然一举攻破清军的大墩营地和彰化府，全歼大墩清军，杀掉彰化知府、同知等官员。

消息传到京城，乾隆惊骇不已。当然，乾隆不是被叛军的气势震动，而是惊叹这些“暴民”的胆子。在乾隆眼里，林爽文之流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可以轻松弹压下去。乾隆指示福建水师提督黄士简和台湾总兵柴大纪全力进剿，一个不留。

攻破彰化县之后，刘升无法服众，大家推举林爽文为盟主兼大元帅。林爽文等人显然不是乌合之众，他们甚至连年号都想好了——顺天，摆明了要跟乾隆争夺天子之位。

林爽文随后将义军一分为二，一路由王作带领，主攻淡水；一路由林爽文亲自带领，主攻诸罗。柴大纪派兵堵截，可惜挡不住义军。台湾岛的驻军都是从内地调拨，三年一换，所以这些人特别腐败，只

有三年，大家当然要狠狠捞一把，正因为官兵极度腐败，所以纪律松弛，战斗力一弱再弱。

不久，林爽文的好友庄大田变卖家产，也拉起反清大旗，自称洪号辅国大元帅。两路大军就像两条长龙，在台湾这个小岛上翻江倒海，台湾的官兵们一筹莫展。黄士简、任承恩等人登陆台湾岛后，兵分多路对义军进行追剿。没想到，官兵居然屡遭重创。三个月后，福建水陆两路提督黄士简和任承恩都被革职，乾隆重又派常青赴台征剿。

没想到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最后发展到十万人众，十万人将清军分割包围，打得清军招架不住。随后，除了府城还在官府手中，台湾全境都被义军占领。据说在城墙上面看到下面黑压压的义军，常青吓得手脚发抖，泪水横流。常青请求增兵，不久又给和珅写密信，请他高抬贵手，想办法把自己调离台湾。

总兵柴大纪的表现还可以，他率领清军拼死抵抗，义军无法打败他，反而损失惨重。

看到台湾局势不断恶化，乾隆决定换主帅，这次他选择了年轻的福康安，让猛将海兰察协同福康安剿匪。乾隆选择年轻的福康安是需要眼光的，福康安果然不负所望，到了台湾后，对起义军分化瓦解，最终以优势兵力和过硬的指挥才能打得起义军节节败退。局势迅速扭转，林爽文再也撑不住了，义军崩溃之后，林爽文选择了逃亡。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林爽文被俘，享受清廷最高待遇的惩罚，凌迟处死，枭首示众。没多久，林爽文的好友庄大田也被福康安生擒，在台湾被处死。

林爽文起义就这么轰轰烈烈了一段时间，然后猝然落幕，沉入历史的黑洞。对乾隆这次的武功我们真不好打分，首先林爽文起义带有反抗官府腐败特征，另一方面他又确实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他一门心思当皇帝，也看不出是社会的进步。

出兵安南

明朝的时候，统治安南的是后黎王朝，明朝中后期开始腐朽之时，后黎王朝也越来越腐败。乾隆三十年以后，阮文岳、阮文惠和阮文吕三兄弟在西山崛起，这三兄弟本是地方上的豪强，但他们抓住机会，趁着后黎王朝腐败，国内政局混乱之际，推翻后黎王朝，统一安南。

乾隆五十二年，这三兄弟借口清君侧除掉权臣郑氏，攻入后黎王朝都城黎城。安南国王和大臣们纷纷逃亡，许多人跑到广西避难，请求中国政府出手援助。

本来这是别人的家事，但安南自古是中国的附属国，历来安南新君即位，都需要清政府批准，给他们一个文件，证明新政府是合法的。安南这次权力更迭，事先没有给乾隆打招呼，最为失策。

乾隆对大臣们说：“安南臣服本朝，最为恭顺，现在被强臣篡夺，安南君臣向我们呼救，如果我们置之不理，就没法让那些臣服于我们的小国信服了。所以，我们应当纠集强势兵力，声讨阮氏逆贼。”

当时，朝中重臣阿桂表示反对，阿桂的意思是这是安南的家事，如果我们因此劳师动众就太不值得了。其实，阿桂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安南不管是谁执政，都会向中国朝贡的。如果他们不肯臣服，再打也不迟。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乾隆让两广总督孙士毅召集军队调拨粮饷，准备大举进攻安南，驱逐阮氏政权。十月底，孙士毅带领万人军队，取道镇南关，进入安南境内。二十多天后，云南提督乌大经率军进入安南境内。

刚开始的时候，清军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还得感谢清军庞大的宣传攻势，进入安南境内后，清军大量散发“讨阮扶黎”的传单，当地的兵民纷纷配合，支持清军。十一月十三日，清军渡过寿昌江，大败阮文惠的军队；四天后，渡过市球江；六天后，渡过富良江。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阮文惠只好放弃黎城，向南逃去。十一月二十日，孙士毅率军进入黎城。孙士毅遵照乾隆旨意，册封黎维祁为国王。

乾隆对战事的结果很满意，封孙士毅为一等公，赏戴红宝石帽顶，将领许世亨封为一等子爵。在这种情况下，阮文惠向清廷求和，请求清廷给自己一个臣服朝贡的机会，但遭到拒绝。此时，清廷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中，然而，危机已悄悄探出头，很快就蔓延开来。

战术上的胜利并不能补救战略上的失败。远征安南，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补给困难，后勤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很难继续讨伐阮文惠。当时清军的补给全靠内地供应，安南那边并不能提供多少粮草。攻占黎城后，清军的粮草很快就陷入了困境，沿途运粮的差夫虽然有四五万人，但补给线长达两千里，中途还有安南叛军的骚扰，清政府已经困于应付了。

清军虽然占领了不少土地，却随时有可能失去这些地方。

黎维祁这个人也非常不争气，复位以后，他不是卧薪尝胆重新振作，反而仗着清廷撑腰，对政敌进行疯狂报复，不惜代价铲除异己，从而让自己的人气跌到谷底。后黎王朝统治腐败，早已失去人心，安南正经历像中国历史中周期循环一样，一个新生的朝代取代腐败的王朝。乾隆出兵，打破了安南历史的新陈代谢过程，也给自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为一个昏君出兵值不值得呢？乾隆不止一次问自己这个问题。

孙士毅待在黎城的日子，由于粮草短缺，一再向安南人民施压催粮，结果引起了安南人民的反感，他们搞不懂这些人是来拯救自己还是欺负自己。安南人民不交，孙士毅就纵容手下抢掠。孙士毅这些措施无疑给自己抹上了非正义色彩，结果让阮文惠捞到政治资本，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阮文惠。

阮文惠在彬山称帝，招兵买马，准备大反攻。在反攻之前，狡猾的阮文惠假意向孙士毅投降。孙士毅未必相信，但他坚信阮文惠已是强弩之末，败亡只是迟早的事。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二，就在清军欢度新春佳节之时，安南国王黎维祁也抱着幼子到清军大营来庆贺，黎维祁还带来了一个消息，说阮文惠会报复，随时准备反扑。说完，黎维祁请求孙士毅把自己父子送到中国境内。

孙士毅非常鄙视黎维祁，但还是很客气地把他送回中国境内。随后，孙士毅部署好防御计划。第二天，总兵张朝龙带领三千精兵和阮文惠激战，由于兵力悬殊，虽然清军战斗顽强，但张朝龙还是被打得找不着北。随后，大将许世亨前来支援张朝龙，双方再次激战，整个战斗只能用“惨烈”二字来形容，双方的伤亡都非常惨重。不久，驻扎在富良江南岸的总兵尚维昇和参将王宣也赶过来支援。

孙士毅坐守大营，四面都是请求他支援的呼声，而孙士毅手下不过一千五百人，应付不过来，居然带着几百人渡河逃走。逃走还不算，孙士毅担心阮文惠的追兵过来，居然把浮桥砍断。结果，许多激战中的清兵突围出来，来到浮桥边，发现浮桥断了，悲愤异常，只好再杀回黎城，导致伤亡惨重。这一仗，清朝阵亡和失踪的士兵达到五千人，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李化龙，参将杨兴龙、王宣等人全部战死。

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误，孙士毅说自己曾再三劝阻官兵们撤退，结果他们不听。乾隆远在北京，不知真实情况，听信了孙士毅的辩解，只是将他调离两广总督的职位，剥夺之前对他的赏赐，让福康安接替他。

阮文惠重创清军，又击毙清廷的大将，自知捅了个大娄子，再加上刚建立新政权，人心不服。他也考虑如何取得清廷的谅解，于是几次派人去清廷请求臣服朝贡，让乾隆给他一个证件，成为安南名正言顺的新君。

此时，乾隆非常尴尬，早知今天何必当初，一早就扶持阮氏政权不就啥事都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乾隆决定接受阮文惠的请求，毕竟黎氏政权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从一开始，出兵安南就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乾隆虽然同意接受阮文惠的臣服，但示意福康安对阮文惠严厉一点，好让他真心悔罪。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阮文惠派使者到谅山，又担心清廷不准，便派使者先去镇南关试探。乾隆认为阮文惠很没有诚意，如果真心投诚，必须先将清军俘虏送还，并且将杀害清廷大员的人绑起来，送到福康安那里。

阮文惠立即照办，乾隆才松口，示意福康安和他接触。五月，阮文惠派侄子阮光显进京觐见，并表示一旦国内稳定，一定亲自过来朝觐。乾隆不满，认为阮文惠不亲自来朝觐，不够礼貌，所献贡物不便接受，乾隆要求阮文惠在明年八月进京朝觐，也就是乾隆八十大寿的时候。六月，福康安再次呈递阮文惠的两道表文，乾隆看他的话说得非常恭敬，这才决定封阮文惠为安南国王。

安南国王虽然后来也定期朝贡，但对乾隆这次武功只能打零分，因为这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战争。乾隆没必要干涉安南内政，阮文惠一再请求向清廷称臣，乾隆为了逞能，悍然发动这场劳民伤财破坏两国人民友谊的战争。

反击廓尔喀

廓尔喀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廓尔喀和西藏毗连。

在十三世纪，尼泊尔分裂成许多部落，廓尔喀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廓尔喀部落首领博赤纳刺征服其他部落，统一了尼泊尔，迁都加德满都。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兵击败了尼泊尔的邻国不丹，廓尔喀危机感加重，于是派人到西藏，让六世班禅致书东印度公司调和。

六世班禅帮助廓尔喀，但廓尔喀不知好歹，反而打起了西藏的主

意。

西藏地广人稀，有许多财宝（大多是清朝皇帝赏赐的），廓尔喀觊觎已久。在他们看来，西藏军事力量薄弱，是个理想的猎物。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清廷当时在西藏的驻兵只有五百。在出兵之前，廓尔喀指责西藏卖给他们的食盐中掺有沙子，这个可能是事实。食盐是官家垄断行业，为了追求暴利，官员们有什么干不出来的。

藏民反击说廓尔喀银币里也掺了假，双方展开了骂战。

廓尔喀人骂不过，直接抄起武器，往西藏挺进。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廓尔喀人显然不是什么君子，他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西藏聂拉木等地。驻藏大臣庆麟得知这个消息，极为震惊，震惊过后，赶快向京城报警。报完警后，庆麟就等着清廷的援兵。

乾隆对此高度重视，调遣四川提督和成都将军率兵进剿，同时还派理藩院侍郎巴忠前往西藏，就在清廷大张旗鼓谋划征讨廓尔喀的时候，西藏地方政府却私下里和廓尔喀达成协议，答应每年给廓尔喀三百个元宝。听到元宝，廓尔喀动心了，答应归还占领的地方。就这样，见钱眼开的廓尔喀军队从西藏撤走了。

钦差大臣巴忠来到后，发现情况突然变成了这样，大家都很尴尬，扑空了咋办呢？如果向乾隆如实汇报的话，岂不是要无功而返。所以，巴忠私下里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共同蒙骗乾隆，说是清军击败了廓尔喀军队，还说廓尔喀国王已经臣服，要向清廷进贡，并请求乾隆授予他王爵。

这样的弥天大谎都敢编，不得不佩服巴忠的胆量，他胆子大到都不考虑圆谎的问题。

西藏地方政府虽然用私了的方式让廓尔喀撤军，但也埋下了隐患，每年三百个元宝，对于经济拮据的西藏政府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结果，这成为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的理由。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廓尔喀照例向西藏索要三百个元宝。西藏地方政府说：缓一缓吧，我们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廓尔喀军队荷尔蒙正处于过度分泌状态，你说缓一缓，不仅他们的荷尔蒙不同意，连理智都不同意。廓尔喀国王说：要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次入侵比上次规模更大，占领了班禅额尔德尼的驻地日喀则。驻藏大臣认为保命要紧，带着班禅逃到前藏。他们这一逃，廓尔喀军队大肆洗劫日喀则，将乾隆赏赐给六世班禅的财物一洗而空。

乾隆很生气，让四川总督阿辉和成都将军成德出兵讨伐，可惜这

两人是庸才，久战无功。乾隆只好再让王牌元帅、两广总督福康安出马，同时让猛将海兰察辅助福康安。

福康安身份尊贵，但是一点都不娇嫩，一路跋山涉水，不畏艰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拉萨后，福康安稍作休息，便领兵赶往后藏，在冰天雪地之中和廓尔喀展开激战。廓尔喀在名帅福康安和名将海兰察面前，变成了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五十七年五月，福康安收复了所有失地。接着，福康安乘胜追击，进入尼泊尔境内，打到尼泊尔的都城加德满都下。廓尔喀国王低声下气，请求福康安撤军，说以后不敢造次了。

福康安要求廓尔喀归还从西藏抢走的财物，并释放所有的人质，向清廷臣服，每五年朝贡一次。这是乾隆十全武功中最后一次，这次战争确实打得还不赖，但如果不是有福康安这样的统帅，战争不会这么顺利。可以给这次武功打八分，不过这次武功更多的是福康安的武功，乾隆作为最高领导者，成功的地方在于用人正确。

乾隆“十全武功”累计用兵五十万、耗资一点五亿两白银。虽然“十全武功”有很多让人诟病的地方，但还是奠定了中国辽阔的版图，在乾隆全盛时期，中国版图达到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第七章 乾隆反贪“风暴”

更绝的是甘肃省冒赈的事情爆发，乾隆让李侍尧和阿桂查办此案，用贪官来反贪，乾隆可谓是深谙以毒攻毒之道。李侍尧本身是一个贪官，对于贪官的伎俩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很快就把这个案子办得干净利索，深得乾隆欣赏。正应了那句古老的哲理：“使功不如使过。”

宦海惊魂——大贪官李侍尧逍遥法外之谜

李侍尧案发，和珅审理

乾隆四十五年，清廷发生了一起怪诞的贪污案。这个案子怪就怪在高官李侍尧被人揭发后，经过审理，犯罪证据确凿。刑部三次议定死刑，最终李侍尧却逍遥法外，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官越做越大。更奇的是，那些揭发李侍尧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这个案子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呢？

如果说乾隆纵容贪腐、惩贪不严的话，那不是事实。晚清洋务派学者薛福成评价乾隆是个英明的皇帝，惩贪也非常严，但是越惩治贪污之风越甚。薛福成总结的原因是当时有一种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贪，并不是因为那时人们显得格外贪婪。这种力量，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官场潜规则。

这个李侍尧官职非常高，是云贵总督。李侍尧的家世也非常显赫，祖上是清初的开国功臣李永芳，他的父亲担任过户部尚书。一直以来，李侍尧都很受乾隆的赏识，他是一个办事能力很强的官员。李侍尧的贪心跟能力成正比，担任云贵总督期间他大量收取陋规，聚敛无度。

李侍尧是乾隆一手提拔起来的，先后担任户部尚书、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等要职，乾隆三十八年擢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位极人臣。乾隆经常夸奖李侍尧，说他办事能力在督抚中最为出色，并将他和阿桂并称，认为这两人是国家的栋梁支柱。

李侍尧在担任总督期间，虽然受贿不少，但无人敢告发他，可见其“御下有方”。

然而，在乾隆四十四年年底，李侍尧被人捅了出来。绝的是并不是有人故意要告他，只不过是在闲聊时无意提到。透露出这个秘密的是一个叫海宁的官员，他在跟军机处的朋友聊天时，随口谈到了李侍尧贪污索贿之事。

海宁曾经当了一年的云南粮储道，对上司李侍尧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海宁本人也送过李侍尧两百两黄金作寿礼。海宁并不愿给李侍尧送礼，只是云南的官员都送礼，如果偏偏自己不送，李侍尧会认为这是有心跟自己作对。

当然，海宁所以提到这事，并不是心痛那两百两黄金，也不是要报复李侍尧，他只是聊天时随口说出。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军机大臣和珅知道此事后，找到海宁，详细询问李侍尧贪污之事。海宁知道自己闯祸了，他根本不敢得罪李侍尧，更不敢得罪和珅，没有办法，只好得罪自己，海宁承认自己曾给李侍尧送过两百两黄金，此外一概不知道。

和珅为什么对李侍尧贪污之事这么关心呢？因为和珅跟李侍尧的矛盾很深。本来，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朝中高官，隔那么远，不至于有太多恨啊！可惜，世上的事情往往没有这么简单。李侍尧出身显赫，身为封疆大吏又位高权重，所以很看不起出身一般依靠拍马屁在乾隆面前走红的和珅，所以经常不给和珅面子。譬如，朝鲜使臣就曾说过：“李侍尧年老位高，平时把和珅当儿子一样使唤。”

和珅是一个记恨之人，早已对李侍尧恨得咬牙切齿。逮到这个好机会，他能放过吗？

和珅不仅是想报复李侍尧，他也想借着惩治李侍尧上位。当时和珅虽然受宠，毕竟只是一颗政治新星，官职不过是侍郎，在军机处也不是能拍板的人。

心动不如行动，和珅找到乾隆，将李侍尧贪污的事情和盘托出。得知此事，乾隆有些意外，他没想到自己如此信任的人居然会干出这种事情。乾隆亲自找到海宁问话，海宁是个圆滑的人，他避重就轻，说李侍尧办事非常认真。乾隆打断他：“李侍尧有没有贪污？”海宁只好回答说：“李侍尧对下属要求很严，关于他贪污的流言不是没有，但是微臣真的没有见到任何真凭实据。”

看海宁说话模棱两可，乾隆很生气，让军机大臣福隆安严审此案。在刑法的威逼之下，海宁终于说出了实话，将李侍尧的贪污行径全部如实吐出。根据海宁的说法，李侍尧大概贪了两万六千两白银。

李侍尧认罪

看到海宁的供状后，乾隆任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前往贵州调查李侍尧。在和珅离开京城之前，乾隆下了密旨，让人先将李侍尧暗中监视起来。

李侍尧待在云南，乾隆为什么让他去贵州呢？其实这是乾隆声东击西的策略，防止李侍尧起疑心。

和珅到达昆明后，先对李侍尧的心腹家奴张永受、连国雄等人进行隔离审查，这些家奴的财产远远超过一个家奴应当拥有的家产，和珅询问他们这些钱财从哪来的，他们都无法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和珅的严刑逼供下，他们只好老实交代，这些财产是李侍尧贪污所得，经过他们一手办理，分得的一部分。

家奴们的供词成为李侍尧犯罪的有力证据，接下来，和珅根据海宁的名单，开始审讯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在和珅的威逼之下，这些官员纷纷交代了行贿的情节。原来李侍尧借着为朝廷办理贡品的名义，经常向下属伸手要钱，下属们不敢得罪李侍尧，只能掏钱。

当和珅获得足够的证据后，便正式向李侍尧开刀，李侍尧还想抵赖，但是在强大的人证和物证面前，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了。于是，他供认了下面的受贿事实：迤南道庄肇奎送银两千两，鲁甸通判素尔方阿送银三千两，按察使汪圻送银五千两，临川知府德起送银两千两，东川知府张琬送银四千两……

根据李侍尧的交代，他总共收受白银三万一千两，当然实际数目肯定比这个大得多。

李侍尧认罪后不久，湖南巡抚李湖给乾隆上了一道密折，说自己的下属在湖南捉到了李侍尧的家奴张曜等人，根据张曜的供认，他去年被李侍尧从云南派到北京，帮李侍尧从北京家中送回白银五千二百两、玉器十件，此外，张永受也带回了七千两白银。得到这个线索，乾隆立即派户部尚书英廉审讯李侍尧的管家，最后证明实有其事。

英廉顺着线索追查，发现张永受拥有房产六处、地亩一处，放债四千两；张永受的母亲有住房三十多间，田地四五顷。一个家奴家产就如此之多，至于主人李侍尧贪污多少则可以想象。

调查李侍尧，对乾隆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光因为李侍尧是乾隆的“脊梁”，更因为李侍尧在进贡的时候精益求精。无论如何，李侍尧是一个对主子非常忠心的奴才，贪污也许是事实，但这不改变他“恋主”之心啊！

和珅固然把这个案子干得相当漂亮，但未必符合乾隆的心意。案子水落石出后，乾隆下令将李侍尧押到京城。李侍尧落到和珅手里，论理是没有活路的，根据雍正修订的法律，贪污超过一千两就是死刑，而李侍尧自己供认的就已经有三万一千两。

乾隆怜惜李侍尧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李侍尧在进贡方面特别卖力，如果李侍尧不受贿的话，哪有那么多钱给自己整这么多宝物。在乾隆初期，律己甚严，但到了后来，乾隆喜好奢靡的本性开始暴露，乾隆虽然不能约束自己的喜好，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这个案子查到最后，总归会回到进贡问题上，到时候落马的就不只是李侍尧，自己也会留下骂名。

一审死缓

高官李侍尧落马，和珅心里那个滋味真就是一个美字可形容。

乾隆下旨痛斥李侍尧和那些行贿的官员，并下令将李侍尧革职查问，其他行贿人等全部革职，具体如何量刑由刑部和和珅等人拟定。此外，乾隆还下旨将云南巡抚孙士毅革职，发配伊犁，理由是隐匿不报。其实，孙士毅并没有向李侍尧行贿。如果让孙士毅告发李侍尧，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太可能。

当时督抚大员对辖区的权力之大甚至超过了皇帝，因为全国那么多官员，主要靠督抚来管理。督抚有权推荐和弹劾官员，所以让一个下属去弹劾督抚，那是强人所难。

不过，孙士毅跟和珅的关系较好，和珅替他说情后，免予发配伊犁，最后留在京城编纂《四库全书》。

揭发李侍尧的海宁非但没有得到奖赏，反因为最初不肯交代事实，犯了欺君之罪，交到刑部议罪。

和珅很希望给李侍尧拟个斩立决，但和珅毕竟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在乾隆身边，无人比和珅更会揣摩圣意。和珅从乾隆的态度看出他对李侍尧多有怜惜之意，好像很不情愿将李侍尧治罪一样。和珅清楚，李侍尧是乾隆的股肱之臣，自己如果能把李侍尧置于死地的话，乾隆这么精明的人估计会看破自己的真实想法，到时候也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和珅经过反复考虑后，跟刑部侍郎喀宁阿拟了个“斩监候”的刑罚，换句话说死缓。狡猾的和珅很明白，这样的量刑对于李侍尧的罪行来说不算重，从而可以掩盖自己报复李侍尧的动机，但是也不会影

响李侍尧最后的结局。一般来说，判为斩监候的只不过是多活一段时间，最后也难逃一死。

倒是对那些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判决容易一些，索尔方阿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家产抄没；汪圻和庄肇奎被发配到伊犁，永不许归，家产入官；张琮、方洛、杨奋被发配到乌鲁木齐，家产入官；德起因为病故，免受追究，不过家产也被抄。

在办理李侍尧案子时，和珅充分展现了自己过人的才干，仅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圆满完成任务。

二审斩立决

被判斩监候后，李侍尧觉得自己迟早一死，只想这一天快点结束，免得承受更多的折磨。他所不知道的是乾隆并不想他死，乾隆很想出手救他。当乾隆看到和珅奏折上针对李侍尧的量刑时，非常担心李侍尧会被处死。

作为一个皇帝，他是帝国权力最大的人，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将大清法律视同儿戏。要救李侍尧，也必须得钻法律的空子，不能给人独断专行的感觉。

李侍尧作为朝中重臣，他的案子本应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家共同会审。现在却只有刑部一个部门审理，乾隆心想，让三家共同会审是不是可以救李侍尧一命呢？但乾隆也担心三家会审会让李侍尧死得更快，除非自己事前打招呼，但提前给三个部门打招呼，君威何在呢？

乾隆于是想起了另一条路，大学士九卿会议。这个会议是清廷最高的审议机关，成员由九个部门的高级长官组成，由于人员复杂，人心不一，这个会议经常流于形式。很多与会人员对于讨论的事情并不关心，很多人甚至以种种理由为借口不来开会。乾隆觉得这个会议应该不像三司那样要求严格，估计不会判李侍尧死罪，一旦这个会议轻判，自己就有机会救李侍尧了。

然而，让乾隆失望的是，这个会议居然比刑部判刑更严厉：斩立决。

会议代表显然对李侍尧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大家都没有流于形式，而是积极发表意见。大家援引《大清律例》，觉得判处李侍尧斩监候太轻了。许多大学士援引乾隆五年九门提督鄂善受贿一千两银子被判死刑的案例，说李侍尧的犯罪情节比鄂善要严重得多，理应斩立

决。此外，还有以前的云贵总督恒文和原任贵州巡抚良卿等人，也是在任内贪污，而且贪得还没有李侍尧多，最后两人也是被立即执行死刑。

代表们的话是合情合理的，可惜他们没有揣测到乾隆的真实意思。这条路堵死了，还会有其他的路吗？

三审网开一面

二审的结果无疑把李侍尧推上了绝路，但是乾隆仍不想就此放弃，他想出了一个绝招——让地方督抚发表意见定夺。这个想法真绝，亏乾隆想得出来，地方督抚和李侍尧处于相同的立场，自然会帮李侍尧说话。

乾隆是如何想到这个绝妙的点子呢？当时乾隆还在南巡的途中，皱眉看和珅的奏折时，正接见前来接驾的富勒浑。乾隆就把自己心头的困惑告诉了富勒浑。富勒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李侍尧担任封疆大吏，做事认真负责，时刻将国事放在心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固然晚节不保，但一生劳苦功高，应该免他一死，这样日后定会感激圣恩，加倍为国效力。

乾隆当时没有对富勒浑的话表态，不过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事后，他想到了富勒浑的话，觉得既然走正常路线救不了李侍尧，何妨让督抚们来讨论。只要有一个督抚反对斩立决，自己就有出手救李侍尧的理由。

乾隆下旨让地方督抚们对李侍尧的事情发表意见，在谕旨中，乾隆还循循善诱地说李侍尧才干出众，为自己分了不少的忧，但辜负了皇恩，希望督抚们以李侍尧为戒。这番话冠冕堂皇，实际却是暗示督抚们反对斩立决。但是，乾隆的意思特别委婉，若非极会揣摩圣意的人估计很难猜出。

乾隆的谕旨发出来以后，督抚们都没猜到他的真实意思，甚至连富勒浑这次也错误地领会了乾隆的意思，大家都主张将李侍尧斩立决。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督抚们如果为李侍尧说话，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我这是在为同类辩护，会不会让皇帝以为我也有问题呢？那么富勒浑为什么也主张斩立决呢？这还得从上次他在乾隆面前说那番话讲起，当时他说话的时候，城府很深的乾隆没有任何表情，说完之后富勒浑胆战心惊，以为自己说错了话。这次乾隆再问话，他赶紧主张斩立决。

只有一个人猜到了乾隆的意思，这便是安徽巡抚闵鹗元。闵鹗元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根据字面意思来理解，他拿到圣旨后，反复推敲，终于从蛛丝马迹中推测出乾隆的真实意图。闵鹗元清楚，李侍尧的罪行证据确凿，经过两次会审后，乾隆迟迟不拍案，这时突然让督抚们讨论此事，一定是有原因。如果乾隆想处死李侍尧，完全没必要这么做。

闵鹗元非常圆滑，他首先肯定刑部和大学士九卿会议宣判得有道理，然后又说李侍尧劳苦功高，是国家的栋梁，虽然晚节失保，但根据律例“八议”中的“议勤”和“议能”两项可以对李侍尧法外施恩，免除死刑。闵鹗元用律法为李侍尧说情正中乾隆下怀，可以说闵鹗元的奏折为乾隆解了围。

有了这个突破口，乾隆可以施展手脚了。

不久，乾隆颁发了一道谕旨，说已经收集了各省督抚的题本，考虑到其中有人请求赦免李侍尧，所以暂时不对李侍尧作出判决，等到明年再审。这当然只是一个堂皇的借口，半年后，回人反清起义爆发，乾隆立即让李侍尧从牢房中出来，前去甘肃处理军务。不久，陕甘总督勒尔锦因咎获罪，李侍尧取代了他的职位。从云贵总督变成战略地位更加重要的陕甘总督，李侍尧的权势有增无减。

更绝的是甘肃省冒赈的事情爆发，乾隆让李侍尧和阿桂查办此案，用贪官来反贪，乾隆可谓是深谙以毒攻毒之道。李侍尧本身是一个贪官，对于贪官的伎俩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很快就把这个案子办得干净利索，深得乾隆欣赏。正应了那句古老的哲理：“使功不如使过。”

乾隆为何对李侍尧法外施恩？

乾隆处置的贪官很多，为何偏偏要放过李侍尧呢？

乾隆释放李侍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李侍尧确实非常能干。乾隆曾经公开宣称“李侍尧是中外最能办事的人”，在乾隆看来，朝中就数阿桂和李侍尧最为能干。像这样的人如果出什么问题，是大清国的损失。

关于李侍尧的才能，我们可以举实例来说明。李侍尧四十岁担任广州代理将军，他一上任就做了一件让乾隆印象深刻的事情。李侍尧上任不久，就发现军中马匹数额不对头，李侍尧顺着这个线索追查下去，发现前任将军席勒库荒废了马政工作，导致军中缺少五百匹战

马。从这件事中，乾隆看出李侍尧做事认真负责，从此对他日加信任。

李侍尧曾经担任两广总督十七年，刚到任的时候，就成功地处理了英国商人洪仁辉事件。洪仁辉罔顾清廷只开放广州港口的命令，屡次将商船开到浙江一带，浙江水师不准他登陆。洪仁辉就到天津去告状，控告广州海关监督李永标勒索外商。李侍尧负责审理此案，他没有按常规出牌，而是将原告和被告各打五十大板。

首先，李永标确实勒索贪污，李侍尧将他革职；而洪仁辉不遵守清廷的法律，还恶人先告状，加上乾隆对洋人非常防范，李侍尧便将洪仁辉押到澳门，监禁三年。之后，李侍尧又颁布了《防夷五事》，对外国人限制更严。

李侍尧的处理方式让乾隆很满意，不久就把李侍尧署理两广总督的职位扶正。在担任封疆大吏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李侍尧干过不少实事。所以，乾隆对他多有依赖，治国这么多年，乾隆深知人才难得，一流的人才更是难得。一旦国家发生了动乱，没有这样的人才就非常麻烦，相反，留下李侍尧利大于弊，乾隆的判断是正确的。果然后来甘肃发生了回族起义事件，但乾隆这么做的危害也非常明显，国法没有权威，其坏处往往影响后面好几代。

除了会办事之外，李侍尧对乾隆可谓是忠心耿耿，乾隆说他“恋主”大概不是假的。李侍尧时刻把乾隆放在心上，乾隆交代给他的事情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有什么好的东西总是献给乾隆。对此，乾隆心知肚明。

在抄家的时候，李侍尧家里最好的东西是三座黄金佛、一架珍珠葡萄、三株珊瑚树。乾隆一看，这些东西非常眼熟，后来才想起这些是李侍尧献给自己的贡品。根据清廷的规矩，臣子献给的东西，要退还一部分给臣子，算是赏赐吧！这些东西是乾隆退还给李侍尧的，在李侍尧的贡品里是相对差的一部分。现在乾隆看到自己退还给李侍尧的东西居然是他府里最好的东西，乾隆能不感动吗？这说明李侍尧是忠心为主子，把最好的东西全都奉上。

在乾隆眼里，李侍尧是个忠心不贰的奴才，会办事。李侍尧固然贪污受贿，但对于一个才能突出又忠心护主的奴才来说，这不是什么致命的错误。乾隆不想杀李侍尧的根本原因是：到哪找这么好的奴才啊？

当然了，乾隆放过李侍尧还有一个原因是进贡，李侍尧的贪污跟自己进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就这样把李侍尧杀了，乾隆于心有愧。乾隆是一个假模假式的人，经常在臣子面前表现自己勤政爱民，

好像非常厌恶奢侈一样。但是在李侍尧面前就没有这么装了，他曾经对李侍尧说：“你这次进贡的镀金羊景表亭非常好，如果以后发现有和这个一样好看的，多献几件上来；如果发现有比这个还大还好的，也多找几件来，不必在乎价格。”

看到没有，不光李侍尧主动进献，乾隆有时也主动索取。

李侍尧虽然贪污勒索下属，但这些钱大多数还是用来服务乾隆的，自己只取其中少数。乾隆曾多次夸奖李侍尧“优于办贡”，意思是他献的贡品很讨自己喜欢。这么一来，官场上办贡成风，所以李侍尧案发后，许多同僚指责他，说他带坏了风气，所以应该严厉惩治。

这种风气对于吏治固然很坏，但是乾隆却不希望终止，他很希望过这种奢侈的生活。乾隆不能杀李侍尧，杀李侍尧等于自绝臣子的纳贡之路。

李侍尧的最后结局非常风光，乾隆不仅归还了他的官职和爵位，还加封他太子太保的头衔。最后，乾隆模仿唐太宗李世民绘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也设置了一个紫烟阁，李侍尧位列二十四功臣之一。

惊天大案——甘肃冒赈案

通省都是贪官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甘肃发生了回教反清起义。起义的领导人是一个叫苏四十三的穆斯林教徒，他领军围困兰州城，陕甘总督勒尔锦平叛不力，被押回北京候审。

乾隆随后派遣政坛新星和珅前去督战，和珅督战不力，乾隆只好让王牌将领阿桂前往甘肃。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平叛居然揪出了一件惊天贪污案。

和珅是当年四月到达兰州的，到后不久，他就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纯属军情，丝毫不涉及贪污案。和珅在奏折里说他刚一进入甘肃境内就遇到大雨，十天后，阿桂也来到甘肃。阿桂也给乾隆上了一道关于军情的奏折，在折子里他也提到甘肃连日下大雨，阻碍了行军，对用兵很不利。

这两个奏折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谈的都是军情。然而，心细如发的乾隆却从中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收到这两份奏折后，乾隆马上想起了甘肃省连年的旱情奏折。

甘肃省接连上奏折说天气干旱，庄家收成大减，百姓生活困苦。为此，乾隆耗用巨资给甘肃赈灾。现在，和珅和阿桂的奏折都说甘肃连日大雨，雨量相当充沛。为什么甘肃年年旱灾，今年雨水特别充沛呢？乾隆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蹊跷，在惩办陕甘总督勒尔锦和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时，乾隆的怀疑被证实了。

勒尔锦被抄家后，家中仅存七千两白银，但是他的家奴曹禄家中却发现了两万余两白银。乾隆因此认定勒尔锦隐匿财产，让阿桂在前线也顺带关注一下这事。

布政使王廷赞守城有功，然而却盲从勒尔锦，延误了军机，顺带着也被革职，进京接受调查。王廷赞为了将功补过，自愿提出将自己四万两养廉银献给甘肃府库充作军饷，但让王廷赞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么做居然弄巧成拙，让乾隆更加怀疑。王廷赞出手这么大方，背后肯定还有更多的银子。

再联系到王廷赞的前任王亶望，不久前捐款五十万两修建浙江海塘工程，乾隆当时就很奇怪王亶望咋就这么有钱。王亶望到浙江期间，名声还不错，乾隆由此推测，王亶望和王廷赞的钱财应该都是在甘肃捞的。

这时，乾隆收到和珅的奏折：“王廷赞担任甘肃布政使多年，家里非常充裕，就是再多捐出几倍，对他来说也是小事情。”

乾隆让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和阿桂审理此案。经李侍尧和阿桂一查，一个巨大的贪污网络浮出水面。

当这个贪污网络浮出水面后，乾隆感到震惊，这是他当皇帝以来最大的一个贪污案。原来，甘肃接连七年谎报灾情，赃银高达一千万两，涉案官员多达一百多人，以至于乾隆大呼这个案子是自古未有的奇贪大案。

冒赈中的猫腻

案子很快分两头审理起来，一头由阿桂和李侍尧对甘肃省各级官吏进行审讯，一头由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浙江对王亶望等人进行审理。

王亶望拒不认罪，没办法，乾隆只好把他押解到热河行宫进行审讯。王亶望和王廷赞等人仍然抵赖不认账，随着证据越来越多，他们面对这么多有力的人证和物证，再也没法狡辩了。

甘肃接连七年上报灾情，其实这七年并没有大旱。那这些官员谎报灾情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事情还得从捐监说起，捐监是清朝的一种特殊制度，它允许为国家捐钱的读书人获得国子监监生的资格。这是方便一些有钱却无学问的人，给他们一个做官入仕的机会。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乾隆下旨批准陕甘总督勒尔锦在甘肃实行捐监制度。乾隆批准这个项目也是别有原因，因为当时甘肃连年旱灾，需要大量的赈灾钱粮。捐监可以部分地解决钱粮问题，但是也会带来很多的弊端。为此，乾隆特派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前往甘肃，负责捐监事务。

王亶望本人就是靠捐监发家的，他通过捐纳当上了知县，后来又担任知府、布政使、巡抚等官职。乾隆所以委派王亶望处理捐监事务是因为王亶望身上有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现在常说的理财能力，第二个优势便是王亶望的父亲王师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官员，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乾隆心想，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王师既然是个清官，他的儿子王亶望应该不至于是个贪官吧！

事实证明，有时候老鼠生的儿子也不会打洞。

这个王亶望能力确实不错，在甘肃三年，收到“监粮”六百多万石，批准了十五万通过捐监获得监生资格的人。按规定，甘肃每年要缴纳的钱粮是八十万到九十万石，王亶望一上来就收获了这么一大笔钱粮，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绩。因为甘肃是一个经常发生战争的地带，钱粮在这里尤其显得珍贵。

也正因此，乾隆提拔王亶望为浙江巡抚。当真相水落石出的时候，乾隆震怒了，自己看上的理财高手居然也是一个贪污专家。

我们一定很好奇，王亶望是怎样贪污的呢？

应该说，王亶望确实很聪明，他来甘肃不久就发现了一个贪污门路。甘肃以前经常发生旱灾，粮食短缺，百姓生活困难。如果谎报灾情的话，正好可以借机贪污国家公款。为了让贪污“大计”得逞，王亶望说服了总督勒尔锦，勒尔锦下水之后，甘肃省的各级官员就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了。

王亶望贪污的另外一个手段是在捐监之时额外多收，当时规定的捐监银两是五十五两，王亶望往往要多加收一些银两。为了将这些银子贪污，王亶望特命自己的亲信蒋全迪为兰州知府，专门负责收取捐银。

虚报旱灾之后，王亶望又奏请乾隆，允许将捐银赈济地方百姓，结果这些钱全都被腐败集团私分了。王亶望甚至为各县预定灾情，根据灾情的轻重分别给予不同的钱粮，甘肃的地方官们当然不会放过这

么一个好的发财机会，大家纷纷落入王亶望的腐败网络里，私吞赃款，上下一片腐败，通省难得一个好官。

王亶望自然是这些人中贪污最多的一个官员。

事实上，这些监粮主要是钱，并不存在所谓的粮食，但是上报的时候却说成了粮食。乾隆中途也一度产生怀疑，认为甘肃的监粮可能没有那么多。他还曾派遣刑部尚书袁守侗到甘肃查访，袁守侗是一个出名的办案高手，曾经五次破获重大案件。但是，袁守侗这次到甘肃后却扑了一个空。

甘肃各级官员听说皇帝派钦差下来查粮，串通起来设计了一个骗局，在粮仓下面铺设木板，上面撒满谷物，造成粮仓充实的假象。袁守侗回京后，向乾隆奏报，甘肃粮仓非常充实，没有虚假。

乾隆将信将疑，只好把这事情暂时搁置在一边。

明察暗访

事实上，半年前乾隆就对王亶望产生了怀疑之心。其时，乾隆任命阿桂为钦差到浙江视察钱塘工程。到了杭州，阿桂对钱塘工程的各种细节一一过问，并且派人暗访吏治情况。阿桂首先发现杭嘉湖道员王遂有问题。

王遂还没有担任杭州知府之前就已经有一处豪华的房产，担任杭州知府后买下一些房产，将自己的豪宅扩建，扩建之后，王遂的房产已经有一条街的规模，王遂将其他的一些房子当做店铺租给商人。阿桂立刻想到王遂抢占民房，便派人私下里访问那些卖民房的人，根据他们的说法，王遂虽然不是抢占民房，但这些卖房的人也并不是自愿出售的，大家都是迫于他知府的威势不敢不卖。

随着查访的深入，阿桂还发现王遂在西湖附近另有两处房产，并出资数万两银子和商人何永利开办钱庄。掌握了确凿证据后，阿桂奏请乾隆将王遂革职查问。

乾隆收到奏折后，命阿桂负责审理王遂。阿桂带着陈辉祖、富勒浑、李质颖等人前往王遂府上搜查，查出王遂家里有现银九万多两，银器两千多两，王遂还借出四万多两银子。在王遂老家，查出合计八万两白银的田产和财物，此外还有大量的金银玉器。

王遂一年的养廉银不过几千两，按照正常收入不可能有这么多钱。现在王遂有二十四万两存银，如果不是贪污，又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

王亶望作为王遂的顶头上司，很可能是一个更大的贪污犯，乾隆叮嘱阿桂务必要钓出潜水的大鱼。王遂不光是王亶望的下属，还是王亶望一手提拔和推荐上来的。也正因为这层关系，要王遂供出王亶望并不容易。自己贪污的罪证被发现，王遂只好自认倒霉，拒不供认“恩人”王亶望。

结案之时，王遂一案并没有进展，刑部给王遂拟定了“绞监候”。乾隆不想立即处死王遂，始终希望他能供出王亶望。

王遂虽然没有供出王亶望，但阿桂和和珅前往甘肃平叛时无意中给乾隆提供了另一条线索，乾隆终于抓住了王亶望的尾巴。

刑部堂官英廉等人负责审讯勒尔锦，勒尔锦并没有抵赖，事已至此，他知道还是认罪比较好，于是将这些年来贪污受贿的情况交代出来。但勒尔锦把主要责任推到王亶望身上，他说自己本来是不想这么干的，是王亶望一再怂恿，自己也怕得罪人，一时意志不坚定，跟着大家同流合污了。

根据勒尔锦的供词，王亶望是冒赈案的主谋，这个案子是他一手策划一手筹办的，其他人都是从犯。与此同时，甘肃省藩司王廷赞也坦白，王亶望将捐粮改收为银两，每个捐生收银五十五两，这事由王亶望的亲信负责，自己只不过是沿着王亶望铺好的路走而已。

大批贪官落马

经过一年半的审理，案子已经水落石出了。看到结果，乾隆非常震惊，甘肃省的官员几乎全部落马。

阿桂给乾隆呈递的贪官名单上有一百多人。这起冒赈案贪污的具体数字并不清楚，但毫无疑问数额是非常庞大的，仅仅从王亶望家里就查抄出三百多万两银子。根据王亶望自己的交代，甘肃全省贪污银两总共大概有一千多万两，这个数字肯定还是保守的。

现在，摆在乾隆面前的问题是，要不要把这些官员全杀了呢？根据国法，是应该全部杀掉的。但是这么一来，甘肃官场顿时就会出现真空状态，政务谁来处理呢？一时之间也没法找到这么多官员来替补。不杀的话，国法何在，贪污之风如何抑制？

经过再三考虑，乾隆采取了折中的做法，既强调严惩贪官，又表示事情已经过去多年，能宽容的就宽容，加上涉案官员太多，能不杀就不杀。乾隆还下了一道特别的规定：贪污超过两万两白银的斩立决，贪污在一万到两万两之间的判为斩监候。由于涉案官员太多，乾

隆不得不把死刑标准放宽。但即便如此，也有五十六名官员被处死，王亶望是立即正法，勒尔锦享受到自尽的待遇，王廷赞被判为绞监候。

当这些官员们一一认罪伏法的时候，甘肃省的官场立即陷入瘫痪状态。乾隆从全国各地往甘肃调往官员，这才解决衙门瘫痪的问题。

乾隆对这起贪污案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认为真正的元凶并不是王亶望，而是刚辞世不久的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因为当时勒尔锦奏请捐监时，于敏中是极力劝说乾隆批准的，于敏中如此热心于推行甘肃捐监，当时乾隆也猜不透其真实意图。现在想想，乾隆觉得很可能于敏中就是幕后最大的人物。

现在想来，于敏中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为了从中捞钱。于敏中很幸运，在冒赈案还没露底之前他就已经去世。于敏中这个人在生前享有廉洁正直的美誉，没有人会想到他也是一个贪官。他的问题是怎么查出来的呢？说来还是他的后代们为了分家产打官司，官府一查，发现于敏中家中居然有银子两百多万两。

乾隆一看，就知道其中大部分是从甘肃那边捞来的。愤怒的乾隆让人查抄于敏中的家产，并表示如果他还活着，一定要重罪惩治，看在他过世兼为国效力多年的分上，就不追究了。

刑部尚书袁守侗和刑部左侍郎阿扬阿曾经前往甘肃查看监粮，因被甘肃官员蒙蔽，没能发现问题。乾隆认为应该给予他们处分，把他们交给刑部议处。这案子还牵连到陕西巡抚毕沅，毕沅虽然是陕西巡抚，但是根据乾隆制定的规章，陕西巡抚有责任监察邻省的事情。而且毕沅这个人才华出众，在陕西当了十几年巡抚，理应了解甘肃那边的情况。甘肃通省贪官，毕沅却没有发现，降三级留用，并停发所有薪俸。

审判官陈辉祖也卷入案中

就在甘肃冒赈案接近尾声的时候，没想到跟随阿桂查案的闽浙总督陈辉祖竟不幸卷入贪污案中。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陈辉祖曾经负责查抄王亶望的家产。也就是在查抄的过程中，王亶望的巨额资产让陈辉祖产生了贪婪之心。陈辉祖心想，这么多的黄金、珠宝和古董，我顺手牵羊拿一些不会有人知道的。

就这样，陈辉祖把好东西都拿走了，留下一些稀松平常的东西交公。乾隆是一个非常警觉的人，打开王亶望家财的箱柜，发现里面居

然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东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金银珠宝。这实在不像是王亶望的家私，王亶望曾经进献过不少珠宝，而现在这些家私里居然没有一件。

乾隆是个聪明人，立刻想到肯定是有人从中做了手脚。乾隆四十七年夏，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浙江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等人。乾隆问他们是不是有人把王亶望的家产调包，这几个人都说不知道。乾隆很生气，让人亲自去浙江调查，很快就调查出证据来，发现李封、陈淮正是犯罪嫌疑人，在乾隆的一再逼问下，这两人终于供出了陈辉祖，说陈辉祖用白银换成黄金，还将一些常用的东西替换珠宝。

陈辉祖接受刑讯的时候，百般狡辩，不肯认罪。说到白银换黄金，陈辉祖说当时抄家时，布政使跟自己商量，说金子含水过多，成色不好，运到北京以后，估计耗损会更多，所以干脆换成银子更实惠一点。陈辉祖强调说，这么做也是为了国家着想。为了抵罪，陈辉祖甚至编造出离谱的借口，说王亶望被抄时曾向他求情，怕金子太多引人注目，让自己按照市场价兑换成银子。

说到实物被调换，陈辉祖编造借口说，从王亶望家里搜出的朝珠太普通，自己都不好意思运往北京，所以让人在外面买了一些好的，一并放在里面，这么做也是为朝廷着想。

陈辉祖的供词显然是不值一驳的，黄金成色不好兑换成银子，怎么送到北京来还有九两黄金。而且陈辉祖对其他一些贵重的珠宝只字未提，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王亶望曾经向乾隆进贡了一些宝物，乾隆照例给他返还一部分。

陈辉祖的上司阿桂负责审问他，阿桂从陈辉祖家奴口中得知陈辉祖偷换名贵的玉器和字画等等。看到调查出来的证据越来越多，陈辉祖知道如果抗拒的话，后果更严重，只好坦白。

坦白之后，乾隆开恩，抄了陈辉祖的家，判为斩监候，随后改为自尽。陈辉祖因为一时贪念，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还丢掉了卿卿性命，真应了那句古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陈辉祖死后，江南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昨日抄人家，今日被抄家；贪官皆上路，百姓笑哈哈！

一个牛脾气揪出一群贪官

像李侍尧这样的重量级的高官贪污引起轰动我们可以理解，像甘肃这样全省集体贪污的事件炒得沸沸扬扬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贪污弄得全国皆知你能理解吗？

作案者是浙江平阳县的一个县令，捅出这个案子的是一个脾气相当直的老头。这个老头捅出这个案子后，不但没有得到奖赏，反而被处分降职，这是这个案子最奇怪的一个地方。

这个倔老头名叫窦光鼐，山东人，担任浙江学政。窦光鼐这个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根筋，认死理，说话做事经常得罪人，这种人在官场里肯定是个讨人嫌的角色，说实话，连乾隆都不喜欢他。乾隆屡次降他的职，但是考虑到他这种人性耿直，在官场上比较少见，降职的同时又多次起用他。

浙江学政本来是主管教育的，吏治的事、财务的事本来不归窦光鼐管。当时，浙江上上下下都贪污，大家互相包庇，官官相护，没有人敢捅开这层纸。

王亶望、陈辉祖这些人贪污事发后，乾隆对浙江官场疑虑相当深，他觉得浙江肯定上下都不干净，便任命福崧为新任的浙江巡抚，指望他查清浙江官场的腐败情况。不过，有意思的是，乾隆送福崧赴任之前叮嘱他：查归查，但也不要搞得满城风雨，尽量要和风细雨。

福崧来到浙江后，发现全省亏空一百三十多万两银子，平均每个县亏空两万两。乾隆让福崧在三年之内补足亏空，福崧表示一点问题都没有。三年之期终于到了，福崧却没有完成任务，说还欠三十三万两。乾隆不高兴了，山东发生贪污案后，新任的巡抚用两年的时间就补足两百万两亏空。浙江是何等富裕的地方，三年时间怎么就补不了一百多万两银子。乾隆怀疑，福崧可能也被侵蚀了。

乾隆于是又派户部尚书曹文植、刑部侍郎姜晟和工部侍郎伊龄阿等人前往浙江监察，不久，乾隆就免去福崧浙江巡抚的职务。曹文植、姜晟、伊龄阿这些人来到浙江后，向乾隆奏报，浙江亏空确实只有三十多万两，跟福崧报告的数据差不多，而且各级官员正在紧急弥补亏空。

钦差大臣的这个奏折本来是可以平息乾隆的愤怒的，没想到中间杀出了个窦光鼐，他爆出了个猛料：浙江亏空远远不止三十多万两。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窦光鼐自从来到浙江，负责各州县的教育事务，但老窦这人对财务也特别感兴趣。他亲临各县，明白各州县的亏空远远比实际上报的数字要多。福崧让各州县官员上报亏空数字，官员们不敢如实上报，福崧对此浑然不觉。但时间长了，福崧慢慢也

知道了，不过此时他也不敢上报乾隆，怕乾隆骂他：“你当初是怎么办事的？”

没办法，福崧只好命各州县的官员尽快把亏空补足，上报的和没上报的一起补足。窦光鼐对这些都了解，他并没有傻乎乎地蹦出来，把这事情揭开。他知道福崧也有难处，所以把嘴边的话强行憋了三年。

三年之后，再也憋不住了。他催促福崧尽快采用强硬措施，但福崧这个人做事优柔寡断，他觉得这样不太好。后来乾隆派钦差大臣来浙江后，他们上奏说浙江只有三十多万两亏空，然而窦光鼐却给乾隆上了一道密折，把幕后真相揭露出来，在奏折中，窦光鼐还说福崧这个人人品没问题，只不过对下面的人太宽容了。窦光鼐因此被乾隆提拔为吏部侍郎，乾隆圆滑地告诉他：“浙江有问题，你也有责任，不可以漠不关心，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

窦光鼐升官了，报恩心切，告诉乾隆：三年前各州县上报的亏空数目是不真实的，造成亏空的主要原因是由上司勒索造成的，上司一勒索，下面就贪污，反正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所以大家互相庇护；官员交接的时候，都会事先劝说新任官员，让他们对这些事情守口如瓶，新任官员拿到好处以后，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窦光鼐这么做把浙江全省的官员以及皇帝派遣的钦差大臣全得罪了，三位钦差大臣仍然坚持说自己的调查是正确的，窦光鼐提供的数据是极为不合理的。

这场斗争一开始窦光鼐并不是孤军奋战，至少乾隆站在他这边。所以，窦光鼐干得很卖力，他经过实地查房，发现仙居县亏空近万两，以致新任县令不敢接手；黄岩县亏空粮食五万九千石；乐清县亏空两万两，候补知县也不敢接手；桐庐县也亏空两万多两……

在窦光鼐实地查访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条鳄鱼：平阳县县令黄梅。此人借着弥补亏空的名义居然把钱都塞进自己的腰包里。黄梅在平阳当了八年县令，对百姓勒索摊派，发现亏空后，居然不把银钱补足亏空，反而都揣进自己的腰包里。

说实话，乾隆这时候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固然想解决贪污问题，但也不想搞得太大。作为一个皇帝，还是希望大臣们能拥戴自己，如果为了一个倔老头、为了一些银子搞得跟大臣们不愉快，也不符合乾隆的本意。

乾隆知道，这个案子还得让阿桂去办。窦光鼐失败的地方在于他连阿桂也得罪了，阿桂是何等的人物，而且这个人官声也不错，你得

罪他不是找麻烦吗？这事也许不能怪窦光鼐，因为阿桂对他一向没有好感。

阿桂来浙江不久，就上奏说窦光鼐参劾的内容不实，还是曹文植等人的报告比较可靠。乾隆是非常信任阿桂的，在乾隆的心目中，阿桂是朝中第一重臣，李侍尧是第二重臣。阿桂的话和窦光鼐的话谁的分量更重不言自明。

阿桂在浙江主持了一个会议，各路官员都前来开会。这个会议表面上是查贪，其实是整窦光鼐。以前向窦光鼐作证的人全部改口，所有的证词都朝着对窦光鼐不利的方向进行。阿桂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窦光鼐诬陷浙江官员。

此时，乾隆还是清醒的，他没有就此认为窦光鼐完全是在诬告，他感觉背后必定有隐情，所以仍然为窦光鼐开脱。

窦光鼐也没有坐以待毙，他给乾隆上奏说，阿桂来浙江调查后，各级官员都串通好了，钦差大臣们没有实地查访，地方官说的全都是假话，窦光鼐只差没有说阿桂故意在整自己。窦光鼐最大的悲剧是他手中没有确凿的证据，乾隆对这种“负气”的说辞非常恼怒，天下就你窦光鼐一个人正直？你得罪人不要紧，别把我也扯进去。乾隆干脆下旨让窦光鼐不要多管闲事。

没想到窦光鼐的牛脾气上来了，连圣旨也不当回事。管都管了，就一定要管到底，非得出出胸口这顿恶气不可。窦光鼐居然孤身一人前往平阳搜集证据，这一去后面多少官员在看着，每个人都巴不得他早点完蛋。

阿桂第一时间把窦光鼐的行踪报告给乾隆，乾隆的回复是：笑话，且看他如何办案。

窦光鼐到了平阳后，在当地的明伦堂召集衙役和举人们开会，让大家放心大胆地揭露平阳县的腐败问题。

伊龄阿早已派人秘密跟踪窦光鼐，并将窦光鼐的行为添油加醋地报告给乾隆：窦光鼐在平阳搜集证据，大家不愿开口，他就在大堂之上咆哮，威胁那些举人和秀才们，让大家都非常害怕。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在此时，都察院和吏部又弹劾窦光鼐袒护劣生，擅离职守，建议将他革职。乾隆此时也对窦光鼐烦透了，便下令革去他吏部侍郎和浙江学政一职。

窦光鼐已经不管这些了，他已经下定决心，就算豁出老命也要把这些官员拉下马。伊龄阿这人不仅书画才能棒，搬弄是非的能力也特别强，他立即给乾隆上奏折说窦光鼐不想做官了，也不要性命了，有

违大臣之礼。乾隆听了，怒不可遏，下令将窦光鼐押解进京，由刑部议罪。

这么一来，窦光鼐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连乾隆也站在他的对立面。

窦光鼐在做人方面是完全失败的，然而他执着的精神却让人深思，如果官场中能够多一些这样的人，吏治还会这么污浊吗？

我们还是先看看窦光鼐的命运，这个原本想捅出官场腐败的老头眼看就要自身难保了。幸运的是，在被押解进京之前，他已经搜集到黄梅的贪污证据。窦光鼐带着人证物证风尘仆仆地来到巡抚衙门前，要求伊龄阿重申这个案子。伊龄阿一口回绝，直白地告诉他：“老先生，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是为自己考虑考虑吧！”此时，乾隆下令将窦光鼐押解进京的谕旨还没有到杭州，但伊龄阿相信窦光鼐这次肯定难逃一劫。

窦光鼐急了，写了一封密折给乾隆，把自己搜集的证据全都寄给乾隆。根据窦光鼐的调查，一个小小的平阳县令黄梅居然贪污高达二十万两银子。

窦光鼐这个折子到了朝廷后，不光是乾隆，整个朝野都震惊了。因为乾隆已经给浙江亏空案结案了，难道窦光鼐想翻皇上定下的案子？

窦光鼐密折发出后不久，他本人也戴上镣铐，前往京城。乾隆发出一道谕旨，让官差中途把窦光鼐释放。接着，乾隆第三次任命钦差大臣闵鹗元前往浙江，会同阿桂重新审理这个案子。

这层纸捅破之后，查起来非常顺手，贪官们认罪态度也相当好。判决如下：

黄梅斩立决，就地正法；黄梅的儿子黄嘉图，协同犯罪，发配伊犁。

平阳县的一些犯法的衙役从犯，杖打八十下，关押两个月。

黄梅的顶头上司、温州知府范思敬贪污受贿，包庇黄梅，发配伊犁当差。

原浙江巡抚福崧，包庇贪官，玩忽职守。革去现任山西巡抚的职务，调到新疆担任帮办大臣。不过后来乾隆又把福崧调回内地担任巡抚。

整个判决中，最让人意外的莫过于对现任浙江巡抚伊龄阿的审判了，伊龄阿是阻挠这次贪污案的一个罪魁，出于私心，百般诋毁窦光

鼐，袒护腐败官员。伊龄阿本以为自己即使不杀头，也要发配三千里。让他意外的是，乾隆不但没有降罪于他，反而升他的职。乾隆将他提拔为内务府大臣，同时兼任崇文门税务总督，由从二品变成了正二品，这还不说，不管内务府大臣还是崇文门税务总督都是巨肥的差事。要理解乾隆为何作出这样一个判决，必须了解伊龄阿的出身，伊龄阿是内务府出来的一个奴才，换句话说是乾隆的家奴。就算狗在外面咬人了，主人也不会把狗给宰了，狗永远是狗，永远忠于主人。

对阿桂的惩罚是革职留任，这种惩罚当然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乾隆是不可能真处置阿桂的，但阿桂也因为这件事影响到自己的地位。而和珅正好借机攀援，最后和珅成为乾隆的第一宠臣。

窦光鼐也许正兴奋地等待乾隆对自己的奖赏，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惩罚。一纸文书下来，免除窦光鼐吏部侍郎职务，改授宗人府府丞，由从二品降为正三品。当然，乾隆也肯定了窦光鼐“实心任事、忠心事主、功不可没”，但他话锋一转，说窦光鼐固然有功，但在查案中行为乖张、咆哮公堂，也犯了不少错误，所以必须给他敲敲警钟。

第八章 六下江南——处处留情真风流

据说乾隆曾带着第一任皇后富察氏南巡，一天，在江南的御舟中招了许多漂亮的娼妓，寻欢作乐。皇后得知后，很不高兴，痛骂娼妓，还对乾隆讽刺了几句。乾隆气得把富察氏揪到房里，拳脚相加。最后，富察氏不堪侮辱，跳河自杀。

民间热议：乾隆为何六下江南

南巡的传统始于康熙，康熙曾有过六次南巡，乾隆即位后，事事效法皇祖，南巡这事当然也不能例外。乾隆奉康熙为楷模，不仅在位时间不敢超过皇祖父，就连南巡的次数也不敢超过。本来六下江南是视察民情、整治河工的好机会，但为何乾隆在晚年又说自己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六次南巡，乾隆自己给出了答案：劳民伤财。

我们先来看看民间是怎么看待乾隆下江南的，跟乾隆自己的看法不太一样。乾隆认为自己下江南是为了治理国家，关心民生，但老百姓对这个说法可不买账。

离家的孩子要回家

前面讲到，在浙江海宁一带流传乾隆是陈阁老的私生子，传说有鼻子有眼。根据传闻，雍正当皇子时，跟陈阁老的关系很好。后来两家同一天生了孩子，雍正生的是女孩，而陈阁老生的是男孩。陈阁老抱着孩子到雍王府以后，被雍正调包了。后来，乾隆当皇帝后，听说了自己的身世，他六下江南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事是真是假。

乾隆六下江南四次住在海宁陈阁老的家里，虽然这时陈阁老夫妇已经去世，但陈阁老的子女们都在。如果乾隆是陈阁老生的，那么乾隆住在这里也算是跟兄弟姐妹们在一起。据说，乾隆每次回来，都要到陈阁老夫妻墓前行孝子大礼。

这个传说在浙江一带流传得是非常广的。

微服私访

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一播再播，非常火热。这乾隆既然凡事都以皇祖康熙为榜样，自然也要学着微服私访了。

这个说法在民间流传得也相当广。据说乾隆有一次下江南的时候，微服私访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赶车的少年，这少年看上去颇为机灵秀气。乾隆就好奇了，问他：“小伙子，你这么个年纪，怎么不去读书，反倒在这里赶车，以后还能有什么出息啊？”

这少年的回答让乾隆大吃一惊，少年说：“我怎么就不想读书了，是我不能读书啊，都是乾隆那个王八蛋害的。”

乾隆气愤地说：“你自己不读书，反倒怪乾隆了？”

少年这才告诉乾隆，他本是一个知府的儿子，父亲在任时屡次弹劾一个贪赃枉法的大臣，结果都被乾隆驳回。这个大臣仗着有乾隆庇护，更加为非作歹，竟然将父亲杀害，这个少年侥幸逃脱，不得不以赶车为生，怎么还能指望读书呢？

乾隆一听，颇为愧疚，回去斩了那个大臣，并把知府的儿子叫到京城，免费提供给他读书的机会，后来还让他当上了京官。

微服私访是为了了解民情，不过有时候也是寻花问柳的好机会。

寻花问柳

乾隆多情，喜欢拈花惹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为此他还跟皇后闹翻了。

据说乾隆曾带着第一任皇后富察氏南巡，一天，在江南的御舟中招了许多漂亮的娼妓，寻欢作乐。皇后得知后，很不高兴，痛骂娼妓，还对乾隆讽刺了几句。乾隆气得把富察氏揪到房里，拳脚相加。最后，富察氏不堪侮辱，跳河自杀。

这个传说无非是根据乾隆好色这一点延展开来的，乾隆确实曾经对一个皇后特别糟糕，但这个皇后不是富察氏。乾隆与富察氏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两次立富察氏的儿子为太子，对富察氏是非常宠爱和尊重的，不可能对她拳脚交加。而且，富察氏并不是自杀的，她是因为两个皇子早殇而病逝的。再说了，富察氏在乾隆十三年就去世了，而乾隆是从十六年才开始南巡的。

乾隆倒确实因为寻花问柳的事情跟第二任皇后那拉氏发生了冲

突。到了江南后，乾隆纵情声色，那拉氏过去劝谏他。乾隆本来就很讨厌那拉氏，只是迫于太后的旨意，才立她为皇后。乾隆就对那拉氏破口大骂，那拉氏脾气也不好，两人就这么闹翻了。乾隆让人先把那拉氏送回京城，那拉氏悲愤异常，居然剪发，说要出家。乾隆对这种行为非常厌恶，对那拉氏更加反感，不久，那拉氏就去世了。

炫耀书法，卖弄文采

我们知道，清朝皇帝从康熙开始就有一个习惯，喜欢炫耀自己的才能，特别是文采方面。乾隆就特别喜欢写诗题字，一生写了几万首诗，南巡的时候到了名胜古迹，总会意兴挥洒，不题字，便写诗。

民间流传这么一个传说，乾隆在江南时微服私访，曾看到一个农家小孩在练书法。乾隆兴趣上来了，便问这个小孩会不会对对子，小孩点点头。乾隆噌的一声打开折扇，摇头说道：“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水。”没想到这小孩绝顶聪明，一会儿就想出来了：“丁香花，百字千字万字头。”

乾隆一听，心里很震惊，这对子对得实在太好了，感叹道：“后生可畏啊！你这么小的年纪，居然有这样的才能，将来一定是状元的料啊！”

男孩一听，喜上眉梢，跪地说道：“谢皇上赐状元之恩。”

乾隆一听，更吃惊，支吾地说：“你……你怎么知道我是皇上？”

男孩回答更聪明了：“天下除了皇上，还有谁敢点状元呢？”

乾隆摇摇头：“罢了，罢了，君无戏言，就赐你为‘童状元’吧！”

我们知道乾隆南巡途中游山玩水，到处题字作诗，这个是事实。但是他还决不至于昏庸到专门为了炫耀自己的才能而南巡。实际上，乾隆是一个非常理智、非常智慧的皇帝，而且也是很有涵养的，对政事也非常用心。

乾隆后期吏治腐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乾隆这个人昏庸，也不是这个人愚蠢，论起聪明才智，乾隆不比雍正差。只是乾隆在吏治方面的政策跟雍正不太一样，雍正尽力把国家往“法治”路上推，虽然雍正也做了不少违背法治的事，但总体的心愿还是以法治国。乾隆却恰恰相反，在他手中，国家不断往人治方面发展。

乾隆用权术虽然可以维护国家的利益，但已伏下了吏治隐患。譬如，李侍尧犯了贪污罪，理应处死。乾隆巧妙地把他们救了出来，最后

李侍尧为国家立了大功，这事既可以说乾隆非常善于用人，但也破坏了律法的权威性，根据蝴蝶效应，法律权威被破坏后，后面必然是吏治腐败。

乾隆实际上是收获了眼前利益，却失去了长远利益。

同是南巡，康乾有所不同

康熙是清朝历史上一个开疆拓土的皇帝，历史学家对他评价相当高。康熙的南巡也没有落下话柄，为何同样南巡的乾隆却引来阵阵骂声呢？甚至，到晚年连乾隆自己都意识到错误。

我们来看看这祖孙俩在南巡事情上有何不同。

康熙幼冲即位，国家局势不稳，朝政被权臣把持。年少的他韬光养晦，除掉权臣鳌拜。亲政以后，国内局势变幻莫测，内有三藩，外有台湾的郑氏政权，西北有准噶尔的叛乱势力，东北俄国人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之下，康熙一步步解决了问题，平三藩，收台湾，平定准部叛乱，击退俄国侵略者。成就了千古大帝的名声，康熙虽然丰功伟绩甚多，但始终把治国安民放在首要地位，这便是他南巡的真正原因。

康熙南巡有六个主要的原因。

一是治理黄河。封建统治者历来把黄河的治理当作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提到与吏治同等的地位，这意味着黄河治理不好，可能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元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康熙执政以后，黄河的灾患仍然严重，影响了黄河附近各省的人民生活。在出发前，康熙就把河工一事放在心里。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他又逐步了解民情，考察吏治，一举多得。由于多次亲临黄河现场，康熙自己总结出了治理的新方法。他提出疏通河底、修改清口、拆毁拦水坝和引水归江四大措施，为黄河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察访民情。康熙对民情是非常关心的，雍正曾说自己在通达下情这块比康熙强，这话得这样说：雍正比康熙更了解官情。正因为深入了解民间疾苦，为了稳固大清江山，康熙提出了“永不加赋”的政策。了解民情也是康熙南巡途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是考察吏治。康熙南巡亲临官场第一线，发现问题、了解问题、解决问题是他一贯的办事风格。第一次南巡时他发现漕运总督邵甘有问题，立即将其撤职。第二次南巡他搜集了更多的官场情况，重

新任命了一批官吏。对于吏治这个问题康熙从来不敢怠慢，也不会轻易相信下面的奏折，自己亲自了解情况才是最可靠的。

四是减免钱粮。南巡与钱粮并无必然联系，这个决定是在南巡的途中作出的。深入了解百姓的疾苦，才能选择更好的统治方法，康熙有感于百姓苛捐杂税繁多，多次减免钱粮。

五是笼络人心。康熙爱才，哪个明君又不爱才呢？爱才容易求才难。南巡的途中，康熙不忘发掘人才，跟地方上一些有贤名贤才的人谈话，量才录用。这既能挑选人才，又能笼络天下士人之心，一举多得。

六是游览名胜。康熙本人是个有艺术细胞的人，对于美景名胜当然也不会拒绝，看看自己治理下的大好河山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康熙过人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在游玩上面耗费太多精力，而是放在一个非常次要的地位。这是他跟乾隆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乾隆南巡跟乃祖康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南巡的本意也是为了察吏安民，知得失，识兴替，制定更加利国利民的政策。动机虽好，可是做起来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说到才智和聪明，乾隆未必比康熙差多少，但为什么结果迥然有别呢？其根本原因不是才智，而是品格，康熙能够克制自己，乾隆却相对显得有些放纵了。

乾隆南巡也是把治理黄河当成大事来看待，乾隆甚至说过：“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乾隆并没有光说好话不做好事，在治理河工这块他确实下了很大工夫。

乾隆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修筑海塘，这就是为什么他屡次住在海宁陈阁老的家里。钱塘江的水位关系到江浙一带百姓的生计，也关系到朝廷的赋税，所以乾隆才深入了解钱塘江的水情。

乾隆南巡也有笼络人心的意思，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和当地的父母官以及地方上的名士交流，甚至祭拜明陵，拜谒孔庙，以此笼络天下人心。

在减免赋税这块，乾隆做得比康熙还多，这也是南巡的一个原因之一。南巡需要大量的开支，这些开支基本上是地方解决。乾隆自然报之以李，凡是路过的州县都减免钱粮，百姓对此是非常感恩的。

乾隆南巡还有一个目的：笼络官商。这跟康熙南巡不太一样，以乾隆的脾气，他是更喜欢人治的。所以，他不会像雍正那样对待官员，他更多的是笼络天下的官员，其中还包括商人。乾隆花钱非常大方，光是国库里的钱无法支撑乾隆挥霍，很多商人自然会支持乾隆，所以乾隆对商人还是非常看重的。

游山玩水是乾隆南巡的一个重头戏，所以在南巡的过程中，乾隆留下了太多的风流韵事。

表面上，乾隆南巡和康熙南巡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往深里看，大不相同。康熙每一次南巡都是尽量节俭，而且费用由内务府解决，不动用百姓一针一线。如果地方官因此要百姓摊派，会受到康熙严厉的惩罚。乾隆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每一次南巡都是兴师动众，极为铺张奢华，如此劳民伤财，跟隋炀帝下江南有异曲同工之妙。

劳民伤财的南巡

乾隆十五年，南巡之事就已经在紧锣密鼓之中筹备了。乾隆上任之后，经过十五年的积累，国库已经很充裕了，南巡的钱是没问题的，所以乾隆希望尽量办得隆重一些。

第一次南巡随行的大臣有三十二人，侍卫章京官员六百一十一名，兵丁两千五百五十九人，马匹六千六百九十匹。南巡途中经过的一些地区还得准备大量的船只和马匹，乾隆御用船只由漕运衙门打造，装饰要求奢华精美。此外，还有大量运粮的骆驼、骡子等等。

南巡的路线是这样的：先经过直隶到达山东，在山东祭拜孔庙后，转到江苏，再由江苏进入浙江。光是陆路就有一千七百五十八里，水路一千三百四十六里，往返路程总计五千八百四十里。乾隆每到一处，地方官都要带领兵民前来迎驾，百姓跪在地上夹道欢迎，场面非常宏大。

皇帝南巡这是百年难遇的大事，地方官都引以为荣，百姓也乐得看热闹。所以，只要乾隆到一个地方，这里就成了黄金旅游点，许多百姓赶过来围观，人口往往暴增。乾隆还要求，各地必须保证临时增加人口的物资供应，不能让人饿肚子，所以事先截留几十万石的粮食保证地方上的供应，以免出现粮食匮乏的事情。乾隆是不希望看到有人饿肚子的，南巡本是喜庆事，如果因这事让许多人饿肚子，不仅良心不安，也会煞了喜气。

准备好充足的粮食和蔬菜也是为了防止物价上涨，影响经济的稳定。南巡需要调用大量的民夫，光是乾隆乘坐的御舟就调用了三千六百多个纤夫。这固然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但怎么看怎么都让人觉得心里不踏实。康熙在南巡时就没有这些问题，平平静静，无风无雨，极少扰民。

根据账面上的统计，乾隆六下江南耗费了两千多万两银子，可以

肯定，实际数目绝对比这个多得多。各级地方官和商人们贡献了多少钱是没法算进去的。

乾隆南巡虽说也做了一些实事，总的说来就是摆阔花钱，吃喝玩乐。

乾隆是个非常喜欢享受的皇帝，凡事喜欢讲排场，饮食相当讲究。在皇宫里享受可以理解，难道南巡的途中就不可以将就一下吗？换做乾隆的祖辈或者子孙都可以，但乾隆是不能将就的。就拿饮用水来说，乾隆喝的是最上等的矿泉水，在直隶饮用的是玉泉山中的泉水，在山东喝的是济南珍珠泉水，在江苏喝的是镇江金山泉水，到浙江则是杭州虎跑泉水。光是运输这些水，就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有人就问了，喝水就不必这么讲究了吧，地方官为何不能用一般的水假冒呢？

谁敢啊，乾隆的舌头可灵敏了，就算舌头不灵敏，他还有一种特制的仪器，能够测量水质的好坏。如果你敢忽悠他，那是活腻了。

南巡的途中还带了大量的牛羊，牛羊虽多，但也不够吃。不够的肯定是从地方上取，总之，皇帝南巡途中的物资不会有半点匮乏。

乾隆经过的御道也是非常讲究的，陆路御道要修得平直宽敞，路面要坚实稳固。中心正路宽一丈六尺，两旁马道各宽七尺。有石桥的地方，一律要撒上黄土。御驾经过的地方，必须用清水泼街。

沿途修建了三十多处行宫，虽为行宫，条件也不能差。必须布置得富丽堂皇，起码要做到一住进去就能感觉到皇帝的气派。尽管乾隆让各地修建行宫时不要铺张浪费，但事实上地方上把行宫修得相当豪华，也没看乾隆责备惩罚他们。

商人也借着这个机会向乾隆邀宠，他们纷纷掏钱承担乾隆在江南的花销，有的甚至主动负责接待乾隆。乾隆第一次南巡经过扬州的平山堂，当地的商人闻知乾隆酷爱梅花，集体出资在行宫里栽种了上万株梅花。乾隆来到这里后，看到一望无际的梅林，大为愉悦。盐商汪氏，破费几万两银子在扬州建造了“三仙池”，乾隆看了后大大夸奖了汪氏一番，自然在官盐这块会多给他一些项目。

皇帝下江南，百姓虽说可以看热闹，但真正受苦的还是百姓。御道要笔直，碰到不笔直的地方，不得不把民房拆迁，老百姓活得好好的，突然要搬家，谁乐意啊！一边是皇帝辇车浩浩荡荡，一面是百姓怨声载道。号称察吏安民的乾隆非但没有真正做到安民，反而一再扰民，表面文章做得再好，也不能掩盖舆论。

每到一地方，侍卫们都要清道，防范百姓如同防贼。虽然乾隆

口口声声说自己不会回避百姓，但实际上把百姓隔得远远的，老百姓只能看到浩浩荡荡的巡幸队伍，根本没法看到乾隆长啥样。有一次，队伍经过扬州时，一个女人在城楼下面烧火做饭，侍卫们看到烟火，以为有人要行刺，立即乱箭将那名无辜的女子射死。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乾隆晚年时总结南巡说：“朕在位六十年，并没有什么失德的地方，只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好处不多，坏处不少。”

为此，乾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将来如果有皇帝要南巡，你如果不阻止的话，你就没脸在地下见朕了。”

嘉庆当皇帝后，有一次打算南巡，时任直隶总督的吴熊光立即出来阻止，把乾隆对自己说的话向嘉庆复述一遍。这才打消嘉庆下江南的打算，乾隆好歹算一个有自知之明的皇帝。

南巡途中的故事

乾隆第一次南巡时来到扬州，富商汪如龙献给乾隆一个才艺双绝的歌妓，这个歌妓名叫雪如，歌喉如同夜莺，肌肤雪白若冰雪。得到雪如后，乾隆非常欢喜，一高兴，就赏给汪如龙二品顶戴，让他在御前当差。

汪如龙得到好处后，极大地刺激了其他人的欲望，这些人尽己所能讨好乾隆。陈阁老和雍正关系比较好，又是海宁的望族，所以此次乾隆视察钱塘江就暂住在陈阁老的家里。乾隆第一次南巡时，陈阁老还活着，为了让乾隆住着舒服，陈阁老家人把安澜园修建得富丽堂皇，将通往家门的道路修建得平坦宽敞。乾隆到来前，陈阁老全家人在码头跪迎。

到了陈家后，乾隆对陈阁老相当亲热，当场口占诗句：“老成忆告能无惜，皇祖朝臣有几人？”陈阁老全家将这首诗当成宝贝珍藏着，视为隆恩。乾隆在陈阁老家里待了四五天，花费不算小。为此，乾隆赏给陈阁老一笔库银。乾隆临走前对陈阁老说：“朕走以后把安澜园的大门封上，以后若非天子临幸，这门不可以再开。”

陈阁老自是满口答应。

乾隆在南巡的路上喜欢微服私访，一天晚上，他带着两个随从来到一个村子里。忽然下起了大雨，乾隆便敲门投宿，结果那个住户理都没理他。乾隆也不生气，只好去敲另一家的门。没想到这一家养着

一条狗，乾隆还没走进院子里，狗就狂吠不止。听到狗叫，这家人以为有贼，拿着棍棒冲出来，把乾隆和两个随从狠狠揍了一番。两个随从想说“你们敢打皇上”，乾隆示意别让他们说。

乾隆只能大喊救命了，这时走来一个白发老者，老人阅历颇深，一看乾隆就知道不是寻常人物。此人气度不凡，显得尊贵威严，即使被人痛打，也流露出一凡的气概。老人说：“此人仪表堂堂，肯定不会是盗贼，你们快放了他。”

乾隆对老人说，自己是山东人，出生于书香世家，特来江南看望表哥，不巧下雨了，无处避雨，所以才到这里来投宿。

老人一听，便让乾隆住在自己的家里。老人有两个儿子，长子三十多，职业务农；小儿子二十多，读了几年书，人很机灵。当晚，乾隆就与老人的小儿子睡在一起。两人聊得挺多，乾隆从他口中得知了许多民间趣事，各地的风俗习惯，以及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第二天，乾隆临走前送给老人一块白玉。老人推辞不受，乾隆便把白玉送给了老人的小儿子。几天后，乾隆以皇帝的身份拜访老人家，并给他的小儿子赐名“奇逢”，还带他去京城上学。村里其他人听说这个人是乾隆，都非常吃惊，那几个打过乾隆的人非常害怕，没想到乾隆一笑置之，并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

还有一次，乾隆巡游，百姓们想瞻仰一下皇帝的尊容。乾隆听说后，便恩准了，从坐辇上走下来，来到百姓中间。一个百姓激动地喊乾隆为“皇帝老爷”，侍卫一听，认为这个人大不敬，准备把他拿下治罪。乾隆本人对这个称呼倒也没在意，只是觉得有些奇怪，便问随从。一个大臣说：“南方的百姓愚昧啊，不识大体，他们往往把上天称为天老爷，把大地唤作地老爷，什么神灵都称老爷。”

乾隆哈哈大笑，知道这个百姓并无恶意，便让人释放了他。

来到扬州时，乾隆还光顾了史可法祠堂，当着大家的面称赞史可法是一个忠心耿耿的爱国将领，并赐史可法“忠正”二字。乾隆亲自为史可法题了一首诗，当时乾隆身边有人提出疑问，史可法是因为抗清被豫亲王多铎杀的，赞扬他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乾隆回答说：为人臣者当然是各为其主，史可法虽然是反抗我大清，但是他为国尽忠的精神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做臣子的节操最为重要。

有一次，乾隆路过山东济宁，当时恰好济宁出现了灾情。知州颜希深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不想因此耽误了接待乾隆这样的大事。和珅很生气，让人把颜希深的家人抓过来审问。颜母解释说，河工出了

问题，灾民汇聚济宁，非常可怜，我儿自作主张，开仓赈济百姓，所以耽误了圣驾。

太后钮祜禄氏看颜母回答得入情入理，对乾隆说：“颜希深虽然于礼节有亏，但情有可原，应该赦免他。”

后来，太后又对乾隆说：“颜母是一个贤母，他的儿子肯定是一个好官。”乾隆点头称是，不久便提拔颜希深为河南巡抚。

乾隆六下江南留下了太多的奇闻逸事，六下江南虽然劳民伤财，但不能不承认对于文学艺术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问君做了多少事？

六次南巡乾隆五次视察黄河和淮河，四次视察钱塘江工程，也不是一点实事也没干。

黄河最主要的问题是泥沙淤积，导致水位上涨，对周边各省的人民造成很大的危害。到了清朝，黄河决堤的问题更加严重。淮河也是这样，经常发生水患。

四年，黄河发生水患，安徽十五个州县受灾；六年，水患淹没了江苏、安徽二十八个州县；七年，淮河决堤，百姓逃难；八年，淮河再次发大水；十一年，黄河和淮河同时发大水；十五年，安徽再次遭受洪灾……

第一次南巡时乾隆到洪泽湖视察工程，他发现黄河大堤只有三座大坝，到了涨水季节，洪湖水位就会上涨。如果疏导不及时，就很容易酿成水灾。乾隆亲临大坝边上，采纳了河道总督高斌的建议，增修两座大坝，将这五座大坝命名为“仁”“义”“礼”“智”“信”。以后，只要水位上涨，就分别从五座大坝中放水，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黄河大堤和下游的安全。

乾隆前两次下江南并没有视察海塘工程，但后面四次都去了。到了钱塘江岸边，乾隆跟治理钱塘江的官员们交流，广泛吸纳各种意见，亲自指导海塘工程的建设。

在治理河工的问题上，乾隆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南巡的途中，乾隆还来了个“路边招聘”，沿途他会接待一些读书人。乾隆表示扩招童生，增加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的童生名额。有不少读书人会向乾隆献诗，乾隆觉得这是一个选拔人才的好机会，便决定自己出题，考考这些人，表现出色的就让他们做官。还别说，这

种路边招考，还真选拔出了不少人才，后来这些人才有人成为封疆大吏，有人成为朝廷重臣。

乾隆做得最实惠的一件事莫过于减免钱粮，乾隆规定，凡是自己经过的州县，免去当年钱粮的十分之三。若是受灾的地方，则免去一半。对于安徽、浙江、江苏三省拖欠的银两，乾隆也下令减免或全免。

六次下江南，乾隆总共免去百姓钱粮高达两千万两银子。乾隆知道，这是笼络百姓的最好办法，光喊口号是没用的，百姓得到实惠了，自然大呼这个皇帝圣明。除此之外，一路上乾隆还赦免了一些犯人，同时尽量避免随行人员踩坏农作物，这些也是值得肯定的。

该做的事情要做，该玩的也应该玩，乾隆是一个做事享乐两不误的皇帝。下江南的路上，乾隆游遍山山水水，经过直隶卢沟桥时，乾隆在石碑上题写了“卢沟晓月”四字。到了良乡县的弘恩寺时，乾隆被这里的景色迷住，寺庙里古木葱郁，环境清幽，是修身养性的绝妙处所。乾隆留恋此地久久不能往返，写下了好几首优美的诗篇。

在山东，乾隆登泰山，拜孔庙，访晏子祠、玉皇庙等名胜古迹。到了江南，游玩的地方就更多了，这些名胜古迹和园林风景美不胜收，乾隆沉醉其中，身心俱悦。游嘉兴南湖之时，乾隆写下了一首诗《烟雨楼》：

春云欲沔旋濛濛，百倾南湖一棹通。

回望还迷堤柳绿，到来才辨谢梅红。

不殊图画倪黄境，真是楼台烟雨中。

欲倩李牟携铁笛，月明度曲水晶宫。

从乾隆的诗作中可以看出，畅游江南给他带来了许多欢乐。想想也是，紫禁城虽然盛大恢宏，但是和江南美景相比，也显得太单调了。

第九章 天子也风流

此时，乾隆的心里充满了寂寞与哀伤，作为一个皇帝，他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是面对命运的力量，他发现自己是这样的无力。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贤后一去不复返

乾隆与康熙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与原配的感情都非常好，虽然是父母指婚，但情深意笃，两情长久。康熙与乾隆一生最爱的都是第一位皇后。

乾隆的挚爱是富察氏孝贤皇后，可惜自古红颜多薄命，孝贤皇后才三十多岁便猝然离开人间。富察氏是满洲镶黄旗人，察哈尔总管李荣保的女儿，协办大学士傅恒的亲姐姐。富察氏是由雍正钦点的儿媳，婚后与乾隆的感情很好，两人相敬如宾，恩爱非常。

婚后第二年，富察氏就为乾隆生下了一个儿子，雍正对这孩子非常喜欢，亲自为他取名为“永璉”，大有希望他延续帝国大业的意思。

乾隆即位后，服完二十七个月的孝期，便册立富察氏为皇后。应该说，对这个皇后，乾隆是非常满意的，在乾隆心中，富察氏简直就是长孙皇后那样的贤后。自古婆媳关系最难处，但富察氏与太后的关系相当好。有了这样一个贤内助，后宫之事完全不必乾隆操心了，所以乾隆说自己之所以全心致力于国事，军功章上有富察氏的一半啊！

明君贤后，还有聪明的太子（乾隆很早就将永璉密定为储君），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完美。可惜，对于完美的东西连老人都嫉妒。乾隆三年十月，一个巨大的打击降临到乾隆和皇后头上，永璉因病医治无效去世。这夫妻俩伤心得跟个泪人儿似的，乾隆悲哀已极，以太子的礼仪安葬永璉，并公布了永璉的身份为密定继承人。

幸运的是，十一年四月初八，孝贤皇后又为乾隆生下了永琮，乾隆大喜，再次将永琮密定为继承人。然而，灾难再次降临到这对父母身上，永琮不满两周岁就因出痘而死，这对乾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孝贤皇后一病不起，乾隆勉强振作，以太子礼仪安葬永琮。

真是祸不单行，这些天钦天监报告天空出现异象，有一颗“客

星”出现在离宫六星之中，这预示着中宫皇后可能有难了。乾隆听了大惊，自我安慰地说，这可能是说皇后痛失爱子吧！

十多天后，客星消失，皇后的病也逐渐好了起来。乾隆放心了。

不久就是东巡的日子，届时乾隆将带上太后去祭拜泰山和孔庙。要不要带上皇后呢？乾隆想皇后身子刚好，还是留在皇宫里养病吧！不过，皇后执意要去，说自己在病中梦到了碧霞元君，此去就是要去还愿。乾隆答应了她。

尽管如此，乾隆却老是觉得不安，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在他心头。东巡前几天，他心烦意躁，写下了二十首小诗排遣内心的烦闷。其中有一首小诗叫《一去无还意》：记得分离日，相期不日还；如何一契阔，长此望边关。

这些诗句完全是不经意中写出来的，写完后，连乾隆自己都感觉诧异。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写出这么哀伤惨绝的诗，想到这里他心头更加压抑。

东巡之旅终于开始了，到了山东后，乾隆等人先去曲阜祭拜孔庙。接下来便是爬泰山了，一路上看不出皇后有什么异样，她的精神似乎很好。此去泰山，皇后重点拜访的一个地方是碧霞宫，乾隆和皇后在此矗立良久，仿佛都被一种无言的情绪笼罩，久久不忍离去。

前往济南的途中，皇后终于病倒了。乾隆想让她在济南府养病，皇后却不愿因此耽误了国事，让乾隆早日启程回京。旅途颠簸，皇后病体如何受得了。到德州时，皇后已经快不行了，当乾隆赶到她身边时，皇后已经闭上了眼睛。

此时，乾隆的心里充满了寂寞与哀伤，作为一个皇帝，他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是面对命运的力量，他发现自己是这样的无力。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乾隆提笔，书写满腔的愁怨：

恩情廿二载，内治十三年。

忽作春风梦，偏于旅岸边。

圣慈深忆孝，宫壶尽钦贤。

忍诵关雎什，朱琴已断弦。

孝贤皇后是乾隆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如果她没有这么早去世，乾

隆应该不至于沦为一个风流天子。多情自古伤离别啊，不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尽管乾隆对孝贤皇后如此深情，关于她的死还是留下了许多传言。

比如，有人说孝贤皇后是跳河自尽的，这是《清朝野史大观》的说法。书中记载，乾隆喜欢上了傅恒的夫人，经常跟她私通，最后被孝贤皇后察觉了，两人经常为此争吵。一次，吵翻了脸，孝贤皇后颜面扫地，跳河自杀。

这些传言无非是为了抹黑乾隆，孝贤皇后的真正死因是感染风寒。乾隆与她的感情很好，真正对她精神造成沉重打击的是两个爱子接连去世。

红颜未老情已绝

乾隆的第二任皇后是乌拉那拉氏，我们在前面已经对她简单介绍过。那拉皇后的出身远不如孝贤皇后高贵，我们可以从正史的记载中推断出，那拉皇后人品还是不错的，但是性格非常倔强。乾隆并不想册立她为皇后，在他心里不想任何人取代富察氏，但太后执意如此。乾隆的母亲也算是一个贤母，由此可以推断，那拉氏肯定也是个贤惠的女人。

那拉氏当上皇后后，乾隆对孝贤皇后的思念更加深切。说实话，乾隆并不了解这个皇后，等他了解了，才开始对她厌恶。我们可以推测，太后也不了解那拉氏。那拉氏表面非常温柔贤惠，其实骨子里非常刚硬，从后来发生的事情中我们可以得知这点。皇上就算有些花心，也不至于剪发为尼，要咒皇帝死啊！

就表面来看，那拉皇后即使比不上孝贤皇后，也差不多了。但在乾隆心里，他深深明白那拉皇后表面和顺，灵魂深处却有一种排斥人的东西，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犀利”，她缺乏女人天性中如水的柔性。乾隆是个感情非常细腻的人，他敏锐地感觉到那拉氏虽然对自己非常好，但其实对自己并没有体贴入微的真情。

所以，乾隆无法从内心深处接受这个皇后。如此一来，自然会疏远这个皇后。看到乾隆经常往其他妃子那里跑，她这个皇后醋意翻滚，对乾隆极为不满。

那拉虽然执掌后宫，但心里那个委屈真是一言难尽。那拉时常在

中宫垂泪，不过她天性不是一个软弱的女子，然而面对至高无上的真龙天子，难道她还能反抗吗？她反抗的唯一方式就是向太后诉苦，太后自己就是忍过来的，想当年雍正对这个太后是非常冷落的。太后告诉那拉：“我们做女人的，就这种命，忍吧，好歹你已经是皇后了，如果将来你的儿子当上了皇帝，你就跟我一样，做个尊贵的太后果了。”

话虽如此，那拉还真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她不服，她想反抗命运。她受不了看到乾隆在其他女人的怀抱里缠绵，她要发泄，她要表达自己对乾隆的不满。

那拉就像一个火山，终有一天会爆发的。

乾隆三十年，乾隆第四次南巡，那拉氏一同前往。到了美女如云的杭州时，火山终于爆发了。

二月十八日，乾隆忽然下旨让福隆安提前护送那拉皇后回京，并在皇宫中软禁起来，理由是皇后发疯病了。

皇后怎么会无缘无故发疯病呢？根据宫中流传的消息，其实那拉哪里有什么疯病，不过是冲撞了乾隆，乾隆教训了她一顿，她哭喊地跑到太后面前，恳求到杭州尼姑庵出家。太后不答应，好言好语安慰那拉。这位倔强的皇后哪里听得进去，她居然满脸疯狂的表情，拿出剪刀，将一头青丝剪去。根据满洲的风俗，女人随意剪发是大忌，是咒夫君死的意思。

那拉为什么突然做出这种疯狂的举动？正史中是没有记载的，也不可能记载，事关乾隆的声誉。相对来讲，野史的记载比较真实一些，乾隆到了杭州后，沉溺于美酒声色中，左拥右抱。那拉气不过，跑到乾隆面前，以“劝谏”的名义含蓄地批评了乾隆，乾隆大怒，大概说了什么难听的话。那拉彻底被激怒，指着乾隆的鼻子大骂，乾隆盛怒之下对那拉拳脚交加。

众目睽睽之下，当着那群贱女人的面，乾隆如此羞辱自己，那拉气不过，终于闹到剪发出家的地步。野史的记载虽然不一定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南巡过程中，那拉确实惹恼了乾隆。从此以后，夫妻之情就此断绝。

乾隆回宫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废除那拉氏，不过这事遭到太后强烈反对，只好作罢。尽管没有废掉皇后，但乾隆此后对她的态度只能用残忍来形容，那拉虽然仍然是皇后，但其实已被打入冷宫。三十一年五月，乾隆下令收回那拉氏的皇后册宝和嫔妃册宝，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在名义上废你，但你现在连个妃子都不如。

从此，那拉活得生不如死，像个疯子一样在冷宫中凄凄惨惨戚戚，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乾隆对此当然一清二楚，但是他毫无同情之心，作为一个帝王，他有一副雷打不动的铁石心肠。听说那拉生病了，他不仅不让御医去为那拉诊治，反而自己跑到避暑山庄打猎。

得知这一切，那拉最终带着无限怨恨去世，相信她死的时候都想做鬼将乾隆的肉一块块地咬下来。

那拉的悲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性格悲剧啊！

南国有佳人

这世界，也许会缺乏真情，但从来都不缺美女。

那拉皇后死后十一年，一个汉族女子走进乾隆的生活里。这是非同寻常的一个事件，因为根据清朝的制度，皇上是不能选汉女为妃的，江南汉女则更是清廷所忌讳的，江南历来就是个反清的大巢穴。

但这种限制是有其特定的背景的，如果该汉女本是八旗后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譬如，康熙的母亲本是汉人之后，但由于他们早就入了八旗，根据清廷的标准，他们就属于满人。年羹尧的妹妹也是汉人，一样做了雍正的贵妃，只能说他们的血统是汉族，但籍贯是满洲。

乾隆本来是不可以立江南籍女子为妃的，但他多次下江南，难免遇上心仪的女子。事实上，根据史料所考，乾隆至少有两位江南籍的妃嫔，一个是来自扬州的明贵人，一个是来自苏州的陆常在。

乾隆四十三年夏天，一个叫陈济的人从扬州来到京城，这个人自称是“国舅爷”，他给内务府大臣福隆安送了一个折子。在折子里，他自称是明贵人的哥哥，现在生活无着落，希望内务府赏给自己一个差事。福隆安收到折子后，断定这人说的应该是真的，一来宫中确实有明贵人，二来冒充皇亲国戚可是死罪。

福隆安不敢擅自做主，便将此事奏闻乾隆。乾隆一看，女人的家人找上门来了，便让福隆安给两淮盐政使写封信，给他安排一个差事。接着，乾隆又想起苏州的陆常在，也让福隆安把陆常在家人的工作落实。乾隆叮嘱此事一定不能张扬，看来在宫中明贵人和陆常在是非常神秘的角色，也许连太后都不知道她们呢！

我们可以肯定，乾隆不可能是通过正规的程序让这两个江南女子进宫的，那么乾隆究竟是用什么手段把她们弄进宫的？

乾隆六次下江南，这两个美女很可能是江南的地方官进献给乾隆的。但这么做有违祖制，所以乾隆不可能光明正大。而且，乾隆也知道，自己的榜样康熙也做过同样的事情，既然祖父能做，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做呢？

据说，那拉皇后就是因为江南女子跟乾隆闹翻了，乾隆要立江南女子为妃，那拉不同意，可能话说重了，结果酿造了一场悲剧。

我们可以肯定明贵人陈氏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否则乾隆不会为她甘冒违背祖制的风险，也不会跟那拉闹翻。

由于乾隆在私生活上较为放纵，以至于有人怀疑嘉庆的母亲魏氏是一个苏州女伶，不能说这种观点完全是臆想，只是找不到充足的证据而已。

乾隆是一个非常风流的天子，素来喜欢怜香惜玉，江南美女婀娜多姿，自是乾隆一大爱好。所以，在乾隆的私生活中，始终伴随着江南美女的身影。

神秘美女香妃

自从《还珠格格》红遍大江南北，就没有不知道香妃的。电视里演绎得特别有意思，香妃身上有一种奇异的体香，能够招蜂引蝶。其实早在1940年就有一部名为《香妃》的电影，是上海合众电影公司拍摄的。

《香妃》电影的故事是这样的：回部的酋长布那敦拒绝向清廷进贡，乾隆非常恼怒，派兆惠前去征剿，第一次征剿失败了。但兆惠给乾隆带来一个消息，布那敦有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名叫沙天香，人称香妃。这位佳人生来有一股体香，这么一来乾隆更加心痒，派遣兆惠率领十万大军第二次征讨回部，要求兆惠一定把香妃带回来。这一次，兆惠打败了布那敦，终于把香妃带了回来，乾隆看到香妃，立即堕入爱河。但是香妃对乾隆却没有爱意，她心里只有布那敦。乾隆为了取悦香妃，在宫中模仿回疆的建筑修建宫殿。香妃虽然感动，却始终不能把自己交给乾隆，而且她还经常带着一把匕首在身边，以防乾隆用强。太后听说香妃经常带着一把匕首，担心乾隆受伤，便趁着乾隆外出的时候把香妃赐死。等乾隆赶回来时，香妃已经咽气了。

1915年，北京故宫古物陈列馆中展览了一幅身着戎装的女子画像，主办方为画像取名为《香妃戎装像》。画中一个漂亮的女子内穿红衣，外披铠甲，手持佩剑，一副英武美丽的样子。据说这幅画出自

宫廷画家郎世宁的手笔，画中人物便是传说中的香妃。

画像下面还有备注《香妃纪略》：“香妃者，回部王妃也，美姿色，生而体有异香，不假熏沐，国人号之曰香妃。或有称其美于中土者，清高宗闻之，西师之役，囑将军兆惠一穷其异。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师。帝命于西内建宝月楼居之……”

《香妃纪略》虽然有打广告的嫌疑，但是白纸黑字写得这么明白，连香妃住的地方都给出了具体地址，由不得人不信啊！这个展览一出来，香妃的故事很快传遍京城的大街小巷。各种小说、戏剧、影视在这个基础上大加发挥，香妃的故事流传到海内外。

在《香妃纪略》中提到了香妃的住处宝月楼，还有模仿回疆建筑的回子营，以及乾隆为香妃修建的浴德堂（专供香妃沐浴之用）——这些地方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关于香妃的说法才如此蛊惑人心。但是根据清史学家孟森等人的考证，香妃并没有这么神秘，很多故事都是人们添油加醋进去的。

根据孟森的考证，宝月楼跟香妃没有半点关系，是乾隆在瀛台和皇城之间设置的一个屏障。瀛台周围风景宜人，春夏之间乾隆喜欢到这里来赏玩，但是瀛台和皇城之间没有屏障。乾隆如果站在瀛台上看风景，长安街上的老百姓能够看到他。作为一个皇帝，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私生活暴露在老百姓面前，所以乾隆下令修建宝月楼挡住外面的视线。

那么回子营又是怎么回事呢？回子营是为回人而建的，是为那些前来觐见和投诚的回人建的，并不是为了一个女人建的。

这个浴德堂也完全不是什么洗澡的地方，浴德堂早在元代就存在。如果浴德堂是香妃洗澡的地方，那么她就要经过外殿，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浴德堂沐浴。而且，浴德堂旁边就是武英殿，武英殿是修书的地方，大臣们经常在这里出入。香妃到这里来洗澡，还不被大臣们看个够。所以，孟森说，就算乾隆是个淫乱昏聩的皇帝，也不会做出这种愚昧的事情，让自己的爱妃到朝堂旁边去洗澡。乾隆是一个非常注重脸面的皇帝，而且也是一个很精明的皇帝，不可能做出这种蠢事。

如此，我们倒要问问了，那么画中的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香妃呢？

这幅画以前是保存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画像的原名是“美人画像”，并没有说是香妃。主办方为了造成新闻效应，故意把画中的这个女人说成是香妃。如果画中的这个女人不是香妃，又会是谁呢？说

实话，还没人考证出来她究竟是谁，有可能并不是哪个具体的人，仅仅是一幅画而已。从乾隆的家庭来看，画中人很可能是嫁给和珅儿子丰绅殷德的十皇女，固伦和孝公主。十公主天性有英豪之气，喜欢舞枪弄棒，经常跟着乾隆到木兰围场狩猎，骑射技术可能比乾隆还好。乾隆晚年因立储之事伤透脑筋，曾经半开玩笑地对十公主说：“如果你是男儿，朕一定把皇位传给你。”

香妃的故事固然传得沸沸扬扬，但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呢？

根据孟森的考证，香妃的原型还是有的，只不过远远没有传说得那么神奇，实际上是乾隆后宫里非常普通的妃子。

这个女人来自回疆维吾尔族，是和卓的后裔，进入后宫后封为贵人，后来晋封为容妃。她身上没有体香，也没有被太后赐死，长得虽漂亮，但远远称不上风华绝代。容妃比乾隆小二十三岁，两人感情好不好呢？

我们先来看看容妃是怎么进入乾隆后宫的，容妃是在回疆叛乱之前进入乾隆后宫的，回部曾经受准噶尔奴役和骚扰，是乾隆帮助回民击退准噶尔的。事实上，容妃进入乾隆后宫也是一次政治联姻。传闻说香妃被乾隆大军掳来，这是不对的。传闻还说香妃被太后赐死，这就更不对了。太后逝世十一年后，容妃才去世，难道太后在黄泉之下也能把容妃赐死？

容妃入宫后，跟乾隆的关系还是非常不错的。乾隆对这位年轻的妃子很宠爱，不仅尊重她的生活习惯，也尊重她的宗教信仰。乾隆出巡的时候经常把容妃带在身边，如果我们给乾隆的爱情指数弄个排行榜，最爱的肯定是孝贤皇后，容妃和嘉庆生母令妃究竟谁排第二谁排第三，估计乾隆自己都弄不清楚。乾隆对江南女子的喜欢更多是一种风流，还没有上升到灵魂之爱的层面。

容妃与乾隆相处了三十年，在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去世，终年五十五岁。容妃死后，葬在清东陵。但是在新疆喀什也有一个香妃墓，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又是好事者添油加醋的，这并不是什么香妃墓，而是和卓家族墓。这座坟墓在崇祯时期就已经有了，是容妃的外祖父为自己的父亲修建的。

香妃一事告诉我们，要了解历史决不能听信传言，历史由于其年代久远是最容易以讹传讹的。

福康安真是乾隆的私生子吗？

清朝末年广为流传的《清宫词》中有这样一首诗，含蓄地透露了乾隆与福康安的非正常关系，我们来看看吧：

家人燕见重椒房，龙种无端降下方。

丹闱几曾封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

应该如何去读这首诗呢？“燕见”就是“宴见”，也就是说乾隆通过宴会认识了傅恒的夫人，两人产生了情丝，遂在宴会之后偷情，而福康安就是他们偷情的果实。因为这层原因，福康安生前封贝子，死后追赠为郡王。

乾隆老婆孝贤皇后是傅恒的姐姐，福康安应该叫乾隆一声姑父，姑父怎么会变成了父亲呢？我们知道，有清一代，有异姓不封王的规定，像吴三桂这种是特殊情况，他们在清朝开国时候立下了巨大功劳，当时的清廷不得不笼络和妥协。自康熙以后，臣僚中就没有异性封王的例子，福康安却是一个例外，难怪有传言说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

很多小说家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譬如金庸在《书剑恩仇录》里就写到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高阳在《乾隆韵事》里也大肆渲染乾隆与傅恒夫人的暧昧之情，二月河在《乾隆皇帝》中也描写了这段韵事。甚至于历史学家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也用小说笔法描写乾隆和傅恒夫人的风流事，蔡东藩也怀疑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但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便写下了这样的话：“福康安是傅恒的儿子，乾隆皇帝非常眷爱。”

蔡东藩把结论交给读者自己去下，但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乾隆确实对福康安非常恩宠，但这并不足以证明福康安就是他的私生子。福康安出生于乾隆十九年，自幼被乾隆带进宫，亲自抚养。乾隆对福康安如同亲儿子一样，福康安长大成人后，乾隆对他更为看重。傅恒去世后，福康安被提拔为户部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此时福康安才十七岁。

十九岁时，福康安就带兵出征金川，这次出征，福康安的军事才能得到表现。他丝毫没有贵胄子弟的那种骄矜，上了战场以后非常勇猛，带领人马冲锋陷阵，攻克敌寨几百座，立下了赫赫战功。因这一仗，福康安被封为三等嘉勇男爵，乾隆还命人在紫光阁为他画像，在功臣排行榜中福康安名列第十三位。

从此以后，福康安在战场上的表现一次比一次出色。乾隆四十九年，福康安平定甘肃回民起义，晋封为嘉勇侯。乾隆五十二年，福康

安平定台湾的林爽文起义，晋封为一等公。一等公是为人臣者能够享受的最高待遇，宗室以外的大臣能得到的最高爵位就是一等公。乾隆五十六年，福康安击败廓尔喀军队，并打到敌人的首都，迫使他们开门投降，对清廷称臣纳贡。这一战打得相当漂亮，乾隆想封福康安为王，但是转而一想，觉得不太合适，富察氏已经隆盛无比，如果异姓封王的话，难免会树大招风。

事实证明，福康安在军事方面有杰出的才能，在作战方面他几乎是百战百胜。当然，福康安也有很多缺点，譬如他非常奢侈，花钱如流水，这一点在打仗中也不例外。他往往大手一挥，大把大把地奖励手下的有功将士，所以，福康安的军队开支特别大。

乾隆六十年，福康安在贵州、湖南一带镇压起义，打了几场胜仗，乾隆就封他为贝子，贝子是只有宗室才能享受到的封号。乾隆这时候封他为贝子，显然感觉到再不封，以后可能没机会了。果然，嘉庆元年，福康安在行军途中感染瘴疠，发病而死。

得知福康安的死讯，乾隆万分悲痛，追封福康安为嘉勇郡王，谥号文襄，配享太庙。乾隆爱屋及乌，将傅恒也追赠为郡王。

乾隆自己并没有讳言与福康安的亲若父子般的关系，有人便猜测是不是他们真是父子啊！乾隆厚待福康安究竟是出于“私心”还是“公心”，如果是因为福康安战功赫赫而给他封王，那么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很快，人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乾隆虽然恩宠福康安，却没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傅恒的四个儿子有两个娶了公主，为什么不把福康安招为额驸呢？是不是因为他有皇室血统？

乾隆有两个公主比福康安小四岁，但乾隆都没有把她们许配给福康安。而且，乾隆在傅恒葬礼上写了一首悼亡诗，诗中有“汝子吾儿定教培”，乾隆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世人自己跟福康安的关系非比寻常吗？

乾隆对福康安比亲儿子还亲，但这并不能成为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的证据。就像后来乾隆宠信和珅，难道和珅就一定跟乾隆有不正常的关系？

乾隆深爱着孝贤皇后富察氏，对于她的家族感情很深，福康安作为这个家族后起之辈中的优秀人才，乾隆自然非常欣赏和喜欢。孝贤皇后去世后，乾隆任命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傅恒死后，乾隆将对富察家的恩宠转移到福康安身上，这一点都不奇怪。

从现有的史料看，乾隆和傅恒夫人并没有特殊的关系。傅恒夫人临死之时，福康安正赶往广西，处理缅甸事务。福康安非常希望见母

亲最后一面，乾隆以国事为重为理由，不让他们母子见面。试想，如果福康安真是乾隆和傅恒夫人的私生子，乾隆做事不至于这么绝吧！

再看乾隆那句“汝子吾儿定教培”，这句话其实是说把傅恒的儿子当成亲儿子一样对待，说白了乾隆还是难以化解对孝贤皇后的一片深情。乾隆要栽培傅恒的儿子，并不单单是福康安，只是福康安远远比其他兄弟要优秀，所以乾隆才看重他。

异姓不封王是个死规定，真正操作起来并非如此，一个功臣如果确实有很大的功劳，死后被追封为王也是有的。譬如，皇太极曾追封扬古利为武勋王，康熙曾追封黄芳度为郡王。

综合所有事实，我们判定，福康安并不是乾隆的私生子。

第十章 十全老人的外交手腕

从后来的历史看，乾隆的直觉是对的，西洋人确实是中国梦魇，不过乾隆对待梦魇的方式错了。他以为把大门关上，就能挡住一切妖魔，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制服妖魔的唯一办法就是去了解妖魔，所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打开国门，去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对于传教士往死里整

乾隆养了一批西洋画家，这些西洋画家原本是传教士，苦于中国政策不允许传播天主教，他们不得不寄身于宫廷，混一口饭吃。

乾隆刚上台的时候曾打算缓和宗教政策，提出“禁止旗人信教，其他一概不问”的政策，郎世宁等人如获重生。听闻宗教政策解冻的消息，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们热血沸腾，感叹终于赢得了一个自由传播宗教的机会。

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在乾隆十一年六月，这朵刚刚开放的宗教之花就夭折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福建省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里，破获了一起西洋传教士秘密传教的事件。神父费若望、德方济各和施方济各被拿获，这些神父犯了一个错误，乾隆说只管旗人信教，不管其他人信教，并不表示同意传教士们传教，他只说信教不犯法，没说传教也不犯法。

这三个神父禁不起严刑拷打，很快就供出了福建教区的主教白多禄。白多禄是西班牙人，属于天主教的分支多明我会，奉罗马教皇之命代理福建教区。

很不幸的是这些传教士落到了福建巡抚周学健的手中，周学健是个极端仇视洋教的人。他把这些传教士关起来，严刑拷打，希望罗织出更多更大的罪名，然后奏请乾隆对洋教实行严酷的政策。周学健对这些人严刑拷打，传教士们细皮嫩肉怎么禁得起这么野蛮的酷刑，纷纷就范。

周学健引经据典，细数洋教的危害，请求乾隆将这些人正法，以

此彰示国法，弘扬圣人之道。乾隆犹豫了，当时福建有两千多教徒，把他们全杀了难免会引起国际舆论对自己的不满，虽然乾隆没有国际意识，但这个道理还是懂的。杀人不可以杀太多，杀一两个典型就够了，起到震慑作用。乾隆最后决定，先将白多禄斩立决，以观后效。

费若望等四个传教头目被判“死缓”，到了第二年秋还是“死缓”，根据我们的经验，他们应该是可以逃过一劫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确实可以逃过一劫。

可意外偏偏发生了。乾隆十三年初，在菲律宾吕宋的天主教会要求归还白多禄的遗体。乾隆听说此事，立即警觉起来，这事怎么传到菲律宾去了？看来天主教确实很恐怖，消息传得这么快，组织必然很严密。

这一事件也让四名羁押在狱中的传教士命悬一线，乾隆指示福建海关要严禁内地民众跟吕宋一带的天主教徒往来。这年秋天，乾隆下了命令，将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秘密处决。乾隆下这个命令甚至都没有通知军机处，四人被处决后，报告是：四人在狱中正常死亡。

乾隆的阴毒由此可见一斑，对外国人是这样，对中国人更是这样。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情还是传了出去，当时教徒们并没有想到幕后杀手就是乾隆，或者想到了也不敢直接指出来。

福建教难发生后，很快就蔓延到江苏。在江苏传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黄安多均被捕入狱，乾隆指示江苏巡抚安宁根据福建教案来处理，也就是说秘密处决，然后再上一个“狱中正常死亡”的报告。

此后不久，教难就蔓延到全国，传教士们要么被杀，要么被驱逐。总之，传教士们感到，乾隆的政策比康熙和雍正更严酷。当时，教徒们都认为这场教难的罪魁祸首就是周学健，巧的是周学健不久也因为违反禁令和贪污受贿落马，被乾隆赐死。教徒们纷纷称之为“天主的惩罚”。

乾隆并没有把天主教看成是白莲教那样的邪教，但是对洋教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乾隆看来，尽管洋教现在不是邪教，但很有可能蜕变成邪教。所以，乾隆对于洋教是很不宽容的。

来自大洋彼岸的梦魇

乾隆没有去过欧洲，不了解西洋人，但传教士们说的什么上帝魔鬼、天堂地狱这些东西，他还是清楚的。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他心底唤起了什么样的感觉，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觉得这些洋人有些疯狂，再联想到从欧洲引进过来的红衣大炮，凭直觉，他觉得这些人是潜伏的危险分子，应该抵御。

从后来的历史看，乾隆的直觉是对的，西洋人确实是中国梦魇，不过乾隆对待梦魇的方式错了。他以为把大门关上，就能挡住一切妖魔，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制服妖魔的唯一办法就是去了解妖魔，所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打开国门，去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就在福建教案爆发之时，一个躲在安徽和湖北交界处的山林里烧炭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产生了反清的念头。这个年轻人叫马朝柱，生活非常辛苦艰难，看不到理想，青春对他来说似乎是一场悲剧。没有出路，他于是想到了反清，他经常跟白云庵里的和尚聊天，讨论如何推翻清王朝。

马朝柱夸口说自己在十六岁时做过一个梦，根据梦的指示，自己似乎有九五之命，而且这个帝王师就在护国寺里。白云庵的和尚告诉他，白云庵以前的名字就叫护国寺，莫非……

后面大家可以想象到了，造反之前首先要造势。马朝柱忽悠了一大批人，联想到当时清廷正在镇压西洋传教士，马朝柱告诉大家，明朝后裔朱洪锦现在正在西洋，还有大学士张廷锡和大将吴承云等人支援自己。张廷锡是张廷玉的弟弟，马朝柱说张廷玉跟乾隆闹翻了，待在家里想造反。还说吴承云是吴三桂的孙子，准备继承遗志，起兵反清。

乾隆十五年，马朝柱宣扬说朱洪锦很快就在西洋起事，准备光复明朝。马朝柱打着西洋的旗号造反，多少还是有些创造力的，从乾隆镇压传教士的行为中，马朝柱看出乾隆对西洋人的恐惧心理，所以便将明朝后裔和西洋人捏在一起。

起义最后被血腥镇压，但马朝柱却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人猜测他可能渡海去了西洋，这件事对乾隆刺激很大，重要的不是叛乱，而是叛乱与西洋人的关系。如果西洋人在幕后支持这些叛乱的话，大清的统治将岌岌可危。

乾隆下令在全国对马朝柱进行搜捕，乾隆认定这个人肯定跟洋人勾结，如果没有海外背景，断不至于这么猖狂。乾隆对马朝柱下了通缉令，然而连马朝柱的影子都没看到，搜捕了二十年，始终找不到这个神秘人物的行踪。

越是找不到，越容易产生不着边际的幻想，乾隆觉得西洋人实在是太危险了，这些藏在暗处的妖魔随时会跳出来，扑向大清国，将大清国撕得稀巴烂。乾隆也知道，在自己登基的第五年，荷兰人在印尼屠杀华侨，一万多华侨被杀，时人称之为“红溪之役”。从郎世宁这些宫廷画家的背后，乾隆看到了不一样的西洋人，如果说郎世宁是天使的话，那么，还有魔鬼躲在暗处。

洪仁辉事件

乾隆二十年四月，一艘外国商船靠近宁波港口。浙江水师前去拦截，发现船上有五个西洋人，其中一个人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我……系洪仁辉……英吉利人……”

洪仁辉说他们是想到宁波做生意的，进一些茶叶和蚕丝到欧洲去卖。水师提督武升进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捞油水的机会到了。武升进立即向乾隆奏报，说这些洋鬼子感服圣恩，千里迢迢来这里经商，带来了许多银元和洋酒，还有四十多名汉人水手，这些水手都没有发辫。

乾隆毕竟是作为帝王的最高统治者，他对洋酒银元都无兴趣，也没兴趣跟这些洋人交流，倒是四十多名没有发辫的水手非常警惕。这些汉人模样的人怎么会没有发辫？他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海外华侨，这事一定得查清楚。如果这些汉人是中国人，那可是抄家灭门的大罪。后来查明说这些人是外国人，乾隆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乾隆一看没大事，便让武升进好好招待那些洋人。结果，这些洋人满载而归，把中国的商品带回国内，大发洋财。第二年，他们又来了，不过这次船只要大得多，带来的货物也多得多，水手有一百三十多个。这次，洪仁辉担任起了翻译，中文水平似乎也有所提高。

这一次，乾隆警惕起来了，他感觉到这些西洋人的野心。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些人的野心是什么，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是发财，但乾隆更多的是从“维稳”的逻辑来看问题的。

乾隆于是找这些洋人麻烦：本来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澳门等港口通商，从来没有到宁波来的，这些洋人想把宁波开辟成一个港口，这事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长期下去，滞留在内地的洋人会越来越多。

乾隆并没有直接把洋人轰走，而是指示两广总督杨应琚提高关税，最后关税比广州、澳门等地提高了一倍。

提高关税以后，并没有把这些洋人撵走，他们反而继续在这里经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洋人为什么不在广州通商呢？其实，洋人真正怕的不是提高关税，而是各种各样的陋规，广州那边陋规太多，各级官员敲诈勒索，搞得洋人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在宁波的话，陋规少，采购也更方便，成本价大大降低，虽然关税提高了，但实际利益更大。

浙江巡抚杨廷璋把这些情况如实地禀报乾隆，没想到乾隆居然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策，他决定开放浙江为通商港口，允许外国人到这里贸易。本来这是一项符合发展潮流的政策，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但很快就终止了。

皇帝的一个特征是喜怒无常，乾纲独断，所有事情都凭自己主观意识办事。几个月之后，乾隆就宣布所有外国商船只准到广州港口通商。英国方面认为这是广州地方政府蛊惑皇帝的结果，广州地方政府想独占对外贸易的利益。

确实是这样的，两广总督杨应琚上书乾隆，为自己辩解，说广州官员并没有勒索洋商的行为，只不过是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制；如果不对洋商加以限制的话，恐怕会埋下祸端。杨应琚的话说到乾隆的心坎里，乾隆最怕的就是这点，一旦开放过头，洋人涌进来，不知道会捣出什么事情。

在这一刻，中国历史发生了改变。乾隆的一念之差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如果中国在乾隆时代就走向对外开放，以后历史的发展简直是无法预料的。这虽然是看似偶然的一件事，其实一点都不偶然，乾隆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必然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就算他对外开放了，难保他的子孙们不关闭国门。

中国再一次失去和世界交流的机会，紧紧地关上了国门。

乾隆发出这项命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有放弃挣扎，他们企图搏一搏，说服乾隆开放浙江港口。东印度公司选择的代表便是洪仁辉这位仁兄。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洪仁辉驾驶着一艘小船来到浙江定海，浙江水师立即把他截住。洪仁辉身上有一封信，请求浙江官员呈给皇上。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广州海关各种为非作歹的行为，浙江官员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们做官这么多年，当然知道做官的一个基本准则：不要随便得罪人。

洪仁辉吃了闭门羹，本该回东印度公司好好跟同事们哭诉一番，然后他牛脾气犯了，居然将船只开往天津大沽口。在那里强行登陆，

还对天津的官员说：“我是英国人洪仁辉，是英国的四品官，在广东和澳门做生意，洋行的人欠我五万两银子不还。我在广州告没人理，在浙江告也没人理，所以我就到天津来了，希望你们让我进京告御状。”

洪仁辉花钱买通了许多官员，让他们把自己的案情呈奏给乾隆。乾隆收到这些奏折后，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自己的官员贪污违法在先，另一方面这个洋人居然越海告御状，这明明是让自己这个皇帝下不了台。乾隆让股肱大臣李侍尧审理这个案子。

经过审理，判处广东海关监督李永标流放罪，外加杖打一百，李永标被革职抄家，流放三千里外。洋行商人黎光华欠钱不还也是事实，李侍尧籍没他的家产，归还给洪仁辉。案子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对洪仁辉，乾隆是相当不满的，必须要给他教训。洪仁辉的诉状是请四川人刘亚匾写的，正好可以给他安个“勾结内地奸民”的罪名，外加违禁通商，判处在澳门监禁三年。乾隆说，这是格外施恩，否则是要判处死刑的。刘亚匾真正倒霉，帮人写状子，雇主没死，他倒被处斩了。

这就是洪仁辉事件，事后，乾隆对洋商态度更加恶劣，不断地往历史的反方向走。

马戛尔尼访华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两广总督郭世勋给乾隆报告了一个喜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以乔治·马戛尔尼为代表的七百人代表团前来给乾隆祝寿。当然乾隆八十大寿已经过去，英国人说是补祝。听到这个消息，乾隆很高兴，乾隆刚标榜完自己的十全武功，英国人就不远万里来祝贺他了，绝对是喜事。

乾隆很重视英国使团这次的来访，让各级官员准备好接待工作。乾隆之所以如此高兴是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英国使团来华的目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开放浙江等地的通商港口，保障英国人在华通商的权利。

其实，英国人在访华之前就大致透露了目的，但郭世勋却隐瞒了他们的意图。接到英国人信件后，看到他们以平等的语气对天朝说话，郭世勋知道这大事不好。但英国使者带来了六百箱礼物，这看上去很像是来朝贡的，一向喜欢好大喜功的乾隆对于朝贡的国家向来是来者不拒的。怎么办呢？只好圆滑一下，将英国人的信润色一下，马

上就意义大变，哄得乾隆笑呵呵。

马戛尔尼出身于苏格兰贵族，是英王乔治三世的亲戚。他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外交家，曾经担任英国驻俄国圣彼得堡公使、加勒比群岛总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他的副使斯当东也是一个才华突出的外交家。当他们得知乾隆对他们的来访很欢迎时，喜出望外。不仅如此，乾隆还破例允许他们从天津港口登陆，让马戛尔尼没想到的是，一路上他们受到了殷勤的招待，马戛尔尼等人本能地以为他们此行的目的可以顺利达到。他们完全没有料到是郭世勋从中做了手脚。

代表团到达北京时，乾隆正在避暑山庄举行八十三岁寿典。几天后，马戛尔尼带领七十多人前往避暑山庄觐见乾隆。乾隆这次接见英国使者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英使埃尼斯·安德逊在回忆录中说：“在伙食供应上，我们迄今是很少有理由提出异议的。关于这方面，我们所受的待遇不仅是优渥的，而且可以说慷慨到极点。”

伙食方面没问题，那其他方面肯定是有问题了。

东西方第一次正面接触可以说是一场完全的失败，两国之间的误解是如此之深，乾隆完全无法理解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当然，我们可以说是郭世勋出了问题，故意把英国使者来访说成是进贡朝觐。但我们又不能完全怪郭世勋，他也有自己的难处，乾隆是个什么样的皇帝郭世勋是很清楚的。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大多数官员都是极力粉饰，如果他们照实说话，很可能惹皇帝不开心。

第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就是礼节。乾隆本以为这些使者会对自己行三跪九叩大礼，没想到他们居然按照自己国家的礼仪，对乾隆行单膝下跪礼。根据清朝的规定，任何国家的使者觐见中国皇帝时，都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英国人头上又没有长角，自然不能例外。

马戛尔尼却认为，英国和中国是平等的国家，所以自己只能按照英国的礼仪朝见皇帝。乾隆对此非常生气，他说即使是英国国王亲自来了，也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

马戛尔尼最后被逼得没办法，这么跟乾隆解释：“一个国家使者的举止，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代表了他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君主不能把要求他们臣民的礼节用来要求外国使者，臣民对君主行礼表示屈服和顺从，而外国使者对君主行礼表示尊重和友谊。”

这些话对乾隆能管用吗？不用想我们也知道，根本不管用。没办法，马戛尔尼此行担负重任，不得不考虑妥协。后来，马戛尔尼表示要他磕头也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清廷必须也派出一个大臣跟着他

一起向英王的画像磕头，而且必须把这事记下来，弄个备忘录。

马戛尔尼这番话是对钦差大臣徵瑞说的，这种狂妄悖逆的话徵瑞自然不敢禀告乾隆。他如果告诉乾隆，搞不好就会弄丢乌纱帽，没办法，只好能糊弄就糊弄。后来，英国使者到了避暑山庄后，和珅知道了他们不想磕头，便劝他们还是按照中国的规则办事。然而，马戛尔尼仍然坚持说如果让他磕头，必须满足附加条件。

乾隆知道马戛尔尼不想磕头的事情后，极为生气，下令降低对英国使团的接待规格，减少给他们的物资供应，并取消对他们的一切赏赐。准备等万寿节一过，就打发他们回家。

看到极有可能功败垂成，马戛尔尼只好做出妥协，我们至今不知道这种妥协到底是什么。没有任何资料证明马尔嘎尼行了三跪九叩大礼，但也不可能行的是英国礼节，很可能是某种折中礼仪，据说是九次单膝下跪。有没有双膝下跪我们就知道了，根据管世铭写的一首诗，似乎是双膝下跪，他说英国使者本来是单膝下跪，见识到乾隆威严后，不由自主就双膝跪下了。

不管怎么说，英国使者肯定没有行三跪九叩大礼。结果我们可以想见，马戛尔尼的这次外交彻底失败，万寿节一过，乾隆就让他们打点行李回老家了。

有一点我们必须了解，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英国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英国的人口虽然只有八百万，但是工业革命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英国的军事力量和工业同步发展。而乾隆恰恰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两个强国之间的接触难免会有冲突。

在英国人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商品倾销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料产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都是英国人的必需品，英国人每年要消耗一千多磅茶叶。打开中国国门，与中国自由通商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强烈愿望，其实这个愿望是互利互惠的，如果中国早日和英国平等通商，也可能不会有后来的鸦片战争。

乾隆的想法当然不一样，中国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时代，就像乾隆所说的，并不需要外国的那些玩意儿，而中国卖给外国的东西却是必需品。在乾隆时代，英国的对华贸易存在着巨大的逆差。作为一个工业大国，这是英国不能忍受的，所以他们急切地希望扭转贸易逆差。这才是英国不惜花费巨资让代表团出使中国的原因。

在马戛尔尼之前，英国就派遣了查理·卡思卡特访华，可惜卡思卡特中途病逝，此行未能成功。马戛尔尼虽然到了中国，但是目的仍然

没有达到。他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拜访中国应该说是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接下来，礼仪问题成为两国继续深入交流的拦路虎。这个问题说白了还是东西方文化的差距，乾隆作为一个封建君主，没有平等对待外国的习惯。

在避暑山庄，乾隆两次接见英国使者。第一次是在八月初十，副使斯当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英国使者行的是“单膝下跪”之礼。马戛尔尼对乾隆呈上国书，乾隆显然不太高兴，把国书随手放在一边，说了一些客套话。这次见面唯一的亮点是斯当东的十二岁小儿子，这些“无礼”的使者让乾隆很不满，但小斯当东倒是相当可爱，他用中国话向乾隆祝寿。乾隆听了当即露出笑脸，还把身上的一个荷包赏给他。

第二次觐见是在八月十三日，这次觐见英国使者到底行了什么礼一直众说纷纭。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等人的口径是非常一致的，回国后都说“深鞠躬”或“单膝下跪”，都没有说行了三跪九叩大礼。但是使团中的其他成员却有不同说法，安迪生说所有在场的英国使者都对行礼一事守口如瓶，所以他怀疑很可能其中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安迪生当时并不在现场，这也是他的怀疑。

不管真相如何，马戛尔尼此行的任务是搞砸了。寿典一结束，乾隆就指示和珅早点把他们打发走。马戛尔尼可不甘心就这么空手而归，他这次出行可是花费了巨资，带着国家寄予他的殷切希望。

马戛尔尼找到和珅，想跟他谈两国通商的事情——这叫病急乱投医，找错人了。随后，马戛尔尼又向乾隆上书，提出两国互派使节常驻对方国家的首都，马戛尔尼表示自己很希望留在北京，同时欢迎乾隆在英国建立大使馆。

对于这种“无稽之谈”，乾隆非常不耐烦，他让和珅早点赶英国使者回家。

和珅是何等精明的人啊！他跟马戛尔尼谈话时，一一避开正题，委婉地说：“特使大人离开英国很久了吧，哎，确实有好些日子了，思乡了吧！赶快回去吧，北京的冬天挺冷的。我们皇帝啊倒是很想留你们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可惜就怕你们身体受不了。”

看到马上就要被人赶走，马戛尔尼只好亮出自己的底牌，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图穷匕见。马戛尔尼现出来的不是匕首，而是诉求，他以急促的语调告诉和珅：“请贵国允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和天津三地贸易；请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一个货栈，以便英国人在这

经商；请在舟山海域给英国人一个不设防的小岛，让英国商人在这里居住、买卖；请允许英国人在广州享有以上的权利；请减免货物从澳门运往内地的关税；请不要让广东的官员勒索英国商人；拜托了，大人！”

和珅把马戛尔尼的话转告给乾隆，乾隆一听，火冒三丈，原来这些洋鬼子不是来给我祝寿的：骗子，骗子，一群骗子，居然敢跟我提这种要求，让他们滚回去吧，给沿途官员打招呼，不要善待他们，让他们凄凄凉凉地滚回家。

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回忆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第十一章 千古一病文字狱

江浙一带是文字狱的重灾区，一柱楼诗案也是发生在江南。这起冤案非常恐怖，不光牵连了许多活着的人，还牵连到死去的人。在乾隆后期，人们提起这个案子无不心惊胆战，这个案子与康熙朝的庄氏史狱、戴名世的南山案和雍正朝的查嗣庭案，并称为清代四大文字冤狱。

吓死大臣的伪稿案

在古代，贪污受贿也许不算是大事，但如果文字有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情，清代尤其如此。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就是别在文字上犯错，那可是要抄家灭门的。

这不，乾隆十六年本来好好的，莫名其妙就出现了一件让人恐怖的事情。大家知道，孙嘉淦在雍正朝就以敢于直谏闻名，应该说是个敢于说真话的好官。当年雍正对兄弟们痛下杀手，孙嘉淦就谏言让他“亲骨肉”。雍正虽然恼怒，但细细一想，觉得这个人为官正直，值得重用，反而提拔他。

到乾隆时期，孙嘉淦已经当上了工部尚书。本来乾隆也挺重视他的，没想到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份奏稿，大家争相传阅，这份神秘的奏稿最后传到了乾隆的手中，由此引起了清朝的一起特大奇案——伪稿案。

而一向胆大直言的大臣孙嘉淦竟被活活吓死。我们不禁好奇，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奏稿，居然可以把一个好端端的活人吓死？

乾隆收到这份奏稿是在乾隆十六年八月，批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密折时，折子里掉下来一张纸，正是那份传得沸沸扬扬的奏稿。乾隆拿起来一看，越看眼睛越大，他愤怒地猛击案桌。冷静下来以后，乾隆知道这个稿子虽然署名是孙嘉淦，但肯定不是孙嘉淦写的。这个奏稿文字粗鄙，显然是没什么文化的人托孙嘉淦的名字写的。

伪稿中充斥着大量诽谤朝政的言论，而且捏造乾隆的朱批。乾隆觉得这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决心把这个重大的政治犯揪出来。当然，乾隆指示军机大臣们，这事情不能走漏了风声，最好在无声无息中找到幕后黑手。

乾隆年轻时的偶像是唐太宗，所以对魏徵式的官员有一种叶公好龙般的向往。还是皇子的时候，乾隆就特别敬仰孙嘉淦，等他当了皇帝，立即提拔孙嘉淦为吏部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让孙嘉淦监督百官。刚开始的时候，孙嘉淦也经常给乾隆谏言，那时乾隆多少还听得进去，甚至当着朝臣的面夸奖孙嘉淦。乾隆三年，乾隆提拔孙嘉淦为吏部尚书，后来又让他当直隶总督，大有把他扶上丞相的意思。孙嘉淦后来又升为协办大学士，应该说孙嘉淦的前景一片光明，直逼鄂尔泰和张廷玉。

可能正因为孙嘉淦敢于直谏的名声，有人居然冒充他的奏折辱骂当今皇上。乾隆当然知道他是清白的，也告诉他不必担心。但孙嘉淦自己害怕啊，他怕这事迟早会牵累到自己，是啊，这个歹徒为什么谁都不冒充偏偏冒充自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自己这次恐怕难逃惩罚了，就这样，孙嘉淦越想越怕，时间一长，居然惊吓而死。这太荒唐了，也毁了他从前胆大的名声，可见，在封建社会里没有一个大臣的胆子是真正胆大的，即便是魏徵，未尝不是提着脑袋跟唐太宗上班。

孙嘉淦能被吓死，说明这稿子的内容绝对“惊天地泣鬼神”，但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无法知道，因为乾隆已经把相关资料全部销毁了。根据乾隆审理这个案子时在大臣们奏折上的朱批来看，伪稿无非是说乾隆失德，有十大过等等，伪稿还为被乾隆冤杀的张广泗鸣冤。

贵州巡抚终于查到线索，伪稿是从一个叫谭永福的商人那里抄出来的。乾隆十六年六月，四川人谭永福到贵州做生意，经过安顺的时候，他对人说自己身上有一份新闻，就这么传开了。根据谭永福的交代，他是跟自己的伙计在云南的一家商号信丰行发现这个奏稿的。线索到了信丰行，信丰行的人说他们是从江西人朱醒庵那里得到底稿的。朱醒庵说是他的同乡从湖北人陈俊臣那里得到底稿的。

湖北官员兴师动众审判陈俊臣，让他们失望的是，陈俊臣也不是伪造稿子的元凶。官员们顺藤摸瓜，摸到了江西一个叫“天一堂”的铺子。江西巡抚舒格终于查出了元凶，不过这个结果让乾隆非常窝火，因为案子的元凶居然是一个名叫罗哲文的死人。

乾隆不甘心啊，所谓死无对证，查到死人头上万事大吉，自己不明白给人骂了吗？乾隆开始思考，会不会是孙嘉淦得罪了什么人，有人故意报复他呢？循着这个思路去查，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

到了九月，直隶、四川、山东、甘肃、江西、河南、江苏、福建……都在传抄这个稿子，连京城都在传，甚至蒙古王公都看到了伪稿。真是越禁传播的速度越快，三个月后已经捉拿了两百八十多个传

抄的犯人，但真正的元凶仍然不知道是谁。

眼看这个案子牵连得越来越大，一些顾全大局的大臣上书请求乾隆终止这个案子，释放株连的人众。御史书成首先上书，乾隆得知后暴跳如雷，其他事情上他可以宽恕，但是涉及自己，乾隆反应非常剧烈，他痛骂书成身为满洲人，却说出大逆不道丧心病狂的话，竟然纵容社会上的人辱骂君主。乾隆愤怒地将书成革职，没多久，侍郎钱陈群也上书请求他终止此案。乾隆又把他痛骂一顿，愤怒地表示，绝对不会停止追查此事。

这一次乾隆是被真正激怒了，所以我们也能理解孙嘉淦为何被吓死。

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了，乾隆决定公开缉拿要犯，号召各地官员先放下手头工作，把缉拿伪稿元凶当成头等大事。经过一年半的追查，因这个案子受牵连的人已经达到上千人，十几名办事不力的督抚大员受到惩罚。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但元凶还是没有找到。

乾隆只好把气撒在官员身上，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西巡抚鄂昌都受到了处分，被乾隆当面责骂。官员们人人自危，朝野上下鸡犬不宁。

十七年底，出现了一个新的线索，江西巡抚鄂容安缉拿了传抄伪稿的千总卢鲁生父子。乾隆让鄂容安把他们押到京城审问。军机大臣经过审讯得知，卢鲁生是从南昌守备刘时达那里得到原稿的。根据刘时达的供词，他们并不是伪稿的源头，稿子的源头在江苏。

最奇怪的是，没过多久，卢鲁生就推翻原供，“承认”稿子就是自己伪造的，表示愿意认罪伏法。案子就这么结了，卢鲁生被凌迟，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斩。除了查抄官员按律法处置外，其他株连之人全部释放。

乾隆为什么要匆匆结案呢？他真的相信卢鲁生是元凶吗？乾隆是何等精明的人，他知道这个案子再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所以指示军机大臣逼迫卢鲁生承认自己就是元凶，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好终止这起惊天大案。

真正的元凶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最关键的是乾隆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通过这起案子，震慑了那些对自己不满的人。

两个不要命的疯子

在现代社会疯子杀人理论上都是无罪的，如果说疯子说了什么疯话，大家都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别人是疯子，跟疯子计较岂不是代表自己也是疯子。然而，在封建社会，专制政府比疯子还疯，一个疯子说了几句狂悖的话，居然要置之死地。

乾隆十六年，山西巡抚阿思哈抓获了一个叫王肇基的人，这个人既没偷什么，又没抢什么，只不过说了一些胡话。但是，阿思哈却比抓到盗贼更加警惕，亲自审问他。其实，这个王肇基并不是什么疯子，不过是个穷酸秀才，想当官想发财想疯了。

皇太后万寿，他胡诌了一首诗歌颂皇太后，想谋个一官半职。他把这首诗投给山西汾州府的衙门，想让衙门的人给自己推荐个一官半职干干。

同知图桑阿本拿到诗一看，发现全是阿谀之词，阿谀倒没问题，拍马屁也是好的，但关键要阿对地方、拍到点子上。王肇基万万没有想到，谋官不成，反而惹祸。他在诗歌下面附了一段评论，正是这段评论要了他的命。

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段评论到底写了什么，不过官方说王肇基的言论“毁谤圣贤，狂妄悖逆”，看来王肇基对时政发表了一些自以为是的评论。

阿思哈派人到王肇基的家里搜，又发现更多悖逆的书文。王肇基辩解说：“我不过是一个小民，写诗祝贺皇太后，只希望圣上喜欢，没有其他意思。”

阿思哈又问：“你在诗后面发表议论，妄议国事，指责大臣，毁谤圣贤，到底是何用意？”

王肇回答：“现在是尧舜盛世，我怎么可能毁谤朝廷呢？我不过是把孔孟程朱的话糅合在一起，以显示自己有学问，希望皇上欣赏我，赏个一官半职。”

阿思哈开始还怀疑王肇基可能跟伪稿案有牵连，后来发现他不过是一个“疯汉”，他奏请乾隆，请乾隆定夺。这种事，在雍正朝最多就是打一顿或者关几个月，然后再释放。但乾隆比乃父更狠毒，居然让阿思哈把王肇基杖毙于廷下。

杖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刑罚，比斩立决更残酷，仅次于凌迟。王肇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疯子，他的死还可以说是因言论获罪。

两年后，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被凌迟，这是大清国第一个被用酷刑处死的精神病犯人。此后，陆续有精神病患者被处死。

这个人叫丁文斌，丁文斌从小就是一个孤僻多疑之人，读过一些书，但是连秀才都没有考上。他与母亲相依为命，靠打短工为生。乾隆十二年，他母亲病死。自此以后，丁文斌的性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常自言自语，对着墙壁说话。丁文斌的生活更加悲惨，要文没文，要力气没力气，生活过得很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精神越来越陷入混乱中，也没多少人愿意请他抄写或是授课。走投无路之下，他跑到路边摆摊，为人测字算命。一个精神病人给人算命这是非常荒唐的，很快他就混不下去，沦落为乞丐。

虽然生活这么艰难，他在内心里还幻想着娶到一个漂亮的老婆。乞讨的时候，他暗恋上董家的黄花闺女，虽然他是疯子，也知道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可能的事。丁文斌知道，要想取得漂亮媳妇必须有钱啊！

但是怎样才能有钱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自己造钱，这样不就成为富翁了吧，丁文斌在想象中把自己造的钱命名为“太公九府钱”。意淫的滋味是甜美的，可是睁开眼一看，失落感更重。想来想去他发现钱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自己之所以这么下贱，倒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没权势啊！

丁文斌可算是想到点子上了，对于他这样的人这是认知的突破，但也是死亡的开始。丁文斌想入非非，世上最有权势的人莫过于皇帝，皇帝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当了皇帝，不就什么都有了么？很多造反的人都跟丁文斌有相似的想法，不过他们好歹是理智的，知道能不能当上皇帝靠的是实力和运气，而不是空想。

但丁文斌除了空想，什么都不会。到了中年时，丁文斌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经常出现幻觉。后来，他经常听到“上帝”在跟自己说话，在“上帝”的启示下，他写下了《文武记》和《太公望传》这两本书。他自认为这两本书写得相当好，想投石问路，找个公职做做。便拦住了江苏学政庄有恭的轿子，庄有恭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丁文斌指望他能看上自己。

没想到，书是送给了庄有恭，但此后毫无音信。没办法，丁文斌又沉入了幻想中。“上帝”又开始对他说话了，让他把以前的作品改写成《洪范》和《春秋》。丁文斌于是就开始修改了，他把书中的“丁子日”统统改成“天子日”或“王帝日”。在中国古代史书里，只能用帝王的年号纪年，而丁文斌居然自号“丁子”，用自己的号来纪年。这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他后来改成天子和王帝，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天子和皇帝了。

丁文斌还决定定国号和年号，准备颁布一本《时宪书》，让天下人都奉新朝为正朔。丁文斌把国号定位大明，年号用天元。

丁文斌如果只是自己想想，还不至于送命，但他居然异想天开，准备去山东把自己的书交给孔子的后代。孔子的第七十一世孙孔昭焕看到丁文斌这些书，立刻下令府里的人把他捆起来，并迅速将这事禀报乾隆。

这个案子简直不用审了，反迹昭彰，唯一要考虑的是丁文斌是精神病。审讯中，丁文斌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上帝的旨意。审讯官荒唐到什么地步，居然让他把上帝叫出来。

杨应琚负责审理此案，他经历的事情多，虽然不懂现代精神病学，但是也知道这种情况是大脑出了问题。杨应琚在审理这个案子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精神病血口喷人，乱咬一气，把朝中大官都咬进来。所以，他希望快点结案，他也知道乾隆是个非常多疑的人。如果乾隆疑虑加深，本来没什么事情，都会弄出许多事情来。

乾隆跟杨应琚的想法差不多，都主张尽快把犯人按大逆罪凌迟处死。

就这样，一个疯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凌迟处死，看客们的表情都非常麻木。只有一个人有所触动，这个人就是庄有恭。庄有恭当然不是同情丁文斌，是他自己跟着遭殃了。乾隆不久发现了丁文斌曾经给庄有恭投书。庄有恭早把这事忘在脑后了，等到想起时，拿起那本书给乾隆。乾隆发现这本书跟从丁文斌身上搜出的书完全不一样，认为庄有恭故意隐瞒。

乾隆决定罚款，你庄有恭做了多少年的官，把你的拿到的薪水乘以十，好好还吧！自己没还完，后代接着还。十四年后，庄有恭郁闷而死，死前还欠了六万多两银子。

此后，乾隆还处决了直隶的疯子刘德照等人，以及一些因为笔误而受处罚的人。

对疯子搞文字狱，而且文字狱一搞势必牵连到罪犯的家人，这种荒唐事竟然发生在号称明君的乾隆头上。后来一些大臣实在看不下去了，斗胆对乾隆说，这些疯子疯言疯语，即使要惩罚，止于他们自身就行了，没必要牵累到家人，并不是家人把他们逼疯的。

乾隆好像听进去了，也好像没听进去。

制造文字狱让乾隆很刺激

和珅如果被乾隆看上了，那是好事；胡中藻若是被乾隆看上了，得小心了。胡中藻是什么人？鄂尔泰的得意门生啊！鄂尔泰又是谁？乾隆要打击的朋党头目啊！

胡中藻这个人做官比较谨慎，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要通过正规途径他没那么容易。但乾隆一点也不担心，胡中藻不是写了一本诗集，叫什么《坚磨生诗钞》吗？那好吧，就从这本诗集入手。

汉字内涵那么丰富，就不信找不到胡中藻的把柄。胡中藻，你自号坚磨生，这次我就要磨得你生不如死。乾隆把这个任务交给军机处行走蒋溥，蒋溥的任务是先搜罗“罪证”，等乾隆觉得时机合适时再出手，所以这个任务一定是保密的。如果蒋溥泄露出去，十个脑袋也保不住。

就这样，蒋溥拿着《坚磨生诗钞》苦苦研读。老实说，这个任务真不轻松。出于文人的一种虚荣，坚磨生同志写诗的时候特别喜欢用一些奇险的文字，显示自己文采非同一般。

我们不妨把蒋溥从鸡蛋里挑出的骨头罗列一下，看到这些“骨头”我们一定佩服中国人在罗织罪名上面的创造力。

你胡中藻用“坚磨生”为号，意思无非是说自己操守很坚定，到底是何居心呢？莫非是想跟我大清“坚磨”到底？想念明朝你就直说。

诗中有这么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清是我大清的国号，你把浊字放在清前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胡中藻还有一句怪诗：“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老佛”暗指自己，乾隆生气了，我天天上朝，你怎么说“朝门不开”呢？

《孝贤皇后之丧》中有这样的诗句：“并花已觉单无蒂。”本意是歌颂帝后恩爱深情，乾隆却偏要说这是讽刺皇后干政，乾隆反问：“我几时让皇后干预朝政？”

类似的“骨头”有很多，乾隆二十年，乾隆发动对准噶尔的战争，朝中多有不满者。乾隆突然拿出胡中藻诗歌问题，借机发难，想让朝臣们噤声。

我们可以看看乾隆这个文字狱，整人迹象太明显了，完全是欲加之罪。雍正也搞文字狱，但比乾隆的水平和境界明显高出很多。雍正曾经想整查嗣庭，说查嗣庭出的试题中有怨气，但他又表示，如果单凭这点就治罪的话，显然会给人留下搞文字狱的话柄。最后，雍正揪出了查嗣庭曾经非难和批评康熙的言论——在专制时代这可是能置人

于死地的铁证，最后雍正以“孝子”的身份处死了查嗣庭。

乾隆可没这个耐心，他要借机除掉朋党，打击反对自己的势力，哪顾得上那么多。

胡中藻的案子牵连到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在鄂昌的书信中也发现了大量“罪证”，两人一同入狱。乾隆开恩，让鄂昌自尽，等于是拿他做典型，警告满洲大臣不要和汉人来往唱和，更不要结党营私，否则下场就是这样。

胡中藻被处斩，祸及族人和亲友。

果然这个案子爆发后，朝野上下无不震荡，不光鄂尔泰这边惊慌，张廷玉那边也紧张不安。

写诗是刀剑上的舞蹈

乾隆三十二年正月，正是千家万户喜庆的日子，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蔡显慌慌张张地抱着一大堆书籍跑到府衙里，对着青天大老爷哭喊，说自己书中没有半点悖逆字句，希望大老爷明鉴。

这个蔡显也算是文化人，在雍正七年中举，尽管如此，他却没能在仕途上发展。我们知道，在古代中举理论上是可以当官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首先必须要有缺，其次你还得有关系，上面有人推荐你补这个缺。

虽然考上了举人，但是没官做，难免会有一些牢骚。蔡显自号闲渔，喜欢学着魏晋名士的派头，跟文人雅士们一起饮酒赋诗，经过多年的锱铢积累，蔡显印有《闲渔闲闲录》《宵行杂识》《潭上闲渔稿》和《红蕉诗话》等书。

其中最有名的是《闲渔闲闲录》，古人说不平则鸣，没有牢骚就没法写诗。在《闲渔闲闲录》中充斥着大量的牢骚，对官府种种行为多有讽刺。当然，这本书出来后也确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文人为诗人的才华倾倒，嬉笑怒骂皆能看出作者文采斐然，简直就是乾隆时期的韩寒，恰好两人也都是松江的。

不过蔡显可没韩寒幸运，在乾隆眼皮底下写讽刺诗，那可是刀尖上的舞蹈，不是亡命徒，别干这号事。这不，被人告发了，蔡显慌了。他自己跑到衙门里坦白，坚信自己并无悖逆之罪，蔡显有这种自信是好的，因为发牢骚跟语言悖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但要看对方是

什么人，因为双方对悖逆的标准明显定得不一样，在一般人看来很平常的话，到了清廷那里就变成大逆不道了。

果然，这事松江府还不敢做主，上报给两广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明德，这两人既然能在乾隆手下当大员，脾气也跟乾隆一样：无事生非，小题大做。他们认为蔡显：心怀不轨，创作逆书，毁谤朝廷，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应该按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戚家属一律连坐。

《闲渔闲闲录》这本书送到乾隆案桌前，乾隆毕竟也是个文化人，他翻了翻这些书，不觉得有什么大逆，只不过牢骚多了点而已，说实话，乾隆还觉得这个人确实有些才华。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乾隆根本没考虑按大逆律对待蔡显的，甚至都打算教训一顿无罪释放。然而，随着乾隆通观全书，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乾隆发现书中竟然有这样的话：“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说的是康熙和雍正年间的文字狱，乾隆心想，这都什么话啊，我想饶你蔡显，你蔡显自己要找死。这条真正谋逆的“罪证”高晋和明德都没有发现，他们发现的只是一些模棱两可的诗句，比如：“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风雨从所好，南北查难分”等等。

说实话能从这些诗句中看出大逆不道那是很需要脑细胞的，“莫教”那两句诗大概是说乾隆乾纲独断、喜怒无常，做事不依靠道德和法律，完全凭个人喜恶办事。“风雨从所好，南北查难分”更隐晦了，大概是说朝廷上上下下都从上所好，是非曲直已经完全分不清楚了。

《闲渔闲闲录》中还有《哀漳城》这首诗：“城里无烟白日荒，北军搜尽万家粮。戈船蔽海天常黑，铁骑飞沙雾转黄。一郡饥魂哭秋雨，千山战骨夜埋霜。我生不尽哀时感，衰草寒夜几断肠。”这首诗很明显是在控诉清朝入关的暴行，蔡显即使想辩解，也很难成功，就算是今天人们也能一眼看出其中的意思，别说是当时敏感的朝廷。

蔡显真是该死，碰到乾隆这么敏感的文化皇帝。《闲渔闲闲录》立即被宣布为禁书，蔡显也将进入最恐怖的审判环节。在酷刑逼供下，蔡显只好认罪，说自己是草野无知，无心写下这些东西，没想到其中有寓意，实在是罪该万死。

高晋奏请凌迟处死蔡显，乾隆施恩，判为斩立决。蔡显长子蔡必照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两个幼子和女儿发配功臣为奴。蔡显的弟子们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印书的人杖打八十。一些办事不力的官员也受到惩罚，高晋和明德本来是想邀功，结果受到乾隆的责备，说他们姑息养奸，理由是没有发现真正“大逆”的文字，反而把一些发牢骚的文字当成大逆。

蔡显虽死，从他的文字中我们确实可以能看到此人的才华，他的诗意境也不错，如果生活在一个较开明的朝代，大概也可以过上文人雅士的风流生活。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与吕留良、黄宗羲、杭世骏齐名的齐周华，这四人并称为浙江四贤。

齐周华是浙江台州天台县人，这人也是一个大儒，而且胆子非常大。

一切还得从吕留良说起，吕留良是名满天下的大儒，曾静奉他为精神导师，在雍正期间，出现了曾静逆书案。这个案子是非常滑稽的，曾静和弟子张照无罪释放，倒是死人吕留良受到株连，被开棺戮尸。这种结果用雍正自己的话说是“出奇料理”，但显然是很不公平的，所以当时就有人写诗鸣不平：

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

看彻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

写诗的人就是齐周华，他还怕别人看不懂，附上注解：“曾静该杀却不杀，吕晚村无罪却坐罪。这是古今一大恨事啊！”

在齐周华看来，曾静谋逆明显，该杀；但吕留良是一个大儒兼思想家，没有犯任何罪，却受到株连。作者非常愤怒，说世道浑浊到这个地步，自己怒发冲冠，连剑都在鸣动不平。发牢骚还行，但如果愤怒到利剑都快要出鞘，这似乎是一个危险的征兆。

雍正于是开始搜捕这个大逆不道之人，齐周华居然不屑于捉迷藏，站出来光明磊落地跟雍正对峙。雍正虽然残酷，但比乾隆要好很多，他倒没有把齐周华杀掉，更没有凌迟处死，只是下令将他永远圈禁。

齐周华是个汉子，雍正未尝不在心里敬佩他，闽浙总督也对他颇为佩服，曾写诗奉劝他：“物外有人闲始见，山中可乐老方知。”希望他不要再管闲事了，好好寄情于山水吧！

乾隆即位以后，天下大赦，齐周华也获得自由了。乾隆上台后推行了一些新政，又让齐周华看到了希望，按捺不住“过问世事”的冲动。

很快齐周华就失望了，他发现这个新皇帝并不比雍正好多少，他上台后处死了曾静师徒，却没有为吕留良平反，也没有召回吕留良发配的家人。后来，齐周华到武当山当了十年的道士。乾隆二十一年，

他的儿子把他接回家还俗。没想到这么一来就出事了。

齐周华回到家里后，脾气非常怪异，他要变卖家产，出版自己这辈子写的作品。最后，闹得跟家人亲族合不来，自己搬到城外一个小楼里居住，他还关起门来谁也不见，成了孤家寡人。族长齐长庚甚至向官府申请把齐周华逐出宗族，齐周华大骂齐长庚的老婆已经七十了，还到处偷人，简直人尽可夫。最后到了什么地步，齐周华的两个儿子痛打父亲，全家人都排斥他。他的家人所以这么做自是担心这个倔强的老头遗祸家门，清代动不动就搞文字狱，他又口无遮拦，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久，齐周华在杭州把自己平生所写的著作出版，并亲自写了对联：“恶劫难逃，早知不得其死；斯文未丧，庶几无忝所生。”说明齐周华早就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但自言对得起生养自己的父母。

齐周华也是自己想死，这人间在他眼里已是地狱。当时他家人反对他出书，倒未必是吝惜钱财，而是担心身家性命。齐周华不怕死，他们可怕死。

亲眼见过那么多文字狱，齐周华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他与族人闹翻可能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齐周华把涉及他人之处全部删掉，直面乾隆这个专制魔鬼。

乾隆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熊学鹏到天台县视察，齐周华拦住他的轿子，献上自己的《名山藏》等书，此外他还呈上一个状子，告发自己的亲族“迫害”自己。

案子一审就是个文字狱，齐周华供认不讳，只是否认李绂、谢济世、沈德潜、房明畴等人为自己作序，这些他全部都改名了，声称是托人伪作，全都是自己写的。乾隆明白，这个人是公开挑衅自己，下令将齐周华凌迟处死。

遗憾的是，齐周华为亲朋好友设的脱身之计在奸诈的乾隆面前完全没有起作用，齐周华的子孙照样连坐，其中四人拟斩监候，妻妾儿媳及小孩发配功臣为奴。堂弟齐召南本是礼部侍郎，被革职抄家，回家不久，齐召南就忧愤而死。李绂、谢济世等人虽久已死去，但也被抄家。

齐周华一案不光牵连甚重，而且著作也被焚毁，他想藏之名山、期盼警醒后来者的愿望也落空了。

一柱楼里飘出死亡气息

死神从天而降

江浙一带是文字狱的重灾区，一柱楼诗案也是发生在江南。这起冤案非常恐怖，不光牵连了许多活着的人，还牵连到死去的人。在乾隆后期，人们提起这个案子无不心惊胆战，这个案子与康熙朝的庄氏史狱、戴名世的南山案和雍正朝的查嗣庭案，并称为清朝四大文字冤狱。

能够跻身于四大冤狱，说明总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吧！

徐述夔，扬州东台县人。他是一个神童般的人物，在古代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平庸才能平安，平安是福啊！徐述夔十七岁考上秀才，三十五岁考上举人，科举之路虽然走得缓慢一点，但他对前途还是充满希望的，希望一展宏图，成为国家栋梁。

不过，他的思想还没有调整好，没有调整到朝廷需要的那个频道。他曾经对学生说过：“本朝剃头不如明朝剃头好看。”其实，他也就是发发牢骚，自视才高，却没有得到重用。不平则鸣，写下了诸如此类的诗句：“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益非非”“江北久无干净土，乾坤何处可为家”等等。

徐述夔之所以这么不得志，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考中举人那年的试题是《君使臣以礼》，徐述夔在答卷中写下了“礼者，君所自尽也”，结合上下文看这只是很平常的句子，但是把君和自尽放在一起，一下子就被审阅的礼部官员发现了。根据清朝科场的规矩，举人的答卷必须交到京城，由礼部官员审阅。

这么一来，徐述夔的仕途就此堵死，甚至此后不得参加进士考试。心灰意冷的他回到了家里，专心写作，以此来表达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徐述夔打算这辈子过一种书斋生活了，他特地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别致的小楼作为书房。这个小楼很奇特，中间是一根大柱子，在柱子上端辟了两层，其他的梁柱都是嫁接在大柱子上的，所以整栋楼看起来就像是一把雨伞。楼梯是在外面的，在楼的下面有回廊和天井，种着许多梅树，环境确实不错。

徐述夔在这里读了一辈子的书，也写了一辈子的书，直到乾隆二十八年去世，终年六十岁。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诗集和小说，其中有《一柱楼诗》《快士传》《五色石传奇》《八洞天》等作品。

在徐述夔生前，这些书都没有拿去出版，乾隆二十八年，他的儿

子为了纪念他，把他的遗作拿去出版。万万没想到居然惹来了大祸？

徐述夔的书中到底写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呢？

首先我们说说他的诗集，在诗中有这样一些句子，譬如“明朝期振翅，一举去清都”“举杯忽见明天子，却把壶儿抛半边”等，这些句子确实有对清代失望，怀念明代的意思。

《快士传》是一本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落榜文人，在书中作者细致地描绘了落榜文人的那种痛苦和无奈。书中也提到文字狱。这部小说文字优美，情节曲折，算得上是佳作。

其他的作品“逆情”不是很大，徐述夔的作品是非常丰富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百度一下，然后到图书馆里借他的书看看。

怎么就给盯上了呢？

有人猜测，徐述夔给小楼取名为“一柱楼”是有深意的，“一柱”便是“易朱”的意思，由此推测徐述夔有反清复明的思想。当然也有人说，徐述夔取这个名字是想表现自己鹤立鸡群、卓而不类。这些看法都只是猜测，即使徐述夔真有“易朱”的意思，也不能根据这个楼名给他定罪。

徐述夔的儿子徐怀祖刊发了父亲的书籍后，还到处送人，在出版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人争相购买徐述夔的书籍。连江南诗坛泰斗沈德潜也赞不绝口，沈德潜跟徐述夔在同一年考中举人，两人虽然交往不是很密切，但也认识。他亲自为徐述夔写了一篇传记，称赞徐述夔人品和才华双绝，是天下读书人学习的榜样。

这桩文字狱是在徐述夔书籍出版十四年后爆发的，究竟是如何引起乾隆的注意呢？

原来徐述夔的家乡有几个望族，徐家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跟蔡家的关系很不好。两家经常闹矛盾，对簿公堂。乾隆四十二年，徐述夔的儿子徐怀祖去世，蔡家这时想赎回以前卖给徐家的田。徐怀祖曾经花了两千四百两银子从蔡家买了几顷的土地，当时是公平交易，愿买愿卖。

没想到蔡耘的堂兄蔡嘉树考上监生后，忽然要赎回田地，借口这块地里有他们家的祖坟。赎回也没问题，出价要合理，但蔡家只肯出九百六十两。不升值也就算了，你还贬值，谁卖啊！徐怀祖的儿子徐食田和徐食书很为难，他知道这是蔡家故意要敲诈他们。

蔡家在这个时候敲诈不仅仅是因为徐怀祖过世，更主要的是乾隆的禁书政策越来越严厉。蔡嘉树看过徐述夔的书，知道里面有文章可做。所以他威胁徐家，如果不把田让给自己，就告官。

徐食田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觉得与其被蔡嘉树勒索要挟，不如主动将祖父的作品呈给官府。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有据可依的，乾隆颁布了谕旨，只要在两年的限期内交出禁书，可以免掉私藏禁书的罪名。

蔡嘉树敲诈不成，岂肯罢休，便去东台县县衙告发徐述夔书中有悖逆的话。县令不敢做主，立即送到江苏书局。江苏书局那边又把书退回来了，让他们标上“违碍”的句子。与此同时，东台县县令在判徐蔡两家的官司，把有祖坟的十亩田拨给蔡家。但蔡嘉树仍不满足，这距离他的期望还有距离，他甚至认为县令偏袒徐家，准备一举将徐家和县令一起告倒。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蔡嘉树直接跑到江宁布政使衙门去告状。布政使官员陶易也不是傻子，了解整个案情后，他认为是蔡嘉树想低价赎回田地，没有得逞后故意报复；徐食田在规定时间内交出了禁书，理应免罪。陶易对蔡嘉树的行为非常鄙视，还在他的告发信上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陶易知道蔡嘉树是个卑鄙小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便让幕僚陆琰去处理这件事。陆琰比陶易的性情更耿直，他给蔡嘉树发出了一个警告：“写书的人如果在诗句中有疑似悖逆的文字，却没有实际悖逆的行为，那么，这个检举作者的人要判处诬告罪。”实际上是警告蔡嘉树及时收手。

扬州知府谢启昆后来才得知此事，说实话，他是胆战心惊的。虽说陶易是他的上司，但他做官时间比陶易要长，知道文字的问题不能这么随便处理。本来，徐家已经把书在规定时间内交出去，蔡嘉树是无事生非，案子可以轻松了结。但这事千万不能让乾隆知道了，乾隆对文字向来是宁紧勿松的。

它又是如何变成一个惊天大案呢？这还得从我们喜闻乐见的宰相刘罗锅说起。

刘罗锅干的好事

扬州衙门本来是想快点了解案子，不想也不敢惊动乾隆。没想到，乾隆居然知道了，这个惊动乾隆的人便是刘罗锅刘墉。刘墉当时

在江苏担任学政，一个门生送给他一本《一柱楼诗》和沈德潜写的《徐述夔传》。

刘墉是个非常忠心的奴才，他收到这本书后，立即上报给乾隆。乾隆拿到诗集，很快就读完了。诗写得还不错嘛，乾隆心想，但是里面愤激的话太多了，这个徐述夔是不是生前吃了火药。乾隆告诉刘墉，如果这个徐述夔还活着，一定得好好惩罚他，他的孙子徐食田是在别人告发后才把书交出，也应该治罪，沈德潜不知好歹，为他作传，本来也该治罪，看他已经去世，就算了吧。

乾隆刚开始时也没想要大惊小怪，不过江苏巡抚杨魁给他一个奏折后，一切都变了。杨魁把蔡嘉树告状的过程添油加醋地复述了一遍，他说徐食田贿赂官吏，阻挠蔡嘉树告发。乾隆愤怒了，他让人把徐食田押到京城。

署理两江总督萨载火上浇油，极力怂恿乾隆把这个案子搞大，将徐述夔开棺戮尸。乾隆同意，将这个案子定为“罪大恶极”的逆案。乾隆其实是想把这个案子搞成一场政治运动，通过禁书达到思想改造和震慑官员的目的。

乾隆根本不给江苏官员们解释的机会，立即下令把布政使陶易、扬州知府谢启昆等人革职，押到京城审讯。

帝王心黑似洞

乾隆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不是没有考虑到其中可能另有隐情，也就是说徐食田很可能是冤枉的。徐食田确实是在别人告发之前就呈交官府，但杨魁和萨载的奏折都说是告发后才送上去的。

乾隆想，如果徐食田在告发之前就呈交逆书，那么陶易判决蔡嘉树诬陷罪也是合理的，扬州知府谢启昆也是照章办事。没什么可指责的，唯一的罪犯就是蔡嘉树了。但是，这么一来，乾隆想震慑天下官员和百姓的政治目的就达不到了。

乾隆决定先让人弄清事实，事实出来后，乾隆很失望，原来徐食田真是被冤枉的，蔡嘉树确实是一个无赖。现在是应该处死好人，还是惩罚无赖，相信是个正常人都并不难做出判断。

可惜，乾隆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帝王，在他心里有一个深深的黑洞，黑洞一旦张开嘴，所有良知和道德都会被吸进去，剩下的只有个人的欲望。

宁可故意杀掉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个，只有这样才能稳固江山。

令人气愤的是，蔡嘉树最后也承认自己是诬告，乾隆要拿起屠刀还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如何给徐食田治罪呢？乾隆玩起了文字游戏，他让刑部官员把《大清律例》中的话换个说法，意思全变了，刑部官员对徐食田说：“听说别人要告自己，然后才能自首，不能算是真的自首，这种自首只能减罪，不能免罪。”

到最后连减罪也没了，官员们纷纷揣摩圣意说，这种自首太不真诚，所以不宜减罪。这条路打通后，后面怎么定罪全看乾隆了。乾隆说徐述夔这个人心怀大逆，对清朝极度不满，希望有一天遇到明主，反清复明，正所谓“明朝期振翅，一举去清都”。在乾隆看来这句诗的意思分明就是希望离开清朝，重新回到明朝。古代不像现代有穿越，回到明朝只能造反了。又说“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这意思太明显了，“壶儿”和“胡儿”是谐音，壶儿搁半边就是推倒的意思，推翻了清朝自然就跟大明天子相见了。“青”字的形状像壶，把壶倾斜就会滴出水，也就是“清”字了，徐述夔确实太有才了。

最后我们看看处罚。

江宁布政使陶易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罪名是袒护罪犯，阻挠告状者；陶易没等到秋后处决，就在狱中病死。

徐述夔诋毁清朝，罪恶滔天，他的儿子徐怀祖将他的书公开出版，罪不可恕，两人开棺戮尸，枭首示众，抛尸荒野。

徐食田和徐食书被判斩立决；徐述夔的两个学生徐首发、沈成濯担任诗集校对，却不检举，斩立决；陶易的幕僚陆琰有心袒护犯人，斩立决。事后，乾隆“开恩”，把这五人的斩立决改判为斩监候。

这个案子中，徐家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斩首，其余人等发配为奴，财产籍没。

为徐书作跋的毛澄杖责一百，发配三千里。

扬州知府谢启昆杖责一百，服劳役三年。

写到这里，读者可能以为蔡嘉树肯定能得到一笔不小的奖金吧！蔡嘉树什么也没得到，判决书说他挟私报复，诬告徐食田贿赂官吏，本应有罪，念他检举逆案有功，将功抵罪。

最后我们说说为徐述夔作序的沈德潜，沈德潜是诗坛泰斗，也是乾隆的宠臣。在沈德潜生前，乾隆是非常器重他的，经常给他写信。沈德潜以九十七岁的高寿去世，乾隆赐他“文憲”的谥号，还亲笔为他书写墓碑。帝王是说翻脸就翻脸的，乾隆下令褫夺沈德潜的一切谥号

和官职，并命人将自己亲手写的墓碑推倒，抹去自己亲手写的文字，再将墓碑捣成碎块，分散扔在荒野中，并在乡贤祠中撤出他的牌位。

乾隆把事情做到这份上，不单单是为了政治目的，里面还有极强的愤怒。若没有愤怒，他不至于连沈德潜的墓碑都要捣毁。

“十全武功”“诗人皇帝”这些称誉东西的背后，乾隆实实在在是一个权力野兽、政治动物。

第十二章 “恋”上和

当乾隆看到和珅时，有种好像在哪见过的感觉，猛地想起这人跟二十年前的那个妃子很像。于是，就把和珅秘密叫进宫里，要看看他的脖子，果然发现和珅的脖子上有个指痕。

真实的和珅

真实的和珅跟电视剧里王刚扮演得完全不一样，和珅是满洲正红旗人，出身于清朝盛产皇后的家族钮祜禄氏。和珅的家族有过非常显赫的历史，和珅承袭了家族传下来的三等轻车都尉。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但出身绝对算是不错的。

不过，和珅早年的命不好，父亲早逝，家里无钱，只好借债读书。那么和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中国人的话如果不可信，我们可以看看外国人的记载。马戛尔尼见过和珅，他跟和珅无冤无仇，所以评价相对客观，他说和珅这个人是一个美男子，相貌很俊秀，看上去潇洒有风度，言谈幽默诙谐，反应也很敏捷，是个讨人喜欢的角色。

马戛尔尼告诉我们，坏人未必会是一副让人讨厌的样子，好人也未必是讨人喜欢的。和珅也是个相当聪明的人，诗词歌赋样样都会，正因为才华出众，他才能得到乾隆的青睐。

有这样一个传说，说是乾隆做皇子时跟雍正的一个妃子有暧昧之情。一天，乾隆进宫，看到雍正的妃子在梳妆。乾隆被她的美貌打动了，居然想跟她开个玩笑，从背后捂住她的眼睛。这个妃子不知道是乾隆，受了惊吓，用梳子朝身后打去，打中了乾隆的额头。雍正发现了乾隆额头的印痕，便问是怎么回事。乾隆不敢隐瞒，只好把事情和盘托出。雍正听了以后，认为是这个妃子挑逗皇子，便下令把她赐死。

当时乾隆很怕雍正，虽然明知妃子有冤，也不敢替她辩解。其实是怕惹祸上身，不过当时乾隆还是很难过的。他跑到妃子的房子里，发现她已经悬梁自尽，还没有气绝。乾隆便在指头上蘸了一点胭脂，按在妃子的脖子上，说：“是我害了你，如果你在天有灵，二十年后再来找我吧！”

当乾隆看到和珅时，有种好像在哪见过的感觉，猛地想起这人跟二十年前的那个妃子很像。于是，就把和珅秘密叫进宫里，要看看他的脖子，果然发现和珅的脖子上有个指痕。

这个故事记载于野史，大概是讽刺乾隆与和珅有同性恋关系。乾隆与和珅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关系，这个没有证据，只能说存在这种可能性。

一般认为，和珅是通过才学折服乾隆，逐步受重用的。这种可能性当然更大一些，乾隆是个喜欢附庸风雅的皇帝，喜欢跟有才的人交往。

读心高手

和珅是乾隆朝发迹最快的一个宠臣，他与皇帝的关系确实非比寻常。和珅固然有才，但才能称不上是一流，却位极人臣，被人称为二皇帝。最重要的是，乾隆对和珅的纵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算明知道他贪污受贿，也不惩罚。从来没有一个大臣享受到和珅这种待遇，乾隆的重臣阿桂因为查案不力就被降职，要知道，乾隆称阿桂为自己的第一重臣。而阿桂在乾隆面前常常像一条狗一样，生怕有什么地方惹乾隆不高兴。

相比较而言，和珅的胆子要大多了，有恃无恐的样子。综合多种因素考虑，外界传言和珅是乾隆的男宠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来看看和珅的发迹路吧！

乾隆四十年，和珅只是一个乾清门侍卫；到了十一月，他就已经是御前侍卫，兼正蓝旗满洲副都统。

第二年正月，他又升为户部右侍郎；三月，担任军机大臣；四月，当上内务府大臣；十一月，授国史馆副总裁；十二月，兼任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并得到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

后来，他又担任九门提督、崇文门税务总督、御前大臣、户部尚书、议政王大臣、太子太保、理藩院尚书、国史馆总裁、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等职务。最后被封为一等公，爵位到顶。

在和珅当官期间，虽然做了一大堆坏事，但是也做了不少实事。譬如平抑粮价、和国外使节打交道、查办李侍尧等，但这些事情跟他的贪污案相比都不值一提。和珅贪污进了吉尼斯纪录，创造了世界之最。

和珅没有被嘉庆打倒之前，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我们想问的是和珅为什么这么“成功”呢？

用今天的话说，和珅是一个心理高手，他总能揣摩到别人内心想什么，简直是乾隆肚子里的蛔虫。正因为和珅如此“善解人意”，乾隆才感觉他离不开这个人，在自己没有吩咐之前，这个人就把自己想办的事情办好了。

乾隆很喜欢写诗，为了迎合乾隆，和珅花了很大工夫研究乾隆的诗歌，然后模仿乾隆的风格写诗。乾隆是个非常自恋的人，他当然不会不喜欢自己的诗，所以看到和珅的诗歌，他是打心眼里喜欢啊，仿佛一个练武的师傅看到徒弟把自己的武功耍得有模有样！乾隆还特别喜欢书法，和珅就可以模仿乾隆的字体，到最后居然能模仿得惟妙惟肖。

晚年，乾隆干脆把一些奏折交给和珅去批。乾隆喜欢佛教，和珅也精研佛教。总之，乾隆喜欢什么，他就喜欢什么；乾隆讨厌什么，他就讨厌什么。

乾隆四十六年，召集大家开会，乾隆想增加绿营兵的数量。大臣们大多不赞成，阿桂反对说：“增加兵额势必会增加军费，到时候必定加重百姓的负担……”阿桂还没说完，就发现乾隆已经紧绷着脸。这时候，和珅站出来说：“增加兵额有什么不好，现在国家这么富足，难道拿不出这点钱，从国库多拿出三百万两军费对于我们大清不过是小菜一碟。”

乾隆马上面露喜色，心想还是和珅懂朕啊！

和珅不光是会说好话，也会做好事。乾隆喜欢讲排场，花钱如流水，国库里有这么多钱让他花吗？和珅有办法，和珅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有办法从各级官员那里敛财，然后再从中抽出一部分供乾隆挥霍。

除了非法勒索之外，和珅还设立了“议罪银”制度，犯了错误的官员只要交纳相应的银钱就能赎罪。如果是个清官，又犯了错，实在交不起，也可以扣工资。这个“议罪银”相当于乾隆的私人小金库，或许这就是乾隆纵容和珅的原因，谁会拆了自家的银行？

嘉庆当然不可能放过和珅，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抑或是私人恩怨上，他都有充足的理由处死和珅。政治上和珅擅权，他这个嗣皇帝当得太难受；经济上，和珅聚敛天下财富，嘉庆上台，国库空虚，急需用钱；私人恩怨上，嘉庆受够了和珅的气，太上皇在的时候无处发泄，太上皇驾崩后，嘉庆就没有顾忌了。

好了，乾隆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乾隆虽然死去，却把问题全都留给了继任者嘉庆。风光了一辈子的乾隆却让他们的子孙过着窝囊纠结的生活。

江河日下 大清风云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鹿鼎公子
著



陆

比野史
更靠谱

比正史
更有趣

公认勤勉的嘉庆如何平定起义？
勤奋的道光缘何喜欢打补丁的衣服？
明明很贤能的奕訢为何没能继承皇位？
看至高皇权如何扶大厦之将倾。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风云.6, 江河日下 / 鹿鼎公子著.—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93-7310-1

I.①大... II.①鹿... III.①中国历史 - 清代 - 通俗读物
IV.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4245号

策划编辑: 胡 艺 (ngaihu@gmail.com)

责任编辑: 吕静云

封面设计: 古润文化

大清风云: 江河日下

DAQING FENGYUN: JIANGHE RIXIA

著者/鹿鼎公子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32
数/238千

印张 8.25 字

版次/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093-7310-1

定价: 29.8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值班电话: 010-66026508

邮政编码100031

传真: 010-66031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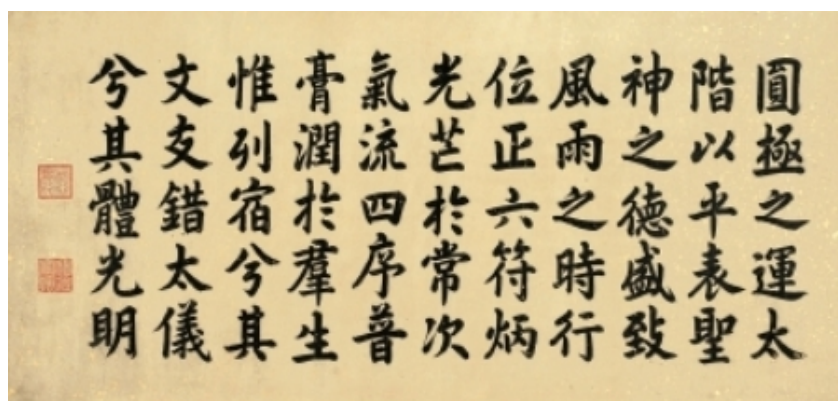
网址: <http://www.zgfzs.com>
010-66053217

编辑部电话: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66033393
010-66033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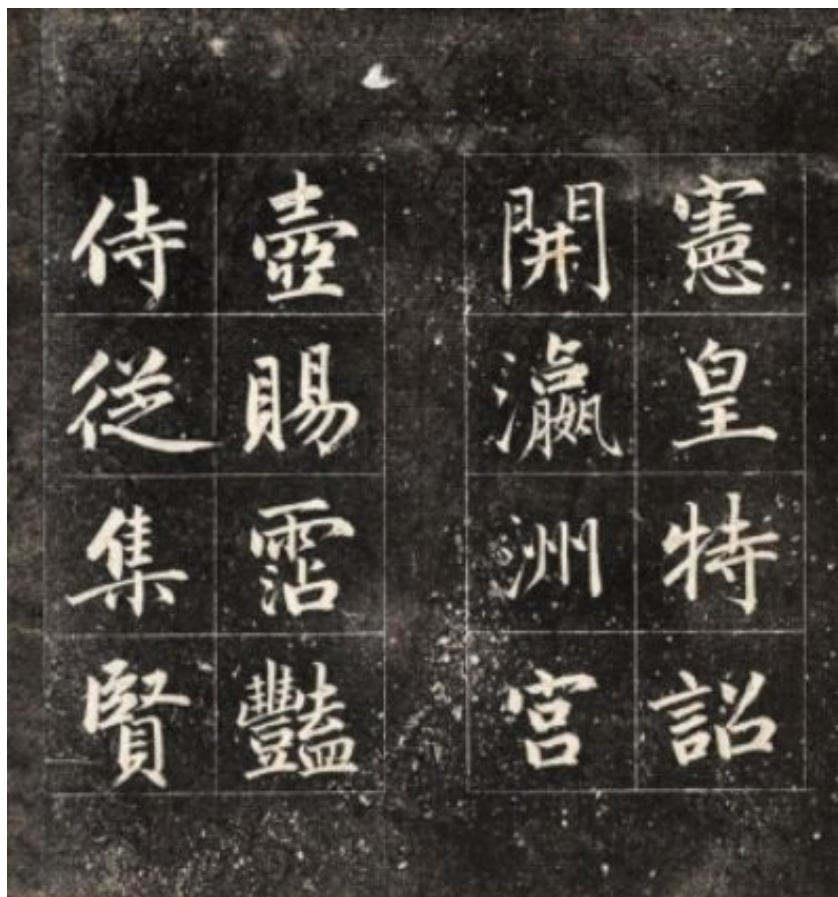
邮购部电话: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道光（款）（1782-1850）楷书

道光，爱新觉罗氏，名绵宁（即位后改为旻宁），庙号玄宗，谥号成皇帝。清仁宗（嘉庆）第二子。1820-1850年在位，年号道光，习称道光皇帝。



永理书法

爱新觉罗·永理，清高宗乾隆帝第十一子。清朝著名书法家。与翁方纲、刘墉、铁保并列，是清代皇室书法家。道光三年（1823年）三月三十，永理薨，年七十二，谥哲，为成哲亲王。著有《听雨屋集》《诒晋斋集》《仓龙集》。



新疆阿克苏局铸红钱

1826年8月，道光帝任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并调集大军从新疆阿克苏出发分三路平定张格尔叛乱。数万官兵云集新疆阿克苏，将士军饷和其他开支需求骤增。当时，清政府在阿克苏开设有铸钱机构，但铸钱工艺落后，加之铸钱铜材缺乏，铸造的铜钱难以应付浩大的军费开支。扬威将军长龄奏请朝廷，请求以内地五万两银锭为原料，仿照普尔铜钱的式样，在阿克苏钱局铸造银钱以应急。阿克苏局后铸道光背八年五钱、十钱以纪平定张格尔之乱。



太平天国玉玺印拓

太平天国，是清朝后期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也是清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太平天国”。

总序

清史洋洋洒洒近三百年，三百年间怪事、奇事、惨事、恨事迭出，三百年年年都精彩，年年都有挥之不去的喜怒哀乐。整个清朝三百年，几乎囊括了人性中一切的极端面，三百年，道不尽的风云爱恨。

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骑兵，建立了后金，身后留下了无数的尸体，最终倒在宁远城下，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书生袁崇焕手中，就此郁郁而终，这是上天对一个暴力征服者的最大讽刺。随后，努尔哈赤诸子开始斗智斗勇，最后皇太极靠谋略成为老大。

皇太极穷其一生精力都在与明朝对抗，不幸暴毙后，大清国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多尔衮与豪格之争最终便宜了顺治。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后，成为皇父摄政王，将全国军政大权操于一身，顺治完全被架空。此时，孝庄和顺治母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危难关头，孝庄舍身保大清，稳住多尔衮，终于使大清逃过这一劫。

顺治是个痴情天子，亲政后喜欢跟母亲孝庄闹不愉快，结果自己和董鄂妃双双去世。康熙继位时才八岁，不过这是个早熟的孩子，也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很早就懂得帝王之术。在别人还是懵懂少年时，他就已经像个猎人一样盯紧了鳌拜，除掉鳌拜之后，康熙开始了自己雄才大略的一生。

康熙治国和外交不外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所以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鳌拜，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荡平准噶尔，击退沙俄侵略……在整个清朝，帝王之术在康熙手中达到顶峰。

然而，康熙也有缺点，他的法度不够严明，治国主要是依靠儒术和道术。雍正虽然上位不明不白，但当皇帝后弥补了康熙的缺点，雍正治国理念上最大限度地奉行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乾隆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他继位后，废除雍正的依法治国思路，重新走康熙的路子。但乾隆并不懂康熙真正的治国精髓，结果变成了外用儒术、内用权术，所以清朝在乾隆时期开始走向衰落。

自乾隆后期，动乱纷起，尤其是白莲教叛乱几乎烧遍整个中国。到了嘉庆手中，国家元气已大伤，嘉庆虽然是个仁君，可惜终究没有先祖那份雄才。他虽然减缓了国家的衰颓，但始终没能重振大清的雄风。到了道光手中，国家就更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欺负得

够呛，国内的动乱更是风起云涌。

咸丰就更悲剧了，太平天国和天地会起义，全国天翻地覆。更糟的是八国联军来了，他连个京城都保不住，年仅三十岁便郁郁而去。咸丰死后，朝政大权掌握在“龙夫人”慈禧手中，国家每况愈下，虽然中途出现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可惜终究是昙花一现。

清末虽然出现了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袁世凯这样的中兴名臣，但亡局已定，神仙也不能力挽狂澜。最终，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千古帝王，悠悠万事，功过自有百姓言，清朝这些事儿，就交给读者去慢慢品味吧！

序言

从嘉庆开始，清朝的皇帝就当得有些郁闷了，在乾隆眼中，嘉庆是个非常平庸的皇子。正所谓虎父无犬子，嘉庆虽然赶不上雍正、乾隆，但也有自己的优势——他特别能忍。

和珅只手遮天的时候，嘉庆对和珅点头哈腰，虽然是个嗣皇帝，但表现得完全像个傀儡。乾隆去世后，嘉庆发挥清朝帝王的传统智慧，先稳住和珅，将其与外界隔离，然后再一举拿下，抄掉和珅的家，逼迫其自尽。整个过程做得相当漂亮，光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嘉庆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皇帝。

在嘉庆还是嗣皇帝的时候，白莲教就闹得风风火火，嘉庆刚掌权的时候，就致力于平定白莲教起义。为了平定这场叛乱，嘉庆花去了两亿两白银，如果不是从和珅家里抄出了一大堆银子，光是平定这次起义，清政府的财政可能就会崩溃。

嘉庆虽然当上了皇帝，但心里一直认为自己这个皇帝当得很憋屈。他觉得自己很仁义，可为什么倒霉的事情全都让自己碰上了。先是一个疯子为了出名，在紫禁城里准备刺杀他。更可气的是，这个刺客出现后，一帮侍卫居然都吓得闪开，虽然贴身侍卫扎克塔尔和巴丹多尔济很英勇，摆平了这个刺客，但其他人的表现着实让嘉庆心里拔凉拔凉的。

这事发生后不久，天理教徒勾结宫廷太监，在紫禁城内发动叛变。这对嘉庆的打击非常大，自古造反都是发生在宫廷外，可这次造反居然就发生在紫禁城内。嘉庆很伤心，下了一道罪己诏，含蓄地批评了乾隆。

虽然受过不少惊吓，但嘉庆一朝大清国还算稳定，没出大的乱子。最后嘉庆在承德避暑山庄暴毙，暴毙之时电闪雷鸣。

嘉庆之后，轮到道光上台。刚开始的时候，道光还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正常的皇帝，但是到后来道光就越来越有意思了，他沉沦在吝啬中无法自拔，就像守财奴一样享受着吝啬和节俭带来的快感。

道光上朝时，不论皇帝大臣，衣服上全都打着补丁，活脱脱就像开丐帮大会。道光的“节俭”已经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习惯，对治国于事无补。

事实证明，从嘉庆开始，清朝的皇帝越来越平庸，一代不如一

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饱尝了战败的屈辱，更糟糕的是国内的局势越来越乱，最最糟糕的是帝国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最最糟糕的是在恭亲王奕訢和咸丰之间，道光选择了更加平庸无能的咸丰。

帝国开始急剧地衰落。

目 录

总序

序言

第一章 乾隆为何选择呆头呆脑的嘉庆接班

这个皇子很一般

立嫡之痛

立储爆冷门

第二章 从傀儡皇帝到痛苦皇帝

做一个影子皇帝很难受

嘉庆和珅终极PK

和珅玩不过嘉庆

二十大罪

留和珅一个全尸

和珅家产是个谜

风光盛世藏危机

第三章 白莲教风云

官逼民反——历史再循环

女中豪杰王聪儿

造反是件悲催的事

杀了王聪儿，还有后来人

第四章 海上烽烟

海患成灾

两个海上黑社会老大

老大之死

第五章 天理教徒闯京城

神秘的刺客

违背天理的天理教

多事的太监

第六章 嘉庆朝最离奇的悬案

贼心胆边生

嘉庆拍案：奇！奇！奇！

第七章 紧锁的大门

来自海外的威胁

嘉庆禁烟

与英吉利使者的外交风波

第八章 嘉庆也多情

薄命皇后喜塔腊氏

执掌中宫时间最长的皇后

其他后妃

嘉庆热恋民妇之谜

第九章 嘉庆猝死之谜

难得奢侈一次

嘉庆暴死之谜

第十章 江山如画，风雨如晦

不错的小伙

梦想做一个好皇帝

求贤若渴

遍地都是贪官酷吏

第十一章 遗诏引发政府改组风波

这事得从乾隆出生说起

平庸的皇帝，平庸的宰相

第十二章 史上最抠门的皇帝

今年过节不收礼

内务府：省着花

节俭成政治秀

抠门到无语

节俭误国

第十三章 平定张格尔

点起狼烟的张格尔

狼子野心遇上官逼民反

此去万里天山路

捉拿张格尔

第十四章 打击盐梟

政坛新星

惩治盐梟

改革岂能手软

第十五章 惨不忍睹的鸦片战争

外来的不速之客

虎门销烟

旧世界与新世界的战争

第十六章 失败但不屈服

亡羊补牢

发生在台湾的冤案

支持民间抗英斗争

广州人民抵制英军进城

第十七章 道光的后宫生活

皇后暴死之谜

后妃虽多，子女不丰

立储之难

第十八章 帝国烽烟四起

镇压云南彝族起义

四平瑶民起义

可怕的敌人

疯狂的落第秀才

第一章 乾隆为何选择呆头呆脑的嘉庆接班

立了永琰后，乾隆还是非常不放心，他在祭天大典的时候默默祷告：“老天爷啊，帮朕把把关吧，如果皇十五子永琰是个贤君，保佑他平安幸福吧！如果他不贤，请让他短命而终吧！朕不是不爱子，只是江山社稷比父子之情更重要。”

如果儿子不贤就咒儿子死，乾隆这个祷告可谓是空前绝后。

这个皇子很一般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正月初一，一个非常喜庆的日子，京城里到处是鞭炮声。五十岁的乾隆在乾清宫广场上观看了烟火表演，乾隆的心情正如节日一样，是非常喜庆的。执政二十五年，大清国在他的领导下迎来了盛世，他感到自豪，也感到一丝疲惫。

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容易，这是乾隆的切身体会，他已经充分理解了父亲雍正。这些年来若非自己小心经营，国家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繁荣昌盛。

乾隆思绪在飘，然而太监们已经簇拥过来，乾隆在众人的呼声中来到养心殿东暖阁。每逢节日，一定有人让乾隆题字，这已经是一种惯例了，一来乾隆书法确实不错，二来这是皇帝的一大爱好。

太监们请皇上写下一些吉祥话，乾隆蘸饱墨水，提笔写下了“开门大吉”四个字，这四个字如果给今天的商人，那他就发了，有乾隆捧场，生意肯定红火。这一年，乾隆的兴致似乎特别高，他喝了点酒助兴，然后信笔写下了一首诗，诗的最后两句是：“御会岁朝图志语，有以迓新韶嘉庆。”

嘉庆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有了名字。众人交口称赞“嘉庆”是一个非常吉利的字眼，乾隆没有太大的反应，因为他实在对于赞美已经迟钝了，迟钝到分不出赞美和拍马屁的区别。

同年十月初六丑时，即公元1760年11月13日凌晨两三点，圆明园传出一阵啼哭声，嘉庆诞生了。此时，乾隆正在木兰围场秋猕，当京城里的信使快马加鞭赶过来告诉乾隆十五皇子出生时，乾隆没有显

出格外的欣喜，并没有搓着手说：“Oh，my god！”只是简单地说了声：“好的，朕知道了。”

说完之后，乾隆继续围猎。几天后，乾隆给小皇子赐名永琰。当上皇帝后，嘉庆改名额琰，他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因避讳而扰民，“永”字是个使用频率特别高的字，所以嘉庆选择了生僻字“颢”。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嘉庆这个皇帝确实宅心仁厚，庙号“仁宗”名副其实。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永琰会成为大清国的皇帝，更没有想到他的年号恰恰就是嘉庆。清朝史官认为这不完全是一种巧合，而是天意，说明乾隆当时就对嘉庆非常器重，刚生下来就打算让他当皇帝。

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乾隆皇子成群，嘉庆并不显眼，而且其母亲地位很低，只是一个“贵人”，“贵人”在宫廷的妃嫔里面属于下等的，只比“答应”和“常在”高一点儿，而且数量没有限制，物以稀为贵，“贵人”既然不稀少，那应该叫“贱人”才对，为何又叫“贵人”呢？这是因为东汉光武帝首次为阴丽华设置这个妃位时，“贵人”仅次于皇后，当时的皇后郭圣通是刘秀争夺天下的一个关键人物。刘秀想立阴丽华为皇后，可惜于理不通，大臣们不同意。

但是后来“贵人”的地位一降再降，到了清朝降到最低，没有丝毫贵气了。

嘉庆的母亲魏佳氏一共为乾隆生育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看在她生产勤劳的份儿上，乾隆后来升她为贵妃，嘉庆当上皇太子后，乾隆追封她为皇后，不过那时她已经去世二十多年。

嘉庆才貌不是很出众，又是庶出，他还是乾隆的第十五个儿子，怎么就轮到他当皇帝了呢？

一切还得从乾隆立嫡失败开始说起。

立嫡之痛

刚即位第一年，乾隆就效法父亲雍正秘密建储。

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初二，二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召集总理事务大臣和九卿到乾清宫西暖阁。当着大家的面，把亲笔书写的皇太子姓名密封好，藏在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牌匾的后面。

大臣们只是见证人，并不知道皇太子是谁。当时乾隆有三个儿子，皇长子永璜八岁，皇二子永璘六岁，皇三子永璋一岁。都是小孩

儿，看不出谁更聪明、谁更贤明。那就看他们母亲吧。永璜的生母是庶妃富察氏，永璘的生母是嫡妃富察氏，永璋的生母是庶妃苏佳氏。永璘的生母地位固然最高，但是大清国立储的原则从来不是立嫡，事实上清朝当上皇帝的都不是嫡长子。

皇太极是第八子，庶出；顺治是皇太极的第九子，庶出；康熙是顺治的第四子，庶出；雍正为康熙的第四子，庶出；乾隆是雍正的第五子，庶出。皇太极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压倒政敌，当上皇帝；顺治是因为多尔衮和豪格两强相争，捡了渔翁的便宜；康熙则是因为受到了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宠爱，当上皇帝；雍正是自强不息，参与争夺，最后权智高超，将皇位握在手中；至于乾隆，则是因为他的哥哥们太没出息，他本人能力突出，顺理成章当上皇帝。

康熙深受汉文化影响，在立储时曾经拼命想立嫡长子，可惜最后人算不如天算，心灰意冷之后，他没再立皇太子，所以搞得雍正即位非常尴尬。

雍正发明了秘密建储制度是基于康熙朝立储的困境，但秘密建储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对于秘密继承人来说，其中的秘辛只有当事人才知道。至少，乾隆体会是非常深刻的。因为秘密建储的最根本目的就是削夺太子的权力，所有皇子地位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很容易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被选定的那个人在当上皇帝之前没有特权，跟兄弟们平起平坐。结果他当上皇帝后，兄弟们难免适应不了，有时候会表现出对新皇帝的不尊重。

当皇子的日子是非常压抑的，乾隆感触很深。所以当他出头之后，决心废掉秘密建储制度，这可以理解，因为乾隆无法体会康熙的那种痛苦，所以乾隆的真实想法是像康熙那样立嫡长子，换句话说，就是重复历史。但是，作为雍正的儿子，如果一上来就废掉父亲引以为自豪的秘密建储制度，这无异于不孝，乾隆还不能这么做，但他公开表示秘密建储制度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甚至不惜冒着父亲从九泉之下跳出来的风险，说秘密建储只是无胆无识的庸主所为，可见，乾隆当时有愤青气息。

当时，大臣们已经看出皇帝倾向于公开立储，但那时大家还看不出乾隆居然想模仿汉文化的嫡长子继承制。在汉文化的传统里，一定要立嫡子，即使不是嫡长子，也要求是皇后所生。这就是为什么朱棣篡位之后，不惜抛弃亲生母亲，将自己的生母说成是马皇后。如果没有这种制度文化，他有必要伤亲生母亲的心吗？朱元璋受这种影响更深，嫡长子死后他居然让嫡长孙继承，选一个嫡次子或者嫡三子也行啊，他一定要“嫡长”到底。

乾隆当时没有预料到皇帝跟太子之间是有矛盾和冲突的，若非亲历，可能很难体会，总认为到自己身上有办法化解，其他皇帝只是没处理好这个关系而已。如果是这样想，就错了，皇帝与太子的冲突是势力本身的冲突，跟父子关系没有太大联系。

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太子是未来储君。帝国的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但是太子是潜力股啊，许多在皇帝面前不得志的人肯定想到投资太子，就算太子不想结党，其周围也难免形成一个党派。对于太子党的人来说，如果皇帝刚立完太子就两脚一蹬，那就最好不过了，最少的投资可以换来最大最快的回报。可是，大多数时候，皇帝要活很多年，有的是十几年，有的是几十年。太子和他身边的人难免天天盼望皇帝死去，有这种想法，你说皇帝和太子还能和平共处吗？皇帝自然担心太子党谋害自己，而太子也会觉得皇帝猜忌自己，将来是不是有一天把自己给废掉？

互相猜忌之后，后果就是康熙朝发生的事情，康熙朝太子事件绝不是偶然的。

乾隆秘密立储之后，大臣们纷纷猜测谁是密定继承人，一般认为是皇长子和皇二子，但谁也不能断定究竟是谁。

直到乾隆三年（1738年），谜底才揭晓。皇二子永琰得了伤风，当时大家觉得是小感冒，也没在意。没想到，十天之后，永琰居然病逝了。乾隆闻讯，悲痛不已，痛哭流涕，将密诏公布出来，大家才知道密定人选是永琰。

乾隆选择永琰为继承人有两个理由，一是永琰为皇后嫡生，还有一个原因是雍正生前也似乎看好永琰，理由是永琰这名字就是雍正取的，大有让他连续帝国之意。

这道上谕发出来后，永璜和永璋非常受伤，他们终于明白自己在父皇心中的地位是次要的。如果乾隆这时候能够克制，不将密诏公布，而是等时机成熟再遴选一个合格的继承人，可能对永璜和永璋就不会有太大的打击。

永琰逝世后，乾隆很长时间没有再立太子。

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是除夕。就在全中国人民沉浸在喜庆气氛之时，一个重大的噩耗再次降临在乾隆头上，皇七子永琮出痘而死，年仅一周零八个月。

这次，乾隆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痛哭，但他还是公布了内心的秘密，也就是永琮是他内定的继承人。永琮是皇后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这样一来大家知道了，原来这乾隆挑继承人只会从嫡子中选。

永琮夭折后，乾隆沉痛地说：“本来从来没有立元后嫡子继承大统的先例，朕打算走先人没有走过的路，求先人不能获取的福分，这是朕的错误啊！”

乾隆坚持要立嫡子，恐怕还是一种思想的偏见吧！在他看来，只有嫡子继承大统才功德圆满。当然，乾隆的元配富察氏确实是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富察氏的曾祖是大清的开国功臣，家世显赫。身为皇后，她不崇尚奢侈，反而非常节俭，喜欢用花草作饰品，不喜欢珠光宝气的东西。她将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连皇太后钮祜禄氏也对她赞扬有加，甚至对其他妃嫔生的孩子，富察氏也极为爱护。有这样一个贤惠的皇后，乾隆非常满意，赞扬说：“朕能够专心于国事，全赖皇后的帮助和支持。”

两个嫡子夭折，乾隆非常悲痛，欣慰的是，富察氏仍然年轻，身体也还好。正所谓，青山就在宫里，还怕没柴烧吗？富察氏，你一定要再接再厉，朕是不会改变立嫡决心的。

乾隆公开说过这话：“选择继承人第一考虑的要素是嫡出，而不是年长。在嫡子原则上是立嫡长，而不是嫡贤。”

两个儿子先后夭折对富察氏打击非常大，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她一病不起，溘然长逝。

对于富察氏之死，乾隆自然是痛不欲生，悲痛的还有很多人，但也有些人非常高兴，譬如乾隆的长子永璜。永璜认为，皇后去世后，也就没有嫡子了，在所有兄弟中自己居长，皇位理当属于自己。永璜的想法跟永璣很接近，只是没有永璣那么快乐而已，毕竟永璣才是长子，估计皇后死了，也轮不到自己。但是，永璣对皇后之死漠不关心，这一点跟永璣倒是相似的。

两个皇子的心理应该说是正常的，可惜城府不深。

乾隆看到他们对皇后之死不哀且乐，将他们狠狠地臭骂了一顿。皇后丧期过后，乾隆对两人的愤怒不但没有平息，反而逐步升级。乾隆骂他们的行为不堪入目，如果将他们的不孝行为公之于众，在世人眼里他们简直是人渣（“伊尚可忝列人世乎？”）。

如果乾隆只是痛骂他们，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他们的政治前途还是未知。但乾隆彻底断了他们的前途：“大阿哥是长子，三阿哥也稍长，如果能够安分守己，至少也能做个贤王或者贝勒。可惜，你们怀有异心，不自量力，日后必定兄弟相残。”

说到这里，乾隆想起雍正年间兄弟相残的事件，突然变得歇斯底里，吼道：“与其将来让你的兄弟杀你们，不如朕现在就亲手解决你

们！”

乾隆当然说的是气话，但是两个皇子早已吓得浑身发抖。乾隆的这番话不仅断送了两个皇子的政治前途，也给他们的人生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担心将来随时有可能被新君杀害。

永璜受此沉重打击后，很快就病倒了，最后一病不起。乾隆亲自过去探望，永璜流着泪说：“儿子不孝，不能送父皇。”乾隆也悲痛万分。不久，永璜去世了。乾隆知道，永璜之死自己是有责任的。

乾隆悲痛之余，追封永璜为定亲王，以亲王之礼安葬。随即对群臣下了一道死命令：“今后谁若提立储之事，立即正法。”

立储爆冷门

二十五年之后，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此时，乾隆已经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沉寂了这么多年，乾隆又重新提起了立储之事。他亲手写下皇子的名字，放在“正大光明”牌匾的后面，想必这时候的乾隆不得不佩服老爸雍正的智慧。

到底谁是继承人呢？这个问题像谜一样笼罩在帝国高层。

有人猜测是皇四子永琰，因为在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中，他最年长。皇长子和皇三子早就没有政治前途，而且皇长子很早就去世了。但永琰很早就过继给履亲王允禔，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也病死了，终年三十八岁，被追封为履亲王。

有人猜测是皇十二子永璘，永璘的母亲是乾隆的第二任皇后乌拉那拉氏。可惜乌拉那拉氏最后被废，被废的原因正史没有记载。乾隆本人并不喜欢这个皇后，只不过太后觉得她贤惠，让乾隆立为皇后，根据一些野史的记载，乾隆生性风流，南巡的时候寻花问柳，乌拉那拉氏不满，规劝乾隆，乾隆非但不听，还出言伤害她。乌拉那拉氏心里很不满，一气之下剪掉头发，在满族的风俗里，只有丈夫死了才剪发表示哀悼，乾隆认为这是乌拉那拉氏在咒自己死。

这么看来，皇十二子没有多大希望，乌拉那拉氏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死去，永璘的地位跟着直线下落。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十四岁的永璘郁闷而死。而且他死后，乾隆甚至都没有给他追封爵位，这是乾隆的儿子中唯一没有被追封的，可见乾隆对他母亲的厌恶到了什么程度。

皇五子永琪在众皇子中享受的待遇是最好的。他生于乾隆六年

（1741年）二月，精通满语和骑射。满语和骑射被视为清王室的看家传统，清朝历代统治者都对此非常重视，永琪能够保持满族的传统，乾隆非常欣慰，对他格外宠爱。

然而，永琪虽然喜欢骑射，但是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乾隆三十年（1765年），他生了一场大病，乾隆为了让他心情好起来，早点恢复健康，破格封他为荣亲王，因此他也是乾隆儿子中唯一生前就被封王的。乾隆本打算把皇位传给永琪，可惜永琪短命，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初八就病死了，终年二十五岁。

永琪死后，乾隆十七个儿子中还有七个是活着的，其中皇四子永琰和皇六子永瑤过继给别人，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余下还有五人，分别是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理、皇十二子永璂、皇十五子永琰、皇十七子永璘。除了永璂外，全是庶出，但永璂的母亲虽然贵为皇后，但他的实际地位连庶出都比不上。所以真正可以继承皇位的只有四个人。

说实话，这四个人在乾隆看来都不是理想的人选，没有理想的，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个相对好一点的。

说实话，乾隆自己也不知道选谁好，只好用排除法，剩下的那一个就是未来的继承人了。

四人中，最年长的永璇是个跛子，如果仅仅只是身体有缺陷，乾隆还可以容忍。关键是永璇这个人品德上也有缺陷，他也许是一个不错的艺术家，诗写得比父亲还好，书法也相当有型，甚至还会画画。也许正因为艺术才能过于丰富，才养成了他放荡不羁的性格，在当时人的眼中是非常离经叛道的。

永璇喜欢游山玩水，喜欢跟文士们饮酒作乐，一副名士派头。经常丢下正事不干，擅自出游，完全没有纪律意识和大局观念。像这样的人，乾隆不可能放心把庞大的帝国交给他。

我们再来看看永理吧！

永理比永璇更出格，如果说永璇有些放纵的话，永理则完全是另类。他的艺术才能比起永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书法艺术在清朝三百年间可以排上前几名。一般人是求不到他的字的，如果现在有他的真迹，那就发了。有一次，永琰拿着永理为自己画的扇子，上面落款是“兄镜泉”，正巧乾隆看到这个扇子，奇怪地问永琰：“朕什么时候有一个叫镜泉的儿子？”永琰告诉他镜泉就是永理，乾隆听了，叫来永理臭骂一顿，说他忘记了满族人的尚武习气，沾染了汉人士大夫的习气。

仅凭这些，还不能就此判定永理没有继承人的资格。因为，有一段时间，乾隆去永理家里非常频繁，父子关系似乎非常亲密。但是，之后乾隆就很少去他家里了。原来，永理的一些怪癖被他发现了，他实在受不了这个儿子。

作为一个皇子，坐拥金山银山，但是永理却非常小气，小气到已经是一种心理疾病了。有一天，他府里死了一匹马，他心疼得要命。读者可能以为永理爱马，其实不是，他心疼的是财产损失。他拦在自己的家门口，不让别人把马拉出去埋了，执意要炖马肉吃，说这样才不算浪费，今天晚上请大家吃马肉。永理可不是想请大家吃饭，而是为了省下王府里下人们的几顿饭钱。

由此可见，永理这人气小到什么地步。自己手中一大堆金银，但是他带着王府的人每天喝粥，估计乾隆来了，他好歹还是会准备一些素菜的。你说乾隆能受得了这种人吗？这种人与人相处都不容易，更别说统治一个帝国。

道光三年（1823年），永理临终前拒绝别人给他洗身体，他说：“死后入土腐烂，比现在还脏，到时候你们有人替我擦洗身体吗？”

我们再来说说乾隆最小的儿子永璘，这孩子也是个怪人。乾隆择储的时候他只有八岁，能力如何很难真正判断。不过，仅仅看他的表现，乾隆是不满意的。虽然是一个小孩子，但是从小就不爱学习，乾隆觉得他轻浮。事实证明，乾隆的判断是正确的，永璘长大后非常“不成器”，为什么要打引号呢？因为我们现在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不再是依据传统的价值，而是多元化个性化地看待一个人。

永璘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他经常出宫溜达，光顾各种各样的胡同，混迹于花街柳巷。换句话说，他没什么贵族气派，平民口味非常重。对这个最小的儿子，乾隆也懒得管他，只要他开心就好。当然，永璘也有一些优点，他喜欢跟一些贩夫走卒下棋聊天，完全没有皇子的架子；而且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没有野心，很有自知之明。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即使皇冠像雨点一样从天上洒落，也淋不到我头上。”这样一个人虽然不适合当皇帝，但也是有自己个性的，他追求的是个性的解放，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受约束，你让他当皇帝他也未必愿意当。

没办法，只剩下永琰了，就算他不想当皇帝也不行了。看来，乾隆选择嘉庆实在是迫不得已。嘉庆在当皇子期间表现得很平庸，不算好也不算坏，用现在的话说“就那样呗”！嘉庆虽然没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是很努力，学习非常刻苦，沉得住气，坐得起冷板凳。

嘉庆没有什么过人的优点，把江山交给这么一个平庸的人，乾隆其实是不甘心的。乾隆甚至对十皇女固伦和孝公主说过这样的话：“你如果是皇子，我一定立你为继承人。”由此可见他对儿子们的失望程度。

当然，乾隆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像朱元璋那样直接跳过儿子，立孙子。但朱元璋毕竟失败了，立孙子后，燕王朱棣就造反了。乾隆不敢冒这个险，虽然他的孙子中确实有比较出色的人，比如皇长子的儿子绵恩能力就很出众。

立了永琰后，乾隆还是非常不放心，他在祭天大典的时候默默祷告：“老天爷啊，帮朕把把关吧，如果皇十五子永琰是个贤君，保佑他平安幸福吧！如果他不贤，请让他短命而终吧！朕不是不爱子，只是江山社稷比父子之情更重要。”

如果儿子不贤就咒儿子死，乾隆这个祷告可谓是空前绝后。

第二章 从傀儡皇帝到痛苦皇帝

乾隆几乎把一切权力都紧紧攥在手中，嘉庆只好夹着尾巴做人，每天对乾隆毕恭毕敬俯首帖耳。以至于外国使者看到这一幕，不明白嘉庆为什么整天不做事，只顾宴饮游乐，侍奉太上皇的时候，太上皇喜悦他也喜悦，太上皇笑他也笑，形同牵线木偶。

做一个影子皇帝很难受

在乾隆八十三岁大寿的宴会上，喜庆之余，他忽然想起自己六十岁生日时候曾经放话：“如果有幸能够在位六十年，就禅位给儿子，不敢超过皇祖的在位时间。”

皇帝说话，一言九鼎啊，大家都听到了，所以不能不算数。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乾隆登基六十周年纪念日），乾隆在勤政殿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正式宣布在次年元旦举行禅位大典。接到这个消息，永琰既惊喜又惶恐，他已经预感到这一天，没想到会来得这样快。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有一件小事值得注意。在乾隆公布这个消息之前，时任首席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要职的和珅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永琰。和珅还给永琰行了一个大礼，那意思是将来皇帝就是你了，你能当上皇帝有我和珅一份功劳啊，到时别忘了我啊！和珅自以为投机高明，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嘉庆平生最厌恶那些玩弄权术之人。再说了，你要投资也要长线投资啊，不能临时抱佛脚。

永琰的身份突然发生变化，欣喜的同时他也感受到一份沉重。作为一个皇子，嘉庆虽然没有表现出过人之处，但从他后来执政的表现来看，他还是一个有智慧、有头脑的皇帝，能够见微知著。此时，他已经感觉到这个帝国的沉重，在乾隆后期，盛世正在不断衰退，嘉庆已经明显感到身上的压力。

乾隆主动禅位——这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唐朝李渊虽说也做了太上皇，但毕竟是被迫的。永琰幸运的地方在于他是第一个在歌舞升平中当上皇帝的，以前新君即位的登基大典都是在国丧期间举行的。悲喜两重天，让那些大臣也非常难堪，刚刚为老皇帝死去悲痛，又得为新皇帝即位高兴，迫使他们一个个变成演技高超的实力派。

这回，大臣们不用这么痛苦了，普天同乐，只管高兴就行了。

公元1796年2月9日，这天同时举行禅位大典和登基大典，紫禁城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这一天有三喜，既是春节，又是禅位大典和登基大典。典礼办得非常隆重豪华，王公大臣和文武百官站在太和殿外恭敬等候，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等外国使臣也位列其中。

八点以后，太和殿外隐隐传来奏乐的声音，乾隆一行人身着朝服缓缓步入太和殿。随后，乾隆坐在金龙宝座上，太子永琰则西向侍立。

音乐停止后，殿外传来清脆的鞭炮声，随后殿内奏响庆典音乐。永琰带着文武百官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两位大学士宣读美文，读完之后，大学士将“皇帝之宝”跪递给乾隆，乾隆接过宝玺之后，亲手将这象征着帝王权力的宝玺交给永琰。永琰接过之后，再小心翼翼地将宝玺交给身边的大学士。

禅让大典结束后，就是隆重的登基大典。典礼完成之后，接下来便是一些加恩赏赐、赦免、赈济孤寡等措施了。

随后几天就是吃喝喝的事情了，皇宫里吃喝喝跟其他地方吃吃喝喝没啥区别，只是礼仪烦琐一点，美酒佳肴丰盛些。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举办了盛大的千叟宴。千叟宴在康熙朝时就举办过两次，分别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和六十一年（1722年）。不过，乾隆举办的千叟宴奢华程度远远超过了康熙。乾隆也举办过两次，一次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还有就是这次了。

这次参加宴会的有三千零五十六人，列名邀赏的有五千人，合计八千多人。参加宴会的老人至少要六十岁，因为这是一个以老人为主题的宴会。参加宴会的，年纪最大的是一百零五岁的郭钟岳，在子孙的搀扶下赴宴。其间，乾隆亲自赐酒给一品大臣以及年满九十岁以上的长者。

与此同时，国家的年号已经改为嘉庆了，嘉庆钱也在紧锣密鼓地生产，似乎新皇帝可以一展抱负了。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形式。

乾隆禅位只是形式，一个做了六十年皇帝的人，对权力太熟悉了，一时让他交出权力，他没法适应。

他很早就表示：“归政后，如果遇到军国大事和用人方面的要事，还是不能不过问的。新皇帝刚即位，有很多地方不懂，所以还需要教诲，每天都来朕这里听政。”

退位后，和珅建议乾隆仍然自称“太上皇帝”，而嘉庆则称为“嗣皇

帝”，乾隆愉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从此以后，乾隆还是皇帝，嘉庆不过是一个见习皇帝。

乾隆还要求年号共存，他在退位诏书中写道，退位以后，宫廷中仍用乾隆年号，地方各省用嘉庆年号。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二十日，湖广总督毕沅征剿白莲教起义时，上了一道奏折，在奏折末尾写下了“仰副圣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注盼捷音”的话，这本来是祝福歌颂的套话。但是敏感的乾隆立刻意识到了问题，毕沅将歌颂嘉庆的话放到自己的前面，分明是没分清主次。此时，乾隆刚交出皇位二十天，立即大动干戈，下旨斥责毕沅，说军国大事自己仍旧亲理，嗣皇帝不过聆听教诲，学习经验。毕沅不遵旨办事，是不是有什么意见？

乾隆几乎把一切权力都紧紧攥在手中，嘉庆只好夹着尾巴做人，每天对乾隆毕恭毕敬俯首帖耳。以至于外国使者看到这一幕，不明白嘉庆为什么整天不做事，只顾宴饮游乐，侍奉太上皇的时候，太上皇喜悦他也喜悦，太上皇笑他也笑，形同牵线木偶。

嘉庆皇帝忍耐功夫很强，也是个孝子，他不仅在乾隆面前低声下气，在和珅面前也大气不敢出。表面上嘉庆对谁都彬彬有礼，实际上内心有太多不快，他把这些全都藏在心里，颇有勾践卧薪尝胆的风范，只不过嘉庆没勾践那么狠。

忍了三年多，终于等到了乾隆归西的那天。弥留之际，乾隆仍然抱怨说：“可惜军务没有处理完，留下了大遗憾。”临死前，乾隆紧紧攥着嘉庆的手，眼睛望着正在交火的西南方。尽管他很不情愿，但还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嘉庆和珅终极PK

嘉庆可能是清朝品德指数最高的一个皇帝，他像祖父雍正一样勤政，品行端正，生活简朴，为人宽厚，而且非常自律，关心民生疾苦，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在清朝正史野史中很难找到他荒淫、昏庸、阴险的记录。可惜，尽管是这样一个皇帝，也没能挽救清朝的衰落。所以，在很多人眼里，嘉庆是一个平庸皇帝，也是一个悲剧皇帝。

乾隆晚年虽然看上去仍不显太老，但是记忆力越来越差，经常是早晨的事，晚上就记不得了。和珅因此更加专权，没有人敢对他说个“不”字。嘉庆呢，演好傀儡角色，同时密切物色人才。他看中了德

高望重的刘墉，刘墉为人正直，从不对和珅阿谀逢迎。

和珅在外国人眼中俨然二皇帝，嘉庆不过是一个三皇帝。如果说忍耐乾隆是嘉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的话，那么对和珅，嘉庆已经反感到极点。

和珅尽管跋扈，但也没有丧失理智。他知道乾隆的日子已经不多，将来嘉庆会不会对自己动手，还真拿不准。所以，和珅对嘉庆处处提防，而嘉庆也对和珅小心翼翼，他知道一旦和珅在乾隆面前说自己坏话，自己可能很轻松就被撤掉，所以嘉庆不给和珅留下任何把柄。

两人就这样暗暗地斗法，归根结底，还是嘉庆技高一筹。

虽然和珅也不弱，嘉庆嗣位不久，和珅就将心腹吴省兰安插到嘉庆身边，表面上是帮嘉庆抄写诗文，其实是暗地里监视嘉庆。嘉庆对此心知肚明，但也绝不能一味认怂。和珅固然位高权重，但摆脱不了奴才的身份，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嘉庆也会在和珅面前耍耍皇帝的威风。

据说，和珅跟大臣们交谈，言必称太上皇，嘉庆知道后，私下里痛骂：“好个奴才，你蔑视朕，不给你点儿颜色，你还不清醒了。”

第二天，嘉庆把和珅叫到殿前，问他：“太上皇对你还好吧？”

和珅说：“太上皇的恩德天高地厚，奴才虽死难忘。”

接着，嘉庆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朕对你怎么样呢？”

和珅想了想说：“陛下对臣的恩德虽然不能和太上皇相比，奴才也会誓死以报。”

嘉庆冷笑一声：“好个誓死以报。太上皇和朕，哪个更贤明呢？”

和珅支吾着：“这个……奴才不敢说。”

嘉庆逼问：“必须得说，你大可以放心地说。”

和珅只得回答：“太上皇有知人之明，陛下有容人之量。”

嘉庆发出一阵奇怪的笑声。

当然，这是野史记载，不过真实地反映了嘉庆的心境。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和珅毕竟还是忌惮嘉庆的。

民间还有一个传说更有意思。说是太上皇训政之时，召和珅入见。和珅进去以后，看到太上皇正南面而坐，嗣皇帝嘉庆则坐在下面的一个小板凳上。和珅下跪以后，太上皇双目紧闭，口中喃喃而语，

嘉庆竖着耳朵听，却根本听不懂乾隆在说什么。过了很久，乾隆突然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这人叫什么名字？”嘉庆自然云里雾里，和珅却说：“徐天德、苟文明。”

接着，乾隆又闭起眼睛，喃喃而语。这一幕让嘉庆非常吃惊，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嘉庆在心里想。事后，嘉庆问和珅，和珅告诉他：“太上皇念的是西域的一种秘咒，这种秘咒可以让太上皇憎恶的人无疾而终，哪怕是千里之外，也一定会顷刻毙命。我刚才听太上皇念咒，就知道他在诅咒白莲教的那帮匪首。当皇上问起时，我就说了白莲教两个匪首的姓名。”

嘉庆听了，背淌凉汗。和珅既然知道这么多，肯定也会这种秘咒，万一自己哪天得罪了他，他给自己也来个无疾而终，岂不冤枉。

这个传说虽然是假的，但是对于乾隆、和珅、嘉庆三者的关系却描绘得非常传神。

还有一个传说，乾隆驾崩后，嘉庆秘不发丧，假传乾隆旨意急召和珅入宫。和珅进宫后，却看到嘉庆站在自己面前，连忙行君臣之礼。嘉庆却莫名其妙地拿出一件袖子又短又窄的衣服给和珅穿，和珅不好抗命，只好穿上，但是袖子窄到根本伸不进去，和珅怕把袖子撑破，不肯穿。嘉庆笑道：“不是袖子太小，是你的拳（权）太大。”

和珅一听，知道出事了，哭着要见太上皇。嘉庆便带着和珅来到太上皇寝宫前，看到乾隆已死，和珅放声大哭。嘉庆也哭了一阵，接着就问和珅：“皇考对你怎么样？”和珅说：“太上皇的大恩，奴才虽死难忘。”嘉庆说：“皇考留下遗诏，让你殉葬，皇考待你不薄啊，九泉之下都挂念你。”

和珅一听，知道完了，连忙跪地求饶。嘉庆冷笑，把和珅轰了出去。

和珅玩不过嘉庆

在乾隆执政后期，和珅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就连嗣皇帝嘉庆也得看他的脸色行事。同时和珅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贪官，他任人唯亲、党羽密布、贪腐成性、排斥异己。

最过分的是和珅经常有越礼的行为，府邸修建得就像皇宫。他仿照紫禁城宁寿宫的样子为自己盖了个锡晋斋，豪宅里还装了几十对铜路灯，比皇宫里还精致。此外和珅还在府里装了几十口太平缸。装铜

路灯和太平缸看起来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根据清廷的规矩，和珅是没有资格装这些东西的，这些属于皇帝的特权。

想想吧！宁寿宫是乾隆禅位归政后住的地方，和珅照着宁寿宫修建府邸简直就是僭越到极点。有人会奇怪，和珅做这种事，乾隆是不是知道呢？乾隆可能不知道，也可能装作不知道。当时的官员大多跟和珅勾结成一党，而且和珅把持朝政，很少有人敢告发他，就算你写密折参劾和珅，很有可能这密折就落到和珅手上。

乾隆还将圆明园附近的淑春园（今天的北大）赏赐给和珅，和珅将其经营为西郊有名的私家园林。和珅过着极度奢侈的生活，挥霍无度。不仅如此，和珅还派堪舆家为自己墓地选址，最后选定了河北蓟州一处地方，和珅又按照皇帝陵墓的规模形制为自己修建了气派、壮观的巨大墓地。据说，墓前修建了门楼，门前还开了隧道。门楼里还有享殿和配殿，大门称为宫门。四周有内外围墙，墙西盖了一座阳宅，里面有219间房子，里面住着和珅的家奴和护院，这些人都是用来守陵的。所以，当地老百姓称这个墓为“和陵”。

对于和珅的专权与不法，嘉庆早在做皇子时就有所了解。《满清稗史》记载，和珅出入宫中时，伺候乾隆喜怒，他说的话乾隆都听，即使是皇子也忌惮他，一天和珅手提着象牙杖出来，边走边说：“今天皇上对某个阿哥感到震怒，当众杖打几十下。”嘉庆为皇子，必然屡次受到和珅的侮辱，之前只好隐忍，等手握大权之后肯定会除之后快的。

就说嘉庆在嗣位之前，和珅就卖弄聪明，提前将消息透露给嘉庆，对这种行为嘉庆是非常看不惯的。和珅一方面通过这种卑鄙的手段在嘉庆面前邀宠；另一方面又偷偷把嘉庆写的诗递给乾隆，想方设法监视嘉庆，致使嘉庆如履薄冰，导致嘉庆的恩师朱珪不能进京述职，嘉庆本人也时刻担心被乾隆撤掉。

在太上皇三年训政的日子里，嘉庆对于和珅的本性看得更清楚了。乾隆朝的腐败嘉庆也看在眼里，对于嘉庆来说，要进行改革，剔除弊政，第一步就是诛杀和珅。为了等这一天，嘉庆忍了三年。

当这一天到来之时，即使是大丧之日，嘉庆也毫不手软。在嘉庆看来，杀和珅事大，大丧事小。他之所以这么迫不及待地杀掉和珅并不是不孝，而是不能给和珅喘气的机会。

乾隆在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逝世，第二天嘉庆就剥夺了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职，当然嘉庆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他对和珅说：“你是大行皇帝的近臣、首席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实是国家的勋旧元老，朕刚亲政，诸事还仰赖你啊！希望相公不

要辜负大行皇帝的重托，辅助朕处理一切军国大事。现在国家大丧，丧事乃国家首要大事。朕特命你全权主持丧事，暂时免掉你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的职位，你专心治丧，等丧事一过，再恢复你的职位。”

嘉庆对福长安说：“大行皇帝在世之日，你与和珅朝夕伺候，朕非常感谢你们。特命你们一起治丧，暂免你军机大臣和尚书等职，丧期一过，便恢复你的职位。”

和珅和福长安这两个老谋深算的人都被嘉庆给迷惑住了，以为嘉庆很信任自己。与此同时，嘉庆迅速进行领导层调整，以防止和珅等人反扑。嘉庆让十一哥永瑍担任军机大臣，处理军政要事；封八阿哥永璇为亲王，总理吏部；让大哥永璜的儿子绵恩担任九门提督，同时指挥火器营和健锐营。

绵恩到岗后，迅速将和珅府中千余甲兵调走，同时撤换九门提督衙门里和珅的亲信，切断和珅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正月初八，嘉庆正式动手，他召来大学士刘墉和恩师朱珪，让他们和内阁一道弹劾和珅。经过内阁和文武官员的弹劾，嘉庆宣布剥夺和珅和福长安的职位。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嘉庆待在养心殿里足不出户，昼夜召见大臣，共同商量对策。这些日子里，后妃们不知道嘉庆在干吗，但是从嘉庆紧张而有序的神色来看，一定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嘉庆彻底将重要部门大换血之后，就可以放心地对和珅展开进攻了。

科道弹劾、御史弹劾不过是走过场，大家都知道和珅是必死的。当嘉庆将他逮捕入狱的圣旨传来时，和珅惊呆了，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自己还在乾隆的灵柩旁，为乾隆主持丧事，嘉庆怎么会在先皇大丧之日逮捕自己呢？不可能。尽管照常理推测不可能，但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容不得他不信了。

和珅下狱后，正月十一日，嘉庆就和珅问题专门发出一道上谕，指责和珅种种不法之处，接着让各部门尽快给和珅议罪，并将和珅的罪行分发各省，让大家一起“讨论”。嘉庆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大家顺水推舟，纷纷指责痛骂和珅。直隶总督胡季堂说：“和珅丧尽天良，简直猪狗不如，种种悖逆行为，祸国殃民，跟白莲教的这些逆贼如出一辙，这么一个无耻小人，目无君上，应该依照大逆律凌迟处死，抛尸街头。至于福长安，应该斩立决。”

这已经不是议罪了，而是人身攻击，虽然和珅确实罪大恶极，但 these 大臣的做法也让人有些恶心。

对于嘉庆来说，这并不恶心，他的目的达到了。在舆论的强大攻势下，诛杀和珅便是替天行道。

二十大罪

嘉庆给和珅定了二十条大罪，分别如下：

一、乾隆册封皇太子时，还没有颁布谕旨，和珅就提前告诉当今皇帝，泄露国家机密，居然想以此邀功，这是大罪一。

二、乾隆在圆明园召见和珅时，他居然骑马直接从左门进去，这是目无君父，这是大罪二。

三、和珅以腿疾为由坐轿子直接进大内，乘着轿子直接出入神武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忌惮，这是大罪三。

四、和珅将一些放出宫的宫女娶为妻子，完全不顾廉耻，这是大罪四。

五、自从进剿白莲教匪徒，乾隆日夜期盼知道军情，和珅却将各路军情匿而不报，有意欺瞒皇上，导致贻误军机，这是大罪五。

六、乾隆身体不适的时候，和珅毫无忧戚之色，每次见过皇帝后，出来还谈笑如常，丧心病狂，这是大罪六。

七、乾隆最后一年批阅奏章时，字迹有些模糊，和珅居然说看不清楚，干脆撕了重写，这是大罪七。

八、和珅奉乾隆之命管理吏部刑部事务，竟然一手操纵，独裁专横，不许下面的人说一句话，这是大罪八。

九、奎舒奏报循化和贵德二厅贼众千人抢夺达赖喇嘛的牲畜，杀死两人。和珅居然将原奏驳回，完全不把边务当回事，这是大罪九。

十、乾隆驾崩后，嘉庆命令蒙古王公未出痘的不必来京，和珅不遵旨办事，说不管有没有出痘都不必来京，完全不考虑国家安抚外藩的政策，居心不良，这是大罪十。

十一、大学士苏凌阿衰老不堪，听力困难，但由于和珅的弟弟和琳是姻亲，这事居然隐匿不报。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等人曾经在和珅家里教书，后来这些人都位列卿位，兼任学政，和珅任人唯亲由此可见，这是大罪十一。

十二、对于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擅权的做法，

不胜枚举，这是大罪十二。

十三、查抄和珅家产后，发现他盖的楠木房屋僭越礼制，宝阁房屋模仿宁寿宫的格局，和珅园林也跟圆明园类似，居心悖逆，这是大罪十三。

十四、和珅蓟州坟茔设置享殿，开凿隧道，周边百姓称之为“和陵”，这是大罪十四。

十五、和珅家里藏的珠宝无数，珍珠手串有两百多串，比宫廷内还多几倍，而且和珅的大珍珠比宫廷里的都大，这是大罪十五。

十六、宝石顶不是和珅应该戴的，但是和珅私藏宝石顶几十个。和府里的大宝石不计其数，很多宝石连大内都没有，这是大罪十六。

十七、和珅家里银两和衣物超过千万件，这是大罪十七。

十八、和珅家里夹墙里藏有黄金两万六千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里埋有白银两百余万两，这是大罪十八。

十九、和珅在通州和蓟州有大量的当铺和钱店，总资本不下十余万两。和珅身为首辅大臣，与民争利，实属可恶，这是大罪十九。

二十、和珅家奴刘全，竟有资产二十余万，还有许多珍宝。一个下贱家奴居然如此财大气粗，可见和珅平日搜刮之厉害，这是大罪二十。

和珅贪赃枉法之处罄竹难书，自古罕见，故不一一列举。

从嘉庆列举的罪状中我们可以看出，贪污罪并不是嘉庆最深恶痛绝的，嘉庆最痛恨的是和珅专权。其中罪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专权的有十六条，而贪污罪集中在后面四条。

和珅认罪的态度很好，基本上都认了，这并不是说和珅这人有自知之明，有悔改之意，只是他深谙官场之道，就算那些罪名全是捏造的，他也必须认，何况还基本属实，不认罪会死得更惨。

福长安也跟着和珅一起遭殃，福长安是傅恒的儿子，他的哥哥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都是朝中重臣，福长安本人担任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因此他的罪状要轻许多，而且也更模糊。嘉庆说福长安世受皇恩，在军机处做事，与和珅朝夕相处，对和珅僭越不法行为应该最为熟悉，但是福长安从来没有将和珅的罪行揭发，显然两人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嘉庆还说福长安只要在自己面前哪怕一次提起和珅的罪行，就不会对他有任何惩罚，现在从福长安家中也查抄出了许多非法钱财，这些钱财虽然远远比不上和珅的多，但也是非法所得。

嘉庆给福长安治罪的理由是他没有揭发和珅，这是强人所难了，当时谁敢揭发和珅，就连嘉庆本人也是忍气吞声。不过，当时军机处有四个重要的大臣，阿桂、王杰和董诰对和珅的不屑大家都知道，唯独福长安和和珅关系不错。

留和珅一个全尸

和珅的罪定了下来，凌迟处死。但是，嘉庆却有些为难，不知是不是装出来的。嘉庆对大臣们说：“和珅的所作所为，固然应该千刀万剐，但是现在正值大丧，和珅曾伺候太上皇几十年，处死和珅会不会留下话柄？”

大臣们自然纷纷说和珅这个人罪大恶极，人神共愤，处以极刑是万民拍手称快的好事，相信太上皇看到这一幕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这样一来，嘉庆完全没有心理压力了，好吧，那就将和珅凌迟处死吧！想到和珅被千刀万剐死状惨不忍睹，嘉庆心情如同酷暑饮冰雪，享受到复仇带来的强烈快感。

嘉庆虽然是一个仁宗，但对和珅他真的是恨不得凌迟处死。只不过，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的老婆固伦和孝公主来求情，请求嘉庆给和珅留一个全尸。嘉庆可以不给和珅面子，也可以不给丰绅殷德的面子，但不能不给妹妹的面子，只好退一步，赐和珅自尽。

考虑到和珅党羽众多，一旦展开清查，势必挖出萝卜带出泥，到时人心惶惶，国家会动乱。嘉庆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珅案子绝不株连，只处罚和珅一人。福长安虽然是从犯，但嘉庆从宽处理，将斩立决改为监禁。监禁半年后，将他无罪释放。

和珅之子丰绅殷德是额驸，加上固伦和孝公主深得乾隆宠爱，嘉庆不想让妹妹伤心，仍让丰绅殷德保留伯爵爵位，但必须在家闲住，不能外出滋事。

此时，和珅还待在监牢里，对于外界的一切都不得而知，不过他知道等待自己的一定不会是好结果。此时，和珅才五十岁，从权力的巅峰一下子沦为囚犯，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他触景生情，在狱中写了一首诗：“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金龙，认取香烟是后身。”

没多久，一条白练送到监狱里，和珅感慨万千，最终狠下心来悬梁自尽。

和珅家产是个谜

和珅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据说那些查抄和珅的官员进去以后，目瞪口呆，这里简直是个宝库，查抄工作进行了五天五夜。

史学家萧一山在《清朝通史》中说：“和珅家财，以比例推算之，殆不下八万万两，甲午庚子两次赔款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书中说，和珅的家产按照当时美国货币推算，价值十亿美元以上，这个数目换到今天至少是几千亿美元。现在一般认为和珅的家产有十一亿两白银以上，当然这些财产也不完全是贪污所得，有些是皇帝的赏赐，有些是和珅自己经营而来，比如开钱庄之类。

财产之多，已在嘉庆的预料之中。嘉庆最奇怪的是，和珅家中还有一些违禁物品，譬如珍珠朝珠。这种东西只有皇帝才能佩戴，和珅怎么会有呢？经过严密审讯，家仆们供认，和珅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这些朝珠佩戴在身上，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时而说着谁也听不见的话，时而傻乎乎地笑着。和珅知道这是非常悖逆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就是死罪，所以谁也不让看见，自己一人躲在黑夜里孤芳自赏，自得其乐，过过皇帝瘾。

这一次，嘉庆吃得很饱。但是，很快人们就对这笔巨额财产的去向产生疑问，是不是全部充入国库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很多人怀疑大部分财产进入了嘉庆的私囊。

有一件事可以证实这种怀疑不是毫无道理的，副都统萨彬图急着邀功，一再向嘉庆上奏，说和珅的财产相当多，肯定不止查抄出来的那些，有很多财产或者寄存他处，或者被人侵蚀挪移了，刑部处理这事时肯定有很多隐瞒之处，萨彬图请求嘉庆严厉追究。

然而，嘉庆有什么反应呢？他对萨彬图完全不理睬。然而萨彬图很不识时务，没过多久又上奏，说他从亲戚那里听到，和珅家里有四个掌管账目的使女，可以拿她们来审讯。萨彬图可能是想向新君邀功，也可能是眼红那些侵吞和珅财产的人。但他这种做法让嘉庆很恼火，嘉庆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你又不是查抄和珅家产的官员，干吗要越俎代庖，你审讯那几个女子，到底想干啥？”

骂了一通之后，嘉庆直接点明要害：“你是不是怀疑朕私吞了和珅的财产，你把朕看成什么人了？”

嘉庆越是这样辩解反而让人越怀疑，他也知道可能会这样，进一

步辩解，自古籍没家产的目的无非是惩戒贪污，并不在乎没收财产的多少，再说了这些财产就算被人掩埋和挪移了，也是在我们大清国啊！何必要穷根究底，非要弄出那几个小钱不可。

然后，嘉庆让刑部给萨彬图议罪，嘉庆说：“以后谁也不许提和珅财产之事，你们吹毛求疵只会把朕抹黑成贪财之辈。这么做就是替和珅报复朕，你们忍心吗？”

嘉庆本打算把萨彬图革职，又觉得如果处罚过重，以后就没人敢上书发表意见了，最后赏给萨彬图一个七品小官，让他到地方上工作，眼不见心不烦。

根据民间的议论，和珅的家产大部分都进入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金库。

由此可见，嘉庆不光吃饱了，而且撑得肚皮都快破了。

风光盛世藏危机

经济上的丰收丝毫不能安慰政治上的困境。

嘉庆接受皇权的时候，大清江山已经走过了一半的路程，康乾盛世的高潮刚好过去。高潮之后自然就是落潮，所谓的乾隆盛世已经过去，留下的是危机四伏的帝国。

首先是吏治松弛、贪腐成风，各级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聚敛人民财富，给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河工治理也是嘉庆关心的头等大事，但是许多官员却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将治理河患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里。嘉庆不是白痴，当然知道这里面的猫腻，他就南河工程发表讲话：“南河工程近年来拨款不下千万，河患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耗钱如此之多，一遇到河患，工程马上坍塌，明显有不法官员从中作假。”

对这种腐败行为，嘉庆有切肤之痛，他写诗骂道：“内外诸臣皆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尽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平居漫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

改革吏治、整顿风气是嘉庆面前的第一道难题，颓风已经刮了这么多年，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现状。

嘉庆认为，要改变朝野上下的颓风，必须从自己做起。嘉庆带头崇尚节俭，奖励清廉。嘉庆第一道命令就是从今以后禁止呈献宝物，

这个命令似小不小，清朝有献宝的风气，各省督抚进京之前都会准备好宝物，每逢庆典佳节，宝物更是琳琅满目、多不胜数，结果形成官场歪风，导致吏治腐败，地方官拼命搜刮。

嘉庆并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而是身体力行。和珅自尽第二天，叶尔羌回部采到了一个重达上百斤的玉石，正在运往京城的途中，嘉庆下了一道旨令，不论玉石运到何处，即刻抛弃，不必运到京师，劳民伤财。

当年七月，嘉庆又下了一道“中秋节令”，说民间中秋不过是以瓜饼果肉为主，内廷也不要过于奢侈，以后中秋节贡要永远停止。

如果说官场腐败是乾隆留给嘉庆一个治不好的痼疾的话，那么军队战斗力低下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早在嘉庆当皇太子时，就跟随乾隆到校场阅兵，当时的情景让嘉庆记忆犹新，许多官兵刚骑上马就从马上掉下来，射箭的时候箭箭虚发。一场国家级阅兵差点变成了小丑闹剧。在嘉庆看来，八旗子弟丧失了满人尚武的传统，这是最危险的一件事。跟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八旗铁骑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由于武备松弛军事懈怠，白莲教起义之时，八旗兵不堪一击，各级政府不得不征召相对彪悍的乡勇和团练。

到嘉庆即位时，国库空虚，首先是乾隆挥霍了大量的钱财，六下江南、大修土木、连年战争，这些行为貌似很盛世，但加剧了社会矛盾。到嘉庆时，人民起义更加频繁，是以嘉庆亲政后国库空虚，如果不是从和珅那里找到一笔钱，嘉庆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把大清这个公司经营下去。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正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工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资本主义发展迫切需要开发海外市场，一再要求和中国通商，可惜闭关自守的清政府拒绝西方国家的要求，从而让中国继续在封建社会里沉沦，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我们也没法享受。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万古不变的铁律。乾隆给嘉庆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嘉庆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烂的摊子。嘉庆无力改变清王朝衰亡的局面，所以很多人觉得作为一个皇帝他很平庸，有人也觉得他很可悲，那么努力那么辛苦，结果还是没有遏止国家的下坡路。

朝鲜使臣来朝觐见后，回国说嘉庆纪律很严，做事不拖沓，很勤政。嘉庆经常工作到很晚，还经常叮嘱大臣们，内外衙门一有陈奏之事，应最快送到朕的案桌前，不能耽搁。嘉庆四年（1799年）六月的

一天，天气非常炎热，管理宗人府的睿亲王淳颖不想嘉庆过于劳累，私自将宗人府的奏折扣下来。嘉庆知道后非常生气，还让宗人府给淳颖议罪，并警告大臣，如果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一定从严治罪。

嘉庆深知官员上书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关键，如果大臣们都不敢上书，必然会导致言路堵塞，吏治不畅。所以，嘉庆颁发求言诏，表明自己欢迎官员们发表言论。为了让官员们去掉心理包袱，嘉庆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为乾隆时期因为直言而获罪的官员平反，甚至对蒙冤者公开赞扬，加官进爵。

在乾隆时期，有一个叫曹锡宝的官员曾经上书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仗势欺人，没想到曹锡宝反而落了个诬陷栽赃的罪名，受到处罚。嘉庆亲自为曹锡宝平反，说当时举朝噤声，曹锡宝却能够坚持自己的臣道，不畏强权，直言进谏，是一个铁骨铮铮的诤臣。像这样的臣子不仅不应该处罚，而且应该重赏。

嘉庆的诚意最终打动了朝廷群臣，许多大臣纷纷站出来解囊献策，指出朝廷内外种种弊政。嘉庆所做的一切是因为他知道身上的责任沉重，这说明他早已看到了乾隆盛世所暗藏的危机，所以他当上皇帝之后，很多事情都以身作则，以达到上行下效的目的。为了缓解经济问题，他主张勤劳节俭，表示终止父亲南巡的传统。

即使是乾隆，晚年也对六下江南表示后悔，曾说过：“当皇帝六十年，没有犯什么大错，只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好心办了坏事。”

我们很难说白莲教起义跟乾隆的奢靡之风有多大的联系，但乾隆治下，吏治腐败、贪官横行却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说，白莲教起义和乾隆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嘉庆用了九年的时间平定白莲教，花去了两亿两白银，这些钱相当于清廷四年的财政收入。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嘉庆大搞捐纳，捐纳可以缓解经济窘迫，但是也会加剧官场颓风。根据雍正的说法，那些通过捐钱当上官的人不仅不知感恩，发愤报效国家，反而志趣低劣，拼命敛财收回之前捐出去的钱。

他们要敛财，就必须搜刮人民；搜刮人民，难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之前，他们捐钱为国家平乱，结果他们自己扰乱社会，这简直是一个恶性循环。捐官制度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乾隆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弊端，所以他下令子孙后代永远取消这个制度，虽然乾隆曾因为一些特定的需要也实行过捐官制度。

根据清宫档案的记载，嘉庆朝的捐纳情况是最严重的。嘉庆时，国家问题特别多，财政明显不足。为了缓解经费问题，嘉庆不得不实行捐官制度，将这些钱用在剿匪、治河、军需等方面，甚至有时候连

皇家的一些用钱也靠捐纳解决，可以想见当时财政窘迫到何种地步。

许多有钱的商人纷纷出钱为国效力，其中也有像潘致祥这样的洋商，他和盐商温永裕在嘉庆四年（1799年）各捐二十万两银子犒赏有功的官兵。嘉庆五年（1800年），温永裕和吴叙慈等人再次捐钱五十万两平定川陕一带白莲教。嘉庆十九年（1814年），洋商公会联合捐钱二十四万两，盐商公会联合捐钱十六万两，用于军费开支。嘉庆十年（1805年）时，黄河、淮河发生大水，徽商鲍漱芳捐米六万石、麦四万石救济灾民。后来，鲍漱芳还带头募捐了三百万两银子开山归海，修理河堤。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对于捐纳，嘉庆是非常欢迎的。这并不是因为嘉庆不知道捐纳的坏处，只是当时国家问题太多，而且多是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嘉庆对富国强民的渴望。他急切地想把国家治理好，有些饥不择食的味道。

当然，嘉庆的努力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至少出现了一些表面上的转机，但是清朝已经积重难返，嘉庆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的危机。这些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吏治腐败，第二是制度落后于时代，第三是西方的崛起。

第三章 白莲教风云

就在大家感觉天晦地暗的时候，白莲教教徒来到了人们中间，好比耶稣来到生活在罗马暴政之下的人群中。他们向百姓宣扬：“信仰白莲教吧，从此你们就可以获救，没有生命危险，不用一分钱就可以走遍天下。加入我们吧，只要我们有一口吃的，你们也会有。”

官逼民反——历史再循环

我们再回到禅位大典吧，体会一下那普天同庆的一幕，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灾难会来得这么快。如果是天灾尚可以理解，可惜偏偏是人祸。

禅位大典之后，性喜奢华的乾隆举办了盛大的千叟宴，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川楚一带的人民却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这是非常讽刺的，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乾隆没有料到在他的统治下，还有许多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当乾隆在千叟宴上满怀盛世豪情之时，警报已经传到了京城。

在清廷档案中记载了对白莲教起义原因的调查，直接原因是教首宋之清被清廷抓捕处决。宋之清在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安徽一带传教，秘密策划反清活动。事情败露后，地方官开展地毯式搜捕，逮捕了以宋之清为首的六十七名教徒首领。宋之清被凌迟枭首，其余人全被斩首。

这次起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直接打出了“官逼民反”的旗号，其他起义大多也是官逼民反，但像白莲教起义这样直接将官逼民反堂而皇之地打出来还是很少见的。

在乾隆中后期，皇室贵胄和地方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大量农民丧失土地，无以为业。许多人拖家带口逃到深山老林里，过着半原始的生活。乾隆末年，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等省发生了天灾，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当时逃到山林里的百姓最多达到百万人，这样庞大的一群失去生计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况。

就在大家感觉天晦地暗的时候，白莲教教徒来到了人们中间，好比耶稣来到生活在罗马暴政之下的人群中。他们向百姓宣扬：“信仰

白莲教吧，从此你们就可以获救，没有生命危险，不用一分钱就可以走遍天下。加入我们吧，只要我们有一口吃的，你们也会有。”

对于受难的劳苦大众，这些话如同福音。救世主来了，不跟着他又跟着谁呢？就这样，白莲教的队伍迅速膨胀。

星星之火，很快燎原，当白莲教在全国蔓延开来时，清廷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剿抚。

在剿抚中，最为给力的是四川南充县一个著名的清官，此人名叫刘清。由于刘清官声很好，在四川一带颇有名望，所以很多起义军都被他“安抚”了。对于招抚的义军兵民，刘清也非常爱护，这无疑对义军构成了一种可怕的威胁。义军宁愿官兵残忍一点，这样也好全力反抗，可是一旦刘清这样的人出现了，你去打他又显得自己不义，是刁民所为。像刘清这样的人，对义军来说是一股令人纠结的反对力量。

当时四川的起义军用颜色作为军号，有点儿类似于八旗。白号的首领王三槐骁勇善战，然而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过于相信刘清。刘清把他骗到清军大营后，居然将他逮捕，解送到京城，随后被处决。

到了京城后，嘉庆亲自审问王三槐。王三槐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是要造反，是那些当官的逼我们造反。”

嘉庆虽然生气，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几分道理，问道：“难不成四川就没有一个好官吗？”

王三槐答道：“只有刘青天一人而已。”别人把他卖了，他还记着别人的好。

刘清虽然出卖了义军首领，这个首领却为他做了一次临终宣传。从此，刘清名扬天下，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清官。

清官不好当，虽然刘清功劳很大，但是清廷却把功劳都给了将领勒保等人，只字不提刘清。这个很好理解，刘清在“贼众”中名声很好，在清廷看来，如果重赏刘清，等于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刘清属于典型的吃力不讨好的官员，分好处的时候拿不到，碰到了要作战或是安抚，总是让他亲往第一线。事后，刘清仍然经常亲自到白莲教大营安抚，大家因为王三槐的事都不再敢轻易相信他，不过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清官，所以不忍心杀了他。

刘清先后招抚的人超过了两万，大家并没有因为他骗取了王三槐的信任而怨恨他。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当时百姓深受贪官污吏之害，难得出现一个清官，大家都知道珍惜，哪怕这个清官出于某些原

因伤害了大家的感情。

嘉庆后来发了一道上谕，承认白莲教起义是“官逼民反”，对起义的大众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是他把责任全都推到和珅身上，认为官僚集团这么腐败是和珅一手造成的。

嘉庆认识到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代理人——也就是官僚集团跟人民的关系。尽管意识到这个问题，嘉庆却没能解决，有人说嘉庆性格优柔，手段平庸，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对嘉庆求全责备，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很少有人能解决。

这里顺便说说刘清的结局，刘清的结局不怎么好，但也不怎么坏。白莲教平定之后，嘉庆亲自召见刘清，高度赞扬他是一个大清官，是巴蜀人民的幸运。嘉庆还准备提拔刘清为四川布政使，相当于省内二把手，主管财务。然而，刘清却以才力不够拒绝了。

刘清真的才力不够吗？不是这样的，刘清很明白，如果自己担任布政使，一定会认真清理整顿财务，这样做必然会得罪很多人。如果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不符合自己做官做人的原则。权衡之下，还是不当这个官。所以，刘清改而请求嘉庆给自己一个武官的职位，于是嘉庆让他做了山东登州总兵。

女中豪杰王聪儿

在白莲教起义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王聪儿。

王聪儿是湖北襄阳人，出身贫苦，父亲是衙门里的一个勤杂工，工资微薄。后来，王聪儿的父亲因劳累而重病，由于无钱医治，很快就去世了。

从此以后，王聪儿就跟着母亲到处流浪，靠打短工和乞讨为生。童年时期的王聪儿就饱尝人间苦楚，后来母女俩实在活不下去了，母亲只好把她卖给一个马戏团，王聪儿聪明漂亮，吃尽苦头之后，终于成为一个“流浪艺人”。

在跟着马戏团流浪的日子里，王聪儿更是阅尽人间沧桑，看到社会角落里种种黑暗和肮脏，这跟乾隆看到的世界完全是两样。自高自大的乾隆只看到自己的文治武功，丝毫没有看到文治武功背后百姓悲惨的生活。

生活的艰辛、世道的腐败让王聪儿很早就有了一种反抗意识，她恨透了腐朽的清王朝，恨透了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

闯荡江湖的时候，王聪儿结识了白莲教众，并成为其中一分子。十六岁时，王聪儿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这个人是襄阳的一个差役小头头，名唤齐林。齐林是身在衙门心在白莲教，两人这一结合，不仅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也激荡出了事业的豪情。

让齐林非常吃惊的是，王聪儿组织能力非常强，白莲教很多人都很崇拜她，这个二十来岁的女人居然是谋划起义的首要人物。在起义之前，王聪儿已经是湖北白莲教的首领了。

齐林和王聪儿计划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元宵节起义，夺取襄阳县。没想到计划败露，齐林被清廷捕杀。失去丈夫后，王聪儿更加悲愤，但她没有消沉，而是化悲痛为力量，在众人的推举下，当上了起义军的领袖。王聪儿豪气干云，视封建礼教为粪土，当众剪去长发，横刀跃马，领导着教众走上轰轰烈烈的反清之路。

嘉庆元年（1796年）三月，王聪儿带领齐林的徒弟姚之富和齐林的哥哥齐国谟等人，在襄阳黄龙岗发动起义。

王聪儿是一个头发长、见识也长的女人，她努力把乌合之众改造成一支有纪律、有编制的军队。她将起义军分成五营，还设立各级文武官员，用“万利”作为年号，造反本就是“一本万利”的好事，本就是性命，利就是江山。王聪儿还提出了“兴汉灭满、未填承运”的口号，比孙中山先生的“驱除鞑虏”提前一百多年。

在襄樊，王聪儿与清军展开大战，结果清军溃不成军。胜利之后，王聪儿带着义军奔向荆楚重镇襄阳。义军将襄阳城团团围困起来，不过襄阳是个军事重镇，要想攻下来没那么容易。而且嘉庆紧急调遣各路兵马支援襄阳，在清军的围堵之下，王聪儿只好放弃攻取襄阳，带着义军战略性撤退，来到河南，在邓州、新野一带和其他义军会师。

王聪儿与清军的第二次大战发生在湖北安陆府钟祥县。战争贵在神速，当王聪儿带领军队抵达钟祥时，清军才反应过来，匆匆调遣陕西总兵杨秀前去堵截。杨秀兵力有限，在起义军大潮面前显得相当弱小。钟祥很快沦陷，被义军占领。

嘉庆手忙脚乱，痛骂王聪儿是众贼之首，让总兵永保整合湖北军队，对王聪儿实行围剿。

面对清军的围攻，王聪儿显得相当镇定。她没有选择被动挨打，反而根据地形主动出击，经常打得永保措手不及。她还采取声东击西

的策略，假装攻击清军的粮仓，吸引清军的兵力，从而让清军兵力分散，疲于应付。

永保被王聪儿整怕了，这个女人实在太厉害。永保想，与其等着被骚扰，不如选择一个特别的日子全力出击。永保选择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里发动突然袭击，准备速战速决，攻下起义军大本营。

可惜，他还是低估了王聪儿。王聪儿事先侦察到清军进攻的计划，做好了周密的部署，当清军到来之时，发现起义军早已准备好。狭路相逢勇者胜，两军激战到深夜，双方都死伤惨重。由于起义军拖家带口，王聪儿决定兵分两路撤退。清军穷追不舍，在陈家河一带，起义军调转马头，痛击清军，歼灭了大量的清军。

嘉庆非常气愤，将满腔怒火发泄到永保头上，下令将永保逮捕入狱，换上了惠龄。这一战胜利后，王聪儿感到一丝安慰，这些天来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却也让她深深体会到造反大业的艰难。

陈家河告捷不久，四川白莲教的首领徐添德和王三槐分别在达州和东乡发动起义。确认此事后，王聪儿决定带领军队进入四川会师。为了摆脱清军追击，王聪儿将起义军分成很多队，忽东忽西，让清军不明所以，被王聪儿牵着鼻子走。沿途，王聪儿劫富济贫，更多的人加入起义军。

没多久，王聪儿就在陕西汉阴与高均德会师，又在镇安与王廷诏、李全会师。清军被王聪儿的迂回战术彻底搞蒙了，疲惫不堪。嘉庆气得七窍生烟，痛骂惠龄无能。

在镇安会师后，王聪儿故意作出向北进攻的架势，结果清军立即中计，将兵力调到北边。王聪儿见此，立即带领主力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渡过汉水。当惠龄赶到汉水边时，只能对着江水发呆了。

嘉庆彻底对惠龄失望了，立即将他革职，换上陕甘总督宜绵。

王聪儿渡过汉水后，清军副都统阿尔萨朗慌忙派兵拦截，也许是因为太慌乱了，阿尔萨朗赶到后，和起义军激战，不幸中枪身亡，清军的前锋参领和副参领也都阵亡。这一战，起义军歼灭清军健锐营千余人。

此时，四川首领徐添德率领的起义军正被清军包围，处境艰难。王聪儿长枪一指，迅速奔向清军的后方，对清军发起了猛攻。面对猝然袭击，清军慌忙调转枪口。看到援军来了，徐添德的部队大为振奋，和王聪儿前后夹击，打得清军落花流水。

造反是件悲催的事

川楚白莲教会师将整个反清起义推向了高潮，但高潮往往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这往往意味着低潮的到来、败亡之路的开始。

这次会师在史书上又被称为“东乡之会”，十几万起义军第一次聚在一起，真有天南地北兄弟来相聚的感觉。表面上，会师之后，起义军的力量更加壮大了。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自古造反的人，自刘邦、项羽以来，就是貌合神离。大家本来都是平起平坐的，这个时候谁也不甘心推举一个最高领导人，然后大家都听这个领导人的命令。虽然这么做，无疑对造反大业有利，但人性的特点告诉我们，肯定是谁也不服谁。当王的感觉多好，谁也不想受别人制约。

结果，起义军首领们商议后，决定用不同的颜色作为起义军的旗号。襄阳王聪儿和姚之富率领的起义军用黄色作为旗号。

会师之后，起义军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各个首领斗得相当厉害，各自都想称王称霸，至少要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王三槐就是因为不堪起义军高层内斗，转而被清官刘清收买。

面对革命火势的蔓延，嘉庆采取了坚壁清野和训练团练的策略，给予了起义军沉重的打击。团练和乡勇往往比清廷正规军还能打，而坚壁清野的政策又让起义军缺少粮草来源，与群众隔绝。

当困境到来时，起义军并没有齐心合力，共渡难关，反而互相责备，有人甚至说：“我们四川的事情湖北人搅和个啥，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这种言论无疑是针对王聪儿的，王聪儿可以受得了这个气，湖北的起义军可受不了，离乡背井可不是为了找气受，既然在这里受气，不如回到老家继续革命事业！

王聪儿也觉得继续在四川待下去不是长久之计，起义军分裂是迟早的事情，干脆打回家乡，再闯出一片天，方显巾帼本色。

出来闯不容易，要回去更不容易。首先是回去的路上布满清兵，为了分散清兵，王聪儿还是采取了之前的迂回策略。到达归州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王聪儿和姚之富率领，进攻兴山，抵达宝康和南漳，再回到襄阳；一路由王廷诏率领，由东攻远安、当阳，最后两军会师。

其中，夔州是起义军回湖北的必经之路。王聪儿打算先占领白帝城，没想到清军已提前在夔州和白帝城布下重兵。清军自以为万无一失，但王聪儿率领义军突然袭击清军的营地，清军立即还击。这时，

埋伏好的四五千起义军冲出来，两军交火，一直斗到晚上，起义军暂时撤退。

到了半夜三更之时，起义军突然偷袭清军大营，直到清军援兵到来，起义军才撤退。

回到驻地之后，王聪儿决定改变打法，不分昼夜轮流对清军进行骚扰。两个昼夜之后，终于冲破关卡。随后，王聪儿率军往归州和巴东进发。嘉庆连忙让官兵在中途进行围截，清军统帅明亮匆匆赶到巴东，被王廷诏的部队迷惑，结果与王廷诏激战。

王聪儿正好率领两万主力军队前往兴山、保康、南漳。当明亮发现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后，已经没法追上王聪儿了。王聪儿本想经由宜城、钟祥前往襄樊，然而中途清军关卡重重，只好放弃这个计划，率领部队进入湖北西北山区地带。

很快，王聪儿就意识到湖北是待不下去的，决定进入陕西南部。前往陕西的路上，起义军在长坪与清军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击毙了清军护军统领惠伦。这次胜利给予处于低潮的起义军很大的鼓舞，然而这也是最后的胜利。

此时，正有几万清军和不计其数的乡勇从各个方向涌来。王聪儿的起义军退到湖北郧西三岔河后，已经无路可退。

三岔河地势非常险峻，到处是悬崖峭壁和苍天古树，固然适合防守，但更适合围住。王聪儿不会想到这里就是她二十二岁生命走向终点的地方。

王聪儿本打算且战且退，进入陕西，然后再回到四川。可惜，她的气数已尽，冲不出这凶险的地方。三岔河里布满清军，到处是炮声，在清军强大的火力面前，王聪儿没有恐惧，当她知道没有可能逃出此地后，从容选择自杀。她带着几十名女兵跳崖，姚之富也跟随她的脚步，场面悲壮慷慨，催人泪下。

造反真是一项悲催的事业。

德楞泰立即派人到山下寻找王聪儿和姚之富的尸体，割下他们的人头，送到京城邀功。王聪儿虽然失败了，但是给了清廷心脏沉重的一击。

杀了王聪儿，还有后来人

王聪儿牺牲以后，她英勇壮烈的形象反而激起了其他起义军更加

强烈的反抗。

襄阳起义军的余部在高均德和李全的率领下，和德楞泰、明亮在陕西展开了激战，起义军打着“为王聪儿报仇”的口号，英勇杀敌，多次击败清军。

嘉庆三年（1798年）六月，湖北蒲圻和崇阳的白莲教众听到王聪儿牺牲的消息，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要为王聪儿报仇。木工出身的王天万在蒲圻发动了八百人，接着又在崇阳召集了一千人，自称都督应劫大元帅，号召大家起义。

王聪儿虽然被清廷剿杀了，但是起义的火势反而更加旺盛。各地起义军在王聪儿牺牲后又坚持战斗了八年，直到嘉庆十年（1805年）五月十九日，起义军最后一个元帅王世贵倒下。

在这些起义中，有四次值得一提的大战役。

首先是大鹏寨战役，这次战役发生在嘉庆三年（1798年）九月，战斗开始后不久，罗其清和李全领导的起义军占领了四川营山县的军事重地大鹏寨。起义军得到了大量的粮食，接着又修起了坚固的堡垒。清军纠集了四路大军围攻大鹏寨，双方相持了三个多月。期间清军多次强攻都没有成功，无奈之下，清军又采用老办法，召集当地乡勇打头阵。

乡勇罗思举是本地人，熟悉地形，他带着清军从后面的悬崖爬上大鹏寨，采用夜间突袭加上火攻的办法，打败了起义军。这次战斗使起义军元气大伤，但他们并没有因此丧失锐气。

第二次大的战役是苍溪战役。这次战役是由起义军领袖冉天元指挥的，在起义军中，冉天元是一个善于打伏击的将领。嘉庆四年（1799年）八月，他带兵来到四川巴山，随后进入苍溪境内。

得知这个消息后，清军主帅额勒登保率兵赶过来，将起义军包围在苍溪的人头山上，清军由三路对起义军发起了进攻，企图全歼冉天元。冉天元并没有被清军的势头吓住，他从容指挥，坚守高地，巧设埋伏，持刀士兵在前面，弓箭手在后面，杀得清军死伤成片，这一战清军副将以下的将官损失了二十四名。随后，冉天元突围出来，到达巴州阴背场。额勒登保失败后，自知过失重大，主动向嘉庆“请罪”。

第三场战役是高院场战役。这场战役还是由冉天元指挥的，从苍溪离开后，他带着四千起义军准备经由川北到甘肃与其他起义军会师。冉天元的部队经过成都和重庆，进驻川西时，部队从四千发展到七八万人。看到白莲教众蔓延得如此迅速，连嘉庆都感到失望，他说贼众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光凭人力简直不可能捕杀干净。

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十九，冉天元的大部队到达西充县的高院场。清政府火速派川北总兵朱射斗前去扑灭，朱射斗到了以后，火炮狂轰，弓矢狂射。面对清军凶猛的火力，起义军并没有畏缩，反而内心更加愤懑。他们恨透了朱射斗这个清廷鹰犬，组成了一支敢死队，为了躲避敌人的炮火和箭雨，匍匐前进，一直爬到朱射斗的大营前，举起大刀砍杀了清军的这个“巴图鲁”，并歼灭了一千多名清兵。

起义军再次获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冉天元在起义军中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将领。

第四次战役是马蹄岗战役，这次战役的主要指挥者还是冉天元。高院场战役后，冉天元带着部队北上到达梓潼和江油一带，并任命部将张子聪向成都挺进，以迷惑清军。此计果然见效，三月的一个晚上，冉天元率领大部队从太和镇成功渡过潼河。嘉庆得知这个消息，非常气愤，下令四川总督魁伦自尽。

随后，冉天元来到马蹄岗，德楞泰率领清军企图再次包围义军，结果两军激战，清军又一次被打得落花流水。起义军反将清军包围，眼看清军就要被全歼，这时清军援军杨遇春和乡勇头目罗思举赶过来。战场形势很快扭转过来，起义军败走，冉天元因为战马受伤，落马被俘。

等待冉天元的是清廷残酷的刑讯，而其终究是一个汉子，始终不肯向清廷低头，最后被斩首。

马蹄岗战役是反清起义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起义军逐渐转为劣势，直至最后被清廷扑灭。

第四章 海上烽烟

蔡牵的势力庞大到什么地步呢？他已经取代了清廷水师维护海上秩序，海上商船但凡购买了蔡牵颁发的执照，就能平安无虞地到达目的地。这是官府之外另一种维护秩序的暴力，暴力集团的最终目的总是获利。

海患成灾

清廷对海上活动有很多限制，这是闭关锁国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为了一家的江山，而将全国人民都与世隔绝起来，这显然是一种非常自私，而且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

乾隆末年，海上洋盗势力猖獗，这些活动可能跟安南的新任统治者阮氏家族有关系。当时清廷高层将“海事”“苗事”和“教事”称为对帝国有威胁的三件大事。

这些海洋盗贼的背景复杂，但有一点清政府几乎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些活动背后有安南国王阮光平和阮光缵父子的支持。这些海盗跟今天的海盗没啥区别，他们对海上来往的商船进行打劫获利。海盗的活动严重地损害了清政府的利益，嘉庆刚即位不久，就着手打击海盗活动。

嘉庆任命福州将军魁伦、广东巡抚朱珪、浙江巡抚吉庆缉拿海盗。当时清廷的水师并不足以远洋出行，只能在近海进行搜捕，同时切断海盗岸上的补给。

不久，魁伦缉拿了一百三十名海盗，其中有五十人是无照出海捕鱼的渔民，嘉庆发现这事后，对魁伦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认为他将无照渔民和海盗混为一谈，分明是冒功。

元月过后，嘉庆谕示军机大臣：海盗长期生活在船上，油盐柴米从哪儿来的？一定是靠沿海的渔民接济，这些渔民卖给海盗食物虽然是为了谋生，但势必助长海盗的气焰，所以一定要对渔民严加盘问。

魁伦后来抓住了一个海上贩子蓝三世，最后虽然查明他并没有向海盗贩卖物品，但为了杀一儆百，魁伦还是把蓝三世处以绞刑。嘉庆获知此事，不但没有责备魁伦，反而夸奖他办事有方法。

由于当时国家危机四伏，嘉庆叮嘱魁伦对海盗采用剿抚并用的手段。盗贼首领纪培投诚之后，嘉庆决定“以盗制盗”，利用纪培缉拿海盗。海盗熟悉海盗，嘉庆用海盗来制服海盗，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成本最低的一种选择，国家内忧太重，分不出太多的力量对付海盗。尽管如此，在治理海患方面嘉庆还是严格要求的。

嘉庆的老师、两广总督朱珪曾经抓获了一个海盗头目何玉理，发现此人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就在海上打劫。这本来是应该奖励的，但是嘉庆却降旨责备朱珪，说这个海盗猖獗这么长时间直到现在才抓住，充分说明各级官员办事不力，要求刑部对朱珪严加议处。

朱珪是嘉庆非常尊敬的一个老师，嘉庆应当不至于吃饱了没事去为难自己的老师。当然，很有可能是和珅在乾隆面前说了什么，嘉庆不得不做出一种姿态。由此也足以说明嘉庆对海盗一事的重视。

当时的海盗不仅打劫中国的商船，远洋来华的外国商船也未能幸免。

嘉庆元年（1796年）九月，两广总督吉庆发现了一个英国商人，根据这个英国商人的说法，他乘坐的商船在两个月前被劫持，船中共有十人，其中六人被害，三人被劫走，他侥幸抱着木板漂流逃走。类似的事件经常在中国近海附近发生，以至于英国政府几次提出派遣军队协助清政府征剿海盗。嘉庆当然不能接受这个建议，清政府的主权意识是相当强的，决不允许外国舰船开进中国海域。

不过，英国提出这个问题，足以说明当时海盗情况之严重。海盗的活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海上贸易。

对于安南阮氏幕后支持海盗的行为，嘉庆当然是非常反感的，不过嘉庆不便公开谴责安南，甚至让下面的人不要张扬。这是从大局来考虑，国内局势很不稳定，不宜跟安南结仇。

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两广总督吉庆又上奏发现安南的海盗，请示要不要照会安南国王。虽然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但谨小慎微的嘉庆还是主张不声张，他认为不能轻易挑起国家之间的矛盾。

嘉庆五年（1800年）六月，发生了一件特别的好事，这件好事用瞎猫碰死耗子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安南有三十艘海盗船，纠合中国水澳帮、凤尾帮海盗船六七十只，在浙江沿海汇集，准备进逼台州。恰好当时海上雷电交加，风雨大作，海盗船只覆没殆尽。一些抱着浮木，或者泅水上岸的海盗都被定海镇总兵李长庚俘虏。在这些俘虏中，有安南的四个总兵，这足以证明安南政府跟此事脱离不了关系。

这四个总兵被处以极刑，嘉庆把他们的官印归还安南国王——这

一招非常厉害，看你脸往哪儿搁，看你如何解释这事。当时安南内战一触即发，安南新旧势力争权夺利呈白热化。新阮代表阮光缵为了讨好清廷，抓住六十多名海盗送往广东，这些海盗可能都是旧阮操控的，阮光缵做出这种姿态，丝毫不能改变他是海盗幕后头头的事实。

但阮光缵讨好清廷的自作聪明的做法，引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许多海盗因此不再相信他，纷纷投降清政府，表示愿意配合清廷消灭海盗。

嘉庆七年（1802年）八月，阮福映打败了阮光缵，为了得到清廷的支持和册正，阮福映抓住海盗首领莫观扶等三人，送到广东正法。经过审讯得知，莫观扶等人本系内地盗犯，后来投靠了阮光缵，阮光缵封他们为总兵，让他们从事海上盗窃。

阮光缵政权覆灭后，海盗问题终于告一段落。新任的阮福映政权在嘉庆的软硬兼施之下，不敢再肆意妄为。

两个海上黑社会老大

嘉庆八年（1803年）以后，海盗行业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时期海上主要首领是蔡牵和朱□。

蔡牵和朱□都是海盗行业的元老级人物，在此之前，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海盗，海上打劫，勒索绑票，无所不为。

蔡牵的势力庞大到什么地步呢？他已经取代了清廷水师维护海上秩序，海上商船但凡购买了蔡牵颁发的执照，就能平安无虞地到达目的地。这是官府之外另一种维护秩序的暴力，暴力集团的最终目的总是获利。

蔡牵出洋的历史非常早，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就在海上活动。嘉庆也很早注意到此人，在嘉庆三年（1798年）八月，他在上谕中点了蔡牵的名，把蔡牵当成江洋大盗中头号通缉人物。蔡牵和朱□都是当时海盗集团的头目。蔡牵有百来艘舰艇，朱□也有几十艘，舰艇中配备有新式西洋大炮，这些装备比当时清廷的水师还先进。

蔡牵和朱□通过垄断海上秩序大发洋财，成为巨富后，他们有了新的目标——将巨资投入到反清活动中。这个转变对嘉庆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以前他认为这些人不过是求财，现在才发现这些人根本目的还是推翻清王朝，这些海盗的犯罪活动也由“盗”变成“逆”。

蔡牵和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跟内地反清会党联合，并在台湾和

沿海一带攻城略地。嘉庆对此非常担心，让吉庆等人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切断海盗与内地反清会党的联系。

嘉庆七年（1802年）五月，蔡牵率领部队袭击了厦门附近的大担山和二担山炮楼，捣毁炮楼，抢走大炮。这是蔡牵第一次向清军主动出击，这次出击的目的不是攻城略地，仅仅是抢夺大炮，但也暴露出了清廷海防的废弛。事情发生后，照例是上面对下面一通责备，要求下面要加强训练、搜捕盗贼，等等。

嘉庆八年（1803年）正月，蔡牵又进攻香普陀山。水师提督李长庚匆匆赶来御敌，蔡牵兵力不足，败走而去。李长庚一路追到福建省三沙洋面，将蔡牵围住。蔡牵眼看就要全军覆没，突然灵机一动，利用闽浙总督玉德贪功的弱点，向玉德诈降，请求玉德不要让浙江水师把自己赶尽杀绝。玉德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让浙江水师回港。

然而，当玉德派人前去招降蔡牵时，蔡牵早已逃之夭夭。玉德被耍后，后悔莫及。

蔡牵死里逃生，不敢再心存侥幸，立即耗费巨资打造更先进、更高大、火力更猛的战舰，他打造的巨艇甚至比清廷最大的舰艇还大。总之，这一阶段，蔡牵以加强自己的海上力量为主要任务。

遭受巨大挫折后，蔡牵也意识到盟友的重要性，这次失败也促成了蔡牵和朱□的结盟。蔡、朱联合后的第二年六月，首次袭击了清军。其时，温州总兵胡振声率领二十四艘运输船，装载木料送往福建造船。蔡牵和朱□袭击胡振声后，玉德让胡振声全力迎敌，打贼众一个落花流水。可惜，福建水师却不支援，不知是不是被蔡牵收买了。

胡振声孤军作战，在蔡牵刚猛的火力之下，船只全部被击沉，八十一名清军包括胡振声本人全部光荣牺牲。

胜利之后，蔡牵和朱□又领着水军进攻浙江水师。李长庚带领水师主动迎敌，对面是蔡、朱庞大的舰队，一百一十艘舰艇一字排开，整装待发。面对黑洞洞的炮口，李长庚并没有畏惧，亲自指挥作战。李长庚的战术是将敌舰一分为二，自己带队亲自攻击蔡牵的部队，部将则围攻朱□的舰队。

最后，李长庚终于击败了蔡牵和朱□。这两人败退后，产生了矛盾，蔡牵责怪朱□指挥不力，朱□很不服气，带着自己的队伍离开，蔡、朱首次同盟宣告破裂。

李长庚不愧是清廷水师一个出色的将领，嘉庆九年（1804年）冬，李长庚又在甲子洋击败了朱□；嘉庆十年（1805年）夏，在青龙港大败蔡牵。

经过这些打击，蔡牵并没有一蹶不振。嘉庆十年（1805年）十一月，他倾巢出动，在台湾登陆，发动了起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也就是在这次进攻中，蔡牵打出了“镇海王”的旗号，换句话说，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打家劫舍的盗贼，想当王了。在台湾登陆后，蔡牵立即联络天地会等一些反清的会党，由此形成里应外合的局面，清军防不胜防。

攻克洲仔尾后，蔡牵全歼陈廷梅的部队。随后又攻入凤山，击毙清军千总苏明荣。此时，蔡牵可以说与清廷彻底决裂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绝对没有第三种选择。敢造反的人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不怕死，其次要有相当的领导能力，还要有非凡的胆识和谋略，否则的话，造反就是活腻了。

蔡牵多少有些胆识，考虑到现在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是清军从内陆调来的援兵，所以他命人火速砸沉港口附近的清军大船。一切安排妥当后，蔡牵带着万余人围攻台湾府外围屏障安平镇和嘉义城，这两城的清军选择死守，等待大陆方面的援兵。嘉庆接到台湾方面的急报后，立即调集重兵支援台湾。李长庚率先出动，抵达鹿耳门后，被沉船阻住，未能登陆。李长庚只好绕道登陆，蔡牵退守到洲仔尾。接着，许松年和王德禄在洲仔尾击败蔡牵，此时蔡牵陷入了困境，由于被沉船所阻，他的战舰不能出去，被困在出海口。

到了这个地步，嘉庆也不得不给李长庚施压了。嘉庆给李长庚发了一道谕旨：如果将军能一战抓捕蔡牵，公、侯、伯都不在话下，但如果让蔡牵逃走，恐怕革职审问未必打得住。这等于是逼迫李长庚下军令状，提不到蔡牵的头就提自己的头。嘉庆当然不会真的要李长庚的人头，这是领导的一个手段而已。

蔡牵这次论理是死定了，然而老天暂时还不想让他死。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海口处突然涨潮，刮起了大风，沉船被风浪掀起刮走，蔡牵感慨老天有眼，居然飘然而去。官兵们当然是紧追不舍，可惜哪里找得到蔡牵的影子。

蔡牵攻台的计划虽然失败，但是捡回了一条性命，也没有损失主力部队，真是幸运至极。

嘉庆气得直跺脚，将李长庚等人革职。台湾稳定后，闽浙总督玉德被押到京城议罪，他是这次事件所有官员中处罚最重的。事实上，嘉庆早就看玉德不顺眼了，玉德上次被忽悠，致使蔡牵逃走，他尸位素餐，将海防和水师治理得一塌糊涂。

老大之死

现在我们该说说朱□的下落了，朱□自从和蔡牵决裂后，有传言说他的坐船被击沉溺亡。事后，人们在广东发现了朱□的下落。朱□也是走投无路，一度想在潮州澄海县接受招抚。

当时新任的两广总督那彦成主张对海贼进行招抚，不过广东巡抚孙玉庭强烈反对，所以，朱□想接受招安也不可能。

那彦成是乾隆名臣阿桂的孙子，嘉庆还是比较看重这个名臣之孙的，那彦成年轻时就担任军机大臣，随后又担任工部尚书、都统、内务府大臣等职。可惜，在做官方面，他比不上祖父阿桂，他很难容人。就任两广总督后，他就因为招抚的事情和孙玉庭闹翻了。最终，孙玉庭占上风，嘉庆将那彦成解职。

清廷的政策之所以发生转移，是因为势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国内的动乱已基本平定，此时没有必要对海贼进行招抚了，招抚要花费很多钱财，征剿的话相对还要划算一些。

征剿海贼这事还是李长庚最擅长，虽然之前有人弹劾李长庚，但嘉庆不但没有听信谗言，反而把弹劾之人治罪，李长庚因此更加卖力效命。

嘉庆十二年（1807年）春，李长庚在大星屿击败蔡牵。十一月，又在浮鹰山再败蔡牵。最后，将蔡牵逼出近海，此时蔡牵的家当只剩下三艘大船、十艘小船，而李长庚的力量是蔡牵的几十倍。一向沉稳善战的李长庚产生了轻敌情绪，由此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李长庚以为稳操胜券，亲自带兵打头阵，冲在最前面，没想到蔡牵一个炮弹发过来，击中了李长庚的船只，李长庚被弹片击中咽喉，流血不止，第二天殒命。

李长庚虽然当场倒下，但清军在势力上仍然占据优势，然而主帅重伤濒死，副将张见陞吓怕了，居然下令撤军。蔡牵这人真是命大，又侥幸逃过一劫。随后，蔡牵逃到安南港口休整。李长庚不久就咽气了，相信弥留之际他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时怎么就那么轻敌呢？

得知李长庚牺牲，嘉庆泪流满面地说：“朕和李长庚素未相识，因为他为国效力，朕屡次嘉奖。没想到他在大功即将告成之前就为国捐躯了，李长庚虽然牺牲了，但贼众经过他多年征剿，已是强弩之末。”嘉庆追封李长庚为三等壮烈伯，赐号“忠毅”，并在李长庚的家乡为他立祠。

然而，张见陞临阵脱逃这一节却没有受到追究，闽浙总督阿林保一向和李长庚关系不好，蓄意庇护张见陞，瞒过嘉庆。

李长庚虽然为国捐躯，但是蔡牵不能不除。随后，嘉庆任命李长庚的部将王得禄为浙江水师提督，专门负责搜捕蔡牵；钱梦虎为广东水师提督，专门收拾朱□。

嘉庆十三年（1808年）五月，蔡牵在安南待烦了，又乘风破浪回到福建。不过今非昔比，蔡牵旧部下王铎、王准、郭秋等人多已经投案自首，他的两个义子也被清兵捕杀，蔡牵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寻思着再和朱□联手。

于是，蔡牵辗转来到浙江海域，和朱□在舟山海域再度联合，可惜两人的势力都大不如前，联合不久就被浙江水师击败。失败之后，蔡、朱二人再次分裂，分裂之后，朱□再次坐船出走，在回广东的路上，金门总兵许松年追着朱□不放，终于将他击毙在海中。

朱□虽死，他的势力却依旧存在，由弟弟朱渥接管。

朱□死后，蔡牵的日子更加难过了，势单力孤不说，物资也越来越匮乏。清军采取了封锁策略，断绝了岸上的物资供应，与此同时，还经常派出船队搜捕他，蔡牵不得不经常更换坐船。

嘉庆为了解决闽浙水师的派系斗争，提升王得禄为福建水师提督、邱良功为浙江提督，陕西巡抚方维担任闽浙总督，而阿林保则调离福建。

闽浙水师的派系斗争解决后对蔡牵是一场灾难，他以前还可以利用清军的派系之争找到缝隙生存，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了。

不久，王得禄和邱良功就将蔡牵包围在定海渔山，激战了两天一夜，蔡牵弹尽粮绝，却始终无法突围。弹药用光了，蔡牵居然用银子当炮弹，而且还打断了邱良功的肋骨。银子的威力毕竟比不上炮弹，换作炮弹，邱良功可能已经步李长庚的后尘了。王得禄也受伤了，还好都是轻伤。

蔡牵真是一个顽敌，王得禄和邱良功都明白，此人今日不除，以后不知猴年马月能够再有这样的好机会。

当银子告罄以后，蔡牵真的是无路可退了。他知道自己这些年来运气一直不错，现在他明白，这些好运害苦了他，他曾经错误地把这些好运理解成天子之命。今天，好运气用完，他自知难逃一死，便用大炮砸沉了自己的船，选择自尽的方式来维护一个造反者最后的尊严。

这事办得让嘉庆很满意，加封王得禄为二等子爵，邱良功为三等男爵。当时，很多人为邱良功打抱不平，说你们功劳一般大，凭什么王得禄的封赏比你高。邱良功倒是一个心胸豁达的人，他笑道：“以前海患不平，全因为派系斗争，现在海患平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又何必计较这些次要的东西。”

邱良功是个识大体的人，国家的利益远远比个人的一点利益重要，如果当官的都像邱良功这样，像蔡牵这样的人也就没有机会兴风作浪了。

蔡牵死后，“海贼”们知道他们横行海上的日子已经是过去时了，朱渥看清了形势，带着所有的船只人马向清军投降。朱渥给清军送上了一份丰厚的礼物，舰船四十二只，大炮八百多门。嘉庆既然庙号仁宗，自然不至于杀掉投降的人，将朱渥遣散回籍。

第五章 天理教徒闯京城

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行刺皇帝是自寻死路，陈德清醒的时候也知道。只不过他的处境实在太艰难，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几度想过要自杀，但又不甘心默默无闻地死去。最后，他想“通”了，反正都是死，不如死得轰轰烈烈一点，不能名垂青史也要遗臭万年。

神秘的刺客

皇帝被人行刺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如果在禁宫内被人行刺就非常荒谬了，这种千载不遇的事情偏偏被嘉庆碰上了。

行刺嘉庆的人叫陈德，他选择的时间是嘉庆八年（1803年）二月二十日，当时嘉庆正谒陵返京，准备进宫斋戒。陈德带着自己十五岁的儿子陈禄儿，提前进入东华门，绕到神武门，埋伏在西厢房南山墙后面。

这一切，嘉庆完全没有想到，他就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胆子这么大，敢在禁宫里行刺自己。当嘉庆乘坐轿子经过神武门，即将进入顺贞门的时候，陈德手持匕首跳了出来。然而，陈德动作慢了些，嘉庆已经进入了顺贞门，当他听到背后一片嘈杂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嘉庆派人去询问后，才知道发生了大事，心里大惊。

当时，神武门和顺贞门之间有一百多个侍卫，陈德跳出来后，他们个个目瞪口呆，反应迟钝，竟然无人上前去捉拿他。只有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等人还算镇定，上前和陈德搏斗，绵恩的衣服被刺破，巴丹多尔济被刺伤。陈德虽然身手不错，但双拳难敌四手，最终还是被拿下了。

嘉庆觉得这个刺客胆子这么大，一定来头不小，下令军机大臣和刑部联合会审，一定要揪出幕后主使者。然而，陈德却一口咬定，这是他个人的行为，背后并无任何指使者。对于这个供词，嘉庆当然很不满意，又让大学士和六部尚书共同会审。陈德却依旧不改口供，嘉庆又让九卿和科道一起会审，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由此看来，陈德如果不是硬汉，后台就一定相当硬。嘉庆动用了

国家重要机关，各种各样的酷刑都使了出来，可陈德仍然不改供词。

事情到了这地步，嘉庆知道再审下去也不会有结果，而且继续审下去会闹得人心惶惶，大臣们互相猜忌。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嘉庆决定就此打住。

宫中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嘉庆照例要自责一番：“这件事充分说明了风化越来越差，这是朕深感惭愧的，如果不是朕失德，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从此以后，朕应该更加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做一个勤政爱民、随时自省的好皇帝。”

事后，嘉庆想起这事，除了对陈德所作所为感到震惊外，也对在场侍卫的麻木感到愤怒。在场一百多人，只有几个御前侍卫拼命护主，其他人的反应太让人失望了。嘉庆深深地感觉到官场中懈怠风气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嘉庆含泪指责：“除了御前侍卫绵恩等人，在场的一百多人难道都不是朕的臣民，遇上行刺皇帝的事尚且漠不关心，还能指望他们尽心为国效力吗？”

为了改变这种懈怠的风气，嘉庆厚赏绵恩等人，并革去阿哈保和苏冲阿护军统领副都统头衔，其他表现很差的人也处以相应的惩罚。

此事之后，嘉庆虽然作出了一些调整和改革，但这件事已经充分暴露出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病入骨髓。嘉庆的改革并不能起到刮骨疗伤的效果，最多只是减缓一下病痛。

我们再来说说陈德的下场，不管陈德有没有供出幕后主谋，他都难逃一死。最后总得给陈德这种行为一个合理的解释，官方的解释是：“陈德这个人不过是一个失业的流浪汉，精神出了点问题，遂产生了叛逆的念头。”

根据现在的法律，精神有问题的人即使犯法也是不能治罪的，只能关进精神病院。可惜陈德并不是生活在现代，最后被判处了极刑——凌迟。嘉庆处死陈德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如果连陈德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也处死的话，未免太残忍了，有负仁宗的庙号。

陈德的案子虽然定了下来，但是对于幕后主谋的猜测一直没有停息。有人认为是嘉庆的兄弟们幕后策划的，有人认为是大臣安排的，还有人认为是天理教策划的一次试探行动。

普遍的看法是陈德是天理教秘密安排的一个刺客，不仅很多野史是这样记载，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也采纳了这个说法。

不过，这个看法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陈德从未跟天理教的那些头领联络过，后来天理教头领林清被抓，也说从不认识陈德这个

人。

那么，陈德究竟为何要行刺嘉庆呢？

这还得从陈德的个人经历说起，陈德全家以前是旗人的奴仆，主人去世后，陈德跟着父母以打短工为生。三十岁左右，父母去世，陈德就失业了，无以谋生，后来携家带口来到北京投靠外甥姜六格，姜六格是内务府正白旗的护军。后来，陈德又到内务府做杂役，因而熟悉宫中的路线。

嘉庆六年（1801年），陈德的老婆去世，上有八十岁的岳母，下有两个处于发育期的儿子，想到以后生活会越来越艰难，陈德烦透了，经常借酒浇愁，一边喝酒一边苦笑，俨然一个疯子。到后来，他又被东家解雇，彻底失去了生计。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德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到最后，甚至产生了幻觉，还经常到寺庙里求签，根据陈德的说法，这些签说的都是好话，给他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他连吃饭都成问题，竟然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自己可能有当皇帝的命，在陈德看来，只要把皇帝杀了，自己就可以当皇帝了。譬如，陈德说有一天他梦见自己被朋友领到一个府邸里，便问朋友这是什么地方，朋友说这是东宫。还有一次，陈德梦见自己在一座无水桥下躺着，忽然被人拉到桥上，桥变成了知府大堂，陈德低头一看，发现自己全身穿着蟒袍。陈德找人解梦，都说是大富大贵的梦，陈德心想都说好梦成真，如果自己不努力的话，好梦不就白做了吗？

不过，稍为理智的人都知道行刺皇帝是自寻死路，陈德清醒的时候也知道。只不过他的处境实在太艰难，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几度想过要自杀，但又不甘心默默无闻地死去。最后，他想“通”了，反正都是死，不如死得轰轰烈烈一点，不能名垂青史也要遗臭万年。

就这样，他决定行刺嘉庆。陈德的心理，说白了就是一辈子活得太窝囊了，想拉风一回，哪怕豁出性命也在所不惜。

陈德并不怕死，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做居然连累了两个儿子。陈德行刺尽管是个偶然的事件，但也充分说明清王朝的统治已危机四伏。

违背天理的天理教

嘉庆是一个非常悲剧的皇帝，他努力想做一个好皇帝，但是不幸的事却偏偏全让他摊上。“苗事”“教事”和“海事”平定之后，嘉庆原本以为可以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了，可惜老天偏不让他安生。

这次搅得嘉庆不得安宁的是天理教，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原名是荣华会和龙华会。教义和白莲教大同小异，创造出类似于佛教西方极乐世界的“真空家乡”，在那里没有苦难，人可以得到解脱。这给当时许多处于水深火热的人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只要能给人们想要的东西，哪怕是虚幻的，也可以流传得很广，深受百姓欢迎。

天理教根据八卦分成八支，相当于天地会的堂主，当时林清就是这样一个身份，担任一个卦的卦主。后来，林清逐渐控制了各卦，并正式将荣华会改名为天理教。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清三次进京摸清情况，回来后与李文成商量，认为是时候举事了。为了方便起事，林清对最高层进行了一些改革，作出了“八卦九宫，林李共掌”的决定，林清为“天皇”，冯克善为“地皇”，李文成为“人皇”。而且他们把“蛋糕”都分划好了，起义成功后，林清得直隶，冯克善得河南，李文成得山东。

嘉庆十六年八月，彗星出现在西北方，林清等人抓住天象大做文章，说是天意让他们起兵。最后大家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起义，主意敲定以后，大家便开始布置，李文成在河南滑县举事，林清在北京城内起义。李文成嘱咐林清，一定要等到滑县的起义军到达北京才能发动起义。

嘉庆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嘉庆照惯例到木兰围场秋猕，临走前，对许多人叮嘱要搞好京城防卫工作，决不允许陈德之事再次发生。这些人口头上答应得很好，嘉庆一走，他们马上松懈下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李文成也出了岔子，他派遣的牛亮臣带领几百人到大伾山赶制武器，结果被县里的巡检刘斌发现。刘斌认为事关重大，立即抓住铁工，讯问之后得知李文成要起事，便紧急密报河南巡抚高杞，请求立即派兵缉拿逆贼。但上层却不当回事，认为不过是本地的一些寻常盗匪，刘斌也不过是为了邀功，故意把事情说得很严重。

不过滑县的知县强克捷不敢怠慢，利用县里有限的差役，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逮捕起来。可惜这两人都是硬骨头，死活不肯招供，哪怕被打得浑身溃烂也不肯说出一个字。

就在知县准备将李文成和牛亮臣押到省里时，滑县的天理教徒决

定提前起事，黄兴宰、黄兴相和宋元成等首领认为事情已经败露，如果再不动手，就只能受制于人。九月七日，滑县三千天理教徒攻破滑县县城，击杀了知县强克捷，从狱中救出李文成和牛亮臣。

滑县起义消息传出后，直隶和山东的许多地方纷纷响应，天理教徒们围城杀官，一场叛乱又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烧了起来。

嘉庆，你真是不幸，什么好事都让你赶上了。

嘉庆进入木兰围场之后，兆头就不太好，接连三天阴雨绵绵，河水暴涨，泥沙俱下，人马很难前行。九月初一，嘉庆不得不下令减围，几天后，嘉庆草草结束围猎。回京的路上，就收到天理教徒起义的消息。嘉庆亲政以后，经历的叛乱也不少了，他并不认为这些人能掀起什么大浪，但是也没有大意，作出了周密的部署，另外也避免事态扩大，弄得人心惶惶。

地方大员虽然在剿匪事情上仍然没有多少长进，但至少堵住了天理教徒北上的路，这在嘉庆看来已经多少过得去了，自从上次被行刺时一百多人无动于衷，嘉庆就不敢对这些吃皇粮的人抱有太多的幻想。

林清在北京里对于滑县提前起义一事完全不知道，由此可见，清军多少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九月十五马上就要到了，林清召集众人商议起义之事，正黄旗曹福昌被林清收买，他向林清透露嘉庆将在十七日抵达白涧。曹福昌说，到时候文武大臣一定会出迎，大家谁也不会想到有人起义，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打嘉庆一个措手不及。

曹福昌的建议很好，可惜偏偏碰上了林清这个死脑筋，他认为九月十五是天意制定的日子，绝对不可以更改。

林清决定十五日派几百人攻入内宫，但是“间谍太监”认为内宫不是很大，容不下太多人，何况天理教有神术护体，一定可以取胜的。最后，林清决定派两百人攻入内宫，由“间谍太监”引路。

进宫的人约好用“白帕”为标志，化装成小商贩在菜市口、珠市口和前门一带汇集。等到十五日午时一到，立即向内宫进攻。林清像个总司令一样坐镇黄村指挥，等待来自滑县的援兵。

说来讽刺，林清起义的消息很早就泄露出去了，在豫王府当差的祝海庆在八日就知道林清起事的消息，甚至知道是在九月十五日午时动手，连这么绝密的消息都走漏了风声，由此可以想象林清的组织能力。祝海庆掌握这个绝密消息后，立即上报，可惜豫王裕丰对此无动于衷，只是敷衍说查明后再作定夺，但是一转身裕丰就将此事忘在脑后。

起事之前，卢沟桥巡检陈绍荣也发现了异样，立即申报宛平县县令，可惜县令也根本不当回事。随后，他又上报步军统领吉纶，吉纶听了后，不仅没有重视，反而有厌烦的情绪，竟然痛骂报告之人：“这太平盛世，你在这里疯言疯语，脑子出了毛病吗？”总之，各级官员玩忽职守，致使本来可以提前扑灭的叛乱最终还是发生了。

九月十五日午时一到，天理教徒们立即分批冲进宫内，不过宫廷禁军也不完全是木偶，看到这么多人往里冲，也知道绝不是集体马拉松。东华门禁军立即下令关闭城门，结果只有很少一部分教徒冲了进去，下场很明显，关门打狗，这些冲进去的天理教徒很快就被擒杀干净。

西华门那边情况貌似好点儿，冲进去了几十个人，这些人先进攻尚衣监文颖馆，接着向隆宗门进攻。当时，皇子绵宁（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原名绵宁，即位后改为旻宁）听说有变，立即让人准备好武器前去拦截。这么点儿人就敢攻下皇宫，当然是春秋大梦，天理教徒们很快就被扑灭，全部被捕杀干净。

我们再来看看那个林清，他坐在黄村貌似一个运筹帷幄的总司令，正痴心妄想李文成带兵支援自己。就在林清想入非非的时候，清军已经冲了进来，将他捆绑得严严实实。

这次起义虽然被轻松扑灭，但给嘉庆的精神刺激相当大。嘉庆想，这些人太欺负人了，我又不是一个坏皇帝，竟然冲进紫禁城里造反。收到这个消息时，嘉庆正在白涧前往京城的路，当时他就惊呆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事，竟会招致这种千古难遇的奇耻，作为一个皇帝，他觉得自己太失败了。一种受伤的情绪在心里蔓延，但他仍不忘夸奖皇次子绵宁等有功之人。

嘉庆对失职官员非常气愤，尚未回到京城，就对失职官员进行惩罚。步军统领吉纶和左翼总兵玉麟被革职，嘉庆命内大臣托津提前回京，对失职官员进行查办，还叮嘱他一个都不要放过。

追究失职官员是情理之中，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是，嘉庆并没有一味地诋过他人。他意识到自己的治理出了问题，怀着沉痛的心情，下了一道罪己诏：

我嘉庆德行本来就不深，谬受皇考托付，十八年来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刚继位的时候，白莲教在四省肆虐，用了近九年的时间，才平定这场动乱。本以为从此以后可以和百姓普天同乐，没想到天理教徒偏偏要破坏这和谐盛世，居然攻入大内。幸亏皇次子绵宁临危不乱，平定了这场叛乱。大清开国已经一百七十多年了，列祖列宗，仁德深厚。我嘉庆虽然没有列祖列宗那样深厚的德行，但也自信

没有做什么害民的事。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简直无法理解，只能自责。灾祸虽然起于一时，但“由”来已久。我虽然再三告诫群臣要忠心为国、勤政爱民，可惜他们都当成了耳边风，终于酿成了这种从汉唐宋明以来从来没有的事情，丢人的不只是我，也是整个帝国的官僚集团啊！说到这里，我已经说不下去，只能以后躬身自省，知错即改，上报天恩，下慰黎民。

在罪己诏中，嘉庆含蓄地批评了皇考和列祖列宗，认为这种事情虽然发生在自己的任上，但其实是长期以来的一个矛盾积累。嘉庆当然不敢直接批评列祖列宗和乾隆，只能采取这种婉转的说法。当然，嘉庆更多地认为是自己的过失，而嘉庆的过失主要体现在“吏治”的失败上。

吏治问题是乾隆中后期遗留下来的，嘉庆能不能治好我们不敢说，但显然他并没有达到整肃吏治的目的。

罪己归罪己，林清却难逃一劫，被凌迟处死。豫王裕丰是这个案子中处罚最重、级别最高的一个官员，嘉庆本想革掉裕丰的王爵，但考虑到这个爵位是豫亲王多铎凭借军功获得的，就此作罢，最后罚了他十年俸禄。后来裕丰又窝藏天理教徒，嘉庆忍无可忍之下，终于革去他的王爵。

天理教事件虽然过去了，但是这一连串的冲击波不仅冲动了清朝统治的根基，而且沉重地冲击了嘉庆皇帝的心灵。

多事的太监

天理教徒闯京城，跟太监的多事是分不开的。在慈禧重用太监之前，清朝还没有太监干政的先例，然而这次“禁门之变”参与的太监之多让嘉庆瞠目结舌。

天理教本来筹划并不周密，如果没有太监从中接应，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林清又是怎样认识这些太监的呢？

林清经常在河北一带传教，而宫中太监有许多河间人，许多太监的家属就是天理教徒，一些太监也跟着信奉天理教，这些太监再传给其他太监，导致宫中信仰天理教的太监越来越多。

本来宫中并没有发现这些太监有谋逆的迹象，事发当日，太监张泰埋伏在东华门马道上，被人拿住了，大家才发现有许多太监已经通敌，准备跟天理教徒里应外合。

嘉庆让人彻查，一大批阉人被揪了出来。嘉庆把太监刘金和刘德叫到面前，问道：“你们服侍我这么久，难道我待你们不好？”两个太监吓坏了，连连跪地求饶。

嘉庆冷笑一声：“你们都已经投靠林清了，还称我为主子干吗？我不是你们的主子，你们说说吧，应该怎么办？”

两人吓得直哆嗦，嘉庆突然咬牙切齿地说：“朝廷养着你们，你们竟然背叛朝廷，跟邪教徒勾结，想谋害朕，你们实在是罪大恶极，应当凌迟处死，家属也不能幸免。”

恨归恨，几天后，嘉庆冷静下来，怕这事扩大化以后，太监人人自危，到时候铤而走险，搞不好真害了自己，便把太监们都叫过来，安抚道：“外面谣传说宫中太监都叛变了，朕亲自审问过了，只有七个太监叛变了，其他人都是清白的。”

许多心里有鬼的太监暗叫好险。嘉庆这招非常高明，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太监参与其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很多，真的很多。

经过这么多事情，嘉庆一定大呼晦气，这么多的事情偏偏全让自己撞上了。嘉庆虽然口头上安抚众太监，私下里还是非常好奇，让人秘密查访究竟有哪些太监参与其中。

外界有很多传言，说为首的太监并不是刘金和刘德两人，而是李文成的侄子李金凤。李金凤这个人相当狠，在他二十岁正当青年的时候，居然一刀把自己阉了，当时也没采取什么医疗措施，阉了自己后就昏死过去。幸亏抢救及时，李金凤才活了下来。李金凤进宫当了太监后，人缘很好，是个左右逢源的角色。

但是他为人阴险狡诈，相当深沉，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有个飞扬跋扈的总管太监，经常欺负其他太监，后来被人揭发。嘉庆当着众人的面将他打得血肉模糊，众人无不在心里拍手称快。唯有李金凤去安慰他，给他送汤送药，仿佛一个孝子。当时大家都以为李金凤心肠相当好，殊不知李金凤的阴险深沉远不是他们所想象的。

果然，这个太监伤好以后，嘉庆又对他宠信如初。这个太监记得李金凤对他的好，李金凤因此得到升职。升职之后，他就有权力在一些职位安排自己相信的人，后来，李金凤让天理教徒补了宫中一个缺。

林清起事失败后，李金凤知道一切都完了，便窃取了宫中的符印，快马出城，声称去木兰围场迎驾。由于他颇受宠信，手中又有符印，守城的士兵不敢阻拦他。

李金凤后来逃到杭州灵隐寺，碰到了高僧日照大师，于是削发为僧。为了安全，最后进入尼姑庵。还有人说，后来清廷派人找到了他，但是他装傻，一句话都不说。再后来，这个人就不知所终。

李金凤这个人就像一个传奇，虽然是一个太监，不得不承认这人相当狠，绝对是一个厉害角色。

第六章 嘉庆朝最离奇的悬案

这天，嘉庆正在看奏折，当览至这个案子的奏章时，禁不住掌击案桌，大喊：“奇！奇！奇！”

贼心胆边生

嘉庆朝发生了一件离奇的案件，这个案件的主人公既不是朝廷命官，也不是地方豪强，只是一个普通的伙计。

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二月的某天，朝廷工部的官员宋允吉和铺户张清泰、商曾祺一起到工部铺户蔡永受家里闲聊。闲聊中，大家东拉西扯说到自家的生活状况，大家都抱怨说工资太低，生活过得挺不容易的。于是大家商量能不能想办法捞点油水，蔡永受提议说，我们为工部做事，为什么不从工部下手呢？

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了大家的认同，衙门里固然油水很多，但要捞到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幸好宋允吉在工部担任贴写职务，熟悉其中的操作流程。大家商量好，宋允吉起草一份工部发给虞衡司的文件，然后用假冒的名字在上面盖章签字。之后，他们还买通了虞衡司的官员柴添初，想让他盗取虞衡司的印章。

这些关节打通之后，还有最后一道难关，还必须有工部的大印。这是最困难的，他们可以买通一些小部门的官员，但总不至于也买通工部尚书吧！如果有这个钱可以买通，也不至于寻思着要捞油水。

他们几次想盗取工部的大印，都没有成功。但这些人又不甘心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他们打算仿制一个工部大印。接下来就是把虞衡司的文件译成满文，这事得找一个懂满文的人干，他们选择了笔帖式惠昆，惠昆这个人非常老实，经不住哄骗，便答应了。

当所有关节都打通了之后，蔡永受等人终于从国库中捞到了油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获取了一些缎匹和颜料等物品。蔡永受等人都非常高兴，他们将物品折换成银两，分完赃之后，大家都觉得实惠。

贼胆总是一步步撑大的。嘉庆十二年（1807年）四月，他们决定捞取更多的油水。蔡永受、王书常勾结户部福建司经承万青，用假印

从国库中领取到了更多的物品。将这些物品倒卖之后，所有参与人一同分赃。

嘉庆十三年（1808年）五月，蔡永受感到，老是这么干，估计迟早会被发现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此时，蔡永受有些心虚了，但心虚归心虚，如果说就此不干了，等于是断了财源，也不行。想来想去，蔡永受发现，冒领物品是个风险特别大的事情，冒领之后，还得变换银两，不仅麻烦，而且容易留下证据，还是直接冒领库银比较方便。

当然，要冒领库银有些手续是必须搞定的，蔡永受联系了工部贴写秦大纶和广储司贴写谢兴邦、丁凤诏等人，让这些人加入自己的舞弊阵营。有了这些难兄难弟的帮助，蔡永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从广储司冒领银两七次，在颜料库和缎匹库冒领两次。

正如蔡永受之前所担心的，总是伸手，难免有天被抓。

嘉庆十四年（1809年）十二月，当王书常和谢兴邦再次将黑手伸到广储司时，被逮了个正着。广储司这天值班的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收到盖有印章的文书时发现有些异样，仔细辨认后终于确信文书是伪造的，于是，这些伸向公款的黑手全部被抓。

在严刑逼供之下，王书常把所有情况都招了，也难怪他，细皮嫩肉如何受得了夹棍和大杖。

嘉庆拍案：奇！奇！奇！

这天，嘉庆正在看奏折，当览至这个案子的奏章时，禁不住掌击案桌，大喊：“奇！奇！奇！”

嘉庆可能是少见多怪了，他奇的是这些犯罪团伙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将黑手伸向国库，他不明白帝国的那么多官员是干吗的。皇帝们习惯了那些勒索敲诈下属的贪官，很少碰到有贪官直接将手伸向国库的。

在清朝，国家的财富无非存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户部，这个地方掌管国家税收收入，属于公款；另外一个就是内务府，这里存放的是皇家的家产。

在嘉庆看来，无论是户部还是内务府，都有很多部门，里面戒备森严程序复杂，办事手续非常严密，要想从中捞钱谈何容易。但这些人不仅做到了，而且连续三年从国库中盗取银两共计六万九千两。嘉

庆气愤的是，作案时间这么长，盗取财产这么多，怎么那么多官员就没有一个提前发现呢？嘉庆再一次深深地感到吏治之腐败。

最让嘉庆受伤的是，卷入此案的官员有四十多人，这些人助纣为虐，不但不思报国，反而做出如此卑鄙下贱的事情。嘉庆愤怒了，痛苦了，他痛骂这些官员禽兽不如，昏聩愚蠢，让刑部严加查办。

这个案子当然不难审，也容易结案，最难的是此案背后所反映的官场问题。该如何整顿治理官场呢？嘉庆似乎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渎职的官员自然应该撤下，撤下之后换一批，时间长了还是老样子。

嘉庆让军机大臣认真调查，然后给自己呈上一本失职官员的名单。不久后，军机大臣呈上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并特地指出，工部尚书温布责任最大，因为温布任职时间最长，其本人又工作懈怠，玩忽职守，一切弊端都是从他开始。如果温布不革职的话，工部的官员们工作风气很难改变。

嘉庆细细研究名单，争取一个都不放过。

根据大清的律法，蔡永受情节最严重，他伙同王书常、吴玉伪造公章，冒取银两十余次，合计冒取银两五万两及物品折合为一万九千两。蔡永受本人分得脏银九千两，是犯罪团伙中得银最多的。所以蔡永受被判定为斩立决。

王书常每次都充当冒银先锋，假装是朝廷的办事人员，按假传圣旨罪拟定为斩监候。王还犯有私刻公印罪，也是斩监候。两罪并罚，斩监候加上斩监候结果还是斩监候。

吴玉在伪造公印上虽然是个从犯，但是根据律法，应当处以斩监候。

为了对官员起到警示作用，嘉庆还让国家六部三库等所有衙门的官员前去刑场观刑。应该说嘉庆为了整顿好吏治，挖空了心思，可惜这些官员都是老油条，处死一两个犯人是绝对吓唬不到他们的。

工部铺户蒋得明，伙同罪犯十次加入犯罪活动；谢兴邦、商曾祺都是犯罪团体的骨干人员。这些人全部处以绞监候，秋后处决。

由于涉案官员太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根据他们的情节轻重，嘉庆酌情给予相应的处罚。

接下来我们看看嘉庆是如何处罚那些渎职的官员的。

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苏楞额和工部侍郎阿明阿二人，主持工部事务，然而对于蔡永受等人的文印信屡次签发却毫无觉察，过失严

重，苏楞额被革去工部尚书的职务。阿明阿七次失察，过失更重，不仅被革职，而且要发配到热河做苦工。

工部尚书德瑛六次失察，三次在伪造文印上签字，而且调查发现，德瑛一些日常工作的行文竟然让儿子代劳，革去太子少保头衔，降为工部侍郎。后来，干脆让他退休。

大学士总理户部禄康六次失察，革去太子少保头衔，降为协办大学士，任户部尚书。

协办大学士长麟也有失察之处，加上他本身有眼疾，但这个不能成为失察的借口，所以免去协办大学士的职位。

内务府大臣兼工部尚书英和、常福两人失察两次，降为三品顶戴，八年后复职。

内务府大臣和世泰，拔去花翎，降三级留任。

大学士兼管三库事务的费淳虽然没有直接的失察地方，但在工部和内务府任职时间相当长，所以革去官衔，降为侍郎。

工部尚书温布在工部任职最久，承担的责任也最大，工部的许多弊端都是从他开始，本应对他严厉处置，但因为已病故，故不再议罪。

看到没有，嘉庆为了整顿吏治，连死人也揪出来特批。后人评价嘉庆庸弱守成，一点没错，虽然上面的处罚还算有力度，但执行起来嘉庆就手软了。真正判刑的时候又从宽减刑，按照嘉庆的意思是，涉案官员太多，如果真的从重惩罚，反而对工部冲击很大，而且处罚他们后，他们处于闲散状态，以后复职的话就更加懈怠。

这些理由全都是借口，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嘉庆性格中致命的弱点：庸弱。这就是他不能整饬吏治的根本原因。

第七章 紧锁的大门

在嘉庆时期，天朝大国虽然在不断衰落，但是心态仍旧是天朝大国。对于任何来华的使团，清廷都称之为贡臣和贡使。嘉庆虽然在世人眼里是一个庸弱的守成之主，但是对待像暹罗、朝鲜、安南、缅甸、廓尔喀和琉璃这样的小国，完全是一副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姿态。

来自海外的威胁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跟以往任何朝代都不一样。当西方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清王朝却仍旧在封建统治的困惑中打转，嘉庆就是处于这种困惑中最典型的皇帝，他不明白吏治何以这么难整饬。他绞尽脑汁，始终没有考虑到可能是制度出了问题，他从不怀疑圣王之道。

然而，无情的现实即将告诉清王朝一个真理：圣王之道已经行不通，何况圣王是中国帝王追求的最高境界，只有极少数帝王才能做到内圣外王。可是，当资本主义大潮蔓延整个世界时，即便成为一个圣王，似乎也很难拯救一个国家的命运。

直到后来，人们才意识到，在圣王之外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制度。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清兵入关，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都比不上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李自成造反只不过是中國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中的一个例子，清兵入关也不过是暴力集团发展壮大后的一个必然结果，并无任何特别之处。而资产阶级革命却宣告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新的思潮、新的制度正悄然崛起。

当乾隆陶醉在十全武功中时，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工业革命。当乾嘉还在纠结于吏治腐败时，北美殖民地爆发了独立革命；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宣言》，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推翻封建君主专制。

对这一切，嘉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嘉庆时期，天朝大国虽然在不断衰落，但是心态仍旧是天朝大国。对于任何来华的使团，清

廷都称之为贡臣和贡使。嘉庆虽然在世人眼里是一个庸弱的守成之主，但是对待像暹罗、朝鲜、安南、缅甸、廓尔喀和琉球这样的小国，完全是一副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姿态。

在中国充当西方文化使者的最开始都是一些传教士，顺治对西方传教士采取宽容政策，康熙前期继承了顺治的政策，后来因为罗马教皇的强硬态度，康熙下令在中国取缔天主教。从康熙开始，清廷就一直禁止天主教。嘉庆继承了先辈的政策，严禁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传播。

当然，像宗教这种东西肯定是不可能完全禁止的，对此，嘉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嘉庆年间，还是有三次查禁西洋教的高潮。对嘉庆来说，这不仅是秉承祖制，也是维护国体。嘉庆多少意识到，西洋教传播的这些东西对于自己的统治是不利的，尤其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思想，很有杀伤力。

在对外贸易方面，嘉庆采取了相当保守的姿态，闭关锁国似乎不是嘉庆的错，不过是继承“祖训”而已。嘉庆绝对有权力改变政策，但他没有这么做，最主要是没有意识到“对外开放”的好处。但即使明知好处多多，如果对帝国有风险的话，相信以嘉庆的性格也不会“开放”的。

国家嘉庆一个人说了算，不开放也没办法，但嘉庆还给出了不开放的理由：“我天朝上国地大物博富有四海，难道需要跟那些弹丸小国贸易赚钱？”嘉庆的意思是，我们很富有，没必要跟洋人做生意。嘉庆还给出了一个理由：“外国佬卖的东西全靠在我们内地销售，而这些钟表呢绒等东西，又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我们卖给他们的茶叶和土丝却是生活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停止贸易，他们立刻就完蛋。”所以，嘉庆的意思是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上，对这些洋人可以随意鄙视。

嘉庆这些话并不是他自己的思想，更不是他的独创，他不过是重复老爸乾隆的观点。乾隆曾经给英国国王发了一道国书，意思是：“我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本来是不需要跟你们通商，用你们货物的。但是因为天朝生产的茶叶、丝绸、瓷器是你们必需之物，如果我们断了通商的话，会使你们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所以格外加恩体恤，在澳门等地开设洋行，准许你们来贸易，沐浴天朝浩荡的皇恩。”

相信每个人都能从乾隆的话中感觉到那份不可一世妄自尊大的狂妄，英王肯定也受不了这种口气，但为了跟中国通商，也只能忍着。一旦他们的国力强大了，难免就不愿再忍了，到时候直接用枪炮打开

中国大门，这就是后来的鸦片战争。

嘉庆限制贸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防止白银外流。他曾经为此叮嘱广东总督吉庆：“西洋商船来中国，一船的货物往往能赚取大量的银钱，长期下去会导致中国白银越来越少。就说钟表吧，他们不过是用少量的铜铁制成，结果把我们白花花的银子赚走；还有玻璃，在他们那儿不过是通过一些简单的原材料淬取，然后做成窗玻璃和屏风，在中国能卖到一个好价钱。他们用无用的东西购买我们有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长期下去会损伤我国的元气。”

就嘉庆当时的认识来说，他能从经济角度考虑国家的元气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嘉庆的担心是正确的，黄金白银是世界的硬通货，如果大量外流，必然会影响国内经济稳定。但是如果因此而终止和其他国家贸易，也是得不偿失的，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实行纸币，不过这在当时太不现实，当时国与国的贸易只能用硬通货。于是，嘉庆便采取了以货易货的方式。

道光年间曾发生白银大量外流的事件，结果严重地影响了全民的经济生活。这说明嘉庆多少还是有一些先见之明的。

嘉庆禁烟

鸦片是由罂粟花的汁液制成，最开始是一种药用物品，起麻醉、止痛的作用。

在唐朝时，就有阿拉伯商人把鸦片带入中国，当时称作“阿芙蓉”。不久，中国就有一些地方种植罂粟，不过当时规模相当小。明朝时，周边一些小国甚至把鸦片当成贡品进献给朝廷。其时，鸦片的价格相当昂贵，价值等同于黄金。

鸦片变成毒品还是在清初的时候，爪哇等地的人通过管子大量吸食鸦片，逐渐成瘾，人们才发现鸦片的危害。

在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中鸦片是一个重头，对于鸦片，清政府征收的关税也相当高。康熙对鸦片收取重税，大概有限制鸦片进口的意思。雍正对鸦片的危害认识更深一些，曾经下达了禁烟令，规定除了药用鸦片，其他鸦片一律为违禁物品，一旦发现，枷号一月，并发配充军；私开鸦片馆的，罪行等同于邪教宣传者，处以绞刑。

雍正的禁烟法令虽然严厉，但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缓冲地带，也

就是说药用鸦片不算违禁。许多非法商人必定紧紧抓住这个漏洞，先把药用鸦片走私或进口，然后再提炼成鸦片烟。

所以，雍正禁烟之后，鸦片的贸易反而逐年增加，这些进口的鸦片无一例外都是以“药用”的身份光明正大地进入中国市场。

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鸦片贸易比雍正时增长了二十多倍，看到这个数目，连乾隆也感到触目惊心，于是也下令禁烟，把雍正当年的话重复了一遍。

到了嘉庆时候，鸦片问题更加严重。他知道，他不能再像父亲那样敷衍了事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正视这个问题。

嘉庆知道，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定不能再像父亲和爷爷一样，不可以给鸦片贩子留下缓冲地带。嘉庆宣布：停止征收鸦片税。听到这个消息，鸦片贩子肯定要欢呼雀跃了。不过，嘉庆的话还没有说完：从此以后禁止鸦片进口。这就彻底断绝了鸦片进口的路径，接下来自然是严厉打击走私了。要知道，有利润的地方就一定有商人，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身家性命尚且不顾，又怎么会真把禁令当回事呢？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里含蓄地赞扬了嘉庆的禁烟政策，不过里面把中国人说成是半野蛮人显然让人不太舒服：“中国皇帝（嘉庆）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的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的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

从此以后，鸦片只能通过地下通道在中国流通了，这对于嘉庆来说仍然是无法容忍的。禁烟之后，政府将与鸦片贩子和吸毒者展开更艰难的斗争。然而政府虽然强大，毕竟在明处；鸦片贩子虽然分散，毕竟隐藏在暗处，这场战斗谁胜谁负很难轻易下结论。

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又将禁烟政策推进一步：禁止在内地种植鸦片。

嘉庆的禁令对于靠鸦片为生的人来说不啻为唐山大地震，各大公行和商行不得不终止和东印度公司的合作。最不甘心的要属国外的鸦片贩子，好端端的一个巨型蛋糕被人端掉了，他们怎么可能轻易就范。

对这些国外的鸦片商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开辟非法的销售渠道，当时澳门和广州的黄埔水域就是他们走私鸦片的据点。眼看地下走私之火就要蔓延开来，嘉庆岂能无动于衷，他也知道福建和广东两省是非常惹火的地带，在这里一定要布下重兵。

嘉庆再三叮嘱两广总督吴熊光，一定要把禁烟事情作为重中之重，强力打击走私贩子。

尽管如此，鸦片走私仍然很难禁绝，嘉庆对此也头痛不已。要说自己的禁烟政策不够狠，那不是事实；打击力度不大，也不是事实。究竟原因何在呢？

经过长期的实践经历，嘉庆终于明白了问题所在。问题就出在那些缉拿鸦片贩子的官员身上，要想查禁成功，必须要求这些官员高度负责。大清官员的德行我们都见识过了，鸦片又是如此暴利的一个行业，这些官员能够抵挡得了糖衣炮弹的攻击吗？

嘉庆终于把目光从鸦片贩子转移到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官员身上，他明确表示，对于在鸦片问题上渎职和腐化的官员严惩不贷。嘉庆严厉的态度无疑对官员们起到了一种震慑作用。

嘉庆十八年（1813年），在禁烟政策上，政府又迈出了一个大步子。嘉庆宣布对鸦片吸食者进行惩治，法令先从“公务员”着手。官员和侍卫，如果有吸食鸦片的，立刻革职，杖打一百，枷号两个月；一般军人和老百姓吸食鸦片，杖打一百，枷号一个月。

这等于是从终端禁烟，嘉庆的禁烟政策贯穿了鸦片流通的整个流程，可以说是非常彻底的。政策是好的，结果是好是坏完全靠执行了。

这个禁令颁布后，禁烟工作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各地源源不断地汇报禁烟政绩，收到这些政绩嘉庆既欣慰又担心。欣慰的是禁烟令终于收到良好效果，担心的是问题比自己想象的还严重。

广东是鸦片走私的一个重灾区，为了让禁烟令行之有效，嘉庆拿广东的两个渎职高官开刀，他们分别是广州将军本智和海关监督祥绍。

世人眼中仁弱的嘉庆皇帝以狠、猛的作风终于扼住鸦片泛滥的势头，这是嘉庆干得相当漂亮的一件大事。

嘉庆的禁烟行动是成功的，可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政绩在他儿子道光手中全部化为乌有，这是后话。

与英吉利使者的外交风波

跟乾隆一样，嘉庆对于英国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所以在与英国的交往中，他依然摆出一副天朝上国的姿态。殊不知，英国此时已经

是欧洲的海上霸主。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使者阿美士德奉英王之命访华。跟阿美士德一起访华的代表团中，有很多中国通，这些人要么长期跟中国打交道，要么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对英国了解相当少。

副使斯当东年少时就跟随马戛尔尼访华，受到乾隆的接见。此后，他一直待在东印度公司，频繁地跟中国进行外贸方面的交流。斯当东访华的时候只有十一岁，而他的父亲就是马戛尔尼的副使。当时他的父亲之所以带着他，就是希望锻炼一下这孩子，斯当东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旅途中便学会了一些中文。后来，代表团在回广东的途中给乾隆写了一封感谢信，这信就是由斯当东代笔的。斯当东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用中文写信，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天才少年。

乾隆接见英国使者时，发现这个小孩会说中文，当即龙心大悦，解下自己的荷包送给他。斯当东非常重视这个荣誉，一直将乾隆的荷包佩戴在身上。虽然他后来对中国的态度非常强硬，但是内心深处对乾隆还是非常敬仰的。

长大后，斯当东当上了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漫长的实践让他成为一个中国通，是英国人眼中的中国问题专家。

嘉庆也很早就注意到斯当东，曾经对大臣说：“英吉利人斯当东，以前就随使者入京朝贡，此人当时虽然年少，却相当狡黠，回去的途中将沿途的地理，绘制成图册。此后，留居澳门长达二十年，对汉语相当精通。”

英国派出的使团阵容相当豪华，有六百多人，乘坐的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如此郑重地来华，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也是当时嘉庆和朝臣的心头疑问。不过，嘉庆仍然能猜得八九不离十，他们来无非就是为了通商呗！

事实上，我们知道清政府并没有禁止海外商人，只不过限制非常严而已。无疑，英国使者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扩大尺度，改变中国对他们的待遇。加上嘉庆禁烟之后，东印度公司人心惶惶，一笔巨大的财源断绝了，不能不引起英国高层的关注。

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层给英王写信，要求政府出面干涉，与清廷交涉，取得自由通商的权利。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英方极为不满，他们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中国磋商一些外交方面的问题。

这是什么事情呢？这事情本来跟中国没关系，只不过发生在中国的海域。一艘英国军舰追捕一艘美国商船，这艘美国商船为了逃避追捕，故意闯进中国海域。英国军舰也冲了进来，商船进来是小事（至少有经商的借口），军舰进来可就是大事了。当时，中国的水师没有坐视不管，而是动用舰艇将英舰驱逐出去。随后，清廷又在澳门传讯英国一个官员，当面谴责英国军舰侵犯中国主权，并且命令英国所有的军舰都要停泊在外洋，否则全部击沉，而且还要停止与英国的贸易。

也许对英国政府来说，击沉一艘军舰不是大事，但要终止贸易不亚于要了他们的命。英国官员极力辩解说，这都是美国商船挑拨离间，他们不义在先，所以我们才要追捕的，这事真的跟我国无关。

因为这事，中英关系搞得相当紧张。英国派出使者团也有缓和两国关系的意思，英国并非不想通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只是当时的条件不允许。英国和法国长期作战，国力消耗很大，再跟中国打，一时之间他们承受不起，再者英国对于中国也还不是很了解。中国一向自称天朝大国，光是这种威势也足以让英国三思而后行。

对于英国使者，清廷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嘉庆对英国的印象特别坏，英国海军曾经抢占澳门，还曾进入中国海域搜捕美国船只，并且不断地向中国贩卖鸦片。是可忍孰不可忍，嘉庆很想直接拒绝英国使团，但作为一个礼仪之邦的皇帝，他必须克制，展现出应有的风度。

英国使者到来之前，嘉庆就连发上谕，规定使团只准在天津港口登陆，让沿途的文武官员对他们多加防范，还让官员们在接待时不准奢靡，天津港口的一些建筑不必重新粉刷，除了一些重要的使者可以登岸外，其他闲杂人等一律留在他们的船上，而且要派人严加看管他们的船只。从嘉庆的这些上谕中可以看出，他对英国的反感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以，这次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中、英两国注定要枪杆子见分晓。

阿美士德等人到达天津港口后，苏楞额负责接待他们。宴会开始时，苏楞额就给英国使者出了一道难题，他要求英国使者跟他一起向皇帝牌位行跪叩礼。阿美士德等人表示这绝对不可以，他还说并不是自己不虔敬，只是他们向来没有这个习惯，见到国王也不过是作揖。

苏楞额则表示，这是礼节，进了天朝就应该按天朝的规矩办事。苏楞额还援引当年马戛尔尼访华时曾问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的事情，并说副使斯当东当年也在场。斯当东正如嘉庆所说的，相当狡猾，他说自己当年很小，对此毫无印象。他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完全

以没有印象推脱，狡猾至极。

双方使者就这个问题僵持了下去，一直谈不拢。无奈，苏楞额作出让步，并上奏嘉庆为英使说话：“这些贡使虽然对吾皇虔敬不二，可惜不敢改变他们国家的礼节，怕回去后受到国王的责怪，所以在行礼时只能按照他们自己的礼节回报皇恩。”

苏楞额如此办事让嘉庆非常不满，嘉庆训斥道：“请你让英国使者反复练习天朝礼仪，他们什么时候熟练，什么时候让他们进京觐见。还有，你告诉他们，天朝所有的臣民，还有朝鲜、安南、琉球、回部、准噶尔等，进京都是按照这个礼节。如果他们练不好这个礼仪的话，让他们永远不要进京。”

然而，苏楞额这人办事似乎缺心眼，他竟然违反嘉庆的旨意带着使者进京。嘉庆知道后，给苏楞额发了一道警告性的上谕，吓得苏楞额满头冒汗，立即让使者停止前进，就地操练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仍然不肯退让，反复说自己不敢改变本国礼仪，否则国王必然会重罚。

苏楞额表示，这绝对不可以。阿美士德无奈之下，表示可以按照自己国家的礼仪做九次，以此表示对皇帝虔敬之心。

可是对于嘉庆来说，按照英国礼仪做一百次也不行。气愤之下，嘉庆撤掉了苏楞额，让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和吏部尚书穆克登额处理这事，可惜这两人也没能说服英国使者。英国使者为什么变得比过去更难说服呢？说白了还是他们国力增强了。

和世泰和穆克登额不能说服英使，但又怕嘉庆责怪，怎么办呢？只能动用中国传统的智慧：先模棱两可上奏，最后出事了推卸责任。

他们上奏说：“贡使们仰承天恩，至诚感服。奴才们让他们操练礼节，可惜他们起跪仍然不是很自如，勉勉强强还算是个礼。”

他们这么一说嘉庆当然高兴了，说明这些使者还是臣服了，只是礼仪不是很熟练而已。就这样，嘉庆让他们带着使者进京。

和世泰等人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希望英国使者能够草率行礼，然后蒙混过关，到时候自己就可以推说他们只是不熟练。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和世泰不敢直接带阿美士德和斯当东觐见，而是带了其他一些次要的使者先作一个缓冲。

这天，嘉庆坐在大殿之上，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整齐地站在殿上，无数双眼睛瞪着英使行礼。让嘉庆倍感意外的是，这些使者并不像和世泰所说的那样行跪叩大礼，只用英国的礼仪对嘉庆作揖。和世

泰大为慌乱，居然捏造谎言说：“他们之所以不能行礼是因为正使生病了，不能行礼，没有正使带头，其他人都不会。”

嘉庆信以为真，还准备请御医为正使治病。接着，嘉庆让副使过来觐见。和世泰一听，完了，只能继续撒谎：“副使也生病了。”和世泰很清楚，副使斯当东态度比正使阿美士德更强硬。

嘉庆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不可能正副使同时都病了。接着，朝堂之上传来皇帝愤怒的声音：“立即将该国贡使遣回国，该国国王的表文也不必呈上，所有贡物全部让他们带回去。”

就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访华之行草草结束，阿美士德甚至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尽管他维护了本国的礼节，却有辱使命，无功而返。

阿美士德返回的途中经过圣海伦娜岛，拜访了囚禁中的拿破仑，阿美士德就此事询问拿破仑的意见。拿破仑认为进入中国后，应该入乡随俗，行三跪九叩之礼。

阿美士德虽然没有完成任务，回国后却因为这事名声大噪，受到英国舆论的一致赞扬，升任为印度总督。

这次外交失败无疑让英王深受打击，也让他更加确信，通过外交途径并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斯当东回去后当上了下议院的议员，多次在议会中宣扬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战争正在酝酿中。

第八章 嘉庆也多情

只见这女人骨骼妩媚，婀娜多姿，双眼明亮，眉若含情，肌肤白嫩，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自然清新的气质。嘉庆心里暗叹，宫里的庸脂俗粉哪能比得上眼前这个女子啊！

董氏被嘉庆看得低下头去，嘉庆让她抬起头来，看着董氏含羞带涩的神态，嘉庆更觉神迷。

薄命皇后喜塔腊氏

嘉庆的后宫情况：皇后两个，皇贵妃两个，妃子两个，嫔六个，贵人一个。

嘉庆的子女情况：儿子五个，女儿九个。

在嘉庆十五岁时，乾隆将满洲正白旗的副都统和内务府总管额尔景额的女儿喜塔腊氏指定给嘉庆。

嘉庆和喜塔腊氏看来颇为恩爱，在几年之内两人生下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乾隆禅位之时就宣布册立喜塔腊氏为皇后，此时喜塔腊氏与嘉庆已共度了二十多年。多年的生活，让这对夫妻有了深入的了解，彼此相敬如宾。嘉庆很喜欢这位温柔善良、宽仁贤惠、母仪天下的皇后，可惜，这位皇后命薄，只当了一年一个月的皇后，就因病而逝。

皇后去世后，嘉庆非常悲痛。乾隆给喜塔腊氏上了“孝淑”的谥号，并让嘉庆按照清朝旧制辍朝五日、素服七日为皇后办丧事。但嘉庆考虑到自己刚刚嗣位，有太多的国事等着自己处理，决定皇后的葬礼从简办理。

皇后死后在宫中停灵七天，嘉庆虽然没有因此而辍朝，但是每天上完朝后都会来皇后的灵前，倾诉内心的痛苦和思念。七天后，皇后的梓宫移到静安庄，当时嘉庆的昌陵还没有修建好，皇后的灵柩便暂时安放在静安庄。

嘉庆八年（1803年），昌陵完工后，嘉庆下令将皇后灵柩移入昌陵，入葬的那天，嘉庆亲自祭酒，并写下了一首哀思之诗：“永别芳形已七年，太平择地卜新阡。考恩垂泽沐深厚，后德流徽感激贤。濯

泪徒倾三爵酒，伤心早废二南篇。临风追悼增哀思，廿载相依百世牵。”

执掌中宫时间最长的皇后

喜塔腊氏病逝后，乾隆让嘉庆再立一个皇后，当时乾隆已经钦定了人选，就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俨然一个皇后家族，在清朝出了六个皇后。

在嘉庆还是亲王时，钮祜禄氏是地位仅次于喜塔腊氏的侧福晋。钮祜禄氏比嘉庆小十六岁，为他生下一男一女。嘉庆嗣位后，钮祜禄氏被封为贵妃。中宫位虚，钮祜禄氏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后。

孝淑皇后百日后，乾隆简简单单夸奖了钮祜禄氏一句：“贵妃钮祜禄氏人品端庄严谨，能力足以领导下面。”乾隆虽然没有直接说立钮祜禄氏为皇后，嘉庆一听便明白，二十七个月后，孝淑皇后孝期一过，嘉庆便准备册立钮祜禄氏为皇后。没想到太上皇乾隆驾崩，根据规定，一切典礼必须推迟三年。

没办法，钮祜禄氏只好继续再熬三年。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乾隆孝期过后，嘉庆便在太和殿册立钮祜禄氏为皇后，给她颁发金印和证书。从册立皇后到嘉庆驾崩，钮祜禄氏当了十九年三个月的皇后。但如果从她实际掌握皇后权力的时间算起，她执掌中宫二十三年，在清朝皇后中，母仪天下的时间最长。

如果说孝淑皇后仁惠贤德的话，钮祜禄氏也不差。钮祜禄氏谦和忍让，顾全大局，品性仁厚，她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皇后，就个人欲望膨胀。尤其是在建储大事上，钮祜禄氏表现出的大度让嘉庆深感欣慰。

嘉庆共有五个儿子，第一个儿子还没来得及起名就夭折了；第二个儿子便是绵宁，孝淑皇后所生；第三个儿子绵恺和第四个儿子绵忻都是钮祜禄氏的亲生儿子。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大统是人之常情，然而钮祜禄氏过人的地方在于她并没有因此蒙蔽了理智。绵恺玩世不恭，性情散漫，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绵忻虽然聪明，但是年纪太小。

这两个儿子和绵宁都没法比，如果坚持立自己的儿子话，肯定会破坏帝国的稳定。在绵宁十八岁的时候，嘉庆就已经将他内定为继承人，嘉庆虽然采取的是秘密立储的方式，但是傻子也能看出来他立的是谁。

根据雍正定下来的老规矩，立储的密诏应该存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的牌匾之后，但是嘉庆却很奇怪。他不放心把密诏放在众目睽睽之下，而是自己藏起来了，没人知道他放在什么地方。嘉庆这么做本来是为了保密安全，但他没有料到自己会死得这么突然。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照例到热河木兰秋狝，在途中暴毙。这样一来，可把大臣急傻了。消息传到京城，钮祜禄氏悲伤之余保持着高度的镇定，她并没想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的儿子捞取大清江山，反而担心找不到密诏，影响了国家的稳定。

在这个关键时刻，钮祜禄氏果断发出一道懿旨：“皇上龙驭上宾，嗣位问题至关重要，关乎国体。皇次子智亲王绵宁仁孝聪睿、英武敦厚，理应继承大统。吾恐仓促中皇帝来不及下旨，故特下一道懿旨，以慰皇帝在天之灵。”

钮祜禄氏发布这道懿旨的时候，还没有找到密诏。接到懿旨后不久，绵宁和大臣找到了嘉庆的密诏，并将密诏给钮祜禄氏看。钮祜禄氏大公无私的行为让新任的道光皇帝非常感激，奉她为皇太后，对她尊敬有加。道光二十九年（1850年），钮祜禄氏去世，谥号孝和睿皇后。

清代贤后不少，自孝庄以后，后继有人。如果后来的慈禧能有钮祜禄氏一半的开明，或许历史又会是另一个样子。

其他后妃

最早为嘉庆生育皇子的是刘佳氏，但这个孩子只活了三个月就夭折了。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刘佳氏为嘉庆生下了皇三女庄敬和硕公主。在嘉庆元年（1796年），她受封为妃子，此后一直没有生育。嘉庆五十大寿时，晋封她为贵妃。道光十三（1833年）年十二月十八日，刘佳氏去世，谥号为和裕皇贵妃。

还有一个为嘉庆生育皇子的是恭顺皇贵妃钮祜禄氏，这位钮祜禄氏和皇后钮祜禄氏有一个共同点，寿考一样，都是七十四岁。该钮祜禄氏是宫中主事善庆的女儿，年纪比嘉庆小许多，入宫时间也相当晚。刚开始的时候，她被封为如贵人。嘉庆十年（1805年），她生下了皇八女，可惜这女孩不到一年就夭折了，这一年如贵人升级为嫔。嘉庆十五年（1810年），她又升为妃子。嘉庆十六年（1811年），她生下皇九女，这也是嘉庆最后一个女儿，在五岁时夭折。嘉庆十九年（1814年）二月如妃为嘉庆生下了最后一个儿子：皇五子绵愉。

嘉庆并非一个沉溺女色的皇帝，从如妃后来为嘉庆的生子情况看，其在皇帝晚年颇受宠幸。在道光朝，如妃被尊为皇考如贵妃。她一直活到咸丰朝，被尊为皇祖母皇贵太妃。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初三，这位老人病逝于寿安宫，谥号为恭顺皇贵妃。

为嘉庆生过女儿的还有简嫔关佳氏、逊嫔沈佳氏和华妃侯佳氏。在嘉庆当皇子的时候，关佳氏的身份不过是格格，女儿逝世不久，她也死去，嘉庆二年（1797年）被追封为简嫔。沈佳氏是内务府大臣永和的女儿，以前也是格格，生下了皇五女慧安和硕公主，这女孩十岁夭折。沈佳氏死得也比较早，她和女儿的封号都是后来追封的。

侯佳氏的福气相对关佳氏和沈佳氏要好一些，以前侯佳氏的身份也是格格，在嘉庆元年（1796年）被封为嫔。钮祜禄氏当上皇后的时候，侯佳氏也升格为妃子。华妃为嘉庆生下了皇六女，女孩在两岁时夭折，华妃本人在嘉庆九年（1804年）七月去世。

嘉庆没有生育的嫔妃有七人，十四个妃嫔论理不算少，也不知是这些妃嫔不给力，还是嘉庆不使力。嘉庆只有五个儿子、九个女儿，比起康、雍、乾三位差了一大截。我们不妨看看清朝皇帝生育儿子的数目，光凭这个数字就能看出清朝的衰落。

努尔哈赤生有十六个儿子，皇太极生有十一个儿子，顺治生有八个儿子（尽管只活了二十四岁），康熙生了三十五个儿子，雍正生有十个儿子，乾隆有十七个儿子，嘉庆只有五个儿子，道光生有九个儿子，咸丰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同治生育成绩单为零，继位者光绪在生育上也是零分，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也是绝后。

生育能力的下降跟近亲结婚可能有直接关系，在封建王朝，统治力跟生殖力往往有潜在的成正比关系。所以，优秀的统治者往往被形容为雄才大略，雄才既是治国之才，又是生殖能力，确保为帝国生育出优秀的接班人。

嘉庆虽然在生育成绩单上不是很理想，但他享受到康熙和乾隆都没享受到的福气——他终于第一次让嫡长子继承大统了。

嘉庆热恋民妇之谜

在热河避暑山庄，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如果发生在乾隆身上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但这事偏偏发生在一向安分守己的嘉庆身上。

嘉庆自亲政以来，励精图治，渴望一展抱负，振兴大清。然而，现实是无情的，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后，晚年的嘉庆明显有些疲惫了。尤其是紫禁城两次被袭击，让他有些心灰意冷，对人生感到失望。

某天，夕阳西下，嘉庆站在宫阙之上，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老人了，遂产生了人生苦短的感慨，既然如此，又何必如此耿耿于功业呢？何不及时行乐！

来到避暑山庄后，嘉庆想起先辈们在这里浪漫的故事，心里也产生异样的波动。是啊，爷爷、父亲都是会享受的人，自己为何就不能好好享受人生呢？错过了大半辈子，现在还来得及。

主意已定，嘉庆决定重修避暑山庄，装饰得更豪华更漂亮，他必须抓紧时间，好好享受一下人生。于是乎他让内务府去江南挑选园林工匠，内务府的人到了杭州后，杭州官员盛情款待他们，保证给他们推荐一流的工匠。

几天后，总督给内务府的钦差呈上了一份图纸和模型，看到图纸和模型，内务府的钦差赞不绝口，拍案道：“主子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好好好，你赶快安排人去接这个工匠，让他跟我们一起前往热河觐见皇上。”

这工匠叫赵玉麟，新婚不久，还在蜜月期。受皇家欣赏本是一件好事，只是小两口如胶似漆，怎么舍得分别。赵玉麟的师傅是园林大师张南园，由于赵玉麟深得师傅真传，当地人又称他为小南园。赵玉麟不仅是园林设计的人才，也善于骑射，堪称多才多艺。他的媳妇董氏，长得秀气端正，画画和刺绣的功夫都非常到家。

这两口子本来组成了温馨之家，感情甜蜜，经济宽裕。赵玉麟平时外出做工，而董氏则在家里开了一个画舫。这小日子过得让附近邻居都羡慕，当夫妻俩接到总督的“订单”时，听说要为皇家设计园林，都非常高兴，这可是一笔大生意啊！谁也没想到，灾难正悄悄降临。

夫妻俩照着总督的要求，设计了一张图纸，还制作了一个镜湖亭的模型。内务府钦差看到他们的设计非常满意，这不，总督又来催夫妻俩快点上路了，本来只要赵玉麟一个人去就行了，但赵玉麟实在舍不得娇妻，再说了董氏是一个好帮手，如果带上她显然对自己工作也更有帮助，就这样，夫妻俩跟随钦差上路了。

嘉庆接到模型也赞不绝口，等到他见到美女董氏时恐怕就是目瞪口呆了。赵玉麟毕竟只是一介平民，看到皇帝，吓得浑身发抖。相反，董氏倒显得落落大方，举止得体。嘉庆这一看不要紧，居然有些神不守舍了。

只见这女人骨骼妩媚，婀娜多姿，双眼明亮，眉若含情，肌肤白嫩，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自然清新的气质。嘉庆心里暗叹，宫里的庸脂俗粉哪能比得上眼前这个女子啊！

董氏被嘉庆看得低下头去，嘉庆让她抬起头来，看着董氏含羞带涩的神态，嘉庆更觉神迷。

嘉庆便问女子姓名，女子彬彬有礼地答道：“奴家董氏。”嘉庆又问她是哪里人，嫁给丈夫多长时间了，女子一一作答。随后，嘉庆又问到设计出自谁的手，董氏便将哪里是丈夫设计的、哪里是自己设计的一一说清楚。

嘉庆夸赞了夫妇一番，便让内务府的人带着赵玉麟去设计房，董氏则到青莲岛候旨。董氏到了青莲岛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整天吃着山珍海味，身边有许多侍女服侍。董氏住在一个叫烟雨楼的地方，这地方景色相当不错，只是整天闲得慌，嘉庆让她候旨，却迟迟没有下旨。她来这里是做事的，不是享受的，可是既然皇帝没有下旨，也只好慢慢等了。

然而，一天又一天，时间过得真快，董氏快腻烦了，这个嘉庆到底想干吗，让自己住在这里又什么事都不让干。董氏于是问侍女们，侍女们全都坏笑，就是不回答，董氏明白了七八成。

一天，就在董氏在烟雨楼上痴痴地看着池中莲花，想念丈夫时，嘉庆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从背后抱住她的纤腰。董氏回头一看，发现是皇上，大惊失色。

嘉庆笑道：“小美人，别害怕，朕会好好疼你的。”

董氏哀求道：“皇上，快放手吧！奴家已经有丈夫了。”

嘉庆说道：“朕知道，朕第一眼看见你就喜欢上你了，朕会好好待你的，也不会亏待你的丈夫。”

董氏愤怒了：“皇上，你如果再不放手，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说完，董氏就要挣脱着跳下去。嘉庆一看，急了，连忙松手说：“不要这样，美人，朕放手就是了。”

随后，董氏面对嘉庆，义正词严地说：“你身为帝王，三宫六院，妻妾成群。为什么要抢我这样一个有夫之妇？皇上如果要用强，我今天只好死在你面前了！”

董氏这么一说，嘉庆清醒了一点儿，我这是色迷心窍昏了头，以前不是这样的，没想到思想一动摇，就做出昏君才能做出的事。嘉庆摆了摆手说：“哎，算了算了，是朕糊涂。”

嘉庆虽然走了，但董氏从此对嘉庆非常不放心，心中更加思念丈夫，后悔来到这个地方。时间长了，董氏发现嘉庆并不是一个凶狠的暴君，倒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于是便央求嘉庆让自己见丈夫一面。

嘉庆安慰她说：“一年后，朕会派人送你回家乡，你丈夫现在正忙，只怕没有时间见你。”

嘉庆又问她：“你见过西湖吗？”

董氏微嗔：“奴家就在西湖不远处，如何不见？”

嘉庆怕她闲得无聊，就让她造一个西湖十景模型。还别说，这一忙起来，董氏也没那么烦了。嘉庆经常跑到她身边，做她的助手。时间长了，嘉庆有时把持不住，便搂着董氏求她成全，董氏非常为难，哭着求嘉庆不要这样。没办法，嘉庆只能放手，他不可能强奸对方。

一天，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宫中一个叫珍儿的侍女拉着董氏去湖中采莲。到达湖心后，珍儿拉着董氏的手，小声说道：“这几天看你神不守舍的样子，一定是在想丈夫了。昨天我办事路过你丈夫工作的地方，把你的事情告诉他，他给了我一样东西，让我带给你。”

说完，珍儿就把物品拿了出来，董氏展开一看，是一幅山水画。画中有一双燕子在空中飞，燕子下方正是雷峰塔和西湖，旁边有四个字：比翼双飞。董氏含泪地握着珍儿的手，说道：“谢谢你了。”

珍儿动情地说：“别谢我了，我们都是苦命人，能看到你们幸福，我就心满意足了，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董氏掏出纸笔，写了一封信，让珍儿带给丈夫，还采摘了两个莲蓬，让她交给丈夫。珍儿好奇地问：“你为什么不多摘些莲蓬给他吃呢？”

董氏低声说：“两个莲子代表心连心，一来告诉他我没忘记他，二来也让他知道我在青莲岛上。”

珍儿笑道：“你真是个有心人。”

那边赵玉麟，自从来到避暑山庄就没日没夜地工作，只想早点完成任务，拿到报酬，然后跟妻子一起回家。只是他不知道妻子现在在什么地方，曾经多次向太监打听，这些太监个个都不理他。赵玉麟工作得很不安心，直到收到珍儿送来的莲子和书信，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董氏在信中说嘉庆非常多情，但是自己这十个月来并未失节，后来她求嘉庆，嘉庆准许一年后让她回家。妻子的信证实了赵玉麟的怀疑，得知妻子坚守贞节，一年后就能回家团圆，赵玉麟更加卖力工作

了。

董氏虽然一再拒绝嘉庆，但她知道，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如果嘉庆执意要占有自己，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虽然她可以以死明志，但毕竟也会失去贞节，搞不好还会遗祸丈夫。

果然，嘉庆最后变得越来越疯狂，仿佛不得到董氏他连帝国都可以放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征兆。董氏最终还是没能坚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她终究没有勇气 and 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对抗到底。嘉庆得逞后，自然高兴，董氏却痛不欲生，她陷入了灵与肉的矛盾中。

董氏知道皇帝从来都好色，今天宠幸这个，明天宠幸那个，如果皇帝能对自己一心一意，还可以豁出去跟了他。现在既不能跟皇上，又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她觉得人生痛苦莫过于此。

一年之期到了后，嘉庆召赵玉麟进宫，把他狠狠地夸奖了一番，你干事真卖力，工作也不错，特赏赐一千两银子，并赐珍儿做你的妻子。好了，话说完了，立即动身吧！

嘉庆的话对赵玉麟犹如晴天霹雳，他惊呼：“我的妻子董氏人在哪里？”

嘉庆手一摆，侍卫就将他和珍儿轰了出去。

赵玉麟和珍儿境况凄惨，来到一家旅馆，不久，赵玉麟就病倒了。幸亏珍儿在一旁尽心服侍，赵玉麟的病慢慢好了起来。

赵玉麟病愈后，流着泪对珍儿说：“珍儿，你真好，这段日子多亏了你，不然我早死了。我无以为报，只有这一千两银子，其中五百两给你，我要进宫救出我的妻子。”

珍儿听了，眼泪齐刷刷地流着，终于开口道：“有件事我一直没敢告诉你，董姐她早已不在人世了。”

赵玉麟一听，脑袋轰隆作响：“她怎么了？”

珍儿：“她死了有好几个月了。她给你写了那封信后，皇上天天缠着她。七月七日那天，她哭着跟我说今天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我和玉麟却没有相会的日子，姐姐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带着玉麟逃出去，以后好好照顾他，姐姐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听了这些话，赵玉麟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报仇雪恨，珍儿也支持他，两人想方设法找机会接近嘉庆。可是宫墙高深，侍卫重重，赵玉麟想报仇谈何容易。眼看愿望要落空，也只能借酒浇愁。一天，就在赵玉麟在酒肆里喝酒时，忽然传来一个烂醉如泥的声音：“来人啊，送爷回客店。”

这人是蒙古王爷，没人敢惹他，所以无人敢上前。赵玉麟听说这人是蒙古王爷，灵机一动，上前扶他，把这个王爷送进客店，还为他泡茶洗脚，并守了一夜。蒙古王爷醒了以后，非常感动，就把赵玉麟留在身边，盛情招待。赵玉麟从他口中得知，他来京城是为了陪嘉庆到木兰围场秋狝。

秋狝时，蒙古王爷带上了赵玉麟，由于平日沉溺于酒色，骑射技术一塌糊涂。而赵玉麟自幼习练过骑射，射箭百发百中，蒙古王爷非常高兴，心想这下有人代替自己了，不用在嘉庆面前丢脸了。

秋狝之前，嘉庆召集大家先练练箭术，这天，蒙古王爷和赵玉麟互换了服装。嘉庆点名让大家射箭时，赵玉麟百发百中，迎来一片赞扬声。

接着，赵玉麟策马在校场上奔驰，跑了两圈后，拉弓射向嘉庆。嘉庆冷不防，眼看就要命毙于此。这时，一个侍卫冲上来推开嘉庆，那支箭擦伤了嘉庆的耳朵。

赵玉麟一看没射中，立即策马逃跑。等到侍卫们追上去的时候，赵玉麟已经跑得不见踪影。赵玉麟下落不明，据说有人看到他和珍儿往北方驰去。

这个故事正史没有任何记载，只能当做野史奇谈来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编这个故事的人一定对嘉庆很了解。

第九章 嘉庆猝死之谜

皇上在重病之中，热河上空雷声隆隆，电光交错，让整个热河行宫笼罩在一片恐怖而神秘的气氛中。大家似乎都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这一次皇上应该是凶多吉少了。嘉庆的面色在电光之下显得更加苍白，一片死气，嘉庆知道自己逃不过这个鬼门关，无力地招手。大家知道，他是想安排后事。

难得奢侈一次

嘉庆之死又是清廷的一桩悬案，用暴毙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从发病到死亡前后只有一天。嘉庆死后，各种流言纷纷而起，有人说嘉庆是痰塞气管窒息而死，也有人说嘉庆是跟太监厮混的时候被雷电劈死……

嘉庆到底是死于何因？还是让我们从他六十大寿说起吧！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是嘉庆的六十大寿，也就是古人所谓的甲子之年。经过二十多年的辛苦，帝国终于安定下来，各方面也正在恢复。想到自己马上六十大寿，嘉庆决定得好好庆祝一下，这一次不能再节俭了。

不过，嘉庆仍然非常担心奢靡之风卷土重来，为了避免内外大臣以祝寿为理由层层搜刮，嘉庆提前一年跟他们打招呼：“来年就是朕六十华诞……只是现在吏治不纯，民风未正，朕心怀愧疚。况且朕天性崇尚节俭，来年仍不举行烦琐的庆典仪式。通知各省，所有的金玉器物一概不准进呈……”

尽管嘉庆希望在最大限度内保持节俭，但对于这甲子寿诞还是相当重视的，六十岁相当于一个甲子周年，所以嘉庆在诏书中暗示：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即使不能办得过于奢侈，至少也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嘉庆还打算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皇恩也是相当浩荡的。

嘉庆会做什么好事呢？父亲乾隆就是榜样，乾隆六十大寿时曾普免全国地丁银两，至今老百姓仍记忆犹新。嘉庆当然也希望像皇考一样出手大方，让天下百姓称颂。但是，乾隆当时正值盛世之巅，国家富有昌盛，乾隆有这个本钱也有这个底气普免天下钱粮。但是以嘉庆

治下的国力和财力，显然无法做到这点。

做不到普免钱粮，嘉庆退一步，宣布免去天下历年的欠粮，合计起来也有两千多万两银子、四百多万石粮食。那些没有亏欠的省份岂不觉得有些冤枉？嘉庆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四川和贵州两省没有积欠，特免除这两省第二年税收的十分之二。

从嘉庆的所作所为看，他非常希望给后人留下明君的形象。普免积欠，是一件让老百姓感恩戴德的好事，让很多人摆脱了困境。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初六，正是嘉庆的六十大寿。虽然嘉庆事前不让宫中举行盛大烦琐的典礼，但是在乾清宫举行的家宴却也是相当的豪华，这是嘉庆难得的一次摆阔，我们就体谅他吧！当时，皇家的皇子皇孙、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外藩使臣齐聚一堂，其乐融融，气氛非常热闹。

嘉庆难掩喜悦之情，加上身体本来就好，他对自己的健康显得特别有自信。宴会中，他还幻想着自己七旬、八旬甚至九旬大寿如何操办。比如，在六旬庆典前，嘉庆就下令不许修建经坛。但由于文武百官再三请求，嘉庆最后还是允准了，从圆明园到西直门之间设立了十三座经坛，引来了无数人观看，车水马龙，差点导致了交通堵塞。对此，嘉庆很不满，他告诉军机大臣：“将来朕七旬大寿时，不准再设立经坛，以此杜绝繁文缛节和扰民之事。”

可见，当时嘉庆认为自己活到七十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再者，嘉庆在颁布普免欠粮的上谕中说：“这次普免欠粮，本来是额外之恩，如果小民们希望在七旬、八旬、九旬也有这样的事就错了，并不是每十年就会免除一次。所以，在缴纳钱粮的时候必须踊跃，各级地方官员切勿借此暗示百姓拖欠钱粮。”

嘉庆说的七旬、八旬、九旬并不是说自己一定会活到那份上，但由此也可以相信他对自己身体的自信，相信自己是可以像皇考那样长寿的。然而，现实跟人的主观愿望往往有巨大的差距，寿典之后不到一年，嘉庆就在热河行宫猝然驾崩。

嘉庆暴死之谜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带着众人前往木兰围场秋狝。

整个过程可以分为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热河避暑、处理政务，

这个阶段占整个过程的三分之二；第二个阶段便是在秋凉之后，前往木兰围猎，围猎一方面是弘扬满族尚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会见蒙古王公，处理好和周边民族的关系。

七月十八日早上，嘉庆从圆明园起驾。随行的包括嘉庆年轻的妃嫔，皇后钮祜禄氏已经年老色衰，前往热河不方便带着她，便让她留守中宫。随行的还有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此外，还有皇次子、皇四子和皇长孙。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启程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将是嘉庆皇帝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当天，嘉庆抵达顺义县西北的石槽行宫，二十日到达密云县行宫。

在密云县的时候，直隶总督方受畴为了拍马屁，向嘉庆报告了一个祥瑞。他给嘉庆呈上了双穗乃至十一穗的稻谷，说这是个好兆头，此去秋狩皇上一定会满载而归。可惜嘉庆对祥瑞从来不感冒，把方受畴奚落了一番，方受畴便灰头土脸地回去了。

二十三日，嘉庆到达了喀喇河屯行宫，这天，嘉庆就感到有些不舒服。出了古北口后，塞外的凉意扑面而来，加上昼夜温差变大，嘉庆的身体不适更明显，不过他对此并没有在意。二十四日是嘉庆前往热河行宫的最后一天，整个路上，嘉庆都是坐在轿子里，其他人都是骑马。

嘉庆似乎有些疲惫，在轿子里经常打瞌睡。行至广仁岭的时候，忽然一股清新的空气流入轿中，嘉庆顿觉精神清爽了许多。他下令停轿，出来一看，发现周围山峦叠翠、树木葱郁、峡谷幽深，好一派自然的神韵。嘉庆感觉精神好多了，便让人备马，说：“这条路是皇祖康熙爷开辟的，朕要策马走过广仁岭。”

未来的皇帝绵宁劝他说：“父皇年高，还是坐轿子吧！”身边的太监也劝说：“皇帝还是坐轿子好。”

这些太监常年跟在嘉庆身边，太了解他的身体状况了，嘉庆虽然看上去没什么大病，身体还不错。晚年的嘉庆，身体肥胖而松弛，用现在的话说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太监深知，骑马这种剧烈的活动，嘉庆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

嘉庆跟清朝的其他皇帝一样，不服老，别人越是这样说，他越不信邪。于是，一意孤行，纵马奔驰。就这样，嘉庆一直骑马到热河行宫，到了热河后，嘉庆出了不少汗，但是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舒服。

当天晚上，吃过晚饭后，嘉庆就感觉不是很舒服。他仍然没有在意，可是躺下来之后就非常难受了，手脚有刺痛的感觉，四肢乏力，

胸口闷。

嘉庆迟迟不能睡着，到了下半夜，痰气上涌，他备受煎熬，神智有些模糊了，处于似睡非睡的状态。嘉庆知道自己可能是受了风寒，便让太监去给自己熬一些姜汤，喝完姜汤之后，嘉庆仍然觉得寒冷。身体虽寒冷，头脑却有些发热，思绪非常乱，嘉庆一辈子做得最利索得意的事情是大丧期间诛杀和珅，可是后来他却很痛苦很烦恼，虽然尽力把事情做好，但是帝国的问题千头万绪，总不能做得完美，只能勉强强撑，过意得去。

七月二十五日清晨，嘉庆在昏昏沉沉中醒过来，此时的嘉庆显得非常苍老，脸皮松弛。他觉得非常虚弱，呼吸也很困难。尽管如此，嘉庆仍然要坚持下床。上午，嘉庆病情加重，说话越来越困难，但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所以他坚持处理政事，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颁布了一道人事任命。

下午，嘉庆的病情更加严重，痰气已经严重堵塞气管，说话非常困难了。身边的人急得直跳脚，却毫无办法，连御医都束手无策。绵宁和其他大臣只能在佛堂里祷告，祈求上天的保佑。可惜，嘉庆命寿已尽，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死神夺走生命。

就在嘉庆处于弥留之际时，热河上空电闪雷鸣，仿佛连老天也对人间这一幕变故感到震惊。当时那个情景真够吓人，当地的百姓好久没见到这么恐怖的情景，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百姓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

皇上在重病之中，热河上空雷声隆隆，电光交错，让整个热河行宫笼罩在一片恐怖而神秘的气氛中。大家似乎都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这一次皇上应该是凶多吉少了。嘉庆的面色在电光之下显得更加苍白，一片死气，嘉庆知道自己逃不过这个鬼门关，无力地招手。大家知道，他是想安排后事。

嘉庆艰难地对皇子绵宁和身边大臣们说：“密匣……”

嘉庆的声音虽然很微弱，大家还是能听出来，大臣们竖着耳朵等待嘉庆说出密匣藏在什么地方，绵宁的神情更是焦急。可惜，后面的话已经气若游丝，只看到嘉庆的嘴唇在嚅嚅，没人听出他在说什么。接着，嘉庆就缓缓闭上眼睛，再一试探鼻息，已经没了呼吸。

众人齐刷刷地跪下，哭号震天，行宫里到处喊着“皇上驾崩了”。

嘉庆暴死时绵宁已经三十八岁，对政事也有了足够的历练。当时虽然没有找到密诏，但皇后钮祜禄氏顾全大局，没有偏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果断地支持绵宁当皇帝，是为道光帝。因为钮祜禄

氏的谦让和明智，一场潜在的危机无声无息地化解掉，这是大清朝的福气。然而嘉庆留给道光一个烂摊子，道光能胜任吗？能将帝国从倾颓中挽救过来吗？

第十章 江山如画，风雨如晦

道光最信任的两个宰相，一个是曹振镛，一个是穆彰阿。曹振镛是典型的张廷玉派弟子，他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多磕头少说话”的理论，虽然曹振镛的官场哲学跟张廷玉类似，但是能力远远比不上张廷玉。曹振镛这个人最害怕自己提拔的人超过自己，所以有意识地提拔一些才具平庸的人，这样这些人就威胁不到自己的地位。而穆彰阿是个大贪官，他与曹振镛联手将道光蒙在鼓里。道光居然让这两人把持朝政，由此可见他说得虽好听，但一到实际问题上就是睁眼瞎。

不错的小伙

历史学家对清朝的衰败有这样一个评价：始于乾隆，嘉庆在中间起了一个缓冲作用，到道光手中衰败开始发扬光大，以后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烂了。

如果我们认为道光是一个不务正业、荒淫无耻的皇帝，那我们还真错了。道光这个人跟他老爸嘉庆一样，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为什么他越努力国家越衰败呢？主要原因固然跟世界大势走向有关，但也有道光自身的原因。道光虽然很勤奋，但是他的才能真的很一般，别说跟他的祖宗康熙雍正比，就是连他的老爸嘉庆也比不上。

道光最大的一个缺点是不会用人，他的曾祖父雍正曾说：“国家大事用人是根本，其他都是枝叶。”然而，道光在用人方面别说跟雍正比，就是跟父亲嘉庆相比也相差千里。道光用人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这将在后面提到。

肯定有人就好奇了，道光才具如此平庸，他怎么会当上皇帝呢？

如果说不把道光看成是一个皇帝，而是一个普通人、正常人，那么道光还是一个不错的小伙。道光刚出生时就引起了乾隆的注意，这至少说明他刚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健康的小孩，长得肯定也不差。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有一件事让乾隆印象非常深刻。

一天，乾隆带着大队人马到木兰围猎，途中发现了一只鹿，乾隆意兴风发，弯弓拉箭，可惜没射中。再射一箭，还是没中。乾隆一看，厚着脸皮说：“大家看到没有，朕刚才的射法是射不中的，朕故

意这样射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能按照这种射法，现在把这个机会交给皇子皇孙们，射中了有赏。”

皇子们都是成年人，谁敢表现得比老爹箭术高明？但是皇孙们年纪还小，心地单纯，纷纷使出浑身本领。可惜没有一个人射中，直到我们的主人公道光皇帝出场，那时候他还叫绵宁。道光当时只有八岁，连射了四箭，中了三箭。

看到小孙子这么英武，乾隆非常高兴，赏给他一个黄马褂，把小孙子抱起来，亲昵非常。有人认为，在乾隆生前就已经确定了道光为嘉庆的继承人，这个说法有待考证，不过道光深得乾隆喜欢却是不争的事实。

梦想做一个好皇帝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清朝第八位皇帝道光登基。

新皇登基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谁也不知道等待道光的是什么，明眼人都知道清帝国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大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道光自己的手心里也捏着一把汗。

道光不幸之处在于，他不仅要对付国内的不安分力量，还要应付正处于扩张期的西方势力。他的父亲嘉庆撵走了英国使者，这个苦果却要让他来背，这多少有些不公平。道光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他的父亲嘉庆还多多少少了解一些。

道光刚登基的时候，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他效仿父亲嘉庆，下令停止一切贡品。新皇帝登基，下面文武百官自然忙着给皇帝搜刮礼品，这样一来势必导致贪污腐败成风。跟嘉庆一样，道光也知道下面官员很腐败，他也想遏制腐败，非常渴望成为汉高祖、唐太宗那样的明君。

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一幕，皇帝非常勤政，常常通宵达旦地批改奏章，对于政务事无巨细都要询问。这些并不是虚构，而是真实的，道光也不是在作秀，而是真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成为名垂千古的圣君。

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这一点道光并没有错。

素服期间，道光让各部门不要耽搁了政事，尽快把奏折送上来。他希望你以身作则，改变日益不张的吏治。

关于道光的执政水平，我们不妨看看晚清作家李伯元在《南亭笔

记》中的一个记载，李伯元虽然是用小说的方式讽刺道光，但多少说明道光在执政上面的糊涂，翻译下来便是：

道光在御极殿召见某个亲信的官员，当时正是夏天，道光略有疲惫之意，便问该官员有没有什么消遣疲倦的法子。官员说：“臣觉得读书最适合消遣解闷。”道光说：“读书固然好，但是也要有新奇的书啊。内务府的书我都读遍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书？”官员说：“好书很多，譬如《金瓶梅》《红楼梦》《肉蒲团》《品花宝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道光听了以后双眼茫然，让人记下了这些书。第二天，道光到军机处见潘文恭，笑问：“听说爱卿家里藏书颇多，一定有《金瓶梅》《肉蒲团》等书吧？”潘文恭听了大惊失色，跪地叩头。道光说：“我只不过是向卿借书而已，你何至于此啊！”潘文恭这才说道：“这些书都是淫书，臣家里可不敢藏，不知道皇上是从哪里听到这些书的？”道光默然，这才下令将那个推荐淫书的官员惩罚。

这个故事无非是说道光孤陋寡闻，委婉地暗示了道光虽然人品还行，但能力不行。

道光也对朝臣说：“为政首在得人，安民必先察吏。”等于是把雍正和历代圣王的话重复一遍，虽然了无新意，至少说明此人并不糊涂。

道光还提出了考核官员好坏的标准。

第一，是否实心奉公。在道光看来，尽心尽力办事的才是好官员，那些夸夸其谈的多半是不合格的官员。所以，道光提倡在官场上要言行一致，不能光说好话不做好事。

第二，要正直，要敢于直言。道光气愤地说，现在官场上欺瞒成风，人人都不说实话，这样下去吏治怎么行得通呢？要敢于说真话，哪怕冒犯皇帝也没关系，千万不要阿谀奉承，千万不要欺上瞒下。许多吹捧道光的官员被道光骂为逢迎之徒，江西学政王宗诚因为江西丰收，称颂这些都是仰赖圣德。道光给了他一个“巴掌”，骂他空谈无理的言论，谄媚不实，以后不可如此。

道光武艺不错，有人夸奖他箭术高超、百步穿杨，简直就是当代的养由基。道光骂他信口雌黄，作无用之谈。看到臣下拍马屁成风，道光知道自己必须效法唐太宗，鼓励官员犯颜直谏，哪怕因此语言显得狂悖都没关系。

第三，要任劳任怨，不避嫌怨，遵纪守法。在道光看来，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官员把自身的利益看得太重，把国家的利益

看得太轻。道光特别指出，各级官员应该把国家的利益作为重中之重，要敢于作为，不怕困难，即使遇到挫折和诽谤也不要退缩，国家是不会辜负正直清廉的官员的。

道光也没有把这些流于口头上，规定了每三年对官员进行一次考核。那些不堪胜任的官员全部淘汰，换上一批能干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道光屡次颁布雍正、嘉庆的谕令，由此可见此人虽然励精图治，但是创造力确实欠缺，治理国家一再照搬过去的东西。

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道光处罚了一批官员。豫亲王裕兴是被处罚的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他强奸了使女寅格，导致后者羞愤自杀。道光获知此事后，革去裕兴的王爵，并软禁三年。庄亲王奕劻和辅国公溥喜等人吸食鸦片，道光予以严惩。镇国公绵顺带着妓女到庙里唱戏，道光认为其卑鄙无耻，对他严加惩罚。这些皇亲贵胄尚且受到惩治，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对于官员的腐败，道光也是深有感触，他忍不住感慨：“多设一官，不过是老百姓多增一害。”

所以说，道光刚上台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我们来看看他刚上台那会儿的政绩吧！

一、实行精兵简政政策，限制衙门里公职人员的数目，裁减冗员。到道光十年（1830年），共裁撤了两万三千九百多名官员。

二、控制捐输，限制督抚属员随意提补。卖官是清朝的一个公开政策，目的是补贴财政收入。但这个政策无疑会公开助长腐败，道光作出了有限度的改革，他并没有杜绝捐输，但是却禁止现任官员加捐衔。

三、加强宗人府的管理。宗人府是管理皇家事务的机构，道光有感于宗室子弟日益腐败，着意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提升皇家子弟的素质。道光四年（1824年），宗人府还将一些皇室子弟送到边疆地区锻炼，一方面是减少他们对社会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些通过艰苦的生活锻炼出良好的身心素质。

四、限定案件的审理期限。办案拖沓是官场的一个通病，很多案子由于长期积压，导致许多人屈死狱中。最高领导人道光认为这种情况会导致许多家庭家破人亡，增加他们对社会的憎恨，如果不能有效处理，对大清国是很不利的。所以他限定了案件的审理期限，京城的衙门必须一个月内结案，州县的衙门时间更短，二十天就必须结案。上司的批复在一个月内必须申报，刑部审核的话，要根据不同案情分别在十天、二十天、三十天内结案。对死罪案件的定决，从报上来到

判定要在七十天内完成，监候限八十天。

相信不会有人怀疑道光是一个上进的人，是的，对于人才道光求贤若渴，用曹操的话来说就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求贤若渴

史载道光虽然不善于用人，但是对用人的重要性还是高度重视的。

道光曾明确表态：“国家以贤才为宝。”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发现人才、提拔人才还是比较困难的。如何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这是道光最为关心的事，但是道光也没有很好的机制能够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只能一再发出求贤诏书。

道光主要通过哪些手段选拔人才呢？

第一种方式还是老办法——科举正途。科举制度虽然会造就一大批迂腐的读书人，也就是今天说的高分低能，但是也能选拔出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这在历朝历代都有。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无疑还是坚持着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第二种方式是推荐。这也是清朝的一个传统，地方督抚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保荐官员。保荐官员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官员确实能干贤明，另一种情况是该官员可能平庸，甚至品性恶劣。一般情况下，如果被保荐的官员平庸无能，道光不会追究保荐人的责任，因为这与保荐人的眼光有关。如果被保荐的官员人品存在很大问题，撤职后依然做违法的勾当，那么就要追究保荐人的责任。正所谓外举不避嫌，内举不避亲，既要鼓励保荐人的积极性，又要杜绝保荐人徇私舞弊的做法。

保荐确实可以让国家选拔出一些优秀的人才，譬如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就是通过保荐升职的。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进士，道光二年（1822年），当上淮海道，后署理浙江盐政史，不久又升迁为江苏按察使。道光四年（1824年），升署理江苏布政使，道光十一年（1831年），升任东河河道总督。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江苏巡抚。林则徐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能在官场上飙升离不开道光的政策支持。林则徐也没有辜负道光的期望，确实为国家尽心尽力，办了不少好事。

在治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光对人才是何等的饥渴，所以他能够做到不拘一格，越级提拔人才。杨发和田大武本来只不过是普通士兵，在平定张格尔的叛乱中侥幸生擒了贼首张格尔，道光非常高兴，提拔杨发为甘肃宁远堡守备、田大武为陕西抚标左营守备。道光甚至亲自接见这两人，当面夸奖这两人年富力壮，是可造之材。

道光选拔人才的第三个办法是考核政绩。作为一个皇帝不可能事必躬亲，也不可能对帝国的官员都了解，只能根据一些政绩的数据来判断。虽然政绩可以作假，但不能不承认这这也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

道光选拔人才的第四个办法是从源头抓起。所谓人才一般都是读书人，所以学院的教育要抓紧，因为这直接关乎人才的素质。道光这个办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投资教育，投资教育不能是一句空话。道光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拨款给一些知名的学院，甚至将良田大宅让给书院。这是实实在在的支持，虽然未必会有多大的效果，投资力度也不大，但可见道光对人才的那一颗虔诚向往之心。

道光所用的这些办法只不过是对历代圣王选人用人的总结，并没有多少创造性，但能真心实意地去做，已经很难得了。

从道光的言行上看，他简直是清朝的周公啊，为何世人又评价他用人一塌糊涂呢？换句话说，为什么道光就这么跟人才无缘呢？难道他不够真诚吗？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

首先，我们必须得说，当时的官僚机构确实太腐败了。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即便是皇帝，在这个庞大的集团面前也显得相对无力。当既得利益群体把持了权力之后，他们能允许道光提拔一些干练果敢的人才来损害自己的利益吗？显然是不能的。而且道光如果真想提拔出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人，势必会损害这些集团的利益。这是客观原因，怨不得道光，以道光的能力不可能有雍正的魄力。

其次，各地举荐的人才大多是庸才，因为很多官员本身就是庸才，他们能举荐出比自己能力还强的人吗？如果真有这种魄力，他们也就不是庸才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一般人只会提拔能力低于自己、能受自己控制的人。然而，这对于道光治国却极为不利，得不到人才，他的所有改革都会成空，功比汉高祖、唐太宗的梦想只能是梦想。

再次，道光想通过科举的方式选拔人才，这是正常的诉求。但是当时科场腐败深入骨髓，从科场中选拔出来的精英寥寥无几，若不整肃科场，如何能够选拔出优秀的人才？道光看问题做事情不够全面深

刻，没有想到帝国的问题盘根错节，如果没有破釜沉舟的胆识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最后，道光虽然求贤若渴，但往往是说得多，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给力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例来说明。

道光最信任的两个宰相，一个是曹振镛，一个是穆彰阿。曹振镛是典型的张廷玉派弟子，他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多磕头少说话”的理论，虽然曹振镛的官场哲学跟张廷玉类似，但是能力远远比不上张廷玉。曹振镛这个人最害怕自己提拔的人超过自己，所以有意识地提拔一些才具平庸的人，这样这些人就威胁不到自己的地位。而穆彰阿是个大贪官，他与曹振镛联手将道光蒙在鼓里。道光居然让这两人把持朝政，由此可见他说得虽好听，但一到实际问题就是睁眼睛。

我们不能认为道光就此表现出来的姿态全是作秀，他应该是真诚的，只是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太缺乏手腕和力量了。用现在的话说，心是好的，只是把事情办砸了。

遍地都是贪官酷吏

道光一心想整顿吏治，可是事与愿违，腐败似乎是大清国的痼疾，就是把古代的三皇五帝和后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全部叫过来，似乎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官僚集团的腐败和残酷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贪官多的地方，酷吏也多。

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广东番禺县出现了一个新鲜的玩意儿。这种东西由来已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只是从未记入史册，所以对道光来说非常新鲜。可是一点都不好玩儿，引起了道光很强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番禺县居然私设班房监狱。这是什么概念啊，等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设置一个私人监狱，凡是自己看不惯的都可以抓进来，而且私设的监狱不受国法限制，官员只要能瞒得了上面，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隐蔽角落的小暴君。不用想象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班房里，虐待犯人肯定是家常便饭。

番禺县衙门附近布满了这种班房，顺德衙门东面的“知遇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凡是被虐待得快死的人，都丢到这里等死。像这样的私设监狱在许多县里都有，进了班房比进正规监狱下场更惨。许多

班房把人关押在囚笼里，连腿都站不直，活生生连猪狗都不如。

班房里的差役更是以虐待犯人为乐，要想逃避被虐待，必须支付大量的赎罪钱。合法伤害权被差役们玩得如鱼得水，这些差役似乎个个都有折磨人的天赋，他们想出的酷刑花样百出，往往让犯人们叫苦不迭。但凡有钱的人，谁都会选择破财消灾，没钱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了。

这些酷吏为了敛财，甚至故意捏造案情逮捕当地的有钱人，人都是傻子，知道被这帮流氓盯上了，只能拿钱赎人。没钱的人，或者不肯出钱的人，往往会被这些流氓打死。这些穿着公务员服装的地头蛇在乡里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百姓深受其害，却拿他们毫无办法。

四川仁寿县县令恒泰收人贿赂以后，将强奸改为通奸，还将无辜平民定为江洋大盗，虐待致死。有的犯人被带到公堂上，恒泰什么也不问，居然先下令给犯人打两三千小板，结果很多犯人还没有接受审问就被杖毙。草菅人命在各个地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办事习惯。

道光虽然精兵简政，裁减冗员，其实也是一项虚政。道光确实裁减了不少冗员，但是他裁减的只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官员，换句话说就是朝廷命官，然而背后大概有十倍的白员。所谓白员就是没有经过政府授权，却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官员。这个庞大的冗员队伍俨然帝国长出来的肿瘤，不割去帝国是不可能起死回生的。

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月十八日，查出湖南宝庆府邵阳县在监狱之外私设了三个班房，分别为外班房、自新房和中公所。在这三个班房里每年“病死”的人不计其数，成为当地百姓眼中的公害。

道光明确下令禁止动用一切非法私刑，禁止虐待犯人，并且痛斥各地县吏如狼似虎，伤天害理。道光的禁令或许能起到一时的作用，但肯定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

到了道光时期，清朝的吏治灾害已经形同蝗灾，铺天盖地，无人能治，无人能医。到最后，道光也只能像嘉庆那样仰天长叹，发出“顺其自然”的感慨。

不是道光不想管，而是真的管不了。

第十一章 遗诏引发政府改组风波

还有一次，早朝结束后，道光把曹振鏞留下来，曹振鏞以为有什么大事，没想到道光问他鸡蛋多少钱一个。曹振鏞是何等精明的人，立刻明白了道光一定是对御膳房起了疑心，想知道御膳房有没有揩油。曹振鏞便捂着肚子说：“不知道，老臣这几天胃口不好，从不吃鸡蛋。”堂堂宰相，曹振鏞连御膳房的人都不得罪，由此可见此人为官之圆滑。

这事得从乾隆出生说起

在《风流天子》中我们讲到了乾隆的身世之谜，这是清宫的重要疑案之一。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乾隆的声誉，也关系到皇位继承的合法性。

道光在宝座上屁股还没坐热，这个问题就被提了出来，最终引发了一场政坛地震。

嘉庆死后，道光让军机大臣代拟嘉庆遗诏，由于嘉庆在避暑山庄崩逝，遗诏中不可能不提到避暑山庄。恰好，避暑山庄跟乾隆特别有渊源，很多人包括嘉庆都认为乾隆出生于避暑山庄。于是，我们从遗诏中看到了这样的话：“况避暑山庄为皇考降生之地。”拟诏的人本来是想说避暑山庄为风水圣地，高宗乾隆出生于此，嘉庆也逝世于此，说明此地与大清关系密切。

我们知道，乾隆在《御制诗集》里一再强调自己出生于雍和宫，遗诏中的说法无疑挑起了这个敏感的问题。当然，一般人还发现不了它。

最早指出这个问题的是翰林院编修刘凤诰，不过那时遗诏已经昭告天下。刘凤诰之所以能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曾经编修过《高宗实录》，知道乾隆曾在诗作中三次提到自己出生在雍和宫。当时，刘凤诰把这个上报给嘉庆，嘉庆感到意外，因为嘉庆一直以为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既然皇考自己这么说，那就定为雍和宫吧，嘉庆对此事并未重视，在一向务实的嘉庆眼里，这不过是细枝末节。

《高宗实录》虽然采纳了乾隆出生于雍和宫的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并没有广泛流传。《高宗实录》不过抄录了五份，分别保存在紫禁

城、圆明园和沈阳故宫等地方。别说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就是军机大臣也无权查看，因为这东西就相当于乾隆的档案。

谁也没有想到，刘凤诰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揪着这个细节不放，他是有目的的，而且背后指使者很可能就是道光。刘凤诰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跟拟定遗诏的军机大臣首领托津有很深的梁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刘凤诰这个人。

刘凤诰官职不过七品，但能在翰林院担任编修已经说明此人是饱学之士。既然是有名的才子，书法和文章都相当出彩，曾经是殿试中的探花，国考能考到全国第三，理应前途无量。不过，这人有个毛病，恃才傲物，派头太大，口无遮拦，又纵饮无度。如果仅仅是生活作风有问题，也不至于惨到做一个翰林编修，嘉庆也曾重用过他，让他担任浙江考区的主考官。可惜，他辜负圣恩，在主考期间作弊，最后嘉庆决定将他流放。

刘凤诰和托津的矛盾就是这时结下的。嘉庆本打算把刘凤诰流放到新疆，托津忽然跳出来，说不行啊，新疆这地方可不像从前那样落后了，经过多年的发展，新疆已经相当繁荣了。如果把刘凤诰流放到那里等于是让他公费旅游，干脆把他流放到黑龙江吧！那地方冰天雪地，野兽横行，适合思想改造啊！

嘉庆一听，托津的话有道理，流放就得有流放的样子，不能让官员到了流放地还能吃喝嫖赌，再说了，新疆的姑娘那么漂亮，把这小子流放到那里岂不是让他享艳福了。

刘凤诰后来了解到背后给自己难堪的人就是托津，恨得咬牙切齿，待在黑龙江四年的时间里，无时无刻不想着将来报这一箭之仇。

如果不是嘉庆仁慈，刘凤诰本来不知要在黑龙江待多久。嘉庆是如何想起召刘凤诰回京的呢？说来也是巧合。

一天，嘉庆闲着没事干，就拿起《高宗实录》翻着看，看到这么一节：一名官员的父亲重病，当时该官员要务在身，不能及时回家探望父亲，最后无缘见父亲最后一面，乾隆对此深为愧疚，在《高宗实录》里接连表达歉意。看完这节，嘉庆深为皇考的仁德感动，因此对父皇起了追思感念之情。嘉庆再翻看《高宗实录》，看到扉页的编者中有刘凤诰的名字，想起刘凤诰正在黑龙江受苦，心里不忍，便把他召了回来。

在嘉庆朝，刘凤诰始终没有找到机会弹劾托津。到了道光朝，这个机会来了。不过，刘凤诰人微言轻，如何才能告倒位高权重的军机大臣托津呢？必须找后台，刘凤诰想到了以前翰林院的头儿曹振鏞，

此人现在地位等同宰相，有他撑腰，一定可以整垮托津。

曹振鏞这个人虽然没有办事能力，但是相当会做官，作为“多磕头少说话”理论的提出者，他肯定是有哲学头脑的。在整个清朝，曹振鏞这个人可能是最会做官的，连鄂尔泰、张廷玉、和珅这样的人都比不上他，和珅即使被人称为“二皇帝”，毕竟最后被整死了。

曹振鏞从乾隆时期就开始做官，一路凯歌，中途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宠冠乾、嘉、道三朝，官龄长达五十三年。直到八十岁时，才因为实在过于老迈而退休。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少见啊，固然平庸，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多少还是有智慧的，至少适应能力特别强，八面玲珑之术炉火纯青。

曹振鏞跟托津的关系也不好，乐得做一个人情，跟道光把这事说明白了。没想到，道光听了大喜。

平庸的皇帝，平庸的宰相

道光高兴什么呢？

道光高兴的是夺权的时候到了，自古新君登基没有不想一展宏图的，而要有所作为，那些位高权重的老臣大多是障碍。道光急需给军机处来一次大换血，把里面都换成自己的亲信。

军机处是清朝权力最大的一个机构，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只是这个部门跟皇帝的关系最密切，最后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政府中最有权力的一个部门。军机处是雍正破天荒的一个发明，它取代了宰相和内阁的功能，同时又能避免侵犯皇权，相当于皇帝手中的一柄权杖。

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宰相后，虽然大权独揽，但害苦了自己。天下那么多事，一个人忙不过来。没办法，最后只好成立内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这样一来，内阁首辅其实就相当于宰相。宰相制度表面上是废除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着，这是因为在行政机构里需要这样一种职能的机构，它不会因为强制被废而消失。

雍正创立的军机处本质是做着内阁的事情，但又不能享有内阁和宰相的权力。雍正将军机处改造成依附于皇帝的机构，而不是依附于国家的机构。打一个通俗的比方，雍正这是把以前服务于国家的丞相变成服务于自己的丞相，也就是说宰相从此以后不可以以国家的利益为第一，而必须以皇帝本人的利益为第一。

所以，我们说雍正创立军机处将中央集权发挥到极致，从此天下就是皇帝一人的天下，以前宰相和内阁还能对皇帝提出反对意见，但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权力和底气了。

道光即位时，军机处首席大臣托津六十六岁，二把手戴均元七十五岁，在道光看来，这些人都太老了，思想很古板，不堪重任。再说了，这些人很可能仗着资历老，阻碍自己的政令。是个正常人就会想到把这班人换掉，换成自己信任的年富力强的班子。何况这些军机大臣才干平平，架子却相当大，总喜欢在新皇帝面前倚老卖老。

道光可是个志向高远的皇帝，他能受得了这帮老骨头指手画脚吗？

但是要把他们撤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人根基深厚，只有抓住切实的把柄才能下手。机会来了，带来这个机会的人正是刘凤诰，由于其中涉及的利益巨大，所以我们真的很难说是刘凤诰的行为激起了道光的灵感，还是道光从一开始就指使刘凤诰这么干。

当刘凤诰上奏弹劾军机大臣托津等人在遗诏中出现的错误时，道光立刻抓住此事，大做文章，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皇考去世之时，朕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让军机大臣代拟遗诏，所以当时未能看出其中的错误。现在出现这么大的错误，不得不承认朕也有责任。朕原本以为军机大臣们任职多年，拟的遗诏不会有任何问题，没想到今朝铸成大错。各位军机大臣，你们说说应该怎么办吧？”

军机大臣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辩解说在嘉庆的诗集中提到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至于《高宗实录》中的记载，他们不知道，《高宗实录》藏在内廷中，他们也没权利看。

这个辩解是无懈可击的，军机大臣们成功地把责任推开。道光不可能再找到更有力的证词驳倒军机大臣，所以他选择了流氓策略，直接说军机大臣误会了嘉庆的意思，完全是在狡辩，推卸责任。然后将托津和戴均元两人从军机处轰出去，其实，起草遗诏的并不是托津和戴均元，但他们身为军机处的领导，道光把过错全推到他们身上，其他人反而没有受罚。道光这么做已经是不加掩饰地打击政敌了。

道光的目的达到了，从此也没有再为难这两人，这两人也以高寿善终——托津活了八十一岁，戴均元活了九十五岁。随后，曹振镛顺利地进入军机处，成为首席军机大臣。

曹振镛很会做人，想必这是他当上首席军机大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下属眼里，曹振镛是一个不摆架子的领导。曹振镛谦逊到什么

地步呢？有一次他遇到一个皇家的人，要进入一道门，两人互相谦让，这个说你先进去，那个说还是大人先进去。结果谦让了很久时间，搞得大家都不能进去。最后有一个下官不耐烦地说：“这是朝廷，不是你的家里。”曹振镛满脸通红，但是仍然笑容可掬，由此可见此人“涵养”之高。

曹振镛这个人虽然八面玲珑，但是操守还是相当不错的，不受贿，学问精深，做事认真仔细。他始终秉承着这样的宗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官场上，曹振镛是个出了名的好好先生，有一次道光给翰林院出了一道题，谁也看不懂，更不知如何作答，道光大骂翰林院不学无术。接着，道光便问曹振镛：“老爱卿懂吗？”曹振镛认真看了看，说道：“不懂。”其实，曹振镛是故意装不懂，不愿得罪翰林院。

还有一次，早朝结束后，道光把曹振镛留下来，曹振镛以为有什么大事，没想到道光问他鸡蛋多少钱一个。曹振镛是何等精明的人，立刻明白了道光一定是对御膳房起了疑心，想知道御膳房有没有揩油。曹振镛便捂着肚子说：“不知道，老臣这几天胃口不好，从不吃鸡蛋。”堂堂宰相，曹振镛连御膳房的人都不得罪，由此可见此人为官之圆滑。

尽管如此，曹振镛这个人还是相当符合道光的胃口的，道光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跟自己一样平庸谨慎的人，这对于道光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默契。

在一代宰相曹振镛的躬行下，官场中“多磕头少说话”的作风愈演愈烈。此后，曹振镛掌管军机处长达十五年，奠定了道光朝的政治风格和做官艺术。所以有人评价说，道光朝的吏治腐败曹振镛是罪魁祸首，这个说法虽然有道理，但很不公平。如果没有道光的欣赏，曹振镛能成为领导百官的首席军机大臣吗？归根结底还是道光的责任，作为皇帝，用谁不用谁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曹振镛一生做官五十多年，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政绩。唯一给后人留下的理论成果是“多磕头少说话”这六个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明哲保身，谁也不要得罪。

曹振镛也是一个很细心很有头脑的人，不过他的聪明更多的还是一种小聪明。道光刚当皇帝的时候，对政务感到焦头烂额，每天的奏折多得批不完。他心烦意乱，真不知道当年雍正是怎么批下来的。

宰相的作用就是为皇帝分忧的，这曹振镛名义上虽不是宰相，但权力比宰相还大。皇上有苦，曹振镛便想出一个计策，对道光说：“当官的喜欢不断上奏折发表看法，一方面是表达忠心，另一方

面也是为了显示工作态度积极。但是皇帝想过没有，这些官上奏折可不需要自己动笔，他们身边多的是师爷，可皇上就苦了，这奏折只能由皇上一人批啊！但皇上也不能禁止他们上奏折，怎么办呢？臣建议这些奏折不必全看，皇上可挑其中的一些细节来做文章，然后给官员以处罚，这样官员们就会以为皇上明察秋毫，不敢欺骗皇上了。官员们如果不敢随便上奏折，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奏折了，皇上，您觉得如何？”

这些话全说进了道光的心坎里，道光便请教曹振鏞什么是细节的错误？曹振鏞说，譬如格式、语法、用典、笔画上的错误等。别说，这个办法还有点管用，道光每逢批奏折批得头晕的时候，便翻开这些奏折，从中挑毛病。这些毛病虽然是小问题，但是道光可以把问题搞大，他说你这个字写错了，怎么回事？一定是工作极不认真，连字都可以写错，足以说明平时玩忽职守。一个错别字的问题就可以让你撤职。

果然，这么一来，天下的官员都以为道光明察秋毫，不是一个容易糊弄的主。然而，道光万万没有想到这么一来，天下的官员将“多磕头少说话”奉为圭臬，尽量少上奏折。如果要上奏折，也要反复检查，确保不会出现语法和错别字这样的疏忽，这样一来，官场形式主义愈演愈烈。

不少官员因为害怕出现错别字得了强迫症，尽管官场好像更严谨，其实更糟糕，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越来越淡。

让我们公正地看曹振鏞这个人吧！这个人肯定不是奸臣，在他当官期间没有做残害忠良贪污腐败的事情，但是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在他的带领和倡导下，官场上平庸圆滑之风越刮越烈。这样的人，如果在太平盛世还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但是道光朝正处于清王朝衰落的关键时刻，这时需要的是像曾国藩、左宗棠那样力挽狂澜的人，而不是四面讨好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

重用曹振鏞是道光在用人上最大的失败，真是什么样的皇帝用什么样的宰相。

第十二章 史上最抠门的皇帝

在节俭方面，道光做到了极致，也终于收到他想要的“效果”。满朝文武上朝之时全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感觉就像是在开丐帮大会。没办法，在道光手下做事，寒碜是必须的。如果道光发现某个官员衣着华丽，立刻会表现出不满的情绪。

今年过节不收礼

跟父亲嘉庆一样，道光也崇尚节俭，不过他似乎做得有些过头了，引来历史学家阵阵嘲笑。

道光的节俭跟嘉庆的节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嘉庆的节俭是一种政治姿态，是一种理政作风，他想搞廉政建设。道光当然也有这种意思，但道光更是把节俭当成一种人生乐趣，这就让人想起了葛朗台。

道光 是乾隆的孙子，乾隆的排场他是见识过的，但是到了他自己手中，做法跟乾隆完全相反。他是能省就省，堂堂皇帝花钱居然跟妇道人家过日子一样，该省的省，不该省的也省。

据说道光之所以如此节俭，还有一些来历。在他做皇子的时候，有一年跟嘉庆去盛京祭祖，晚上住在沈阳故宫里。沈阳故宫非常简陋，跟北京的故宫相差太远。嘉庆心想，这可是一个教育的好机会啊，便把道光叫到清宁宫东暖阁，然后对道光展开了忆苦思甜教育。

嘉庆说：孩子啊，你看到没有，当年祖先们就住在这个地方，来喜，你去把太祖、太宗等人用过的遗物拿过来。

嘉庆指着这些简陋的遗物，开始将大清开国的历史讲给道光听，嘉庆一再强调，祖先创业暴霜露、斩荆棘，才有尺寸之地啊！能有今天的成就，那是付出了多少代人的努力啊！孩子啊，你一定要向你的祖先们学习，学习他们艰苦奋斗、勤俭律己的精神。

道光不像其他皇子，左耳进右耳出，他全记在心里了。

回到京城后，嘉庆的那番话还在道光耳边回响，节俭两个字在道光的心里仿佛变成了一道彩虹，无比的美好，无比的神圣。

在这种类似于宗教般激情的驱使下，道光把心里的感受告诉了老婆，老婆非常赞同。两人一商议，决定把寝宫里所有的物品都搬出去，换成最简陋的，除了床和桌子。不仅如此，他和老婆还决定以后每天晚上都吃烧饼。需要说明的是，宫中是没有烧饼的，必须打发太监去紫禁城外去买，来回路程很远，等烧饼送过来早已变凉变硬了，但是这对夫妻没有任何的怨言，就着热茶能啃完烧饼。之后，立即上床睡觉，据说这样可以节省油灯钱。

这样的一个人当上皇帝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他一定是希望大家跟他一起节俭，谁最节俭谁就是自己最好的臣子。如此治国，只能是本末倒置。

道光当上皇帝后，不久就下达了倡导节俭的《御制声色货利谕》，提出了三个最基本的节俭方针：

一、重义轻利，不要贪财。全国人民一起省，皇帝省，大臣省，百姓省。道光还说：“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怎么能富呢？”皇帝不富，大臣怎么敢富呢？所以，大家一起来节省。

二、各省停止进贡。在嘉庆时期皇帝就下令停止进贡之风，后来臣下改变政策，认为进贡珠宝是奢侈，那么进贡一些土特产总该是合情合理的吧。现在道光说，连土特产也不必进贡了，道光甚至抱怨说，这些土特产本来就不值几个钱，但被大臣们夸得天花乱坠。不管怎么说，都是老百姓的东西，不收礼就能为老百姓节省点儿。而且，这些土特产从地方运到北京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三、以后不增建宫殿楼阁。道光说，皇宫已经相当豪华了，不需要再增加一块砖、一片瓦，以后谁要是提出大兴土木，就是大清的罪人，应该重罚。

尽管道光明表示今年过节不收礼，但是各地的官员却拿不准皇上的真实意思。口是心非实在是皇帝的一个通病，就拿乾隆来说吧，也是表面上不收礼，但如果你真的不送礼，就只能等着穿小鞋了。

官员们集体陷入了困惑之中，到底应不应该送礼呢？从利益来讲，送礼对官员是有好处的，既可以讨好皇帝，又能趁机搜刮。如果不送，表面上可能是遵从圣旨，但说不定道光心里不舒服呢？综合考虑之下，大家一致决定，无视《御制声色货利谕》，坚持送礼。不过说法得改变一下，不能说进贡，得说孝敬，官员们自信把皇帝的心理揣摩得恰到好处。

当全国各地的礼物送进京城后，轮到道光困惑为难了，我不是让他们不要送礼了吗？怎么都不听话，这是公然抗旨啊，理应惩罚。但

是中国从来都有不打送礼人的传统，别人给我送礼，我反而惩罚别人，世人会不会说我这个皇帝不懂礼仪啊？再说了，全国官员都在送礼，难道全部都惩罚吗？

道光想来想去，觉得既不能惩罚他们，也不能收礼。收礼的话会显得自己说话出尔反尔，言不由衷，到时候威信何在呢？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礼物全部退回去。这个办法应该说是不错的，这么一退回去，下次官员们肯定会收敛。可惜，道光的老毛病又犯了。送回去固然可以，但是运费都翻倍啊，道光心疼这钱啊，这本来是可以省下的，无端多花一笔钱道光心里很不舒服。

外省官员和内务府官员纷纷做道光的思想工作，皇上啊，你就收下吧，这是官员们体贴你辛苦理政孝敬你的，他们不忍心看皇上这么辛苦啊，所以才大老远送过来给皇上补补身子。皇上您若是不收下，这不是伤大家的心吗？再说了，这些东西，您不收，我们也得去市场上买啊！

道光撑不住了，只好收下，但换了个说法：赏收。就是说，我不是白白收取他们的东西，我会赏他们一些东西作为补偿。换句话说，把进贡变成了交换，道光有没有赏百官我们不知道，但换一个说法至少有个台阶下。

内务府：省着花

内务府是负责皇家事务的一个机构，内务府大臣相当于皇家的大总管，这个大总管虽然管的是皇家的家务事，但比三公九卿还拉风。皇帝的吃喝拉撒全归他们负责，你想皇帝能不让他们三分吗？

其他部门的官员只敢欺负百姓，内务府的官员连皇上也敢欺负。为啥？因为除了皇帝，没有一个部门有权监督他们，因为这种特殊地位，他们连皇上的吃喝都敢从中克扣。皇帝虽然有权监督内务府，但其实根本拿这帮人没办法。

皇上只有一个人，内务府是一帮人，皇上管不了。如果内务府停止运转，宫廷岂不要瘫痪？哪个皇帝愿随便惹这帮人。再说了，你一个皇帝，如果因为鸡蛋和猪肉的价格跟这些下人争论，拉不下这个脸。而且，真这么做了，下人们肯定从心里瞧不起皇上，说皇上小气，这对皇上的声誉也不好。况且，就算皇帝想跟内务府的人较真，也是很难有胜算的，处于深宫中的皇帝论起社会经验比这些老油条差得远。

所以，皇帝不会傻到随便得罪内务府的人，就算明知道他们吃回扣，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万一跟他们较真，他们往皇帝食物中来点儿三聚氰胺，让皇帝的健康慢慢受损又不明显，皇帝就有苦也说不出了。

内务府买东西往往比一般人贵，理由很简单，皇家购置的东西当然要贵些，这个理由如此冠冕堂皇，说得道光哑口无言。道光觉得让内务府这么搞下去，自己节俭的政策迟早要流产。再加上这次收取贡品内务府也出面请自己收下，道光决定借着这个机会也让内务府瘦瘦身。

道光虽然收下了各省的礼品，但是修改了规定，减少贡品数量和种类，但凡奢侈品一律禁止进贡。道光还强调以后就按这个规定办事，各省不得自作主张。比如，道光规定辽阳每年进贡两百个香水梨，地方官问：皇上家里那么多人，两百个够吃吗？道光说，这个不是用来吃的，上供用，两百个足够了。

道光 and 妃子们亲自过问油盐柴米，然后精打细算，发现每年二十万两银子就足够内务府开支了。道光算的标准是够吃就行，这么一来，内务府立刻紧缩。本来内务府每年至少要四十万两银子才能应付开来，现在缩减一半，大家都得勒紧腰带。

第一个勒紧腰带的是道光自己。道光以身作则，每餐不超过四个菜，衣服破了，让妃子们打上补丁，用的毛笔和砚台都是平常人家买得起的。道光甚至还规定除了皇太后、皇帝和皇后，大家在节日期间不得吃肉。

幸好皇后很贤惠，支持道光的节俭政策。在她的操持下，也把这艰难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所以，道光很重视皇后，以前道光规定自己的生日和皇后的生日是不举行庆典的。现在却破格为皇后举行庆典，皇后生日这天，文武百官送礼祝寿。就在大家坐在宴席上想象会有什么美酒佳肴时，御膳房的人终于露面了，原来是一人一碗打卤面。事后，大臣们心里反而对道光很感激，因为他们听说为了举办这次宴会，道光破天荒让御膳房宰了两头猪。皇后更高兴，她发现道光是如此爱自己，平常一分钱都要节省的道光居然为了给自己祝寿宰了两头肥猪，太感动了。

节俭成政治秀

“成由勤俭破由奢”是唐朝诗人李商隐说的话，道光奉为治国圭

泉。他经常告诫子孙们，祖先们创业是何等艰难，不要以为今天的富贵是理所当然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孩子们，我们所用的一丝一线、我们所吃的一粒米一根面条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换来的。

一个封建帝王能够如此苦口婆心地教导子孙珍惜百姓的劳动成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光奉行的是儒家的圣王之道，他的节俭跟一般守财奴不一样，只能说多少有一些偏执。

在古代，皇帝子女婚嫁是个大事情，排场相当大。但是到了道光这里，不可能再继续讲排场了。他明确规定儿子娶媳妇，一切从简，女方也不能置备豪华的嫁妆。一旦有奢靡之物，立即拿走，还要酌情处分。

公主出嫁，道光规定不能超过两千两银子，驸马送给皇家的聘礼也不能太多。道光甚至免掉驸马给皇家的“九九礼”，这样既可以显得节俭，也免得举办宴席招待驸马家人。道光毕竟是一个精打细算的高手，后来他发现如果免掉“九九礼”，这不等于把女儿白送人家吗？亏本的生意可不能做，于是又恢复了“九九礼”。不过道光可不想破费招待他们，所以让他们象征性地送九只羊，只要把羊赶到内务府就行了。内务府的人跟驸马家的人客套几句，就让他们走人，连打卤面也休想吃到。

在节俭方面，道光做到了极致，也终于收到他想要的“效果”。满朝文武上朝之时全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感觉就像是在开丐帮大会。没办法，在道光手下做事，寒碜是必须的。如果道光发现某个官员衣着华丽，立刻会表现出不满的情绪。

有一个将军请了一个戏班子进家里，宴饮作乐。道光听说这事，立即将这将军革职。

道光有一次检阅禁卫军，发现所有官兵衣着都很朴素，大为高兴，赞扬说：“现在八旗子弟一洗过去恶习，都变得务实严谨了，朕很高兴看到大家这样，将几位主管官员各提拔一级吧！”

把道光的节俭政治推向高潮的是曹振鏞。曹振鏞的性格跟道光非常像，也是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人。曹振鏞家里有一个破驴车，他的厨子除了炒菜还负责替他赶车，他每天都会亲自去菜市场跟小贩讨价还价。曹振鏞深知很多小贩缺斤少两，所以自带了一杆秤，堂堂一国宰相琐碎到这个地步，能治理好国家吗？皇帝也是一样，节俭只能修身，而不能将其变成一种琐碎的嗜好。

道光经常召曹振鏞进宫长谈，不了解的人还以为他们在商量国家

大事，只有道光身边的太监才知道，他们每天讨论最多的还是家常琐事。比如，鸡蛋多少钱一斤啊，白菜涨几毛了。

有一天，曹振鏞进宫后，道光发现他膝盖上有两个补丁，便问打两个补丁花了多少钱。曹振鏞回答说，花了五钱银子。道光一听，跺脚说：“哎呀，怎么我打一个补丁就花了五两银子呢？”曹振鏞说：“皇上衣服的补丁自然做工考究，肯定要比臣的贵啊！”道光暗叫可惜，打个补丁花了五两银子，从此命令后妃们学习补丁之术，硬生生把这笔开支节省下来。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大臣们为了官禄亨通，无不对道光极尽逢迎之能事。其中，最刁滑的莫过于穆彰阿，如果说曹振鏞还只是平庸琐碎的话，穆彰阿已经是奸诈狡猾了。在道光面前，他衣服上的补丁最多，但是背后却贪污受贿挥霍无度。

一天，皇太后钮祜禄氏过生日，道光自己是不搞庆典的，但太后毕竟是太后，不办就对不住皇考了。办要办，但道光舍不得破费，下了一道旨：“当皇帝的，只需国泰民安，就是尽了孝道。皇太后一向以节俭成为大家的模范，如果大典过于铺张的话，反而让她老人家不高兴了。所以，万寿期间，不可过于奢靡，以免违背祖训，让皇太后不高兴。”

圣旨一下，大家都知道，皇上不想花钱。穆彰阿灵机一动，对道光说，皇太后大寿的所有费用不需动用内帑，都由臣子们孝敬吧！道光一听，面露喜色，让穆彰阿好好办理此事。穆彰阿借着这个机会，对各级官员进行敲诈勒索，虽然给道光贡献了不少银子，最大的受惠者还是他本人。光这一次，穆彰阿就捞了上千万两银子。

就在道光满怀成就感地看着满朝文武全身补丁之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北京城的旧衣服店里，破旧衣服的价格在不断上涨，是新衣服的好几倍。破衣服成了抢手货，有些穷官买不起这么贵的破衣服，只好自己想办法把衣服弄破弄脏弄旧。但是，道光把这一切都看成是自己的政绩，认为勤俭节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谓“成由勤俭破由奢”，既然节俭深入人心，那么大清江山就万年不倒了，他这个皇帝能不有一股自豪感吗？

抠门到无语

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像道光这样把内务府当成眼中钉，在道光眼中，内务府是一只硕鼠，专门吞食自己的银子。

正因此，道光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内务府斗法。

野史有这样一个记载，某天，道光忽然想吃“片儿汤”，这是一种由面粉、肉末、鸡蛋、青菜、香葱为原料做成的面条，是一种民间广为流传的食物，但是道光想吃却非常困难。道光先是吩咐御膳房，不料厨师却说不会做。自从缩减内务府开支后，道光把很多人都得罪了，这个厨师就是其中之一。有人或许奇怪，一个厨师而已，怎么敢有这么大脾气。厨师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掌管皇帝的饮食，连皇帝都不敢得罪，脾气大点儿在所难免。

吃不上片儿汤，道光倒也没有怨言。没想到第二天内务府大臣就请求见皇上，说是有相当重要的大事禀告，道光一听这么重要，那就召见吧！内务府大臣所谓的大事就是增设“片儿汤膳房”，道光再看增设膳房的数字，吓了一跳，要一万两银子的开办费。

道光委屈地说，不至于吧，城外的饭馆里片儿汤四十文一碗，让太监去买就是了，用不着花费巨资建片儿汤膳房。内务府大臣没好气地回答：“那就让太监去买吧！”

下午，去买片儿汤的太监空手而归，道光问怎么了。太监说，门外卖片儿汤的饭店不是倒闭了，就是搬走了。这事肯定是内务府大臣搞的鬼，道光也知道，但他没把内务府大臣怎么样，毕竟是自己扫他的兴在先。

如果说生活上的节俭尚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待平定叛乱的功臣如果也一毛不拔，连顿像样的饭都没有，那就太过分了。大学士长龄平定了新疆叛乱，把贼首张格尔押送到北京，照例皇帝是要摆庆功宴招待有功将士的。道光也没有破例，举办了一个庆功宴，参加宴席的包括道光本人在内共有十七人，坐了两桌。

每桌只有几样菜，可以算得上史上最寒碜的庆功宴了。寒碜还是次要的，关键是没人敢先动筷子，因为大家知道，只要有人动筷子，这点儿菜马上就会吃光。吃光了以后对着一桌的空碗碟，那是非常尴尬的。

道光坐在首席，也不动筷子，也不喝酒，而是侃侃而谈，讲前朝的文治武功，说完这些，又说到作诗。有人提议不如大家联诗吧！结果君臣一起，谱写了一首八十句的长诗。庆功宴足足持续了四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居然没一个人动筷子，菜一口没吃宴席就散了。

道光这么做绝不仅仅是弘扬节俭，说明他天性就是相当吝啬，只是作为一个皇帝，后人换个好听的说法：节俭。吝啬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心眼儿小。一个皇帝如果心眼儿小是没法治理好国家的，即

使这个皇帝人品并不差。道光的人品也不差，吝啬也是天性，天性是很难改变的。

在清朝，大臣进京述职，如果皇帝给面子的话，会请大臣吃饭，这叫赐宴。道光也经常赐宴，但是没有一个大臣当真，大家都很了解皇帝。道光赐宴后，大臣有面子的，自己找个馆子好好吃一顿。如果某个大臣真想吃道光一顿饭，这个人在大家眼里就是二百五。

道光甚至在国家大事上也相当抠门，平定新疆后，需要在新疆驻军维护稳定。将军们上奏要派一万八千士兵防守，道光一看，哪需要这么多人，六千人足够了。将军们个个被道光激怒了，说这么点儿人是没法保证新疆稳定的，如果皇上只能留六千人，干脆让西部自治，不设防吧！道光又骂这些人居心叵测，置国防于不顾。

经过几年的争吵，双方终于达成妥协，道光决定各省的绿营兵裁减百分之二。这样每年可以节省三十万两银子，用于支付新疆的防御。在治理国家时，一旦有大臣上奏要拨款，道光不会有任何掩饰，马上面露不悦之色。

有时道光赏赐有功大臣，居然是赏给他们几个鸡蛋，大臣们个个无语。但是在道光自己看来，这已经是格外开恩了，平常道光自己都不舍得吃鸡蛋呢。

节俭误国

尽管道光在节省上绞尽脑汁，大清国的财政问题却越来越多。其实，国库收入并没有减少，但是开支却越来越大了。

一方面，皇室人口膨胀，顺治时才两千人，道光时已有三万多人，这些人本身不会创造价值，而且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全靠财政养着。这么庞大的白吃群体让道光的压力非常大。

另一方面，道光年间物价上涨，因为人口越来越多了，耕地面积不变，人越多人均粮食就越少，价格自然会上涨。这么一来，行政运营成本就增加了。那人们会问，物价上涨，道光怎么不增加赋税呢？说来还是康熙惹的祸，康熙不懂经济，曾经下了一道“永不加赋”的圣旨。这道圣旨害苦了他的子孙们，他们就是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违抗康熙的圣旨。

再说了，就是额定税收也不可能全部收到，每年都有亏欠的省份。不光如此，贪官还将手伸向国库，落入国库的钱自然越来越少。

从乾隆后期开始，各地动乱不断，这些动乱从政治上来说是破坏社会稳定，从经济上来看是增加清廷经济负担。平定一场叛乱，需要花费大量的银子，光是平定白莲教叛乱清廷就花费了两亿两银子。一次叛乱就耗尽清廷家底，你说嘉庆敢不节省吗？道光就算天性不吝啬，也不能不节省。

白莲教起义之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起义就是家常便饭。道光节省倒是的，你得随时准备好一笔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用兵。但节省也要看情况，该省的可以省，不该省的就不能省。解决财政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节衣缩食，而是开源兴利。

道光刚即位的时候，国库只有两千万两银子，这是自三藩叛乱以来清廷财政最困窘的一次。而且这个数字还是账面上的，真实有多少，恐怕道光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治理黄河就要花费上千万两白银，国库中就这么点儿钱，这无疑加重了道光的忧患意识。

道光呕心沥血地推行节俭，然而对帝国的影响微乎其微，官员们只是当着他的面作出节俭的样子而已，私下里仍是挥金如土。道光的节俭甚至不能影响到自己的继任者，咸丰和慈禧都是挥霍奢侈的主儿，尤其是慈禧，可以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光和他的父亲嘉庆都是悲剧皇帝。

林则徐禁烟的时候，曾经逼迫英国商人义律交出鸦片，并答应每箱鸦片按五斤茶叶补偿。当时缴获的鸦片价值八百万两银子，数字报上去后，道光很心疼，不签字。林则徐只好承诺，这些钱由臣子们凑齐，道光这才高兴地签字了。

道光的努力并没有扭转财政状况，反而每况愈下。以至于有大臣发出质问：“为什么乾隆挥金如土，国库却如此充盈；道光锱铢必较，国库却越来越空虚？”蔡东藩评论道光节俭是舍本逐末，以道光的能力治家还可以，治国就远远不够——这个评价是切中肯綮的。

第十三章 平定张格尔

这次闹腾的是一个叫张格尔的人，此人是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的首领，他以圣战的名义发起这场“独立战争”。这本来是一次可以避免的战争，但是因为清朝官员的愚蠢，让事态扩大，最终酿成了一次恶性的叛乱事件。

点起狼烟的张格尔

新疆地处西北，在太平盛世尚且不安稳，一旦王朝衰落，难免会闹出一点事。

这次闹腾的是一个叫张格尔的人，此人是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的首领，他以圣战的名义发起这场“独立战争”。这本来是一次可以避免的战争，但是因为清朝官员的愚蠢，让事态扩大，最终酿成了一次恶性的叛乱事件。

道光刚登基的第三天凌晨，就在睡梦中被太监叫醒：“不好了，皇上，新疆那边来了八百里加紧的急报。”道光一听，连忙从床上爬起，拿起奏折一看，才知道原来张格尔在新疆发动了叛乱。

随后，道光紧急召见军机大臣进宫商量对策，大家都说奏折太简单，现在还无法作出判断，还是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吧！没办法，大家只好慢慢等待消息。

此时，道光刚登基，先皇的丧事还没办完，军机处改组计划尚在酝酿，许多改革措施正在心里发酵。道光也觉得，应该暂时把新疆叛乱搁一边，等情报和奏折足够了再作定夺。

几天后，道光接到奏报，叛乱的头目张格尔是乾隆时期的叛乱头领大和卓木波罗尼都的孙子，属于有来头的人。张格尔叛乱的人数不多，只有几百人，但是胆子却非常大，他们烧毁清军哨所，杀死十几名清军。

收到这个奏折，道光长吁一口气，原来并不是叛乱，只不过是不法分子“闹事”而已。才几百人而已嘛，道光命令清军把这些人全部拿下。刚开始的时候，清军表现不错，轻松将张格尔击败。由于清军急于过中秋节防守疏忽，张格尔趁机带着亲信们逃脱。

张格尔的失败早在道光的预料之中，道光本着穷寇莫追的思想让清军不要追拿张格尔，以免他狗急跳墙。道光原是想息事宁人，没想到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他万万没想到张格尔居然能东山再起，还发起群众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圣战”。

到了道光朝，大清江山本已江河日下，国家财政枯竭、吏治腐败、内忧外患，张格尔叛乱如果发生在康乾盛世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对于千疮百孔的道光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再说了，道光天性吝啬，叛乱本身也许对他来说还不至于太痛心，但让他掏钱等于是他的命。

从一开始，道光就不愿在新疆设置太多的兵力，因为这意味着高昂的军费。新疆的防守相当脆弱，兵力不多，而且当兵的还得自己种田养活自己，能够投入作战的士兵屈指可数。

新疆地处边远，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千头万绪，稍微处理失当就可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理应派一批干练清正的官员坐镇指挥，可惜真实情况刚刚相反。到新疆的官员都是一些素质相对差一点的官员，因为但凡能力出色的官员没人愿意到这么边远寒苦的地方，根据淘汰原则，最后到这里的只能是那些能力和操行相对低下的官员。

这些官员到了新疆后，仗着天高皇帝远，就开始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本来在朝中他们就很失落，好不容易来到了一个没人管的地方，过去的不满和郁闷肯定得发泄发泄。

狼子野心遇上官逼民反

从后来新疆官员们不断隐瞒军情可以看出，对这批官员的任命是极大的失败，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清廷的官员胡作非为，张格尔根本就没有兴风作浪的机会。最后道光也不得不承认：“这十多年来，派往新疆的参赞、办事大臣贪虐残暴，致使民众怨恨日深，从而激起反抗。”

到了道光五年（1825年），官民关系越来越紧张，双方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论理，新疆的办事官员应该感到烦躁不安才是，但他们却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坐视形势不断恶化。

清廷一个官员带着两百骑兵追剿张格尔的时候，没找到张格尔，反而杀掉回民柯勒克孜部落的许多老弱妇孺，以此冒功。张格尔趁机和柯勒克孜的首领结盟，把这两百清军围在一个峡谷里，全部歼灭。

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张格尔对清军正式出手了，他以祭奠祖先的名义，率领五百人，袭击回城。清军前来围剿，反而被击溃。这个消息一传开，在新疆引起了剧烈的反响，许多对政府不满的人蠢蠢欲动。两个月不到，张格尔的叛乱势力已经达到几万人。

不久，张格尔带着大部队围攻喀什噶尔。清军困守孤城七十多天，最后城破人亡，参赞大臣庆祥知道接下来面对的将是张格尔的疯狂报复，干脆自己解决了自己。果然，张格尔的叛军进城后，对清军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不少清军被虐待致死。

喀什噶尔陷落之后，叛军的气焰更加高涨，又先后攻下了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等城。至此，张格尔已经控制了新疆，他志得意满，公然建国称王。

直到此时，道光才意识到新疆问题远远比想象的要严重，遂召集各个重要的部门一起研讨军情，并让各级官员好好检讨一下过去六年在新疆问题上的错误。这种检讨更多的是一种台面功夫，大家都清楚，在新疆将会发生一场大战，必须在全国调兵，合力围歼张格尔的叛军。

为此，需要一个统帅，国家衰落的当头，能干的人似乎也越来越少。经过精挑细选，道光选择了杨遇春，杨遇春是一个沙场老将，在乾隆时期，就是福康安手下一个得力干将。嘉庆年间，杨遇春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立下巨大功劳，深得赏识和信赖。

杨遇春当时是陕甘总督，道光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统领陕甘兵马前去新疆平叛。碰到军国大事，皇帝不可能完全相信一个人，因此，他还任命伊犁将军兼大学士长龄为扬威将军，同赴新疆平乱。长龄是主帅，杨遇春是主将，满汉结合，相得益彰。

到新疆平叛，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补给线太长。为此，必须在中途设置许多中转站，户部尚书经过核算，发现一年的军费至少要一千万两银子。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四千万，听到这个数字，道光吓了一跳。道光对大臣们表示，政府只拿得出四百万两，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大臣们提议从各省征集一些，不过也只能拿到两三百万两，还差钱啊！没办法，道光只好忍痛割爱，表示愿意动用两百万内帑。内务府大臣听到要贡献两百万两银子，很不情愿，对道光说，皇上，你这么一弄，我们以后就得喝西北风了。

道光吝啬归吝啬，但是他知道，如果大清国没有了，就是留再多的钱也没用。所以，还是狠下心来拿出了这笔钱。

道光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大方了呢？也是被逼的，现在不是大方不大方的问题，而是社稷和名誉的问题。自从顺治入主中原，清朝还没有哪个皇帝沦丧国土，道光当然不想做这个千古罪人，两害相权取其轻。

道光对这次出征非常重视，亲自过问细节问题，要求主帅严明军纪，赏罚分明。当然，主要的事情吩咐完了，道光也不忘回到节省层面，要官兵们尽量就地取粮，能节省就节省。“国家有国家的难处，希望大家都能体谅。”道光还告诫官兵们，尽量少买粮食，粮食价格过高就不要买，总之，在最合适的时候买。

此去万里天山路

这年冬天，几万将士出发了，西北的冬天寒冷刺骨，有时要穿越寒冷刺骨的戈壁滩和沙漠。冰天雪地之中，将士们拿着武器，背着沉重的干粮，一步步地走向目的地。这种艰苦是现在人无法想象的，只有那些酷爱户外运动的“驴友”多少能感受一些，当时这些士兵的条件更差。

他们的干粮是一整袋红薯，选择红薯是有特殊考虑的，对于一支远征军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粮食问题。如果带的粮食很多，那是找罪受，一路上会累死。可惜当时没有巧克力棒，否则大家都会带巧克力棒，这样既能补充能量，又不会太重。对清军来说，他们不仅要补充能量，还得补充水，这无疑会加重行军的麻烦。红薯含有充足水分，既解决了粮食问题，又解决了水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不说道光让他们带红薯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这下，士兵们可受苦了，饿了吃红薯，渴了还是吃红薯，整整一个月来全都是红薯。到了目的地后，大家看到红薯就反胃。

道光七年（1827年）二月，各路士兵已经纠集完毕，与张格尔的大战就要开始了。二月二十三日，清军来到洋阿尔巴特，围攻固守高岗之上的叛军。清军炮火非常强势，在几十门大炮的轰击下，叛军逐渐抵挡不住。眼看形势越来越危急，张格尔宣布撤退。清军乘胜追杀，一路狂追三十里，叛军死伤成群。

这一战，清军大获全胜，杀敌一万多人，俘虏三千多人。真实数字估计要打折扣，但无论如何，总之是一场大胜。指挥这场战役的长龄第一时间把喜讯送到京城，道光很是喜悦，立即加封其为太子太保。

二十五日，清军在沙都布尔地区搜剿叛军，这一带到处是水，叛军背水列阵，准备用骑兵作先锋，冲击清军。但是大炮是骑兵的克星，面对清军一轮轮的炮火轰击，叛军骑兵很快败下阵来。清军于是发动进攻，步兵正面攻击，骑兵两翼包抄，再次击溃叛军。据说这一战杀敌四五万人，这个数字当然也不可信。不过，取胜应该是事实。

二十八日，清军与叛军在阿瓦巴特交火。这一次，清军还是采取老战术，用炮火轰击对方的骑兵。不过，这次张格尔学聪明了，不再让骑兵一往无前，而是迂回进攻。这样一来，大炮的威力大打折扣。清军只得换一种打法，既然大炮不管用，干脆让步兵们穿上貌似虎皮的衣服。奇招一出，敌人的骑兵一近前，看到前面一大群“老虎”，马匹受惊，四散而逃。清兵趁对方溃乱之机进攻，大挫敌军。

这一战，上报的数字说歼敌两万多人，还击杀了几个叛军头目。不过，仍让张格尔逃脱了。

二十九日，清军和叛军在浑河两岸对峙。张格尔还有十万的兵力，清军只有两万，虽然兵力悬殊，但清军毕竟训练有素，叛军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长龄和杨遇春知道，这一仗是关系存亡的战役，打赢了意味着大功告成，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

张格尔也明白，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了。

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而是隔着河互相射击，并在夜晚派出小股部队骚扰。就在清军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如何作战之时，天空忽然刮起了沙尘暴，顿时沙尘遮天蔽日，什么也看不见。长龄心想，完了，这下还怎么打仗啊！讨论任何作战计划都没用了。

是啊，按照正常人的理智，啥也看不见了还怎么打仗。将领们都认为还是等沙尘暴过去以后再作决定。就在这时，一个人站了出来，此人便是名将杨遇春。名将就是名将，能看出常人无法发现的战机，杨遇春强烈建议现在就应该发起进攻，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

长龄吃惊地看着杨遇春，如果现在发动进攻的话，士兵们一定会非常诧异，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能够打败敌人吗？如果失败了，谁能承担这个责任？这一步棋太险了，但也确实太有诱惑力。

看到长龄犹豫不决，杨遇春说，如果不进攻，那就赶快撤退，一旦敌人进攻，麻烦就大了。杨遇春认为，在这样的天气下，谁先发动袭击谁就占据了天时。

长龄佩服杨遇春的胆识，胜败在此一举了，该赌的时候就应该放开胆子来赌。

长龄命令一下，清军在漫天风沙之中火速向对岸进军。情况也正如杨遇春所料，张格尔万万没料到清军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搞突然袭击，叛军顿时人心惶惶，来不及作出有力的抵抗就纷纷逃窜。这一战清军击杀叛军六万多人，张格尔的妻子和亲戚等数人被击毙，但张格尔却又成功逃脱了。

捉拿张格尔

张格尔虽然逃脱了，但叛乱基本上平定了。

这一战清军的表现相当出色，简直不像是处于衰老王朝的军队。清军何以表现出这么顽强的战斗力呢？

可以从兵法上找到原因，置之死地而后生一向奉为兵家圭臬，艰苦和极端的条件能激发人的潜能。清军不远万里来到新疆，那是抱着必死的心理，就算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也必须打赢这场仗。

道光为这次战争掏出了不少老本，所以听到张格尔仍在逃，非常生气，责令长龄尽快将贼首缉拿归案。道光破天荒开出十万两银子悬赏张格尔的脑袋，真给张格尔的面子。

在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缉拿一个逃犯如同大海捞针，再说张格尔行踪不定，对新疆又相当熟悉。清军在大草原和戈壁滩上追捕了几个月，也没有发现其踪影。不过，人性是很难改变的，张格尔以叛乱起家，让他就这样认输不可能。逃脱追捕之后，他立即召集人马，养精蓄锐，准备发动新一轮的叛乱。

就在清军以为永远也抓不到张格尔之时，张格尔自己倒带着一支人马过来挑衅清军了。长龄正求之不得，立即和张格尔交战，下令务必要追着张格尔到天涯海角。但张格尔不愧是个枭雄，纵使造反的本领有待提高，逃跑的本领绝对无话可说。

这一次，又让他逃脱了。

长龄着急了，属下有人想出了一个计策，找当地民众充当间谍，与张格尔联系，骗张格尔说大家都盼望着他回来，清军大部队已经撤离喀什噶尔。

张格尔还真上当了，因为春节马上到了，清兵都想着回去过年。于是，张格尔带领骑兵义无反顾地朝喀什噶尔狂奔，就在张格尔以为时来运转的时候，发现前后左右都是清兵。张格尔愣了片刻，很快就反应过来：中计了！

这一天是腊月二十八，离除夕还有一天，张格尔看着漫山遍野的清兵，知道此时自己有两个选择——自尽、成为俘虏，成为俘虏也是死，还要受尽侮辱。张格尔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刀就在手中，只要在脖子上割一下就万事大吉了。但他下不了手，他习惯了对别人下手，对自己下手他还很不适应。

张格尔几次把刀搁在肩膀上，想动手却狠不下心肠，他始终抱有幻想能逃脱，或者道光能饶自己一命。绝望很容易激发人的幻想，但张格尔实在没有时间幻想了。清军已经冲过来，将他按倒在地，捆绑起来。

张格尔想自杀也不可能了，等待他的是什么，他不敢去想，但多少能猜到，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捷报传来，道光露出久违的笑脸。不久，长龄押解张格尔进京城，道光破格犒赏长龄，置办了两桌酒席。虽然大家都没喝酒也没吃菜，至少说明道光很重视这次凯旋，给了长龄等人足够的面子，因为道光从来没有请人吃饭的习惯。

一时之间，整个朝廷喜气洋洋，不亚于过节庆典。文武大臣纷纷恭喜皇帝，请求为道光上尊号，以纪念这次非同凡响的胜利。道光倒也清醒，婉言拒绝了。大臣一听，纷纷赞扬皇帝虚怀若谷，德行厚重。

张格尔是幸运的，道光还算一个仁慈的皇帝，没有对他处以千刀万剐之刑，只是斩首示众。张格尔人头落地之后，道光这个极少注重荣誉的皇帝也感觉自己建立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功业，可以对得起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了。

第十四章 打击盐枭

盐业是一个暴利行业，由国家垄断经营，私人是不能插手的。但正因为是暴利行业，所以走私相对泛滥。但是官府并不直接贩卖食盐，贩卖的事情还是交给商人去做，官府直接负责食盐的生产，然后标价卖给商人，由商人分销。合法的商人必须花费巨资从官府手里取得“经营许可证”，然后在官府指定的地方去卖。

政坛新星

道光在人们眼里是个非常平庸的皇帝，在用人方面远不如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尽管平庸，道光还是用了好几个人才，林则徐是一个，徐广缙是一个，还有一个更有才能的人，这个人便是陶澍。

道光刚上台的时候求贤若渴，让文武百官推荐贤良。当时四川总督蒋攸钰推荐了陶澍，说川东兵备道陶澍这个人非常贤能，业绩在四川第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道光听了，心花怒放，立即擢升陶澍为山西按察使，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

没过多久，道光又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因为陶澍这个人特别麻烦，上的奏折特别多，根据宰相曹振镛的理论，陶澍这种人就是没事找事的那种。道光嫌批阅奏折麻烦，接受曹振镛的建议，专门挑奏折中的细节错误，许多官员因此不敢上奏折，只有陶澍仍然坚持不懈地上奏折。道光也想挑陶澍奏折中的毛病，可惜就是挑不出来，道光在心里嘀咕了：陶澍这个人是不是只会说好话不做好事的那种？

于是，道光暗中派人去考察陶澍，然而没想到的是考察的人对陶澍交口称赞，说陶澍办事雷厉风行，精力无穷，大小事情到他手中都能有条不紊地完成，这人不仅能力好，操守也不错。道光一听，心里大喜，提拔陶澍为安徽巡抚。

道光四年（1824年），洪泽湖决堤，漕运不通。道光决定用海运来取代，当时朝中大臣大多持反对意见，而陶澍却鼎力支持道光。道光于是提拔陶澍为江苏巡抚，让他负责操办海运南漕之事。

陶澍不仅将事情办得妥妥当当，还为道光节省了二十万两银子，让道光心花怒放。陶澍跟其他督抚的表现完全不一样，其他督抚只知道在自己面前哭穷，总是嫌拨款不够。两相比较，道光终于明白了人

才的另一层含义：会省钱的就是人才。

善于用人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发现陶澍这样一个优秀人才，让道光感觉自己也是一个明君。道光十年（1830年），陶澍的恩人两江总督蒋攸銛因病卸任时，道光立即提拔陶澍为两江总督，掌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事务。

有清一朝，直隶总督的政治地位最高，但是经济地位最高的是两江总督，因为两江总督掌管的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给国家上缴的赋税最多。扬州一年就可以上缴盐税六百多万两，占全国盐税总额的百分之六十。

就像当年雍正用李卫一样，道光用陶澍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不要怕得罪人；不要怕苦怕累；破除陋习，治理好河工和盐务。

陶澍这个人性格跟李卫也很像，他胸无城府，敢说敢做，平时好管闲事。该管的他肯定会管，不该管的也管，一点儿也不怕得罪人，而且性格非常直，心里憋不住话，有什么说什么。道光正是看中了这些特点，才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他。

应该说，在用人方面，道光的亮点极少，而陶澍就是其中之一。

惩治盐梟

盐业是一个暴利行业，由国家垄断经营，私人是不能插手的。但正因为是暴利行业，所以走私相对泛滥。但是官府并不直接贩卖食盐，贩卖的事情还是交给商人去做，官府直接负责食盐的生产，然后标价卖给商人，由商人分销。合法的商人必须花费巨资从官府手里取得“经营许可证”，然后在官府指定的地方去卖。

有合法的商人，难免也有非法的商人。在盐业方面，往往是合法的商人对百姓的伤害最大，因为他们背后有官府的支持，可以肆意抬高盐价，而且生产的食盐质量低劣。倒是走私的食盐物美价廉，深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欢。没办法，这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

两淮盐运司衙门就设在扬州，所以扬州的大盐商最多。这些盐商个个富得流油，当时扬州最大的盐商是黄均太，据说他吃一碗蛋炒饭就要花费五十两银子。一碗蛋炒饭怎么会这么贵呢？这蛋炒饭要保证每粒米是分开的，上面都要沾上蛋花。这鸡蛋是怎么做的呢？这鸡蛋可不是一般的鸡蛋，鸡每天吃的是鲜活的鱼虾和中药材，下出的蛋鲜美无比，营养价值非常高。在炒饭之前，先用蛋汁将米饭浸透，炒出

来的蛋炒饭每一粒米都是金黄的，由蛋汁包围。然后再配上“百鱼汤”（用各种鱼制成的汤）喝，极其奢侈。

这些盐商不仅奢侈，而且非常沽名钓誉，经常资助穷人，博取好名声。

陶澍来到这里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整顿官场和商场，尤其是盐业，更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由于合法盐商的胡作非为，导致买官盐的人越来越少、买私盐的人越来越多。这么一来，受损的还是国家，盐税相应就减少了。

当地有一个俗语：私盐越禁越好卖。为啥这样呢？政府越禁，官盐价格就越高，私盐相对价格就更低，所以更好卖。

这里我们得介绍一下为什么官盐价格非常高。仅仅是因为国家垄断吗？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垄断，但是垄断并不必然导致价格过高，政府是有能力控制价格的。欧美的一些垄断企业，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反而让产品价格更低。

官盐的价格之所以如此之高，不光是因为缴税。缴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还需要承受官吏集团的层层盘剥，拿下一个项目往往有十几道手续，每盖一个章都必须出一次血。这些钱全在算在食盐的价格里了。

盐商固然有钱，但正因为有钱才树大招风。河工出什么问题了，让盐商捐钱；给皇上办贡品，让盐商出钱；哪里有灾害了，让盐商出钱；政府搞什么活动了，还要盐商出钱。盐商靠政府吃饭，敢说“不”字吗？盐商又不是银行，这些钱归根结底还是老百姓埋单，钱都存在于食盐的价格中。

私盐不用打点官府，不用盖章，不用办手续，所以利润更高。私盐之所以屡禁不绝，而且愈演愈烈，就在于有官僚背景。道光年间，私盐的销量已经大大超过官盐。陶澍任两江总督后，两淮的官盐每年只能销售定额的三分之一，欠下了几千万的盐税。这是摆在陶澍面前最大的一个问题，他要清除盐业弊端，必须进行改革。

两淮有淮北和淮南两大盐场，淮南的盐场规模最大，还能勉强应付开来；淮北盐场情况相对窘迫许多，欠下了太多的盐税，许多食盐卖不出去。如何改革呢？陶澍当然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不可能取消食盐垄断，只能从打击盐梟入手。

当时两淮最大的盐梟是黄玉林，这人是福建人，长得非常斯文，说话彬彬有礼，就像后来的青帮头目陈其美一样，一个典型的披着羊

皮的狼。黄玉林为私盐贩子，其实并不是什么秘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黄玉林表面是个商人，其实更像一个以经商为目的的黑社会头目。他手下有一支装备先进的武装力量，船只的装备不亚于军舰，船上装有大炮，船员们都有火枪。因为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他们的武器装备甚至比官军的还好。

有时候，盐枭的真正敌人还不是官兵，一方面是因为不少官员已经被他们收买，另一方面是他们武器先进，官兵们也不敢随便得罪他们。在官兵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盐枭们最大的敌人就是竞争对手了，也就是其他的一些盐枭。根据地域的不同，盐枭又分为不同的派别，譬如山东的侉子帮、安徽的捻子帮等，这些人都靠盐吃饭，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不同帮派的盐枭经常大打出手，互相厮杀，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

道光曾多次下令缉拿黄玉林，但黄玉林在官场有内线，所以官兵屡屡扑空。时间长了，黄玉林也越来越自大，越来越看不起官府。他甚至亲自登门造访衙门，让人递上自己的名片，衙门的人听说他来了，不但不欢天喜地感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反而吓得满头冒汗。

官员们只好接见黄玉林，用酒席招待他，吃饱喝足之后，黄玉林再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道光听说这事，非常生气，下令要把黄玉林处死。两江官员一听，急了，纷纷上书说黄玉林这个人不能处死，处死他会有很多弊端，并一一列出来，然后再列出留下黄玉林的种种好处。官员们普遍建议利用黄玉林打击盐枭，所谓以毒攻毒。

陶澍是一个异类，他坚决主张将黄玉林斩立决。两江的官员听到这个消息，个个惊恐不安。他们为啥惊恐？因为他们与黄玉林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不但拿了黄玉林的钱，而且已经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了。黄玉林如果供出他们的话，那就惨了。

陶澍是一个狠角色，他并不想把官场中的人得罪个遍，但是黄玉林必须得死，他不死的话就无法整顿盐业，无法起到警戒其他盐枭和不法官员的作用。

陶澍亲自监斩，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黄玉林这个不可一世的盐枭斩首。

改革岂能手软

杀黄玉林是陶澍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自己对犯罪行为绝不姑息。陶澍很清楚两淮盐业背后存在官商勾结的情况，但是他不会想到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很多官员和盐枭是酒场上的朋友，有的还是儿女亲家，最可怕的是有的官员直接就是盐枭的股东之一。官商勾结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如果没有杀伐决断的气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认真分析问题后，陶澍觉得光是撤撤职，杀掉一两个官员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撤掉两淮的盐政，不要这个衙门了。撤掉以后，盐业由哪个部门管呢？陶澍说不用交给哪个部门，暂时由我代管。在当时的官场上，还有这样有气魄有胆识的人，真是少见。如果碰上了一个猜忌的皇帝，肯定会说这个人如此强出头，一定是想大权独揽，为自己牟利，甚至有不轨的企图。

撤掉一个衙门，等于是砸掉一大批官员的饭碗，改革僵化的体制，必然引起一些守旧派的不满。幸运的是，道光虽然平庸，但也急切希望把国家治理好，有了一个敢于担当的大臣，他懂得珍惜。他不仅没有怀疑，而且很高兴地答应了陶澍的一切要求。

改革盐业是一项重任，陶澍先从自己做起，率先废除陋规。当上两江总督后，他的养廉银每年增加了五千两，但他坚决不要，还不让其他官员拿。陶澍废除各种陋规，目的是压低官盐的价格，从而让老百姓买得起官盐。这是一个大的方针，通过这种价格竞争的方式，让官盐重新在市场中打开一片蓝天。

陶澍是明智的，他没有把暴力消灭盐枭当成最主要的手段，而是意识到必须先纠正不良的政策，当官盐的价格压到跟私盐差不多甚至更低时，不用动手，盐枭也混不下去了。

在盐业改革过程中，陶澍最担心的莫过于当今的太师曹振镛。曹振镛祖上就是靠卖盐起家，现在仍有不少亲属是盐商。考虑到很多人会向曹振镛告状，如果曹振镛反对的话，自己的改革只怕难以为继，因此他决定自己先跟曹振镛摊牌。为此，他给曹振镛写了一封长信，把问题前前后后说得一清二楚，让曹振镛明白如果不改革盐业的话，受损最大的还是国家。

曹振镛当时已经快八十了，别看他做官一辈子无风无雨，其实一辈子谨小慎微。陶澍改革伤害了自己家人的利益，他肯定是不高兴的，但是他也不敢动这个牛脾气的陶澍，一方面是因为道光对其委以

重任，另一方面这个人不好得罪，天不怕地不怕，惹恼了他，只怕自己会晚节不保。

当时道光经常写诗，可能是心里烦闷，写出了一两首自我感觉良好的诗，心情就会高兴许多，还寄给曹振鏞，让他点评点评。曹振鏞哪有胆子批评啊！七老八十的人了，每天晚上都要查阅资料，写读后感，尽量吹捧得既有新意又不着痕迹。写完之后，还要认真检查好几遍，确信没有任何差错才敢寄给道光。

在对待陶澍的信上面，曹振鏞也相当谨慎，他回了一封特别礼貌的信，意思是：现在两淮的盐业弊病确实很严重啊，改革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你想好了就放手去做吧，如果遇到什么困难，老夫会为你做主的。

收到曹振鏞的信，陶澍放心了。没有心理障碍了，改革就容易得多。

道光十二年（1832年）春，陶澍带着自己的班子来到海州（今连云港），专门开会讨论盐业改革问题。明清以来，盐商贩盐都要经过国家的准许和认可，然后让你在指定的地点买盐，再到指定的地点去卖，完全是一种垄断式、计划式经营。陶澍等人觉得这样不好，决定推行票盐制度，从今以后，不需要特殊的关系、资格和手续，只要给国家缴税，就可以经营。

陶澍向道光提出推行票盐法，道光予以肯定。

票盐法一推行，就受到了公众的欢迎，盐业一时之间繁盛起来。此后，生产的食盐既廉价，质量又好，大家都改领票盐，老百姓不再热衷于买私盐。

以前的私盐贩子也没必要走私了，反正只要花钱从官府那里领票，就可以买盐，不用再遮遮掩掩地走私。现在大家都成了合法商人，合法缴税，盐路通畅，盐业再次得到振兴。

票盐制度沉重地打击了以前靠垄断吃饭的盐商，许多大盐商因此而破产。这些盐商自然对陶澍恨之入骨，但是他们拿这个两江总督没办法，何况上面还有皇帝支持。没办法，只能通过意淫的方式表达对陶澍的憎恨，他们发明了一种纸牌游戏，增加了一个叫“桃树”的牌，牌上面画着一个人拿着大斧头拼命砍伐一棵桃树。拿到这张牌的人最晦气，一般会输的，所以往往破口大骂“桃树”这张牌。

这种牌在两淮流传得还挺广的，不久，就传到道光的耳朵里。道光很生气，表示要追究发明这种纸牌的人的责任，并安慰陶澍，让他不要放在心上。这些盐商不肯善罢甘休，说陶澍的改革让以前一些非

法的盐枭获得了好处，道光懒得理。接着，这些盐商耍出新花样，说陶澍把自己写给皇帝的奏折私自出版等，道光一一化解这些压力，让陶澍全心改革，终于促成票盐改革大获全胜。

两淮盐政以前亏损七百多万两，经过陶澍的整顿，不仅扭转亏损，而且超额完成任务。从道光十一年到十七年（1831—1837年），两淮缴纳的盐税高达两千六百四十万两，存银三百多万两。陶澍的这个改革相当于食盐承包政策，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平等竞争。最终，政府和百姓双方都受益，达到了双赢的局面，唯一不满的是那些曾经搞垄断的官员和商人。

陶澍本想把票盐法推广到全国，但还没有来得及在淮南推广，他就因为操劳过度而病逝。听闻陶澍的死讯，道光悲痛万分，赞扬他“实心做事，不避嫌怨”，追封太子太保头衔，谥号文毅。陶澍在病危之时心里还挂念着国家，向道光推荐林则徐担任两江总督。

虽然林则徐并没能力挽狂澜，但是我们还是佩服陶澍的眼光，他知道林则徐是个办实事的人。

第十五章 惨不忍睹的鸦片战争

在《南京条约》中，中英双方对鸦片都只字未提。英国作为当时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正式的条约中不方便将鸦片写进去，英国当局很清楚，这么做的话必然会留下污点，而且会遗留下很多麻烦，见不得人的东西还是任其在阴暗处发展。

外来的不速之客

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它（清政府）唯恐外国人会支持大部分中国人在被鞑子征服后那段时间里所存在的不满情绪。”

马克思的话说到了点子上，清政府对西方人了解越多，对他们传播的那一套东西就越恐惧。资本主义如果再加上民族主义情绪，绝对是洪水猛兽，这种担心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清政府对外贸通商限制重重，就是为了防止中国商人和西洋商人接触过于密切，被西洋那一套“污染”。

当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他们到中国来并非是用一种彬彬有礼、公平竞争的姿态，更多的是咄咄逼人的殖民姿态。对于中国市场，他们有极强的占领欲望。加上他们有坚船利炮，无疑会对中国形成一种很强的政治压力。

当然，清政府的姿态也是相当强硬的，从康熙以来一直如此。到了道光年间，帝国虽然衰朽，但是对于西方的蔑视还是非常明显的。

英国可不管中国的情绪，他们始终为打不开中国市场耿耿于怀。1834年4月22日，这一年是道光十四年，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在对外贸易上的无能非常不满，解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特权，决定在外交部增设一个驻华商务监督部门。

当时，英国急于扭转对华的贸易逆差，决定不顾中国禁烟令，将鸦片再次大规模地输入中国市场。通过鸦片走私，英国在很短时间内就扭转了贸易逆差，在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中，鸦片贸易总额占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这对于英国来说是好事，但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首先是人民健康受损，其次是白银大量外流。

白银外流的结果是银贵钱贱，国库更加空虚，财政更加困难。银

贵钱贱会导致民生更加凋敝，因为老百姓通常是用铜钱交易，但是缴税的时候必须把铜钱换成银子，由于银子价格看涨，以前一千个铜钱换一个银子现在可能要一千六、一千八，无形之中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农民的负担因此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农民负担加重又会导致国内市场萎缩，老百姓没有余钱用来消费。当时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林则徐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人物。林则徐曾上书道光：现在江南一带商业日益疲软，细查暗访之下才知道，百姓的钱大多用于购买鸦片了。

也正是在林则徐的强烈坚持下，道光下令大力禁烟。

经济的损失还在其次，鸦片对中国人最直接的危害是侵蚀人的精神和肉体。吸鸦片的人越来越多，颓废之风越来越重，许多官员加入吸毒者行列，官风日益倾颓。当官的吸毒，难免会贪污渎职；百姓吸毒，肯定没法从事劳动生产。到道光十五年（1825年），保守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达到两百万。

最可怕的是军人吸食鸦片，军队是最讲究纪律和斗志的，一支充满烟鬼的军队还能称为军队吗？能指望这些人保家卫国吗？

林则徐发出疾呼：再不禁烟，国家就要亡了！

虎门销烟

道光元年（1821年）就开始禁烟，不过力度不大，没有多少效果。

道光九年（1829年），制定了更为严厉的禁令。外国商船进港后，必须写明“并无夹带鸦片”的字条，交给洋行的商人，随后，经过海关查核，确实没有鸦片方可放行。这些禁令有用吗？有，但是作用不大。道光比他的前辈们下的禁烟令都多，但偏偏道光时期鸦片走私最为严重。

当时朝中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吸食鸦片的都是游手好闲之徒，这些人吸食鸦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害，这派人过分强调鸦片贸易造成的白银流失问题，主张中国自己种植鸦片，不从国外进口，这派人物以许乃济为代表。还有一派坚决主张禁烟，认为鸦片非禁不可，要严惩吸食者，等禁到无人去买的时候，自然就不会出现白银流失的问题，这一派以给事中黄爵滋为代表。

黄爵滋特别指出，西方国家虽然贩卖鸦片，但它们自己的国民却

不吸食，因为它们对吸烟者有非常严厉的惩罚。所以，我们最好是把吸烟者处以极刑，虽然不必全部处死，但最好杀一批，起到杀鸡骇猴的作用。

黄爵滋的主张是最为极端的，因为在此以前，还没有哪个皇帝要对吸烟者处以死刑。黄爵滋的观点出来以后，很多官员反对，有的官员出于人道精神，更多的则是跟鸦片走私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有的是家人或亲戚中就有吸烟者。

反对黄爵滋的人认为行法治就得公平公正，如果吸食鸦片的人应该判处死刑，那么贩卖鸦片、开烟馆的人又该如何论罪？本来吸食者是禁烟环节中的末端，不应该处以这么严重的刑罚。用现代的法律精神来看，这个观点也是有道理的，吸烟者是犯错，贩毒者是犯法，犯错的被处死，犯法的反而轻判，于常理不合。

林则徐在禁烟问题上也是一个激进派，他非常赞同黄爵滋的意见，甚至补充说应当把贩卖鸦片和开烟馆的人一同治以重罪。林则徐把鸦片危害提高到亡国灭种的高度，也确实引起了道光的重视。

综合各方面意见后，道光制定了新的禁烟条例，主要内容如下：

- 一、走私鸦片的，不论走私量多大，一律处死。
- 二、对玩忽职守的官员和士兵以及内地奸商，一律严惩不贷。
- 三、对吸食鸦片的人，从严惩治，必要时可以处死。

四、对于失察、窝藏鸦片贩子的公职人员，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禁烟令颁发后，一大批犯人受到惩罚，郭亚平是个大毒枭，多年来从事鸦片贸易，在海上负责接送、转运，谋取了巨额利润，道光十八年（1838年）被处以绞刑。太监李秋澄身在宫禁，却吸食鸦片，被检举后，发配黑龙江为奴。

仅在湖北省，林则徐就缴获鸦片一万两千多两，烟枪一千两百多杆；在湖南收缴烟枪三千五百多杆；庆亲王奕劻和辅国公溥喜因为吸烟被革去爵位，并被罚俸两年。

道光禁烟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为此他重用林则徐。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的一天，道光刚起床就召见林则徐。两天后，又召见林则徐，允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让他务必要把禁烟的事情办好。经过仔细的商讨，道光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遣他到广东亲自指挥禁烟事宜。

林则徐在京城待了十三天，道光召见了十九次，赏赐他在紫禁

城里骑马坐轿的特权，由此可见道光对禁烟一事的重视。林则徐接到任务后，风雨兼程地出发了。一路上，林则徐不辞辛劳地考察鸦片情况，询问当地百姓，研究鸦片蔓延到什么地步。

林则徐是一个非常清廉正直的官员，凡路过的地方，他都吩咐地方官员在接待时一律不准铺张，更不准送礼。每到一个地方，林则徐就向地方官晓谕皇上禁烟的决心，让大家积极配合上面的政策。

在到达广东之前，林则徐就给广东布政使邓廷桢和按察使怡良发出机密公文，那是一份鸦片走私贩子的名单。林则徐让他们尽快抓到犯人，早日处决。钦差人还没到，禁烟行动已经开始，林则徐果然是雷厉风行。

英国有一个鸦片大贩，绰号叫做“铁头老鼠”，在广东从事走私十几年。这一次，得到内幕消息，听说林则徐过来了，广东将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铁头老鼠”赶紧溜之大吉。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终于到达广州，在越秀书院落脚。第二天，林则徐就命人在广州城四处张贴布告，向全城百姓宣布此次来广东的目的。一时间，关于林则徐禁烟的消息在广州城传得沸沸扬扬，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心惊胆战，有人拭目以待。来到广州后，那些支持禁烟的人给了林则徐很大的精神支持，他们中很多人主动向林则徐提供情报。

林则徐不是一个凡客，他出手不凡，总能找出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他下令加强海防，搜缴外国的烟贩子。不久，在零丁洋海口发现了二十二艘外国走私船，每条船上都有一千箱以上的鸦片。林则徐既是一个性格刚直的人，也是一种做事讲究分寸和策略的人，他没有派兵直接搜捕英国商船，而是将鸦片全部收缴。

林则徐被认为是当年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说明他多少了解西方，也许他不知道英国真正的实力，但是他可以肯定英国比国人想象的要强大。所以，他不会贸然挑起战争，如果直接扣押英国商船，搜缴鸦片，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林则徐叫来十三行的人，让他们转告洋商，限期缴纳鸦片，并承诺以后永远不夹带鸦片，如果夹带的话，将没收所有的鸦片，还要将人犯正法。

林则徐对大家说：“鸦片一日未绝，本大人一日不回去，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

让英国商人交出鸦片还得过他们商务监督这一关。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一向把中国的法令当成儿戏，这可能跟他长期与中国官员打

交道的经验有关。所以，对林则徐的通告，义律敷衍塞责。义律的态度惹恼了林则徐，看来只能采取强硬手段了，于是下令逮捕拒绝交出鸦片的大走私犯颠地。义律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带人从澳门赶到广州，掩护颠地逃走。

林则徐得知义律所为后，极为震怒。他下令把外国商船全部封起来，还调派水师封锁外国商馆。义律为此陷入了困境，致信威胁邓廷桢，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同时致电清政府，允许他们离开广州。从头至尾，义律对鸦片一事只字未提。林则徐根本就没理睬义律，如果义律不让步的话，他会拿出霹雳手段。

面对强势的林则徐，义律只能低头屈服，但他的屈服是暂时的。义律被迫交出两万零两百八十三箱鸦片，林则徐对义律的“认罪”态度比较满意，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些补偿。凡是缴纳一箱鸦片的，补偿茶叶五斤。

林则徐把缴获的鸦片囤积在虎门海滩上，宣布要当众销毁这些鸦片。

销毁鸦片的当天，无数百姓前来围观，场面极为壮观。焚烟过程持续了三周，这一举动固然可以取悦道光，也可以振奋那些憎恨鸦片的人，然而却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两次鸦片战争。

旧世界与新世界的战争

中英的这场战争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钱，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英国商人垂涎三尺。

英国作为当时西方最先进的一个国家，他们一开始对中国的禁烟态度也很温和，如果因为禁烟就对中国发动战争，在道义上他们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试想，如果中国人在英国贩卖鸦片，那肯定也是被判处死刑。

义律是主张对中国动武的，但英国的外交大臣甚至对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说出这样的话：“女王陛下统治的政府，不支持不道德的商人。”女王的意思是让义律用和平的外交的手段解决争端，不可以提到武力层面。

随后，英国政府获知林则徐因为鸦片贸易全面禁止与英国通商，这等于是将英国从中国市场赶走。对于欲望正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

来说，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终于，英国国会发起投票，战争派占上风，战争就这样打响。

战争之初，清廷认为英国不过是蛮夷，对中国构不成威胁。

1840年6月，英国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率领十六艘战舰抵达澳门，总兵力有四千人。英国外相巴麦尊指示义律封锁珠江口以后，率领大部队北上，攻下舟山群岛。7月5日，英军袭击舟山市定海县城，鸦片战争正式爆发。第二天，定海沦陷，在这场战役中，英国的旗舰马利拿号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触礁后沉入海底，威里士里号成为旗舰。8月，英国舰队抵达天津的大沽口，主战派首领道光帝看到英国舰队来势汹汹，思想产生动摇。

义律给道光递交了一份国书，要求允许通商并惩办林则徐。道光让琦善南下广州与义律谈判，琦善虽然同意惩办林则徐，但是在通商一事上没有给予义律满意的答案。10月，林则徐和邓廷桢被革职。但是在通商问题上，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义律因此失去耐心，决定打完了再谈判。

1841年1月7日，英军事先没有发出战书就袭击了虎门的炮台，清军死伤七百多人，损毁船只十一艘。面对失败，琦善不得不作出让步，与义律签订了《穿鼻草约》，该条约规定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但英国必须向中国政府缴纳一定的税额；中国赔偿英国六百万银元；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英军撤军，归还定海。

这个条约是琦善和义律私人签订的，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没有签字。英国政府对这个条约很不满，认为极大地损害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女王觉得义律简直不可理喻，对中国人太好了，建议国会将其免职。

而道光帝也对琦善相当不满，认为他在出卖国家利益，下令将琦善革职抄家，同时派遣奕山、隆文和杨芳到广州指挥作战。清军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率领下，英勇作战，然而还是抵挡不了英军强大的火力。到5月，清军全面溃退，广州附近的要地一一沦陷。奕山率领一万八千名清军退守城内，被迫与英军议和，签订《广州条约》，答应带领部队撤出广州，并勒索广州商家赔偿英军六百万银元。议和之后，奕山非常害怕，在道光面前，将这次惨败说成是大胜。

不久，英国国会通过女王的提议，将义律免职，调任璞鼎查接替。璞鼎查来了之后，先后攻占了厦门和鼓浪屿。10月1日，又攻陷定海，后来因为军中流行瘟疫，放弃了定海。在定海战役中，中英双方都损失惨重。1842年1月，英军又攻打台湾中部，被台湾道姚莹和台湾总兵达洪阿击退。没多久，英军又攻打吴淞口。

道光惊惧交加，任命宰相奕经为总司令，率领两万精兵和英军作战。1842年春，奕经率领两万大军围攻宁波的一千英军，却被英军打得一溃千里，奕经本人侥幸逃了出来。随后英军长驱直入，攻占了上海和江苏镇江，把军舰停泊在南京的江面上。璞鼎查此时非常嚣张地对道光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接受英国提出的条件，将下令大炮轰击南京城。

此时，道光已经顾不得天朝上国的面子了，江山要紧，保命要紧，派人前去和英军谈判，接受英国的条件，签订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赔偿英国两千万两白银，割让香港全部主权。更过分的还在后头，《南京条约》有一些附加条约，这些附加条约完全无视中国主权，规定：英国人与中国人如果发生纠纷，不受中国的司法审判，而由英国领事来审判；英国军舰可以停泊在五个通商港口；英国在五个商埠里可以建立租界，租界如同英国本土；中国以后提供给其他国家的利益，也应该同时给英国一份。

在《南京条约》中，中英双方对鸦片都只字未提。英国作为当时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正式的条约中不方便将鸦片写进去，英国当局很清楚，这么做的话必然会留下污点，而且会遗留下很多麻烦，见不得人的东西还是任其在阴暗处发展。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争。

英国实际参战的兵力大概在七千人，加上一些辅助的和补给的不超过两万。中国能够调动的兵力号称有八十万，是英军的数十倍，然而在装备和组织上却远远落后于英军。中国军队的抵抗也不能说不英勇，像两江总督裕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这样的高官都先后壮烈殉国。

在努尔哈赤时代所向无敌的八旗军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呢？明朝末年，海盗头目郑芝龙指挥的海军就曾全歼荷兰舰队，后来荷兰舰队再次跟郑氏海军PK，又一次输给了郑氏。李约瑟认为，明代海军战斗力超过了欧洲国家的总和，而西方列强用短短两百年的时间就赶超了中国。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对中国落后于时代的惩罚。

第十六章 失败但不屈服

广州人自古就有一股血性，清军失败之后，他们早就对清军的无能和英人的霸道极为愤慨，大呼：英国人侥幸获胜，还真以为中国人软弱可欺啊！一些被欺负的广州人发出这样的喊声：“英国人焚烧我们房舍，奸污我们妻子，杀害我们父兄，此仇不共戴天。”

亡羊补牢

这次失败对道光的打击是沉重的，天朝上国的美梦第一次被打破。道光自幼接受的是清宫严格的家庭教育，祖先们文治武功的故事犹在耳边，和康熙乾隆等开疆拓土的雄主相比，他有一种沉重的耻辱感。

道光一向把天朝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经过这次打击，一段时间内道光情绪变得低落而消沉。但是他毕竟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接受的家教都是励精图治、艰苦奋斗这些东西。所以，他努力从消沉中振作起来，认真反思这场战争。道光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我们不能期望他总结出什么深刻的教训，他意识到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海防力量的薄弱，这已经不错了。

海防废弛的原因是什么呢？道光有自己的看法：泥守旧制。防护弱是因为多年来一直固守旧制，从没有改变。所以道光得出结论：要想整顿海防，必先从革除旧制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道光对沿海各将军、副都统、督抚、提镇发出诏谕，要求各海口加强防御，因地制宜，进行变通，所有战船上的大炮和枪支，应该有增无减，而且要选择制造精良、方便实用的武器，而且各路水师要加强训练。道光要求沿海的督抚根据岛屿进行布防，一切要求都要从实战出发，不能搞形式主义。

道光还让奕山根据美利坚的造船图纸，同时结合英国兵船的样子，制作一些图纸，然后将图纸分发给沿海各省的督抚。

除了加强武器的制造之外，道光还要求各省把水师作为重中之重，提拔一些能干的将领，淘汰一些不堪胜任的官员。为了训练一批强有力的水师劲旅，道光节衣缩食，在给英国艰难赔款的情况下，尽量不减少水师的军费。可以不夸张地说，为了提高国防力量，道光

呕心沥血，苦口婆心，希望各级将领能以国家利益为重，矢志报国。

这一切，道光都是在悲愤中完成的，虽然他不是一个出色的皇帝，却也是宵衣旰食、用心良苦。他所做的这些改变虽然是亡羊补牢，但也确实是力所能及的改革，但这些并不能改变清王朝衰落的命运。清王朝毕竟落后于时代，不懂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更不懂西方的政治制度，所以道光的改革效果并不明显。

鸦片战争以后，道光的禁烟态度依然没有改变，仍然主张严禁。道光虽然态度坚决，但是禁烟的力度已经大不如以前了，没有谁认真执行。鸦片贸易呈半公开状态，沿海的一些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都怕再次引起战争。

1844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有两万八千六百六十七箱；1846年，有三万四千七十二箱；1848年，英国输入的鸦片有四万六千箱；1850年，达到五万两千九百二十五箱。数目如此庞大，而且全是以走私的形式进入中国，与其说是走私，倒不如说是明目张胆地进来的。这对于极力主张禁烟的道光和林则徐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和打击。

发生在台湾的冤案

《南京条约》签订后，璞鼎查强行占领了鼓浪屿，借口等候清军释放英国战俘。随后，璞鼎查制造出了“台湾冤案”，诬陷说台湾清军杀害了英军战俘。

事情是这样的。签订条约时，浙江被俘的英军大多已经释放，英军侵略台湾时，有一百多人被台湾军民俘虏，这些人一直被拘留在台湾。当璞鼎查派人去台湾索要俘虏时，台湾兵备道姚莹正告英军使者：在台湾有一百三十多名英军俘虏，有的已经病死，有的已经按照中国的法律被处死，目前只剩下九个人，再加上因为刮了台风被台湾军民救起的二十五人，总共有三十四人。

姚莹将俘虏交给英国使者，使者非常感激，和姚莹等人在船上饮酒表示欢庆。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但是使者回去告诉璞鼎查后，璞鼎查非常不满，听到有俘虏被杀，他诈称这些被杀的俘虏都是英国商人，要求清廷将姚莹和达洪阿正法，并赔偿抚恤金给死者家属。

道光得知此事后，让怡良前去调查，怡良受耆英指使，故意诬陷达洪阿和姚莹，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中，唯一取得胜利的就是台湾这个小岛。所以，英国人一直对姚莹和达洪阿耿耿于怀，恨不得处之而后快。

道光对达洪阿和姚莹两人是非常感激的，在清军一边倒的失败中，是他们多少为清廷挽回了一些尊严。本来璞鼎查诬陷姚莹和达洪阿这件事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风波，一查就清楚，但由于这两人是耆英的对头苏廷玉和李廷钰两人的亲信，耆英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弹劾姚莹和达洪阿杀良冒功。

怡良奉耆英之命整姚莹和达洪阿，虽然没有找到证据，但也要给他们治罪，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让人把他们捆绑起来。台湾军民闻讯，群情沸腾，跑到怡良面前申辩，要求他明察。

道光未必知道耆英要整这两人，不过他还是有正常理智的，他知道这两人都是抗英的功臣，因为他们英勇作战，为大清赢回了一些面子。道光对耆英等人说，英国人是绝对不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处置他们的将领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再说了，在鸦片战争中，我军伤亡的将士更多，难道向英方要求赔偿，他们就会赔吗？

道光的话在情在理，但是迫于英方的压力，还是表面上责备了姚莹和达洪阿一番。风声一过，道光立即起用姚莹和达洪阿，虽然没有书面表态，但实际上是为这两人平反。

后来，咸丰登基后，公开为姚莹和达洪阿平反，指出是穆彰阿、耆英等人嫉妒他们的功劳，蓄意构陷，想置他们于死地。

支持民间抗英斗争

鸦片战争后，对英军恼恨的不仅是朝廷，人民对英军为非作歹的行为也非常痛恨。在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人民发起了自发的反抗侵略者的行动。

战争结束后，英国侵略者以胜利者自居，在广州横行无忌，经常欺负当地人民。特别是在交易之时，他们仗着自己是胜利者，盛气凌人，经常和民众发生争执。有时候在街上买东西，讨价还价吵起来后，居然拿起东西就走人。他们上街的时候对民众进行呵斥，如果不让路就用鞭子抽，这些蛮横无理的行为激起了广州人民的激烈反抗。

广州人自古就有一股血性，清军失败之后，他们早就对清军的无能和英人的霸道极为愤慨，大呼：英国人侥幸获胜，还真以为中国人软弱可欺啊！一些被欺负的广州人发出这样的喊声：“英国人焚烧我

们房舍，奸污我们妻子，杀害我们父兄，此仇不共戴天。”

在反抗侵略者的过程中，广州人民体现出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组成一个个社团，当时称为社学。社学本是地主阶级办的书院，后来演变为团练和乡勇，在广州各县遍布。如果是平常时候，组织这种大规模的社团，政府早就要过来解散镇压了，但这次情况不一样，他们针对的是外来侵略者。所以，政府不但不阻止，反而积极支持。

1842年12月7日，一个英国士兵强买小贩陈亚九的橙子不给钱，陈亚九让英兵付钱，英兵非但不付钱，反而用刺刀划伤了陈亚九的胳膊。看到这种事情，围观的群众一个个义愤填膺，围住滋事的英兵，让他掏钱。英兵无奈之下，只好掏钱，接着逃了出去，跑到洋房，将门紧紧关闭。群众一路追着他，将洋房围得水泄不通。

楼上的英军看到这种情况，用砖头砸下面的群众。此举激起了人民强烈的愤怒，一个叫苏亚炳的彪悍乡民路过这里，问清原委后勃然大怒，带着民众到了十三行门口，用石头撞开大门。然后冲进去将房屋点燃，英军看房屋起火了，过来扑救。苏亚炳等人拔刀砍向英军，混战中，两名英兵当场身亡，苏亚炳等人也中枪倒地，其中有五位民众伤重而亡。

火烧十三行之事很快就传到道光那里，道光点评说：“广州人民这么做，实在是因为洋人傲慢无礼所致，跟寻常的闹事有所不同。”道光要求地方官员要秉公办事，不可以偏袒洋人委屈民众。

璞鼎查要求广州巡抚赔偿，广州巡抚给璞鼎查的答复是：“这事真没法赔偿，当时百姓万众一心，闹起来谁也制不住，如果阁下执意要触犯众怒，那后果不堪设想，连政府也控制不了。”璞鼎查也是明白人，无奈之下，只好作罢。

1844年，英国军舰驶入珠江口，又对清政府提出了六个过分的要求：一、英国人两年后可以在广州居住；二、英国人可以在广州河两岸建造洋楼；三、英国人可以在十三行开河截段；四、允许英国人在广州设立天主教堂；五、允许英国在广州设立领事馆；六、允许英国人在天津建造房屋通商。

清政府还没有给英国人答复，他们就在广州河一带勘察地段，对于这种行为，政府能够忍受，广州人民却忍受不了。消息一出，广州各界联合起来，商议每个铺户捐出一个月的铺租，凑齐三百多万两银子，召集乡兵十万多人，准备和英国人大干一场，并给英国一封公开信，称如果他们坚持这种无理的行为，将与他们决一死战。

英国人收到信后，吓坏了。英国人也许不怕道光领导的清政府，但是却非常害怕这些彪悍的乡勇，火烧十三行的事件已经表明为了维权这些人是不怕死的。

珠江沿岸，当地人又称为河南，跟省城广州隔河相对。这是一块人口稠密的地方，地皮非常宝贵，而且这里也是一块战略要地，占领了这里，可以封锁进入黄浦江的船只。英国人为了获得这块宝地，刚开始打算用重金购买，但是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诱买不成，英国人便想强行占有。

璞鼎查带着人到这里插旗划界，想强行占有这块地方，造成既成事实后，逼迫清政府承认。5月21日，双州书社几千名群众集体投书，控告英国人非法占有的行为。后来，广大群众又围住英国领事馆，要求领事给一个说法。领事先是推说不见，无奈群情汹涌，只好将河南租地一事叫停。

1847年夏天，在广州的黄竹岐村发生了一起更大的纠纷。在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沿江的许多村子纷纷围起栅栏，算作一种自我保护吧！当时英国人上岸，只要不到村里闹事，村民都任由其自由出入。

战争结束后，也就是1847年夏天，一些英军乘船到黄竹岐村打猎。上岸之后，他们得意扬扬，看见漂亮的妇女就调戏，许多妇女吓得惊慌逃跑，英国士兵居然在妇女背后开枪射击，当然他们是为了吓唬人取乐，不是真的要杀人。村民们听到枪声，纷纷敲锣打鼓，附近各村的村民全都拿起武器冲了过来，将英军围住。英军顿时吓坏了，惊恐暴躁，企图拿枪吓唬村民。

这些彪悍的村民愤怒异常，当场击毙了六名英军，并将英军的尸体绑在石头上，沉入江底。其中，有一个村民陈亚辰被英军杀死。英军看事情闹大了，赶紧逃走，向领事报告。英国领事立即照会耆英，要求他严惩凶手。耆英吓坏了，立即把英军的尸体打捞上来，归还领事。但是新任的广州巡抚徐广缙支持乡民，对英国人说：“自古以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你们的人杀害了我们的乡民，我们乡民报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迫于政府高层的压力，徐广缙不得不做出姿态，处死三个乡民。但是，英方对这个结果还不满意，继续给耆英施压。没办法，耆英只好要求乡民们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永远不许滥杀英国人，英国人这才平静下来。

广州人民抵制英军进城

中英贸易，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根据长久以来的规矩，英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广州贸易的，这里面有严格的规定。也正因此，英国人对这种限制非常不满，认为中国人对他们不公平，看不起他们。

《南京条约》签订后，璞鼎查再次提出英国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清政府认为英国人如果不带兵卒的话，可以进城谈公事。鸦片战争后，马礼逊担任英国领事，他在任上，多次请求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广州，但是没有结果。马礼逊逝世后，马峨接替他。马峨再次提出这个要求，也没有结果。马峨离职后，德庇时接替他，同样提出这个要求。

德庇时看请求未果，在1847年春，居然率领十多艘军舰闯入广州河，占据十三行湾，让英军偷偷爬上中国炮台，将炮眼盯死，然后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坚请入城”。道光派耆英与英国人谈判，达成协议让英国人两年后入城。1849年，德庇时回国，文翰接替他，再次把这事提出来。

耆英当时答应德庇时，允许英国人两年后入城其实只是缓兵之计，但是在英国人看来，说话就必须算数。他们直接将军舰开进内河，停泊在十三行湾下面，大有强行入城的姿态。

当时，负责广州事务的是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徐广缙和叶名琛的立场是相同的，顺应民心，禁止英军入城。为此，他们增设炮台，加强防守，对众将士下令，如果英军强行入城，立即开火。

文翰得知徐广缙和叶名琛积极备战，便想出一个计策，让徐广缙和叶名琛过来谈判，然后将他们扣押为人质，逼迫清政府允许他们进城。徐广缙接到谈判要求，慨然允许。属下担心他的安危，劝他小心。徐广缙对水师提督洪名香说，没事的，如果他们扣留我，你们立即攻击英国船只，不要因为我在船上而有所顾忌。

徐广缙去了以后，双方还是谈不拢。文翰威胁说，如果不给出一个准确的进城日期，你徐广缙今天就别想回去。徐广缙说，进城之事是耆英答应的，自己是奉皇上的命令来广州，没必要履行耆英的承诺。

文翰对徐广缙使尽了一切手段，最终毫无办法，只能送徐广缙回去。事后，文翰多次催问进城之事，徐广缙都以静候皇上的旨意婉拒。文翰办事不力，引起英国方面的强烈不满。

文翰也急了，说你们大清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徐广缙义正词严地

反驳，那是耆英跟你们缔结的契约，跟我没关系，如果你们非要进城，置全城愤怒的百姓于不顾，你们自己去跟百姓较量吧！

广州人民都是英勇爱国的市民，这一点文翰不是不知道。得知英军可能强行入城后，广州全城百姓立即动员，拿起武器，严阵以待。一时之间，十万乡勇个个如临大敌，血气沸腾。到了晚上，乡勇四处巡逻，灯火通明。英国人看到这种场景，也吓呆了，文翰只好退让，暂时放弃入城的计划。

广州人民同仇敌忾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深受鼓舞，对广州人民骁勇爱国的精神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在这多事之秋有这样的百姓，真是一种福气啊！

反抗英国人进城的斗争能够取得胜利，首先要感谢的是广州人民的团结和顽强，面对英国侵略者，能够保持士可杀不可辱的英雄气概。其次还得感谢徐广缙和叶名琛这样深明大义的领导，没有他们的支持，人民的底气不会这么足。当然，也不能忘记了远在北京城的道光皇帝，虽然他承受了巨大压力，但是他内心依然刚强，从来没有在精神上屈服于外敌。

这是衰落时代、国难时刻鼓舞人心的亮点，也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所在，中华民族的优秀本色在广州人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十七章 道光的后宫生活

道光登位如同祖父乾隆一样，无风无雨，顺理成章。在道光统治时期，皇室也还和睦，君臣之间也还融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光 是幸运的，他不必要像后来咸丰那样，饱受战乱之苦，连紫禁城也待不住，也没有感受到太平天国如洪水一般扑向清王朝。

皇后暴死之谜

道光一共有四个皇后，第一个是孝穆成皇后，钮祜禄氏，户部尚书布颜达的女儿。她是道光做皇子时的嫡福晋，没有留下儿子，很早就逝世了。道光当上皇帝后，追封她为孝穆成皇后。第二个是孝慎成皇后，佟佳氏，三等公舒明阿的女儿。道光即位后，佟佳氏被册立为皇后，她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逝世，没有留下儿子。第四个皇后是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刑部员外郎花郎阿的女儿，道光生前她没有被封为皇后，后来咸丰因她抚育之恩，追封她为皇太后。

我们这里要讲的是第三个皇后——孝全成皇后，她也是钮祜禄氏，三等公颐龄的女儿。这位皇后非常聪明贤惠，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苏州，当时就名扬苏州城，人人都知道颐龄家里有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儿。就是这么一个贤惠的皇后，其死因却不明不白，很多人怀疑她是被皇太后杀死的。

皇太后钮祜禄氏虽不是道光的生母，但对道光有大恩，道光的继位离不开她的支持。传言说皇太后在孝全成皇后病重时送给她一杯药酒，导致后者死亡。那么，她们两人肯定有什么矛盾，究竟有什么解不开的梁子，非要置人于死地呢？而且我们知道皇太后是一个非常识大体的女人，也是一个贤惠的女人，两个贤惠的女人本应该相处得很和睦才对，干吗要死掐呢？

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皇太后人确实不错，嘉庆暴毙，一时之间找不到密匣子。她没有浑水摸鱼，让自己的儿子当上皇帝，反而力挺道光。道光即位以后，对她也非常孝顺，虽然她没有干政，但是册立皇后等后宫事务道光还是得请示她，对她表现了充分的尊重。

道光非常节俭，皇后和嫔妃们跟着他过苦日子，但是道光对皇太

后却不马虎，尽量让她吃喝玩乐，样样遂心。然而，皇太后不干政，整天待在深宫里也无聊啊！人一无聊难免就想找点儿乐子，除了看戏之外，皇太后还染上了吸鸦片的坏习惯。每天吞云吐雾，让她在平庸无聊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些乐趣。

道光禁烟那是非常干净利落的，但再怎么禁烟，也不可能把皇太后给禁了，只能由着她去了。道光禁烟也是用心良苦，嘱咐宫中的太监这事一定要瞒着皇太后，而且特地为她准备了一个秘密的鸦片来源，我们可以称为“特供烟”！

隐患就在这里埋下了。你说这个道光，想政策和孝心两不误，结果呢，也有弄巧成拙的时候。宫里有些人就想了，皇太后可以吸烟，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吸烟啊！都是人，烟瘾发作又这么痛苦，干吗搞两套标准呢？有些烟瘾特重的妃嫔弄不到鸦片，只好到皇太后那里诉苦，希望太后能解解她们的饥渴。

太后呢，人不错，心想，我不能光自己一个人享受啊，快乐应该分享嘛！来来来，一人给点儿。这一给不要紧，让中宫的掌门人皇后知道可就不好了，如果孝全成皇后自己吸烟倒也罢了，偏偏她不好这口。她知道了这事能不生气？后宫管理不好可是我的责任啊，得管。

皇后这么一管，严厉地处分了那些吸烟的妃嫔，皇太后可不乐意了。你打狗也得看主人啊，这鸦片烟是我给她们的，你给她们处分这不是打我的脸吗？反了，以为自己是个皇后就谁也不放在眼里是吧！

后来皇太后终于知道，原来全国都在禁烟啊！哎，这可不好，我也得戒啊，否则就是不给道光面子啊，这孩子挺孝顺的，一直瞒着我，怕我心烦。得戒，可惜皇太后戒了好几次，始终没戒掉。

皇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节俭了一辈子的道光终于狠下心来铺张一回，也学着他父亲嘉庆的样子，减免一部分钱粮。这一天是道光自登基以来最喜庆的一天，妃嫔和宫女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打扮一番了，她们脱去寒酸的布衣，穿上漂亮的丝绸，努力打扮得花枝招展。

寿宴中有一个环节是在慈宁宫听戏，这一天道光兴致很高，亲自登台唱戏，唱的是“二十四孝”中“莱子娱亲”，道光的动作非常僵硬笨拙，唱腔也经常走调，活脱脱一出小丑剧。皇太后和妃嫔们都笑得前仰后合。

唱完之后，道光学着伶人的样子向太后讨赏钱，太后便让宫女们把瓜果和银钱撒到戏台上去。道光一高兴，让会唱戏的王公大臣们上台表演。一时间，热闹非凡，气氛活跃。

到这里我们仍然看不出皇太后有毒死皇后的动机，事实上，皇太

后还是皇后的姑姑。关于太后杀皇后有两个版本。两个版本都认为皇后为太后所杀，但原因不一样，第一个版本是婆媳矛盾，主要过错在太后；第二个版本主要过错在皇后，皇后想毒害其他贵妃生的儿子，太后知道此事后，把她赐死。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版本。皇太后是后宫地位最高的人，而皇后却是实际掌权者。换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太后是最高领导，皇后是实际管事的。皇后管理后宫名义上是不需要什么事都请示太后的，但你不请示人家太后心里不舒服啊！再说，人家本来待在深宫里守寡多年，已经够无聊了，看到什么都你皇后说了算，她能顺眼吗？

据说这个皇后也是相当厉害的一个人，独断专行，连皇帝都管，道光对她宠爱有加，她确实没什么忌讳。皇后对妃嫔管理得很严格，结果她们不敢接近皇帝，这一来大家都有怨言了，纷纷跑到太后那里告状，说皇后嫉妒心很重。太后本来就看皇后不惯，这个小侄女太没女人样了，封建社会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却熟读诗书，权欲又强，得给她点儿颜色看看。

太后就找道光谈话，说皇后太年轻了，做事呢经常没分寸，你得好好管教一下，免得以后是个麻烦（后宫干政）。

道光把太后的意思告诉了皇后，皇后很年轻，才三十来岁，听了很不舒服，仍然一意孤行，但从此，在心里开始恨上了太后。加上后来禁烟的事情，其他妃嫔联名在太后面前状告皇后，可能事情真闹大了，否则道光也不会下了一道特别的诏书。

道光的诏书是这样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嗣后无论官私大小事务，有应启知皇后者，除本宫、四阿哥、四公主事务外，其余俱著先行奏闻，皇后遇有交派事件，亦著具奏，候旨施行。”

四阿哥和四公主都是皇后所生，皇后负责管教他们，那意思是其他的事情你就别管了。可能当时婆媳之间的矛盾确实已经呈白热化了，道光不得不作出妥协。也有可能皇后真的有吕后风范，让道光本人也有些受不了。

这事发生以后，皇后在宫中受到空前孤立，道光对她也越来越疏远。多重打击之下，身板扛不住了，病倒在床上。据说在她临死之前的一个晚上，太后亲自过来看望，还送给她一瓶药酒。皇后喝了之后，第二天就死亡了，终年三十三岁。

根据这个版本，皇后死得非常冤，因得罪太后冤死。

另一个版本皇后之死则更多的是咎由自取。

依据《清宫词》的记载，皇后是被太后用家法处死的。钮祜禄氏当上皇后以后，非常希望让自己的儿子奕訢当上太子，只有这样，自己的地位才能巩固。当时道光有四个儿子，皇四子奕訢和皇五子奕詝都是十岁，皇六子奕劻九岁，还有一个一岁的奕譞。四个皇子中最具有竞争力的就是静贵妃所生的奕劻，奕譞太小，奕詝举止粗鄙，不讨道光喜欢。

奕訢和奕劻各有优势，奕訢是皇后所生，而且年长，人比较宽厚。奕劻却非常聪明，深得道光喜欢。皇后担心时间一长，奕劻会后来居上，到时候静贵妃母以子贵，自己这皇后之位就保不住了。

后来，皇后听到传闻，道光想立奕劻为太子，这正是她最担心的。自己是堂堂皇后，如果不能将儿子扶为太子，颜面何存。皇后熟读史书，深知宫廷斗争的必要性。历朝历代，后宫都是一片血腥的战场，如果自己不争的话，太子之位可能真要旁落到静贵妃那里。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毒死奕劻，消灭了竞争对手，造成既成事实，道光也不能拿自己怎么样。想好了以后，皇后决定叫奕劻和奕詝过来吃饭，吃饭之前，皇后对儿子奕訢说：“待会儿吃饭的时候，上了鱼之后，你千万不要吃鱼。”

“母后，这是为什么啊？”

“你就别问了，只管照母后吩咐的做就行了。”

“母后，你不说我就偏要吃。”

“真不听话，好了好了，母后告诉你。”

皇后对着奕訢一阵耳语：“明白了吗？”

奕訢愣住了，他不懂母亲为什么要杀了自己的兄弟，要知道他从小跟他们在一起玩，一起读书，兄弟们的感情很好，怎么舍得兄弟们的去死呢？

吃饭的时候，奕詝和奕劻都吃得津津有味，只有奕訢闷闷不乐。等到鱼上来的时候，奕訢两眼发直，神情紧张，他故意用筷子去夹鱼。皇后在桌子底下狠狠地给了他一脚，他只好收回筷子。等到奕劻和奕詝夹鱼的时候，他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在桌下踢他们。这样一来，哥儿几个都懂了，原来这鱼有毒啊！皇后的阴谋就这样流产了。

太后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下令用家法将皇后赐死。钮祜禄氏犯下重错，连道光也救不了她了。

后妃虽多，子女不丰

道光的妃嫔在清朝皇帝中算是比较多的，但是他的子女却不是很多，这是他不断充实后宫的一个原因。

在道光的妃子中，子女最多的是琳妃乌雅氏，她虽然进宫很晚，但是年轻漂亮，深得道光宠爱，接连为道光产下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而且都长大成人。为了奖励她，道光将她从贵人提拔为妃子。多子多福，道光逝世后，琳妃的待遇也是相当好的，她的孙子光绪当上了皇帝，虽然是个傀儡，至少说明她确实有福。

道光还曾宠爱过祥妃钮祜禄氏，就是她为道光生下了皇五子奕詝，她还为道光生下了两个女儿，其中一个过早夭折。祥妃一直活到同治时期。

彤妃舒穆禄氏，虽没有生育皇子，但生下了两个女儿，一个女儿早殇。道光对她颇为喜爱，将她从贵人的身份提拔为贵妃。晚年，有一次她惹怒了道光，被降为贵人。后来，咸丰同治不断给她加封，临终前终于恢复贵妃的称号。

第一个为道光生孩子的是那拉氏，嘉庆十三年（1808年），她为道光生下了长子奕纬，奕纬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去世，终年二十五岁。那拉氏因为给嘉庆带来第一个孙子，被提拔为道光的侧福晋。但道光对她并无多少好感，登上皇帝后，她的身份还只是一个嫔。后来，还是太后提携，让道光晋封她为妃子。

得到道光宠爱的妃子相当多，她们中大多数没有子女，但很多人都受封了，如佳贵妃、成贵妃、常妃等。这些妃嫔都非常可怜，帝王的宠爱犹如昙花一现，加上没有子女，她们一辈子在深宫里孤孤单单，如同守活寡。

我们再来看看道光的子女们。

皇长子奕纬是不幸的，作为长子，本来他是很有优势的，加上嘉庆特别喜欢这个长孙，他完全有理由活得更好、更开心一些。可惜，道光很不喜欢他，甚至到了厌恶的程度，据说他举止相当粗野，还有吸食鸦片的嗜好。而且他母亲地位太低，所以虽然贵为长子，活得却相当孤独可怜。

临死之前，他的身份还只是一个贝勒，更让人心酸的是这个爵位还是嘉庆封的。道光对他的冷落可想而知，更糟的是他没有留下孩子。论理，作为一个父亲，道光应该安排一个孩子过继给他，以

免“绝嗣”，这在清朝皇室中屡见不鲜。但是道光什么都没做，可见父子之间感情的淡漠。

倒是咸丰皇帝有些兄弟之情，当上皇帝后，追封这位长兄为隐志郡王，还将永理的后人过继给他。

道光第二个儿子奕纲两岁夭折，第三个儿子奕继三岁夭折。四儿子奕訢，孝全成皇后所生，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

皇五子奕詝比奕訢晚六天出生，但明显更淘气，小时候经常往老师的茶壶里撒尿，长大后也不讲究什么礼仪。道学气息很重的道光自然不喜欢这个孩子，后来直接把他过继给弟弟绵恺。咸丰后来封他为惇亲王，奕詝逝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终年五十九岁。

皇六子奕䜣比咸丰小一岁，是道光最为喜爱的一个儿子，也是道光唯一主动封为亲王的儿子。在立储的时候，道光在他和奕訢之间犹豫不决，奕䜣没有表现出一个帝王应有的大度和谦让，最终输给了奕訢，但道光破例留下两道密诏，一个是立奕訢为储君，另一个就是封奕䜣为恭亲王。奕䜣是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正是他帮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除掉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从而建立了“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政治模式。

当然，后来慈禧太后一步步剥夺奕䜣的权力，却无法剥夺他对近代史的影响，正是在他的主持下，清政府放眼于世界，开展洋务救国运动，从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国家的衰败。奕䜣逝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终年六十六岁，谥号忠，配享太庙。

皇七子奕譞咸丰年间被封为醇郡王，他也曾参与北京政变，协助慈禧除掉肃顺等人。同治十一年（1872年），封为醇亲王，他的儿子载湉后来当上皇帝。光绪十年（1884年），奕譞成为军机处首席大臣，主持海军事务，然而也正是他，对慈禧巴结讨好，将海军军费挪来修建颐和园。光绪十七年（1891年），奕譞去世，终年五十二岁。他死后王爵由第五子载沣承袭，光绪和慈禧驾崩后，载沣之子溥仪即位，载沣本人当摄政王。清王朝被推翻后，载沣隐居在北京，1951年去世，终年六十九岁。溥仪后来在满洲国投靠日本人，载沣非常生气，怒斥他是卖国的汉奸。

皇八子奕詝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咸丰年间被封为钟郡王，同治七年（1868年）逝世，没有留下儿子。

皇九子奕譞，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生，咸丰年间被封为孚郡王，同治末年（1874年）升为亲王，光绪三年（1877年）病逝。

道光十个女儿有五个早夭，长大成人的五个公主寿命都不长，寿

命最长的寿庄固伦公主活到了四十三岁。她们虽然贵为公主，其实并没有享受到正常人应该享受到的那种幸福。首先，由于身份特殊，她们不能追求爱情，只能由皇帝指定婚姻。这些婚姻大多带有政治因素，基本与爱情无关。再者，作为公主，她们不能和公婆住在一起，只能住在公主府里。公主要想和丈夫同房，还必须得先召额駙，这无疑让夫妻感情生分。

世人都羡慕宫廷生活，殊不知深宫寂寞远甚寻常人家，还是做一个平凡人好啊！

立储之难

道光得子比较晚，很晚才考虑立储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只需在皇四子奕訢和皇六子奕䄎之间做一个选择。

道光始终犹豫不决，两人各有各的长处，很难做出决定。没办法，只好考考他们了。

某年春天，道光命令他们两个到南苑去打猎，看谁打的猎物多。这个测试对奕䄎是非常有利的，他就好这口，喜欢舞枪弄棒，驰骋田猎。奕訢对打猎不感兴趣，技术肯定好不到哪里去，怎么办呢？奕訢只好去请教老师杜受田，杜受田揣摩道光的心理，给奕訢出了一个计策。

这计策说白了就是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去比别人的长处。

比赛的结果没有悬念，奕䄎满载而归，奕訢却空手去见道光。道光忙问他这是为啥，奕訢答道：“现在正是动物繁衍的季节，儿臣不忍心杀这些动物。何况儿臣本来就不喜欢打打杀杀的事情，是以空手而归。”

道光一听，捋须微笑：“孩子，你心地仁厚，有君子气度啊！”

这一回合，奕䄎表面上是赢了，实际却输了，奕訢城府明显要深，技高一筹。

尽管这一回合奕訢赢了，但道光毕竟更喜欢奕䄎，所以并没有决定一定要将大位传给奕訢。道光很希望奕䄎能够再争口气，表现得比兄长要高明一些。一天，道光拿出两个盒子，一个是金的，一个是木的，让两个儿子挑选。奕訢平静地说：“还是弟弟先来吧！”

奕䄎也不推辞，直接就把金盒抓进手中。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让道光确信奕訢更适合当皇帝，道光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

一个帝王应该有虚怀若谷的气度。虽然奕䄢更有才能，但品德比不上奕䄡，所以还是奕䄡适合当继承人，尽管在内心里他一直为奕䄢感到遗憾。

还有一种传说，道光临终前让太监宣六阿哥进宫，当时奕䄡正准备进宫给道光请安，得知此事，非常不安，立即赶到父皇面前。道光睁眼一看，来的是四阿哥，不是六阿哥，眼睛一闭，说道：“天意，天意啊！”当奕䄢进宫的时候，道光已经咽气了。

这个传说应该不是真的，清朝实行的是秘密建储制度，所以不存在谁临死前在皇帝身边就立谁。这个故事只不过反映了道光在立储问题上的矛盾心理。

类似的传说还有很多，经过艰难的抉择，道光还是做出了决定：皇四子继承大统，皇六子封为恭亲王。

道光在临死前召集军机大臣，把密匣交给他们，但是八个军机大臣没有一个敢接。为啥？原来奕䄢的生母静贵妃（形同皇后）早已知道其中内容，私下里让军机大臣不许接过密诏，静贵妃还买通了季昌芝，此人带头不接密匣，其他人也就不敢接手了。

道光虽然快死了，脑子还没糊涂，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趁着还有最后一口气，拍着床板大骂：“朕还没死，你们就不听话了！”没办法，大家只好接过密匣。

咸丰登基也是比较险的，所以他登基以后，对季昌芝非常排斥。季昌芝死的时候，他公开表示“不恤典”，朝廷不出一分钱治丧，这在正一品大臣中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道光去世了，但是王朝的命运还在继续。我们知道道光跟他的父亲嘉庆一样，都是比较悲剧的皇帝，清朝的衰落并不是从他手中开始，却在他手中光大。道光处在一个王朝衰落的转折点上，加上资质平庸，是不太可能改变王朝命运的。清王朝的弊病积累了近两百年，虽然期间经过雍正的整顿，起死回生了一次，但乾隆之后，问题更突出。两百年的问题和矛盾就像火山一样，难免有爆发的一天，可偏偏祸不单行，衰落之时半路上又杀出了西方列强。

道光身上悲剧的地方大家都能看到，但如果说道光是幸运的，有人会相信吗？

道光出生于乾隆年间，深得乾隆喜欢，仗着祖先们的文治武功，平庸的他可以坐稳金銮殿。他不必像皇太极那样靠权谋胜出，将兄弟们杀的杀、贬的贬；也不必像顺治那样，在一个强大的摄政王面前战战兢兢；他还不需像康熙那样，那么小就谋划着除掉鳌拜这样的重量

级人物；他甚至都不必像雍正那样，不明不白地登上皇位，然后对兄弟和功臣们大开杀戒。

道光登位如同祖父乾隆一样，无风无雨，顺理成章。在道光统治时期，皇室也还和睦，君臣之间也还融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光 is 幸运的，他不必要像后来咸丰那样，饱受战乱之苦，连紫禁城也待不住，也没有感受到太平天国如洪水一般扑向清王朝。

所以说，他是幸运的。

第十八章 帝国烽烟四起

道光死后不到半年，洪秀全召集各路人马，在广西桂平市北部金田村商议起义之事。两万人马齐聚金田，建立了太平天国，一个庞然大物就这样诞生了。腐朽的清王朝和一个蛊惑人心的野心家正式开战。王朝虽然衰朽，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野心家虽然恐怖，毕竟领导的是一群非理性的“暴民”。谁胜谁负，当时还真没人能看出来。

镇压云南彝族起义

改土归流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土司问题，在道光时期，一些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仍然保留着。一些新老土司利用手中所剩不多的权力，跟地方官府勾结，鱼肉百姓，让少数民族的同胞们非常不满。

彝族百姓生活在西南各省，到了嘉庆时代，他们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生计越发艰难。土司们兼并土民的土地后，再把这些土地卖给有钱的汉人。在云南省北部，土地典当情况特别严重，很多彝族人卖出自己土地的一部分，留下的少量土地无法养活家庭。老百姓一旦无法生存下去，脑子里就会想到造反。

道光刚登基一个月，云南永北厅的彝族人民就密谋造反。当然，他们并不是想直接造道光的反，最直接的愿望还是反抗当地官府，改善生活。

当土司发现这些人想造反后，立即明白是咋回事了，顿时免除了一些摊派。这一招还真有效，老百姓顿时就不闹了，看来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造反的，如果老百姓到了动辄造反的地步也就是传说中的暴民了。

事件平息不久，土司们又故态复萌，和官府再次勒索土民。彝族人民再次受不了，上千人聚集在一起，扬言要报复土司和官府。他们围住阿喇山旧衙门，并将附近的村寨烧毁。

云贵总督庆保本来正要离职，得知这个消息后，八百里加急奏报道光。同时，命提督张凤和高适带领官兵前去镇压。

道光接到奏折后，督令官兵防范堵截，防止叛乱蔓延。

起义军的发展态势非常迅猛。二月，起义军已经渡过金沙江，进

入大姚县内，与大姚县内的起义军汇合，势力大增。看到起义军蔓延，道光仍然认为这些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于是派遣三千七百名官兵镇压，同时让当地的乡勇们配合官兵剿匪。道光相信，只要守住扼要的关口，对起义军进行前后堵截，一定可以将其迅速扑灭。

二月二十九日，起义军的一个头目梅老依什被清军俘获，但起义军在四川的发展并没有得到遏制。道光指示即将离任的四川总督德瑛阿暂时待在四川，堵截义军。

三月九日，道光任命新任云贵总督史致光日夜兼程赶往云南，协同庆保一起剿匪。

这次偶发的事件暴露出道光在调兵遣将统筹大局方面能力的不足，一个几千人的造反事件，他就先后动用四个总督（两个即将离任的、两个新任的）、几省的官兵，然而剿匪还是收效甚微。到了三月，起义军已经发展到七八千人。官兵有八千、团练有四千，占据很大的优势，然而在剿匪过程中，官兵和团练非常不给力，不知他们是胆小还是观望，迟迟不肯大力出手。

后来，道光考虑到庆保不熟悉军务，便让有作战经验的尼玛善去协助他。这时，负责剿匪的最高领导已经有四个总督、一个将军了。

尽管如此，形势仍然没有转机，甚至可以说更糟糕了。守备郭荣光与起义军激战，伤亡五十多人，军需粮草全部被起义军劫获。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了万人，活动在云南四川一带。情急之下，道光又任命贵州提督罗思举带领五千贵州兵前去协助剿匪。

四月十三日，清军终于传来捷报，在大姚县大败起义军，俘获了起义军首领陈添培，道光紧张的心情这才放松下来。十天后，再次传来捷报，大姚残存的起义军据点拉古被攻破，击毙起义军一百人，俘获六十多人。至此，大姚境内的起义军全部被肃清。

提督张凤在云南永北地区也取得胜利，俘获了起义军首领唐老大及数百名起义军。这场折腾了三个多月的彝族起义终于平息，道光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接下来照例是封赏，庆保加封太子太保头衔，尼玛善、史致光等人也赏赐了一定的银两，我们不要指望道光有多大方。他封赏更多的是表示重视这些人，感激这些人，大家心领了就行。

平定起义后，善后事务是最关键的。彝族起义本是因为土地变卖，百姓无以为生。道光相应地作出了以下的政策调整：一、以前彝族百姓将田地卖给汉人，没有田了，却还得缴纳赋税，现在不用交了，赋税由收购田地的汉人缴纳；二、彝人没有田产，土司却还勒索

他们，这种事情必须禁止，违法者必究；三、土司的一些爪牙祸害百姓，将这些人全部裁革。

从道光的这些措施来看，他是想解决问题，但是这些措施真能解决问题吗？我们认真一看，发现很多都是空话，执行起来特别难。道光总不可能天天盯着当地的官府和土司，他们如果勒索，道光如何监督？所以说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四平瑶民起义

瑶族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广东等省。他们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是语言差别太大，不同地方的瑶族人甚至无法沟通。他们通用的语言主要是汉语和壮语，文字则全部采用汉字。

湖南、广东、广西交界的地方，崇山峻岭，生活着大量的瑶族百姓。这些瑶民处于半隔绝的状态，虽然自治程度比较高，但也受到地方官府的管制。地方官当然免不了对他们进行一些勒索，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免不了会不公平。长期下去，致使积怨爆发，瑶民们拉开了反抗的大旗。

第一次瑶民起义是由一个叫赵金龙的人率领的。

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二月十九日，湖南永州府江华县的瑶民赵金龙带领五百多瑶民起义。这个赵金龙自诩金龙王，号召起义群众头裹红巾作为标志，打杀了四十多个官差。第二年正月初十，永州总兵鲍友智奉命弹压，这时赵金龙的队伍已经有一千多人了。

道光接到奏折后，任命湖广总督卢坤和湖南提督海陵阿进入永州追剿。彝族起义的事情把道光搞怕了，对这种事情他再也不敢掉以轻心，大有如临大敌、如履薄冰的感觉，他急命广东广西两省的督抚大员一同协助剿匪，这些大员包括李鸿宾、朱桂桢、刘荣庆、苏兆熊等人。

阵势是非常庞大的，方法还是老方法，严防死堵，防止蔓延。在封建统治者眼里，造反就像是瘟疫，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防止扩散。

赵金龙面对清军猛烈的炮火，很快就抵挡不住，棍棒红缨枪这些中古时代的兵器怎么抵挡得住火枪大炮？不到一千人的队伍一下就损失了三百多人。赵金龙只好带着大家退到大竹山，准备来个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逃到广东连州。可惜前路被清军堵死，他只好退回五

水瑶山，一路上，赵金龙不忘招兵买马，部队很快扩展到两三千人，全是瑶民。

道光又一次不幸地看到事态扩大，战火蔓延。此时，他想起了久经战场的罗思举，罗思举在平定彝族起义中立了大功，这次也可以用他。罗思举遂带领一千精兵，火速赶往湖南。

随后，道光还从陕西调了五十门大炮、两百名火枪手到永州。到二月下旬，从外地调往湖南的官兵有四千多人。道光以为，自己的部署已经很严密了，匪徒没有不被剿灭的道理。

二月十四日，湖南提督海陵阿在大雨中率军向五水瑶山和九嶷山行军。赵金龙得知了这个消息，挑选了一批瑶民，让他们伪装成夫役，为官兵们抬大炮和枪械。抬到一个逼窄的峡谷中时，道路更加难行，夫役们用眼光示意。一时间，夫役们拿起枪支向清军开火，听到枪声，早已埋伏好的起义军冲了出来。

海陵阿完全没有料到会中计，他还没反应过来，副将马韬已经阵亡。海陵阿回头，指挥后续部队，想冲出重围，不幸也阵亡。清军大量伤亡，只有少数人逃了出去，枪炮粮食等全部为起义军所获。

这次失败让起义军声势更加浩大，清军不敢再轻易进攻，起义军在江华、蓝山、宁远、常宁等县纵横驰骋，毫无顾忌。无奈之下，道光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同时增派援兵，让贵州提督余步云带兵前往湖南。

起义军仍然在不断发展，道光忙着从各省继续调遣援兵支援。随着湖南援兵的增加，赵金龙的活动也受到限制。为了扭转不利的形势，赵金龙兵分三路，主动袭击清军。道光得知战况后，让清军把敌人诱到平原开阔的地方聚而歼之。道光的这个策略是不错的，起义军都是瑶民出身，长年生活在山里，最擅长打游击战。如果让他们分散在山里是很难剿灭的，只有引诱到平地，才能手到擒来。

效果很快就出来了，三路起义军中赵福才一路伤亡千余人，赵福才本人也战死。赵文凤一路由于不敌，被清军招抚，一半的人解散。

后来，起义军退守洋泉镇，罗思举率军包围洋泉镇。洋泉镇易守难攻，外有群山作为屏障，内有河水环绕，城墙是由石头做成，非常坚厚。罗思举将洋泉镇团团包围，但他并不急于进攻，城墙实在是太坚固了。

三月二十九日，大雨滂沱。罗思举认为这是进攻的好机会，下大雨，起义军一定疏于防守。没想到起义军防守非常严密，罗思举与起义军激战了四昼夜，双方损失都很大，但还是没攻下来。

四月初六，清军开始强攻，在大炮的猛烈轰击下，清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终于攻进城内。隔日，双方在城内展开巷战，到了巷战的地步，胜负基本上已经定了。赵金龙光荣阵亡，起义军残部虽然不肯投降，但也难逃失败的厄运。二十四日，战斗宣告结束，叛乱到此平定。

收到捷报的道光非常喜悦，大大表扬了卢坤和罗思举，封他们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余步云加封太子少保。

没过多久，风波又起，起义军的另一个首领赵子青借口为赵金龙报仇，整合赵金龙余部两千人在江华锦田一带活动。但不到一个月，赵子青就兵败被俘。

第二次瑶民起义还是由湖南人发起的，此人叫蓝正樽。

蓝正樽是湖南新宁县瑶民，起义的原因还是一样的，当地的瑶民受到官府和豪强的欺压，偏偏官府和豪强都是汉人。瑶民有冤情，到官府告状不通，蓝正樽是个爱打抱不平的人，多次帮着有冤情的瑶民上访，可惜官府置之不理。蓝正樽一怒之下，决定号召瑶民起来造反。

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二月，湖南武冈州官府听说瑶民造反，决定秘密搜捕这些“暴民”。蓝正樽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此事，立即联络各州县的瑶民：“官府要来抓我们了，大家联合起来才能对抗他们啊！”

当地瑶民组成了一个叫“龙华会”的组织，这个组织一开始的目的并不是造反，只是为瑶民“维权”。

道光十六年（1836年）二月初五，蓝正樽召集“龙华会”三千群众在九龙庵开会，决定起义；蓝正樽自号卫王，改元“刚建”。第二天，起义军兵分三路，向武冈进军，一路由陈仲潮率领，一路由蒋玉先率领，一路由蓝正樽自己率领。

三路大军将在武冈城下会师。蓝正樽本来还算是一个正直的人，当上“卫王”后，头脑也不太清楚，本来也就三千人，他偏要学着大元帅的样子兵分三路，其实他也就想感受一下号令大军的感觉，其实根本没必要分成三路。

出征之前，蓝正樽任命邹元佐为元帅，让邹元佐拿着自己的“诏书”号令城内文武百官投降。邹元佐其实只是个使者，他要求进城跟知府谈话，知府徐璿放他进来。邹元佐进来以后，非常骄横地告诉徐璿，现在归顺就是功臣，再晚了就是罪臣。徐璿大骂邹元佐信口雌黄，将他关进大牢里。

招降失败后，蓝正樽号令攻城。蓝正樽这人从来没有打过仗，只是因为帮瑶民“维权”，有一定的威望。当他担任军队的总指挥，对于军事的无知立刻暴露了出来。

蒋玉先率军进攻西门，西门防御很强，只能退回，转攻南门。攻进南门后，在校武场遇上了武冈千总张大宏，起义军不敌，只能撤退。蓝正樽当然不肯就此作罢，气势汹汹地来，不能灰头土脸地回去，下令强攻，今天一定要拿下武冈城。

当知府徐璿拿出红衣大炮时，他们才真正尝到了厉害，也明白了军队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看到起义军死伤一大片，蓝正樽头脑清醒了许多，下令撤退。

能退到什么地方去呢？蓝正樽也不懂啊，他只是个平凡的瑶民，哪有什么战略规划。他甚至都不清楚他到底在干吗，他不明白他是在带着大家送死，最多不过是给道光留下一个经验总结：对待瑶民不能太苛刻了。即便如此，蓝正樽自己也是难逃一死的。

退到蔡家塘后，乡绅张谦殷勤地招待起义军，蓝正樽没有城府之心，以为这人真的是对自己好。他万万没有料到，张谦表面上好酒好肉地招待他们，私下里却早已派遣人去向官府禀报。当起义军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官府的人马已经将蔡家塘重重包围。

就这样，蓝正樽起义还没几天就失败了，而且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就镇压了这场叛乱。蓝正樽这人虽然没有其他能力，但从他及早逃脱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非常警觉的人。

虽然这次起义动静不大，但是道光却高度重视，对于起义这种事道光一向是敏感的。听说蓝正樽下落不明，他急调湖广总督纳尔经额去搜捕。湖南巡抚荣光本来已经光荣卸任，道光让他留在那里观察形势，新任的湖南巡抚裕泰也赶往湖南剿匪。如此兴师动众让人感觉道光真有点小题大做。

蓝正樽的下落如何呢？那次在蔡家塘，得知官兵赶来，蓝正樽神不知鬼不觉地脱身，换上乡民的服装逃到漆家湾。没想到跟当地乡勇发生冲突，蓝正樽被乡勇用石头打死。听到这个消息，道光半信半疑，让新任的湖广总督林则徐去调查此事。林则徐是个实在的人，他办事道光放心。林则徐经过查证后表示，蓝正樽确实死于乡民之手，道光本该卸下心头重压，睡一个安稳觉了。但是他凭“直觉”认为林则徐在骗自己，他感觉，当然只是感觉，蓝正樽没有死，还藏在山中的某个地方。

道光被心中的怀疑折磨得非常痛苦，一气之下，将纳尔经额降

职，调到西藏去，永远不许回京。林则徐也被处罚了，降五级留任。

第三次瑶民起义是由一个叫雷再浩的人发动的。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九月十日，湖南新宁县瑶民雷再浩联合汉人李辉、陈名机等人在连州发动起义。雷再浩起义也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清军扑灭，但清军也付出了代价，多少为雷再浩挽回一点面子。起义军击毙了清军守备李廷杨、千总刘春林，还有外委陈国熊、马瑞春等人。

第四次瑶民起义的发起人还是湖南新宁县的村民，此人名叫李沅。这次起义有黑社会性质，都是一些“拜把子”兄弟干的，他们成立了“把子会”，打算学梁山好汉，劫富济贫。后来李沅的兄弟们被官府抓进去了，李沅带着兄弟们劫狱，就这样拉开了造反的序幕。

起义以后李沅不称王也不称元帅，自称“总大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哥大，打出“劫富济贫”的口号。这次起义发展很快，清军动用了一万多官兵剿匪，直到道光死后三个月起义才被镇压下去。

可怕的敌人

彝族起义也好，瑶民起义也好，跟后来的起义相比，都不过是给帝国挠痒痒。

白莲教曾经把乾隆和嘉庆折腾得很惨，虽然最后被扑灭，但是到了道光朝又死灰复燃。道光末年，河南出现了一个叫朱麻子的人，这个人企图复兴白莲教，召集了几百人起义。朱麻子等人虽然被清军火速扑灭，但就像野火一样，是一个不好的开端。很多人打着白莲教的名义搞一些地下活动，“白莲教”是清廷统治者非常敏感的三个字。

王朝衰落之际，过去已经销声匿迹的一些“妖孽”往往会再度复活，这不，天地会也冒出来了。道光十二年（1832年），台湾嘉义县的天地会首领陈办、张丙等人率众起义，一时之间，台湾云集响应，将嘉义城包围得密不透风。清军大批将领被天地会杀害，一时间起义军膨胀过万。

接着，便是政府从全国各地向台湾调兵，义军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对于清廷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道光十五年（1835年），山西爆发了先天教起义。这场起义在嘉庆年间就开始酝酿，直到道光年间才爆发，起义虽然失败了，却给道光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所以，道光下令从严处罚作乱之人，凌迟、摘

心、斩首的有一百多人。

从道光元年（1821年）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全国爆发的起义多达二百五十多次，叛乱如此频繁，足见当时国家的衰败。但是道光没有想到，更可怕的敌人还在后头呢！

捻子正气势汹汹地向大清国涌来，在捻子身后是更可怕的太平天国，在太平天国背后，站立着一个疯狂的广东人：洪秀全。

先说说捻子吧！

捻子是民间一个秘密的社团组织，据说在康熙年间就存在，甚至有人说在明末就存在。捻子主要是由手工业者和农民组成，在嘉庆年间，他们的活动开始频繁。捻子是北方的方言，意思是一伙人、一群人。嘉庆末年（1820年），捻子在安徽、江苏、山东一带异常活跃，数十上百人为一捻，大的捻子甚至有几千人。很多私盐交易都是捻子在背后干的。

捻子恐怖的地方在于他们并不是一支专业的造反队伍，相反全是一些潜伏派，是民间广布的火种。平常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就像老实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一到特殊时刻就摇身一变为土匪。孙玉庭曾经向道光奏报捻子的危害，道光着令他查访缉拿，不过捻子的人数太多了，抓到几个首领对他们不构成任何损失。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捻党在直隶活动，白天横行，晚上打劫。清军前来镇压，和捻军在王家楼大战。此后又有许多小规模战役，这些小打小闹的战役就像是热身赛。虽然由于清军的镇压，直隶一带捻子活动暂告平息。但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山东捻党又活跃起来，分批进入河南和直隶。这些捻子虽然没有对清军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是分散的无孔不入地骚扰更让人难受，不时发生官银被劫被盗的事情，搞得这些省份不得安宁。

从分散的捻子转化为有组织有预谋的捻军，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就像是化学反应，需要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

疯狂的落第秀才

晚清历史上最疯狂的人莫过于洪秀全了。

洪秀全原名火秀，又名任坤，后来给自己取了个“秀全”的名字。他是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出生于一个耕读家庭。在中国

封建社会有很多这样的家庭，一家人都在种田，供着一个有希望的孩子读书，指望这孩子将来有一天鲤鱼跃龙门。

洪秀全从小就被寄予了深厚又沉重的希望，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自尊心也是薄弱的。据说洪秀全小时候读书还真不错，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村里一些阅人犀利的老人都认为这孩子将来有出息，应该能金榜题名，步入仕途。

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不知道是当时主考官有问题，还是洪秀全天赋才学不够，考了三次连秀才都没考上。第三次落选之时洪秀全已经二十五岁，老大不小了，还是个单身汉，连个文凭也没有，更不用说工作了。

这次落第给了洪秀全一个沉重的打击，回家以后，就病倒了。这一病居然改变了他的命运，在梦中他好像神游了一趟基督教的天堂。洪秀全曾经在第二次落第之时，发现了一本《劝世良言》的小册子，书中宣扬的全是基督教的思想，当时洪秀全心情非常低落，正需要这种东西寻求精神上的安慰。

病好了，洪秀全却疯了，他逢人便说自己是耶稣的兄弟，是上帝让他下凡斩妖除魔。这下，洪秀全犹如醍醐灌顶，把儒家的四书五经全扔了，发誓从此不考科举，要宣扬基督教。这时，洪秀全连《圣经》都没摸过，所有关于基督教的思想都是来自那本《劝世良言》。

洪秀全告诉大家：“现在人心败坏，政治腐败，不久老天就会降灾于这个世界，只有信仰上帝才能避免灾难啊！入了上帝教，不分男女，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信不信由你们，反正我是信的。”

乡亲们问他：“你就这么肯定？”

洪秀全表情沉重地说：“是的，非常肯定。因为上帝是我爸爸，耶稣是我哥哥，他们让我下凡来了，来拯救你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同胞。”

你还别说，真有很多人信他，受苦受难的人实在太多了。第一个相信他的是洪秀全的表弟冯云山，他很快成了洪秀全的得力助手，跟着表哥一起传教。

洪秀全到广州传教后，效果不是很好，广州是个富裕的城市，劳苦大众没有穷乡僻壤多，大家犯不着加入邪教啊！最后，这兄弟俩学乖了，跑到山区去传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经过两年多的宣传，终于吸纳了两三千名教徒。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正式成立“拜上帝会”。

直到此时，洪秀全心里可能还没有造反的想法，否则他不会跑到家里著书立说。如果说洪秀全这是奠定理论成果，为后来的革命制定方针政策，那也不对，从后来的表现看，洪秀全并不是这么深谋远虑的一个人。他要真有这种智慧，也不至于后来把太平天国弄得那么糟。

后来，洪秀全还考虑进修，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理论。罗孝全是个负责任的牧师，他拒绝为洪秀全这种双重大逆不道的人洗礼，他清楚地看到洪秀全根本不是什么基督徒，而且一个居心叵测的野心家。洪秀全自诩为上帝的儿子是对上帝的大不敬，领导太平天国运动，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既是对清廷的大逆不道，也是对华夏文明施暴。

洪秀全快快而归，开始了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大业。洪秀全忽悠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可能是因为有一股强大的激情指引，在他的领导下，拜上帝会的规模迅速膨胀。

不幸的是，十二月份，冯云山被捕入狱。后来，拜上帝会的人把冯云山救了出来。洪、冯二人回到了紫荆山，让洪秀全感到欣慰的是，拜上帝会的教徒已发展过万。这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拜上帝会团体里已经人才济济，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这些人都是在这时加入的。拜上帝会也不仅仅局限于广东，在广西也得到迅速发展。

造反的念头可能就是在这时开始的。洪秀全知道，天无二主，清廷是不会容许拜上帝会发展下去的，到最后必然分出个胜负。这段时间，洪秀全也在积极筹划武装起义的事情。起义还没有爆发，道光就已经死去。

这场PK注定要由道光的儿子咸丰来完成，咸丰当然不是洪秀全的对手，不过咸丰手中有一张克敌制胜的王牌：曾国藩。鹿死谁手我们已经知道，看来多读点儿书学习努力一点儿还是有好处的，不学无术的洪秀全终究不是传统士大夫曾国藩的对手。

道光死后不到半年，洪秀全召集各路人马，在广西桂平市北部金田村商议起义之事。两万人马齐聚金田，建立了太平天国，一个庞大物就这样诞生了。腐朽的清王朝和一个蛊惑人心的野心家正式开战。王朝虽然衰朽，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野心家虽然恐怖，毕竟领导的是一群非理性的“暴民”。谁胜谁负，当时还真没人能看出来。

下一本书我们将展现太平天国的全貌，再现真实的洪秀全和他手下那些叱咤风云的将领，为您揭开太平天国风云背后的血腥与争夺。

风雨飘摇 大清风云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鹿鼎公子 著



比野史
更靠谱

柒

太平天国、列强入侵、慈禧染政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晚清重臣轮番登场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比正史
更有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风云 . 7 , 风雨飘摇 / 鹿鼎公子著. —北京 : 中国法制出版社 , 2016.3

ISBN 978-7-5093-7311-8

I. ①大... II. ①鹿... III. ①中国历史 - 清代 - 通俗读物 IV. 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44243号

策划编辑 : 胡 艺 (ngaihu@gmail.com)

责任编辑 : 张 津

(zj2007011567@163.com)
化

封面设计 : 古润文

大清风云 : 风雨飘摇

DAQING FENGYUN: FENGYU PIAOYAO

著者/鹿鼎公子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张/8.125 字数/157千

印

版次/2016年5月第1版
5月第1次印刷

2016年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093-7311-8
价 : 29.80元

定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010-66026508

值班电话 :

邮政编码100031
010-66031119

传真 :

网址：<http://www.zgfzs.com>
电话：010-66053217

编辑部

市场营销部电话：010-66033393
电话：010-66033288

邮购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清朝皇帝列表

姓名	庙号	年号	谥号	在位时间	皇陵
努尔哈赤	太祖	天命	高皇帝	1616—1626 年	福陵
皇太极	太宗	天聪 崇德	文皇帝	1626—1643 年	昭陵
福临	世祖	顺治	章皇帝	1643—1661 年	孝陵
玄烨	圣祖	康熙	仁皇帝	1661—1722 年	景陵
胤禩	世宗	雍正	宪皇帝	1722—1735 年	泰陵
弘历	高宗	乾隆	纯皇帝	1735—1795 年	裕陵
颙琰	仁宗	嘉庆	睿皇帝	1796—1820 年	昌陵
旻宁	宣宗	道光	成皇帝	1820—1850 年	慕陵
奕訢	文宗	咸丰	显皇帝	1850—1861 年	定陵
载淳	穆宗	同治	毅皇帝	1861—1875 年	惠陵
载湉	德宗	光绪	景皇帝	1875—1908 年	崇陵
溥仪	逊帝	宣统	—	1908—1912 年	华龙陵园



咸丰帝像

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訢 (1831 - 1861)，即咸丰帝。清朝第九位皇帝，入关后的第七位皇帝，清代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手中握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也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



曾国藩书法

“止于至善”，谓处于最完美的境界。来源于《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曾国藩是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与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并称“四大名臣”，谥“文正”。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有人推崇他为千古第一完人。



慈禧

慈禧（1835—1908）即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咸丰帝的妃嫔，同治帝的生母。晚清重要政治人物，清朝晚期实际统治者。



任薰画作

任薰(1835—1893)，清代画家。字舜琴、阜长，籍贯萧山人，“海上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与兄任熊、侄任预、族侄任颐被后人合称“海上四任”。善画人物、山水、花卉、禽鸟。亦长于园林设计。其人花鸟画工写兼善，取景布局，富有奇趣。

总序

清史洋洋洒洒近三百年，三百年间怪事、奇事、惨事、恨事迭出，三百年年年都精彩，年年都有挥之不去的喜怒爱恨。整个清朝三百年，几乎囊括了人性中一切的极端面，三百年，道不尽的风云爱恨。

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骑兵，建立了后金，身后留下了无数的尸体，最终倒在宁远城下，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书生袁崇焕手中，就此郁郁而终，这是上天对一个暴力征服者的最大讽刺。随后，努尔哈赤诸子开始斗智斗勇，最后皇太极靠谋略成为老大。

皇太极穷其一生精力都在与明朝对抗，不幸暴毙后，大清国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多尔衮与豪格之争最终便宜了顺治。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后，成为皇父摄政王，将全国军政大权操于一身，顺治完全被架空。此时，孝庄和顺治母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危难关头，孝庄舍身保大清，稳住多尔衮，终于使大清逃过这一劫。

顺治是个痴情天子，亲政后喜欢跟母亲孝庄闹不愉快，结果自己和董鄂妃双双去世。康熙继位时才八岁，不过这是个早熟的孩子，也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很早就懂得帝王之术。在别人还是懵懂少年时，他就已经像个猎人一样盯紧了鳌拜，除掉鳌拜之后，康熙开始了自己雄才大略的一生。

康熙治国和外交不外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所以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鳌拜，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荡平准噶尔，击退沙俄侵略……在整个清朝，帝王之术在康熙手中达到顶峰。

然而，康熙也有缺点，他的法度不够严明，治国主要是依靠儒术和道术。雍正虽然上位不明不白，但当皇帝后弥补了康熙的缺点，雍正治国理念上最大限度地奉行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乾隆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他继位后，废除雍正的依法治国思路，重新走康熙的路子。但乾隆并不懂康熙真正的治国精髓，结果变成了外用儒术、内用权术，所以清朝在乾隆时期开始走向衰落。

自乾隆后期，动乱纷起，尤其是白莲教叛乱几乎烧遍整个中国。到了嘉庆手中，国家元气已大伤，嘉庆虽然是个仁君，可惜终究没有先祖那份雄才。他虽然减缓了国家的衰颓，但始终没能重振大清的雄风。到了道光手中，国家就更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欺负得

够呛，国内的动乱更是风起云涌。

咸丰就更悲剧了，太平天国和天地会起义，全国天翻地覆。更糟的是八国联军来了，他连个京城都保不住，年仅三十岁便郁郁而去。咸丰死后，朝政大权掌握在“龙夫人”慈禧手中，国家每况愈下，虽然中途出现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可惜终究是昙花一现。

清末虽然出现了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袁世凯这样的中兴名臣，但亡局已定，神仙也不能力挽狂澜。最终，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千古帝王，悠悠万事，功过自有百姓言，清朝这些事儿，就交给读者去慢慢品味吧！

前言

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将大清帝国推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一个科举失意的读书人受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的启发，创立拜上帝教，太平天国运动以烽火燎原之势席卷大清版图。遗憾的是，领导层的内讧导致太平天国的局面急转直下。而大清王朝气数未尽，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晚清重臣轮番登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大清帝国在落幕之前上演了一出精彩纷呈、跌宕起伏的大戏。

咸丰皇帝就是在风雨飘摇中接过大清帝国的权柄。他也很想有一番作为，遗憾的是，时运不济，一边是太平天国的内忧，一边是列强环伺的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将这位倒霉皇帝推到了腹背受敌的悲惨境地。国库空空如也，手下的臣子又不争气，天津沦陷了，北京沦陷了，圆明园付之一炬，咸丰内心的窝囊和委屈无处宣泄，只能徘徊于后宫，沉沦于欲海，暂且忘却无边的烦恼。可是，嫔妃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争宠弄权，勾心斗角，或许咸丰皇帝在内心深处会大吼一声：朕富有四海，可却找不到一块清静地。

岂止是他生前不得清静，在他死后，两宫太后联手，将他临终托孤的顾命大臣铲除，慈禧更是垂帘听政长达半个世纪，帝国的权柄牢牢地掌握在一个女人的手中。这个女人不寻常，她是在苦苦支撑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延续着苟延残喘的国运，还是将最后一丝复兴的希望窒息呢？历史自有公论。

目 录

清朝皇帝列表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太平存在于天国

洪教主的梦想

来土之争

金田起义

教主万寿

漂亮的一仗

钦差大臣不管用

永安很重要

第二章 通往南京之路

永安大战

天德王洪大全之谜

蓑衣渡大劫

血染长沙

左宗棠这个人

定都之争

攻打武昌

天国的旗帜飘在南京上空

第三章 决定天国存亡的北伐与西征

改造天京

也谈谈北伐

纵横北国，过把瘾就死

西征前期战果辉煌

第四章 曾剃头来了

传奇人物曾国藩

可怕的湘军

湘军四虎将

西征军的落日

曾国藩大战石达开

门口拔牙

第五章 这一年天京有血光之灾

天王恨东王

借刀除东王

天国大地震

第六章 天国的覆灭

石达开出走

翼王断翅

天国丧钟

第七章 命苦的皇帝

平庸皇帝

成立智囊团

一帮不争气的督抚

财政红得刺眼

不靠外国人

误事宠臣叶名琛

第八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亚罗号事件引爆战争

虎视眈眈的俄国

可怜的叶名琛

天津沦陷

公使驻京问题

大沽口胜利

怎么打都是输

圆明园劫难

第九章 风流短命的皇帝

风云诡谲的后宫

逐鹿后宫

失意皇帝纵横欲海

第十章 告别这个让人伤心的世界

热河度假

临终顾命伏祸端

两宫智除肃顺

第一章 太平存在于天国

造神运动就这么如火如荼地搞起来了，太平天国的领导人虽然都起于草根，但个个深知造神运动的奥妙。也许正因为他们起于草根，才如此了解造神的必要性。造神与愚民是统治之术的两面，虽然太平天国一再被拔高，但毫无疑问它的本质还是一个封建政权。

洪教主的梦想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在封建时代是深入人心的。

当读书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时，功名二字将是所有读书人心中的一个重压，考不取功名意味着对一个读书人的否定。从这个角度来看，洪秀全实在太不幸了，但是他并不甘心接受命运的摆布，就跟唐朝时的黄巢一样，他心中也有强烈的富贵梦，渴望成为人上人。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是黄巢在落第之后写下的一首咏菊的诗，诗中豪情万丈，充满杀气，由此可见科举的杀伤力。能够写出这样好诗的人居然考不上科举，又可见当时科场之腐败。

洪秀全落第以后又有什么表现呢？老实说，洪秀全没有黄巢那样的万丈豪情，也没有那样的诗情画意，当他看到自己榜上无名后，对着榜单一阵唾沫，骂了句脏话，便郁郁而归。

回去以后，洪秀全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外人都以为他生病了，其实他确实生病了。但是不出门的主要原因是无脸见人，虽然他的脸皮已经很厚，但毕竟考了这么多次，结果连个秀才也没捞上。极度的悲愤加上羞耻，还有发高烧，在洪秀全的头脑里产生化学反应，历史上的那些宗教和邪教创始人都有这种类似于癫狂的体验。

稀里糊涂中，洪秀全忽然觉得自己是上帝派下来的二儿子，肩负着拯救万民的使命。这个想法虽然疯狂，好歹平衡了他受伤的自尊心。

有了这般神奇的体验，洪秀全提笔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这首诗严格说来不算是诗，但是傻子也能看出反意昭然。写归写，洪秀全这时还真没有造反的打算，只不过是发泄对清王朝的满腔仇恨而已。

科举的路走不通，洪秀全选择了上帝，当然，这个上帝是洪秀全的上帝，并不是基督教上帝。洪秀全带着表弟冯云山开始传教，还别说，真有一些人相信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冯云山似乎显得更有才能，他能招揽更多的教众。

随着教众越来越多，洪秀全得意之下，写下了一首诗：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效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这又是一首反诗，由于洪秀全坚持不懈地传播自己的“反意”，最终丢掉了私塾老师这个饭碗。失去饭碗后，洪秀全带着冯云山和教众们出门闯荡，刚开始他们到广州城里传教，发现效果不好。退而求其次，到乡野间去传教。这次多少有些收获，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招到了几十个教徒。

不久，洪秀全和冯云山商议去广西传教，或许那里情况会有所不同吧！到了广西，情况并没有好转。中国的老百姓都没听说过什么上帝，大家只知道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土地公等等，你让他们信上帝，这不是让他们使刀叉吗？一时之间肯定是办不到的。

失望之下，洪秀全又回到了老家花县。他回家以后干吗呢？说来也没干什么大事，而是捡起课本，重新到私塾里授课，人毕竟是要吃饭的。当时，洪秀全是很努力的一个人，他白天教书，晚上回家研究

上帝这门学问，还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和《改邪归正》等文章。他无非是从基督教思想中断章取义一些东西，然后再用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述出来。

英国一个传教士曾这么评价洪秀全：“如果教皇有权处置他（洪秀全）的话，早把他烧死了。”

洪秀全写的这些东西虽然不伦不类，但好歹算是一种理论积累吧！这些东西对于他后来的“革命”还是很重要的。

与此同时，冯云山还在广西那边苦口婆心地传教。冯云山跟洪秀全一样，也是个落第秀才，所以两人特别有共同语言。不过，冯云山的性格跟洪秀全恰恰相反，洪秀全属于夸夸其谈的理论家，冯云山更多地是一个实干家。两人到广西后，洪秀全半途而归，冯云山却坚持了下去。

他一边教书、打短工养活自己，一边传播“新思想”。冯云山是一个非常毅力的人，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他。到1847年时，冯云山已经有两千多个教众了。在这些人群中，已经有像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这样的“开国功臣”了。

洪秀全听说冯云山在广西混得挺好的，便赶了过来，顺利地接过了领导权。

人多好闹事，但现在的势力还不足以跟官府直接对抗，得扩大影响，加大宣传力度。洪秀全和冯云山商量出一个点子，准备先从象州的甘王庙下手。甘王庙其实就是一个破庙，这个叫甘王的人并不是什么神，本是五代时期一个将领，叫甘佃，原名罗应，经历颇为传奇，曾跟着刘裕一起打天下，刘裕准备封他为护国大将军，被他拒绝了，他只要求刘裕免去自己家乡的皇粮。所以，他死后被象州人奉为神。

这年十月，洪秀全带着大家冲进甘王庙里，把里面的东西砸个稀巴烂，并宣布甘王为邪神，以后不准祭拜他。这么一来，当地老百姓不干了，我们的偶像好好的，你干吗砸他啊，还不让我们祭拜，岂有此理。当地的乡勇们拿起武器，准备跟洪秀全大干一场。这时，忽然有一个男孩倒在庙前，自称是甘王附体，哆哆嗦嗦地说道：“你们千万不要伤害这些打我的人，他们是神圣的，得罪不得。”

老百姓一看吓坏了，纷纷逃回家。洪秀全笑道，成功了。等乡民们散开以后，他拍着小孩的肩膀说：“你真机灵，来，这些都是赏你的。”

打倒甘王后，洪秀全带着教众们开始肆无忌惮地破坏民间的各种神，谁也不敢再阻拦他们。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拜上帝会。

事情闹大了也会有麻烦，官府们盯上了拜上帝会，并在乡勇的带领下抓捕了冯云山。冯云山到狱中坚称自己只是信仰基督教，并没有做不法的事情。桂平县的知县担心事情闹大了可能会引起教徒们动乱，为了息事宁人，决定放了冯云山。知县让两个官差把冯云山押回家乡，没想到半路上冯云山居然成功劝说这两个差役加入拜上帝会。

其实冯云山出狱的真正原因是教徒们集资打点县衙。冯云山被捕之时，洪秀全在干吗呢？他匆匆赶到广州，准备向两广总督耆英告状，救出冯云山。

来土之争

冯云山被捕是洪秀全集团的第一个风波，凡有风波的地方难免会产生一些风险。

冯云山被捕之后，洪秀全去了广州，拜上帝会群龙无首，谁在主持呢？

这时候，稳定局势的是杨秀清和萧朝贵，杨秀清看到教众们心态不稳。当着众人的面突然倒地，接着一个鲤鱼打挺，忽然站起来，开始说胡话了，自称是天父附体。杨秀清转达了“天父”的意思，把思想摇摆不定的黄氏家族驱逐出拜上帝会，客观上维护了这个团体的稳定，也缓解了内部的骚乱情绪。杨秀清因为此事威望骤增。

萧朝贵在一旁看杨秀清表演，也学着他的样子，突然倒地，突然站起，自称“天兄”耶稣附体，与杨秀清配合得天衣无缝。

这事洪秀全和冯云山都不知道，这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杨秀清成了天父的代言人、萧朝贵成了天兄的代言人，那洪秀全和冯云山干吗呢？洪秀全和冯云山知道此事后，两人商量怎么处理，经过仔细的观察，他们断定杨秀清和萧朝贵当时只是为了稳定教众，并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决定承认这件事。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杨秀清和萧朝贵不过是上帝和耶稣的代言人，地位不可能超过洪秀全这个上帝的亲儿子。

杨秀清是一个孤儿，五岁丧父，九岁丧母，从小跟着伯父生活。长大后以烧炭为生，由于职业关系，杨秀清的健康很糟，身体瘦弱，一只眼睛斜视。不过，杨秀清这人头脑相当好，善于结交朋友。萧朝贵是杨秀清的同事，也是烧炭的，如果说杨秀清长相奇怪的话，那么他的长相就堪称丑陋凶恶了。

这件事让洪秀全意识到巩固个人权威的重要性，后来洪秀全多次装神弄鬼，加上他懂得一些医术，在教众的眼里他变成一个无可替代的神人。1850年，金田村一个叫韦昌辉的大财主加入拜上帝会，这是加入拜上帝会的第一个有钱人。我们知道拜上帝会主要是由一些穷苦落魄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来历也有所不同。

要了解太平天国起义，不能无视客家人这个群体。太平天国的领导层主要是由客家人组成，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都是客家人。客家人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从名字上看，“客家”有客居的意思，那么我们有理由猜测这些人最早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

这就必须考察客家人的起源，其实客家人是货真价实的中原汉人。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候，秦始皇南征北战，曾经派遣五十万大军进驻岭南，这五十万大军在蛮荒之地定居下来，传播中原文化。没想到，秦始皇死后，帝国就开始崩溃，这五十万大军只能自生自灭。当时秦帝国人心尽失，留在南越的秦军或者因为消息不通，或者因为不愿“逆流而行”，居然没有在帝国最危急的关头，前去咸阳勤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支驻留南越的大军逐渐化为百姓，开始了他们漫长的迁徙生活，最终这个群体演变成客家人。客家人保留着秦人那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们重传统、讲道理，有古代秦人的遗风。

由于客家人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这就让他们与南方本地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来土之争就是指客家人和当地人之间的矛盾，所谓“来人”是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客家人，所谓“土人”就是广西当地的土生土长的人，这些人中既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人民。

广西这地方在古代较少受到儒家礼教的约束，民风颇为彪悍。在广西，民间械斗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而且这种民间械斗的规模相当大，在先秦时期都可以算得上是小规模战争了。其中，以来人和土人的矛盾最为激烈，有时候会出现上万人PK的场面。

由于大家都是老百姓，因而使用的器械相对粗糙，往往是一些农具之类。用这种器械搏斗的话，不容易打死人，打伤人却很轻松。不像军队打仗，往往一两天就结束战斗，有时候甚至用不了一天，几个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但广西民间这种械斗却显得很持久，有时客家人和土著人能打上几十天，这种刚猛的战斗精神让人很佩服，但最后往往是以两败俱伤收场。双方都是带着极大的仇恨参加械斗的，就算是官府来制止也不管用。

这就是洪秀全金田起义的目的，他要组织一支有效的军队来对付土著人。所以，他最开始的目的并不是反清，只是后来阴错阳差到了那地步，才举起反清的大旗。

金田起义

来土之争给洪秀全制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威望把客家人聚拢起来，共同对付土人。

在起事之前，精明的洪秀全把家人都接到广西；冯云山就没有洪秀全这么机警，所以起事之后，家人被官府拿住，基本上都被砍头了。洪秀全和冯云山的祖坟也被刨得一千二净。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广西的客家人纷纷涌入金田村。刚开始的时候，官府以为这些人是逃难的。对于来人和土人的矛盾，官府一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韦昌辉也是客家人，他出身于大地主，别的没有，就是钱多。所以，金田起义前，韦昌辉的主要任务是出资打造兵器，洪秀全甚至干脆把总部设在韦昌辉的家里。

看到各路人马都来齐了，洪秀全诗兴大发，写了一首志满意得的诗：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墨雾收残一鉴中。

这首诗烂得可以，但意思还是可以看清楚，洪秀全把自己比作是刘邦、朱元璋那样的人物。

1851年1月11日，这天是洪秀全的生日，也是太平天国的第一天。造反是没有回头路的，洪秀全只能死撑下去。一些拜上帝会的信徒在前往金田村的途中跟清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双方都死了不少人。所以，洪秀全不可能再说自己是搞和平聚会了。

在与清军的交战过程中，杨秀清脱颖而出，首场胜利就是他取得的。杨秀清率领几千人击败浔州副将李殿元，并击杀了其中一个巡

检。这一战鼓舞了教众们的勇气，在这场战斗中，杨秀清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军事头脑。当时洪秀全和冯云山在思旺指挥战斗，被清军包围了，杨秀清破关卡、败清军，解救洪秀全，将他迎回金田。所以，这场战斗在太平天国里又叫“迎主之战”。由此可见，这是决定太平天国命运的一战，如果杨秀清厚黑一点，让洪秀全先被清军灭掉，然后打出为洪秀全复仇的口号，杨秀清可能就是第二个朱元璋了，而洪秀全充其量只能当韩山童。

在这场“迎主之战”中，烧炭出身的杨秀清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华。他先派人秘密拿掉了清军关卡，随后对围困洪秀全的清军进行偷袭，整个部署堪称佳作，在调兵遣将这块，杨秀清也表现出了知人善任的智慧，所以他后来成为太平天国的实际掌权者并不是偶然的。

金田起义发生后，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他们觉得这不过是地方上一些乱民在闹事，甚至都不知道拜上帝会这个组织。至于洪秀全的大名，还不曾传入清朝高层的耳中。

不过思旺之战已经把广西地方政府吓坏了，广西和贵州两省加紧训练乡勇团练，与清军正规军一起，兵分两路向金田进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客家人汇聚在洪秀全的麾下。

得知清军要来进攻，大家似乎也不是很怕，因为大家有洪秀全这样的精神领袖。洪秀全不是人，他是上帝的二儿子，有神的支持，纵使再多妖魔鬼怪也不在话下。不等清军来进攻，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就带着教众挥舞着大刀长矛朝清军冲过去，完全一副神灵附体的状态。当地的乡勇打前锋，清军跟在后面，当他们看到太平天国的这些人完全像疯子一样时，都吓呆了。天哪，从哪里来的一群不怕死的人！两军还没交战，乡勇和清军们就开始溃退。

清军将领伊克坦布想阻止众人溃退，却被自己的士兵撞下马来，来不及逃跑就被太平天国的人杀死。

这一战，太平天国赢得很轻松，大家更加信任上帝之子洪秀全。

教主万寿

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初十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就在洪秀全万寿的时候，道光却走完了自己悲催的一生。

洪秀全这次生日对于太平天国的意义非比寻常，这不单是庆祝一个中年人的生日，更是庆祝一股新生势力的崛起。就像一切新生事物

一样，这股势力刚刚崛起的时候还没有表现出它的狰狞面目，反而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争权夺利，甚至称得上纪律严明。

拜上帝会的同志们欢聚一堂，庆祝天王的伟大生日。庆典中，洪秀全再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是普照万方的红太阳，杨秀清是圣神风，萧朝贵是雨神，冯云山是云神，韦昌辉是雷神，石达开是电神。总之，这些领导者全都不是凡人，而是天神下凡。如果上帝知道自己跟这些杂牌神混在一起，真不知作何感想。

造神运动就这么如火如荼地搞起来了，太平天国的领导人虽然都起于草根，但个个深知造神运动的奥妙。也许正因为他们起于草根，才如此了解造神的必要性。造神与愚民是统治之术的两面，虽然太平天国一再被拔高，但毫无疑问它的本质还是一个封建政权。

也就是在这次庆典上，洪秀全自称太平真主，他的军队称为太平军，正式打出反清大旗。说到太平这个词语我们实在太熟悉了，倒不在于这个词语反映了什么太平的愿望，而是因为它往往跟叛乱联系在一起。东汉的张角创立太平道，拉开黄巾起义的大旗；现在洪秀全创立太平天国意义也是一样的。

在洪秀全之前，没有人把“太平”和“天国”联系在一起，倒是宋太宗赵光义取了个“太平兴国”的年号。宋太宗的本意是消融别人对自己篡位的猜测，洪秀全把“太平”和“天国”搁在一起，是想用西方的矛攻东方的盾，刺穿了清廷，然后重新树立起“东方的盾”。

在庆祝自己万寿的时候，洪秀全发布了五项军纪：

- 一、绝对服从洪秀全的领导。
- 二、分立男营女营。
- 三、对百姓秋毫无犯。
- 四、所有教众的财产归公家所有。
- 五、大家齐心合力，打仗时不可以临阵退缩。

洪秀全都已经称王了，咸丰当然不能坐视他壮大，咸丰想启用老辣干练的林则徐。以林则徐的才干能力，镇压一批刚刚兴起的叛乱之众自然不是问题。然而，天不假人意，此时被贬伊犁的林则徐已是一个年迈的老者，当他接到圣旨的时候，心中感激皇恩浩荡。可惜，返京的路上他就病死了，这对林则徐来说多少是幸运的，也免去了后来被戴上镇压农民起义的大帽子的风险。

林则徐既死，咸丰便任命两江总督李星沅接替他。李星沅调动了

六省的军队前去进剿，不过人数倒不多，总共才一万多人。咸丰还任命悍将向荣为广西提督，和布政使周天爵一起配合李星沅剿匪。

咸丰元年（1851年）正月，双方在大湟江口和牛排岭发生激战，太平军多次搞伏击，击败向荣部队。后来，清军联合作战，逼退太平军。随后，太平军开始了战略转移，移师武宣和象州一带。二月二十八日，洪秀全抵达武宣东乡，在这里完成了太平天国制度建设。

洪秀全自称天王，长子洪天贵为幼天王。洪秀全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觉得儿子洪天贵的名字不够拉风，在后面加了一个“福”字，变成了“洪天贵福”，成就了最奇特的名字。如果有人叫洪天贵福，我们一定认为他复姓“洪天”，如果说一个人姓洪，名天贵福，这就相当怪异了，不过洪秀全本就是个不伦不类的人，否则也不会打着上帝的名义造反。

这个洪天贵福据说也是一个有才气的人，写诗很有乃父之风，我们不妨来看看。

投降清朝后，洪天贵福写了这样一首诗：“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意辅清朝。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逃。”如果我们从正面去推测的话，唯一的可能是洪天贵福在装疯卖傻，想借此保命。

洪天贵福还写过一首情诗：“哥别妹，妹别哥，别上天，无别魔。瞞天混杂是妖魔，妹大五岁手别摸，妹大九岁远别清。男行女行不同座，妹长成时不相见，遵条福别福江河。”

洪秀全的诗歌遣词造句特别烂，但好歹有一股气势，有那么一点点科举教育遗留下来的古风。洪天贵福写诗除了胡乱遣词造句，则完全是现代派。

未来的继承人确定后，在冯云山的主持下，洪秀全把军队分为五支，分别为：中军、前军、后军、右军和左军。杨秀清担任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洪秀全也看过《三国演义》，深知军师的重要性，洪秀全一下拜了四个军师，还是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这些人。

冯云山在太平天国中的角色有点类似于萧何，他按《周礼》为洪秀全设定了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至此，太平天国已经完全像一个小朝廷了。杨秀清成为这个朝廷的二把手，掌管一切军政要务，统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我们不知道洪秀全这个安排的真正用意何在，一般来说，无论是皇帝还是造反领袖，都想大权独揽。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安排一定出自冯云山的头脑。冯云山文史功底比洪秀全强多了，他看到了杨秀清处理政务的能力，也了解表哥洪秀全是个什么样的人，这种安排完全是为了维护集团的利益。冯云山熟悉历史，他一直认为明朝和清朝的腐败是由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当然，这个看法并不是冯云山读书时自己总结出来的，而是直接承袭了黄宗羲的思想。

冯云山也确实有萧何的心胸，所以他在为太平天国制定蓝图时完全站在集团的立场上，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本来，如果没有杨秀清和萧朝贵，冯云山稳坐第二把交椅，现在却要屈居在杨秀清之下，没有容人之量肯定是做不到的。在制度设计时，冯云山一心想“重回汉唐”，在冯云山看来，汉唐制度开明，正是他理想的帝国模板。

洪秀全对这种设计是否满意呢？从史料中看不出洪秀全有任何不满的地方，这可能跟洪秀全的知识水平有关，他看不到这种设计实际上不利于树立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洪秀全不但没有任何不高兴，反而非常开心，自己坐在最高的宝座上，吃喝玩乐，什么都不用操心，真是世间最美的事。等洪秀全意识到这一点时，他跟杨秀清的关系就像历史所揭示的那样，两个人中只能活一个。

看到太平天国已经有了帝国的雏形，洪秀全高兴之下，一口气纳了二十一个妃子，提前享受当皇帝的感觉。

客观地说，太平天国这套制度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管用的，人心划一，所有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所有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所有人都把自己的财产交出来，上缴到“圣库”之中。谁需要花钱就从“圣库”中领取，人人平等，大家同吃同住，天南地北皆兄弟。会众必须要严格禁欲，连夫妻平常也不能会面，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沉溺女色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如果发现男女私底下约会，处以极刑，连正常夫妻都不例外。右丞相陈宗扬和妻子同房被发现，夫妻俩论律当斩首，杨秀清极力保住他们，装着天父附体的样子，情愿为他们挨六十板子，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禁止男女交往很明显违背了人性，这个政策很难推行下去，第二年就被废去。

但不能不承认的是，这种军事化管理和共产主义式的财产制度确实能鼓舞大家的积极性，在革命的初期能让教众们保持高昂的斗志。洪秀全为了表示和清廷对抗到底的决心，号召教众们一起蓄发。此后，清政府称这些蓄发的叛乱者为“长毛”。

漂亮的一仗

周天爵这个人还是有些来头的，他是咸丰老师杜受田的门徒。周天爵做官还不错，不怕得罪人，颇有李卫的风格，但这人很明显有暴力倾向，性格非常顽固。他跟顶头上司李星沅的关系很糟，周天爵提出一整套剿匪的计划，李星沅根本不买账。

周天爵、李星沅、向荣这三人就脾气来说是很像的，三人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服别人，让他们协调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咸丰将这三人安排在一起不知用意何在，说到用人，清朝自康熙以降，几乎是一代不如一代。

清军将帅不和，这对太平军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太平天国高层决定发动一场主动袭击，地点选在三里圩。三里圩是一个丘陵地带，中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村落，这种地带最适合布置伏兵。在此之前，杨秀清先派人查探地形。杨秀清这个人确实有些恐怖，他做事之认真仔细简直不像是烧炭出身。他不仅让人勘察地形，甚至改变地形以适应战事需要。

杨秀清是怎么改变地形的呢？比如说这块地方路口太多了，清军很容易杀进来，就把路口给堵起来；这块地方掩护少，就多搬些石头过来；这条河流正好通向我们的老巢，就想办法把河堤炸掉，迫使河流改道。杨秀清亲临第一线，监督各地防御工事，当时太平军防御之严密连清军都叹为观止。

石达开跟杨秀清性格不一样，他更具进攻性，所以也更加重视枪炮这些武器。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做事情都非常严密有条理。

韦昌辉负责在前线指挥，杨秀清率领主力在后面，等待敌人深入，石达开在关口坚守炮台。整个作战体系是相当严密的，太平军布置成一个布袋的形状，就等着清军钻进来。

周天爵很快就上套了。周天爵是个性情非常急躁的人，尤其是跟李星沅和向荣关系闹僵之后，他想独自率领军队拿下太平军，以此证明自己的实力。周天爵手中的兵马很少，只有一百多人，用一百多人去灭掉两万多太平军，周天爵是不是脑子发热了？说来这周天爵还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听说书的人说岳飞率领八百人破金兵十万铁骑，心想我在路上再招募一两百人，不跟岳飞破金兵的比例差不多吗？

在路上，周天爵又招募了一百多乡勇。周天爵赶到武宣县时还分了一百人给知县刘作肃，自己率一百多人向东乡出发。太平军得到这个消息非常惊慌，没人知道周天爵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话说这个周天爵赶到东乡时，李星沅也急了：他这么搞迟早要连累大家。没办法，只好派出五千人增援。向荣也带着两千乡勇赶了过来。向荣虽然吃了不少败仗，但确实是一个相当勇猛彪悍的将军。洪秀全对他还是心存忌惮的，听说他来了，命令韦昌辉往后撤退。

向荣看太平军撤退，以为这些人都是软蛋，玩起了艺高人胆大的把戏，率领六百孤军深入，结果大家都能猜到，被围了。被围之后，乡勇们只顾逃命，哪还顾得上他向荣。向荣想阻止，他的部下甚至想背后给他一刀。

听说向荣被围住了，周天爵抛弃旧怨，带着四百人前去支援。周天爵不怕死，其他人可很在乎小命，大家看到太平军的架势，纷纷想逃跑。周天爵手起刀落，连砍了两个逃兵，但是于事无补。看这些人个个都胆小如鼠，周天爵很看不起，也很无奈。相反，他倒悠闲地抽起了烟。我们很难知道他在想什么，可能他在想：这才是英雄本色，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不久，李星沅派来的援兵到达，这时清军已经有万人，总算解了向荣之围。接下来便是讨论作战计划了，还没进营帐中，这些人就吵了起来。大家并不是商量什么作战计划，而是互相责骂，吵到大家都觉得累的时候，才气喘吁吁地讨论作战方针。最后，在其他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终于通过了周天爵提出的作战计划：兵分四路进攻。

这四路军队最后全部落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在战场上，清军终于看清了：这群人全都是疯子，他们高唱着洪秀全编写的诗歌，进入战场如入无人之境。清军全面败退，后来在太平军的连番打击下，周天爵终于服输了，输了战场不要紧，如果输了心气那就完蛋了。

周天爵到最后居然认为太平军是不可战胜的，清廷是永远不能击败他们的，为啥呢？他们全都不怕死，好像吃了什么奇怪的药。周天爵还把这个观点上报给咸丰，咸丰也是将信将疑。

这一战，杨秀清的功劳最大，事实上他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也更加巩固了。如此，我们才能明白冯云山当时为何把杨秀清安排到丞相的位置上。杨秀清连大字都不认识一个，更别说有什么深厚的文化功底，却有天生的治国和军事才能。他所以能脱颖而出，跟太平天国草创时期的松散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杨秀清在天京事变被杀后，太平天国不断走下坡路，最后到了进退维艰的地步。其实，在杨秀清的一生中，仍然有很多失误。最大的失误就是自居九千岁，想和洪秀全平起平坐。虽然杨秀清治军甚严，但战略上也有失误。比如，定都南京就是杨秀清的主张，南京虽然自古就是一个帝都，但这里盛产偏安朝廷；如果说杨秀清是想以南京为

根据地的话，这还不能算作一个失误，但他兵分两路北伐无疑会分散军力，西北两路军相隔甚远，又不能做到首尾呼应。

杨秀清是一个雷厉风行、铁腕有力的领导者，作为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之一，他实际上是这个集团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他被杀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层出现一个真空状态，再也没有人能填补这个真空。洪秀全虽然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弄到重要岗位上，但太平天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覆灭之路。

忠王李秀成评价杨秀清说，他在世时，军令严整，赏罚分明，民心臣服。洪秀全意识到这点，他借韦昌辉和秦日纲之手除掉杨秀清，又以滥杀无辜的罪名除掉韦昌辉和秦日纲，后来又规定杨秀清死的那天为“东王升天日”，让天国的人民代代不要忘记。

其实杨秀清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避免农民军成为流寇。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军在前期势如破竹的原因。

钦差大臣不管用

清军的惨败给咸丰打了一针，让他意识到自己可能遇上对手了。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惩罚那些作战不力的将领，接下来便是调兵遣将了。咸丰派遣湖北盐法道姚莹和淮扬道严正基前往广西督战，还派遣广州火器营副都统乌兰泰去支援。乌兰泰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只带了二十八个火枪兵。如果说这些还只是点将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要选帅了。

为了确保战争取得胜利，咸丰还任命首席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到广西去坐镇指挥。赛尚阿出马可见咸丰对太平天国的重视程度。

赛尚阿是满洲正蓝旗人，嘉庆年间曾中过举，在满人之中他算是比较有文化的，道光年间曾担任军机大臣，官职理藩院尚书。到道光末期，他又身兼协办大学士和九门提督等要职，在人们眼里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了。

在赛尚阿出征前，咸丰就送给他一把尚方宝刀，授予他先斩后奏的权力。咸丰还给他增拨了两百万两白银，对他寄予了殷切的希望。赛尚阿去广西，一般人都认为贼众死定了，只有少数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翰林院侍讲铁林就是其中之一，他断定赛尚阿这次去不但不会成功，反而会引起天下的兵灾。

铁林凭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呢？事实上，铁林对太平天国也不了解，但他了解赛尚阿是个什么样的人。赛尚阿做官还可以，清正廉洁，审案和办公都还行，让他去打仗却是万万不行的，上了战场我们就知道了。

赛尚阿出发时排场是相当大的，时任吏部侍郎的曾国藩当时对此就很看不上眼，在给弟弟的信中嘲讽赛尚阿虚张声势。赛尚阿还没有到达广西，从其他各省选出来的四千精兵已经开到广西。在赛尚阿抵达广西前，广西已经有四万的清军了。李星沅已经被打怕了，整日忧惧，既恐惧太平军袭击，又担心咸丰怪罪。没多久，就一命呜呼。

赛尚阿从京城到广西，走走停停，一共花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清军和太平军主要是对峙，双方都忙着修建防御工事，并不急着交战。中途，太平军的将领凌十八率领万人前来会师，结果清军在江上拦截，致使会师失败。这次会师失败，对太平天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战无不胜的。

其中一些教徒开始清醒，清醒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后悔：“哎呀，我的脑壳出了毛病啊，怎么相信上帝、天堂这些个离谱的东西。”可惜财产都已经充公了，现在肯定是要不回的，一些心怀不满的人于是在背地里搞破坏，抢劫民财、煽动叛乱等，太平天国的军纪开始受到挑战，如果不能果断有力地处理好，很有可能从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再次蜕变为流寇。

这时候，杨秀清站出来了，咣啷一声倒在地上，又噌的一声跳起来。不得不佩服杨秀清这个人，每到太平天国危难之时，他都不顾脑震荡的危险，模仿僵尸倒地跳起这种非常伤筋骨的行为。杨秀清对大家说了：“我派遣你们的主子为天王，他说的话就是我的命令，你们一定要遵从。你们要全心辅佐你们的天王，不得有任何胆大妄为的行为，也不能有任何怠慢。相信你们的天王吧，我既然让他做你们的真主，你们跟着他一定不会错的。”

杨秀清“清醒”后，萧朝贵也咣啷一声倒地，接着又跳起来，说道：“天国的臣民就应该有天国的风范，要遵纪守法，不要抢劫百姓的财产，打仗的时候不可以临阵退缩。大家要不分彼此，同心协力，打下江山以后，不仅可以上天堂，荣华富贵也享不尽。”

杨秀清和萧朝贵这双簧唱得好，一个是从思想上规整众人，一个是用物质诱惑教众，真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的典范。

清军越来越多了，太平军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这期间，凌十八的部队被清军歼灭，很多人投降了清军，最著名的一个降将就是冯子材，冯子材后来成功击败法军，从一个流寇将领变成民族英雄，这是

一个非常华丽的蜕变。

赛尚阿对打仗毫无经验，来了以后也想不出好的战略，只能硬着头皮让向荣和乌兰泰出战。乌兰泰一直掌管火器营，是个火器专家，不喜欢近身肉搏，喜欢搞远程射击。他带着几十个炮手朝对方开炮，双方互有损伤。乌兰泰急着上奏，说自己轰死对方多少多少人，偏偏不提己方损失了多少人。

在小规模交锋中，双方互有胜负。乌兰泰取得小胜之后，第二次跟太平军交手时却被围住了，清军纷纷逃窜。后来，还是向荣赶过来支援，击退了太平军。

赛尚阿到广西后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重用在家守丧的举人江忠源，江忠源可谓是湘军团练的祖师爷，当时他负责训练五百个团练。江忠源虽然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名气很大，但一生带兵从没有超过三千团练。

江忠源上前线后，带领五百个衣衫褴褛的乡勇，逼向清军前线。石达开以为江忠源是来送死的，很是轻敌，没想到江忠源带领的这些乡勇全都彪悍勇猛，都是一副拼命的架势。石达开一看讨不到便宜，赶紧下令撤退，结果在逃跑过程中被江忠源砍了几百个士兵首级。

江忠源一出手就让人刮目相看，清军上下都对他相当尊重，职位比他高的将领在行动之前都会先请教他。此后，江忠源一发不可收拾，在战争中屡屡挫败韦昌辉、石达开这些人，江忠源收到咸丰的表扬如同雪片一样。

写鸦片战争之时，我们就提到台湾岛姚莹这个人，鸦片战争时，清军全面溃败，只有台湾取得了局部胜利，由此可见姚莹这个人不一般啊！像这样的人才自然要用到刀刃上，这次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也有姚莹的一份。赛尚阿虽然不懂打仗，但还是会用人的，他的任务不在于指挥，而在于协调各路将领。

在赛尚阿的统一调度下，太平军扛不住了。清军步步为营，稳打稳扎，想一步步摧毁太平军。洪秀全危机感重了，打算突围回到金田。回去的路上，洪秀全扫荡了曾经抓捕冯云山的团练头目王作新等人，王作新的亲属有四五人战死，王作新自己则脱身逃走。

太平军转移到紫荆山一带时，与清军又展开了一场血战。赛尚阿拿着尚方宝刀，清军将士们不敢不死战。在统一领导和尚方宝刀面前，向荣的能量得到了释放，他就像一个能量惊人的野兽，在战场上不知疲倦地厮杀着，让洪秀全和杨秀清寝食难安。同时，姚莹和江忠源还不断发起心理战，宣称洪秀全已经被击毙，清军已经在太平天国

的防区内埋下了大量的地雷和炸药。

这些心理战术对瓦解敌人的斗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太平天国中很多人开始想着叛离。到了这时候，又是杨秀清和萧朝贵付出之时了，他们冒着脑震荡和骨折的危险再次玩起了鲤鱼打挺的游戏。可惜，危机时刻，这些旧日的把戏已经不太管用了。

怎么办？杨秀清觉得还是用实力说话吧，打几场胜仗鼓舞一下士气。杨秀清亲自率领部队击溃了乌兰泰的火枪兵，他想多捞几个胜利，稳固军心，可惜还是难敌饿狼一样的向荣，最终被打回来了。萧朝贵和韦昌辉也先后被向荣击败，韦昌辉的两个弟弟战死。向荣将战线推入太平天国的防区，占领了太平军的一些重要阵地。连在战场上一向沉稳老辣的杨秀清也屡屡吃败仗，更让人绝望的是，这时候各省仍在源源不断地往广西运送清兵。

杨秀清一向是个沉得住气的人，这时候也有些发狂了，满腔怒气无处撒。他决定选择达洪阿下手，达洪阿这个人喜欢炫耀，平时没事习惯把皇帝赏赐的黄马褂穿在身上，在战场上也不例外。杨秀清便挑选了一批精干的兵将，袭击达洪阿所在的部队，恰好乌兰泰赶过来支援，都被杨秀清歼灭，仅达洪阿和乌兰泰两人幸免。

尽管如此，也无法扭转太平军的劣势。恰好这时，旗人巴清德嫉妒向荣的功劳，拼命跟向荣作对，给咸丰上书“五不可”，让皇帝好好管教向荣，别让他气焰过于嚣张。结果，在战场上如狼似虎的向荣气得一病不起，赛尚阿充当和事老，过来劝向荣，向荣这才勉强起床。

清军势头很猛，大有一战扑灭起义的架势。

八月二十日，太平军撤到平南县思旺墟，这里是杨秀清处女战的地方。这一次可能不会像第一次那么走运了，清军也尾随而至，和太平军相距不到五里。双方都没有进攻，不久就天降大雨，火器都不能用了。这时候如果打仗的话就完全是拼刺刀了，杨秀清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命令萧朝贵和韦昌辉抓住机会，即时出击。

向荣之前特别拉风，没想到这场雨中之战全军覆没，他本人狼狈不堪地逃走。逃到半路上，江忠源过来接应他。向荣抱着江忠源大哭：“我打了几十年的仗，从来没有受过今天这种耻辱。”

正是这一战，给了太平军喘息的机会，他们收缴了清军的辎重粮草和武器，冲出了清军的包围，向广西繁华地带发展。不仅鼓舞了原本低落的士气，而且士兵很快就发展到八万人。

咸丰派遣钦差大臣赛尚阿，原本是为了扑灭叛乱，没想到叛乱之火越烧越旺。我们只能说，这个钦差大臣不管用。

永安很重要

太平军本来发展有瓶颈，现在清军拱手送给他们一大批先进武器，无疑是给了他们一个克服瓶颈的机会。

武器装备提升了，就有了攻打大城市的本钱。洪杨两人决定兵分两路攻打永安，这对太平军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他们绝不敢掉以轻心。他们根本想象不到，结果太顺利了。其实，也不奇怪，向荣自从上次大败，迁怒于乌兰泰，认为是他故意不来救援自己。清军内部的分裂越来越严重了，向荣再也不肯出力，所以这么多人看着太平军云集永安，居然都没有反应。

永安的守城官兵不到千人，太平军玩了一个小把戏就把永安城拿下了。他们准备了许多炮仗，点着后扔进城，看到烟雾滚滚，官兵们都非常惊慌，太平军将领罗大刚正好借着机会登城，一举拿下永安城。知州吴江和副将阿尔精阿纷纷投水自杀。

永安城是太平天国拿下的第一座城池，听到这个消息，赛尚阿当即就慌了。不久，他就收到消息，咸丰让刑部给他议罪。

清军那边慌乱了，太平天国这边却忙着确立制度。

洪秀全自诩是上帝的儿子，出于对“上帝”的尊重，洪秀全认为只有上帝可以称得上是帝，自己只能称王，那么杨秀清冯云山这些功臣怎么办呢？这些人个个劳苦功高，洪秀全起于草根，多少讲些义气，如果不给这些人封王他也觉得过意不去。最后还是决定，封杨秀清为东王，九千岁；萧朝贵为西王，八千岁；冯云山为南王，七千岁；韦昌辉为北王，六千岁；石达开为翼王，五千岁。

这次封王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洪秀全是最高领导者没有疑问，杨秀清为诸王之首，节制诸王。这实际上是正式赋予杨秀清主持军政大事的权力。让人吃惊的是，太平天国这次封王还真的就是封王，所谓的封王就是先秦时代的那种王，诸王享有封地，可以在自己的封地里设立行政机构。这完全是模仿周朝的体制，这种体制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洪秀全又捡起来用，不知出于何种原因。

这种周朝的分封制度跟清朝的中央集权制度恰恰是两个极端。分封制过于松散，不利于国家统一；而集权制过于专断，整个国家之中除了皇帝一人是主子，其他人都是奴才。倒是汉唐那样的君主体制是相对成熟的，在专制时代里也是相对人性化的一种制度。汉唐制度规避了帝国两个大的方面的危险，一个是避免像分封制那样引起帝国分裂，一个是避免因皇帝的错误而导致国家灭亡。

这个设计应该还是冯云山的创意，因为从后来历史看，洪秀全对于分封制是不满的，不断地加强中央集权。这一方面说明了分封制已经不再适合历史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分封制并不是洪秀全想要的东西。但分封制不光只是一种理念，更是缓和太平天国高层矛盾的一种策略。

有意思的是，借着这次封王，洪秀全将自己内心骄狂的一面表露无遗。他规定以后只准太平天国的王用“王”字来称呼，历史上其他的王全面要在前面加一个狗尾旁，变成了“狂”。比如，燕王朱棣应该说成是燕狂朱棣，霸王项羽应说成是霸狂项羽。洪秀全的疯狂由此可见，这完全是一个极端专制者的性格。如果说洪秀全是从暴民转化成暴君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暴民和暴君是同一种东西，唯一的不同的是所年的位置，本性是完全一样的。

永安建制之时还颁布了新的历法，称为《天历》。关于这个天历还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咸丰四年（1854年），一个叫张炳垣的秀才不满太平天国的统治，纠集一批同样心怀不满的人，准备打开城门，将清军引进来。这事还差点成功，张炳垣竟然联合了六千人。

败露的原因却让人啼笑皆非，张炳垣和清军约好开城的时间，张炳垣一个疏忽，按照天历算的，而清军却是依据旧历，结果相差了六天。开城的那天，清军没来，杨秀清倒是来了。杨秀清亲自审理这个案子，没想到一向精明的杨秀清这次弄巧成拙。

张炳垣不承认自己通敌，说那个告发自己的张沛泽是个瘾君子，因为害怕自己告他吸食鸦片所以诬陷自己通敌。杨秀清最痛恨吸食鸦片的人，居然相信了张炳垣。杨秀清立即放下这个案子，将张沛泽等吸食鸦片的人全部处死。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杨秀清是带着极大的愤怒的，所以也没来得及问清青红皂白，在痛恨鸦片这块杨秀清跟清朝的统治者态度是一样的。

在太平天国高层的领导者中，杨秀清是最憎恨瘾君子的，不像其他人，觉得这种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韦昌辉审理张炳垣的案子，从后来韦昌辉诛杀杨秀清的手段来看，此人是相当有心计的。韦昌辉很快就查出了实情，张炳垣在内心深处是非常痛恨太平天国的，虽然承认了通敌罪，但诬陷了几十名太平天国的将领，说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干这事，韦昌辉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将这些人全部处死。

张炳垣最后也难逃一死，在刑场上他说出了实情，当面嘲讽杨秀清、韦昌辉这样的牛人，让这些人无地自容。

冯云山还写了三篇讨伐清朝的檄文，文采虽然比不上骆宾王，但激烈程度绝对首屈一指，看了这些檄文，当时的民众无一对清朝产

生愤怒。

这些檄文虽然谈不上什么文学价值，但确实打响了与清廷的舆论战。

这次永安建制还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改革，确立了明确的赏罚制度，杀了多少敌人就可以升多大的官，都有明文规定。这就是为什么忠王李秀成说东王在世时赏罚分明了，因为李秀成以前也是个普通士兵，后来成为指挥十万大军的元帅。陈玉成更是如此，二十出头就成了大元帅，没有杨秀清他们都不可能升得这么快，所以他们对杨秀清有所怀念也是可以理解的。

永安对于太平天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革命的第一个大站是金田的话，那么永安就是第二个大站了。正是在永安，太平天国完成了制度性的建设，为后来的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通往南京之路

蓑衣渡一战之后，太平军内部人心不稳，就连领导层也不例外，洪秀全一度绝望到要解散太平天国。杨秀清站出来安慰他：“大哥，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越是挫折越是考验一个人的时候，大哥一定要挺住啊！”

永安大战

太平军占领永安后，清军坐立难安，既不能坐视不管，又不敢去攻城。怎么办？他们想出了个好办法：下毒。

在武侠小说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下毒专家，这些人下毒手法极为高明，毒性也非常剧烈。但是真实历史却不是这样的，当时工业不发达，所谓的毒药仅仅取自草药。清军用的是一种名叫烂肠草的毒药，这草里面含有大量的笑气。学过化学的人知道笑气，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

赛尚阿和姚莹心想，如果洪秀全和杨秀清中了毒，就会狂笑而死。他们派人从草药中提炼出毒水，让人洒在城里，妄想毒死洪秀全和杨秀清。

下毒毒死几个士兵还行，要想毒死洪秀全和杨秀清简直是做白日梦。姚莹和乌兰泰又想出了一个鬼点子，乌兰泰是个火器专家，擅长鼓捣火药之类的玩意儿，他做了个信匣子，在里面放上火药，然后在匣子上面写着：“洪秀全和杨秀清同拆。”摆明了想一起炸死两位领导人，乌兰泰得意洋洋地说：“只要洪秀全和杨秀清一起打开这个匣子，里面就会立刻爆炸，洪杨两人必定命丧当场。”

结果怎么样呢？至少洪秀全和杨秀清都安然无恙，也不知道有没有炸死人。反正乌兰泰为了面子执意说炸死了两个小兵。清军的计谋一个接一个地破产，姚莹仍然不死心，他始终认为如果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洪秀全和杨秀清，太平天国自然破产，那就用不着艰难剿匪。这种思想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投机取巧，如果投机成功了，那便是谋略。

姚莹想到了诈降计，他派了几十个间谍假装投诚，然后找机会刺杀洪秀全。遗憾的是，这些人全都没有见到洪秀全，只是得到一个情

报：洪秀全这人不喜欢见人，喜欢睡觉，尤其是喜欢跟女人睡觉。这些人想找到洪秀全睡觉的地方，结果没找到不说，反而全部被抓住，处以极刑。

在战争中，这些动作都属于奇技淫巧，要想靠奇技淫巧取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就这么耗着，那是浪费军饷，赛尚阿心里也焦急，那边刑部还在给他议罪呢！

在粮草方面，太平军并不担心，因为有杨秀清在，他严律约束士兵不准抢百姓的粮食。那杨秀清通过什么手段获得粮草呢？杨秀清其实用的还是老一套，劫富济贫，从富户那里获得大量的粮食，分出一小部分给贫民，其余充作军粮。

两军在永安相持了半年，清军耗费军饷七百万两，赛尚阿压力非常大。到了这地步，他跟清朝其他的官员已经没什么两样，能敷衍就敷衍，为了糊弄咸丰，他甚至说太平军在城周围都布下了铁钉、梅花桩和马刺，所以根本就不可能进攻。咸丰也不傻，他反问赛尚阿，既然我军不能进攻，为什么敌军出入自如呢？

赛尚阿继续找借口，我们就不用管了，看看战局究竟因何发生逆转。

迫于压力，赛尚阿只好让丁守存去请向荣复出，上次也是赛尚阿请求解除向荣的职务。这向荣一出面，局面确实有所缓解。

在清军中，向荣是唯一一个职业军人，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职业军人，向荣之前所以遭遇惨败，主要责任不在于自己，而在于那些跟他合作的人。

好了，奇技淫巧先搁下，一场真正的大战开始了。

向荣率领一万人攻城，战况之激烈我们就不用说了，太平军感觉眼冒金星，这家伙太猛了。太平军虽然击退了清军的进攻，但伤亡很重。不久，清军又从桂林运来两千斤大炮，这对向荣来说简直是如虎添翼。

清军猛烈的炮火打得太平军头顶冒烟，不得已，太平军只好在城上悬挂渔网，然后洒上水，以此抵挡炮火，可惜根本不管用。向荣三次进攻都重创太平军，事实上，双方的伤亡都非常大。但太平军底子薄，很快就要消耗完，而清军的援军却源源不断地往永安运。

永安一战，太平天国事实上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刚入城时的四万太平军只剩下一万人，其中真正能作战的不到四千。

永安城已经被清军围得密不透风，太平军眼看就要走到山穷水尽

的那一步，究竟又是如何起死回生的？

说来，还是老问题，向荣、乌兰泰、江忠源这三人又闹起了矛盾。向荣打仗很厉害，但性格也非常固执，他看不惯乌兰泰，凡是乌兰泰的观点他都要反对，哪怕是正确的战术。江忠源在中间调解，结果两面不讨好，一气之下称病回家。

清军将领内斗给了太平军喘息的机会，恰在这时，老天又送来了及时雨。贵县有几千个矿工，听说洪秀全闹革命，都想跟着洪哥混，没想到他们动作慢了，赶到金田时，洪秀全已经离开。后来，听说洪秀全在永安，这几千人又匆匆赶到永安来投奔。矿工们都是精壮汉子，他们的加入立即壮大了衰微的军势。

正是在这些矿工们的接应下，太平军在暴雨中突围，终于抓住一线生机。

太平军离开后，永安变成了一座空城。赛尚阿上奏说，永安的百姓全部被太平军杀光了，这是个非常无耻的谎言。事实上，大多数百姓都加入了太平军，还有一部分被清军杀良冒功了。

向荣率军追击，萧朝贵负责殿后，与向荣展开厮杀。双方在峡谷里大战，这一战太平军伤亡惨重，根据李秀成的回忆，死了大概有两千人，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军力。萧朝贵带着几十个亲兵逃脱，杨秀清得知后军全军覆没的消息，非常愤怒，亲自带兵埋伏好，准备袭击清军。

乌兰泰带领万人想将太平军追杀干净，进入峡谷以后，天降暴雨。太平军伏兵四起，清军慌乱想逃脱，结果自相践踏，死伤枕藉。虽然向荣前来援救，救出了乌兰泰、秦定等人，但清军死伤太多了。这一战，清军损失惨重，多名高级将领阵亡，咸丰一怒之下将赛尚阿连降四级。

天德王洪大全之谜

清军在追击太平军的过程中，俘获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为什么说这个人神秘呢？

此人外表华丽、言谈不俗，面相不凡身材魁梧，一看就知道不是个一般的人物。清军抓到这个人物非常兴奋，以为是太平天国的二号人物杨秀清。经过审问才知，这个人并不是杨秀清，但这个人自诩比杨秀清还牛气。

比杨秀清还牛气的人莫非就是洪秀全了？此人说：“杨秀清在我面前还得称臣呢！我也不是洪秀全，洪秀全是我结拜的弟弟，我是天德王洪大全。我这个人比较豪气，喜欢饮酒交朋友，我弟弟洪秀全没出息，只喜欢漂亮女人。如果大人用美色勾引我弟弟，这小子一定会投降的。”

听说抓住了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赛尚阿当然也很兴奋。劳师动众这么久，总算拿到了干货。赛尚阿对洪大全相当客气，不能不客气啊，这是自己的本钱啊，每天好酒好肉地招待，就怕这个“客人”一不小心暴毙了。

这个洪大全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刚开始的时候，洪大全自称是湖南兴宁人，地主出身，曾经参加科举。跟洪秀全一样，他也屡试不第，时间一长，肚子里的怨气就越来越多。而且，洪大全跟洪秀全一样，也是相当自命不凡的人，他觉得自己这么有才，清廷居然不能用自己，简直是瞎了眼。时间一长，洪大全也走上了造反的路，不过他走的路跟洪秀全不太一样，洪秀全是白手起家，他经人引荐加入了天地会。

洪大全说郴州天地会大哥许佐昌很重视自己，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自己。

这个洪大全明显是个很能忽悠的主，那么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呢？

历史学家们对洪大全的身份和地位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著名历史学家萧一山认为太平天国事实上分两头政治，一头是洪秀全，一头是洪大全，两人同是万岁。萧一山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依据故宫档案中的《洪大全供》，换句话说，萧一山得出结论完全是凭借洪大全自己说的供词。萧一山认为，洪大全是天地会的首领，刚开始的时候，拜上帝会和天地会合作比较好，但后来因为教旨冲突，大量的天地会众脱离太平军。洪大全被捕后，太平天国和天地会的合作正式破产。

观点二：史学家荣孟源也是从洪大全的供状中得出结论，拜上帝会领袖洪秀全和天地会领袖洪大全共同尊奉一个天德皇帝为领袖。洪秀全和洪大全的关系在名义上平等，但实权掌握在洪秀全手中，所以洪大全的地位事实上不仅比不上洪秀全，也比不上杨秀清萧朝贵这些人。洪大全被捕后，拜上帝会排斥天地会，天地会失去依靠后被清军逐个击破。

观点三：著名的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罗尔纲认为洪大全这个人确实

是存在的，但他并不是什么天地会领袖，更不可能跟洪秀全平起平坐，他只不过是郴州天地会的一个堂主。赛尚阿弹压失败后担心咸丰怪罪，故意捏造了这么一个“天德王”，以隐瞒自己的过失。

到底哪一种看法更接近真相呢？我们不妨来辨析一下。

洪大全被抓后，口述了三份供状。第一份供状是由钦差大臣赛尚阿在永安记录下来的，第二份是在河南信阳时洪大全供认的，第三份是在京城录的口供。有意思的是，随着地点和时间的推移，这三份供状内容也经常发生变动。

在第一份供状中，洪秀全说自己是湖南衡山县人，考试不中后自感屈才，于是饱读兵书，欲图大事。几年前，在广东花县遇见了洪秀全和冯云山，引为知己。后来洪秀全在广西起事，把洪大全接了过去，尊为天德王，用兵之道全都请教洪大全。

到了河南信阳后，洪大全又说自己出生在岭南，长在湖南，还说自己是洪秀全花了三百两黄金聘请过去的军师。洪大全还说，自己本来是不想投靠洪秀全的，原本打算投靠两江总督李星沅，没想到李星沅不但不赏识自己，反而辱骂自己，这极大地挫伤了洪大全的自尊。洪大全说，他当时连自杀的想法都有了。结果被太平军的将领胡以晃救了，这才进入太平天国，洪大全认为自己的智谋比诸葛亮还高，所以取了赛诸葛的外号，还封自己为天德王。洪大全反复强调自己是个军事和谋略的奇才，有很多良策可以剿灭太平军，希望咸丰能够赏识。

咸丰也看出了洪大全这人的供词一直在变，他便问大臣们，这洪大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给事中陈坛说：“洪大全这个人我们以前根本没听说过，估计是个不入流的角色。一定是前方将士担心战败被罚故意拉出这么个人冒充天德王，皇上只需将这个人就地正法就行了，以此拒绝前方将士们徇私舞弊的作风。”

咸丰觉得陈坛说的有道理，但出于谨慎考虑，他还是没有把这个人就地正法，而是让他们押到京城。

刑部官员审问时，洪大全的证词又完全变了，他说自己是广东人，出生于广东南海县，小时候跟着叔叔洪云秀到湖南衡阳读书，咸丰元年到广东游荡时碰到了洪秀全的将领胡以晃。在胡以晃的引荐下，他结识了洪秀全。洪秀全后来赏识自己的才华，封自己为天德王，地位几乎跟洪秀全平起平坐。

总之，审问来审问去，大家就是搞不清楚洪大全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咸丰和大臣们都没办法，只好按照大逆律将洪大全凌

迟处死。

很显然，洪大全在证词中说谎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究竟是自己自愿撒谎，还是被迫撒谎？

学者们在追查这个历史悬案时发现，在永安突围之中，清军将领的奏报中根本没有洪大全这个人。如果洪大全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太平天国一个高层人物，那么之前的奏报中当然会提到他，但是查遍所有资料，在永安突围之前，根本就没有洪大全这个人。

所以学者们有理由怀疑洪大全这个人是赛尚阿一手制造出来的“俘虏明星”，目的昭然，都不用解释，无非是向咸丰邀功，我平叛虽然失败了，但抓住了太平天国的二号人物，至少可以将功抵罪吧！

至于人们说洪秀全跟天地会合作，我们来看看洪秀全自己的态度吧，洪秀全曾公开表达对天地会的看法：“我洪秀全虽然没有加入天地会，但对天地会还是多少了解一些的，我也听说过天地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的。大家看看吧，自从康熙这老儿死了，这不都过去了快两百年吗？反清是对的，但复明怎么可能呢？天地会这帮人有几种恶习是我无法忍受的，例如啊，新入会的人必须要崇拜那些牛鬼蛇神，还要歃血为盟，搞得就跟黑社会一样。而且我还听说天地会这帮人拿着刀逼会员们交钱，这跟我们信仰上帝、人人平等完全是两码事。”

洪大全临死之前，他作了一曲慷慨激昂的《西江月》：

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谩将金锁绾冰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

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待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就写诗水平来说，洪大全这个人比洪秀全还是强很多的，不过命不好，也只能“壮怀问天公”了。

蓑衣渡大劫

永安突围之后，太平军四处流窜，一时没有明确目标。

在运动战中，太平军多次击败清军，最后，杨秀清决定攻打桂林。桂林比永安更大，更坚固，守军也更多。如何拿下桂林，这是摆在太平天国决策层面前一个很大的难题，大家普遍认为强攻是万万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呢？我们来看看吧，桂林城有一千三百四十个垛口，这里解释一下垛口，看过长城的朋友都知道，长城上端铸成凹凸的形状，凹处就是垛口。垛口既可以用来瞭望，也可以用来射击。桂林城有十座城楼，二十二尊炮台，城周长十二里。

上次攻永安，罗大纲功劳最大。这次大家自然指望他能再想出一条妙计，罗大纲熟读《三国演义》，忽然想起诸葛亮智取南郡的故事。罗大纲决定带着几百个兄弟，假装成向荣的军队，只需找个跟向荣长得像的人冒充就行。罗大纲等人来到城楼前，说是向荣的军队来，请城里的人开门。

听说向荣的军队到了，早已到了城里的向荣非常好奇，亲自来到城楼上。向荣嘲讽地对下面说：“你好啊，向荣！”

罗大纲狼狈不堪，灰头土脸地跑了回去。随后，太平军派奸细入城，向荣早已做好了防备，加强戒备，搜捕出来十多名奸细。

黔驴技穷。太平军只好强攻，强攻的下场很惨，所有攻城士兵都被歼灭。攻城讨不到好处，太平军只好撤退几里，形成相持的局面。就在这时，乌兰泰的援兵赶到桂林。杨秀清正好满头是火，直接围住乌兰泰，将乌兰泰打得大败，乌兰泰逃跑时被一炮轰死。火器专家死于火器，也算是善始善终。

随后，清军各路援兵纷纷来到桂林，城内守军配合援军出城袭击敌人。两军交战二十四次，清军失败得多，赢得少。太平军虽然攻城不下，但野战激发起了战斗的信心。接下来，太平军用尽办法也不能攻下桂林城。最后只好放弃这根难啃的骨头，这时已经是咸丰二年（1952年）四月了。

四月十五日，太平军抵达全州。太平军无意攻打全州，只想快点过去，全州官兵也不阻拦他们，双方心照不宣似的。太平军的人马就在全州官兵的眼皮底下过去，没想到队伍的后面有一个黄轿子。一个炮兵看到，知道是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如果轰死这个人就发达了，炮兵忍耐不住，一炮轰过去。这炮兵还真行，打中了目标，将轿中人轰得半死不活。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太平天国的萧何冯云山。

这个炮兵惹下大祸了。已经走过去的太平军纷纷掉转回头，以满腔的愤恨拿下全州城，将全州官兵杀得一干二净。

太平军意外得到全州城，好整以暇，就在这里休息几天吧！在全州期间，许多天地会会众前来投顺，杨秀清还命人打造两百艘船，准备渡江作战用。

全州只是一个小城，战略意义不大。太平天国的真正目标是长

沙，在进入湖南境内之前，必须经过一个叫蓑衣渡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险要的水域地带，这里大树参天，处处是荆棘和灌木，东面是高山，西面是沙滩。所以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里布下伏兵最容易全歼敌人。

只要能越过蓑衣渡，太平军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湖南境内。但太平军能这么幸运吗？要知道团练鼻祖江忠源就是湖南人，此人是个兵家好手，能不知道扼住蓑衣渡吗？

果然，江忠源看太平军想涌进自己的家乡，立即到处活动。可惜，其他人不把江忠源当回事，眼看无人理自己，江忠源只好自己训练乡勇。经过训练，江忠源手中已经有一千乡勇。他带着乡勇来到蓑衣渡，二话不说，大家抄起斧头，把一些大树古树砍倒，扔进水里，顺便说一下，江忠源这么做是绝对违背环保精神的，如果不是出于战争时期特殊需要，我们绝对不能提倡这种行为。

江忠源将一些大树钉在河底，再把树干树枝扔进水里，阻断水流。不过，江忠源兵太少了，能不能阻住太平军他也毫无把握。他几次请求其他将领调兵支援自己，这些人都跟他玩太极，谁也不想断送手中的那点家底。

冯云山事先也派人去查探地形，发现蓑衣渡这地方非常险要，很容易设伏兵，便对洪秀全提出建议：“接近蓑衣渡的时候，让步兵下船在岸上先行，其余部队、辎重和家属坐在船里跟着步兵，这样保险一些。”

洪秀全听了，很不爽：“你这个人就是谨小慎微，清兵要是知道在这种山旮旯里埋伏兵，我们还能活到现在吗？让步兵下船，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到长沙啊！还是让水手们赶快划船吧！”

洪秀全就这么驳回了冯云山的建议，没想到他驳回的不是冯云山的建议，也是冯云山的生命。

冯云山本已受伤，太平军的船只到了蓑衣渡后，被树木所阻，刚明白是怎么回事，江忠源的大炮就轰了过来。正是在这场战斗中，冯云山阵亡。江忠源打得热火朝天，原本以为其他部队很快就会过来增援，没想到打了两天两夜，也没见到一个援军的影子。太平军最精锐的部队几乎被全歼，但由于江忠源兵力少，还是让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突围而逃。这一战，太平军天国的精锐尽皆覆没，粮草和辎重都被江忠源缴获。

也是天不绝人路，如果其他将领给江忠源拨了一千人，估计太平天国就会全军覆没。蓑衣渡一战是决定历史的战争，如果没有江忠源

在这里痛击太平军。太平军势必顺利进入湖南，要知道当时长沙的防守空虚，以清军的办事效率，要想他们赶在长沙陷落之前过来支援是不太现实的。

长沙一旦落入太平天国的手中，湖南很快就会成为太平天国的地盘，到时候曾国藩拿什么拯救他的湖南，别说招募乡勇了，只怕曾国藩会成为洪秀全的阶下囚。湖南一旦成为太平天国的根据地，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就出不来，他们出不来，清廷岌岌可危。历史上也就不存在湘军一说。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蓑衣渡之战就是太平天国败亡的起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蓑衣渡之战，南王冯云山阵亡。冯云山对于太平天国是非常重要的，他实际上是丞相的角色，把冯云山比作太平天国里的萧何并不过分，他是这群草莽里难得的一个政治家。冯云山死了以后，太平天国的政治品味明显下降了不少一个档次。而且，冯云山是一个协调者，正是他肯定了杨秀清的功绩，把杨秀清安排在二把手的位置上，也只有他能调和杨秀清与洪秀全之间的矛盾。如果冯云山不死，天京事变或许不会发生。

其次，太平天国在前期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一些骨干和精锐，在这场战斗中全部损失。这些精锐都是对太平天国非常忠诚的人，有着较为坚定的信仰。后来招收的一些人马虽然也具有战斗力，但是他们都是半道出家，对太平天国的那一套学说都是将信将疑。这一战事实上让太平天国丧失了元气和根本。

再次，战略目的没有达到，没有攻取长沙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太平军士气受到沉重打击，战略要地没能拿到，失去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而且，因为这一战，湖南人的自信大增，正是因为江忠源成功地击败了太平军，激发了曾国藩的勇气和信心，让他意识到乡勇的战斗力比正规军还强。

血染长沙

蓑衣渡一战之后，太平军内部人心不稳，就连领导层也不例外，洪秀全一度绝望到要解散太平天国。杨秀清站出来安慰他：“大哥，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越是挫折越是考验一个人的时候，大哥一定要挺住啊！”

在杨秀清的辛苦经营之下，太平天国总算有了起死回生的气象，

大家在湖南又补充了一些兵员。湖南对太平军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到了道州时，洪秀全又开始烦躁了：“这哪里是个尽头，还是回广西吧！至少那里我们熟悉啊！”

杨秀清当然不能同意这个建议，当时之所以离开广西就因为在广西很难打开局面，必须寻求一片更广阔的天空。杨秀清跟洪秀全解释，要有大胸怀，就应该占据南京，将南京作为天国的都城，这样进可攻退可守，时机一到就可以问鼎天下。

在湖南行进的途中，大量的天地会成员前来投靠太平军，太平军的势力迅速扩张，到了郴州时已经有十万人，能够作战的有五万人。不久，杨秀清侦知长沙的守军不过两千人，便下令攻打长沙。

萧朝贵为先锋，率领四千精兵直扑长沙。长沙守军听说太平军要来进攻，赶紧临时装修城墙。

说实话，长沙百姓不相信真会有战火，太平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说打仗就打仗呢？有人跑到大街上说长毛要进城了，大家都不相信，还把这个人毒打一顿，送上衙门，告他散布谣言。

这时候，从陕西那里调过来一千援兵，这些援兵企图在萧朝贵攻打长沙前进入长沙城，没想到跟萧朝贵正好遇上。这一千人被萧朝贵歼灭，只有少数几个人逃了出去，他们满身血污地跑到长沙，这时官府才不得不相信。于是，立即关闭城门，积极备战。但是，老百姓仍然不相信战火会烧到长沙。

没多久，萧朝贵的军队就到达了长沙城南，在这里设下了大营。萧朝贵虽然是长毛，但品味却很贵族化，喜欢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长沙城有一个姓杨的迂腐儒生，看到萧朝贵穿着光鲜，以为是钦差大臣来了。杨生心想，这可是一个扬名立万的好机会，他跑到萧朝贵跟前，向他显示自己的才华，提出种种剿灭长毛、振兴国家的机会。萧朝贵这人也比较有意思，他装作很欣赏的样子，不时还夸奖杨生几句。

杨生以为这下真的发达，忽然进来一个人，问萧朝贵杨生是何人。萧朝贵说：“这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他在向我献策，如何剿灭我们太平天国。”

杨生一听，立刻灰溜溜地逃走。

长沙城实在太大了，萧朝贵站在城下有些茫然，应该从哪里攻起呢？萧朝贵看来看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不至于到了这里什么也不干吧！萧朝贵下令就地放炮，炮弹虽然打中了城墙，但是没有伤到一个人。萧朝贵终于发现在东南角有一个最高的城楼叫天心阁，萧朝贵

心想，这肯定就是城门，往这里轰吧！

长沙城其他地方没有大炮，偏偏这个天心阁这里有两尊大炮。你开炮我也开炮，城上的人看到下面有一个人衣服穿得特别鲜艳，简直就像是开丝绸店的。行了，目标太明显了，就轰这个人吧！这炮弹一来，萧朝贵一命呜呼，萧朝贵万万没有想到漂亮衣服也会要了自己的命。

就这样，太平天国的又一个领导人殉国。

萧朝贵一死，他手下的先锋曾水源极为悲愤，发疯般地攻城。那边江忠源听说长沙危机，立即赶了过来。江忠源来了以后，发现长沙城防御太糟糕了，自己亲自指挥防御。没多久，就接到一个好消息，新任的湖南巡抚正从云南赶往湖南，湖南总算有最高领导了。贵州知府胡林翼和将军向荣也正日夜兼程赶往湖南。

曾水源拼了命想攻下天心阁，江忠源跑到这里一看，说：“如果让长毛攻下天心阁，长沙就保不住了。”

杨秀清得知萧朝贵战死的消息也非常悲愤，他和洪秀全正一起率领大军逼向长沙。与此同时，清军将领和春与张国梁也赶了过来。太平军的先头部队还没到长沙，就在永兴城外遭到张国梁的袭击，损失了不少人手。杨秀清的目标直指长沙，太急切了往往会给敌人留下许多漏洞。

杨秀清不顾张国梁的骚扰，径直带兵攻向长沙。张国梁不断在后面偷袭太平军的后续部队，斩获颇丰。

杨秀清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在萧朝贵出发一个月后，也就是萧朝贵死的时候他才发兵，错失了攻下长沙的最好机会。有人推测杨秀清对萧朝贵不满，洪秀全作为最高领导者，故意让萧朝贵来限制杨秀清，所以杨秀清才迟迟不发兵。

这时候发兵显然已经有些晚了，在长沙城汇聚着向荣、和春、张国梁、江忠源、骆秉章等人，后来还来了左宗棠和郭嵩焘，黑马们全都来了，而且兵力有三万多人。杨秀清怎么打啊？估计是怎么打怎么输，除非这些人老毛病又犯了，互相扯皮，互相争执，还没开战先搞内讧。

杨秀清终于被张国梁搞烦了，只好回头先收拾张国梁。让杨秀清意外的是，张国梁真不是好惹的，他不但没收拾张国梁，反而被张国梁收拾了。杨秀清还是用老办法，设埋伏，在攸县丹陵桥附近设下埋伏。张国梁的参将文岱来到丹陵桥，一眼就看出这里有埋伏，可想而知太平军埋伏工作之粗糙。

文岱决定将计就计，在松林里埋伏了两千精兵，自己带着几百人走向丹陵桥，佯装中计。太平军冲出来追杀，文岱又假装撤退，太平军不疑有诈，一直追到松林里。这时，清军伏兵齐出，此时，太平军终于见识到张国梁的厉害了。张国梁的部队善用火器，火枪噼里啪啦地射向太平军，太平军一片哀嚎，几百人阵亡。无奈之下，这支太平军只好退到谭家村。

张国梁真狠，别人撤退了，还不放过。他又让人掘开河堤，淹了谭家村，结果不光是太平军，就是连谭家村的百姓也无一生还。

七月初七，太平军的一支五千人部队终于和曾水源会师。曾水源这下遇到水源，活了，率领大军发动突然袭击，歼灭了蔡公墓一带秦定三的部队。江忠源赶过来支援秦定三，结果被杀下马，他的兄弟们拼死才救回他。江忠源是个硬骨头的汉子，虽然大腿中枪血流如注，仍然坐在轿子里指挥战斗，硬是把曾水源杀了回去，保住了蔡公墓。

七月十四日，洪秀全和杨秀清终于到达长沙。洪秀全在城楼下，骆秉章在楼上，都是广东花县人，老乡见老乡，并没有泪汪汪，只是沉默，一种阴郁的沉默。也许骆秉章心想，好你个洪秀全，你什么不好做，偏偏要去做贼，看老夫今天就替家乡父老收拾你这个逆贼。洪秀全心想，骆秉章啊骆秉章，你竟然充当清廷的走狗，真丢我们广东人的脸，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让大家看看做走狗的下场。

其实，这两人完全没必要互相憎恨，如果洪秀全考上了科举，也会跟骆秉章一样站在城楼上。骆秉章考中进士那时在广东名列第一，至少就学习成绩来说，洪秀全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但现在不会读书的洪秀全混成了天王，骆秉章不过是清廷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而已。优等生变成了中规中矩老实本分的公务员，差等生变成了翻江倒海的混世魔王——这跟现在的社会现实是多么相似啊！

史载这次围攻长沙的太平军有十万，但根据李秀成的说法，只有五六万人。其实，这次太平军只是号称十万，真正的人数不过五六万，而能够作战的也就一两万人。清军的实际数目可能在三万左右，加上乡勇，不会超过五万。

长沙会战是太平天国历史上三大最惊心动魄的战争之一，另外两战分别是曾国荃在安庆大战陈玉成、左宗棠与石达开在宝庆血战。

太平天国高层对这次战役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等人共同研究，决定先派几千人挖地道。当时，长沙的清军只有两万人，还有两万人滞留在郴州，一时之间过不来。所以，杨秀清和韦昌辉的任务就是把长沙城围起来，慢慢吃掉。石达开负责渡过湘江，打通粮道，同时击毙一切支援的清军。

这个战术还是非常严密的，关键就看实战效果怎么样。

九月初一，太平军七千人扑向浏阳门校场和江忠源大营。江忠源已猜到杨秀清的打算，提前给城内的向荣发了求援信。向荣挑选出两百个最勇猛强干的士兵前去支援。江忠源习惯用腰斩战术，固营坚守，吸引太平军的主力，然后让秦定三率领乡勇从后面将太平军拦腰切断。

杨秀清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习惯用螃蟹战术，中间虚空，两翼的势力很强，就好像是两个巨大的蟹棒。秦定三企图拦腰切断，首先遇到的是两翼军队。面对两翼强大的军力，秦定三的部队一下子就崩溃了。

这时候，和春赶过来支援，和春、江忠源和秦定三三路兵马同时跟进，太平军招架不住，败退到陈家陇。江忠源奉行痛打落水狗的政策，一路追到陈家陇，没想到杨秀清在这里埋下了伏兵，这样一来，反而把江忠源给围住了。双方势均力敌，一直打到天黑，没有分出胜负，各自退去。

石达开那边情况比较好，他渡过湘江后，控制了大片的农田，当时正是收割的季节，粮草是没有问题了。杨秀清打算把战线移到西面，江忠源再次识破他的意图，请求向荣出兵渡江，但向荣一口回绝。石达开势如猛虎，在西面战场上所向披靡。向荣后悔莫及，但是仍然对江忠源非常厌烦。江忠源的计策明明是对的，但向荣偏偏不配合自己，于是非常恼怒，发誓永远不再和向荣合作。

石达开那边形势一片大好，但杨秀清这边却连吃败仗。清军最终接受了江忠源的建议，派兵去支援西岸，石达开的势头这才被遏制了。随后，赛尚阿亲自指挥对石达开的战争，千辛万苦之下终于击败了石达开。

清军将领朱启仁非常凶悍，他一路追到石达开的大本营，想赶尽杀绝，贪心往往要吃大亏。朱启仁非但没能灭掉石达开，反而全军覆没。石达开这人打仗喜欢玩技巧，尽量避免跟人正面对碰，向荣呢，喜欢硬战血战。向荣把石达开逼到橘子洲，硬是逼着石达开跟自己正面对战，石达开被逼无奈，只好跟向荣正面开打。没想到这一打，居然打得向荣全军覆没，向荣带着几十名亲兵仓皇逃走，又献了一次大丑。

就这样，石达开在河西站稳了脚跟。

在整个长沙会战的过程中，最郁闷的人莫过于江忠源。后来，徐广缙代替赛尚阿成为钦差大臣，江忠源又向他献策，结果徐广缙也不

比赛尚阿好多少，也不怎么搭理江忠源。江忠源又是老样子，甩手不干了。

这边杨秀清围攻长沙城八十多天，没什么进展，也准备放弃了。石达开负责接应，居然让太平军成功逃走。结果，太平军就在和春的眼皮下平安撤退。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敌军撤退的时候是最好的进攻时机。和春显得这么淡定，难免有人怀疑他有问题。有人指责和春收了太平军的贿赂，和春却相当不屑地说：“这些贼又不怕我，怎么可能会贿赂我呢？”

这事不了了之，就算和春真的接受了贿赂，别人也很难找到证据。太平军离开长沙后，很快就攻下了宁乡和益阳，不久，太平军又出洞庭，拿下岳阳。到了岳阳时，太平军的队伍更加庞大了，在岳阳的时候，太平军还建立起一支水军。

左宗棠这个人

在长沙会战中我们提到左宗棠这个人，不过这时左宗棠还没有崭露头角。左宗棠被誉为清朝的中兴名臣，跟曾国藩齐名，说明此人的能量是相当大的。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左宗棠的科举路也不太顺，到了二十几岁还没有考上秀才，这倒不是因为左宗棠这个人特别笨，至少在读书方面，左宗棠比洪秀全强很多。我们看看左宗棠写的一些诗词，确实还是有些功底的。左宗棠这个人读书时很有些不务正业，他喜欢看兵书，对于儒家的那一套不太感冒。

左宗棠没有考上秀才，还是花钱捐了个监生，这才有机会参加乡试。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特别幸运，本来已经落第了，没想到道光心血来潮，让扩招，让主考官从落选的五千张试卷中挑选六个人为举人。其中有一份试卷就是左宗棠的，左宗棠就这么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举人。也是老天有意要拯救清王朝，否则左宗棠准备卷铺盖回家务农呢！

左宗棠一辈子都没有考上进士，这个一点都不意外，他要考上倒是怪事了。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左宗棠这辈子可能也就是个小举人了。尽管左宗棠科举路不太顺，但他还是比较幸运了，结识了不少有能力的人，偏偏这些人都欣赏左宗棠这个偏才。

譬如，道光朝炙手可热的大臣陶澍，跟左宗棠的关系就很不错。左宗棠还曾为陶澍写过对联，陶澍很满意，更满意的是左宗棠这个人

见识非凡，一看就不是寻常人物。陶澍曾经夸奖左宗棠有王霸之才，预言这个人前途不可限量，甚至会超过自己。左宗棠当时不理解，自己只不过是举人而已。

陶澍这个人很善于识人，他一眼就看中了左宗棠，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居然为自己的儿子向左宗棠的女儿求婚。陶澍曾经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说当今的大清没有人的才干超过此人，陶澍也没想这么说无异于说林则徐的才能也比不上左宗棠。还好林则徐倒也不计较这些，亲自接见了左宗棠，这才知道陶澍的话原来字字是真。

林则徐视左宗棠为自己的接班人，可惜还没来得及重用左宗棠，林则徐就去世了。左宗棠必须自己去闯荡，如果他真能翻江倒海，也不一定要靠关系。

左宗棠投靠了湖南巡抚张亮基，成为他的幕僚。张亮基被罢免后，左宗棠一度回家种过田。后来骆秉章当上湖南巡抚，也很器重左宗棠，亲自写聘书给他，请他过来高就，当师爷。人说良禽择木而栖，左宗棠自视甚高，瞧不起骆秉章，居然不理这个巡抚。

骆秉章为了让左宗棠过来，居然故意把左宗棠的女婿抓起来，没办法，左宗棠忍气吞声来到骆秉章府里，极不情愿地做他师爷。左宗棠这人很不地道，后来他发迹之后竟然对骆秉章拳打脚踢，他看不到骆秉章这么做也是求贤若渴。

骆秉章是一个很儒雅的人，他知道左宗棠才高，左宗棠来了以后，一切事情都由左宗棠决断，还因此引来了不少嘲笑声。骆秉章经常对左宗棠说：“你觉得行就行，你觉得不行就不行，不必问我。”

左宗棠这个人脾气是非常怪异的，骆秉章对他这么好，他还瞧不起他。很明显，若非骆秉章涵养这么好，这两人是根本没法相处的。骆秉章担任湖南巡抚期间，实际上一切事情都是由左宗棠决断，有人因此嘲笑骆秉章是影子巡抚。殊不知，骆秉章是高人，左宗棠只不过是才人而已。除了左宗棠之外，骆秉章还发现了刘蓉这样的人才，刘蓉后来也成为一代名臣。

左宗棠的才能确实非同凡响，但性格过于骄狂，他总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他觉得卫青、霍去病都难入他的法眼，连民族英雄岳飞都比不上他，更不用说当今世上的这些人。左宗棠生平只佩服一个人，还是个死人，这人便是诸葛亮。不过到了晚年，左宗棠连诸葛亮都不放在眼里了，他经常说：“古代的诸葛亮哪里比得上今天的诸葛亮。”

当时有不少人拍左宗棠的马屁，说大人你真是神机妙算再世诸葛

啊，左宗棠毫不客气地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接着，左宗棠又破口大骂，这世上自称诸葛亮的庸才太多了，连洪大全这种败类都敢自称诸葛亮。一旁的林寿图笑道：“此诸葛亮之所以姓诸葛也。”左宗棠竟然因此对林寿图怀恨在心。

左宗棠这样的人，用现在的话说真是太嚣张了，什么曾国藩啊李鸿章啊，他全都看不起。他唯一看得上眼的还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因为曾国荃的性格跟他有几分神似。左宗棠曾经问曾国荃：“九哥一生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曾国荃笑道：“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左宗棠哈哈大笑：“这就是你比乃兄曾国藩强的地方。”

左宗棠在官场中是一个异类，他行事率性、作风豪迈、言谈不羁、极有个性，我们会在以后的篇章中着重提到他，因为左宗棠是晚清历史中举足轻重一个人。正如当时湖南人所说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定都之争

太平天国历史专家罗尔纲总结太平天国两大军事失误：一是定都南京，二是分兵北伐。

中国的学者思考问题的方式往往有三个特点：一个是事后诸葛亮；另一个是对问题没有细致深入的分析，往往用概念式的思维来理解；三是用空洞的理论取代科学的分析。

就说这定都南京，现代人根据历史经验，总结出南京盛产偏安王朝，由此断定南京不适合定都。想当年，这朱洪武不也是在南京建都，然后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吗？虽然他的下一任朱棣迁都到北京，但至少说明南京并不一定就是“克皇帝”的命。再说这分兵北伐，分兵北伐本身是没有错的，在古代打仗的时候经常是分成两路三路甚至四路的，分不分兵最关键的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要考虑各种因素，并不是简单地分兵不好，拧紧一个拳头就是好的。

早在进入湖南之前，杨秀清就提出了问鼎天下的大计：从湖南一路打到南京，再建都南京，然后图谋天下。洪秀全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洪教主认为应该在河南建都，河南毕竟是中原，这里自古就是王者之地，而且离北京更近一些，更适合北伐。

虽然洪秀全不学无术，经常失误，但后世很多历史学家大多认为在定都这事情上洪秀全是正确的。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太平天国选择了杨秀清路线，最后却失败了，这不正好说明了定都南京是重

大的战略失误吗？

为了加强说服力，这些历史学家还举出了定都南京的几个弊端：一、这个南京自古就是个短命王朝的集散地，在这里定都，打不开局面，犹如蛟龙被困浅池；二、江南这个地方非常奢靡，金陵又是最繁华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定都太平天国急剧腐化；三、江南一带，民风不够彪悍，在这里招的兵打仗不够猛。

真是这样的吗？

先看看第一个理由吧，第一个理由说白了就是南京风水不好，这是典型的生不出孩子怪媳妇，拉不出屎来怪茅厕。对风水有了解的人知道，南京这个地方号称六朝古都十代王朝。东吴、东晋、宋、梁、齐、陈都在这里建都，但大家知道这些王朝都不是什么老字号。除此之外，南唐、朱洪武、太平天国、国民党都曾在这里建都，所以又号称十代繁华。

这么多王朝在这里建都，虽然大多不能持久，但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南京的风水绝对是一级棒的。古代皇帝们个个都是风水的粉丝，他们在建都之前还不把堪輿这块搞得一清二楚。自古风水大师对南京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龙盘虎踞。

为什么到了近代，南京突然变成了“克皇帝”的命呢？说白了，还是我们后人总结历史经验，发现在南京建都的都没好下场，只能风光一时。

假如说朱棣不迁都，整个明朝三百年的首都定在南京的话，人们肯定又是另外一个说法，说南京确实是帝都，确实有帝都的气象。所以，从风水上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是个失败完全没有科学依据。

至于说江南奢华容易腐化更是荒谬了。江南繁华是不争的事实，但繁华不等于腐化啊！一个人要腐化，他就是在南极北极或是热带雨林还是一样腐化。要驳倒这个貌似有理的看法一点不难，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开国，大宋开国之时宋军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宋太祖定都开封，算是民风彪悍之地吧，但后来宋朝的官兵们一样变得疲软。八旗子弟在关外的时候是非常彪悍的，入关之后一代不如一代，再说北京也是北方风沙之地，连在这北方都能腐化，又怎么能把太平天国腐化的责任推到江南的繁华上面呢？还有李自成集团，也是进了北京后开始腐化堕落的。再看看反例，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也没看他的集团腐化啊！

由此可见，腐不腐化看的不是在哪里，而是谁。如果一拉不出屎就怪茅厕，那天下就没有茅厕了，茅厕都被黑锅给压塌了。

再看看最后一点，江南民风柔弱，这一点简直是侮辱南方人。这一点本来根本不值一驳，但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因为这种观点至今还很有市场——现在人都觉得说话嗓门大就是爷们，文雅、彬彬有礼就是软弱。

中国历史上那些硬骨头，譬如范仲淹、包拯、文天祥、陆秀夫、海瑞、袁崇焕等都是南方人，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例外的情形。我们就从清军入关开始说起吧，清军入关，北方的明军不堪一击，抵抗最为激烈的还是南方人。江南一个小小的典史阎应元就率领民兵杀了清军几万人，战果超过北方战场上明军的总和。正因为南方抵抗最为激烈，清军在南方的屠杀也最是骇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发生在江南。

我们再回顾一下屈辱的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中，清军不堪一击，广州人民却表现出了高昂的斗志。英国人想进驻广州，广州人一夜之间组织起十万民兵，吓得英国人不敢进城。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在英国人面前低声下气，倒是广州人血性高涨，动辄杀掉扬威作福的英国人，致使英国人对广州人心存忌惮。

再看看太平天国起义，如果没有湖南人没有湘军，这大清王朝八成要完蛋。湘军的战斗力远远超过了八旗军，这场战斗更像是湖南人跟广东人之间的一场战争，最后不学无术的广东人洪秀全败在了儒家士大夫曾国藩的手中。

我们只需看看近代历史中的这些强人们，洋务运动的大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南方人，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也都是南方人，到了蒋介石还是南方人，至于共产党的领导者中湖南人就更多了。

日军侵华时，在东三省几乎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倒是在南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上海的淞沪会战震惊世界，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拿下上海，但上海人至今还因为缺少阳刚之气被人看不起。在南京，日军制造了耸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偏偏在南京搞这场大屠杀呢？因为南京人抵抗最为激烈，让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果我们追溯得更早一些的话，就能发现南方人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当年项羽率领楚军纵横天下，无人是他的对手。项羽的失败是政治的失败，他最后败在了同乡刘邦的手中。刘邦治军虽然不行，但他手下的那些人才很多也是来自南方的，汉初三杰中，萧何和韩信都是南方人。

虽然我们驳倒了对于建都南京的指责，但并不能就因此而证明建都南京就是一个很好的决策。我们还必须具体分析建都南京的利弊。

自古，都城都倾向于建在北方，这是因为中原四通八达，气象开阔，坐拥中原等于是坐拥天下。但是进入近代，历史却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南方在经济、文化、人口等各个方面都超过了北方，占有南方等于是占据天下粮仓。这也是朱元璋当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的原因，当然，南京适合作为一个过渡性的都城，我相信这也是杨秀清真实的意思。杨秀清并没有说在南京待一辈子，而是先在南京站稳脚跟，然后问鼎中原，这也是他北伐的原因。

所以说，建都南京问鼎中原这个决策不但没错，而且是最好的一个路线。如果说太平天国打下了江山，统一了全国，还把都城建在南京，这就值得商榷了。

太平天国的失败跟建都南京一点关系都没有，它的失败还得从它的内部说起，如果我们用一架X光机照射出太平天国的骨骼，就会发现，它不失败反倒没有天理了。

攻打武昌

太平军离开湖南时，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了。队伍浩浩荡荡，船只有好几千艘，沿途的清兵没人敢去惹他们。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初十，太平军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武昌金口县，知县周和祥胆子特别大，带着四百个乡勇前去阻击。我们佩服他勇气的同时也对他的结局表示惋惜，他和县丞、千总、典史等人全部阵亡，四百乡勇尽数被歼。

武昌告急，身在的湖南的向荣、和春、秦定三等人当然是第一时间赶过去。清兵陆续赶到武昌，要守住这个很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太平军在攻克武昌之前，军纪还是非常不错的。

太平军将领黄玉昆率先在武昌龟山登陆，击败当地守军八百人，顺利地攻入府城，知府董振铎阵亡。不久，太平军攻克汉阳。此时，武昌暴露在太平军的炮火之下。武昌城内只有常大淳率领的三千人马，常大淳非常害怕，一害怕起来就胡乱指挥。很快，太平军就拔下了武昌外围的两个据点。

太平军将武昌团团包围，赶来支援的清兵无法入城，武昌因此变成一座孤城。如果说常大淳指挥才能不行的话还可以谅解，毕竟人的能力和特长很多是天生的，但常大淳却偏偏很愚蠢。武昌的百姓们担心被太平军抓走，纷纷来到城墙外，恳请常大淳开城，帮助官兵守城。但常大淳却把炮火对准老百姓，当然，常大淳可能是担心这些百

姓中有太平军的奸细。就算如此，不开城就行了，不至于用炮火轰啊！

这么一轰，把老百姓都轰到太平军那边去了。常大淳还担心太平军在城外的民房中挖地道，一把火把老百姓的房子全烧了，不少人被烧死。许多老百姓加入太平军，为太平军充当攻城向导。

此时，向荣的部队已经到了武昌城外，向荣有一万多人，军力不可小觑。他首先拿下太平军洪山的据点，接下来就比较为难了，武昌是一个孤城，外围据点全被太平军拔去，如何守城，如何进入武昌城呢？

张国梁也已经赶到，几次击败了太平军，不过他也很无奈，打赢了又怎样，太平军遮天蔽日，如果不能进入武昌城，这武昌城迟早要失守。城内的清军和城外的清军没法联系，不能里应外合，所谓的支援大打折扣。而且，这些赶来支援的清军自身就很危险，他们没有可以依靠的防守据点，很容易被击溃。

太平军果然开始了地道战，准备掘地三尺，攻入城内。城上的清军看到了，很是着急，主动沿着绳子下去，破坏地道，击杀掘地的太平军。奇怪的是，常大淳却严禁士兵下城，搞不懂常大淳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可能他爱惜士卒，担心士兵安危——只能这样想了。

太平军就这么明目张胆地挖通了地道，挖地道不是为了从地道里面钻进城内，如果是这样的话，清军只要派几个士兵把守洞口就行了，伸出一个头就砍一刀。挖地道的目的是在洞口里放炸药，直接炸毁城墙，然后攻入城内。城墙炸毁之后，洪秀全让五十个童子兵冲锋，让小孩子充当炮灰有很多好处，首先小孩子不怕死，洪秀全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洪秀全说只要冲进去，死了立即就能进天堂。这些小孩子还巴不得战死呢！

有炮灰在前面，后面的军队自然就胆大许多，武昌城一举拿下，常大淳自杀殉国。

进城之后，太平军制定了一项政策：“官兵不留，百姓不伤。”如何评价这个政策，百姓不伤是好的，但官兵不留就大错特错。太平军拒绝官兵们投降，这等于是在告诉清兵，以后你们拼死抵抗就是了，反正投降也是死。太平军又打开监狱，囚犯们纷纷加入太平军，一起对官兵进行报复性清算。

杀了一批官兵后，杨秀清突然站出来，制止了杀戮，颁布了一项新的命令：“从此以后，官兵们可以投降，投降后不杀，只是满人例外，满人杀无赦。”

我们可以猜到，颁布官兵格杀勿论政策的一定是洪秀全，杨秀清跟洪秀全多番沟通之后，洪秀全才同意不杀投降的官兵，但绝不可对满人开恩。

太平军在武昌城待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他们做了不少的事情，首先是建立了一支水军。其次是招兵买马，将部队扩张到五十万人左右。

洪秀全一度想把武昌作为首都，武昌跟长沙一样，都是省会级别的大城市。如果确立武昌为都城的话，至少洪秀全本人用不着再迁徙奔走了，造反这么久，他极想安稳下来好好享受。可惜这个想法不太现实，武昌虽然攻破了，但城外的清兵还是相当强悍的。

向荣和张国梁都是能征善战的将领，他们重整士气后，联手袭击了太平军的营垒，斩获颇丰。如果不是韦昌辉及时赶来击退了他们，估计他们的气焰会更加嚣张。

洪秀全很担心这武昌城也住得不踏实，下令石达开出城拒敌。石达开于是在城外修建炮台和土墙，向荣等人来进攻的时候，被土墙阻隔，饱尝了石达开的炮火。没办法，只得后退。张国梁却绕到石达开的后方，歼灭了千名太平军，石达开出城，亲率部队迎击张国梁，双方势均力敌，打到天黑时都各自撤走。

双方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不少，互有胜负。

拿下武昌城后，太平高层又犯了农民起义军常犯的毛病：目光短浅，只看得到一亩三分地，看不到万里江山。他们想在一夜之间把武昌的老百姓全都变成兵，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就实行男女分营制度。入我太平门，交上私房钱，不交钱的打。至于那些富户，处境就更糟，太平军直接冲进去，把有钱人的财产抢个干净。这是太平军的经济政策，其风格完全是流寇式的。

太平军的政治工作做得要比经济工作好，他们的宣传是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天天让人给大家讲天国的大道理。洗脑的人很辛苦，被洗的人也很辛苦。大家信奉儒家思想都快两千年了，突然要信仰什么上帝，没人能接受的了，而且洪秀全的上帝还那么另类。

其中有一个人实在看不下去了，站出来高声反对太平天国的思想，说太平军的“讲师”摧毁儒家的传统道德。“讲师”非常愤怒，要知道他不光是一个讲师，他手下还有一大帮子军队。他一声令下，手下的人准备把这个人五马分尸。可惜人懂得五马分尸的道理，马不懂这个道理，闹了半天，还没分尸。没办法，这个“讲师”只好自己跳下来，几个人一起把这人砍成了五段。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太平军没有军纪，这时候他们的军纪还是非常严的，尤其是禁止奸淫妇女。凡是奸淫妇女的士兵都要砍头，武昌城外就挂着几百个首级。

在武昌，太平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有很大的失误。疯狂扩军就是一个大错，扩军以后军费怎么办？粮草怎么办？如何在短期内将这些人都训练成精兵？全民皆兵之后，谁来负责生产活动？没有生产活动，哪来的钱粮？

如果洪秀全和杨秀清两人中有一个人有战略头脑，就不应该这么做。扩军是必须的，但不能这样扩，应该选择精壮的男子参军，其他人等继续以前的职业。攻打南京之前，留下一部分军队和粮草镇守武昌，这样可以保证攻打南京时的粮草和兵源。

天国的旗帜飘在南京上空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初二，太平军启程了，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南京。

这次，他们也学乖了，再也不敢全军都乘坐在民用船里。作为天王，洪秀全坐在舒适的大船里。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则率领水师拱卫，保证不会再被偷袭。当时，船分为两种，一种是民用船，一种是战船。杨秀清等人指挥的就是战船，战船有作战功能，不会被偷袭。

为了保险起见，林凤祥、胡以晃、李开芳等人还率领着步兵在岸上走，蓑衣渡的悲剧不会再重复了。悲催的是清军，没人敢惹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沿途的清军都不超过几千人，太平军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他们。

消息传到京城，咸丰气得差点翘辫子，立即将钦差大臣徐广缙逮捕入狱，提升向荣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湖南和湖北的军务。咸丰还任命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负责江苏和安徽的防守重任。此外，咸丰又任命了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守湖北和河南。

咸丰用钦差大臣的数目表明他很重视，也很生气，希望这些钦差大臣们给点力。咸丰心想，只要你们人人给点力，帝国就无虞了。

向荣很想给力，他在九江纠集重兵，准备和清军在这里大干一场。在到达九江之前，太平军畅行无阻。钦差大臣陆建瀛整天神经紧张，收到向荣的消息后，赶紧下令全军撤到九江。在九江时，陆建瀛

整天焦躁不安，要是向荣没能及时赶来怎么办啊？

陆建瀛下令全军必须日夜巡逻，切不可有丝毫疏忽，结果全军上下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有一天夜里，陆建瀛实在睡不着，半夜起来出去巡视，没想到巡夜的士兵居然把他当成贼，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这个钦差大臣当得太窝囊，陆建瀛还不能责怪那个士兵，反而夸奖他敬业。可想而知，当时清军压力之大。

陆建瀛后来实在受不了，心想，要是向荣没有及时赶到，我这老身子骨就要送给长毛了。九江这地方太危险了，陆建瀛越想越怕，撤到彭泽。到了彭泽后，他还是觉得很危险，居然连夜乘坐小船跑到南京，留着将领们守城。

巡抚张芾看钦差大臣跑了，心里也着慌。张芾素来怕死，干脆带着全军将士一起逃命。向荣果然没有如期到达九江，太平军来时，发现这里空空荡荡，大家一路引吭高歌经过九江，很快就到达军事重镇安庆。安庆总兵王鹏飞知道大势已去，自己如果抵抗，肯定是全军覆灭，干脆带着大家一路狂奔，狂奔没有目的地，离太平军越远越好。

安庆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有长江作为天险，是太平天国一个重要的屏障，如果能把安庆搞好，南京城的安全就能得到巩固。后来，曾国藩把安庆比作是太平天国的七寸，不惜巨大代价拿下安庆，最终撬翻太平天国。但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却没一个意识到安庆的重要性，别说的不学无术的洪秀全，就是脚踏实地的杨秀清也没看到这点，这件事充分说明了多读书多长点见识是有点好处的。

杨秀清到了安庆后，根本没想到好好经营这个战略要地，还是老一套，疯狂扩军，将钱财席卷一空。

太平军离开安庆后，部众已经扩大到七十万人了。

镇江、瓜州、扬州、南京全都暴露在太平军的刀锋之下。太平军一旦控制了镇江和瓜州，等于是控制了南北漕运的咽喉，清廷危矣。没有南方粮草和银钱的供应，在曾国藩和左宗棠还没有脱颖而出的时候，要想击败蝗虫一样的太平军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咸丰也很焦急，提拔周天爵为安徽巡抚，负责在安徽剿匪。这个周天爵我们已经见识过了，完全是一个大内密探零零发，他极有搞笑天赋，但现实不是电影，搞笑是搞不垮敌人的。这次，周天爵又对咸丰说：“太平军非常骁勇善战，要想打败他们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办法。”

“什么办法？”咸丰问。

“下毒，”周天爵表情深沉地说，“皇上，您只要给我三十万斤的烂肠草，我保证让洪秀全和杨秀清不战自溃。”

咸丰还真相信了，立即下旨让两广总督叶名琛收集三十万斤的烂肠草。据说，石达开曾经让士兵们收集了几万斤烂肠草卖给叶名琛，再用这些钱买回了不少大炮火枪。

周天爵搞笑过头了，最后自己辞去军务，推说自己年纪大了。咸丰于是紧急召见军机大臣，问他们怎么办。经过一番商议和争吵，最后制定了一个战略：南京将军祥厚主持这次防守，江苏巡抚杨文定镇守镇江，漕运总督杨殿邦镇守瓜州，向荣带兵到南京救援，琦善带兵支援瓜州，江忠源和邓绍良带兵救援南京。

清廷高层的想法是在南京城下一举歼灭太平军的主力。但向荣和琦善却违背圣旨，迟迟不肯出兵。曾国荃后来评价说：“先到先败，后到后败，同到同败，不到不败。”江南总兵兵力才几万人，太平天国却有七十万之众，能够作战的至少也有十万人。军机大臣们纸上谈兵不需任何代价，只不过浪费点口水，但前方将士却要因为这些口水而送命。自古就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说法，所以他们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月二十八日，李开芳的部队抵达南京城外，从武汉到南京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路上基本上没遇到像样的抵抗。

李开芳到了南京城外后，终于遇到了一次像样的抵抗。这支抵抗的力量并不是来自清军，而是一个叫张炳垣的读书人纠集的几百乡勇。令人称奇的是，这帮乡勇连武器都没有，拿起扁担充当武器。还别说，他们打得有模有样，因为是巷战，太平军不熟悉地形，被他们打得晕头转向。

陆建瀛在城楼上看呆了，他不理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几百个乡勇对付太平军上万人，怎么可能？这仗打得起来吗？

乡勇们一下子打出了自信，加入团练的越来越多，大家纷纷请求总督陆建瀛支援，贡献些武器。陆建瀛本是个神经很容易紧张的人，他认为这帮乡勇是太平军的内奸，故意做做样子引诱自己开城。陆建瀛不但不给乡勇们武器，反而下令向乡勇们开炮，炸死了几百个乡勇。乡勇们彻底寒心了，纷纷逃走。

陆建瀛非常黑，他杀死乡勇后，还上报说击杀了大量的太平军。咸丰一听他立功了，表扬一番，陆建瀛把这些钱全部挪入自己的家中。

不久，林凤祥的精锐部队和李开芳会师，太平军意气风发，而城

内的守军却心惊胆战，个个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城楼上。

太平军先不急着攻城，而是把大炮先运到城下。李开芳大旗一挥，数十门大炮朝城楼轰去。城里许多建筑被轰塌，看这架势，陆建瀛又想逃命。儒生张炳垣这时候派上用场了，他建议陆建瀛，用牛皮泡水后包裹藤盾，再蒙上一层渔网，盖在城楼上就可以抵挡炮火。陆建瀛将信将疑，到了这节骨眼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权且当做一个偏方吧！

没想到这偏方真的很管用，陆建瀛此时心理上完全处于依赖状态，他觉得张炳垣这个人太神奇了。只要有他在，南京城定然金枪不倒，这么一想，便不再作逃跑的打算。

别说张炳垣不是诸葛亮，就算他真是诸葛亮也不管用。各地援兵都没赶到，南京城已经是一座孤城了。而且攻城的林凤祥是个有勇有谋之人，无论白昼黑夜，太平军的大炮持续不断地轰击着南京城，城内的守军无不心惊胆战。一到晚上，林凤祥就将士兵分成很多小队，假装要攻击，搞得清军人心惶惶，夜不能寐。

与此同时，南京城内部也不消停，城内的天地会教众也伺机搞破坏。到了这地步，陆建瀛已是草木皆兵，南京城已经没有什么道理了。就算不会被攻破，陆建瀛也会精神崩溃。

杨秀清到了前线之后，下令在静海寺、天后宫等地方挖掘地道，准备实施爆破攻城的计划。张炳垣发现之后，建议陆建瀛在入城口修建地堡，在城中主干道两旁设置炮台，只要太平军挖地道就轰击。不知道为什么陆建瀛拒绝了他，想是这些天被吓坏了，不再相信张炳垣。

二月十日，一声巨响，狮子山上的那块城墙轰然倒塌，接着太平军又用大炮猛烈轰击缺口。狮子山那块的城墙全部倒塌，太平军蜂拥入城，陆建瀛正准备逃跑，不想在街上被逮了个正着，当场被杀。如果以为到这里战事结束了，我们就大错了。汉兵们一哄而散，因为之前杨秀清颁布过命令，凡是投降的可以不杀，所以大家还是保命要紧。

但南京城内驻扎着一支八旗军队，八旗军队是没有特赦权的，不论投降还是血战，都是个死。置之死地而后生，八旗兵和城里的乡勇联手，居然把攻入城内的太平军全部歼灭。许多和尚也加入了这场战斗，因为太平军从武昌到南京的途中杀了不少的和尚，理由是这些和尚相信佛祖不相信上帝。

李开芳亲自率领大部队进城，才控制局面，将八旗兵击退到城中

之城。南京城内也有很多的小城，这些旗人拼了命也要跟太平军战斗到底。洪秀全这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如果改变一下政策，规定投降的人一概不追究，说不定这些八旗兵立即会缴械投降。

现在剩下的就是血战了，杨秀清亲自指挥攻城，连攻三次都没有攻下来，徒留下几千具尸体。杨秀清终归是杨秀清，他心想你们就这么点人，还能死扛到底啊，我先用车轮战把你们搞得精疲力竭再说。不少八旗兵在杨秀清的车轮战术下居然活活累死，看到八旗兵精疲力竭，杨秀清忽然下一道命令：投降的旗人可以免死。

杨秀清太阴险了，他这道命令一下，等于是给旗人们浇了一瓢冷水，斗志大减。目的达到了，杨秀清命令太平军全力攻城，终于拿下最后的钉子。将军祥厚自杀殉国。城破之后，洪秀全下了一道非常无耻的命令，下令全城捕杀旗人。先前杨秀清已经答应了投降不杀，现在洪秀全又下这样的命令，虽然说兵不厌诈，但这么做确实太卑鄙了。

我们不知道杨秀清对此的反应，估计也是听之任之的态度。

两万旗人全部被杀，无一幸免。

南京陷落，全国震惊。

第三章 决定天国存亡的北伐与西征

要搞清楚这次北伐绝不容易，这次北伐跟历史上的其他北伐不太一样，它奇怪的地方就在于北伐的兵力少得可怜，只有两万人。这就让人费解了，让两万人拿下京城，洪秀全和杨秀清虽然肚里墨水很少，但也不至于蠢到这个地步。其中必有隐情。

改造天京

南京之战，对清廷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噩耗，对于太平天国来说，是一个天大的胜利。这些农民出身的起义领袖们终于踏上南京这个繁华的大都市，他们的心情是无比激动的，对未来也是无比乐观的。

他们不会想到，南京居然也可以成为埋葬他们的地狱。

洪秀全进城之后，南京城改名为天京。接着便是对全城进行改造，还是老办法，所有的人都编为天国的子民，居民财产全部充公，天国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分开，漂亮的归天王洪秀全和诸王所有，其余人做女兵。洪秀全一来，南京城内的商业全部废弛，对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整个南京城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兵，一种是兵的家属。全民皆兵，据说南京有六十万精兵，所谓精兵就是不包括老弱妇孺的青年壮丁，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所有的精壮男丁都是兵。如果生产遭到破坏，兵再多又有什么用，生产跟不上，就会有很多人饿肚子，饿肚子的人多了，仗就没法打。

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玩的还是杀鸡取卵的游戏，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改造世界，而非根据客观现实因势利导改变世界。

洪秀全的宗教政策也非常残忍，对于其他宗教的信徒一概采取清洗政策，这样固然省事，但伏下了天怒人怨的祸端。就连天主教徒也未能幸免，虽然天主教徒相信上帝，但拒绝服从拜上帝教，因此他们也受到迫害。

许多工商业人士、娱乐圈人士，甚至包括一些医生也被关进了监狱，在太平天国之内思想完全统一，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不过这样也有坏处，譬如杨秀清患上眼疾后，一时之间居然找不到医生来

治疗，韦昌辉悬赏一万两银子都没人上门。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不少医生被投进监狱，另一方面也说明太平天国确实得罪了一大批人，尤其是那些有技术的相对富裕的阶层。

全城人民的思想统一之后，接下来就是大修天王府了。洪秀全是一个非常热衷于享受的人，天王府自然要修建得富丽堂皇。天王府后来被湘军一把火烧了，否则我们今天还能一睹它的繁华，据说天王府的豪华程度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现在我们只能从记载中感受它的风采了。

天国的构架已经成型了，但洪秀全还不满意。考虑到太平天国中国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洪秀全觉得再穷不能穷了教育，读书还是要的，于是便开设了天国科举制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太平天国在定都南京不久还是非常尊重读书人的。

大学问家顾观光的儿子顾深就不幸落入了太平军的手中，后来顾深写了一本《虎穴生还计》，讲述自己在太平天国的经历。根据顾深的记载，他刚被抓后，说自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什么活都干不了。他原以为太平军会放过自己，没想到听说自己是文人后，他们反而硬把自己留下。太平军上下对顾深都非常尊敬，他的工作就是文字工作，逢年过节帮大家写写对联，太平军的领导要写文书，他就代笔，诸如此类等等。

顾深还颇为得意地写道，只要有文书来，这些文盲们都会聚拢在他身边，毕恭毕敬地听他读信。顾深还引以自豪地写道，他们有不理解的地方，有不明白的道理，都会过来请教自己。

洪秀全很清楚，一个政权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于自己的统治是不利的。怎么办呢？最好是留下他们的知识，再阉割掉他们的思想。可惜世上哪有这么美好的事情啊，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培养出太平天国自己的知识分子。

怎样培养出这种符合政治需要的知识分子呢？洪秀全有一套办法，儒家的这些经典书籍还是要读的，不过在此之前要全面地和谐一番。洪秀全甚至亲自删改儒家典籍，好歹洪秀全也算得上是半个文人。好了，这些删节版的儒家典籍就是考试的素材了，但是答卷的时候千万不能过于儒家了，一切要以拜上帝教的宗旨为准绳，答卷的时候一定要紧扣这个主题。科举的考官都是太平天国的高层人物，足见太平天国对于科举也是非常重视的，可惜这些考官往往都是半文盲，而拜上帝教的教义又非常粗俗浅陋。考试如何考出水平这才是最关键的。

太平天国的科举分为乡试、县试、郡试、省试、天试。虽然洪秀

全表现出一副求贤若渴的姿态，但是应试者寥寥无几。太平军进城后，读书人大部分都逃走了，留下的一部分对这个政权不满，一部分就算真想博取富贵，也担心考试时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富贵不成反而丢了脑袋。

后来，杨秀清下令凡是读书人不来参加应试的全部要砍掉脑袋，无奈之下，大家纷纷耷拉着脑袋过来应试。有的人直接交白卷，有的人写诗讽刺洪秀全、杨秀清，这些人不少被处以极刑。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百姓的支持，却让读书人退避三舍。

洪秀全的科举制度最后流于形式，洪秀全之所以不废掉科举制度是因为他觉得有科举才说明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王朝。有意思的是，太平天国的科举中榜率实在太高了，只要你进了考场，又认认真真地答完了试卷，一般都能高中，录取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洪秀全是第一个开设女子科考的，这当然也只是个形式，跟拜上帝教男女平等的思想一致。

中国第一个女状元傅善祥就是在太平天国中高中的，她曾写过这样的对联：“独手擎天，重建大明新气象；丹心誓国，扫除外族旧衣冠。”在太平天国中，拿到名次的一般都是马屁拍得一流的人，只要马屁拍得好，词句通不通不要紧。

有一年的解元之所以高中就是因为写了这样一句：“恨不得杀尽妖头，上答天王之高厚。”

在太平天国流传得最广的一首诗并不是《静夜思》，而是：“一统天朝界，山河万重新。士民皆欢乐，成颂太平春。”

太平天国的科举完全是一场闹剧，并没有选拔出像样的人才。但对于一个政权来说，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太平天国的人才主要还是来自下层百姓，科举招不到人才，洪秀全便亲自书写“求贤榜”：“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竹匠，或铜铁匠，或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

一篇大白话的“求贤榜”，老百姓一看就懂，觉得这个领导人没有架子，彼此间心理距离很近。通过这种方式，洪秀全发现了不少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虽然出身卑微，大多有一技之长，其中有很多人还是真正的豪杰。由于遴选机制问题，这些人长期被拒绝在传统的科举大门之外，现在他们终于有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但由于文化的缺乏，他们毕竟都有难以弥补的缺点。

写到这里，我们试着对洪秀全作一个评价。洪秀全是那个要文没文要武没武的人，文治才能他远远比不上冯云山，武功本领他又比不上

杨秀清，领军作战的本领他比不上韦昌辉、萧朝贵、石达开这些人。洪秀全为何还能成为这些人的领导呢？这固然跟洪秀全的创始人身份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洪秀全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如果说洪秀全有什么才能的话，那就是用人了。

在中国历史中，洪秀全最像的一个人可能就是刘邦了，不过论其气度和智慧他都比不上刘邦，可以说是一个大量删节版的刘邦。在用人方面，洪秀全也远远比不上刘邦，只是说和洪秀全自己的其他才能相比，用人方面他是相对出彩的。

从天京之乱中我们就能看出洪秀全的心术，他先是利用韦昌辉和秦日纲杀掉杨秀清，最后又借此除掉韦昌辉和秦日纲。到后来，他又果断地启用李秀成和陈玉成这样的后起之秀，这两人都是杰出的帅才，没有一点的用人本领，是很难做到这些的。虽然洪秀全的所作所为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但毕竟巩固了个人的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用人之术。

也谈谈北伐

在写太平天国历史的时候，北伐是最关键的一环，根本不可能绕开，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北伐对于太平天国来说就像一个生死关口。北伐的失败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的史学家认为太平天国在拿下南京之后，应该借着锐气，一鼓作气，全军直捣北京。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时太平天国的斗志正处于最高昂的时候，全部主力北上的话，极有可能拿下北京。

如何评价这个观点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观点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当年吴三桂造反就因为在长江边踌躇不前，误了大事。太平天国如果倾巢出动，确实很有可能拿下北京。但是有几个问题必须考虑到，首先这么做风险是相当大的，南京一战中就能看到八旗子弟在绝境中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如果不能拿下北京，太平军很可能就会走向崩溃的边缘。其次，就算是拿下了京城又怎么样？太平天国能统一全国吗？

有人觉得，连京城都拿下了，这天下自然是你的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黄巢攻陷了唐朝的都城长安，最后还是兵败被杀。李自成也打进了北京，最后还不是落得逃亡被杀的命运。对于太平天国来说，当时有两大威胁，而且都是致命的威胁。一个是内部的矛盾，在南京尚且杀得你死我活，到了北京，权力更大，内讧只会更加激烈。第二个

是地方上的力量，推翻了清政府不代表就建立了新政权，北洋军阀的例子我们都看到了，洪秀全如果在北京当了皇帝，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会同意吗？

综合各种因素考虑，我们认为攻克南京之后如果倾巢涌向京城是一个自取灭亡的决策。如果不信的话，我们看看当年朱洪武是怎么做的，朱洪武拿下南京之后，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先后吃掉陈友谅和张士诚，经过了多年的积累和巩固最后才决定北伐，赶走元朝统治者。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向荣很快在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琦善在扬州建立江北大营，这两人好比是蹲在天国门口的两头老虎。如果太平军全力北伐，一定是腹背受敌，首尾难顾。

要搞清楚这次北伐绝不容易，这次北伐跟历史上的其他北伐不太一样，它奇怪的地方就在于北伐的兵力少得可怜，只有两万人。这就让人费解了，让两万人拿下京城，洪秀全和杨秀清虽然肚里墨水很少，但也不至于蠢到这个地步。其中必有隐情。

定都南京两个月后，太平天国高层发出了北伐和西征的命令，北伐军由李开芳和林凤祥率军，主力部队由两万广西人组成。

朱元璋北伐时动用了二十多万大军，后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后也用兵十多万，还是在武器不对等的情况下。洪杨用两万人北伐这是在闹着玩吗？北伐将领李开芳和林凤祥虽然骁勇善战，但北伐事关重大，理应派上韦昌辉或是石达开这样的人当元帅才对啊！太平天国这次北伐确实给人留下了太多的疑惑。

为了解开这些谜底，我们还得从清朝的军事体制入手。在写清朝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清朝的兵力非常分散，总是几千人、几百人一调，最多也就几万，从来没有一次性调动十万大军的，这在其他朝代是很少见的。这首先说明了清朝的兵力比较少，国家的常备军不超过八十万，其中绿营六十万，八旗兵二十万。实际数目更小，因为各营都有缺员的情况。

读者一定很好奇，到清朝时中国已经有四亿人口，组建一支两百万的大军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兵这么少呢？这还得从清朝政权说起，清朝是外族政权入主中原，八旗兵不是很多，他们能放心军队里全是汉人吗？所以，清朝皇帝在政治和军事上最讲究控制和平衡，让下面互相牵制，从而维护统治的稳定。

太平天国军队爆发后，清朝真正能调动的军队不过四十万。这四十万能够作战的军队还分散在全国各地，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清廷调兵

几百人上千人，这在以前的朝代是不可想象的。

鸦片战争时，西洋军队几千上万人在神州大地横行无阻，很多人都嘲笑清廷的软弱。其实，他们也有难处，首先是兵少，其次又分散。真正跟洋人作战的部队也多不到哪里去，通常也就是一两万人，有时候洋人的军队还更多一些。

清朝军事制度深深地打上了外族政权的烙印，由于满族人口少，他们必须控制汉人军队的数量，从而导致军队整体规模较小。由于是外族入侵后建立的政权，他们随时担心各地出现起义，又将这些少得可怜的军队分驻到全国各地，如果出现会党起义立时弹压。而且各地的驻兵都是互不统属的，目的也是为了互相牵制，防止这些军队联合，操于一人之手，对清廷构成威胁。这也是曾国藩解散湘军的原因，他不解散的话迟早要跟清廷干仗。

几百人、上千人的小军团分驻在全国各地，而且这些小军团的头目互相不节制，这固然不会对清廷构成威胁，但对于镇压太平天国这样大规模的起义也很不利。太平天国动辄几万人，如果有一个会打仗的统帅，可以轻松将清军的小军团一一歼灭。因为清军不够，各地才组织乡勇，正是这些乡勇的存在遏制住了太平军的步伐。

写到这里，我们多少理解杨秀清为何安排两万人北伐了。首先李开芳和林凤祥都是优秀的将领（虽然不是帅才），而且两人互补，一个有勇，一个有谋，如果他们指挥得好的话，未尝不能成功。北伐军后来被胜保和僧格林沁两个军团打败。其实这两个军团加起来也不过四万人，两万人打败四万人并不是什么天大的难事。

八旗军总共有近二十万，其中两万在南京之战中全军覆没，还剩下十八万。如果灭掉胜保和僧格林沁的军团还有十四万，一般认为清廷不会把这十四万人全部押注，这些人可能是负责保护爱新觉罗家族北逃的。清廷会不会这么做不知道，但杨秀清很可能是这样想的。

所以他派出两万人，这两万人全都是精兵，都是从革命根据地广西发展起来的。当年太平军几千人冲破赛尚阿四万人的封锁，一路攻破南京，形成百万之众。杨秀清有理由相信这种事情也可以出现在李开芳、林凤祥身上，如果一开始就给李开芳、林凤祥十万大军，杨秀清自己也不放心啊！他也担心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担心李开芳、林凤祥攻破北京后拥兵自重。

杨秀清显然也算上北伐途中有大量的捻军和天地会等组织，如果李开芳处理得当，大军抵达北京时未尝不会有几十万人之众。从历史上看，北伐所以失败，更多的还是指挥上的失败、战术上的失败。

而且，拿出两万的军队对于太平天国来说不是一笔很大的赌注。杨秀清显然是抱着不成也罢能成更好的心态。他并没有把全部的希望都押在这场战役，如果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压在这场战役上，很可能会亲自指挥这场北伐战争。北伐的真正目的可能是为了牵制清军，从而为西征缓解压力，西征才是主力。

从后来的历史看，也确实是这样的，韦昌辉、石达开、罗大纲、曾天养、胡以晃等重量级人物都参加了西征。为什么西征这么重要呢？因为西征的目的是打下半壁江山，控制东南富庶地带，给清廷来个釜底抽薪，如果控制了整个南方，那么清廷就没几天可折腾了。

总体上说，杨秀清这个战略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外敌还没有灭，内部的争斗就已开始，第一个送命的恰恰是他自己。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思路，假设太平军将全部主力部队用来北伐，会出现什么结果？一方面清廷很可能被推翻，但各地的清军很可能偷袭南京，重新占领南京。到时候天国真正拥有的不过是北京一座孤城，占据北京后，接下来就是消灭各地的督抚了。在这个阶段，各地会党很可能不但不帮忙，还会捣乱，也在图谋江山。

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些人有经世之才，没了清廷的约束，他们的发展会更加迅猛。如果曾国藩和左宗棠打出拥护清廷王室的旗号，将有大量的军队和乡勇汇集在他们的旗下，洪秀全打不过曾国藩，杨秀清也干不过左宗棠。估计，清廷玩完，天国也玩完。湖南人会早一百多年打下江山。

所以说，杨秀清偏师北伐主力西征是深谋远虑之后作出的决策，无奈洪秀全比杨秀清更深谋远虑，直接把他干掉了。杨秀清不想为曾、左等人作嫁衣裳，洪秀全也不想为杨秀清作嫁衣裳，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北伐军只动用了两万人，西征军有六万，这是两次非常大的军事行动。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大多认为太平军可能并不像史料记载的那样有六十万精兵，否则不会出动这么少的兵力。历史学家孟森却坚信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有六十万精兵，因为后来的事实很明显，天京之变后，陈玉成李秀成带兵动辄几十万，有时高达上百万，怎么会没有兵呢？

只不过在杨秀清在的时候，非常注重质量，他死了以后，高层更加注重数量。杨秀清一般是不会把新兵派上战场的，新兵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派上战场。

杨秀清的这种军事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兵贵精不贵多，用精兵可以以少胜多，这也是太平天国前期发展迅猛的原因。后期，太平军动辄几十万大军，却被曾国藩几万人打得抱头鼠窜。杨秀清之死对于太平天国确实是一场灾难。

现在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应不应该北伐呢？

我觉得应该北伐，北伐是主动出击，在战略上可以让己方处于主动地位。如果取消北伐的话，那么清军就主动得多，也会有更多的兵力来围剿太平军。

北伐军人数虽然少，却是太平军中最精锐的部队，里面的将士主要来自广西，也就是曾国藩所谓的“老长毛”。曾国藩曾经有这样的评价：“三十万新长毛的战斗还比不上三万老长毛。”这支王牌军队虽然一路上发展到五六万，但打到最后始终是两万。原因其实很简单，对于这样一支精英部队，其他人很难真正融入他们，而且北伐军是流动作战，新加入的人也跟不上节奏。

北伐军确实极大地牵制了清军，清廷前后调动二十多万大军才消灭了北伐军，清军方面损失了七万多人。北伐军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对于清廷的震撼极大，以至于后来曾国藩抓到了广西的长毛，一律斩首。

下面我们将看看这支王牌军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失败的。

纵横北国，过把瘾就死

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初一，北伐军出发了。

关于北伐军的人数还得啰唆几句，一般认为是两万人，但也有人认为有五万人，历史学家范文澜就持有这种看法。他认为北伐军在出发时有五万，在过黄河之时损失了三万，最后只剩下两万。

北伐军首先到达安徽境内，整个安徽只有四千清军，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周天爵招抚的捻军。这支军队自然不可能抵御北伐军，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来到六合县。也就是在这里，北伐军尝到了厉害。六合知县温绍原虽然是个小官，但跟江忠源一样，官小志气不小。他很早就预见到太平军可能会攻打六合，提早做好了准备。

温绍原是个不错的父母官，深得民心，他老早就训练了一大批乡勇。在太平军到来之前，他就把百姓都迁入城内，然后坚壁清野。两军相持期间，温绍源甚至主动偷袭北伐军的先锋部队，差点让太平军

的先锋部队全军覆没。

北伐军攻不下六合县，只好绕开，攻打镇守苏州的周天爵。周天爵手下没多少兵，但他这个人胆子非常大，居然真的模仿书中情节，玩起了空城计。城门打开，周天爵坐在城楼上悠闲地抽烟。林凤祥非常谨慎，居然不敢攻，放弃了宿州。周天爵得理不饶人，居然还带着三千人马去追击太平军，也小有收获。

太平军一再受挫，损失了不少人马，只好招募饥民。后来北伐军又被胜保在清流关下击败，北伐形势不容乐观。从这些战斗中可以看出，李永芳和林凤祥都不是那种能够独当一面的帅才，只能算是冲锋陷阵的将领。

不过，这两次失败之后，太平军很快扭转形势，接连攻克蒙城、亳州，来到黄河边上。

清军将领陆应谷与北伐军在黄河边发生了激战，双方都死伤不少。正在北伐军苦于无法渡河之事，捻军过来协助他们，击退清军，攻下归德。陆应谷仓皇逃跑，归德之战后，北伐军再次一路高歌，畅行无阻，接连攻破睢州、陈留、开封，一路到达军事重镇朱仙镇。

尽管太平军拔去了黄河边上的清军营垒，但林凤祥和李开芳都不熟悉水战。这两人都是打仗还行，组织不行的角色。加上此时军队人数扩张，他们一时之间非常茫然。林凤祥请求韦昌辉支援些粮草，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啊！仓皇之中，两人也没来得及筹备，就匆匆渡河。结果被八旗将领托明阿和善禄偷袭，死伤惨重。

无奈之下，他们决定趁夜偷渡，结果又被清军炸沉不少船，伤亡惨重。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李开芳和林凤祥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渡河。渡过黄河后，只剩下两万人的精锐部队，其他人等不是被杀，就是逃散。

北伐军渡过黄河后，咸丰顿时吓坏了。接着，北伐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河南省怀庆府。怀庆城池坚固，北伐军打了两个月，拿不下来，只好放弃，向西挺进。其时，在天京的杨秀清给北伐军发出了一道密函，让他们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以最快的速度闪击京师，让清军来不及反应，方寸大乱。可惜这封密函被清军截获，李开芳在怀庆逗留了两个多月，完全违背了杨秀清打乱清军的战略部署的目的。

杨秀清也知道北伐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所以要通过机动作战打乱清军部署，防止清军的散部队集结成大军团。

随后，北伐军进入山西境内。咸丰大怒，下令逮捕直隶总督纳尔

经额。

听说太平军进入山西，巡抚哈芬立即跑得不见踪影。咸丰又很愤怒，下令逮捕哈芬，但没人能找到哈芬。如此一来，山西境内等于是没有设防，北伐军在这里纵横驰骋，极少阻滞。城池一座接一座被攻破。如果北伐军在山西能树立良好军纪，将这里当成北伐的一个暂时大本营，也许北伐的结果就完全两样。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在平阳城，守城的一个清兵开炮打死了林凤祥的一个旗手，而这个旗手恰恰就是林凤祥的老乡。林凤祥非常愤怒，破城之下，下令屠杀全城百姓。疯狂到这个地步，能不覆灭吗？

北伐军由于缺少一个素质高的领导，军纪混乱也是意料之中。李开芳和林凤祥都是粗暴的武夫，不太懂政治，所以群众基础比较差。听说太平军来了，百姓纷纷逃亡。此时，人数虽然有五万，估计很多人都是勉强加入太平军的。

穿过洪洞后，北伐军进入了直隶省，扑向天津。才十几天的时间，北伐军就一路攻城略地，距离保定只有六十里。消息传到京城，皇城里面炸开了锅。城里的有钱人纷纷出逃，咸丰也做好了逃亡的准备。

危亡关头，咸丰作出部署，命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胜保等人合力保卫京城。

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曾考中举人，但天生对军事感兴趣。胜保虽然是满人，但最崇拜的偶像是岳飞，这个武痴还打算在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字，结果刺完“精忠”两个字就刺不下去了，太痛了。至于报国两个字是用红笔写上去的，每半个月上一次色，起保鲜作用。在被咸丰委以重任之前，胜保一直生活在幻想中，受够了同僚们的嘲笑。

这次终于能够一展平生报复，那肯定是拼死卖力了。

近代人物中，胜保最崇拜年羹尧。他说话做事经常模仿年羹尧的风格，甚至连生活细节都模仿年羹尧。如此一个人，很难让人相信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将领。但清军将领的素质实在太低了，胜保好歹是一个急切渴望施展才华的人，只要敢打敢拼，慢慢就能打出经验，说不准真能成为一代名将呢！

九月二十五日，北伐军打到沧州。沧州知府沈如潮站出来，招募三千乡勇，严阵以待。北伐军完全没有料到沈如潮是一个猛人，这天清晨大雾弥漫，北伐军前锋前进的时候忽然遇上了沈如潮的军队。北伐军很奇怪，这些人不守城，出城来干吗呢！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已

经杀了过来，沈如潮的部队对地形很熟，也习惯了大雾天气，很快就杀退太平军的进攻。

最后北伐军集合全部兵力围攻沧州，终于拿下这座铁城。为了泄愤，李开芳和林凤祥下令大肆屠杀，虽然没有杀光全城的人，也杀了上万人。

攻克沧州后，北伐军扑向白洋淀。去过白洋淀的朋友知道，这里四处环水，很适合打水上伏击战。北伐军陆战能力不错，水战正是软肋。果然，第一次进攻北伐军就损失五百人，而守军无一伤亡。

北伐军几次进攻先后被挫败，只好退到静海。此时，北伐军在军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如果不惜一切代价攻打天津，应该是可以拿下的，天津的防御力并不强。

机会稍纵即逝，没多久，胜保和僧格林沁的军队已经抵达天津。清军仓促过来，军容不整，辎重在后。李开芳和林凤祥如果在这时候来个突然袭击是很容易击败支援的清军的，可惜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做。也许他们是吓怕了，一直守着静海，坚守不出。就这样，眼看清军在天津城周围集结。

其实，清军是有很多破绽的，首先胜保和僧格林沁两人的关系就不好。胜保名义上是保卫京师的钦差大臣，但僧格林沁的实际地位要高，所以他们互不统属，两人经常钩心斗角。

奇怪的是，林凤祥不仅没有进攻，反而让李开芳带领四万人驻守独流镇，自己带着一万人守静海镇。

这五万人的北伐军中，真正有战斗力的还是从南京出发的那两万人。流民组成的军队本来就军心涣散，只有通过战斗才能不断凝聚他们。现在北伐军转攻为守，无疑助长了很多人叛逃的心思。

前来增援的清兵号称是八旗精锐，但是战斗力也相当差，前后十多次对北伐军发动超过万人规模的进攻，都被打退。两支军队就这样陷入僵持状态，如果李开芳和林凤祥有石达开那样的才能，北伐很有可能会成功。杨秀清北伐的战略是正确的，但让林、李两人担此大任不能不说是杨秀清用人的失误。

正面进攻没有效果，双方都选择在晚上搞一些突然袭击。有几次，两军夜晚搞突袭，在半路上恰好相遇了，互相打起来。打到伸手不见五指，双方心照不宣地撤回去。结果撤退时很多人搞错方向，清军跑到北伐军那边为北伐军修炮台，北伐军跑到清军那边为清军筑工事。等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原来回错了地方。

后来，北伐军实在熬不住了，主动进攻。没想到进攻僧格林沁时，被胜保偷袭，损失了几万人，最后只剩下两万。

自此，北伐军渐渐步入劣势，清军步步为营，包围北伐军。北伐军突围退入阜城。其实到了这地步，北伐军已经没什么搞头，南下和援军会师倒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林凤祥突然作出一个自取灭亡的决定，不再后退，坚守阜城，等待援兵。杨秀清确实派出了一支七千人的援兵，但这支援军正被清军拦截在山东临清。

林凤祥坐地等死，僧格林沁和胜保证求之不得。他们率领四万清军团团围住阜城，激战之中，主将吉文元阵亡。这也是攻城以来获得的最大战果，僧格林沁攻了许多次，都不能成功，忽然听说北伐的援军已经冲破临清，渡过黄河北上。僧格林沁急让胜保带领万人前去阻击。

胜保一走，北伐军压力大为减轻，林、李二人带兵出击，成功突围，退到连镇，在这里补充了大量的粮草。可惜，冬天已经到了，这些南方军队实在经受不起北方的严寒，冻死饿死不少，北伐军内部弥漫着一股失望的情绪。

胜保还真不是纸上谈兵之辈，居然把北伐军的援军全部歼灭。而这边的李开芳还以为援兵不久就到来，亲自带着几百人迎接。他没迎接到援军，倒是迎接到胜保，李开芳狼狈逃回。

此时，北伐军还剩不到万人，清军兵力是他们三倍以上。后来逃兵越来越多，在逃兵的指引下，清军攻破城池。林凤祥被抓住后，押往京城凌迟处死。林凤祥不愧是从血火中训练出来的人，他有着恶魔般的意志，凌迟的时候，居然面不改色，反而很镇定地看着刽子手对自己下刀。当时，在一旁的清廷官员吓得面色如土，大家纷纷说：“这个人简直不是人啊！是人哪有不怕痛不怕死的，你看他这样子，不是个英雄，就是个魔鬼……”

北伐军主力虽然被歼灭，还剩下李开芳率领的一千人。李开芳居然多次抵抗了清军的进攻，胜保因为模仿关二爷被僧格林沁参劾，押往京城问罪。一路上，胜保诗情大发，感叹自己是深受不白之冤的岳武穆，也算是自娱自乐，免得在囚车上无聊。

李开芳最终还是被捉住了，一天大风沙，他想跟僧格林沁玩诈降，结果被人识破。李开芳也是一个硬汉，在刑场凌迟时他居然接连踢死了两个刽子手，还带着部下们高喊：“自出天京，所向无敌，清妖不堪一击，灭亡就在眼前。”

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杨秀清为什么安排这两人北伐了，这两人

确实是战斗到底的血汉子。你不用担心他们妥协，不用担心他们有修正路线，更不必担心他们会投降，他们是值得信任的。尽管如此，杨秀清用这两人北伐还是很大的失败，他将不具备帅才的人放到元帅的位置上，这种教训是惨痛的。

西征前期战果辉煌

西征的首发阵容并不强大，杨秀清只派了三万人，由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等人率领。

西征军很快拿下安庆城，接着进入江西，包围南昌。按照杨秀清的战略，西征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份，相当于扩大太平天国的外围屏障，与清廷对峙，形成半壁江山。

赖汉英亲自带领猛将林启荣、曾天养围攻南昌，南昌城只有五千人，正规军三千，团练两千，而前来围攻的太平军接近万人。防守好的话，还是能扛得住的。可惜，还没交战，城内先乱，不少官员拖家带口地逃跑，两千乡勇一哄而散。

眼看南昌保不住了，忽然来了个江忠源。其实，江忠源并不是赶来支援南昌的，这个人心比天高，他想带领两千乡勇直接到南京城下叫阵。他这个想法太疯狂了，有自取灭亡的意思！理性一点的曾国藩给江忠源提建议，说我家训练六千乡勇，咱们凑够一万人，趁着太平天国还不稳定，一举拿下天京。

可惜历史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江忠源路过九江时忽然接到清廷命令，不用赶往南京，在南昌防御。江忠源到了南昌后，就接管了南昌所有的防务。南昌巡抚张芾发出求援书，各地赶到南昌的援兵也有六千来人，加起来，南昌守军有一万多人。

南昌这边增援，太平军这边也没撂下，韦俊、石凤魁、石祥祯率领的两万援军也赶到南昌城外。

江忠源不愧是一个老牌将领，他能在危险没有出现之前消灭危险。江忠源知道太平军擅长爆破攻城，那么好，把南昌外城三里以内全都烧成一片白地，顿时间，火光冲天，连滕王阁也未能幸免，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滕王阁是个假文物，真的只能去问江忠源要了。江忠源本来是一代名将，这次火烧滕王阁让他背负了很重的骂名，在仕林中声名狼藉。

江忠源艺高人胆大，面对太平军的强大攻势，指挥若定，粉碎了

太平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到后来，江忠源已经不满足于守城了，主动出击。双方各有胜负，但很显然，到了这个地步，太平军是没法拿下南昌城了。

西征军是太平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三万人围城近三月，始终拿不下南昌城，由此可见江忠源的可怕，可见湖南人之强悍。南昌攻坚战给太平军高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留下了心理阴影，后来，石达开率领八万人居然不敢攻几千湘军镇守的南昌。

如果没有江忠源，南昌八成要落入西征军的手中，南昌一沦陷，西征军就可以长驱直入进入湖南。如果再派上石达开的增援部队，太平军控制湖南并不是什么难事，当时湘军正处于成长中，还没成型，正是最脆弱的时候。湖南一控制，天下还不好控制吗？天下一控制，就改朝换代了，不过最后天下到底是姓洪的还是姓杨的就不清楚了。

所以说，南昌的失利让杨秀清非常愤怒，愤怒就得找个人问责啊！赖汉英是南昌攻城战的总指挥，杨秀清本想把他杀了，考虑到他是洪秀全的妻弟，好歹是个国舅爷，不能一刀咔嚓，便将他革职问罪。不过，杨秀清这个人脾气非常怪，他很想杀掉赖国舅，只是现在还不方便动手而已。赖国舅也知道自己今天不死，有一天也会死的，这么一想，便在安庆投水自杀。

可以说，又是江忠源挽救了清朝的国运。

南昌失败后，杨秀清意识到必须换上一个更给力的元帅，当时只能在两个人中间选，石达开和秦日纲，因为韦昌辉要负责京城的防卫工作。秦日纲就是后来诛杀杨秀清的罪魁祸首之一，这说明秦日纲很早就是洪秀全的亲信，杨秀清不相信他，这个元帅只能是石达开了。

石达开率领万人出征，并接管前线西征军的一切指挥权。石达开来了，气象果然有所不同。他让韦俊和石祥祜率两万人溯江而上，进攻两湖；胡以晃和曾天养在安徽发展。石达开到了安庆后，意识到此地的战略地位，加固城池，修建土城和炮台，把安庆打造成一座铁城。

石达开虽然在我们眼里是一个军事家，其实这个人还是有政治头脑的。他到了安庆后，将安庆发展成一个基地，而不仅仅是军事重镇。他甚至冒着极大的风险废除了洪秀全的一些弊政，比如，他不没收所有居民的财产，也不强迫所有人加入太平天国，他规定，居民只要正常工作正常缴税就可以了。石达开还派遣士兵兴修水利，深得百姓的爱戴。如果太平军都像石达开这么搞，天下没理由不是天国的。

石达开虽然干得不错，但我们不禁替他捏了一把汗，他的行为实

在有山头倾向，说不定某天就惹火烧身。

石达开很快就在安徽江西一带站稳脚跟，而且石达开还抢到了清军的十六万石的粮食，真是丰收之年。咸丰看到安徽很快就要落入太平军手中，罢免了原巡抚，改任江忠源为安徽巡抚，此时奉命剿匪的周天爵病死安徽，安徽清军阵脚大乱。

两湖的西征军轻松攻取九江，韦俊让林启荣镇守九江，自己率主力进攻湖北，在黄州遇上湖北巡抚张亮基。江忠源前往湖北支援江忠源，要说这江忠源，一生够倒霉。他为清廷立功最大，但吃力不讨好，这就是会做事不会做人的下场。保卫南昌一战，江忠源的楚勇立功最大，但清廷却没有任何赏赐，没有赏赐倒也罢了，偏偏正常的粮饷都不能及时运到。许多楚勇纷纷扔下兵器，跑回家里。江忠源手中的兵相当少，但是牌子依然响亮，听说他带着一两千人来到湖北后，张亮基立时信心大增。

尽管能带来很大的品牌效应，但江忠源的气数已尽。他的楚勇早已走散大半，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在渡江的时候，江忠源的支援部队全部被石祥桢歼灭，江忠源仅以身逃。

楚勇被灭，张亮基如遭雷轰，他知道完蛋了。果然，西征军攻城略地，击杀清军将领，大量乡勇投降。田家镇、蕪州、黄州先后失守，西征军稍事休息，又攻克汉口、汉阳。武汉彻底暴露在西征军的炮火之下。

坐镇武汉的是湖广总督吴文熔，此时吴文熔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求救，可惜无人救援。这时候，西征军主力收到杨秀清的一封急信，让他们尽快去安徽庐州参加会战。

庐州也是一块战略要地，这里城防很坚固。曾天养带领万人与胡以晃在庐州外会师，此时江忠源也带着一千多人赶到安徽。在六安时，江忠源淋雨，患了重感冒。病中，江忠源听说太平军攻陷了舒城，侍郎吕贤基自杀，幕僚李鸿章逃走。在跟曾国藩混之前，李鸿章并不是一个优秀的人，反而是个生活拖沓自由散漫的人。

庐州只有两千守兵，知府胡元炜四处散发求援信，但现在大家都学乖了，谁也不去救，都怕搭上自己的性命。无奈之下，胡元炜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江忠源身上，他怕江忠源不来，故意说庐州城内粮草充足，团练很多，守兵过万，江忠源如果来了一定如虎添翼。

江忠源信以为真，心想庐州确实是块战略要地，粮草和兵马肯定不会少的。于是，留下一半兵马守六安，自己带着几百乡勇和新招募的两千乡勇赶往庐州。

到了庐州后，江忠源才知道胡元炜完全是忽悠自己，庐州城内兵少粮乏。江忠源自诩名将，到了这步田地也只能死守了。江忠源动员全城百姓，凡男丁一律上城楼。咸丰也知道庐州的情况，紧急下令两湖总督吴文熔前往庐州支援。其实，吴文熔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里分得了身去救别人。

正在湖南训练团练的曾国藩答应派兵支援，不过箭在弦上，他又忽然改变主意，拒不发兵。尽管形势非常不利，但江忠源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深信只要自己在这里，庐州城就一定能保住。

胡以晃带着几万大军连夜攻城，从东南西北四面发动进攻。江忠源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与太平军激战两昼夜，终于击退太平军。第二天大雾，胡以晃准备再次进攻，假装攻东门，实际主力攻北门。江忠源一眼识破他的计策，在付出五百人的伤亡后击退太平军。

胡以晃围困了庐州一个多月，双方打打杀杀不少，都不能一战击败对手。不久，陕甘总督舒兴阿率领万人来支援，太平军前去阻击，两军蜻蜓点水地打了一仗，舒兴阿就下令撤退，然后待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远距离观望。

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十六日，胡以晃炸开了小东门和小西门，带兵冲入城内。胡元炜自知大势已去，居然跪地迎接胡以晃，愿为胡以晃引路灭掉江忠源。胡元炜这么做很不地道，其实，自从他诱骗江忠源入城，老江就天天骂他，见一次骂一次，还扬言等战事结束杀了他。胡元炜非常害怕，他老早就听说江忠源有“江屠夫”的外号。

江忠源正在城楼上指挥战斗，忽然看到胡元炜领着太平军上来，悲愤之下，准备拔刀自刎，被身边的人救下。将士们背着江忠源逃命，但江忠源性格极为倔强，他曾夸下海口，说有自己在，庐州城一定能保住，城在人在城亡人亡。这时要他苟且偷生实在是为难他，江忠源狠咬背着他的人的耳朵，那人吃痛放下他。江忠源立即跳水自杀。

江忠源曾给咸丰写过这样的奏折：“城存，臣存；城亡，臣亡。”咸丰这样批复：“庐州城可失，江忠源绝不可失。”可惜诏书到时，胡以晃已占领了庐州城。

江忠源前脚刚进鬼门关，武汉不久就被攻克，吴文熔后脚跟上江忠源。

此时，太平军接近辉煌状态，但仍然不能说形势一片大好。此时，最好是西征军各路主力一起杀向湖南，但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曾天养在荆州受阻，林绍章的部队也推进缓慢。庐州城外还有几

万清兵，太平军的势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巩固。

第四章 曾剃头来了

当官的这段日子曾国藩深深掌握了厚黑术和忍术的精髓，严格说来，忍术也算是厚黑学。如果曾国藩不是一个忍术大师，很难在这种险象环生的情况下活下来，就会像江忠源那样过早地为国捐躯。因为像曾国藩这样的人，不光要对付太平军，有时还要应付清廷和同僚们给自己制造的麻烦。

传奇人物曾国藩

西征军进入湖南后，就要面对近代史中的传奇人物曾国藩了。

曾国藩，字涤生，谥号文正，绰号曾剃头，湖南湘乡人（今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人）。

曾国藩出生于地主之家，小时候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他不贪玩，也不淘气，读书非常认真。二十三岁，曾国藩考上举人；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如果没有出现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的一生会比较平淡，一辈子当自己的官，不会卷入太多是非中。

老天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他注定要成为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他为清廷延续了五十多年的寿命。对曾国藩的评价至今毁誉参半，在很多人眼里他仍然是个“剃头专家”，在一些人眼里他是个圣贤，是继往开来的大人物。

清末有人这样评价曾国藩：明朝有一君一相，明君是朱洪武，贤相是张居正；清朝也有一君一相，君是康熙，相就是曾国藩了。

有人吹捧难免有人骂，章太炎就痛骂曾国藩是民贼。章太炎是个性格很矛盾的人，他既厌恶曾国藩镇压人民，又庆幸曾国藩把洪秀全给灭了。章太炎赞同革命，但不赞同洪秀全式的革命，自相矛盾也可以理解。

曾国藩在现代的媒体和文化中，也是一个大红人，现在成功学甚嚣尘上，全民都在追捧曾国藩。为啥呢？因为曾国藩会做人会做事会做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很适合成为中国人的偶像。像乔布斯、巴菲特那样的成功典范显然不太适合中国国情。

经过媒体层层包装的曾国藩是真实的曾国藩吗？

其实，真实的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成功学大师，许多书把曾国藩塑造成那种严于律己不苟言笑的人，无非是教导别人老老实实做人脚踏实地做事。曾国藩并不认为自己是成功学大师，他给自己写了两句墓志铭：“不信书，靠运气。”

看到没有，首先就是不信书，虽然曾国藩是一个儒生，但他从不相信教科书上写的东西。曾国藩觉得这才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反过来讲，如果相信书的话，就很难成功了。接着，曾国藩说靠运气，这无异于给那些刻意追求成功的人当头一棒，连曾国藩自己都说他能有今天，首先靠的是运气。

但我们千万别被曾国藩的话误导了，所谓靠运气并不是说运气真的很重要，运气只是成功道路上次要的东西，实力是基本，运气是东风。

曾国藩根本不是我们印象中那种迂腐的儒生，他是一个脑子非常活的人。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不断发展壮大，后来曾国藩的部下很多人劝他黄袍加身，其中甚至有左宗棠这样桀骜不驯的人。后来，李秀成也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但曾国藩还是拒绝了。拒绝的理由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曾国藩是一个权谋大师，城府非常深，当然修养也相当高。不过生性耿直的左宗棠却看曾国藩不顺眼，觉得这个人文雅是假的，正直也是假的。左宗棠是一个执著的人，他一生中在曾国藩身上浪费了不少的口水，这些口水自然极少赞扬。

曾国藩是个实用主义者，做事非常圆通，为人一点也不古板，性情幽默，喜欢开玩笑，经常逗得同事们哈哈大笑。曾国藩这个人不简单啊！

我们来看看曾国藩仕途的经历吧！

点翰林后，曾国藩其实是个闲官，这段闲散的日子里，曾国藩阅读了大量的文史著作。后来又拜唐鉴学习理学，大家知道理学讲究存天理灭人欲，曾国藩当然不会灭人欲，但在这个过程中养成了“静”的习惯，所谓“静”不是安静，而是没有任何杂念地观照事物，这样才能窥见事物的本质。我们之所以强调曾国藩学习理学的经历，是因为这段经历对他后来镇压太平军有很大的帮助。

有人或许会奇怪，理学能帮助打仗吗？确实没有直接帮助，但能起到间接作用。理学可以教会人如何辨别表象和本质，在战争中有许多的假象和干扰，如果能够看出对方的真实意图，打仗自然顺利了。

后来，曾国藩傍上了权相穆彰阿，做官做到了侍郎。咸丰上台

后，搞掉穆彰阿，曾国藩却没有受到牵连，可见此人会做官。他拜在穆彰阿门下，但从不会让人感觉自己在结党。后来，曾国藩还上了两封批评皇帝的奏折，一举博得正直的好名声。

当官的这段日子曾国藩深深把握了厚黑术和忍术的精髓，严格说来，忍术也算是厚黑学。如果曾国藩不是一个忍术大师，很难在这种险象环生的情况下活下来，就会像江忠源那样过早地为国捐躯。因为像曾国藩这样的人，不光要对付太平军啊，有时还要应付清廷和同僚们给自己制造的麻烦。

如果非要在曾国藩身上挖出成功学的东西，那就是忍术。

可怕的湘军

团练和乡勇是清朝兵制下的产物，正规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弱，不得已才招募各地的乡勇。

清朝靠八旗兵起家，入关之后，八旗兵战斗力越来越低。三藩叛乱时，康熙主要靠绿营兵镇压了这场叛乱。从此以后，八旗兵的战斗力越来越低。为什么？因为清廷一直把八旗当做是家底，不随便拿出来用，但工具不用都会生锈，何况是兵团。

乾隆后期，在讨伐白莲教时，迫于形势需要，发展出团练和乡勇。没想到这个发明还真的应了时代的需要，以后每逢战争都会训练一批乡勇。

从乡勇团练到湘军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完成这段距离的正是曾国藩。值此乱世，湖南盛行经世致用的理学思想，在清朝，湖南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但湖南人天生有一种强烈的“成功”欲望。

江忠源还活着的时候，曾国藩就建议训练一万人，一举拿下天京。这一万人就是湘军最早的骨干，如何治理这支军队呢？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带领湘军的小头目，第一要求能够治理百姓，第二要求不怕死，第三要求不在乎功名利禄，第四要求能够吃苦耐劳。”曾国藩用人最注重忠义血性，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可靠的，所以他最怕用那种智巧的人，更怕用像自己城府这么深的人。曾国藩不愧是一个深邃的领导者。

在湘军的将领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读书人当将军的比武夫多得多。还别说，真管用，这些读书人都是曾国藩精挑细选出来的，也许拎不起斧头，但是骨头都是很硬的。

曾国藩对士兵也有严格要求，优先选择年轻力壮的农夫，如果会玩一些兵器的更好，但凡油头滑面的一概不收。有市井气（市民气、俗气）的也不收，有官僚气的更不收。曾国藩本身是个官僚，居然如此歧视官僚，这个人做领导简直到了化境。

为了防止士兵们逃亡，曾国藩在招募的时候就各个营官到自己老家去招兵，这些兵的家庭住址父母兄弟等信息全都记录在案——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点名时人不在，行，到你家里去找。曾国藩用书生管理农民，确实很有创意。

为了保证将士们英勇作战，曾国藩还提高他们的薪水。曾国藩的钱哪来的？小部分是清廷拨款，大部分还是自己筹措的，在筹钱这块，他有一个智囊团，可以从各种途径获取银两。刘蓉和郭嵩焘都是理财和搜刮的高手。所以，湘军的拿的钱有绿营兵三倍多，连打仗都受经济规律影响啊。

至于将士的薪水，曾国藩是这样安排的：带五百人，一年可以拿三千两银子，依次递增，如果能带一万人，一年可拿六万两黄金。这种激励作用是相当大的，只要你有本事，不怕死，就有可能发财。

曾国藩这人还挺有创造力，雍正无中生有创立个军机处，他曾国藩也创立了一个营务处。营务处相当于一个参谋机构，专门负责培养军事人才，相当于军营里的军校。

曾国藩管理将领有四字秘诀：勤、恕、廉、明。所谓勤就是说当将领的一定不能懒，将领一懒，军纪就会涣散，凡事都要亲临第一线，了解种种细节，然后再作决定。所谓恕就比较难理解了，大家应该凶狠才对，为什么要强调恕呢？曾国藩认为大家都是湖南人，都是乡亲，应该亲如兄弟，不要动不动就责打士兵。所谓廉很好理解，当将领的一定要廉洁奉公，这样士兵才会卖力。所谓明就是要明察秋毫，不能被下面的人糊弄。

在军中，曾国藩号召大家要吃苦耐劳，提出了四耐：耐冷、耐劳、耐劳、耐闲。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借鉴了戚继光的经验，同时结合清朝现有的兵制。曾国藩以营为基本定编单位，初设每营三百六十人，后设五百人。在每一个营中，十人为一队，但实际上一个队有十二个人，还包括队长和斯养，斯养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其实就是一个烧饭洗衣服的，打仗中也需要这样的人。八个队又组成一个哨，在每个哨中，第一队和第五队配备抬枪，抬枪大概有三十斤左右，相当于那时候的重机枪。二、四、六、八队配置大刀和长矛，第三和第七队配置小枪。四哨为一营，营官除了指挥四哨之外，还有六队亲兵，第一和第三队

亲兵是炮手，二、四、六队用的武器还是刀和矛，第五队是长枪队，没有哨长，亲兵总共七十二人。

一个营里，各个兵种搭配比较均衡，就好像一道营养均衡合理的菜，上了战场自然有威力。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增加了长夫制和帐棚制。打仗并不简简单单就是拿起武器上战场卖命，除了卖命之外，它还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清军中，没有专门用来搞后勤的士兵，后勤也不光是运粮草做饭那些，有时候还包括修筑河工、守护好漕运等等事情。

一碰到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时候，清军就到处抓人来做苦力，这么做法是典型的扰民。曾国藩亲自在第一线，他知道老百姓都很反感官兵一有事情就抓人去做，所以他特地增加了长夫制和帐棚制。什么是长夫制呢？也就是说每一个营配备一百八十个长夫，这些人就是用来干活的。以后，士兵可以专心作战，不必当全能士兵了，打好仗就行了。所谓帐棚制就是各营自带帐棚，确保扎营的时候士兵有地方住，这就避免了士兵们抢占民房，说白了也是为了严肃军纪，取得老百姓的支持。

不同的人领导的湘军营制也不相同，只是说曾国藩的营制是主流，也是最成熟最有效果的。

曾国藩对练兵也非常重视，这一点跟杨秀清是一致的。曾国藩曾说，有兵不练跟没兵一个样，兵不练精跟没练一个样。所以曾国藩从不让新兵上战场，要上战场首先在练兵这块已经过关了，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吴文熔和好友江忠源战死的时候，曾国藩一直没有伸出援手。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想把自己的家底全部赔进去，要想不赔，必须将兵练精，曾国藩深深懂得兵贵精不贵多的道理。

在陆军这块，太平军和湘军势均力敌，但太平军的水师明显比不上湘军。虽然太平军水师数量庞大，但编制非常混乱，作战效率很低。

打仗有时候打的是政治，曾国藩这人在政治上非常高明，为了统一军心，振作士气，他亲自编写了不少军歌，其中有《爱名歌》《解散歌》《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等。

而且，曾国藩讨伐太平天国的檄文非常高明，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对方的要害。曾国藩闭口不谈民族矛盾，他死死揪住太平天国打倒孔教、打倒传统这点，把这场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变成东西方的文化之争，变成孔子与上帝之争。在当时的中国，谁更有市场一看就知道。曾国藩还强调地域矛盾，说太平军在广西起家，只注重广西人，把其他省份的人看得猪狗不如。

不久，胡林翼的湘军也并入曾国藩的部队中，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已经初具规模，足以和太平军抗衡了。

世事真是因缘巧合，曾国藩办湘军原本只是为了给江忠源补充兵源，没想到江忠源战死，他自己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台前。我们不知道曾国藩对这样的结果是感到高兴呢还是压力很大，总之他真的站出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曾国藩也不是很顺利。

太平军将领林绍章进入湖南后，一路攻城略地，占领了不少地方。随后，林绍章打算占领湘潭和靖港，然后围住长沙。曾国藩让满洲将领塔齐布率一千三百人、江忠淑率两千人，前往湘潭阻止太平军。

塔齐布和江忠淑抵达的前一天，林绍章已经拿下了湘潭。塔齐布和江忠淑都认为趁着太平军尚未站稳脚跟，立即进攻。林绍章也可算得上是一员猛将了，加上他指挥的是太平天国的精锐部队，所以难免不把湘军放在眼里。正因为这样，一交战的时候他就傻眼了，他是真没想到这次遇上劲敌了，这些训练完不久的湘军居然比清廷的正规军还能打。

其实湘军人数也不多，也就三四千人，林绍章万万没想到自己手下身经百战的将士居然被这些乡勇打败。仓皇之中，太平军退入城内坚守。

这时，曾国藩的水师部队也抵达湘潭城外，水陆两军联合作战。林绍章也不服气，他是真不信这些人真这么厉害，觉得一定是侥幸。可惜，事实就这么残酷，由不得林绍章不信，林绍章十次出战十次失败，打到最后手下的人都快死光了。走投无路之下，林绍章带着四个亲兵连夜出城逃到靖港。

曾国藩心血来潮，想亲自指挥攻城战，拿下靖港。讽刺的是，曾国藩训练出来的湘军虽然无敌，但他自己指挥起来却手忙脚乱，就像一个新手第一次驾车一样。湘军的兵力虽然是城内太平军的几倍，居然屡次被太平军击败。一旦失败，就有人想开溜。曾国藩治军甚严，他拿着剑站在大旗后面，大声说：“过旗者斩。”

很多乡勇也很聪明，他们不过旗，而是绕着旗逃跑。曾国藩气得都快吐血，居然跟江忠源一样投水自杀，幸亏被属下救了。

羞愤归羞愤，既然活下来就得好好活着，开心地活着。靖港一战，曾国藩大败，但为了鼓舞自己生存的信心，他居然在给咸丰的奏折里巧妙地把这次惨败说成是小胜。曾国藩确实有人所不及的一面，

他既不怕死，又很热爱生命，这样的人是无敌的。

湘军四虎将

靖港之战给曾国藩的打击很大，他原本以为自己很厉害的，随便派两个人就能击败林绍章，怎么亲自上阵反而效果更差？

他不得不反思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曾国藩后来总算想清楚了，自己不属于那种亲临战场第一线的人，自己不是李广，而是一个运筹帷幄的人。练兵你行，建立军制你也行，调兵遣将你还厉害，如果你连亲自上战场这样的事情都能干得出色，那你就是全才，下面的最怕碰到全才型的领导了！

曾国藩自己打仗虽不是很内行，但是用人这块他还是相当内行的。湘军中有四员虎将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

四虎首推罗泽南。罗泽南是曾国藩同乡，也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说他是湘军的创始人，一点没错。像这样一个百战百胜的武将并不是什么武夫农民出身，相反，罗泽南是晚清的一个大学问家，估计连曾国藩的理学功底都比不上他。

罗泽南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小时候靠借贷读书，生活的艰苦让罗泽南更加坚毅。他在饥寒交迫中完成了学业，可惜学有所成之前，母亲和三个哥哥全都病死。正当可以通过教书养家糊口的时候，一直供自己读书的祖父和嫂子也去世了。命运对他的打击还不止于此，二十九岁的时候，罗泽南乡试归来，发现他的妻子正对着三个儿子的尸体大哭。

接连经受这么多打击，罗泽南居然挺过来了。可能跟生活经历有关，罗泽南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他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看到世道腐败、人心浇漓，但他没有选择麻木。他一心一意想拯救这个世界，这在今天看来既狂妄又迂腐，但确实符合儒家传统文人的心理。这就是罗泽南走向理学的原因，他想用理学来治疗这个遍地创伤的世界。

罗泽南虽然是曾国藩的下属，但实际上他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而且曾国藩也非常尊敬他，公推他是湘军的鼻祖，没有他就没有湘军的成就。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打仗研究的是兵法，尤其是《孙子兵法》，罗泽南却特立独行，他不用兵法，他用理学的思想来打仗。

这人如果不是疯子，就是天才，事实证明他不是疯子，如果一个理学家是疯子的话那“理学”应该改成“疯学”。

理学怎么可以用来打仗呢？我们来听听罗泽南自己是怎么说的吧：“其实《大学》中有几句话早已概括了兵法之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其实罗泽南的意思很有道理，打仗是关系很多人身家性命的事情，一定得认真谨慎，决不能陷入狂热和混乱中。“知止而后有定”说的是把握住事情的分寸，把握住分寸之后才能镇定，镇定才能心里平静，平静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和行动，然后才能胜利。

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罗泽南能够从《大学》中悟出兵法和做人的道理确实很不一般，这种人读书读出了境界，一通百通！

罗泽南曾告诉世人什么是有用的学问：“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湘军中第二大虎将是李续宾，李续宾是罗泽南的弟子。学者王闿运评价这对师徒说，罗泽南更多的是一个名帅，上阵杀敌还比不上李续宾，李续宾是当时天下第一名将。

李续宾以前是一个武夫，因仰慕罗泽南的名声而投靠到他的门下，成为罗泽南弟子后，李续宾也深受理学的浸染。

当时清军将领个个毛病一大堆，经常互相扯皮，喜欢看别人笑话。李续宾在这方面是个异类，他个性很开朗，人也特别好，跟同僚之间很少有“人际关系”的问题。谁如果需要救援，他一定在最短时间内赶过去，碰到了强敌总是自己挡在最前面。像这样一个人，就是再官僚化的人也乐于跟他交往。

古人说的良将大概就是李续宾这样的人，上上下下都夸他好，那是因为他肯卖命，又不在乎自己的得失。李续宾这人勇冠三军谋略过人心肠又好，像这样的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后面我们会看到他的精彩表演。

湘军的第三个猛人是胡林翼。胡林翼，字润之，湖南益阳人，也是晚清的中兴名臣之一。在湖南的这些名臣中，胡林翼家境是最好的，他的父亲是个探花郎，而他呢，也很早中了进士。可能是因为出身于官二代，胡林翼早期很有些公子哥的派头。让胡林翼改变做人风格的是他的岳父陶澍，陶澍这个人在写道光的时候我们已经了解到，此人具有丞相之才，善于识人。

胡林翼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陶澍不但不责骂他，反而对人说：“林翼这孩子将来是国家栋梁，会为国家鞠躬尽瘁，现在让他放松一下又有何不可呢？”

胡林翼听说这话，一改公子作风，变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胡林翼不仅有理政才能，也有打仗的智慧，石达开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谁都不服就服胡林翼。

在湘军的这些牛人中，除了曾国藩外，胡林翼可能是对权术最有研究的人。李续宾也因为这个原因在曾国藩面前指责过，说胡林翼这个人待人有血性，但是也有不少的权术。曾国藩说，胡林翼确实喜欢玩弄权术，但他对你是真诚的。曾胡二人真是相得益彰，互相弥补。

最后一个猛人是彭玉麟。人如其名，彭玉麟是一个非常洁身自爱的人，很注重品行和名声。在湘军后期，随着胜利的逼近，军纪也变糟了，贪污腐败的风气在军队里愈演愈烈。彭玉麟自始至终保持着清高的本色，不仅不贪财，连朝廷赏赐给他的都不要。

值得一提的是，彭玉麟这个人不光会打仗，还是个书画家。彭玉麟最喜欢画的是梅花，他一生画了十万多幅梅花。

有人这么评价彭玉麟：千古一人，绘画堪比郑板桥，打仗不输周公瑾，诗词不亚苏东坡，爱国不逊范希文（范仲淹），用情高山流水。

也就是说彭玉麟有这么多身份：画家、军事家、文学家、爱国主义者、情圣。

西征军的落日

湘军一出手，太平军就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湘潭的失败传到杨秀清的耳中，杨秀清的性格跟湖南人倒也有点像，他也是那种越挫越勇的人。杨秀清首先将林绍章革职，然后严令石达开的哥哥石祯祥死守岳州，并派曾天养前去湖南。

曾天养是一员猛将，他很快开进湖南，攻破澧县，进攻沅陵县，与湘军对峙。石祯祥也收集溃勇，扩大势力，在湘西一带左冲右突，企图扩大根据地。

我们来说说曾天养这个人吧！曾天养是一个非常彪悍的将领，大家不要把他想象成中年人，他参加金田起义时就已经六十一岁。但这个人老当益壮宝刀未老，越是老年反而越不甘心一辈子这么平庸，很想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于是，他跟随洪秀全参加起义。

洪秀全对他是相当器重的，曾经让他当私人卫队的统领。曾天养的长相可能跟关云长有点像，目光深邃，胡须很长。虽然已经是个老

人，但打起仗来比年轻人还勇猛，十几个年轻人都打不过他。曾天养这个人也确实很自恋，他把自己当成了再世关云长，为人处世处处模仿关羽。

曾天养也不是有勇无谋之辈，他来到湖南后，决定先采取骚扰战术引诱湘军分散，然后逐个歼灭。湘军刚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中计了，后来老谋深算的曾国藩识破曾天养的诡计，下令集中优势兵力反攻。

为了对付曾天养，湘军几乎出动了所有的名将（当时很多人还不是很有名，名气都是靠太平军的尸体支撑起来的），胡林翼、周凤山、塔齐布、江忠淑、罗泽南、李续宾等人都参加了这场战争。

湘军出动了两万人，在君山和雷公湖一带布置埋伏。太平军的水师首先中计，进入湘军的埋伏圈，水军本就是太平军的弱点，哪里比得上湘军训练有素。水师吃了打败仗后，曾天养不得不放弃岳州，退守陵矶。湘军水师顺利攻占了岳州城。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曾天养自比关云长，怎么会是那种轻易放弃城池的人呢？其实，让他放弃城池的是石达开，石达开给曾天养下了一道命令，说岳州城估计是守不住了，你们可以退到下游，等候东王进一步的命令。也即是说，后退是石达开作出的权宜之计。

石达开作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智取，不喜欢硬碰硬。曾天养虽然执行了石达开的命令，但事后觉得很不舒服，居然不等杨秀清进一步的命令就下令收回岳州城。曾天养这次意气用事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石达开在军队中的威望是非常高的，他不听石达开的命令，想指挥好一次战争恐怕很难。

最关键的是曾天养和曾国藩都想到了同一个计策，就是激怒对方，引诱对方进入自己的埋伏圈，然后聚而歼之。结果，曾天养被湘军骂得火起，居然中计了，设计不成反而中计。太平军遭受伏击后，心里怨恨曾天养，居然和曾天养的亲兵打了起来。曾天养大败，退到临湘。

武汉的韦俊、陈玉成这些人听说曾天养大败，只好匆匆赶过来支援，一起进攻岳州。援军到来之后，与湘军展开了大战。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还是湘军棋高一着，在天昏地暗之时又派出一支军队偷袭，终于打退太平军。

岳州防守战胜利后，曾国藩感觉麦子熟了，到了收割的季节。农民收割的是庄稼，曾国藩收割的是人头。

曾国藩对形势的估计仍然过于乐观，现在还不是攻取天京的时候。韦俊失败后，调集湖北的兵力到湖南增援，准备再次进攻岳州。

太平军在象骨港这里全歼湘军水师一个营，给了曾国藩一个沉重的打击。

象骨港一战也激起了曾天养的斗志，他带兵偷袭塔齐布。塔齐布也是一员勇将，狭路相逢勇者胜。看到塔齐布在战场上驰骋纵横，曾天养忽有种英雄相惜的感觉，他决定上战场跟他单挑，来个现代版的云长斩颜良。

曾天养提起长矛，奋力向塔齐布奔去。无论是湘军和太平军都被这种气氛所震慑，大家都是草根，从小听惯了说书，今日看到双方主将想要单挑，个个欢声雷动，在下面呐喊加油，一时忘记了这是战场，不是演戏。

说时迟那时快，曾天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过来，一矛刺中了塔齐布的坐骑。因为速度太快，刺中之后，曾天养在惯性的作用下摔下马来。太平军还指望双方主将能下马单挑，倒是湘军机警，大家纷纷冲过去，割下了曾天养的脑袋。我们不要责怪湘军，曾国藩就是用高薪诱惑湘军卖命，有了曾天养的人头，这辈子都不愁吃穿了。

曾天养一死，太平军马上大乱，大家纷纷溃逃。

曾天养的牺牲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对西征军的士气打击非常大。当然，也不能把后来西征军的失败全部归到曾天养的头上，西征军先后投入到湖南的兵力多达四五万人，原本是想拿下湖南，却被曾国藩逐个击破。从战略上来说，杨秀清还没有足够重视湘军，最终让曾国藩集中优势兵力将西征军一步步耗掉。

战略的失败加上战事的失利让西征军最终失去了武汉，偷鸡不成蚀把米，湖南没有拿下来，反而要逐步丧失对湖北的控制权。其实，武汉的守军不少，有五六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新兵，而湘军只有两三万人，但大多都是精锐，所以能在四十天之内拿下武汉这座大城市。

武汉失守的消息对杨秀清打击非常大，他下令将守将石凤魁和黄再兴押回天京斩首。太平军这边是屋漏逢连夜雨，拿下武汉后，清军将领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等人又在田家镇击败秦日纲的部队，歼敌上万人，烧毁船只几千艘。至此，太平军在湖北已是强弩之末。

曾国藩立功不小，咸丰本打算至少给他一个湖北巡抚当当，但考虑到曾国藩是手握兵权的汉人，如果再让他当上巡抚，那是养虎为患，于是便赏给他一个三品顶戴的虚衔。

曾国藩倒也是个会做官的人，他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感谢皇恩浩荡，要誓死报效国家。

曾国藩大战石达开

肃清湖北的太平军后，曾国藩一时之间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在咸丰的奏折中洋洋得意地说，东南很快就会出现转机，形势很有可能扭转。

湘军上下比曾国藩更嘚瑟，大家都觉得太平军不堪一击，纷纷鼓噪着一举肃清江面，直捣天京。曾国藩也觉得是时候了，他在九江和湖口一带纠集部队，准备顺江摧毁太平军的防线，然后在天京城外和向荣会师，一同攻破天京城。

这个算盘是很好的，但是也有点虚。曾国藩首先应该估摸自己的势力，然后再了解太平军的势力，然而求胜心切，哪顾得了那么多。

曾国藩急命两大王牌将领塔齐布和罗泽南进攻，进攻的目标是太平军的后起之秀陈玉成。陈玉成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将领，不过太年轻了，他虽然是佯装撤退的计策击败了周凤山的军队，但是塔齐布和罗泽南同时过来袭击，被三路大军夹击，岂有不败之理。

秦日纲又在九江被击败，这时太平军呈全线溃败的颓势。秦日纲一路退到黄梅，黄梅县是湖北、江西、湖南三省的交界点，也是太平军的一个重要军事要塞。

秦日纲不断败退的同时，杨秀清也一再地对他表示愤怒，先是让石达开取得一切指挥权，接着表示，如果黄梅再丢了，决不轻饶。秦日纲也知道杨秀清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黄梅丢了，自己的脑袋估计也保不住了。

秦日纲背水一战，为了打赢这场战，他不断地加固防御工事。他在黄梅城外挖掘了许多巨大的梅花坑，深达丈余，里面布满了地雷和竹签。黄梅城的周围陷阱重重，滚石擂木一大堆，秦日纲自认为湘军这次怎么也不可能拿下黄梅城。

秦日纲千算万算，就没有算到湘军有几十个间谍潜入军中。这些间谍冒充太平军，将城内外的布置弄得一清二楚，塔齐布对太平军的陷阱了如指掌。

尽管如此，秦日纲还是仗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屡次击败湘军。秦日纲没得意多久，湘军内外夹击，攻入城内，放火烧城，击败秦日纲。这次湘军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大，死伤甚巨，猛将塔齐布也在战斗中受了重伤。

秦日纲和陈玉成退到宿松和太湖一带，两人都饱受挫折，心里留

下了一点阴影，守着阵地死活不肯出战。

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初七，罗泽南率领四千人向濯港进发，遇上了罗大纲和赖桂英，太平军方面有两万人。罗大纲虽然也姓罗，但此罗远不是罗泽南的对手。罗大纲自乱阵脚，居然分兵突围，结果正好被罗泽南拧紧一个拳头击败。罗大纲和赖桂英被击退之后，也学着秦日纲的样子，坚守不出。

由攻势转为守势，这是太平军最大的变化。

不是湘军太猛，而是太平军的士气正在不断下跌，这说明庞大的太平集团出现了问题。当你的敌人做得比你更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习别人的优点，在战场上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以洪秀全杨秀清为代表的太平集团做得不够好。

不久，罗大纲在几支湘军的猛烈攻击下，损失万人，退到湖口。湘军锐气高涨，一鼓作气击败九江江面的太平军水师部队。

湘军完全收复了湖北。

太平军全部退到九江湖口，湘军近两万人也严阵以待，准备一举攻下九江和湖口。为了鼓舞士气，曾国藩亲自来到九江。

这边杨秀清比较悲剧，他对秦日纲非常痛恨，让石达开代替秦日纲主持西征军的一切军务。杨秀清当然很想一刀斩了秦日纲，但秦日纲毕竟是洪秀全的人，让秦日纲主持西征军事宜也是洪秀全的主意。打狗也得看主人，何况是杀一个王。

杨秀清知道，如果长江上游的防线全部失掉，太平集团就岌岌可危。杨秀清让石达开统领西征军不只是为了表达对洪秀全的不满，而是真切地希望他能够挽回败局。所以，杨秀清把新训练出来的几万新兵全部交给石达开。但石达开能不能力挽狂澜是个很大的问题，西征之前，太平军的势力很强大，水师部队也很庞大。现在水师部队几乎全部被摧毁，陆军屡战屡败，损失了不少人。

九江其实是一个无险可守的城市，但战略地位也很重要。清廷方面认为，南方的大局全在于长江，长江的关键全在于九江。石达开也是这么看的，守住了九江等于是为安庆和天京提供了保障，同时又能随时反攻，进攻其他省。

石达开这个人做事很有计划，在全军防守九江之前，他趁着湘军和秦日纲大战。从背后搞到了很多粮草，全都运往九江，准备在九江跟湘军来个大决战。

秦日纲也不是没有功劳，他的功劳就是为石达开赢得了充足的时

间。石达开让自己的心腹爱将林启容镇守九江，林启容这个人前面曾提到过，还是有几把刷子的，打仗跟石达开很像，都是稳健保守派，都有一个宗旨：以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

林启容是个防守天才，他居然用石达开抢到的粮食做成堡垒。他把糯米和黏土混合在一起，制造出黏性十足的堡垒，因为黏性十足，很适合抵挡炮弹的袭击，也会让湘军进攻时很纠结。你想想，一群人拿着刀枪往前冲，忽然前面是一堆糯米团，是应该上，还是应该退，上的话会被黏住，行动不便。

西征军水师覆灭，石达开知道要想打赢这场战，还必须建立起一支水师，而且是更加精锐的水师。所以，他在安庆设置了造船厂，模仿湘军建设水师的经验，准备打造出一支像样的水军。

曾国藩指挥两万湘军攻城，但都被林启容击退。林启容不愧是得到石达开的真传，防守密不透风，湘军将领童添云阵亡，罗泽南也受了伤，李续宾也不能讨到好处。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石达开不愧是一个优秀的统帅，九江在防守的同时，他还在到处打劫湘军的粮草。盛衰之势极有可能扭转，湘军攻了一个多月，没有半点效果。石达开认为，战事越久对自己就越有利，时间一长，曾国藩必定心浮气躁，然后会更加急于求成，到那时或许就是出击的时候。

鄱阳湖那边的水战也正打得热火朝天，石达开知道湘军水师厉害，亲自指挥战斗。他发现湘军舰船有一个弱点，舰船虽然庞大，却很笨重，搏杀与移动主要靠舢板来完成，如果拿掉舢板等于是拔掉老虎的牙齿。

石达开故意撤走鄱阳湖口的水军，引诱湘军进入鄱阳湖。湘军果然中计，等湘军的舢板全部入湖，石达开下令封锁湖口，然后把湘军的大船小船分割开来，再派小舰艇去放火攻击，湘军的小船被歼灭之后，大船就只能坐以待毙了。湘军水师败退到九江，石达开下令趁着夜色进攻，同时袭击曾国藩的座船，杀掉船长，曾国藩差点成为阶下囚。虽然侥幸逃走，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自杀，再次被部下救起。这都怪江忠源，开了一个好头，以后湘军将领打败了如果不自杀，仿佛觉得内疚似的。

这一战粉碎了曾国藩直取天京的计划，石达开终于挽狂澜于既倒，解救了天国的一次大危机。西征战场的胜利仰赖于杨秀清的运筹帷幄，杨秀清选择了石达开，石达开胜利了，证明了杨秀清决策之正确。

湖口之战后，石达开迅速占领江西的大部分地方，部众也扩大到几十万人。曾国藩带着湘军守卫南昌，此时南昌变成一座孤城，出于谨慎考虑，石达开并没有攻打南昌。石达开当然是担心损兵折将，但没有将曾国藩的湘军斩草除根，也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门口拔牙

1854年，琦善病死，托明阿继任江北大营的统帅。

江南江北大营宛如天京门口的两颗獠牙，既随时威慑着天京，又能扼住太平军南侵的态势。向荣有事没事经常骚扰天京城，让杨秀清很头疼。

1855年，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进攻镇江。镇江和瓜州都是战略要地，向荣已经扼住了长江水路，如果镇江和瓜州失去，两路清军就会汇合，直逼天京。杨秀清下令从南京调兵增援镇江，但全被向荣和张国梁等人击回。不得已，只好从长江上游调兵，命秦日纲为主帅，率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人驰援镇江。这几个人都是会打仗的人，秦日纲可能稍微差点，但陈玉成和李秀成挺能打的。

陈玉成很猛，他突破清军重重封锁，进入镇江，和城内太平军会师。3月18日，太平军与清军、湘军激战了一天，大败敌人。但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陈玉成自告奋勇，要攻打江北大营，拿下扬州，解决粮饷问题。

陈玉成和李秀成不愧是猛将，轻松拿下了江北大营，攻克扬州。此时，石达开率领三万大军直逼江南大营。石达开先是引诱向荣分兵，然后秦日纲趁机包围吉尔杭阿，吉尔杭阿是条汉子，战斗到最后。咸丰愤怒之余，大大赞扬了吉尔杭阿勇于牺牲的精神，谥号“勇烈”，追赠其总督头衔。事后，连吉尔杭阿的尸体都没找到。

向荣反应过来时，匆匆赶过来支援，没想到迟了一步，镇江周围的清军营垒先后被攻破。向荣又被秦日纲打了回去，前有秦日纲，后有石达开，向荣这次估计是凶多吉少了。

这时，杨秀清又从天京城里调出精兵，三路大军合围向荣，终于攻破孝陵卫大营。向荣毕竟是一个老将，败也败得比较从容，沿途还不停地阻挡，最终被秦日纲击退。向荣到了丹阳后，终于安静下来，一安静下来，悲从中来，心想我勇猛了这么一辈子，最后像狗一样被人追着打，没脸再活了。一个大男人，没有用刀给脖子来一刀，反而像女人一样拿着白绫上吊，说明在最后的日子里向荣的心情是抑郁

的、悲哀的。

听说他自杀，咸丰也很悲哀，给他上谥号“忠武”，对外说他是病死的。

本来太平军形势一片大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天京城内正酝酿着血雨腥风。

第五章 这一年天京有血光之灾

这不，杨秀清过早地提出要跟洪秀全平起平坐，以天父的名义命令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洪秀全是什么反应呢？他心里一定非常吃惊非常害怕，虽然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来得太早了。他这时候担心的还不只是自己的天王宝座，而是身家性命。杨秀清说出“万岁”时，洪秀全就知道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天王恨东王

太平天国领导层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广西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洪秀全一直是太平天国名义上的领导者，实际权力掌握在杨秀清的手中。杨秀清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他依靠过硬的行政能力和军事天赋，成为仅次于洪秀全的二号人物。当年冯云山设立了一种架空天王的制度，我们很难想象冯云山是为杨秀清准备的，他最开始肯定还是为了大权落到自己的手中，只是杨秀清后来居上，在天国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公认的领袖，冯云山也只好承认杨秀清的领导地位。

这种安排对于天国是有利的，洪秀全并无军事和行政才能，而且也不愿太劳神费力，杨秀清只要不威胁到他的一把手地位，他还是愿意让他处理军政大事的。自从冯云山和萧朝贵战死，杨秀清的地位已经无人撼动了，洪秀全有危机感也是难免的。

杨秀清和洪秀全虽然是一个阵营的，但穿的并不是同一条裤子，两人的政见和做事风格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鉴于洪秀全悲剧的科举历程，他对儒家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想要打倒所有的孔家店。杨秀清虽然没有读过书，也许正因为没读过书，对孔孟之道没那么多的仇恨，他更看重读书人的作用，所以很反感洪秀全的“灭孔”运动。

为了阻止洪秀全焚书坑儒，杨秀清假装天父下凡，要洪秀全立即停止这种自戕的行为。洪秀全不甘心，但也不能不住手。洪秀全也是一个很偏执的人，杨秀清如此不给他面子，他心里自然恨不得将杨秀清千刀万剐。

这还只是个开始。

一天，杨秀清与韦昌辉等人商讨政事的时候，当时洪秀全的几个女官也在这里。杨秀清忽然倒地，站起来时已经是天父了，天父说洪秀全已经变得专横跋扈，经常虐待身边的宫女。接着，天父对这四个女官说，你们以后不要去伺候天王了，到东王府伺候东王吧！

杨秀清这是干吗呢？可能是这四个女官长得比较漂亮，他垂涎美色；也有可能是这四个女官很有才能，东王日理万机，需要她们帮忙。但这么做等于是羞辱洪秀全，难道杨秀清不知道？

杨秀清当然不是不知道，而是此时他觉得已经没必要忌惮洪秀全了，军政大事全操于他一人之手，而且他在天国里的威望已经很高。此时，倒是洪秀全非常忌惮杨秀清。

如果说虐待女仆确实有错的话，那么杨秀清指责洪秀全四岁的儿子恣意妄为就有些过分了，一个四岁的小孩，在雨里玩耍，杨秀清却说这种行为过于放纵，为了防止他将来虐待子民，必须禁止。

当然，洪秀全虐待妇女是事实，洪秀全生气的时候，曾经一脚踢伤怀孕的妇女，导致后者流产。

杨秀清当然也不是一味地以天父的身份批评洪秀全，他也曾以下属的身份建议过洪秀全，这时候，洪秀全往往听不进去。每逢这时候，杨秀清就玩天父下凡的游戏。杨秀清这么做当然让洪秀全很难受，但对于天国的稳定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洪秀全是一个性格粗暴的人，处事方式也非常简单，看不惯的不喜欢的就杀，杨秀清做事要认真谨慎得多，这样就避免了许多冤狱。

在对待男女分营的事情上，洪秀全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杨秀清从人性的角度很反感这样，他觉得革命虽然重要，但也不能泯灭人伦，男女之爱是人的天性，所以不应该禁止男女分营，应该允许他们每隔二十天或是三十天能够回家跟老婆团聚一次。杨秀清还建议不应该把象征帝王的“龙”打入妖魔鬼怪的行列，洪秀全是个反传统的人，所以龙在他眼里也是妖魔鬼怪中的一个。而杨秀清却认为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不应该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

也许是迫于形势，洪秀全公开赞扬杨秀清坦诚、无畏、忠实，所以应该被尊为“劝慰师”和“圣神风”，所谓的“劝慰师”和“圣神风”就是三位一体中的圣灵，估计洪秀全这么做也是无奈的。

如果说洪秀全是天父的儿子的话，那么杨秀清似乎正在一步步高升，要把天父的儿子从天国的宝座上挤下来。用今天的话说，杨秀清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已经是二把手的人，再往上爬，洪秀全岂不要从顶端摔下来。

1853年12月，杨秀清几次天父附体，羞辱洪秀全的两大心腹，韦昌辉和秦日纲。杨秀清有时闲得无聊，就会突然倒地，然后让侍女去传唤韦昌辉。韦昌辉到了之后，必须五体投地听杨秀清训诫。杨秀清坐在轿子里，韦昌辉必须在一旁恭敬地当个跟班。就连杨秀清的奴仆都可以把韦昌辉玩得团团转。秦日纲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甚至还要为东王抬轿子。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韦昌辉和秦日纲对洪秀全更加依赖，他们知道只有这个人能够帮自己除掉杨秀清，虽然这个人没什么能力，但他毕竟是天国的最高领导人，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的。私下里，韦昌辉经常跟杨秀清唱对台戏，杨秀清曾建议洪秀全要节俭，又不是开时装店，干吗弄那么多龙袍。韦昌辉却对洪秀全说：“天王大哥，你现在富甲天下，龙袍当然是越多越好。”

后来，杨秀清知道了这事，洪秀全出来打圆场：“秀清就是古代敢于直言的正直大臣啊，昌辉只是心疼我这个做哥哥的，你们两人都是爱我啊，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

对杨秀清来说，他是容不下有人再称王，韦昌辉虽然是北王，但在他眼里也只是一个跟班的。杨秀清只想在太平天国内部建立一个四人领导集团，这四人中除了他自己和洪秀全，其他两个都是不存在的。一个是长兄耶稣，一个是三哥冯云山，洪秀全是老二，杨秀清是四弟。

毫无疑问，太平天国已经分化为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不存在什么是非，只存在好坏之分。以杨秀清为首的一派，代表的是更专业更有远见的利益集团，他们的目的是一统江山，再创盛世。以洪秀全为首的一派更多的是关注既得利益，为了既得利益，韦昌辉和秦日纲这些人聚拢在洪秀全周围。

杨秀清曾以上帝的口吻说过这样的话：“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简中书。”意思很明显，就是让洪秀全珍惜文化和典籍。

杨秀清清楚地看到，走向传统文化的对立面只会威胁天国的事业。杨秀清的看法是对的，当时有很多人对太平天国的统治不满，有读书人，也有一般的劳苦大众。所以，曾国藩拿太平天国毁坏传统的事情大做文章。杨秀清是一个政治家，洪秀全是权谋家，政治与权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很难区分，但多少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政治是为了求大治，在求大治的过程中难免会做出一些权谋之事，譬如唐太宗发动玄武门兵变。而权谋则是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一个是以大治为最高标准，一个是以个人利益为最高标准。

1855年，杨秀清已经病魔缠身，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也不会忘日理万

机，权力就像鸦片，很容易上瘾。杨秀清每次扮演天神下凡时，排场越来越大，他的家属和部属地位已经非常高了，大家整整齐齐排列在宫殿里。杨秀清如果要出巡的话，所有人都必须在宫外提前一两个时辰，恭敬地等候在那里。有时候连洪秀全也不得不跪在天王府门口恭候杨秀清的到来，如果杨秀清不想亲自动身的话，洪秀全还必须跑到东王府听候圣旨。

到此时，洪杨二人之间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事实上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自古一山不能容二虎，权力斗争从来没有双赢机制，双赢只存在于现代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中。

杨秀清往最高权力路上奔走之时，韦昌辉和秦日纲最辛苦了。如果杨秀清心血来潮，半夜天神附体，韦昌辉必须连夜赶到东王府，倘若迟到一分钟，杨秀清就让人用板子伺候韦昌辉。堂堂一个北王，落到这步田地，我们可以想象他心里的怨恨。

洪秀全把秦日纲提拔为燕王，后来因为西征失利，又被杨秀清废掉了。

借刀除东王

洪秀全越来越难受了，因为杨秀清开始干涉他的私生活。

虽然洪秀全的私生活有许多可以指责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天王，有人对你的私生活指手画脚，这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事情。杨秀清经常谴责洪秀全对母亲不孝，洪的不孝是事实，当上天王之后，洪秀全脑子里全是酒色，哪里还有什么母亲。

杨秀清虽然骂得在理，但洪秀全心里很不舒服。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里唯一一个将军政大权掌握在手中的人，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人做到这一点，包括洪秀全除掉杨秀清后，他也没能将权力都控制在手中。在军事方面，杨秀清拥有最高的裁决权，哪怕他生病时也是这样。可能在政务上有些事情他还得跟洪秀全打声招呼，但在军事上他说一不二，前方将领任何大的军事行动都出于杨秀清的决策。

北伐和西征都是杨秀清一手作出的决策，北伐是失败了，但震动了清廷的心脏部位。西征也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杨秀清临时易帅，终于挽救了危局。这一系列军事行动都证明了杨秀清卓越的战略眼光，湘军在西征战场上溃败，围困天京的清军大营也被一一攻破，心力交

猝的猛将向荣最终一命呜呼。

胜利很容易激发人的野心，洪杨二人之间的矛盾本来就找不到出路，随着杨秀清威望的提升，两人的矛盾加速激化。洪秀全不可能退位，而杨秀清也不可能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业拱手让人。

本来九千岁和万岁只隔了一千岁，一个台阶而已，但杨秀清受不了。他很希望跟洪秀全平起平坐，杨秀清也是一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有时候欲望一强，难免就会过于心急。

这不，杨秀清过早地提出要跟洪秀全平起平坐，以天父的名义命令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洪秀全是什么反应呢？他心里一定非常吃惊非常害怕，虽然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来得太早了。他这时候担心的还不只是自己的天王宝座，而是身家性命。杨秀清说出“万岁”时，洪秀全就知道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此时，朝政已完全控制在杨秀清手中，军事大权、司法大权完全由他掌控，前方将领也多听从杨秀清指挥。杨秀清如果要杀掉洪秀全，只是举手之劳，甚至连举手都不用，只需说一句话而已。杨秀清为什么没有杀洪秀全，以至于最后反被洪秀全杀了呢？

可以这么说吧，杨秀清没想过要杀掉洪秀全，也许他真实的想法是逼洪秀全退位。作为一个政治家，杨秀清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干掉了洪秀全，天国的这些把戏全都要穿帮，一旦这些统治的神话破灭，天国就会元气大伤。神话一旦穿帮，杨秀清能不能稳住局面，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他要做的是跟洪秀全平起平坐，一个天国，两个万岁。杨万岁在前台掌权，洪万岁在幕后享乐。

为了给自己造势，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科考中出了这么个题目：《四海之内有东王》。而且这年春节，杨秀清还在自己的家门前挂上对联：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做人王。这已经是非常赤裸地要上位了，洪秀全只能答应封他为万岁。与此同时，洪秀全也在密谋除掉杨秀清。洪秀全知道，这次博的不只是权力，还有身家性命。

杨秀清早已把韦昌辉和秦日纲这些人支到前线去，洪秀全要除掉杨秀清必须把这些人召回，这是一项高难度的动作，因为天京城内到处都是杨秀清的密探。

为洪秀全送信的还有一个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拿了一笔丰厚的钱财，跑到秦日纲的大营里，将天京的事情和盘托出。根据爱尔兰人的描述，杨秀清神灵附体时，洪秀全都要匍匐在地上。杨秀清曾经声色俱厉地问洪秀全：“你打江山，多亏了何人？”洪秀全说：“四弟。”杨

秀清又问：“你既然知道四弟有大功劳，为什么不封他万岁呢？”洪秀全说：“应该封四弟为万岁。”杨秀清问：“东王世子也只是千岁吗？”洪秀全说：“东王子孙后代都是万岁。”

据说杨秀清后来也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了，称自己是万岁，洪秀全是万万岁。这个爱尔兰人还说杨秀清虽然很跋扈，但确实是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他相貌高贵，和蔼可亲。

洪秀全自己手中没多少兵，就一些亲兵，靠这些人没法除掉杨秀清，但韦昌辉、秦日纲、石达开手中有兵啊！韦昌辉受了杨秀清不少气，最难堪的是有一次韦昌辉的士兵闹兵变，杨秀清当众打了韦昌辉几百军棍，差点把他打残。挨打之后，韦昌辉还说东王依法办事，赏罚分明，让人心服口服。还有一次，韦昌辉的哥哥跟杨秀清的小舅子争地皮，韦昌辉居然把自己的哥哥五马分尸。韦昌辉也是厉害的角色，把刀悬在心里，忍术很厉害。

秦日纲是跟着韦昌辉混的，同样对杨秀清恨之入骨，洪秀全选择这两人是没错的。但选择石达开就有问题了，石达开虽然也有理由恨杨秀清，因为之前他的岳父黄玉昆得罪了杨秀清，被杖打三百，革职查办。但另一方面，杨秀清又很器重石达开，石达开跟杨秀清的关系到底怎样非常难说。

根据史料记载，石达开是反对洪秀全诛杀杨秀清的，他跑到天京来阻止，可惜为时已晚。世人称石达开为奇男子，他奇特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凌迟的时候泰然自若一声不吭，而是这个人的心思不可捉摸。除了岳父被打之外，他跟杨秀清没什么大的矛盾，两人之间更多的是明主和良将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他被捕后没有说杨秀清一句坏话，后来又请示洪秀全诛杀韦昌辉和秦日纲。

但石达开也有欲望啊，他手握重兵，东王一旦被杀，没有人能控制得了他。他就可以取代杨秀清的位置，然而，杨秀清既然被杀，难保他以后也不被杀，所以他是很矛盾的。加上世人普遍认为石达开的性格优柔寡断，所以我们很难断定他对诛杀杨秀清的真实态度，但仍然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杨秀清器重石达开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大家看不到的是杨秀清很有可能对石达开非常猜忌。没有证据表明杨秀清对石达开非常猜忌，但是我们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测，石达开是诸王之中兵权最重的一个人，也是能力最强威望最高的大王，能力和地位仅次于杨秀清。杨秀清也许看不起洪秀全，但他一定忌惮石达开，他不敢对洪秀全动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激起石达开叛变。

杨秀清的性格很像雍正，雄才大略但是猜忌心非常重，韦昌辉和

秦日纲被他折磨得死去活来，石达开也担心杨秀清将来有天会这样对自己。石达开被俘后写了个《自述》，在《自述》中他有两点歪曲事实：一、他说洪秀全主动诛杀韦昌辉，其实是他以兵权威胁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二、他说洪秀全是主动封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不服气，所以诛杀了杨秀清，其实是杨秀清逼宫，洪秀全借刀杀人。

石达开为什么要歪曲事实呢？他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说天京事变跟自己没关系，由此可见，石达开很可能也参与了密谋杀害杨秀清的计划，或许他中途又反悔了。

1856年9月1日深夜，韦昌辉带领三千广西长毛抵达南京，这些士兵全都跟随他多年，忠实可靠。秦日纲已经在天京城内，他驻扎的地方离天京不远，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在等待韦昌辉的到来。

韦昌辉到了以后，大家在洪秀全家里开了一个会，商议好了，只杀杨秀清一个人。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天京城内有六千人是完全忠于杨秀清的，如果等他反应过来的话，行动会很不便，所以应该尽快下手，杀杨秀清一个措手不及。至于石达开那边，以后再说。

东王府的人听到韦昌辉深夜敲门，以为有紧急军情，便打开大门。韦昌辉进来以后，大手一挥，士兵们一下子涌进来，见人就杀。

杨秀清听到外面有喧闹声，很不高兴，他也以为是有军情，但不愿意别人深夜打扰自己。杨秀清身边有十二个绝色的女秘书，这些女秘书有双重身份，既是杨秀清的小蜜，又是得力助手。听说韦昌辉有紧急要事，她们在第一时间起床，准备备案，记录军情。没想到韦昌辉冲上来，咔嚓十二刀，十二个美人顿时人头落地。

终于到达了杨秀清的寝宫里，杨秀清很吃惊，他发现今天的韦昌辉已经不是往日的韦昌辉了。他满脸是血，眼睛通红。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杨秀清知道大事不妙，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韦昌辉已经举起手中的钢刀，只听咔嚓一声，一代枭雄杨秀清的人头就被捏在韦昌辉的手中。

韦昌辉溅了一脸的血，看着手中这个血淋淋的人头，他心中全是复仇的快感，丝毫没意识到死神已经在身后。

天国大地震

东王府的人被杀得一干二净，但是杨秀清还有很多忠实的部下，他们如果知道杨秀清被杀的话，很可能会叛变，到天京城就会变成

战场。

如何处理这件事呢？洪秀全找韦昌辉商量：“昌辉，你还得再付出一次，东王的下属肯定很愤怒。我只好假装痛斥你滥杀无辜，对外界说当众打你五百棍，然后再把你处死，用这个理由邀请东王的下属来观刑，他们一定不会拒绝的。”

韦昌辉阴险地问：“天王是想等他们来了，再把他们一网打尽是吧？”

洪秀全笑道：“昌辉，我没有看走眼，你是很有潜力的。”

行刑的场所就在天王府内，之前就有规定，进入天王府的人一律要交出兵器。东王的部下乖乖地交出兵器，大家恨透了韦昌辉，只想看到他千刀万剐，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一条毒计。这六千人进去以后，连韦昌辉的影子都没看到，就在大家感觉出什么事的时候，脚底下的炸药忽然炸开，接着一群士兵拿着刀枪冲了过来。

尸体，全都是尸体，东王的人马已被彻底清除了。论理，洪秀全应该放心了吧！

还不行，必须在全城搜捕杨秀清的亲信，一个也不能放过。两万人死于这场屠杀，到最后参与屠杀的已不止是韦昌辉，洪秀全出动了天京城内所有的士兵。

杀死杨秀清后，洪秀全还不解恨，下令将杨秀清分尸，然后放到锅里煮，再分给全军将士吃。屠杀完成后，石达开终于赶到天京，老实说他非常吃惊，他万万没想到洪秀全和韦昌辉做事会这么绝。石达开当面指责韦昌辉滥杀无辜，他这么做不一定是为杨秀清鸣不平，而是他清楚地看到，这么做是自取灭亡。

韦昌辉自然很恼火，他认为石达开是杨秀清的人马，或者已经投向清廷。不过这时韦昌辉还没有要杀掉石达开的意思，他还想笼络石达开。韦昌辉本来和石达开是竞争对手，都是王，都得听洪秀全节制，如果韦昌辉头脑正常，就不会想笼络石达开，而是要想办法除掉他。

韦昌辉的头脑很正常，他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想取代洪秀全成为最高领导者。要除掉洪秀全，还得打败清军，他不能不笼络石达开。

一天，韦昌辉请石达开到北王府吃饭，吃着吃着，忽然侍者端上一锅肉羹。韦昌辉笑着对石达开说：“这肉价值连城，达开，来尝尝。”石达开吃着吃着，忽然眉头紧皱，问：“这是什么肉，怎么味道

怪怪的？”

韦昌辉笑道：“九千岁的肉。”

石达开顿时脸色大变：“你太残忍了，人都杀了，居然把人煮成肉羹，好歹东王以前是我们的领导。”

韦昌辉脸色突然变得冷峻：“达开，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相信你一定是个聪明人。”

石达开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哪受得了韦昌辉这样跟自己说话，脸色一沉，甩袖而去。回去以后，石达开才知道自己处境很危险，韦昌辉和洪秀全这么残忍，一定不会放过自己。这时，石达开的一个部下建议他快点逃，正如部下所说：“再晚了就来不及了。”

石达开也是一个聪明人，连夜逃出天京城，他不敢走正门，让人从上面放个绳子，慢慢滑下城。堂堂西征军统帅，逃走的时候这么狼狈，由此可见，当时天京城局势之恐怖。

听说石达开逃走，韦昌辉气得咬牙切齿，杨秀清死后，石达开是军中威望最高的人，他逃走就代表不想和新的政府机构配合。韦昌辉杀人上瘾，请求洪秀全让自己诛杀石达开全家，洪秀全看别人杀人也上瘾，立即同意了。

洪秀全做事还是很有头脑的，让韦昌辉杀石达开全家，还让秦日纲去追杀石达开。秦日纲没追到石达开，韦昌辉倒是把石达开全家杀得一干二净。

石达开逃到安庆后，洪秀全才意识到，现在石达开是最大的军阀，他坐拥几十万大军，比杨秀清的威胁性更大。如果石达开要造反，几十万人大半都会跟着他，因为石达开在太平军中名声最好。

果然，石达开在安庆点兵，扬言要杀回天京，平息叛乱。洪秀全听说这事，立即慌了，立即作出姿态谴责韦昌辉：“我本来没有杀东王的意思，是你逼我这样做的，就算杀了东王，他的下属也是无辜的，你把他们全部都杀了。你这样做让我很心疼，如果不是天父仁慈，我岂能轻饶你。”

韦昌辉一听，就差没有当洪秀全的面骂娘，愤然反击道：“我为你除掉大害，你利用了我，现在反而沽名钓誉指责我，你当我是任人宰割的牛羊啊！”

洪秀全一听，脸色骤变，心想你这个白痴，我这是在救你，看你这样子迟早都会反，不如杀了你，还可以笼络石达开。

等韦昌辉走后，洪秀全立即让人拟旨，下诏捕杀韦昌辉。韦昌辉

听说后，气得头顶冒烟，直想一刀戳穿洪秀全，立即带领手下的三千精兵围攻天王府。洪秀全早料到他会狗急跳墙，早早关闭了王府的大门。洪秀全是个多疑的人，所以天王府修得坚固如铁桶，怎么攻都攻不破。

就在韦昌辉心急如燎的时候，天王府里忽然冲出一群不要命的女兵，这些女兵全是完美洗脑的产物。韦昌辉的精兵居然被这些女人击溃，韦昌辉等人狼狈不堪地逃到北王府。

这时，洪秀全从王府中走出来，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下令全力围攻北王府。韦昌辉看大势已去，已不可能推翻洪秀全，便带着几个亲信逃出王府，想悄悄溜出城。韦昌辉逃到城门口，遇到巡逻兵，偏偏他又回答不出口令，被人捆绑起来，押到天王府。

洪秀全根本不想见韦昌辉，只是下了一道命令，将韦昌辉五马分尸。分完尸之后，又让人把韦昌辉的尸体割成无数小块，挂在城楼上，写着：“北奸肉，只许看，不许取。”做完这一切后，洪秀全让人把韦昌辉的人头寄给石达开。石达开仍然不满足，他给洪秀全写了一封信，让他诛杀秦日纲。

洪秀全无奈，只好继续诱捕秦日纲，将秦日纲的首级也送了去。收到这两人的首级，悲痛中的石达开总算稍感安慰。

1856年12月，石达开抛开仇恨，带领部分人马进入天京城。在天京，石达开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人们朝他扔鲜花，欢迎他的到来。

洪秀全见到石达开后，泪流满面，悲愤地控诉自己被韦昌辉“挟持”的经历，他说如果没有韦昌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东王不会死，你的家人也不会……

石达开只能安慰洪秀全：“天王，不要这样，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对这起内讧，天国高层讳莫如深，大家都不说事实，都说东王是赎罪期到了，跟着耶稣一样归天了。东王死的这天定为“东王升天日”，即使韦昌辉、秦日纲这些人，大家也不说他们被诛杀，而是说死了，一不小心死了。

虽然高层封锁消息的能力值得肯定，但这起事件就像大地震，波及整个天国控制的区域，连不被天国控制的区域都受到了影响。百姓们纷纷说：“天父杀东王，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太平军的一些士兵说：“天父杀天兄，终归一场空。打包回家转，还是做长工。”

太平天国的很多人是真的相信上帝，相信洪秀全是上帝的二儿子，相信杨秀清是天父的代言人。但现在他们崩溃了，北王杀掉了代言天父的东王，天王又杀了北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补救统治危机，洪秀全开始追封杨秀清，把他塑造成高大全式的完美人物，甚至亲自写诗讴歌东王：“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忘记。”洪秀全还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东王，称为幼东王。这些举动当然全是作秀，出于政治需要。后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与清军湘军交战时处处挨打，洪秀全才真心想起杨秀清的好。

天京事变是一场毁灭性的政变，从此太平天国义无反顾地走向下坡路。这次政变，杨秀清手下两万多人被杀，这些人不是精兵强将，就是高级参谋，都是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他们集体被杀，导致太平天国整体实力急剧下滑。

在天京事变爆发前，整个战略形势对太平军是有利的，当时清军驻扎在天京附近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都已拔去。石达开又击败了湘军，控制了安徽、江西和湖北，随时可能打入湖南，击溃湘军。太平军已经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只要拿下浙江和江苏等地，就等于握住了天下粮仓。

事变之后，曾国藩得到喘息之机，迅速调整部队，准备反攻。

第六章 天国的覆灭

石达开虽然名义上仍然尊洪秀全为教主，但内心深处他已经跟洪秀全恩断义绝。洪教主看石达开出走后，几十万人跟着他，心里很慌，急忙革去两个哥哥的王爵，希望石达开能浪子回头。石达开毫无反应，从他出走的那天起，他就没打算再回天京，如果要回去的话，估计也是兵临天京城。

石达开出走

太平天国的这些首脑们一个个被除掉后，洪秀全非常没有安全感。用现在的话说，领导与下属之间遇到了信任危机。

洪秀全觉得外人都是不可靠的，只有自己的家人才是可信的，他首先提拔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整个天国只剩下石达开一个王了，洪秀全觉得完全可以给两个哥哥封王，便封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在洪秀全后来提拔的亲属中，只有族弟洪仁玕有才能，其他人大多是脓包。

洪秀全担心石达开有意见，想进一步提拔他，封他为义王，也就是说在诸王之中，现在你地位最高。但石达开居然拒绝接受这个封号，洪秀全有些难堪，因为他不知道石达开心里在想什么。石达开不领情，洪秀全也不为难，仍然称他是翼王，但加上了“圣神风”的封号。

说实话，石达开对洪秀全大封家人的做法很不满，在他看来，要当王首先得有能力。此时，石达开还待在天京城，今非昔比，家人被杀光之后，石达开一直闷闷不乐。虽然他现在总揽军政大权，但没有丝毫的高兴，经常一个人孤零零地想心事。

洪秀全安排两个哥哥当王就是用来牵制和监视石达开的，根据李秀成的说法，石达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负气出走。

1857年夏天，石达开带着亲信部队离开天京城。所到之处，他对大家说自己是继续西征，报答天王隆恩。石达开这次出走直到死，再也没有回到天京。

石达开出走时，带的人并不多，只有几千人，但是他途经安徽、

江西、湖北时，部众已经有十几万人。

石达开在出走前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打仗的水平直线下降，前期他是清军眼里头号难对付的人，但是到了后期，曾国藩将他定为二等敌人，反而把陈玉成、李秀成这些后起之秀看成是头号敌人。到最后，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些人甚至认为石达开是个徒有虚名的将领。

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更加不信外姓将领，用李秀成的话说：“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异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

如果石达开没有负气出走的话，太平天国未必一定会失败，清军方面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士气低落，这时候捻军又在安徽起义，成立了大汉国。贵州有苗人起义，广东有天地会拉起造反大旗，福建的小刀会也浑水摸鱼……

如果太平天国能够挺住，清廷没有不倒之理。此时清廷已到了内外交困的危险时刻，全国各地都有起义，这些起义打乱了清廷的部署，让清廷无法对天京组织统一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咸丰政府跟英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僵，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更糟的是清廷的财政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咸丰不得不命令内务府停止购买丝绸和瓷器，取消八旗子弟的财政补贴。就像周天子后来穷到要把象征最高权力的鼎熔化一样，咸丰也让人把金钟、铜器熔化，做成制钱，开源节流，一切可以想的办法咸丰都拿来用了……

石达开出走不光是因为受气，主要还是怕重蹈杨秀清的覆辙。他已经听说洪仁发和洪仁达在洪秀全面前告状，说自己的坏话，洪秀全似乎动了杀机。

石达开这一出走，旅游兴趣大增，在十二个省之间转来转去，打仗反倒是业余的职业了。这也难怪，天京事变家人被杀，他心情很不好，确实需要旅游散散心。

石达开虽然名义上仍然尊洪秀全为教主，但内心深处他已经跟洪秀全恩断义绝。洪教主看石达开出走后，几十万人跟着他，心里很慌，急忙革去两个哥哥的王爵，希望石达开能浪子回头。石达开毫无反应，从他出走的那天起，他就没打算再回天京，如果要回去的话，估计也是兵临天京城。

一路上，也有一些将领嚷着要回天京城，人们眼中优柔寡断的翼王非常果断地杀掉这些将领。由此可见，石达开这次真的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石达开不高兴，曾国藩就高兴了，他让师爷李元度给石达开写一封劝降信。这位师爷的文采相当好，洋洋洒洒几千言，借古讽今，告诉石达开造反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如果能弃暗投明的话，仍然不失英雄本色。

李师爷恩威并用，将利弊和形式剖析得鞭辟入里，甚至用楚项羽的例子来吓唬他，想当年这个项羽力拔山兮，最后还是乌江自刎。你再看看你，如果你一旦失势，不就是一个不能自保的匹夫吗？放下武器，投靠清军，可保全家性命和富贵；坚持抵抗，只会招来灭顶之灾。

石达开看到这封信，陷入了沉思中，然后信笔写下了一个“难”字。确实很难，石达开现在是太平军中威望最高的人，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振兴天国，再造以前的大好形势。如果他投降，不但辜负了众人的一片期望，还会落下千古骂名，甚至有可能激起叛变。

翼王断翅

以前，石达开打得曾国藩几次想跳水自杀，现在石达开好像锐气尽损，手中有几十万大军，居然屡屡吃败仗。石达开先是攻打浙江衢州受挫，衢州守军只有一万人，石达开却没占到半点便宜，反而被清军袭击，损失几千人。清军援兵陆续赶到衢州后，形势对石达开更不利，石达开不得不全线退出浙江。

石达开打算转战福建，与太平天国后期的另一个重要将领杨辅清会师。石达开一路艰难地到达福建，杨辅清以前是杨秀清的老部下，对石达开的遭遇颇为同情。但是两人见面之后情况有了微妙变化，石达开正不断走下坡路，而杨辅清风头正劲。石达开受不了他功高盖自己，想除掉杨辅清，兼并他的军队。杨辅清也是一个老练之人，感觉到石达开的杀机，带着七万人连夜逃走。

逃走之后，杨辅清又效命于洪秀全，当然他对洪秀全也不是真心的，东王被杀后，他在福建鼓吹造反，打回天京。现在形势不同，靠着大树好乘凉。

石达开准备在福建发展，打出一片坚固的根据地，但是清军和乡勇联手起来，让本已心力交瘁的石达开疲于应付。石达开觉得福建不好待，决定去江西那边看看。后来听说江西那边爆发了瘟疫，石达开便在福建滞留了一个月。这一停留，给了清军时间，周天培等人赶到

福建袭击石达开，石达开又吃了败仗，士兵们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

石达开带领部队义无反顾地窜入江西，冲过重重包围，终于到达了革命根据地瑞金。石达开在江西大规模征兵，然而江西也很难发展下去，因为这里大部分被湘军控制。

江西待不下去，石达开选择攻打湖南。进入湖南后，石达开一路攻城略地，直抵宝庆府。湖南人做事打仗都有一股蛮劲，而这点恰恰是石达开缺乏的。

宝庆会战是太平天国战史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最为惨烈的战争。宝庆地势险要，城池坚固，民风彪悍，能不能拿下宝庆可以说是石达开后期军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石达开的军队大概有十几万，湘军有四五万人。太平军这边的总指挥是智力和魄力都在不断下滑的石达开，湘军的指挥是智力不断上升的曾国藩和胆识勇气不断增长的左宗棠。

最关键的是湘军占据地利，粮草充沛。石达开虽然雄兵十几万，但消耗太大了，而且是一支流动军队，战事一旦僵持，太平军必败。

事实正如曾国藩所料，石达开伤不起也耗不起。石达开气势汹汹地过来，留下一大堆尸体，大多数是自己这边的，然后狼狈不堪地离去。

随后，石达开转战桂林，仍然没能攻克。

1859年底，石达开终于时来运转，攻下庆远府，他把这里命名为“龙兴”，大有东山再起一展宏图的意思。可惜，好运已经离开了石达开。1860年3月，石达开进攻百色，这一次损兵折将将近十万人。

失败还不是最残酷的，比失败更残酷的是，军队人心涣散，不少将领闹着要离开。石达开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虽然他一向是个比较仁慈的人，但处理这种事情也毫不手软。杀掉了几个将领，勉强稳住了形势。

这一年石达开刚好三十岁，刚步入中年，本来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可他的心情却非常低落。在将领们的建议下，石达开又进攻南宁，拿下南宁之后，将士们强烈要求他回天京主政。石达开烦透了，表示自己不可能回天京。将士们漂泊在外，没有归宿感，而且一直这样，心里也很不踏实。

彭大顺和朱衣点等大将居然带着十几万人脱离石达开，想一路杀回天京。这些人的下场很惨，要么中途被清军歼灭，要么投降清军，

要么在江西和李秀成的部队会合。

石达开受此打击后，更加一蹶不振。心灰意冷之中，他对部将说要“归隐山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一旦造反就没有回头路，太平军允许他退隐，清廷也不允许。造反不是荣华富贵，就是死，想闲云野鹤是不现实的。

1861年，石达开离开广西，再次回头攻打湖南。行军的路上石达开的情绪一直很低落，甚至都懒得约束部下，任由他们一路劫掠，也许石达开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败亡了，所以他懒得去阻止。

到达湖南涪州时，石达开的部队又有二十多万人，当然这些部队的战斗力远远比不上过去了。大量的精英流失，一些新招募的士兵又没纪律。

1862年6月，石达开攻破长宁。次年春，石达开兵分三路进攻四川。三路大军中赖裕新首先出师不利，在中州坝阵亡。李复猷也很不顺利，遇到清军的阻击，不得不折返到贵州和云南。石达开率军到贵州乌江渡口时，写下了一首诗：

垂翅无翼鸟倦飞，乌江渡口夕阳微。

穷途纵有英雄泪，空向西风几度挥。

写这首诗时，石达开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这大渡河就是石达开的葬身之地。石达开的部队驻扎在大渡河边的紫打地，本来应该早点渡河，孙子说兵贵胜不贵久，打仗不是旅游，肯定不能慢悠悠。但这一天石达开特别高兴，他的小妾为他生了个孩子，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全家被杀，终于又有了亲生骨肉，终于又可以做一个父亲，那种快乐近乎重生。

所以，石达开下令在这里停留三天，全军庆祝。谁也没料到，这一停留就坏事了。第二天，大渡河爆发山洪，河水暴涨，军队不敢过河。骆秉章带领清军冲出来，断了他们的后路。石达开一怒之下，把两百多个带路的彝族人全部斩杀。这一来激起了彝族人的愤慨，他们纷纷协助官军，把山路给封死。

此时，石达开不光要对付清军，还有当地的土民，这些土民充当清军向导，在这种崎岖山路占有很大的优势。军队越打越少，粮草越吃越空。石达开感到大势已去，让妻妾和子女几人跳江自杀。为了保住将士们的性命，他主动提出跟骆秉章“和谈”。这时，他也不能不和谈了，不能不谈的时候往往是谈判资本最少的时候。

骆秉章也是一只老狐狸，他当即表示，像石达开这样的豪杰能够弃暗投明绝对是一件好事，欢迎他亲自来清军大营。石达开信以为真，带着自己的爱子去见骆秉章。没想到骆秉章话锋一转，说道：“你是来投降的吗？”

石达开确实是来投降的，但人都有自尊心，所以他说：“我是来为三军请命，希望大人能够放过他们，我是死是活任由大人处置。”

骆秉章哈哈大笑：“你是死是活还得看上面的意见，但你的那三军将士肯定是一个都活不了的。”

石达开的三千将士缴械之后，在大渡河边被清军集体屠杀，杀完之后，直接把尸体扔进河里。大渡河一夜之间变成红河。

石达开临刑前写了一份自述，拒不承认自己失败是因为才华不够，坚持认为是天国上层混乱，还有就是老天要亡自己。

石达开被凌迟处死时，神色泰然，观刑的人都称他是奇男子。石达开五岁的儿子论律要等到十五岁以后凌迟处死，但不久就被人下毒毒死。

天国丧钟

洪仁玕是洪秀全亲人中最特别的一个人，洪秀全家族里太多不学无术的草包，洪仁玕是个例外。在太平天国的后期，政务主要靠这个人主持。

洪仁玕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想。当他从香港来到天京时，随身携带着一本《资政新篇》。当洪秀全为天国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忽然来了这么一个能干的弟弟，简直是喜出望外。他封洪仁玕为干王，把政务都交给他。

与此同时，洪秀全也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算是平衡一下局势。洪仁玕这个人是个典型的书生，说他有能力，是相对洪秀全其他的那些兄弟。洪仁玕来了以后，夸夸其谈，纵论世界大势，认为太平天国想强大，必须学习日本和俄罗斯。这些东西对于太平天国根本不适用，太平天国已经自身难保。但洪仁玕提的这些东西确实是先进的，如果真能付诸实践，他倒不失为一个先驱者。

很快，洪仁玕就露出了马脚，对于打仗他一窍不通。天京的重要屏障安庆丢失后，洪秀全一气之下，不再重用洪仁玕。洪仁玕此后一直过着郁闷的生活，洪秀全临死的时候才想起找他托孤。太平天国失

败后，洪仁玕挺有骨气，坚持不肯投降，以文天祥自居。

我们再来看看陈玉成的结局。金田起义时，陈玉成还是一个童子兵，他戎马十二年，从一个普通士兵变成大军的统帅，最后当上英王，升迁很快，但绝不是励志的好榜样。从小他就是一个被洗脑的孩子，长大之后以战场为生，虽然会打仗，但完全是一粒棋子。

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就是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攻破的，陈玉成打得清军老将向荣最后羞愤自杀，还击毙了湘军四虎之一的李续宾，生擒了清朝巡抚李孟群，可谓是战功赫赫。

在太平天国后期，清军再度组织了江南大营，陈玉成领兵又一次击破江南大营，这一次他打得老将和春服毒自杀。

1860年秋，太平天国组织了第二次西征，统帅便是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等人。这次西征的目的是拿下武昌，陈玉成的兵锋很锐利，一路攻城略地，占领了黄州，距离汉口只有百里之遥。杨辅清和李世贤在安徽一带也进展顺利。

李秀成的部队出发得比较晚，但他的经历更具戏剧性，李秀成曾经一度离曾国藩的大营很近。李秀成也知道曾国藩在那里，他却不去攻，因为他认为曾国藩的大营一定防守严密，兵力雄厚。事实上完全相反，曾国藩的湘军早已派往各地，大营里兵力空虚。如果李秀成这时候杀过去，即使不能俘杀曾国藩，至少也能击溃曾国藩所在的湘军，致使曾国藩流窜山林。这样一来，各地的湘军肯定会赶来营救，李秀成再把前来支援的湘军一一歼灭，极有可能会挽回整个战略形势。

李秀成这个人打仗求稳，这是他跟陈玉成最大的不同。李秀成绕过曾国藩，直取吉安和瑞金，然后率领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涌向武昌。到了武昌后，李秀成并没有攻城。跟三个月前陈玉成一样，都放弃了武昌，转而攻其他地方。这倒不是因为武昌攻不下来，是英国参赞巴夏礼搞的鬼。英国人在武昌有许多既得利益，扬言说如果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李秀成随后转入浙江，攻破杭州，然后学习石达开在这里经营。浙江虽然富庶，但军事地位远远没有安庆重要。曾国藩宁愿不要江南的富庶之地，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安庆。陈玉成虽然赶去救援安庆，但被湘军阻挡住了，无法跟城内守军应和。

安庆就这么丢失了，两万将士阵亡。

安庆丢失后，洪秀全焦躁不安，下令将陈玉成和洪仁玕等人革职，重新任用他那些草包兄弟。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洪秀全开始疯

狂地封王，一口气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

陈玉成一个人困守庐州，处境非常凄凉，洪秀全不信任他，李秀成也不来救他。血战之后，最终成为清廷的俘虏。不过陈玉成这个人很有骨气，誓死不投降。

正如陈玉成临死时说的：“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已毁一半。”

李秀成在杭州这边确实经营得不错，他一改太平天国过去的政策，重用人才，鼓励工商业。他任命了一大批地主出身的官僚，在他的治理下，杭州每年出口的丝绸比清廷还多。

天国的根基已失，李秀成根本无力回天，最后李秀成被左宗棠击败。

洪秀全死后，李秀成身负托孤重任，带着幼天王逃亡，在天京东南面的山上被湘军抓住。

狱中，李秀成曾希望曾国藩能免自己一死，可惜清廷还是没放过他，幼天王洪天贵福也殉难。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场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以前大家都说凡是革命的东西都是好的，当我们真正了解这场革命后，我们看到的还有一幕人间惨剧。以暴易暴永远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当时美国的驻华使者柔克义推测太平天国运动至少导致中国两千万人丧生，后来一个传教士说这场运动至少导致五千万人丧生。复旦大学葛剑雄通过系统的分析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期间，中国人口减少了约一亿一千万人。

这场运动犹如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如果说它还带来了什么东西的话，那便是后来的洋务运动，不过这是间接原因。

灾难都应引起人的思考，如果不能或不许思考，一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

第七章 命苦的皇帝

咸丰即位以后，国库里的银子只够五个月的开支，还是正常的开支，碰到战争等肯定是不够的，内务府的银子就更少，只有四万多两。越穷破事越多……

别说咸丰平庸，纵使有雍正之才，估计也难以应付这种局面。

平庸皇帝

像所有平庸皇帝一样，咸丰刚当上皇帝后，也很想有一番作为。

可能是受遗传因素影响，咸丰有非常浓重的作秀癖，他所以能当上皇帝就仰赖于打死也要作秀的精神。道光死的时候，他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唯恐自己的孝心不能被天下人知道。登基后，咸丰强烈要求恢复三年之丧的古制。三年之丧是古代最重的一种丧服，起源于周朝。

咸丰这么做无非是想告诉天下人：我是一个有德的明君，以孝治天下。

大臣们当然不能同意，说皇上你刚登基，日理万机，怎么能服孝三年呢？还是按照祖制服丧百日吧！咸丰对大臣们说：“看了大家的奏折，朕的哀痛更深更重了。皇考对朕有养育大恩，就算守丧三年，也不能报答皇考的慈恩啊！而且三年之丧是礼经上记载的，古人能够做到的，朕也一定能做到。”

朝臣们自然大肆颂扬新皇帝的仁孝，但强烈建议皇帝还是要化悲痛为力量，以国家为重。咸丰终于妥协了，但这么一秀，就秀出了名声，天下人都知道他咸丰是个孝子皇帝。

咸丰是个乐此不疲的演员，做了太多“仁孝”的事情，这个我们就不说了，还是看看他有没有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咸丰做的最雷人的事情莫过于罢免三朝元老穆彰阿，罢免穆彰阿之后，咸丰还表示永不叙用。当时朝堂上下一片吃惊声，其实如果熟悉清史，丝毫没有值得奇怪的地方。从康熙以来，大家都这么干的，一个不落。

穆彰阿和曹振镛是道光最宠信的两个元老，这两人都是会做官不做好事的典型。穆彰阿比曹振镛更狡猾，也更贪婪，而且当过咸丰的老师。咸丰老早就了解到穆彰阿的人品，所以上台后迫不及待地拿他开刀。曹振镛虽然平庸，但人品毕竟还不错，所以没遭殃。

咸丰当然少不了给穆彰阿一顿臭骂，说穆彰阿这个人小忠小信，为人阴谋，好奸诈之术，遇事喜欢逢迎阿谀，还说穆彰阿贪婪好虚荣，打压贤才，妨碍林则徐复出。

耆英也受到惩罚，咸丰将他从一品降到五品，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耆英的错误在于承诺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细心的人会发现，穆彰阿和耆英都是林则徐在政治上的反对派，而咸丰是比较欣赏林则徐的，他这么做似有打压政敌的嫌疑。不光是打压政敌，更是为了立威。

林则徐让咸丰这个二十岁年轻人崇拜的地方很多，他的骨气，他在外交中的强硬姿态，以及他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穆彰阿和耆英的表现完全相反，这两人做事显得优柔寡断，在与英国人交往时又处处丢中国的脸。

咸丰当时并不知道丢人事小，利益事大。他有年轻人常见的那种激情和愤青脾气，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能算到穆彰阿、耆英这些妥协派的头上，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实力不行。但是当时的人，不论是咸丰也好，还是朝臣们也好，或是平民老百姓也好，都不愿承认中国技不如人，都认为堂堂天朝居然败给海外夷狄，肯定是有奸臣在其中捣鬼。

其实，这次鸦片战争林则徐是有很大责任的，但结果大家都把责任推到穆彰阿和耆英这些妥协派身上，都以为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奉行林则徐的抵抗政策。

耆英这个人是非常冤的，战争失败不是他的错，主张妥协也是针对当时形势所提供的建议，而且妥协确实比强硬要好。

耆英还有一个地方得罪了咸丰。咸丰登基不久就下达成言诏，希望大家踊跃发言，敢于说真话。耆英却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小人且当保全，君子亦恐误事。”

老实说，咸丰猜不透耆英是什么意思，耆英的意思大概是小人也可以做好事，君子也会误大事。耆英这话可能是暗讽林则徐，他亲临第一线，跟林则徐一样和洋人打交道，所以深知林则徐这个君子误了大事。但在当时的那种氛围下，他不可能说出心里话。

咸丰不明白耆英的话，于是便开始猜。他想起耆英担任两广总督

期间，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后来居然跟英国人私下里达成协议，允许他们两年后进城。之后，耆英又巧妙脱身，离开广州，回到京城，把烂摊子留给继任者徐广缙。这种做法分明就是小人行径，莫非耆英心虚，说的就是保全自己，那所谓君子误事说的应该是林则徐。

这笔账咸丰记在心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耆英再度“出卖”国家利益，咸丰干脆一口把他赐死。

道光朝最大的弊病是暮气沉沉，大家都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方针，没有人会提出实质性的问题，更没有人会说一些让皇帝不高兴的话。咸丰做皇子时就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不理解道光为什么要那样，也许咸丰直到死都没有明白，因为他死得太年轻了，才三十一岁。如果他活到道光的岁数可能就明白，对一个最高领导者来说，有时候朝政振作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切都符合自己的心情，自己能够很舒服很快乐地面对每一天，不会有人在耳边聒噪，说一些破坏心情的话。

咸丰下达求言诏不久，大理寺卿倭仁对用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倭仁说的多少有些道理，我们不妨总结一下：

一、就性格来说，君子看上去木讷笨拙，小人看上去机巧奸诈，君子淡定，小人急躁。

二、从胸怀来看，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

三、在志向方面，君子志存高远，以国家元气为重，小人注重私利，以敛财升官为重。

四、从气质上说，君子刚正不阿，小人善于揣摩，阿谀逢迎。

五、对待君主时，君子敢于直谏，小人却百般奉承。

六、在写奏折时，君子动辄提醒人君要警钟长鸣，而小人却百般歌颂，让人君消磨斗志。

倭仁的这段分析大体说中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但是人善于伪装，光有理论肯定不够，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咸丰求言也是有限度的，对于那些将批评的矛头直指自己的官员，他大动肝火，将奏折扔在地上。所以说，叶公好龙容易，真心爱龙难。

成立智囊团

咸丰急切地想补救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为了重振大清，他首先

罢免那些手握实权但不干事的权臣，接下来就是成立自己的智囊团了。

咸丰首先要提拔的人是林则徐，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爆发，咸丰将镇压的任务委托给林则徐。幸或不幸的是，林则徐在前赴两广总督的任上病死。

咸丰提拔的第一个智囊是祁寯藻，他是嘉庆十九年的进士，当过道光、咸丰、同治的老师。在道光朝，祁寯藻已经当上了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和户部尚书。作为一个对外政策的强硬派，他极力反对穆彰阿等人的妥协政策。祁寯藻还是一个诗人大学者，他保举了一大批寒门士人，在仕林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他更多的是一个文人，并不是一个有魄力的改革家。

咸丰提拔的第二个智囊就是他的恩师杜受田了，杜受田在咸丰二年就已去世，所以他到底有几斤几两很难说清楚。杜受田工于心计和谋略，有一定的才能，咸丰即位后，奉他为帝王师，加封太子太傅头衔，兼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杜受田相当于当朝宰相，咸丰感于他的拥戴之功，对他言听计从。杜受田掌权后，也确实做了一些好事，他重新启用了在鸦片战争中获咎的林则徐、周天爵等人，让他们镇压太平天国。周天爵才具虽然一般，但确实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挖空心思剿灭太平军。

杜受田死后，咸丰心里很空虚，感觉失去了臂膀。

在咸丰提拔的这帮人中，肃顺是最有胆识的一个。肃顺是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七世孙，在咸丰朝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当然时人对有一些偏见，这是难免的，人们对一个被扳倒的铁腕人物是不会有好语气的。

肃顺这个人极为爱惜人才，尤其重用汉人，常能做到礼贤下士。咸丰用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一扫官场陋习，肃顺这个人做事雷厉风行，做事刚猛，头脑又特别精明，对腐化堕落的八旗子弟态度很严厉。肃顺虽然是满人，但他好像非常看不惯满人，经常说八旗子弟的坏话，反倒是极为欣赏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些人。在对外关系上，肃顺跟林则徐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清史稿》对肃顺的评价相对客观，认为他是一个对大清有重大贡献的重臣。

文庆也是咸丰非常重视的一个智囊，文庆是满洲镶红旗人，在道光年间，文庆当上了军机大臣和尚书等职，后来又被免职。咸丰登基之后，重新启用他，文庆不仅官复原职，还被逐步加升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

在咸丰看来，文庆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在重用汉臣这块，文庆跟肃顺是一致的。文庆重用汉臣的理由很朴实，他说他们都是从民间走过来的，深知百姓疾苦，不像我们这些身居庙堂的人只会空谈。文庆的主要任务是在人事这块给咸丰提建议，咸丰六年，文庆去世，临死前他还对咸丰说，哪些督抚不堪胜任，应该换掉，确实是不辱使命的一个大臣。

刚开始这段日子咸丰确实是非常卖力的，很想有些作为，后来逐渐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跟他的祖父嘉庆、父亲道光一样，顺其自然吧！反正我是皇帝，活着得好好享乐才算便宜，为了国家励精图治，反而不讨好，太亏了。

一帮不争气的督抚

咸丰是清朝罢免督抚最多的一个皇帝，很多督抚往往是上去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赶了下来。不是咸丰心理变态，确实是当时形势特别严峻，洪秀全一闹，整个中国都不安分。咸丰急切地希望将叛乱之火扑灭，所以频繁提拔一些督抚，这些督抚往往让他失望，只好“落马”了。

咸丰登基不久，广西巡抚郑祖琛就发来一份奏报，说自己成功地镇压了一批造反的逆贼。这些“逆贼”并不是洪秀全的人马，而是湖南新宁县遭遇水灾的农民，一些没饭吃的农民起来造反，最后发展到五千人。咸丰让湖广总督裕泰亲自剿匪，没想到裕泰非常无能，不但镇压不了，反而损失不少士卒。

咸丰一生气，下令将湖南提督英俊和湖南巡抚冯德馨革职，让向荣和骆秉章接替他们。咸丰这么做是想给裕泰一次机会，裕泰终于珍惜了这次机会，配合郑祖琛、向荣、骆秉章等人剿灭了叛乱。咸丰给他们分别加了一些头衔，大家高兴之余万万没有想到好戏还在后头。

广西会党发展得非常快，尤以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为最。不久，有人参奏广西提督闵正凤毫无治军之才，整天只知道喝酒应酬。随着广西形势的恶化，咸丰一怒之下，将闵正凤革职，发配边疆，巡抚郑祖琛革职回家。

其后，咸丰将镇压起义的重任交给李星沅和周天爵，任命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向荣为广西提督。可惜这三个人合不来，李星沅主动辞去钦差大臣职务，准备回家养病，不想中途病死。周天爵办事不力，免去广西巡抚之职，即刻回京，重新任命

邹鸣鹤为广西巡抚。

后来，拜上帝会一发不可收拾，咸丰任命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督办剿匪事务。赛尚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却没有扑灭太平军，反而让其突围。咸丰很生气，但不忍罢免赛尚阿，便让巡抚邹鸣鹤背了黑锅，由劳崇光接替广西巡抚。

到后来呢，形势更加恶化，赛尚阿自己也扛不住了，咸丰再也受不了，将赛尚阿革职下狱。赛尚阿走后，咸丰让徐广缙接替他，咸丰指望这个曾经的牛人能够挽回败局。没想到，今非昔比，今天的徐广缙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徐广缙了。他做事拖拖拉拉，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那边打得昏天黑地，他还一路慢悠悠地游山玩水。

咸丰三年，太平军围困长沙，攻陷岳州，咸丰逼急了，下令将徐广缙革职查办，定罪为斩监候。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太平军又势如猛虎，没多久，咸丰又重新启用赛尚阿和徐广缙。

湖南巡抚骆秉章也被革职留任，以观后效。不久，云南巡抚张亮基署理湖南巡抚，后又署理湖广总督。太平军北伐时，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阻止北伐军，骆秉章再任湖南巡抚。太平军势如燎原之时，湖北巡抚龚裕为了避难，称病请辞。咸丰刚开始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觉得不太对劲，如果答应了他，那以后遇到困难，所有督抚都辞职，大清不就完蛋了，遂把龚裕从重治罪，发配到新疆。

常大淳接任湖北巡抚，不幸的是没多久就被太平军击毙，看来龚裕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发配总比死了好。接着，崇纶接任湖北巡抚。

咸丰三年，太平军进入安徽，安徽巡抚蒋文庆被杀，周天爵和李嘉瑞先后接任安徽巡抚。后来，李嘉瑞被革职，江忠源替代他。当年十月，江忠源在庐州战死，福济成接任安徽巡抚。

太平军拿下武昌后，陆建瀛担任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陆建瀛是个软货，还没开战先自逃跑。江宁（南京）将军祥厚接替他。南京城攻破后，祥厚殉国。

在咸丰朝，最幸运的是朝中大臣，坐在朝堂之上，指手画脚，而且还酒足饭饱没有生命危险。督抚们却是提着脑袋干活，不是被太平军杀掉，就是被咸丰革职查办。这是由形势决定的，在雍正朝做朝臣远不如督抚划算，督抚是地方上的大头，权力很大，说一不二，雍正极为仰仗这些督抚；在朝中做官反而很危险，一不小心就得罪了雍正，吃不了兜着走。

财政红得刺眼

嘉庆上台之后，就感觉到财政的压力。到了道光更是如此，好歹道光节衣缩食，渡过了重重难关。到了咸丰朝，清廷的财政已经亮起了红灯。

鸦片战争后，中国流失白银三亿多两，虽说中国地大物博，但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道光三十年，全国欠政府的税银有八百六十多万两。

咸丰即位以后，国库里的银子只够五个月的开支，还是正常的开支，碰到战争等肯定是不够的，内务府的银子就更少，只有四万多两。越穷破事越多，农民起义肯定是要镇压的，但咸丰拿不出这个钱啊，怎么办？从各省的藩库里抽。但这么做是会引起连锁效应的，地方缺少银两，自然会导致货币紧缺，对各省的经济发展不利，经济发展不好，上缴的税收就少。税收一少，镇压就更难，地方政府就会陷入半瘫痪状态，总之是一头乱麻。

别说咸丰平庸，纵使有雍正之才，估计也难以应付这种局面。

货币紧缺，咸丰想到发行纸币，这事就是由肃顺来办的，这种做法当然不能根治财政问题，但也只能先治好眼前病再说。

咸丰和大臣们想到了很多增加收入的办法，比如鼓励大家捐监，在国内外借债，增加税收，削减官员薪水，减少支出等。这些做法全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有些做法会直接导致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就拿捐监来说，在咸丰朝已经大大贬值了。捐监的本质是清廷出售“国子监监生”这个职务，百姓花钱买。人都不是傻子，大清的股票在不断下跌，没有人愿意按原来那个价格购买了。所以咸丰不断地打折，低价卖出。

当时没有国债的说法，但咸丰向国内百姓借债本质上就是发行国债，全国都有一些富人，要向富人借钱，都给他们发一些凭证，这些凭证就是国债的前身。清廷强制性地给一些富人发票印，承诺按期归还。政府伸手要钱，没人敢不借，不借就会受到迫害。除此之外，清廷还向国外的商人借债，然后给他们一些利益。

加重税收后，老百姓的负担更重了，加上这些年天灾不断，所以我们很能理解太平天国为什么发展那么快。

真正解决财政危机的还是厘金制度。厘金说白了就是对商人强制征税，官兵们守住陆路关卡和水陆要冲，对来往的货物按价值征税，

用我们通俗的话说这就是买路钱，在当时又称为行厘。还有一种是对开店的商人征税，这种称为坐厘。

抽厘来钱确实非常快，但无疑也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商业税重了，商品的价格会更高。但当时也没有办法，因为朝廷拿不出军饷，只好让各省自行解决，所以中央政府允许各省抽厘，抽到的钱不用上交，怎么花由地方自己决断。各省抽的厘金没有统一标准，有的抽百分之二十，有的抽百分之五，根据各自的需要吧！

必须说明的是，抽厘是杀鸡取卵的政策，但如果没有这些厘金，清廷真的很有可能完蛋。太平军北伐之后，咸丰曾经有亡国的预感，对杜受田的儿子杜翰说了这样的话：“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现在贼已渡河，明末的悲剧只怕会重演，如果不幸真的发生，朕就是大清的崇祯了。”

不靠外国人

国内一片燎原之时，不少督抚想请求英国人和法国人帮忙，打算借外国的刀杀中国的“贼”。两江总督何桂清和江苏巡抚王有龄主动跟外国人联系，希望他们能高抬贵手，把洋枪洋炮对准中国起义的农民。

英法联军都是唯利是图的强盗，有生意做，他们当然不会拒绝。现在关键是咸丰的态度，咸丰多少有些骨气，他觉得这种想法荒谬无比，列强是中国的敌人，我们就是再难再穷也不能向他们低头乞怜。

上海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纷纷抱怨你咸丰不来救我们，又不允许外国人帮我们，看来我们只能自救了。他们凑钱请了一批洋人雇佣军为他们打仗，造成既成事实后，他们希望咸丰能够批准，从而将雇佣外国军队合法化。

咸丰非常生气，批复说：“如果向外国借兵，只会让他们更加轻视我们，后患无穷。”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的两天，法国公使葛罗向恭亲王奕訢主动提出愿意为大清剿匪。奕訢大为欢喜，他是极力主张借洋人的枪灭掉长毛的。咸丰此时也有所动摇，下诏各省督抚讨论。

主张借刀杀人的主要是江南的一些官员，这可能跟江南遭受的破坏最大有关。反对派以漕运总督袁甲三为代表，袁甲三是河南人，袁

世凯的叔公，他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荣辱观很强。第三种是模棱两可的中立派，以曾国藩为代表，曾国藩可能是怕洋人抢走了自己的功劳，如果自己被太平军干趴下了，那时候他肯定是赞同借刀杀人的。

最后，咸丰接受了袁甲三的意见，公开表扬袁甲三深谋远虑，说就算洋鬼子剿灭了长毛，以后也会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就像他们在印度干的那样。

总之，综合各种考虑，咸丰拒绝了外国人的“援助”。

咸丰这么做让列强很没面子，列强既然是列强，难免就霸道些，热脸贴冷屁股让他们有些恼火。感情受伤是次要的，利益没得到才是无法忍受的。

误事宠臣叶名琛

一个太平天国足以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时候如果洋人能够厚道一点，情况或许不会糟糕到这个地步。咸丰万万没有料到列强会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很无辜：我什么时候招惹你们了？

这事如果真要怪的话，就怪咸丰的宠臣叶名琛。

论年龄，叶名琛可以当咸丰的老爸，大他二十二岁。叶名琛一生非常顺利，二十六岁考中进士，之后做官一路飙升。叶名琛这人既有实干才能，又会文章之术，还懂理学。这样一个人，升官想慢一点只怕都难。

道光赏识叶名琛，咸丰就更加赏识他了。当年英国人要进入广州，就是叶名琛和徐广缙死扛着，最终赢得了胜利。这一点，咸丰牢记在心里。徐广缙被派去征剿太平军后，叶名琛顺理成章地成为两广总督。叶名琛也确实实至名归，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平定了广州的凌十八起义，粉碎了凌十八和洪秀全会师的计划。

叶名琛对外能让英国人服帖，对内又能干净利落地消灭流寇，在咸丰眼里，他简直是个全才。

不久，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天地会起义，人数发展到十万，叛军一路攻城略地，包围了广州。叶名琛手中可用的兵只有一万人，处境是很艰难的，但叶名琛并没有开口向咸丰求救，甚至都不伸手要钱，居然自己摆平这些人，把他们赶出广州。

在叶名琛的治理下，广州的战火终于熄灭。你说咸丰能不高兴

吗？广州人向来喜欢闹事，全国各地都乱了，这里还不乱，全国各地都伸手要钱，唯独叶名琛好像从不缺钱花一样。叶名琛，你是好样的，多一些你这样的人，国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咸丰接连加封叶名琛为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把广州的事情放心地交给他，自己不闻不问。叶名琛呢，不仅把广州治理得秩序井然，还不断地支援湘军，为湘军采购军火。

在清朝，两广总督相当于外交大臣，叶名琛负有双重使命。在当时的情况下，外交是最难处理的。

叶名琛失败就失败在外交这块。

1854年4月25日，英国公使包令要求会见叶名琛，谈论修约的事。所谓修约就是英国单方面提出霸王条款。叶名琛虽然骨头很硬，但是他不懂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他的外交策略非常简单，就是避免跟外国人接触，对于外国人的要求尽量用温和的语言拒绝，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包令想进入总督衙门跟他谈判，叶名琛自知拒绝不了，表示不可以在衙门里，只能在城外的酒楼里谈。包令很恼火，坚持要在衙门里谈。

包令看这事没有结果，加上他了解叶名琛这个人是个一根筋的顽固派，决定直接到上海或是天津，跟清廷的其他官员交涉。

叶名琛给咸丰上了一封奏折，大意是说这些洋人就喜欢瞎折腾，皇上您不用担心，这事我能搞定。

咸丰对叶名琛非常放心，认为他一定能驾驭自如，自己都不用给他什么指示。

包令到上海后，跟江苏官员讨论修约的事，咸丰知道后，命令江苏官员把这些事情全部交给叶名琛。这下，英国、美国、法国三国的公使急了，他们在香港召开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跟叶名琛谈的话，绝对谈不拢，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三国公使一起北上，当面跟咸丰谈。

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一看这架势，很担心，加上三国公使派人前往太平天国的控制区，很有可能跟太平天国勾结。吉尔杭阿建议咸丰派出钦差大臣会同叶名琛一起跟外国公使谈判，意思很明显，担心叶名琛搞砸，想削弱他外交的权力。咸丰接到这个奏折后，不喜反怒，大骂吉尔杭阿一派胡言。由此可见，他对叶名琛的重视和信任。

三国公使给咸丰递交了一份密密麻麻的修约，咸丰不懂对外事

务，让他们跟叶名琛谈。

三国公使白忙活了一阵，只好南下回到香港，他们都是识时务的人，谁也没有去找叶名琛。此时，英法两国与俄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没时间找中国麻烦。美国人更聪明了，他们看清军和太平军打得你死我活，到底鹿死谁手还不知道，所以主张多观望一段时间，等他们分出了胜负再找人去谈判。

后来形势的发展超出了叶名琛的预料。

12月7日，天地会的红兵围攻广州，叶名琛急了，忽然想起了英国人包令，希望他能出兵帮忙剿匪。包令也狡猾，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战，英国不愿参与其中，如果非要英国人帮忙的话，最好是在总督衙门好好谈谈。包令觉得这次一定可以入城，便派军舰进入珠江，停泊在广州城外。

叶名琛是怎么反应的呢？他仍然坚持拒绝英军入城，也不同意在总督衙门谈判。两方都僵持住了，过了一段时间，广州城的危情缓解。包令也识趣离开。

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到期，美国会同英法再次提出修约，叶名琛又拒绝了，美国公使又提议北上，包令说，省点力气，回去吧。

美国公使死脑筋，仍然坚持北上，结果还真有些斩获。太平军先后拔掉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忽然有种来日无多的感觉，让叶名琛变通一下，勉强答应他们一两条。叶名琛自认为非常了解洋人，说这样只会激起他们的贪欲，绝对不可以有半分退让。咸丰没办法，只好表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此时，包令正向英国政府申请调集军舰，包令对国会说，不动用武力，修约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此，叶名琛毫无感觉，仍然沉浸在挫辱包令的快感中。咸丰此时也乐得纵情享乐，现在天下还是爱新觉罗的，赶紧抓紧时间喝酒玩女人，再晚了恐怕要喝西北风。

第八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在宫中不停地发脾气，首先他把气撒到耆英的头上，痛骂耆英一顿后，让各部门给耆英议罪。恭亲王奕訢主张将耆英定位绞监候，肃顺则主张立即正法。考虑几天后，咸丰决定让耆英自尽，耆英一死，咸丰心里好受了点。

亚罗号事件引爆战争

亚罗号只不过是一艘划艇，而且是由一个叫苏亚成的中国人制造的，谁也没有想到它居然成为引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苏亚成造了这个划艇后，将他卖给在香港居住了十年的方亚明，这艘普通的小船是中国人造的，卖的也是中国人。怎么就阴错阳差带来灾难了呢？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江面发现了亚罗号，船上有十二名中国水手，官方怀疑这是一只海盗船，所以决定扣押起来，并将水手当嫌疑犯带走。没过多久，船长过来了。这个船长是英国人肯尼迪。肯尼迪向英国领事巴夏礼求救，巴夏礼转告包令。

包令照会叶名琛，让他道歉放人，并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包令还提到中国水师扯下船上的英国国旗，这是对英国的极大侮辱。

亚罗号为什么挂上了英国国旗呢？要知道这是一艘中国船，要解开这个谜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时代。鸦片战争之后，清廷水师的无能暴露无遗，导致沿海地区海盗活动日益猖獗。很多商船为了免受威胁，纷纷在香港注册，向英国人缴纳注册费等，就能悬挂英国的国旗，受到英国海军的保护。

亚罗号曾经在香港注册，领到了英国执照。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英国的执照只管一年，过期作废。事发之时，亚罗号的执照已经过期了十多天。叶名琛以此为由，拒绝了英国方面的要求。

巴夏礼也承认执照过期，但是他把责任都推到清廷的头上，他说亚罗号虽然过期，但不是不想换执照，只不过受清廷水师的阻挠，没

有机会去香港续执照而已，中国水师扯下英国国旗，总归是一个侮辱。

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英国公使包令希望把事情闹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想在浑水中摸几条鱼看看。

叶名琛放人后，英方还不满足，包令要求叶名琛将和约补足，以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并公开道歉。叶名琛表示没有扯英国国旗这种事情，所以拒绝道歉。

随后，包令下令香港的英军出动，准备包围广州城。此时，叶名琛还没有意识到事态可能会扩大。

10月23日，三艘英国军舰越过虎门，攻占了猎德炮台。叶名琛听说奏报后，居然大方地安慰下人：“没事的，天黑了这些洋鬼子自然会识趣离开。”叶名琛还下令水师后退，避免引起冲突。

英军接连攻下了几个炮台，将军队开到广州城下，叶名琛才知道这次他们玩真的了。叶名琛下令中断一切对外贸易，以此逼迫英军撤退。英军不为所动，要求叶名琛出来谈判，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广州，叶名琛没理他们。

英军不耐烦了，开炮轰炸官署，士兵们都逃完了，叶名琛还端端正正地坐在里面，大有殉国之意。英军看叶名琛没有任何反应，用炮火轰击广州城南面城墙，轰开了一个缺口。

29日，一百多名英军冲进广州城内，一百人自然无法占领广州城。不久，英军就退出城，在城外用炮火轰击，保持军事压力。逼迫叶名琛道歉，允许英军进城，叶名琛全部拒绝。

尽管压力很大，叶名琛仍然镇定自若，他鼓励广州军民杀敌，杀死一个英国人，赏银三十两。叶名琛相信他有办法制服这些洋人，只要拒绝通商，他们必定低头。

当然，叶名琛面临的最大的压力还是如何向咸丰交代，总不能跟他说广州城被英军轰破了吧！此时，叶名琛选择了谎报军情，他声称清军两次击败英军。击败还是小事，模棱两可。叶名琛居然说击毙了英军四百多人，围攻广州的英军加起来都没有四百人，他撤出这样的弥天大谎实在是让人心寒。这还不算，叶名琛甚至说击毙了英军的总司令。

叶名琛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已经调集了两万人马，足保广州城无虞，美国和法国方面呢也很稳定，都觉得英军无理，不会支援他们的。

咸丰并不怀疑叶名琛所说的，但他还是很担心事态扩大，让叶名琛不要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尽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其实清军就没有打赢过，只是英军兵力少，无法拿下广州城，最后退到了凤凰岗。英军显然在等待援军，叶名琛却认为自己的计策收到了效果，英军知难而退。叶名琛志得意满地告诉咸丰，全面击败英军。咸丰自然高兴，但也有所担心，告诉叶名琛不要引起大规模战争。

直到广州城外围炮台已经完全被英军占领，叶名琛依旧报喜不报忧。

英国首相巴麦尊正在筹划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派遣额尔金伯爵为远征军统帅，会同法国和美国一起对中国发动战争。

之前，法国传教士马赖在广西传教，被当地官员处死。法国政府要求道歉赔偿，叶名琛一概拒绝，法国方面也在准备对华采取武力。美国方面比较复杂一点，国内正在酝酿南北战争，加上美国对外战争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所以美国没有加入战争行列，但表示在要求修约这事上与英法两国立场相同。

虎视眈眈的俄国

与咸丰同时代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尼古拉一世好大喜功，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

1847年，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西伯利亚总督，负责远东的扩张计划。穆拉维约夫到任后，积极安排向黑龙江一带移民，为以后重新划定边界寻找借口。

1853年9月，俄国与土耳其爆发战争，英国和法国支援土耳其，共同对抗俄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克里米亚战争。

1854年，穆拉维约夫带领两千多人，乘坐八十三艘小船沿着黑龙江而下，据说穆拉维约夫这次还带了两船的妇女。黑龙江副都统胡逊布截住了穆拉维约夫，俄国诈称只是想借道黑龙江，抄近路与英法联军交战。

穆拉维约夫威胁说：“我国跟贵国是睦邻友好国家，你如果还不放行的话，恐怕不是友好的表示吧！”

胡逊布手中兵不多，不敢与俄方发生冲突，只好放行。事后，他才知道这批俄国人原来是到中国领土上定居。到1857年，俄国人三次

往黑龙江运输军民，在这里修建堡垒，屯兵。

清廷派黑龙江将军奕山跟俄国人交涉，奕山是道光的侄子，也是个不肖子弟。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时，他担任靖逆将军，负责与英军作战。但他谎报军情，事后被道光察觉，将他革职圈禁，后来又发配到伊犁做将军。咸丰这次用奕山是希望他知耻而后勇，能够洗心革面，有一番作为。

孬种就是孬种，你不能指望他会突然变得强悍能干，奕山到了黑龙江后，在俄国人的淫威之下，一步步地妥协，并在1858年与俄国人签订《璦琿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送给俄国。穆拉维约夫超额完成业务，受到沙皇的嘉奖，提升为上将，晋为伯爵。

奕山的所作所为咸丰并不知道，当时咸丰正忙于和英法联军作战，哪顾得上黑龙江那边。不过，俄国人倒是自己到北京了，俄国大使彼罗夫斯基到北京要求清廷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咸丰让肃顺跟俄国人交涉，肃顺态度非常强硬，拒绝跟俄国人交流。

彼罗夫斯基很不满，给清廷的军机处递交了一份文件，要求将乌苏里河至海口的中间地划给俄国。彼罗夫斯基还表示，如果清廷能满足俄国人的要求，他们会劝英法联军撤退的。

本来就是多事之秋，哪里经得起俄国人的恫吓，咸丰想，还是忍一时海阔天空吧！于是作出妥协，同意和俄国签订《中俄天津条约》。

俄国得到好处后，胃口变得更大，要求清政府在边界问题上作出回应，肃顺非常愤怒，拒不承认《璦琿条约》。彼罗夫斯基说，你们明明跟我们签订了，怎么现在不认账？咸丰这才知道奕山的所作所为，立即将奕山革职，坚决不承认《璦琿条约》。

彼罗夫斯基在北京的时候，穆拉维约夫继续在黑龙江搞移民，并重新根据《璦琿条约》勘察中俄边界。

咸丰很生气，拒绝了俄国提供的军事援助。这时，俄国“支援”中国的武将伊格纳切夫已经来到了北京。他居然欺骗说自己是代替彼罗夫斯基谈判边界事宜的，彼罗夫斯基也点头称是。就这样，清政府跟一个没有外交头衔的人谈了一年。

双方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璦琿条约》是否有效，肃顺说：“我们已经跟你们签订了《天津条约》，你们还想怎样。奕山是没有资格跟你们签订《璦琿条约》的，他没有政府的授权证书，也没有正式关防，他做出这种违法越权的事情已经受到我们皇帝的惩治。

所以《璦琿条约》是完全无效的。”

伊格纳切夫则表示：“你们皇帝跟臣子的那些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条约已经签订了，就是合法的。”

伊格纳切夫还说：“我说你们皇帝要这么大领土有什么用呢？东北这块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地方对你们没半点用，反而会带来许多麻烦。如果你们给我们，我们就能保障你们东部地区的安全，还能让英法联军退兵。这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情，再说了我们两国可以深入开展贸易，这样不就可以补足你们财政上的亏空吗？”

肃顺说：“别装了，你们真有这么好心，不就是想侵占我们领土吗？东北是我大清的领土，不可能让给别人，别痴心妄想了。如果你们执意要这么做，我们会反击的。”

伊格纳切夫看肃顺态度强硬，屡次要求清廷换一个谈判代表。他当然不知道，肃顺此时已经是朝中重臣，深得咸丰的信赖。

有一次，谈判之时，肃顺大怒，将《璦琿条约》的文本“啪”的一声掷在桌上，对伊格纳切夫吼道：“这几张破纸毫无价值，完全是一纸空文。”骂完之后，肃顺甩袖而去，酷毙了。

伊格纳切夫瞠目结舌，事后向清政府抗议说：“肃顺简直无礼之至，他如此对我简直是藐视俄国尊严，好歹我也是一个堂堂公使啊！我要求你们立即把肃顺撤掉，换上一个知书达礼的大学士。”

咸丰自然不理他，还是由肃顺负责谈判。

1860年5月，沙皇正式任命伊格纳切夫为全权公使，还建议他暂时离开北京，去为中国和英法充当调解人，或许能增加谈判的筹码。

伊格纳切夫在走之前，还给清廷下了一道最后通牒，限清政府三日之内对重修边界一事作出答复。清廷断然拒绝，这个伊格纳切夫也被气饱了，他南下之后，不但没有调解，反而极力怂恿英法联军发动规模更大的战争，还将京城一带的防御情况告诉英法联军。

果然，英法联军杀进紫禁城后，清政府丧失了谈判的筹码，被迫与俄国重修边界，割舍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可怜的叶名琛

这时，世界四大列强英国、法国、美国、俄国联手对付中国，再加上国内有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清朝事实上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

关键时刻，而且这次亡的很可能不只是政府，很有可能是整个国家。

1857年7月，额尔金伯爵抵达香港，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跟中国政府交涉。不过此时印度那边正爆发起义，所以他只好赶往印度，先扑灭后院之火。叶名琛得知此事后，以为额尔金是软柿子，来香港不过是为了虚张声势，现在看吓唬不了人，只好跑到印度去。

叶名琛认为自己这招“以静制动”着实厉害，他相信不管英国人怎么逞强，迟早都会面对现实的。

叶名琛还没高兴多久，额尔金就回到了香港，这时英法联军已经集结在中国近海。

12月12日，开战之前，额尔金最后一次照会叶名琛，提出三项要求：一、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二、赔偿亚罗号的损失和马赖神甫事件的一切损失；三、立即进行修约谈判。额尔金表示，中方必须立即允诺英方的前两项要求，否则联军将攻打广州。

叶名琛丝毫没意识到这是最后通牒，他觉得英国人喜欢吓唬人。要说叶名琛对英国人一点也不了解也不是事实，他还是一个很注重搜集情报的人，他派出了大量的间谍前往香港搜集情报。这些情报虽然很多，但大多都失真了，中国的间谍只拿钱，太不敬业了。

叶名琛拒绝了对方后，十二天之内没见他们有什么动静，叶名琛相信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加上这几天他求神算卦，卦上所言全是大吉大利的话。叶名琛也给咸丰上了一道奏折，声称英国人已经求和，我们随时准备通商，趁着他们求和之际，斩断他们的一切要求，让他们以后老老实实地跟我们做生意。

咸丰收到奏折后，心里大安，心想这个叶名琛真能干。其实，咸丰收到奏折时，广州城已经惨不忍睹。

两江总督怡良从上海人那儿听到了广州的战况，知道叶名琛蒙骗了咸丰，但怡良不敢直接说出真相，因为叶名琛现在红得发紫。他只能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地说出一些事实，果然不出他所料，咸丰完全不信他的话，还警告他不要为外国人造势，更不要扰乱视听，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广东巡抚柏贵上了一道奏折，算是为叶名琛辩护吧，语气和内容完全跟叶名琛一致。所以，咸丰对叶名琛所说深信不疑。

我们一定很奇怪了，叶名琛以前是一个不错的官员，也有大丈夫的气概，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满嘴谎话的人呢？说来这事也不是叶名琛的错，还是体制的问题，用流行的话说，叶名琛的谎言也是善意

的，他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尤其对于自己的对外策略深信不疑，他相信自己迟早会搞定外国人，所以也就没必要让咸丰烦心了。

他 also 知道咸丰这个人没有主见，摇摆不定，一旦说出了真相，他肯定勃然大怒，把自己革职。叶名琛未必在乎这个职位，但是他非常相信，现在全中国能够对付这些外国人的只有自己，如果换了一个人，很可能让大清尊严受辱。

清朝的皇帝对大臣要求非常高，丝毫不能设身处地地考虑别人处境，这也是叶名琛不敢告诉咸丰实情的原因之一。

叶名琛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人，他本来可以做一个好官，但是生活在一个僵化的体制里、一个没落的时代里。这就让他左右不是人，跟英国人议和吧，他就变成了民族罪人，抵抗吧，国破家亡。

人称叶名琛是“六不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从这“六不”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真的非常纠结。不战是因为知道打不赢，不和是出于责任感，不想辜负皇帝也不想辜负民族，不守是因为守不住，越守越会引起规模更大的战争；不死是因为他爱惜生命，或者觉得自己是个人才，死了太可惜；不降是因为投降太可耻，不走是因为他不可以走，也没那个脸逃走。

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出动二十艘战舰、五千七百人的陆军进攻广州。炮弹像雨点一样砸进总督衙门，衙门里的官兵顿时一逃而空，只有叶名琛还静静地坐在那里。叶名琛一边整理文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就这么一阵子，很快就会过去的，生活该怎样就怎样。”

这次，叶名琛失算了。第二天，广州城就被攻破，市民纷纷逃难，叶名琛在呆坐在家里。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大概在想，既然来了，就该面对吧！反正已经有罪之身，没必要逃。这时，叶名琛的部下建议他赶快议和，虽然到了黄河，叶名琛仍然不死心，坚决反对议和，还对大伙儿说：“你们不用瞎担心了，没事的，这些外国佬只是贪财，给他们点钱就没事了，这几天我占卜过了，五天后保管事情平息。”

没等到五天，叶名琛就被英军抓住了。即使被抓住，叶名琛仍然威仪十足，准备和英法大使进行谈判。开始，叶名琛听说自己可能被带回英国，满怀希望见到英国女王后能质问她为什么要侵华。

不过，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英国人根本没打算把他押回英国，而是押往印度。叶名琛是个注重气节的人，他不想吃英国人的粮食，让人准备了一年的粮食。在印度，他就吃自己带的粮食，吃完之

后，绝食而死。

当咸丰收到广州陷落叶名琛被抓的奏折后，他呆住了，愣了半晌后，写下了这样的话：“览奏实深诧异。”

确实，叶名琛报告胜利的消息没多久，广州居然陷落了，老叶成了阶下囚，正常人都接受不了。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叶名琛呢？他肯定不是一个卖国的小人，但是干的事情却直接导致了国土沦陷，让中国卷入对外战争的深渊，从而让咸丰最后逃离京城。叶名琛对这起战争负有很大的责任，对战事的失利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我们不能不同情他。

天津沦陷

对洋鬼子那一套，咸丰是个睁眼瞎。

咸丰把叶名琛革职之后，居然说出这样幼稚的话：“以前洋鬼子憎恨的是叶名琛，现在我们把叶名琛革职了，让柏贵和黄宗汉代理，这两人跟英国人从来就没有宿怨，他们应该不至于为难这两人的。我们可以给英国人好处，只要他们退还广州，允许通商，如果强硬的话，我们就调集兵勇收拾他们。”

咸丰的法子看起来幼稚，但实际上是继承了祖宗的老一套，也就是剿抚并用，恩威并施。清廷对于叛乱者历来采取这两种手段，现在咸丰把英法联军也当成了农民起义，不免让人心寒齿冷。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像所有统治者一样，他们也想恢复秩序，打造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为了防止民众叛乱，英军用刺刀逼着柏贵进衙门复职，和英法总局共同治理广州。也就是说，广州已经成为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咸丰已经管不了广州。

1858年2月11日，英法总局宣布解除一切封锁，英国人和法国人可以在广州自由贸易。

战事到这里，英国和法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本来可以避免升级。但咸丰肯定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他让骆秉章秘密去广东，联系各地官员，组织几万人的乡勇，将英法联军赶出广州城，然后清政府可以出面调停夷人和民人之间的矛盾。咸丰的想法很简单，我们人多怕他干啥，老百姓闹起来，我们政府就可以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这又是传统智慧。

传统智慧不是不好，但咸丰死搬教条，且不说乡勇根本不是联军

的对手。就说你把两国之间的矛盾转化为英军跟广东人民的矛盾，然后自己再充当中间人，这不是发神经吗？

团练虽然组织起来了，但大家一直没有进攻，中国人都聪明，谁也不愿意充当咸丰的炮灰。

更奇特的是，广州战争爆发后，两江总督何桂清主动跟英国人联系，说广州打仗不关我们的事啊，就拿上海来说，跟你们外国人的关系很好啊，我们一切照旧吧，该贸易的贸易，该喝酒的喝酒，该泡妞的泡妞。

何桂清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咸丰，咸丰也点头批准。咸丰的思维是这样的，出了问题就要丢卒保帅，广州既然出事了，就不能蔓延，他恨不得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叶名琛一个人头上。闽浙总督王懿德也效法何桂清，跟洋人通气，希望和睦相处。

洋人有好处，自然不折腾。所以，历史奇特的一幕出现了，广州是交战区，其他地方却歌舞升平，尤其是上海，十里洋场一片繁华。上海甚至成为英法舰队的中转站和基地，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看不到的。

好像这场战争不是英国和中国的战争，而仅仅是英国与广州的战争，真是荒唐到了极点。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者威风八面地来到天津大沽口，他们要清政府六天之内派钦差大臣来谈判，否则将……

此时，咸丰又求助于传统权术，他让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临行前，面授机宜。他告诉谭廷襄，我们要尽量把这四国分化瓦解，让他们互相斗起来，对俄国要友好一点，告诉他们不要帮助他们的敌人英国和法国，同时答应多开放两个通商港口；对美国呢，要想办法羁縻，美国毕竟没有参战，没那么可恶，如果美国提出的条件不过分，可以答应他们；对英国和法国口气要狠一点，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蛮横。

咸丰本想分化四国，结果毫不管用。咸丰没办法，只好换一套招数，实行两手政策。一方面对他们的要求完全拒绝，只同意酌量减少点关税，另一方面又要谭廷襄避免决裂。谭廷襄也是人，怎么可能既拒绝别人，又让别人心平气和。

谭廷襄都快疯了，心想横竖不如战死，咸丰又警告他，千万不可开战。

看到谈判没希望，四国决定攻占大沽口，还是用武力说话。1858

年5月20日，英法两国发出最后通牒，让清军两个小时以内交出大沽口，清军不同意。两个小时后，英法联军就占领了大沽口炮台。

5月26日，天津沦陷。5月30日，英法联军再次发出威胁，要求清廷立即派出全权大使谈判，否则将进攻北京。

听到这个消息，咸丰吓坏了。大沽炮台是清军北方海口兵力最强的一个炮台，守军有三千人，后来咸丰又增派了六千人。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落入洋鬼子的手中呢？

咸丰万万没有料到洋鬼子的火力会这么猛，他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让他这次给洋鬼子一点甜头尝尝，不能再过分强硬。

不久，惠亲王绵愉建议咸丰派耆英去谈判，咸丰秘密召见耆英，让他前去天津，协助谈判。

咸丰所以这么做，还是中国的传统智慧，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耆英是有名的妥协派，让妥协派做好人，让强硬派做坏人，希望能捞点便宜。

结果，他又失望了，咸丰真悲催，他辛苦那么多年，学到的知识全派不上用场。耆英很悲剧，洋鬼子们也看透了他，知道他这个人表面妥协，其实是敷衍人。所以，耆英到了会场后，洋鬼子对他破口大骂。一个老年人承受这种侮辱，情何以堪，耆英差点晕倒。两天后，他就返回北京。

跟美国和俄国还好打交道，签了天津条约后，他们也消停了不少。倒是英法的态度非常强硬，英方提出了五十六条条款，并告诉桂良一字都不能修改。咸丰听说英国这么强硬，也逼急了，准备决裂开战。

桂良是个明白人，他知道真开战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大清很可能完蛋，就私自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

桂良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咸丰，并对他说，现在没办法了，只能用委曲求全的方式顾全大局。咸丰无奈，只好在条约下签了“依议”二字。

公使驻京问题

条约签订之后，咸丰的内心深受伤害，一个受伤害的皇帝是需要拿人来发泄的，发泄对象自然是那些“办事不力”的大臣。

咸丰在宫中不停地发脾气，首先他把气撒到耆英的头上，痛骂耆英一顿后，让各部门给耆英议罪。恭亲王奕訢主张将耆英定位绞监候，肃顺则主张立即正法。考虑几天后，咸丰决定让耆英自尽，耆英一死，咸丰心里好受了点。

除此之外，镇守天津的一些提督和都统也被判为绞监候，秋后处决。

英法联军虽然暂时稳住了，但咸丰担心他们随时都可能打过来，命令老派将领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主管京城一带的防务。僧格林沁统帅的八旗军是清军的精锐之师，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立下了大功劳。

英法联军要求得逞后，也离开了天津。僧格林沁到天津后重修炮台，在大沽炮台增设一百多门大炮，并布置了一万多名守军。咸丰给僧格林沁一道密旨，说如果洋人不老实，可以偷偷袭击他们，然后说是乡勇干的。接到这道密旨，僧格林沁哭笑不得，觉得实在不好执行。

在《天津条约》中有一条是咸丰无法忍受的，这就是公使驻京问题。公使驻京是当时西方国家的一个惯例，但咸丰不懂这些，他觉得这是洋人骑在头上，待在京城给自己施加压力。其他的割地赔款都没这个重要，最可气的是条约中还规定，公使见到中国皇帝时，只需按照西方礼节三鞠躬就可以了。在清朝皇帝看来，不行三跪九叩大礼乃是对大清帝王的大不敬。

公使驻京其实不涉及实际利益，这虚的东西恰恰是咸丰最为看重，身为谈判代表的桂良就在这上面大做文章，要求英国政府让步，公使驻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上海、广州等等。

老外都很现实，心想驻在哪里不都一样，没必要为这个问题搞僵，再说了，北京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公使驻京也不安全。

大沽口胜利

僧格林沁巩固海防是好事，不过巩固过头了，大沽口到处是炮台和障碍，根本无法成为通商港口。僧格林沁上奏咸丰，让洋人从大沽口以北三十里的北塘靠岸通商。

奏折还没到达咸丰那儿，英国舰队已经抵达大沽口，他们要求撤去障碍物。

直隶总督恒福让英军在北塘登陆，英军置若罔闻，强行闯入大沽口。

在咸丰眼里，什么条约全都是废纸一张，正如桂良曾对咸丰说的：“我们现在跟英法两国签约，皇上不必当真，不过是废纸几张，目的只是让他们退兵。将来如果翻脸，皇上只需要把奴才几个人治罪，这些条约就变成了废纸。”

1859年6月25日，英法舰队自己清楚大沽口水域的障碍，僧格林沁看到这一幕，让全军戒备，不要轻举妄动。虽然清军大炮黑洞洞地在前方，但英法联军丝毫不慌张，仿佛是在海里捞鱼一样。这也难怪，这些清军不堪一击已经是他们头脑里的共识。

当天下午两点，炮声响起了。到底是哪一方先开炮，现在还搞不清楚，不过事实明摆着，是英法联军擅自闯入中国军事禁区，所以理在我们这边。

英法联军已经习惯了清军的无能，万万没有料到这次清军好像有点不一样。僧格林沁不愧是一个老将，第一炮就射中了对方的旗舰，英国海军司令何伯当场受伤。

双方开始了激烈的炮战，联军看占不到优势，便登陆进攻，结果被清军挫败。后来美国也加入战斗，还是没效果。从下午一直打到日落，联军终于狼狈不堪地败走。这一战，清军击沉敌舰三艘，重创三艘，击毙敌军484人。

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对外战争中第一次取得胜利。收到捷报，咸丰的心情复杂，一方面是出了口恶气，感觉舒畅很多，另一方面又担心战火扩大，局面难收拾。

胜利归胜利，咸丰还是很理智的，现在正好是恩威并施的时候，咸丰不想事态扩大，下诏让英法两国公使早日进京交换条约。没想到恩威并施这套对老外根本不管用，他们竟然不理，率领舰队南下。

倒是美国人趁机浑水摸鱼，到北京和清廷交换条约，本来美国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但现在英法两国不干，清廷也就给美国一次机会，其实是希望英法两国知趣点。

大沽口的胜利让咸丰产生了一种错觉，他觉得清军的实力还是很强大的，之前之所以经常失败是点将不当，换上一个将领结果完全不一样。

怎么打都是输

1860年是个灾难特别深重的一年，这一年是咸丰人生路上的倒数第二年，也是他执政的第十年。

刚开始的时候传来的都是好消息，袁甲三在安徽成功地击败了捻军，湘军也接连挫败太平军。更喜的是两江总督何桂清发来的奏折，英法两国已经失和，英国和美国也闹起了矛盾，法国与西班牙也准备开打。

咸丰还没高兴多久，忽然心脏被人踩了几脚。

3月19日，李秀成攻下杭州。5月6日，太平军再度攻破江南大营。接着，江南等富庶城市接连沦陷。咸丰本来最讨厌曾国藩，最疑忌曾国藩这种人，迫于无奈，只好给曾国藩一个尚书头衔，命他署理两江总督。

咸丰的意思很明白，曾国藩你这个老狐狸，赶快去把江南收复回来。哪知道曾国藩按兵不动，曾国藩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其道行远不是咸丰能够比的，他统筹大局，自然有自己的战略。咸丰瞎指挥，他当然不同意，如果真按咸丰说的去做，失败了倒霉的还是自己。

咸丰看曾国藩不听使唤，以为他是嫌尚书头衔和署理两江总督不够拉风，故意闹情绪。想到这里，咸丰恨不得踹曾国藩两脚，但他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封曾国藩为正式的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主管江南军务。

没想到曾国藩仍然不听指挥，居然丢着富庶的江南不管，全力围攻安庆。咸丰心里那个焦急我们就不用说了，他觉得曾国藩这个人有异心，手握重兵，显然有独霸一方的欲望，吴三桂殷鉴不远，不过今非昔比，咸丰丝毫不敢拿曾国藩怎样，因为他的麻烦实在太多了。

上次在大沽口吃了败仗，英法联军一直扬言要报复。咸丰调集了近三万的兵力加强北方的海防，大沽口驻军一万。英法联军真的过来了，而且军队规模空前，英国派遣了两万人，法国派遣了七千六百多人。

战局情况如下：

4月14日，英军占领定海。

5月27日，英军占领大连。

6月4日，法军占领烟台。

6月18日，英法联军进入渤海湾。

6月26日，英法正式对中国宣战。

由于上海方面跟英法两国关系很好，加上一些富商愿意出钱，两国公使居然抽调了一千六百三十名英法联军保卫上海。换句话说，如果侵略军打到了上海，他们很可能会与自己人交手。有钱能使鬼推磨，说的一点不错。

咸丰意识到形势非常严峻，下令僧格林沁不可以首先开炮。

8月1日，英法联军一万七千人在北塘登陆，直隶总督恒福要求会见英国公使，让他们进京换约。但两国已经完全不理睬，这也难怪，别人的军队都已经出动了，还怎么谈，动用一支远征军也是要花费巨资的。要谈只能在战争之前或之后谈，战争之中没法谈。

僧格林沁知道这一战凶险无比，决定以身殉国。咸丰得知他的决心很担心，他还指望有一天逃亡龙兴之地时僧格林沁能保驾。他告诉僧格林沁，一定要爱惜生命。

事实证明，英法两军一旦登陆，僧格林沁也不是对手。幸好咸丰有言在先，逃命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了。

8月23日，侵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天津。

咸丰看形势不对，立即让桂良组织谈判，承诺答应天津条约的一切条款，并增加赔款。没想到洋人不买账了，拒绝谈判，一定要打，而且要往北京打。

英法联军到达通州时，咸丰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出面谈判。载垣不辱使命，洋人开出的一切要求他都答应，只求对方能退兵。别说这招还真管用，洋人心想，别人都这样了，总不能逼人太甚吧！眼看战争可以结束了，没想到中途杀出了个巴夏礼。

巴夏礼提出一个在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附加条件，要求皇帝亲自出面递国书，盖玺时英国使者必须在场。咸丰对此非常敏感，亲自见这些洋人难免涉及礼仪问题，而这些洋人是不可能三跪九叩的，到时自己岂不颜面扫尽。

谈判就因为这个原因破裂，不过还好有僧格林沁，他率领两万精锐在张家湾围歼联军四千人的先头部队，结果大败，后来又在通州吃了败仗。总之，怎么打都是输。

僧格林沁知道这次麻烦大了，建议咸丰先到热河避难。咸丰是个聪明人，僧格林沁一说，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皇帝逃跑始终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咸丰却婉转地说自己要御驾亲征。逃跑说成是亲征，可见中国语言之魔力，南极到北极之间只要一个词语就能搞定。

很多大臣猜到咸丰的心思，他们坚持认为不能逃跑，必须留在北京，大臣们还举了澶渊之盟和土木之变的例子，用史实强调亲征的好处和逃跑的危险。皇帝一逃跑，谁还有斗志，大臣们说的也有道理。

在面子和性命之间，还是面子重要。

圆明园劫难

北京全城的百姓都在看皇帝的态度，大家已经作了逃跑的准备，正看紫禁城那边是什么反应。很快，紫禁城里传出消息说皇帝准备逃难，皇帝都逃了，老百姓干吗不逃呢？

大臣们一看这形势，纷纷上奏，请求咸丰留下来，甚至要求他从圆明园移驾到皇宫，以此安定人心，鼓舞士气。咸丰根本听不进去，不过这时朝野上下都阻止他。

根据《翁同龢日记》的记载，咸丰的七弟奕訢听说他要出逃，跑到咸丰面前痛哭流涕，请他不要逃跑，还求他让自己带兵跟敌人决一死战。五弟奕谔握着奕訢的手说：“七弟说的没错，皇上，请三思啊！”这时，军机大臣们在一旁跪地齐呼：“请皇上留下来。”

咸丰实在没办法，只好下令暂不亲征，留守北京。僧格林沁这时也给咸丰发来一封奏折：“如果奴才们真的完全抵挡不住了，皇上再‘亲征’吧，奴才相信那时肯定还是来得及的。”

僧格林沁也算是老将了，抵抗不可谓不用心，怎奈敌人武器太先进了。

9月22日，咸丰觉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这天上午十点，咸丰一行人从圆明园后门出发，从后门逃走自然有些狼狈。咸丰走的时候一点也不从容，据说连生活必需品都没有带。在圆明园里，咸丰只喝了几碗小米粥，便与大家挥泪告别。

9月24日，英法联军占领通州；9月26日，大军开刀朝阳门外。咸丰在出发前，号召各路人马进京勤王，但这些人到达北京，至少要一个月。

恭亲王奕訢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留守北京，他希望英法联军能谈判，化干戈为玉帛。奕訢手中有一个筹码，这个筹码便是英国领事巴夏礼。在开战之前，清军抓住了巴夏礼，把他关进了监狱。这时候，东西方文化又产生了误解，奕訢把巴夏礼看成是人质，逼迫英法联军退兵。

英法联军让他放了巴夏礼，才可以谈判。奕訢错误地认为巴夏礼这个人非常重要，他不明白英国的制度，也不明白巴夏礼的职位，他只是根据中国的思维方式认定这个人肯定是个位高权重的人，否则英人不会对他这么在乎。他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英国人在乎这个人性命不代表这个人就非常重要，事实上，巴夏礼虽然是个人才，但对于英国实是个无关紧要的人。

英国人逼得越紧，奕訢就越觉得这个人重要。法国人心想，那是你们的事，跟我们没关系，总不能因为你们要人耽误我们发财吧！这么一想，法国人率先进入圆明园。

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劫难开始了。

圆明园又被称为“万园之园”，是世界文明史的奇迹，集中国园林艺术之精华。今天我们只能看到它的残章了，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当时还是个一般的园林，赐给了后来的雍正皇帝。雍正即位以后，把办公的地方搬到圆明园，花费巨资扩建装修。到乾隆时，圆明园才正式修缮完毕，占地三百五十公顷，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园林。在圆明园中，西洋风格的建筑有十三公顷，占全园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其余为中国式园林。

圆明园不仅建筑精美，更收藏有大量的文化瑰宝，所以又被称为“万园之园”。自雍正开始，清朝五代皇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圆明园渡过，这里风景之美可想而知。

据说在一年前咸丰曾经做过一个梦，梦中一个白胡子老者告诉咸丰，圆明园不久会遭遇大劫。老者是圆明园的土地神，他告诉咸丰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这块地方，所以请求辞去职务。梦里，咸丰以为老者是嫌官职低，便承诺给他封高官。哪知老者飘然而去，再也找不到。

这个传闻不知是真是假，但是后来人们确实发现土地神被赏了二品顶戴。

10月6日，法军对圆明园进行了第一轮抢劫。这时，英军还在和清军交战。10月8日，在英军的威胁下，清廷官员释放巴夏礼。10月10日，英法联军让清军交出安定门，奕訢只能照办。此时，英法联军完全控制了北京城。

一位法国伯爵见证了这一切，这位伯爵是个贵族，所以难免有些高贵气质，他似乎看不惯法军对圆明园的强盗行为，如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场面：

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不抱任何偏见、却也充满好奇心的旁观者，贪婪地欣赏着这一幕奇怪且令人难忘的情景：这一大群各种肤

色、各式各样的人，这一大帮地球上各式人种的代表，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咒骂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初看起来真像是一个被人踏翻了的蚂蚁窝，那些受惊了的勤快的黑色小动物带着谷粒、蛹虫、卵或口衔麦秆向四面八方逃去。一些士兵头戴皇后的红漆箱；一些士兵半身缠满织锦、丝绸；还有一些士兵把红宝石、蓝宝石和一块块水晶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衬衣里、帽子里，甚至胸口还挂着珍珠项链。再有一群人，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座钟和挂钟，匆忙地离去。工兵们带来他们的大斧，把家具统统砸碎，然后取下镶在上面的宝石……这一副情景只有吞食大麻的人才能胡思乱想出来。

.....

哦，我的天哪！

这位法国伯爵的文字可能有一点点装逼，通篇都在表现自己与众不同与高贵，跟这些强盗不是同一类人。但他毕竟如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场景，所以我们还得感谢他。

英军显得更有秩序，他们是分批去抢劫的，军官先抢，然后再轮到士兵。据说这些老外还挺合作的，在分赃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很文明，也就是说没抢到或者抢少了的人不必担心，大家根据宝物的价值公平分配，最珍贵的礼物留给英国女王和法国皇帝。

据说英法联军撤退时，载运赃物的车队有几里长。

这些强盗本来就是为了利益而来，他们进入圆明园抢劫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不抢倒让人费解。问题是，抢完之后他们干吗要一把火烧掉呢？

这跟项羽、黄巢、张献忠等人是一个德行，不能拿走的就烧掉。西方世界自诩文明国度，他们怎么也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法军统帅蒙托邦将军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们欧洲，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样的豪华相比拟……这些稀世珍宝让我眼花缭乱。”

法国海军上尉巴吕说：“看到这座宫殿的时候，不论受过何种教育，也不论哪个年龄，还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大家所产生的印象都是一样的：压根儿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与之相比，绝对地震撼人心！确切地说，法国所有的王室城堡都顶不上这个圆明园。”

是不是因为这座园林太美了，战争又恰好激发了人灵魂的毁灭欲望，所以他们才烧毁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据说烧毁这场园林的原因是一起外交事故，原来僧格林沁抓住巴夏礼等人时，一共有39个英国人，但是后来清廷释放的时候只有19个人，也就是说少了20个。这20个可能是病死的，也可能是抑郁死的，还有可能是吓死的，英国人却认为他们全都是被虐待致死的。

为了报复清廷的“残暴”，英军决定以焚烧园林的方式报复，他们最开始打算烧毁紫禁城所有的皇宫。后来觉得这么做可能有点过分，搞不好会惹怒整个中国人民，又或是导致软弱的清政府下台，清政府下台后，一旦换上了强势的政府，他们的利益就会受损。英国人还要求法国人一起焚烧圆明园，法国人没那么多愤怒，至少清廷没有处死他们的俘虏，所以拒绝参加。

英国人在焚烧圆明园之前说出了他们的四点理由：

一、圆明园是俘虏们被虐待的地方，就是在那里，我们的同胞被锁链拷起来，残酷的清政府不给他们吃喝。

二、如果我们不严惩清政府，英国就不会满意。严惩，是英国人对人权遭到野蛮侵犯时所表示的愤恨。

三、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求和平、签条约，然后撤军，清政府就会以为他们可以不受惩处地抓捕和杀害我们的同胞，在这点上，我们有必要让他们醒悟。

四、圆明园在皇帝心中极为重要，我们摧毁它只是针对清政府，而不是人民，因为只有清政府应该对这些野蛮罪行负责。

1860年10月18日，英军统帅格兰特派遣一个师的军队烧毁圆明园。京城上空烟雾弥漫，它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历史将会有一段长久的动荡，象征着几千年来帝国的根基在动摇。这场来自海外的浩劫将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转折点，它积极的意义在于把沉睡在专制制度里的人民惊醒。

曾经辉煌灿烂的圆明园，只留下一片废墟。这片废墟告诉我们的不只是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教科书中经常提及的道理，它还告诉我们要想强大必须变革，封建专制是落后的根源。

第九章 风流短命的皇帝

咸丰四年（1854年）秋，丽妃终于怀上龙种，听到这个消息，咸丰非常开心。一直以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丽妃能为自己生下一个皇子，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继承人了。咸丰对丽妃的宠爱越加深厚，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口里怕化了。

风云诡谲的后宫

在大家的印象里，咸丰最有名的两个女人就是慈禧和慈安了，而前者又把后者给弄死了。

咸丰的第一个女人其实是孝德皇后，这个女人是道光钦点的。可惜福薄命薄，嫁给咸丰两年后就因病去世，她死了一个月后，咸丰就当上了皇帝。后来，咸丰感念她的贤惠，追封她为皇后。

咸丰并没有难受多久，作为一个皇帝，他要多少女人就有多少，旧人去新人来。很快，咸丰就开始选秀女了，慈禧和慈安就是这时候进入咸丰的后宫的。

咸丰二年（1852年），终于服满丧期，是时候为后宫挑选一个掌门人了。到底谁能当上皇后呢？说实话，谁也猜不中，咸丰心里怎么想的没人知道。

在后宫中，有一个叫兰儿的姑娘，此人姓叶赫那拉氏。兰儿的曾祖父名叫吉郎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做的官不是很大。在乾隆年间，他最高做到刑部员外郎，嘉庆时当上盛京刑部主事，道光时担任山东司刑部员外郎。兰儿的父亲惠征在道光朝长期担任笔帖式。

兰儿家世虽然谈不上显赫，但也确实出身于官宦人家，是个大家闺秀。

“兰儿”这个小名是家里人对她的爱称，这兰儿在成为太后之前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的，长得挺漂亮，也挺活泼，比较讨人喜欢。

这个兰儿就是后来的慈禧，根据慈禧的女官德龄女士的回忆录，兰儿从小就是一个很有志气的女孩，“她有伟大的梦想，那种梦想是

如此的伟大，有时连她自己也有点害怕……她渴望在一个缥缈的将来，能够突破礼教的限制”，兰儿的心声正是武则天年轻时的心声。

根据德龄的介绍，兰儿年轻时跟荣禄好得如胶似漆，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慈禧掌权期间，荣禄确实很吃香，很混得开。

兰儿刚进宫时身份是个贵人，在她前面有五个等级：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

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封了三个妃嫔，分别是贞嫔、云贵人和英庶妃。不仅没封皇后，连贵妃都没有封。这个贞嫔就是后来的慈安，她的出身比其他人要好，出身于皇后家族钮祜禄氏，父亲是穆扬阿是广西右江道台。从清人的画像来看，慈安长得确实要比慈禧更温柔贤惠一些。

五月，咸丰晋升贞嫔为贞贵妃。咸丰此举很明显，这是立皇后的信号。这时候的慈禧或者说兰儿虽然不能说失宠，但确实有些失意。她忽然发现，宫廷其实比什么地方都残酷，如果你不能得到皇帝的宠爱，那你就什么都不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在花丛中穿梭，自己不光受冷落，还得受其他人欺负。

说实话，兰儿对咸丰有些失望，她原本以为皇帝是一个伟丈夫，见了皇帝才发现，论起英俊潇洒，皇帝还比不上荣禄，而且这个男的还经常让自己伤心。兰儿知道，要想在后宫里生存下去，自己必须有所改变，有所突破，技压群芳，成为皇帝最宠爱的人。

兰儿还沉浸在对未来的思考中时，咸丰已经立钮祜禄氏为皇后了。在咸丰还是皇子的时候，钮祜禄氏就随侍左右，两人感情比较深厚。

钮祜禄氏人品也确实不错，清朝的一些野史作家向来刻毒，但对慈安却笔下有情，称赞她节俭、贤惠、仁爱。钮祜禄氏深得咸丰宠信，中宫掌门人的位子是不会动摇的，但仍然存在风险，皇家里向来母以子贵，如果没有儿子，这个位子就不太牢靠。

遗憾的是，直到咸丰死，钮祜禄氏也没有为他添一男半女。

咸丰的独生子同治是慈禧生的，这是慈禧能够最终掌握权柄的最大筹码。

现在有一个问题，咸丰对慈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喜不喜欢慈禧呢？

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慈禧不是咸丰的宠妃，这种观点甚至认为，咸丰在临死前想杀害慈禧。

从清宫档案的记载来看，咸丰对慈禧并没有特别的宠爱。在咸丰六年（1856年），慈禧生下同治，由懿妃升为懿贵妃，但这不表示咸丰对慈禧情有独钟，只能说她珍惜这个为他带来龙子的女人。咸丰最宠爱的妃子是丽妃他他拉氏，丽妃长得非常漂亮，风姿绰约，咸丰最希望丽妃为他生个儿子。

在宫中庆典中，皇后坐在东边头桌，丽妃坐在第二桌，慈禧坐在西边头桌。由此可见，慈禧跟丽妃是分庭抗礼的。在咸丰死后，那时已经成为太后的慈禧首先对丽妃采取了动作，虽然只是撤销了她的干果盘，但也说明了多年来慈禧一直对丽妃怀恨在心。

在咸丰生前的一些赏赐中，皇后和丽妃都得到了丰盛的一份，但偏偏慈禧没有。从这些生活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慈禧并不受咸丰的宠爱。咸丰病死当天，在他灵前祭奠的只有慈安和琳贵妃，慈禧无缘参加。要知道慈禧可是为咸丰生了儿子的女人，而且这个儿子马上就要当上皇帝了。

种种迹象表明，慈禧可能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受宠。顾命大臣肃顺对慈安一向恭顺，偏偏跟慈禧关系不好，这是否也说明了慈禧的地位。肃顺是官场中的老手，如果慈禧真的地位很高，他不至于蠢到自绝前途的地步。

还有一些野史说同治不是咸丰的亲生儿子，因为咸丰妃嫔众多，却只有一个儿子，难免让人怀疑了。《清稗类钞》是这样记载的：慈禧对自己地位低下深为不满，很想要个儿子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后来听说有个宫女生了个儿子，便找人毒死这个宫女，然后把孩子抱过来，还告诉咸丰说，自己生下这个孩子一个多月了。

这个说法不太可信，因为清朝对皇子皇女管理非常严格，妃嫔一怀孕就得立即上报，哪能生下孩子一个月后才告诉皇帝。写这野史的人肯定不了解宫廷的制度。根据清宫档案的记载，同治确实是慈禧亲生的。当然，有人会说了，就算是慈禧亲生的，也不代表一定是咸丰的种。这个说法我们就不反驳了，理论上好像是有点道理，但谁敢碰皇帝的女人啊？慈禧就算要跟荣禄偷情，也得出宫啊！

另一种观点更为流行，认为咸丰专宠慈禧。这个不难理解，以为慈禧是最终胜利者，掌握了最终的话语权。用慈禧自己的话说：“文宗（咸丰）专宠我”，“初入宫，宫人以我美，咸妒我”，“迨后皇子生，我之地位更巩固矣”。

慈禧能够掌握朝政大权，脸皮自然是很厚的，我们就不必跟她争论了。但是她说的似乎也有点道理，虽然我们从清宫的画像和照片中确实看不出慈禧有多么美丽，只能说比较而言还是不错的。

美国女画家卡尔曾经为慈禧画过像，她是这样描述慈禧的：太后真是一个极品女人，她身体各个部位极为相称，容貌之佳让人一看心生好感，太后的手嫩白纤细，身材苗条，头发漆黑如夜，太后的额头宽阔丰颐，眼睛明亮动人，眉毛弯如柳叶，鼻子挺拔，樱桃小口真叫动人，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不带有任何的勉强态度，气质迷人，再加上她那丰满的耳垂和洁白如贝壳一般的牙齿，笑起来真的是百媚丛生，令人心旷神怡，我若不知道她已经六十九岁，还以为她是一个刚满四十的美妇人呢！哎，世上竟有这样的奇女子，她的美、她的庄严简直是用笔墨无法形容的。

中国人有个毛病，自己同胞说的话不太相信，很相信老外的话，觉得老外很客观。美国人最现实了，收了别人的钱，可能马屁拍得比中国人还响。人都是懂得感恩的，谁给好处，那自然就挺谁了。如果慈禧把卡尔痛骂一顿，扫地出门，估计她又是另一番说法，说这个人简直是个恶毒的母老虎，阴狠歹毒，笑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认为咸丰专宠慈禧的人总结了以下几种理由：

一、慈禧貌美。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基本上都是慈禧老年时的，从她老年的样子中看不出她年轻时是绝代佳人，但肯定还是有些姿色的。当然很多见过慈禧的人都说她确实美貌，如果不美的话，也不至于死后被孙殿英的士兵在陵寝中奸尸。话又说回来，后宫里不可能有母夜叉，慈禧美，可能别人更美，这个不是受宠的必然原因。

二、慈禧聪慧伶俐，善解人意。一个权力女人不可能不聪明的，但聪明也不是受宠的必然原因，很多时候，男人对聪明女人是非常防范和忌惮的。

三、慈禧有文化，代替咸丰批奏章。这个是事实，慈禧在少女时代就喜欢看历史，所以深谙权力斗争。咸丰后来沉溺于女色，自然疏于政事，让慈禧批奏章也是事实，而且他也看到了慈禧的才华。从这里可以看出咸丰还是比较重视慈禧的，但这是不是代表专宠她呢？

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说，重视一个人和喜欢一个人完全是两回事，喜欢跟专宠又完全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咸丰看到了慈禧理政的才能，而他自己又沉溺于酒色之中，慈禧能为他分忧，他很高兴。再加上慈禧也还有姿色，他觉得有这样一个老婆还是很划算的。

要说专宠一个女强人，这是不太可能的，很少有男人会喜欢一个女强人。

逐鹿后宫

咸丰最敬重的女人无疑是皇后钮祜禄氏，最宠爱的女人是丽妃他拉氏。丽妃在后宫的女人姿色最为突出，不用说，后宫的女人都吃她的醋，连皇后也不例外。

咸丰四年（1854年）秋，丽妃终于怀上龙种，听到这个消息，咸丰非常开心。一直以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丽妃能为自己生下一个皇子，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继承人了。咸丰对丽妃的宠爱越加深厚，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口里怕化了。

这一来，后宫里的其他女人就非常失落了，皇后钮祜禄氏心里最难受了。身为中宫之主，她却不能为皇帝添一个儿子，哪怕是个女儿也可以聊以自慰啊！她心里有种自卑感，更有愧疚感，还有危机感。

尽管如此，皇后看到皇帝这么高兴，还是希望丽妃能生下一个龙子，为了太平天国的事情，皇上已经很郁闷了，她多希望他能快乐啊！是的，作为一个女人，有时候必须得付出，尤其是皇宫里的女人。

慈禧可不这样想，她气得要死，入宫以来，她每天晚上都要诅咒丽妃，现在这个贱女人居然怀上了龙种，老天简直是故意跟自己作对。慈禧是个权力女人，但事到如今，她也只能忍受。

竞争已经开始了，慈禧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讨咸丰的欢心，让咸丰频繁地宠幸自己，然后自己也怀上龙种，只有这样才有抗衡的资本。咸丰第一次当父亲，虽然无限宠爱丽妃，但作为一个男人，他还是希望丽妃能顺利地产下龙种。所以，丽妃怀孕这段期间他也不好去骚扰她，免得惊动了胎气。

慈禧瞅准了这个缝隙，故意打扮得花枝招展，妖冶十足，日日陪伴慈禧。这段时间咸丰在政事上很不顺利，太平天国越闹越大，那些大臣们一个个都是窝囊废。慈禧的陪伴让他很放松，很快两人感情加深。

更让咸丰感到贴心的是，慈禧还经常劝咸丰要注意身体，得节省点精力处理政事。咸丰一听，如饮甘露，这女人真贴心啊！

丽妃终于生产了，没想到居然是个女孩，咸丰很失望，今年二十五岁的他多希望有一个儿子啊！丽妃更失望了，原本想着母凭子贵，不断往上爬，现在看来还得再接再厉了。咸丰不是个好父亲，女儿也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就算失望也不应该表现出来，他居然把给孩子

满月的赏赐品减半。孩子小，当然不知道伤心，但丽妃就伤心了。

最高兴的就是慈禧了，这时候她也怀上了，慈禧对肚子里的孩子说：“你要争气啊，别让我像丽妃一样。”

这段时间，咸丰确实对慈禧好很多了，他很希望这次能产下皇子，为大清江山储备一个接班人。慈禧获宠后，后宫的女人们一样是怨声载道，个个眼红嫉妒。

如果说皇后还能容忍丽妃的话，对慈禧她是深恶痛绝的，出于女人的一种直觉，她觉得这个女人不是省油的灯，将来是个很大的威胁。相对来说，丽妃要单纯一点，跟皇后的关系也不是很僵，但慈禧就不一样，她眼珠子一动就让皇后生气，所以皇后很想找个机会惩治她。

虽然咸丰很尊重皇后，但这种尊重让她很受伤，作为一对夫妻，光尊重是不够的，还得生活融洽。这皇后迟迟没有生产，咸丰当然失望，再加上她心情郁闷，沉默寡言，老是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如何能激起咸丰的宠爱？

皇后把自己的怒气全都迁怒于慈禧，但要想惩治这个女人并不容易，毕竟她现在很红，怀上了皇帝的种。皇后想起了祖训，清朝的祖训无非是要勤政爱民，不要荒废朝政沉溺女色。皇后自知已经难讨皇帝喜欢，便经常在他耳边聒噪：“皇上，你要珍惜龙体，现在天下这么不太平，你如果不节省精力，处理政事，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啊……”

“好了，好了，朕知道了，朕已经很烦了，你就不要再让朕烦心了。”

咸丰这人对祖训还是敬畏的，皇后这一说，短期内他还是有所收敛的。没过多久，咸丰又故态复萌，咸丰是非常好色的，而慈禧又恰好很有手段，咸丰肯定会对她厌烦的，只是现在新鲜劲儿还没过，所以还是经常往她那里跑。

皇后一听说咸丰又经常往那个狐狸精那里跑，气得七窍生烟，心想我堂堂皇后，难道还收拾不了一个狐狸精。皇后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她不知道这大清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

六年正月，咸丰接连几天泡在慈禧的储秀宫里，皇后一听，这还了得，你皇上不处理国家大事，光泡妞，终于被我抓到了把柄。皇后于是宣太监，让他拿出祖训。接着，皇后带着太监，威风凛凛理直气壮地来到储秀宫。

赶到储秀宫时，咸丰正和慈禧一起休息，还没起床。皇后心里更加气愤，直接跪下，高声说道：“请皇上起床听祖训。”

咸丰一听到祖训二字，心跳瞬间加速。咸丰立刻爬起来，恳求皇后：“朕马上去早朝，别让朕听祖训了。”

说完，咸丰匆匆离开，皇后阴笑一声，走到慈禧面前：“狐狸精，还不快跟我去坤宁宫。”

慈禧虽明知皇后是醋劲发作，却也不敢不遵命。

到了坤宁宫后，慈禧非常乖，连忙跪地，皇后说什么，她就认什么，总之现在你是老大，要杀要剐随你便。皇后一听，算你识相，但好不容易逮住个机会，怎么能这样轻易放过她，于是大喝一声：“来人呐，棍棒伺候。”

慈禧强忍着耻辱，小心翼翼地护着肚子里的骨肉，默默地说：“孩子你一定要争气，将来娘就靠你报仇了。”

刚打两棍，咸丰忽然赶过来了：“你们这是干吗呢？屁大一点的事，用得着这样吗？”

皇后叹气道：“皇上，这个狐狸精妖媚惑主，如果不教训一下，将来怎么了得。”

咸丰道：“皇后，你也真是的，就算懿妃真有什么不对，她毕竟有身孕啊，你就原谅她一次吧！”

皇后答道：“既然皇上都这样说了，臣妾能不原谅吗？”

这场风波是平息了，但咸丰再也不敢随便去储秀宫了。

失意皇帝纵横欲海

国家越乱，咸丰就越想寻欢作乐，宫里限制又太多，咸丰便想起了汉女。

本来，根据清朝祖制，汉女是不可以入宫的。但咸丰贪慕美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身边的太监了解到皇帝的嗜好，想尽了办法，终于为咸丰弄到几个绝色女子。他们当然不能说这些是宫女，就假装说都是打更民妇。

我们不知道咸丰的金屋里藏了多少汉女，但其中有四个最艳丽的女子，分别叫牡丹春、杏花春、海棠春和陀罗春。听起来有些像艺

名，这些女人确实才貌双绝，不仅长得美艳，才艺方面绝对也是可以上星光大道的。

我们先说说这个牡丹春，她是江苏人，据说在这四春中长得最妖艳。牡丹春离开家乡后经常想逃走，皇宫里确实富贵，可惜没有自由，这牡丹春可受不了，她就喜欢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自由在地甩男人。皇帝却是没法甩的，所以她很闹心。

再说这杏花春，身份比较低微，是一个官员的奴婢。这个官员的大老婆很凶，她受不了这么个狐狸精在府里，所以想办法把她撵走，送进了宫。杏花春进宫后，还记得主人的好，为他说好话，主人得以升官。

海棠春是大同人，一个有名的戏子，在天津唱戏时跟一个男青年爱上了，进宫后整日闷闷不乐，老是想着情人。最后相思成疾，香消玉殒。

陀罗春是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一个寡妇，后来还进了尼姑庵，咸丰一次拜佛的时候看中了。郎有情而妾无意，陀罗春进宫八个月，每次咸丰想临幸她，她就长跪不起，硬是不想让咸丰得手。后来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陀罗春投水自尽。

这四春都住在风景如画的圆明园里，这四个女子中，咸丰最喜欢的是杏花春。牡丹春虽然最漂亮，但心猿意马，老是想“越狱”，碰上这种女人，男人烦还来不及，怎么会喜欢。陀罗春整天一副活死人的样子。海棠春我们就不说了，整天抹眼泪，满脑子都是以前的情人。只有杏花春最乖，毕竟是奴婢出身，懂得伺候主人。

据野史记载，咸丰后来不光荒淫无度，而且脾气非常暴躁，经常酗酒打人。他一撒酒疯，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就要遭殃。在咸丰发怒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能让她平静，这个人就是杏花春。每当这时，杏花春都会过来劝他，咸丰就搂着她说：“你真是朕的开心果啊！”因为这个原因，宫中人给杏花春取了个外号：欢喜佛。

欢喜佛这么讨人喜欢，说明她是一个懂得取悦人的女人，没那么多的脾气。不过她也有一些小缺点，据说她爱财如命。咸丰一发脾气就有人来请她，如果不给足出场费，她可是侍儿扶起娇无力。因为这个原因，杏花春得罪了不少人，她老是敲诈勒索下面，所以圆明园劫难之时，侍卫趁乱把她杀了。

关于咸丰的风流韵事还有很多，据说他后宫里藏有一个民妇曹氏，曹氏自然是个美女，最吸引咸丰的是他那不及三寸的金莲。曹氏是一个寡妇，占有一个寡妇，对以儒家治国的清朝皇帝来说简直是一

种耻辱。可是一旦色迷心窍，咸丰恐怕是管不了那么多的。

还有一个传闻说圆明园里藏有大量的春药，藏有春药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把春药到处乱放。像春药如此私秘的东西自然应该放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咸丰却堂而皇之地摆在茶几上。有一次，咸丰召见晚清名臣丁宝桢，商量军国大事。丁宝桢早早地来到园内等候，一时闲得无聊，忽然看见茶几上有一盘干果，这丁宝桢也是嘴馋，顺手拿起几颗吃掉。

没想到吃完不久，药性便发作。丁宝桢知道自己是误吃了春药，咸丰接见他的时候，他捂着肚子，一下子扑倒在地上，说自己肚子疼，现在没法讨论军国大事。咸丰让他回家，他才灰溜溜地逃回去。后来丁宝桢知道，这是宫廷中最烈的春药。

这些传闻是真是假不好说，俗话说的好，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从正史中我们还是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1855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上奏，请咸丰住在皇宫里，不要住圆明园里。王茂荫话说得很含蓄，但咸丰还是动怒了，他将王茂荫交给刑部议处。

没多久，御史薛鸣皋听说圆明园修理围墙，以为咸丰又要住进圆明园，上奏说现在逆贼还未剿灭，千万不要临幸御园，以免产生荒唐的念头，把咸丰气得不行。

说实话，这些大臣也是为咸丰好，现在国事艰难，正是需要打起精神挽救国难的时候，沉溺女色只会消融人的斗志。再说了女色本来就是一个深渊，若是自制力差，一旦沉迷其中，很难控制住自己的。咸丰不听劝，最后终于送了自己的性命，想来临死前连他自己也会后悔。

喜欢女人无可厚非，一旦过度了势必伤及生命元气，用春药虽然能兴奋一时，却掏空了自己的身体。一个皇帝如此荒纵，国家如何能治理得好。

当然，咸丰也有他自己的痛苦，刚登基的时候他未尝不是一个勤于政事的好皇帝，后来发现就算他再努力，也无法改变现实。一切他不希望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在治国方面他屡屡受挫。所以，他只好从美酒和女人中寻找解脱。

野史作家对咸丰的评价恰到好处：“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

说的一点没错，真是自戕。

第十章 告别这个让人伤心的世界

休息一段时间，咸丰的精神又好起来了。精神一好，他的老毛病又犯了，极想寻欢作乐。避暑山庄的风景不错，咸丰忽然产生了不问世事的冲动，他还信笔写下了“且乐道人”四个字，还准备让人挂在寝宫内。皇后听了非常担心，让他千万不要这么做，让大臣知道了不好。

热河度假

咸丰曾自比崇祯，说天启当亡不亡，崇祯不当亡偏亡。事实证明，他比不上崇祯，崇祯至少比他更有责任心。

咸丰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后，一脸的阴霾。临走之前，他把一切政务都交给奕訢。到了热河之后，他也顾不上处理政事了，整天发脾气。

不过，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在这里比京城舒服多了。在京城他无法轻松，到了热河后，不用处理政事，不用去管外国佬，也不用理那些长毛。只要不去想，他就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这么一想，倒也豁然开朗，反正一切政事都交给肃顺去处理，慈禧帮忙看下奏章。自己呢，乐得轻松。

休息一段时间，咸丰的精神又好起来了。精神一好，他的老毛病又犯了，极想寻欢作乐。避暑山庄的风景不错，咸丰忽然产生了不问世事的冲动，他还信笔写下了“且乐道人”四个字，还准备让人挂在寝宫内。皇后听了非常担心，让他千万不要这么做，让大臣知道了不好。

咸丰倒也快活，每天在行宫里听戏，有时候还自己唱。

肃顺知道咸丰想放松，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专门找了许多漂亮汉女侍奉他。

北京方面的文武百官都希望咸丰早点回来，现在洋鬼子都走了，皇上应该快回来了吧！

咸丰收到奕訢请他回京的奏折，召集肃顺、载垣等人商议回京之事。肃顺此时已经是咸丰身边最大的权臣了，他非常担心咸丰回京，

他知道这是奕䄢等人担心自己左右咸丰而出的计策，决定极力阻挠咸丰回京。

肃顺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好不容易混到权臣这个地步，这一回京，大权可能就要落入奕䄢等人的手中。当然，要说服咸丰必须抓住他的弱点，肃顺知道咸丰最怕的就是洋人，故意说道：“臣以为现在回京万万不可，洋人诡计多端反复无常，他们说退兵不可信。万一皇上回去，他们又打回来了呢？要知道，洋人火烧圆明园就是憎恨皇上啊！以臣愚见，不如先暂住热河行宫吧，等风声彻底过去以后，再回不迟啊！”

载垣跟肃顺一个鼻孔出气，也说道：“是啊是啊，何况现在冬天临近，皇上您龙体欠安，不能冒这个险啊！”

咸丰一听，也有道理，行宫住着多舒服，回去后又得政务缠身了，那好吧，就在这里住下了。等什么时候养好精神再回去。

于是，咸丰在奕䄢的奏折上批复：朕经过反复思考，以为木兰秋狝这个事是遵循祖先旧制，热河和京师也不远，在热河足以驾驭形势，回京之事，各位王公大臣不准再奏。

有一点，肃顺和载垣是说对了，这时候咸丰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每隔几天就会咯血，咸丰的病很可能是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不治之症。咸丰听人说，喝鹿血能治此病，便特地养了一群鹿，每天喝几碗。鹿血是壮阳之物，喝了鹿血对病没有益处，反而让咸丰欲望更强，结果对身体损耗更大。

咸丰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慈禧需要批阅的奏折就越来越多。此时，慈禧的想法也非常多，她在想咸丰让她代批奏折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因为自己懂文史，比皇后文化水平高？还是因为自己是他唯一皇子的母亲？或是皇上希望用自己来牵制权臣肃顺？

不管怎样，她很珍惜这个机会，她很了解咸丰的病情，过不了一年半载，六岁的载淳就会继承大统，到时候还得靠自己这个母后指点。现在正好借着这个机会了解政务，将来或许能将大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一天，慈禧在批阅奏折时，发现了恭亲王奕䄢的奏折，恭亲王请求过来看望皇帝。慈禧意识到这个举动不寻常，开始动脑筋了，以前恭亲王是皇上的竞争对手，但同时他又是肃顺的政敌。他这次来热河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个是看望咸丰的病情，如果不行的话他得尽早为自己作打算；一个就是劝咸丰回京。

慈禧跟奕䄢不是同盟，也不是敌人，但她与肃顺是政敌。根据敌

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慈禧决定无论如何要让奕□过来。肃顺经常在咸丰面前说慈禧专权，干预政事，慈禧对此一直怀恨在心。

要奕□过来，必须先征求咸丰的意见。咸丰本来是准备把这道奏折发给军机处，慈禧拿着奏折直接找咸丰：“皇上，这道折子是六爷发过来的，您还是亲自签吧！”

咸丰脸色变得阴沉，他一向对奕□心怀芥蒂，说道：“我让你发下去。”

慈禧：“六爷是您的亲兄弟，他的折子您还是亲自批吧！”

咸丰瞪了慈禧一眼：“那你先搁着。”

肃顺在这段期间也没少活动，他逮住慈禧不在咸丰身边的时候，诚惶诚恐的说道：“奴才有句话，斗胆启奏皇上。奴才这话说出来，很可能人头不保，还望皇上明鉴啊！”

看肃顺这么诚惶诚恐，咸丰很吃惊，口气亲热地说：“肃六，有什么话你就起来说吧！”

肃顺战战兢兢地起来，凑到咸丰的耳边，低声说道：“懿贵妃恃子而骄，专权独断。皇后却仁厚善良，臣担心有一天皇后可能遭遇不测啊，希望皇上为皇后作点打算。”

咸丰听了，也感到害怕，忙问：“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肃顺顿了顿，说：“皇上身体不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只怕母后干政的事情会发生，当年汉武帝就做得很英明，希望皇上杀伐决断啊！这种事情犹豫不得。”

咸丰知道肃顺是让自己赐死慈禧，肃顺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自己的身体这么差，随时都可能驾鹤西去。吕后专权，武曌篡位，对这些事情咸丰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像汉武帝那样直接赐死钩弋夫人，固然省事。但考虑问题还不能这么简单，咸丰对肃顺说：“朕会好好考虑，记住，今天说的话不要让第三人知道。”

“喳，奴才就是长得九个脑袋，也不敢乱说啊！”

这次谈话虽然很机密，但最后还是被慈禧知道了，可想而知慈禧多么恨肃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慈禧坚持要处死肃顺。

在咸丰最后的日子，大臣中肃顺跟他的关系最近，一有事情他就召肃顺，两人的关系超越了一般的君臣关系。肃顺也清楚地知道，这是最关键的时刻。皇上的身体越来越差，一旦逝去，政局将发生大变动，在这个变动中自己可能成为大清国的监国人，也有可能成为刀

下鬼。如果让慈禧或是奕䷐攫取了权力，自己的生命是岌岌可危的。

咸丰思考再三后，还是决定不让奕䷐来热河，他给奕䷐的回复是：你我兄弟情深，自从上次分别我也一直想你，但可惜我现在生病了，如果你来看望我，难免回首往事，到时候只会让我的病加重，而且你在京城把事情处理得也很好，我认为还是没必要见面。

奕䷐收到谕旨后，知道肯定又是肃顺在搞鬼。没多久，奕䷐又听说肃顺在咸丰面前说自己想跟洋人联手，合谋篡位。奕䷐叫苦连天，他知道肃顺准确地把握住了咸丰的心理，咸丰自从登上皇位后，一直为当年争储的事情猜忌自己。

老实说，恭亲王奕䷑很失望，自己这么卖力干活，皇上还不信任，干得越好干得越多，皇上的猜忌就越重。与其吃力不讨好，还不如少干一点，或者干脆什么事都不干。但有时候不干也不行，后来因为潮州反入城事件，奕䷑处理得不是很好，咸丰发谕旨对他表示不满。

奕䷑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诉苦水，奕䷑说了这样的话：“虽委屈之隐，固不必求谅于人言；而专擅之讥，则不敢不预防于众口。”

意思很明显：如果你听信谗言的话，我在这边没法安心做事，我很冤枉，我很郁闷。

临终顾命伏祸端

咸丰最后的日子肯定是不太快乐的，他不仅被病痛折磨，还得考虑身后的事情。总的说来，有三方势力，一个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亲王派，一个是以慈禧为首的吕后派，一个是以肃顺为首的权臣派。这三派都不可能是省油的灯，如何确保自己死后国家不会发生动乱呢？

就当时来说，咸丰最相信的人是肃顺，他相信肃顺对自己赤胆忠心，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也没有证据表明肃顺这个人是不忠心。咸丰的意思是让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牵制其他两派，其他两派作为对立面存在，也能制约肃顺派，使权臣不能为所欲为。

当然，咸丰也很担心皇后钮祜禄氏的命运，尤其是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他更加眷恋皇后。根据野史记载，咸丰对慈禧非常防范，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女主干政，危及社稷，更担心皇后遭遇不测。他把自己的担忧全都告诉了皇后，为了保护皇后，他给了皇后一道密旨，密

旨上写着，如果那拉氏行止失德，有违礼制，让皇后便宜行事，当众赐死那拉氏。慈禧耳目很多，听说此事后，对皇后恭谨有礼，事事顺遂。皇后被她感动了，当着慈禧的面烧掉密旨。

这虽然是野史，但非常深入地反映了当时时局的敏感，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在政治上失势，甚至有可能送掉性命。

咸丰不是一个刚强的人，就算他意识到危险，也不可能有那份魄力杀掉慈禧。他当然也反感慈禧对政事的兴趣，更厌恶她心机之深。但如果让他动手杀掉自己宠幸过的老婆，他还真办不到。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慈禧还为他生下了未来帝国的继承人。

刚开始的时候，最得势的是肃顺，论起心计，肃顺终究还不是慈禧的对手。他跟慈禧的矛盾也不仅仅局限于争权，咸丰在逃亡热河的当天，准备工作就是由肃顺做的，肃顺只准备了一辆马车，就咸丰一人坐在车里。其他人都是在民间雇的车马，肃顺分给慈禧的是一辆破骡车，一路上颠簸难忍，慈禧受尽了苦头。她坐在骡车里上下颠簸的时候一定恨透了肃顺，中途她还请求肃顺给她换一辆。

肃顺漫不经心地回答：“现在到哪里去找车子，到了休息地再说吧！”

后来到了一个小镇，慈禧又提出这件事，肃顺很不耐烦地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哪有闲功夫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啊！”

慈禧那辆车可能真的非常破，在半道上，肃顺经过她旁边时，她流着眼泪哀求：“肃大人，你帮个忙，帮我换一辆车吧！”

肃顺烦不胜烦：“我说劳驾你顾全点大局行不，逃难之时名堂还这么多，你以为你是皇上啊！”

慈禧还想哀求，肃顺已经扬长而去。

到了热河行宫后，肃顺想办法让咸丰过着奢侈生活，但是对于下面的妃嫔却非常吝啬，尤其是慈禧，日子过得更为艰难，每月的伙食费不到一百个铜钱。

肃顺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慈禧对他的所作所为也只能忍受。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皇上突然病危，接连几天昏迷不醒。之后，有段时间回光返照，感觉精神不错。

一天，咸丰召见肃顺，在召见之前，咸丰已经让所有闲杂人等都退下，肃顺一进来，就感觉到皇上有大事要找自己商量。

果不出所料，咸丰让肃顺坐下，在封建社会里，皇上让臣子坐下

那是莫大的恩宠。肃顺当然不敢越礼，但咸丰坚持让他坐下，他只好找个垫子，坐在地上。

咸丰有气无力地说：“肃六，朕对你如何？”

肃顺一听，立即五体投地，说道：“皇上对奴才的恩德比天还高比地还厚，奴才来生也报答不尽。”

咸丰听了点点头，疲倦地说：“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朕自信待你不薄。我们君臣一场，也是缘分，只是恐怕来日无多了，现在朕最担心的是皇后。”

听皇上这么说，肃顺泪流满面，说道：“皇上，你不要乱想了，皇上正当年富力强，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咸丰淡淡地说：“朕如果走了，你要保护好皇后，不要让别人欺负她，如果有人想爬到皇后的头上，你一定要阻止。”

七月十四日，咸丰的病情加重，大家都在积极准备，以防皇帝驾崩后，会出现混乱。混乱中，有人得利，也有人会遭殃。

七月十六日，上午咸丰还好好的，下午突然昏厥。御医赶紧过来为咸丰诊治，咸丰苏醒以后非常无力，立即召集王公大臣等人。咸丰对大家说：“朕可能快不行了。”

接着，咸丰说出了八个顾命大臣的名字，这些人清一色都是肃党。在顾命大臣的名单中没有奕訢，咸丰是担心奕訢变成本朝的多尔衮。

这时，咸丰握着同治的小手，流泪地对肃顺等人说：“朕把载淳交给你们了。”

八个顾命大臣连忙跪地，说道：“臣等一定尽力辅佐幼主，请皇上放心。”

接着，咸丰让人写下谕旨：“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为顾命大臣，赞襄一切政务。钦此。”

临终前，咸丰也召见了慈禧，不过他说的话让慈禧有些无语，咸丰说：“兰儿，朕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尊重皇后。”

慈禧愣了片刻，立即说道：“臣妾一定谨遵皇上教诲。”

当天晚上，咸丰就驾崩了。

听说咸丰死去，肃顺大哭，其悲痛之真切，不可能是作秀，一个

奴才对主子的忠心表露无疑。

消息传到北京后，最郁闷的是恭亲王奕訢，自己做了那么多事，连个顾命大臣都沾不上。他明白皇兄就是到死都还在猜忌自己，奕訢当然不甘心就这么出局，在权力场中，有时候出局意味着危险。

咸丰虽然西去，但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政务交给顾命大臣。他也考虑到顾命大臣可能擅权，操纵朝政，所以又给了皇后一个“御赏”印章，给慈禧一个“同道堂”印章，这个印章虽然名义上是载淳，但其实还是由他的母亲慈禧保管。顾命大臣所拟的圣旨，只有在上面盖有“御赏”印章，末尾盖有“同道堂”印章才能生效。

这样三方制掣，能够确保权力平衡，至少咸丰是这样盘算的。咸丰如此设计，是希望通过牵制作用，等载淳长大后，皇权能够顺利过渡到他手中。设计不能说不精致，但他错误估计了中国人的本性，错误估计了权力的本质。在中国传统政治里，权力制衡是非常罕见的东西，权力最终还是会汇聚到一人的手里。

根据中国的权力逻辑，这三方中最终有两方会出局，最终心狠手辣的人掌控局面，成为新一轮的独裁者。这个人不可能是皇后，要么是肃顺，要么是慈禧。

事实上，咸丰去世没多久，肃顺等人就向慈禧开战了。顾命大臣拟了一道圣旨，尊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第二天才尊慈禧为圣母皇太后。也就是说两宫并尊，但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显然是更尊钮祜禄氏。慈禧当然会记恨。

两宫智除肃顺

1861年8月24日，肃顺带着顾命大臣们进入东西宫，和两位太后讨论公文处理的程序。肃顺说，奏折由八位大臣看就行了，谕旨也由八大臣共同拟定，两宫太后只要负责盖章就可以了，为了防止后宫干政，太后不可以更改谕旨。

这个要求无论是钮祜禄氏还是那拉氏都无法接受，她们坚持要审阅谕旨，只有经过她们的审定，谕旨才能生效。

其实，肃顺的要求并不过分，咸丰临死前授权给这两个女人，无非是要她们在关键时候限制顾命大臣，所谓关键时候就是顾命大臣有可能作出危害大清江山的事情。两宫太后要求审阅奏折和谕旨，分明是想干政。

钮祜禄氏本来对政务兴趣不大，她所以这么做，显然是受到了慈禧的怂恿。在慈禧跟权臣的斗争中，钮祜禄氏始终与慈禧的步调保持一致。钮祜禄氏真是一个蠢女人，她连真正的敌人都看不清楚，最后被人吃掉也是情理之中。

肃顺这时也犯了大错，他最后居然妥协，两个太后时时以小皇帝的名义出头，他也觉得很难抵挡。当然，这跟肃顺轻敌有很大的关系，钮祜禄氏不足为惧，慈禧也只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难不成她真能翻起什么大浪？

慈禧向来跟皇后水火不容，这时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不惜低声下气和皇后结盟，由此可见她绝非等闲之辈。跟皇后结盟是一件大事，如果弄巧成拙的话，很可能祸及自己。为了确保这事能做得天衣无缝，慈禧派出了心腹太监安德海。安德海办事很给力，果然说动了皇后。

东西太后这么一联手，肃顺等人就有些烦闷了。两太后一致认为，要扳倒权臣，必须先抓出他们的罪证。这个重要的任务自然交给了安德海。

安德海是一个心机很深手腕高明的太监，他密切地关注着肃顺的一举一动，终于抓住了肃顺的一些把柄。是不是诬告我们不知道，反正根据安德海提供的情报，肃顺有大逆不道的行为。肃顺喜欢开玩笑似的坐在皇帝的宝座下，还问身边的人自己像不像皇帝。还有一个情报是肃顺的一个内监不小心打碎了他的羊脂玉杯，内监很害怕，后来想出了一个法子，把玉杯粘好，第二天给肃顺送参茶的时候，突然装出很吃惊的样子，一不小心把手中的玉杯摔落在地。肃顺惊问其故，内监说我刚才在你的鼻孔里看到两道黄气，就像龙脉一样，所以不小心把杯子给砸了。

接下来我们不用猜也知道，肃顺不怒反喜。这个故事太老套了，八成是捏造的。在袁世凯身上也有一个同样版本的故事，从这个故事里我们能感到，权力斗争是多么的卑鄙龌龊。

搜集情报无疑会激起更多的人对肃顺不满，有助于建立起一个反肃顺联盟。肃顺对此全然无知，他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奕訢身上，他认为奕訢才是最大的敌人。肃顺认为，奕訢没有被列入顾命大臣肯定会不满，所以首先必须把他稳住。于是，肃顺发出一道谕旨，既让奕訢参与丧事，又让他留在北京，不必前往热河。

奕訢收到奏折后，知道肃顺对自己怀有很深的戒心，但是不久，他就见到两个太后派来的密使，让他立即前往热河奔丧。奕訢很振奋，上奏请求奔丧，最终得到恩准，奕訢知道两太后功不可没。

9月5日，奕䷑到达热河，哭丧是必走的程序。哭完之后，奕䷑请求面见两个太后，奕䷑还让肃顺和自己一起，以显示光明正大。肃顺反倒不好意思了，说：“你们叔嫂见面，外人怎么好掺和呢？”

这是肃顺犯的一个大错，奕䷑和两太后谈了两个多小时，内容全是关于如何扳倒肃顺集团的。奕䷑建议两太后尽快携小皇帝进京，到了北京后再除掉肃顺集团。

9月11日，奕䷑星夜离开热河，前往北京。他走得这么急，是怕事情泄露，肃顺会杀了自己。

京城里的一些官员也开始活动，大学士周培祖以前饱受肃顺欺负，他和御史董元醇一起上了道奏折，请求太后垂帘听政。这个奏折无疑是对肃顺公开发难。两太后自然是极力称赞周培祖的建议，但肃顺等人坚决反对。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执，载垣说道：“臣等的责任是辅佐幼主，如果听命于太后的话，那么太后就相当于皇帝了，臣等就相当于军机大臣了。这不是先皇的意思，先皇是让臣等尽顾命大臣的责任。”

载垣想说的是，如果让太后垂帘听政，后果不堪设想。肃顺要求两宫太后把周培祖和董元醇的奏折交出来，在顾命大臣等集体威慑下，她们不得不交出奏折。随后，肃顺等人就奏折内容拟旨，狠狠地批评了董元醇，还影射奕䷑干政。

两宫太后看了谕旨后，拒绝盖章，双方大吵起来。肃顺看她们不肯照办，便号召八大臣集体罢工。行政机构一瘫痪，两太后也不能不让步，只好盖章发下去。八大臣小胜一回合，大家弹冠相庆。

两宫太后在这场斗争中虽然失败了，但也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同情，人们很自然地把肃顺联想成鳌拜那样的人。京城的官员们都知道，现在唯一能牵制肃党的就是两位太后了。垂帘听政固然是不好的，但事到如今，这也是唯一制服肃顺集团的方法。那些反对肃顺的大臣们很自然地希望太后通过垂帘听政的方式打倒权臣。

11月1日，两宫太后和新皇帝到达北京，奕䷑率领文武百官出城跪迎。11月2日，两宫太后召集奕䷑等人，先对肃顺破口大骂，接着商议制敌之策。

政变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慈禧拟定好谕旨，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先革职问罪。奕䷑手持诏书，先来到载垣和端华面前，宣布他们有罪。这两个傻帽还以为拟旨的权力在顾命大臣那里，大声抗辩：“我们都没有拟旨，诏书从何而来？”

肃顺此时还在密云护着咸丰的灵柩，忽然半夜听到敲门声，有人把他从床上抓起来。

11月3日，两宫太后以小皇帝的名义，宣布奕訢为议政王，由奕訢成立新的军机处。

政敌已经成为阶下囚，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罗织罪名简直是太容易了。11月8日，罪名已经颁发各部，其中有一项就是肃顺等人造假，慈禧说咸丰根本没有安排什么顾命大臣，全是肃顺趁皇帝病危，从中搞鬼。两太后以皇帝的名义赐载垣和端华自尽，肃顺的处罚要重一些，斩立决。

肃顺也算是一条汉子，在囚车里面无惧色，高声叫骂，旁边的人都被他吓坏了。到了刑场后，肃顺不肯下跪，被刽子用手用铁棍敲破膝盖才跪下。

除掉这三人后，其他五人也分别被革职查办。慈禧就这么轻松地把权力握在手中，政变讲的是狠、准、快，这方面慈禧做得很好，不愧是一个麻辣西太后。

除掉肃顺后，奕訢和慈禧都笑得很开心，胜利者永远都是开心的。慈禧没有开心多久，就在考虑未来的战略，肃顺虽然除掉了，但东太后钮祜禄氏始终是个威胁，奕訢更不是省油的灯。

奕訢位高权重，有治国的才能，现在政局不稳，需要他稳定大局。但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身边有这样的人，四年之后，慈禧故技重施，解除了奕訢的权力。

至于东太后，慈禧更是容不下她，她的结局我们也知道。

写到这里，我们觉得，咸丰临死前精妙的算盘最终还是打错了。权力斗争没有仁义可言，最忌讳的就是用善意的眼光去推测人性。

曲终人散 大清风云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鹿鼎公子 著



比野史
更靠谱



比正史
更有趣

光绪为什么斗不过慈禧？
摄政王为何会重新起用清廷大患袁世凯？
末代皇后婉容又为何落得令人唏嘘不已的
悲惨结局？

紫禁城最后的悲歌即将上演。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风云. 8, 曲终人散/鹿鼎公子著.—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93-7312-5

I. ①大... II. ①鹿... III. ①中国历史 - 清代 - 通俗读物
IV. 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4246号

策划编辑: 胡 艺 (ngaihu@gmail.com)

责任编辑: 吕静云 封面设计: 古润文化

大清风云: 曲终人散

DAQING FENGYUN:QUZHONG RENSHAN

著者/鹿鼎公子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32

印张/8.75 字数/248千

版次/2016年5月第1

版

2016年5月第1次

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093-7312-5

定

价: 29.8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值班电话: 010-66026508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

010-66031119

网址：[http://](http://www.zgfzs.com)

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

010-66053217

市场营销部电话：010-66033393

邮购部电话：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晚清（1895年）官府精制“恭祝慈禧六十寿辰万寿图铜质鎏金水烟纪念盒”

慈禧的六十岁生日，是 1894 年阴历甲午年十月初十。清政府打算拨出3千万两银子的专款，为慈禧太后举办盛大的庆寿典礼。正当庆典筹备紧锣密鼓进行之中，1894 年 7 月，日本舰队在黄海挑起甲午战争。为给慈禧祝寿，清朝官员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



恭亲王

恭亲王奕訢，爱新觉罗氏。清宣宗（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清末政治家、洋务运动主要领导者，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咸丰十一年（1861年）到光绪十年（1884年），一直处于清王朝政治权力中心，光绪十年（1884年）因中法战争失利被罢黜，史称“甲申易枢”。一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善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才再度被起用。



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即爱新觉罗·载湉。是清朝第十一位皇帝，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第九位皇帝。庙号德宗，谥号景皇帝。生父为醇亲王奕譞，生母为叶赫那拉·婉贞，为慈禧皇太后亲妹。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被两宫皇太后立为帝。



清同治时期金鑿花双喜圆寿字茶碗

金碗捶揲成型。碗腹鑿刻几何纹地上间饰“囍”和团“寿”字。口沿及足鑿刻回纹各一周，器腹下部近足处为仰莲纹一周。器底鑿刻“同治十一年二两平重七两四钱一分”铭文。此碗是同治皇帝大婚用品。清代金器往往在器底鑿刻年款、重量，有的还有承做作坊的戳记。清晚期除造办处外，民间作坊也承接了不少皇室金器的制作。

总序

清史洋洋洒洒近三百年，三百年间怪事、奇事、惨事、恨事迭出，三百年年年都精彩，年年都有挥之不去的喜怒哀乐。整个清朝三百年，几乎囊括了人性中一切的极端面，三百年，道不尽的风云爱恨。

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骑兵，建立了后金，身后留下了无数的尸体，最终倒在宁远城下，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书生袁崇焕手中，就此郁郁而终，这是上天对一个暴力征服者的最大讽刺。随后，努尔哈赤诸子开始斗智斗勇，最后皇太极靠谋略成为老大。

皇太极穷其一生精力都在与明朝对抗，不幸暴毙后，大清国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多尔衮与豪格之争最终便宜了顺治。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后，成为皇父摄政王，将全国军政大权操于一身，顺治完全被架空。此时，孝庄和顺治母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危难关头，孝庄舍身保大清，稳住多尔衮，终于使大清逃过这一劫。

顺治是个痴情天子，亲政后喜欢跟母亲孝庄闹不愉快，结果自己和董鄂妃双双去世。康熙继位时才八岁，不过这是个早熟的孩子，也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很早就懂得帝王之术。在别人还是懵懂少年时，他就已经像个猎人一样盯紧了鳌拜，除掉鳌拜之后，康熙开始了自己雄才大略的一生。

康熙治国和外交不外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所以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鳌拜，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荡平准噶尔，击退沙俄侵略……在整个清朝，帝王之术在康熙手中达到顶峰。

然而，康熙也有缺点，他的法度不够严明，治国主要是依靠儒术和道术。雍正虽然上位不明不白，但当皇帝后弥补了康熙的缺点，雍正治国理念上最大限度地奉行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乾隆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他继位后，废除雍正的依法治国思路，重新走康熙的路子。但乾隆并不懂康熙真正的治国精髓，结果变成了外用儒术、内用权术，所以清朝在乾隆时期开始走向衰落。

自乾隆后期，动乱纷起，尤其是白莲教叛乱几乎烧遍整个中国。到了嘉庆手中，国家元气已大伤，嘉庆虽然是个仁君，可惜终究没有先祖那份雄才。他虽然减缓了国家的衰颓，但始终没能重振大清的雄风。到了道光手中，国家就更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欺负得

够呛，国内的动乱更是风起云涌。

咸丰就更悲剧了，太平天国和天地会起义，全国天翻地覆。更糟的是八国联军来了，他连个京城都保不住，年仅三十岁便郁郁而去。咸丰死后，朝政大权掌握在“龙夫人”慈禧手中，国家每况愈下，虽然中途出现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可惜终究是昙花一现。

清末虽然出现了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袁世凯这样的中兴名臣，但亡局已定，神仙也不能力挽狂澜。最终，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千古帝王，悠悠万事，功过自有百姓言，清朝这些事儿，就交给读者去慢慢品味吧！

序言

咸丰一死，同治继位，但同治不过是一个傀儡，朝政操持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手中。同治跟顺治的命运有些像，但更惨。首先，同治的母亲慈禧比不上顺治的母亲孝庄，一个是权力母老虎，一个仁惠的孝庄太后；其次，同治的能力比不上顺治，一个是寻花问柳的同性恋皇帝，一个是不断挣扎励精图治的上进皇帝；再次，同治活的时间比顺治短，同治只活了十九岁，顺治活了二十四岁；最后，同治在生育方面比不上顺治，同治一个子女都没有留下，顺治却生下雄才大略的康熙。

但同治跟顺治还是有很多共同点：同样短命，同样跟母亲的关系很糟糕。同治反抗母亲的方式就是叛逆，不断地寻求感官的刺激，从同性恋到逛窑子，总之，怎么自虐怎么败坏家风就怎么来。和慈禧相处的日子让同治非常压抑，同治通过无节制的性生活来解压，结果染上梅毒，全身溃烂而死。

同治死后，慈禧又从爱新觉罗家族抱了一个小孩过来当傀儡，这个小孩便是光绪。光绪比同治还可怜，四岁时就离开父母的怀抱，跟着冷血无情的慈禧，战战兢兢地活着，到了亲政年纪，还是一个傀儡。光绪从小身体就不好，加上常年生活在压抑的气氛里，长大后一直郁郁寡欢。

直到遇到珍妃，光绪心情才明朗起来，可惜慈禧连他这点快乐也剥夺了。慈禧是个嫉妒心非常强的女人，她看到别人快乐就受不了，所以时间一长，跟珍妃的矛盾累积，最后将其推入井中弄死。珍妃死后，光绪的感情世界变成了荒漠。对于光绪来说，活着的唯一动力就是振兴大清，富国强民。

但慈禧是决不允许光绪借着变法的机会掌权的，光绪的理想注定只能成为一场空。光绪不是没有考虑过发动政变，囚禁慈禧，他在康有为等人的撺掇下，联系袁世凯，准备发兵攻打颐和园。只可惜，光绪和慈禧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政变以失败告终，光绪被囚禁瀛台。

从此以后，光绪的人生彻底黯淡，黑暗中唯一的星光就是期盼慈禧死后，自己出来重新掌权。然而，慈禧在临终前先让人毒死了他。光绪一生都没走出慈禧的阴影，所以世人无不痛惜这个可怜的皇帝。

光绪和慈禧死后，溥仪继位，载沣摄政。这时候，帝国的大权已经落入袁世凯手中。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跟革命党人做了一桩生意，卖掉大清。

清廷被推翻后，溥仪还想挣扎，游走在全国各地，寻求复辟的机会。可惜大势已去，曲终人散的结局不是他能改变的。

目 录

总序

序言

第一章 母子冤家

叔嫂可以同治

小混蛋同治

母子博弈

泼辣母PK不孝子

断背皇帝患上风流病

皇帝皇后化蝶飞

第二章 洋务运动要搞出清朝特色

悍女慈禧击败猛男奕□

同是改革，中日效果不一样

列强说白了是一群狼

第三章 打仗还得靠左宗棠

左宗棠不爽李鸿章

抬着棺材上战场

强悍的冯子材

第四章 太后垂帘，光绪紧张

又一个傀儡皇帝

可怜孩子遇上慈祥恩师

权术太监李莲英

慈安离奇暴毙

军机处大换血

架空光绪

修建颐和园

第五章 爱一个人好难——光绪与珍妃

爱的就是珍妃

棒打鸳鸯

芳魂坠落深井

第六章 甲午战争——挥之不去的痛

袁世凯鼓捣朝鲜

老李很纠结

激烈的海战

一人欢喜全国愁

第七章 昙花一现的变法

变法这根救命稻草

维新有点肾虚

没有悬念的悲剧

第八章 慈禧带着大家去西安打猎

“亲爸爸”准备对干儿子下手

义和团真能折腾

袁世凯收拾义和团有一套

八国联军也很疯狂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战后新政

第九章 袁世凯的崛起

北洋军的创始人

炙手可热的直隶总督

大起大落

扳不倒的总督

第十章 这一年皇帝和太后先后离去

光绪死因之谜

清德宗光绪是个什么样的人

慈禧临终前的维稳安排

慈禧的生活习惯

第十一章 载沣与袁世凯斗法

可怜的摄政王

排挤袁世凯

收拢兵权

袁世凯回老家

寄情山水，韬光养晦

第十二章 扶不起的大清国

宪政也不管用

对日本低头

血腥镇压革命

第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一场意外引发辛亥革命

袁公出马一个顶俩

游走在皇权和革命党人中间

袁世凯逼退清廷

第十四章 孙袁斗法

南京北京之争

这个总统不好当

宋教仁之死

第十五章 溥仪退位后的生活

关上门继续做皇帝

溥仪大婚

叛逆年代

经济上的那些事儿

第十六章 与世沉浮的皇帝

张勋复辟

冯玉祥逼宫

飘来荡去不自由

日本人的傀儡

两度出访日本

末代皇后婉容的凄婉一生

新中国的公民

第一章 母子冤家

淫海无底，同治同志陷进去后就拔不出来了，他养成了一种癖好，动不动就微服出宫，到花街柳巷中寻找刺激。同治同志是很多妓女的熟客，加之他出手大方，很多妓女都很喜欢他。

叔嫂可以同治

咸丰驾崩时，懿贵妃只有二十六岁，钮祜禄氏比她还小。这两个年轻的女人能够驾驭庞大的大清国吗？很显然是不能的，所以她们必须仰赖恭亲王奕訢的经验。

1861年10月4日，桂良上奏请求给太后上徽号，东宫太后为慈安皇太后，西宫太后为慈禧皇太后。此前两天，内阁就太后垂帘听政之事展开讨论。名为讨论，实际是让大家举手赞同。根据大臣们的观点，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太后听政是必需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听政，换句话说就是确立听政的程序。

11月7日，内阁发出上谕，将新皇帝的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所谓“同治”就是让两个太后一同治政，同时也有太后和小叔子一起分享大权的意思。

垂帘听政的程序基本上是这样的：两个太后听政的地点是养心殿东暖阁，小皇帝坐在龙椅上，两个太后坐在后面，中间隔着一道帘子，跟武则天当年所作所为一模一样。

除了听政之外，大臣奏折和紧急军情也要交给两宫太后审阅，太后审阅之后，再下发给议政王和军机大臣。

太后垂帘听政是清朝历史上的大事件，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太后听政的先例，孝庄虽然很有头脑，也只是通过自己的想法影响顺治和康熙，从没有直接干预朝政。古人说，牝鸡司晨，国之不祥。从后来的历史看，确实是这样，同治和光绪接连早逝，而且没有留下子女。甲午战争，中国海军全军覆没，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即宣告破产。袁世凯崛起后，逼退清廷，自己称帝，旋即退位，一命呜呼，随后便是军阀混战。一个字：乱。

虽然名为两个太后听政，实际上是由慈禧一人听政，慈安是个没

主见的人，再加上本性懦弱，一切都听慈禧的。

在慈禧攫取大权的过程中，奕□是最给力的一个干将，慈禧提出赏其一个铁帽子王，奕□是聪明人，当然拒不接受。慈禧说：“既然六叔坚持不受，那这事就暂时缓一缓吧，将来等同治亲政后，让他来办也行。”

这一阶段，大清的实权掌握在奕□的手中，他相当于一国丞相，两宫太后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者，而同治呢，只是帝国的一个象征。

这时候的奕□权势熏天，朝中大臣多是他的党羽，地方督抚很多也是支持他的，就连西方势力也挺他，把他看成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在西方国家眼里，奕□是一个头脑开明的人，非常适合做清政府的代理人。有奕□在，他们与中国的商贸合作将更顺利。

英国领事罗伯逊甚至建议大英帝国扶植奕□为皇帝，所以奕□在后人眼里又是一个投降派、卖国派。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公平的，奕□跟列强妥协是事实，但妥协跟卖国完全是两码事，不妥协的下场我们已经看到了，如果单纯从效果来说，不妥协反而造成了“卖国”的结果。

面对一个强盗，你打不过他，这时候硬碰硬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幸好老外的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没有说赶走了皇帝自己当皇帝，只是抢些金银珠宝。但也不是所有的洋人都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美国人白齐文就是刘邦项羽式的人物，他是洋枪队的队长，看到清军被击溃，政府近乎崩溃，他忽然产生了自己当皇帝的想法。当然，凭他的力量还不能做到这点，所以他找英国人戈登商量。

幸亏白齐文的想法不是欧美的主流思潮，戈登觉得这个人完全是个无赖，是个疯子，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还别说，如果白齐文真得到了支持，然后组织一支两万人的军队，说不定还真能当上皇帝。

戈登虽然反感白齐文，但很看好李鸿章，他曾对李鸿章说：“中国现在没希望了，以后恐怕无法在世界上立足，除非老兄你能够取而代之啊！老兄如果想当皇帝，跟兄弟我说一声就行了，我手下的洋枪队必定唯老哥你马首是瞻啊！”

李鸿章一听，当然吓坏了。老李有才，但没有胆，稍微有胆的话，可能后来就不会被贴上卖国贼的标签了，反而是民国的国父了。人这一退缩成啥样了，在以成败论英雄的社会里，不存在什么公平的，大家只看结果。

说这么多，无非是说恭亲王不是一个卖国贼，他是有自己难处

的。你不能指望他变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把洋人们都赶尽杀绝。虽然 he 不能变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但他确实很努力，知道中国只有自强一条出路，这是 he 跟洋人打交道过程中的实践总结。

实际上，恭亲王掌权以后也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内有“长毛”之患，恭亲王要搞定他们，必须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曾国藩虽为两江总督，但是管理四省军务，分别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四省，奕訢还授他为协办大学士。此外，奕訢提拔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曾国荃为浙江布政使，李鸿章为署理江苏巡抚。这些安排无非是希望尽快平定内乱，为国家的自强和发展制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

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恭亲王更是忍辱负重，如履薄冰，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好在他天性聪明，很多问题能够处理得恰到好处。一方面，大清的政权是一定要保住的；另一方面，尽量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洋人支持。要把洋人伺候舒服又不能让他们狮子大开口，外交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奕訢认为：英国人是最霸道的，俄人居心叵测，法国人贪财，美国人相对来说性情要淳朴一些。他这个看法大体是正确的，美国的独立原本就是反抗霸权和控制的结果，所以美国在建国时很注重自由与民主。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内涵是不侵犯别人的自由，这个别人也可以升级为别国，只要你不把美国惹毛了，他一般都可以跟你有话好好说。

奕訢还提出，国家要自强，首先靠练兵。而练兵首先要有利器，不能拿着长矛乱舞，得有先进的洋枪洋炮。要有先进的洋枪洋炮，必须花钱买，钱从哪里来？奕訢说，从海关的税收中来，用洋人交的税购买洋人的枪。史载奕訢聪明看来一点不假，他当然也知道买别人的东西始终是下策，最好的办法是自己能够制造，但是洋人太狡猾了，把那些好技术都捂得紧紧的。

小混蛋同治

同治是独生子，还是皇帝的独生子，娇生惯养在所难免。

咸丰生前把这孩子当成个宝，慈禧更是如此，她能有今天的地位全靠这孩子。咸丰一生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公主，除了同治外，另一个儿子出生没几天就死了。

为了让这孩子成为帝国合格的接班人，咸丰和慈禧就跟现在的夫

妻一样，为他请最好的老师。咸丰给同治安排的老师是李鸿藻，这李鸿藻是个大学问家，学问在当时是顶尖级的。后来师资队伍不断扩充，还包括祁寯藻、翁心存、倭仁等人。

祁寯藻学问也相当扎实，自幼被认为是神童，二十二岁考上进士，是个专业的“皇帝老师”，之前做过道光 and 咸丰的老师。翁心存是翁同龢的父亲，官至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他的儿子翁同龢后来做了同治和光绪的老师。倭仁是理学大师，官至文渊阁大学士。

这些人虽然个个饱读诗书、学富五车，但清一色全是守旧派。

师资队伍固然庞大，但家教却很成问题，咸丰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慈禧更是一个阴毒的女人。同治想要在他们身上学到一点正面的东西，委实太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孩子会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被环境同化，另外就是变得叛逆，与环境格格不入。

同治选择了叛逆，这也是必然的，他是独生子，没有竞争压力，不懂得妥协的道理。

有人说慈禧掌权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很早就有流言：灭建州者叶赫。建州是努尔哈赤的发迹地，叶赫是被努尔哈赤吞并的女真部落。慈禧，叶赫那拉氏，身上流着叶赫部落的血。现在的问题是，清朝是不是亡于慈禧之手呢？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们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讲。首先，慈禧的教育是很失败的，虽然是个女人，但是她严重缺乏母爱。她不仅缺乏母爱，还嫉妒其他女人爱护孩子。同治向她请安时，她经常板着脸孔，教训这调皮的孩子。同治从小就不喜欢这个母亲，反而跟慈安要亲近一些。

一个没有母爱的孩子也就是今天人们说的缺乏家教，叛逆是理所当然的。

同治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跟太监鬼混，不喜欢读书，上课的时候调皮捣蛋，眼里毫无师长。这些老师谁都不敢教训他，清朝主子与奴才等级分明，老师再有学问也是奴才，奴才怎么能打主子呢？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像张居正那么牛气。

在这些老师之中，同治最喜欢的是翁同龢，不光因为翁同龢年轻，只有三十多岁，更因为这个老师讲课比较生动，能够讲出引人入胜的道理。翁同龢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老师，他每天都准时上课，准时下课，无论寒暑，从不间断，除非生了大病。

而且翁同龢这个人很正直，有什么说什么，就是对慈禧也不例外。像这样的老师，想不尊重都难。

好老师不一定能教出好学生，同治小时候可能患有多动症，这个也不能怪他，宫里规矩太多，而他又缺乏母爱，难免需要一些发泄。同治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摔跤，及至年长，对男女之事的兴趣也越来越浓。

皇帝要泡妞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同治身在皇宫里，对宫女兴趣不大，倒是喜欢逛民间的花街柳巷。生活极不俭点。

母子博弈

这慈禧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说一不二、唯我独尊。同治虽然是她的儿子，好歹也是个皇帝，甭说是皇帝，就是任何一个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都要挣脱家长的控制，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成长的一部分，如果不能挣脱家长的控治，就意味着在形成独立人格的过程中受挫。

慈禧是一个相当自私的女人，这一点大家不用怀疑。所以她看到同治越没出息，她就越高兴，这意味着她能够长久地把持政权。但同治迟早都是要长大的，政权迟早都是要放手，慈禧知道这是大势所趋，但是她希望尽量延缓这一天的到来。

我们知道，早期慈禧身边有一个红得发紫的太监叫安德海。有传言说，这个安德海虽然是个太监，但并不是货真价实的太监，只能算是半个太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安德海净身之时并没有“连根铲除”，而是留了半截。咸丰去世之后，慈禧孤枕难眠，又看到同治天天巫山云雨，难免心里越发痒痒，于是就跟安德海搞在一起。

安德海由此成为清朝第一个弄权的太监，朝廷大事要想在慈禧那儿通过，首先得在安德海这里通过。在这个过程中，安德海的控制欲望越来越强，收取的贿赂也越来越多。

如果说在嘉庆、道光、咸丰的手中朝政衰败的话，那么在慈禧手中，朝政已经开始腐化阴暗了。

同治虽然顽劣，也不是傻瓜。他非常痛恨安德海，很小的时候就痛恨，他知道这个阉人不但跟自己的母亲走得近，而且还把持朝政，为所欲为。这个安德海也确实过分，他不光弄权，还在慈禧的面前教训同治。太监教训皇帝，这皇帝长大后如果不杀了他倒是怪事了。

同治十四岁时，慈禧开始为他操办婚事。皇上结婚意味着啥，意

味着他长大了，虽然慈禧暂时还不想让他亲政，但这一天正在逼近。

安德海还没有意识到死神已经逼近了，那些日子以来同治绞尽脑汁设计捕杀安德海。他首先要做的是搜集安德海的罪证，这个不难做到，安德海仗着慈禧这棵大树为非作歹有恃无恐，留下了太多的犯罪证据。最关键的是如何过慈禧这关，要杀安德海，慈禧如果不同意就会很难办，而且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慈禧肯定是不同意的。

同治从外围开始做工作，他首先把安德海的不法行为告诉王公贵族和军机大臣们，大臣们也早就看安德海不惯，只是碍于慈禧的面，不便杀他。要杀这样一个人，必须等待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

有一次，安德海奉慈禧之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去江南采购服装。同治得到这个消息，紧急联系慈安太后，告诉她，只要安德海出京城，立即将他斩首。慈安知道安德海与慈禧苟且之事，所以力挺同治。慈安给了山东巡抚丁宝桢一个密折，让他见机行事，一有机会立即除掉安德海。

根据清朝祖制，太监不准出京，更不可以勾结外官。安德海虽然是奉慈禧之命出京，但是也应该低调，可惜他完全不懂这个道理，他一出京就场面吓人，好像要告诉全天下的人他就是太后身边的红人，甚至是情人。

安德海到达德州后，丁宝桢立即命人将他逮捕，审问之后将安德海斩首，一同处斩的还有安德海的二十多名同党。

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做是慈禧与同治母子之间的博弈，也可以看做是一场政变的前兆。慈禧不想放权，同治想掌控大权。在这场博弈中，慈禧是孤独的，站在她这边只有一些太监，而她的对立面有同治、慈安、奕□。尽管从势力上来看，慈禧好像要更弱一些，但是她更有手腕，也更狠毒，所以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同治一直在京城里等好消息，他有种预感，安德海这次一定会人头落地，想到慈禧栽在自己手中他很高兴，再说他事前已经跟军机处打招呼，事发之后军机处肯定也是支持自己的。慢慢的，大权自然会回到自己的手中，同治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

慈禧听到安德海被杀的消息后，一张保养很好的脸立刻变得铁青，刚想发怒，同治就把安德海的罪行全盘托出，然后说：“额娘，为这些混账东西发脾气不值得啊，额娘要注意身体啊！”慈禧准备传谕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同治又说：“六叔和军机大臣已经知道了，大家都说安德海恶贯满盈，死有余辜，额娘，奸人除掉，你该高兴才

对。”

慈禧唯一的成人用品被同治干掉了，不可能高兴得起来，不过木已成舟，也只能这样了。奴才没了，可以再挑，成人用品没了，天下男人多的是。

慈禧看同治人虽小脑子却贼灵活，担心他结婚之后，就得归政，归完政之后自己就得在一边晾着。怎么办呢？只有推迟他结婚的时间，因为一旦他结婚，势必会殃及自己的权威。

泼辣母PK不孝子

慈禧原本是打算让同治在十四岁那年结婚，没想到同治还没大婚就想揽权。慈禧觉得不能这么快，婚事一拖再拖，拖到同治十七岁的时候，她才不得已给同治议婚。

选择皇后是一门大学问，这个选择权不在同治手中，自然由两宫太后裁决。如果两宫太后意见一致，那就没问题了，一次通过。关键是两个太后意见相左，慈安喜欢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慈禧则喜欢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

阿鲁特氏出身名门，祖父是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家教方面是很ok的。这个阿鲁特氏一举一动都显得端庄典雅，很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富察氏容貌更艳丽一些，同治嫌她举止有些轻浮，母仪天下的功夫不够，所以决定立阿鲁特氏为皇后。

听说同治做出的决定，慈禧火冒三丈，这兔崽子，咋就处处跟亲娘作对。没办法，同治就是跟慈安要亲一些。慈禧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同治封富察氏为慧妃。

根据一些史书的记载，说同治这家伙特别喜欢皇后阿鲁特氏，根本原因就是此女是一个才女。洞房花烛夜那晚，同治心血来潮，考她唐诗，没想到皇后背得一字不差。这个说法我们不能当真，同治不学无术是真的，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他真的看重才学吗？说白了，他就是为了给自己亲娘添堵，他的快乐是建立在慈禧的痛苦之上的。同理，慈禧的快乐也是建立在同治的痛苦之上的。

在权力的顶峰上，这母子俩注定不能和平共处。

史书记载，慈禧不喜欢阿鲁特氏，不准同治跟皇后同房，让他多陪陪慧妃，慈禧苦口婆心地说：“慧妃是个贤惠的女人，论才干不应该屈居在妃子的位子上，你要对她好点，多去她那儿坐坐。皇后年记

比较小，不太熟悉宫里规矩，应该劝她好好学习。皇上你不要老是留在中宫，耽误了政事。”

慈禧是一个可以睁眼说瞎话的女人，线装书看多了就是这种结果。皇后明明比同治还大两岁，而慧妃比同治还小，她居然说皇后年纪小，不懂事。同治有很强的叛逆心理，慈禧越讨厌皇后，他跟皇后的关系就越好。如果说他有多爱皇后，倒也不至于。

同治跟他娘抬杠倒也罢了，偏偏这皇后也跟着同治一个鼻孔出气。

大家都知道，慈禧很喜欢看戏，作为皇后，阿鲁特氏不得不陪她。慈禧是个欲望女人，喜欢看一些情情爱爱，带一些色彩的戏。每到这时候，阿鲁特氏就回头闭上眼睛，一副不忍看下去的样子。慈禧心里当然很不舒服了，心想同治那小子天天陪你，你自然不缺那种安慰。但是一个寡妇就不一样了，天天守着空床孤枕难眠，想从文艺中寻求一些安慰，你倒好，装清高，把人家慈禧衬托得就像个女流氓。

婆媳关系很紧张，身边的人就劝皇后，你还得跟老太婆搞好关系啊，否则将来吃不了兜着走。没想到，皇后倒是底气十足：“敬则可，昵则不可。我乃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门迎入者，非轻易能动摇也。”

一个小女生，说出这么大义凛然的话，现在的90后是该好好学习。话说回头，这皇后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她也不看看，连肃顺的尸体都踏在这个西太后的脚下。再想想看，人家慈禧可是偏房出身，这本是她的心病，你这么说她她受得了吗？

得罪慈禧，一定要付出代价的。

皇后很快就尝到苦果了。同治生病了，慈禧不准皇后去看他，然后大骂皇后是个妖妇，没有夫妻之情，连皇帝生病了都不去看。同治弥留之前，皇后痛哭流涕地去看他，还为同治擦血，慈禧大骂她是妖妇，到了这地步还狐媚惑主，是不是想把皇帝给害死啊？

有一天，皇后实在受不了，偷偷去探视同治，两人说了些悄悄话。阿鲁特氏向同治诉苦，同治安慰她说：“你先忍耐下吧，将来肯定会有出头之日的。”

没想到这话传到慈禧那里，慈禧立即赶到皇后面前，对她破口大骂。皇后气不过，当面顶撞了一句：“媳妇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请太后给媳妇点面子。”

慈禧一听这话，更加冒火，动不动就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这不

是明摆着鄙视我吗？慈禧一怒之下，直接揪住皇后的头发，把她拖出来，大刑伺候。同治听说这事，吓晕过去，慈禧怕同治反应过头，这才停止对皇后动刑。

慈禧要求宗人府的老大惇勤亲王奕詝废掉皇后，奕詝回答说：“要废皇后没这么简单，不是从大清门进来的人不能废大清门而入之人，所以奴才不敢遵命。”

听到这话，慈禧都快疯了，没办法，只能忍。

有同治和那帮拥护皇帝的人在，慈禧处处感到深受制掣，所以她要不遗余力地阻挠同治掌权。而大臣们纷纷以康雍乾的祖制为由，要求慈禧撤去帘子，放权归政。

1873年2月23日，同治皇帝终于举行了亲政大典。为了摆脱垂帘听政的阴影，同治将办公地点从养心殿移到乾清宫，在那里单独召见大臣，独立裁决军政大事。

同治跟他的列祖列宗们一样，刚登基都想有所作为。同治认为，只要自己把心血都放在国事上，慈禧一定会认同自己的。他虽然不喜欢这个亲娘，但还是想当然地认为哪个亲娘不希望儿子好呢？

慈禧是这样想的吗？根本不是，慈禧非常迷恋权力，所谓归政其实是说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慈禧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同治励精图治，他希望同治还像以前那样，吃喝嫖赌，即使要处理国事，也得事事请示自己，继续让自己垂帘听政，只不过这次帘子要垂得更深。

和慈禧相比，同治还太嫩了，厚黑学远远不够。如果同治再成熟一点的话，就应该做做样子，每天向慈禧汇报政事。可惜他完全无视慈禧，只不过把岁贡银从十万两提升到十八万两。没过多久，慈禧便忍无可忍了。

她随便找了个借口，把同治叫来，臭骂一顿。同治莫名其妙被老太婆骂，自然很不爽，心里十分厌恶慈禧，但慑于她是自己的母亲，不好发作。

看同治不敢抗辩，慈禧的气焰更加嚣张了，明目张胆要求干预政事。母子俩又斗了起来，慈禧要干政，同治坚持要独立裁决。同治忽然有种感觉，这个女人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一条缠绕在自己权柄之上的毒蛇。

同治很想将她支开，但如何支开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机会总算是来了，同治从太监口中得知，慈禧想重修圆明园，把那里当成修养身性的地方。在同治七年（1868年）的时候，慈禧就想动用国库的钱修

筑圆明园，当时清军刚好平定捻军起义，慈禧觉得天下太平了，可以好好享受一番了。这个提议遭到了恭亲王奕訢强烈的反对，自此以后，慈禧知道，重修圆明园不得人心，不敢再公开提倡此事。

不过人的本性是改变不了，虽然没有重修圆明园，后来慈禧还是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直接导致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

此时，同治探知慈禧想重修圆明园，想到终于可以送走瘟神，全心理政了，他很高兴。这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决定，慈禧是一个极爱享受的女人，现在同治修园，既可以了却自己的心愿，又不用自己承担骂名。如果能在圆明园里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不干政就不干政吧！

同治一提出重修圆明园，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的声音。一个叫游百川的御史，他提出的反对意见非常有意思，他说皇帝想尽孝心无可厚非，但重修圆明园很可能再次引来洋人啊！同治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严词质问游百川：“你没有父母吗？父母想要什么东西，难道不应该给吗？”

游百川这个人胆子也大，回答说：“紫禁城里的西苑也不错啊，风景秀丽，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修得很好。这地方也可以用作太后颐养天年的地方啊！”

同治一听，脑子转了一会儿，心想西苑花销虽小，但是离紫禁城太近，如果让慈禧住在这附近的话，估计她还是要干政。

最后，同治把游百川革职。同治十三年（1874年），重修圆明园的工程终于启动。但是国难刚刚过去，国家百废待兴，此时斥巨资修圆明园简直是公开与人民为敌，要剥天下百姓的皮。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左宗棠西征取得胜利。在前方出生入死的将士们听说慈禧想重修圆明园，都有罢工的冲动。左宗棠也很不爽，他决定暂时缓报胜利的消息，让高层多担点心，或许能打消修园的主意。

左宗棠的想法也很天真，或者说把自己太当回事了。真正给修园制造难题的不是人，而是钱。此时，国家财政肾虚，拿不出那么多钱。同治也没办法，只好发起募捐活动，号召大臣们一同为国家分忧排难。大臣们当官为的啥？谁愿意掏钱？但是又不能不给皇帝面子，只好象征性地拿出一点。

恭亲王奕訢虽然极为反感修园，但为人还不错，带头贡献了两万两银子。奕訢的话说得很有意思，他说自己受恩深重，不敢妄图嘉奖。尽管有恭亲王带头，但是捐款的数目还是很小，不到五十万两，这些钱只够修墙。

最后修园之事不了了之。

断背皇帝患上风流病

本来为娘的应该希望看到儿子幸福，天下的事如果都这么简单就好了。

同治新婚之后，慈禧不喜，反而吃醋。作为一个寡妇，她看到同治很幸福，受不了，同治跟皇后的关系越好，她心里就越不爽。心想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这个狐狸精把儿子的爱全部夺走了。以前儿子就不怎么喜欢自己，自从沉溺在女色中，来看自己的次数就更少。

慈禧心里对皇后极为不爽，总想好好虐待一下她。每次皇后见她时，她就一脸的阴冷，说话阴阳怪气，含讥带讽，语言就像一根根针一样，恨不得把人刺死。这种态度自然让皇后神经非常紧张，随时担心得罪了慈禧，这无疑让皇后的生活蒙上了一层很深的阴影。

如果把慈禧比作一条毒蛇的话，皇后只不过是只小兔子，慈禧要吃掉她只是时间问题。

慈禧精于政治，擅长挑拨离间的把戏，用在政治上且不说，把政治权术用在家事上就太过分了。同治最厌恶的莫过于慈禧对自己私生活的干涉，慈禧不光让太监留意同治的性生活情况，记录下某天跟某妃同房，还经常责备同治不应该经常跟皇后同房，要“普施雨露”。

一个皇帝，连私生活都不能自主，你想想他心里的愤怒和怨恨。

慈禧跟皇后的关系太糟糕了，于是就流传着许多神秘的说法。有人说慈禧和皇后生肖相克，慈禧属羊，皇后属虎，羊入虎口，很不吉利。慈禧很迷信，所以一早就反对立阿鲁特氏为皇后，担心有一天她克了自己的“大命”。还有一层关系，我们不能忽视，皇后是端华的外孙女，而端华就是被慈禧在辛酉政变中杀害的。

一个皇帝，上千万平方公里的最高统治者，连自己私生活都不能做主，连跟自己老婆同房都被人横加干预，其心理压抑可想而知。

在同治无比苦恼的时候，两个登徒子闯进了他的生活。一个是恭亲王奕訢的儿子载澄，一个是翰林院检讨王庆祺。

恭亲王人不错，却生了个败家子载澄。载澄是个荒淫无耻的官二代，他爹是恭亲王，他比李刚还牛气。这样一个人是有资本腐败的，恭亲王怎么不治他呢？因为恭亲王治不了，有时候管家事比治国要难得多。治国有才能和智慧就可以了，但治理家事再有智慧也未必奏

效。

王庆祺是一个基佬，据说他长得“美丰仪”，同治对他是百看不厌，所以准许他“骑龙”。同治为了方便跟王庆祺断背，封他为帝王师，在弘德殿行走，一同高升的还有翰林院编修张英麟。

一天，一个太监给同治送茶，进去后，看见同治跟王庆祺赤裸裸地躺在床上，两人凑着淫书奇文共欣赏。太监偷偷一瞟，发现书中全是春宫图。二人看得入迷，居然连太监进来都没发现。太监就悄悄地退了出去，但这太监多事，居然把这事告诉王庆祺的同僚们。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同治跟王庆祺搞断背山。

皇帝跟淫臣勾结自然让百官反感，后来同治染病死亡，有人写挽联讽刺道：

弘德殿，宣德楼，德业无疆，且喜词人工词曲；

进春方，献春策，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

淫海无底，同治同志陷进去后就拔不出来了，他养成了一种癖好，动不动就微服出宫，到花街柳巷中寻找刺激。同治同志是很多妓女的熟客，加之他出手大方，很多妓女都很喜欢他。

同治的荒唐事是说不完的，人们形容那些登徒子说什么来着，色胆包天。发展到后来，同治通宵达旦地在妓院里，连早朝都不上。

大臣桂庆直言规谏：“我说皇上，您现在正是血气方刚之时，最应该戒色。再说了，难道大内的美女还不多吗？皇上您尊贵的身体怎么能光临那种污浊之地呢？我说皇上，以后别这样，那些蛊惑您的太监全都叫他们滚蛋……”

同治：“我看应该叫你滚蛋才对。”

桂庆看自己的话不管用，便上书慈禧，让她好好管教同治。慈禧听了，翻白眼。是啊，同治做的事情难道她不知道，要你桂庆多管闲事。慈禧巴不得同治胡闹呢，同治越荒淫，她就越有理由再次掌控政权。

桂庆看没人理自己，感到很没面子，干脆辞职回家。

同治叛逆成性，他也只能叛逆了，只有这样才感觉自己是个人，是个皇帝。别人越说他，他越是往妓院里跑。以前还偷偷摸摸的，现在却理直气壮。妓院这地方，人流量那是相当大的，玩归玩，当时没避孕套，病毒可以肆意地互相传染。

大概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的一天，太监在给同治洗澡的时候，发现同治身上有许多玫瑰样的斑疹。太监皱眉，大喊：“皇上，不好了，您这是……”

太医李德立来了，问同治：“皇上痒吗？”

同治：“不痒。”

李德立心想，完了，如果痒的话还好治，不痒的话就更难诊治了。李德立知道，同治患的是性病，但不敢说出口，只能给皇帝开药。同治吃完药后，红斑消退，以为病情消失，照旧寻花问柳。

年轻人真是不知深浅，患了性病也不引起重视，跟他爸咸丰一样，同治也是因为女人搞垮了自己的身体。

1874年11月29日，同治到西苑后，突然感冒，就此一病不起。第二天，他头晕目眩，全身发冷，脸上也出现了红疹。慈禧听了，终于找到久违的母爱，跑到同治床榻前，发现几天没见，这孩子已经骨瘦如柴，慈禧忍不住抹眼泪，权力毕竟不能泯灭人的天性。

慈禧问太医同治到底生了什么病，太医凑着她耳朵说：“也没啥大病，就梅毒而已……”

慈禧：“这病还不小，不管怎么样，得好好帮我儿子治，治不好也不怪你们。”

太医一听，这老太婆人真好，治不好也不怪我们，好，那就放心治了。

12月10日，朝廷正式宣布皇上遇“天花之喜”，让大臣们穿上蟒袍去为皇帝“送喜”。可惜，当时爱德华·琴纳的牛痘接种法还没有传到中国。天花是送不走的，同治饱受疾病的折磨，他的身体在不断腐烂，时时有呕吐的感觉，简直想把肠子都吐出来。

经过十多天的治疗，病情似有好转，看到同治病情好转，慈禧慌了神。不行啊，万一这小子突然又生龙活虎，那以后我还能掌权吗？病死的话为娘的肯定会伤心一段时间，但如果好转的话为娘的就更难过了。

在同治痊愈之前，慈禧要亲手导演一场夺权的阴谋大戏。她命令军机大臣李鸿藻代替自己批阅奏章，慈禧胆大，李鸿藻可不想卷入是非，只是象征性地在奏章上批阅“知道了”等字样，然后全部交给奕□去处理。

看到权力落入奕□手中，慈禧太后很不爽。幸运的是，同治病情好转只是假象。

一天，慈禧在同治的病床前召见军机大臣，大臣们一一跪拜之后，慈禧拉起被子，对大家说：“你们好好看看吧！”

大家一看，床上的这个人哪是皇帝啊，人瘦成了芦柴棒，脸上全是一些恶心的痘痘，眼睛都睁不开。大臣问安之后都退下了，慈禧让他们到养心殿等候。

养心殿上，慈禧漫不经心地说：“大家都看到了，皇上这样子还能处理政事吗？为国家大计着想，大家都给个说法吧！”

大家都是聪明人，慈禧话还没出口，大家都知道她唱的是哪出戏。但大臣们也不能随便附和慈禧，这大清毕竟还是爱新觉罗的，并不是叶赫那拉的。

看大家都沉默，慈禧悠悠说道：“皇上这病是怎么染上的，相信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个皇上，丢着国家大事不管，整天跑到污浊之地鬼混，这像话吗？”

慈禧这一说，大臣们不便吭声，但心里都为同治鸣不平。这时，惇勤亲王奕詝站出来，他毕竟辈分高，是咸丰的五弟，看到慈禧如此欺负人，他主动抗辩，把一些宫闱秘史抖出来：“我这侄子不也是被您老逼得没办法吗？堂堂一个皇帝，跟着自己老婆同房都不行，太后您觉得这像话吗？皇上招您惹您了，您咋就不能让他们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呢？”

慈禧一听，老五想把责任全推到自己的身上，灵机一动，忽然大哭，说自己这些天如何照顾皇帝，几天没合眼。瞬息之间将话题转移，不愧是女中流氓。哭完之后，慈禧说，现在同治都这个样子，我这个为娘的只能多操点心，再帮他吧折子全批了，省得他生病时还担心国事没处理完。

说完这些，慈禧一抹眼泪，微笑着说：“这样吧，训政之事还需要皇上同意，干脆你们集体去劝皇上同意吧！”

慈禧就这么顺利地完成了夺权阴谋，没费多少力气。

皇帝皇后化蝶飞

同治的病本来稍有好转，但经过慈禧一番折腾，病情很快发生逆转。

十一月十八日，同治的生命进入垂危状态。第二天，同治的腰部红肿溃烂，露出两个溃洞，脓水源源不断地流出。

没多久，同治全身溃烂，大清国的皇帝已被病毒占领，这是一个象征，帝国被病毒占领，处于畸形和腐烂状态。

二十五日，同治的腰部和臀部已经连成一团腐烂的浆水，大清国的皇帝就快变成了一堆腐肉了，连太医看到皇帝都忍不住要恶心。

二十九日，同治凝聚最后一口气，召见诸臣。其实，也没什么要事，君臣之间只有一些简单的问话，双方心里都很难受。谁也不希望看到皇帝这样，当初皇帝混迹于花街柳巷，群臣们建议他保重龙体。同治不但不听，反而责骂大臣，想到这一节，他心里充满了悔恨。

同治并没有安排后事，在大臣们的安慰下，他依然相信自己的病有好转的一天。

三十日，同治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病毒正在侵蚀他最后一点生命。十二月初一，同治已经不成成人形；到了初三，他已经是个脓状体了。初五，病毒彻底征服了同治，他缓缓闭上眼睛，这眼睛在最后的时刻流出死气和一丝疑惑。这疑惑是对生命的疑惑，是对人性的疑惑。同治最后的念头是：这一切是宿命，老爸是这么死的，自己也是这么死的。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基因，命运的力量，不可抗拒。

据说同治临死之前头脑也还清楚，他想效法老爸，搞个临终托孤的游戏。虽然同治没有“孤”，但为大清国托一下也不碍事，我们姑且理解吧！同治找的人是帝王师李鸿藻，当时皇后也在身边，同治先是问皇后：“我死后找谁来做皇帝呢？”

皇后哭道：“国赖长君，臣妾不愿弄个小皇帝像当今太后一样弄权。”

同治一听，目光转向李鸿藻：“爱卿啊，朕决定立载澍为储君，让他继承大统吧！”载澍是康熙长子允禔五世孙，后来过继给道光第九子为嗣。

李鸿藻一听，“哦哦哦”地记下了同治的遗诏。这个李鸿藻是个精明人，他知道皇帝的遗诏是无效文件，未来储君的决策权在慈禧那儿。所以他前脚从同治那里出来，后脚就进入西太后的门里，将皇帝临终顾命之事和盘托出。

太后听完后，将临终遗诏撕成碎片，扔进火炉里，口里还骂着：“这个混蛋儿子，还有那个小狐狸精，合伙来坑我。老李，你给我听着，让人把皇上的药给停了。”

这个传闻不知是真是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载澍当时只有五岁，

并不是个长君。如果不是同治头脑糊涂，那么这个传闻就是后人编造的。

同治短暂又痛苦的一生终于结束了，他的一生，可悲又可叹，罪恶又无奈。留给皇后阿鲁特氏的是地狱，暗无天日的地狱，从此她将在黑暗女王慈禧的黑色魔爪之下。

皇后哭成了一个泪人儿，她有太多的理由去哭，她伤的不只是情，她伤的是性命。皇后，你真的伤不起，不如吟诵元好问的《摸鱼儿》吧：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这首词是元好问十六岁时写的，当时元好问到山西太原参加科考，看到一个捕雁者捕了两只雁，一只雁脱网而去，捕雁人杀掉一只雁后，那只脱网之雁悲鸣不已，盘旋不肯离去，竟至撞地而死。元好问是一个很敏感的诗人，大雁殉情一下子打动了他，让他体会到爱情的永恒性。于是乎，写下了这首千古流芳的词作。

说实话，同治这么一死，除了皇后，没有人真正哀痛他。慈禧不用说，没准儿这会儿还在偷着乐，那些后妃们，要指望他们对皇帝有感情，很难。至于大臣们，难过归难过，毕竟相隔好多层，在他们眼里，皇帝毕竟只是一个位子，皇帝死了，还会有人来做。

皇后难过归难过，还不能像大雁那样殉情，同治无后，国事交给谁来处理呢？皇后决定挑起这个担子，皇后有责任心是好的，但这无疑是自找麻烦。

慈禧的意思是立载湉为储君，载湉是奕詝的儿子，慈禧准备把他过继给咸丰，自己继续当太后。皇后听到这个消息，那是非常悲愤的，同治死了，理应从宗族中挑选一个过继给同治，再由他入承大统，自己当太后，慈禧当太皇太后。没想到，慈禧直接为咸丰挑儿子，那意思就是撇开自己。

皇后找到慈禧，想做最后的抗争，皇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不管怎样，不可以让大行皇帝无后。”

慈禧一听，冷笑道：“大行皇帝无后，你这媳妇倒有理了，如果

有个争气的媳妇，说不定大行皇帝早就有后了。”

皇后一听，泪如泉涌：“是……是我的错，是我辜负了大行皇帝，但现在太后这么做又是怎么回事呢？”

慈禧暴怒：“立储之事由我跟东太后说了算，你不要进来搅和，小心说了不该说的话，哀家赐死你。”

皇后：“死就死，有什么了不起，我早就想死了，至少得为大行皇帝立嗣，我才能去死。就算死，我也是从大清门里抬出去。”

“你……”慈禧翘起兰花指，愤怒地说，“你敢羞辱哀家，你找死啊？来人呐，给这个贱人掌嘴。”

“慢着，”慈安赶过来说道，“姐姐不要动气，皇后她也是为了大行皇帝好，大家各让一步。”

皇后的父亲崇绮一看女儿跟太后对着干，担心她遗祸家族，竟然跑到慈禧面前说自己女儿这不好那不好的。慈禧冷笑道：“崇绮，我看你也是个聪明人，大行皇帝去世后，皇后悲痛欲绝，我们就遂了她的心愿，让她跟大行皇帝一块儿去吧！”

崇绮一听，连忙说道：“老佛爷英明。”

崇绮回去后，让人给女儿送去了一个食品盒，皇后打开一看，发现里面空空如也。顿时明白，父亲这是让自己绝食而死，以免连累家人。在同治去世后七十多天，皇后绝食而死，终年二十二岁。

皇后殉夫后，慈禧对外界声称：“皇后跟大行皇帝的感情很深，坤仪天下，加封为嘉顺皇后。”

第二章 洋务运动要搞出清朝特色

恭亲王是个性格比较高傲的人，所谓理政不规范就是不够低调，总是出风头，不能谦抑自己的本性。就拿用人来说，奕□重用汉人，慈禧很不高兴，曾对他说：“干脆我们把这爱新觉罗的江山拱手让给汉人，你说好吗？”

悍女慈禧击败猛男奕□

刚开始的时候，慈禧什么都靠奕□，两人之间的合作看起来也比较愉快。奕□权势熏天，顶着这么多的职位：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地位之隆在当时无出其右。在浩荡的皇恩中，奕□并没有昏头，他知道这是一种阶段性的荣耀，他时刻牢记着“进退自如”四个字。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四，慈禧太后开始对恭亲王奕□发难。慈禧召见奕□，对他说：“有人弹劾你，这是奏章。”

奕□：“谁？原来是蔡寿祺，他……”

慈禧：“他怎么了？”

奕□：“没什么，有人弹劾也很正常嘛！”

蔡寿祺是四川人，以前是胜保的好朋友，后来担任起居注官，也就是说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内廷，接触皇帝和慈禧太后，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皇帝和太后的心理和情绪。如果不是看到太后对奕□不满，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弹劾恭亲王。他这么做，很显然是背后有太后撑腰，奕□也不是傻子，对此心知肚明。

奕□无力地说：“蔡寿祺这个人人品不行，希望太后不要相信他，他以前就招摇撞骗，应该绳之以法。”

慈禧怒目说道：“打住，现在究竟是谁有罪，恭亲王，你不要血口喷人，为了逃避责任，不惜信口泼污水。”

奕□在心里大骂：慈禧，你想整死我就直说啊，玩这些下三滥的把戏。

果不其然，隔日，慈禧召集内阁大臣，当着这些元老的面，一把

鼻涕一把泪地说：“恭亲王这个人要不得啊，以前我们孤儿寡母相信他，没想到现在擅权作威，欺负我们母子，大家说说，我们还要不要活下去了？”

大臣们比猴还精，现在形势还不明朗，自然不便表态。奕䜣手握重权，慈禧心机很深，这两人如果真斗得你死我活，未必能分出胜负。所以最好的对策是让他们去斗，自己保持中立，谁赢了就支持谁。

慈禧一看这架势，母老虎的脾气上来了：“大家想想先帝吧，好好想想先帝吧，你们现在这个态度对得起先帝吗？任何一个正直的大臣都不应该畏惧权势，应该仗义执言，以国家大局为重。再说了，恭亲王又不是老虎，难不成他会把你们吃了？”

周培祖是最圆滑的一个人，慈禧说完，他笑眯眯地说：“哎，太后啊，这种事只有你们两宫才能决断，我们这些臣子晓得什么呢？大事还得太后自己拿主意啊！”

慈禧生气地说：“那要你们这些大臣们干吗呢？国家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退缩，像话吗？”

周培祖还算镇定，整理整理情绪，说道：“太后，让臣等给恭亲王治罪也得有真凭实据，所以这事还得从长计议。”

周培祖和倭仁开始审问蔡寿祺，让他拿出证据，蔡寿祺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哪里有什么证据？”倭仁：“你拿我们消遣啊，没证据也得拿出证据，否则卸掉你两条胳膊。”蔡寿祺：“凭啥啊？”倭仁：“就凭你诬告。”周培祖：“行了行了，蔡寿祺，你先回去吧！”

蔡寿祺走后，倭仁问：“这下咋办呢？”

周培祖：“我看这次太后是有备而来，证据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现在关键是太后已经有了心思了。”

倭仁：“你是说？”

周培祖点头：“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恭亲王定罪，削弱他的权力。”

周培祖上了一道奏折，大意是说恭亲王在理政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可以适当考虑削弱他的职权，一切听候太后裁断。

恭亲王是个性格比较高傲的人，所谓理政不规范就是不够低调，总是出风头，不能谦抑自己的本性。就拿用人来说，奕䜣重用汉人，慈禧很不高兴，曾对他说：“干脆我们把这爱新觉罗的江山拱手让给汉人，你说好吗？”

奕□跪在地上说：“太后不必说气话，现在国家有难，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干吗管他是满是汉呢？”

慈禧：“好你个恭亲王，你处处跟哀家作对，你以为哀家不敢革了你吗？”

奕□听了也上火，咸丰一个小小的妃子，竟敢教训道光最爱的儿子，说道：“臣是皇考的第六子，你就算革了我的职，也不能革去我的皇子身份，你看着办吧！”

慈禧第一步就是革掉恭亲王的议政王职位，想当年韩信被吕后所杀，曾发出“兔死狗烹”的感慨。现在轮到恭亲王了，恭亲王为慈禧夺取政权，最终也难逃被烹的下场。

惇勤亲王奕詝赶紧站出来，说恭亲王是被人诬陷的，所参不实。慈禧已经下定决心要拿掉恭亲王了，硬是罢免了恭亲王议政王、军机大臣的职位。后来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建议恭亲王服软，向太后认错，并让出内务府大臣的职位，这个职位是用来限制慈禧的，让出这个职位等于是表明以后不管你慈禧怎么花钱了。

还别说，这两招还真管用，慈禧是个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之人，你给了她好处，她也会让你三分。再说，恭亲王堂堂一个大男人，在太后面前痛哭流涕，尊严扫地，确实让太后心情舒畅了许多。恭亲王是真哭还是假哭我们就不知道，不过这一招真的很奏效，不是慈禧心软，而是她看到恭亲王认输。

慈禧玩弄着指甲，漫不经心地说：“好了，别哭了，你继续在军机处上班吧！议政王这个职位就免了吧！”

慈禧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告诉恭亲王：看清楚了，这里谁说了算。

慈禧这么一整，把恭亲王的锐气全整没了。他算是懂得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再有本事再有能力，在领导面前也得像个奴才，这毕竟不是跟外国人打交道。奕□这么一畏缩，影响的还不只是他个人的生活，还影响了整个洋务运动，以后做啥事他都瞻前顾后的，简直不像个男人了，跟以前判若两人。

玩弄权术，遗祸无穷。

就在慈禧弄权之时，曾国藩跟幕僚赵烈文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曾国藩：“我听从京城里过来的人说，现在皇城里气象不怎么好啊，有人在街上明目张胆地抢劫，城市里乞丐扎堆，好多妇女都裸着身子，没衣服穿啊，看来国家民穷财尽了，以后怎么了得啊？”

赵烈文：“您就别操这个心了，国家有国家的命运，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管得了吗？清朝统一了这么多年，肯定会分裂的。不过，清朝也算是出了几个明君，仗着余威估计不会在瞬间土崩瓦解。所以，我觉得灾难肯定不会率先在中枢机构发生，倒是可能在地方督抚那儿，等各省各自为政时，大清就玩完了，而且不出五十年就能看到这一切。”

曾国藩：“那是不是还得像宋朝皇帝一样南迁？”

赵烈文：“您就别操心了，南迁不可能了，中原陆沉，改朝换代。”

曾国藩：“幸好我活不到那年头。”

赵烈文：“您活不到才可惜，活到了没准儿这江山……”

曾国藩：“嘘，打住打住！”

奕□跟曾国藩的命运差不多，两人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但朝廷只有在碰到大事的时候才用他们，平常无事的时候奴才吃香。

同是改革，中日效果不一样

在比较中国近代史和日本近代史的时候，最让人不解又生气的一个问题是：日本一次明治维新就把国家内部的问题搞定了，中国前前后后折腾了很多次，搞了许多回，就是做不到富国强民。

都是黄种人，咋就差别这么大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文化基因、政治基因入手，中国几千年奉行的都是维稳逻辑，养成的全是窝里斗的习惯。根本就没有团结合作对外开拓的精神，当权术取代进取，你还能指望一个国家会进步吗？

当时恭亲王的感觉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穿过内斗的暴风雨，宁愿清醒痛苦地活着，也不要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麻痹自己。是时候向西方学习，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了。

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对洋务运动那是非常的欢迎，他们就靠洋人的枪炮打胜仗起家，心里都觉得洋人的东西就是好使。

李鸿章原本是希望老师曾国藩能领导这场洋务运动，但曾国藩这个人太精明，他绝不会傻到挑这个头。这个头只能由恭亲王来挑，老佛爷在后面有选择性地支持。

当时中国聘请了一个洋人当海关总税务司，这个人就是英国人赫德。赫德这个人很有责任心，也很有职业精神。他二十六岁时担任这个职位，一做就是四十五年。赫德这个人很有能力，当时中国各个衙门里一片腐败，唯独海关一枝独秀。西方人如此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腐败、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机构，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

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大概能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改革来革命去，总脱不了坏毛病了吧！鲁迅说劣根性是对的，这种劣根性并不是人种的劣根性，而是文化的劣根性，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一次性搞定的东西，中国折腾来折腾去，越搞越复杂。

赫德当时给清廷高层写了一本类似于战略白皮书的小册子，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大计，如果这些东西付诸实践的话，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后来的历史究竟会如何发展。

遗憾的是，清廷虽然最后把赫德的官阶提升到正一品，但始终把他当成个客卿，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个洋人，他真希望中国强大吗？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不可能。

湖广总督官文就说赫德的所谓战略里“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也说“万万不能照赫德说的做”，两广总督瑞麟说“要富强，靠自己，洋人能帮我们什么”……

总之，皮肤不黄不可信，眼睛不黑不真实，头发不直不牢靠。

这个赫德到底提出了什么建议呢？说实话，很多，我们就挑重要的来说。

首先，这个洋鬼子第一眼就看出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官场腐败，他说如果不把官场治理好，将来中国就无法立足，会分崩离析的。其次，军队问题很严重，军队懈怠，士兵不肯尽力，将领们贪生怕死、贪污受贿，这样下去军队只会变得不堪一击。最后，就是教育，这些八股文教的是什么东西啊，一点用都没有，之乎者也看得人头晕。这些都得改，当然赫德也考虑到别人骂自己“包藏祸心”，并不敢真正触及科举制度，只是说在科举之外也要提倡西式教育，学以致用。说到政治改革，他也没说向西方那样搞个国会，而是一步步来。

其实，这个赫德也是个挺实在的人，他对大清好是真的。为什么对大清好呢？因为恭亲王、文祥等人非常器重他，洋人也知道知遇之恩。

列强说白了是一群狼

以前清朝统治者对洋人是拒之千里之外，现在给人打几次打怕了，也只好采取合作的姿态了。

四个国家中，以美国最为友好，毕竟人家是反抗强权建国的，建国后又重视民权，有较强的契约意识和平等意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对美国驻中国公使蒲安臣说：“在中国，一切重大的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我们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支持中国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

美国的“合作政策”一提出来就得到了其他列强的热烈响应，毫无疑问，这种政策能够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也是在列强的督促下实施的，列强当然不是希望中国强大，而是希望接受他们的思想，从而能够在中国更自由地通商。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双赢的机制。中国落后，洋人也没多少好处，中国经济发展，洋人就可以把更多的产品卖到中国。

蒲安臣是美国公使，负责执行西华德的政策，由于蒲安臣推行一些“平等”“自由”的理念，赢得了恭亲王奕訢的好感，奕訢对他给予了高度的信任。同治六年（1867年），蒲安臣要回国，清廷竟任命他为“一统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等于是把清政府的外交事务交付给一个美国人，由此可见蒲安臣和奕訢之间的关系。

蒲安臣回国后，以清廷的外交代理人身份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这个条约虽然是以平等的语气签订了，但是不是平等还得看内容。在条约中，提到了两国友好，可以自由平等地来往。这话非常好听，其实了解美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在这段时间，美国正处于经济大开发阶段，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蒲安臣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从中国引进大量的劳动力。

到光绪继位，中国已经有二十多万劳动力前往美国了，他们主要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譬如修铁路，挖煤矿、金矿等等。事实证明，美国的“合作外交”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质，这些华工到了美国后，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许多人猝死在工作岗位，最令人气愤的是许多白人迫害华人，无辜被杀的华人不在少数。

我们再来看看教案问题，教案问题是晚清一个很大的问题，许多外交危机都是由教案引起的。传教士与官方的冲突倒不是很明显，教

案冲突主要还是一种文化冲突，中国的许多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些洋人的上帝。再加上中国与列强的战争中，中国一再战败，这无疑在老百姓心里对洋人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百姓中盛传教堂中的神父都是一些魔鬼，他们经常会偷偷抓走小孩，把小孩的眼睛和心脏挖出来，然后泡在化学液体中，用作实验。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中，民教冲突也毫不奇怪了。就拿天津教案来说吧，其实双方都是起源于一种误解。百姓听信谣言，认为神父做一些伤天害理的勾当，群情汹涌，不辨真伪，把教堂包围起来。攻陷教堂之后，接着便是我们熟悉的打砸抢烧，这些事情势必会引起外交冲突。

清廷让曾国藩处理教案事件，曾国藩为了息事宁人，似乎有意“偏袒”洋人，结果引起了公愤。其实曾国藩也没有办法，他从大局着想，不可能纵容那些暴民。暴民容易被愤怒左右，而愤怒从来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朝廷本来对曾国藩疑心很重，正好借着这个由头，让李鸿章替代曾国藩，曾国藩被调回原来两江总督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应该重点说说日本，中国近代史最主要的精力还是和日本较量，而且在这个较量过程中，我们一输再输。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可谓是刻骨铭心，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我们自己倒没有什么，日本这个邻居反倒有深刻的危机感。他们模仿勾践，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国力。

一旦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崛起，日本立即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朝鲜就是日本向东亚扩张的跳板。日本积极对朝鲜展开外交攻势，外交攻势往往是军事进攻的一个前兆。李鸿章特派袁世凯前往朝鲜处理日本问题，袁世凯是一个态度强硬的人，在朝鲜问题上有得有失，但最终还是没有阻止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

至于中俄关系就更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从康熙开始，中国与俄国就没有安宁过。伊犁叛乱发生后，清廷曾希望俄国能够伸出援手，但俄国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俄国想占领伊犁，控制新疆。左宗棠西征大军来到后，与俄国进行了交涉。最终左宗棠兵锋犀利，俄国慑于他的威势，不得不放弃控制新疆的企图。

这一时期是暴风雨酝酿的时期，列强环伺，而中国又缺乏一个能够纵览世界大势的领袖。而且中国内部问题相当多，统治阶级在许多问题上意见都是分裂的，这样一个低效率互相牵制的政府显然不足以应付这么多的内忧外患。

第三章 打仗还得靠左宗棠

晚清史是一段屈辱史，左宗棠西征总算给清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收复了新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左宗棠能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不光是因为他善于用兵，更是因为他有一股强烈的爱国精神。在出征的时候，左宗棠让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由此可见他的决心。

左宗棠不爽李鸿章

鸦片战争后，中国就没少接受炮火的洗礼。

1874年，日本悍然发兵台湾，中国竟然被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欺负，不仅损失了琉球岛，而且还要赔给日本一笔巨款。这场战争让清廷意识到中国海防的薄弱，11月5日，以李鸿章为首的总理衙门呈上了一份奏折，强调必须加强海防，重点提出练兵、引进新式武器、多造船的策略。11月19日，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呈奏《海洋水师章程》，请求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分别守卫北海、东海、南海三面海域。

李鸿章更是呈奏了一篇“万言书”——《筹议海防折》，条分缕析，说中国江海门户大开，敌人可以随便出入，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只有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才能确保江海门户的安全。如果李鸿章只是建议加强海防的话，倒不会引起太多的争执，关键的是他还说自古清廷一直重视西北的边防，但现在形势发生了改变，政府应该更加重视海防。

李鸿章的意思是政府应该把海防当成头等大事，至于西北边防相对没有那么重要，李鸿章还抱怨说西北即使平安无事，每年还耗费三百多万两银子，很不值。当时，新疆问题很严重，俄国军队已经侵入伊犁，左宗棠听说李鸿章建议暂缓西征，立即跳了起来。

左宗棠当时是陕甘总督，主持西北的防务，如果清廷采纳李鸿章的建议，必定削减西北的军费。左宗棠立即上了一道奏章：“海防固然重要，塞防也很重要，两者不可偏废，新疆一定要收复。”

清廷经过反复考量，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海防与边防并重，一面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一面让李鸿章办理北洋海防事务，沈葆楨办理南洋海防事务。

当时清廷财政比较拮据，最后不得不放弃同时建立三支海军的打算，决定先打造北洋海军。李鸿章着手建立北洋海军后，建议朝廷购买外国战舰，清廷没办法，只好在国外购买了46艘战舰。此外，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也造了23艘小型舰船。

1885年10月，清廷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1888年海军衙门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留英的海军人才林泰曾、刘步蟾为总兵。除了北洋舰队之外，清廷也在陆续建立广东、福建、南洋三支舰队。

抬着棺材上战场

在清朝时，新疆是一块是非之地，动乱频繁。

1864年，新疆爆发了反清武装起义，整个新疆陷入动乱和割据之中。1865年，浩罕汗国在英国的支持下，派遣大将阿古柏入侵新疆。阿古柏进入新疆后，先后剿灭新疆的割据势力，自封为“洪福之王”。之后，阿古柏又攻占了吐鲁番，翻越天山后，又占领了乌鲁木齐。

阿古柏还和英国、俄国勾结。1871年5月，趁阿古柏北进之机，沙俄入侵伊犁，并放话说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左宗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命收复新疆，当时左宗棠已经六十多岁，而且身体还有病。左宗棠是一个战神，国家有战事，怎肯托病推辞？

1876年，左宗棠率领三路清军向新疆进发。进入新疆后，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先收复了乌鲁木齐及其周边地区，然后开始攻打吐鲁番，战神出手，果然不凡，不到半年时间，左宗棠就收复了北疆大部分地区。

进入南疆后，左宗棠号召新疆各族人民拿起武器，共同进击侵略者。1877年，阿古柏被左宗棠打败，兵败身亡。1878年，左宗棠又收复了和田，处决了勾结外敌的金相印。至此，除了伊犁外，新疆全境已收复。

晚清史是一段屈辱史，左宗棠西征总算给清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收复了新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左宗棠能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不光是因为他善于用兵，更是因为他有一股强烈的爱国精神。在出征的时候，左宗棠让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由此可见他战死沙场的决心。

左宗棠很清楚，征途还没完，新疆还有一座孤城等着他收复。这

次，左宗棠面对的是俄国人。年近69岁的左宗棠开始整顿兵马，指挥三军再出玉门关，将大军部署在哈密，准备跟俄国人大战一场。

俄国当时正在克里米亚地区作战，看到左宗棠兵临伊犁城下，觉得如果跟左宗棠硬拼可能讨不到好处。左宗棠军队的锐气沙俄是亲眼看到了，事到如今，他们觉得还是谈判为妙。

1878年6月，清廷派遣吏部右侍郎崇厚前赴伊犁和俄国谈判，崇厚根本不是谈判的料，在狡猾的俄国人面前，他一再被愚弄，于第二年10月2日和俄国人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根据条约，清廷赔偿俄国五百万两白银，并将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土地割让给俄国，允许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经商并全部免税，还必须允许俄国人经过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通商……

这个条约签订后，清廷上下一片沸腾，慈禧一怒之下将崇厚革职查办，刑部判定为“斩监候”。随后，清廷照会俄国：崇厚没有权力签订这个条约，条约无效。清廷决定另派代表和俄国谈判，这次派遣的人是曾国藩次子曾纪泽。清廷一面让曾纪泽去谈判，一面让左宗棠调兵备战。

俄国人好不容易忽悠崇厚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听说清廷宣布条约作废，顿时恼羞成怒。俄国公使闯进总理衙门，对着清廷官员叫嚣：“你们敢撕毁条约，我们就动武。”

1880年7月，曾纪泽抵达彼得堡。双方开始了一场艰苦的谈判，俄国代表坚称条约不能作废，不仅不能作废，连修改都不行，甚至还要中国将沿海地方作为通商港口，还要清廷增加赔偿，否则就用武力说话。

为了给谈判增加筹码，俄国向伊犁增兵，还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部署重兵。曾纪泽在出发前，李鸿章就叮嘱他：“通商的事好商量，但是领土一定要保全。”曾纪泽毕竟是曾国藩的儿子，虎父无犬子，经过半年艰辛的谈判，1881年2月，双方在彼得堡签订了《伊犁条约》。根据新条约，中国收复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的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俄国商人可以在新疆自由贸易，不需要缴税，此外给俄国赔偿五百多万两白银。

虽然这也是个不平等条约，但相比上一个条约要好许多，在中国四面楚歌的境地下，能够争取到这样的利益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苛求曾纪泽，谈判毕竟还是要用国力说话的。

《伊犁条约》签订第二年，清军就入驻伊犁。左宗棠担心新疆会再次出乱子，奏请刘锦棠出任新疆巡抚，受陕甘总督节制。在左宗棠

和刘锦棠的努力下，新疆再次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强悍的冯子材

西北战事才平息，东南沿海一带战火又烧了起来。

1883年12月，法国入侵越南，中国也介入了这场战争。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这些军事实力比较强的人纷纷主张对法作战，李鸿章却倾向于求和。

清廷高层主意未定，一方面派遣军队进入越南，另一方面再三叮嘱千万不能主动袭击法军。

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大大削弱了前方将士的士气，战争一开始，清军就全面溃败，最后，慈禧罢免恭亲王，让李鸿章与法国人谈判。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代表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诺撤回边境上的清军。

详细的条款由曾国荃与法国代表谈判，中法双方谈判时，法军却很不安分，屡屡在中越边境上滋事。随后，法军准备由海路进攻福州。在福州马尾海域，中国海军第一次与法军展开了激战。

马尾港口位于福建福州东南，福州造船厂就在这个港口里。马尾港是一个河港，四面环山，水很深，可以停泊战舰。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港口，到处是炮台。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居然将舰队驶入马尾港，还口口声称自己不过是来旅游。

当时清廷有个政策：不可对列强轻启战端。所以，福建海疆大臣张佩纶和闽浙总督何璟非但没有阻止孤拔，还盛情款待法国海军，仿佛五百年前是一家。

1884年8月22日，法国政府电告孤拔，让他歼灭中国福建水师。孤拔准备第二天下午开战，在这个节骨眼上，福建海军很多官兵上书李鸿章，请求派遣北洋水师来增援。李鸿章是主张求和的，下令福建海军不要抵抗。8月23日上午8点，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泰向何如璋发出最后通牒，让福建海军立即撤出马尾港，否则就开战。

何如璋接到法国人的通牒后，不仅没有备战，反而请求法国人宽限几日。没想到孤拔说到做到，当天下午就炮轰马尾港，福建海军虽然备战不足，但还是进行了激烈的反击。战斗持续的时间很短，仅仅半个小时就分出了胜负，福建舰队十一艘舰艇全部被击沉，伤亡七百多人。法军方面，两艘鱼雷艇受重创，死伤三十多人。

第二天，法军将马尾港的造船厂摧毁，之后，又将马尾港两岸的炮台击毁。

马尾海战是中国创建海军以来第一次作战，没想到开门黑，居然全军被法国吃掉。

战后，清廷认识到法国人的真面目，不得不在8月26日对法军宣战，并派遣陆军进入越南，准备与法军同时展开陆战和海战。

在海上战场，法国舰队进攻台湾，占据基隆。台湾巡抚刘铭传兵力不足，在淡水一带坚守。法军尽管占领了基隆，但是无法再推进，他们不断地侵犯台北，并骚扰浙江沿海。中国军队也不是好惹的，他们奋起反击，让法军难进咫尺，在攻打招宝山炮台的战斗中，孤拔的座舰被击中，孤拔本人身受重伤，不久便死去了。

在中越边境地带，中越也正在进行激烈的交火。

1884年底，越南军将领刘永福配合清军将宣光城中的法军围困了三个多月，就在法军陷入绝境的时候，援兵赶到，对驻扎在谅山的清军发动了进攻。当时指挥清军的是广西巡抚潘鼎新，他看法军来势凶猛，下令后撤。法军就这样轻松占领了广西的门户镇南关。占领镇南关之后，法军还在上面树立一个木牌，上面写着：“广西的门户已经不存在了。”

潘鼎新抵抗不力，清廷革去他巡抚之职，任命年近七十的冯子材取代他。冯子材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他到广西后，积极备战，挖掘防御工事。3月23日，法军兵分三路，进攻清军基地。在冯子材的指挥下，清军作战勇猛，成功击败法军。第二天，法军再次猛攻清军基地，冯子材亲临长墙，对将士们说：“如果再让法军入关，我们有什么面目回去见家乡父老呢？”说完，冯子材手持长矛，跳出长墙，和法军展开肉搏。清军上下看主帅如此英勇，个个舍命冲上去。法军万万没料到清军会如此英勇，抵挡不住，纷纷溃退。

就这样，冯子材取得了镇南关大捷，随后，冯子材又乘胜出击，收复了谅山。谅山一仗，清军击毙法军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粮草。这是法国在侵略越南和中国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挫折，清军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胜利首先要感谢冯子材这样铁骨铮铮的爱国将领。

镇南关大捷之后，李鸿章立即以此为筹码，让法国回到谈判桌上来。双方签订了对中国不平等的《中法新约》，当时很多人很气愤，说：“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第四章 太后垂帘，光绪紧张

光绪是一个胆小的孩子，最怕打雷，读书的时候，如果碰到打雷，光绪都会吓得跳进老师的怀里。翁同龢就抱着他，安抚说：“别怕别怕，很快就过去的。”

又一个傀儡皇帝

同治去世后，继承人问题摆在大家面前。选择谁当皇帝好呢？

这时候，太后大权独揽，一般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太后必定是选择一个跟自己关系近的人当皇帝，而且还必须是个年幼的孩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将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说实话，这时候皇室中最有实力的就是恭亲王奕訢了，而且奕訢能力突出，在大臣中有很高的威望，具备当皇帝的基础。但慈禧肯定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奕訢如果当皇帝，她这个太后就不用混了，迟早得回后宫天天看戏。而且奕訢如果当皇帝，会削弱咸丰和同治的地位，他本来就是咸丰的竞争对手。奕訢当皇帝对国家有好处，但是对太后很不利，考虑到太后已经将朝政基本控制在手中，奕訢没有当皇帝的可能。

最好的情况是在同治的下一辈中选择一个溥字辈的当皇帝，这样同治就有父皇之尊，然而慈禧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慈禧已经是太后了，如果再选溥字辈的，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地位固然尊崇，却不便实行垂帘听政。为了继续垂帘，慈禧决定还是在同治的兄弟中选择一个。

慈禧心里其实早有了合适的人选，但她并没有直接提出来，而是装模作样地召集大家在养心殿东暖阁讨论。

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意见不统一。慈禧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时，慈禧对李鸿藻使眼色，李鸿藻立即站出来说：“醇亲王奕訢之子载湫适合继承大统，等载湫有了子嗣，立即过继给大行皇帝。”

慈禧点头：“李大人的意见很好，载湫的血缘与大行皇帝比较近，又是大行皇帝的弟弟，适合入承大统。”

慈禧还提出，将载湫过继给咸丰，这样一来，她还是母亲，还是

皇太后。

大家都知道，光绪的母亲是慈禧的亲妹妹，慈禧一表态，大家都懂是什么意思了。

没人敢提出反对意见，不过反应最激烈的还是载湫的父亲奕譞，听说自己的儿子要当皇帝，他不但不高兴，反而觉得大祸临头。双脚瘫软，突然跪在地上，大哭：“太后啊，载湫何德何能可以当嗣皇帝，请太后另择贤能吧！”

看到他如此反应，慈禧倒心安了：你还知趣，知趣的人会有好报的。

当时载湫只有四岁，小小年纪自然什么都不懂。他在家玩耍的时候，忽然有人把他抬到皇宫里去。从此以后，载湫就变成了慈禧的儿子。

王公贵族虽然不敢对慈禧的所作所为提出反对，但朝中不乏一些敢于直谏的正直官员。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就是其中一位，他上了一道奏折，首先肯定慈禧的做法是为国家考虑，接着又要求颁布铁券，明确将来光绪帝的子嗣永远过继给同治帝，他还建议慈禧召集王公大臣一起讨论。广安的奏折表面上是赞同慈禧，其实是对慈禧所作所为表示不满，他担心慈禧将来还会任意废立，所以想用铁券约束慈禧。

慈禧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女人，自然不会看不出广安的动机。慈禧下了一道懿旨，严厉批评广安，让他老老实实的，不要多管闲事。

慈禧这招并没有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吏部主事吴可读是一个相当刚烈的人，慈禧的所作所为让他联想到汉朝的吕后。他觉得长期下去，国家必有大难，思前想后，居然选择了尸谏。吴可读希望用自杀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他还留下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说慈禧为咸丰立嗣，没有为同治立嗣是大错特错，吴可读要求慈禧降旨，将来大统仍然归于同治。吴可读还说，如果破坏了祖制，是毁坏国本的行为。

面对尸谏，慈禧居然没有大怒，而是一招太极，巧妙化解。她居然对大臣们说：“吴大人的意见哀家不是没有考虑过，不过这事情还得大家再讨论一下。”

慈禧早已提前跟一些官员沟通过，大家纷纷站出来谴责吴可读，说他勇气可嘉行为不妥。就在大家把吴可读批评得一无是处的时候，慈禧却站出来说：“吴大人的心意是非常好的，这种为国尽忠不惜一死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但是他思想错了，好心办了坏事。无论如何，对于这些的官员我们应该保留一份敬意。”

双簧戏唱完，再也没有反对的意见了。

可怜孩子遇上慈祥恩师

光绪帝从小就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他本应该在母亲的膝下过一种简单快乐的生活，这对于他的成长才是有利的。

当他被接入冰冷的皇宫中时，就注定了命运的悲剧。

慈禧还不让光绪叫自己母后，而是称呼自己为“亲爸爸”。为什么要叫“亲爸爸”呢？这跟慈禧身上的权欲和男性气质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女人，她很希望像男人一样君临天下。太后这个身份总让她觉得有所缺憾，光绪虽然是过继来的，但她很希望这孩子把自己当成是父皇，而不是母后。

儿子当上皇帝后，醇亲王是非常担心的。慈禧跟自己亲儿子同治之间的剑拔弩张他是看在眼里，他很担心这样的命运将来会出现在自己儿子身上。在载湉刚刚出生时，醇亲王曾经为他算过命，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将来有当皇帝的命，可惜一生充满坎坷啊！

当时，醇亲王不信，心想我不过是一个王爷，儿子怎么可能当上皇帝。现在儿子真当上了皇帝，他才知道算命先生所说不虚啊，现在最让他提心吊胆的是“一生坎坷”。醇亲王总觉得，与其做一个命运坎坷的皇帝，倒不如安享平凡的幸福。

当然，他很清楚，自己操再多的心也不管用，儿子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慈禧手中。

光绪现在还小，什么都会听他这个“亲爸爸”的，但是将来这孩子长大后，是不是还这样听话呢？慈禧可不敢保证，所以必须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他塑造成自己需要的傀儡。

进宫之后，光绪接连失去了父爱母爱，整天要面对的是一个冰冷的“亲爸爸”。尽管年纪很小，他很快就明白，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亲爸爸”手中。“亲爸爸”一个不高兴，可以随意处置自己。

连梁启超都说，中国皇帝中最苦的莫过于光绪帝，一般人都有父母之爱，可以在父母面前撒娇。只有光绪帝孤零零地面对着威严的“亲爸爸”，其他人哪敢亲近这个皇帝啊，这个“亲爸爸”呢，满脑子想的都是权力，怎么可能会给光绪母爱或是父爱呢？再说了，慈禧骄奢淫逸，心思怎么会放在光绪身上。慈禧在光绪心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威权，这让年幼的光绪倍感压抑。

真正给了光绪帝父爱的倒是他的老师翁同龢，在光绪六岁时，慈禧为他挑选了一个老师，此人便是同治帝的老师翁同龢。翁同龢中过状元，学问精深，为人严谨，是最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

翁同龢对学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但是这对师生关系还是比较好的。慈禧也经常过问光绪的读书情况，翁同龢也不隐瞒，实话告诉她，有时候光绪读书走神，心不专一。慈禧听说后，晚上回去必定责骂光绪，光绪是个心灵比较敏感脆弱的孩子，慈禧一责骂，他往往整个晚上都在伤心哭泣。

到了第二天，翁同龢给他授课时，光绪居然凄然落泪。翁同龢大惊，他没想到光绪心里会有这么多的悲伤，小小年纪居然如此伤感，他从心里十分可怜这个小皇帝。每每这时，翁同龢不会勉强光绪读书，而是抚摸他的脑袋，安抚他，让他不要伤心，不要想太多，说太后也是为你好之类的话。

翁同龢与光绪的交往长达二十三年，期间，如无要紧事，翁同龢一般每天都会见光绪，君臣关系宛若父子。可以说，光绪帝的人格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翁同龢的影响，在光绪帝的童年和青少年，皇宫中他唯一信任的人也是翁同龢。

翁同龢也知道，光绪虽然是皇帝，但其实是个没人疼的可怜孩子，自己既然当了他的老师，除了教他学问之外，也应该多给他一些关爱。翁同龢自己没有儿子，在心里他也确实是把光绪当成自己的儿子。

光绪是一个胆小的孩子，最怕打雷，读书的时候，如果碰到打雷，都会吓得跳进老师的怀里。翁同龢就抱着他，安抚说：“别怕别怕，很快就过去的。”

翁同龢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他给光绪慈爱是好的，但没想到让光绪在心里对他形成了一种依赖，这对于一个平常人来说都是不好的，更何况是一个帝王。一个帝王如果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是很难做成大事的。

这说明翁同龢在教育上出了问题，他教给光绪知识和学问，却没有教他如何独立，成为一个刚强的君主。慈爱过多有时候反而不好，一旦翁同龢生病了，不能过来，光绪就思念深切，还派人去问他病情，说自己特别想念老师。翁同龢看到皇帝如此重感情，抱病前去上课，看到翁老师来了，光绪才感觉心情好转。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光绪心里极度缺乏关爱和安全感，翁同龢善良可亲，为人正直，让他感觉很安全，值得信赖。师生之情逐渐被

一种类似于父子之情替代，这是一个离开父亲的孩子正常的心理诉求。

在光绪童年和少年时，几乎是一天也离不开翁同龢。有一次，翁同龢要回乡扫墓，安慰了好半天才说服光绪，让他不要难过，老师很快就回来。光绪流着眼泪说：“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啊！”

光绪十二岁时，慈禧任命翁同龢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显得更忙一些。除了要教光绪课程，还得去军机处上班，参与国家大事。翁同龢经常教光绪如何审阅奏折，如何处理政事，日积月累，光绪对政治有了更深的了解，更让他揪心的是，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时候，需要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光绪的使命感就是在这时建立的。

光绪十年（1884年），翁同龢将光绪两年来写的四篇政论裱糊起来，作为收礼献给慈禧。慈禧认真地看了论文，颇为自豪，这些政论虽然文笔幼稚，但其中不乏一股励志图强的精神。

亲政以后，光绪也时时不忘去上书房向翁老师请教。翁同龢虽然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但是思想并不保守，甲午战争之后，他清楚地看到，如果不学习西方，中国必定会落后。

戊戌变法时，翁同龢在背后力挺光绪，但这场变法最终胎死腹中。光绪的势力还远远不足以和慈禧抗衡，变法流产之后，翁同龢也被罢官。

翁同龢回乡前，光绪为他送行，师生二人热泪盈眶，相拥大哭。翁同龢回乡后，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一旦慈禧从京城发出自裁的谕旨，他便立即自杀。幸好慈禧倒也没有除掉他的意思，1904年7月3日，翁同龢在老家常熟病逝。

临终前，翁同龢口占一首诗，希望光绪能发愤图强，将来振兴中国：

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

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权术太监李莲英

光绪进宫后，贴身太监是王商，在我们印象里，太监都是一群心理阴暗的小人。其实不然，太监中也有很多好人，这个王商就是一个不错的太监。

他对光绪照顾得很周到，当然他不可能进入光绪的心灵，像翁同龢那样照顾光绪，他的身份毕竟是奴才，不可能跟主子的关系过于亲近。王商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光绪的饮食起居，甚至比光绪的乳母还要周到。

但是，在这个宫里有一个太监权势熏天，这便是总管太监李莲英。安德海死后，李莲英善于揣摩圣意，很快就取代安德海成为总管太监。

李莲英这个人阴险刻毒，长相猥琐，但很会做人，他知道在这宫里只有慈禧太后才拥有绝对权威，只要靠紧了这棵大树，自己就可以为非作歹。

光绪刚进宫就跟李莲英不和，那时候光绪还是一个小孩子，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怕李莲英，光绪很直接对李莲英说：“你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丑？难看死了，你快别出现在我面前，我很怕你这长相。”

李莲英一听，表情凝固了，虽然对方是个小孩子，但毕竟是皇帝啊，皇帝讨厌自己，将来长大了可要修理自己了。像李莲英这样阴险的小人，宫里没人敢得罪他，光绪一个小孩得罪了他，他都要报复，何况是其他人。

李莲英的报复方式也没什么特别的，无非是在慈禧面前说光绪这不好那不好，让慈禧责备光绪。李莲英还经常指责翁同龢和光绪师生，说翁同龢不好好教书，光绪也不好好学，实在有负老佛爷的厚望。

很多时候，光绪受到慈禧的责骂，其实是李莲英挑拨的，当时光绪年幼，怎么知道人心这么险恶。

从此以后，李莲英就是光绪的死对头，光绪真没想到，一个太监居然能让自己这个皇帝不得安宁。后来慈禧发动政变，废掉光绪，也有李莲英的参与。

李莲英是一个权术高手，他就像慈禧的一个影子，他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反映了慈禧的利益。作为一个奴才，李莲英对慈禧忠心不二，慈禧也对他极为放心。随着李莲英权势膨胀，朝野上下开始不安，大臣们担心宦官干政的事情会出现在大清朝，纷纷上疏，请求慈禧能够抑制李莲英。

李莲英是慈禧的一把利器，她怎么可能因为大臣们的一番话舍弃这个利器。事实上，随着光绪的成长，他已经感觉到李莲英就像一个难缠的梦魇，感觉到这个李莲英比“亲爸爸”还难对付。

但李莲英毕竟是一个聪明人，他第一原则是绝对效忠慈禧太后，在不违背第一原则之下，他还是愿意做一些事情讨好光绪的。毕竟光绪是皇帝，万一哪天慈禧真的放权，自己的生死就取决于光绪，所以自光绪亲政后，李莲英对光绪还是非常巴结讨好的。凭着这些左右逢源的生存技巧，李莲英在宫中稳坐太监第一宝座。

光绪被囚禁瀛台时，李莲英还经常去看他，李莲英相当精明，他知道政治就像潮流，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事情。一朝光绪复出，一定会感念自己在他失势时去看他。

光绪最终没有机会复出就死去了。李莲英后来离开了宫里，回到老家北京棉花胡同，终日吃斋念佛，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宣统三年二月初四，李莲英病死在家中。当然也有人说李莲英是被人谋杀的，不过这种说法证据不足。

慈安离奇暴毙

光绪六年（1880年），慈禧生了大病，躺在床上几个月不能起来。

御医对慈禧的病束手无策，后来浙江巡抚谭钟麟推荐了一个民间医生治好了慈禧的病。这个医生名叫薛宝田，是江苏如皋人，医术高超，有妙手回春的本领。

根据这位民间医生的记载，他在为慈禧诊治的时候，也顺便为慈安太后把脉，发现慈安太后脉象正常，身体也还好。

没想到，慈禧的病刚好不久，慈安太后就离奇去世。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晚上七八点左右，宫里忽然传来慈安太后离世的新闻，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自然引起了种种猜测。

我们先来看官方发布的文告：初九，慈安太后身体不舒服，请了御医诊治，以为不是大病，很快就可以好，没想到第二天病情就加重，御医前来诊治，束手无策，没想到这一病竟然无药可医，慈安太后就此离世。

这个报告可信吗？说实话，没几个人相信，初九生病，初十就死了，这简直就是暴毙啊，慈安是一个心地比较淡泊的女人，说她暴毙真不可信。

还有一个说法是她是被人毒死的，这个说法主要是记载在野史中，尽管是野史的说法，但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很多人都持这种看

法。如果说慈安是被毒死的，凶手就不言自明了。

慈禧有毒死慈安的动机吗？

确实有，在咸丰的遗诏里，咸丰给予了两宫太后不一样权力，给予慈安的权力更大，他曾经密令慈安，如果慈禧擅权的话，可以采取非常手段。慈禧后来逐渐控制了大权，慈安的权力逐渐变小，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她还是有一定权力，对于慈禧的一些行为她多少还是可以提出意见和批评的。慈禧毒死她，等于是除掉一个对手，除掉一个威胁。

我们知道，慈禧是非常重视太监李莲英的，而李莲英呢也为虎作伥，骄纵不法，弄权乱纲。对于这种行为，慈安是非常看不惯的，禁止宦官干政是清朝的祖制，慈安作为一个正宫太后，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当年，她支持同治除掉安德海就证明了她绝非一个不问世事的太后。李莲英的眼里只有慈禧，对慈安很不尊重，有一次慈安经过时，李莲英居然跟其他太监在玩耍，对慈安视而不见，慈安非常生气，就找到慈禧，对慈禧一顿批评。慈禧很不服，心想我现在才是手握实权的太后啊，你凭什么批评我啊！就这样，两人关系日渐冷漠。

还有，光绪六年到东陵祭奠时，慈安认为是正宫太后，要求在典礼中把自己排在慈禧的前面。慈禧哪里肯作罢，最后经人调停，两个太后排名不分先后，这才化解了一场风波。不过，慈禧心里已然种下了恨的种子，她觉得慈安不除掉，始终是一个麻烦。

最后，慈禧曾经将一个姓金的优伶弄到自己的床上，慈安对这种行为很不齿，对慈禧进行了一顿严厉批评。慈禧当时虽然认错了，还赐死了这个优伶，但也下定决心要除掉慈安。

除了野史的记载外，光绪的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也认为是慈禧毒死了慈安。他说那天慈安在花园里玩金鱼，慈禧让太监给慈安送了一盒糕点，慈安尝了一口，然后就病倒了。

考虑到恽毓鼎是光绪的臣子，而光绪又跟慈禧是对头，所以他的说法也未必可信。

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慈禧毒死了慈安，其实在宫廷里，有很多无头案件，根本不可能查出来。当时有很多人跟我们的想法一样，都怀疑是慈禧干的，但是又没有什么证据。

左宗棠就是其中之一，左宗棠听说慈安死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呢？”

说句公道话，以慈安的水平，对慈禧并构不成太大的威胁，但终究是一个束手束脚的羁绊。慈安死后，慈禧的日子确实舒坦不少，再也没有人敢对她说三道四了。

不管慈安是不是慈禧杀的，慈禧很清楚自己是逃脱不了嫌疑的。如何洗刷自己的嫌疑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重视慈安的丧事，坦然面对别人的怀疑，慈安的丧事虽然谈不上有多隆重，但也符合清朝的礼制，换句话说，慈禧并没有怠慢慈安的丧事。也没有过分抬高，过分抬高的话反而容易被人认为是心虚。

军机处大换血

慈安太后去世后，恭亲王奕訢更加孤掌难鸣。

长期的政治斗争已经挫伤了奕訢的锐气，这正是慈禧希望看到的。随着光绪一天天地长大，如果奕訢仍然野心不死，力挺光绪反对自己，那还真不好招架。幸运的是，奕訢这头昔日的老虎已经变成了病猫，那么，事态的发展应该可以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

根据清朝的祖制，小皇帝到了十四岁就应该亲政了，这是自顺治以来便一直沿袭的规矩。慈禧第一个打破这个规矩，同治直到十八岁才亲政，当然慈禧有很多借口，说同治这个孩子顽劣不堪、朽木难雕等等。

光绪马上就到十四岁了，慈禧又会找什么样的借口阻止他亲政呢？

这次，慈禧什么借口也没找，闭口不提皇帝亲政的事。大臣们早已窥破慈禧的心理，也没人敢提此事。曾经犀利的恭亲王这时候也一副与世沉浮的样子，不敢跟慈禧作对。就这样，光绪的十四岁就这么平静地过去了。

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入侵越南，同时用武力威胁清政府，要求清廷答应他们的条件。全国上下笼罩在战争的阴云里，朝野上下又开始了主战主和的讨论，李鸿藻、左宗棠等人主张一战较高低，认为法国侵吞越南的真实目的是以越南为跳板，进一步入侵中国。主和派的代表李鸿章则认为法国军事力量远胜清军，如果开战的话，得不偿失，请求奕訢跟法国和谈。李鸿章还说实在要打的话也只能采取游击战，派遣军队入越南伏击法军，千万不能跟他们正面对碰。

面对这两种态度，慈禧也没有定见，她很清楚自己玩弄权术很高

明，但说到军事大事就是外行了。所以，慈禧让李鸿章全权处理此事。慈禧的态度不明朗，奕䜣的态度也很模糊。

奕䜣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让大臣们很不解，危急关头，当断不断最是失策。但我们也不能苛责奕䜣，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恭亲王早已死在慈禧的手中了，现在的奕䜣心如死灰。他知道不管自己怎么做，也不管是做好做坏，最后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奕䜣很清楚，自己是慈禧的眼中钉，功劳越大，死得越快。眼看光绪亲政的问题一天比一天迫近，如果光绪真的亲政，肯定重用自己。但慈禧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在光绪完全亲政之前，慈禧一定会在政治上击垮自己。

奕䜣只是不想再做冤大头了。

奕䜣之所以不敢轻易表态是因为他被整怕了，即使要表态他也要先揣摩好慈禧的意思。刚开始的时候，慈禧偏向李鸿章的看法，认为最好是主和。奕䜣就跟着说：“最好不要轻启战端。”后来，国内主战的声音越来越高，慈禧受这种热情感染，忽然从鸽派变成了鹰派。奕䜣揣摩到慈禧的意思，也说：“可以打。”

奕䜣这种骑墙的态度引起了许多大臣的不满，慈禧似乎也对他很愤怒。奕䜣感觉到了这点，又百般讨好慈禧，在慈禧的大寿上大花心思。

慈禧心想，你以为讨好我就可以逃过这一劫。

1884年，中法战争开打了，没想到清军果真不堪一击，在越南前线节节败退。慈禧立即拿这个当借口，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奕䜣的头上，并和醇亲王奕譞一起草拟了罢免奕䜣军机大臣等职的上谕。

军机处基本上都是奕䜣的亲信，如果慈禧只罢免奕䜣一个人，还不能说明她手段的狠辣，慈禧居然将所有军机大臣都罢免了。新的军机处人员全是慈禧的人马，短短的几天，慈禧就把这个帝国的中枢机构完全变成自己的后花园。

这次政府机构大改组又被称为甲申朝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朝变，因为从此以后，大清国就是慈禧一个人说了算。

架空光绪

光绪十六岁的时候，亲政问题终于提到了日程表上。光绪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无论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做人，都非常严谨，慈禧再也

不能以顽劣不堪为借口推迟他亲政的时间。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慈禧宣布明年将归政于光绪，慈禧还让钦天监选择吉日，明年正月举行亲政大典。

光绪的父亲奕譞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早就窥出慈禧不是真心归政，所以自己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如果露出志得意满的迹象，搞不好会跟奕□一个下场。善于揣摩人意的奕譞给慈禧上了一道奏章，请求太后用“训政”取代归政。奕譞知道，慈禧连自己的亲儿子同治都不肯归政，何况是隔了一层的光绪。

奕譞明白，这时候如果不学聪明一点，将来自己的孩子肯定要吃苦头的，所以果断地提出让太后训政。那意思很明白啊：太后，你继续掌权吧！

慈禧并没有答应，对，她在等。果然不久，奕譞带着王公大臣们一起请求太后训政，大臣们说皇帝太年轻了，经验不足，国家大事又不是儿戏，很多事情还要仰赖太后裁决。

慈禧一听说道：“你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那好吧，准奏。”

几天后，慈禧颁布了一道懿旨：“现在国家问题很多，国事繁重，皇帝刚刚亲政有很多问题还不了解，碰到一些不能决断的大事，哀家不能不在一旁提点。本来哀家不想过问政事，无奈王公大臣一再邀请，让哀家为国再尽一份力，哀家不敢因为死守教条而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勉强答应了，决定在皇上亲政后再训政几年。”

慈禧的措辞是非常得体的，但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这道懿旨一出，世铎等人立即赶制出一道《训政细则》，规定许多礼仪沿袭垂帘听政时制度。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十五日，亲政大典举行。光绪先带着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到慈宁门拜见慈禧太后，随后在太和殿受百官朝贺，接着便在保和殿举行宴会。

光绪当然明白，慈禧把权力牢牢地抓在她自己的手中，自己只不过是名义上亲政而已，手中并无可利用之兵，也无可用之权，军国大事还是慈禧一人说了算。光绪很不喜欢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好像被人挟持了一样，自己根本无法展开手脚，他决定搏一搏。

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光绪颁布一道谕旨，说自从咸丰皇帝去世，太后为国家操劳了近三十年，鞠躬尽瘁，宵衣旰食，为了大清呕心沥血，很少休息，他自幼受太后的教诲，不敢有丝毫松懈，作为一个儿子，他理应担起社稷之重任，让太后能够颐养天年，好生享

受。

光绪的话当然也说得漂亮，但是出这么一招是非常不明智的，慈禧是何等精明的女人，她还看不出他真正的用意。光绪的用意一出来，她将会视他为潜在的对手，从此对他倍加防范，让他更难施展拳脚。其实，光绪最好的做法不是跟慈禧斗，因为他还完全没有跟慈禧斗的资本，最好的办法就是顺着慈禧，让慈禧明白，他这个儿皇帝非常听话，你可以对他非常放心。

光绪这道谕旨出来后，立即有大臣上疏。礼亲王世铎又增加了一个《归政条目》，以《训政细则》为原本，这是给光绪量身打造的紧箍咒。

御史屠守仁上书请求慈禧仿效高宗乾隆训政之事，凡重要奏折一律先交付皇太后审阅。

慈禧一听，心里非常舒服，但是为了做出自己是真心归政的姿态，她严厉地批评了屠守仁。为了表明自己并不热衷权力，慈禧还移居到颐和园，在那里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其实，她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紫禁城，她时刻关注着文武百官的动向。

就像翁同龢说的，现在跟过去没什么两样，鸡毛蒜皮的事由皇帝裁决，稍微重要一点的事由军机大臣决断，碰到军国要事只有请示太后。

修建颐和园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最早是乾隆为了庆祝生母钮祜禄氏六十大寿建造的。后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将圆明园和颐和园一并烧毁。

慈禧早就有重修颐和园的意思，同治七年（1868年），御史德泰揣摩慈禧心意，上奏请求重修颐和园。这个提议遭到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大臣们的反对，只好不了了之。

同治结婚后，慈禧才有了修颐和园的打算，这时，李鸿藻又出来谏阻，慈禧只好作罢。同治亲政后，为了让慈禧放权，在她四十大寿时不顾众大臣反对，执意要重修颐和园。慈禧看众怒难犯，出来做事佬，这么一来，修园之事又搁了下来。

听说光绪要亲政，狡猾的奕訢又提出了修园之事。奕訢这么做自然是为了讨得慈禧的欢心，让慈禧对自己的儿子好一点，也是希望将来儿子亲政后能够有一番作为。儿子要想有作为，最好是希望慈禧太

后沉溺于享乐中。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五日，清廷成立了海军衙门，奕譞担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劻和李鸿章等人协助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当时清廷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建立一支先进的海军非常重要。

慈禧是个非常喜欢享乐的女人，她很早就想修颐和园了，当然那时候还叫清漪园。奕譞提出这个建议后，她立即批准，慈禧还把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取“颐养冲和”之意。

这次修园没有多少人反对了，因为反对的人基本上都不在朝堂上，在朝堂上的人就算有意见也不敢反对。

决议通过了还有一个问题，修园的钱哪里来呢？修园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国库中的钱应付内外需要还不够，又怎么可能用来修园呢？钱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老佛爷的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的话，奕譞知道后果很严重。他最后决定从自己主管的海军衙门中挪用经费，到底挪用了多少经费还是个谜，有的说有两千万两，有的说有三千万两，有的甚至说有八千万两。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数目一定很庞大。

既然数目庞大，那么海军怎么办呢？还需不需要发展呢？不需要了！老佛爷的享乐要比国防重要，所以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一点也不奇怪。

慈禧不光是修建颐和园，还大肆修建西苑三海，所需费用还是从海军军费里抽取。为了供奉慈禧，奕譞在掌管海军衙门的九年时间里，居然没有购置一艘新的战舰，甚至连一门火炮都没有更新。

反观日本明治天皇，非但没有让天下侍奉自己一人，反而节衣缩食，用自己的私房钱购买武器，为海军贡献一臂之力。

其实，从两国领导人这个小细节就可以看出国力的盛衰，胜负的规律，以及民族性的差异等等，谁说盛衰都是命运呢？

第五章 爱一个人好难——光绪与珍妃

光绪对珍妃的宠爱是非常明显的，他很欣赏珍妃那种敢爱敢恨的个性。光绪是一个极不自由的皇帝，但是他在珍妃身上看到了这种自由的个性。珍妃性格开朗，活泼好动，鬼灵精怪，好奇心重，完全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黄蓉啊！再加上珍妃对于宫里刻板的生活很厌恶，更讨厌宫里那些尔虞我诈斗来斗去的事情，光绪对这个妃子实在是太喜欢了，因为在珍妃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渴望却又缺少的东西，那就是潇洒和自由、率真与浪漫。

爱的就是珍妃

光绪直到十八岁还没有结婚，这在清朝皇帝中算是非常晚的。不是光绪不想结婚，而是慈禧没发话，他不敢结婚。慈禧推迟光绪成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防止他亲政，婚姻向来是成年和独立的标志，慈禧非常担心光绪一结婚，会要求自己放权。

等到光绪十八岁时，慈禧没法再拖下去了，总不能让皇帝打光棍吧！皇帝结婚自己做不了主，一切还得靠慈禧。那么，慈禧希望光绪有什么样的婚姻呢？很显然，慈禧不希望出现下一个阿鲁特氏，所以这场婚姻必定是政治婚姻。

慈禧倒是挺大方的，拨出五百万两银子为光绪操办婚事。皇后究竟是谁呢？除了慈禧谁也不知道，光绪心里也没谱。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初五，慈禧才公开谜底，皇后是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氏，这个叶赫那拉氏比光绪大三岁，长相也很一般。当时，叶赫那拉氏已经二十一岁，早已超过了选秀的年龄，慈禧公然违背祖制将她选为皇后，用心十分明显。

她绝不希望为光绪选一个恩爱佳人，皇后不过是安插在光绪身边的一个耳目，这个皇后就是后来的隆裕太后，她的长相和气质至今还保留在清宫的相框里，大家有空可以去瞻仰一下她的风采。此外，慈禧还为光绪选择了两个后妃，瑾妃和珍妃。光绪后来爱上了珍妃，虽然爱得很辛苦，好歹算是碰上一个自己爱的人。

就在婚礼进行得热热闹闹的时候，一场大火在太和门上燃烧起来，皇帝大婚遇大火，这可是很不吉利的征兆。大火很快就蔓延开来，一边在举行婚礼，一边在拼命扑火。翁同龢看到这景象，忍不住感叹：“这是天降奇灾啊，惊心动魄，奈何奈何。”

在翁同龢的心里，光绪是个苦命皇帝，这场灾难分明就预示着他将来的苦难。

婚礼虽然办得很豪华，但光绪对慈禧一手包办的政治婚姻很不满意，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木偶一样任人耍弄。根据礼制，婚后四天，要在太和殿宴请皇后家族的人。然而，光绪只请了王公大臣，没有请皇后家族的人。光绪这么做让慈禧很没面子，皇后家族也就是慈禧家族啊，这分明就是故意让慈禧难堪。

可以想见，光绪对这个皇后是很不满的。据说光绪小时候就见过隆裕皇后，当时就很不喜欢她，没想到长大以后居然成为了夫妻，那自然是更加反感了。

隆裕皇后也是个正常的女人，丈夫不喜欢她，她也感到憋屈。丈夫越冷落她，她就越是紧紧靠着慈禧这棵大树。也只有这样，她皇后的位子才能保得住，至于夫妻的情爱她已经不奢望了。

慈禧的御前女官德龄曾这样描述光绪和隆裕皇后新婚后的情状：

我在宫里头听许多人说，自从婚礼举行过后，光绪和静芬（隆裕皇后的小名）从不曾有半点亲热的态度，他们好像是同住在宫里的两个陌生人而已。除非逢到什么令节，或是参加什么典礼，使他们实在不能不开口之外，平时简直绝对没有攀谈过一次。

清宫里有一个“承幸簿”，这个本子相当于皇帝与后宫女人同房的备忘录。只有皇帝和太后能看这个本子，而且新皇帝登基后就必须把上一朝的“承幸簿”烧毁。本子上面极少出现隆裕皇后的名称，所以隆裕的感情生活是非常郁闷的。

光绪也很痛苦，他很清楚隆裕是慈禧安排在自己身边的一个棋子，他对慈禧很厌恶，对隆裕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光绪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皇帝，他是很需要感情的，终于，他在珍妃身上找到了这种感情。

珍妃是瑾妃的妹妹，她们都是侍郎长叙的女儿，姓他拉氏。珍妃比光绪小五岁，刚入宫时和她姐姐一样都是嫔。珍妃在这三个女人中长得是最漂亮的，加上她天资聪颖，很讨光绪喜欢。据说，刚入宫的时候慈禧也挺喜欢她的。和珍妃相比，她的姐姐瑾妃的气质和相貌就差好远，由于珍妃独享光绪的宠爱，瑾妃因此嫉恨珍妃，坚定地站

在隆裕这边，与自己的妹妹为敌。

珍妃是一个比较有自己想法的女生，而且兴趣很广泛，她自幼就很喜欢读书，尤其偏爱文史方面。珍妃的字也写得相当不错，据说她能够两只手同时写字。此外，珍妃还喜欢画画。慈禧听说她喜欢画画，让宫廷女画师缪嘉蕙女士教她，由此可见，刚开始的时候慈禧对她还是不错的。

德龄女士这样评价珍妃：“珍妃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物，玲珑剔透，正和她姐姐的愚蠢固执形成绝对的反比。”

1894年，适逢慈禧六十大寿，虽然同时也是甲午中日战争，但这一点也没影响慈禧祝寿的雅兴。她一高兴，就将瑾妃和珍妃从嫔提升到妃。

光绪对珍妃的宠爱是非常明显的，他很欣赏珍妃那种敢爱敢恨的个性。光绪是一个极不自由的皇帝，但是他在珍妃身上看到了这种自由的个性。珍妃性格开朗，活泼好动，鬼灵精怪，好奇心重，完全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黄蓉啊！再加上珍妃对于宫里刻板的生活很厌恶，更讨厌宫里那些尔虞我诈斗来斗去的事情，光绪对这个妃子实在是太喜欢了，因为在珍妃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渴望却又缺少的东西，那就是潇洒和自由、率真与浪漫。

在清宫第一个学会照相的就是珍妃，由此可见她对新事物的好奇。在珍妃入宫前，照相技术就传入中国，不过当时一些保守人物说照相这东西是“西洋淫巧之物”，还有人认为照相能够摄去人的魂魄，折损人的阳寿，要求禁止这东西流行开来。珍妃却偏不信这个邪，她让人偷偷买了一架相机，在宫里这儿拍拍，那儿拍拍，逐渐就变成了一个摄影爱好者。

像这种天真烂漫不守礼法的姑娘，光绪没有办法不喜欢。珍妃在服装上非常追求时尚，她不仅乐于尝试新式服装，还喜欢女扮男装，有时她甚至会穿上太监的衣服，在宫里走来走去。珍妃如果生活在现代，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娱乐演员吧。在珍妃眼里，礼法什么都不是，她居然敢穿着光绪的龙袍在宫里翩翩起舞。光绪烦闷的时候，一看到珍妃心情立即就好了。

慈禧对珍妃这种性格是很看不惯的，如果有嫔妃不守规矩的话，那后宫岂不要乱，老佛爷可不是个摆设。像这样一个张扬的女孩，自然让隆裕和瑾妃极为嫉恨，她们不停地在慈禧耳边煽风点火。慈禧也动辄教训珍妃，不过珍妃左耳进右耳出。

总的来说，光绪和珍妃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岁月，两人之间恩

恩爱爱，就像一对平凡的男女那样恋爱。德龄女士这样描写两人的恋情：

光绪后来完全忘了顾忌，他几乎每隔三四天工夫就要亲自上珍妃宫里去走一次，这和他每夜非召幸珍妃不可的事同样都成了宫中的绝妙谈资。

他为了心爱的女人，是决计不惜领受人家背后的议论的。或者说，在处理朝政和对付其他人的时候，他心上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一个万乘之尊的皇帝，可是一想到珍妃的时候，上天所赋予人类的好色的天性，已侵入了他浑身的神经系统，把那些自尊心、虚荣心等全赶走了，他几乎忘记了他所处的地位和四周的环境了。

光绪每天几乎和珍妃形影不离，这是慈禧和隆裕非常担心的，长期下去，皇后迟早要被废啊！也就是在这时，慈禧和隆裕有了默契：必须除掉这个不懂事的丫头！

棒打鸳鸯

有时候，慈禧在批阅奏章的时候，后宫的一些妃嫔也在一旁。珍妃精通文史，久而久之对朝政产生了兴趣，加上她天资聪颖，很快就学会了很多处理政事的方法。

如此一来，珍妃与光绪的交流也不再局限于琴棋书画或是新潮衣服了，她开始对政事发表自己的意见。珍妃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女孩子，她能够对朝政大事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意见又往往与光绪的想法不谋而合，让光绪产生了知己的感觉。

光绪曾经对珍妃说过这样的话：“这宫里实在太寂寞了，朕每天上朝回来，没有一个懂朕的人陪朕，除了爱妃你。”

光绪在批阅奏章的时候，甚至也把珍妃留在身边，让珍妃充当自己的下手，为自己处理政事。光绪也是个性情中人，他一时一刻都离不开珍妃，就像当年他离不开恩师翁同龢一样，光绪对珍妃的爱并不全部都是男女之爱，还有一种精神层面心理层面的需要。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寂寞的皇帝。

正因为心里过于寂寞，所以光绪置宫廷规矩于不顾，本来皇帝想宠幸一个妃子，必须妃子到皇帝的寝宫来的，皇帝如果自己跑到妃子的寝宫里，那就是不懂礼了。但光绪顾不得这么多，当他需要珍妃时，会连夜跑过去。

出头的椽子先烂。

珍妃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宫中有很多眼线正在盯着她，以她这种性格又是很容易给人抓住把柄的。

问题出在钱上面。

清朝妃嫔的工资是相当低的，一个妃子每年只有三百两的收入，嫔就更少了，只有二百两。珍妃不懂省钱之道，又酷爱新奇的玩意儿，自然每个月都入不敷出。那怎么办呢？找光绪要吗？找光绪要固然简单，但得过慈禧那一关啊，少不了要挨一顿臭骂。靠人不如靠自己，当时清宫上下都流行卖官鬻爵，珍妃虽然很有个性，可惜没有接受“五四”新思想，她也选择了这条发财路。

珍妃串通了几个太监，让他们帮着卖几个官职出去，这一下子就有钱了。钱如果来得太容易，很容易让人糊涂的。珍妃万万没有想到这事居然告到慈禧那里去了。慈禧可以挪用海军经费，却不允许珍妃利用权力获取一些零花钱，这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慈禧当面审问过珍妃几次，还在其家中搜出一个账本。慈禧让李莲英调查此事，发现了珍妃卖官鬻爵的证据。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一月，慈禧给珍妃定罪，罪名是“不遵家法，干预朝政”。从罪名中我们可以看出卖官鬻爵不过是一个借口，慈禧真正不满的是光绪宠爱珍妃，并经常与珍妃一起讨论政事。珍妃被当庭杖责，珍妃的贴身太监高万枝被当场处死，珍妃的哥哥志锐被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珍妃宫里的几十个太监和宫女也被发配充军。瑾妃也受到牵连，在这次事件中，珍妃和瑾妃都被降为贵人，过了一年，慈禧才恢复她们妃的身份。

给予珍妃惩罚后，慈禧还告诉她，要她从今以后谨言慎行、穿着要朴素，不要再痴迷于那些新奇的物件。

这次事件表面上是由珍妃卖官鬻爵引起，其实不过是后宫的一次政治事件。慈禧这么做实际是提防珍妃参政，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在晚清，卖官鬻爵早已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珍妃心里也很清楚慈禧是借这个事情在整自己。

芳魂坠落深井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战败。战争的惨败促使光

绪和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图谋变法，珍妃力挺光绪，坚决支持光绪变法。

珍妃这么做等于是重蹈干政的覆辙，但作为一个女人她没有其他选择，她爱光绪，愿意为他分担忧愁。当时光绪的势力远远不如慈禧，只有一些维新派支持光绪，在宫里，光绪就更加势单力孤，只有珍妃是可以信任的人。

光绪戊戌变法除了富国强民，也是为了跟慈禧争权，珍妃介入此事，让慈禧格外恼怒。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大肆搜捕维新派，珍妃也未能幸免。光绪被囚禁在瀛台，珍妃被幽禁在钟翠宫一个偏僻的地方。从此以后，光绪和珍妃再也不能见面。

被囚禁没多久，珍妃就死了，年仅二十五岁。

关于珍妃之死，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珍妃是投井而死，有人说被李莲英杀死的，还有人说珍妃是被崔玉贵推入井中而死。

究竟珍妃是死于何因呢？

根据《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的记载，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挟持光绪西逃，在出逃前，慈禧忽然想起了珍妃，让人把珍妃从北三所里释放出来，原本想带着她一起出逃，但是珍妃出来后，居然找到慈禧，再一次激怒了老佛爷。珍妃请求慈禧让光绪坐镇北京，与八国联军交涉。

听到这话，慈禧当即火冒三丈。珍妃这个提议是合乎情理的，当年咸丰出逃，让恭亲王坐镇北京，为什么慈禧听到珍妃的提议会如此生气呢？

其实，珍妃的意思很明显，她希望光绪借着这个机会将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在朝中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光绪自亲政后，实际上是个傀儡，现在是夺回权力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盛怒之下，慈禧秘密让亲信太监崔玉贵将珍妃推入贞顺门的井中。

作为一个太监，崔玉贵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李莲英，他是慈禧弟弟桂祥的干儿子，跟慈禧的关系也非常近。慈禧回到京城后，为了平息谣言，将崔玉贵赶出宫去。还对众人说，自己绝对没有要把珍妃推入井中的意思，当时只不过是在气头上说说而已，崔玉贵为了讨好自己，自作主张把珍妃推入井中。

光绪听说珍妃的死讯后，浑身颤抖。在那一刻，光绪的世界在崩

塌，堂堂的大清皇帝，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光绪的精神深受打击。从此以后，光绪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压抑，遭受政治和情感的双重打击，光绪原本脆弱的心灵已经变成碎片。

所以，光绪英年早逝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据说，直到临终前，光绪身边一直带着一个盒子，盒子里装着珍妃的头发，真是一个痴情天子。光绪经常对着珍妃的头发发呆，恹恹鼎鼎目睹光绪愁怨，写了一首诗歌颂光绪对珍妃的深情：

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

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

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

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

1902年返京后，慈禧为了洗脱谋杀珍妃的嫌疑，对外宣称珍妃是一个烈妇，她之所以投井是为了避免被洋人玷污。为此，慈禧恢复珍妃的名誉，还晋封她皇贵妃。

珍妃的尸体在井里泡了一年多，恢复名誉后，她的姐姐瑾妃才敢恳请慈禧将妹妹的尸体打捞起来，慈禧恩准了。珍妃的尸体打捞上来后，被草草地埋葬于西直门外田村，这个地方有很多坟墓，主要是用来埋葬太监和宫女的。

慈禧死后，直到民国二年（1913年），瑾妃才将珍妃葬到光绪的崇陵里。

第六章 甲午战争——挥之不去的痛

关于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历来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大多数人认为袁世凯在朝鲜还是尽忠职守的，他虽然权欲很强，但是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在与日本人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袁世凯的表现颇为出色。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袁世凯在朝鲜对日本人的强硬态度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

袁世凯鼓捣朝鲜

朝鲜自古就是中国的藩属国，朱元璋开创大明王朝的时候，朝鲜的大将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建立了李氏王朝。晚清时，李氏王朝出现了一个女强人闵妃，闵妃的出现让朝鲜陷入了混乱中。

当时朝鲜的国王是李熙，李熙无能，朝中分裂成两股势力，一股势力以李熙的父亲大院君为首，一股以闵妃为首。双方的矛盾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火拼起来，大院君的军队击败闵妃的军队，控制了政权。但在交火的过程中，大院君的军队袭击了日本的大使馆，因为大院君是亲中国的，对日本非常反感。

大院君的做法简直是玩火，李鸿章知道形势非常危急，朝鲜国土上很有可能发生战争，急命淮军将领吴长庆带兵前往朝鲜。当时，晚清的政治强人袁世凯正是吴长庆的部下。在这次前往朝鲜的途中，袁世凯的表现非常出色，他干净利落地将大院君诱捕，并将大院君押往中国，以此堵住日本侵略朝鲜的借口。

平定朝鲜叛乱后，袁世凯扶植闵妃政权，由于在朝鲜的出色表现，李鸿章让袁世凯呆在朝鲜，处理朝鲜事务。日本人对袁世凯很不满，准备在朝鲜培养起敌对势力，跟袁世凯抗衡。

日本扶植的是开化党人，还让开化党人密谋暗杀袁世凯，没想到袁世凯胆识过人，成功地从一次暗杀行动逃离。之后，甲申政变爆发，开化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攻入王宫，抓住国王李熙和闵妃，逼迫李熙同意日本派兵驻扎在朝鲜。

政变发生后，袁世凯来不及请示李鸿章，亲自带兵营救李熙。袁世凯指挥若定，成功击败开化党人和日军，救下国王和王妃。甲申政变后，日本人逃回国内。应该说袁世凯的办事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却让李鸿章有些不满，没有一个上司会喜欢一个喜欢“自作主张”的下属。

当时袁世凯只有二十六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他沉迷在自己的成就里，丝毫没意识到枪打出头鸟的古训。袁世凯锋芒毕露早已引起了公愤，可惜当时他没意识到，竟然“趁热打铁”，向李鸿章提出一个建议，请求大量增派军队进入朝鲜，彻底接管朝鲜的军政大事，以此断绝日本和俄国的幻想。

袁世凯其实是想把朝鲜变成中国的一个行省，他担心李鸿章不同意，还一再强调说日本人欺软怕硬，如果我们跟他们求和，他们反而要跟我们打仗，如果我们对他们采取强硬姿态，他们反而会求和。

可惜，李鸿章拒绝了袁世凯的建议。李鸿章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中国正在跟法国打，可调的兵不多，再说了，现在正是敏感时期，不宜和日本人关系闹僵。其实，李鸿章还有一层想法：老夫要是什么都答应你袁世凯，你这黄口小儿用不了多久就会爬到我头上去。

果然，随着袁世凯威望的增高，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不满。袁世凯为了安抚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的家属，居然动用清军的军饷，还申请李鸿章拨款填补这项花费。李鸿章收到这封信，暴跳如雷，他还不是为钱的事情愤怒，而是为袁世凯自作主张感到恼怒。李鸿章痛斥了袁世凯一顿，让他自己填上这笔亏空。

除此之外，袁世凯的顶头上司吴兆有也越来越看不惯他，因为袁世凯这个人特别喜欢自作主张，眼里没有他这个上司。于是，吴兆有联系一些人写信检举袁世凯蓄养军妓及贩卖鸦片。李鸿章派人来调查，发现蓄养军妓和贩卖鸦片都是诬告，不过袁世凯在朝鲜独断专行倒是真的。

听说袁世凯得罪了上司和同僚，日本政府及时给清廷施压，指责袁世凯是挑起中日矛盾的罪魁祸首，要求清廷严厉惩罚袁世凯。李鸿章虽然对袁世凯不满，但绝不会蠢到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办事，最后不过是赔日本人一笔小款。

不过，袁世凯遭遇了这么多事情，对官场开始失望，曾经那个热血沸腾的青年陷入了纠结之中。正好母亲生病，袁世凯便提出休假。

袁世凯休假期间，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和李鸿章讨论在朝鲜撤兵的事情。经过二十天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在四个月之内中日双方都必须将军队全部从朝鲜撤回，而且双方都不能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如果朝鲜发生动乱，双方要出兵必须先告知对方。这就是《中日天津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规定了中日在朝鲜平等的地位。

当然，日本人恨透了袁世凯，所以伊藤博文还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严惩袁世凯。对此，李鸿章坚决拒绝了。

后来，李鸿章让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回国，李鸿章的目的是希望袁世凯再次控制朝鲜。袁世凯到了朝鲜后，积极扶持大院君，让李熙和闵妃夫妇俩特别难受。

关于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历来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大多数人认为袁世凯在朝鲜还是尽忠职守的，他虽然权欲很强，但是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在与日本人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袁世凯的表现颇为出色。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袁世凯在朝鲜对日本人的强硬态度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

那么，究竟哪种评价更符合事实呢？笔者以为前面的评价应该更符合实际，甲午中日战争的罪魁祸首绝不是袁世凯，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是很明显的。不管有没有袁世凯，日本都会发动侵略战争，日本一直在扩大军事力量，十年磨剑就是为了有一天拿其他国家试剑。

后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中国和日本都派兵前往朝鲜。袁世凯虽然在第一时间请示李鸿章，但中国衙门的办事效率远远比不上日本，日本的动作比中国要快得多，他们在第一时间内派出七千士兵登陆朝鲜。

东学党原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听说中日两国派兵来镇压自己，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是以两国军队还没过来，他们已经逃得一千二净。那么接下来就是中日两国的问题了。

根据之前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签订的条约，这时候中日两国都应该信守条约，从朝鲜撤兵。可惜问题没这么简单，日本对朝鲜是志在必得，非但没有撤兵，反而不断地往朝鲜增兵。袁世凯请求李鸿章派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到朝鲜跟日本军决一死战，李鸿章自诩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他一口回绝袁世凯的要求，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方针。

李鸿章清楚，俄国也非常想染指朝鲜，所以李鸿章想挑起俄国和日本的争斗。只可惜，俄国人并没有上套，他们同意“劝劝”日本。

此时，中国国内对日宣战的呼声越来越高。

老李很纠结

当时，中国最了解日本的人是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在掌管海军的时候就一直以日本为假想敌。本来中国也是很有希望建造一支像日本

那样现代化海军的，可惜慈禧几次三番挪用海军经费，海军根本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

当朝野上下一片喊打声时，李鸿章的心里凉飕飕的，他很清楚中国打不过日本，但是又不能说出原因。袁世凯在日本也待不下去了，赶紧逃回国。

1894年，正是光绪二十年，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岁。面对朝鲜的形势，光绪没有掉以轻心，他派遣了近两千五百名士兵赶往朝鲜，这点兵力当然远远比不上日本在朝鲜的兵力。不过，当时光绪并不认为中日的战争会迫在眉睫，他只是要做出一个姿态，希望日本能够知难而退。毕竟天朝上国这么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余威还是有的。

日本在朝鲜的行动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警惕，他们担心日本的扩张政策会影响他们在远东的利益，所以西方列强一起对日本施压。这反而引起了李鸿章的错觉，李鸿章觉得只要列强能帮助中国，日本一定会退让的。李鸿章这一疏忽可不是小事，让中国军队疏于备战，真打起来措手不及。

说实话，在这件事情上，光绪比李鸿章的感觉更敏锐，他觉得事态远远比李鸿章所想象的要严重，他给李鸿章下了一道圣谕：“现在倭寇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朝鲜被他们胁迫，岌岌可危。千万不要指望列强对日本的劝说，那些都是空的，中国和日本的决裂就在眼前。你督练海军这么多年，应该比较了解日本人吧，希望你能审时度势，尽快备战，不要等到战争爆发后匆忙应对……”

李鸿章在心里是比较看不起光绪这个黄口小儿的，他觉得姜还是老的辣，光绪懂什么，日本肯定不敢跟中国开战的。

五月二十八日，光绪召见军机大臣，当着军机大臣的面表示自己站在主战派一边，还说慈禧太后也主张打一场。李鸿章心想，你们这娘俩知道什么，海军的钱都被老佛爷给花光了，这仗怎么打都是输。

六月十五日，光绪在上书房召见翁同龢，翁同龢告诉他朝臣的意见是一面增兵一面协商。

光绪沉吟片刻说：“如果日本撤兵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谈判，如果他们不撤兵的话，免谈。这也是皇太后的意思。”

翁同龢：“这个老臣知道。”

慈禧确实是主战的，因为在慈禧的眼里，日本不就一个弹丸小岛吗？泱泱大清打败它就像摁死一只虱子。当时，正好是慈禧六十大寿，慈禧反倒希望早点开打，把日本打败后，自己再来祝寿，那简直

就是双喜临门啊！

当天，翁同龢带着军机大臣联名上奏，坚决主张对日宣战，在宣言中，翁同龢的签名排在第一，他还为此十分自豪。整个中国只有李鸿章一个人心里清楚，中国如果跟日本开战，必败。但是全中国都陷入了主战情绪中，李鸿章根本无力跟潮流抗衡。在光绪的一再催促下，他只好备战。

“即使凶多吉少也只能这样了。”

激烈的海战

1894年7月23日，日军直接冲进朝鲜皇宫，将国王李熙捉住，然后逼迫他宣布朝鲜脱离清朝，从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的军队必须尽数离开朝鲜。

两天后，也就是7月25日，日本海军在牙山口外丰岛海域突然袭击中国的军舰。不宣战就开打，非常符合日本军队的做事习惯。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然而，这次战争有一个非常吊诡的地方。本来两国交战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理应全国人民都很关心才对。可惜真实情况完全相反，慈禧正忙着给自己做寿，朝中大臣的眼光都盯着慈禧的大寿上面。中国的老百姓呢更不关心战事，打赢了打输了跟自己关系不大，再说了，李中堂那么大本事，难道还打不过小日本。

李鸿章太悲剧了，他很早就料到是这个结果，这场仗一定打不赢，黑锅肯定得自己背。

甲午战争最激烈的一场海战就是威海卫保卫战，这也是最后一场海战，指挥这场战役的便是袁世凯的好友丁汝昌。北洋海军在威海卫港口内有26艘战舰，1895年1月20日，日军大将大山岩率领两万五千名日军在荣成的龙须岛登陆。30日，日军进攻威海卫的南帮炮台，当时驻扎在南帮炮台的清军只有三千人。日军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下，终于拿下南帮炮台。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等于是先夺取了威海卫后军的后方基地，丁汝昌坐镇的刘公岛顿时成为孤岛。

日军对刘公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水陆两路的日军先后对丁汝昌发起了八次强攻。期间，日军联合舰队司令多次用高官厚禄诱劝丁汝昌投降，丁汝昌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月10日，“定远号”弹药用完了，舰长刘步蟾下令部下将舰船炸沉，以免被日军缴获，全舰官兵以

身殉国。第二天，一些将领产生了投降的意识，要求丁汝昌带着大家投降，丁汝昌非常生气，走投无路之下愤然自杀。12日，船上的美籍洋人浩威伪托丁汝昌的名义写了一份投降书，送到日军军舰处。

17日，日军占领刘公岛，中国的威海卫海军基地全部沦陷，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后，接连占领了凤凰城、海城等地。清廷紧急调派两江总督刘坤一前去抵御日军，还让湖南巡抚吴大澂去协助刘坤一。可惜，清军远远不是日军对手，真正一交手，清军节节败退。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出发，一路东进，先后攻占牛庄、营口、田庄台。才十天的时间，六万清军居然全线溃退。

听闻水陆两军全线溃败的消息，光绪极为震怒，愤怒之下，难免要找一个发泄的对象，最好的发泄对象就是李鸿章了。只可惜，李鸿章是慈禧的人，如果自己严惩李鸿章，慈禧必不答应。无奈之下，光绪只好对李鸿章略施薄惩，拔去他三眼花翎和褫夺黄马褂。

许多支持光绪的大臣们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解除李鸿章的权力，换上一个帝党大臣。只可惜，慈禧坐在那儿，谁也动不了李鸿章。

慈禧听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后，也非常震惊，她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人会这样厉害，惊吓之下，慈禧让李鸿章赶快跟日本人求和。为了防止光绪借着这个机会收权，慈禧决定重新起用恭亲王奕訢，任命其为总理衙门大臣兼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没多久，慈禧又恢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

一人欢喜全国愁

奕訢很明白，慈禧完完全全是在利用自己，利用完之后肯定会被甩掉。但没办法，国难当头，就算不为慈禧，也要为国家。

11月3日（十月初六），奕訢召见英国、德国、俄国、法国和美国等五国公使，请他们进行战争调解。奕訢跟各国的关系比较好，在列强眼里，他是一个开明的领导人，所以对于他的要求列强还是会尽量满足的。

十月初十就是慈禧的六十大寿，在中国六十年是一个甲子年，中国人一般都相当重视六十大寿，慈禧就更不例外了。

早在万寿之前，慈禧就让人了解乾隆年间庆典规模等等，决定仿

照乾隆办一个豪华挥霍的万寿大典，选定的地点是颐和园。

庆典之前，慈禧让人把颐和园里的道路修葺一新。慈禧还明确宣布自己的六旬寿典是今年的头等大事，任何事情都不能比这事还重要。在战争浓云密布的时候，把自己的寿典当成头等大事，可见这个政权已经腐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不战败反而没有天理了。

日本方面很注重情报的搜集，他们得知清廷高层竟把寿典当成头等大事，心里那个高兴是不言而喻的。日本高层立即做出一个决断：现在是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好时机。

随着战争的进行，清军一败再败，光绪犹豫了，国难当头，庆典还应该办得这么豪华吗？光绪想给慈禧一点建议，但是又不敢开口。光绪于是让一些大臣给慈禧建议，让她降低庆典规模，慈禧听后，气得咬牙切齿：“今天谁要是让我不爽，明天我要让你们不爽。”

战败之后，慈禧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此时她变成了一个女人，一个平凡的女人，她忽然之间感觉到恐惧。虽然她是这个腐朽的帝国里最高领导人，但是外面已经来了强悍的敌人，如果自己再胡作非为的话，搞不好会亡国。

10月12日，上书房的大臣们集体上书，请求慈禧停办庆典。无奈之下，慈禧放弃在颐和园里举行庆典。

日军准备强渡鸭绿江，侵略中国本土，整个中国却沉浸在慈禧的庆典中，大臣们不是操心国事，而是忙着给慈禧送礼。像翁同龢和李鸿藻这样的人，对慈禧不顾国难的行为非常不满，本来是不想送礼的，但看到所有人都送礼，他们最后也不得不从俗。

清廷高层这种不顾死活的行为激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反感，学者章太炎愤怒地写下这样的对联：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顾一人歌庆有；

五旬割琉球，六旬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战败之后，慈禧让李鸿章去善后，让李鸿章全权代理与日本议和之事。一个战败国在议和中是没有什么筹码的，日本明确要求将台湾据为己有。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回到住处，遭到一个人枪击，受了枪伤，幸好伤得不重。

在伊藤博文的威逼之下，李鸿章无奈签下《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朝鲜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国失去在朝鲜的一切特权，这些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以及台湾所有的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三、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

四、增加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商船可以自由出入上述港口。

五、日本人可以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可以自由销往中国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

六、为确保上述条款妥善执行，日军暂驻威海卫。

当《马关条约》的文件送到光绪案头时，军机大臣们默然而立，光绪在屋里踱步，发出几声长叹，接着眼泪流出，痛苦地在上面积字。

签订《马关条约》后，光绪下了一道《罪己诏》，告诉全国人民：“朕实在是万不得已才求和，希望天下臣民能原谅朕。”

中日甲午战争是一个危险的警示，它是世界向中国发出的讯号：“如果不自强改革，就有亡国的危险。”

第七章 昙花一现的变法

如果说，甲午战争前，光绪还能容忍慈禧把持权力不放的话，现在他完全不能再忍受了。慈禧如果能把国家治理好，恋权就恋权吧，可如果她把持朝政把国家带向不归路，那是万万不行的。

变法这根救命稻草

甲午战争就像一场噩梦，噩梦虽然过去，阴影却持续笼罩在大清国的上空。

在这场噩梦中，受伤的是全国人民，受伤最深的还是光绪和李鸿章、袁世凯这些有强烈时代责任感的人。尤其是光绪，自中国战败后，日夜忧愤，既恨日本的强横野蛮，又恨自己不能控制朝政大权。

如果中国是败在西方列强的手下，光绪还能理解，但这次击败大清的是弹丸小国日本，在光绪的印象里，日本从来就不比中国强，怎么突然间就这么强大了？

光绪开始反省，他决不允许自己做亡国之君，所以必须要自强。光绪虽然天性有仁弱的一面，但骨子里是非常要强的。

甲午战争后，中国变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西方列强纷纷把魔爪伸向中国，不断在中国发展势力范围。面对这个局面，光绪陷入了深深的危机感中。为慈禧太后画像的美国女士卡尔这样描述当时的光绪：“之前光绪皇帝对国事没有太多的主张，而对于中国将来之进步，亦漠不关心……中日一战而后，中国割地赔款，莫大之耻辱，光绪皇帝如梦初觉，慨然以发愤自强为己任。故中日战前与战后的光绪皇帝，不啻判若两人。”

如果说，甲午战争前，光绪还能容忍慈禧把持权力不放的话，现在他完全不能再忍受了。慈禧如果能把国家治理好，恋权就恋权吧，可如果她把持朝政把国家带向不归路，那是万万不行的。

要救国图存必须变法，光绪一向怕慈禧，可这时一股强烈的责任感赐予了他莫大的勇气，但他还不敢直接向慈禧表达自己的心意，而是找到了慈禧的心腹奕劻，让他转告慈禧：“我不能做亡国之君，如果不能把权力交给我，我宁愿退位。”

光绪等于是向慈禧摊牌，如果不给我权力变法，这个皇帝我不做了。

慈禧虽然不愿意放权，到事到如今，自己搞得一团糟，再不放权就说过去了。

无奈之下，慈禧只好点头，但她告诫光绪：“施行新政不是不可以，但不能违背祖宗的大法，再怎么改革，也要保证江山姓爱新觉罗。”

慈禧的真实意思是：“我可以让你搞新政，但你的所作所为必须在我的控制范围内。”

光绪的维新思想深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影响，这里还得说说恭亲王奕訢，变法还没有开始，这个昔日主持洋务运动的领袖就去世了。晚年的奕訢变得较为保守，他对变法持相当慎重的态度，他知道光绪的变法太过激进，将来刹车可能有点困难，他担心变法变到最后，中国会变成民主共和国，而不再是爱新觉罗的江山。

就在这一年，奕訢去世了。这对维新派是个好事，但也是个重大的损失，如果有奕訢在，或许变法不会那么快收场。

1895年5月，康有为发动一千多个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变法图强，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当时保守派扣留了这份上书，康有为锲而不舍，又给光绪上了一道奏折。经过重重的阻力，这封信终于递到光绪的案头。光绪看到康有为的奏折，如受电击。

康有为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举人，自幼被视为神童，没想到后来发展却很顺利。没能步入仕途，康有为选择了教书，慢慢地名气越来越大，许多人慕名跑来跟他学习，其中有一个叫梁启超的年轻人。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师徒二人都是一流宣传家，甲午战争后，在光绪的支持下，他们办了一份《万国公报》，这个报纸旨在宣传新思想。当时，袁世凯也是一个对新思想热血沸腾的人，他受清廷委托，正在主持练兵事宜，一步步掌握实权。

1897年，德国占领了胶州湾，康有为借着这个机会，再次上书请求变法，主张效法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进行剧烈的军政改革。康有为还强调，变法国家才能保全，不变法就会亡国，变得越彻底国家就越强，只变一点点仍然会亡国。

康有为还建议为了保证变法妥善执行，应该设立一个“制度局”，在制度局下面设立十二个分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

局。

光绪想召见康有为，却被朝中守旧派大臣阻挠，根据清朝规矩，受皇帝召见的大臣必须四品以上。光绪无法，只好让总理衙门先接见康有为，接见康有为的是翁同龢、李鸿章等人。翁同龢是非常欣赏康有为的，他曾多次在光绪面前推荐康有为，说这个人的才能是自己的十倍。

康有为到了总理衙门后，一点也不慌忙，侃侃而谈，好像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李鸿章冷冷地听着，翁同龢却不时微笑地点头。

侃完之后，康有为递给李鸿章一封文书，说是呈给皇帝的。光绪拿到康有为的文书，看得激动得热泪盈眶，康有为提出了一揽子的计划，最后还说自己实在不忍心看到崇祯吊死煤山的事情发生在今天，所以斗胆写下这些激烈的言辞。康有为这话如果是对朱元璋说的，搞不好是满门抄斩。

然而，光绪看到这样的话不但不觉得冒犯，反而认为康有为这个人赤胆忠心，不顾个人生死。“这样的人正是朕需要的人才啊！”光绪在心里感慨。

光绪决定，无论如何都应该召见这个人。

1897年6月15日，康有为赶往颐和园。第二天，光绪在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在前去觐见光绪的路上，碰上了当时掌握军权的荣禄，荣禄一向看不起康有为夸夸其谈的姿态，含讥带刺地说：“先生一肚子墨水，请问有何救国的良策？”

康有为不卑不亢地说：“只有变法。”

荣禄冷笑一声：“变法说得好听，但一两百年流传下来的祖制，能够说变就变吗？”

康有为终于愤怒了：“杀几个一品大员，就可以变了。”

荣禄一听，心里大惊，你这人要是得势，只怕我们这些元老们都要遭殃了。

光绪接见康有为后，君臣二人立即产生了共鸣，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事后，光绪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授予他专折直奏的特权。光绪就召见康有为这么一次，以后也没有机会召见，他们一直是通过奏折联系。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维新变法。这份诏书是维新派和慈禧太后妥协的产物，但无论如何是一个进步的兆头。

维新有点肾虚

百日维新就这样开始了，发布了维新诏书，光绪就跑到颐和园里向慈禧报喜。

慈禧似乎没有太多的喜悦，只是面带微笑地点头，悠悠地说：“变法固然是好事，但是有三件事千万不能忘了。一、变法不能操之过急，任何事任何决策要深思熟虑之后才能行动；二、万变不能离其宗，再变也不能变天，不能变了江山；三、要多用那些老成持重的老臣，不要轻信那些哗众取宠的小臣。”

光绪唯唯诺诺地点头，心里却很反感那些守旧的老臣，特别是像李鸿章这种。光绪很明白，自己要站稳脚跟，必须提拔一批自己的人，除了康有为之外，还有后来的戊戌六君子。

光绪得到慈禧的允准，将康有为的册子复印多份，每个大臣发一份。这次改革可以说是非常激进的，几乎涉及国家的方方面面。经济改革有七十多项，政治改革有九十多项。

说实话，这么多新政接二连三地出台，就是连光绪自己都觉得眼花缭乱。看到这么多新政同时出台，慈禧感觉越来越悬，她担心的就是光绪的莽劲。

做一个有实权的皇帝就是爽，四天后，光绪罢免了对新政说三道四的礼部官员。要知道，慈禧在此之前叮嘱过光绪，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必须由自己裁决。听说光绪敢私自罢免二品以上官员，慈禧很愤怒，光绪心里开始感到害怕。

慈禧决定给光绪一点颜色看看，慈禧首先免去帝师翁同龢军机大臣和内阁大臣的职务，让荣禄取代翁同龢。这一招非常阴狠，翁同龢是帝党的核心人物，罢免翁同龢等于是给光绪来个釜底抽薪。

慈禧此举给光绪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震慑，他很担心慈禧接下来会搞掉自己。光绪紧急召见谭嗣同，让他将自己的困境转告康有为，让康有为出谋划策。康有为对光绪很是忠心，听说皇帝的困境，立即想办法，最后想出了四个主意：一、学习日本的明治天皇，皇帝应该在全国选一些忠心耿耿的勇士，由皇帝亲自统领，这些勇士既可以保护皇帝，在非常时期又能成为先发制人的武器；二、改戊戌年为维新元年，以此彰显朝廷变法之决心；三、减掉头发，更改服饰，以此动摇守旧派的心志；四、以巡幸的名义先到上海避避风头，防止慈禧出手。

这四条主意完全是一个书生的馊主意，根本是纸上谈兵，没有可行性。

眼看康有为也不能想出什么良策，光绪心情一天比一天焦躁，他仿佛预感到变法会流产，而自己也将失败。这段时间，光绪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当时一个外国人这样描述光绪：“大清国皇帝陛下的容貌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衰老许多，额部凹陷，脸色发黄。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伤的、疲惫的和带有孩子气的笑容。当他咧开双唇时，嘴里露出的是参差不齐的长长的黄牙齿，两侧脸颊上都出现了深深的凹坑。他的表情并非缺乏同情心，不过更多表现出的是麻木不仁。从他的容貌上看，我们看不到一点生趣。事实上，光绪皇帝给我的印象是：克制、冷漠、无趣、缺乏精力、疲惫不堪，整个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好像生活对他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这样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

其实，在当时这种激进的变法确实让许多人感到困惑，连一向支持维新的袁世凯也觉得不妥。新政像雪花一样分发到各地，执行起来非常困难，而且各地官员基本都是传统的守旧派，对西方那一套根本一窍不通。官员们不懂新法，要让他们执行可以想象有多困难。

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官员的思想，他说：“现在时事变幻莫测，一些思想离奇古怪，给人感觉像做梦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是我年老昏聩吧，不懂其中的奥秘……”

百日维新这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光绪先后发布了一百八十多条新令，可见他心情之急迫。但欲速则不达，越急迫越办不好事情。

八月，京城里到处流传着谣言，说慈禧准备十月份带着光绪去天津阅兵，并在阅兵的途中趁机发动政变，废掉光绪。光绪听到这个谣言，更加恐惧。

此时的光绪彻底乱了方寸，连他的心腹大臣都不知道他想干吗，他们经常看到光绪莫名发火，有时又一个人偷偷地哭泣。在变法最紧要的关头，光绪急命康有为离开北京。光绪知道现在非常危险，在他心里，康有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变法很有可能流产，但只要康有为活着，将来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接着，光绪又紧急召见袁世凯，说实话，在心理上，袁世凯是同情和支持光绪的。但光绪在这个敏感时期召见自己，他已料到事情非同小可，如果被慈禧知道了，可是大事。

光绪见了袁世凯后，也没有说套话，问他：“你的兵练得怎么

样？”

袁世凯毕恭毕敬地回答：“士兵们已操练很久了，如果有战事，他们一定可以为皇上效力。”

光绪一听，面色稍有舒展，便问袁世凯平时是如何练兵的，袁世凯一一作答。光绪接着又说到变法的事，问袁世凯是怎么看的。袁世凯激动地说，皇上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看到袁世凯站在自己这边，光绪放心了。

接着，光绪忽然提到一个让袁世凯害怕的问题：“如果我把统领军队的重任托付给你，你能保证绝对效忠于我吗？”

袁世凯一听，知道光绪话里有话，连忙跪地：“微臣只要一息尚存，一定誓死为皇上效力。”

光绪没有多说，只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袁世凯：“你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吗？我的处境你也是理解的。”

袁世凯抹着头上的汗水：“微臣一定见机行事，皇上的意思微臣完全明白。”

康有为听说袁世凯支持光绪，又给光绪上了一道奏折，请求光绪杀伐决断，干脆来个宫廷政变，包围颐和园，将慈禧轰下台。

没多久，朝中就有人弹劾康有为等人，光绪一听知道大祸临头了，他知道自己暂且不会有事，康有为只怕难逃一劫。光绪让人密告康有为，让他先逃到上海，康有为听到光绪的密谕，顿时眼泪流了出来，和爱国青年们抱头痛哭。

康有为说：“皇上处境这么艰难，还不忘关心微臣的安危，像这样的旷古明君世间少有，如果我这时候逃走了，我还算什么维新导师。大家一起来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营救皇上。”

在这些青年中，有一个实力派人物，就是徐世昌，他是袁世凯的心腹好友。

几个热血青年说道：“我们也很想干一票，可惜我们手中没兵啊！”

康有为得意地拿出一封信，说道：“这是袁世凯给我的信，上面写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不就有兵了吗？现在最关键的是找一个可靠的人去联络袁世凯。”

谭嗣同一听，立即站出来：“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

谭嗣同虽然是官僚家庭出身，但浑身上下有一股任侠豪迈之气，他找到袁世凯后，直接开门见山：“现在皇上处境危险，只有阁下手中有兵，你干还是不干？”

袁世凯虽然很吃惊，但心里是支持光绪的，他表示这个计划过于冒险，不如选择一个更稳妥的政变计划。根据袁世凯的意思，最好是等到慈禧和光绪到天津阅兵的时候再动手，自己到时以保护皇帝为名，当场诛杀荣禄，然后再囚禁慈禧，到时朝政就由光绪一人说了算。

谭嗣同一听，觉得袁世凯的话确实有道理，便将他的意思转告给康有为，康有为也同意了。

袁世凯那时是真心效忠光绪的，他回到天津后立即准备弹药和武器，准备大干一场。但袁世凯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光绪秘密召见他的事早已传入慈禧的耳中。

袁世凯在天津的所作所为似乎也为慈禧所知，慈禧给荣禄下了四道命令，让直隶提督聂士成带领一万七千人驻扎在陈家沟，如果袁世凯有异动，这支军队将第一时间进行阻挠袁世凯的行动。前后，慈禧调集了四万八千人拱卫京城，加上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驻军，共计有十三万人。而袁世凯的新军不过七八千人，袁世凯看到慈禧的举动，明白了这个女人为什么稳坐江山几十年了。

光绪虽然授予了袁世凯直接杀荣禄的权力，还容许袁世凯杀完荣禄后直接取代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袁世凯已经没有击败慈禧和荣禄的希望了。

没有悬念的悲剧

9月21日，慈禧正式对光绪下手了。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谕旨，称皇帝生病不能理政，自己将再度临朝训政。

接着，从宫里就传来消息，光绪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慈禧当着文武大臣的面说道：“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胡言乱政，立即革职。即刻派人缉拿康有为他弟弟康广仁，交由刑部治罪。”

听到光绪被囚禁，康有为和梁启超在第一时间逃到海外。

9月23日，光绪带着文武大臣在勤政殿贺喜慈禧训政，慈禧在大殿上反复质问光绪，康有为所说的“围园捕后”究竟是怎么回事。光绪不敢如实回答，只好说是维新派不懂事，胡乱说的。慈禧很愤怒，下

令将张荫桓、徐致靖、杨锐、杨深秀、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革职，交由刑部审讯。

谭嗣同听说自己被捕，非常淡定，当时很多人让他赶快出逃，他却镇定地说：“每个国家变法都会流血，不流血怎么可能变法成功呢？现在中国要变法，又没人愿意流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变法失败的原因。这第一滴血就从我谭嗣同身上开始吧！”

9月28日，慈禧下令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斩首示众。

在狱中，谭嗣同写下了一首流芳百世的绝命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戊戌六君子都是爱国志士，行刑时神色坦然，面无惧色。围观的人为他们洒泪，他们却意气高昂，深信自己的鲜血会唤起沉睡的国人。

此后，政权完全掌握在慈禧的手中，光绪的政治前途完全毁掉。慈禧撤去那道帘子，跟光绪一并坐在大殿上临朝。大臣上奏时，光绪不准说话，除非慈禧示意他说话。退朝之后，自有人送光绪到瀛台，这个可怜的皇帝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处在严密的监视中。

至此，光绪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木偶，有事的时候慈禧会让他出来撑个台面，以示皇帝一切都好，无事的时候就回到瀛台。

慈禧本来也准备收拾袁世凯的，后来袁世凯的顶头上司荣禄为他求情，说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袁世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还是让他戴罪立功吧！

慈禧一听，也好，反正现在没有人可以动摇自己的权威了。

第八章 慈禧带着大家去西安打猎

慈禧出逃的时候，虽有马玉昆带领的一千名官兵护驾，但一路上还是非常艰难的。由于出逃仓皇，食物和衣服都很缺乏，一路上，慈禧和光绪只能睡在土炕上，连个被褥都没有。

“亲爸爸”准备对干儿子下手

戊戌变法对慈禧的冲击太大了，差一点她就变成了囚禁在瀛台的那个人，虽然她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已经把政敌软禁起来。但慈禧仍然感到不安，光绪就像一个影子一样缠着她，万一将来国家出了什么乱子，肯定会有人打着光绪的旗号造反。

一旦有人让最高领导者夜长梦多，他的处境就危险了。

慈禧决定主动出手，先为废掉光绪做好舆论准备。要废掉光绪的话，最好的理由莫过于皇帝身染大病。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以后，京城里到处流传皇帝身染重病的小道消息，有人说他患了淋症，有人说他患了腹泻症，还有人说他患了咳嗽症，总之，五花八门，光绪成了各种病症之集大成者。其实，光绪最大的病恐怕还是抑郁症吧！

这些谣言都是从内务府的太医院里传出来的，有鼻子有眼，有人还说光绪之所以患重病是因为吃了张荫桓和康有为送来的药丸。

看到谣言满京城后，慈禧接下来又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书：“朕最近身体很不适，经过多日诊治还是不见效果，民间如果有通晓医术的神医，各位大臣一定要举荐给朕，越快越好。”

这道诏书的语气非常逼真，很像是光绪亲自下发的。诏书下发之后，慈禧下令全国通缉康有为。康有为已经逃走了，慈禧不是不知道，她此举的目的是将康有为定为叛国罪，同时也给任何有维新思想的人敲警钟，千万不要还有改革的念头，否则严惩不贷。

康有为也听说了国内的形势，他也是个聪明人，知道光绪的处境非常危险，很有可能被慈禧废掉或是杀掉。想到这一层，他也是很心疼的，康有为一度想不开，要跳海自杀，被朋友给拉住了。

普通人可能看不出来，官场上的人一眼就看出，慈禧正在紧锣密鼓地废掉光绪。

慈禧这种做法不仅在国内引起了不满，也让西方列强很愤怒。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一旦废掉光绪，必然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光绪皇帝并无大错。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态度也差不多，不过他更老成一点，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而且采取了观望态度。上海的一些商人甚至联系海外侨胞，公开致电慈禧，请求慈禧“保护圣躬”。

看到国内的反对声浪很高，慈禧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更让慈禧没有想到的是，西方列强的反应居然更为剧烈。变法失败后，保守派控制了朝政，列强对此是非常担心的，毕竟以光绪为首的维新派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派掌权的话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所以，他们很担心慈禧的掌权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更担心中国会倒退，重新掀起排外的潮流。

列强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中就可以看出来。列强最希望的是中国建立一个开明的政府，跟他们的制度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样一来，交流才更顺畅一些。

当各国驻京公使听说光绪病重时，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他们强烈要求觐见光绪皇帝。一些外国人甚至担心光绪已经被慈禧秘密处死了，在列强的一再盘问下，慈禧的代言人奕劻只好对各国公使表示：“皇帝依然健在。”

各国公使说：“让我们见见皇帝，我们才相信。我们想请一名洋医生为皇帝看病，如果确实如你们所说，我们就信了。”

慈禧明确表示拒绝，心想这是我爱新觉罗的家事，轮不到你们这些洋人来插手。

列强也不是好惹的，他们首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慈禧、赞扬光绪，还把军舰开进中国海域举行示威巡游。

慈禧看到群情沸腾，终于做出了让步，允许洋医生进宫为光绪诊治。

为光绪会诊的是一个叫多德福的法国医生，多德福诊治的结果是光绪虽然身体不太好，肾脏有病，但总的来说没有大碍。多德福还为光绪提出了治疗方案，多德福自信地说，按照我的方子去调养，光绪皇帝很快就会痊愈。

多德福的会诊戳穿了慈禧的谎言，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慈禧只好放弃废掉光绪的阴谋。不过她并不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荣禄跟慈禧走得近，深知慈禧的心思，但荣禄并不赞同慈禧，他也不希望废掉光绪。袁世凯曾经恳请荣禄一定要保全光绪，就荣禄的本心来说，他也不希望光绪受伤，这个皇帝已经非常可怜了，而且确实是一心为国，这样一个皇帝如果还要废掉或是处死，荣禄觉得天理难容。

荣禄不知道该如何劝说慈禧，便请教李鸿章，李鸿章的看法跟他也是一样的，李鸿章说：“太后有这个意思我也知道，但此事万万不可。如果阁下配合太后做出这样的事情，就是大逆不道，你想想看，此事一旦发生，各国公使首先抗议，各省的封疆大臣也会集体不满。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激起兵祸啊！再说了，太后跟皇上是母子的关系，这天伦之情在这儿，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你一定要好好劝说太后。”

荣禄说道：“我会尽力的。”

随后，荣禄找到慈禧：“听说太后想废掉皇上，有这事吗？”

慈禧冷漠地说：“无中生有，从来就没有这事。”

荣禄：“没有就最好了，太后应该知道兹事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

慈禧：“但是皇上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个你也看到了。”

荣禄：“皇上不可以废，但如果太后想安心一点的话，不妨为皇上选立一个太子，皇上无子，可以在宗族中挑选一个。”

慈禧沉默良久，说道：“你说的未尝没有道理。”

慈禧经过反复考量，最后选定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儀为大阿哥。慈禧本来是很讨厌端郡王的，在宗室中，让慈禧喜欢的就没几个。但是载漪对慈禧是有“隐功”的，在辛酉政变中他出力不少，戊戌变法中他又主动向太后告密，慈禧立他的儿子也算是一种回报吧！慈禧虽然是个权谋女人，但基本上还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她善于记仇也善于记恩。

当时溥儀十四岁，还没有成年，立他的话肯定好控制。慈禧带着军机大臣，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光绪：“你觉得怎么样呢？”

光绪胆战心惊地回答：“我没有任何意见。”

慈禧：“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立太子在历朝历代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到了清朝就不太正常了，自从雍正设立了秘密建储的制度，其后再也没有皇帝公开立

储。慈禧公然违反祖制，其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限制光绪，一步步解除光绪对自己的威胁。

此时，光绪表面上还是帝国的首脑，实际地位形同政治犯。他没有实际权力了，但影响力还是有的，在许多朝中重臣的眼中，光绪是一个比较贤明的皇帝。就连在政治上倾向于支持慈禧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认为光绪是个不错的皇帝，缺点就是性格懦弱了一点。翁同龢是光绪的帝师，在他心目中，光绪的仁义在皇帝中是比较少有的。

慈禧册立大阿哥的消息在国内传开后，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这个地方反响是最为剧烈的。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工商业比较繁荣，在光绪的维新理念中，有很大程度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

上海商会一千多人联名反对慈禧册立大阿哥，紧接着全国各地的商人纷纷反对，就连国外的华侨也没有置身事外。

工商业人士的反对是软弱无力的，慈禧拿出了统治者基本的手段——镇压，逮捕几十个人自然能压下反对声浪。为了取得各国对自己的支持，慈禧也做出了一些改变，一改往日不接见外国人的姿态，在宫里大肆宴请各国公使，还送给他们许多贵重的礼物。

各国公使虽然接受了她的礼物，但是对她的做法仍然多有微词。慈禧由此而生恨，心想这些外国人全是一群不识好歹的东西，从此，她对洋人就再也没有过好感。

大阿哥溥儀是个比较弱智的孩子，不喜欢读书，对治国更是毫无兴趣，最喜欢的事情是跟太监们打水漂。溥儀有时还羞辱光绪，光绪会一些英文，他骂光绪是鬼子徒弟。慈禧虽然囚禁了光绪，但是也绝不允许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发生，当她知道后，让人抽了溥儀二十鞭子。

由于溥儀太胡闹，再加上不少封疆大臣比较看好光绪，慈禧最后还是废掉了这个不学无术的大阿哥。

义和团真能折腾

多年来，洋人一直跟慈禧作对，我们就不说列强屡屡欺负清朝了，就说最近发生的事情。她想废掉光绪，列强百般阻挠，她想缉拿康有为，英国人把康有为藏起来。当慈禧听说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

下偷渡成功，愤怒地说：“这些洋人真可恶，总有一天我要报仇。”

不光慈禧反感洋人，民间也在酝酿着一股汹涌的排外潮流。这就是义和拳，义和拳对洋人的厌恶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义和拳是一个民间暴力组织，慈禧不敢公开对洋人动武，义和拳对洋人的暴力行为无疑让她觉得很爽。

义和拳是由白莲教演化而来的，在山东和直隶一代活动，这个秘密团体最早的宗旨是反清复明。等后来洋人涌入中国后，他们又改弦更张，打出赶走洋人的旗号。

义和拳以仇杀洋人和教民为乐事，通常，他们用的武器都非常简陋和原始，也就是一些传统的冷兵器，所以义和拳又俗称大刀会。义和拳许多头领自称有神功护体，刀枪不入。这个组织在很多人眼里是非常神秘的，他们习惯用红头巾扎头，穿着红兜肚，腿扎红带子，手裹红布，衣服里随手一抓就是各种各样的符咒。

曹州教案就是义和拳搞出来的，那时山东巡抚还是李秉衡。李秉衡跟慈禧一样，对洋人非常痛恨，所以对义和拳多有纵容。曹州教案发生后，德国人出兵胶州湾，再次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李秉衡因为办事不力被革职，暂且接替他的是张汝梅。

张汝梅只是署理山东巡抚，1899年，正式的山东巡抚毓贤到任。毓贤比李秉衡还过分，他既是一个酷吏，又是一个对洋人极为仇视的老顽固。毓贤来了以后，非但没有镇压义和拳，反而把义和拳招安，将他们改造成半官方的组织：义和团。

这样一来，义和团就成了毓贤领导下的“黑社会”，毓贤暗地里指使他们抢劫天主教堂，杀害外国神甫。

这里还得说说袁世凯，其时，袁世凯俨然成为了帝国新升的一颗政治明星。袁世凯跟外国人打过交道，曹州教案发生后，他就感到大事不妙。袁世凯第一时间给当时的代理巡抚张汝梅发电报，让他在山东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塞驻兵，防止德军入侵。但张汝梅没有任何反应。

后来，德军果然占领了胶州湾，还不断向日照、沂州等地增兵。

袁世凯一再上书，请求朝廷向山东增兵。袁世凯的意见终于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荣禄命袁世凯和聂士成带领新军向山东进发。

袁世凯自从回国后，一直在练兵，现在终于可以试试手中的刀有多锋利，这对他来说是兴奋的。出发之前，袁世凯给徐世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次去山东，我心里怦怦乱跳，想到马上就可以开

仗，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兴奋，不知道能不能如愿。”

但朝廷的意思很明显，不希望发生战争，只是想通过军事威胁迫使德军让步。袁世凯进入山东后，让毓贤很不爽，心想山东是我的地盘，用不着你袁世凯来插一脚。所以，毓贤处处跟袁世凯作对。

毓贤安排了大量的眼线监视袁世凯，最后整理了袁世凯许多“罪证”，一并寄给朝廷。袁世凯也不是怂人，心想你毓贤要跟我对着干，我就奉陪到底。也让人搜集山东百姓对毓贤的不满，然后打包寄给朝廷。

朝廷的态度非常暧昧，居然两个都没得罪。根据朝廷的意思，袁世凯圆满完成任务，可以带兵回天津了。袁世凯傻眼了，不知朝廷为何做出这种安排，自己兴致冲冲地过来，难道要一枪未发地回去？

回到天津后，袁世凯还时时想不通，接连给慈禧上了两道奏折，袁世凯不无激动地说：“德国人分明是借着曹州教案事件侵占我国领土，他们有恃无恐地出兵胶州湾和日照等地，就因为我们国防太脆弱了。我们大清虽然军队庞大，但大多是没有经过现代化军事训练的旧式士兵，所以现在最要紧的是练兵。”

慈禧觉得袁世凯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便让他提出详细的练兵方案。袁世凯立即将自己的方案呈上，慈禧看后觉得确实不错。

慈禧还没来得及批准袁世凯的练兵方案，毓贤在山东又搞出事来了，他居然让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德国人很愤怒，你们那些刀枪棍棒也想灭洋，不管了，赶快修一条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这条铁路一通，德军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调兵到山东各地。

德国在山东搞这么大的动作，其他列强口水啪嗒啪嗒地流。首先对清廷开口的是意大利，意大利彬彬有礼地请求清廷把三门湾让给意大利。李鸿章说：“你们找错了地方了，这里没门。”

意大利心想你们要来硬的，我们就派军舰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不得不让袁世凯带兵进入山东。慈禧革掉毓贤后，让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

袁世凯收拾义和团有一套

袁世凯是晚清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真正的实力派。

他到山东后，面临两个问题：一、弹压义和团；二、和洋人周旋，稳住洋人。

袁世凯很早就听说过义和拳，在他眼里这些人不过是一群怪力乱神的乌合之众，对义和团的那些装神弄鬼的把戏他根本不屑一顾。但他很清楚，如果任由这股邪火发展，将来有可能烧毁大清国。

1900年1月，袁世凯给慈禧上了一道奏折，他说义和团虽然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但他们终究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可能灭得了洋人，所以清廷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纵容义和团的话，反而会授洋人以柄，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情绪对于国家大局的稳定没有半点好处。所以，袁世凯坚决主张对义和团采取弹压政策。

袁世凯对义和团采取两手政策，剿抚并用。刚到任时，许多义和团的头领不清楚袁世凯的态度，以为他会跟前几任一样支持义和团，所以这些首领相约去拜访袁世凯。

袁世凯很客气地宴请了这些首领们，酒席上，这些首领们吹嘘自己法力无边，刀枪不入。袁世凯不动声色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等到首领们吹得差不多的时候，袁世凯说道：“既然各位神通广大，袁某倒想见识一下。”

说完，袁世凯击掌三下，一群士兵端着枪走了进来。

袁世凯面不改色地说：“现在各位可以表演了。”

首领们傻眼了，袁世凯不等他们犹豫，下令：“开枪射击。”

一排枪声，这些自诩神通广大的首领全都应声倒地。由此可见，袁世凯是一个铁血人物，习惯不动声色地快刀斩乱麻。

事后，袁世凯立即命人在全省张贴告示，宣布义和团为非法组织，朝廷要予以取缔，如有违抗命令者，杀无赦。在袁世凯的铁腕统治下，义和团很快就在山东待不下去了。

尽管袁世凯处理事情很果断，也很给力，并且也确实安抚了洋人。但朝中对他不满的大有人在，朝中有许多人是同情义和团的，包括慈禧在内。

山东的义和团很快就转移到直隶境内，在直隶境内，义和团运动再次达到高潮。袁世凯得知后，立即上奏请求慈禧让直隶总督裕禄和自己夹击义和团。慈禧没有表态，她自始至终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且还对义和团那些神神鬼鬼的把戏挺入迷的。京城里，许多王公贵族对义和团兴趣浓厚，尤其是端郡王载漪还盼星星盼月亮盼望义和团进京。

裕禄善于揣摩慈禧的意思，义和团进入直隶后，他不但没有剿匪，反而拜义和团的首领为大哥。义和团还在直隶总督的衙门设立祭

坛，祭拜关公，将整个衙门搞得乌烟瘴气。

得到官方势力的庇护，义和团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烧杀劫掠，洋人和教民们死的死逃的逃。

慈禧为什么这么纵容义和团呢？除了讨厌洋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慈禧非常喜欢听戏，对戏曲中那些神奇古怪的法术非常迷信。现在义和团上演的是一曲真实的戏剧，义和团所宣传的那些神怪东西能够满足慈禧内心深处的某种神秘渴望。

看到义和团的火势向京城蔓延，洋人非常担心。各国纷纷派出卫队保护使馆，就在义和团向京城进发的时候，洋人的军队也开向了京城。洋人的军队由英、法、美、俄、德、意、日、奥八国组成，共计两千余人，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指挥。

就在此时，京城高层也发生了人事调动，极端排外的端郡王载漪进入总理衙门。从人事调动中我们可以看出慈禧的态度，她对洋人的仇视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1900年6月10日，义和团浩浩汤汤地逼近北京，北京城有十万守兵，城门紧闭，团民们在城下高呼：“开门开门……”

在没有接到慈禧的命令前，没有人敢开门的。

守城的士兵严阵以待，准备对这些团民开枪，就在双方箭在弦上的时候，九门提督忽然接到谕旨：开城放人。谕旨还说这些人都是“爱国志士”，对“爱国志士”没有不欢迎的道理。

义和团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进入紫禁城，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义和团的部众已经发展到十几万人。说实话，这些团民在山东受到袁世凯的镇压，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如今进了紫禁城，上有太后的支持，下有百姓的呼声，若不好好发泄一番就太亏了。

乱民们再也没有顾忌，京城似乎退回到李自成当年进京的时候，一片骚乱，一片狼藉，洋人和教民像野狗一样被团民追着赶，教堂被焚毁。清兵乐呵呵地看着这一切，因为上头有令，不要干涉义和团。

没多久，京城家家户户都在筑坛念经，宫廷里也不例外，慈禧在天坛上筑坛念经。

眼看京城越来越乱，慈禧似乎也不想管了。自义和团进京后，端郡王载漪就跟义和团的首领勾结，他想借义和团之手诛杀“一龙二虎”，一龙是指光绪，二虎分别是李鸿章和奕劻。几十名团民冲进瀛台，想对光绪不利。慈禧听后非常愤怒，我容许你们胡来，你们还敢干涉我的内政，吃饱了撑着。

慈禧处决了二十名团民，才把这起风波压了下去。

连日来，京城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四千多家商铺被烧成灰烬，交易系统全部停止。

这是一场浩劫。京城里有许多基督教信徒，从义和团进京开始，教民的末日就来临了。义和团将教民抓捕起来，然后实行集体大屠杀。

这一年是庚子年，这一年的动乱又叫庚子之乱。很多的外国人死于这场动乱，其中有一个叫杉山彬的日本人死得最惨，他死后被肢解，五脏六腑还被拿去喂狗。

后来，慈禧听说八国联军开往京城，也非常生气，紧急召开会议，任命刚毅、载勋、载漪等人为统帅，带领清军和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美国忽然撤回自己的军队，他们还不想和中国闹翻。6月17日，七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害，首级在东安门示众。

反正已经跟列强撕破脸，慈禧决定对列强宣战。6月21日，慈禧同时对英、美、法、德、日、意、俄、西、荷、奥匈等十一国宣战。

慈禧此时已近于丧心病狂的状态，她确实也是被逼急了，长期被列强欺负，找不到出路，干脆豁出去，来个鱼死网破。

八国联军也很疯狂

看到京城发生动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袁世凯既担心，又有些快意。

大沽炮台失守的那天，袁世凯就接到带兵勤王的命令。袁世凯早就对慈禧纵容义和团不满，现在要他勤王说什么也不会答应，何况他好不容易训练出来的新兵，如果一下子全葬送了，以后还怎么混？

袁世凯不愿出兵，但也不好直接违抗命令，只好派出一小股部队，然后对慈禧解释说自己派出的人数虽少，但全部都是精兵，山东这边形势也非常危急，如果倾巢北上的话，山东很有可能全部沦陷。

袁世凯是个非常善变的人，以前他是高调剿匪，但现在慈禧收编了义和团，袁又宣称义和团是合法的，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必须全部北上，帮助朝廷打鬼子，如果胆敢不去，就说明是冒牌的义和团，凡是

冒牌的一律赶尽杀绝。

八国联军跟义和团的德行是一样的，他们看到战争不断升级，也不断增派部队，到最后联军人数发展到三万人。7月9日，太原总兵聂士成阵亡。7月14日，天津沦陷，直隶总督裕禄自杀。7月17日，八国联军从天津开往北京，沿途抵抗的清军和义和团有十五万人，但这些人不堪一击。

8月13日，八国联军向北京发动了进攻。两天后，慈禧吓怕了，带着光绪皇帝等人仓皇逃离紫禁城，这就是所谓的庚子西狩。

8月16日，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城。八国联军进城后，又开始了一场浩劫，这些军人把对慈禧的怨恨全发泄在北京城里的百姓身上。

德国高层给德军下了一道命令：在战斗中，只要碰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

日军则更为变态，喜欢折磨人，喜欢做一些变态的实验，他们拿北京人民做实验，看看一颗子弹能穿过多少人。

法国军队也很残忍，他们遇上了一群中国人，然后把这些人逼到一个死胡同里，最后开枪射击，一个不留。

女人就更可怜了，许多女人被轮奸致死。一些官员为了防止家人被辱，带着全家人投井自杀，同治的岳父崇绮的妻子和女儿被押到天坛，她们回来后，崇绮带着全家人自杀。

与此同时，俄国出动十七万大军侵占东北，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慈禧出逃的时候，虽有马玉昆带领的一千名官兵护驾，但一路上还是非常艰难的。由于出逃仓皇，食物和衣服都很缺乏，一路上，慈禧和光绪只能睡在土炕上，连个被褥都没有。

慈禧到达北京西北的怀来县后，县令吴永负责接驾，情况才稍有好转，但战争年代，珍馐佳肴是没有的。县令给慈禧等人呈上了小米粥和鸡蛋，慈禧等人狼吞虎咽，仿佛这是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休息好了之后，慈禧继续西逃。在逃亡的过程中，慈禧收到列强的通牒，在列强的压力之下，她不得不严惩主战的大臣，下旨让载勋自尽，毓贤就地正法，载漪和载澜发配新疆。同时，慈禧还把一切责

任推到义和团身上，说这些乱民是罪魁祸首，一定会派人征剿的。

其实，慈禧终究是一个女人，洋人让她流亡，她何尝不恨得咬牙切齿，慈禧原本下令各地不惜一切抵抗洋人。这时候，李鸿章站出来了，他全力阻止慈禧这种玩火自焚的行为，李鸿章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跟列强谈判。李鸿章代表东南十几个省跟列强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一事件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

事实上，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继续向直隶进军。当时袁世凯在山东，心知情况危急，便联系德国公使，跟对方交换意见后，知道他们不会侵略山东，心里的石头也算落地了。

当然，袁世凯对洋人并不是很信任，所以他让人连夜赶制大量石碑，上面刻着山东某村某县的字样，再将这些石碑矗立在山东和直隶的交界处。这一招确实管用，八国联军看到界碑，知道这是袁世凯管辖的地区，也就绕道而行。

稳定洋人后，袁世凯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心。慈禧让他勤王，他一再敷衍，性好猜疑心狠手辣的慈禧一定不会放过自己，怎么办呢？

袁世凯知道慈禧是个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女人，现在正是慈禧落难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给她一些帮助，或许她能不计前嫌。于是，袁世凯让人四处打听慈禧的行踪，当他听说慈禧等人像丧家犬一样逃到太原时，立即让人给慈禧送去大量的银子、衣物和美食。袁世凯这招还真管用，看到袁世凯送来的东西，慈禧的不满瞬间烟消云散。

在太原待了几天，慈禧又继续西逃，10月26日到达西安。

到了西安后，生活总算是稳定下来，慈禧又开始过起了奢靡的生活。虽然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但慈禧还是非常担心，她怕各国公使会将自己列为头号战犯，一再催促李鸿章进行谈判，要确保列强不要把愤怒的矛头指向自己。慈禧还向列强道歉，说中国的这次动乱事发突然，自己完全没有料到，得罪了你们这些友邦，实在很抱歉。

李鸿章和奕劻与十一国公使开始了谈判，终于确定了一份《议和大纲》。当李鸿章派人将《议和大纲》送到西安后，慈禧看自己并没有被列为头号战犯，列强还允许她保留自己的位置时，已经高兴得昏过了头。她立即给李鸿章回电：所有条款，立即允准。

战后新政

李鸿章原本已退居幕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再次起用他，让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代表清廷与列强谈判。所以说，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人，别人搞出事来，总让他去收拾烂摊子，结果必然是做卖国贼背黑锅。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许多有识之士恳请李鸿章就任中国大总统，支持者不乏像张之洞、刘坤一这样的实力派。李鸿章也不是没考虑过，但是他始终还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始终不敢挑起大梁。

接下来，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是非常不平等的，中国要赔偿十亿两白银，据说李鸿章签字的时候当场吐血。

《辛丑条约》签订后，只有慈禧一个人是高兴的，全国人民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都在骂李鸿章是卖国贼。

不久，李鸿章就在悲愤中离开人世，临死前李鸿章反复念叨着：“毓贤误国。”

据说李鸿章临死前，给慈禧和光绪上了一道奏折，在奏折中他给慈禧推荐了自己的接班人，李鸿章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

慈禧接受了李鸿章的意见，让袁世凯担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时，袁世凯俨然成为大清国的脊梁柱。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两个人是真正的实力派，一个是张之洞，另外一个就是袁世凯了。张之洞把湖南、湖北经营得不错，给自己的军队自强军装备了德国新式武器；袁世凯的新军比张之洞的军队更强，不仅配备了新式武器，还接受了严格的西式训练。

1901年10月，慈禧决定返回京城。到达直隶境内时，袁世凯听说慈禧进入直隶，立即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他将保定的行宫布置得极为奢华，慈禧离开直隶的时候，袁世凯为她准备了当时中国最豪华的专列，慈禧和光绪各用一节车厢，车厢内用豪华黄缎铺饰，慈禧用的瓷器和杯盘都是精心制作的。

就这样，袁世凯让慈禧无限风光地坐上了驶往北京的列车，慈禧很高兴，回到北京后赏给袁世凯一件黄马褂，允许他在紫禁城里骑马。

慈禧回京后，表示对义和团绝不姑息，袁世凯奉命征剿义和团，义和团大股势力基本被扑灭。后来，一个叫景延宾的人收拢义和团的残余势力，又打出“扫清灭洋”的口号，将清政府和洋人都当成敌人。袁世凯命令段祺瑞搜捕景延宾，一个月后，景延宾领导的义和团被扑灭，景延宾本人被凌迟处死。

袁世凯办事确实很利索，慈禧很满意，1902年6月，正式授予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经过这次劫难，慈禧也知道必须推行新政了，她让奕劻、刘坤一、袁世凯等人推行新政。新政的内容包括整顿吏治、改革官制、改定刑律、兴办学校、派遣留学生、成立警局、奖励实业、军队改革等等。

第九章 袁世凯的崛起

袁世凯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慈禧对自己的崛起是很不放心的，他很想知道慈禧心里的态度，但是怎样才能知道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慈禧身边的太监来了解，李莲英是慈禧最信任的太监，袁世凯首先要贿赂的是李莲英。不过，李莲英权倾天下，跟慈禧的关系太近了，一个不慎，可能就会好心办坏事。

北洋军的创始人

在慈禧眼里，戊戌变法是光绪用来跟自己争权的一个把戏，所以她不惜一切代价掐灭戊戌变法。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她才明白变法是唯一的宿命，不变法的话中国就要落败，自己的生死就操控在外国人手中。

变法最关键的一步是成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这个任务非袁世凯莫属了。袁世凯一直热衷于维新，并且时时以改革派自居。在他担任山东巡抚期间，创办了济南大学堂，这便是山东大学的前身。袁世凯还在山东创办了商务总局，任命好友唐绍仪为总局局长。

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红透半边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相当于一国的总理了。1902年，袁世凯又身兼督办政务处大臣、练兵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务，号称一身兼任八大臣。

袁世凯是在天津小站练兵发家的，这次手握大权，重中之重还是进行军事改革。在练兵上，袁世凯主要借鉴德国和日本的经验，综合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训练方法。首先在兵源上，袁世凯就要求得非常严格，第一要求身体素质好，第二要求是良民，有固定的户籍。袁世凯不收游民，不收流氓，因为这些人不守纪律很难管理，再说了袁世凯准备提高士兵待遇，选择良民的话直接将士兵的工作与家庭的生活挂钩，不怕他们不认真。

在我们印象里，当兵的似乎很牛，但其实清朝的士兵境况并不好，工资待遇不高，社会地位不行，退伍后往往还会受到地痞流氓的欺负。对这些问题袁世凯也很清楚，他想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办法。首先，他提高士兵的待遇，将士兵的每月工资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给

士兵，一部分寄给士兵的家里。同时，袁世凯还让各地方官善待士兵的家属，免除他们一部分徭役。

袁世凯专门成立了军政司，负责处理练兵事宜。同时，他还将军队分成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种。

此外，袁世凯还对军营编制进行了一些改革。清军一般是以营为单位，袁世凯却建立了近于现代化的军队编制。他以两镇为一军，一个镇相当于一个师，每镇统辖步队二协、马队一标、炮队一标、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全镇官兵共12512人。统率一军的叫总统或军统，统率一镇的又叫做统制或翼长。

袁世凯将自己新建立起来的军队称为北洋常备军，王士珍担任第一协统，相当于旅长。第二支新兵练好后，冯国璋担任第二协统。袁世凯还有一个干才叫段祺瑞，袁世凯是很看好段祺瑞的，可惜段祺瑞是武人出身，不会笔试，尽管袁世凯很想让他当上第三协的协统，可惜他就是考不上。

根据袁世凯的规定，只有考试通过的人才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段祺瑞的军事才能是得到袁世凯肯定的，可惜过不了笔试这关，怎么办呢？袁世凯后来想了个办法，将试题提前泄露给段祺瑞，就这样，段祺瑞当上了协统。

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就是所谓的北洋三杰。

由于袁世凯过人的练兵能力，朝廷精选出三千八旗子弟兵，让袁世凯训练。袁世凯将这三千八旗兵设置为京旗常备军，还提议让满人铁良带领这支军队。

当袁世凯把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交给铁良时，铁良深为佩服袁世凯，袁世凯这个人不仅会练兵，还会做官。他深知树大招风的道理，知道随着自己的崛起，慈禧一定会猜忌自己，所以千方百计让满人掌管京旗常备军。

随后，朝廷又命令各省督抚派人到天津学习袁世凯的练兵技术，这对袁世凯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但老于世故、久经官场的袁世凯多了一个心眼，他在想，慈禧让各省的人跟自己学习练兵，难道她不承担自己门生故吏满天下吗？所以保险起见，应该建议朝廷设立一个专门练兵的地方，由庆亲王奕劻提这个头，自己以顾问的身份来练兵，这样就可以避免太惹眼。

炙手可热的直隶总督

1904年，在征得朝廷同意后，袁世凯开始了扩军计划。他先在山东、河南、安徽招募了几千壮丁，练就了一镇的兵马。后来，袁世凯又盯上了张之洞的自强军，通过各种手段将自己之前的武卫右军一部分人马和张之洞的自强军合编为一镇，并接管军事领导权。

至此，北洋军已有六镇的兵马。袁世凯很清楚，这点兵力跟西方列强相比仍然不值一提，所以他不断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

1906年，袁世凯在保定成立了陆军军官学堂，后来的民国“总统”蒋介石就是毕业于这个学堂，由此可见这个学堂对于近代中国军事的影响力。

袁世凯不满足于北洋新军的称号，请求朝廷将自己的六镇兵马改名为陆军一镇、二镇、三镇、四镇、五镇、六镇。为了向全国人民展示自己军队的战斗力，袁世凯决定找个时间来演习，演习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国内外很多军事家都在一旁观看，纷纷夸奖陆军六个镇的战斗力。

这次演习让袁世凯名声大噪，成为了国际军事界明星。随之而来的是军队的扩大，他的军队很快就扩展到九万人。由于这些军队很像是袁世凯的私人卫队，所以引起了朝中一些守旧派的不满，很多人向慈禧进言，说袁世凯已经威胁到大清的江山，最好是除掉。

不过，当时朝中第二把手奕劻是袁世凯的好友，他早已被袁世凯买通，所以使劲为袁世凯说好话。一时半会儿，袁世凯倒也没有什么危险。

袁世凯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慈禧对自己的崛起是很不放心的，他很想知道慈禧的态度，但是怎样才能知道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慈禧身边的太监来了解，李莲英是慈禧最信任的太监，袁世凯首先想到贿赂李莲英。不过，李莲英权倾天下，跟慈禧的关系太近了，一个不慎，可能就会好心办坏事。

所以，袁世凯把收买对象重点锁定在马宾廷的身上，马宾廷也是一个太监，地位比李莲英要低很多，跟慈禧的关系不是特别近，但是也能跟慈禧说上一些话儿。为了笼络住马宾廷，袁世凯甚至和这个太监做拜把子兄弟。由此可见，袁世凯这人做人做事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袁世凯毕竟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慈禧就算怀疑他，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再说了，袁世凯处处小心，也算是个识时务的人吧！就这样，袁世凯做了五年安稳的总督。

1906年，社会又开始动荡起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宣传“驱除鞑虏”的思想在全国各地得到响应，同时西方的君主立宪思潮开始涌入中国，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君主专制感到不满。

排满潮流的出现引发了满族贵胄的恐惧感，袁世凯是当时最有势力的一个汉人，他们很担心袁世凯最后会成为端掉清朝的那个人。而且，袁世凯也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他曾上书实行君主立宪制和责任内阁制，还要求清廷撤销军机处。

袁世凯的做法引起了慈禧的反弹，君主立宪制想也别想，撤销军机处也不可能。慈禧不仅没有按照袁世凯的要求去做，还将兵部改为陆军部，任命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此举等于是用铁良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很多传统保守的汉人官僚也对袁世凯很不满，最典型的莫过于军机大臣瞿鸿机。瞿鸿机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士大夫，他是一个清官，信奉忠君爱国的思想。袁世凯想要拉拢他，几次给他送上厚礼，都被他拒绝。

除了瞿鸿机之外，朝中还有很多大臣指责袁世凯位高权重，已对君权构成威胁。

袁世凯看到自己终于引起了清廷的不满，也算是识时务，主动请求朝廷撤去自己身上八个兼差，还请求清廷收回自己陆军一镇、三镇、五镇和六镇的兵权。袁世凯这么做本是以退为进，希望慈禧信任自己的忠心，并继续让自己掌握兵权。他万万没有想到，慈禧居然连客套话都没说，直接接受了他的“请求”。

就这样，袁世凯一下子就失势了，不过他根基深厚，随时都有可能东山再起。

大起大落

很快，袁世凯的机会就来了。1906年，日本和沙俄在中国东北剑拔弩张，双方都不把清廷当回事。慈禧派遣贝勒载振和军机大臣徐世昌去东北了解情况。

徐世昌跟袁世凯是好哥们，他和载振先到天津，在天津拜会了袁世凯。袁世凯将载振伺候得舒舒服服，然后送他们上路。临行前，袁世凯还让手下的马仔段芝贵跟着他们去东北。

1907年1月，载振等人从东北回来，再次经过天津。袁世凯又行

地主之谊，盛情招待载振等人。

袁世凯听段芝贵说，载振特别爱听戏，便请了一个戏班为载振唱戏。其中，有一个名角叫杨翠喜，这女人不光戏唱得好，长得也是千娇百媚。载振听戏听得入了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杨翠喜。一旁的段芝贵立即看出载振的心思。

散场后，段芝贵让人找到杨翠喜的住处，花了一万两银子把杨翠喜赎出，还给了她一份丰厚的嫁妆钱，然后风风光光地把杨翠喜送给载振。

载振回京后，大夸袁世凯和段芝贵。没过多久，段芝贵又弄来十万银票孝敬奕劻。段芝贵的后台老板就是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此时不惜下血本是因为一桩重要的买卖就要来了。

日本和俄国在东北争锋，他们眼中虽然没有慈禧，但慈禧是不能不管的。东三省是所谓的满人龙兴之地，在东三省鼓捣等于是动大清的老巢。为了防止日本和俄国侵占东北，慈禧决定改革，将东北改成与内地一样的制度，设立总督和巡抚。

听说要在东北设立总督和巡抚，朝廷之上炸开了锅，东北是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能谋上这个肥缺，就是花再多的钱也值得啊！

这样一来，当朝宰相奕劻的门槛差点被人踏破，大家知道，要想谋得这个肥缺，奕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说实话，袁世凯很希望去当东北总督，但他是慈禧重点猜忌对象，慈禧是不可能让他再去当这个炙手可热的东北总督的。既然袁世凯自己不能去当，就想着安排自己的人去东北。袁世凯跟奕劻的关系非常铁，奕劻最后让徐世昌当东北总督，段芝贵当黑龙江巡抚，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朱家宝担任吉林巡抚。

这四个人全是袁世凯的党羽，名单一出来，朝廷里一片反对声，反对最激烈的要数瞿鸿机。瞿鸿机联合都察院的三个御史江春霖、赵启霖和赵炳麟共同反对袁世凯。瞿鸿机很清楚袁世凯有奕劻撑腰，便拉上岑春煊站在自己这边。

岑春煊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人，晚清有三大屠夫，岑春煊就赫然在榜。民屠袁世凯，杀了大量的义和团团民；土屠张之洞，杀了大量的书生；官屠就是岑春煊了。

岑春煊是广西桂林人，老爹是广西巡抚，也算是官二代。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岑春煊带兵第一时间过来勤王，慈禧西逃的时候，他又一路保驾，所以慈禧相当信任他。因为这些出色的表现，岑春煊很

快由布政司升到总督的位置。就性格来说，岑春煊跟瞿鸿机很相似，为人很正直，视钱财如粪土，这也是瞿鸿机拉拢他的原因。两人惺惺相惜，肝胆相照。

岑春煊担任两广总督期间，有一次弹劾了四十多名官僚，官场很多人都怕他。岑春煊弹劾那么官员，不小心得罪了奕劻，被贬为四川总督。听说岑春煊被贬为总督，瞿鸿机决定帮他一把。他想在岑春煊离京之前，安排他与慈禧见一面。

奕劻那边催促岑春煊赶快启程，岑春煊先到上海，到了上海他称病不走。在瞿鸿机的安排下，他又转道回到北京，重新秘密见到慈禧。

慈禧是个懂得感恩的人，和岑春煊聊着聊着她就动了感情，想起自己逃难期间，这个人不辞辛苦地保护和帮助自己，顿时感慨万千。当时光绪也在场，慈禧指着光绪说：“我经常对皇帝说，庚子事变那年如果没有大人，我们母子俩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岑春煊听了，神情颇为感动，倏地一下跪下，哭道：“微臣不想去四川啊，微臣想留着太后身边，侍奉太后和皇上。”

慈禧听了，大为受用，说道：“我懂，大人对我一片忠心，哀家心里是明白，你就放心地待在北京吧！”

慈禧立即给奕劻放话，奕劻无奈，只好允许岑春煊待在北京，还将他升为邮政部长。就这样，岑春煊和瞿鸿机正式结为反袁世凯同盟。岑春煊上任之后，首先弹劾自己的下属邮政部侍郎朱宝奎。朱宝奎是袁世凯和奕劻的党羽，岑春煊此举等于是向袁世凯发出进攻信号。

奕劻自然是力保朱宝奎，但岑春煊脾气硬得很，他一定要将朱宝奎革职，并表示如果不将此人革职，自己就不上任。慈禧没办法，只好迁就岑春煊，将朱宝奎调走。

朱宝奎离职三天后，御史赵启霖便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奏折，弹劾奕劻父子和段芝贵，背后矛头直指袁世凯。在奏折中，赵启霖将段芝贵买戏子给载振的事情挖了出来。慈禧本不知道这件事，看了赵启霖的奏折，她也很生气，心想下面这些人胆子太大了，瞒着自己做一些不法的勾当。岑春煊又借机在慈禧面前说奕劻父子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慈禧一气之下，撤销段芝贵黑龙江巡抚的职位，改命程德全为黑龙江巡抚，同时她还让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成立专案组，调查奕劻父子的生活作风问题。

调查完之后，确实发现了很多问题。慈禧召奕劻父子当面训

话：“你们作为皇亲国戚，竟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你们干脆找根绳子把我们母子俩勒死算了。”

奕劻父子吓坏了，他们知道慈禧心狠手辣，惹怒了她，是很有可能对自己下手的。载振得知此事更加恐惧，他跑到天津去找袁世凯，让袁世凯想办法。

袁世凯是脑子特别灵活的人，立刻计上心头，说道：“我们首先应该把杨翠喜送回天津，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他们没有了证据，我们才好周旋。”

这件事办好之后，袁世凯还买通了天津的一家报纸，让他们为载振和杨翠喜的事情辟谣。

岑春煊和瞿鸿机等人一看报纸上登出辟谣的文章，立即感觉到事情有变，他们要求对天津报社进行彻查。慈禧只好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去天津调查，等调查小组到天津后，杨翠喜变成了一个叫王益孙的商人的使女，王益孙还出示了买卖数据，日期是载振去天津之前。还有那个借钱给段芝贵的富商，也矢口否认。这个案子线索就这么中断了。

慈禧的心思没几个人明白，案子没查出个头绪，她居然拿御史赵启霖开刀，说他污蔑皇亲国戚，理应革职。慈禧是个非常精明的女人，奕劻是她一手提拔起来的，她难道还不知道奕劻是什么人？奕劻做的那些事情她是清楚的，但是她不希望有人弹劾奕劻，因为这也是在给她脸上抹黑。

慈禧袒护奕劻可不代表她就赞同奕劻的所作所为，她只是觉得这是自己的家事，外人不应该插手。慈禧选择私下里解决，她好好地教训了奕劻一顿，并让载振自己提出辞去一切职务。

扳不倒的总督

瞿鸿机和岑春煊主动出击，袁世凯巧妙地躲过这一招，接下来就是如何反击了。

瞿鸿机和岑春煊为官都很清廉，要想找他们的茬很难。袁世凯决定另辟蹊径，挖出他们的老底，一个人做官多年，难免会落下一下把柄。

奕劻让人去军机处调查瞿鸿机和岑春煊的档案，经过几天的搜索，终于抓住了他们的小辫子。他们发现，瞿鸿机写过三份保举康有

为和梁启超的奏折，岑春煊保举过立宪党人张謇（翁同龢的门生）。

康有为、梁启超和翁同龢都是慈禧非常讨厌的人，但当时情况特殊，瞿鸿机 and 岑春煊保举立宪党人也可以理解，当时朝中许多大臣都是主张立宪的，连袁世凯也不例外。所以，如果光凭这件事就对瞿鸿机和岑春煊下手，那么慈禧就太昏庸了。慈禧自认为还算一个聪明的女人，当然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打击瞿鸿机和岑春煊。

不过她心里已经有些动摇了：或许瞿鸿机和岑春煊并不那么值得信任！

袁世凯没有扳倒对手，心里很不甘。瞿鸿机和岑春煊在朝中强强联手，对袁世凯很不利，所以袁世凯很希望将他们中一人赶出京城。

机会很快就来了。

不久，广东衙门被革命党人袭击。袁世凯一看，立即给慈禧上奏说广东的革命党人特别麻烦，而岑春煊办事很有能力，只要岑春煊坐镇广东，革命党人必定服服帖帖。

慈禧也不是傻子，一听就知道袁世凯想把岑春煊从京城支开，慈禧犹豫了，要不要让岑春煊去广东呢？

袁世凯看慈禧犹豫，又进言道：“太后是领导，岑春煊是下属，领导需要下属去什么地方下属就应该去什么地方。现在广东很需要岑春煊，如果他真的忠于太后，应该立刻去广东。”

慈禧想了想，批准了袁世凯的意见，让岑春煊去广东。岑春煊也不是好惹的，临走前还参了奕劻和袁世凯一本，说奕劻和袁世凯勾结，想排挤自己，孤立老佛爷。看到岑春煊离去，慈禧心里很不忍，甚至动了拿掉奕劻的心思。

袁世凯早已买通慈禧身边的太监，听说慈禧想对奕劻开刀，袁世凯绞尽脑汁想对策。

那边，岑春煊离开北京后，先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仿佛是在等慈禧召他回京。岑春煊在等慈禧拿掉奕劻，只要瞿鸿机取代了奕劻，到时候自己一定可以回京。

可是岑春煊没想到，自己没有等来奕劻倒台的消息，反而等到瞿鸿机倒台的消息。

慈禧确实想拿掉奕劻。一天，奕劻生病没来上朝，慈禧单独召见了瞿鸿机，对他说：“我虽然老了，但还不糊涂，庆亲王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我只不过是念着这些年他为我们孤儿寡母出力不少，不忍心法办他们。但如果他们父子还不知收敛的话，不给点颜色看看，他

们倒以为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了。老大人，你觉得拿掉奕劻后，谁接替他最合适？”

慈禧是明知故问，瞿鸿机当然认为自己最合适，但人不能自夸，所以他囁嚅了几声。他很清楚慈禧是想让自己取代奕劻，双方就这样达成默契。

没想到，瞿鸿机控制不住喜悦，回去后喝酒一高兴，就告诉了老婆。他老婆听说他要成为大清二把手，非常高兴，一高兴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竟然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闺蜜。其中有一个闺蜜是汪康年的老婆。汪康年就是《京报》的创办人，还是瞿鸿机的门生。他听说自己的老师高升，自然很为老师高兴，竟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英国《泰晤士报》。

几天后，《泰晤士报》中文版刊登了这个消息，说中国的政局将会有大的变动，奕劻下台，瞿鸿机取代他。慈禧从来不喜欢看报纸，报纸登了后，她也不知道。

但英国公使很担心，奕劻是亲英的，他们担心奕劻下台会影响他们在华的利益，请求慈禧验证一下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慈禧一听，满脸变色，冷冰冰地说：“没有这事，我大清的事用不着你们来操心。”

事后，慈禧对瞿鸿机非常恼怒：这么大的事情你也敢随便泄露，闹得满城风雨，我若不好好治治你就不是慈禧了。

这边袁世凯听说慈禧对瞿鸿机动怒了，立即找到一个枪手弹劾瞿鸿机。这个枪手就是光绪的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文采相当好，但是在朝中很不得志。给瞿鸿机罗织罪名是非常困难的，若非才思敏捷的文人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恽毓鼎不愧是一个文采过人的士人，他给瞿鸿机罗织了四条罪：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弹劾一个人如果没有证据就毫无杀伤力，但瞿鸿机为官清廉，要找到切实的证据很难，所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一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添油加醋，给人雾里看花的感觉。

暗通报馆是指瞿鸿机和汪康年勾结，授意言官是说瞿鸿机指使御史赵启霖弹劾奕劻父子，阴结外援是说瞿鸿机暗中跟《泰晤士报》的编辑勾结，分布党羽也有所指，是说瞿鸿机曾保荐自己的亲家余兆康当法部丞参。

慈禧本来就想整瞿鸿机，这个奏折好比是刀柄，她立即拿起这个

奏折，将他革职。

瞿鸿机就这样下台了。

瞿鸿机下台后，奕劻说自己是“戴罪之身”，请求慈禧允许自己辞职。慈禧不同意，理由很简单，现在没有合适的人选取代他，奕劻这么做很高明。

瞿鸿机倒台后，朝廷成了奕劻和袁世凯的天下。这时，清朝的贵族们又开始担心了，铁良更是在慈禧面前进言，说袁世凯就是当世的曹操，不能不防。

袁世凯之前交出的四镇兵权就是由铁良接管，他早已把铁良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所以，接下来就是要搞掉铁良。

袁世凯主动给慈禧上奏折，说铁良身为兵部尚书，对军事一窍不通，担任兵部尚书后，没有做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这么搞下去国防事业迟早会功亏一篑。

铁良则说袁世凯这个人居心叵测。在这件事上，慈禧完全站在铁良这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况慈禧本来就不信任袁世凯。

无奈之下，袁世凯又把矛头直指岑春煊，岑春煊虽然离开了京城，但终究是瞿鸿机的死党，又跟慈禧关系密切。如果不搞垮岑春煊，说不定有天瞿鸿机还能东山再起。

袁世凯和奕劻又在慈禧耳边进言，说岑春煊勾结康有为，还说岑春煊曾加入康有为的保国会。慈禧也不是傻子，对这些攻击全然不信。

整不垮岑春煊，袁世凯绝不放手。恰好这时他认识了一个照相业方面的高科技人才蔡乃煌，蔡乃煌听说了袁世凯的难处，立即计上心头，说自己懂得照片PS技术，可以把岑春煊和康有为的照片合成一张，看上去就好像两人合影一样。

当慈禧收到这张照片时，就是不相信也不可能了，可怜慈禧久居深宫，哪里懂得什么照片PS技术。不久，慈禧给岑春煊发了一道谕旨，说先生生病了，好好回家养病吧！

随着袁世凯的政敌一个个地倒台，朝中对袁氏集团也越来越警惕了。

慈禧也意识到必须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了，慈禧想的办法还是老一套，明升暗降。他将袁世凯升为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免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务。跟袁世凯一同“升迁”的还有张之洞，张之洞也是因为权力过热，被调到京城担任军机大臣。

袁世凯和张之洞都是权臣，慈禧同时将他们调到京城，不仅限制了他们的权力，还让他们在朝中互相牵制，确实高明。

可惜，慈禧日渐衰老，很多事情力不从心，因而给了袁世凯不少机会。袁世凯虽然进京，但为了紧紧握住北洋军队的枪杆子，他动用各种关系让自己的心腹杨士骧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进京后，张之洞果然跟袁世凯斗了起来，慈禧安心了，她就怕张之洞跟袁世凯关系好。

第十章 这一年皇帝和太后先后离去

十几年生活在一座孤岛上，光绪曾多次感叹自己还不如汉献帝。光绪知道，自己虽然名义上是个皇帝，但性命随时不保，一旦慈禧不需要自己，就可以直接把自己抹掉。光绪是慈禧的政敌，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怀疑光绪是被人谋害的。慈禧晚年，感到来日无多，很担心光绪复出，重操大权。

光绪死因之谜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于中南海瀛台的涵元殿，这位多灾多难的皇帝终于结束了自己悲催的一生。

然而，他的死至今仍是一个悬念，他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被人谋杀，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事实上，光绪自被囚禁于瀛台，就一直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光绪是个尊严感很强的皇帝，也是一个有大志的皇帝，过着囚犯的生活，其心情之压抑我们可以想象。

十几年生活在一座孤岛上，光绪曾多次感叹自己还不如汉献帝。光绪知道，自己虽然名义上是个皇帝，但性命随时不保，一旦慈禧不需要自己，就可以直接把自己抹掉。光绪是慈禧的政敌，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怀疑光绪是被人谋害的。慈禧晚年，感到来日无多，很担心光绪复出，重操大权。只要光绪掌权，慈禧在地下都不安稳，为何？

因为慈禧生前一再迫害光绪，她担心自己死后，光绪会怠慢自己，会像伍子胥和顺治那样“鞭尸”。恰好光绪死后二十四小时，慈禧也驾崩了，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慈禧在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后，先让人下手毒死了光绪。

也有人认为光绪是正常死亡，我们来看看这个观点。

在清朝的正史中记载光绪是正常死亡，内容不外是光绪生病了，而且病入膏肓，御医治不好。这种看法貌似有道理，因为光绪从小身体就不好，长大后也是多病，加上心情抑郁，早逝的概率确实很大。

根据清宫档案的记载，光绪的病状主要是虚癆病，外加精神抑郁，导致五脏六腑都受损，阴阳两虚，气血双亏，最终神离魄散而死。用现代的医学观点就是，光绪有肺结核和心肺功能衰竭之病。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依据清宫史料的记载，正史从来是不可尽信的，但又不能完全不信，所以才需要后人辨析。光绪有病是真，但光绪诊治的整个过程都是由慈禧监控的。慈禧让奕劻负责为光绪治病，所以任何医生如果没有得到奕劻的批准是不能进入瀛台的。这就意味着光绪的生死操纵在慈禧的手中，慈禧如果想伪造病情只是举手之劳。

持谋杀观点的人，在凶手问题上有许多分歧。

有人认为杀害光绪的凶手是袁世凯，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提到，戊戌变法时，袁世凯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在关键时候倒向了慈禧。袁世凯担心慈禧死后，光绪掌权，自己会受到追惩，所以动手除掉了光绪。在光绪驾崩的前一天，袁世凯派人送来了药丸。光绪恨袁世凯可能是事实，但当时袁世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还有人说光绪临终前嘱托隆裕太后和载沣，让他们除掉袁世凯，为自己报仇。尽管袁世凯有作案动机，而且跟奕劻的关系铁，确实也有杀掉光绪的能力。但这个说法缺乏证据，溥仪的说法也是从一个老太监口中得知的，老太监也是听别人说的，口口相传的东西往往不可信。

也有人认为谋害光绪的是李莲英。

李莲英跟光绪的矛盾由来已久，慈禧重病之后，李莲英惶恐不安，便同慈禧合谋害死了光绪。慈禧的女官德龄便持有这种看法，她在书中写道：“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不久，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让光绪掌了权来跟自己算账，不如还是自己先下手为好。经过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近来奴才听许多人说，万岁爷的身子很不好。’凑着一个机会，他就悄悄地对太后说，语气是非常的奸猾。‘奴才愿意去瞧瞧看，或者可以使他的身体好起来。’他这一串说话的深意，当时太后究竟有没有听清楚，实在没有人敢断定了。但为稍存忠厚起见，我们不妨姑且说她病中精神恍惚，所以没有窥测到李莲英的真意。就在李莲英说过这番话的第二天，光绪便好端端地害起了厉害的病来了。”

德龄女士的文字非常不客观，太多渲染和主观臆断。虽然她的话不足为信，但李莲英确实是有嫌疑的，李莲英肯定与光绪有矛盾。英国人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中也认为是李莲英害死了光绪。这种观点仍然缺乏充足的证据。

第三种观点认为谋杀光绪的人是崔玉贵。

崔玉贵也是慈禧非常宠信的一个太监，谋杀珍妃的就是他。本来

想处死珍妃的是慈禧，但慈禧回京后却把一切责任推到崔玉贵的身上，说崔玉贵误解了自己的意思，自作主张处死了珍妃。试想，慈禧死后光绪上台，会不会宰了崔玉贵。如果不除掉光绪，崔玉贵就是必死了，所以崔玉贵很有作案动机，但是缺乏的仍然是证据。

第四种观点认为杀死光绪的是奕劻。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晚清翰林院庶吉士胡思敬，他在《国闻备乘》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奕劻推荐郎中力钧进宫给光绪治病，力钧给光绪进献了一副药剂，光绪吃后狂泻不止。第二天，力钧再进去，光绪怒目而视，后来，力钧再也不敢去了。这个传闻是真是假无法验证，即使是真的，也不能完全断定杀害光绪的人是奕劻。

第五种观点认为杀害光绪的凶手就是慈禧。

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记载过这样的事情：得知慈禧病了，光绪面有喜色；慈禧听说了这件事，大怒：“我不能死在你前头。”

换句话说，慈禧担心自己死后政权落入光绪手中，怕光绪推翻自己制造的种种冤案，更怕光绪在史书中抹黑自己，所以下手毒死了光绪。

事实上，光绪在囚禁瀛台的日子里，仍然没有放弃学习。他每天都在阅读中国古典书籍和西方的一些书籍，甚至还每天跟德龄女士学习一个小时的英文，询问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德龄如此回忆当年光绪向自己求学的情况：

每早见皇帝，当余有暇时光绪必问英文，所知甚多。余见皇帝，极有趣味。在太后面前，面容肃默，或有时如一呆子。若离开时，竟然又是一人。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还保存着光绪当年索要图书的书单，从中可以看出，光绪求学的欲望丝毫未减。这说明，光绪对未来还是存有希望的，他现在只不过是韬光养晦，指望有天慈禧死后，自己能够重掌朝政。听说慈禧病重，光绪心里肯定是高兴的，他万万没想到，政治太险恶了，一个表情不对就可能危及性命之忧。

清宫太监在回忆录《清宫琐谈》中有这样的记载：“光绪本无大碍，诸医开方借以平和之剂为药，然而，太监们在光绪死前已得到光绪驾崩的消息。当时在瀛台侍疾者共六名，其中两人饿死，剩下几人食不果腹，‘因饿失血者又凡三人’。光绪死前，在床上召唤医生周某，他两眼瞪大，四次用手指指口，周某知帝饿极，但实在是没有吃的，就连他本人也三天未进食了。后来，光绪帝渐无声息了。不久，醇亲王入见，周报告说皇帝已去世，醇亲王用镜子试皇帝鼻息，确信

其已死亡，于是匆匆而去。一会儿，皇后赶来探视，随后便把皇帝驾崩的消息公之于众。”

著名金石学家、教育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溥良当时担任礼部尚书，是主管礼仪的最高官员。根据溥良的回忆，慈禧临终前，他就守候在慈禧的寝宫外面。在宣布慈禧驾崩前，溥良看到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碗出来，溥良问是什么。太监回答说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酸奶。光绪服下了这碗酸奶就驾崩了。

光绪之死可以说疑云重重，众说纷纭，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光绪确实死得太突然了。没有人想到光绪会突然死去，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不知道应该把皇帝葬在哪里。大家只好暂时把光绪的遗体停在梁各庄行宫，一个月后，才为光绪选好陵址，开始修建陵墓。到民国四年（1915年）时，光绪才正式下葬崇陵。此时，距离他去世已经有七年了。

为了解开光绪暴死谜案，考古学家联合中央电视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中心、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等机构组成了专题组，经过五年多时间的研究和实验，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探寻光绪死亡之谜。

最后得出结论，光绪死于砒霜中毒。但是究竟是谁下的毒，仍然是一个谜。

清德宗光绪是个什么样的人

光绪虽然是一个天子，但一生坎坷，活在慈禧的阴影里痛苦不堪，他想摆脱慈禧，可是每次受伤的都是自己。

悲剧贯穿着光绪的一生，不但政治生活是一个悲剧，连家庭生活也是莫大的悲剧。光绪只有一个皇后两个妃子，后妃数量在中国皇帝中是最少的之一。但即便是这两个妃子，他也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爱。

后人总结光绪的家庭生活有八大不幸。

不幸一：没有正常的父子关系。一般来说，皇帝的父亲也是皇帝，这种关系比较正常，天伦之爱和君臣关系并不冲突。但光绪就不一样了，他的亲生父亲必须跪在他的面前，父子之间无法享受天伦之乐。父亲不能安慰儿子，儿子也不能在受伤时扑入父亲的怀抱。

不幸二：没有正常的母子关系。儿子都恋母，慈母之爱是一个儿

子不能缺乏的，乾隆跟母亲的关系就相当好，孝子慈母，垂范天下。而光绪想见自己亲娘一面都难，相信光绪自己都觉得这个皇帝做得太累了，如果做一个普通人会幸福得多。

不幸三：爱不起爱不得的皇后。隆裕皇后是慈禧的侄女，首先光绪不爱她，也厌恶跟她亲近。光绪清楚，她不光是自己的皇后，也是慈禧的耳目，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敢对皇后说。

不幸四：深爱珍妃却不能在一起。光绪爱珍妃，珍妃爱光绪，可是慈禧很讨厌珍妃。慈禧还将光绪唯一深爱的女人害死，这对一个皇帝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不幸五：没有正常的手足之情。一个正常人都会在乎兄弟之情，可惜光绪却不能这样，他跟兄弟相隔很多层，是君臣关系。

不幸六：“亲爸爸”根本不亲。光绪是由慈禧抚养大的，但慈禧很少给光绪温情和母爱。相反，光绪长大后，慈禧对他多有提防，不断迫害和打击光绪。

不幸七：光绪无儿无女，无法享受天伦之乐。

不幸八：光绪被囚禁在瀛台，一个人孤孤单单，断绝了跟外界的联系，心灵之寂寞常人难以想象。

作为一个帝王，光绪并不是一个昏君，他有思想，想变革，想强国；可惜他性格懦弱，在权谋方面完全不是慈禧的对手，所以终生活在慈禧的淫威之下，一生不能施展抱负。

在历史的非常时期，如果没有杀伐决断的魄力，即使想改革，也很难有所作为。光绪想奋发有为，通过维新变法强国收权，可惜没有与之匹配的手段和铁血心肠，这注定了他的失败。

孙中山曾这样评价光绪：“维新运动后革命之得到大步迈进，还得感谢光绪皇帝。”

慈禧临终前的维稳安排

1908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已经七十四岁。这一年的十月初十是慈禧的七十四岁大寿，此时她掌握大清权柄已经四十八年了。

大寿之前，慈禧已感觉年老体衰精力不济，她预感到自己可能来日无多。大寿虽然办得很豪华风光，但慈禧心里没多少喜庆的感觉，

她更多的是担心生老病死。

大寿那天，慈禧在西苑颐年殿看戏，看完戏后，回到仪鸾殿就寝。没想到回去不久，她就病倒了，这些天，她吃了些果饼，没想到腹泻更严重了。

慈禧一病倒，大清帝国的大厦就摇摇欲坠，偏偏这天光绪也在生病。朝廷大员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储君问题，慈禧并没有放弃对朝政的控制，她还是很希望自己早点病好，统治整个大清。不过，两手打算还是必需的，病中，慈禧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接入宫中。

其实，这时候如果慈禧不做决定的话，各方势力都会蠢蠢欲动。当时幻想最大的是恭亲王溥伟，他是恭亲王奕訢的孙子，从他爷爷开始就在做皇帝梦，好不容易又逮住一个机会，怎么肯放弃。甚至连奕劻父子都想做皇帝。

此时，京城里到处传言袁世凯打算废掉光绪，立自己的哥们载振为皇帝。听到这些流言，慈禧很担心，她最担心的是奕劻和袁世凯联手，到时朝中就无人是他们的对手。为了防止情况有变，11月7日，慈禧让奕劻去遵化为自己选择陵寝。其实，慈禧这招是调虎离山，将奕劻调离京城，才能确保政权顺利过渡。

调离奕劻后，慈禧又让铁良统领一镇的兵力镇守京城，倘若出现乱子，在第一时间弹压。

虽然慈禧心里已有算盘，但在接溥仪入宫之前她还是召见了张之洞、世续等重臣，询问他们立嗣的问题。张之洞等人实话实说，觉得应该立一个长君，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这些人心里都想，如果再立小孩子的话，恐怕又会出现太后垂帘听政的事。所以，大家一致主张立载沣。当时载沣已经二十五岁，已经担任军机大臣之职。

慈禧经过反复权衡后，决定立溥仪为储君，载沣为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皇帝的异母弟弟。

11月14日，光绪驾崩。此时，慈禧的病情也越来越重，近乎弥留。慈禧不愧是女强人，在如此重病的情况下，依然打起精神召见载沣、奕劻（接班人确定后，奕劻便回来了）、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进宫，正式宣布新皇帝的人选：溥仪当皇帝，继承大统，同时过继给同治和光绪。

临死前，慈禧对自己一生做出了总结：“我几次垂帘，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我贪恋权势，其实是情况逼得我不得不这么做。”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快死的人是不会撒谎的，但是慈禧的总结告诉我

们，有些人就是要死了也不会改变撒谎的习惯。

慈禧还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忽然颁布了这样一道诏书：“以后不准再让妇人干政，后宫干政与本朝家法相违背，必须严格限制。同时也不要让太监干政，明末亡国的教训殷鉴不远。”

我们不要把慈禧这些话当真，她弄权了一辈子，最后还说这样的话，很典型的得了好处还卖乖。再说了，大清的气数也快完了，不会再有妇人有机会弄权了。

慈禧的生活习惯

慈禧是个很注重养生的人，衣食住行非常讲究。

慈禧的衣服由江南制造专门负责，成千上万，不可计数。有一次慈禧东巡，随身带了两千多件衣服，一次出行就带这么多衣服，可见这个女人之奢侈。如此挥霍民脂民膏，大清还有不亡的道理吗？

对于饮食，慈禧就更加讲究了。慈禧设立了一个专门为她做饭的御膳房，御膳房下面又设了五个局，分别为荤菜局、素菜局、饭局、点心局、挂炉局。

慈禧的御膳房规模庞大太监众多，很多厨师专门只做一两个菜，每一样菜、每一种食物都要做到相当可口。慈禧的口味非常刁，她一口就能吃出味道是否地道。有一次去清东陵，烧麦的刘师傅未能随行，便让另一个厨师代做。没想到慈禧尝了一口就勃然大怒，立即让去召刘师傅过来亲自做。

在慈禧的菜单上有四千多种菜，慈禧最爱吃的食物有：小窝头、饭卷子、油性炸糕、烧麦、黄色蛋糕、炸三角、荷叶粥、肉粥、绿豆粥、小米粥、薏仁米粥、果料粥、粳米粥、佛跳脚。

除了饮食挥霍之外，在养生方面慈禧还有一些特殊的习惯。

比如，她喜欢喝人乳，在慈禧看来，每天喝一点人乳，既可以美容又能养生。所以，慈禧有一批固定的乳母，慈禧从年轻时就有喝人乳的习惯。

此外，慈禧还特别喜欢吃鸭子，她最爱吃的有清炖肥鸭、清炖鸭舌、盐鸭掌、熏鸭等等。

在吃方面，慈禧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有人说：“慈禧的一生，简直是为吃而存在的。”慈禧每一次就餐，至少要有一百多道

菜。

我们再来看看慈禧的爱好。

慈禧虽然文化水平不高，批阅奏折时经常错字连篇，但她还是很喜欢附庸风雅的。她曾经请一些书法一流的女人教自己练字，除了书法之外，她还爱好绘画。当然，她绘画的功夫不怎么地，但不管怎么说，能有这份心思也算是不错了。

慈禧知识水平固然不高，但还是很喜欢看书的。史书太难看，她主要是看《封神演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而且还从这些书中学习治国的经验、权术的技巧。当然，慈禧最大的爱好还是听戏。

总的说来，慈禧的兴趣非常广泛。

她是一个爱权力的女人，也是一个爱美的女人，更是一个爱财的女人。我们可以说，慈禧一生中最爱的还是权力，排名第二的就是自己的生命了，排名第三的绝对是财产。慈禧爱财如命，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慈禧收集了大量的珍奇异宝，根据德龄的记载，她仅仅在一个房子里就看到了三千多盒珠宝。

无论如何，这个穷奢极欲的女人离开了多灾多难的人世。在临终前她虽然做了周密的安排，但人算不如天算，辛亥革命的爆发，终于让清王朝寿终正寝。

第十一章 载沣与袁世凯斗法

载沣虽然不相信光绪是袁世凯害死的，但他确实有惩治袁世凯的意思，袁世凯重兵在握，对清廷已经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威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将来清廷势必受制于袁世凯。而且载沣很清楚，袁世凯一路鼓吹君主立宪，就是想搞垮清政府。

可怜的摄政王

溥仪能当上皇帝不光是因为他是醇亲王奕譞的孙子，还因为他的外祖父是荣禄。荣禄是慈禧的宠臣，传说慈禧在进宫前就爱上了荣禄，执掌权力后，跟荣禄的关系更为暧昧。再说了，荣禄也是一个实力派，手握兵权。

溥仪被抱进宫时才三岁，那时慈禧距离死亡还有三天，根据溥仪的说法，他对慈禧没有好印象，溥仪回忆说：“我记得自己忽然处在许多陌生人中间，在我面前有一个阴森森的帷帐，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瘦脸——这就是慈禧。”当时溥仪坐在地上号啕大哭，慈禧让人给他一串冰糖葫芦，溥仪将冰糖葫芦摔在地上，慈禧当时很不高兴。

在为慈禧和光绪举办丧礼的时候，溥仪坐在宝座上很不耐烦，大哭大喊。载沣在旁边只好尽力哄溥仪：“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载沣无心中说出了很不吉利的话，很多大臣纷纷猜测，认为这是不祥的话。果然，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

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是一个好男人，但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他为人很随和，而且喜欢清静，在生活上追求舒适和安闲。载沣喜欢读书，对政治的兴趣反而不是很大。载沣是一个学者式的人物，不抽烟不喝酒，生活单调而无趣。听说慈禧让自己带着溥仪入宫，他是不愿意的，也是无奈的。

像载沣这样手腕平庸的人要想稳住局面是不可能的，在乱世中，如果没有相当的手腕不可能稳住局面。当时全国最有权力的人是袁世凯，载沣既然当了个摄政王，出于一种责任感，他也必须干一番事情。

首先是中央集权，将权力从袁世凯那里夺过来，在和袁世凯争权

的过程中，载沣明显感觉到非常吃力。确实，一个好男人是不可能斗得过袁世凯这样铁血的人物的。

其实，到了载沣摄政的时候，清帝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只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才能把权力分散的帝国捏合在一起。

国内的地方势力几乎就快形成割据，清政府对地方督抚的影响力日渐减弱，而帝国主义又在中国肆意瓜分。日本和俄国在东三省活动，几乎把东三省当成自己的领土。最要命的是国内的反清运动此起彼伏，载沣虽然想尽办法镇压，但越镇压，反清活动就越猖狂。

朝政也相当腐败，载沣拿这些腐败的官员毫无办法。看到朝廷官员结党营私，只顾着自己的利益，而大清帝国却摇摇欲坠，载沣非常痛心。人浮于事，载沣想改变却力不从心，更让他气愤的是他的妻子瓜尔佳氏却带头给他抹黑。瓜尔佳氏喜欢钻戒，一些官员投其所好，这样一来，载沣想惩贪也不知从何下手了。

最棘手的问题还是财政，载沣摄政时清廷国库空虚，所有部门都只知道伸手要钱，对外赔款早就让清政府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载沣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但既然接手了这个烂摊子，那么就得干下去。

载沣决定先从袁世凯下手。

排挤袁世凯

光绪死后，远在海外的康有为散布消息说光绪是袁世凯害死的，他接连发出《光绪帝上宾请讨贼袁启》和《讨袁檄文》，指责袁世凯是谋害光绪帝的头号凶手，请求载沣惩治袁世凯。

载沣虽然不相信光绪是袁世凯害死的，但他确实有惩治袁世凯的意思，袁世凯重兵在握，对清廷已经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威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将来清廷势必受制于袁世凯。而且载沣很清楚，袁世凯一路鼓吹君主立宪，就是想搞垮清政府。

载沣摄政后，首先冷落袁世凯，重用张之洞。

不久，就有人站出来说袁世凯是个奸诈小人，让载沣惩治他。御史赵炳麟借机上疏，说袁世凯是曹操刘裕之流，不仅结党营私，而且把持军权，如果不拿掉他，势必危及大清江山。

至于朝廷的一些元老更是主张杀掉袁世凯以绝后患，载沣确实动

了杀害袁世凯的念头。

奕劻听说载沣想杀掉袁世凯，立即找到载沣，愤怒地说：“你要杀袁世凯不难，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杀了袁世凯之后，北洋军造反你能镇压得了吗？”

奕劻这一说，就把载沣吓清醒了，载沣只好放弃干掉袁世凯的想法。不光奕劻不同意杀掉袁世凯，朝中一些元老也不同意，譬如张之洞，他认为新君继位，维持稳定为第一要事，现在杀掉袁世凯势必会引起国内政局的动荡，到时候遭难的还是大清，还是天下的百姓。

袁世凯侥幸逃过一劫，不过他很清楚，自己现在是载沣的眼中钉，迟早他会除掉自己。鳌拜和肃顺的例子就在眼前，这段时间，袁世凯被吓坏了，呆在府里不敢出门。后来想来想去，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一天晚上，袁世凯狼狈不堪地换上普通人的衣裳，惶恐不安地离开了北京。回到天津后还觉得不踏实，想偷渡到日本去。他的门生杨士骧知道此事，让自己的儿子杨毓瑛去找袁世凯，转达自己的意思：这时候千万不能逃到日本，如果逃到日本的话就等于是叛国，说明自己底气不足，于今之计，最好的就是立即返回北京，以不变应万变，你本来就没有犯罪，应该理直气壮地待在北京。

袁世凯终于被说服了，又偷偷地跑回了北京。到了北京后，载沣给他下了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很有意思，以溥仪的名义发布：军机大臣袁世凯为国家出力很多，是国家的栋梁，朕继位以后很希望袁世凯继续为国家效力，可惜袁世凯患上了足疾，行走十分困难，不能继续为国效力，所以朕特许他回家养老，以示朝廷对大臣的体恤之情。

收到圣旨时，袁世凯大汗淋漓，他很担心载沣会宰了自己，现在知道性命无忧，总算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虽然职务全丢，但终究保住了一条性命，袁世凯还是觉得庆幸。

收拢兵权

载沣对于兵权是非常重要的，这可能跟他出使德国的经历有关。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载沣以皇帝兄弟的身份出使德国，德皇让亨利亲王招待载沣，亨利带着载沣参观了德国军队。这次参观给载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亨利告诉载沣，在德国皇室里，皇家子弟全部都是从陆军学校毕业。他们从低级军官一直升到高级将领，因此德

国的军权牢靠地掌握在皇室的手中。

载沣回国之后，把德国的这种军事思想转告给光绪，认为大清应该模仿德国，皇家子弟必须掌控军权。

载沣监国后，想把军权牢牢地抓住。1908年十二月初三，载沣颁布了一道诏书，宣布禁卫军的指挥权归摄政王。载沣还派人出洋考察，回来后训练禁卫军。宣统二年，载沣又提出振兴海军和陆军，命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兵部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创办海军。我们知道，李鸿章本来已经创办了海军，但是中国海军在甲午中日海战中全军覆没。

为了将陆军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载沣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前各省督抚都身兼陆军部尚书和侍郎等职，载沣觉得这样不行，只会让督抚的权力过大，于是决定将各省的兵权回收中央，各省督抚如果要调兵的话，必须先经过中央部门的同意。在中央，载沣把军权交给自己的兄弟们，贝勒毓朗管理军谘处事务，载沣六弟载洵掌管海军，七弟载涛掌管禁卫军。

在载沣看来，对自己掌管军权威胁最大的是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所以他重用大量留洋的留学生，企图取代表世凯北洋海军的势力，他将一批忠于自己的留学生放到军队的重要岗位上。

载沣急欲振兴大清，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载沣任命的这些人不具备军事领导的才能。这些八旗子弟已经完全丧失了祖先们的尚武传统，这些人要想在军队中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

袁世凯回老家

1909年1月6日，袁世凯拖着沉重的身体，疲惫不堪地来到北京火车站。送行的人只有寥寥几个，跟袁世凯红透半边天时的情况完全不同。

送行的几人之中就有张之洞，张之洞虽然在政治上是袁世凯的对手，但两人多少也有惺惺相惜的感觉。看张之洞来送自己，袁世凯从容地说：“你就不担心会连累自己？”

张之洞苦笑说：“项城你走了之后，恐怕很快就轮到我了。”

袁世凯和张之洞、严修、杨度等人告别后便踏上了前往河南的列车，这是一辆绿皮火车，也就是最普通的那种。可见，袁世凯懂得低调做人的道理。

在火车上，袁世凯越想越心酸，觉得这个世道真的太炎凉了，以前自己得势时门槛都被人踏破，现在居然没几个人来送自己。

袁世凯想到自己的恩人翁同龢，翁同龢被贬谪时，朝中没有一个人敢为他说话，最后无限凄凉地还乡了。到了天津时，袁世凯听说他来了，也不敢见他，却给他写了一封信，上面还附了一张银票，让人送给翁同龢，当翁同龢看到袁世凯的书信，竟然当着来人的面哗哗流泪。

袁世凯跟家人的关系不是很好，他曾因为葬母之事得罪过家人，所以他到了河南境内后，并没有回项城老家。袁世凯究竟因何得罪了家人？事情是这样的，袁世凯生母刘氏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山东剿灭义和团。袁世凯曾提出想回家守丧，但遭到慈禧的拒绝。因此，他母亲的遗体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安葬。当上直隶总督后，袁世凯才有时间回家葬母。

袁世凯的母亲是庶出，根据当地的规矩，庶出的小妾不可以从正门出殡，也不能葬在祖坟的正穴中，更不可以跟丈夫合葬，合葬的位置是留给正妻的。

袁世凯常年在外奋斗，没有多少时间孝敬母亲，母亲死后，袁世凯非常伤心。现在家里人要用这种待遇葬自己的母亲，说什么他也不肯答应。他一定要母亲从正门出殡，还要葬在祖坟中，与自己的父亲合葬。全家人都不同意，认为袁世凯疯了。袁世凯无奈，居然跪在地上求主持葬礼的二哥袁世敦通融一下，但袁世敦丝毫不通融。

袁世凯大怒，居然带着一帮军人过来，要强行给母亲从正门出殡，这么一来他把全家人都给得罪了。家人不同意他母亲葬在祖坟里，固执的袁世凯买了一块坟地，单独安葬母亲。

从此之后，袁世凯就与家人互相不往来。

袁世凯这次回河南，选择在彰德府北门外的洹上村落脚，彰德就是现在的安阳，洹上村是安阳的一个风景不错的村庄。村口有一条小河，人称洹水。

寄情山水，韬光养晦

一般说来，官场失意的都会选择寄情山水，自古以来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其实这不光是失意后的一种派遣，更是一种韬光养晦的做法，官场起起落落，总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洹上村风景宜人，天津有个大款在这里买了个别墅，这个别墅占地两百多亩，里面林荫葱翠，鸟语花香。袁世凯一看，这倒是个好地方，便出高价买下了这个别墅。袁世凯开口要买房子，这个商人就是不想卖也不行了。

袁世凯买下这个房子后，开始进行改装，他差点把这个庄园弄成碉堡，当地的地方官知道袁世凯是个大人物，所以特地派来了一支兵马保护袁世凯。

之后，袁世凯便过着不问世事光风霁月的生活。

袁世凯的别墅前有一个小池塘，里面长满了荷花，到了六月，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看起来美极了。袁世凯还在院子里开辟了一个花园，里面种着各种奇花异草，他为这个花园取名为“养寿园”，还将花园里的楼阁题名为“养寿堂”，主楼旁边的侧楼题名为“谦益堂”。

养寿堂和谦益堂的名字可是大有来历，“养寿”和“谦益”是慈禧赐给袁世凯的两个词语，算是对袁世凯的规劝和忠告。慈禧是一个非常老辣的女人，一下子就指出了袁世凯的缺点，并建议他适时注意和改正。袁世凯家族里的男人很少有活过六十岁的，慈禧给他“养寿”二字就是建议他多注意养生，别太汲汲于权力；“谦益”是建议袁世凯不要居功自傲咄咄逼人，要学会低调做人淡定为官。

袁世凯用慈禧给自己的赐字命名两个楼，用意非常清楚，他相信自己一定能东山再起，现在正是韬光养晦的时候。

隐居的这段日子里，袁世凯用了很大的心思反思自己在官场上的失败之处，他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己不够低调不够谦虚，而且修养不够，过于锋芒毕露，过于迷恋权力，所以才招致众人的嫉恨，做官最关键的是知进退。

闲云野鹤的日子倒也惬意，袁世凯经常到洹水去钓鱼，还自诩为陶渊明的弟子。

但袁世凯天生是一个政治动物，他是不可能放得下政治的，闲暇之余，他写下了一些诗，这些诗最能反映他的心态，譬如《忆庚子旧事》：

八方烽举古来无，稚子操刀建远谟。

惭对齐疆披枳棘，还临燕水补桑榆。

奔鲸风起惊魂梦，归马云屯感画图。

海不扬波天地肃，共瞻日月耀康衢。

这首诗名为怀旧，其实反映的还是他念念不忘政治和权力的心理。另一首诗就更直接地表达了他对于壮志未酬的遗憾：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士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为了让朝廷相信自己归隐，袁世凯还和哥哥袁世廉在船上钓鱼合影，照片中，袁世凯披着蓑衣，手持钓竿，一副醉心于山水的样子。袁世凯将照片印了几百张，分发给亲朋好友，还让人把自己的诗歌连同照片发表在报刊上。照片和诗一登报刊，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袁世凯很希望载沣能注意到自己，重新起用自己，袁世凯实在有些闲得无聊了。载沣正处于焦头烂额的关头，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起用袁世凯的。

载沣最痛苦的是，大清国在他手中并没有好转，反而一天不如一天。国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财政拮据。载沣不懂经济，没钱只知道向洋人借钱。只可惜载沣跟洋人没有交情，载沣开口，洋人并不借。到了这地步，载沣只好向老百姓伸手要钱了。乱世中，老百姓本来就艰苦，你再向他们伸手要钱，他们只好造反了。

载沣不用袁世凯，袁世凯就只好继续养老了。虽然袁世凯在家里休养，但是他生日的时候，老部下们纷纷过来拜访他，这些人主要是北洋集团的人物，有张勋、段祺瑞、王英楷、刘冠雄等人。由此可见，袁世凯虽然退休，但是实力仍在。

部下过来拜寿，袁世凯是喜忧参半，一来高兴这些人还没忘记自己，二来担心部下如此举动会引起清廷的猜忌。这时候大清的国运已经快消耗殆尽了，所以袁世凯的这些部下才敢明目张胆地过来拜见他。

这一切是不是预示着袁世凯很快就要复出呢？

第十二章 扶不起的大清国

对于革命，统治者从来只有一个政策：镇压镇压再镇压。镇压命令虽然是由载沣下达的，但载沣委实是一个软弱的人，看到大清帝国风雨飘摇，他经常被吓得一个人偷偷哭泣。汪精卫行刺他后，他有时吓得连家都不敢回。

宪政也不管用

让家天下的封建皇权实行宪政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外敌的入侵，清廷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要进行宪政改革。

载沣掌权后，本来是不打算进行宪政改革的，但是来自国内外的压力非常大，他不能不有所作为。清廷从实行宪政的第一天起就表现出迫不得已的姿态，这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是真心改革。

宣统登基第二天，载沣宣布预备立宪按原计划执行。各省的督抚担心载沣只不过是做做姿态，联名上书，要求清廷立即召开国会，讨论宪政事情，但遭到载沣的拒绝。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反清活动也日益高涨，各地不断出现暴乱和攻打衙门的事件。对此，载沣也没有什么良策，无非就是镇压。

预备立宪开始后，也进行了一些改革，首先是官制改革。官制改革主要是模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建立内阁，并设立总理大臣一名，左右副大臣两名，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官职改革大体是模仿三权分立制度，废除了清朝的三法司制度，也就是说废掉了都察院、大理寺和刑部，改而建立一套完整的司法系统。除了在中央，在地方上也进行了一些官制改革，这些改革虽然都很好听，但并没有收到实质性的效果。

在官制改革中，设立了资政院，资政院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相当于国会的前身。资政院的主要事务是做好国家预算、制定国家政策、负责税收和公债等事务、制定和修改法典（但不能制定宪法）等等。

如果说资政院相当于西方国家的上议院的话，那么谘议局就相当于下议院。谘议局的议员由各省督抚推荐和考核，部分地反映了民

意。但这些改革其实根本还是换汤不换药，真正的权力还是操纵在皇室和督抚手中。

立宪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地方自治，这是出洋考察的五个大臣总结出来的经验，回来后他们力荐中国实行地方自治，他们说：“考察西方强国，他们所以强大最大的原因在于实行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在戊戌变法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湖南就实行地方自治，张之洞把湖南经营得非常好，为全国做了一个表率。

谘议局成立后，实业家张謇带头发动了大规模的国会请领活动，张謇请求在宣统三年召集国会，同时请求设置责任内阁。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清廷坚持预备立宪九年后才召开国会。虽然请愿活动给清廷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但仍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对日本低头

慈禧治国很有一套，那就是宁可让国家断送在外敌手中，也不要让国家落入“奴才”的手中。那意思很明显：严防家贼，对外国人要好一点。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扩张欲望空前高涨。日俄战争后，日本又夺取了朝鲜，随后，它的眼光紧紧盯着中国的东北和蒙古。1906年，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这两个机构的成立就是为了侵略东北做军事准备，借公司之名实行武备之实。

日本对东北的侵略首先是从修铁路和开矿开始的。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初十，日本向清廷提出了安奉铁路问题，要求清廷允许日本人在丹东和沈阳之间修铁路。日本还想把这条铁路和朝鲜境内的汉城连接起来，计划在鸭绿江上架铁桥，以便对东北进行军事侵略和资源掠夺。

日本方面还要求将铁路改为宽轨，并改变之前的路线，以便多占有一些土地，还声明要派兵保护铁路。清廷让东三省总督锡良与日本人交涉，锡良尽全力维护中国的主权，不对日本人妥协。日本见锡良不妥协，居然公开对清廷发表照会，表示日本将自行执行，不管清廷的态度。

中国政府还没有同意，日本人已经开工了，清政府懦弱无能，不敢阻止日本人。日本就这样霸王硬上弓，根据自己的规划开始修建铁路。看到清廷如此软弱，日本的要求不断升级。

抚顺煤矿本来是由中国商人在经营，中国商人曾向俄国人借款，日本借口说这个煤矿是俄国人的产业，日俄战争之后，霸占了抚顺和烟台两处煤矿。清廷让日本归还，日本人却说这是俄国人的产业，拒不归还。后来，经过艰难的交涉，日本表示愿意向中国缴纳一定的税收。

还有就是间岛问题，间岛是中朝边境的一块沙滩地，有两千多亩。日本占领朝鲜后，以保护国的名义肆意干涉间岛领土问题。日本不断地让朝鲜人民向间岛周边地区渗透，然后以保护朝鲜人民为由，侵占中国的领土。日本想将延吉厅据为己有，清廷跟日本公使严正交涉，在如山的铁证面前日本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延吉厅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日本要求中国在其他问题上进行让步，须以图们江为中朝两国边界，日本可以在图们江以北设置领事馆。此外，日本还要求修筑吉会铁路，日本修筑这条铁路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军队运输。

日本在东北的扩张行为一发不可收拾，给清廷造成了巨大压力，清廷虽然想遏制日本，无奈力量不够。

清廷想通过美国来遏制日本，要知道在日俄战争中，美国给予了日本经济上的援助。美国并不是好心要帮助日本，而是比较看好日本，愿意在日本身上投资。美国想等日本击败俄国后，与日本分享东北的利益。没想到日本击败俄国后，居然想独占在东北的利益。美国无奈，只好放弃对日本的幻想，打算直接从清政府的手中取得铁路的修筑权。当时奉天巡抚唐绍仪跟美国领事司代德接洽，想让他们尽快修筑新法铁路。日本得知此事后，悍然进行阻止。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准备将庚子赔款美国所得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在中国兴办文化和教育。清廷得知此事后，任命唐绍仪为专属大臣，前往美国致谢。日本得知唐绍仪出使美国后，很担心中美联手，于是采取一种积极的姿态建议美国就远东问题进行谈判。

美国也不愿跟日本闹僵，接受了日本的建议，唐绍仪到达华盛顿的时候，美日两国已经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在协议中，两国表示允许太平洋地区维持现状。这等于是表示美国默认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唐绍仪原本还想“以夷制夷”，结果此次访美只搞定了庚子赔款的事情，其他事情都没有做成。

1910年4月25日，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代表来到中国。司代德是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司代德这次来主要是讨论在东北和湖广修筑铁路的事。清廷很乐意美国在东北修铁路，遏制日本的势力。司代德信心

十足地说，可以排除日俄的干涉。8月19日，双方签订了《锦璦铁路借款草合同》。在这个合同中，中方急于用美国来牵制日俄，所以给予了美国非常大的优惠。

后来清廷看到，根据合同中国的利益损失惨重，因此决定不予批准。美国没有料到清廷会推翻原议，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一时之间找不到出口，居然提出让日本和俄国交出在满洲的铁路，由其他国家组织共同接管，这就是所谓的“满洲铁路中立化”方案。

日俄对这个中立化的方案不屑一顾，他们照会美国和中国，美国在东北所做的一切必须先经过日本的同意，日本有权控制修铁路过程中的一切。由于日俄从中阻挠，美国的计划无法实现。

自己实力不强，想靠以夷制夷来牵制日俄这些虎狼，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的。

血腥镇压革命

一个王朝的衰落一定伴随着此起彼伏的起义，清朝本来就是外族入主中原，在康雍乾盛世时，起义尚且不断，更不用说日益衰落的晚清了。

载沣摄政时，官僚机构已经非常臃肿，人浮于事。宣统刚继位时，安庆就爆发了革命党人起义。1908年3月28日，黄兴在钦州发动起义。此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

除了起义之外，革命党人还积极组织暗杀行动，最著名的莫过于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令人称奇的是载沣并没有杀掉汪精卫，倒不是载沣厚道，而是汪精卫朝中有人。

对于革命，统治者从来只有一个政策：镇压镇压再镇压。镇压命令虽然是由载沣下达的，但载沣委实是一个软弱的人，看到大清帝国风雨飘摇，他经常吓得一个人偷偷哭泣。汪精卫行刺他后，他有时吓得连家都不敢回。

革命发生后，清廷展开了血腥镇压。熊成基率领马炮营在安庆起义后，带着一千人围攻安徽巡抚朱家宝。朱家宝死守城池，同时命令长江上舰艇袭击起义军大营，起义军很快就支持不住，往合肥撤退。两江总督端方命令清军毫不留情地追剿，起义军作鸟兽散。

当然，清廷最担心的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清廷要求沿海督抚要严防同盟会成员回国。

宣统元年（1909年），湖南发生水灾，当地官绅趁机囤积粮食，抬高物价，民不聊生，许多老百姓饿死。民情沸腾，接下来可能就是暴乱了。第二年三月，长沙人民开始抢粮食。官府派兵来镇压，老百姓不服，几万人围住巡抚衙门。湖南巡抚下令开枪，打死了几十人。群情更加汹涌，连外国人都出来协助清军镇压，最后抓了几百人。

1910年春节期間，广东新军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新军大多是一些有革命思想的人，革命党人倪映典趁机在新军中发动起义，一千多人加入起义阵营。清廷派水师提督李准前来镇压，当场击杀上百名新军，生擒几十个头目。

这一年山东莱阳的几千饥民在曲诗文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围攻莱阳城。山东巡抚孙宝琦立即派兵镇压，血洗起义各村，屠杀上千乡民。

起义活动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举行起义，清廷命令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一同镇压，革命之火被扑灭后，八十六个革命党人遇难。

战火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燃烧起来，起义之火虽然一再被扑灭，但神州的上空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

第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惊。住在洹上村的袁世凯自然也听说了，清廷大多数官员听到武昌革命的消息既感到震撼又感到害怕，唯独袁世凯脸上浮上一丝微笑，他明白自己出山的机会到了。

一场意外引发辛亥革命

镇压黄花岗起义后，清廷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等于是国家垄断经营铁路。这在今天看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大家知道一切都是国家的，但是当时激起了大量资本家的反对，资本家联合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各省还派遣代表进京，抗议朝廷的政策，要求清廷赶快推行宪政，组织内阁。

清廷面对国内的压力，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的姿态，撤销了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由奕劻担任内阁总理。

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全国人民都不满意，纷纷说新成立的内阁不过是皇家内阁，这倒是一点都没错，内阁大臣基本上都是满洲贵胄。

清廷这么做让很多人放弃了最后的希望，他们认为要让这个政府改革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共和国。

眼看着革命的风暴就要席卷全国，载沣急得焦头烂额。这时，奕劻把眼光投向了那个在洹水边钓鱼的袁世凯。

清廷让袁世凯的老师张謇先去探探袁世凯的意思。张謇找到袁世凯后，两人聊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最后张謇说到正题：“你出山的时候到了。”袁世凯狡猾地说：“如果蒙皇上不弃的话，我当然应该万死不辞为国家效劳。”

奕劻等人看到机会来了，经常恳求载沣起用袁世凯，说现在如果不用袁世凯大清就要亡国了，就连载沣的亲弟弟也认为现在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局面。

可是载沣对袁世凯非常忌惮，始终不能下定决心让袁世凯复出。

武昌起义并不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起义，其实它的爆发有很大的偶然性。在武昌起义爆发前，武汉有两个反清的社团，一个叫文学

社，一个叫共进会。这两个社团多多少少跟同盟会有些联系，它们的共同点是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由热血青年组成，他们身上涌动着一股热血，他们想推翻清王朝，但明显实力不够，所以他们计划策反新军。

文学社和共进会原本计划在辛亥年的年中举行起义，但筹划不是很周全，于是想邀请同盟会几个元老做带头大哥，他们希望黄兴和宋教仁等人能挑这个头。但是，同盟会这些人没有如期来武汉，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人决定推迟起义时间。

然而，一场意外却让这场革命提前爆发。

1911年10月8日下午，共进会的头目孙武正在汉口的俄租界里试验炸弹，孙武原本是想用炸弹打出革命第一声炮响。没想到试验过程中出现了意外，炮弹居然自爆了，估计这炮弹是个国产货。炮弹爆炸后，孙武也受伤了，不过伤得不是很严重，这再次证明了炮弹是个国产货。

炮弹爆炸后，惊动了俄国人，俄国人立即派兵把孙武的住处包围，逮捕了一些共进会的人。文学社那边听说共进会的兄弟被抓了，非常着急。文学社的首领蒋翊武在11月9日晚上召开会议，宣布连夜起事。

就在文学社宣布起事不久，有人密告官府，官府连夜过来抓人，抓住了文学社的三个领导人彭楚藩、杨宏胜和刘复基。蒋翊武身手非常敏捷，居然让他翻墙逃走，由此可见，多做一些体育锻炼是有好处的。

彭楚藩、杨宏胜、刘复基三人被抓走后，很快就被处死。

本来，眼看着革命之火将被扑灭，怎么反而会提前爆发呢？

事情是这样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在策反之后，很多新军士兵已经秘密加入他们的社团。当时，湖广总督瑞澂是个满人，对新军极不信任，上任之后肆意打压新军。结果新军人心涣散，许多人从心理上已经倒向了革命党人。

10月10日晚上，新军工程第八营副班长金兆龙和士兵程定国正在擦枪，工程营后队第二排排长陶启胜看到他们擦枪，起了疑心，问道：“都晚上了，又没有什么任务，你们擦枪干吗？是不是想造反？”

金兆龙和程定国早已加入了共进会，是革命党人，听陶启胜这么说，金兆龙还以为事情已经败露，心想只能豁出去了，干脆说道：“造反又怎样？”

说完，程定国端起枪，崩掉陶启胜。

程定国这一枪打响了武昌起义的首义精神，许多新军高喊“起义”，金兆龙振臂一呼，潜伏在清军的革命党人纷纷拿起枪杆子。由于起义军群龙无首，大家便推举新军中官职最高的吴兆麟担任革命总指挥。

起义事发突然，又气势汹涌，许多清军吓破了胆，以为武昌一夜之间已经被革命党人控制。第二天早上，起义军就攻下了总督衙门，随后接连拿下武汉三镇，武汉彻底成为革命党人的天下。

袁公出马一个顶俩

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都震惊。住在洄上村的袁世凯自然也听说了，清廷大多数官员听到武昌革命的消息既感到震撼又感到害怕，唯独袁世凯脸上浮上一丝微笑，他明白自己出山的机会到了。

刚开始的时候，清廷的很多官员还认为造反的不过是一小撮乌合之众，只要随便派个人去镇压，这些造反的人就会一哄而散。有很多人请教袁世凯当时的时局，袁世凯笑着说：“瑞澂和张彪不过是两个外强中干的人物，指望他们平定叛乱不可能。摄政王载沣更是眼高手低，根本不可能稳住局面。这些革命党人绝非一些乌合之众，要拿下他们绝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人建议说：“眼下这种形势，非袁公出山不可了。”

袁世凯听了，笑了，但是他很清楚，现在是非常时期，绝对不可以轻举妄动，非常时期更要镇定。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就在家等，他知道肯定会有人来找自己。清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就是北洋军，但北洋军除了袁世凯谁也指挥不了。

果然，这次朝野上下一片呼声，请求让袁世凯出山，载沣犹豫不决。他对袁世凯可谓是反感到极点，害怕到极点。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大哥，他磨破嘴皮子请袁世凯出山，但载沣无动于衷。连满人军机大臣那桐都请求载沣让袁世凯出马，那桐是满人，对袁世凯没有好感，但他也认为现在除了袁世凯，无人能挽狂澜于既倒。

那桐对载沣说：“我敢以身家性命担保，现在如果不起用袁世凯的话，我大清只怕有亡国的危险。”

载沣气得浑身发抖，骂道：“连你也替袁世凯说话。”

那桐说：“臣不是替袁世凯说话，是替大清着想。”

载沣虽然愤怒，却又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

载沣认真想了想，几天后召见奕劻和那桐，纠结地说：“如果真的起用袁世凯，你们敢保证他没有异心吗？”

奕劻拍着胸脯说：“我敢以身家性命担保，袁世凯这个人绝对没有异心。”

听叔叔这样说，载沣也只好起用袁世凯。听说载沣要用袁世凯，恭亲王溥伟急了，他找到载沣说：“皇叔，你用袁世凯，这是引狼入室啊！”

载沣痛苦地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我何尝不知道袁世凯是匹狼，但前狼后虎，袁世凯好歹名义上算是我们大清国的奴才，他虽然危险，毕竟比革命党人要好些。”

溥伟一听，也只能承认，说：“就算要用他，至少要找一个人牵制他啊！”

载沣问：“找谁呢？”

溥伟急了：“皇叔你是摄政王，难道身边就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吗？”

载沣满眼凄凉，他摄政三年，身边竟然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人，叹道：“朝中全是支持袁世凯的人，我一个心腹都没有。”

载沣一语道破了这三年来的辛酸，原来他摄政三年，手中并无实权，不过是一个被朝臣架空的摄政王。

就在袁世凯在洹水装模作样钓鱼的时候，朝廷谕旨送到洹水边，让他担任湖广总督，全权负责剿匪事宜。

没想到袁世凯忽然摆起谱来，给朝廷回了一封信：“微臣在家养病时，听到爆发了武昌起义，对此微臣非常痛心。朝廷让微臣去镇压乱党，微臣理应义不容辞。只可惜脚病还没好，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什么时候等微臣脚病好了，再为朝廷效力吧！”

袁世凯也不是故意要跟清廷为难，只是他嫌载沣开出的价码太低，一个湖广总督就打发自己，他实在接受不了。

袁世凯既然不出马，朝廷只好派其他人，载沣选择了满人荫昌，荫昌在德国留学，主攻陆军，后来又在德国军队里做了实习生，还跟德皇威廉二世在一个队里。载沣正是看到荫昌的高学历才选择了，

但荫昌自己并不自信，他深知自己没有实战经验，所以在赴任之前特来洹上村请教袁世凯用兵之道。

袁世凯听说荫昌来求见自己，躺在床上称病不见。荫昌坚持要见到袁世凯，看袁世凯不见自己，直接闯进袁世凯的房里。荫昌进去后，立即向袁世凯请罪，并请求他剿匪的问题。袁世凯本来不想见他，但袁世凯欣赏做事认真执着的人，便决定跟荫昌聊一会儿。

荫昌的境界还处在纸上谈兵的层次上，他说：“武昌的叛军不过一群乌合之众，又没有一个像样的领头的。我相信，这场叛乱很快就会扑灭的。”

其实，荫昌说这话是没有底气的，他不过是想看袁世凯如何回答，从袁世凯的回答中套出一些战略。袁世凯完全明白荫昌的用意，他假装糊涂，说自己这些年不问世事，信息不通，不敢对国家大事妄发议论。说实话，袁世凯很担心叛军被扑灭，叛乱一扑灭，朝廷就用不着他了，他更不可能开出更高的价码。

袁世凯想了想，又说：“听说武昌的叛军中有一个叫黎元洪的，这个人资历很老，如果叛军推举他的话，就难办了。”

荫昌走后，袁世凯急了，他担心荫昌真的平定了叛乱，那自己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袁世凯遂给内阁发了一封电报，声言自己虽然有病在身，但是既然国家有难，还是应该为国分忧，希望朝廷让自己出马，并拨款四百万两银子作为军费。

过了几天，袁世凯又让朝廷准许自己的老部队配合自己作战，说白了袁世凯正在想尽办法收拢自己的势力。

载沣现在是完全处于被袁世凯要挟的状态，袁世凯提出的条件他也只好答应。

武昌起义之后，起义军成立了武昌军政府，荫昌平叛不力，叛乱反而愈演愈烈。不出袁世凯所料，湖北军政府果然推举黎元洪任总督。其实，黎元洪并不敢挑这个头，他是被人用枪指着当上总督的。起义军之所以看上黎元洪是因为他的资历相当老，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战争时他是一个大副，后来加入张之洞的自强军，当上了旅长。

黎元洪并没有革命思想，他一直是清廷的一个军人，只是他为人忠厚，士兵们比较爱戴他。武昌起义发生后，黎元洪不敢卷入是非，吓得藏起来。后来被士兵们找出来，要推举他当总指挥。黎元洪说什么也不愿意，革命党人一怒之下用枪指着他：“你不挑这个头，只好让你先为清朝陪葬了。”

没办法，黎元洪只好硬着头皮当上了这个总督，由于他非常怕事，士兵们给他起了个外号：泥菩萨。

武昌起义成功后没多久，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了。

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

10月23日，江西九江独立，陕西独立。

10月25日，广州将军凤山被革命党人刺杀。

眼看着大清即将垮台，袁世凯并没有急着出力，他选择了冷眼旁观，让北洋军不要轻易出击，原地待命。袁世凯要干吗？他在等待载沣对自己让步。载沣很快明白了这层道理，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海陆军，并节制各省督抚。这样一来，袁世凯又是大权在握。

10月27日，陆军十镇的统制张绍曾等人拥兵给清廷施压，要求清廷成立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还提出皇族成员永远不能担任内阁大臣和国务大臣等职，同时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

张绍曾非但是在口头上进行要挟，还扣留了清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并致电黎元洪，表示自己不会与他开战的。没过多久，山西宣布独立，阎锡山出任总督；接着，云南宣布独立，蔡锷出任总督；南昌新军起义，江西全省宣布独立。

各省都在宣布独立，而且张绍曾已经有倒戈的迹象，随时可能杀进北京。朝中一片慌乱，隆裕太后和载沣已经做好了逃亡的准备。

眼看大清江山要丢，这时候载沣已经顾不上其他了，先保住江山再说，他立刻出台了四项政策：同意实行宪政；立即起草宪法；解散皇室内阁，成立责任内阁；释放所有政治犯。

11月1日，载沣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没想到袁世凯竟然推辞了。袁世凯推辞的理由很简单，袁世凯说根据宪法精神，你载沣没有权力任命我为内阁总理大臣，必须经过国会选举，我才是合法的内阁总理大臣。载沣虽然气坏了，但也只能按照袁世凯说的办。

11月8日，国会召开，袁世凯正式当选为内阁总理大臣。此时，国家的军政大权基本上操纵在袁世凯手上。袁世凯率领军队进入北京后，对载沣说，既然实行宪政，你这个摄政王也就是多余的，回家好好休息吧！

载沣就这样回家了，不过他并没有失落，反而感到有些庆幸，总算把这个烂摊子交给别人。回家后，载沣满脸高兴地对老婆说：“从今天起，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地在家里逗孩子玩了。”载沣天生就不

是一个政治人物，居家的日子对他来说确实是幸福的，袁世凯还算厚道，每年给他一笔丰厚的津贴。

至此，大清国皇权基本只剩下空架子，真正的实权掌握在袁世凯和革命党人手中。

游走在皇权和革命党人中间

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一军总统，调江北提督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随时待命。袁世凯虽然将军政大权操于自己的手中，但清廷还在那儿，免死狗烹的经验对他来说是非常深刻的。他知道，一旦把革命军剿灭，自己迟早要落得免死狗烹的下场。与其如此，倒不如先留着革命军，为自己牟取更大的利益。

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军队攻下汉口，接下来袁世凯并没有继续进攻。他是想通过军事的力量逼迫革命党人就范，让清廷和革命党人的命运都操纵在自己的手中。

组织责任内阁后不久，袁世凯就以出征为由，将禁卫军的军权夺取。袁世凯夺权的方式特别巧妙，禁卫军是清廷投资最多的军队，装备最好，可惜指挥人才不行，指挥者是载涛。袁世凯故意让载涛去平叛，载涛从来没有打过仗，自然怕得不行，求袁世凯网开一面。

袁世凯说，既然你怕打仗，那就把兵权交给我吧！

袁世凯确实是一个手腕高明的人，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掉大清江山，建立宪政，然后自己出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也知道革命党人不会轻易让他当这个大总统，所以他必须留着清廷，逼迫革命党人让步。革命党人如果承诺同意他当总统的话，他就可以逼清帝退位。

袁世凯并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是一个政治强人。其时，中国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大家还是希望出现强人收拾局面的。可以说，袁世凯在当时也是众望所归，立宪派支持他，因为他们相信袁世凯会照顾资产阶级利益；老百姓也支持他，老百姓希望出现一个政治强人，让大家过上安稳的日子；西方列强也支持袁世凯，他们觉得袁世凯是一个开明的专制者，袁世凯统治中国，他们在华的利益就能得到深化；就连革命党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支持袁世凯，大家都知道，袁世凯屡次受清廷打压，跟清廷的矛盾很深，也是最有可能亡掉清朝的人。

袁世凯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他在清廷面前说：“我袁世凯是大清的总理大臣，不可能赞成共和的。因为这样一来，天下人会耻笑我，说我连孤儿寡母都保护不了，我还是很在乎名誉的，所以出卖大清的事我是不会干的。”

开始时，袁世凯给黎元洪写了一封信：“只要你承认君主立宪，咱们一切都好谈，可以立即停止交火。”

只可惜，当时全国都是革命的呼声，袁世凯所谓的君主立宪制早已湮没在这片洪流里。袁世凯一向擅长政治投机，这种人的政治嗅觉一般都是很强的，在潮流还没到来之前，他就能闻到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及早做出应变。

袁世凯忽然摇身一变，居然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绝对不会为难革命党人的。”

这话说得模棱两可，让人猜不透，就连袁世凯的属下冯国璋都领悟不了袁世凯的意思。冯国璋没有揣摩透上面的意思，依然跟革命党人交火。袁世凯生气了，把冯国璋召回，让段祺瑞代替他。段祺瑞到了武昌后，立即跟革命党人握手言和，双方就像朋友一样，进行了亲切的会面和交谈。

随后，袁世凯又派唐绍仪到上海与革命党人谈判。唐绍仪开出的条件是君主立宪制，革命党人不同意，但表示：“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制的话，我们一定推举他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袁世凯得知革命党人的意思后，并没有急于表态。他所以如此淡定就是因为手握重兵，他可以轻易击败革命党人。只是他事先放话自己支持君主立宪制，如果共和的话，必然有人指指点点。

政治权衡的首先是利益，袁世凯决定向革命党人示好，释放了汪精卫，还让自己的长子袁克定和汪精卫结拜为兄弟。

让袁世凯没有料到的是，1911年12月25日，同盟会的领导人孙中山忽然回国。这对当时的新闻界绝对是一个重磅炸弹，对政坛的冲击就更大了。袁世凯本来是稳操胜券，孙中山回国多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孙中山登上上海滩的时候，在记者的采访下，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这次回国，身无分文，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如果革命的目的没有达到，我们革命党人绝不议和。”

孙中山是在向袁世凯放话，不推翻清王朝就没得谈。孙中山回来后，住在了南京，南京顿时成为革命圣地。

可以说这时候袁世凯才感觉到自己地位受到了威胁，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清廷中，已经没有人能威胁到袁世凯的地位，如果要建立民国的话，那么总统必定要选举啊！孙中山在国内的人气是非常高的，虽然袁世凯是实力派，位高权重，但是一旦走民主路线，他有可能不是孙中山的对手，这是袁世凯最为担心的。

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是中国的华盛顿。他显然比袁世凯更新潮，更符合时代思潮的发展方向。

孙中山这个人做事也是非常讲效率的，25号回来，29号就举行临时总统选举仪式，当时共有十七个省参加，候选人有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三位。在十七票中，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一切可以说完全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之外，袁世凯老成谋国，没想到孙中山彻底打乱了他的整个部署和计划。袁世凯自然很愤怒，他立即让段祺瑞和冯国璋发出通告：誓死维护君主立宪，坚决反对共和。袁世凯是在向孙中山发出威胁信号，你要再这么搞，就开打了。

发出通告的第二天，袁世凯就跑到隆裕太后那里，装模作样可怜兮兮地自责，说自己我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以来，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太后你不要介意啊，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引咎辞职。

隆裕太后也不是傻子，她最不相信的人就是袁世凯，看袁世凯如此装模作样，她知道一定是话里有话。隆裕好言安慰袁世凯，袁世凯这才说道：“南方的革命党人居然敢公然组织临时政府与朝廷对抗，他们胆子实在是太大了，一定要毫不留情地剿灭，希望朝廷能够拨款，让我灭了这些乱党。”

隆裕太后一向怕袁世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八万两黄金给袁世凯。岑春煊听说袁世凯两面敲诈，准备镇压革命党人，便站出来骂袁世凯为了个人权力居然不惜破坏共和，袁世凯假装没听到。袁世凯确实是一个独裁式人物，他并不是真的信仰民主和共和，民主和共和不过是他攫取权力的一个幌子。

就在大家以为袁世凯会对革命军动武的时候，忽然京城里传来消息说袁世凯劝告清帝退位，接着京城里的驻外大使联名发出通电，建议清帝退位，以安抚愤怒的沸腾的民意。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一定是袁世凯在后面捣鬼。大家不懂的是，为什么袁世凯前几天还准备对革命党人动武，现在又逼迫清帝退位，如此喜怒无常，到底背后有什么把戏？

袁世凯逼退清廷

其实，袁世凯并不是真的要动武，他发出的那个通电是想告诉孙中山：识时务者为俊杰。孙中山是个聪明人，怎么会不明白袁世凯的意思呢？孙中山虽然当上临时大总统，但他很清楚自己不是袁世凯的对手，他很清楚这个总统的宝座也只有袁世凯才能坐得住，用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可以增加筹码，逼迫袁世凯让清廷退位。

说实话，袁世凯是不相信共和的。1912年1月2日，袁世凯公开发表声明：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此外，袁世凯还说：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灭亡。

当然，关于中国究竟是适合共和还是专制从晚清以来就争论不休。比如，当时的《泰晤士报》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庞大的国家，有着非常深厚的君主专制传统，如果突然用共和制取代专制，恐怕会欲速则不达。日本人也认为中国不适合实行共和制，在他们眼里，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个个都是小暴君，现在突然全国人都吵着要共和，其实连共和是什么东西，他们都不知道。

这些观点都是有道理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民主共和也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

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固然成立了，可惜经济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没有钱，公司都没法运作，更不用说一个政府了。

孙中山在实干方面能力的欠缺很快就表现出来了，他试过用各种方式筹措经费，可惜根本没效果。他想发行公债，可惜没人认；他想收税，但各省各自为政，扣留税收。中央政府穷得叮当响，有一次，前线革命军粮食告急，给中央发电请求拨款。孙中山大笔一挥，拨二十万两银元救急。秘书胡汉民去国库取钱时，发现只剩下十个银元。

孙中山的国民政府可以说一穷二白，但是袁世凯的内阁也不是很阔气，这段期间袁世凯借了大量的外债。这时候，袁世凯已经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大清的代理人，而是中国的实际掌舵人。

袁世凯从支持君主立宪制走向支持共和并不奇怪，当时的立宪派也主张共和，袁世凯的老师张謇就是其中之一。袁世凯也并非对君主立宪有什么好感，他只不过是在乎自己的名声而已，怕后人说他篡夺了孤儿寡母的江山。所以，袁世凯最后逼迫清帝退位也表现出一种非常痛苦非常无奈的姿态。

袁世凯把条件都告诉了隆裕太后：名号不变，中华民国对待清帝就像对待外国元首一样；退位后，清帝能拿到四百万元的年薪；除了

太监外，其他人员可以继续留用；王公贵族的待遇和爵位保持原样。

隆裕太后当场哭得昏死。袁世凯努力表现出很伤心，安慰隆裕太后：“太后，想开点，自古就没有不亡的国家，古代的那些亡国之君可比你们惨多了。就说明朝吧，崇祯砍死家人，自己在煤山上吊。再看看我们大清，皇帝虽然退位，但尊号还能保全，每年还能拿到那么高的年薪，这可是历朝历代没有的，太后，你就知足吧！”

逼退清廷后，袁世凯让段祺瑞给南京的临时国民政府发出一封电报：共和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制度，中国能有今天，同盟会诸公功不可没，现在大清皇帝退位了，从此我们要好好经营共和制，保证君主政体永远不再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当天晚上，袁世凯剪去辫子。

第十四章 孙袁斗法

孙中山看袁世凯称病不来南京，便派了一支阵容豪华的队伍去北京请，这支队伍里有蔡元培、宋教仁和汪精卫这些名人。袁世凯当然很礼貌地接待了他们，至于说到去南京的事情，袁世凯表示自己也很想去南京跟孙先生共谋大局，只可惜现在北方的局势不是很稳定。

南京北京之争

1912年2月13日是清帝退位的第二天，这一天也是中华民族推翻两千年封建帝制的第一天。

京城里一片喜庆的氛围，老百姓们纷纷收起龙旗，奔走呼告：“改朝换代了，以后太平了，不用再打仗了。”

第二天，便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七，家家户户都在为春节做准备。这个年对袁世凯来说可以说是三喜，一喜春节快乐合家团聚，二喜民国建立，三喜自己就任第一届中华民国大总统。

就在袁世凯乐呵呵地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时，从南京发来的一份电报让他脸上浮现了一层阴霾。电报是唐绍仪发过来的，上面说孙中山已经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但却对袁世凯有许多限制条件。

孙中山给袁世凯戴了三个紧箍咒，第一个紧箍咒是临时政府必须建都南京，为何要建立在南京？孙中山说这是由各省代表选出来的，你袁世凯既然赞同共和，就应该支持民意。

我们来说说其中的内幕吧，孙中山这么做纯粹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南京是同盟会的大本营，北京是袁世凯的大本营，让袁世凯来南京等于是把猛虎关进笼子里。孙中山所谓的南京作为都城是各省代表选出来的，这也不对，其实很多代表是反对定都南京的，他们从一个正常的理智出发反对定都南京。但孙中山不想失去自己的权力，要求他们必须选南京。

章太炎和宋教仁反对很激烈，章太炎甚至跳出来，公开说定都南京有五害，还骂孙中山这么做是故意生事，破坏社会稳定。第一次投票的结果，选择南京的只有五票，选择北京的有二十票。当天晚上孙中山便召集大家开会，要求统一口径。但是这些议员都是民主派，心

想你孙中山逼着我们选举跟独裁有什么两样，所以很多人不同意。孙中山只好让黄兴用武力迫使议员就范，黄兴带着宪兵扬言说：“如果不按既定方针办事，立即将议员绑架起来。”

孙中山也懂得枪杆子出政权的道理。

孙中山料到袁世凯很可能不会来南京，这就设下了第二个圈套：只有你袁世凯来南京就任，我和我手下的官员才会辞职。这意思就很明显了，如果袁世凯不来的话，就休想做总统。

第三个圈套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表面上看新总统当然要遵守宪法，为何说这是一个圈套呢？这还必须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说起。《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孙中山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而《临时约法》却是孙中山为袁世凯量身定制的。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总统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临时约法》处处限制总统的权力，让总统变成一个空架子。

孙中山显然是想跟袁世凯争权，但当时他的实力比不上袁世凯，而且列强并不看好他，列强们都很看好袁世凯。

孙中山和袁世凯显然在进行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博弈。

孙中山看袁世凯称病不来南京，便派了一支阵容豪华的队伍去北京请，这支队伍里有蔡元培、宋教仁和汪精卫这些名人。袁世凯当然很礼貌地接待了他们，至于说到去南京的事情，袁世凯表示自己也很想去南京跟孙先生共谋大局，只可惜现在北方的局势不是很稳定。

蔡元培等人一再请求袁世凯去南京，最后袁世凯居然说：“我已经考虑好了，决定去南京。我们现在正在商量留守北京的人选，确定以后，就可以和诸位一起去南京了。”

袁世凯真会去南京吗？当然不可能，但书生气十足的蔡元培却相信了袁世凯的说辞。

元宵节很快就到了，京城又是一片喜庆的气氛。然而，就在千家万户张灯结彩的时候，北京城里面却出现了骚乱。军队发生叛变了，蔡元培等人住的地方也枪声大作。

第二天，袁世凯对蔡元培等人说：“实在不是我不想去南京，我一离开这里，北京就会出乱子啊，请你们转告孙先生，说孙先生的好意项城心领了，实在是分身乏术啊！”

没多久，临时政府的副总统黎元洪致电袁世凯，表示拥护袁世凯在北京定都。黎元洪此举是在向袁世凯示好和效忠，孙中山自然气得

咬牙切齿，但没有办法，只好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

这个总统不好当

千年帝国一夜之间实行民主，这看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袁世凯虽然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是他能不能收拾这个局面就很成问题了。

客观地说，在当时的局面下，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独裁强人，有民主作风的领导人不可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国家虽然打出了共和的旗号，但其实还是军阀割据地方混战，每个集团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不光袁世凯集团是这样，革命党人阵营也是这样。

在上海，青帮老大兼革命党头领陈其美刺杀了陶成章；在长沙，民政部长谭延闿刺杀了都督焦达峰，当上湖南都督；在北京，黎元洪借刀除掉张振武。

地方政府虽然名义上服从中央，其实各自为政，为了争地盘，经常互相大打出手。蒙古那边也出现了问题，活佛呼图克图看到南北对立，居然公开宣布独立。沙俄率先承认蒙古独立，还出兵占领了新疆的伊犁。西藏那边也不安宁，英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兵入驻西藏，暗中策划西藏分裂活动。

所以说，袁世凯面临的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烂摊子，当上总统后，某种责任感让他道德有所提升。他是真的想把国家建立好，无奈事情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用民主共和的方式管理中国让他感到心力交瘁。

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困难，袁世凯执政的头两年主要靠借外债过日子。

袁世凯当总统后，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唐绍仪跟袁世凯的关系非常铁，袁世凯在朝鲜工作时，唐绍仪就是他的副手。也许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唐绍仪跟孙中山的关系也不错，在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中，总理的权力甚至比总统还大。

这样一来，在实际工作中，袁世凯与唐绍仪时时发生冲突，向“六国银行”借款的事件最终引发了两人的矛盾。向人借钱是有求人，六国银行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唐绍仪受不了，拒绝向六国借款。

当时袁世凯非常缺钱，没钱的话政府就无法运作，所以袁世凯让财政总长熊希龄代替唐绍仪跟外国人交涉。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同

盟会就一直把唐绍仪看成是自己人。现在看到唐绍仪被人排挤，孙中山立即号召大家抗议，打着维护国家主权的口号，反对向外国人借款。

六国银行看中国人吵起来了，宣布无限期推迟贷款。袁世凯一看，着急了。

唐绍仪看事情搞砸了，主动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千方百计挽留他，唐绍仪准备留下来，最后还是因为党派之争辞去总理一职。

唐绍仪一走，立即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唐绍仪走后，袁世凯想让宋教仁出任总理，只可惜宋教仁是个理想主义者，让他当总理他还不乐意，他的理想是自己组织政党和内阁。

唐绍仪辞职不久，同盟会所有成员退出内阁，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的职务，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

看到大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袁世凯很窝火，后来还是忍了，号召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纠结于党派的纷争。

在袁世凯的提议下，陆征祥当上总理，陆征祥曾经担任过外交公使，并非袁世凯的亲信。他当上总理，同盟会那边还能接受。总理确定后，袁世凯开始着手制定《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随后，便开始准备正式选举国家总统。

没想到选举还没有开始，陆征祥就出问题了。陆征祥这个人饱受西方文化浸染，在政府工作中喜欢表现幽默，在他眼里，一个好的领导人首先是幽默的。在西方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在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时不时的幽默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觉得这个人毫无担当意识，对民族的创痛根本不放在心上。所以，内阁议员们对陆征祥非常不满。

议员们不准备跟陆征祥合作了，这让陆征祥非常郁闷。袁世凯出面来调停，议员们不买他的账。政府变成了一锅大杂烩，不同政见的人甚至在争吵时大打出手。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主共和制度感到失望，章太炎和张绍曾甚至请求袁世凯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必拘泥于细节，可以从权办事。

后来，议员们弹劾陆征祥失职，陆征祥一气之下，学唐绍仪一走了之。

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共和制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一向自信的袁世凯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袁世凯毕竟是个旧式人物，共和这种新制度让他感到棘手。这期间，袁世凯比过去苍老了许多，他处于一种

反思与纠结的状态中。他不知道是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还是自己没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

此时的袁世凯不再像过去那样犀利果敢，反而显得有些呆滞和笨拙。如果说以前他不断地走上坡路话，现在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他就像一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骆驼。

袁世凯终于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共和根本不适合中国，至少现在不适合中国。

我们来看看当时中国的情况吧，中央政府相当于国家的大脑，但这个大脑无法有效地指挥手脚。地方政府根本不把中央的政令当回事，各省不但截留税收，而且自行任命官员。此外，整个社会道德崩溃纲常废掉也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当时也像现在一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中的违法乱纪事情也非常多。

道德崩溃后，年轻人更加迷惘，一迷惘就无法无天。很多年轻人加入同盟会等组织，他们其实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并不是为了什么信仰加入社团。社会上报纸越来越多，但是农民却越来越少，土地日渐荒芜，民生处于凋敝的边缘。

知识分子以前靠科举吃饭，共和制度取消科举制后，他们一肚子牢骚，全变成了愤世嫉俗的卢梭。人人都急切地盼望社会改变，所以大家习惯于喊口号，以为只要口号喊得够响，日子就会很快好起来。

袁世凯有一个英国顾问叫莫理循，他这样描写当时中国的时局：“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如一的目标。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他们却把精力用在无休无止的争吵和规章法令上，改革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莫理循的话是有道理的，袁世凯想通过共和制度强国，事实证明不可能。

宋教仁之死

1912年8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正式合并为国民党，孙中山担任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和黄兴等人担任理事。

在国民党中，宋教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担任国民党理事时才三十一岁。宋教仁最大的梦想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民

主国家，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讲天赋，组织政党内阁。在国民党内，宋教仁对孙中山几乎形成了功高震主之势。正是在宋教仁的一手努力下，国民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才占据近一半的席位，形成了一党独大的局面。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第一大党应当组阁，身为国民党的党魁，宋教仁理应出任内阁总理。

眼看着宋教仁的声望一天比一天高，很多人心里不满。当时，宋教仁正在南方各省演说，号召民众觉醒。袁世凯也很担心，他怕宋教仁想跟他抢总统宝座。

宋教仁这个人道德是非常高尚的，在他遇刺之前，有人提醒他要小心。他却说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光明正大地参加竞选，有什么好怕的。

袁世凯几次催促宋教仁进京会谈，宋教仁也答应了他。宋教仁打算在上海坐火车去北京，好友于右任建议他坐船，说坐车的话很容易引人注目，有可能招致暗杀。宋教仁不以为然，果然在火车站被人开了三枪。

宋教仁临死前发了一封电报给袁世凯，从电报中看出宋教仁丝毫不认为袁世凯派人暗杀自己。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是袁世凯授意赵秉钧干的，持有这种观点的认为袁世凯把宋教仁看成是个威胁，担心他一旦成为总理会限制自己的权力。

宋教仁被杀后，全国都沸腾了，大家怒不可遏，要袁世凯查出凶手。袁世凯也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找出凶手。

不久，有两个学生向警方提供线索，他们住的隔壁有一个叫武士英的人，这个人昨天还向他们借钱，今天回来忽然变成大款，全身西装革履。两个学生还说，宋教仁被刺的当天，武士英一夜未归。上海是陈其美的地盘，所以这个案子也就由陈其美来审。不过说句公道话，陈其美就是嫌疑人之一，让他负责这个案子，想要得到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

警方在武士英住的地方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应桂馨是一个黑帮老大，后来加入同盟会，曾经担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的科长。应桂馨跟孙中山和陈其美的关系都比较密切，查到他头上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容易戳破我们对革命的幻想。

应桂馨供出幕后主谋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述祖曾当过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采购时收了两千两银子的回扣，事发后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但洪述祖是个厉害的人，在狱中居然买通了狱卒，逃出狱

后，洪述祖回内地发展，投奔赵秉钧，当上了赵秉钧的秘书。

案子到这里，矛头直指赵秉钧，而众所周知赵秉钧是袁世凯的心腹，所以袁世凯很难洗脱嫌疑。宋教仁遇刺时，孙中山正在日本，为修建铁路的事筹款。听说宋教仁被杀，孙中山立即抓住机会，向袁世凯发难。

二次革命一触即发。

宋教仁之死至今还是一个谜案，很多人都有嫌疑，但主要观点还是认为不是袁世凯集团干的，就是国民党内部阴谋。孙中山等人认为袁世凯是凶手，袁世凯集团认为孙中山和陈其美等人是凶手。

上海是国民党的地盘，宋教仁北上赴京身边没有一个卫士保护，案发后也没有任何警察来保护，凶手轻松逃离现场。这些事都很难解释，国民党人在国民党的地盘里竟然连自己的领导人都保护不了，这是什么道理。

凶手武士英被捕后，没多久就在狱中暴毙。应桂馨在监狱里呆几个月后，居然成功越狱。案子调查到洪述祖那里时，洪述祖表示认罪，说自己就是看宋教仁不顺眼，就是要杀了他。

杀宋教仁的嫌疑人主要有这么几个：

No.1：袁世凯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袁世凯极力想笼络宋教仁，曾送给宋教仁五十万大洋，但是没有收买成功，所以袁世凯想杀掉宋教仁，以免将来宋教仁对自己构成威胁。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刺杀宋教仁，因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的亲袁派，而且宋教仁与袁世凯的私交甚好，袁世凯视宋教仁为自己的子侄。如果宋教仁死后，国民党仍然会要求一个人来出任总理，换了一个人可能更难处理。

袁世凯自己也说，如果他要杀了宋教仁，完全不必等他北上之前刺杀，这明显是授人以柄，即使要杀，也要等他到北京，然后给他定罪。

No.2：赵秉钧

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代理总理，如果宋教仁当上了总理，赵秉钧就要失势，所以有人认为是赵秉钧杀害了宋教仁。

No.3：国民党内部

这个就不好评论，只能读者自己去猜测。

第十五章 溥仪退位后的生活

根据溥仪的说法，结婚的当天他并没有跟两个妻子同房。溥仪是这样说的：经过正常的仪式后，我就进入了一间暗红色的房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整个房子里一片红色，好像一摊熔化的红蜡烛，我觉得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回养心殿实在，于是便回到了养心殿看书。

关上门继续做皇帝

溥仪退位时，不到六岁，什么都不懂。他虽然已经不是皇帝了，但依旧住在紫禁城里。一个小孩子，正是贪玩淘气的时候，生活在深宫里，肯定是很难快乐的。

当然，溥仪还享有尊号，这时候尊号相当于一种意淫的东西。清朝的遗老们和后妃太妃们仍然希望溥仪像皇帝一样满足他们内心的失落感，在他们看来，家法和礼仪是必须保持的。清朝的遗老当然不甘心就这样丢了天下，他们还期盼有一天能东山再起。

在紫禁城内外仍然有一些皇家的军队，这些军队撑撑台面还行，真打仗就不行了。

溥仪后来回忆说：“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二十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

直到十八岁，溥仪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如果不是冯玉祥发动政变，逼迫溥仪出宫，可能他还会舒舒服服地继续过着皇帝的的生活。

袁世凯逼退清廷并不是把皇室赶出宫，仅仅是让他们放弃一切权力，至于生活待遇还跟以前一模一样，所以溥仪又被称为“关门小皇帝”。

袁世凯这个人还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对清廷皇室比较优待，但是常年高薪养着这一批吃饭不做事的人，人民也不乐意啊！

后来袁世凯称帝，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就一命呜呼。袁世凯死后，他的继任者们对待清廷还是继续贯彻袁世凯当初的政策。但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中并没有写上对清廷的“优待条件”，1917年一月，清廷遗老集体请愿，要求宪法确保“优待条件”永远生效。徐世昌发表演

讲，力挺将“优待条件”写入宪法。

四月二十日，宪法会议讨论此事，会议大多数人认为，清廷皇室优待一事本质是缔结条约，经过南京临时政府的投票，自然永久生效，其法律效力跟宪法同等，所以不必列入宪法之中。会议的结果非常有意思，既承认“优待条件”永远生效，又拒绝写入宪法中，可以说是非常“政治”的一个做法，很有意思，也很有智慧。

根据优待条件，大清皇帝退位后，暂时住在紫禁城里，日后移居颐和园。溥仪退位后，乾清门外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归国民政府所有，乾清门以北的宫禁由清皇室暂居。

养心殿从雍正开始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清朝皇帝一般都在这里办公，召见臣下。溥仪退位之后，仍然是养心殿的主人。

至于说每年给皇帝四百万两银子，这个就比较难办到。大家知道，民国的财政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四百万两很难到位，但是国民政府还是尽量保证他们过上好日子，每年也会凑上一两百万两的银子。随着溥仪的退位，待遇其实是一年比一年差，这个是必然的。但是皇室中有很多珍宝古董，他们也不缺钱花。

有意思的是，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在教育溥仪的时候，仍然是以清朝教育皇帝的方式，跟教育一般的小孩不太一样。陈宝琛的目的是把溥仪教育成一个皇帝，继承祖业，将来继续统治臣民。

溥仪读书的地点是毓庆宫，也就是嘉庆皇帝当皇子时读书的地方。溥仪的主要课程还是十三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套。溥仪十三岁时，开始学习英文，英文的学习拓宽了他的视野。不过，他所受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腐朽的，老师教给他的东西无非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老师一边讲课一边大骂革命有罪民国无聊，让溥仪要学习勾践卧薪尝胆，他日复国。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这段日子：

我从宣统三年学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关于自己的祖国，从书上只看到“同光中兴”，关于外国，我只随着爱丽思游了一次奇境。什么华盛顿、拿破仑，瓦特发明蒸汽机，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全不知道。关于宇宙，也超不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

菜肴。

我读的古书不少，时间不短，按理说对古文总该有一定的造诣，其实不然。首先，我念书极不用功。除了经常生些小病借题不去以外，实在没题目又不高兴去念书，就叫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一天。在十来岁以前，我对毓庆宫的书本，并不如对毓庆宫外面那棵桧柏树的兴趣高。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桧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下，忙个不停。我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子喂它们，帮助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后来我又对蚰蚰、蚯蚓发生了兴趣，叫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喂养。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

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怎么做一个“好皇帝”，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有了兴趣。这兴趣只在“道”而不在“文”。这种“道”，大多是皇帝的权力，很少是皇帝的义务。虽然圣贤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之类的话，但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在第一部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了“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理。这些顺耳的道理，开讲之前，我是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的，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的比书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件苦事，确实给了他们好处。这种好处我却没享受到。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的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

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封建遗老，他对清皇室很忠诚，对民国非常仇恨，所以他给溥仪灌输什么东西我们就不难想象了。陈宝琛曾经对溥仪说：“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我大清开国已经有两百多年，仁德深厚，现在百姓都很怀念我大清，将来陛下一定可以光复我大清。”

溥仪相信陈宝琛的话吗？相信，而且非常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出任伪满洲国皇帝，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光复清朝。有意思的是，陈宝琛并不赞同溥仪投靠日本人，连溥仪的生父载沣也非常反感溥仪这种做法。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是卖国的行为，光复大清也要

靠自己的力量。但是溥仪并不理会老师的意见，他觉得陈宝琛虽然忠于大清，但终究迂腐不堪。

溥仪大婚

溥仪结婚时十六岁，用现在的标准来看有些早婚了，但在清朝的皇帝中还算结婚比较晚的。

溥仪结婚时是在1922年，也就是民国十一年。尽管他只是一个过了气的皇帝，但毕竟还是做过皇帝啊，所以很多女人以嫁给他为荣。其实，很早就有人看中了溥仪。民国四年（1915年），也就是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曾经让人去找溥仪提亲，想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后来袁世凯称帝失败，这事就没办成。

民国六年（1917年），一个德国人写信给溥仪，表示德国皇室支持清朝复辟，并想与清朝皇室联姻。对这件事，溥仪的老师陈宝琛不同意，他始终觉得清廷的复辟不能借助外人的力量。后来，张勋搞复辟时，也想把女儿嫁给溥仪。

民国十年（1921年），皇室开始正式操办溥仪的婚事。究竟选谁好呢？溥仪自己是不能做主的。听说溥仪准备结婚，那些蒙古王公们个个蠢蠢欲动，准备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当时，溥仪的七叔载涛收到了大量的相册，全是蒙古王公们为自己女儿制作的，退位皇帝的婚礼不亚于选秀，由此可见，皇权思想在当时还是深入人心的。

甚至连徐世昌、张作霖这些与时俱进的人也不能免俗，他们听说溥仪准备结婚，也是托人说媒，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有意思的是，溥仪拒绝了，理由是清朝有祖制，满汉不能通婚。

到底应该选谁当“皇后”，还得由宗族中地位高的人决定。当时，隆裕太后和庄和太妃已经去世，还剩下三个太妃，她们都想从自己家族中挑选一个女的做溥仪的皇后，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最后，皇室中人给候选人照相，再把这些照片送到溥仪的案头。

溥仪当时不懂何为爱情，拿到这些照片，他觉得大婚不过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自己结婚后就独立自主了，不用再受管束了。溥仪是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觉的：“经过这道手续，别人就不能把我像个小孩子似的管束了。”

经过重重筛选，最后挑出四张照片，当这四张照片送到溥仪面前时，溥仪觉得四个人一模一样，看不出差别，每个人的身段就像纸糊

的桶子，而且照片中头部非常小，分不出美丑来。溥仪只能根据她们旗袍的花色来判断究竟谁更有品味些，溥仪凭感觉选了一张照片。

这个姑娘叫文绣，字蕙心，比溥仪小三岁，出身并不高贵。虽然溥仪选了她，但是端康太妃不同意，主张选出身较好颇有气质的婉容。最后经过王公大臣们的恳求，溥仪娶了她们两人，一人为后一人为妃，溥仪自己是不打算要两个妻子的，但王公大臣们说皇帝既要有后，也要有妃。就这样，内务大臣荣源之女婉容被立为皇后，端恭之女文绣被立为后妃。

婚礼的举办还是挺豪华的，一切仪式模仿前朝皇帝的礼仪。

溥仪曾回忆这段婚姻：“我从结婚的那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这个问题：我有一后一妃了，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我一遍一遍地回答自己：我成年了。如果不是闹革命，这时候我就应该亲政了。”

根据溥仪的说法，结婚的当天他并没有跟两个妻子同房。溥仪是这样说的：经过正常的仪式后，我就进入了一间暗红色的房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整个房子里一片红色，好像一摊熔化的红蜡烛，我觉得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回养心殿实在，于是便回到了养心殿看书。

溥仪身上有一些诗人气质，对于包办婚姻是不满的，结婚没多久，他就给两个老婆聘请了英文教师，教她们学习英文。溥仪给婉容请的是美国牧师的女儿任萨姆，给文绣请的是英文专家凌女士。溥仪这么做一方面是想让她们增长点见识，另一方面也想跟她们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叛逆年代

同治也好，光绪也好，都经历过一个叛逆年代。他们的叛逆集中体现在对慈禧权威的逆反态度上，结果无一例外都很惨。

溥仪上面虽然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也是被整个家族牵制着，这无疑也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年轻人一到特定年龄，叛逆性情难免会发作。

长在深宫里有时候也是非常无聊的，皇宫再好总不比外面世界自由，宫苑再美，也没有大自然迷人。溥仪的英文老师，苏格兰人庄士敦经常对他说外面的世界有多迷人，这让溥仪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很

渴望到外面的世界走走，尤其是去外国看看。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很多人头上还留着辫子，尤其是京城里，留辫子的百姓相当多。溥仪作为末代皇帝，是不允许剪辫子的。如果溥仪要剪辫子的话，皇室的人就会骂他大逆不道。但溥仪确实挺烦辫子的，所以有一天偷偷让太监为自己剪掉辫子。但这个太监不敢，哭求溥仪不要这样干。溥仪一气之下，自己把辫子剪掉了。

溥仪剪掉辫子后，皇宫里一片唉声叹气，大家心想，连皇帝都把辫子剪了，看来复国是没有希望了。本来皇宫里还有一千五百多人蓄辫子，溥仪把辫子一剪，没几天的工夫，皇宫里只剩三条辫子。

后来，溥仪又戴上了眼镜，其实他很早就有近视。宫里人又对他指指点点，说清朝的皇帝从来没有戴眼镜的，这么做是违反祖制。

这段时间，溥仪跟家里人关系不是很好，他很希望出门看看，但大家都不同意，都说你身份特殊，万一出去，可能被革命党人袭击。而且紫禁城外有护卫队，溥仪要出去，必须跟国民政府商量，没有得到许可是不可以出去的，即使出去，保安措施一定要周全。所以，出去一次就意味着兴师动众。

后来，溥仪买了一辆汽车，这才可以比较方便地出城。当然，每次出城，后面总会跟着几辆车。

溥仪的老师庄士敦是个中国通，跟新文化旗手胡适素有交往。庄士敦拿出胡适的一些文章给溥仪看，溥仪对于新文化并不排斥，看了胡适的文章，颇为叹服，便让庄士敦安排自己跟胡适见一面。

溥仪曾回忆与胡适见面的经历：“不久，他果然来了，他来见我，已经稀奇，可是还有更稀奇的。他一见面就称呼我皇上，我当时想，一个新文学家怎么能称我为皇上呢？怪事！怪事！”

对这次见面，胡适是什么感受呢，从他给庄士敦的信中可以了解：“我没有待很长时间，大约二十分钟就告别了陛下，去赶赴另外一个重要约会……我必须承认，我被这件小事深深地感动了。就在这里，我面对着我国最后一个皇帝，我面对着历史上所有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个代表。”

青春期的溥仪越来越反感宫廷中的那一套，生活方式越来越西化。他甚至不愿坐皇帝专用的金顶黄轿，反而喜欢骑自行车代步。对溥仪这些洋气的爱好，宫里人当然看不惯，太妃们经常教育批评，但溥仪已经很有个性了，他觉得这些东西是自己喜欢的，就应该坚持。溥仪与几个“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多，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越来越深。

溥仪后来为自己定做了一套民国将军的大礼服，为这事他跟“首席”母亲端康太妃吵了起来。端康让溥仪的生父载沣教训溥仪，载沣来了后，大骂溥仪：“你堂堂大清的皇帝穿着民国将军的衣服，像话吗？”

溥仪自然很不服气，载沣拿他没办法，毕竟儿子的身份是皇帝，总不可能动手打皇帝吧！载沣只好下令将溥仪身边的两个太监各打五十大板。

这事发生后，端康太妃对溥仪管教更严了，派遣了几个太监监视溥仪。溥仪对此非常不满，经常对人咆哮：“我还是不是皇上了？”

太妃最担心的是溥仪想出国，溥仪多次流露出这种想法，溥仪一旦出国，那四百万就没有了。溥仪与端康的矛盾不断升级，还是从辞掉一个医生开始的。

这个医生叫范一梅，曾经为溥仪治过病。端康过生日那天，范一梅没有过来祝寿，端康一怒之下把他开除了。溥仪听说此事，到端康面前大发脾气：“我是皇帝，宫中的人员去留由我决定。你要这么干涉的话，还要我这个皇帝干吗！”

女人是受不得气的，何况还是自恃是母后的女人。端康立即到王公大臣面前历数溥仪的不孝，但是大家都很沉默，只有溥仪的父亲载沣安慰了她几句。端康看拿溥仪没辙，便把溥仪的祖母和母亲叫进宫，大发雷霆。溥仪的祖母和母亲只好去劝溥仪向端康认错，这才了结此事。

溥仪的生母受到端康的折辱，回去后想不开，抽鸦片解闷，整日饮酒消愁，就这样活活把自己给折磨死了，于1921年9月30日自杀身亡。

听说母亲自杀，溥仪悲痛欲绝，还赌气说永远不再回到宫中。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不回宫中是不可能，所以溥仪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次谁也拦不住他。溥仪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出来，除了庄士敦之外，人人表示反对。

宫人们告诉溥仪，一旦出国的话，“优待条件”可能会作废，因为根据“优待条件”的条款，清帝退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皇帝一旦离开紫禁城的话，很有可能给民国政府以借口，取消“优待条件”。溥仪一听，心里更有底气了，心想：“他们吃我的，喝我的，怕我一走什么都没有了。”

溥仪的父亲载沣是一个非常实在非常老实的人，他每年能拿到一定的津贴已经很满意了，所以他很担心溥仪这一走津贴也跟着没了。

但溥仪是一个热血青年，有很强的自尊心，他对自己的处境很不满，虽然名义上是个皇帝，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一切不过是虚设。每年虽然能拿到一大笔钱，但是靠民国政府养活在他看来也是个耻辱。很多时候他宁愿放弃这一切，只为换来一些自尊。

看到所有的人都反对自己出国，溥仪甚至产生了出逃的想法，民国十一年（1922年）六月三日，溥仪密会庄士敦，还让他在宫门口准备两辆轿车。见面后，溥仪让庄士敦送自己到英国使馆，不过庄士敦却不同意他这么做。庄士敦认为，出国可以，但不能偷偷摸摸，作为一个皇帝，如果偷偷溜出国，必然会在社会中引起震荡。

庄士敦在信中已经提及此事：“陛下继续说，等他一到公馆，他打算发一个电报给中国人民，声明他感到继续做无用的国家补助金领取者是耻辱的，希望不仅放弃作为退位代价而由民国政府承诺每年付给他的400万元，并且放弃他的皇帝头衔及其所有的附属权利，包括占据皇室的特权。发出这一电报后，他打算立即安排出访欧洲，并且将麻烦英国大使一段时间，直到做好去外国旅游的一切准备。”

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庄士敦看溥仪憋得实在太难受了，终于同意帮助溥仪出逃。溥仪让庄士敦请荷兰公使欧登科帮忙，一同策划这次出逃行动。欧登科同意帮忙后，溥仪派弟弟溥杰去找欧登科，约定开车到神武门外。

就在溥仪和溥杰准备偷偷出宫的时候，载沣忽然下令，所有宫门一律关闭，严禁出入。载沣显然提前知道了溥仪想偷偷出宫的消息，质问溥仪时，溥仪一概不承认。

溥仪这下绝望了，在他眼里，紫禁城就是一座监狱。

经济上的那些事儿

溥仪一家六口人，每年享受四百万两的津贴，这个数目对一个退位的皇帝来说确实不算小。如果把这笔钱用来投资或是经商的话，溥仪一家就永远不用担心坐吃山空的问题了。可惜他们都没有商业意识，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当时民国政府穷得叮当响，四百万常常是打折的。

第一年是一百万两，但是第二年就只有两百八十万两了，第三年是两百四十九万两，第四年是两百六十六万两，第五年只有一百五十三万两……

皇室生活崇尚奢侈，如果只有一百多万两，日子过得肯定不是那么阔绰的。经济陷入了困境，皇室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典卖文物古董，甚至变卖房产。有人可能会奇怪，溥仪一家也就六口人，一百多万两银子还不够花吗？

光是溥仪一家人可能还花不了那么多，关键是皇室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有大量的服务人员，这些人员都要吃饭，都要发工资，光是内务府的官员就有一千多人，太监有一千五百多人，后来虽然逐年裁减冗员，但数量还是很可观。而且这些官员和太监们承袭了以前的陋习，喜欢从中捞油水，所以说这点银子确实很难满足这些人的开销。

好在皇宫里还有大量的珍宝，而且这些宝物一般都是无价之宝，把这些宝物卖出去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收入，虽然是贱卖，但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当时，皇室的人都把皇宫里的宝物看成是皇家的财产，而且他们都知道清朝已经完蛋，如果自己不卖掉的话，将来民国政府很有可能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

趁着民国政府还没有没收皇室财产的计划，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天，溥仪成立了一个皇室财产调查委员会，将皇室的财产列在账单上，由他亲自过问。

然而，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夜晚发生了一场火灾，让溥仪损失惨重。当时溥仪正在婉容的房里与婉容聊天，忽然听说建福宫中的德日新殿着火。这场大火烧了十多个小时，蔓延到很多地方，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扑灭。建福宫一带的宫殿里珠宝堆积如山，里面大量的珍宝化为灰烬。

内务府经过统计后公布：在这场大火中被烧毁的金佛有两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还有其他一些东西。统计数据肯定是不准确的，有大量的东西是没法统计的。

内务府派人清理了火灾现场后，捡回五百多袋东西。有意思的是，溥仪后来在这片废墟上修了一个网球场，打网球时还有人在这里捡到金片。北京的一家金店用五十万元买下了这块废墟的灰烬处理权，可以想象这场大火留下了多少东西。

后来，养心殿的无逸斋又失火了，由于发现及时，并没有引起大火。这件事引起了溥仪的警惕，他怀疑是有人故意纵火，决定赶走身边的太监。

七月十六日，除了太妃身边的一百七十五名太监，溥仪把其他太监全部解散了。溥仪这么做大家都不同意，尤其是载沣，拿出祖制来

压溥仪。溥仪不甘示弱，质问父亲宫中两次失火由谁负责，载沣答不上来。溥仪立刻表示，如果不允许他解散这些太监的话，他干脆把所有的太监都解散，一个不留。看溥仪态度强硬，载沣只好屈服了。

溥仪怕有人阻挠，当天晚上就叫了一支护军，把太监们全叫到一个院子里，宣布解散这些太监，让他们立即收拾细软出宫。一些太监们顿时瘫软在地，有的大哭，有的大声骂着，这些都可以理解，他们舍弃自己的命根子进宫当太监，为的是什么，一夜之间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这是非常大的打击，不光是失业那么简单。

一个小时候，太监们拿着遣散费走出神武门。

撵走太监后，溥仪接下来要整顿的是内务府。内务府也是人员庞大，开支甚多，而且内务府的人掌管皇家开支，捞油水的情况更严重。在溥仪眼中，内务府完全是一个腐朽的机构，这些人不过是一些寄生在皇家肌体上的寄生虫。内务府相当于皇家的财产管理机构，但是却把财产都侵吞到自己的荷包里。

溥仪任命刘体乾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内务府的财务问题。溥仪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裁减人员，精简机构。虽然溥仪把内务府机构简化为总务、文书、会计、采办四科，但贪污腐败问题还是非常严重。

第十六章 与世沉浮的皇帝

两年后，婉容的青春美貌逐渐失去。1937年3月7日，溥仪三妹给溥仪写信，说婉容前后变化太大了，现在变得非常可怕。婉容经常用长发遮面，不敢给人看。到了伪满政权后期，婉容已经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境况非常凄惨。

张勋复辟

作为末代皇帝，溥仪在很多事情上都是矛盾的，首先他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心里理应存着故国，但是他的思想又非常西化，生活方式也模仿西方，受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比较深。

从小到大，身边的人就告诉溥仪，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应该继承祖制，光复大清。甚至连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也错误地认为专制制度适合中国，中国人民跟其他国家的人民不一样，就喜欢皇帝，只有金銮殿上坐着一个皇帝，他们才有安全感。

加上民国搞得一团糟，专制思想在中国有非常坚实的基础。

溥仪从小就长在深宫里，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侵蚀。庄士敦回忆说，皇帝直到十三岁还没有出过紫禁城。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溥仪才带着两个妻子经过重重阻力，艰难地迈出了紫禁城，一睹外面的世界。

溥仪成了封建时代的一个象征，很多有光复想法的人都想将来有一天打着溥仪的旗帜，恢复君主专制。袁世凯在称帝前就做足了功夫，对溥仪毕恭毕敬，袁世凯的姿态其实就是表明皇帝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袁世凯自己称帝后，全国反对，抑郁而死。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和张勋密谋复辟，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扶植溥仪这个傀儡，然后自己掌握军国大权。

宗社党在这方面的需求就更加强烈了，恭亲王溥伟在青岛宣传复辟思想，溥伟还准备典卖家产当复辟的经费。皇宫里的人也在不断地跟各地军阀联系，希望他们支持复辟。一时之间，复辟思想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载沣跟张作霖联系颇多，一时之间社会上流传张作霖

准备复辟，支持小朝廷。连康有为也主张复辟，他不断地说服军阀吴佩孚加入复辟阵营。

在这种形势下，溥仪不可能无动于衷。

民国六年（1917年）七月一日，张勋复辟，扶植溥仪登基。这一年溥仪才十一岁，完全是这些军阀们的傀儡。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大总统，段祺瑞当上国务总理。但这个总统跟总理的关系非常不好，两人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当时张勋是一个大军阀，两人都想拉拢他。

张勋看机会来了，竟然以调停黎元洪和段祺瑞矛盾的名义率领军队北上。民国六年六月十四日，张勋的军队抵达北京。

溥仪以皇帝的身份在养心殿里召见了张勋，张勋对溥仪行三跪九叩大礼，溥仪在自传中回忆这段经历：

我按着师父（陈宝琛）的教导，问他徐兖地方的军队情形，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些失望。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看他的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胡子，倒像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注意到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

在这次会见中，张勋并没有提到复辟的事情，因为张勋很清楚，溥仪还小，而复辟事大，决不能轻易说出去，最好的情况是，复辟成功后，给溥仪一个惊喜。

六月三十日晚上，张勋入宫，和陈宝琛商量复辟大事，当时有五十多个要人在场，这些人中不乏像王士珍这样的实力派，大家都赞同复辟。

第二天，陈宝琛告诉溥仪：“皇上，你马上就可以再当大清的皇帝了，伟大的复辟事业已经开始了。”

溥仪很高兴。陈宝琛告诉他，上朝之时，张勋给你请奏，你答应就是了。溥仪点头同意。

上朝之时，张勋行过三跪九叩大礼就开始请奏：“皇上啊，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现在只有皇上重登大典，才能救万民于水火啊！”

溥仪问道：“如果我当了皇帝，那黎元洪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

事前，张勋曾经胁迫黎元洪放弃大总统之位，支持溥仪当皇帝，但遭到黎元洪的拒绝。此时，为了哄骗溥仪，张勋说：“黎元洪已经

答应辞职了。”

溥仪按着陈宝琛的教导说：“既然这样，朕就准奏。”

第二天，溥仪再次当上大清的皇帝，溥仪当上皇帝后，幕后团队为他出台了九项改革措施：

- 一、大清实行的是君主立宪政体；
- 二、皇室费用四百万两银子照旧；
- 三、皇亲贵族不得干预政事；
- 四、满汉一律平等；
- 五、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仍然有效；
- 六、废除民国发行的印花税和其他一些苛捐杂税；
- 七、废除民国法律，用宣统元年的法律；
- 八、禁止党派之争，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 九、剪不剪发，臣民可自行裁决。

七月一日，张勋让康有为起草复辟通电，下发全国各地，张勋还要求康有为历数民国弊政，让大家觉得复辟是深得民心。

复辟之后，京城里的百姓确实热闹了一阵，很多人家挂起了龙旗。看到百姓们的热情这么高，陈宝琛非常欣慰，唯一煞风景的是黎元洪不肯退出总统府。头脑发热的陈宝琛居然让溥仪赐死黎元洪，溥仪心地倒还单纯，说道：“我刚当皇帝，就赐死以前的大总统，这么做太不像话了。再说了民国也优待过我啊！”

这次复辟活动中，张勋是第一功臣，张勋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专制派，民国建立后，就他的军队留着辫子，所以他的军队又叫辫子军。复辟之后，大权掌握在张勋手中，他担任内阁议政首席大臣，兼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同时还控制着兵权。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张勋是袁世凯第二，“哪里是什么大清复辟，不过是张勋自己想当皇帝罢了。”张勋还准备把自己八岁的女儿嫁给溥仪当贵妃，显然是想控制朝政。

张勋之心路人皆知，但他的政治手腕并不高明，螳螂捕蝉，后面还有黄雀啊！

张勋不知道的是段祺瑞集团对他虎视眈眈，段祺瑞跟黎元洪的关系不好，想借助张勋的力量赶走黎元洪，然后再来打掉张勋。张勋进京后，段祺瑞就表示要支持张勋当“第一领袖”，张勋复辟之时，段祺

瑞也表示支持。张勋复辟虽然赢得了一部分百姓的支持，但是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的力量仍然强大，很快反对的浪潮就一波比一波高。

此时，段祺瑞忽然以民国保护人的姿态出现，声称要讨伐张勋。七月三日，段祺瑞向全国通电，表示要反对复辟，两天后讨伐张勋。

两军一交战，胜负就出来了，张勋溃败。七月六日，张勋通电全国，表示辞去职位。复辟以闹剧收场。

当段祺瑞的军队打入紫禁城时，溥仪吓坏了。七月八日，溥仪只好颁布退位诏书。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担任民国大总统，段祺瑞继续担任总理。七月十四日，北洋军高层通电请求取消清室的优待条件，以免他们又作非分之想。但冯国璋和段祺瑞都不同意，毕竟他们是靠吃袁世凯的饭起家的，而袁世凯又是清廷的一个臣子，吃水不忘打井人。

冯玉祥逼宫

皇宫中的溥仪是没有安全感的，随时担心可能被人赶出皇宫，这种担心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成真了。

民国十三年，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军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要求溥仪一家全部搬出宫。鹿钟麟负责执行这个任务，他回忆说：“说起逼宫这件事来，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是辛亥革命不彻底，近因是张勋复辟。当时我们许多人就觉得了，宣统太不安分了。”

冯玉祥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是他的思想比较前卫，他认为革命不可以拖泥带水，必须彻底推翻帝制，中国才有未来。而且冯玉祥这个人很正直，袁世凯称帝时封他为男爵，他当时痛哭流涕，说袁世凯是在侮辱自己。

冯玉祥发动政变后，紧接着逼迫曹锟下台，修改清室的优待条件。冯玉祥对自己的心腹鹿钟麟说过这样的话：

“在中华民国的领土里，甚至在首都的所在地，居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中外政治阴谋家随时企图利用的孽根。现在稍明事理的人无不以留辫子为耻，留溥仪在故宫，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这是多么令人羞耻的事啊！”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内容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还是比较合理的：

一、宣统帝永远废去皇帝年号，与中华民国的国民享有法律上的一切平等权利。

二、国民政府每年补助清室五十万，并用两百万开办贫民工厂，收容八旗贫民。

三、清室应该立即搬出皇宫，住什么地方自己选择，国民政府负责保护清室的人身安全。

四、清室宗庙由民国卫兵保护。

五、清宫的私有财产完全归清室所有，但是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

鹿钟麟限定清室在两个小时内全部搬出，就是一般人搬个家两个小时也不够，由此可见冯玉祥对清廷之痛恨，急切地想把他们赶出宫。溥仪觉得很委屈，两个小时太短了。

两个小时到了后，清皇室的人还在那里拖拖拉拉，鹿钟麟拿出两枚空心炸弹，扬言要开炮。清室的人只好央求他再宽限一点时间，鹿钟麟愤怒地说：“最多给你们再宽限二十分钟。”

大家草草收拾一番，便在卫兵们的催促下出宫。

溥仪上车时，鹿钟麟还跟他握手，问他：“溥仪先生，你以后是打算当皇帝呢，还是打算做一个平民？”

溥仪说：“从今以后我只想做一个平民。”

鹿钟麟点头：“你这样想就好，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

冯玉祥此举受到孙中山高度的赞扬：“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欣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但段祺瑞反对冯玉祥的做法，他回到北京后，准备恢复对清廷的优待，这时候，孙中山立即站出来演讲，给段祺瑞施压，段祺瑞为了大局的稳定，才放弃恢复清廷优待的打算。

飘来荡去不自由

溥仪虽然表示自己要做个平民，但其实他是很不甘心的。他觉得是冯玉祥害得自己流离失所，感慨道：“我当皇帝，也是天注定的，是前生修来的福。我现在是困龙受灾难，等灾难一过，我还会回宫当真龙天子。”

溥仪出宫后，住在北府。这里比皇宫里更不自由，门外有国民卫兵在保护。名为保护，其实也是监视。

终于，溥仪待不下去了，想离开这里。听说这事后，鹿钟麟特来找溥仪商量，希望劝他留下。

鹿钟麟来了后，载沣和溥仪都要求能够放宽门禁限制，鹿钟麟也同意放宽限制，但是表示不允许年轻人和外国人进入溥仪的住处。他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防止溥仪跟外人勾结，又图谋复辟。

溥仪心里确实是愤愤不平，他经常对人说：“宫中的东西，全是列祖列宗苦心经营起来的，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才有今天，这些应该是我们皇家的私有财产，现在全给冯玉祥霸占了，天理难容。”

最要命的还不是财产问题，而是人身安全问题，大家都对冯玉祥心里没底，不知道他接下来会不会为难皇室成员。大家整日都过着惶惶不安的日子，尤其是载沣，更显得失魂落魄。溥仪本人，倒显得无所畏惧的样子。

庄士敦、胡适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等人极力想为溥仪争取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执政的段祺瑞对此并不反对。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溥仪先逃到日本使馆。日本方面很重视溥仪这个奇货可居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使馆待了三个月后，决定去日本留学。随后在日本警察的护送下，在罗振玉父子的作陪下前往天津。

溥仪到天津后，在日本旅馆住了一天，便搬到张彪的家里住，张彪是前清驻武昌第八统统治，他对清朝存着感恩之心，免费供溥仪和两个妃子吃住。张彪死后，溥仪搬到陆宗舆的家里住。

溥仪在天津一待就是六年。

溥仪原本是打算出国，为什么在天津一待就是六年呢？这还是因为他存着复辟的幻想，在天津时，他认识了大量的军阀，这些人都对他表示忠心，以至于让他认为复国有望，张作霖就是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军阀，溥仪在自传中回忆与张作霖见面的情景：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也没有事先指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上将军好。”我就着劲，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厅门。我心里很高

兴，而且多少——虽然这已不像一个皇帝的心理——有点感激他刚才的举动……当然，我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并不是忘旧的。

张作霖对溥仪说，他对冯玉祥逼宫的事情很不满，同时还怪溥仪不该投靠日本人，说自己完全有能力保护皇帝。张作霖还向溥仪信誓旦旦地保证，溥仪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只管开口就是了。张作霖还建议溥仪去东北住，住在宫殿里。

讨好溥仪的大军阀远远不止张作霖，吴佩孚也急着献殷勤。

张作霖死后，溥仪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如果想稳住东北，必须借助溥仪。而溥仪也想借助日本的力量，光复大清，这虽然是与虎谋皮，但在溥仪看来，也是值得的。

在天津的这段日子里，溥仪与日本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日本方面对溥仪也照顾得很周到。双方就这么越走越近，为后来的阴谋奠定了基础。

溥仪在天津的日子显然比皇宫里要丰富得多，在这里大家都很尊重他，把他当成“皇帝陛下”，而且人们纷纷给他送钱，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但是在天津的日子里，溥仪的家庭生活却有些不幸，首先是文绣与婉容关系的恶化。而且，溥仪对两个妻子的感情似乎也不深，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主的奴才和工具。”

婉容毕竟是正宫，名义上是皇后，所以难免要骄横一些，经常教训文绣。最后，文绣实在受不了，愤然出走。后来，溥仪总算是让人把她找了回来，回来后文绣依然愤愤不平。

看到溥仪一味偏袒婉容，文绣愤然提出要跟溥仪离婚，并让溥仪支付五十万元的赡养费。这事让溥仪非常震惊，但他还是跟文绣签订了离婚协议。

文绣离开后，溥仪对婉容也越来越冷淡，心思全都放在了复辟上。

文绣离开溥仪后，拿到了五万五千元的赡养费，由于她不会持家，这点钱很快就用完了。后来，她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只好卖掉首饰，自己租了一个小房子，并辞退了所有的佣人。

文绣的晚景是非常凄凉的，她后来靠糊纸盒卖烟过日子，再后

来，她嫁给了国民党军官刘振东。新中国成立后，刘振东当清洁工人，夫妻两人过着最平凡的生活。1953年9月17日，文绣病逝。

比起婉容的命运，文绣还算是好的。婉容后来跟溥仪到了东北，到东北后，溥仪娶了日本妻子，对婉容不闻不问。婉容身心受到极大的刺激，于是拼命地放纵自己，饮酒吸毒，甚至跟溥仪的侍卫私通。最后，婉容处于半疯半傻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凄凉地死在监狱里。

日本人的傀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史称“九一八事变”。

9月20日，日本在沈阳成立了军政和市政两个公所，同时改沈阳为奉天。日本人很清楚，要控制东三省必须安置一个傀儡，最好的人选莫过于溥仪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受到日军铁骑的蹂躏，全国人民都在愤怒和悲痛之中，溥仪却置人民的感情于不顾，从民族的灾难中看到了复国的希望。溥仪甚至写信给抗日英雄马占山，劝他放弃抗日的打算，投降日本人。

关东军让奉天市长土肥原贤二去天津接溥仪到东北，溥仪求之不得，见到土肥原之后，溥仪脸上洋溢着笑容和希望。从一开始，溥仪就认为土肥原很靠得住，甚至比张作霖那些人都要牢靠。土肥原也是一个非常会说话的人，他说日本出兵东北也是不得已，日本对东北完全没有野心，只不过是忍心看到中国被军阀败坏，想帮助溥仪建立起一个满洲的政权。

溥仪完全被复辟的幻想冲昏了头脑，他不知道日本人是虎狼，不可能真心帮他复国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溥仪心里完全没有感受到四万万中国人的痛苦，他只是觉得现在自己的利益跟日本人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损失点良心又算什么呢？

得到日本人的支持，溥仪感到很满足，但还有一点他不放心，他问土肥原，建立满洲政权后，到底是实行帝制还是共和呢？土肥原笑着说，自然是帝制了，这下溥仪没有后顾之忧了。

这虽然是一桩政治买卖，但中间还是有一些波折的，日本高层在立溥仪还是恭亲王溥伟问题上有分歧。溥伟这个人显然比溥仪能力更强，溥伟很早就组织宗社党企图光复大清。宗社党失败后，溥伟不甘

心。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让溥伟看到了希望，他在沈阳成立了个明光帝国，要求土肥原参加会议，当场表示反对立溥仪。

就在这时，蒋介石也看出了溥仪的价值，派人去找溥仪，只要溥仪跟南京政府合作，愿意恢复清廷的优待条件，但溥仪宁愿相信日本人，也不愿相信蒋介石。

11月10日，溥仪在日本人的策划下秘密出逃。到了东北后，日本方面并没有打算立即立他。他们觉得，如果过早立溥仪，可能会刺激西方列强。

1932年1月13日，日本中央开了一系列会议，打算筹建伪满洲国。2月16日，关东军召集了一大批“汉奸”，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第二天建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18日，委员会宣布东北脱离中国。

不过，在伪满洲国的政体方面，日本高层还是发生分裂。溥仪很希望他们实行帝制，为此写了一份“正统系十二条”，威胁关东军高层，如果他们不接受自己的要求，自己就回天津。日本的负责人板垣请求溥仪接受“执政”之位，溥仪听了非常生气，拒不接受。板垣说：“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恢复帝制，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新国家。”

溥仪最终还是拗不过日本人，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求。2月24日，日本方面做出最后决定，确定了伪满洲国的元首为执政，国号为满洲国，国旗为新五色旗，年号为大同。

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宣告成立，从伪满洲国成立到日本战败投降，经历了近十三年半的时间。这十三年半等于是溥仪第三次当皇帝，这次当皇帝跟前两次又不同，前两次如果说是为了大清的利益在挣扎的话，那么这次就是出卖国家的利益成全个人的利益，而且这利益也是虚幻的。

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礼，任命心腹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同时任命了三个省长和其他一些首脑。就职以后，溥仪秘密与日本人签订卖国协定，其中有一份协议叫《日满议定书》，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为“独立的国家”，伪满洲国则承认日本在东北的一切利益。

这是溥仪第三次充当傀儡，溥仪的前半生是傀儡，后半生是战犯。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政权又改行帝制，溥仪颁布诏书，再次继位为皇帝。溥仪本想穿龙袍登基为皇帝，但是关东军不允许他这样做，理由是日本人只承认他是满洲皇帝，不承认他是大清的皇帝，所以不准穿龙袍。

刚当皇帝的时候，溥仪还想励精图治，做康雍乾那样的皇帝。于是，溥仪一改往日懒散的习气，每天早起，到“勤政楼”里“勤政”，但溥仪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真正的实权都把持在日本人手中。其实，就连自己的心腹郑孝胥都开始背叛溥仪，他背着溥仪跟日本人进行私下交易，溥仪很生气，打算换掉郑孝胥。

溥仪提出自己的想法，日本人都不同意。后来日本人听说郑孝胥也不太听话，这才同意撤换掉总理，郑孝胥曾抱怨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应该让他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

这话传到日本人耳朵里，日本人便用张景惠替代了他。

这件事也让溥仪明白，日本人比其他人更难搞，如果不听话的话，搞不好自己都会被换掉。做人还是识时务一点好，乖乖听话，做个傀儡至少能混得有头有脸。

事实上跟日本人作对是非常危险的，伪满洲兴安省的省长凌升是蒙古都统的儿子，号称是满洲的开国元勋。凌升比较有个性，一次在会议上谴责关东军说一套做一套，以前说满洲国是独立的国家，现在却完全控制了满洲国。

凌升这么一抱怨就丢了性命，会议一结束，日本人就逮捕了他，最后以“里通外国背叛日本”的罪名判处了死刑。凌升的儿子与溥仪的四妹结婚，日本人强行让溥仪解除婚约，还直截了当地对溥仪说：“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叫杀一儆百。”

自从经历了这件事，溥仪从此在日本人面前小心翼翼，不敢再提任何反对意见。关东军还把吉冈安直安插在溥仪身边，吉冈安直对溥仪说：“关东军是你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吉冈安直的意思是“我是你代理老爸”，这简直是侮辱。但溥仪根本不敢有任何怨言，溥仪见外人时，吉冈安直就会待在他身边，溥仪基本失去了人身自由。

溥仪曾描述自己的感受：

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从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

当然，溥仪并不甘心成为傀儡，他又开始了悲剧的挣扎。他想训练之前的七八名护军，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军事骨干，然后让这些人為自己建立一支军队。护军一直发展到三百多人，溥仪用自己的私房钱

养着这群军队，期盼这些人将来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日本人肯定容不下溥仪设立私人卫队的，对这支护军非常关注。

1937年6月28日，溥仪的护军在公园里休息的时候，关东军故意派便衣过来挑衅，结果双方发生斗殴。日本人放军犬来咬护军，护军踢死了军犬。日本宪兵借故过来将护军抓走，然后对他们进行严刑逼供，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东条英机下令将护军解散，同时由日本人担任溥仪护军的头领。

自此以后，溥仪再也不敢不听话了，只能老老实实做一个傀儡。对日本人而言，这个傀儡还是很管用的，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傀儡，他们可以利用溥仪掩盖他们的一切罪行，用溥仪的名义进行侵略，杀害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源。在诏书中，溥仪公开称日本人为恩人，支持日本的扩张政策。皇帝做到这份上，已经全无尊严可言了，不仅没有尊严，更是伤害了广大同胞的感情。

两度出访日本

溥仪在满洲做傀儡时两次出访日本，第一次是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自己的弟弟到长春对自己登位祝贺。

1934年6月6日，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奉天皇之命到长春祝贺溥仪登上皇帝大位，溥仪亲自到车站迎接。一年后，关东军让溥仪礼尚往来，回访日本。溥仪只好照办，1935年4月2日，溥仪前往东京，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战溥仪。

日本政府对溥仪的这次来访还是很重视的，他们做出了精心的安排，让溥仪住在赤坂离宫，这地方是裕仁天皇当年当太子住的地方。

4月13日，溥仪跟随天皇拜访了皇太后，同皇太后在花园散步时，上下坡之时，溥仪就像一个孝子一样扶着皇太后。皇太后感激地说：“陛下回到满洲后，以后每次日落，我都会想起陛下的。”

溥仪回道：“以后看到旭日东升，我也会想到天皇、皇后和皇太后对我的深情厚谊。”

溥仪在日本待的这段日子里，过得还算不错，日本天皇看起来也是个友善的人，临走之时，溥仪含着眼泪让负责接待自己的官员向日本天皇致谢。天皇听说溥仪这么重感情，竟然感动地流下泪来。

溥仪其实是演戏，他在自传里是这么写的：“这么一弄，就把那个老头子给逗哭了，回想起来，我连一点中国人味都没有。”

天皇对溥仪是什么感觉呢？天皇的母亲对溥仪印象非常好，对天皇说：“这个小伙非常不错，很讨人喜欢，也很孝敬老人家，看来他对我们日本感情很深啊，你要好好对他啊！”

裕仁天皇说道：“妈，不见得啊，从中国来的人都是相当会应酬的，他很有可能是逢场作戏啊！我去车站接他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那份真挚让我很感动。但是分别的时候他和我握手很像是例行公事，让我感觉特别冷淡。”

不管怎么说，溥仪这次访日心情还是愉快的，因为天皇对他的接见非常隆重，而且天皇对他也很友善，让他感觉到一种“平等姿态”。溥仪回国后，说了这样的话：“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回国后，溥仪鼓吹满洲与日本精神一体同心同德，这就是关东军安排溥仪访日的目的，让溥仪更加依赖日本，更加傀儡化。

溥仪第二次访日是在1940年6月，这时东北被日本殖民已经九年了，日本不满足东北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地位，决心要把东北并入日本的版图。在勒令溥仪访日之前，关东军经常对溥仪训话，既然日满精神一体，那么宗教信仰也应该一体。河源敏明写道：

当时名义上是用来庆祝皇纪（以神武天皇登基为元年的日本纪元）2600年。实际上主要是为要求把“天照大神”的神灵移奉到满洲国的建国神庙里。因为关东军，特别是皇室御用人员吉冈安直中将受到了压力。认为满洲国应该以神教为国教。最初，皇帝表示反对，最后只好咽下屈服的眼泪。

第二次访日，日本方面的接待不及第一次那么隆重，但也比较礼遇。6月22日，溥仪从长春出发，26日到达东京，日本天皇再次到东京车站迎接。29日，皇太后设宴招待溥仪。溥仪这次访日的目的主要是把“天照大神”接回东北，当成满洲国的大神供奉。

溥仪拿出吉冈安直事先为他准备好的讲演稿，说“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满洲想把日照大神迎接到宗庙中供奉。裕仁表示，既然满洲国皇帝这么坚持，他也只好从命。随后，裕仁递给溥仪三件代表天照大神的東西：一把剑、一面铜镜、一块勾玉。还向溥仪介绍这三样东西的用途。

在回去的路上，溥仪终于哭了。当溥仪把这三件所谓的神器带回

家时，全家人都禁不住大哭。日本人得寸进尺，让他更换祖宗，这对爱新觉罗的后代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溥仪在自传里写道：

自从我在旅顺屈服于板垣的压力以来，尽管我每一件举动都是对民族祖先的公开背叛，但那时我还有自己的纲常伦理，还有一套自我宽解的哲学：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举动看做是恢复祖业，对祖先尽责的孝行，以后又把种种屈服解释成委曲求全之计，相信祖宗在天之灵必能谅解，且能暗中给予保护。可是现在，日本人逼我抛弃祖宗，调换祖宗，这是怎么也解释不过去的。

此后，溥仪要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定时祭奠“天照大神”，这对溥仪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每逢初一十五，溥仪都要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去祭祀。

1945年8月11日，溥仪逃离长春伪宫时，放火烧了这座让自己饱尝侮辱的神庙。

末代皇后婉容的凄婉一生

到东北后，婉容就逐渐失宠了。溥仪和婉容分居了，很少理婉容。

溥仪冷淡婉容的原因很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婉容逼走了文绣，还有一个原因是到东北后，溥仪的心理受到扭曲，而婉容似乎并没有理解他。到东北后，溥仪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傀儡，性格多疑残暴，整天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就是关在家里“打骂、算卦、吃药、害怕”。总之，溥仪没法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在日本人面前溥仪唯唯诺诺不敢半点不敬，但是在房子里却写着：“日本人的气，还没有受够了吗？”

溥仪在自传中写到自己的状态，对此我们深表同情：

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颠颠，对家庭生活更没有一点兴趣。我先后有个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子，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来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个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女人是需要安慰的，溥仪这种状态显然无法安慰女人。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溥仪很需要婉容的精神支持，但是溥仪却没有感受到这

些，婉容的表现非常任性，看到溥仪冷落自己，没有选择自强自爱，而是选择了自暴自弃。

1934年6月7日，日本天皇的弟弟雍仁觐见溥仪和婉容，外界一直传言皇后有精神病，没想到婉容居然能出席招待雍仁的午宴，而且状态并不差。由此可见，婉容并非真有精神病，只不过是夫妻生活不和谐导致的结果。

1935年初，溥仪发现婉容怀孕了，立即断定婉容与人私通，因为溥仪知道自己患有不育症。其实在1931年从天津到大连的过程中，婉容的哥哥就为了私利把她卖给日本的军官。婉容怀孕后，恳求溥仪承认这个孩子，溥仪拒不承认这个孩子，但是同意孩子生下来后交给婉容的哥哥去抚养。在此之后，婉容就被打入了冷宫。溥仪还让人监视她，只允许她的两个妹妹见她。

溥仪甚至想废掉婉容，但由于日本方面不同意，他才作罢。

从此以后，婉容就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苦闷时抽大烟喝闷酒。每年只有春节和溥仪生日时，婉容才有机会见溥仪，不过还不能单独相处，仍有其他人在场。每次见面时，婉容都打扮得干净整洁，以求博得溥仪的欢心。

婉容的烟瘾很大，每天要抽二两鸦片，八十多支香烟。烟瘾犯了之后，婉容经常表现失态，有时候会穿着睡衣往外跑。但婉容精神正常的时候，还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两年后，婉容的青春美貌逐渐失去。1937年3月7日，溥仪三妹给溥仪写信，说婉容前后变化太大了，现在变得非常可怕。婉容经常用长发遮面，不敢给人看。到了伪满政权后期，婉容已经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境况非常凄惨。

当然，婉容也不甘心一辈子就这么毁了，曾经试图作出挣扎。她有两次争取“自由”的尝试，1932年4月，李顿代表团来到东北，婉容派人去大连见中国代表、调查团的顾问顾维钧，请求他帮助自己从长春逃走。顾维钧委婉地拒绝了她，并让人转告她，自己不过是个顾问，即使想救她，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1933年，婉容托赵欣伯的妻子向日本人请求去日本养病。婉容很委屈地对溥仪三妹说：“为什么别人有自由，偏偏我没有自由？”溥仪三妹说：“你是皇后，跟其他人不一样，不自由是很正常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以后的事情就知道了。”

果然正如溥仪三妹所说，婉容的反抗是不会有希望的。

1945年8月，日本战败，伪满洲政府垮台。8月11日，婉容跟着溥仪坐上了前往长春的专列，13日，在通化临江大栗子沟，溥仪将婉容和李玉琴扔下，准备坐飞机去沈阳，然后转飞到日本。婉容被抛下后，精神接近崩溃状态，哭喊叫骂，连走路都走不稳。

后来，苏军告诉婉容，溥仪已经被抓住了，将送往苏联。婉容给溥仪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很平安，希望早日与他相聚。

1946年4月29日，民主联军将婉容送到她哥哥润良的家里，润良不肯收留她。此人就是当时捏合婉容跟日本军官胡搞的那个哥哥，他当时靠婉容发迹，现在婉容晚景凄凉，他居然拒自己妹妹于千里之外，这种冷酷实属罕见。

婉容没有落脚之处，只好跟着军队继续走，到了吉林后又从吉林向延吉前进。在路上，婉容已经奄奄一息。从延吉转到敦化后，婉容病情恶化，高烧不退，不久便凄凉离开人世。

婉容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溥仪在满洲当皇帝时，又娶了两个“贵人”。1937年4月6日，溥仪娶了满洲贵族的女儿谭玉龄，就像溥仪自己所说，谭玉龄也不过是一只养在笼子里的鸟，这只年轻的小鸟在1942年就死去。谭玉龄人长得很漂亮，天真纯洁，她的到来安慰了溥仪受伤的心。

溥仪非常喜欢她，只可惜在1942年8月13日凌晨，这只可爱的小鸟就离开了人世。谭玉龄得的是伤寒症，并不是什么绝症，溥仪怀疑谭玉龄之死跟吉冈安直有关。吉冈安直为谭玉龄请的是日本医生，这个日本医生对谭玉龄的病似乎不是很热心，日本医生要给谭玉龄导尿，溥仪不准，日本医生甩手不治，第二天谭玉龄就死了。

谭玉龄死后，关东军让溥仪娶一个日本人，溥仪不答应。吉冈安直只好拿来一些中国女学生的照片让溥仪挑选，结果溥仪挑选了李玉琴，李玉琴被册封为福贵人。李玉琴来到溥仪身边时只有十五岁，溥仪之所以选一个年龄小的就是怕对方是关东军的耳目。一个单纯的女孩子要容易控制一些，这是溥仪的真实想法，他不想跟自己同床共枕的人还是关东军的耳目。

李玉琴出生于汉族贫民之家，溥仪娶她更是与爱情无关。由于是贫民出身，李玉琴身上缺少贵妇人的气质，为此遭到了仆人家人的嘲笑。尽管如此，这个出身贫贱的贵人仍然觉得当溥仪的老婆很有面子，从温饱都成问题的家庭一下子变成了伪满洲的皇帝的贵人，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难免养成一些骄矜之气。

溥仪给她提供了奢华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权威的丈夫，高高在上，而且这个丈夫喜怒无常，所以李贵人在溥仪面前总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日本战败后，李玉琴的境遇要比婉容好一些，因为她“出身好”。民主联军做他的思想工作，让她跟溥仪划分界限，参加革命。李玉琴没有接受，表示自己是溥仪的妻子，一定会忠于溥仪。但是第二年四月，她就改变了想法，写了一封与溥仪离婚的信，便回到娘家。但后来她被溥仪的族兄溥修接到家里，溥修打算把她送到北京的醇王府，不过载沣没有同意。李玉琴只好住在溥修的家里，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奴仆。

1951年，李玉琴随溥修一家来到北京。1953年，她挣脱溥仪家族的束缚，回到长春，可惜找不到正式工作，只好做临时工为生。1955年3月，李玉琴收到一封信，是溥仪从监狱中寄过来的，李玉琴给溥仪回了一封深情的信。之后，她去监狱里探望过溥仪四次，每次都带一些糖果过去。

不过由于溥仪是战犯，李玉琴跟他交往顶着很大的压力，家里人都反对她这么做。1956年，李玉琴在长春图书馆工作，到了年底，她又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次她找溥仪是谈离婚之事，但是管理所的领导却不赞同她跟溥仪离婚。他们竭力开导她，让她继续跟溥仪待在一起，为了方便他们，领导们还让她跟溥仪住在一起。但是这位女士坚持要离婚，溥仪虽然心里很痛苦，但还是同意跟她离婚。

后来，李玉琴跟一个广播电台的职工结婚，两人生下一子，李玉琴后来还当上了长春市政协委员。

新中国的公民

溥仪在沈阳被捕后的第二天，就被押往苏联，在苏联，溥仪过的还是俘虏生活，不过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他很担心苏联把自己送回国，因为他认为自己回国一定会被处死。

在苏联期间，他上书斯大林，请求永久生活在苏联。斯大林没有答应，溥仪在苏联期间学习了马列主义著作，思想得到一定的解放。

远东军事法庭成立之后，他到东京去作证，溥仪的证词对于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有很大的作用。1950年，前苏联将溥仪引渡回国，一路上溥仪吓得半死，他觉得这一回去必死无疑。

溥仪万万没有想到，接待他的共产党人态度非常亲切和蔼，溥仪听到对方说：“我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现在你们回国了，先好好休息休息吧……”

后来溥仪进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呆了近十年的时间，在这里，溥仪脱胎换骨，最终蜕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公民。在监狱中，溥仪发现没有人当自己是皇帝，甚至有人当面骂自己是废物，因为溥仪做事笨手笨脚的。

刚开始溥仪也不适应，但时间长了，也就慢慢接受了现实。监狱的生活让溥仪完成了从一个皇帝到平民的心理过渡过程。

溥仪出狱的时候，听到弟妹们叫自己大哥，顿时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把溥仪的七叔载涛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问载涛：“你现在还跟溥仪往来吗？”载涛说：“他是战犯，我怎么能跟他往来呢！”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消灭的是阶级，而不是某个人。你们家族要帮助他，关心他，共同使他成为新人，有时间的话，也要去看看他。”

1959年，新中国感觉溥仪的改造已经完成，给予溥仪特赦。溥仪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大哭。

溥仪出狱后，来到北京，他的父亲早已去世，妻妾也是死的死，离的离，兄弟姐妹们也都有自己的家，溥仪无处可去，后来住在五妹的家里。

1960年2月16日，溥仪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工作，开始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溥仪的改造是真诚的，他从内心深处变成了一个新人，有一次他回北京过春节的时候，有一些家族成员要给他磕头，称呼他为皇上。溥仪听了非常生气，认为这是对自己极大的侮辱，溥仪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说明你们头脑里还有封建思想，那就是故意要跟我作对。”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很关心溥仪的生活，认为溥仪从监狱出来，努力工作，已经完成了新时代公民的改造，应该找一个贤内助过好生活。1962年1月8日，溥仪从照片上认识了李淑贤，对方是朝阳区门诊所的一个护士，溥仪觉得这样一个自食其力的女人正是自己所需要的，便于4月30日与她举行婚礼。

婚礼的一切费用由国家报销，溥仪心存感恩，一切从简。

在跟李淑贤结婚之前，溥仪对李淑贤说：“现在我一无所有，以前的珍宝全部捐献给国家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李淑贤说：“你要是还像以前皇帝时那么坏，我就不嫁给你了，就算你有千千万万的珠宝我也不嫁。”

溥仪对李淑贤是非常好的，很难想象一个曾经的皇帝会如此关心自己的妻子，李淑贤身体不好，不能闻烟味，溥仪毅然戒烟。后来李淑贤患了子宫瘤，溥仪吃不好饭睡不着觉，时时落泪。后来确认是良性肿瘤，溥仪才安心。当时溥仪自己刚切去左肾不久，经常强忍着病痛去看望李淑贤。

夫妻之间的情感很真挚。

溥仪的改变是彻底的，可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溥仪成为了红卫兵攻击的对象。幸亏周恩来及时对溥仪进行了保护，溥仪才能免于被侮辱。然而，溥仪还是没能逃脱病魔，其实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

1967年10月17日凌晨，末代皇帝溥仪因病去世，根据家属的意见，溥仪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

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平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